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00005.jpg 4](#_Toc55141229)

[序章 7](#_Toc55141230)

[第一章 孝明天皇 12](#_Toc55141231)

[第二章 祐宮出生 20](#_Toc55141232)

[第三章 開國難避 27](#_Toc55141233)

[第四章 下田條約 34](#_Toc55141234)

[第五章 安政大獄 41](#_Toc55141235)

[第六章 賜名睦仁 47](#_Toc55141236)

[第七章 和宮下嫁 55](#_Toc55141237)

[第八章 “征夷大將軍” 63](#_Toc55141238)

[第九章 蛤御門之變 71](#_Toc55141239)

[第十章 家茂去世 78](#_Toc55141240)

[第十一章 孝明駕崩 85](#_Toc55141241)

[第十二章 美子皇后 92](#_Toc55141242)

[第十三章 末代將軍 99](#_Toc55141243)

[第十四章 將軍遁走 108](#_Toc55141244)

[第十五章 接見公使 116](#_Toc55141245)

[第十六章 五條誓文 129](#_Toc55141246)

[第十七章 親王叛亂 137](#_Toc55141247)

[第十八章 東都江戶 147](#_Toc55141248)

[第十九章 剛、毅、木、訥，近仁 156](#_Toc55141249)

[第二十章 英國公爵來訪 164](#_Toc55141250)

[第二十一章 帝師元田永孚 172](#_Toc55141251)

[第二十二章 廢藩置縣 180](#_Toc55141252)

[第二十三章 初次巡幸 189](#_Toc55141253)

[第二十四章 “征韓”論爭 198](#_Toc55141254)

[第二十五章 江藤新平之死 208](#_Toc55141255)

[第二十六章 早蕨之局 220](#_Toc55141256)

[第二十七章 西南戰爭 231](#_Toc55141257)

[第二十八章 功臣？叛臣？ 239](#_Toc55141258)

[第二十九章 大久保遇刺 248](#_Toc55141259)

[第三十章 吞并琉球 257](#_Toc55141260)

[第三十一章 格蘭特到訪 265](#_Toc55141261)

[第三十二章 教育改革 275](#_Toc55141262)

[第三十三章 籌備憲法 282](#_Toc55141263)

[第三十四章 卡拉卡瓦訪日 291](#_Toc55141264)

[第三十五章 自由民權 299](#_Toc55141265)

[第三十六章 濟物浦條約 308](#_Toc55141266)

[第三十七章 巖倉逝世 317](#_Toc55141267)

[第三十八章 江戶的舞會 326](#_Toc55141268)

[第三十九章 太子嘉仁 336](#_Toc55141269)

[第四十章 帝國憲法 347](#_Toc55141270)

[第四十一章 修學習業 368](#_Toc55141271)

[第四十二章 大津事件 378](#_Toc55141272)

[第四十三章 條約改正 391](#_Toc55141273)

[第四十四章 對清宣戰 399](#_Toc55141274)

[第四十五章 旅順屠殺 410](#_Toc55141275)

[第四十六章 馬關條約 424](#_Toc55141276)

[第四十七章 暗殺閔妃 434](#_Toc55141277)

[第四十八章 英照皇太后 449](#_Toc55141278)

[第四十九章 藩閥終焉 458](#_Toc55141279)

[第五十章 義和團運動 467](#_Toc55141280)

[第五十一章 英日同盟 482](#_Toc55141281)

[第五十二章 禍機暗藏 492](#_Toc55141282)

[第五十三章 戰前交涉 503](#_Toc55141283)

[第五十四章 “發現敵船” 514](#_Toc55141284)

[第五十五章 日俄談判 525](#_Toc55141285)

[第五十六章 高宗抵抗 536](#_Toc55141286)

[第五十七章 慶子去世 548](#_Toc55141287)

[第五十八章 伊藤遇刺 560](#_Toc55141288)

[第五十九章 吞并韓國 572](#_Toc55141289)

[第六十章 “大逆”陰謀 580](#_Toc55141290)

[第六十一章 天皇駕崩 591](#_Toc55141291)

[第六十二章 乃木徇死 600](#_Toc55141292)

# 理想國譯叢序00005.jpg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理想國譯叢主編

梁文道 劉瑜 熊培云 許知遠

[美] 唐納德·基恩 著 曾小楚 伍秋玉 譯

# 序章



環繞京都御所的北墻邊，有一所小小的房屋。明治早期，美國傳教士首次獲允住在這座古都內，他們在尋找住所時，曾將家具和其他物品暫時存放在這所房子里。房子如今很不起眼，即便它是僅存的幾座貴族宅邸之一，不僅在京都19世紀中期席卷御所的那場大火中幸免于難，還逃過了1868年遷都東京后的破敗與損毀。

將房子和花園與外人隔絕開來的圍墻外面，豎著一塊小小的木牌，上面寫著“祐之井”三個字。越過圍墻，勉強可以看到里面立著一塊巨大的石碑。這兩個標記提示著游客，這座房子的意義不僅僅是日本19世紀傳統建筑的一個樣本——何況是一個稀松平常的樣本。事實上，1852年，明治天皇[[1]](#_1__Ben_Shu_Cheng_Ta_Wei__Ming_Z)就出生在這座房子里，而且據不太可靠的傳說，他第一次洗澡用的便是“祐之井”的井水。[[2]](#_2__Ren_Men_Jing_Chang_Shuo__Min)

明治沒有出生在皇宮，而是在這樣一座普普通通的房子里，因為他的母親中山慶子（1835—1907）迫于風俗，在即將臨盆時離開了皇宮。傳統上，人們認為分娩會使住所觸穢，因此皇室的孩子通常都在母親家附近出生，一般是在一所單獨的房子里。這所房子一旦不再使用，很可能會被燒毀。諷刺的是，明治出生的這座小房子存留的時間比四周那些精心設計、屋頂一波高過一波的貴族宅邸都要長。

慶子的父親，權大納言[[3]](#_3__Da_Na_Yan_Shi_Ri_Ben_Gu_Dai)中山忠能（1809—1888），為了即將誕生的親王，在自己的宅邸旁邊建了這座產房。他一開始想使用鄰居的空地，不過，盡管這個尚未出生的孩子極有可能成為天皇，他們還是拒絕了他。最后，他只好把小屋建在自己已經很擁擠的宅邸里。跟當時的許多貴族一樣，中山忠能窮得蓋不起這樣一所小房子——兩個小房間，外加一個相連的浴室和廁所——不得不向別人借錢。[[4]](#_4__Zhe_Zuo_Fang_Zi_Ben_Shen_Hua)

房子本身雖然毫不起眼，但是一位神圣天皇（他在東京的神廟明治神宮每個新年都吸引幾百萬人參拜；即使平日里，也有數千人）的出生地竟然如此簡陋，如此不被重視，實在令人匪夷所思。這座房子長期以來被嚴重忽視，直到最近，他們才給它換了新瓦。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實用建筑，地面鋪著光禿禿的地板，沒有一絲裝飾，很難看出這里是日本最有名的天皇的出生地。

對明治出生地的忽視，同時也是人們對這個人總體印象的奇怪反映：即使是那些認為明治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統治者的日本人，也舉不出一個例子來證明他的輝煌聲譽。明治當然和1868年日本現代史開端的“明治維新”聯系在一起，但當時他只有十五歲，顯然無法對維新或者緊隨其后的重大改革做出關鍵貢獻。他的名字與對中國、俄國戰爭的大勝以及英日同盟聯系在一起，但他在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充其量是一個仁慈的君主，而非政策或者軍事策略的制定者。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位期間（甚至他死后很久），一直鼓舞著日本人以非凡的勇氣去締造功績。毫無疑問，在那些為新政權實施改革的人心目中，他是一位精神上的導師。

我們普遍對他缺乏了解，并非是因為大量證據遭到封鎖。明治從出生到死亡的一生中，幾乎每件事都有詳細的記錄。官方史書《明治天皇紀》幾乎逐日列出了他直接參與，以及發生在他周圍的相關事情。明治死后，認識他的人寫了許多書和文章，回憶他的日常生活和性格，但是不知為什么，這些書都沒能給人留下什么印象。作為第一位與西方人見面的天皇，他也出現在那些訪問過日本的外國高官的日記里。與謁見過他的幾個日本人不一樣，這些人沒有什么忌諱，從明治第一次公開露面起便坦率地描繪他的外表，這使得他們的書讀起來別有趣味。但是，他們提供的資料也很少。

除了十二卷厚厚的且印得密密麻麻的官方記錄記載的大量事實以外，還有無數關于明治的傳說和軼事，尤其是關于他的風流韻事和酒量的傳聞。甚至有人驕傲地宣稱是他的私生子，但他們的證據通常都站不住腳。的確，素材如此之多，看來對于想寫一部全面傳記的學者來說，唯一需要的只是耐心了。然而，在令人信服地刻畫這名在位四十五年且見證了日本歷史上最偉大變化的人物上，明治天皇的傳記作者鮮有成功。

原因可能在于這些傳記作者（不管他們是否愿意承認）得出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即明治天皇的個性并不見得比那幾張印有他畫像的紙來得深邃和復雜，人們習慣向這些君主的畫像鞠躬，而從不考慮隱藏在表面以下的東西。為了證明明治也有“人性”的一面，傳記作者通常會講一些趣聞逸事，說明他冷漠的外表之下隱藏著對皇后熾熱的愛，或者他無時無刻不惦記著自己的臣民，或者他具有極佳的幽默感。但是這類趣聞軼事未能給人留下什么印象，甚至讓人很難相信。近來一些喜歡揭露真相的批評家傾向于將明治描寫成一個對那些功績沒有絲毫幫助的人，或者反過來，將他描繪成一個毫不關心人民福祉的無情暴君。他們可能都錯了，這樣的努力只會使明治擁有持久不衰的名聲和數目眾多的崇拜者這件事變得更加神秘。

跟幾乎同時代的維多利亞女王不一樣，明治不記日記，而且幾乎沒有寫過信。明治的父親孝明天皇（1831—1867）留下了許多書信，大部分都充滿了對世界局勢發展的強烈憤怒，但是明治留下來的珍貴信件則不怎么有趣。除了在國家文書上的簽名，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手跡。[[5]](#_5__Ta_De_Xu_Duo_Shi_Du_Xie_Zai)他也沒留下什么照片（也許加起來不過三四張），而當時許多地位沒他高的日本人都經常去照相。他生前和死后繪制的幾幅畫像，要么是在視察銀礦，要么是在主持討論憲法草案的會議，但這些都是肖像畫，并非確確實實發生的真事，是一些可能從未見過明治長什么樣的畫家的作品。[[6]](#_6__Ming_Zhi_Shen_Gong_De_Sheng)

要想了解明治，除了官方記錄和他的侍從寫的非官方回憶錄（有時并不可靠）之外，還可以讀他寫的短歌[[7]](#_7__Duan_Ge_Shi_He_Ge_Zui_Chang)。據估計，明治一生寫了十萬多首短歌。盡管大都是一些傳統語言和意象，但包含了少量跟他生平有關的內容，其中透露出他在各種場合的情感；而他最為人知的作品——關于軍隊和教育的法令——都是由別人代勞，很難在他們的措辭中發現明治個人的信念。

他死后，認識他的宮廷人員所寫的文章都難以令人滿意，有時候還互相矛盾。有個人回憶明治小時候格外地健康活潑，可能還有點霸道，青年時期得過一次相撲冠軍。另外一個跟他同樣很熟的人則反駁說，孩提時代的明治身體虛弱，常常生病，這不禁使人懷疑起相撲冠軍這個說法來。許多傳記作者都講了明治第一次聽到槍炮聲時暈倒的故事，但是另一些傳記作者則否定這種說法。在面對這種種矛盾的說法時，現代讀者會傾向于相信最糟糕的事情，即孩提時代的明治實際上體弱多病且膽小怕事，只是他的傳記捏造了這些趣聞軼事，以顯示他是強健的大和男兒。但是，明治多年以前的那個玩伴回憶明治經常打他，難道是在說謊嗎？[[8]](#_8__Mu_Cun_Zhen_Zhi_You_Hui_Yi_S)

這樣的抵牾并非只存在于他的童年時期，他的聰穎、明智、對人民的關心，以及與一名統治者相稱的其他能力近來都受到了學者的質疑。試舉一個這類矛盾的小例子：明治真的（如他的一個侍從在回憶錄中所說的那樣）每天收到十幾份日本報紙和外國報紙，并認真地閱讀嗎？[[9]](#_9__Fang_Cheng_Jun_Liang____Gong)還是，（如他另一個侍從所說的）明治在統治初期還瀏覽一下報紙的標題，后來卻連看都不看一眼？[[10]](#_10__Zhi_Yu_Ta_Wei_Shi_Yao_Bu_Za)這樣的抵牾還出現在他日常行為的描述中，因此我們很難判斷他是個怎樣的人。如果他像人們常說的那樣，品味非常簡單，不愿在自己身上花錢，因此制服都打了補丁，[[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noYu)那這又如何與他喜歡鉆石和法國香水的傳聞對上號呢？[[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noYu)

即使艱難地讀完關于他日常生活的十二卷官方記錄，你也很難了解明治的感覺。我們確切地知道他何時第一次踏足御所外面，但我們真正想知道的并非這個具體的時間，而是當他從曾是他的整個世界的高墻之內走出來時，（就像釋迦牟尼一樣）第一次看到貧窮、疾病和死亡時，內心有什么樣的感受。

認識他的人稱贊他的剛毅、公平以及一些別的值得贊美的品質。即使我們認為這些贊美屬實，也會很想知道，一個基本上由宮中無知婦人帶大，喜歡傳統優雅的貴族消遣勝于武器的親王，一個許多世代都沒有參加過戰爭的君主后代，一個從未上過戰場的人，為什么會給人留下一直穿著戎裝的軍人印象？

在描繪明治的過程中，很難將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因為他總是被一些能力非凡且個性迥異的大臣包圍著。歷史學家往往從這些人的角度來討論明治的統治，認為這些人的輝煌成就都是以天皇的名義進行的，天皇只發揮著儀式上的作用。然而，認為明治的非凡名聲僅僅源于他（相當偶然地）是大變革時代的天皇，未免對他不太公平。一個更為負面的觀點認為，他的年幼和無知無疑幫了“大政奉還”領導者的大忙；你很容易想象，假如明治的父親孝明天皇（他對外國人簡直恨之入骨）沒有在三十六歲時英年早逝的話，這些人的工作會舉步維艱。明治盡管年輕，卻也能夠做出重大決策，舉個例子，由于他的介入，才阻止了侵略朝鮮的戰爭。當時西鄉隆盛等大多數大臣都主張入侵朝鮮。明治后來的多次行動——尤其是他多次到全國各地視察——使臣民們意識到日本是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將明治視為可有可無的人，就像將維多利亞女皇視為無能的人一樣，是非常不恰當的。[[13]](#_13__Giles_St__AubynPing_Lun_Dao)

明治的第一個名字祐宮，或者祐宮親王，是孝明天皇在他出生后一個星期給他起的。他后來的名字叫睦仁，這是他在位時簽署在文件上的名字。明治這個現在人們一般稱呼的名字，其實是他的謚號和年號。與西方的編年史不同，日本史書使用年號紀年。在睦仁將“明治”定為他整個統治時期的年號以前，通常一個皇帝的年號要更改多次——在一甲子六十年中的兩個固定時刻[[14]](#_14__Ji_Xin_You___Jia_Zi_Liang_G)，或者在發生一系列自然災害之后（這些自然災害被認為是年號不祥導致的），或者是出現了一些需要在歷法中記錄下來的祥瑞。明治的意思是“開明的統治”，這個年號從1868年他即位第一年起便作為他的年號，直到1912年他逝世為止。現在，這個年號還被用來描繪那個時期經歷急速變化和劇烈動蕩的整個日本文化。

我將在這本書中試著描繪這樣一個明治天皇：他生于一個幾百年來一直拒絕與西方接觸的國家，卻親眼目睹了日本變成一個世界強國，并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

1. [[1]](#_1) 本書稱他為“明治”，盡管這是他死后的謚號。在他生前，日本人只叫他“天皇”或者“皇帝”；“睦仁”這個名字主要是和外國人交往或者簽署文件時才用到的。

1. [[2]](#_2) 人們經常說，明治幼年的名字“祐宮”取自這口井，但是這口井是1854年8月京都大旱時才挖的，當時明治差不多一歲。“祐宮”這個名字（或者叫祐親王）是孝明天皇從參議五條為定建議的七個名字中選出來的。明治的曾祖父光格天皇（1771—1840）兒時也叫這個名字。該井以親王的名字命名，而不是反過來。孝明天皇自己因為對甘甜的井水非常滿意，所以將井命名為“祐之井”（《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9頁）。人們通常認為明治第一次洗澡用的是祐之井的井水（例如，栗原廣太，《人間明治天皇》,第1頁），但是官方記錄中清楚地指出，洗澡水取自出町橋以北的鴨川（《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0、23頁）。

1. [[3]](#_3) 大納言是日本古代官職，僅低于太政大臣及左右大臣，相當于副丞相。大納言為上述三公提供協助及參議政事，也是天皇的近侍。其下則是中納言、少納言。對于超出規定人數而任命的官職，則加上“權”字；后文中的親王是日本皇室典范中對皇子、皇孫的稱呼，皇女、皇孫女則稱作內親王。——譯注

1. [[4]](#_4) 這座房子本身花了一百兩銀子，而忠能則申請借款二百兩。這個申請經過層層遞交，最后在關白那里被拒絕，他說沒有借款超過一百兩的先例。于是忠能只借了一百兩，同時承諾將在十五年內分期還清。幸運的是，忠能的姑奶奶中山績子當時任大典侍，他才得以用她的名字又借了五十兩，這五十兩銀子將分十年償還（《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9頁）。忠能無疑希望孩子平安降生后，他女兒收到的禮物可以讓他償還這些債務。

1. [[5]](#_5) 他的許多詩都寫在紙片上，由專業的女書法家謄寫出來，然后銷毀。

1. [[6]](#_6) 明治神宮的圣德紀念繪畫館收藏了八十幅巨大的繪畫，展示了明治一生從出生到葬禮的各個重大事件。這些畫由當時的杰出畫家在1926—1936年間創作，但是很可能沒有一位畫家親眼見過明治。意大利畫家Edoardo Chiossone（1832—1898）是少數幾位為明治畫過肖像的畫家之一，他的畫被大多數人看成是照片，張貼在日本的所有學校。

1. [[7]](#_7) 短歌是和歌最常見的一種形式，由五、七、五、七、七個音節組成。——編注

1. [[8]](#_8) 木村禎之祐回憶說（當時他七歲，明治八歲）：“一旦發生什么讓他不高興的事，他通常會掄起拳頭，一拳打向那個倒霉的人。我記不清自己有幸挨過他多少拳頭。不管怎么說，我比他小一歲，一般不怎么怕他，總是斗膽做出一些違抗他旨意的事情來，每次他都會賞我幾個拳頭”（《明治天皇の御幼時》，第17頁）

1. [[9]](#_9) 坊城俊良，《宮中五十年》，第15頁。

1. [[10]](#_10) 至于他為什么不再看報，可以參考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53頁。

1. [[11]](#_11) 《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44頁、第175頁。

1. [[12]](#_12) 《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44頁、第175頁。日野西在第59頁提到明治有時會花幾萬日元購買鉆石戒指；第146頁上說他每兩到三天就用完一瓶香水。

1. [[13]](#_13) Giles St. Aubyn評論道：“幾乎所有的19世紀憲法文本都暗示女皇是一個擺設……實際上，沒有什么比這更荒謬的了，格拉德斯通（Gladstone）聽到了這樣的廢話可能會哭笑不得”（Queen Victoria, p. 218）。

1. [[14]](#_14) 即辛酉、甲子兩個年度。——編注

# 第一章 孝明天皇



孝明天皇有兩幅畫像。我們經常看到的是第一幅，天皇身著朝服坐在隆起的榻榻米（玉座）上，頭戴獨特的天皇冠冕，頂上有突出的羽狀帶子。他那張橢圓形的臉微微轉向右邊，沉靜而無表情，這是典型的朝服畫。沒有什么（也許除了羽狀帶子的角度）顯示這幅畫像作于19世紀而不是其他時候，比方說，13世紀。從孝明的表情中也看不出他長期為自己動蕩不安的統治感到揪心。這幅畫像中，孝明和他兩百年前的祖先一模一樣。他們大多是對國家幾乎沒有貢獻的傀儡，一生都不為大多數日本人所了解，如今甚至名字也已經被人遺忘。盡管這幅畫像中的孝明面無表情，但人們卻牢牢地記住了他。[[1]](#_1__Tian_Huang_De_Guan_Fang_Hua)

第二幅畫像給人一種完全不同的印象。他臉上露出強烈的個性，似乎主要是憤怒。孝明大半生時間確實充滿了憤怒。他留下來的書信和文件都清楚地表明，在他在位期間，幾乎每件新生事物都令他感到憤怒。他不只對每件事情生氣，還為自己無法阻止政府和社會發生這些迫在眉睫的變化而沮喪不已。

孝明生于1831年7月23日。他的父親仁孝天皇，是官方記載的第一百二十代天皇。他的生母并非皇后，而是一名侍妾，是貴族藤原實光的女兒。但是，孝明名義上是皇后生的孩子。作為仁孝天皇的第四子，按理說他是沒有機會登上皇位的，但是他的哥哥在他出生之前全都死了。這個時期，甚至到后來很晚近的時候，皇室嬰兒的死亡率都高得驚人。在仁孝天皇的十五個孩子中，只有三個活過三歲；在孝明的六個孩子中，只有一個（明治）活了下來；而在明治的十五個孩子中，只有五個長大成人。[[2]](#_2__Guan_Yu_Zhe_San_Wei_Tian_Hua)不清楚為什么皇室的嬰兒死亡率會比同期的日本農家高出這么多。[[3]](#_3__1899Nian_Ri_Ben_De_Ying_Er_S)人們將其歸咎于各種原因，例如過早結婚（皇位繼承人通常十六歲結婚）、宮廷醫生醫術的落后、宮廷中彌漫著不健康的陰沉氣氛等。也許還包括——盡管這一點很少被提及——可供挑選為妃的貴族女子數量非常有限，從而導致了近親通婚。



孝明天皇像

特別是18世紀初以后，除了一些例外，天皇的壽命都不長。櫻町天皇死于三十歲；他的繼任者桃園天皇，二十一歲；后桃園天皇，二十一歲；仁孝天皇（孝明的父親），四十六歲；孝明天皇，三十六歲。因此，太子很早便登上皇位：孝明的祖父光格天皇九歲登基；其子仁孝天皇，十七歲；孝明，十五歲；他的兒子明治也是十五歲登基。在其他情況下，年幼無知的皇帝登基可能使國家管理出現嚴重的問題，但事實上，不管天皇是具有君主智慧的可敬典范，抑或只是不諳世事的孩子，對日本政府幾乎都沒有影響：他并不參與政事，唯一的公開活動是舉行規定的儀式和慶典。[[4]](#_4__Zhe_Xie_Yi_Shi_Dui_Gong_Ting)幕府將軍在擬定行動計劃之前，無須聽取天皇的意見，一旦做出決定，也不必征得天皇的同意。到了孝明時代，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

孝明在京都（約八十九公頃）中心的御所長大[[5]](#_5__Xian_Zai_Wei_Yu_Jing_Du_Shi)。京都是皇宮和大多數公家（貴族）的宅邸所在地，而御所則是皇室家庭的全部世界。根據東久世通禧（1833—1912）的說法，幕府的政策就是將天皇與世隔絕，把他看作活著的神一樣，且嚴格禁止將新的或者不尋常的事情通知他。[[6]](#_6__Dong_Jiu_Shi_Tong_Xi____Zhu)東久世十歲時被選為孝明的玩伴，他晚年講述了記憶中有關孝明的童年故事，擔心如果不把回憶記下來，那些古老的傳統將會永遠消失。他的回憶非常特別，具體到他親眼目睹的許多儀式細節——在場的每個人、他們穿的衣服、收到的禮物等等。下面是他對一個典型儀式的描述：

六月初七，皇太子九歲[[7]](#_7__Shi_Ji_Shang_Shi_Ta_Sheng_Ri)。這天在御學問所[[8]](#_8__Jing_Du_Yu_Suo_Zhong_Gong_Ti)舉辦了“初讀”儀式。親王并非到了九歲才開始讀書。事實上他已經讀過了《孝經》和《大學》，左大將鷹司是他的老師。這個儀式完全就是走過場。皇太子穿著二藍三重襷樣式的直衣、紫色龜甲紋的奴袴，坐在中房中。[[9]](#_9__Er_Lan_San_Zhong_Tasuki_Zhi)中納言久我建通把一張桌子抬到皇太子前面。舟橋在賢坐在桌子前。他將《古文孝經》的序言誦讀三遍。皇太子隨即跟著他念。之后舟橋退出，久我上前，把桌子搬走。皇太子隨后回到皇宮。[[10]](#_10__Dong_Jiu_Shi_Tong_Xi____Zhu)

皇太子的教育主要是在老師的指導下大聲朗讀《孝經》這樣的儒家經典。他一開始讀的時候完全不知道含義，但最終不僅能閱讀文言文，還能用文言文寫詩。書法同樣是皇太子必須學會的一項技能，而選擇什么人作為書法老師則至關重要。最后，皇太子應該能創作古典形式的日本詩——短歌。

除了這些傳統教育課程之外，皇太子從書本中獲得的知識似乎很少——也許僅限于日本和中國的歷史、地理的基本知識。有些天皇喜歡讀日文小說，其他人則醉心于宮廷演出了上千年的舞樂，根據記載，宮廷中也曾演出能樂[[11]](#_11__Wu_Le_Ji_Ya_Le__Shi_Yi_Zhon)。但這些愛好不過是些消遣，和幕府要求天皇作為主業學習的真正的學問不同。

1615年，前幕府將軍德川家康、其子德川秀忠（名義上的將軍）以及貴族二條昭實（曾任關白）共同擬定了一部貴族的行為規范法典。這部名為《禁中并公家諸法度》的法典共有十七條，可能是模仿圣德太子在604年頒布的《十七條憲法》。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規定，天皇應該以研習學問和藝術為第一要事。德川時代的天皇似乎都牢牢地記住了這一條：學問（有限的幾本儒家經典著作以及日本的傳統禮儀做法）以及藝術（主要是短歌和書法）成為他們教育的主要內容。學習儒家經典并非為了有一天能夠挑戰德川時代的學者對經典的詮釋，而只需基本熟悉孔子學說，并能在適當的時候引經據典就足夠了。十七條中的其他條文都和具體的事情有關，比如朝廷官員的任命、貴族的遺產繼承、各個貴族家庭的地位高低和座次排列以及貴族出家后應該享受的待遇等。

即使他們討厭高高在上的幕府，懷念遙遠的過去（那時的天皇是最高統治者），但是大多數天皇和貴族對各種嚴苛規定都不敢表示不滿。他們生活在一個狹小的世界里，并似乎渾然不覺，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也能使他們念叨上幾十年。即使他們討厭幕府干涉自己的生活，討厭江戶派駐京都的官員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但是他們心里很清楚，沒有幕府給的薪俸他們就活不下去。

對于低級貴族來說，薪俸通常不足以維持一家人正常的生活開銷，因此許多人不得不做一些兼職，最好是那種不辱沒他們身份的職業，例如拓印古代名家的書法作品，或是繪制新年期間玩耍的紙牌。他們在出售作品時靠的是自己顯赫的名聲。巖倉具視（1825—1883）家族是德川時代晚期和明治時代早期最顯赫的家族，他們家非常窮，不得不將房子出租給賭場，由于巖倉家的貴族身份，賭場可免受警察的管制。不過，就算最窮的貴族也對自己的血統和社會地位感到驕傲，而且他們總體上仍受到社會的尊重，盡管如這些貴族親口所說，他們也有些人胡作非為，為了賺錢完全不擇手段。[[12]](#_12__Qing_Can_Kao_San_Tiao_Shi_W)

天皇和宮廷的貧窮經常被夸大，尤其是通俗歷史作者添油加醋地編造了一些故事，好像連天皇也是勉強才能活下去。實際上，即使按當時大名（他們的財富同樣常被夸大）的標準來看，天皇的生活還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德川時代的天皇生活肯定非常無聊。除了夜里尋歡作樂得到的安慰之外（后水尾天皇有三十七個孩子，后西天皇則有二十七個），每天的工作似乎都是主持各種儀式，這些儀式年復一年地進行，不曾有半點變化。此外，我們也可以認為除個別例外，天皇生活的最壓抑之處在于他的活動范圍非常小。天皇從未遠離御所，但他們偶爾會到城里各處去轉轉。舉個例子，1626年后水尾天皇就在二條城（幕府將軍在京都的行轅）住了四天。但是1632年德川秀忠死后，他的兒子德川家光憑借自己的能力當上了幕府將軍，此后幕府便不允許天皇離開御所。固然，有幾次御所發生了大火，天皇被迫到京都的寺廟避難，但是說那些1632年以后繼任的天皇是被軟禁的政治犯，也并不夸張。

遜位的天皇可以到御所外自由旅行。京都東北部山中的修學院原本是1650年為遜位的后水尾天皇修建的游樂場所。后來其他遜位的天皇也時不時造訪這里，但總體來說還是多年無人居住。1823年光格天皇[[13]](#_13__Guang_Ge_Tian_Huang__1771)遜位后，向幕府將軍請求想參觀修學院，于是該處才匆匆忙忙進行了維修。當時盛況空前：

日吉（比叡）山麓修學院御茶屋，后水尾院法皇[[14]](#_14__Hou_Shui_Wei_Tian_Huang__15)始御幸，靈元院法皇[[15]](#_15__Ling_Yuan_Tian_Huang__1654)亦屢屢行幸。享保十七年（1732），靈元法皇薨后，星霜百年，荒廢以至行幸斷絕。文政六年（1824）秋，武家（幕府）命新修，復其舊貌。文政七年九月廿一日，太上皇（光格天皇）始御幸。出清和院御門，抵桝形，渡鴨川，至新田山端御休憩之所。萬民歡呼，高喊萬歲。觀者盈衢，實圣明之世。[[16]](#_16____Gu_Shi_Lei_Yuan____Juan_S)

幕府允許遜位和出家后的天皇享有這種自由，但在位的天皇卻沒有。從1632年到1863年孝明參拜賀茂神社和石清水八幡宮為止，歷代天皇極少離開御所，少有的幾次也是因為發生了什么災難。他們沒有人見過大海或富士山，也沒見過幕府統治下的江戶城。天皇畢生所見不過數百朝臣，普通日本人一眼都未見過他。京都人當然知道天皇就住在御所的高墻后面，但是除了一些極罕見的場合（例如遜位的光格天皇參觀修學院）外，他們連他坐的轎子都難得一見，更不要說天皇本人。除了少數幾名高級侍臣，沒有人能見到他。天皇是一個隱藏在簾子后面的人，讓人敬畏，并與人間俗世相距甚遠。

少數幾個人既是侍臣又是孝明天皇的朋友，東久世通禧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憶孝明天皇精通學問時說：“（他）可輕易閱覽四書五經等[[17]](#_17__Ru_Jia_De_Jiao_Cai___Si_Shu)，學力足以授課。和書尚未學習，然作和歌，由其父皇添削，日日誦讀。其和歌頗為優異。自大納言羽室顯孝處習雅樂，亦長于笛子。”[[18]](#_18__Dong_Jiu_Shi_Tong_Xi____Zhu)

1840年孝明被正式冊封為皇太子，那一年他十歲。東久世回憶說，在舉行冊封典禮之前，皇室下令七大神社和七大寺廟舉行儀式，祈禱典禮不會被大風大雨打斷。[[19]](#_19__Dong_Jiu_Shi_Tong_Xi____Zhu)[[20]](#_20__Qi_Da_Shen_She_Zhi_De_Shi_Y)真正的儀式在紫宸殿（舉行國家慶典的地方）舉行。儀式結束時，天皇將壺切之御劍贈給皇太子，這把寶劍的擁有者將是下一任天皇。

東久世直到1842年才真正成為皇太子的伙伴，但是他兩年前就從傳聞中知道了孝明那天的樣子：“御發型為總角，因尚未加元服，故在頭頂中分，垂至耳邊梳成圓形。圣德太子畫像中有二童子，即似該童子發型。”[[21]](#_21__Dong_Jiu_Shi_Tong_Xi____Zhu)

也許東久世只是從別人那里知道這個儀式的，不過他親眼見證了孝明的加元服儀式，或者說成人禮，這是皇太子一生中的第二個重要儀式。加元服儀式于1844年5月11日開始，那一天要把皇太子的牙齒涂黑。孝明非常抗拒，因此人們不得不強迫他。（我們不難想象給一位十三歲少年的牙齒涂上臟兮兮的黑色液體時他扭動尖叫的樣子。）接下來兩天進行儀式的彩排。東久世解釋說：“天子一朝只一度之事，當值者少有記憶，故皆依記錄，演習大概。”[[22]](#_22__Dong_Jiu_Shi_Tong_Xi____Zhu)

舉行儀式那天，天剛蒙蒙亮，皇太子就穿上了慶典的服飾。所有貴族都穿著束帶[[23]](#_23__Gui_Zu_De_Zheng_Zhuang__Yi)，并佩戴嵌有螺鈿的太刀[[24]](#_24__Tai_Dao__Dao_Ren_Chang_Liu)。仁孝天皇出現了，后面跟著一位手捧皇太子御冠的侍女。在紫宸殿里，宮內省的官員掀開簾子。皇太子的老師領著他來到臺上，關白[[25]](#_25__Guan_Bai__Ri_Ben_Gu_Dai_Gon)鷹司政通（1789—1868）走上來站在皇太子旁邊。右大臣九條托著皇太子的后裾。在這個肅穆的時刻，所有貴族都拜倒在地，外面的那些低級官員也全都跪下了。內大臣近衛忠熙（1808—1898）將御冠戴在皇太子頭上，權中納言久我建通為他束發。近衛再次走上前來，將帽子取下，然后離開。久我上來幫皇太子重新整理頭發。整理完畢，皇太子退入內宮更衣。[[26]](#_26__Dong_Jiu_Shi_Tong_Xi____Zhu)儀式結束。

1846年2月23日，孝明天皇的父親仁孝天皇駕崩。沒有人料到他會死：他正當盛年（只有四十六歲），且身體向來非常強壯。仁孝只不過患了點小感冒，并無其他病狀，但他起床去廁所時，卻發現自己站都站不穩。侍女們過來攙他，但根本抬不動這個強壯的男人，他不得不爬去廁所，途中病發而亡。死訊并沒有立刻公布，相反，皇宮對外宣稱天皇病得很厲害，已完全喪失了工作能力，因此希望退位。不過，沒有幕府的允許，天皇是不可以退位的。幕府在京都的代表所司代隨即派人向江戶請示，但是在收到回復時仁孝已經死了很久了。

3月13日天皇駕崩的消息正式發布。一個星期后，舉行了一個孝明登基的簡單儀式。孝明登基后的第二天，仁孝的尸體入殮。接下來，3月30日，宮內宣布宮女九條夙子（1834—1897）為女御（地位僅次于皇后的妃嬪），標志著孝明現在有妻子了。[[27]](#_27__Shi_Ji_Shang_Ta_Zhi_Dao_184)

官方記錄中，孝明統治初期的大部分事情都沒什么歷史意義。其中列舉了為去世的仁孝天皇舉行的法會、凈化等儀式，月食，斗雞等——一切都事無巨細地詳細記錄，也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學習院（一所培養貴族子女的學校）開始授課。不過，1846年10月19日的一則記錄則非常醒目：“二十九日（壬午）異國船渡來之事，京師風聞，故降海防之敕至幕府。”[[28]](#_28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

這是幾個世紀以來首次有天皇發表對外交政策的看法，只可能是十五歲的孝明（或者他的顧問）在得知外國入侵的威脅之后極度驚恐的結果。1847年6月9日的記錄也是同樣的語氣：“二十五日（甲戌）石清水臨時祭，以參議野宮定祥為敕使，特以外艦來航之事，祈四海靜謐。”[[29]](#_29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

這是孝明多次向神靈祈禱中的一次，他祈禱神靈幫助自己將外國侵略者趕出日本。但是，孝明一生都沒見過任何外國人。事實上，他在石清水八幡宮祈禱的時候可能根本就對他們一無所知，而就算在統治后期，他也沒有增加多少了解；但是他非常肯定，外國人（或者更準確地說，西方人）的出現是神國[[30]](#_30__Ri_Ben_Guo_Qu_De_Yi_Zhong_G)無法忍受的侮辱。

孝明祈禱中所提到的外國軍艦，可能是指頭一年夏天來到江戶灣的兩艘美國軍艦。這兩艘軍艦的首領是海軍準將詹姆斯·比德爾（James Biddle），他試圖與浦賀的地方長官簽署一份貿易協定，但沒有成功。1846年，一艘法國軍艦也來過日本。孝明在給石清水八幡宮的宣命[[31]](#_31__Tian_Huang_Chi_Ming_De_Yi_Z)中提到了這兩件事，他祈禱假如再有外國人來到日本，神社的保護神將刮一陣大風將他們吹走，使這個國家永葆平安。[[32]](#_32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

孝明從未改變對外國人的仇恨，盡管有時因為沒有別的辦法，他勉強同意外國人暫時留在日本，但仍希望時機成熟時就將他們全都趕進海里。他的仇外心理很早就形成，而且伴隨他終身，這肯定是他的畫像表情如此兇惡的一個原因。

1847年10月31日，孝明的加冕典禮在紫宸殿舉行，這一年他十七歲。孝明發表了一份宣命，祈禱天下太平，并請神靈保佑他的所有子民。從保存下來的資料來看，這次典禮相當隆重，而且第二天，那些平時不準接近皇宮的人也能夠一睹場面的輝煌。[[33]](#_33__Fu_Di_Zhong_Xiao____Xiao_Mi)

加冕典禮之后，孝明的日常生活和之前并沒多少區別，仍是一些宗教儀式、詩會以及朝廷官員的辭職和晉升。必要時孝明會創作一首短歌，通常都是用輕快的語言：

花園里

梅樹和柳樹

都披上了春色

混合著早晨的太陽

和畫眉鳥的歌聲[[34]](#_34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

接下來幾年，唯一令人不安的事情是日食和月食。發生日食和月食的時候朝廷的一切活動都要暫停。孝明觀看宮里的舞樂和能樂表演，適時舉行賞月的宴會，并參加各種儀式和集會。他嚴格按照規定，在每年的同一時間進行各種儀式。官方的歷史記錄中極少出現個人的事情，除非是得了罕見的疾病。御所之外，大火燒毀房屋，洪水摧毀橋梁，每一次災難后天皇都派人到各大神社去為子民祈福。

外國軍艦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日本海域，每次都讓孝明心神不寧，但是他對這些威脅的反應最多就是派人到七大神社和七大寺廟去祈禱天下太平。

官方的歷史記錄里也會出現一些歡樂的時刻，例如孝明的皇后系上了腹帶，兩個月后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孩）出生了。十三天后一個侍妾給他生了個兒子，但是母子倆在同一天都死了。孝明在位期間，皇室經常出現這種情況，而這是第一次。男嬰的母親并非皇后，但這并不會降低他出生的重要性，也不會減少天皇對他的死的痛惜。但是他活的時間太短，以致通常為表示尊重死者而發布的京城鳴物停止令都沒有頒發。[[35]](#_35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

孝明統治初期記載的事件都不太有趣，但是那些知道后來事件的讀者有時也可能對一條看似就事論事的無趣記錄產生興趣。例如，1851年8月8日的記載中說天皇派人給有棲宮熾仁親王（1835—1895）捎去口信，稱已同意將妹妹和宮親子內親王（1846—1877）嫁給他。[[36]](#_36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當時和宮只有五歲，這門親事完全是出于王朝的考慮而提前締結的，但是十年后幕府將軍向她求婚時，這個婚約將成為嚴重的障礙。

還有，1851年10月15日的官方記錄簡略地提到一名親王出生了。[[37]](#_37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假如事先不知道誰是這一天出生的話，那你還要接下去閱讀很多頁，才會恍然大悟，那名剛剛出生的親王原來就是后來的明治天皇。

1. [[1]](#_1_1) 天皇的官方畫像之所以缺乏個性，可能是因為這些畫像都是在天皇死后，由從未見過他的畫家繪制的。我們知道有一幅畫像的情況是這樣的：1846年11月4日，仁孝天皇逝世八個月后，曾經為光格天皇畫過像的豐岡春助奉命為仁孝天皇繪制畫像，為此獲得了十兩銀子和兩段（日本布匹單位，一段布寬約三十四厘米，長約十米。——譯注。）絲綢的潤筆費（《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270—271頁； 藤田覺，《幕末の天皇》，第141頁）。

1. [[2]](#_2_1) 關于這三位天皇的子女，以及大宅壯一對死亡率如此之高的看法，請參考《大宅壯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4—26頁。

1. [[3]](#_3_1) 1899年日本的嬰兒死亡率為153.8‰，即便四十年以前的數字要高一些，但是仍與皇室嬰兒死亡比率相距甚遠[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新潮 45》7(10)(78)，第62頁]。

1. [[4]](#_4_1) 這些儀式對宮廷來說當然極為重要，因此，在德川時代，發生過兩次這樣的情況：由于皇位的男性繼承人年紀太小，無法舉行這些儀式（即使做做樣子也不行），而選出一位內親王擔任女天皇統治國家，直到男性繼承人成年為止。Herschel Webb寫道：“周而復始的儀式、宣誓就任以及歲時禮儀就是天皇和宮廷的全部‘國’事”（"aid-ME", pp. 119-20）。

1. [[5]](#_5_1) 現在位于京都市區的北邊。

1. [[6]](#_6_1) 東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41頁。

1. [[7]](#_7_1) 實際上是他生日前一個星期。按照西方的算法，當時孝明八歲。我在本書中的其他地方已經將陰歷轉換為陽歷，人物的年齡也從日本的算法轉換為西方的算法，但是在直接引用時則遵循原文。

1. [[8]](#_8_1) 京都御所中供天皇及皇子學習的宮殿，也是宮內舉行詩會等活動的場所。——編注

1. [[9]](#_9_1) 二藍三重襷直衣是近世日本皇族夏季的標準上衣，二藍是一種青紫色，三重襷是一種菱形圖案，直衣是平安時代以后皇族及貴族的日常上衣；奴袴是貴族服飾中的下衣，和直衣等搭配，少年親王著紫色龜甲紋；中房即中段。日本武家住宅樣式的建筑中，大廳多有數進，稱之為段，一般分為下段、中段、上段，各段地板依次增高，從側面看，可看作下房、中房、上房。——編注

1. [[10]](#_10_1) 東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34頁。至于官方根據各種來源編寫的這次儀式的記錄，請參考《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43—45頁。

1. [[11]](#_11_1) 舞樂即雅樂，是一種日本宮廷中祭祀、燕享時的音樂舞蹈，與中國古代舞蹈中的雅樂含意不完全相同，其包括日本固有的樂舞催馬樂、朗詠等；能樂是日本獨有的一種舞臺藝術，演員佩戴面具演出的一種古典歌舞劇。——譯注

1. [[12]](#_12_1) 請參考三條實萬對“堂上公家”的不正當行為的表述。“堂上公家”是指那些允許出現在天皇面前的高級公卿（福地重孝，《孝明天皇》，第21頁）。例如，他們在賣藥時會稱自己的醫術是祖輩傳下來的，非常靈驗。在街上遇到一名軍人或者富商時，他們會因為一些瑣事指責對方冒犯了他，從而要求對方賠償。本身也是高級公卿的三條說，那些 “堂上公家”的快速致富計劃如雨后春筍一般，隨處可見。

1. [[13]](#_13_1) 光格天皇（1771—1840），第119代天皇，孝明天皇的祖父。——編注

1. [[14]](#_14_1) 后水尾天皇（1596—1680），第108代天皇。1629年因紫衣事件以及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令乳母春日局面見天皇（春日局無官位），憤而傳位給六歲的女兒，以太上皇執政。日本天皇遜位后稱太上天皇，簡稱上皇。出家為僧的上皇則稱太上法皇，簡稱法皇。后水尾院是院號，是對上皇的尊稱。——編注

1. [[15]](#_15) 靈元天皇（1654—1732），第112代天皇，后水尾天皇之子。——編注

1. [[16]](#_16) 《古事類苑》卷十二，第747頁。

1. [[17]](#_17) 儒家的教材。四書指的是《論語》、《中庸》、《大學》和《孟子》。五經指的是《易經》、《詩經》、《尚書》、《春秋》和《禮記》。

1. [[18]](#_18) 東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33頁。雅樂是一種古老的廟堂音樂，仍然在宮廷和一些神廟演奏。演奏時通常伴隨著舞樂的舞蹈。

1. [[19]](#_19) 東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33頁。

1. [[20]](#_20) 七大神社指的是伊勢、石清水八幡宮、下鴨、上賀茂、松尾、稻荷（伏見）以及春日神社；七大寺廟指的是仁和寺、東大寺、興福寺、延歷寺、圓成寺、東寺和廣隆寺。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佛教寺廟都隸屬于“奈良六宗”或者天臺宗和真言宗，與鐮倉時代以及后來出現的重要宗派不同。

1. [[21]](#_21) 東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34頁。

1. [[22]](#_22) 東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35頁。

1. [[23]](#_23) 貴族的正裝，一種曳地長袍。——編注

1. [[24]](#_24) 太刀，刀刃長六十厘米以上，刀刃朝下，佩帶在腰間的日本刀。武士佩帶在腰間，刀刃朝上的稱為“打刀”。——編注

1. [[25]](#_25) 關白，日本古代宮職，是攝政一職在天皇成年后的稱呼。關白退位后稱“太閣”，若出家為僧，則稱“禪閣”。攝政關白合稱“攝關”，除豐臣季吉、豐臣季次外，皆由藤原氏及其分家擔任。——編注

1. [[26]](#_26) 東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35頁。

1. [[27]](#_27) 實際上她直到1848年1月10日才成為他的妻子（《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764頁）。夙子生于1834年，但是由于這一年不太吉利，于是她的官方出生日期被提前到1833年（福地重孝，《孝明天皇》，第35頁）。即使成為孝明的妃子之后，她的頭銜仍然是“準宮”，即準皇后之意。這個頭銜分幾種，最常見的是“準三宮”，意思是地位僅次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后。她是明治的嫡母，明治登基之后，她的頭銜變成了“皇太后”。

1. [[28]](#_28) 《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255頁。《武家傳奏記錄》等資料中詳細記錄天皇的信，見《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255—258頁。

1. [[29]](#_29) 《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370頁。

1. [[30]](#_30) 日本過去的一種觀念，認為天皇是神，由天皇統治的國家是神國。——編注

1. [[31]](#_31) 天皇敕命的一種格式，全部以漢字標注日語。

1. [[32]](#_32) 《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370頁。孝明當然知道13世紀時“神風”摧毀蒙古入侵者艦隊的事。

1. [[33]](#_33) 福地重孝，《孝明天皇》，第44頁。11月30日，普通人也被允許進入御所。根據這個時期重要的資料來源——山科言成的日記《言成卿記》——來觀看加冕典禮的各色人等，就像“黑壓壓的云層和密不透風的濃霧一樣”，人多得連空隙也沒有（《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432頁）。

1. [[34]](#_34) 《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512頁。這首短歌作于1848年的陰歷二月二十五日，菅原道真逝世的紀念儀式上。梅花開得最早，也許就是這首詩提到梅樹的原因，但是傳統上也經常把菅原和梅聯系起來。

1. [[35]](#_35) 《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950頁。如果想了解皇室或者幕府家族的成員逝世后禁止“鳴物”（樂器等發出噪音的東西）的有趣禁令，可以參看藤田覺，《幕末の天皇》，第30–32頁。

1. [[36]](#_36) 《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39頁。

1. [[37]](#_37) 《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81頁。

# 第二章 祐宮出生



《孝明天皇紀》中，關于未來明治天皇出生的記載很少，但《明治天皇記》卻非常詳細地敘述了典侍（即侍妾）中山慶子從大概早上8點開始感到陣痛后的情況。

慶子的父親權大納言中山忠能立刻行動起來。巳時（上午9點到11點），他派人去請三位太醫和一名接生婆，他們立刻趕來了。他還將親王即將誕生這個消息書面通知了太政大臣鷹司政通、議奏（朝廷的發言人）[[1]](#_1__Zhao_Ting_Guan_Yuan__Zhe_Ge)以及武家傳奏（幕府聯絡官）[[2]](#_2__Zhao_Ting_Guan_Yuan__Zhe_Ge)。消息立即傳遞給了宮中其他相關的男官和女官。嬰兒在“午時半刻”（下午1點）出生。消息再次傳遞出去。孝明聽到消息時正坐在寢宮的北花園里，一邊欣賞花壇里的菊花，一邊喝著午飯前的清酒。據說他聽到兒子出生的消息后特別高興，喝了很多酒。[[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親王剛一出生，便和胎盤一起被裹在請衣[[4]](#_4__San_Kuai_Bai_Se_De_Gao_Ji_Si)中。親王出生的消息公布后，中山家熄滅了所有的火。他們從川端道喜（1835—1902）家取來火種重新點燃——川端家多年來一直是官方的皇室年糕供應商。熄火的習俗可能與某種觀念有關，即認為生育使家里的火都觸穢。新火種取自一個商人之家，而不是取自神社或者某位皇室成員歸隱的寺廟，令人感到有些奇怪。不過川端家自室町時代晚期起地位就非同一般，他們家的火被稱為“清火”，御膳房的火也取自他們家。

為了保佑生產順利，孩子出生前，中山忠能已經從各個吉祥的寺廟和善人那里請來了護身符。現在他可以用謝禮來還愿了。天皇派來一名宮女，給親王留下了一把防身用的短刀[[5]](#_5__Ji_Shou_Dao__Jian_You_Fang_S)和一條有兩個袖籠的被子（搔卷）。寶寶會收到許多別的禮物，這些禮物很傳統，今天的讀者也許會覺得很奇怪。不過出生后，首先要做的還是剪臍帶、包裹，并用火燒灼臍帶進行消毒。[[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胎盤洗凈后會放進一個陶器里，裝進一個未上漆的木桶，再用白綢布把木桶包起來，跟兩把筍刀[[7]](#_7__Sun_Dao__Ri_Ben_Chuan_Tong_Z)、兩塊青石和兩條沙丁魚干一起放在隔壁房間的架子上。[[8]](#_8__Sha_Ding_Yu_Gan_De_Ri_Yu_Wei)架子前面擺著一盞長明燈，四周用屏風圍起來。木桶上用鉛白畫著松樹、竹子、仙鶴和烏龜，但是沒有梅花。雖然在藝術品中它通常和松竹搭配，但梅花會凋謝，不太吉利。

剪過臍帶之后，寶寶洗了第一個澡。人們遵守古老的習俗，從鴨川打來河水，再混合井水給他洗。接下來幾天，寶寶都穿著貼身內衣和一件無袖上衣，直到用襁褓把他包起來。他的床就鋪在一張叫做“片高”[[9]](#_9__Xie_Pou_Cheng_Liang_Ban__Yi)的床上，安放在他出生的那所小房子的主房里。榻榻米朝東或者朝南較高的一端一般會放一個枕頭，枕頭兩側相對擺著兩只紙糊的小狗（犬張子），兩只小狗中間擺著十六種化妝品。后面是一個架子，放著親王收到的那把守刀和一種叫做“天兒”的玩偶[[10]](#_10__Yi_Zhong_Fei_Chang_Jian_Dan)，玩偶用白絹包著，但是四肢末端都粘著紅綢布。壁龕里還有一個架子，上面放著兩只未上漆的木桶，木桶上繪有白色花紋。其中一只桶里放著一小包大米和兩根盤成花形的絲帶，另外一只桶里放著三顆藍色的石子和兩條方頭魚。[[11]](#_11___Fang_Tou_Yu__Su_Cheng__Jin)大米用銀箔包著，每次親王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都要將這些象征性的米撒出去，以驅趕惡魔。白絲帶每條長約四米。親王從出生的那一刻開始直到第七天晚上，每打一次噴嚏都要用絲帶打一個結；人們相信他打的噴嚏越多，就越長壽。床的東面立著兩個衣架，上面掛著金箔點綴的紅黑兩色綢緞腰帶。剛開始時，它們是房間里唯一的一抹顏色。按照風俗，嬰兒的衣服都是白色的，上面裝飾的吉祥圖案（如松、竹、鶴、龜）一般也是白色的。在嬰兒出生一百零一天后，這些白色的衣服將換成彩色的。

與此同時，陰陽師土御門晴雄（1827—1869）也收到信，要他盡快趕來。每次重大決策之前，或者重要事情發生之后，總會召一位陰陽師來解釋事情的含義或者指示接下來應該怎么做。土御門家族是世襲的皇室占卜師，他們的建議總是很有分量。分娩地點的方位取決于實際分娩的日子，在中山慶子即將臨盆之前，晴雄對此已做了詳細的指示。

慶子在懷孕五個月時曾經發高燒，大家都嚇得不輕，雖然最后她還是挺過來并順利生產，但人們還是絲毫不敢大意，迫切需要聽聽土御門的建議。可惜的是，他住得離皇宮有點遠，等到他來的時候，寶寶已經在吃奶了。盡管如此，土御門還是按往常一樣給出了指示，就好像他是準時到達的一樣：他大聲地宣告應該如何剪臍帶、準備洗澡水和給嬰兒洗澡，并補充了去除胎發、用襁褓包裹嬰兒、掩埋胎盤等指示。這些主要是形式上的需要，因為大部分步驟都已經做了。有一件事情還沒定下來，那就是掩埋胎盤的地點。出于方位的原因，晴雄選擇了城東的吉田神社。這件事需要征得宮廷的同意，于是他們派了一名信使去皇宮。等收到皇宮的肯定答復時，天已經黑了。

與此同時，中山忠能和他的兒子中山忠愛（1832—1882）已經向武家傳奏報告說他們因分娩而觸穢。忠能還向他在宮里的同僚告知了這件事。這些也是形式上的需要。他不僅沒有因為觸穢而傷心，反而異常興奮，這一點我們能夠從他的詩里看出來：

今天極好

天照大神的

神圣孫子

不是別人

正是我自己的！

這首詩盡管缺乏文學價值，卻完美地表達了忠能的感情。

接下來幾天，每一個有意識的行為都要遵照陰陽師的指示，但他的指示并不是唯一需要考慮的。嬰兒出生后的第七天，忠能讓一名陰陽師凈化了孩子出生的那個房間。正要舉行正式的七日儀式時，人們才意識到那天剛好是順子內親王（嬰兒的姐姐）的百日祭，因此儀式往后推了一天。

埋葬胎盤是第二個需要考慮的重要事情。這個儀式通常在出生后的一兩天舉行。嬰兒出生之前，中山忠能已經在自家庭院挖了兩個坑，但土御門說兩個坑都不太吉利。他對風水理論的理解告訴他最好選擇吉田神社，但是不管怎樣，埋葬都無法立刻進行。出生后的三天屬于“土用”[[12]](#_12___Tu_Yong__Yuan_Yu_Zhong_Guo)的范圍，在這期間忌動土，以免受到詛咒。“土用”結束后的那天是季節更換，也不宜動土。嬰兒出生后的第六天，要將頭上的絨毛全部剃去，同時賜予名字，這一天也不行，而接下來那天是順子內親王的忌日。盡管一隊人已經在神社的范圍內巡視過一番，并確定了合適的地點，但上述這些事情都禁止在地上挖坑。最終，明治出生后十天才舉行埋葬胎盤的儀式。

然而，孝明到這時還一眼都沒有見過新出生的兒子。我們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焦急地等待這個時刻，但是風俗比父愛更重要。親王出生三十天后，才被帶進宮見父親。出發之前，人們在他的前額沿發際畫了一條白線，然后點上黛。線的下方用胭脂寫上“犬”字，作為護身符。嬰兒的母親中山慶子抱著他，坐轎來到皇宮（幾百米的距離）。她隨身帶著首次系上腹帶以及后來分娩之后所收到的特別禮物。

轎子大約早上11點出發。兩名門衛開路，十名隨從走在這頂八抬大轎的前面，四名穿著正式禮服的官員走在轎子的旁邊，兩名太醫和一名管家身著朝服跟在后面。其他侍衛都穿著亞麻的武士正裝走在最后。貴賓沒有在隊伍的行列，而是單獨走著。這些人哪怕有一絲盡快趕到皇宮的想法，那么從中山家走到皇宮最多不會超過十分鐘，但是隊伍按照陰陽師的指引，繞了一條令人難以置信的彎路。最后他們到了皇宮，天皇正和皇后在常御殿里等候。他們倆都送了親王玩偶。親王贈送內侍所[[13]](#_13__Gong_Nei_Gong_Feng_Zuo_Wei)一百錠黃金和一箱鮮鯛魚，送給天皇十刀上等紙、海帶、干鯛魚和一桶清酒，其他禮物也隨后呈上。接著，親王宣布他希望住在母親的寢宮里。他的外曾祖母，中山忠能的母親，也搬到了宮里，以便可以日夜照顧他。[[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那一年的年尾，忠能遵照京都的風俗，以外公的身份送了他第一份新年禮物“振振”和球杖。“振振”是木頭做的玩具，形狀像瓜，上面畫滿了仙鶴和烏龜等吉祥圖案。球杖也是木頭做的，長約五十五厘米，形狀像一根木槌。和球杖搭配的有兩個木球。這兩樣東西總是一起作為典型的新年禮物，它們原本都是玩具，但是也許因為它們變得太昂貴了，已經看不到孩子們在玩了。

親王——這時已經有了名字，叫做祐宮——收到的禮物，以及那些送出去的回禮，幾乎和當時京都中等富裕家庭所交換的禮物差不多。也有給錢的，但是跟同時期歐洲皇室慶祝親王的誕生相比，這些慶祝活動顯得非常簡樸。

祐宮也收到了玩偶和玩具，這些是更加適合嬰兒玩耍的禮物。從這時起，祐宮成長過程的每個重要事件都被仔細地記錄下來——第一次使用筷子、第一次盤腿坐、第一次使用蚊帳。宮中的和平氣氛并未持續多久。六個月后的1853年7月，海軍準將馬修·卡爾布萊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一支美國艦隊來到了日本海，要求將華盛頓的文件提交給日本政府，這是長期閉關鎖國之后國土開放的第一步。

1853年5月26日黃昏，佩里的艦隊首次出現在日本海域，那次他的艦隊駛進了琉球群島的那霸。琉球群島的政治地位令這些美國人大惑不解。琉球同時向日本（更準確地說，是向薩摩藩）和中國進貢，卻又擁有自己的皇帝。本世紀初以來，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艦隊曾經到過這里，然而他們在進入日本的主要港口時被拒絕了。迄今為止，外國軍艦每次出現時通常都只有一艘，而佩里卻揚言自己有五艘船。佩里靠岸，來到琉球的首都首里，并在那里租了一所房子。談判的結果令他很滿意，他將農具和蔬菜種子送給島上的居民，當地人則為他提供了燃料、淡水和食物作為回報。這座島嶼幾乎已經向外國軍艦開放了。

佩里的艦隊還到了小笠原群島，島上只有大約三十個混血居民——英國人、美國人、葡萄牙人和夏威夷人的混血后裔。佩里從主島的美國移民那里購買了大片土地，打算建一座辦公室、一個碼頭和一個裝煤站。等這些都建好之后，他回到那霸，準備駛往他的主要目的地——日本。

京都對這一切一無所知，那里的生活還是平靜如水。五月初五，小親王慶祝了自己的第一個端午節。宮內專門為他掛起了傳統的彩旗，并送給他男孩在端午節的專屬玩具——一頂頭盔和一根長矛。小親王現在住在外祖父家，而很長時間沒有見過親王的孝明，迫切地想再見孩子一面。孝明咨詢了太醫，他們都非常謹慎，建議最佳的見面時間應該在孩子過完生日的九月之后；不過，假如天皇急于見到兒子，也是可以的，只要避開酷熱的六月和七月就行。[[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當問到中山忠能的意見時，他回答說親王的身體特別健康。太醫定時來看他，然而極少發現他有什么不適。沒有什么理由不能立刻見面。因此，陰歷五月廿七日，孩子就被送往宮中，天皇和皇后送了他許多玩具。

五天后的六月初三，即西歷1853年7月8日，佩里的四艘軍艦來到了離江戶不遠且防御森嚴的浦賀港。浦賀奉行所與力[[16]](#_16__Feng_Xing_Shi_Ping_An_Shi_Q)中島三郎助和翻譯堀達之助[[17]](#_17__Ku_Da_Zhi_Zhu__1823__1892_C)登上了佩里的主艦“薩斯凱哈那”號（Susquehanna）巡洋艦。一開始美國人不許他們登船，經崛達（用英語）和軍官們斡旋之后，他們才得以上去。中島和崛達出示了命令，要求驅逐所有停靠在日本港口的外國軍艦。佩里（并沒有會見日本人）通過副官傳話說，他帶來了一封美國總統要求訂立貿易條約的信，但是只交給高級的日本官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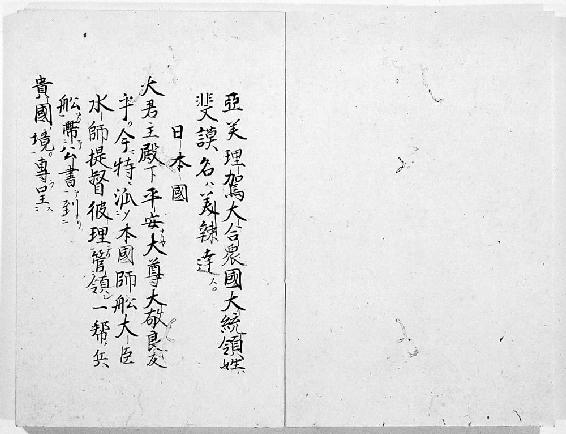
第二天，另一位官員香山榮左衛門假冒奉行，登上了美國軍艦。他沒有見到佩里，而是和船長布坎南（Buchanan）以及另外兩名軍官見了面，并告訴他們，浦賀不可以接受外國人，因此不能接受該文書，軍艦應該開到長崎去。布坎南回答說，除非日本政府指派一名合適的官員來接收文件，否則佩里將（必要的話會使用武力）上岸，并將信件交給將軍本人。香山答應向將軍匯報此事，并于三日內答復。

浦賀奉行井戶弘道（1855年去世）向幕府將軍匯報了美國軍艦來到浦賀的消息，并提醒說浦賀的防衛力量不足以抵御美國人。與此同時，美國艦隊已派出船只測量江戶灣的水深，這令幕府的官員們憤怒無比卻又無可奈何。美國軍艦來到日本內海的消息傳到江戶，朝野頓時一片恐慌。法律規定不得收受外國的國書，但是拒絕肯定會招來戰禍。官員們認為，最好是忍一時之辱，收下國書，等美國軍艦離開之后，再全面討論應該采取何種國家政策。

7月9日，兩名日本高級官員來到浦賀西南的久里濱，在那里會見了佩里并接受了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的信。他們告訴佩里，將軍病得很厲害，無法立即對重要的國事做出決定，[[18]](#_18__Zhe_Bing_Fei_Tuo_Ci___7Yue)但是承諾來年會給出答復。佩里接受了，并說他還會再來。

迄今為止，這些消息都沒有傳到京都。祇園祭照常進行，一周后是孝明的生日，要吃紅米飯并交換墨魚干這樣的吉祥禮物。

7月14日，菲爾莫爾總統的信送到將軍手里。這使他揪心不已，也成了震撼整個社會的傳聞來源。老中（政壇元老）阿部正弘（1819—1857）召集閣僚開會，但是大家意見不一，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兩位高級官員筒井政憲（1778—1859）和川路圣謨（1801—1868）認為應該接受美國人的開國要求。他們稱經過兩百多年的和平，軍備松弛，人心不振。阿部正弘派人請來了水戶藩的大名德川齊昭（1800—1860），他因為資格很老，而且平素熱心國防，遂成為最受幕府官員尊敬的政界人物。德川齊昭心里很清楚，如果拒絕美國人而最終訴諸武力的話，會導致巨大的麻煩，但他不想接受外國人的請求，最終贊同對美國人采取強硬的立場。許多人附和他的建議，但是將軍夾在鎖國派和開國派中間不知如何是好。



菲爾莫爾總統的信的日譯本，幕府將其發給各個大名

7月15日，幕府指示京都的所司代脅坂安宅（1809—1874）通知宮廷美國軍艦到訪的消息。宮廷很早就擔心有可能發生這類災難，接到這個報告時，著實嚇得不輕。深感不安的天皇下令七大神社和七大寺廟進行為期七天的祈禱，希望四海靜謐、寶祚長久、萬民安泰。

8月5日，將軍把翻譯過的美國總統來信發給各位大名。此前，所有事情都是將軍一人決定，但是現在這套建立了兩百多年的秩序看起來馬上就要崩潰，將軍別無他法，索性讓各位大名也對國事發表發表意見。

最坦率的也許是福岡藩的大名黑田齊溥（1811—1887），他認為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下，日本一個國家想保持閉關鎖國是不可能的。現在應該滿足美國人的開埠要求，但是只限長崎一個地方，而且要設定五年或者六年的期限。他還同意讓美國人使用某個無人居住的島嶼作為煤站，但是不同意日本向他們提供煤炭，因為一旦美國人享有這一特權，俄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隨后也會提出同樣的要求。

無論如何，他接著說道，貿易特權應該只限于美國人和俄國人，因為后者早在1804年就已經提出了要求，其他國家則應該堅決拒絕。如果其他國家反對，只需利用美國人和俄國人的力量來對抗他們即可。如果認為不宜給兩個國家貿易特權的話，那選擇只給美國會更好。與他們保持良好關系會博得他們的感激，而且可以利用他們來對付歐洲國家。這是以夷制夷的策略。如果斷然拒絕美國人的話，戰爭肯定無法避免，而一旦發生戰爭，日本軍艦將會到處受到攻擊，海路也會被切斷。不僅江戶連一天都撐不下去，而且沖突將會留下永世之弊。考慮到國防松弛，日本不可能取勝，現在首要目標應該是和平，以免俄國人趁機進攻并攫取日本的北方國土。

黑田認為最要緊的是海防。現在應該廢除禁止建造大型船只的法律，以西方為模型并進行改造，邀請熟悉造船和武器制造的技師和匠人到日本，并且允許日本人有出國的自由。總之，承平日久，民眾上上下下都追求舒適的生活，人心萎靡。是時候重振軍備了。

黑田的建議并非全面開放國土，但令人驚訝的是，在美國軍艦剛剛駛離浦賀后，就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大名提出建議——在除了收到一封美國總統要求裝煤的信以外，并無其他挑釁的情況下——廢除一項持續兩百多年的制度。他當然沒有建議廢除幕府的統治，也沒有提到（不久有些人會這么做）天皇對于一個全新的日本的重要性，但是他明確贊成結束這個國家的閉關鎖國狀態，而這正是德川政府統治的基礎。

黑田對日本軍事力量的評價坦率得令人驚訝。幕府建立在武士階級統治的基礎之上，而且從未忽略過軍事訓練，但是黑田明白，和外國人作戰，日本取勝的機會微乎其微。他對國家軍事力量的評價也許太過悲觀：明治政府建立前夕的戰爭明顯否定了武士階層士氣薄弱的觀點。

并非所有的大名都跟黑田一樣，擔心與外國人作戰就會敗北。薩摩藩的大名島津齊彬（1809—1858）寫信給將軍，說接受美國人的要求將會削弱將軍的威望，使日本在海外名聲掃地。他承認，假如日美之間立刻爆發戰爭，日本“難保必勝”。于是提議，假如美國人再來，日本應該進行稽延性的外交談判，旨在將肯定答復推遲三年。在這段時間完善軍事，恢復國力，然后一舉消滅異邦蠻人。[[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大部分大名也贊同他的看法，從這個時刻開始，攘夷——驅除夷人——成了提倡國防者的戰斗口號。

京都宮廷直到8月16日才收到美國人信函的翻譯件，這時離朝廷官員開會討論信函的內容已經過去了八天。宮廷的生活節奏依然十分緩慢。這一次太政大臣（鷹司政通）和兩名議奏（廣幡元豐和烏丸光政）以及兩位武家傳奏（三條實萬和坊城俊明）在御學問所里開會。在此之前，外國事務一直都由幕府處置，但是現在還需要征得宮廷會議的同意。

我們也許以為廷臣會一致反對采取任何可能導致國家向外國人開放的行動，但是鷹司卻出人意料地贊同接受美國人的要求。他指出，盡管這個國家原則上向所有的外國人關閉，但實際上日本與中國和荷蘭的貿易已經開展了很多年，因此同意與美國人做生意只不過是將貿易伙伴從兩個增加到三個。不過，他們的商業活動必須限制在長崎一個地方，如果違反規定，就用武力將他們驅逐出去。他說，不幸的是，日本的軍隊已經喪失了原來的剛健之氣，變得“怯惰柔弱”。武士對如何與外國人作戰根本就沒有概念。因此，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允許交易，并收貿易之利。

其他人大多不同意鷹司的觀點，但是第二天，他派人送信給幕府，要求他們在美國人回來時無論打算采取什么措施，都要事先通知朝廷。幕府一口答應了這個前所未有的要求，于是幕府二百五十多年來第一次在做決策之前要咨詢朝廷的意見。

在美國人看來，菲爾莫爾總統要求向在該太平洋海域作業的船只提供補給，無疑再自然不過，因為這是世界其他地方通行的做法。美國人并沒有公開威脅動武，但是意思非常明顯，而日本人也清楚他們必須做出回應，否則將會遭到報復。在這樣的時刻——特別是將軍的身體又非常虛弱時——幕府需要大名的支持，不僅包括那些與德川家結盟的大名（譜代大名），還包括那些奉行更加獨立路線的大名（外樣大名）。而這些力量加起來仍不夠應付這個新危機，他們還需獲得天皇的幫助，即便天皇手頭并沒有一兵一卒或者一槍一炮。

事實證明，一旦樹立了事先咨詢天皇的先例，接下來幾年幕府要忽視天皇的愿望將變得非常困難。

1. [[1]](#_1_2) 朝廷官員，這個時期有五六個人，他們服侍天皇并將天皇的話傳達給公卿。

1. [[2]](#_2_2) 朝廷官員，這個時期有兩人，負責維持與幕府的聯系。他們傳達禮節性的問候，并負責接待拜訪朝廷的幕府官員。

1. [[3]](#_3_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頁。

1. [[4]](#_4_2) 三塊白色的高級絲帛組成的方形衣物。

1. [[5]](#_5_2) 即守刀，兼有防身及祈禱家族永續繁榮之意。——編注

1. [[6]](#_6_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頁。他們使用被稱為“筍刀”的小刀割斷臍帶，筍刀通常是用來在元服時剪斷頭發的，《明治天皇紀》的作者指出這也許是某種“古俗”的遺留。

1. [[7]](#_7_2) 筍刀，日本傳統中，在男孩元服儀式上用來剪頭發等的小刀。——編注

1. [[8]](#_8_2) 沙丁魚干的日語為“ごまめ”，之所以送它是因為其名字中包含了“まめ”，即“健康”的意思。

1. [[9]](#_9_2) 斜剖成兩半，一頭高一頭低的厚榻榻米。

1. [[10]](#_10_2) 一種非常簡單的玩偶，高約四十二厘米，有點像有手臂的“木芥子”。這種玩偶的手臂張開，與身體成直角，就像個十字。在嬰兒的床邊放置這種玩偶，可以吸走邪氣，從而保護孩子。這種玩偶要放在嬰兒床邊，直到孩子三歲為止。

1. [[11]](#_11_2) “方頭魚”俗稱“金頭”，亦被叫做“魴魚”。選擇這種魚完全是因為相信文字的魔力：金頭，意味著嬰兒將會特別強壯。藍色石頭的含義與此相同。

1. [[12]](#_12_2) “土用”源于中國古代歷法中的“陰陽五行”，春夏秋冬的五行分別為火、水、木、金，而土則藏于四季之中，春夏秋冬各季交替結束之前的十八天被稱為“土用”。日本的“土用”一年有四次，這里指的是秋季的土用。——譯注

1. [[13]](#_13_2) 宮內供奉作為天照大神御靈的神鏡的場所，由作為內侍的女官管理，故稱“內侍所”。——編注

1. [[14]](#_14_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7頁。顯然，大家是通過“翻譯”嬰兒的啼哭聲知道他的愿望的。

1. [[15]](#_15_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6頁。

1. [[16]](#_16_1) 奉行是平安時期至江戶時期武家的職位名稱，為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奉行所即奉行辦公的場所。與力是負責司法、治安等方面的職位。——編注

1. [[17]](#_17_1) 堀達之助（1823—1892）出生于一個世代是荷蘭語翻譯的家族。他后來學會了英語，1846年詹姆斯·比德爾（James Biddle）帶到浦賀的信就是由他翻譯的。后來他創辦了一所教英語的學校，并出版了一本學習英語的重要辭典。

1. [[18]](#_18_1) 這并非托辭。7月27日，德川家慶（1793—1853）去世。幕府將他去世的消息隱瞞了一個月（《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5頁）。

1. [[19]](#_19_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3頁。

# 第三章 開國難避



9月19日，宮廷還沒有從佩里意外來訪的震驚中恢復過來，就收到了幕府傳來的新消息：一支由四艘船組成的俄羅斯艦隊，在海軍中將普加金（E. V. Putiatin，1803—1884）的率領下，已經駛進了長崎港。[[1]](#_1__Pu_Jia_Jin_De_Jian_Dui_Dao_D)普加金甫到長崎就對這里的官員說，他帶來了一封俄國政府關于兩國貿易的信函。他最初接到的命令是把船開往江戶并在那里開展談判，但是俄國政府后來決定最好尊重日本的法律，于是改為駛往長崎這個日本指定與外國交往的港口，這一點與厚顏無恥闖入江戶灣的美國人的做法大相徑庭。[[2]](#_2__Pu_Jia_Jin_Zai_Xiao_Li_Yuan)

俄國人的艦隊抵達不久，長崎奉行所的官員便和一名荷蘭翻譯來到船上。“帕拉達”號（Pallada）的船長告訴他們，海軍中將普加金帶來了一封俄國政府寫給日本政府的信，還有一張給長崎長官的便箋，上面寫著必須立即送達。官員們猶豫了很久，第二天再度上船，收下了便箋。便箋中用極為禮貌的措辭宣稱，出于對日本法律的深深尊重，才促使俄國艦隊停靠在長崎而不是江戶。這是沙皇熱切希望兩國之間建立起友好關系的標志。

官員們立刻向江戶匯報了俄國人來的消息，并詢問是否要收下俄國政府的信函。等了一段時間以后，普加金將艦隊駛往上海裝載補給物資，這也許是在等政府的新命令。[[3]](#_3__Guan_Yu_Pu_Jia_Jin_Zhe_Ge_Sh)他從上海返回時發現依然沒有答復，于是宣布，在這種情況下他別無選擇，只能將船駛往江戶。長崎的官員大驚失色，連忙用加急信件通知江戶，信中提到，跟美國人相比，俄國人要隨和許多，并建議也許可以用俄國人來挫挫美國人的銳氣。他們還說，如果像平時那樣懷疑俄國人的提議，日本可能會招致一個面積是美國兩倍大的國家的敵意。

就在江戶收到長崎的來信之前，將軍德川家慶剛剛去世，幕府的高級官員正陷于悲悼之中，而且面臨著重組新政府的問題，因此對于如何回復俄國人這個問題沒有立刻作答。經過仔細考慮，他們決定接受俄國宮廷的信，因為已經有過接受美國總統信件的先例。

這封來自俄國外交大臣卡爾·羅伯特·涅謝爾羅德（Karl Robert Nesselrode）伯爵的信（由俄語寫成，但是附有中文和荷蘭文的翻譯），表達了希望兩國建立和平友好關系以解決日俄在薩哈林島上有爭議的邊界問題，以及開放通商口岸的愿望。[[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大多數幕府官員傾向于接受俄國人的要求，但幕府海防顧問德川齊昭強烈反對，會議于是拖延下來。最終，他們一致同意，最好的方法就是拖延。

長崎官員承諾的幕府回信杳無聲影，普加金對此越來越沒有耐心。他再次威脅說，假如五天內還沒有回信，就把船駛向江戶。四天后，筒井政憲和川路圣謨率領一幫行動遲緩的官員，帶來了將軍給涅謝爾羅德的回信。信中說，首先，確立邊界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決定，要畫出地圖，咨詢相關各方等等。其次，他們的祖先嚴禁開放通商口岸，但是在當前的世界潮流下，政府確實意識到有必要開放國土，然而新的將軍剛剛即位，形勢太過復雜，因此無法立即給出答復。他們需要向京都和各地的大名遞交報告。經過慎重考慮后，有望在三到五年內拿出一個方案來。[[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字里行間明顯可以看出，幕府拼命想拖延決定。但更重要的是，它承認盡管日本長期閉關鎖國，但是現在除了開國已別無選擇。不過，關于國際形勢變化這一點，因為擔心遭到孝明天皇的憤怒反對，幕府并沒有向宮廷說明。

對這個答復很失望的普加金態度轉為強硬。他告訴幕府的代表，除薩哈林島南部之外，擇捉島以北的所有島嶼都屬于俄國領土。筒井回答說，日本擁有堪察加以及（理所當然地擁有）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來年春天幕府將派官員到薩哈林島查明情況；俄國人可以在除了江戶周圍地區的日本海岸獲得免費的燃料和淡水。筒井還承諾，如果日本跟其他國家簽訂了貿易特許協定，該協定對俄國同樣有效。

普加金仍不滿足，但是他在1854年正月初離開長崎，并說他春天會再回來。現在，有實力的大名都知道閉關鎖國的政策已經維持不下去了。前文已述，早在1853年7月，福岡藩的大名黑田齊溥就正式提議廢除建造大型船只的禁令。8月，鹿兒島的大名島津齊彬寫信給幕府，勸告他們盡快從荷蘭購買船只和武器。10月21日，長期以來提倡建造適于遠航船只（而不是那種在日本沿岸打魚的小船）的幕府老中首座[[6]](#_6__Lao_Zhong_Shi_Jiang_Hu_Mu_Fu)阿部正弘，廢除了那道實施了二百二十多年的禁令。幕府從荷蘭訂購了幾艘蒸汽戰艦，不久，各藩就開始為幕府建造起大型船只來。1854年8月，幕府決定了掛在新船上的旗幟：白底上一個紅色的太陽。[[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官方記錄里并沒有記載京都皇室對俄羅斯艦隊來航以及后來事態的發展有何反應。即使知道美國人和俄羅斯人已經來了，我們也不清楚天皇和他的謀臣們是否知道對外開放的形勢已經發生了巨變。不管怎么說，古都這些人的心思都被其他更迫切的事情占據。8月里的酷暑使大部分的井都干涸了，其中包括中山忠能家的井。他擔心這會對年幼的親王不利，于是決定在陰陽師建議的地方挖一口新井。新井出來的水非常純凈，中山高興極了，宣布從今往后，這口井的水將專門給親王使用。這番話傳到天皇的耳朵里，天皇也很高興，給這口井賜名“祐之井”，因為這口井與祐宮有關系，并且“祐”字還意味著好運。

11月，親王慶祝了自己的第一個生日。我們可能已經料到皇室成員會送給他精美的禮物，以慶祝這位皇族的后代到達人生的一個里程碑，但其實大部分禮物都是他送給別人的，包括皇帝、各位內親王、親王或王妃、宮女以及中山忠能的家人。他還“邀請”了幾位醫生、奶媽和其他服侍過他的人來參加生日會。小親王顯然沒有參加挑選這些儀式性的禮物，比如一箱箱的新鮮鯛魚、豆沙包和米酒這樣的禮物，但是收到皇帝和皇室成員（包括母親中山慶子）送給他的玩具和娃娃，他可能還是很開心的。

但是，接下來那個星期，親王卻生了一場大病，又是嘔吐又是發燒。各種醫生都被召來，開了傳統的中藥方子（有些藥的名字很奇怪，例如紫雪散）。這些藥都沒有效果，于是皇室派使者前往各個神廟為親王祈福，祈禱親王早日康復。親王有時候看上去好點了，但是很快又病情復發。皇室陷入一片陰影之中，人們想起此前有多少皇室的孩子都沒能度過嬰兒期。大家送了無數禮物給親王——大多根本不適合嬰兒——希望能緩解他的痛苦，而他的母親則徹夜不眠地在床邊照顧他。他們還請來了覺勝院的前住持亮恕為他施念咒語。親王的外曾祖母中山綱子為親王的病憂心忡忡，作了一首詩寄托自己的心情：

上天的諸神

和佛祖該如何看待

傷心欲絕的我們

當這位小小的親王

似乎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那天晚上中山慶子得了一種奇怪的病，昏厥過去。除了僧侶的加持和讀經以外，陰陽師也進行了祈禱。他們一邊祈禱一邊撥動琴弦，彈奏音樂。這些儀式顯然奏效：到了月底，親王和他的母親似乎都康復了。但是不久親王又病倒了，于是又召來另外一批僧侶為他祈禱。直到年底，他才完全康復。雖然醫學知識快速在日本傳播——大部分是學習歐洲醫學的結果——但是宮中的醫學依然進步緩慢。實際上，除了祈禱，皇室成員是不太可能像下等人那樣接受醫學治療的。

11月23日，天皇正式任命前幕府將軍的第四子德川家定（1824—1858）為第十三任幕府將軍。天皇還任命他為“征夷大將軍”，這個頭銜一直以來都是將軍正統身份的重要標志，[[9]](#_9__Teng_Tian_Jue____Mu_Mo_noTia)不過它并沒有什么軍事意義，因為這個國家并未受到夷人的威脅。但是當外國軍艦出現并引起民眾的極大恐慌時，它便成了一種迫切的需要。孝明天皇派了兩名武家傳奏到江戶，并帶去皇帝的旨意：“征夷大將軍”最重要的責任就是確保全國人民的安全，并將外國人的軍艦趕出去，從而避免國家蒙羞和將來的后患。太政大臣鷹司政通親自給幕府重臣阿部正弘寫信，詢問幕府如何處理美國軍艦問題并安撫受驚的天皇。阿部回答說，處理辦法迄今仍未出臺，但是無論做什么事，都會優先考慮讓天皇安心。他還鼓勵天皇以后有什么愿望盡管直說，他將盡力而為。[[10]](#_10__He_Tian_Chun_Shu____Kai_Guo)

一直以來，宮廷都將國家的一切事務交給幕府處理，但是自1846年孝明天皇給幕府去信詢問海防事務以來，天皇已數次不滿幕府對夷人的消極抵抗態度。1854年3月31日，幕府沒有問過天皇便和美國人簽訂了《神奈川條約》，開放下田和函館兩個港口，并允許美國領事駐留在下田，而日本則必須向美國人提供燃料、淡水和食物等生活必需品。這個和平友好的協定沒有提及貿易，但是貿易的基石其實已經鋪下。下田和函館兩個地方都非常偏僻，選擇這兩個地方無疑反映了幕府希望對外國人敬而遠之的態度。[[11]](#_11__Ci_Shi_De_Xia_Tian_Shi_Ge_Y)

我們不清楚宮廷是什么時候知道條約的事情的。不管怎樣，另外一場災難轉移了人們對外來威脅的關注。5月5日，皇宮發生一場大火，由于風勢很大，紫宸殿、清涼殿等很快就被大火吞噬。天皇和皇室成員急忙轉移到賀茂神社。大火來勢洶洶，為了及時趕到并護送他前往安全的地方，天皇的六七名隨從甚至赤腳跑來。另外一名官員匆忙趕到中山家將祐宮護送到同一個神社。大火不僅燒毀了皇宮，還讓五千四百余處民房化為灰燼。

賀茂神社被指定為皇宮發生火災時皇室的避難所，但是神社的地方太小，無法容納全部皇室成員和他們的侍從。于是皇后回娘家暫住，其他人則暫時寄宿在一兩座寺廟里。中山家是御所內幸存的房屋之一，親王于5月15日回到了中山家。[[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皇室的麻煩還遠未停止。6月底，祐宮突然發起燒來，一時宮中陷入手足無措的狀態。后來他康復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氣，但不久又迎來了京都地區有記錄以來最強的地震。這次地震造成傷亡眾多，摧毀房屋無數。盡管中山家再次逃過一劫，但他們家的房子太小太擠，在地震中似乎特別不堪一擊。余震發生時，祐宮一直待在庭院里，根據官方記載，他當時一直在安靜地吮吸著奶媽的乳頭。

即使災難接連發生，天皇依然堅持學習和歌，并領略到了其中的奧妙。為了祝賀天皇取得的成績，據史料記載，其他親王派人給他送去一盒墨魚干。皇室成員之間在每個可能的場合都會互贈禮物，但是這些禮物極少是歐洲皇室青睞的那種。最常見的禮物便是鮮魚。新鮮的魚，特別是海魚，對于地處內陸的京都來說，無疑非常罕見，但是它和魚子醬完全不是同一類，更不要說法貝熱的復活節彩蛋[[13]](#_13__Zhi_E_Guo_Zhu_Ming_Zhu_Bao)了。如果以其他地方的皇室標準來衡量的話，日本皇室的生活的確非常節儉，他們簡樸的生活可能并不是由于經濟緊縮，而是一種長久以來的傳統，或許也是一種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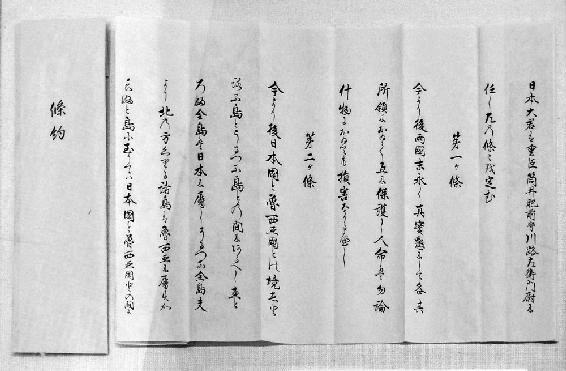
比火災和地震更加讓天皇不安的，是1854年11月7日突然出現在大阪灣的俄國軍艦“戴安娜”號（"aid-126"）。[[14]](#_14__Ru_Guo_Pu_Jia_Jin_Xiang_Sha)上一年乘著老舊的“帕拉達”號主艦的普加金，現在乘一艘新式戰艦回來了。“戴安娜”號在大阪灣停留了兩個星期，給京都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你可以輕易地想象到，絲毫不愿與外國人妥協的孝明，對于一艘幾乎已經入侵到家門口的外國軍艦會是什么反應。他不僅派人到常去的七家神社和七家佛寺祈禱國家太平，還將自己的每日膳食減到最少，厲行節儉。京都的市民驚愕異常，為了安撫民眾，幕府下令各地的大名派兵保衛京都及附近地區。一些官員甚至支持將天皇遷到比御所更容易保護的大阪城居住，但是就在大家還在喧喧嚷嚷之際，俄羅斯軍艦已經起航，駛向了下田。

12月22日，日本（筒井和川路）和俄國（以普加金為首）在下田開始了談判。急于達成協議的普加金表示，只要日本允許兩國間開展貿易，俄國政府愿意將擇捉島割讓給日本，即便俄國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這座島嶼屬于他們。談判取得了一些進展，預計兩天后進行第二次會談。接下來的那一天，一場大地震襲擊了本州，隨之而來的巨大海嘯給下田帶來特別嚴重的破壞。無數岸邊居民被怒吼的海浪卷入海里，嚴重受損的俄國軍艦也只是勉強未撞碎在礁石上。俄國人從海里救起了一些日本人，這一點令日本人非常感激。[[15]](#_15__Guan_Yu_Chuan_Lu_Sheng_Mo_D)

這次海嘯幾乎把下田全毀了，日俄之間的談判只得中斷十天。談判延遲了。[[16]](#_16__Guan_Yu_Zhe_Ci_Fu_Za_De_Tan)與此同時，京都的宮廷認為最近的災難都歸咎于不祥的年號，因此下令儒家學者擬定一系列合適的新年號。將軍從中選出一個“安政”并提交給天皇，這個年號源自早期的儒家著作《荀子》，原文是“庶民安政，然后君子安位矣”。[[17]](#_17__Xue_Zhe_Men_Suo_Zhen_Zhuo_D)盡管這個年號非常吉祥，但是安政時代（1854—1860）卻并不平安。

安政時代剛開始時發生的一件事可以說確實非常安寧——親王首次穿上彩色的衣服，代替他一直以來穿的白衣。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步驟之前，自然要去咨詢一下陰陽師。陰陽師土御門晴男決定，十二月十六日（1855年2月3日）巳時（上午10點）為吉時。那是一個下雪天，為了御寒，親王無疑要包裹得嚴嚴實實的。他在外曾祖母的陪伴下，坐著轎子，來到了父親居住的臨時宮殿。母親家族的其他成員，包括中山忠能夫婦，都走在轎子的后面，在預定的時刻來到了皇宮。中午祐宮穿上了第一套彩色衣服，一件白色的絲袍，外面罩上一件紫紅色的袍子，這兩件都是天皇送的禮物。按照規矩，親王在母親中山慶子的服侍下吃了一頓飯。儀式結束后，他被外祖父中山忠能帶到了臨時宮殿，天皇在那里接見了他并賜他酒宴。換過衣服后，親王出來見天皇，天皇向他道喜，又賜給他酒宴。席上有水果和其他美味佳肴，還有娃娃和玩具等禮物。接著親王又換了第三次衣服，這一次換成了鮮紅色。儀式持續到大約下午4點。這一天，天皇送了親王十二套衣服，其他宮廷成員也給親王添加了衣物。祐宮向天皇和其他人送了禮，主要是魚。那些參加儀式的人之間也紛紛互贈禮物。[[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五天之后，在天皇和朝廷并不知情的情況下，日俄友好條約在下田簽訂。日本對俄國人的讓步，比對美國人要慷慨一些，也許是因為對他們有好感，也許還出于對普加金的同情——普加金為了簽訂條約已經來日本四次，在海嘯和后來的暴雨中船只還嚴重受損。[[19]](#_19__He_Tian_Yin_Yong_Le_Chuan_L)困于日本的俄國人最終都返回了祖國，一些乘坐租來的美國運輸船，其他人乘坐一艘德國商船，還有一些人則乘坐一艘俄國人指導日本工匠造的船。到了1855年夏天，最后一名俄國人也離開了日本。[[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1855年，筒井政憲和川路圣謨代表日本簽署的《日俄和親通好條約》

盡管朝廷對這些事情全然不知，而且明治的生活記錄（到目前為止只提到京都發生的事情）主要還是記載諸如他發了一場水痘導致臉上留下了疤痕、第一次學步這類人生大事，但是朝廷肯定已經嗅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險。朝臣們不管是贊同繼續鎖國還是開國，都一致認為應該加強國防。翌年朝廷下令，將寺廟的鐘收集起來，重新鑄成槍炮。幕府禁止將銅、鐵、鉛等金屬用于鑄造佛像或者其他法器。[[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自然災害繼續在這個國家肆虐。1855年9月，暴雨和大風使得京都的河流上漲到了警戒水位，鴨川上的橋梁只剩兩座，其余全部被洪水沖毀。11月11日，一場大地震襲擊江戶，摧毀了半座城市，死傷無數。

1855年宮廷的一件喜事是新皇宮落成，代替了那座一年前被大火燒毀的皇宮。建造新宮殿花費了一年零七個月，而1788年完工的前一座宮殿則花費了兩年十個月。盡管國家面臨鞏固國防等迫切問題，但是阿部正弘下令優先重建宮殿，說明他將“為天皇減憂”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當被問到對新宮殿有什么要求時，天皇回答說，盡管他能夠想到許多可以改進的地方，但是考慮到國家的急務，宮殿只要按原樣重建他就心滿意足了。幕府詢問天皇的意見，而天皇則拒絕奢侈浪費，這不僅說明他們的關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還說明天皇已經意識到了政治局勢的發展。

新宮殿的費用由幕府和各地大名承擔，特別是最富有的加賀藩的大名前田齊泰（1811—1884）。1856年1月1日，天皇、皇后、親王和其他皇室成員陸續搬進了新宮殿。親王由他的外曾祖母照料。她在出家時已經落了發，但是在這個喜慶的時刻，戴上了假發。

1. [[1]](#_1_3) 普加金的艦隊到達的時間是1853年8月21日，但是幕府過了將近一個月才把這件事報告給京都的宮廷（《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7頁）。想更好地了解普加金的目的和事件的背景，請參考和田春樹的《開國—日露國境交渉》。

1. [[2]](#_2_3) 普加金在小笠原群島知道了俄國政府做出這個決定背后的想法，見和田春樹，《開國―日露國境交渉》，第89—91頁。俄國人對日本人的感情的估計是正確的：那些與俄國人打交道的日本人對他們的溫和態度非常贊賞，并將他們和自以為是的美國人做對比（第101頁）。

1. [[3]](#_3_3) 關于普加金這個時期的行動，見和田春樹，《開國―日露國境交渉》，第109—111頁。他急于收到俄國政府的消息，因為俄國與土耳其的戰爭似乎一觸即發，而且與土耳其的盟國英國和法國之間的戰爭也可能爆發。普加金在上海的時候，給當時在香港的海軍準將佩里寫信，建議他們聯合，并請求佩里從上海借給他四十噸美國煤炭。佩里禮貌地回絕了他的結盟建議，但是同意借給他煤炭。煤炭一借到手，普加金就掉轉船頭，駛回長崎，這時他已經知道了克里米亞戰爭爆發的消息。

1. [[4]](#_4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7頁。亦參考和田春樹，《開國―日露國境交渉》，第99—100頁。

1. [[5]](#_5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8頁。

1. [[6]](#_6_3) 老中是江戶幕府的官職名，直屬將軍，負責統領全國政務；在大老未設置的場合上，老中是幕府的最高官職。定員四至五名，采取每月輪換制，輪番管理不同事務，其人選原則上在二萬五千石領地以上的譜代大名之中選任。老中首席是專門負責財務的職位。——編注

1. [[7]](#_7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0頁。

1. [[8]](#_8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2頁。

1. [[9]](#_9_3) 藤田覺，《幕末の天皇》，第11—12頁。

1. [[10]](#_10_3) 和田春樹，《開國―日露國境交渉》，第157—158頁。還可參考《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155—156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4頁。

1. [[11]](#_11_3) 此時的下田是個約一千戶，共四五千人的小村莊。除了坐船，很難到達這個村子，而且那個地方經常受到臺風的侵襲。

1. [[12]](#_12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8頁。這個日期對應的陽歷是1854年5月11日。

1. [[13]](#_13_3) 指俄國著名珠寶首飾工匠彼得·卡爾·法貝熱制作的復活節彩蛋作品。復活節是東正教的重要節日，訂制彩蛋是以前俄國皇室的重要活動。法貝熱與助手在1885年至1917年間總共為沙皇和私人收藏家制作了六十九顆彩蛋，這些彩蛋由珍貴的金屬或是堅硬的石頭混合琺瑯和寶石裝飾而成，華美異常。“法貝熱彩蛋”后來成為奢侈品的代名詞，并被認為是珠寶藝術的經典之作。——譯注

1. [[14]](#_14_3) 如果普加金像上次一樣將三艘軍艦駛往長崎，可能會引發麻煩，因為那里正停泊著四艘英國軍艦。當時正值克里米亞戰爭，他們可能會襲擊俄國船只，因此普加金改為將船駛往已經向美國人開放的函館。他在函館時，一個他去年帶回日本、對他心懷感激的日本人告訴他，英國軍艦已經到了日本海域。普加金通知日本政府他要到大阪去，但是直到他到了大阪，這封信才送達（和田春樹，《開國―日露國境交渉》，第133—135頁）。

1. [[15]](#_15_2) 關于川路圣謨的評論，請參考拙作Travelers of a Hundred Ages , pp. 393-394。

1. [[16]](#_16_2) 關于這次復雜的談判，以及中間發生的“戴安娜”號沉沒事件，請參考和田春樹，《開國―日露國境交渉》，第146—160頁。

1. [[17]](#_17_2) 學者們所斟酌的七個年號以及選自《荀子》的“安政”，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8頁。伯頓·沃森（Burton Watson）將這句話翻譯為：“一旦人民感到安全，君子們在各自的職位便可感到安心”（Hsün Tzu , p. 37）。

1. [[18]](#_18_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9—90頁。

1. [[19]](#_19_2) 和田引用了川路圣謨日記中的相關段落，見和田春樹，《開國―日露國境交渉》，第153—154頁。日本人對俄國人有好感的一個例子是向他們開放了三個港口（長崎、下田和函館），向美國人只開放了兩個。

1. [[20]](#_20_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8—99頁。這艘船在伊豆半島西端的戶田村建造，因而得名“戶田”。“戴安娜”號海難發生后，俄國人搶救回來一些在喀瑯斯塔德（Kronstadt）建造軍艦用的圖紙，日本根據這些圖紙造出了第一艘符合歐洲標準的軍艦。那些乘坐德國商船回國的俄國人，在薩哈林島附近被英國人攔截并俘虜了。

1. [[21]](#_21_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1頁。

# 第四章 下田條約



隨著1856年（安政三年）的到來，在新宮里安頓下來的孝明天皇，終于可以享受對他那暴躁的個性來說難得的片刻寧靜了。然而即使在這個相對和平的時期里，也偶爾還是會有驚恐的時刻。外國船只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大阪沿岸水域，由于害怕天皇為此擔憂，幕府從彥根、郡山等藩調來士兵加強京都的防守。但也許是漂亮的新宮殿令他感到安心，天皇覺得沒有必要增加護衛，他給太政大臣下了一道諭旨，要求大大減少護衛的人數。[[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不過，天皇從未真正感到安心過。這個時期，出現在日本的外國人（通常是他不快的來源）似乎沒給他帶來什么煩惱，反而是祐宮的身體令他擔心不已。前年年底，親王發過一次燒。嘴唇四周都腫了，沒辦法吃東西。覺勝院大僧正[[2]](#_2__Da_Seng_Zheng__Ri_Ben_Gu_Dai)趕到皇宮，祈禱了一夜。護凈院僧都湛海法師進行加持儀式，顯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一天親王看上去好點了，盡管只是暫時有所緩和而已。2月15日，親王的體溫突然升高。他備受咳嗽折磨，往往要到午夜才能入睡。親王唯一能喝的營養品就是糖水。17日，他可以吃一點稀飯，但仍然睡得很少。天皇在內侍所祈禱孩子早日康復，并向神靈貢奉了米。皇后也派人到祇園神社禱告，湛海法師又誦經加持。

直到十天后親王才完全康復。當然，每個孩子都會生病，而且孩子每次感冒父母都會擔心憂慮，但皇室孩子每一次生病，不管多么輕微，都可能被看成死亡的先兆。一旦醫生的處方看起來沒有效果，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禱了。此外，隨著時間的流逝，天皇也許不再有孩子出生，所以親王健康的每一次波動都會牽動整個宮廷。

那一年的4月29日，祐宮在皇宮見到了父親。盡管他還不到三歲，但是已經顯示出倔強的性格：他拒絕坐進事先準備好的轎子，乳母不得不把他抱在懷里。親王還特別不喜歡別人盯著他看，因此從中山忠能家（親王居住的地方）到宮門的一路上都掛著簾子。簾子將他擋在了好奇者的視線之外，但是民眾卻不得不繞彎路。盡管這樣有許多不便，但每次親王去皇宮都要這樣。他通常在母親家族人員和一兩名侍從的陪伴下去皇宮。[[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天皇越來越喜歡自己的兒子，偶爾會留親王在宮里過夜，有一次甚至留他住了一個月。中山忠能非常希望外孫能留在家里，但是想到最好還是讓孩子適應宮廷生活，于是在宮里當值的時候，常常設法讓自己遠離他的視線。有時候親王會在皇后的花園里玩耍，經常陪伴他的外曾祖母中山綱子，看著他走過皇后花園里那座小石橋時，作了下面這首詩：

太陽之子

注定將升到

無法預測的高空

他第一次跨過了

天國的石橋[[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_5___Tai_Yang_Zhi_Zi__Shi_Tian_H)

1856年8月21日，就在綱子詩中歌頌的和平氣象過去兩個月后，美國領事湯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乘坐軍艦“圣哈辛托”號（"aid-16V"）來到下田。四天之后，他拜訪了下田的地方長官岡田忠養，并通知岡田從今以后他將長駐下田。岡田顯然收到幕府的命令，不承認哈里斯有權留在下田，并列舉了日本禁止外國人滯留的現有規定。哈里斯不為所動，堅持認為依照《神奈川條約》的規定自己有權留在日本，假如當地官員不給他領事的待遇，他就直接到江戶去投訴。哈里斯等了整整一個月，幕府終于同意他在下田住下來。與此同時，哈里斯在他稱為領事館的佛教寺廟玉泉寺里升起了美國國旗。幕府令京都的所司代向太政大臣匯報這件事。[[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哈里斯抵達下田兩天后，前荷蘭商館館長、現任荷蘭政府專員揚·亨德里克·唐克·科蒂烏斯（Jan Hendrik Donker Curtius，1813—1879）寫信通過長崎奉行轉給幕府，敦促后者放棄閉關鎖國的政策。他預言，假如日本堅持這種政策，將會導致與世界上的大國發生戰爭。他還呼吁摒棄過去對基督教的敵對政策，并特別譴責使用忠誠測試的手段（踏繪），強迫日本人踩過畫像（一般是圣母瑪利亞）來證明自己不是基督徒的做法。他指出對外貿易會給日本帶來種種好處，建議日本設立進口關稅表，同時鼓勵生產適合出口的商品。他還建議日本允許那些來自與日本有聯系的國家的人攜妻帶子，一起住在開放的口岸。科蒂烏斯最后要求廢除對外國船只的限制，并修改相關法律，允許它們離開停泊的港口到江戶去。[[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十二年前（1844年），荷蘭國王威廉二世已經給幕府去信要求日本開國。那些驕傲的官員根本不屑于回答，但是現在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幕府覺得有必要認真考慮唐克·科蒂烏斯的建議。開會時，事實上在場的人全部贊成立即開國，只有阿部正弘擔心各大名以及狂熱的愛國主義者的反應，認為時機還未成熟。總之，沒有人擁護這個國家長久以來閉關鎖國的傳統。[[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政策以驚人的速度發生了轉變。

這些情況看來還沒有傳到京都的宮廷里。親王慶祝了自己的第三個（按照日本算法是第四個）生日，他收到了天皇和宮廷其他成員送的禮物——主要是魚。一個星期后，在天皇的命令下，親王搬到皇宮居住。他在宗教儀式和其他儀式的伴隨下離開外祖父中山忠能家。由于親王不喜歡坐轎子，他們便改為在接他的轎子里裝上護身符之類的東西，假裝親王就坐在轎子里。他的母親中山慶子坐在這些護身符的旁邊，假裝在照看（隱形的）親王。眾多醫生、大臣和權貴跟在轎子后面走過了這段短短的路程。

親王一進皇宮，就被帶去見天皇，天皇賜給他用漆盒裝著的一杯清酒（重肴），皇后送給他各式糖果（交肴）和玩具。親王也回贈了類似的禮物。盡管他只有三歲，卻被要求參加禮尚往來的固定儀式。對于這類不得不扮演的角色，難以想象小男孩的反應如何。也許他將這種儀式化的行為看成一種游戲，但是他漸漸會明白，鞠躬和互贈禮物并不是一種游戲，而是他的生活。許多年以后，德國籍宮廷醫生歐文·貝爾茨（Erwin Baelz）無意中聽到伊藤博文對有棲川宮熾仁親王說：“生為皇太子真是不幸。自打一出生起就被各種禮節束縛著，稍微長大一點又要被老師和顧問擺弄。”說完伊藤比劃了個拉提線木偶的手勢。[[9]](#_9__Erwin_Baelz_Awakening_Japan)

為了享受到的所有特權，親王一生都要在痛苦而受限制中度過，幾乎沒有自由。但是人之常情卻并未完全受到壓制。也許親王覺得和外曾祖母中山綱子最親近，（用官方記載中的話）四年間她“廢寢忘食，奉侍撫育”。[[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我們很容易想象，在得知他將住在宮里，再也無法想看就看到他時，中山綱子的心情該有多么失落。

親王將住在生母中山慶子的寢宮，位于花御殿（花宮）西側的三間房子里。[[11]](#_11__Zhe_Shi_Chang_Yu_Dian_Bei_M)他出生后不久，慶子就將對孩子的所有權利都轉給了孝明的皇后。孩子稱呼皇后為母親，并向她表達應有的敬意。盡管慶子是地位較高的典侍[[12]](#_12__Dian_Shi_Wei_Ri_Ben_Nu_Guan)，但是她能期望的最多也就是可以服侍兒子。她不會向他暗示（盡管他最終會知道）自己是他的生母。1893年，貝爾茨醫生在檢查過中山慶子（那時稱為“二位局”[[13]](#_13__Ju_Shi_Zheng_Fu_Ci_Yu_Shi_F)）的身體之后寫道：

她是天皇的生母，然而作為天皇母親的皇太后——通常寫作こうだいこうごう——卻是前天皇的正妻。天皇必須對后者盡到兒子責任，一年中要禮節性地看望數次。但另一方面，他從未踏足生母家一步，因為她只是一個臣民。除非生母提出申請并且得到天皇批準，她才可以去見他。多么奇怪的禮儀啊！[[14]](#_14__Erwin_Baelz_Awakening_Japan)

也許出于對奪去了孩子的母親的同情，孝明讓她照顧親王。這一點上，即使是皇后也沒有這么幸運。一直到20世紀初，宮廷的規矩都是要把天皇的孩子從母親那里帶走，交由陌生人撫養。貝爾茨這樣描寫大正天皇的長子（即平成天皇裕仁）：

5點去拜訪川村伯爵。皇太子的兒子被交付給這位上了年紀的海軍將領（他估計快七十歲了）照料。這種想法多么奇怪！將小親王從父母身邊帶走并交給陌生人撫養，這是違背人性的殘忍風俗，我希望廢除它。但是它并沒有被廢。可憐的皇太子妃被迫交出她的孩子，這使她掉了多少眼淚。現在父母一個月只能看一兩次他們的孩子，而且每次的時間都很短。[[15]](#_15__Erwin_Baelz_Awakening_Japan)

盡管親王現在跟母親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在宮里卻總是睡不安穩。中山慶子的寢宮跟他迄今為止生活的中山家比起來，也許既寒冷又凄清。也許他在思念外祖父，特別是外曾祖母。但是宮中為他治療失眠的唯一方法，就是召來高僧焚燒圣火，施念咒語，驅趕那些令親王失眠的惡魔。[[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宮里的生活越來越落后于日本其他地方。他們仍舉辦跟過去一模一樣的傳統儀式，并用這些儀式而不是現代醫藥來治病。在日本的其他地方，種痘預防天花的功效已經廣為人知[[17]](#_17__Zai_Zhong_Shan_Jia_Zhu_De_S)，還是小孩的明治天皇也秘密地接種，但是孝明卻拒絕種痘，而這也許就是造成他英年早逝的原因。

御所內的舒適生活都是過去式的。1857年春天，宮內按照天皇本人畫的草圖在皇宮花園建了一座亭子。他給完工的亭子起名為“聽雪”，并讓著名的書法家左大臣近衛忠熙寫成匾額懸在門上。[[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想象孝明在亭子里作詩，或者不止聽雪還欣賞雅樂，這個場景實在是非常愜意。一切似乎都沒有改變，但是皇宮外面的吵鬧聲卻越來越響亮和刺耳。

1857年2月28日，唐克·科蒂烏斯又一次警告長崎的地方長官，意在警告將軍。他說（日本業已知悉）清朝已經在鴉片戰爭中敗于英國，迫于和約只好開放廈門、廣州、上海、寧波和福州五個港口。盡管清朝是被迫開放，但這些開放的口岸因對外貿易卻變得非常繁榮，老百姓也從中獲利頗豐。然而，廣州違背和約，并未開放港口，暴徒還燒毀了英國國旗。這座城市被英國艦隊炮轟并毀于灰燼。歐洲和美國將此歸咎于清朝官員不負責任，他們對中國人的嘲笑和鄙視至今沒有停止。

接下來，唐克·科蒂烏斯表明他為何不辭勞苦地將這些消息告訴日本人。盡管廣州城發生的事情和日本沒有直接關系，但是應該把它看成一個警告，即一旦簽訂了協議，就應該履行規定的條款，不能蓄意更改。他接著說道：“最近我從與下田官吏交涉過的美國官員口中得知，貴國一再推遲對談判做出答復，而且對小事爭論不休，否認承諾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不是與外國建立信任關系的方式。此外，在與其他國家的信函往來中，貴國的態度通常很傲慢，在稱呼他們時使用的都是命令藩屬國的語言。這件事情令所有的外國人反感。如今世界上的大國是英國、美國、俄國和法國，貴國將與這些大國開展貿易關系。你們應該盡快改變落后的方式，體現友好關系的成果，與時俱進，并以這樣的方式回應世界潮流。”[[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唐克·科蒂烏斯的話很有道理，而且他所警告的外國勢力對日本的威脅確實存在。但是他的論據的前提，即假如日本不接受普遍的貿易準則，則會被夷為灰燼的說法，在那些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聽來，簡直是無稽之談。正如唐克·科蒂烏斯所說，貿易也許對相關的國家都有益，但是如果一個國家選擇拒絕這種利益，為什么就會覆滅呢？幕府的官員確實很傲慢，他們的拖延策略也許讓人很惱火，但是如果外國人能意識到自己不受歡迎并離開，就完全可以避免羞辱了。

幕府官員的腦海里可能會掠過這樣的想法，即便他們意識到日本的孤立狀態無法維持多久。便捷的交通工具（包括蒸汽輪船）降低了距離這一日本賴以保護自己的屏障的有效性，使開國變得無法避免。但這倒不一定完全是個災難。除了唐克·科蒂烏斯提到的商業利益之外，對外貿易可能還會帶來其他好處。蘭學者（學習荷蘭科學技術的學者）研究歐洲科學已經有一個世紀，他們相信，有必要使日本了解外國在醫藥、航海、地理以及其他對日本有益的學科方面的發展。而且很明顯，如果日本能夠從國外進口食物，最近的饑荒就不會死那么多人。

即使身居京都且通常與民眾隔絕的天皇，至少也有一次意識到了饑荒帶來的痛苦：1787年，大約七萬人聚集在御所周圍向天皇祈禱——就跟向神靈祈禱一樣——希冀自己能擺脫饑餓。[[20]](#_20__Dui_Dang_Shi_Yu_Suo_Zhou_We)光格天皇和遜位的后櫻町天皇深為感動，都竭力救濟受災的民眾。[[21]](#_21__Ju_Shuo_Dan_Dan_Yi_Ge_Xia_W)光格被人民的苦難所震驚，破例要求幕府賑災，這是德川幕府時代第一次有天皇干預國家政策。

對于1857年初夏在聽雪亭休息的孝明來說，不太可能有機會回憶祖父的這一舉動。拜幕府的慷慨薪俸所賜，這個時期他的生活極其舒服，而且沒有什么迫切的理由需要為人民的福祉擔心。相反，對他的幸福形成重大威脅的是外夷。孝明向神靈祈禱，熱切地希望外國人盡快離開，這個愿望盤踞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

不久，無數愛國者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但是孝明自己只希望“攘夷”。他非但不想從這種對天皇的新的尊敬中獲益，或者剝奪幕府的政治權力，反而嚴厲反對那些將“尊王”和推翻幕府聯系起來的人。孝明不僅政治上非常保守，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舒適生活都是將軍所賜。他一次次地大發雷霆，似乎源于他無法享受聽雪亭的寧靜而倍感煩惱。但是，對于孝明天皇來說，只有在不了解御所之外的情況時才能保持心情的平靜。

五月初五這一天，有男孩的家庭都會豎起鯉魚旗慶祝他們的成長。孝明接見了親王，并親手將一個裝飾用的香包掛在親王的肩膀上。那天晚些時候，他來到親王的房間——這是少見的行為——并像其他父親一樣檢查了鯉魚旗。這天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個平靜日子：一個星期后，他收到了第一份幕府的報告。報告中說，鑒于出現在距離京都很近的大阪海岸的外國船只越來越多，幕府加強了那里的防備，在木津河和阿吉河的河口分別建起了兩座炮臺，鑄造四十門重炮，并切實推進西式戰艦的制造計劃。這些都是重大的事業，不能指望很快見效。[[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在得知外國軍艦離得如此之近后，京畿地區的這些積極防備無疑使孝明的恐慌情緒緩和了許多，但是世界形勢似乎朝著他憎恨的方向發展。幾個星期后的1857年6月17日，下田的地方長官與湯森·哈里斯簽訂了《下田條約》，進一步向“蠻夷”開放日本。

不滿于《神奈川條約》條款的哈里斯，通過不斷地談判和妥協，獲得了一份對美國更加有利的協議。這份哈里斯口中的“協議”向美國船只開放了長崎，并給予美國人在下田和函館的永久居住權。協議還為治外法權提供了依據：“在日本犯下罪行的美國人應受美國總領事或者領事的審判，并按照美國法律進行懲罰。”[[23]](#_23__Yuan_Wen_Jian_Mario_Emilio)后來，日本花費了莫大的努力說服外國政府放棄這條侵犯他們主權的特權，但下田的地方長官可能都沒有預見到自己做出了的讓步會如此巨大。

哈里斯的下一個勝利是，經過屢次要求，幕府決定讓他到江戶去面見將軍。一些有影響力的家族反對這個決定，但是幕府不顧他們的反對，將自己的行動通知了宮廷。1857年11月23日，哈里斯在荷蘭翻譯亨利·休斯根（Henry Heusken）[[24]](#_24__Dang_Shi__Ke_Neng_Mei_You_Y)的陪同下離開下田，幕府派出大隊士兵，以確保他一路無虞。從士兵的人數、傳令官等許多方面來看，這很像是某個大名的隊伍。哈里斯在日記里寫道：“整個隊伍大約有三百五十人。”[[25]](#_25__Mario_Emilio_Cosenza__ed__T)

1857年12月7日，德川家定將軍在國事大廳會見了哈里斯。[[26]](#_26__Guan_Yu_Ha_Li_Si_Dui_Hui_Mi)幕府官員按照等級排列，將軍坐在最高一級，靠在一個扶手上。哈里斯鞠完三次躬，向將軍走去，解釋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他將一封富蘭克林·皮爾斯（Franklin Pierce）總統寫給日本國皇帝的信交給老中，請其轉呈給將軍——當時仍然認為被稱為“大君”的將軍是這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信中賦予哈里斯在兩國締結通商條約上完全享有“商定、處理、商討和談判”的權力。哈里斯的日記接著寫道：“說完我停下來鞠了一躬。片刻寧靜之后，大君開始將頭往肩膀后面一扯，同時頓了一下右腳。這個動作重復了三四遍。”

不清楚這些動作想表達的意思，但其意圖是友好的。將軍簡單回答了哈里斯，并以“兩國友誼永世長存” 作結。[[27]](#_27__Guan_Yu_Ha_Li_Si_Dui_Hui_Mi)

五天后，哈里斯會見了老中堀田正睦（1810—1864）。哈里斯列舉了種種理由，說明由于蒸汽輪船和電報的發明，國家之間的通訊已經變得極為便捷，現在整個世界已變得像一個家庭，每個國家必須和其他全部國家保持友好關系。他提出了兩個要求：在其他國家的首都設立外交使節、允許自由貿易。

哈里斯警告日本，假如英國無法取得通商條約，可能會對日本發動戰爭。英國海軍很可能占領薩哈林和蝦夷；如果當時正進逼北京的英法聯軍取得勝利的話，法國可能會占領朝鮮，而英國可能會要求清朝割讓臺灣。然而，美國只要求建立和平的關系。另外，假如日本依賴美國，就能拒絕英國和法國貪得無厭的要求。哈里斯警告，如果日英之間爆發戰爭，日本必敗無疑。最后，他承諾，如日本和美國簽訂條約，美國將保證禁止銷售鴉片，借此表示和英國人有所不同。[[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英國艦隊對日本的威脅似乎起了效果。盡管一些強勢的大名反對簽訂合約（像高聲堅持攘夷的德川齊昭），但1月16日，堀田正睦還是邀請哈里斯到自己的住處，向他表示日本愿意開始雙邊貿易，允許一名公使常駐日本，并開放一些其他口岸代替下田。[[29]](#_29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_1)

堀田將這些事情通知了京都所司代，要求他向天皇匯報。宮廷很快做出回應，下令不許開放京都地區的任何港口。那個月晚些時候，奉幕府的命令，兩名官員提交給宮廷一份最近與外國人交涉的詳細報告。讓宮廷知道當前事態發展的先例已經牢固確立。

堀田通知說，為了獲得宮廷對與美國簽訂合約的許可，他將到京都去一趟。看來這份報告并不能使孝明安心，他決定在堀田來之前先咨詢朝廷高級官員的意見。孝明寫了封信給關白，要求他詢問太政大臣、左大臣和右大臣對于外交事務的坦率意見。天皇聽到傳言說堀田將帶來大量金錢，在給關白九條尚忠（1798—1871）的信中說：“黃白，豈足動朕之志哉？朕治世之中，若成許與外夷通商之俑，則失信于國民，遺恥于后世，此身何以見神宮及列圣？卿等亦詳察斯意，必不為金錢所惑。”[[30]](#_30__Zhe_Duan_Hua_De_Fan_Yi_Zun)

在這些忙亂的日子里，偶爾也會有一些寬慰人心的插曲。1857年11月，六歲的祐宮作了一首短歌[[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這是他十萬首短歌中的第一首。

1. [[1]](#_1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13頁。

1. [[2]](#_2_4) 大僧正：日本古代由朝廷任命的管理僧尼的最高職位。僧官系統分三級，自上而下依次為僧正、僧都、律師，僧正和僧都又分大、小兩級。——編注

1. [[3]](#_3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17頁。

1. [[4]](#_4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18頁。

1. [[5]](#_5_4) “太陽之子”是天皇和親王的別稱，由于提到了“太陽”，詩歌一開始就用了一個與之相關的詞“上升”。“天の浮橋”這個詞的原意是“天上的石橋”，在這里指的是親王真正跨過的橋，但卻暗示了 “天之浮橋”（連接天地之間的橋梁）、天照大神隱身的 “天巖戶”等多重含義。

1. [[6]](#_6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0頁。這段描述來源于日本文獻，見《東坊城聡長日記》及《大日本古文書》等，但它與哈里斯日記中的描述并不相符。在1856年8月22日，即抵達下田后的第二天，他走上岸，來到下田對面一個叫做“柿崎”的村子。“這個地方的寺廟——神道教的玉泉寺作為美國人的住處。房間非常寬敞，既整潔又干凈，一個人在這里待上幾個星期是很舒服的……下田的了泉寺也用來給美國人用——可能我得住在那里，直到找到居住的房子為止”（Mario Emilio Cosenza, ed.,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 pp. 203-204）。8月27日，哈里斯提到官員們努力說服他“一年內離開并回國”，但他抵抗住了所有這類勸告。8月28日，“副奉行”通知他說，“由于我的地位很高，他很榮幸地準備接見我，并將為我指定一處合適的住處——柿崎的玉泉寺”（pp. 209-210）。哈里斯在下田登陸和居住期間遇到了當地的反抗，可能有人故意誤導江戶政府，向他們掩蓋了真相。

1. [[7]](#_7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1頁。

1. [[8]](#_8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1頁。

1. [[9]](#_9_4) 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24.

1. [[10]](#_10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4頁。

1. [[11]](#_11_4) 這是常御殿北面的一座小建筑。1840年以后通常稱為“東宮御所”，或“皇太子御所”，此時文中使用的是舊稱，可能是因為祐宮還未被指定為皇太子的緣故。

1. [[12]](#_12_4) 典侍為日本女官的官名。日本天皇的后宮中沒有宦官，主要的事務都由女官來擔任。女官的職位按高低分為典侍、掌侍、命婦、女嬬、雜工等。各級女官職位都由出身決定。權為權官，超出該職位人數后增設職位，一般比該職位級別稍低。典侍（權典侍）因經常服侍于天皇身邊，故常有侍妾化的情形出現，之后便成為天皇嬪妃的位號。——編注

1. [[13]](#_13_4) 局是政府賜予侍奉皇室、將軍、公卿等有著重要地位的女性的名號，如江戶初期的春日局。——編注

1. [[14]](#_14_4) 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01。

1. [[15]](#_15_3) 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44。

1. [[16]](#_16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6頁。

1. [[17]](#_17_3) 在中山家住的時候，明治就已經在外祖父中山忠能的命令下接種了牛痘（《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54頁）。關于國內其他地方種痘的情況，可以參考拙作"aid-1C8", p. 382。那篇日記的作者井關隆子（1785—1845）高度贊揚了長崎的荷蘭醫生所引進的種痘方法。

1. [[18]](#_18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9頁。

1. [[19]](#_19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7—128頁。原文是一封用荷蘭語書寫的信件，本文譯自日譯本。

1. [[20]](#_20_2) 對當時御所周圍祈禱的群眾的記載，見藤田覺，《幕末の天皇》，第55—70頁。

1. [[21]](#_21_2) 據說單單一個下午，后櫻町天皇就派發了三萬個蘋果，每人一個（藤田覺，《幕末の天皇》，第60頁）。

1. [[22]](#_22_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0頁。如果想要更詳細的資料，可以參考《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644—645頁。

1. [[23]](#_23_1) 原文見Mario Emilio Cosenza, ed.,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 pp. 573-574，也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1頁。

1. [[24]](#_24_1) 當時，可能沒有一個人能將英語直接翻譯成日語，或者將日語直接翻譯成英語；哈里斯的話被休斯根翻譯成荷蘭語，然后再由一位學過荷蘭語的日本人翻譯成日語，荷蘭語是唯一一門日本人說得流利的歐洲語言。有關休斯根的介紹，可以參考Reinier Hesselink, “The Assassination of Henry Heusken”。

1. [[25]](#_25_1) Mario Emilio Cosenza, ed.,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 p. 412。也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6頁。

1. [[26]](#_26_1) 關于哈里斯對會面的描述，請參考Mario Emilio Cosenza, ed.,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 pp. 468-480。

1. [[27]](#_27_1) 關于哈里斯對會面的描述，請參考Mario Emilio Cosenza, ed.,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 p. 475。將軍的日文原話用影印于p. xxx。

1. [[28]](#_28_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7—138頁。哈里斯對自己與堀田會面的描寫，雖然內容差不多，但卻沒有這么具體。例如，沒有提到英國和法國領土上可能有的野心。還可參考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劍橋日本史》）, vol. 5, p. 278。

1. [[29]](#_29_1) 《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708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0頁。哈里斯的版本見Mario Emilio Cosenza, ed.,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 pp. 496-500。

1. [[30]](#_30_1) 這段話的翻譯遵循了《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2頁的內容。信的原文要詳細得多（《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725—726頁）。

1. [[31]](#_31_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9頁。這首詩是中山慶子死后在她的私人物品中發現的，上面還附有這首詩作于何時的標記。詩的內容，請見第六章。

# 第五章 安政大獄



1858年3月6日，在兩名高級官員川路圣謨和巖瀨忠震的陪同下，老中堀田正睦帶著將軍德川家定送給天皇的豐厚禮物，離開江戶，出發去京都。同一天，堀田給武家傳奏去信，告知他來京都是為了匯報和美國簽訂條約的情況。兩天后，堀田將兩名武家傳奏和三名議奏邀請到自己的住處，向他們詳細地介紹了當前世界的發展趨勢。他指出，日本已再無可能保持與世隔絕的狀態，并向這些官員出示了通商條約的草稿，要求獲得宮廷的首肯。[[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一些朝廷官員，包括著名的前關白鷹司政通及其兒子鷹司輔熙（1807—1878）都同意答應幕府的要求，但是孝明給左大臣近衛忠熙和關白九條尚忠分別去信，強烈要求大家尊重他的意愿。孝明在給九條的信中重申自己絕不向外國人妥協的堅定立場。如果滿足了美國人的要求，那他還有何顏面見伊勢皇大神宮內供奉的祖先？如果“夷人之輩”堅持要日本開放通商口岸，日本應該“不辭武力”。[[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堀田的宮廷之旅毫無結果。4月5日，天皇在接見堀田時，一再重申他確信與美國簽訂合約將會陷這片神圣土地于危險之中。在給堀田的一封信中，孝明表達了自己深深的憂慮。[[3]](#_3__Xin_Jian_Wan_Zheng_Yi_Wen_Ji)他強調，如果按照美國人的要求，對幾年前簽訂的那份開放下田——這本身已經是國家大事——的合約進行修改，那么國家榮譽將會受到玷污。孝明最初起草這封信時，曾準備將這件事全部交給幕府去處理，但是八十八名公卿貴族強烈抗議幕府對外國人的妥協政策，因此信中的語言變得更加直言不諱。5月15日，堀田在極度失望中離開了京都。

堀田這次來訪最顯著的一點，也許是公卿們大聲叫囂的反對態度。這個時期的貴族給人的印象是怯懦的朝臣，他們往臉上撲粉、化妝，并且穿著過去時代的衣服。這樣的貴族可能存在，然而從這個時期開始，許多貴族努力實現大政奉還、王政復古，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決心，甚至出現魯莽的行為。有人認為，這種現象源于當時公卿的妻子普遍出身武士階層，她們為公卿階層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們很難證明這一點，但是無論如何，認為朝臣都是頹廢的文人雅士或者是平安貴族的末裔的看法，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了。從這個時期開始，公卿在反對幕府的一切行動中都有著突出的表現。

1858年4月，幕府指定彥根的大名井伊直弼（1815—1860）為大老。[[4]](#_4__Zhe_Ge_Tou_Xian_You_Ge_Zhong)翌日，在給關白等大臣的一封信中，天皇預計井伊將會竭力爭取朝廷批準合約，但是自己絕不改變主意。[[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孝明絕對擁護幕府，然而在認為他們不對時，卻堅持認為自己有權拒絕配合。

孝明越來越直言不諱地譴責開國的政策。1858年7月27日，他分別派使者到伊勢神宮、石清水八幡宮和賀茂神社去祈禱神靈的保佑。在一份宣命中，孝明向神靈請愿，假如日本和夷人之間發生戰爭，希冀神靈和13世紀摧毀蒙古侵略者那次一樣，發一陣神風，把侵略者吹走。他還請求神靈懲罰那些忘記國恩的“不忠之輩”——那些同意開國的人。[[6]](#_6__Yuan_Wen_Jian___Xiao_Ming_Ti)

孝明的祈禱并沒有產生什么效果。7月29日，下田的地方長官井上清直登上當時停泊在神奈川的“珀哈頓”（"aid-1ES"）號戰艦，與湯森·哈里斯會面，并簽署了一份日美友好通商條約。[[7]](#_7__Tiao_Yue_De_Ying_Wen_Nei_Ron)條約包含一個時間表，規定五年內陸續將下田和函館以外的幾個港口——神奈川（橫濱）、長崎、兵庫（神戶）和新潟——向外國船只開放。

7月31日，幕府向宮廷匯報了日美條約簽訂的結果，并解釋說由于情況緊急，沒有時間聽取宮廷的意見。當宮廷收到這封信時，不出所料，孝明非常憤怒。他派人請來關白，宣布自己將退位。

孝明采取這種極端手段，也許因為這是他能使幕府改變政策的唯一辦法。假如孝明退位——如果幕府同意他的決定——繼任者將會是他那只有六歲的兒子，或者是一名旁支的親王。在這種關鍵時刻，少年天子注定是個災難，而一個不是直系的遠親登上皇位不是引發仇恨，就是引起黨派之爭。

孝明在信中一開始用模式化的詞句，宣稱日本帝王制度的獨特性，特別是王室的血統從未間斷過。日本不像中國，出身卑賤的人只要有過人的能力就可以當上皇帝。孝明稱贊日本皇室的一脈相承，但他真正的重點似乎是放在做皇帝的難處上。他說自己并非因為能力出眾才當上皇帝。即使是對皇室尊貴血統深信不疑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并非每一個登上皇帝寶座的人都能成為一名出色的天皇；事實上，《日本書紀》就描寫了一些殘忍剛愎的天皇。孝明也許比同一世紀的前任們要有才華一些，這一點或許解釋了為什么他會對自己被迫扮演的角色感到不滿，并最終對自己感到不滿。孝明使用這些套話，但在某種程度上卻表達了他的真實情感，他多次使用“愚力不及”“微力難及”等語句，表達自己不符合天皇的要求。孝明說，仁孝天皇死時自己本應堅決拒絕繼任皇位，但是當時他太過悲傷，在登基儀式上根本就不知道都發生了什么。盡管無知，但他從那時起便一心一意侍奉神靈，尤其是神宮中的祖先，努力避免玷污這個神圣的家族。他的微薄之力已經無法治理這個國家，自己也經常嘆息自己的失敗。自1854年皇宮毀于一場大火以來，國內許多地方發生了騷亂，人民生活不得安寧。孝明悲痛地認為這些完全歸咎于自己的“德薄”。

最近，外國船只來到了日本海域，其中美國特使甚至要求友好和通商。他相信，盡管外國人口頭說得好，但實際上懷著有朝一日吞并日本的野心。如果拒絕外國人，必定會引發戰爭。他知道由于長年的和平及政府的善政，人民已經變得懶散，而且軍備也不足。總而言之，日本的武力無法和敵人抗衡。然而，即便是日本長期和平的特殊局勢，那些擔負著“征夷”使命的武士卻無法完成自己的職責，實在令人悲嘆。

孝明說自己一直將政治事務委托幕府處理，并因為擔心幕府和宮廷的關系惡化而不愿發表自己的意見，但現在卻導致了困難的局面。他不知如何是好，而且能力有限，于是決定辭去皇位。在這個國家面臨嚴重危機的關鍵時刻，祐宮還太小，難以繼位，因此他提議三位有皇室血統的親王為繼任者。[[8]](#_8__Ta_Zai_Xin_Zhong_Ti_Dao__San)他說自己絕對不是為了過上舒適的生活才退位，而是希望讓位給那些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人，讓他們來處理國家大事。天皇要求關白向幕府轉達自己這一請求。[[9]](#_9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

這封信清楚地表達了孝明對幕府無法應付外國人的不滿。盡管沒有在信中明說，但他已經越來越抱有一種信念：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將外國人趕出去、讓他們出現在日本就是對神靈和自己祖先的不敬。這封信和隨后的類似信件有一點令人難以忘懷，即它們傳遞了一個飽受折磨的個人的形象。信中的許多措辭當然都很模式化，然而至少幾百年來，還沒有天皇表達過輝煌頭銜之下類似的苦澀無奈和無力感。孝明成為一個悲劇人物，從這時一直到他凄慘的臨終，只有幾個非常短暫的時期沒有受到憤怒和失望的困擾。如果想在日本歷史上尋找和他類似的人，我們可能不得不追溯到被流放的后鳥羽天皇和后醍醐天皇。也許莎士比亞筆下的理查二世在意識到自己無法掌控命運這一點上，可能和孝明更為接近。信中孝明對幕府官員的攻擊、對每一次事態發展的悲嘆，在日本君主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這些信都署的是孝明的雅號，通常是“此花”。也許這里用到了古老的《難波津之歌》的典故[[10]](#_10__Zhe_Shou_Zhu_Ming_De_He_Ge)：

花開難波津，

寒冬閉羞顏。

今春滿地堂，

花開香芬芳。

孝明使用這個雅號，是希望他在長長的寒冬過后，也能看到春天嗎？

信的末尾，孝明否認自己放棄職位是為了過上舒適的生活，然而荒謬的是，那樣的生活正是幕府和許多官員認為最適合他的生活。只有到了統治末期，當他的情感從無奈轉為絕望時，孝明才沉溺于美酒和女人。[[11]](#_11__Yuan_Shan_Mao_Shu_Bian____W)孝明在這封信中的形象非常感人，他是一個聰明人，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而在一個外力作用下的變革時代，這種傳統正迅速崩潰。

孝明的退位請求顯然沒有傳到幕府。九條尚忠通過努力勸說，使孝明平靜下來。九條承諾讓一名幕府高級官員到京都來說明情況，然而1858年7月，幕府再次與荷蘭、俄國和英國簽訂了條約（類似于和美國簽訂的條約）。[[12]](#_12__9Yue_Yu_Fa_Guo_Qian_Ding_Le)9月11日，孝明對事態的新進展怒不可遏，他頒布了一條敕令，宣布自己將退位，并要求幕府解釋為何無視天皇的意愿。

九條尚忠收到敕令后回應說，盡管天皇明顯有理，但是由于事情的嚴重性，自己不得不認真考慮后才能給出意見。他與朝臣見了面。大多數人同意應將天皇的命令傳達給幕府，但是應該避免使用過分的語言。九條向三公出示了孝明寫的信，左大臣近衛忠熙主張發一份給水戶藩的前大名德川齊昭，敦促他勸幕府改革內政、抵御外侮。假如齊昭能勸兩三個主要的大名接受自己的意見，天皇的愿望完全能夠實現。[[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這是一個危險的計劃。它打算違反幕府的規定，直接與大名聯系；更糟糕的是，如果計劃成功，肯定會引發宮廷與幕府的糾紛，而這是幕府最擔心和痛恨的。朝臣們意見分歧，一些人擔心信發出去最終將會損害朝廷，另一些人則堅持立刻把信寄出，否則天皇肯定會退位。最后，這封信的一份副本交給了水戶藩在京都的代表，另一份則交給了常駐皇宮負責傳達消息的一名幕府官員。

孝明在信中承認，和美國簽訂協議是情勢所迫，在所難免，但他指責幕府沒有聽從自己的建議，在采取進一步的外交措施之前咨詢主要藩主的意見。孝明非常擔憂國內的騷亂形勢，并敦促幕府采取“公武合體”的政策，即公家和武家合為一體。這個詞概括了孝明的理想：和我們更為熟悉的“尊王攘夷”相比，孝明希望的是和幕府合作，將外國人趕出去。在論述德川幕府末期的文章中，這個詞常常出現。

孝明的退位又一次被勸阻了。9月23日，將軍德川家定逝世的消息傳到首都。他其實一個多月前就死了，但是幕府封鎖了消息，直到這時宮廷才收到消息。將軍的逝世可能使孝明中止了退位計劃。總之，9月初他用近衛忠熙代替了支持幕府的關白九條尚忠，孝明認為近衛和自己更加趣味相投。

1858年10月31日，老中間部詮勝（1804—1884）來到京都。這似乎符合幕府派出一名高級官員的承諾，但間部完全無意就未征得皇室同意便和美國人簽訂條約一事向天皇道歉。相反，他受井伊直弼指派，來為九條尚忠恢復原來的關白之職。除此之外，他還要將京都所有反對幕府政策的人都處理掉。這標志著所謂的“安政大獄”開始。八名“尊王攘夷”派的武士被處死，其中包括備受尊崇的吉田松陰、橋本左內和賴三樹三郎。吉田松陰的罪名是密謀刺殺間部，這些人計劃在江戶到京都的途中殺死間部，但其他人的“罪名”則沒有這么明顯。那些被懷疑是“尊王攘夷”派的公卿（包括地位很高的家族）也受到審問并被迫辭職。其他一些被認為和“尊王攘夷”派有更深瓜葛的人則被軟禁，或者被勒令落發出家。

也許是為了安慰天皇，間部給天皇帶來了新將軍德川家茂準備的豐厚禮物，然而孝明拒絕接見間部。[[14]](#_14__11Yue_1Ri_Ta_Gei_Zuo_Da_Che)他將天皇挑選的近衛忠熙換掉，代以其并不信任的九條尚忠，天皇對這個幕府官員的心情可想而知。間部會見了重新當上關白的九條，告訴他在當今的世界形勢下，為什么日本不得不和各國簽訂友好通商條約。他還向九條獻上各大名送來的紀念品和一份跟美國簽訂的臨時協定。這些文件后來都交給了天皇。

同一天，11月29日，天皇將新任將軍的官階擢升為正二位，并在第二天任命他為“征夷大將軍”。孝明似乎在賜予可能的敵人最高榮譽。接下來幾個月，孝明繼續寫信表達對當前形勢的憤怒之情。那年年尾，他最終接見了正準備返回江戶的間部詮勝。孝明交給他一封信，信的開頭寫道：“蠻夷親和貿易之條款，乃皇國之瑕玷，神州之污穢。”天皇在信中竭力主張返回到“鎖國之良法”上來。[[15]](#_15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他本人并不贊同簽訂合約，然而考慮到國內外的情況，愿意原諒合約的簽訂。但是，簽訂合約所獲得的這個喘息機會應該用于落實“公武合體”政策。這是孝明做出的許多次讓步中的第一次，然而他的終極目標，即將日本從夷人手里解放出來這一點，卻從未動搖過。

隨著皇宮舉行傳統的新年慶典，安政六年（1859）拉開了序幕。大家互換禮物，觀看舞樂表演，吃各種應節食品，同時開懷暢飲。宮廷為現年七歲的祐宮送上一桶清酒和一些開胃菜：他已經到了可以參加宮廷活動的年紀。2月21日，他在天皇的陪伴下第一次觀看舞樂表演，并且喝了一杯（同樣也是第一次）天皇親手賜予的清酒。

5月24日，間部詮勝上一年逮捕的四名公卿——鷹司政通、近衛忠熙、鷹司輔熙和三條實萬（1802—1859）——的“請求”獲得通過，被允許落發出家。這是幕府對那些膽敢直接與德川齊昭聯系的朝臣的懲罰。鷹司政通和兒子鷹司輔熙本來屬于支持開國的公卿，但他們受到“志士”（主要由有民族主義信仰的低級武士組成）的勸說，轉為支持閉關鎖國，從而激怒了幕府。

在幕府的處分下來之前，京都所司代酒井忠義（1813—1873）要求他們自殺，但是四人拒絕從命。同情這些人的孝明給關白九條尚忠寫信，要求他向酒井說情，赦免這些人，但是酒井的態度非常堅決。他有確切的證據證明這些人和齊昭之間有秘密聯系。宮廷的機密被這些人傳給了水戶藩的武士，而水戶藩和福井藩的武士一直都在蓄謀叛變。這些人也許只是被浮浪之徒的妄說蒙蔽，然而不管什么原因，他們的行為都與“公武合體”背道而馳了。[[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4月9日，孝明秘密寫信給三條實萬，表達自己對四人的特殊敬意和喜愛之情。仁孝天皇在位期間，鷹司政通曾做過很長時間的關白，天皇突然去世后，他輔佐毫無經驗的孝明登上皇位，并在所有方面幫助他，如同攝政一樣。孝明不忍看到鷹司在耄耋之年被控犯有嚴重罪行。而近衛忠熙是孝明的老師，教他書法，在孝明的元服儀式上為他戴上御冠。其他兩人也都是盡忠盡職的前朝元老。當外國人來到日本時，四人總是竭盡全力地依照他的愿望行事。他們也許偶爾會犯錯，但不可能暗中懷有顛覆將軍的計劃。[[17]](#_17__Yuan_Wen_Jian___Xiao_Ming_T)

孝明在信尾說，希望自己能夠說服幕府赦免他們。三條實萬接到這封信時，正幽居在京都郊外的一個小村子里。盡管臥病在床，他還是掙扎著起來，換上朝服，戴上帽子，并在沐浴之后才閱讀信件。天皇的仁慈令他感激涕零，三條認為，天皇的褒獎說明自己不是祖宗的不肖子孫，不會給后代留下罵名。然而，酒井斷然拒絕了孝明的請求，甚至連延遲處罰也不答應。孝明依然不愿發布削發的命令，又問了一次四人是否真的希望這么做。他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四人無疑已經聽從了命運的擺布，孝明最后沒有辦法，只好下達了命令。

在那些描繪安政大獄對宮廷影響的文章里，酒井忠義的形象通常都是反面的，但他只是幕府在京都的權力代表。孝明每次向他請求寬恕這些曾經服侍過自己和父親的人時，酒井都無情地拒絕了，但拒絕的背后，是井伊直弼這個幕府權力最大的人決定鏟除一切反對派的決心。從1858年井伊剛當上老中，便開始鎮壓，一直持續到兩年后他被暗殺之時。鎮壓的主要原因是，井伊認為有必要清除那些反對幕府和外國簽訂和約的人，但其中也有國內方面的原因，即指定將軍繼承人的問題。事實證明，這次鎮壓完全失敗，并最終導致幕府解體，但這兩年恐怖統治所實施的逮捕和監禁，將會被人們牢牢記住。

對孝明而言，這次鎮壓是他個人的奇恥大辱。即便是為了幕府的安全，顯然也沒有必要僅僅因為在某個階段反對和約，就要這些忠心耿耿服侍過孝明和先皇的老臣削發出家。但是井伊決定殺雞儆猴，即使引起孝明的痛恨也在所不惜。皇權的實質與現狀之間的矛盾從未這么清楚過。身著朝服履行規定儀式的孝明，想到自己發布的命令沒有一項不被幕府否定時，肯定感到很煩惱。

1859年的官方記錄里還提到肆虐全國的瘟疫等災難。孝明的第三個女兒出生，但也許是因為瘟疫，結果成了他第二個夭折的女兒。令孝明感到些許安慰的是兒子祐宮，他正漸漸長成一名合格的皇位繼承人，這是災禍頻仍的那年唯一的亮點。

1. [[1]](#_1_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3頁。

1. [[2]](#_2_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2頁。信的原文見《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730頁。

1. [[3]](#_3_5) 信件完整譯文見W. G. Beasley, ed. and trans.,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 pp. 180-181。

1. [[4]](#_4_5) 這個頭銜有各種不同的英語翻譯，如“攝政(regent)”、“大臣(chancellor)”、“首席大臣(president of the councilors)”等。其意思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但是職位上主要指資深的“老中”，即將軍顧問中權力最大的人。

1. [[5]](#_5_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8頁。信的內容見《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856頁。

1. [[6]](#_6_5) 原文見《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892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50頁。孝明為這種場合所作了幾份類似的“宣命”，這只是其中的一份。

1. [[7]](#_7_5) 條約的英文內容見Mario Emilio Cosenza, ed.,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 pp. 578-584。

1. [[8]](#_8_5) 他在信中提到“三位親王”，但卻只寫了“伏見”和“有棲川”兩個名字。“伏見”指的是伏見宮貞教親王；“有棲川”指的是有棲川宮幟仁親王和他的兒子熾仁親王。這三個人都曾被仁孝天皇收養，隨后被賜予“親王”的頭銜，這么做顯然是為了保證皇室血統的延續，盡管他們并非皇室的近親（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77頁、第207頁）。

1. [[9]](#_9_5) 《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923—924頁。

1. [[10]](#_10_5) 這首著名的和歌原文中有“此花（このはな）”一詞。——編注

1. [[11]](#_11_5) 遠山茂樹編，《維新の群像》，第56—57頁。

1. [[12]](#_12_5) 9月與法國簽訂了條約。

1. [[13]](#_13_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53頁。

1. [[14]](#_14_5) 11月1日他給左大臣（近衛忠熙）寫信，說他太累了不想見間部（《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102頁）。

1. [[15]](#_15_4) 《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155、第156頁。

1. [[16]](#_16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70頁。

1. [[17]](#_17_4) 原文見《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227頁。摘要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71頁。

# 第六章 賜名睦仁



1859年祐宮開始上學，有棲川宮幟仁親王（1812—1886）被指定為他的書法老師。祐宮的第一位老師是一名書法家，說明寫一手漂亮書法的重要性。書法對歐洲王子來說無關緊要，但是在日本卻是貴族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皇室成員展示書法技藝的場合相對較少，但是一旦動筆，書法技藝不僅要得到大家的認可，更重要的是還必須反映他的人格。不過，我們并不知道明治天皇最終對這項技藝有多么精通，因為他極少有書法作品保存下來。[[1]](#_1__Ta_Chuang_Zuo_De_Shi_Wan_Sho)

實際上祐宮上一年就開始學習書法了，但顯然只是隨便學學。他今年八歲了，應該在合適的老師的指導下系統地學習書法（和其他科目）。有棲川宮幟仁親王被選為親王的書法老師，是因為他的家族很久以來就以書法著名。5月5日，有棲川宮幟仁親王帶來那首《難波津之歌》作為假名書寫的范本。[[2]](#_2__Gai_Shi_Ge__Yi_Ji_Fan_Yi__Qi)他和學生互換了禮物，彼此都送了對方一盒新鮮鯛魚。在親王的教育中，第一堂正式的書法課最為重要，也因此他們會交換傳統上賀禮所用禮物的鯛魚。[[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4]](#_4__Diao_Yu__tai_Huan_Shi_Yi_Zho)

從此，有棲川宮幟仁親王在指定的日子里每月來幾次，教授祐宮書法。6月4日，祐宮將自己臨摹的幾個字交給老師評判，并贈送給老師禮物。到了8月10日，年輕的親王顯然對自己的進步感到非常開心，他開始向侍從展示自己的書法作品——每次一兩個字，通常是“中”和“山”。[[5]](#_5__Du_Bian_Ji_Zhi_Lang____Ming)

與此同時，祐宮已經開始了另外一種學習——閱讀儒家的經典著作。5月29日，伏原宣明（1823—1876）被指定為祐宮的閱讀指導老師。伏原在給學生上第一節課時，將一段選自《孝經》的文章朗讀了三遍。當然，你不能指望一個七歲的孩子能理解中國的哲學著作，即便是用日語朗讀；然而過了不久，祐宮就能認字并跟著老師大聲朗讀了。這種被稱為“素讀”[[6]](#_6__Jiang_Hu_Shi_Qi_De_Xue_Xi_Fa)的學習方法效果驚人，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正是通過這種方法學習漢語并能自由讀寫；但是對一名孩子來說，整小時整小時地背誦那些在他看來毫無意義的詞語，肯定無聊透了。

祐宮剛剛完成《孝經》的素讀，孝明天皇就命令他閱讀《大學》。[[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在素讀課堂上，年齡相仿的孩子之間至少有歡樂的友好競爭，或者可能有一起捉弄老師帶來的樂趣，但是祐宮剛開始上課時并沒有同伴。1861年，公卿里松良光（1850—1915）成為祐宮唯一的同學，那年他十一歲，未來的明治天皇十歲（采用日本的計算方法）。里松在一次談話中回憶道：

我每天侍候親王，從早起到他上床睡覺，不管是學習還是運動，從未離開他一步。親王一般穿彩色的真絲縐長袖和服與白色的真絲褲子。他并非每天都穿新衣服，而是穿得很樸素。親王梳著男孩子的發型，把前面的頭發梳向兩邊，然后在頭頂打個結。我和他發型之間的唯一區別就在于他的頭發兩側都是鼓起來的。

親王的學習從素讀《四書》《五經》開始。我是他的伴讀。我們的老師是已經去世的伏原宣諭，但是偶爾阿野奧充會來代課。我們的課本都由伏原先生工工整整地謄寫出來。每讀完一本，伏原就向陛下呈上下一本。我們一起高聲朗讀，就好像是在舊式的寺子屋[[8]](#_8__Ri_Ben_De_Min_Jian_Si_Shu__F)一樣。[[9]](#_9__Mu_Cun_Yi____Ming_Zhi_Tian_H)

到目前為止，這些都不是正規教育，因為祐宮和同伴是在私塾里跟老師學習，但是1862年6月25日這一天，他們的正式教育開始了。孝明天皇命令陰陽師土御門晴雄定下開學的日子。一切都遵照1839年孝明入學時的儀式進行。在高級貴族的注視下，伏原宣明將《孝經》序言里的幾句話朗誦了三遍，親王跟讀。

祐宮并不是一個特別用功的學生。一些關于他不喜歡學習的軼事被保留下來。明治后來回憶說，母親中山慶子對他相當嚴格，除非完成了當天的功課，否則就不給他吃午飯。[[10]](#_10__Du_Bian_Ji_Zhi_Lang____Ming)再后來，1905年，天皇還作了一首詩回憶那些遙遠的歲月：

我現在多么后悔

我的孩子氣

那時我覺得

寫作業是

浪費時間的無聊事情

下面這首作于大約同個時期：

我現在記得那些日子

那時我很不重視

寫作業

因為我唯一的興趣

就是騎竹馬[[11]](#_11__Liang_Shou_Shi_Du_Shou_Lu_Y)

另外一則軼事講述了當時主管祐宮教育的中山忠能如何地怒不可遏。那天，這位學生上課時突然站起來，沒有任何解釋就走回內宮。忠能認為，假如親王的行為如此不受管教，他已沒必要繼續教下去了（他為此付出了全部身心）。忠能寫了一封辭職信，說自己不想再出現在親王面前。兒子孝麿懇求父親說，親王還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憤怒的忠能什么都聽不進去。這時宮廷來旨，要求他速速回宮，但他固執地拒絕了。孝麿認為抗旨有違臣子的職責，最終成功地說服父親，使他的脾氣緩和下來。祐宮見到忠能時，向他道歉，說自己錯了，并承諾永不再犯。祐宮說：“請您不要發脾氣，而是像以前一樣照顧我。”忠能深受感動。那天晚些時候見到孝麿時說：“殿下是一名開明的親王。我太心急了。都是我的錯。”說完號啕大哭。[[12]](#_12__Du_Bian_Ji_Zhi_Lang____Ming)

這個故事以愉快收尾，但它說明祐宮也可能做出自私甚至殘忍的行為。我們從他小時候的玩伴木村禎之祐口中知道，即使在孩提時代，祐宮心里已經很清楚自己對下屬的權力：

親王殿下個性極為沖動，而且非常倔強。一旦發生什么讓他不高興的事，他通常會掄起拳頭，一拳打向那個倒霉的人。我記不清自己有幸挨過他多少拳頭。不管怎么說，我比他小一歲，一般不怎么怕他，總是斗膽做出一些違抗他旨意的事情來，每次都會吃幾個拳頭。

有一天某個大名送了親王一個金魚缸，里面有五六尾金魚游來游去。我非常好奇地在殿下身邊觀看。當他走進隔壁房間時，我立刻把手伸進金魚缸去抓魚，直到成功抓住了一條。令我驚慌的是，這條魚死了，正當我不知該怎么辦時，殿下回來了，看到了這一切。他頓時怒火中燒，大喊：“你這個笨蛋！”然后掄起拳頭，接連往我的腦袋打了三拳。我逃跑了，但是他在后面追我，又賞了我一個拳頭……

還有一次，忘了什么原因，但是我做了件淘氣的事，惹得他把怒火都發泄到我身上，連續往我頭上打了九下。回想這些事時，我知道是自己的淘氣惹得親王生氣了，不過即使現在，我仍然能感到腋下冷汗浸浸。[[13]](#_13__Mu_Cun_Zhen_Zhi_You____Ming)

另外一件令人不那么喜歡的軼事，則描述了一位年老的公卿是如何開始認為這個孩子太頑皮，自己管教不了的。這名公卿從祐宮出生起便負責照看他，正考慮提出由一名年輕的公卿代替自己。一天，祐宮在御所的一個水池邊玩耍。他大聲喊道：“爺爺，快來看啊！池塘里好多鯉魚！”老人走到池塘邊，但是沒看到鯉魚。他禮貌地問親王鯉魚在哪里，祐宮的回答是：“瞧，在那！在那！”老人彎下腰想看得更仔細些，這時男孩從后面推了他一下，老人跌入水中。池塘很淺，但是由于年紀大了，他費了好大勁才爬上岸。殿下隨即大聲喊道：“大家快來看呀，老人變鯉魚嘍！”人們趕過來將老人扶到岸上。據說，他跌入水塘時身上穿的那件沾滿泥漿的衣服已經成為他們家族最寶貴的財產。[[14]](#_14__Du_Bian_Mao_Xiong____Ming_Z)

人們也許會納悶，為什么這類軼事會出現在那些旨在增加明治天皇榮耀的作品之中。也許人們認為，親王對待玩伴和無辜老人的粗暴（甚至殘忍）的態度，是他成為一名嚴厲的國家統治者所必須具備的一項品質。要知道親王不僅由女人撫養，長年以來衣著打扮也像個女孩。據說，這位被推進池塘受辱的老人后來寫信給巖倉具視，要求更換別人。但是巖倉把他叫來，對他說：“你從殿下誕生之日起便服侍他，然而現在還不了解他的偉大之處。我能體諒你在這般年紀所做的付出，然依我所見，你自幼接受貴族教育，僅想教育殿下舉止良好。但日本目前正處于非常之時，王政必將復古。屆時，天皇僅有穩重性格并不足夠。我從年幼的圣上身上看到面對任何難局皆能保持泰然平靜的氣象，暗地由衷歡喜。我不同意你的辭職。”[[15]](#_15__Du_Bian_Mao_Xiong____Ming_Z)

軼事收集者們強調小親王的男子漢氣概，說他隨時準備用拳頭對付一切有違自己意愿之事，因為他們不希望把祐宮描寫成一個躲在屏風后面，連朝臣也看不見的模糊形象，或者是描寫成一個身體虛弱，經常使周圍人擔心的親王。他們似乎在說，盡管祐宮把老人推進池塘這件事本身并不光彩，但卻是他有著剛強性格的表現。

祐宮其他方面所接受的都是傳統教育，不管是老師的指導，還是他在宮廷的觀察體驗。祐宮甚至在接受正規教育之前就已經開始創作和歌。[[16]](#_16__Gen_Ju_Zhi_Ren_Qin_Wang_De)他這個時期創作的詩歌有一首流傳下來：

看到月亮

野鴨飛了起來

水中有月亮的倒影

這首詩并不符合韻律[[17]](#_17__Duan_Ge_De_Ge_Shi_Shi__Wu_Q)，表達的意象也很混亂，但它作為祐宮最早的詩歌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幾年后創作的一首短歌則顯示出他對韻律有了更深的認識：

在黃昏的熹光之中

野鴨回巢了啊

在這個春日啊

我聆聽它們的叫聲啊——

他們的聲音如此平靜。

加強語氣的助詞“啊（ぞ）”的重復使用，主要是為了填滿韻律，現代的讀者可能會認為好笑，但是親王意識到了韻律要求，說明他已經有了一些進步。從這個時期開始，祐宮便常常會見父皇并接到一些創作短歌的題目。他將創作的成果給父親看，本身即是一名出色詩人的孝明會給他修改。孝明將親王的詩歌修改如下：

春日時

天空暮色熹微

野鴨回巢了

可以聽到它們的叫聲——

它們叫得多么平靜

孝明的指導對明治的正規教育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內容為日本所獨有，是一項在平安時代便建立起來的傳統，那時的天皇不僅創作和歌，還要精通和歌的傳統。不久，祐宮就熟諳經典詩集。除此之外，他在文學上的喜好僅限于日本的武士故事和中國的英雄故事。[[18]](#_18__Mu_Cun_Yi____Ming_Zhi_Tian)祐宮的兒時玩伴里松良光回憶說，祐宮經常提到他非常仰慕英勇的豐臣秀吉和忠誠的楠木正成。這個時期祐宮似乎對歷代天皇的事跡沒有什么興趣，也許因為他們不夠勇猛，不符合他的品味。

祐宮的教育和父親相比，或者說，和幾個世紀前的祖先相比，事實上并沒有什么不同。盡管孝明一直對西方侵略者憂心忡忡，但他并不認為有必要讓兒子知道這些夷人的危險。祐宮并沒有學習世界地理或是思考西方取得的科學成就。只有明治維新以后，他的教育才變得與自己生活的這個世界息息相關。

1860年4月，大家決定為祐宮舉行“深曾木”儀式。這個修剪小孩頭發的儀式通常在孩子三歲到八歲之間舉行，然而1858年，就在明治即將舉行“深曾木”儀式時，與皇室有密切聯系的泉涌寺發生了大火，儀式被迫推遲。另一個名為“紐直”或“帶解”的傳統儀式，通常在孩子九歲（按日本算法）時舉行。儀式上，小孩子第一次系上大人的腰帶，而不是小時候的繩子。大家認為祐宮今年應該舉行這兩個儀式。在咨詢過陰陽師之后，“深曾木”的日子定在5月9日的上午10點舉行，十天后舉行“紐直”儀式。

“深曾木”的準備工作非常繁瑣。天皇送給親王許多套衣服，一些是在儀式上穿的，官方記錄用了三頁密密麻麻的文字來描繪這些衣服。[[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紐直”的儀式則要簡單得多。這些都是8月16日即將舉行的一個重要得多的儀式的序曲，這個儀式將正式宣布祐宮為皇位繼承人。從此他將被視為孝明皇后的“親生子”，宮里的地位也緊隨其后，而且將與皇后住在同一座宮殿里。10月宮廷將正式宣布祐宮為皇族以及皇位繼承人。

10月16日，孝明下令文章博士唐橋在光（1827—1874）為親王擬一個合適的成年名字，唐橋提交了三個名字供選擇——與仁、履仁和睦仁。第二天，天皇下令將名單提交給關白和左大臣等重要公卿，讓他們從中選出一個最合適的。[[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11月11日，宮廷宣布祐宮為皇太子，并向全體公卿公布了祐宮的新名字。天皇親自寫下了“睦仁”兩個字。[[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儀式過后大家喝酒慶祝，唱起了時興謠曲和能樂，并送給親王許多禮物。下個月將軍送來賀禮時宮里又慶祝了一番。[[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熱鬧過后，睦仁被送回去上學。皇后不滿睦仁在書法上的進步程度，命令中山慶子每天監督他練習書法。

這些事情可能為孝明天皇提供了一些消遣的時光，但是當時發生了一件急事，使這一切都蒙上了一層陰影，那就是將軍家茂請求娶天皇的妹妹和宮為妻。生于1846年的和宮是仁孝天皇的女兒，她在父親死后五個月才出生。和宮與同父異母的哥哥孝明關系似乎非常親密，這也許可以解釋宮中為什么極度不愿接受將軍的求親，即便這樁婚事在某些方面看來非常有利。1860年6月3日，宮廷收到江戶方面發來的求婚書，上面說，婚事將有助于促進公武合體，而這正是孝明公開表示的政治立場。宮廷和幕府的關系自幕府與西方五國簽訂條約以來便跌入低谷，聯姻將有助于修補裂痕。

1858年11月，左大臣近衛忠熙和剛剛上任的所司代酒井忠義首次討論了聯姻。近衛認為這樁婚事于國家有利，但是和宮五歲時和有棲川宮熾仁親王（幟仁之子）締結了婚約，因此不可能與將軍結婚。然而酒井卻不愿放棄這個計劃。第二年，酒井和關白討論了這門親事，并得到了幕府的肯定。最后，這些話傳到了孝明那里，孝明回答說，不可能解除和宮與有棲川宮熾仁親王的婚約。他還說和宮很怕到江戶去，因為在她年少無知的印象中，那里是蠻夷的聚居之地。孝明同情妹妹，不想迫使她接受一樁如此恐懼的婚姻。[[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然而，孝明很清楚這樁婚姻在政治上非常有利，他在拒絕的同時無疑也感到一絲遺憾。

那年和宮慶祝了自己的虛歲十六歲生日。7月15日她參加了賞月儀式，這是女子的及笄禮，與男子的元服禮相似。看到賞月時的和宮那么天真無邪和美麗動人，我們不難想象孝明多么不愿失去自己唯一的妹妹。

但幕府不愿放棄將軍與和宮的聯姻計劃。宮廷內部也有人支持這樁婚事。天皇問巖倉具視的意見，當時還是侍從的巖倉回答說，幕府的權力明顯正在減弱，但是試圖用武力收回皇權的話肯定將導致國內大亂，并可能引發外國干涉。目前最好是同意聯姻，向全世界宣布公家和武家確實合為一體。這樣一來，幕府不得不逐步廢除那些與外國簽訂的和約。假如能夠說服幕府同意從此以后一切國家大事在實施之前都必須獲得宮廷的批準，那么幕府的權力將會回歸宮廷。因此，對國家而言，和宮一人比九鼎更加寶貴。巖倉建議接受這門親事，前提是幕府保證將廢除條約。[[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7月6日，孝明就這門親事給關白九條尚忠寫了封信。信中的語氣說明他受到巖倉意見的影響。孝明說自己對幕府與蠻夷簽訂和約深感不快，因為他無法在眾神和列祖列宗面前解釋這件事。另外，自己不愿讓和宮，這位天皇的女兒，嫁到“夷人徘徊之土地”。但是，如果幕府顯示出驅逐夷人的決心，他將試著說服和宮接受這門親事。[[25]](#_25__Jian_Dan_De_Zhai_Yao_Jian)

幕府的回復使孝明放下心來。幕府說他們在一切事情上都和天皇的意見一致，完全同意驅逐外國人，但是要等到國家統一和武力強盛時，才有可能處理好這些外交問題。現在首先要向全國展示公武聯合。這一步一旦成功，下一步則加強國防，對抗外國人。假如天皇同意內親王和將軍的婚事，國家的所有資源將以這種方式聯合起來并得到加強，這樣一來，渴望驅除夷人的幕府，難道還有可能與天皇相左嗎？[[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幕府承諾將在七到十年內，以談判或者武力的方式廢除和約，驅逐外國人。[[27]](#_27__Wu_Bu_Cheng__Qu_Zhu_Wai_Guo)

這些保證使孝明傾向同意接受江戶方面的求婚。9月4日，孝明要求關白請和宮的母親和舅舅去勸說她接受親事，[[28]](#_28__Shi_Jing_Xiao____Mu_Mo__Fei)并命令關白與有棲川宮熾仁親王協商解除婚約的事。[[29]](#_29__Wu_Bu_Min_Fu____He_Gong)然而和宮不為所動，一再重申一想到要離開哥哥，就倍感凄涼。一個星期后，孝明給關白寫信，告訴他和宮不愿下嫁到江戶。孝明不忍強迫她接受，但是又認為自己有義務履行與幕府之間的約定。因此他建議用自己唯一活下來的女兒，只有一歲半的壽萬宮代替和宮。孝明非常喜歡這個女兒，但是為了表達實現公武合體的渴望，他愿意放棄私情，和年幼的女兒分開。假如幕府不接受這個建議，他將別無他法，只好退位。

孝明這封信的副本也傳到了和宮那里。和宮看到孝明將退位的字眼，知道如果自己成為哥哥退位的原因，一定會寢食難安。因此她決定接受孝明的建議，[[30]](#_30__Gen_Ju_Shi_Jing_De_Shuo_Fa)到江戶去，但是幕府必須滿足五個條件。第一條是在父親仁孝天皇逝世十七周年的忌日（兩年之后）之后再到江戶去。此外，她還希望每年能夠在仁孝的忌日回到京都，為他上墳，并向天皇請安。然而急于操辦婚禮的幕府不愿再等上兩年。和宮的第二個條件是，她在江戶的生活環境要和御所一模一樣。幕府接受了這一條。剩下的幾條都與挑選隨從人員有關。[[31]](#_31__Wu_Bu_Min_Fu____He_Gong)

孝明在寫給幕府的信中列出了自己的六個條件：（1）接受和宮的五個條件；（2）即使老中發生變化，斷絕與外國外交關系的承諾將繼續有效；（3）告知全國人民，和宮下嫁并非為了保存德川家族一脈，而是為了國家需要和促進公武合體；（4）賑濟那些因開國而變得一無所有的人民；（5）一旦和宮的婚事確定下來，任何與和宮待遇有關的問題都應該事先秘密向天皇匯報；（6）補償有棲川宮熾仁親王。[[32]](#_32__Wu_Bu_Min_Fu____He_Gong)

即使在和宮同意下嫁之后，仍有一些公卿反對這門親事。宮廷盛傳著謠言，說天皇的親信久我建通（1815—1903）收受了幕府的賄賂，并通過指使朝臣千種有文和巖倉具視，從中推進了這門親事。聽到了這些風言風語的孝明，指示關白將謠言壓下去，因為一旦同意了聯姻，孝明就不能容忍任何反對的聲音。[[33]](#_33__Shi_Jing_Xiao____Mu_Mo__Fei)

有棲川宮熾仁親王最后同意放棄了與和宮的親事。有個蓄意流傳的謠言說，有棲川宮熾仁親王對這門親事并不熱心，因為和宮生于丙午年（火馬年），而這一年出生的女人命都不太好。后來發現年輕的將軍也是這一年出生，于是又有說法說，兩個出生年份都不吉利的人結合在一起，就會變得非常吉利。[[34]](#_34____Da_Zhai_Zhuang_Yi_Quan_Ji)

這個時期，睦仁的教育與和宮的親事似乎完全吸引了宮廷的注意力。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1860年也是日本第一次向美國派出外交使團的一年。盡管為迎娶和宮，幕府做出了驅逐外國人的承諾，但他們仍不可避免地要走這一步——在閉關鎖國兩百多年后首次派遣官員出國考察。

1. [[1]](#_1_6) 他創作的十萬首短歌都寫在紙片上，然后由宮女將它們謄寫在更加合適的紙上。原稿隨后被銷毀（花房義質，《先帝陛下に関する追憶》，322頁）。唯一一名評價過明治書法的宮廷人員說，他的字很難辨認（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54—55頁、第181頁、第187頁）。

1. [[2]](#_2_6) 該詩歌（以及翻譯）請參見第五章。

1. [[3]](#_3_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67頁。

1. [[4]](#_4_6) 鯛魚（たい）還是一種有吉祥寓意的禮物，因為它的名字和“喜慶（めでたい）”這個詞部分同音。

1. [[5]](#_5_6) 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85頁。渡邊引述了《忠能日記》的內容。“中”和“山”兩個字組成了他母親家族的姓氏，這可能是天皇選擇這兩個字的原因，不過他在剛開始學書法時也會學到這兩個簡單的字。

1. [[6]](#_6_6) 江戶時期的學習方法之一，學生只跟著老師大聲朗讀，但不解釋文義。——編注

1. [[7]](#_7_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12頁。1860年9月14日，他開始用素讀的方法學習，并于12月23日讀完了整本書。12月28日，他開始學習《中庸》（第231頁），并于1861年7月23日開始用“素讀”的方法學習《論語》（第257頁）。

1. [[8]](#_8_6) 日本的民間私塾，發源于室町時代后期。起初為寺院開辦以庶民子弟為對象的初等教育機構，后泛指民間的私塾。——編注

1. [[9]](#_9_6) 木村毅，《明治天皇》，第91頁。木村顯然是在和里松良光交談時得知這個信息的。

1. [[10]](#_10_6) 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86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45頁，里面提到祐宮是如何偶爾欺騙母親，讓她以為自己已經完成了作業的。

1. [[11]](#_11_6) 兩首詩都收錄于《明治天皇御集》第二卷，第714頁。第一首見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86頁。第二首中的“竹馬”可能指的是“高蹺”。

1. [[12]](#_12_6) 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84頁。

1. [[13]](#_13_6) 木村禎之祐，《明治天皇の御幼時》，第22—23頁。

1. [[14]](#_14_6) 渡辺茂雄，《明治天皇》，第4—5頁。

1. [[15]](#_15_5) 渡辺茂雄，《明治天皇》，第5—6頁。

1. [[16]](#_16_5) 根據幟仁親王的描述，1857年底，才五歲的明治就已開始創作和歌（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86頁）。

1. [[17]](#_17_5) 短歌的格式是“五七、五七七”，這首和歌原文的前半部多了一個音節，因此不合韻律。——編注

1. [[18]](#_18_4) 木村毅，《明治天皇》，第92頁。明治閱讀的書籍包括《源平盛衰記》、《太平記》和《太閣記》。

1. [[19]](#_19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99—202頁。

1. [[20]](#_20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21頁。

1. [[21]](#_21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23頁。

1. [[22]](#_22_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28頁。

1. [[23]](#_23_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06—207頁。對孝明的答復的解釋，亦可見《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379—380頁。孝明說，由于和宮是另一個母親所生，她可以不必聽從他的命令。

1. [[24]](#_24_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18頁。亦可見武部敏夫，《和宮》，第39—41頁。

1. [[25]](#_25_2) 簡單的摘要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18頁；完整記述見《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410頁。

1. [[26]](#_26_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18頁。亦可見武部敏夫，《和宮》，第44—45頁。

1. [[27]](#_27_2) 武部稱，驅逐外國人的承諾并非幕府的本意，而是迫于孝明“攘夷”的具體計劃（《和宮》，第46頁）。

1. [[28]](#_28_2) 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60頁。石井認為，和宮的母親觀行院和舅舅橋本實麗的反對，加劇了她對這門婚事的抵觸情緒。

1. [[29]](#_29_2) 武部敏夫，《和宮》，第48頁。

1. [[30]](#_30_2) 根據石井的說法，九條尚忠（關白）的心腹島田左近向和宮暗示說，如果她堅持拒絕的話，母親和舅舅將會面臨嚴厲的處罰（《幕末の天皇》，第61頁）。他還誘使和宮的乳母勸說她接受婚事。武部說，關白的兩名家臣密謀，讓和宮乳母的一個親戚告訴乳母，幕府已經決定處罰和宮的母親和舅舅，以此來動搖和宮的決心（《和宮》，第51—52頁）。總之，在說服和宮同意與將軍結婚時，這些人似乎用了卑鄙的手段。

1. [[31]](#_31_2) 武部敏夫，《和宮》，第53頁。

1. [[32]](#_32_1) 武部敏夫，《和宮》，第54頁。

1. [[33]](#_33_1) 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62頁。

1. [[34]](#_34_1) 《大宅壯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59頁；武部敏夫，《和宮》，第55頁。

# 第七章 和宮下嫁



1861年是一甲子中的兩個“變革”年之一，無一例外要更改年號。[[1]](#_1__Gai_Nian_Shi_Xin_You_Nian)但即使它不是“變革”年，上一年發生的風波也足以成為年號變更的理由。這一年新年伊始就不吉祥。皇宮的庭院發現了一只狐貍，孝明天皇令中山忠能把狐貍趕出去，然而不論祈禱還是祭祀都沒有效。這只狐貍一夜復一夜地對著親王的房檐尖叫，直到最后（在皇后的提議下）親王搬到了皇后的閣樓居住。[[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國內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老百姓不堪高昂物價的消息傳到天皇的耳朵里，他給了所司代五十枚金幣，命令他用這些錢賑濟首都附近山城國的百姓。所司代拒絕接受這筆錢，因為他聽命于幕府，而幕府有其他的賑災計劃。[[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幕府似乎不愿意讓天皇積極地參與賑災活動。

日本和外國的關系也很緊張。1861年3月13日，在船長比利列夫（Birilev）的率領下，俄國輕巡洋艦“波薩德尼克”號（"aid-1SF"）停泊在日韓之間的對馬群島附近。俄國軍官和水手以修船為由上岸，不久便建起了營房等建筑，似乎打算在那里永久定居。島上的居民和俄國人發生沖突，死了幾個日本人。幕府派外事長官到對馬去要求俄國人離開，但遭到他們的拒絕。[[4]](#_4__Guan_Yu_E_Guo_Ren_Zai_Dui_Ma)

俄國并非唯一一個意識到對馬群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歐洲國家。英國人曾要求幕府開放那里的港口，他們的一艘軍艦也探測過那附近的海域。這些行為給了俄國人“保護”對馬免遭英國人侵占的借口。他們提醒幕府英國人有可能占領對馬，認為日本極有必要加強那里的軍事防御，并表示自己愿意為日本修建炮臺以及租借大炮給他們。[[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幕府拒絕了這項提議，但是當俄國人差不多已經占領這些群島時，幕府沒有辦法，只好在“以夷制夷”的原則下，轉而向英國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爵士求助，請求他們幫助驅逐俄國人。兩艘英國軍艦在東印度艦隊司令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爵士的率領下，來到了對馬群島。俄國人在接到霍普措辭嚴厲的警告之后，撤離了對馬群島。[[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這些過去可能不會讓天皇知道的事，不久就傳到了孝明那里，使他倍感苦惱。然而直到第二年（1862）他才下令要對馬的大名加強日本海防。[[7]](#_7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天皇親自干預了一件在過去根本不會讓他注意到的事情，說明他的權力已經大大增強。

3月29日，天皇的年號由“萬延”改為“文久”。這個日子是由陰陽師擇定的。變更年號一開始似乎很有幫助。有一段時間，宮廷成員又可以進行那些傳統的娛樂活動，例如園游會、能樂表演等消遣方式。這時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孝明還在襁褓中的女兒壽萬宮去世，又一個皇室的孩子夭折了。

宮廷的寧靜氣氛非常短暫：盡管幕府正努力改善和歐洲國家之間的關系，但國內民眾的排外情緒高漲。[[8]](#_8__1862Nian_Pai_Chu_Yi_Ge_Da_Xi)6月5日，十四名水戶藩的浪人襲擊了江戶的英國使館，公使阿禮國爵士逃過一劫，但他的職員受了傷。水戶藩的“攘夷”行動依然最為積極，然而其他藩國卻反而準備與外國人達成和解。山口縣長州藩的大名毛利敬親認為必須開國，并實現公武合體。他派長井雅樂（1819—1863）到京都轉達自己的觀點。長井和正親町三條實愛（1820—1909）見面，傳達了毛利認為國家政策必須改變的強烈信念。

長井向正親町三條陳述的意見冗長而不著邊際，但他顯然是想讓孝明天皇聽到。長井一開始感嘆幾個世紀以來的和平造成日本軍隊令人遺憾的現狀（這已是老生常談的觀點）。他接著說道，天皇看到幕府不僅無力抵抗外國人，甚至沒有咨詢過自己就打算跟外國人簽訂友好通商條約，肯定非常氣憤。天皇意識到軍隊已無法繼續保護自己，可能也很煩惱。幕府對外國人沒有確定的方針政策，只是滿足于一時的權宜。天皇并未全盤了解事態的發展，一些頭腦發熱的人圍著他，整天叫囂著廢除與外國簽訂的和約。但假如中止和約的話，外國列強肯定無法平靜地接受，肯定會對日本發動戰爭。哪怕有一點勝算，他都不會反對與外國開戰，但是打一場日本完全無法取勝的戰爭、置國家社稷于危險的境地，是非常愚蠢的。

長井接著說道，三百年來，京都的宮廷將內政與外交政策都交給幕府，因此，外國人認為幕府就是日本政府。現在他們已經與幕府簽訂了條約，認為日本是他們的盟國。廢除和約將會激怒他們，并立即引發戰爭，很快整個國家都將陷入危險。舉個例子，四五艘軍艦便可將九州封鎖，那樣，全國其他地方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屆時不知京都能否守得住。如果首都的街道遭到外國人的鐵蹄踐踏，其他地方即使沒受到直接攻擊，也將遭受同樣的恥辱。

長井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令人不快的情況，是因為幕府自島原之亂后采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早期的日本歷史上，不僅允許外國人自由出入日本，還修建鴻臚館等設施來接待他們。實際上，與其他國家隔離并非真正的古代日本傳統。伊勢神宮的女神不是許諾過，天皇的影響將遍及太陽照耀的地方嗎？神功皇后征服了朝鮮半島的三韓，就符合她那位神圣先祖的愿望，如果她知道三韓之外還有其他國家的話，可能還會繼續征討。然而現在的政府，不僅沒有為日本開疆拓土，還被動地任由外國人進來。即使認為閉關鎖國的政策可取，也只有在國力強大的條件下才能維持。完全依賴日本島國形勢的孤立政策注定將失敗，目前最急需的是充實攻防兩用的國力。

長井懇求天皇改變支持閉關鎖國的觀點，回歸祖先的政策，將天皇的權威延伸至國外。如果制定以五大洲都來帝國朝覲為基調的國策，民族災難就會轉化為國家之幸。而拜公武合體所賜，國內將出現一派和平景象，一旦日本擁有大量軍艦，就能將全世界納入天皇的統治之下。[[9]](#_9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_1)

毛利敬親沒有向孝明宣揚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點，而是提醒他，一旦實現公武合體，天照大神關于日本將統治世界的承諾就會實現，以此（通過使者長井雅樂）來說服孝明天皇放棄閉關鎖國的政策。目前，疲敝的日本軍隊不是外國的對手，而將來，全世界的國家都將到日本來朝覲。事實上，這之間還有一些階段有待闡明，但是，毛利期待與外國人的貿易所得能夠幫助日本提升武器裝備。

不出毛利敬親所料，正親町三條將長井的請愿書轉給了天皇，天皇很高興地收下了。孝明并不贊成取消閉關鎖國的政策，但同意加強日本的軍事力量，而且他對公武合體的支持從未動搖過。孝明命令毛利敬親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促進宮廷和幕府之間的相互理解，還賜給他一首和歌：

即使暴風雨肆虐著

整個國家

我也將等待它們

將太陽重新送回天上

讓它重放純潔的光芒

在長井的努力下，幕府最終同意讓敬親擔任公武合體談判的中間人。不過，不幸的是，那份提交給正親町三條的文書被認為含有不敬之語，在引發了一場辯論之后，長井最終被免職了。[[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德川家茂

1861年的大部分時間，宮廷的注意力都放在將軍的準新娘和宮的江戶之行上。她出發的日期是1861年的10月底，這是上一年定下的日子。幕府匆忙修繕和宮沿途即將經過的道路，然而天皇要求將日子推后，理由是來年春天內親王應該在京都參加父親仁孝天皇逝世十七周年的紀念日。這個要求提交給了所司代酒井忠義，但是被他以準備工作已經完成為由拒絕。不過，幕府同意將和宮的出發時間延遲到11月中旬。

即使已經做了這樣的安排，兩人的婚姻還是出了新的障礙。因為1860年，幕府秘密地與普魯士、比利時和瑞士進行了外交談判，并在年底與普魯士簽訂了合約。[[11]](#_11__Dang_Mu_Fu_De_Zhi_Ta_Men_Bu)得知幕府和外國簽訂了三個新和約的孝明自然非常生氣，他宣布取消和宮與將軍的婚約。孝明說，正是因為相信幕府廢除條約的承諾，所以才同意了這門親事。關白等宮廷人員驚駭萬分，擔心孝明的決定可能會影響宮廷和幕府的關系，他們試著安慰孝明，最后終于使他同意將聯姻計劃推遲（而不是取消）幾年。當問及和宮的意見時，她以驚人的坦率回答說，自己從未想過要結婚，在最后一名外國人被驅逐之前，在東部平靜之前，她希望自己可以不必到江戶去；假如這些無法實現的話，她希望婚禮可以取消。[[12]](#_12__He_Gong_De_Xin__Jian___Xiao)

在機敏的酒井忠義的活動下，婚禮得以照常舉行。酒井拒絕將宮廷的憤怒反應向幕府匯報。他認為自己是私下向關白透露有關新和約的消息，如果宮廷正式向幕府提出抗議，等于是背信棄義。孝明最終同意將一切事情交由關白處理。1861年元旦，幕府給宮廷去信，詳細解釋了三個新條約的簽訂情況，并再次承諾七到十年內將外國人驅逐出去。

其他一些危機也威脅著聯姻計劃，然而1861年9月，孝明天皇怒氣已消，于是同意和宮11月啟程前往江戶。親子內親王（和宮現在的官方稱呼）[[13]](#_13___Qin_Zi__Zhe_Ge_Ming_Zi_Shi)非常不愿意離開京都。[[14]](#_14__Zhe_Ge_Shi_Qi_He_Gong_Xie_G)她參觀了曾經為祖父光格天皇重新修繕過的修學院離宮，并在返程時參拜了賀茂和北野神社。她在宮中觀看了一次能樂表演。當和宮前往祇園神社祈求旅途平安時，天皇和親王目送她和隨從離開宮門。11月17日，和宮來到皇宮向天皇、皇后和親王告別，并接受了他們的禮物。出發之前，天皇給內親王寫信，要求她婚后利用自己對丈夫的影響力，實現將外國人驅逐出去的目的。終于，和宮害怕的日子來臨，她必須出發了。11月22日，和宮在朝臣的陪同下，坐著轎子離開了桂離宮。一年之后，有愛國主義者認為，內親王到江戶去這件事極大地侮辱了皇室的尊嚴，陪伴她前往江戶的兩名公卿（千種有文和巖倉具視）因為在這次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受到懲罰。[[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婚禮隊伍的場面非常浩大——一萬名武裝士兵[[16]](#_16__Guan_Yu_Dui_Wu_De_Ren_Shu_Y)、大量馬匹、食品、禮物和行李。為了滿足和宮下嫁的五個條件中的第二個，行李中還包括一座拆下來將在江戶重建的京都風格的房屋。內親王一行極為奢華，經常在沿途的景點逗留，直到12月16日才抵達江戶，而通常這段旅程只需兩個星期。為了確保和宮的絕對安全，大家認為必須配備大量的隨行人員（有謠言說內親王有可能半路被劫持）。幕府禁止十五歲以上的男性穿過隊伍行經的道路，城里的男性則被命令待在后房，只留婦女在門前鞠躬。為了避開那些不祥的地名，和宮行走的路線也很曲折，例如，為了避開名字有“分開”（さった）意義的薩陲（さつた）嶺，隊伍偏離通常走的東海道，選擇了崇山峻嶺間另一條長長的彎路。不幸的是，路上沒有辦法避開“緣切榎”，這種樹名直譯是“能斬斷緣分的蕁麻樹”，對婚姻非常不吉利，于是樹上的每片葉子都用草席遮住，以保護內親王免受這個惡名的傷害。[[17]](#_17____Da_Zhai_Zhuang_Yi_Quan_Ji)

內親王和年輕將軍的婚禮必須等到1862年3月11日才能舉行，然而在那之前，反對這樁婚事的人就已經開始動武了。1862年2月14日，公武合體和聯姻的主要倡導人老中安藤信行（1819—1871），在去江戶城的途中，遭到六名水戶藩浪人的襲擊。有人朝安藤的轎子開了一槍，但是大約有五十名家臣保護著安藤（井伊直弼的遇刺使幕府官員意識到外出時沒有足夠的護衛非常危險），他們很快就擊斃了這些行兇未遂的刺客。

浪人的身上帶著一份聲明，解釋被迫這么做的原因。[[18]](#_18__Sheng_Ming_De_Bu_Fen_Yuan_W)他們指責安藤欺騙宮廷：安藤說天皇的妹妹嫁給將軍是為了公武合體，但實際上只不過是讓天皇同意與外國人簽訂條約的陰謀而已。浪人受當時流傳的一則謠言鼓動。1860年幕府官員堀利熙（1818—1860）自殺，原因不明。傳言說他留有遺書，職責安藤背信棄義。[[19]](#_19__Zhe_Feng_Xin_Shi_Che_Tou_Ch)信中說，安藤在湯森·哈里斯的教唆下，密謀推翻天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安藤讓兩名國學學者舉出那些被廢黜的古代天皇的例子。[[20]](#_20__Gen_Ju_Yao_Yan__Tang_Sen__H)這些刺客對這一謠言深信不疑，對安藤對外國人的友好態度感到憤怒，認為這玷污了真正的臣子之道。他們別無選擇，只好讓安藤得到天誅，即代替上天誅殺他。“天誅”這個古老的詞匯，成為19世紀60年代流行的政治謀殺的借口，并在這時開始流行起來。

也許有人認為，死里逃生的安藤可能成為人們同情的對象，地位甚至比以前更穩固，然而身為幕府中贊同經濟改革和與西方通商一派領導人，安藤實際上已經喪失了以前擁有的巨大政治權力。也許這因為倒幕力量已經占了上風。

婚禮舉行前又發生了一次危機。幕府曾經答應親子內親王，讓她返回京都參加父親逝世十七周年的紀念儀式，但是她回京的日期卻被一推再推。最后，內親王派一名高級侍女代表自己前往京都。孝明對幕府沒有履行承諾感到氣憤，然而后者辯解說，婚前做長途旅行會使內親王感到疲憊。

親子在婚禮上受到極高的禮遇，被安排坐在主人的座位上。結婚儀式進行了大約十個小時，有足夠的時間讓新娘更換許多套衣服。親子第一次見到丈夫時的感覺并沒有記錄下來，盡管有政治背景，并且后來她和婆婆之間也有矛盾，但是就跟任何皇室婚姻可能的那樣，他們的婚姻卻非常美滿。因為家茂的突然去世，內親王的婚姻生活只持續了四年半。然而親子臨終之際，要求葬在德川家的墓地，而不是京都。

天皇的妹妹與將軍結婚，使得皇室與幕府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同時也開創了一個天皇的影響力比幾個世紀以來都要大的短暫時期。[[21]](#_21__Teng_Tian_Jue____Mu_Mo_noTi)孝明堅定不移地支持公武合體，反對倒幕派，然而隨著幕府繼續與外國簽訂通商條約，宮廷與幕府的關系變得緊張起來，雖然宮廷只不過是想將所有的外國人驅逐出日本。

各派的政策變化頻繁而且突然，有時導致令人意外的聯盟和反目。過去，薩摩藩常常表現得像個獨立王國，幾乎脫離了幕府的掌控，但是1861年底，年輕的薩摩藩大名島津忠義（1840—1897）派使節到京師，提出愿意作宮廷和幕府之間傳遞消息的渠道。使節向孝明獻上一把寶劍，孝明親筆題寫了一首和歌以示感謝：

毫無疑問，

寶劍蘊含著一顆

憂國憂民的心

萬里無云的天空

武士的精神照耀四方[[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島津忠義和父親島津久光接到這首詩時，都感動得流淚。

1862年6月，薩摩大名和父親派使者到京都，向前左大臣近衛忠熙和權大納言近衛忠房表達對天皇的支持，并認為幕府亟需改革。他們擔心天皇沒有足夠的護衛，因此已經決定將自己的軍隊派往京師。近衛忠房聽后非常震驚，試著推掉這些不請自來的幫助，但是薩摩藩的領導人并不聽從勸告。6月15日，大約一千名薩摩武士進入京都。島津久光宣稱希望看到一些朝廷的高級官員下馬，并由近衛忠熙代替九條尚忠的關白位置。他們同時提出幕府的改革要求，希望借此將那些反對公武合體的人清理出去，并要求幕府向朝廷示忠。此次行動一旦完全確立皇權，就可以考慮通過何種方式將其延伸到海外的問題。[[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那天晚上，也許是為了檢驗薩摩的忠誠，天皇下令島津久光平定那些引起京師騷亂的浪人。

五天之后，久光的行動開始了。他來京都之前，尊王攘夷派的武士和浪人都以為他將領導攻擊幕府的行動，然而當久光明確地表示自己的目的是改革而不是推翻幕府時，大家感到非常失望。萩藩等地的藩士和心懷不滿的薩摩藩藩士主張使用暴力手段，他們在京都南部伏見地區的一家酒館寺田屋碰頭，商討刺殺關白和酒井忠義的計劃。密謀者和忠于久光的薩摩藩藩士起了沖突。叛亂分子遭到屠殺，天皇感到非常滿意，他賜給久光一把皇室收藏的短刀，以表彰他成功地鎮壓了不法人員。島津久光在宮廷獲得了很高的聲譽。

這一時期的《明治天皇紀》幾乎沒有出現睦仁的身影。我們知道，和宮出發去江戶時，睦仁去送過她，也許他知道（即使只有十歲）和宮的悲傷。6月宮里舉行了一個儀式，慶祝睦仁開始學習儒家經典，盡管他三年前就開始學習了。孝明在同樣的年紀也舉辦過這樣的儀式。那年夏天，麻疹的流行震驚宮廷，為了親王的平安，宮中舉行了許多祈禱儀式。此外，又有一個妹妹死了，死時還不到一歲。本年度比較開心的一件事是睦仁開始畫畫了。

這些事情點點滴滴地散落于官方記錄的那些紀實性文字之中，使人們很容易忽略一些重大事件。例如，1862年9月的官方記錄詳細記載了各大神社舉行的宗教儀式，天皇夜里賞月，并向皇太子贈送禮物。在這類平淡的事件下面，緊接著9月14日的記錄，一開始是一段乏味的陳述，但后面的內容是：三名被控與幕府勾結，促使和宮下嫁的公卿——巖倉具視、千種有文和富小路敬直——被軟禁在家，解除職務，并被勒令出家。[[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這個令人震驚的事件背后，是尊王攘夷派的強大壓力。隨著人數不斷增加，尊王攘夷派的不滿越來越強烈，行動也變得越來越魯莽。就在上條記載的一個月前，關白九條尚忠的家臣島田左近遇刺身亡。頭顱被懸在四條河原示眾，四肢被割下并拋進高瀨川。一輪極端主義者稱之為“天誅”的恐怖浪潮開始了。幕府無力鎮壓騷亂，使得恐怖主義者迅速占了上風。他們列出朝廷的“四奸二嬪”[[25]](#_25___Si_Jian__Zhi_Jiu_Wo_Jian_T)作為特別的攻擊對象，指控他們要為和宮的下嫁負責。恐怖主義者獲得了一些公卿的支持，而且攘夷派現在控制了一些重要的藩國。盡管孝明一再聲明支持幕府，但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他卻宣布自己從未違背“攘夷”的誓言和使命。[[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在那些施行“天誅”的行兇者看來，這個聲明就是天皇對他們行動的公開支持。

很難了解這些事情對睦仁的成長有什么影響。是他太小，理解不了御所外的世界發生的事情？還是人們有意不讓他聽到那些激烈的爭論和謀殺的新聞？還是，當看到那些經常在宮里出沒的人不再出現時，連生活在御所深處的親王，也逐漸明白有大事發生了？孝明是否曾向兒子解釋自己為何總是這么激動和疲憊？不管怎么說，這個幾世紀以來遵守傳統秩序和禮儀觀念的國度，正受到時代殘酷現實的滲透。現在，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了。

1. [[1]](#_1_7) 該年是辛酉年。這一觀念源自中國的緯學思想，認為辛酉年和甲子年是革命之年，歷代都更改年號。——編注

1. [[2]](#_2_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4頁。

1. [[3]](#_3_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44頁 。

1. [[4]](#_4_7) 關于俄國人在對馬島上的各種活動，請參考George Alexander Lensen,The Russian Push Toward Japan , pp. 448-451。Lensen的描述主要根據俄國提供的資料。

1. [[5]](#_5_7) 《明治天皇紀》，第243頁。

1. [[6]](#_6_7) 《明治天皇紀》，第242—243頁。小西四郎強調了對馬居民對俄國人的抵抗（《開國と攘夷》，第226頁）。如果他們沒有為保衛國土而奮力抵抗俄國入侵者，這件事不會是英國人簡單一個動作就能輕易結束的。

1. [[7]](#_7_7) 《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243—247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43頁。對馬的大名是宗義達（1847—1902）。

1. [[8]](#_8_7) 1862年派出一個大型使團到歐洲。想了解這個使團的話，可以參考芳賀徹所著《大君の使節》，以及拙著Modern Japanese Diaries 。

1. [[9]](#_9_7) 《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611—616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55—256頁。

1. [[10]](#_10_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56頁、第257頁。

1. [[11]](#_11_7) 當幕府得知他們不僅僅與普魯士簽訂了合約，而且與“北德意志聯邦”下的其他國家也簽訂了合約時，感到困惑甚至驚愕。日本人認為自己上當受騙了，才會與幾個國家簽訂條約（《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34—235頁；《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488—489頁）。

1. [[12]](#_12_7) 和宮的信，見《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489—490頁。亦可見武部敏夫，《和宮》，第66頁。

1. [[13]](#_13_7) “親子”這個名字是1861年5月宣布她為內親王之后，由孝明天皇起的（《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559頁）。

1. [[14]](#_14_7) 這個時期和宮寫給孝明的一封信保存了下來。里面包含有這樣的句子“為了國家的和平，我別無選擇，只好接受，盡管事實上我痛恨這么做”（武部敏夫，《和宮》，第60頁）。

1. [[15]](#_15_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67頁。中山也失寵了，但是今出川實順很快恢復了名譽，1863年被任命為敕使前往神武天皇的陵墓祈禱攘夷成功。

1. [[16]](#_16_6) 關于隊伍的人數有不同的說法。一個經常被引用的說法是有7896人、280匹馬、7440條被褥、1380個枕頭、8060個飯碗、5210個湯碗、1040個碟子和2110個盤子（武部敏夫，《和宮》，第83頁；小西，《開國と攘夷》，第214頁）。沿途各地還額外增派了衛兵。大宅壯一估計護衛的人數約為20000人（《大宅壯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78頁）。

1. [[17]](#_17_6) 《大宅壯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78頁。“緣切榎”位于江戶以北的板橋區。

1. [[18]](#_18_5) 聲明的部分原文見《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764—765頁。

1. [[19]](#_19_5) 這封信是徹頭徹尾偽造出來的（《大宅壯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76頁）。

1. [[20]](#_20_4) 根據謠言，湯森·哈里斯決定除掉開國的攔路石孝明天皇，并收買安藤，讓他實施暗殺行動。兩位據說被收買的學者（塙次郎、前田健助）也于1863年1月遭到暗殺（《大宅壯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76頁）。

1. [[21]](#_21_4) 藤田覺，《幕末の天皇》，第282—283頁。

1. [[22]](#_22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73頁。這首詩包含了兩個文字游戲：“たち”同時有“寶劍”（指孝明收到的禮物）和“本質”（指愛國情懷）的意思；“さや”同時有“劍鞘”和“照耀”的意思。

1. [[23]](#_23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82—283頁。

1. [[24]](#_24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00頁。

1. [[25]](#_25_3) “四奸”指久我建通、巖倉具視、千種有文和富小路敬直。“二嬪”指今城重子和堀河紀子。這六個人某種程度上都與和宮與將軍的婚事有關。

1. [[26]](#_26_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12頁。

# 第八章 “征夷大將軍”



1863年1月17日發生的一件事生動地展現天皇和將軍之間關系的變化。這天，天皇的敕使三條實美（1837—1891）和副使姊小路公知（1839—1863）來到江戶城，呈送天皇給將軍的一封信。信中孝明簡要地重申了自己要將每個外國人都驅逐出去的堅定信念，敦促幕府制定一份攘夷的具體計劃，并立刻將計劃轉給各藩藩主。經過眾議后確定良策，從而完全掃除這些丑惡的外國人。[[1]](#_1__Xin_De_Yuan_Wen__Han_Wen__Ji)信的內容沒有任何異常，只不過重申了孝明一直以來的觀點，反常的是敕使將信交給將軍時的態度。

按照慣例，敕使謁見將軍時，將軍會坐在議事廳的上房[[2]](#_2__Yi_Shi_Ting__Da_Guang_Jian)接待他。敕使匍匐在下房的地上，由傳令官大聲念出他的官銜和名字。將軍點頭之后，使者跪著走到上房，深深地鞠一躬，并傳達天皇的諭旨。結束之后，跪著退下。三條實美認為這個做法不符合宮廷的地位，甚至在侮辱宮廷，于是向京都守護松平容保傳達這一想法，希望幕府對敕使表現得尊重一點。[[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盡管幕府可能經過了一番討論，但三條的抗議得到了認真對待。這一次，使者直接走到上房，反而是將軍一開始坐在中房，必須等待使者指示后才能走到上房，接受天皇的諭旨。很難想象還有比這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它說明幕府與宮廷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而且這絕不是唯一一次幕府對天皇表現出新的誠惶誠恐。

幕府現在進退兩難。它顯然希望增進與宮廷的關系，可那樣就必須遵從孝明的攘夷命令，但是幕府中的聰明人士——例如德川慶喜（1837—1913）和松平慶永（1828—1890）——都知道開國無法避免。將軍最后可能別無他法，只好在回答孝明時安慰他說，自己全心全意打算執行攘夷政策。

各藩藩主很快就注意到天皇和將軍相對地位的變化，許多大名認為有必要造訪一下京都。幕府曾經嚴令禁止他們進入京都，日本西部的大名前往江戶的路線通常也都會避開它，然而如今這條禁令已經失效，大名們開始經常造訪京都。事實上，政治中心已經從江戶轉移到了京都。宮廷利用其突然增加的重要地位，利用來訪大名的影響力，說服幕府改變了一些自己反感的慣例舊行。五百多年來天皇首次擁有這樣的政治權力。不過，宮廷政治活動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為天皇爭取更大的權力，而是為了實現攘夷。

這種變化也影響著一眾公卿。在這以前，他們一直都與國家的政治毫不相干，在政治上的擔憂僅限于宮廷和那些儀式。然而，現在他們開始積極參與政治，邁出王政復古的第一步。

1863年將軍訪問京都，再次強調了天皇的新地位。這是兩百多年來首次有將軍訪問京都。家茂希望表達自己對宮廷的敬意以及實現公武合體的強烈愿望。2月27日，家茂最重要的顧問德川慶喜在他之前已經訪問京都，并受到天皇的接見。三天之后，慶喜參觀了學習院，這是孝明的父親為培養公卿子弟而創辦的學校。慶喜趁著這個機會，提議廢除皇室年輕成員出家的規定，稱呼他們為親王（意為皇室的血親），并允許他們繼續過世俗的生活。慶喜還提議，多年來一直幽閉于御所的天皇，應該模仿古代的君主，春秋兩季到全國巡視。最后，他建議允許朝彥親王（安政大獄中被判處永久幽禁）還俗。德川慶喜（和將軍）的這三條建議明顯是為了討好天皇。

最后一條很快就實施了：3月18日，天皇頒布圣旨，命令朝彥親王蓄發。[[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不久，中川宮親王（朝彥親王現在的名字）[[5]](#_5__Zhong_Chuan_Gong__1824__1891)就成為天皇的密友和宮中最信任的人。奇怪的是，中川宮親王很少引起現代學者的注意，但他不僅是天皇的幕后謀士，[[6]](#_6__Teng_Tian_Jue_Cheng_Qin_Wang)還是一位對時局有重要影響力的人。中川宮親王的一生跌宕起伏，從他頻繁地更換名字這一點便可看出。他在青蓮院為僧期間，尤其是19世紀60年代初期，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愛國人士來訪。

將軍的來訪證實了京都政治上的重要性加強，但這卻未能平息那些極端主義者心中的怒氣，他們依然痛恨每個涉嫌勾結幕府的人。又一波恐怖活動席卷京都。他們殺害了一些人，并對其他人發出死亡威脅。1863年3月10日，四名刺客暗殺了儒醫池內大學（1811—1863）。殺手按照這類暗殺事件的慣例，留下了一張紙條，解釋刺殺池內的原因：

此者，向來蒙高貴之人恩顧，戊午之時（1858年），從正義之士，行種種周旋。然遂反覆，相通奸吏，致諸藩誠忠之士幾多斃命，彼竟自免，其罪不容天地。依之，加誅戮令梟首也。[[7]](#_7__Li_Yuan_Long_Yi____Zhan_Jian)

池田曾與梅田云濱、梁川星巖和賴三樹三郎一起，被認為是攘夷派的四雄。安政大獄期間，幕府認為池田是個危險人物，曾追捕過他。最后池內自首，但卻沒有被處死，而是在短暫羈押之后被釋放，這使人們懷疑他與幕府合作。

刺客們不甘心只把池田殺死。他們把他的耳朵割下來，一只送給了中山忠能，另一只送給了正親町三條實愛，并附上紙條，警告說除非他們辭職，否則將會有同樣的下場。他們指責這兩名公卿是兩面派——在公開場合支持正義行動，私下里卻喜歡妥協和假情假意的措施。刺客們還稱，這兩人收受了賄賂，為公武合體的目標奔波，而這就是他們讓人仇恨的原因。中山忠能被無中生有的指控氣得發瘋，但是最后他和正親町三條都被死亡威脅嚇退，雙雙以健康為由辭職。中山忠能照看睦仁親王一職由三條實美代替。

1863年，暴力和恐嚇事件倍增，武士和浪人醉心于攘夷的信條而大肆殺戮。他們散播謠言，使整個京都籠罩著一股緊張的氣氛。那一年發生了七十余起謀殺、縱火和恐嚇案件，寫有理由的“斬奸狀”被放在遇害者的腦袋旁、“天誅預告書”被貼在墻上。幕府當局無力平息暴亂，把問題留給了宮廷——暴徒們正是以它的名義制造出這些駭人聽聞的事件——讓宮廷去規勸這些無法無天的“愛國者”。天皇支持幕府的態度從未動搖，他將駐扎在京都的十六個藩國的武士集中到學習院，命令他們不得干預政治，特別是以向公卿家投擲匿名信的方式干涉。如果要投訴，應該向負責的官員寄送署名信件。天皇還將十六個藩國的大名召來，令關白傳達他們自己對攘夷的一貫看法。天皇鼓勵大名隨時參觀學習院，發表他們的看法，特別是與國防事務有關的。

并非只有活人才是暴力的犧牲品。3月11日，九個人沖進等持院的大殿，將供奉在那里的前三代足利幕府將軍的木像梟首，并將砍下的頭顱帶到三條大橋示眾，同時留下告示，解釋每個人的罪行。[[8]](#_8__Dui_Zu_Li_Mu_Fu_Jiang_Jun_De)這個行為被認為是對德川幕府的秘密攻擊，幕府在京都的代表迅速做出反應，抓捕肇事者，但關于該對他們施以什么刑罰引起了廣泛的討論。[[9]](#_9__Walthall___Off_with_Their_He)

4月21日，德川家茂將軍帶領三千多名家臣來到首都。他住進了幕府在京都的行轅二條城。這次來訪有潛在的危險。城里到處都是尊王攘夷派的黨羽，其中任何一人都有可能對將軍進行自殺式襲擊。第二天，家茂派德川慶喜到御所為自己上任以來無能力管理國家而向天皇表示歉意。然而他要求天皇遵循由來已久的傳統，重新授予自己統治權。家茂的要求得到了滿足。[[10]](#_10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

4月24日，家茂親自來到皇宮，覲見天皇。天皇親切地接見了將軍，并禮節性地賜給他一杯清酒。后來，天皇把家茂請到御學問所，在那里聊天。天皇對將軍很有禮貌，但是并不恭敬：宮廷將將軍位次列在內大臣之后，處于第六。

家茂懇求天皇一旦發現幕府的做法有任何不當，一定要不吝賜教。這種尊敬態度和上一次（1634年）德川家光進京時的傲慢形成了鮮明對比。那時德川家族的權力達到了頂峰，將軍的位置也在關白之前，[[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而這次的會面則明顯由天皇主導。

會面時，孝明像平時那樣，要求家茂貫徹已經宣布的攘夷政策。會面結束后，家茂參觀了睦仁親王的住處，并留下了豐盛的禮物，包括一把精美的大刀、五百件銀器、二十件金器、兩幅畫、一個花瓶，和幾匹錦緞。第二天，天皇派使者到二條城，向家茂回贈了自己和睦仁的禮物。

正式的儀式一結束，國土上頻繁出現的外國人又使天皇感到焦慮和憤怒。4月28日，孝明有生以來第一次主動地離開御所，[[12]](#_12__Qian_Wen_Ti_Dao_Guo__1854Ni)到上賀茂神社和下鴨神社祭拜，祈禱攘夷成功。[[13]](#_13__Ta_Jue_Xin_Can_Bai__Si_Hu_S)陪同他的有關白、右大臣和許多次一級的公卿。將軍也率德川慶喜、各大名和禮儀專家出席。那天下著雨，然而當天皇的乘輿經過家茂等人時，他們全都從馬上跳下來，扔掉雨傘，跪在路旁。[[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大批的京都市民涌向街頭，難得地一睹天皇，或者說他的乘輿的風采。[[15]](#_15__Tu_Zuo_Fan_De_Zhi_Shi_Ji_Cu)據說那天將軍經過時，長州的攘夷派極端分子高杉晉作（1839—1867）高喊“征夷大將軍！”，諷刺將軍辜負了這個稱號。

家茂的來訪對孝明天皇而言是一次極大的成功。他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不愿客人離開。然而4月7日，已經在京都滯留過久的家茂（他原本只計劃停留十天），宣布將啟程返回江戶。朝臣們非常失望。當時的宮廷分為兩大派：一派希望實現公武合體，一派認為家茂待在京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為難他，甚至最終推翻幕府的機會。這兩派人的理由并不相同，不過都希望家茂留下，以達到他們的目標；但是幕府急切地希望家茂回到江戶，處理前年秋天發生的一件事的善后工作。

在一個名叫生麥的地方，英國人查爾斯·理查遜（Charles Richardson）和三名同伴騎馬經過薩摩大名島津久光的隊伍時，據說因為沒有表示出應有的尊敬，導致理查遜當場被殺。這就是所謂的“生麥事件”。英國要求幕府和薩摩藩賠償，幕府最終同意了英國人的要求，但將軍上京時這件事情還沒有處理，幕府迫切需要他回江戶磋商。

家茂請求天皇同意自己離開，但天皇說，如果家茂回江戶，自己將難掩凄涼。他懇求家茂再停留一段時間，以使自己安心。被這些話深深打動的家茂同意了天皇的請求。天皇滿心感激地送了家茂很多禮物，而陪伴父親的睦仁親王也第一次見到了將軍。

5月28日，孝明來到石清水八幡宮，祈禱國家免于外患。按原計劃孝明一個星期前就該出發，天皇還命令將軍陪自己前往，但這一計劃被中止。中山忠能的第七子中山忠光（1845—1864）突然以生病為由辭職，并離開京都。[[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據說忠光和一些長州的浪人計劃攔截去石清水的隊伍并刺殺將軍。5月17日，天皇聽說了這個陰謀，下令推遲參拜。德川慶喜建議完全取消這個行程，天皇本人也越來越不想去，然而迫于極端主義者的壓力，不得不遵守原先的計劃。

5月29日，孝明在寫給中川宮親王的信中說已決定再次延期，因為他頭暈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害怕長途旅行。關白鷹司輔熙說，盡管這種情況下延期非常合理，然而計劃卻難以改變，因此建議天皇還是堅持去比較好。不久，三條實美請求覲見天皇，看看天皇是否真的不舒服。三條拒絕聽任何延期的話，請求天皇不管天氣如何，也不管是否生病都立刻啟程。后來，其他官員也加入了討論，一些人說天皇是假生病，另一些人甚至說要到內宮將他拽出來塞進乘輿。天皇害怕得渾身發抖，只好從命。關白對發生的事感到很失望，然而他也無力改變這種狀況。天皇和關白都不是這些“血氣之公卿”的對手。孝明要中川宮親王請島津久光幫忙勸勸這些不顧后果的公卿，要是再這么鬧下去的話，可能就是“國亂之基”。[[17]](#_17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



德川慶喜

根據其他文獻，在沿途天皇可能休息的地方都做了準備，以防他突然發病。天皇確實不太舒服。在石清水的正殿祭拜時，他被絆倒，要別人幫忙才能站起來，在參拜十五個配殿時，全程都有隨從攙扶。

諷刺的是，孝明的反對者，那些尊王攘夷派的成員，都曾向天皇宣誓效忠，然而他們卻公然無視他的意愿，甚至說如果天皇拒絕來石清水，他們將使用武力。他們隨時準備為他赴死，但前提是滿足自己的條件。

公卿們本來計劃家茂和天皇一起去石清水，并由天皇賜給他一把“節刀”，這是一種裝飾用的劍，標志著佩戴者為天皇的代表。收下這把劍將使將軍處于兩難之地，他將不得不執行天皇的攘夷政策，而這是幕府不愿意看到的。家茂似乎已經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于是稱病不去，并派德川慶喜代替自己出席，然而當詔書宣德川慶喜到神社接受節刀時，他卻以急病為由，拒絕離開住所。[[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我們可以想象，兩次被拒的孝明心情是多么的沮喪。他自己的病也許是心理作用引起的。這種本能的恐懼心理非常好理解，對他而言這不僅是一次長途旅行，還可能半路被劫持甚至謀殺。

那些威脅天皇的人并不是刺客，也不是粗野的武士，而是上層社會的公卿大家。在人們的印象中，他們往往頹廢懦弱，而不是血氣方剛。另一方面孝明尋求幫助的人既不是廷臣，也不是將軍，而是薩摩藩的實際領導者、也許可以用魯莽一詞來形容的島津久光。島津去年曾派兵到京都鎮壓寺田屋事件中的激進效忠者。天皇在石清水八幡宮為攘夷事業祈禱時，可能同時也在祈禱可以擺脫這些喊叫著支持自己的“尊攘”派（尊王攘夷派現在的稱呼）。

沒有證據顯示睦仁親王對這些事知道多少。他只有十一歲，可能還沒有和父親討論過政治事件。孝明出發去石清水，親王（和皇后）目送他離開，并迎接他回來，然而他可能并未意識到石清水之行對父親是個多么大的考驗。不過，關于年輕的舅舅中山忠光的事，他可能知道一些。

1858年，十三歲的中山忠光被任命為侍從，主要任務顯然是擔任比自己年輕七歲的外甥睦仁的玩伴。同一年，他參加了反對幕府與外國簽訂通商和約的八十八公卿廷參事件。小小年紀的他，便在武市瑞山（1829—1865）、久坂玄瑞（1840—1864）和吉村寅太郎（1837—1863）等愛國者的影響下成了一名攘夷派，而上述三人后來在幕末的戰斗中都犧牲了。[[19]](#_19__Xi_Dao_Liang_San_Lang____Zh)

在中山忠光成長為一名愛國者的過程中，田中河內介（1815—1862）起著重要的作用。田中是中山家的家臣，從孩提時代起便認識忠光。田中跟忠光的其他老師一樣，也參加了寺田屋事件。他被薩摩的軍隊逮捕，在被送往監獄的船上和養子一起遇害，尸體被拋入瀨戶內海。也許田中給中山忠光的主要教導就是，諸藩藩士應該忠于藩主，但更正確的應該是忠于國體，即以天皇為象征的日本國。

1862年9月30日，中山忠光來到武市瑞山家。他告訴武市自己要暗殺巖倉具視，并需要武市的幫助。忠光并沒有說為什么要殺死巖倉，但武市的日記里提到忠光認為巖倉計劃毒死天皇，或者至少要詛咒天皇。武市要他放棄計劃，但忠光回答說，他已經下定決心，在事業完成之前無法停下來。武市不知道如何才能說服忠光這樣過度狂熱的人，于是答應將和同伴討論一下計劃。其中一人是公卿中的極端主義者姊小路公知，姊小路說他聽聞忠光常常有狂熱的行為，但不確定其是否真的是一名憂慮時局的“正義家”。[[20]](#_20__Ta_De__Zheng_Yi_Yong_Hu_Zhe)

武市將這個暗殺計劃告訴了三條實美，后者可能告訴了中山忠能。那天晚上忠光來到武市家，說暗殺計劃不得不取消。顯然忠能不允許忠光參加這個陰謀行動。忠光以自殺相威脅，忠能回答道：“你如此一意孤行，那么不管我說什么都沒用了。但是直接殺死巖倉太過于魯莽。你應該首先向有關官員正式起訴他，如果那個官員拒絕調查，再按自己的方式處理。如果你不肯聽從勸告，那么先殺了我吧！”[[21]](#_21__Xi_Dao_Liang_San_Lang____Zh)

在父親的堅決反對下，忠光只好放棄了計劃。但是第二天，11月2日，他把武市叫來并對他說，經過快速考慮，他還是決定殺死那幫奸黨，并要求武市向薩摩、長州和土佐等藩尋求幫助。武市恭敬地聽完忠光的話，然后跑去警告關白，說除非將巖倉等人放逐到其他地方，否則忠光將伙同三個藩國的人對他們實施“天誅”。兩天后，三名公卿——巖倉具視、久我建通和千種有文——的家里被扔了恐嚇信，警告他們如果不在兩天內離開京都，他們的頭顱將會在鴨川的河床上示眾，整個家族也將受到懲罰。他們的威脅和朝廷中占優勢的攘夷氣氛起了作用：13日，巖倉落發，幾個星期后在京都北部的巖倉村歸隱。不過，這未能阻止忠光殺死巖倉的執念，他一再指責巖倉是每一件令自己不快的事件的罪魁禍首。

忠光不顧父親的反對，似乎也不在乎父子關系斷絕，在成功趕走巖倉之后仍繼續著那些狂熱魯莽的行為。不用說，忠能非常擔心自己的任性兒子，他根本不知道兒子的行蹤。1863年4月，忠能請求朝廷解除忠光的職務，他說自己擔心太過于憂國憂民的忠光可能已經失去了理智。他會繼續尋找兒子，判斷他是否已經瘋了。

忠光有一段時間躲在長州，時隱時現的他自然不會是受歡迎的客人，不過他與皇室的關系對攘夷事業非常有利。1863年5月22日，一封從長州發出的信中寫道，忠光看到攘夷最積極的長州藩購買的外國船只和武器時怒不可遏。他反對在如此神圣的事業中使用外國武器，要求大名銷毀它們。他們無法接受這個建議，忠光一怒之下騎馬去了下關。[[22]](#_22__Xi_Dao_Liang_San_Lang____Zh)

1863年9月，吉村寅太郎等人一起成立了以忠光為核心的天誅組。這些狂熱的效忠者以大和國為中心，焚燒政府辦公場所，殺害官員。一開始他們獲得了一些成功，然而很快就被鎮壓了。1864年，長州藩派出一群殺手暗殺了忠光。[[23]](#_23__An_Sha_Fa_Sheng_Yu_11Yue__D)

睦仁親王還太年輕，無法理解攘夷運動的細節，但他也許知道一些忠光的事跡，可能還知道他秉持的信條。明治十五歲登基時，人們幾乎不了解他的政治觀點，但他看起來并不像父親那樣尊崇幕府的制度。也許忠光幫助年輕的親王形成了統治者在日本應有的概念。忠光的行為如此反復無常，很難想象他會系統地向明治灌輸什么政治理念，但是一名年輕的公卿不顧父親的反對和傳統的壓力，冒著生命危險試圖推翻自己所痛恨的體制，也許觸動了這名不久之后將成為天皇的小男孩的心弦。

1. [[1]](#_1_8) 信的原文（漢文）見《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195頁。日語的意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12頁。

1. [[2]](#_2_8) 議事廳（大広間）為三進。下房（下段）是普通的榻榻米；中房（中段）有兩層榻榻米高；上房（上段）有三層榻榻米高。

1. [[3]](#_3_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12頁。

1. [[4]](#_4_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20—321頁。亦可見《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353—354頁。

1. [[5]](#_5_8) 中川宮（1824—1891）是伏見宮邦家親王的兒子。他少年時代就有幾個名字，1831年被送到本能寺當侍僧后名字就更多了。1836年他轉到一乘院，任奈良興福寺的塔頭，并在叔叔（寺廟住持）的指導下學習（這時他用的是另外一個名字）。同年，十二歲的他被仁孝天皇收養為義子，并代叔叔出任住持，盡管直到1838年他才正式剃度出家。1852年，他依照圣旨轉到京都天臺宗的重要寺廟青蓮院，被稱為青蓮院宮尊融親王，這是他最常見于德川時代末期文獻里的名字（他還因為寺廟的所在地而被稱為粟田宮）。那些聚集在他周圍的人包括梅田云濱、池內大學、真木和泉、橋本左內、佐久間象山以及許多在安世大獄中遭到殺害或者肅清的人。從那些追隨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們不僅為親王的攘夷主張所吸引，還為他的高貴品格所感召。他在“志士”中的號召力沒有逃過幕府的注意，安世大獄期間，被判在相國寺永久蟄居。他在一間狹小破敗的屋子里度過了兩年多時間（Ōnishi Gen’ichi, “Ishin kaiten no kōbo to Kuni-no-miya Asahiko Shinnō,” p.79）。親王的遭遇令志士們憤慨不已，為他爭取自由成了他們的首要目標（第86頁）。一些人甚至提出讓親王擔任“征夷大將軍”，率領軍隊推翻幕府，盡管親王至死都是“公武合體”的支持者（第82頁）。為了除去幕府官員，并掃除所有的外國人，這些人提出了各種血腥的方案，希望親王能夠領導他們的行動（第87頁）。1862年，由于和宮和將軍大婚，朝廷宣布大赦，親王獲得了自由，并被允許還俗（第98頁）。到這時他才被稱為中川宮。明治維新之后，政敵仍敵視親王，以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將其流放到廣島。死前幾年他擔任伊勢大神宮的祭主。在興福寺期間，親王學習了文學和武術，尤其是使用長槍。在奈良時，他結識了致力于開國的幕府重臣川路圣謨，不過親王一直都是“攘夷”運動的支持者。

1. [[6]](#_6_8) 藤田覺稱親王為“孝明天皇的右臂”（《幕末の天皇》，第219頁）。

1. [[7]](#_7_8) 栗原隆一，《斬奸狀》，第107頁。

1. [[8]](#_8_8) 對足利幕府將軍的控訴書原文見栗原隆一，《斬奸狀》第115頁。對此事件的極佳的英文描述，請見Anne Walthall, “Off with Their Heads! The Hirata Disciples and the Ashikaga Shoguns,”Monumenta Nipponica , 58:2, Summer 1995。

1. [[9]](#_9_8) Walthall, “Off with Their Heads! The Hirata Disciples and the Ashikaga Shoguns,” pp. 162-168.負責逮捕這些人的官員是1862年被任命為京都守護的松平容保（1835—1893）。事件使這位年輕的默默無聞的會津藩大名引起了朝廷的注意。這個行動的象征性意義使他決心將犯人抓捕歸案：砍掉前將軍木像的頭顱，就是在威脅現任的將軍。

1. [[10]](#_10_8) 《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455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25頁。

1. [[11]](#_11_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25頁。據說家茂的隨行人員多達三十萬七千人。難以相信他真的帶了這么多人，但是也許這是他希望徹底打動宮廷而帶來的大批護衛給人們留下的印象。

1. [[12]](#_12_8) 前文提到過，1854年皇宮發生大火時，他曾被迫離開御所，到別處暫避。

1. [[13]](#_13_8) 他決心參拜，似乎是長州藩大名毛利敬親的繼承人毛利定廣（1839—1896）一再請求的結果。定廣說，在這個關鍵時刻，天皇不宜繼續封閉在皇宮里，并極力主張他不僅參拜兩座賀茂神社，還去參拜泉涌寺和石清水八幡宮（《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27頁）。

1. [[14]](#_14_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26—327頁。

1. [[15]](#_15_7) 土佐藩的志士吉村寅太郎在寫給父母的信中描繪了當時的盛況：“天皇的乘輿越來越近，我忍不住淚流滿面。我匍匐在地，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后來聽說有超過四十萬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輕人——聚集在道路兩旁，希望一睹珠簾里面的龍顏的風采，他們全都感動得哽咽不已”（西島量三郎，《中山忠光暗殺始末》，第39頁）。

1. [[16]](#_16_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30頁。中山忠光當時擔任外甥睦仁的侍從。

1. [[17]](#_17_7) 《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592—593頁。亦可見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68—69頁。

1. [[18]](#_18_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30—331頁。

1. [[19]](#_19_6) 西島量三郎，《中山忠光暗殺始末》，第22—24頁、第34頁。

1. [[20]](#_20_5) 他的“正義擁護者”可能指的是某個擁護“尊攘”事業的人（西島量三郎，《中山忠光暗殺始末》，第 34頁）。

1. [[21]](#_21_5) 西島量三郎，《中山忠光暗殺始末》，第35頁。

1. [[22]](#_22_4) 西島量三郎，《中山忠光暗殺始末》，第49頁。

1. [[23]](#_23_4) 暗殺發生于11月，但是關于日期則至少有八個不同的版本（西島量三郎，《中山忠光暗殺始末》，第197頁）。西島提供了由當時藩內主要的反攘夷派“俗論黨”派去刺殺忠光的殺手名單（第201頁）。

# 第九章 蛤御門之變



1863年6月9日，德川家茂向天皇報告說，幕府將于6月24日驅逐外國人。[[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之前他曾兩度定下日期，但都不得不推遲。毫無疑問，家茂極度不愿這么做。他心里很清楚，假如外國人拒絕離開，日本的軍備是多么的可憐和不堪一擊。然而他別無選擇：宮廷不斷向他施壓，而他在迎娶和宮時已經承諾將執行攘夷政策。

了解了宮廷驅逐外國人的決心之后，長州藩匆忙筑起了沿海的防御工事。確定攘夷開始的這一天，長州藩迫不及待地當起了急先鋒，首先向外國船只開炮。停泊在九州北部岸邊的一艘美國商船成了第一個犧牲品。接下來幾個星期，他們又分別炮轟了行經下關海峽的一艘法國軍艦和一艘荷蘭軍艦。消息傳到宮廷，天皇令公卿正親町公董擔任“攘夷監察使”，到長州藩為藩主及其兒子送上禮物，贊揚他們在攘夷事業中主動擔任其他藩的領導。[[2]](#_2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顯然，外國人遲早會報復，但孝明早就準備打一仗了。[[3]](#_3__Yi_Tian_Xi_Jia____Jin_Dai_Ti)

不久，薩摩藩成功地抵御了英國人的進攻，天皇似乎由此堅定了必勝的信心。英國人要求幕府和薩摩藩分別賠償在生麥村遇害的查爾斯·理查遜。5月，幕府做了賠償，然而薩摩藩則拒絕回應。1863年8月12日，英國派出一支由七艘軍艦組成的艦隊來到鹿兒島灣，要求大名島津茂久處死生麥事件的肇事者，并為死者和事件中的傷者支付賠償金。英國給他們二十四小時的考慮時間。薩摩藩的回答是：肇事者已經逃跑，無法找到；至于賠償金，沒有幕府的許可藩國無權支付。

8月15日，英國艦隊突然扣留了隸屬薩摩藩的三艘蒸汽軍艦。中午時分，薩摩藩向英軍的艦隊開炮，英軍回擊。激戰持續到傍晚。鹿兒島的許多房屋和寺廟都毀于炮火，薩摩藩的軍隊也損失慘重，但英國人也蒙受了巨大損失，艦隊未獲得任何決定性的勝利就離開了。島津茂久把戰斗的情況向宮廷匯報，天皇發來了嘉獎的敕書。[[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宮廷對這個消息的反應非常熱情。由于預料到可能要與外國人發生武裝沖突，皇室成員和公卿在進出皇宮時都要佩劍。這對他們是個全新的體驗，因為宮廷成員已經有幾百年沒有真正準備過戰斗了。關白鷹司輔熙咨詢住在京都的大名們，天皇是否適合親自領導攘夷運動。鳥取藩的大名池田慶德（1837—1877）回答說：“親征亦可，然至尊及公卿倘不知兵，以何達其目的？會津藩主肥后守松平容保，今任京都守護之職，[[5]](#_5__Fei_Hou_Shi_Ri_Ben_Di_Ming)諸藩主亦擁兵在京，宜命該等練兵，眼熟戎旅，耳慣炮聲，而后可初議親征之事。”[[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于是，孝明天皇命令松平容保的士兵在建春門外演習。那天下著雨，但天皇還是從城門上的一個觀察點觀看了演習。陪同他的有皇后和皇太子以及宮里的許多侍女、公卿和大名。容保親自率領一支三千多人的隊伍，大約下午4點開始演習。所有的士兵都身穿盔甲，但是一些部隊扛著槍支，其他的則揮舞著長矛、弓箭等傳統武器。士兵們吹響了海螺號，打起了鉦鼓，揮舞著大刀和長矛，不時發出戰斗的吼聲。幾乎看不到一點現代戰爭的痕跡。

9月17日，建春門外又舉行了一次演習。這次參加的不僅有會津藩，還有鳥取、德島、米澤和岡山等藩國的軍隊。睦仁親王再次觀看了演習。米澤藩的軍隊演習時使用的都是西式武器。《明治天皇紀》中這樣寫道：

炮聲震天，硝煙蔽空，陪觀兒女驚愕失色，親王神色未變，始終泰然。天皇親覽軍事，近世絕無之事，況親王幼沖即陪之，未曾有也。當時廷臣中有為說者，言縱令練兵、馳驅于九門之內，啻破舊習；于內侍所附近弄兵器，亦冒瀆神威，可想當時之狀。[[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9月25日，孝明宣布將去大和參拜神武天皇山陵和春日大社，祈禱攘夷成功。他還計劃到伊勢神宮去做同樣的祈禱。這些行為明確表面孝明考慮親自指揮攘夷運動。攘夷派公卿與長州藩的武士和志士商討之后，認為這是一次極好的倒幕機會。公武合體派猜到將會發生什么事，極為不安，于是請求中川宮親王說服天皇取消原定的大和之行。28日清晨，中川宮親王來到皇宮，問天皇為何要走親自指揮這步險棋。天皇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嚇了一跳，說自己還沒有決定是否親征。去參拜神武天皇山陵是他的“素志”，但其余的話都是為了安撫三條實美一派而說的。[[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中川宮親王很清楚，天皇已經被攘夷派控制了。

那天晚上，中川宮親王在天皇的要求下，與前關白九條尚忠及其他公武合體派成員進行磋商。他們決定鏟除那些陰謀進行“朝政改革”，即試圖破壞宮廷與幕府傳統關系的人。30日凌晨前，朝廷召開了一次會議，與會的有公卿以及京都守護和所司代。御所的九個大門被鎖上，沒有天皇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進入御所。他們命令各大名的士兵守護城門。凌晨4點，京都發射了空炮，宣布戒嚴令開始。攘夷派公卿聽到炮聲趕到皇宮，但是大門緊鎖，他們被擋在了外面。

這時，中川宮親王在天皇御前宣讀一份詔書：“今春以來議奏、國事掛[[9]](#_9__Yi_Zou___Guo_Shi_Gua_Du_Shi)等，勾結萩藩，矯敕多發，親征之事為最。自今以后停實美等參朝之權，責其閉居。”[[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三條實美及同黨被解職，改由中山忠能和正親町三條實愛這樣的公武合體派擔任其職位。天皇另頒布一道諭旨，宣布取消大和之行，稱攘夷的政策沒有變，但現在并不是天皇親征的合適時機。攘夷派很快就明白他們的輝煌歲月已經成為過去。就在長州藩的武士離開京都返回自己藩國時，包括三條實美在內的七名公卿跟隨他們一起去了長州。[[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公武合體派現在控制了宮廷。

這些重大事件后，宮廷迎來了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11月3日，宮內慶祝親王的生日。宴會辦得非常節儉，大家如往常一樣交換鮮魚等禮物。隨后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聚會，中山忠能獻上祝詞祝賀中山慶子，即自己的女兒和皇太子的母親。那天，忠能在自己家里為親王的健康長壽舉杯。他無比懷念過去親王住在家里的那段時光。親王現在十二歲了（按照日本的算法）。往事茫茫入夢，世事變幻恰似反掌。忠能無疑在想，在瞬息萬變的宮廷，自己的境遇就如萬花筒般變化無常。那個月晚些時候，忠能的妻子中山愛子覲見了自己的外孫。這是她七年來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外孫。回想起過去的種種，愛子忍不住泣涕如雨。

12月26日，睦仁年滿十四歲的同伴里松良光乞假參加元服儀式。這個請求被批準，在慶祝儀式上天皇和皇后都送了他禮物，親王除了實用的禮物之外，還送了朋友一些有關打仗和神鬼的傳統繪本。[[12]](#_12__Zhe_Xie_Tu_Shu_Bao_Kuo___Hu)其中一些書中的插圖被親王上色，有些還有親王的亂畫。顯然他已經看過這些書，也許是在被迫閱讀儒家典籍時聊以解悶吧。[[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親王的和歌指導（從1864年2月起）由父親改為宮廷詩人冷泉為理（1824—1885）和柳原光愛（1818—1885）。此前，為理不知道親王已經受過父親（偶爾還有典侍廣橋靜子）的指導，認為自己有責任告訴天皇親王已經十三歲，是時候開始學習短歌了。天皇國事繁忙，一時沒有答復他。2月19日，為理創作了兩首和歌，解釋自己為何認為親王應該開始學習和歌。第二首是這樣的：

花一開始

并無

香味

在還是蓓蕾的時候，

花就開始成為花了。

1864年2月[[14]](#_14__Cong_Yin_Li_2Yue_12Ri_Qi__J)，將軍德川家茂應天皇之命訪問京都。六天之后（2月22日），他來到二條城，天皇任命他為右大臣兼右禁衛府大將。家茂到皇宮答謝皇恩。

天皇寫給家茂的文章中卻一點也不高興：“嗚呼！汝如何視方今之形勢？內則綱紀廢弛，上下解體，百姓受涂炭之苦，皆顯瓦解土崩之色，外則受驕虜五大洲之凌辱，正臨并吞之災。其危實如累卵，又如燃眉。朕思之，夜不能寢，食不下咽。嗚呼。汝如何視此。此非汝罪，乃朕之不德所致，其罪在朕。”[[15]](#_15__Yuan_Wen_Jian___Xiao_Ming_T)

天皇的措辭都是陳言套語，但這些話似乎發自肺腑。文章寫道，“朕愛汝如子，希汝親朕如父”，這時的天皇顯示出了對家茂的喜愛之情。他敦促家茂不要辜負“征夷大將軍”的頭銜，還說，“夫征服丑夷為國之大典，非遂興膺懲之師不可，然無謀之征夷，實非朕之所望。當議定所以之策略，以之奏朕。”[[16]](#_16__Yuan_Wen_Jian___Xiao_Ming_T)

這封信的措辭比同時代的大多數公文都要直接，它強烈表明了孝明的立場。他喜歡與幕府合作，通過驅趕丑惡的夷人，恢復國家的穩定與繁榮，然而他卻不贊成長州武士那種輕率地進攻外國人的做法。他用 “累卵”和“燃眉”兩個詞表達了自己對緊急形勢的擔憂：“累卵”的意思是疊起來的蛋，一碰就倒，而“燃眉”的意思是危險離得很近，把人的眉毛都燒焦了。

除此之外，家茂的來訪還是很愉快和悠閑的。他一直待到五月才離開。天皇和家茂多次交換禮物，而且皇宮舉辦的所有宴會和娛樂活動都邀請了他。三條實美逃往長州后，宮廷的攘夷派已經失勢，國內其他地方的排外活動也暫時平靜下來。

平靜首先在7月8日被打破。長州藩向宮廷請求原諒三條實美、毛利敬親及其兒子定廣，并允許他們回到首都。宮廷拒絕介入此事，將事情全被委任給幕府處理。長州藩的浪人聽到請求被拒的消息后，非常氣憤。其中有些人秘密聚集到一個叫池田屋的旅店，商議下一步行動。幕府聽到了聚會的風聲，派出近藤勇（1834—1868）領導的著名的“新選組”（一個由幕府組織的精英劍客團體）襲擊了池田屋，殺死或活捉了那里的所有浪人。[[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池田屋事件的消息傳到長州藩，憤怒的長州藩派出一支由一千多名士兵組成的隊伍來到京都，由福原越后（1815—1864）擔任首領。隨著有相同信念的浪人加入，隊伍的人數不斷增加，他們在城里的各個地方駐扎下來，并派人向宮廷和幕府請愿，再次請求原諒。7月27日，宮廷在商議后決定，允許毛利敬親或毛利定廣訪問首都；假如他有后悔之意，那么宮廷可以取消處罰。在德川慶喜的要求下，宮廷命令京都附近的長州軍隊撤離自己的據點，返回長州。但這些要求都被長州藩拒絕。相反，他們這時考慮的可能是這樣：選一個大風的日子在京都放火。趁亂殺死京都守護松平容保和中川宮親王；說服天皇移駕長州；襲擊“新選組”；撤掉會津藩大名的京都守護一職，改為由長州藩的大名擔任；迫使將軍實施攘夷計劃等。[[18]](#_18__Xin_Xuan_Zu_Cong_Yi_Wei_Bei)

對中川宮親王和松平容保的特殊仇恨可能源于當時流傳的一個謠言，稱這兩人采納了佐久間象山（1811—1864）的建議，準備將天皇遷往彥根。這類謠言并非第一次出現。1863年7月，支持開國的老中小笠原長行（1822—1891）曾帶領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幕府軍隊從江戶駛往大阪。一時謠言四起，說他打算迫使宮廷同意開國，否則將在首都縱火，綁架公卿，并一舉摧毀這座城。謠言還說幕府計劃將首都遷往彥根。[[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現在，時隔一年，類似的謠言再次傳到了長州愛國者的耳朵里。

儒家學者佐久間象山被認為是計劃的發起人和開國的擁護者，是浪人特別憎恨的一個對象。8月12日，他們在京都殺害了象山。[[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長州人的魯莽行為激起了其他藩國的不滿，他們紛紛要求派兵征討長州。

支持和反對長州的勢力都聚集在京都周圍。8月19日，朝廷命令長州藩立即撤回所有部署在京都地區的兵力。如果長州藩遵守天皇的命令，并乞求原諒，朝廷承諾認真考慮這一請求。但是長州藩的武士拒絕服從命令；相反，他們向朝廷上書，歷數松平容保的種種罪行，以及對其實施天誅的決心。解釋長州為何別無選擇只好開戰的信被扔進了公卿、諸藩主的家里。

宮廷頓時一片混亂。天皇接見了關白、中川宮親王、德川慶喜等人，并下達了鎮壓長州藩的旨令。這時，戰爭已經在伏見那里打了起來，槍炮聲在皇宮都聽得見。慶喜下令關閉皇宮的所有大門。

第二天早晨7點，叛軍距離城門越來越近。福原越后的軍隊被大垣藩的士兵擊退，但是其他長州叛軍則成功抵達了蛤御門和中立賣門。書中記載戰斗“其音如萬千雷落”，“殿舍震動恍如地震”。[[21]](#_21__Shi_Jing_Xiao____Mu_Mo__Fei)叛軍的火力主要集中在會津藩把守的蛤御門。戰斗異常激烈，叛軍差一點就攻破了城門，這時桑名藩和薩摩藩的援軍趕到，合力趕跑了長州藩的軍隊。蛤御門之捷鼓舞了那些效忠天皇的人，戰斗一共持續了五個小時，叛亂才被鎮壓下去。[[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戰斗給皇宮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在天皇的命令下，睦仁親王與皇后和淑子內親王一起，從自己的住處搬到了常御殿。緊急時用以疏散皇室成員的乘輿也準備好了。孝明天皇身著朝服，靜靜地坐著，仿佛對周圍發生的喧囂無動于衷。[[23]](#_23__Zhe_Fan_Miao_Shu_Lai_Yuan_Y)廷臣們卷起帽子上的長纓，把寬大的袖子系到后面，腳上穿著草鞋，與平時的形象完全不同。皇宮庭院所到之處滿是身穿鎧甲的士兵，炮彈打在皇宮的大門上，偶爾血濺四處。突然，門外躥起了火光，并向四周擴散。熊熊的火焰沿著烏丸通一路燒去，看上去皇宮馬上就要變成火海。皇宮內的混亂情形簡直無法用言語描述，宮廷成員們甚至想跑到外面。在松平容保的諫言下（他堅持認為他們不應該逃跑），孝明才沒有卷入兩方火拼的戰亂之中。[[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第二天，幕府趁著勝利，處死了三十多名被關押在六角監獄的尊王攘夷派。死者的尸體堆積在一起，在二百五十多年沒有見過戰爭的皇城門外曝尸三日。京都大約有兩萬八千間社寺民屋毀于戰火，大火連燒了好幾天才被撲滅。

長州叛軍被鎮壓，首都又一次呈現出祥和的氣氛，但仍不時有令人不安的事情發生。一天夜里，一群人闖入皇宮，試圖偷走皇上的乘輿。消息傳到負責宮廷防衛的德川慶喜那里，他匆忙趕到皇宮，發現大約有三百人聚集在常御殿。慶喜命令這些人散去，同時派人向關白和中川宮親王匯報情況，他們也急忙趕來了。大家請求天皇搬到一個安全一點的地方。后來，在慶喜的要求下，天皇搬到了紫宸殿居住。陪伴他的有睦仁親王和皇后。不知道發生什么事的宮女被嚇得啼哭哀叫。親王也嚇得暈了過去，在一名侍者的幫助下才清醒過來。[[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這一描述在戰后成為被誤改為描繪明治天皇的傳說之一。例如，一名（不太友好的）傳記作家寫道：“1864年7月，當長州藩向蛤御門開火時，（明治）天皇被爆炸的響聲嚇得暈了過去。從這個事情上我們可以推測他天性膽小懦弱。”[[26]](#_26__Quan_Chuan_Xin____Ming_Zhi)使親王暈倒的并不是蛤御門外的槍炮聲（這一戰斗發生在一天前），而是半夜里突然被夾在一群尖叫的婦女中間送往紫宸殿。尖叫聲可能是因為一次反常的事件：某位嬪妃的侍女正陪同她從一處宮殿走向另一處宮殿，途中侍女意外地把一個裝有黑色液體（用來涂牙齒）的罐子掉在了地上。罐子撞擊地板的聲音使人們誤以為是槍炮聲，而液體發出的氣味也非常強烈，因此造成了恐慌。[[27]](#_27__Zhe_Shi_Fei_Niao_Jing_Ya_Da)

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在記錄天皇生活的嚴肅文字中，出現這樣一則可能像中世時的傳奇故事，還是令人感到吃驚。出現在庭院中的那些神秘人物是誰？他們為什么要偷皇上的乘輿？為什么三百人一個也沒有抓獲？為什么侍女要在這種關鍵的時刻攜帶染齒的顏料？為什么罐子掉在地板上的聲音會讓這么多人陷入恐慌？

這個神秘事件發生的當天，親王派人請來外祖父中山忠能。他拿出一些繪本，要外祖父講給他聽。即使在這個皇室百年不遇的危險時刻，十二歲的親王也沒有被身邊發生的真正冒險故事所吸引。他依然是那個沉迷于冒險故事書的小男孩，這一點令人欣慰。

1. [[1]](#_1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31頁。

1. [[2]](#_2_9) 《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707—710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35頁。

1. [[3]](#_3_9) 伊田熹家，《近代天皇制成立の前提》，第10頁。為了證明，他引用了孝明1859年4月7日寫給近衛忠熙的一封信。信的全文見《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787—789頁。

1. [[4]](#_4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38—339頁。島津茂久最終接受了英國人的要求，并支付了六百萬兩黃金的賠償金。

1. [[5]](#_5_9) 肥后是日本地名，大致為現在日本的熊本縣。守是平安時期朝廷派往地方的最高管理者的職稱，但江戶時期僅是作為名號；京都守護是文久二年（1862）改革設立的新職，負責京都市內的治安及御所、二條城等的警備。——編注

1. [[6]](#_6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40—341頁。如想更詳細地了解池田慶德的觀點，請參考《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741頁。

1. [[7]](#_7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41頁。

1. [[8]](#_8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44頁。

1. [[9]](#_9_9) 議奏、國事掛都是文久二年（1862）改革設立的新職位，成員可參議國家事務。——編注

1. [[10]](#_10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45頁。《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791—820頁中有更詳細的資料和詔書更完整的引文。例如，中川宮親王曾向一名采訪者回憶道，孝明說過自己不能領導任何攻打幕府的軍隊，因為親子內親王（原來的和宮）現在是德川家的人，如果他攻打德川家族，就會害死她。這對親子的父親，即已故的天皇以及她的親戚們來說都是不可饒恕的。如果確實到了非進攻不可的時候，他會進攻，但是時機必須恰當。就他所知，現在武器未備，開戰為時尚早。因此“朕暫延親征”“止征幕之事” （《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791頁）。并不清楚中川宮親王的這些話是何時說的，但可能是政變數年之后。如果那樣，也許這些話中有記憶偏差或夸張捏造的成分。

1. [[11]](#_11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45頁。七名公卿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說，就在“中興之大業”即將取得成功之時，“狂妄奸賊”陰謀詭計干擾了圣聽。他們七人感到忍無可忍，于是決定西下，招全國“有志之士”，舉“義兵”（栗原隆一，《斬奸狀》，第178頁）。

1. [[12]](#_12_9) 這些圖書包括《繪本淺草靈驗記》、《繪本三國妖婦傳》、《繪本太閣記》、《繪本彥山靈驗記》、《源平盛衰記》和《葦牙草紙》。

1. [[13]](#_13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53頁。

1. [[14]](#_14_9) 從陰歷2月12日起，紀年由“文久四年”改為“元治元年”，因為這一年是變革年。大臣推薦的二十四個年號的完整名單見《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84—88頁。其中一個推薦的年號是“明治”。

1. [[15]](#_15_8) 原文見《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20頁；譯文見W. G. Beasley, ed. and trans.,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 pp. 263-264。

1. [[16]](#_16_8) 原文見《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20頁；譯文見W. G. Beasley, ed. and trans.,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 p. 264。

1. [[17]](#_17_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76頁。詳細資料見《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226—230頁，尤其是第230頁。那天木戶孝允來太早，于是暫時去了對馬藩府邸，想之后再來，因此逃過一劫。

1. [[18]](#_18_7) 新選組從一位被他們抓獲并嚴刑拷打的勤王志士古高俊太郎（1829—1864）那里得知了這些計劃。他們還知道了參與者的名單（福地重孝，《孝明天皇》，第182—183頁；遠山茂樹編，《維新の群像》，第55頁）。

1. [[19]](#_19_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37頁。彥根是強大的譜代大名井伊家族的所在地，因此被看做是符合遷宮且能夠保證天皇安全的地方。

1. [[20]](#_20_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77頁。刺客在祗園神社留下一份聲明，解釋刺殺象山的原因，他們說象山宣傳“洋學”，主張“交易開港之說”，協助“奸賊會津、彥根兩藩”，且與中川宮親王一起，密謀遷都彥根（栗原隆一，《斬奸狀》，第247—248頁）。似乎有理由相信，遷都計劃正在醞釀之中。

1. [[21]](#_21_6) 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84頁。這番描述來源于中山忠能的日記，見《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302頁。

1. [[22]](#_22_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78頁。

1. [[23]](#_23_5) 這番描述來源于東坊城任長的日記，轉引自《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305頁。亦見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85頁。

1. [[24]](#_24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79頁。

1. [[25]](#_25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80頁。亦可見《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303頁。

1. [[26]](#_26_4) 蜷川新，《明治天皇》，第21頁。大宅壯一也許是第一個說親王被槍炮聲嚇暈過去的人（《大宅壯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0—32頁）。但是正如飛鳥井雅道所指出的，這個觀點源于對《中山忠能日記》的誤解（《明治大帝》，第97頁）。

1. [[27]](#_27_3) 這是飛鳥井雅道的推測，見《明治大帝》，第98頁。

# 第十章 家茂去世



1864年是災難的一年。禁門之變發生后僅僅兩個星期，一艘由英國、法國、美國和荷蘭組成的艦隊炮擊了下關，報復長州對外國船只的襲擊。英國公使阿禮國爵士提議了這次行動，他已經極不耐煩幕府的拖延政策，認為有必要使用武力。

那年的早些時候，池田長發（1837—1879）率領一支日本使團出訪法國，商討對外國船只關閉橫濱港的問題。幕府并不贊成此事，但仍認為有必要尊重對宮廷做出的承諾。不久池田就知道法國人完全沒有興趣討論這件事。相反，他們要求賠償遇襲的法國船只的損失，并保證他們以后能安全地通過下關海峽。池田深信幕府必須改變基本政策，于1864年6月20日與法國人簽署了條約，[[1]](#_1__Wai_Guo_Ren_Que_Shi_Ou_Er__K)接受了他們的要求，即便他并沒有簽署此類條約的資格。[[2]](#_2__Fa_Wen_Ban_De_Tiao_Yue_Jian)池田還不顧幕府命令，決定不去英國等國家。他認為他們肯定跟法國一樣，不會同意日本向外國船只關閉橫濱港的。

池田意外地早早返回日本，后來，知道簽訂條約的四國駐江戶的代表要求幕府執行條約的各項規定，然而幕府回答說自己不受條約的約束，因為池田違反了委任條款。（他和同事隨后都被調離崗位，并受到處罰。）四國認為幕府又在使用拖延戰術，十分惱火，決定自己來處理這件事。他們不顧幕府的阻止以及和長州通過談判達成和平協議的愿望，派了一支聯合艦隊前往下關。9月5日，聯合艦隊向長州的炮臺開火，經過三天的激戰，外國人登陸并摧毀了長州的防御工事。長州的大名毛利敬親被迫請求停戰并接受聯軍提出的條件：通過下關海峽的外國船只將受到友好對待；不許更換或者重修炮臺；向外國船只供應柴火、淡水、食物和煤炭；支付三百萬美元的賠償金。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平靜無事，直到11月德川家茂決定率領一支遠征軍討伐長州，懲罰長州士兵在京都的不法行為。為了重振幕府的聲威，家茂下令各藩國派兵出征。一些藩國找借口拒絕：他們顯然不愿意幫助幕府。盡管長州被稱為叛徒，但它的勇敢立場受到大家的欽佩，當下關遭聯軍轟炸的消息傳來時，舉國上下都很同情長州。幕府注意到了這種情緒，因此只要求長州道歉并提交一份認過書。毛利敬親同意了這些條件，為表示順從，他獻上了三個主要謀臣的人頭，并答應將按照幕府的要求處置三條實美等逃到長州的公卿。[[3]](#_3__Chi_Tian_Gei_Mu_Fu_Xie_Le_Fe)

這次勝利對幕府來說不算什么，但至少為它提供了一個內政和外交上喘息的機會。宮廷生活至少表面上恢復了原來的平靜，然而隱隱約約的不安依然存在。中山忠能頻繁地夢到睦仁親王，感到很不安，于是派一名家臣到北野天滿宮去為親王祈求平安。忠能的妻子也很擔憂，派人詢問親王的健康。[[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新年（1865年）已經開始，然而如何處理三條實美等逃往長州的公卿的問題則仍在討論。主張將他們流放到九州的人中有一位名叫西鄉隆盛（1828—1877），這是他首次在《明治天皇紀》中露面。[[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2月7日，改年號“元治”為“慶應”，前一個年號被認為是去年秋天發生禁門之變的元兇。

新年號的起用，并未給局勢帶來大的改善。7月14日，德川家茂來到京都。將軍進京在幾年前是格外重要的大事，現在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家茂向天皇匯報說，盡管毛利敬親公開懺悔自己的罪行，但其藩內的攘夷勢力又有不穩的動向，此外，敬親還派人向外國購買大批軍火。家茂稱自己手里有確切的證據證明敬親在秘密和外國人交易，因此，幕府已經決定出兵征伐他。

家茂在正式出兵征伐長州之前先向天皇陳述自己的意圖。這種事情即使在十年前也是無法想象的，那時將軍根本就不會告知天皇自己的政治和軍事計劃。家茂也許將這次談話看成是情況匯報，但孝明卻理解為請求他同意征伐長州。孝明的第一個反應是邀請家茂到常御殿，并親自為將軍斟上一杯清酒，作為友誼和同意家茂計劃的象征。天皇退到內宮后，議奏、武家傳奏等廷臣將家茂拉到一邊，告訴他天皇很滿意他年初完成的修補山陵之功，正考慮賜予他的先祖德川二代將軍秀忠和三代將軍家光 “神號”。家茂竭力拒絕這個榮譽，但被告知這是陛下難得的表示，應該毫不猶豫接受才是。[[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于是，家茂接受了皇上的圣旨。這是天皇與幕府關系變化的又一個例子。

1865年11月16日，由英國、法國、美國和荷蘭派出的九艘軍艦出現在攝津國的海岸。他們派人傳信給幕府，以這些國家的名義要求開放兵庫港，還說天皇[[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已經批準了條約。作為回報，聯軍愿意放棄下關事件賠償金三百萬美元的三分之二。但是，如果幕府不立刻同意這些要求，外國人將會徑直到京都，向宮廷提出同樣的要求。如果宮廷同樣拒絕接受，那么再次見面將會是在“炮煙彈雨”之中。[[8]](#_8__Wai_Guo_Ren_Yi_Zhi_Cheng_Tia)日本有七天的時間考慮。

駐扎在兵庫的老中阿部正外和松前崇廣贊成接受外國人的要求。他們認為沒有時間咨詢宮廷，如果堅持這么做，結果肯定會導致戰爭爆發，外國人的武力將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和無法估計的破壞。天皇得知他們的態度后勃然大怒，立刻令幕府將這兩人革職，并幽禁在家，等候進一步的指示。[[9]](#_9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_2)盡管此前宮廷從未干涉幕府的人事安排，但幕府還是照做了。天皇在命令中并沒有說明這么做的原因，但我們從其他資料了解到德川慶喜為避免開戰而采取的措施。[[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慶喜首先將所有的幕府官員召集到大阪城，詢問他們的意見。跟上次的會議一樣，除了同意外國人的要求，這些人并沒有提出什么新的建議。只有松平康英有不滿之意。覺得有些安心的慶喜讓康英秘密聯系大阪的行政長官井上義斐，讓他下次磋商時告訴外國人，幕府已經決定按要求開放兵庫港，但是，“實際上，我國將軍之上還有天皇。重大事情連將軍都得先獲得天皇許可后才能實施。換言之，兵庫開港這樣的國家大事自然要得到敕許。為了獲得天皇的許可至少需要十天時間”。[[11]](#_11__Yu_Bing_Ku_Wai_Guo_Ren_Zhou)

幕府的坦白令人驚詫。直到這個時候，外國人都以為將軍（大君）就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天皇（帝）只不過是“精神上的統治者”。幕府官員也助長了他們的這種觀點。湯森·哈里斯在日記中寫道：“他們說到天皇時幾乎用輕蔑的口氣，聽到我引用日本人對他的敬稱時哈哈大笑。他們說這個人既沒有錢和政治權力，也沒有其他值得尊重的東西，就是一個傀儡。”[[12]](#_12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

幕府是日本的合法政府，因此將軍就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這種觀點也反映在當時新上任的英國公使哈里·巴夏禮（Harry Parkes）爵士寫給將軍家茂的信中。他稱呼將軍為“陛下”。巴夏禮的要求之一確實是 “天皇批準條約”，[[13]](#_13__Mario_Emilio_Cosenza__ed_Th)但是信中的語氣顯示，巴夏禮認為將軍完全有能力從一個傀儡那里獲得“批準”。

但是，幕府的一名高級官員現在公開承認天皇的級別在將軍之上，兵庫港必須征得他的同意才能開放。面對這個日本權力結構的新發現，外國人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之前的設想。[[14]](#_14__Jian_W__G__Beasley__ed__and)不久之后，英國將公開支持天皇，法國則支持將軍：兩國將他們在歐洲的對立關系延伸到了日本，不過當時四個國家都令人意外地同意延遲十天，等候天皇的批準。他們仍不相信幕府官員的保證，要求出示天皇一定會批準的證明。井上義斐回答說自己拿不出任何證據，但在日本，做出重要承諾時一般都要滴血盟誓。“因此，我將當著你們的面，割破我的手指，按上手印。”說著他拔出匕首，準備割手，這時，嚇得臉色發青的外國人連忙將他止住，說相信他。[[15]](#_15__Zhe_Li_Wo_Shi_Yong_Le_Song)

井上義斐的談判支持了慶喜的決定，使幕府獲得了十天的寬限期以爭取天皇的同意。這件事本身非常困難，但是又有新的問題出現。家茂對宮廷開除兩名幕府官員這事感到非常惱火，認為幕府的權力遭到篡奪。11月21日，他上書天皇，陳述自己“幼弱不才之身，雖蒙征夷之大任”，但上不能“奉安宸襟”，下不能“鎮萬民”，因此希望把將軍之位讓給德川慶喜。他還懇求天皇看在危險的國際形勢份上，迅速同意簽署條約。提交申請的同一天，家茂離開大阪前往江戶。當家茂走到京都南部的伏見時，接到了關白二條齊敬的信，說他的辭職申請不能馬上批復，并斥責他未經許可便返回江戶的行為輕視“天朝”，不合“臣子之做法”。二條要求家茂參加第二天的朝會，親自向天皇解釋辭職的原因。[[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這份書信的訓斥幾乎不能再嚴厲。天皇和將軍誰更強大，已經毫無疑問。家茂改變計劃，住進了京都的二條城。他要求德川慶喜、松平容保等在京都的主要幕府官員到皇宮去，向天皇解釋立刻批準條約的必要性。

慶喜隨后被召入宮，與關白等朝廷官員討論是否批準條約的問題。孝明在竹簾后面聆聽了他們的討論。會議從晚上6點開始，開了一夜，但仍未能達成一致意見。第二天，在慶喜的建議下，大約三十名駐京都的各藩重臣參加了討論。會津藩和土佐藩首先發言，強烈要求開放國土，并譴責閉關鎖國的政策。其他藩國幾乎無一例外地支持天皇批準條約，這對孝明是個巨大的打擊，但宮廷最終決定批準。中川宮親王的一番話尤其打動天皇，他懇求宮廷接受條約，并警告說，如果拒絕，“彼等立開戰端，則……兵庫、京師忽成大火，寶祚之安危難保，伊勢神廟亦成灰燼，此者仿若眼前。”[[17]](#_17__Shi_Jing_Xiao____Mu_Mo__Fei)

即便正享受著五百年來最大的權力，天皇也無法忽視大多數藩國的意愿。不得不批準自己所痛恨的條約一定讓天皇有斷腸之痛，但是，他拒絕兵庫開港，也算保留了一點顏面。[[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許多人聲稱愿意為天皇的事業貢獻自己的生命，但即便是天皇，心里也很清楚裝備極差的日本士兵根本就不是外國人的對手。

盡管家茂宣稱自己是“前往江戶”，但他在關西地區一直滯留到12月20號。在那一個星期前，天皇接見了家茂和其他的幕府高級官員。家茂為自己的無能，特別是最近發生的爭議向天皇深表歉意，但天皇安慰他說，他們將像以前一樣并肩作戰，“治內地，御外辱，充實武備”。[[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1865年余下的時間沒有什么大事發生，而睦仁親王的名字則極少出現在1866年的記錄里。8月，他完成了《孟子》的素讀。這本書花了他一年多的時間，與上一本花了他四年多時間的《論語》相比，已經是很大的進步。天皇夸獎了親王的努力，并鼓勵他繼續保持。

盡管如此，有證據顯示天皇此時最擔心的還是親王的教育問題。他擔心親王受到負責撫養他的宮女的過度影響，特別是她們可能向他灌輸過激的尊王攘夷思想。孝明在寫給賀陽宮親王（中川宮親王的新頭銜）的信中說：“如今神色雖是吾子，然并不親近。視從予之命者為惡人，少許反對者則甚贊美。雖是少兒，亦絕不可輕視。”孝明指責宮女是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并再次透露出退位的意向。[[20]](#_20__Yuan_Shan_Mao_Shu_Bian____W)

大約這個時候，在京都北部隱居的巖倉具視寫信給天皇，表達自己的觀點，同時敦促天皇放棄“酒池肉林”的生活，改為嚴肅地對待政治問題。[[21]](#_21____Zhao_Yan_Qin_Wang_Ri_Ji)

這些零散的證據似乎表明，天皇紀中宮廷平靜生活的記載可能掩蓋了一些不太好的實際情況——親王甚至向父親叫喊著尊王攘夷的口號，而孝明試圖通過沉迷于美酒和女人來忘卻苦惱。

我們還想了解更多關于賀陽宮的活動，他被一位現代歷史學者描繪成一個“狡猾”的人。[[22]](#_22__Shi_Jing_Xiao____Mu_Mo__Fei)1863年9月，由賀陽宮一手策劃的宮廷政變取得成功后，天皇為他賜名朝彥親王并任命他為彈正尹，這個職位具有直接上奏天皇的特權，是只有皇室血統的親王才能擁有的高級職位。[[23]](#_23__Yuan_Shan_Mao_Shu_Bian____W)然而，有個奇怪的謠言流傳開來，說賀陽宮詛咒天皇。據說，1863年夏，親王派人給石清水八幡宮的忍海送去一支箭和一大筆錢，這個僧人是親王的好朋友。忍海買來一只野雞，用箭將其射死。他將野雞擺在祭壇上，詛咒天皇，祈求賀陽宮取代天皇。忍海的陰謀被鳥取藩的一名武士發現了，他殺了忍海，并將野雞從祭壇上移開。

消息傳到了天皇那里，但是他非常信任賀陽宮，認為這是某個“奸人之策”。他宣布自己和親王是“真正之連枝”。[[24]](#_24__1864Nian_1Yue_11Ri__Xiao_Mi)為了表示對親王的信任，天皇增加了親王的薪俸，并為他修建了一座漂亮的新宮。[[25]](#_25__Yuan_Shan_Mao_Shu_Bian____W)

這件事看起來令人難以相信，然而一些宮廷人員卻認為確有其事。不管怎么說，這件事說明宮廷的氣氛非常壓抑，人們相信有邪惡的巫術。它也解釋了那年年尾，天皇和將軍去世時，為什么那么快就出現了毒殺論和陰謀論的謠言。[[26]](#_26__An_Zhao_Quan_Chuan_Xin_De_S)

對于幕府而言，1866年完全是個災難之年。這次的災難并非來自外國人——他們對降低關稅等沒什么爭議的談判結果非常滿意。相反，前年春天幕府宣布準備第二次征討長州，將由將軍親自指揮。得知消息的長州購買現代武器并用西式方法訓練自己的軍隊。但更重要的是，它促使長州和薩摩這兩個一直以來的死對頭結成了盟友。初期的結盟體現在薩摩為長州提供從長崎的歐洲商人那里購買武器的渠道。1866年初，西鄉隆盛就派黑田清隆（1840—1900）到下關去試探長州領導人關于兩藩合作的意愿。[[27]](#_27__Zhe_Xie_Chang_Zhou_Ren_Bao)1866年2月，一直為實現兩藩結盟而奔走的土佐藩士坂本龍馬（1835—1867）和中岡慎太郎（1838—1867）和西鄉見面，探討薩摩和長州之間積極合作的計劃。[[28]](#_28__Guan_Yu_Zhe_Ge_Shi_Qi_De_Ta)他們的戰斗口號已經不再是“攘夷”。“倒幕”、“王政復古”的目標將兩藩緊密團結在一起。3月，在坂本龍馬的協助下，木戶孝允（1833—1877）和西鄉隆盛分別代表長州和薩摩簽署了協議。[[29]](#_29__Guan_Yu_Xie_Yi_De_Liu_Tiao)

1866年7月，幕府的軍隊開始征伐長州。幕軍的士氣非常低迷。幕府本來指望一些藩國派兵加強幕軍的力量，但是他們拒絕出兵，其余的藩國也只派了小分隊參加。而長州的軍隊盡管在人數上并不占優，但卻受過良好的訓練，且裝備精良。甫一交戰，幕府軍便落敗，而這是這次戰爭中幕府連敗的開始。這次戰爭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戰斗使用的是槍炮，而不是刀劍、弓箭。這是日本第一次現代戰爭。

戰斗期間，本來就身體欠佳的德川家茂在大阪病倒。[[30]](#_30__Na_Nian_5Yue_Jia_Mao_Kai_Sh)幾乎與此同時，尚無子嗣的家茂的繼承人問題被提了上來。他自己選擇的是德川慶賴三歲的兒子龜之助。在這個國家危難的時刻，家茂為什么會選一個小孩子做自己的繼承人，非常令人費解。沒有一個人同意他的選擇，甚至包括家茂的妻子親子內親王[[31]](#_31__Yi_Ming_Gong_Nu_De_Ri_Ji_Zh)。最后家茂同意上奏天皇，請求自己死后由德川慶喜繼任將軍，并擔任長州征伐的統帥。[[32]](#_32____Xiao_Ming_Tian_Huang_Ji_1)1866年8月29日，德川家茂在大阪去世，終年二十歲。

9月19日，天皇召集一批資格較老的公卿開會，討論鹿兒島大名提出的建議。那份建議書中稱在“皇國危機存亡之時”，應該停止與長州的敵對狀態，將一切力量用于防御外患。[[33]](#_33__Jian_Yi_Shu_De_Yuan_Wen_Jia)議奏正親町三條實愛強烈支持這么做，其他公卿沒有人發言，但是坐在簾子后面的天皇要求“征長解兵之事暫待”。激動不已的實愛拜受了天皇的話，據記載“血泣痛哭無措”。在知道天皇反對的情況下，實愛還有勇氣堅持自己的信念，這一點很出人意料。即便實美和強大的薩摩藩聯系緊密，但仍難以想象亞洲或者歐洲的其他專制制度會發生這樣的事。[[34]](#_34__Zhe_Shi_Shi_Jing_Xiao_De_Gu)9月12日，公卿再次開會，孝明否決了薩摩藩的提議。[[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幕府一開始隱瞞了家茂已死的消息，但是總要有人擔任討伐長州的總指揮。9月8日，德川慶喜被任命為征長總督。慶喜出發上前線之前，接到了小倉陷落的消息，小倉是幕府在北九州的一個據點。因此，他決定暫時停止與長州的敵對狀態。他將這個決定通知關白，再由關白通知天皇。不出所料，孝明極為不悅，堅持要求慶喜完成使命。9月24日，慶喜覲見天皇，向他解釋了形勢的無望。天皇這才同意停止戰爭。

9月28日，家茂死后一個月，他的死訊正式對外公布，這為第二天結束長州征伐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借口。[[36]](#_36__Sheng_Ming_Zhi_Shi_Shuo_Di)一場不會給任何人帶來榮譽和利益的戰爭就這么結束了，沒有砰砰作響的槍炮聲，而是伴隨著啜泣。然而它永遠改變了日本人對戰爭的看法。

1. [[1]](#_1_10) 外國人確實偶爾（可以追溯到湯森·哈里斯）威脅說要把爭議提交京都，讓天皇解決，但這是他們——或者其他任何人——首次被告知天皇的地位高于將軍。有關早前外國人對天皇重要性的認識，請參考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2, p. 43。然而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寫道：“英國學術界第一次發現了真正的權力源頭，揭露了江戶的假冒政府，看懂了這個世代相傳的謎語，并掀開了其長期遮蓋的面紗。這個人正是英國公使巴夏禮爵士，是他首次為了尋找真相而不顧生命危險：扯去幕府‘陛下’的虛偽頭銜，向英國請求得到國書，并將其遞交給日本的君主——天皇”（The Mikado’"aid-2M0"p. 577）。

1. [[2]](#_2_10) 法文版的條約見W. G. Beasley, ed. and trans.,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 pp. 273-274。條約規定，日本政府必須在日本使團返回日本后三個月內 “支付十萬雷阿爾銀幣，長州藩支付四萬雷阿爾銀幣，共十四萬”給江戶的法國大使。

1. [[3]](#_3_10) 池田給幕府寫了封長信，解釋了自己這么做的原因，池田的信的翻譯見W. G. Beasley, ed. and trans.,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 pp. 274-282。

1. [[4]](#_4_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87頁。

1. [[5]](#_5_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88頁。

1. [[6]](#_6_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95頁。這一條記錄于2月16日。西鄉的名字再次出現是在3月8日，當時他極力主張的恰恰是相反的做法：讓這些公卿回到首都，并恢復他們的官職。他似乎因薩摩大名島津茂久的一項命令而改變了主意。

1. [[7]](#_7_10) 《明治天皇紀》，第407頁。

1. [[8]](#_8_10) 外國人一直稱天皇為“帝”（みかど）而非“天皇”（てんのう），他們認為這個頭銜意味著宗教權威，而不是世俗權威。

1. [[9]](#_9_10) 《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653頁。1865年10月30日英、法、美、荷四國的駐日大使在橫濱簽署了這份外交照會，照會的法文原文見W. G. Beasley, ed. and trans.,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 pp. 293-296。其內容與這里所給的日文版概要有許多小的出入。

1. [[10]](#_10_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16頁。

1. [[11]](#_11_10) 與兵庫外國人周旋的資料見《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654—655頁，這些資料出自越前藩大名松平慶永（1828—1890）在1862—1867年間所做的記錄《続再夢紀事》。

1. [[12]](#_12_10) 《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654頁。

1. [[13]](#_13_10) Mario Emilio Cosenza, ed.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 pp. 371, 518.

1. [[14]](#_14_10) 見W. G. Beasley, ed. and trans.,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 p. 300。這封信的日期是1865年11月21日。

1. [[15]](#_15_9) 這里我使用了松平慶永的描述，引自《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655頁。其中的細節部分與《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的第418頁有出入，例如，后者寫道是巴夏禮看到井上要割手指，于是說相信他。

1. [[16]](#_16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19頁。

1. [[17]](#_17_9) 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91頁。

1. [[18]](#_18_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20頁。關于宮廷給幕府的諭旨譯文，見W. G. Beasley, ed. and trans.,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 p. 304。

1. [[19]](#_19_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21頁。

1. [[20]](#_20_7) 遠山茂樹編，《維新の群像》，第56頁。他的翻譯非常隨意，而且略去了大量事實，但是正因為如此，使得他的譯文比原文更好理解。石井引用了寫于1865年8月29日同一封信中的某些詞語（《幕末の天皇》，第89頁）。這封信并沒有出現在《孝明天皇紀》中，而是出現在《朝彥親王日記》第一卷，第336—337頁。

1. [[21]](#_21_7) 《朝彥親王日記》第一卷，第336—337頁。遠山說巖倉的這番話出自《続叢裏鳴蟲》（《維新の群像》，第57頁），然而書中并沒有。該頁引用中山忠能的日記中“宮殿如游廊，日日歡樂”一節，記錄孝明天皇的側室及妾有二十幾人。

1. [[22]](#_22_6) 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々》，第88頁。

1. [[23]](#_23_6) 遠山茂樹編，《維新の群像》，第51頁；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々》，第77頁。由于這個官職，親王被稱為“尹宮”。

1. [[24]](#_24_5) 1864年1月11日，孝明給中川宮親王去信，信的相關部分見《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940頁。石井引用了的信的部分內容，包括天皇譴責謠言是不法分子試圖推翻9月30日的政變，并說他肯定尹宮能看透他的內心，就像他能看透尹宮的內心一樣（《幕末 非運の人々》，第77頁）。孝明最后說他對親王完全沒有疑心。

1. [[25]](#_25_5) 遠山茂樹編，《維新の群像》，第52頁。

1. [[26]](#_26_5) 按照蜷川新的說法，“明治天皇于慶應3年的1月9日登基。前一年的12月25日明治的父親孝明天皇被巖倉等人暗殺，同年9月20日第十四任將軍家茂在大阪城被某個殺手殺死”（《明治天皇》，第11頁）。

1. [[27]](#_27_4) 這些長州人包括像木戶孝允、高杉晉作、井上馨和伊藤博文這樣的杰出人物（《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29頁）。

1. [[28]](#_28_3) 關于這個時期的談判，見Marius B. Jansen,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 pp. 217-222。

1. [[29]](#_29_3) 關于協議的六條內容，見Marius B. Jansen,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 pp. 220-221。

1. [[30]](#_30_3) 那年5月家茂開始發病，病情幾經反復，并在7月加重。那時家茂在大阪。關于他的病情的詳細描述，請參考Conrad Totman,The Collapse of the Tokugawa Bakufu , p. 516。

1. [[31]](#_31_3) 一名宮女的日記中提到，親子內親王擔心龜之助的年紀太小，無法應付當時的困難局面（《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799頁）。

1. [[32]](#_32_2) 《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798頁。這份給天皇的奏折日期只寫了“七月”，但是其他資料確切地顯示奏折上呈的時間是7月29日。然而，家茂死于7月20日。因此，我們不清楚到底是家茂之前就把奏折寫好了，還是這封奏折是別人代寫的。

1. [[33]](#_33_2) 建議書的原文見《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804—806頁。

1. [[34]](#_34_2) 這是石井孝的觀點，見《幕末 非運の人々》，第95頁。我曾試著想象凱撒·威廉二世耐心地傾聽大臣激烈抨擊他的政策，但發現那太困難了。

1. [[35]](#_35_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42頁.

1. [[36]](#_36_1) 聲明只是說敵對雙方將“暫時”停止進攻（《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832頁）。

# 第十一章 孝明駕崩



德川家茂的死對孝明天皇的打擊很大。他非常喜歡這個朋友，一度相信他們能夠合力實現公武合體的理想。假如天皇能夠忘掉這個理想并接受王政復古的新理想，那他無疑會幸運一些。屆時不僅有大多數公卿的支持，還有武士階層的支持，但他卻拒絕放棄自己的舊理念。令周圍的人惱火抓狂的是，天皇非常固執，然而嚴格說來，他的極度不愿改變只是保守主義者的表現：每一次的讓步都使他感到痛苦和懊悔。在幕府軍隊征討長州失敗之后，天皇處于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地位：一些人試圖使他成為日本無可爭議的統治者，而為了對抗這些人，他使盡了一切辦法。

1866年10月8日，就在德川慶喜宣布中止長州征伐后不久，二十二名公卿向朝廷遞交了一份請愿書，要求覲見天皇。他們說，在這個國家危難的時刻，他們想向天皇表達自己的衷心。這些公卿由中御門經之（1820—1891）和大原重德（1801—1879）領頭，幕后操縱者是巖倉具視。

1862年，巖倉由于涉嫌與幕府合謀將和宮下嫁到江戶去而遭到彈劾，之后便被迫在京都之外過起了隱居生活。然而他是個天生的陰謀家，不用多長時間便和以前的熟人恢復了聯系。經常有人來拜訪他，特別是那些攘夷派，他們給他帶來了最新的消息。[[1]](#_1__Du_Sha_Lun_De_Zhu_Yao_Zhi_Ch)正親町三條實愛在御前會議上反對繼續進行長州征伐，其大膽立場給巖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萌發一個念頭，讓公卿集體向天皇請愿，從而加強自己一方的力量，動搖孝明對幕府一如既往的支持態度。

巖倉強烈支持薩摩藩提出的停止長州征伐的建議。他延續建議書中改造宮廷的觀點，起草了一份創立宮廷內閣的計劃作為公卿提案的草案。計劃主要有三點，首先要求朝廷將二條齊敬等反對派清理出去，包括朝彥親王、德川慶喜和松平容保；接著允許那些暫時被迫隱居的公卿回到朝廷；最后重新任命近衛忠熙為關白。這些（以及其他的）“諫奏”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王政復古。他們想在將軍剛死，幕府內部混亂的狀態下一舉實現這一目的。[[2]](#_2__Da_Jiu_Bao_Li_Qian____Yan_Ca)

作為回應，天皇和關白二條齊敬、朝彥親王等高官一起接見了這些請愿的公卿。大原重德是一名年長的朝臣，他站出來向天皇提出了公卿的集體請求。大原要求按照初步方案，由宮廷迅速召集各藩大名聽取天皇的命令。這種方式將繞過幕府。接著，大原提出的三個要求，和巖倉的并不完全一樣：恢復那些因政治事件而被關押或者判處幽禁的公卿自由；解散征討長州的軍隊；重組朝廷的議事機構。[[3]](#_3__Shi_Jing_Xiao____Mu_Mo__Fei)

大原的話聽起來很刺耳，一方面是因為他是有名的硬漢，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已經六十五歲了，可能覺得自己已經沒什么好失去的了。不管怎么說，這種勇氣在日本宮廷可不多見。

孝明的回應可想而知：“上作色曰：‘汝等所奏之言，只瑣瑣之事。’”他詰問到，集體上書的公卿口中的“國家之大事”指的是什么？前年冬天，發生“條約敕許”問題時才真正是關系“國家之安危”的大事。“汝等若果有憂國之念”，那個時候正該“獻忠言”。然而你們“不知該事可為”，到現在“猝然結黨來迫”，除了是“不敬”還是什么？[[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脾氣溫和的關白向天皇道歉，解釋說，大原是因為“憂國之心至切”才做出這番請愿。除了深深擔憂國家，一個人還有什么理由如此直言呢？二條齊敬最后下結論說，失政之責在他，身為公卿最高位的關白，他本人難辭其咎。[[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對此，大原表示關白并沒有錯，但是當朝彥親王和二條齊敬一樣，為自己未能做好輔弼之任而道歉時，大原卻轉身對他說：“殿下宜負罪引退，以謝天下。”

接著他表示，如果得到關于此事的答復，他會立刻退下。天皇回答說幾天后他將和大原單獨談談。孝明顯然并不打算再舉行一次全體會議。朝彥親王建議留住大原，讓他說出全部的想法，但是天皇說他需要時間來考慮這三條提議。他令進諫的公卿到側房等，和朝彥親王等人商議之后，同意于10月11日召集大名，讓他們和大原見面。凌晨2點，仍在等候答復的二十二名公卿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各自回家了。

或許我們應該看到，巖倉具視是那天發生的事件后面的推手。他認為只要二條齊敬和朝彥親王還在朝廷，王政復古就無法實現。在試圖除去這兩個人時，巖倉利用了大原，但是他仍不得不與天皇抗爭。10月12日，受到公卿彈劾的二條齊敬以生病為由辭職。天皇拒絕接受他的請辭。朝彥親王也表達了辭職的愿望，說自己無法勝任肩負的重任，但是天皇安撫了生氣的親王，并說服他留了下來。這些舉措暫時中止了進一步的行動，因為對二條齊敬和朝彥的任何指控都會被視為對天皇本人的攻擊。

10月15日，二十四位大名收到敕命，要求他們參加有天皇出席的國事討論。到了11月，只有三位大名（加上另外兩位的嗣子）來到京都，其他人都以身體不適為由缺席了會議。鑒于大家的熱情如此之低，這次會議并無下文。

11月25日，天皇發布了處罰中御門經之、大原重德和請愿的其他二十二名公卿的敕令，譴責他們犯了欺君之罪。中御門和大原被要求在家禁閉，其他人則被勒令不準上朝。正親町三條實愛由于有協助那些遭禁閉的公卿的嫌疑，同樣被要求在家禁閉。天皇希望通過這些方法，扼殺那些反對自己政策的公卿。

1867年1月10日，天皇授予德川慶喜“攘夷大將軍”的稱號，以表示自己依然堅定地支持公武合體的理念。這是他在位時頒布的最后幾個法令之一。一個星期后的1月16日，天皇連日不舒服，但還是在內殿觀看了神樂舞蹈的表演。太醫診斷是感冒，雖然建議不要參加，但天皇仍抱病參加儀式，然而表演結束之前，天皇感到極為難受，提前離場。此后他的病情加重。兩天后，天皇發高燒并臥床不起。1月20日，太醫宣布天皇得了天花。經過調查，發現一個名為藤丸的侍從曾經得過天花，但是經過長時間的治療已經康復。1月15日，藤丸又開始在宮里露面，人們懷疑天皇是被他傳染。[[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根據天皇的兒時的朋友、朝臣東久世通禧的說法，孝明的身體一向健康強壯，從未生過病。[[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也許在那些熟悉孝明的人看來，他不太可能生病。直到今天，學者們仍然意見分歧，一些人認為孝明死于天花，一些人認為他死于中毒。沒有人懷疑他得了天花這個事實，然而奇怪的是，源頭竟是一個已經康復且被認為不再具有傳染力的男孩。而且宮里只有天皇一人染上這種病，而是他和藤丸只有偶爾的接觸。關于只活了三十六歲的天皇的死因，坊間流傳著幾種神秘的說法。

從那些服侍過他的人，包括睦仁親王的外祖父中山忠能和母親中山慶子所寫的信件和日記中，我們可以追蹤孝明染病的經過。天皇在觀看神樂表演時首次病倒，第二天就發起高燒，并開始出現神志昏迷、失眠、食欲不振。1月20日，天皇手上開始出現斑點，第二天斑點蔓延到臉上。太醫診斷為天花，這個結果得到了十五名醫生的簽名認可。[[8]](#_8__Dong_Jiu_Shi_Tong_Xi____Zhu)天皇的病情變化正常，有幾天他只能喝幾口熱水，但是之后情況明顯好轉，他一天天地好起來。1月24日的官方記錄里寫天皇得的是極輕的天花。[[9]](#_9__Yuan_Kou_Qing____Xiao_Ming_T)看起來他快要完全康復，情況可喜，而受命為他誦了十七天經的湛海和尚也被允許回到寺里。[[10]](#_10____Zhong_Shan_Zhong_Neng_Ri)

27日，為了慶祝天皇康復，宮內甚至計劃舉辦一個宴會，然而1月30日天皇的病情突然惡化，出現嚴重的嘔吐和腹瀉。各種記錄都提到那天孝明臉上出現了紫色的斑點，而且“九孔”流血。不久他就在極度痛苦中咽氣。[[11]](#_11__Zhan_Hai_De_Ri_Ji_Xie_Dao)

到這時為止，所有的記錄都保持一致，但他的死亡被隱瞞了幾天，而且就在他看似已經脫離了危險時，病情卻出人意料地急轉直下，不久就有謠言說他死于砒霜中毒。這些謠言一直存在，并使人們煞費苦心地研究死于中毒和死于天花的癥狀有何不同。從1月31日起，官方記錄中有關他的病情的記錄便一片空白，一些學者猜測有人故意抹去了相關的事實。即使在當時，宮里也有人懷疑太醫的診斷過于樂觀。公卿山科言成在日記中寫道，他聽說天皇1月24日那天遭受了極大的痛苦，病情已經擴展到身體的其他部位，盡管官方宣布他的情況正在好轉。[[12]](#_12__Yuan_Kou_Qing____Xiao_Ming)

天花在當時的日本并不少見，但是那種特別嚴重的、幾乎致命的類型（名為出血膿包天花或者出血性天花）[[13]](#_13__Yuan_Kou_Qing____Xiao_Ming)要罕見得多。而且，那種最危險的天花和砒霜中毒的癥狀很相似，這促使一些學者一步步地追查孝明的發病過程（根據當時的文件記錄）與砒霜中毒癥狀（根據醫書中的記錄）之間的相似之處。即使在首次可以自由討論這類問題的1945年之前，已經有學者認為孝明是被毒殺的。[[14]](#_14__Yuan_Kou_Lun_Shu_Le_Ji_Tian)這種謠言可以追溯到歐內斯特·薩道義（Ernest Satow）爵士，他在大部分寫于1885—1887年之間的《明治維新親歷記》（A Diplomat in Japan）一書中回憶道，1867年2月——孝明死后沒有多少天——在兵庫港，

我遇到了幾名當地的商人，他們對港口即將開放有著濃厚的興趣，并討論了適合建立外國人居住區的幾處地點。他們還告訴我剛剛公布的皇帝駕崩的消息。坊間說他死于天花，但是幾年后，一名熟知內幕消息的人鄭重地告訴我皇帝是被毒死的。天皇堅決反對向外國人做出任何讓步，一些人預見到幕府垮臺后宮廷將不得不與西方列強直接聯系，于是除掉了這個攔路虎。如果皇帝過于保守，一切都將變得非常困難，很可能會導致戰爭。在東方國家，人們經常將重要人物的死歸咎于毒藥，上一任將軍據說就是被一橋慶喜[[15]](#_15__Ji_De_Chuan_Qing_Xi___Qing)的門徒干掉的。關于天皇，我當時確實沒有聽到任何這類的謠言。他離開了政治舞臺，留下一名十五六歲的男孩作為繼任者，我們無法否認，他死得恰是時候。[[16]](#_16__Sir_Ernest_Satow_A_Diplomat)

薩道義的文章清楚地表明為什么這么多年來學者會被這種學說所吸引：人們認為在一個如此保守的君主統治之下，某個人或某些人對國家的進展感到絕望，于是決定毒死孝明。顯然，正如薩道義所說的，如果孝明繼續礙手礙腳，對那些試圖推翻幕府并在日本建立新政府的人來說，他們的行動將會面臨更大的困難，甚至可能無法實現。他的繼任者，一個十五歲大的男孩，則是另外一回事。一些明治維新的領導者認為他是塊“寶玉”，即讓他們的革命計劃得以實現的寶。學者們認真考慮過這個事實之后，覺得天皇在年富力強的時候突然死去真是太巧合了，很難讓人不懷疑他的死因。對他們來說，這不可能是個偶然事件。

但如果孝明是被毒死的，那么問題在于是誰干的，又是怎么做到的？禰津正志是最直言不諱地支持謀殺論的學者，他認為是那些收了幕府賄賂并促成和宮下嫁的公卿下的毒，包括關白九條尚忠、內大臣久我建通、巖倉具視和千種有文。[[17]](#_17__Ni_Jin_Zheng_Zhi____Xiao_Mi)這些人教唆一名宮女下了毒。

巖倉具視被認為是最可能的下毒者。有一種說法是巖倉知道孝明在斟酌字句時有舔毛筆的習慣，于是在天皇發病前一天，把兩支將呈給天皇的新毛筆都涂上毒藥。[[18]](#_18__Da_Zhai_Zhuang_Yi_Zai___Da)但是這個說法和天皇發病過程中的其他細節相抵觸。假如他的病起源于效果直接而可怕的毒藥，那么他不會慢慢地出現天花的癥狀，也不會在幾天后病情似乎出現了轉機。這個說法顯然難以成立。

更為普遍的一種說法認為是巖倉的妹妹堀河紀子下的毒，但她在1863年就已經出家，再也沒有回到宮中，因此不太可能有機會進入孝明的病房。還有其他一些宮女也被認為是兇手，但是目前還不清楚為什么只有女人可以給他下毒。[[19]](#_19__Shi_Jing_Xie_Xia_Le_Liang_W)

巖倉是下毒的幕后黑手的猜想無疑源于他陰謀家的名聲，[[20]](#_20__Wan_Gu_Cai_Yi_Fei_Chang_You)然而除此之外，并沒有證據顯示是他策劃了這次謀殺或者孝明的死對他極有利。實際上，他自信能操縱天皇，但同時認為天皇是至高的權威，是宮廷改革絕對關鍵的人物。據說巖倉在聽到孝明的死訊時，第一個想法就是：“吾事已終！”并打算遁世隱居。[[21]](#_21__Da_Jiu_Bao_Li_Qian____Yan_C)

原口清是“病死說”的主要支持者，他努力想證明孝明這個時候死去對巖倉沒有好處。[[22]](#_22__Yuan_Kou_Qing____Xiao_Ming)原口認真檢查了當時的文件記錄（其中一些被謀殺論者用到）中所有有關孝明發病的癥狀，并與1946年名古屋天花大流行（將近一萬八千人受到感染）時觀察到的癥狀相比較。[[23]](#_23__Yuan_Kou_Qing____Xiao_Ming)他的結論是孝明死于疾病。因此，沒有人下毒，也沒有人策劃這起事件。除非當局批準我們檢查孝明的骸骨是否殘留有砒霜，否則我們不可能知道真相。

天皇發病的初期，睦仁親王每天都陪在父親的病榻旁，也許是為了讓父親開心，他身穿鮮艷的衣服。但是當醫生認為病源是天花時，孝明害怕傳染，下令親王在他康復前不要到病房來。不過，事實上睦仁接種過天花疫苗。很多年前，當親王還住在外祖父家時，中山忠能就讓荷蘭醫館的醫生給他接種。天皇在病榻上聽到這個消息時，覺得無需擔心傳染睦仁，松了一口氣。當然，孝明本人是拒絕打疫苗的。[[24]](#_24__19Shi_Ji_30Nian_Dai__Wei_Yu)

也許因為孝明死得太突然，宮廷還沒準備好葬禮，因此封鎖天皇的死訊幾天。這段時間，悲痛的睦仁親王既不能悼念，也不能登基。踐祚儀式有必要迅速完成，然而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卻突然冒了出來：親王還沒有加元服，因此不知道他在踐祚儀式上應該穿什么衣服。一名官員受命尋找先例，結果發現1779年登基的光格天皇踐祚時穿著孩童的服飾。因此，踐祚時睦仁梳著總角，穿著兒童樣式的衣服。

父親的突然去世對親王肯定是個沉重打擊，他的日常生活立刻發生了變化。他的服飾、食物，甚至連睡覺的地方都發生了變化，心里肯定感到不安。2月4日，天皇駕崩的消息終于公布，國家進入大喪。第二天，天皇的遺體入殮，親王最后一次向父親告別。

廷臣們認為葬禮應該符合古儀，命精通此事的戶田忠至研究古時的葬禮。他匯報說，從中世開始，天皇的葬禮慣用火葬，山陵也只是在埋葬骨灰的地方立一個小石塔。然而，1654年后光明天皇駕崩時，舉辦了盛大的葬禮，名義上采取火葬的禮儀，但實際上進行了土葬。大家于是決定孝明也進行土葬，并且安葬在京都的泉涌寺里。[[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新天皇的踐祚儀式在1867年2月13日舉行。儀式出人意料地簡單。下午4點天皇走出來，在紫宸殿的指定地方坐下。兩名宮女已經將標志王權的劍和玉（草薙劍[[26]](#_26__Ci_Wei_Cao_Ti_Jian_De__Xing)、八尺瓊勾玉）放在天皇座椅的右邊。天皇命令前關白擔任攝政，代自己行使職權。接著天皇退到內宮。攝政命人宣讀天皇詔書，其中稱公卿的權利與前朝相比并沒有什么變化。將軍家定的遺孀和德川慶喜的妻子都送上了賀禮，仍然在為丈夫家茂服喪的親子內親王的賀禮延后。

也許儀式上最高興的人要數中山忠能了。他跟大約八百五十年前的藤原道長一樣，為自己成為天皇的外祖父而開心不已。孝明天皇的死固然令其悲傷，但是可能開心的心情更強。他寫了首和歌送給女兒中山慶子，以表達自己的心情：

悲痛，然而

在傷心之中

也有快樂

快樂源于

今天發生之事

年輕的天皇寫了四十多首哀悼父親的和歌，其中有三首提到天皇肩負的重任。他將短歌展示給中山忠能看，后者感動得老淚縱橫。[[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不幸的是這些短歌都遺失了。但是從這時開始直到生命結束，詩歌幾乎是明治天皇宣泄個人感情的唯一途徑。

1. [[1]](#_1_11) 毒殺論的主要支持者禰津正志有些聳人聽聞地說，“在戰敗之前，任何人只要輕微地表示懷疑官方的信息（即孝明天皇是自然死亡），就會被視為大不敬，或者受到法律的制裁，被投入監獄。沒有一個學者想到要調查這件事。沒有一個日本人寫文章公開說孝明天皇是被毒死的，但薩道義在《明治維新親歷記》（"aid-2U9"）則說那是謠言”（《孝明天皇は毒殺されたのか》，第28頁）。禰津親口說，1940年7月，在日本醫學史協會關西支部大會的一次會議上，佐伯理一郎博士在仔細看過尹良子元義手中的御醫日記之后，得出結論說，直到1月22日或者23日孝明的天花發展一直正常，之后可能是巖倉具視利用天皇生病的機會，讓他時任宮女的侄女下毒。佐伯博士說這些事情是他親耳聽涉事宮女所說，這名宮女隨后在京都東部鹿谷的靈鑒寺出家做了尼姑（禰津正志，《孝明天皇は病死か毒殺か》，第34—35頁）。問題是，事實上出家的這名宮女是巖倉的妹妹，而不是侄女。支持毒殺論的石井認為巖倉的妹妹崛河紀子當時并未在宮中當值，因此不可能是她直接下藥的（《幕末 非運の人々》，第114頁）。 我還想起曾聽我的老師角田柳作博士說起，大約1910年的時候，在檀香山的一個酒吧里，一名鄰座告訴他自己參加了暗殺孝明的行動，因此無法在日本待下去。這個消息可能很有力，假如我能確定以下三點：（1）在聽了角田教授講的故事四十年后，我的記憶沒有發生偏差；（2）角田教授在四十年后回憶那場發生在檀香山的對話時沒有發生偏差；（3）酒吧里的那個人當時沒有喝醉。

1. [[2]](#_2_11) 大久保利謙，《巖倉具視》，第138頁。

1. [[3]](#_3_11) 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97—98頁。

1. [[4]](#_4_1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45頁。

1. [[5]](#_5_1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45頁。

1. [[6]](#_6_1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45頁。

1. [[7]](#_7_1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 第454頁；資料見《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916頁。

1. [[8]](#_8_11) 東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41—42頁。中山忠能的日記中提到天皇的身體強壯，從未感冒，轉引自《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927頁。

1. [[9]](#_9_11) 原口清，《孝明天皇は毒殺されたのか》，《日本近代の虛像と実像Ⅰ》，第48頁。亦見《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918頁。

1. [[10]](#_10_11) 《中山忠能日記》第三卷，第652頁。

1. [[11]](#_11_11) 湛海的日記寫道，“天皇恢復良好”（禰津正志，《孝明天皇は病死か毒殺か》，第33頁）。

1. [[12]](#_12_11) 原口清，《孝明天皇は毒殺されたのか》，第49頁。官方的說法是孝明死于12月29日，實際上他死于25日。自17世紀以來，天皇死亡的“官方”日期通常要比他們實際死亡的日期晚，這也許是為了給準備喪事提供更多的時間。1867年10月，悼念孝明天皇的日子被定在他實際死亡的那一天（《明治天皇》第一卷，第816頁）。

1. [[13]](#_13_11) 原口清，《孝明天皇は毒殺されたのか》，《日本近代の虛像と実像Ⅰ》，第57頁。

1. [[14]](#_14_11) 原口論述了吉田常吉1949年首次發表的文章，并堅持認為孝明死于天花，見《孝明天皇は毒殺されたのか》，《日本近代の虛像と実像Ⅰ》第49—50頁。

1. [[15]](#_15_10) 即德川慶喜。慶喜小的時候曾過繼給一橋家。——編注

1. [[16]](#_16_10) Sir Ernest Satow,A Diplomat in Japan ，pp. 185—186.

1. [[17]](#_17_10) 禰津正志，《孝明天皇は病死か毒殺か》，第35頁。

1. [[18]](#_18_9) 大宅壯一在《大宅壯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94頁中提到了這種猜測。

1. [[19]](#_19_9) 石井寫下了兩位宮女的名字（高野房子和中御門良子），在他看來這兩個人并非毫無嫌疑（《幕末 非運の人々》，第113頁）。他還說罪犯可能是一名宮女，盡管幕后肯定有一名策劃者，然而他并未做進一步的說明。但是，佐佐木克暗示可能是大久保利通下的毒手，他與被流放到巖倉村而無法自由行動的巖倉串通一氣（《戊辰戦爭》，第9頁）。不管怎么說，佐佐木相信有人在背后策劃了這場暗殺。然而，當十三年后他的書再版時（1990年），他卻寫道，自己已經被原口的文章說服了，認為孝明死于天花。

1. [[20]](#_20_8) 丸谷才一非常有趣地想象了1887年4月26日明治天皇觀看的一場歌舞伎表演（《青い雨傘》，第273—74頁）。加演的劇目包括《哈姆雷特》里面的戲中戲，這場戲不僅當著天皇的面，而且還當著巖倉具視的面表演，當后者的罪行上演時——像克勞迪亞斯（Claudius）那樣毒殺天皇——明治將伺機觀察這個有罪的人的反應。但是丸谷心里很清楚，巖倉1883年就死了。

1. [[21]](#_21_8) 大久保利謙，《巖倉具視》，第181—82頁。關于巖倉聽到孝明生病且死亡的消息時的悲痛心情，見《巖倉公実記》上，第1135—1136頁。

1. [[22]](#_22_7) 原口清，《孝明天皇と巖倉具視》。

1. [[23]](#_23_7) 原口清，《孝明天皇の死因について》，《明治維新史學會報》第15號，第2—3頁。

1. [[24]](#_24_6) 19世紀30年代，位于長崎的荷蘭貿易站的醫生就已經將接種疫苗的技術傳到日本。到了這個時候，這項技術已經在上流社會廣為傳播。

1. [[25]](#_25_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59—460頁。

1. [[26]](#_26_6) 此為草薙劍的“形代”，即代替物。一般認為草薙劍供奉在熱田神宮，八咫鏡供奉在伊勢神宮，而八尺瓊勾玉和前述兩神器的代替物供奉在皇宮。——編注

1. [[27]](#_27_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70頁。

# 第十二章 美子皇后



1867年的新年伊始，明治天皇并不快樂。宮廷正處于服喪期，平常的新年慶祝活動都取消了。不消說，年輕的天皇對父親孝明天皇之死深感悲痛。我們不清楚他們父子心意相通到什么程度，但他們經常見面：每天下午去給父親請安并請求他給自己的詩歌指正已是明治多年的習慣。親王沒有理由預料到年僅三十六歲的父親會突然死去，而他所受的傳統模式教育也沒有給他恰當的準備，使他可以勝任天皇之職，尤其是在這個艱難的時刻。也許由于感受到壓力，這段時間他經常做噩夢。廷臣們的書信和日記婉轉地提到天皇遭受著失眠之苦。朝臣千種有文寫信給巖倉具視說：“一夜復一夜，總有東西到新天皇的枕邊威脅他，使他大為苦惱。昨天，正如我跟你說的，天皇下令為自己祈禱。謠言似乎是真的。”[[1]](#_1__Zhai_Zi_Yi_Feng_Xie_Yu_1867N)

朝彥親王也在2月9日的日記里提到夢魘：

近日有奇異之事。大行天皇（孝明天皇）側近之人所言。有異物現身，其形即俗稱鐘馗，身佩寶劍。后一日晨，天皇有發燒狀。[[2]](#_2____Zhao_Yan_Qin_Wang_Ri_Ji)[[3]](#_3__Zhong_Kui_Shi_Yi_Ge_Mian_Mu)

2月15日朝彥親王在日記中寫道：

妙染院歸京，聽聞諸多故事。其間，新帝因前日奇異之事，風寒加重。踐祚以來，先帝晝夜現新帝前，極困擾。[[4]](#_4____Zhao_Yan_Qin_Wang_Ri_Ji)

即便我們相信，像《哈姆雷特》里的那樣，逝去之人的魂魄有可能返回俗世，告訴唯一的兒子自己是被謀殺，并要求兒子替自己報仇，那么我們只能說這個鬼魂跟哈姆雷特的父親相比實在太差勁了。鬼魂讓小天皇一直睡不著，然而卻沒有喚醒他，使他為非正常死亡的父親報仇，就連那些可能對父親下毒的宮里人，他也沒有（從他接下來的行動可以看出）變得不信任。

新朝伊始，鬼魂也許是困擾年輕天皇的主要原因，然而其他廷臣都忙于處理前朝遺留的事情，并沒有心思為這事煩惱。眼下一個緊要的問題便是革除后宮，即大奧弊風。中山忠能寫信給內大臣近衛忠房，強調從嚴治理后宮的必要性，批評孝明朝后期宮廷女官管理不善，紀律松弛。

如果我們能相信忠能的話，那么當時后宮如“游廊”，即煙花巷。[[5]](#_5__Yuan_Shan_Mao_Shu_Bian____We)忠能認為，天皇年紀尚小，對后宮尚不是很感興趣，這為清除違律和恢復宮廷傳統提供了特殊的機會。大典侍（忠能的祖母中山績子）的身體非常虛弱，應該馬上將她替換。那些服侍過已故天皇的典侍，應該根據服侍的年限，賜給她們大量的賞錢，讓她們退休。鼓勵那些仍然很年輕的侍女——二十出頭或者更年輕——嫁到合適的人家。對于二十四五歲以上的宮女，則應該根據其意愿允許其留任或出家。忠能的女兒中山慶子一開始說想出家，用余生為孝明天皇的安息祈禱，但是她被說服并“殘留塵世”，因為孝明死后，如果太多服侍過他的宮女都出家，恐怕熟悉禮儀的宮女人數將會不足。慶子猶豫著同意，后來把自己的全副身心都用在了兒子，即新天皇的教育上。[[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2月19日，為悼念剛剛去世的天皇，并慶祝新天皇繼位，宮廷宣布大赦。在1863年和1864年的事件中蒙羞的七名公卿都得到了原諒，并獲得上朝的權利。十天之后，包括熾仁親王在內的四名正軟禁在家的攘夷派公卿也被赦免了。

2月23日，朝廷下令幕府解散征討長州的軍隊。諸藩組成的軍隊被一個藩國打敗，清楚地表明了幕府的衰弱。幕府軍隊士氣本就低沉，將軍家茂的死又進一步削弱了人們對幕府事業的熱情。看不到一絲取勝的希望，幕府最終以天皇剛剛去世為由，下令部隊回到原來的統帥處，以避免自己臉上無光。[[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3月5日，孝明天皇在京都泉涌寺的皇家陵園下葬。遵照他的遺囑，天皇死后的那些傳統葬儀——舉國服喪、雇職業哭喪人等等——都沒有舉辦，但執行了防止城內發生騷亂的警戒令，并在一年之內禁止舉辦慶祝活動和穿戴貴重的服飾。[[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明治無法離開宮殿護送孝明的棺槨到墓地去，只好目送著葬禮隊伍走出了月華門。

3月初，天皇的日常生活首次發生了變化。3月7日，他搬到倚廬殿居住，這是一座在御學問所里臨時搭建的簡單屋子。天皇穿著麻布做的孝服，周圍只放一些簡陋的生活用品，祈禱剛剛去世的父親得到安寧。兩個星期后，天皇脫下孝服，沐浴凈身，然后回到主殿居住。第二天，各官員覲見新天皇并送上禮物。新的王朝開始了。

3月21日，宮內確定前天皇的謚號為“孝明”，這兩個字源自《孝經》。[[9]](#_9__Xiang_Si_Qu_De_Tian_Huang_Zh)但是此時年號卻并未隨著王朝的更替而改變。孝明繼位之后，“弘化”這一年號延續了大約一年，人們遵照孝明在位時的做法，直到1868年10月23日才變更年號，這時孝明已經駕崩將近兩年。此后日本確立了每位天皇只用一個年號的制度。[[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新王朝成立之初，無疑是外國列強極為關心的一件事。法國政府繼續支持幕府，認為它會參加權力爭奪。3月29日，將軍德川慶喜在大阪城會見了法國主權公使萊昂·羅斯（Leon Roches），征求他對幕府改革的意見。羅斯警告幕府不要試圖撕毀已簽訂的條約。他說，各藩國以幕府不想真正開國為由，已經各自與英國進行談判，開放自己控制的港口。法國考慮到幕府的利益，認為有必要開放下關和鹿兒島，代替兵庫和新澙（這個問題已經討論了很久）。開放這些港口能顯示幕府的誠意，同時又能搶在薩摩藩和長州藩之前。羅斯還竭力主張將軍對新天皇進行教育和指導，而且在對待各大名時持強硬態度。他承諾法國會支持幕府。有了這個保證，幕府將能堅定無畏地執行它之前所宣布的開國政策。羅斯的建議給慶喜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慶喜經常把羅斯召來磋商問題。[[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4月11日，將軍問九個主要藩國是否應該開放兵庫港。將軍強烈要求大家支持他的行動，他說自己很清楚已故天皇斷然反對開放這個港口，但是，一旦已經承諾將開放兵庫，要改變已經與外國簽下的和約并不容易。在收到九藩的回復之前，他已經請求朝廷的批準。他說，自從孝明拒絕同意以來局勢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不僅發生了征討長州和前將軍去世，而且外國人在要求日本兌現條約的承諾時也理直氣壯得多。日本沒有選擇，只有同意。較之被動地默許，日本應該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局勢。在“四海同胞一視同仁”這句古老格言的指導下，新王朝建立伊始必須啟動國家的重建。這樣一洗過去之陋習，數年之內國家將變得繁榮富強。帝國的光輝將澤被四海，天皇也會變得安心。[[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各藩之間異論頻出，幕府并不能確定開國政策能否贏得諸侯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宮廷也沒有被慶喜的理由說動。宮廷給他的答復是，鑒于前天皇的反對，兵庫不可開港。換句話說，新天皇不想對父親的愿望表示不敬。他要求將軍再考慮一下。[[13]](#_13__Yuan_Wen_Jian_Duo_Tian_Hao)

然而慶喜卻不想放棄自己的計劃。4月29日，他又遞交了一份奏折，請求朝廷批準。他為自己被拒絕之后依然堅持己見表示抱歉，并說自己完全知道臣子應該聽從前天皇的英明決策。但是在影響國家命運的緊急形勢之前，自己無法保持沉默。他知道贊同遵守條約，將可能惹朝廷生氣，但他仍然要求宮廷看在國家安全和聲威的份上，重新考慮一下反對兵庫開港的決定。宮廷再次拒絕，并進一步要求幕府承諾遵守此命令。[[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然而，即使是宮廷也無法無限期地無視列強的威脅。7月24日，攝政二條齊敬寫信給慶喜，說鑒于將軍等重要人物的意見，宮廷別無選擇，只好同意開放兵庫港。[[15]](#_15__Yuan_Wen_Jian___Yan_Cang_Go)

年輕的天皇很可能與宮廷的這一決策無關。事實上，我們不清楚是否曾有人告訴他這些方針政策。一件稀有的記載，反映天皇這個時期的教育情況：中山忠能在日記中提到向天皇講述了《禁秘抄》（一本13世紀研究宮廷禮儀的書）和《通俗三國志》（17世紀的日譯本）。[[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這兩套書是天皇傳統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卻難以為他提供這時所需的知識。忠能顯然不認為天皇的政治地位提升，就有必要接受一種不同的教育。也許他希望明治跟他父親不一樣，能將自己的興趣（就跟德川時代早期的天皇一樣）局限于詩歌、禮儀和古典文學。

尊王派自稱非常尊敬天皇，但他們的忠誠通常只表現為反對將軍，并不清楚幕府垮臺后國家能獲得什么好處。這些人極少考慮王政復古后天皇將扮演什么角色。當然，沒有人希望天皇變成一個將自己的意愿強加在人民頭上的絕對獨裁者。也許忠能和天皇周圍的其他人希望建立的體制是，在天皇曖昧的支持下，由公卿代替幕府來統治國家。

盡管羅斯建議特別留意年輕天皇的教育問題，但似乎沒有人把他的話放在心上。明治的母親中山慶子繼續監督他學習書法和和歌，由幟仁親王和熾仁親王指導。[[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過了一年多，在木戶孝允首次過問天皇的教育之后，人們才開始考慮現代君主在學問素養上應該做何準備這個問題。

即使在長州征伐失敗之后，幕府仍是實際上唯一的中央政府。宮廷能做的最多就是拒絕幕府提出的，特別是有關外國事務的計劃；但宮廷自己并沒有提出什么計劃。幕府在與外國人打交道方面當然要比宮廷有經驗得多，但它現在卻面臨自閉關鎖國以來從未遇到過的問題。

為解決與俄羅斯之間關于如何處置薩哈林島的爭端，幕府派兩名官員到圣彼得堡去和俄國人談判。當時島上居住著日本人和俄國人，兩國居民之間的爭端從未間斷。日本提議以北緯五十度將薩哈林島一分為二；俄國人要求占有整個島嶼，但是同意放棄擇捉島和其他三個小島。談判陷入僵局，不過，1867年的3月18日，兩國最終簽署了一份臨時協議，約定雙方均可使用該島，但要求兩國人民真誠友好地相處。這是一個兩國的定居者都不滿意且不太可能實現的條約，但卻標志著日本外交史上邁出了重要一步：這是日本使團首次出國談判。[[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慶喜竭力與在日本居住的外國外交官搞好關系。他首先接見英國全權公使哈里·巴夏禮爵士，并在大阪城觀看了英國騎兵展示的馬術。隨后他正式宴請了對方，以表示自己的友好之情。接下來的幾天慶喜會見了法國、荷蘭和美國的代表。慶喜對他們極為殷勤，同時以個人名義擔保，將忠實地執行條約。[[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去年，朝鮮發生殺害一名法國傳教士和幾名美國水手的事情，外交局勢變得緊張起來。一些日本人主張與朝鮮結盟驅趕外國人，但幕府反而派使節到朝鮮去勸說朝鮮人，說與外國人開戰對朝鮮非常不利，幕府愿意作為中間人調節雙方的爭端。三名老中聯名寫信慫恿美國公使，建議假如朝鮮悔過自新并同意和解的話，美國應該積極響應。[[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與外國切斷聯系達兩百年之久的日本，居然能夠向另一個國家提供國家之間交往的建議，著實令人驚訝。也許日本擔心一旦朝鮮被西方列強占領，將會對自己非常不利。日本的調停起了效果：1867年年尾，美國感謝日本幫助避免了一場戰爭。[[21]](#_21__12Yue_17Ri__Mei_Guo_Zhu_Jie)

這段時間，年輕天皇的心思也許被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占據著，那就是他的新娘來了。7月27日，權大納言、左近衛府將軍一條實良的妹妹美子[[22]](#_22__Zhe_Ge_Shi_Hou_Ta_De_Ming_Z)進宮，天皇在御學問所接見了她。這次來訪的目的是為了使天皇看一下美子的容貌舉止。如果天皇不喜歡，可以拒絕這門親事，但他可能早就傾心于美子，因為她的出身和教養都非常好。美子的父親是已故的左大臣一條忠香，母親是伏見宮邦家親王的女兒。她的血統無可挑剔，在學養和藝術上的造詣同樣令人欽佩。美子還是小孩子（三歲或者四歲）時就能夠朗誦《古今和歌集》中的詩歌，五歲就能自己創作短歌。七歲在儒家學者貫名正祈的指導下完成了一本中國典籍的素讀，同時還跟正祈學習書法。十二歲時她開始學習箏，不久開始學習笙。美子很喜歡能樂，會在學習的間隙唱上幾段。[[23]](#_23__Dong_Kou_You_Shou____Zhao_X)她還向當時的大師學習茶道和花道。美子從未生過什么大病，八歲時就打了天花疫苗。[[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這些（以及其他的）條件使美子成為廷臣眼中年輕天皇的理想新娘。除了一個小問題：她的年紀比天皇大。這并不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靈元天皇、櫻町天皇和仁孝天皇的皇后年紀都比他們大。不過美子比明治大了三歲，這個差別通常被認為不太吉利，應該避免締結這樣的親事。攝政將美子的出生年份從1849年改到了1850年，這樣一來問題就解決了。[[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在天皇接見她之前的一切準備都就緒了。

那天美子穿了一件白色的繡花紡綢和服和深紫色褲子。大約下午1點，她在侍女的陪伴下，坐著柳條轎來了。在御學問所里，美子和天皇互相致意，吃了些點心和清酒。美子送給天皇一盒鮮魚等禮物。大約7點左右美子退下，來到皇太后的宮殿，她在這里又吃了些點心。美子換過衣服，向天皇告別。天皇送給美子許多禮物，包括煙斗、裝飾用的發卡和一個香盒。事后天皇高度稱贊美子的舉止大方得體。權大納言柳原光愛很高興天皇的首肯，他問高級廷臣們是否同意將美子定為女御。[[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沒有人反對，因此封她為皇后的所有障礙都清除了。

兩天后的7月29日，武家傳奏日野資宗作為天皇的敕使來到一條實良家，通知他的妹妹已被選為皇后。消息很快傳開，一條家來了無數客人。幕府捐了一萬五千兩銀子作為婚禮和其他的費用，并宣布從今以后每年將向美子提供五百袋大米的薪俸。但是，由于次年的政治變故，幕府無法顧及婚禮，只兌現了承諾的一小部分。其他藩也送來了禮金，但是所有加在一起，只夠辦一個簡單的婚禮。

即使明治未來的皇后已經確定，也無法立刻舉行婚禮。他要為父親孝明戴滿一年的孝。而且，他尚未加元服（進入成年的標志），這件事也必須在婚禮前操辦，并且也只有等他孝滿之后才能進行。

婚禮之前又出現了另一個性質嚴重的問題。京都治安不穩威脅到了一條美子的安全。7月，朝廷派了一個由十名武士組成的護衛團去保護她，同時擬定計劃，萬一發生騷亂，將把美子疏散到某個寺廟；發生緊急情況時，則到皇太后的宮殿避難。事實上，1868年年初就曾發生過這樣的事。由于將軍宣布將歸政于天皇，京都發生了不小的騷亂。支持天皇和支持幕府的兩派軍隊沖突，連皇宮里面也能聽到槍炮聲。于是婚禮的計劃暫時擱置。

那年5月，美子的哥哥一條實良去世，又一個問題出現了——假如沒有采取特別措施讓美子和家人分開吃飯，那么哥哥的死將會使她觸穢。總之，到1868年年底，情況已經足夠穩定，可以于1869年1月11日舉辦婚禮了。[[27]](#_27__Gen_Ju_Ri_Ben_Li_Fa__Zhe_Ge)

那天一早，美子的閨房就為了準備婚禮而裝飾一新。宮廷請來陰陽師，決定美子更換婚禮禮服的準確時間。他建議在早上8點鐘，到了這個時候婚禮的負責人近衛忠熙為她系上了袍子。下午2點，一輛棕櫚編織的車子停在美子閨房南邊的樓梯口。兩名公卿扶著車轅。一名侍女將香爐和天皇早上賜的寶劍放進車里。美子上了車，兩名侍女隨行。公卿把車拉到中門，在那里套上牛。隨從護衛準備好后，牛車出四腳門。在抵達皇宮最北邊的朔平門后，牛被解開，車轅停在一個架子上。一名官員向護衛通報牛車已到，于是朝廷官員將牛車拉進大門。他們穿過玄輝門（內宮的北門），來到飛香舍宮殿的東北門。這時，隨行的公卿上來用簾子和屏風把車圍住，避免美子從車上下來時被外人看到。隨從手捧著寶劍和香爐，跟在她身后。她們穿過層層走廊來到若宮御殿，美子坐下，寶劍和香爐就放在她身邊。公卿們沒有沿走廊繞，而是直接走進若宮御殿向她表示祝賀。[[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經過短暫的休息，美子穿著五層袍子，頭發重新盤過后再次出現。她到飛香舍吃了些點心，不久就被告知已被封為女御。通常只有服侍過天皇的宮女才有資格獲得這個封號，但是由于美子即將被封為皇后，因此就在當天封她為女御。皇后這個稱號是寵愛的象征：孝明的妃子到最后也沒有得到這個封號。[[29]](#_29__Ta_Bei_Cheng_Wei__Zhun_Hou)

在宣布美子為女御和皇后的儀式上，官員們的一舉一動都非常精確，令人不禁聯想到復雜的芭蕾舞。儀式終于結束，美子將到清涼殿和未來的丈夫見面。近衛忠熙和中山忠能陪同，一名宮女托著美子的裙擺，另外兩名捧著寶劍和香爐。接下來皇宮將舉辦“夜御殿之禮”。8點，天皇在凈身處換上草鞋。他從西門進入由帳子圍起來的洞房之后，近衛忠熙把草屐拿走。接著皇后也進了帳子。中山忠能作為天皇的外祖父和夫妻皆在的老人，為他們蓋上被子。接著他端來米餅，供新人在婚禮的前三天晚上食用。這些餅通常由一對年長的已婚夫婦親手制作并奉上。[[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夜御殿之儀結束后，一名宮女把米餅拿到飛香舍，在那里朝一個吉祥的方位放上三天。接著一名命婦（有身份的婦女）拿來一盞帶燈芯的油燈，用掛在洞房東北角的燈籠引火點燃后，拿到飛香舍點燃一盞外面涂漆的燈籠。這時忠熙和忠能都退下。漆燈將燃燒三天三夜。那天晚上，宮女們輪流捧著天皇的寶劍。

接著在常御殿舉行了私密的飲酒儀式，即三獻之儀。皇后朝北面坐著。到了第三獻時，她親自倒了一杯清酒獻給天皇，隨后從他手里接過一杯酒。之后他們簡單吃了點東西，然后回到皇后的宮殿。兩位新人終于可以獨處了。

不消說，這一系列儀式中的每一個動作都遵循傳統。這些儀式對王朝而言意義深遠，人們相信，天皇的幸福、多子、長壽與國家繁榮昌盛緊密相連。明治和新娘雖然并沒有生育孩子，但二人十分和睦。美子作為一名公眾人物，將比幾百年來的任何一名后妃都要杰出許多。

1. [[1]](#_1_12) 摘自一封寫于1867年2月21日的信。收錄于《巖倉具視関係文書》第三卷，第277頁。亦可見藤田覺，《幕末の天皇》，第239—240頁。

1. [[2]](#_2_12) 《朝彥親王日記》第二卷，第268頁。

1. [[3]](#_3_12) 鐘馗是一個面目猙獰（他的特征是有一把絡腮胡子和一雙大大的眼睛）的神話人物，據說他擁有揮劍驅除瘟疫和其他惡魔的能力。他出現在唐玄宗的夢里，唐玄宗讓吳道子把他畫下來。

1. [[4]](#_4_12) 《朝彥親王日記》第二卷，第272頁。

1. [[5]](#_5_12) 遠山茂樹編，《維新の群像》，第57頁。

1. [[6]](#_6_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63頁，第479頁。亦可見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88頁。

1. [[7]](#_7_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66頁。

1. [[8]](#_8_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67頁。

1. [[9]](#_9_12) 向死去的天皇追贈謚號的做法起源于中國，謚號后加“天皇”而非“院”的古老習慣已經廢棄了955年，直到1840年為紀念光格天皇的長期統治才恢復了這種做法（藤田覺，《幕末の天皇》，第129—133頁）。在回歸這種古老的做法之前，天皇們死后通常以一個地名再加上“院”字來稱呼，表示天皇死前已經出家。一條院和桃園院就是例子。孝明天皇是新（其實是更老）做法的一個例子。

1. [[10]](#_10_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26—827頁。

1. [[11]](#_11_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69—470頁。

1. [[12]](#_12_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77頁。將軍的信的完整內容，見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第二卷，第42—43頁，以及W. G. Beasley, ed. and trans.,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 pp. 308-310。

1. [[13]](#_13_12) 原文見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中，第44頁；翻譯版本見W. G. Beasleyed. and trans., ed. and trans.,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 p. 310。

1. [[14]](#_14_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80頁。原文見《巖倉公実記》中，第44頁，45頁；翻譯版本見W. G. Beasley, ed. and trans.,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 pp. 310-311。

1. [[15]](#_15_11) 原文見《巖倉公実記》，第47頁；翻譯版本見W. G. Beasley, ed. and trans.,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 p. 319。

1. [[16]](#_16_1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81頁。中山忠能繼續給年輕的天皇上關于日本典籍的課，其他人則給他上關于中國典籍的課（第500頁、第507頁）。

1. [[17]](#_17_1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97頁。明治還師從高辻修長和長谷信篤學習中國典籍（第500頁、第508頁）。一本提到書名的中國典籍是《書經》。

1. [[18]](#_18_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74頁。

1. [[19]](#_19_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81頁。

1. [[20]](#_20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84頁。

1. [[21]](#_21_9) 12月17日，美國駐節公使范·瓦肯伯格（R. B. Van Valkenburgh）帶來了一封安德魯·約翰遜（Andrew Johnson）總統的信，感謝日本做出的努力（《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49頁）。

1. [[22]](#_22_8) 這個時候她的名字還叫勝子，但是后來被改為美子。這個名字為外國人所熟悉。為了保持行文一致，我將從頭至尾稱呼她為美子。

1. [[23]](#_23_8) 洞口猷壽，《昭憲皇太后宮》，第9頁。

1. [[24]](#_24_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02—503頁。

1. [[25]](#_25_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04頁。

1. [[26]](#_26_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04—505頁。“女御”的地位在皇后之下

1. [[27]](#_27_6) 根據日本歷法，這個日期是前一年的12月28日。有關婚禮的詳細描述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41—944頁。

1. [[28]](#_28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40—941頁。

1. [[29]](#_29_4) 她被稱為“準后”，即字面上的意思：接近但低于皇后。

1. [[30]](#_30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43頁。

# 第十三章 末代將軍



1867年初，幕府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開放兵庫港，一是處置長州藩的叛亂。宮廷幾個月里一直強烈反對開放兵庫港，但7月26日宮中召集高級公卿，聽取對這件事的討論意見。權大納言醍醐忠順說，盡管孝明天皇曾禁止開放兵庫港，但在目前的情況下開港卻已經難以避免。事實上，孝明天皇上已經同意開放了三個港口，之所以沒有兵庫是因為那里離京都太近，但這并非是反對開港。他侃侃而談，其他公卿都被他說動，最后宮廷同意開港，同時決定從輕處罰長州。[[1]](#_1__Da_Qiao_Zhao_Fu____Hou_Teng)

至此，關于兵庫開港這一曠日持久的爭論終于告一段落。7月7日，幕府進一步決定允許外國人在江戶和大阪進行商業活動。這樣一來，與外國所簽和約的全部條款都已兌現。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幕府的所有難題得到了解決：不斷有大大小小的問題產生，年輕的天皇只得越來越頻繁地參與決策。

設立外國人居住地之后，直接后果便是出現了一個小問題。7月14日，長崎的地方長官逮捕并關押了六十八名基督徒。基督教在日本已經被禁了約二百五十年，然而長崎地區的“隱匿的基督徒”[[2]](#_2__Ban_Ben_De_Ji_Ce_Jian_Marius)在沒有牧師指導甚至沒有《圣經》的情況下依然堅持信仰。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基督徒的信仰逐漸偏離了正統的教義，他們原來唱的拉丁文贊美詩，現在已經變得令人費解。信徒靠死記硬背把贊美詩記下來，完全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大部分基督徒都是窮苦的漁民和農民。假如鎮壓教徒是一項純粹的宗教事務——譬如說，鎮壓佛教異端——那么不會有任何問題，但鎮壓基督教立刻牽涉到對攻擊自己的宗教異常敏感的外國列強。



在大阪的德川慶喜

時間上溯到1857年。當時老中堀田正睦與湯森·哈里斯談判后，決定同意外國人信仰自己的宗教，允許美國人在居住地建基督教堂。那時法國神父也以長崎為中心積極宣揚天主教。“隱匿的基督徒”因為有同教派的人來而欣喜若狂，公開到法國人建的教堂禮拜，并向法國公使尋求幫助。一些人甚至炫耀自己的信仰，仿佛他們的好時代終于來臨，為此甚至釀成了家庭的內部矛盾。[[3]](#_3__Shi_Jing_Xiao____Wu_Chen_Zha)盡管基督教仍然被禁，但政府在嚴懲基督徒時的動作緩慢使佛教徒十分憤怒，他們威脅要自己處理這件事并屠殺基督徒。后者聽到這個消息后，立刻用竹矛武裝。7月14日，逮捕事件發生之后，長崎的法國和葡萄牙領事要求政府釋放基督徒。被拒之后，他們將此事上報公使，強烈要求公使與幕府協商，釋放囚犯。

8月24日，德川慶喜在大阪城會見了法國公使萊昂·羅斯。羅斯已要求幕府釋放基督徒，然而卻被告知這些人觸犯了國家法律，必須要被逮捕。在羅斯的要求下，慶喜和羅斯以洽談商務的名義見面。幕府的武器供應越來越依賴法國，而法國在被囚基督徒的問題上也非常強硬。為了給慶喜留下更深的印象，他們邀請慶喜登上法國軍艦，參觀空炮射擊和船舶操縱。第二天，羅斯開始談到釋放囚犯的問題。

9月3日，老中板倉勝靜（1823—1889）和羅斯會面并討論釋放被捕基督徒的問題。兩天后慶喜寫信給拿破侖三世，解釋說日法之間的條約承認基督教在日本長期被禁這一事實，因此依法逮捕基督徒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他要求法國神父停止向日本人傳教。最終慶喜同意釋放被囚的基督徒。這些人將由村里的官員看管，同時禁止他們遷往其他地方。[[4]](#_4__Yuan_Wen_Jian___Ming_Zhi_Tia)

這一舉措沒能阻止對“隱匿的基督徒”的鎮壓行動。1868年4月，幕府張貼告示的告示牌上，民眾必須遵守的五條禁令被新的王室禁令所代替，但禁止基督教這一條并沒有變化。第三條禁令這樣寫道：“嚴禁傳播淫邪異端的基督教。發現任何可疑的人都應向村官報告。舉報者有重賞。”[[5]](#_5__Elizabeth_Longford__Queen_Vi)

連天皇也參與到如何控制基督徒的討論中。5月9日，天皇召見親王、公卿以及各位大名，要求他們就如何處置長崎的基督教徒發表自己的看法。天皇告訴他們，盡管上個月剛剛頒布了禁令，但基督徒的數目仍在持續增長，現在已經超過三千人。如果不采取懲罰措施，后果可能不堪設想。因此，長崎法庭的首席大法官才獲得授權，可以使用適當的方式處置這些人。

元老井上馨（1835—1915）此前去長崎了解過基督徒的情況，感到非常不安。回到京都后，井上向木戶報告了長崎的情況，木戶又跟副總裁[[6]](#_6__Sir_Ernest_Satow__A_Diplomat)三條實美磋商。他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耐心地說服信徒的領袖；遵守禁令的人應該丟棄耶穌像，宣誓信仰日本的神祇；拒不服從者則處以死刑。他們向天皇提出這個建議，于是，天皇召開御前會議。[[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第二天與會者提交了各自的意見：大多數人都同意處死全部基督徒。

英國公使巴夏禮爵士聽說連新的布告牌也禁止基督教之后，非常憤怒。5月4日，巴夏禮登門拜訪三條實美，抗議布告牌的內容和對長崎基督教徒的處理方式。巴夏禮以脾氣暴躁著稱，不難想象他聲色俱厲的樣子。巖倉具視、晃親王和元老大隈重信（1838—1922）也在場，大隈最終使巴夏禮平靜下來。

5月27日，明治召見木戶，命他到長崎去處理這件事。布告牌被修改：“淫邪異端的基督教”中的“淫邪異端”一詞被刪去，但另添加了一條取締邪教的禁令。[[8]](#_8__Jiang_Hu_Shi_Dai_Yin_Mu_Fu_F)1868年6月4日，一百一十四名基督教領袖被移交給萩藩、津和野藩、福山藩關押。最終，兩千四百多名信徒被關押在十七個不同的地方。監獄的條件極為惡劣。大約五百人在當局的壓力下放棄了信仰，獲得釋放，但其他人的信念非常強大，堅持不肯改變信仰。政府認為再拘留下去也不會有什么效果，于是在1873年3月，釋放全部囚犯，允許他們回家。[[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鎮壓基督教并非幕府在最后歲月面臨的主要問題，對朝臣而言也是如此。朝臣一直努力的是推翻幕府。然而，他們卻認為有必要在御前討論基督徒的處置問題。此后，天皇參加了絕大部分國策的討論，盡管官方的記錄里并沒有提到他的反應。

幕府面臨的最緊迫問題自然是它的存續問題。已經有許多歷史學家研究過日益高漲的倒幕運動的始末，因此我在這里只需說一點就夠了：原先的死對頭長州藩和薩摩藩結成聯盟，成為刺激倒幕事業的關鍵因素。主要位于本州西部、九州和四國的倒幕各藩越來越不滿幕府壟斷了利潤非常豐厚的對外貿易。然而在反對幕府時，他們通常都不會說這一點；相反，他們說的是王政必須復古。一位當代歷史學家寫道：“維新時期的內亂絕非源于勤王思想這一點已經無須再言。其根底是以薩摩藩和長州藩為首的西南主要藩國希望脫離幕府統治的獨立化傾向。”[[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即便這是最終推翻幕府的薩摩、長州等藩的真正愿望，他們也需要一個口號，而“王政復古”剛好派上用場。德川慶喜領導下的幕府，尤其在長州征討中戰敗蒙羞之后，不顧一切地采取措施避免垮臺。在法國的幫助下，幕府的現代武器庫存迅速增加。幕府在慶喜的領導下，開始了許多改革。其中資深大臣小栗忠順（1827—1868）試圖推行一系列計劃，使幕府成為一個專制政府。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幕府在叛亂各藩心目中的威信。[[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早在1866年，小栗就在私底下討論撤藩設縣的可能性（這項政策最終在1871年被明治政府采納），然而幕府卻缺乏足夠的支持來推行如此大膽的計劃。

各主要藩國結成了軍事聯盟，尤其是西部和南部各藩。他們口口聲聲尊敬京都的宮廷，然而主要關心的問題似乎是如何保全自己的實力。至少一開始，他們并不希望以天皇的絕對權威代替幕府的統治，[[12]](#_12__Jian_Ben_Shu_142Ye_Ye_Xia_Z)幾乎沒有一個大名或家臣能夠跳出自己藩國的存續問題，從整體上去考慮什么樣的政策才對國家最為有利。[[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幕府的威信也被叫做“改革社會（世直し）”的民眾暴動削弱。1866年夏天，長州之戰進行期間，暴動達到了高潮。[[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這些暴動源于對物價飛漲（特別是大米）的憤怒。他們牽制了幕府的力量，而這時的幕府正亟須團結一切力量征討長州。[[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與此同時，來自九州、四國和本州西部的主要藩國正在整合王政復古的計劃。1867年3月，土佐藩參政后藤象二郎（1838—1897）在長崎會見了從土佐藩脫離藩籍的坂本龍馬。后藤本應逮捕坂本，然而他卻聽了坂本先進的政治理念。兩人一致認為，打破當前政治困境的唯一方法在于將軍自愿把權力交還給宮廷。[[16]](#_16__Shi_Jing_Xiao____Wu_Chen_Zh)

幾個月后的1867年7月，后藤在坂本龍馬和另外一名土佐藩藩士中岡慎太郎的陪同下，在京都會見了薩摩藩的三名領導人——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1830—1878）和小松帶刀（1835—1870）——并起草了一份兩藩合作的公約。公約的措辭和政治理想都與坂本龍馬的《船中八策》高度一致，數周之前，坂本在從土佐到京都的路上寫成了這本書。[[17]](#_17__Guan_Yu_Xiao_Li_Zhi_Chi__De)

兩藩承諾將盡一切力量實現王政復古，并在八條盟約上達成了一致意見。第一條宣布“國無二王乃國家之常經，宜復政權與朝廷”。盟約接下來認為，必須“諸蕃貢獻（資金）”在京都建一座議會大樓，“制度法則悉由京師議事堂出”。議會將由上下兩院組成，下院的成員從“正義純粹”的人中選出，包括“公卿、諸侯、陪臣乃至庶民”，上院則由各位大名組成。但是在這一切之前，將軍必須“辭其職，列于諸侯，歸政權于朝廷”。此外，在對外關系上，應該與外國簽訂“義理明白之新約定”。[[18]](#_18__Shi_Jing_Xiao____Wu_Chen_Zh)

同年10月，薩摩和長州特別簽署了一份旨在推翻幕府的條約。薩摩藩重臣大久保利通和大山綱良（1825—1877）來到山口，告訴大名毛利敬親，盡管薩摩藩大名島津久光勸說幕府，但幕府毫無反省之色。要解決國家的問題，只有武力推翻幕府。如果長州派軍隊支援在京都的薩摩軍，則“皇國之大幸，未有甚此”。[[19]](#_19__Song_Mu_Hong_An__Ta_Huan_Yo)

大久保的觀點以及回答長州藩人士提問時的坦率態度打動了毛利敬親，他毫不猶豫地同意派兵到大阪支援薩摩藩。但是，他強調說，皇宮守衛的職責重大，假如不幸天皇被敵人擄去，一切都將前功盡棄。

京都貴族和那些旨在推翻幕府的武士之間也有往來。仍然軟禁在巖倉村的巖倉具視一直與薩摩藩的主要領導人保持聯系，另外，各藩來的訪客也給他帶來了最新消息。7月，中岡和坂本來拜訪巖倉，并懇求他與宿敵三條實美和解。巖倉同意后，中岡又遠赴九州成功地說服三條忘記舊怨。這樣一來，勤王派兩位公家在倒幕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并得到薩長兩藩的支持。[[20]](#_20___Gai_Ge_She_Hui__Duo_Cai_Yo)

1867年11月，土佐藩的前大名山內榮堂（1827—1872）[[21]](#_21__Shi_Jing_Xiao____Wu_Chen_Zh)寫信給德川慶喜，建議他將王權奉還宮廷。山內榮堂并不支持以軍事行動實現王政復古，但是后藤象二郎巧妙地說服了他，認為慶喜本人會很歡迎大政奉還這個提議。這樣一來榮堂就顯得既尊敬天皇又同情將軍。后藤還強調，薩摩和長州正計劃用武力推翻幕府，而避免戰爭的最好方法就是將軍辭職。榮堂堅決認為應該避免武力沖突，他說自己不會派土佐藩的一兵一卒到京都去。后藤對此深感失望，他已經向西鄉和大久保承諾將把土佐藩的士兵帶到京都。不過，不管怎么說，他還是帶來了山內榮堂寫的一封信。[[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信中榮堂一再重復由于不知給將軍寫信是否合適而倍感惶恐以及自己最近的病情，此外，還用模糊的語氣表達了一個看法，即現在是“一變皇國數百年之國體，以至誠接萬國，建王制復古之業之一大機會”。榮堂在自白書的最后說，他為國家的處境感到非常擔憂，“懇懇之至情難以默止，泣血流涕不已”。[[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信的后面附上了一封由后藤象二郎和其他三名藩士簽名的倡議書，倡議書的內容更為詳細，一共有七個要點，一些源于坂本的《船中八策》，其他則源于薩摩—長州條約。倡議書一開始便建議“議天下之大政，全權在于朝廷”，國家制度法令及政策“出京都之議事所”；第二條設立一個由上下兩院構成的議會，議會的成員由“上至公卿下至陪臣庶民”的“正明純良之士”中選出；第三條要求在各城市設立學校，“分長幼之序，教導學術技藝”；第四條呼吁“結道理明確之新條約”，“不失信義于外蕃”；[[24]](#_24__Zhe_Ge_Xing_Huan_Ke_Du_Chen)接下來一條強調了國土防備和海防的重要性，在首都和攝津國之間建立軍事設施，“朝廷守護之親兵，為世界無右之兵隊”；第六條呼吁“改新古來之舊弊。非馳枝葉，止于小條理，而以建大根基為主”。只有“除弊風，改革一新，方可建地球上獨立之國本”；最后，議會的成員在做出判斷時應該“去私心，基公平，設術策及正直之旨”，此外要防止“言論多而實效少之通弊”。[[25]](#_25__Da_Qiao_Zhao_Fu____Hou_Teng)

這封信通過老中板倉勝靜交給慶喜。后藤接到命令，要他爭取薩摩藩同意榮堂的提議，但是西鄉予以拒絕，他說倒幕計劃已經擬好，現在向將軍提議已經太晚。自己并不想阻止土佐藩實施它的計劃，但是薩摩藩將會按照自己認為最佳的方式去做。后藤并未泄氣，又接觸了其他薩摩藩重臣，發現他們都支持這封信的建議。最后西鄉和大久保只好同意推遲軍事行動。[[26]](#_26__Yuan_Wen_Jian___Ming_Zhi_Ti)

1867年11月9日，薩摩藩和長州藩收到一份密旨，命令他們討伐德川慶喜：[[27]](#_27__Hou_Teng_Xiang_Er_Lang_He_Z)

源[[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慶喜，借累世之威，恃闔族之強，妄賊害忠良，數棄絕王命，遂矯先帝之詔而不懼，躋萬民于溝壑而不顧，罪惡所至，神州將傾覆焉。朕今為民父母，不討此賊，何以上對先帝之靈，下報萬民之深仇哉。此朕憂憤之所在，值諒暗之際而不顧，乃萬不得已也。[[29]](#_29__Yuan_Wen_Jian___Ming_Zhi_Ti)汝宜體朕意，殄戮賊臣慶喜，以速奏回天之偉勛，而措生靈于山岳之安。此朕之所愿，望莫懈怠。[[30]](#_30__Qing_Xi_Bei_Cheng_Wei__Yuan)

這份諭旨措辭之強烈，實屬罕見。奇怪的是，盡管它是用第一人稱寫的（使用了天皇的代詞“朕”），然而署名卻是三名公卿。[[31]](#_31__Gong_Ting_Reng_Ran_Zai_Ai_D)因此，有人認為這份諭旨是偽造的，也有人進一步主張出主意的是巖倉具視，實際操刀的是曾為僧人的玉松操（1810—1872）——他才識淵博，是巖倉的“智囊”[[32]](#_32__Wo_Fan_Yi_Shi_Zun_Zhao_Shi)。根據巖倉自己的說法，這份諭旨由中山忠能拿去給天皇看過，得到他的首肯之后才發給兩個藩國。[[33]](#_33__Zhe_San_Ge_Ren_Shi_Zhong_Sh)然而可疑的是，忠能竟將一份攝政都沒有看過的絕密文件拿給天皇看。[[34]](#_34__Shi_Jing_Xiao____Wu_Chen_Zh)

第二天，薩摩藩和長州藩又收到一份諭旨，要求兩藩殺死松平容保和松平定敬二人。[[35]](#_35__Duo_Tian_Hao_Wen_Bian____Ya)諭旨由天皇發出，內容簡短得多。兩藩在回答時都承諾將竭盡全力服從命令，但是誰也沒有動手殺害這兩個人。

11月8日，德川慶喜給宮廷寫了份奏折，請求允許大政奉還，天皇立即撤回了發給薩摩藩和長州藩的諭旨。[[36]](#_36__Shi_Jing_Xiao____Wu_Chen_Zh)歷史學家討論過慶喜為什么要在這時決定放棄自己的權力。[[37]](#_37__Jin_Guan_Di_Er_Fen_Yu_Zhi_D)幕府內部有許多人都意識到改革勢在必行。11月8日，慶喜將收入超過十萬石的四十個藩國的高級官員召集到二條城開會，討論大政奉還的問題。板倉勝靜給他們看了慶喜申請大政奉還的奏折草稿，并詢問他們的意見。大多數官員沒有表態就退場了，但是薩摩藩的小松帶刀、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和福岡孝弟（1835—1919）以及安蕓藩的辻維岳卻留了下來。他們感謝慶喜做出的犧牲，并敦促他果斷采取行動。其他藩國的人也在旁邊附和。慶喜終于下定決心，當天就把奏折交給了兩名武家傳奏。[[38]](#_38__Duo_Tian_Hao_Wen_Bian____Ya)

慶喜的奏折措詞老套，他追溯了自己家族服侍天皇的悠久歷史、受到的優渥賞賜，表示在目前國家有難的情況下自己無德無能，因此請求大政奉還，并希望得到天皇的領導。如果大家團結一致，確保國家的安全，相信日本將能夠與外國列強平起平坐。11月10日，慶喜入宮，天皇批準了大政奉還的請求。

王政復古的消息直到1868年1月4日才正式公布，然而決策卻早已定下：天皇至少在原則上是日本唯一的統治者。我們不知道明治對此的反應。他甚至沒有留下一首詩，使我們得以一窺他當時的心情。維多利亞女王登基那天在日記里寫的那樣：“我還很年輕，對太多事情都沒有經驗。但是我相信，極少有人像我這么善良且真心希望做出恰當而正確的舉動。”[[39]](#_39__Conrad_TotmanXie_Dao___Bu_Y)或許有人也期待明治有類似的表達。不過，天皇應該會意識到，自1603年家康開始的德川幕府時代已經終結，建武中興后五百多年來，天皇第一次在沒有將軍的情況下治理國家。[[40]](#_4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同一天，巖倉具視接到了天皇允許他再次上朝的敕命。此前，一些了解巖倉的王政復古計劃的人，將這一計劃比作建武新政——當時（1333年）后醍醐天皇也在沒有將軍的情況下親政。玉松操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目前王政復古的范圍之廣，只有神武天皇創建日本國一事可以比擬。[[41]](#_41__1338Nian_Zu_Li_Zun_Shi_Chu)自源賴朝首次建立幕府以來，已經過去了六百七十多年，自德川幕府建立以來，已經過去了二百六十多年。

大約一個月后，日本的外國使節都收到了這封信：

日本天皇告各國帝王及其臣人，向者，將軍德川慶喜請歸政權。（天皇）制允之，內外政事親裁之。乃曰，從前條約，雖用大君名稱，自今而后，當換以天皇稱。而各國交際之職，專命有司等。各國公使，諒知斯旨。[[42]](#_4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上述消息（翻譯的文本）發布的日期為公歷2月8日，署名為睦仁。

1. [[1]](#_1_13) 大橋昭夫，《后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76頁。兩人會面的內容，見Marius B. Jansen, Sakamoto Ryō"aid-3EV", pp. 265-266。

1. [[2]](#_2_13) 坂本的計策見Marius B. Jansen, Sakamoto Ryō"aid-3F4", pp. 295-296；大橋昭夫，《后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91頁。

1. [[3]](#_3_13) 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61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01—502頁。大橋的解釋有一些不同（《后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95—96頁）。亦見Marius B. Jensen, Sakamoto Ryō"aid-3F9", pp. 300-301。

1. [[4]](#_4_13) 原文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21—522頁。亦可見Marius B. Jensen, Sakamoto Ryō"aid-3G1", pp. 312-317。

1. [[5]](#_5_13) Elizabeth Longford, Queen Victoria, p. 61.

1. [[6]](#_6_13)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24. 原文（漢文）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95頁。這封信由東久世通禧送達六國大使。翻譯中使用的復數We當然是天皇的自稱“朕”。一個類似，但遠不相同的分析認為，天皇已經廢除將軍，并將對“同盟列藩”會議所通過的國內外事務做出決定，見佐佐木克，《戊辰戦爭》，第17—18頁。

1. [[7]](#_7_1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95頁。

1. [[8]](#_8_13) 江戶時代因幕府發布禁教令而偽裝成信仰佛教的基督教徒。——編注

1. [[9]](#_9_1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97頁、第500頁。原文講述了在環境改變，關系疏遠的情況下，夫妻分離和親戚斷交的極端例子。

1. [[10]](#_10_1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11頁。

1. [[11]](#_11_1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56頁。

1. [[12]](#_12_13) 見本書142頁頁下注。——編注

1. [[13]](#_13_1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81頁。

1. [[14]](#_14_1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82頁。歐內斯特·薩道義爵士描繪了1868年5月22日巴夏禮爵士與后藤象二郎和伊達宗城會面的情況：“我們與后者討論了近期公布的基督教禁令。這么一來，以前的禁令又恢復了，只不過程度沒那么嚴厲而已。伊達承認禁令的措辭令人不快，并說他已經讓大阪和兵庫不要張貼禁令。他已經努力修改表達方式（原來的稱謂是‘邪惡’或者‘有害’的教派），然而不可能完全取締對基督教的打壓……后來我和中井（弘）就這個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我建議法令不要特別提到基督教，而只是籠統地禁止‘有害的教派’。顯然，不可能說服日本政府完全撤銷法令，因為那等于放手讓長崎的天主教傳教士去干，這些人在改變他人信仰時的積極態度已經令人生厭”（A Diplomat in Japan , p. 368）。

1. [[15]](#_15_1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2頁。

1. [[16]](#_16_12) 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1頁。

1. [[17]](#_17_12) 關于小栗支持“德川專制主義”的詳細內容，參考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188—221頁。

1. [[18]](#_18_11) 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21頁。

1. [[19]](#_19_11) 松木弘安（他還有一個名字是寺島宗則）是個例外。在短暫的薩英戰爭期間，他故意被囚，目的就是為了到國外去。他對世界上其他國家，尤其是印度和中國的了解，使他堅信，日本抵御外國列強殖民統治的唯一方法，就是整個國家統一由天皇一個人領導（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22頁）。1866年夏幕府和長州之間的戰爭爆發之后，福澤諭吉提交了一份建議書，希望鎮壓長州之后（必要時請外國軍隊幫助），封建制度能夠改變。他希望將軍建立一個專職政府（第29頁）。

1. [[20]](#_20_10) “改革社會”多采用一種變形的形式，即人們沿街游行，邊跳舞邊高喊“好不好”（いいじゃないか）。薩道義對一次這樣的示威行動的描寫是這樣的：“我們費了好大勁才從身穿火紅衣服，一邊跳舞一邊重復喊著‘好不好’的人群中穿過。他們如此專注于跳舞和手提燈籠，以致幾乎沒有人注意到我們經過”（A Diplomat in Japan , p. 289）。

1. [[21]](#_21_10) 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38頁。

1. [[22]](#_22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16頁。

1. [[23]](#_23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18頁。

1. [[24]](#_24_8) 這個姓還可讀成“山之內”（Yamanouchi）；“容堂”是他幼時的名字，他的實際名字是“豐信”。

1. [[25]](#_25_8) 大橋昭夫，《后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99—101頁。

1. [[26]](#_26_8) 原文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20頁。

1. [[27]](#_27_7) 后藤象二郎和中井弘（薩道義稱他為“弘藏”）給薩道義看了倡議書的副本：“他們拿出一份土佐藩上個月的倡議書，書中建議大君采用之前的政策，并進行改革。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由兩院組成的議會、在主要城市開辦學校，教授科學和文學，以及與外國列強就新的條約進行談判”（A Diplomat in Japan ，p. 284）。

1. [[28]](#_28_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19—520頁。

1. [[29]](#_29_5) 原文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25頁。原文復本見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67頁。

1. [[30]](#_30_5) 慶喜被稱為“源”而不是“德川”，是因為德川家族自稱是鐮倉時期將軍源氏的后代。

1. [[31]](#_31_4) 宮廷仍然在哀悼孝明。

1. [[32]](#_32_3) 我翻譯時遵照石井孝在《戊辰戦爭論》第66—67頁上對原文的翻譯。并非很精確，但大概的意思是這樣。

1. [[33]](#_33_3) 這三個人是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和中御門經之。

1. [[34]](#_34_3) 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70頁。巖倉和玉松之間的關系，見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中，第59—62頁。

1. [[35]](#_35_2) 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中，第70頁。

1. [[36]](#_36_2) 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71頁。

1. [[37]](#_37_1) 盡管第二份諭旨的日期比第一份要晚一天，但是兩份諭旨卻在同一天下達（《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26頁）。容保時任京都守護，定敬則任所司代。

1. [[38]](#_38) 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中，第84—85頁。根據巖倉的說法，天皇命令簽署諭旨的三位公卿等一等，因為現在慶喜已經宣布愿意將大政奉還天皇，既然這樣，那就看他接下來會怎么做。盡管巖倉這么說，但是年輕的天皇不太可能自己做這個決定。

1. [[39]](#_39) Conrad Totman寫道：“不要忘了，有跡象表明江戶一直在努力恢復德川家族的權力和聲威，并取得了實質性進步，慶喜10月12日（即西歷11月8日，譯注）的決定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不禁要問：他為什么這么做？”（The Collapse of the Tokugawa Bakufu , pp. 381-382）。Totman為找到可能的答案而列舉了許多近期和長期的原因，最后他說：“總而言之，考慮到那種非常令人擔憂的背景、慶喜含糊的目的、他對執政的矛盾心理、他周圍那些人相對妥協的傾向、缺乏有力的力量與之抗衡、土佐藩的倡議目的上的局限性，以及無論如何這件事都非常有可能像他的前輩所經歷的那樣逐漸平息下來，慶喜的決定就不是那么令人吃驚了”（p. 386）。

1. [[40]](#_4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27頁。

1. [[41]](#_41) 1338年足利尊氏出任將軍，最后一位足利將軍義昭于1588年被廢。而1588至1603年之間有五十年時間沒有將軍，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里，將軍之職實際上由豐臣秀吉出任，雖然他名義上并不是將軍。

1. [[42]](#_4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60頁。完整的描述見多田好問，《巖倉公実記》中，第60頁。

# 第十四章 將軍遁走



自從全國范圍內第一次喊出“尊王攘夷”的口號以來，許多日本人夢寐以求的王政復古終于實現了。政治權力（至少原則上）收歸宮廷，可是宮廷卻仍未設立行政和立法機關。1867年11月27日，朝廷重臣在攝政二條齊敬家會面，商討基本國策，但未能達成一致意見。[[1]](#_1___Xiang_Xi_Zi_Liao_Jian_Mariu)王政復古的支持者并沒有充分考慮過一旦親政可能要面臨的問題。

按照天皇頒布的政令，收入超過十萬石[[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的大名組成議會，決定與外國有關的重要決策和政策，但是，把這些人召集到京都顯然需要時間。與此同時，堆積如山的國內外問題亟待處理。宮廷似乎無力應付，事實上，這個時期的京都可以說處于無政府狀態。[[3]](#_3__Sa_Dao_Yi_Jian_Yao_Dan_Que_H)

大政奉還之際，將軍在言語和行動上都表現得情真意切，然而許多在江戶和京都的大名都對慶喜的決定感到憤怒。他們開會討論大政奉還的優劣，一些人私下里拜訪慶喜，表達自己的不平。慶喜耐心向他們解釋說，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統治者，并勸他們回到自己的藩國去。他勸告他們不要誤解，特別是不要做出任何輕率的行為。但是那些居住在江戶的大名，不管是譜代大名還是外樣大名，都不理睬這一請求。他們強烈支持幕府對抗宮廷，一些人甚至拒絕遵從宮廷發布的命令。許多武士對政府的變化感到憤怒，紛紛提議加強軍備，武力奪回政權。一些武士甚至請求一直隱身在幕后的朝彥親王恢復幕府的統治。[[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王政復古并沒有給京都帶來和平與穩定。謠言頻發使得氣氛高度緊張。11月14日，巖倉具視秘密前往京都的薩摩藩邸，通知他們應對緊急事態。一名與巖倉關系密切的前官員告訴他，大垣藩的一名武士向老中獻策，建議焚燒薩摩駐京都的宅邸，隨后在混亂中將天皇劫往大阪城。巖倉相信了這個很可能毫無根據的謠言，匆忙去警告薩摩的武士小心謹慎，以防不測。[[5]](#_5__Shou_Ru_Yong_Da_Mi_Ji_Suan)

暗殺——幕末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也加劇了緊張的氣氛。1867年12月10日，在薩長聯盟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坂本龍馬在京都遭暗殺身亡。[[6]](#_6__Da_Qiao_Zhao_Fu____Hou_Teng)

王政復古的公告尚未正式頒布，但幕府已不再管理國家。京都的宮廷面臨各種實際問題。12月16日，攝政等廷臣召集德川慶喜和在京大名的高級家臣商討局勢，討論的問題包括如何安排各藩派出的士兵輪流保衛京都和皇宮、如何籌集建造大宮御所的經費[[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所司代及以下的職位如何處理、如何監管紙幣的發行。[[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原則上，這些問題應該由資深大名組成的議會來決定，但是迄今為止只有幾位在京都露面，其余人在離藩之前要先看看政治的風向。宮廷最后決定至少暫時一切照舊。我們幾乎可以看到慶喜臉上露出了微笑，他正從遠處看著公卿在陌生的新任務面前茫然無措的樣子。[[9]](#_9__10Yue_19Ri_Kai_Shi_Jian_Zao)

12月17日，天皇向三名在王政復古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公卿下達諭旨——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和中御門經之——命令他們告知薩摩藩和長州藩暫時停止對幕府的攻擊。[[10]](#_10__12Yue_14Ri_Mu_Fu_Fa_Xing_Le)12月20日，慶喜再次上書提出辭職申請，但是遭到攝政二條齊敬的拒絕，他要求慶喜繼續留任，直到大名組成的列藩議會商議好如何安置他。顯然，宮廷還沒有想好如何處置這個雖然敗北但仍有實力的人物。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慶喜想利用大政奉還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在日的外國人懷疑慶喜的請辭有著不可告人的動機。據歐內斯特·薩道義爵士回憶，當英國人聽說慶喜很久以來就打算“把政權移交給皇帝”時，紛紛表示懷疑：

我們當然不相信。我們覺得他是對薩摩、長州、土佐和肥前的糾纏不休感到厭煩，想通過召集一個列藩會議，使自己內部團結起來。會議可能會以大票數通過的方式使他恢復原職，這樣一來他將比以往更有威望。[[11]](#_11__De_Chuan_Qing_Xi_Dui_Gong_T)

早在1867年7月23日，兩名幕府高級官員板倉勝靜和永井尚志就想出一個妙計，即將軍在天皇未成年期間擔任攝政，從而避免宮廷和幕府之間的一切分歧，[[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不過這個建議似乎并沒有什么結果。不過那年年底，慶喜的智囊西周（1829—1897）就未來政府的形式，向諸侯議會[[13]](#_13__Sir_Ernest_Satow_A_Diplomat)起草了第一份提案。

提案采取三權分立——政府之權、大名之權和朝廷之權。“政府之權”意為行政上的權力。其首腦將由被稱為“大君”的德川家族的族長擔任。政府設在大阪，由大君指派的官員治理全國，不過其中“宰相”一職將由大君從大名提議的三名候選人中選出。

“大名之權”為立法之權。議政院將由兩院組成，上院由大名組成，下院由各藩派一名武士組成。立法機構有權討論重要的事項，例如法律、預算、對外政策和戰爭與和平等問題。大君將擔任上院的主席。在上下兩院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大君有權投三票，而上下兩院的議員每人只能投一票，這樣就能確保大君的投票永遠都具有決定性。大君有權解散下院。

政府權力的第三個組成部分——朝廷之權——只有名義上的作用。天皇將在議會通過的法律上加蓋自己的印章表示同意，但是沒有否決權。[[14]](#_14__Shi_Jing_Xiao____Wu_Chen_Zh)

如果諸侯議會同意這個提案，慶喜的權力將比以前更大。通過剝奪大名的財產，慶喜的權力將進一步加強，因為大名必須將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國防，剩余的大部分用于教育、礦山開采、電話系統和鐵路建設。西周當時寫道：“就像土耳其人稱（他們的統治者）為蘇丹，俄國人稱為沙皇一樣，我們國家沒有理由不能稱為大君。”[[15]](#_15__Shan_Nei_Rong_Tang_Jian_Yi)慶喜無疑希望得到大多數大名的支持，從而使自己成為一名擁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即使日本啟蒙運動的倡導者福澤諭吉（1834—1901）也擁護“君主立憲制”。[[16]](#_16__Xi_Zhou_Zai___Yi_Ti_Cao_An)我們不知道慶喜希望的是什么。一些學者認為他的目的是實現絕對的專政，其他人則認為他希望建立一個以各藩國聯盟為基礎的政府，并由自己出任聯盟的首腦。[[17]](#_17__Shi_Jing_Xiao____Wu_Chen_Zh)

1868年1月4日，王政復古的消息正式宣布。那天一早，侍從千種有文就被派去通知巖倉具視軟禁已經結束，并要求他立刻盛裝上朝。巖倉的樣子肯定很奇怪，因為他的朝帽戴在一顆已經剃得光溜溜的腦袋上（剃發是對軟禁懺悔的人的要求）。他帶著一個里面裝有王政復古大號令等文件的盒子來到宮廷。巖倉被引到天皇面前，他將公告呈獻給天皇，并說這份公告是他在天皇本人觀點的基礎上擬寫的。說完巖倉就退了下去。年輕的天皇立刻來到書房，親王和高官顯貴都聚集在那里，天皇（為了不讓大家看到他，可能是從簾子后面）大聲宣讀了王政復古的公告，廢除關白、攝政和將軍等官職，并建立一個由一名總裁（有棲川宮熾仁親王）、十名議定和二十名參議組成的新政府。[[18]](#_18__Zhe_Ge_Ci_De_Ri_Yu_Shi__Da)[[19]](#_19__Shi_Jing_Xiao_Zai___Wu_Chen)

那天晚上舉行了一個御前會議。議長中山忠能宣布會議的目的是通過實施徹底的改革來奠定王政的堅固基礎。片刻之后，山內榮堂就站起來建議允許慶喜參加會議。大原重德不同意他的看法，但山內不以為意繼續表達自己的觀點。他稱贊德川家族為日本帶來了兩百多年的和平與繁榮。慶喜甘愿放棄繼承先祖遺留下來的權力，目的只是為了成立一個更好而持久的政府，這一做法令人欽佩，然而“二三公卿，擁幼沖之天子，性陰險之舉，沒慶喜之功”。[[20]](#_20__Zhe_Ge_Shi_Qi_She_Li_De_San)

巖倉可不是個對批評泰然處之的人。他叱責山內為什么可以在天皇面前如此無禮，做出這樣的指控。“圣上以不世出之英才，建大政維新之鴻業，今日之舉悉出宸襟，妄言擁幼沖之天子，竊取權柄，何其亡禮之甚。”[[21]](#_21__Gong_Gao_De_Yuan_Wen_He_Qi)

山內被這個指控嚇了一跳，忙不迭地為自己的出言不慎道歉，然而他的“出言不慎”并未立刻使其他人支持巖倉的觀點。越前藩的大名松平慶永（1828—1880，剛剛被任命為新政府的議定）也為慶喜說話，提到幾個世紀以來德川家族的輝煌成就。巖倉打斷了松平的話，說慶喜哪怕有一點責任感，就應該立刻辭去職務[[22]](#_22__Zhe_Fen_Rong_Tang_Fa_Yan_De)，將土地和人民交還給朝廷。這樣他才能協助完成大政奉還的偉大事業，并為自己在議會中保留一席之地。慶喜在宣布大政奉還時，“奉還政權之空名[[23]](#_23__Duo_Tian_Hao_Wen_Bian____Ya)，保有土地人民之實力”。巖倉最后反問，怎么可以原諒慶喜這樣的人并讓他參加討論？[[24]](#_24__Duo_Tian_Hao_Wen_Bian____Ya)

大久保利通第一個站出來支持巖倉。他認為宮廷應該命令慶喜交出土地和臣民，如果慶喜拒絕，就進行鎮壓。大久保一向沉著少語，看來那些同情大政奉還的敵人的話語，已經令他忍無可忍，變得滔滔不絕起來。[[25]](#_25__Zhe_Ke_Neng_Yi_Wei_Zhu_Ta_D)

后藤象二郎隨后發言。他謹慎地支持榮堂和松平慶永，呼吁一個公平公正的王政復古。這顯然意味著對慶喜從輕處理。跟在后藤后面發言的其他幾位，包括尾張藩的大名德川慶勝和安蕓藩的大名繼承人淺野茂勛都支持榮堂和松平，然而薩摩藩的大名島津忠義支持大久保。這時巖倉注意到中山忠能把幾名公卿拉到一邊討論，于是質問道，這個時候大家都應該全副身心在天皇面前辯論問題的是非，他們怎么可以獨自在角落里竊竊私語。討論看來不會很快結束，于是天皇下令休會。[[26]](#_26__Duo_Tian_Hao_Wen_Bian____Ya)

休會期間，會場外的西鄉隆盛說，“只需短刀一把就可解決爭議”。聽聞這句話的巖倉決心更大。[[27]](#_27__Duo_Tian_Hao_Wen_Bian____Ya)巖倉首先和淺野茂勛溝通，淺野雖然支持山內，但卻似乎有點猶豫。巖倉說即使在天皇面前流血，也要殺了山內。淺野在震驚之余答應支持巖倉，他派一名家臣將西鄉所說的話以及巖倉的決心告訴了后藤。后藤迅速權衡一番之后，向山內建議放棄，否則將發生真正的流血事件。山內沒有辦法，只好聽從了后藤的建議。后藤還說服了松平慶永，使他答應重新考慮。后藤之所以改變主意可能是想在新政府中謀得一職。[[28]](#_28__Duo_Tian_Hao_Wen_Bian____Ya)不管怎樣，當天皇回到議事廳，會議繼續時，所有人都同意了巖倉的看法。沒有一個人反對他提出的要求德川慶喜辭官納地的建議。午夜時分，會議結束。

巖倉贏得了那些甚至最堅定地支持德川慶喜的人的支持，說明他擁有非凡的外交手段，能輕而易舉地挑撥離間并從中得利。也許巖倉對付反對派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一口咬定自己所走的每一步，包括要求慶喜放棄頭銜和土地，都事先經過天皇的批準。然而事實上，明治天皇真的同意？或者說，這完全是巖倉的捏造，目的是通過援引一個他們無法反對的權威人士來制服那些慶喜的支持者？留存下來的資料并沒有告訴我們哪個才是真相。明治的年紀還很小——按西方的計算方法，他只有十五歲——但不至小到不能形成自己的政治見解。孝明之所以被自己的兒子激怒，很可能是因為明治的娘家人或者后宮（大奧）的侍女向他灌輸了反幕情緒。不過，最重要的是明治自始至終都在會議現場，對他們的爭斗肯定印象深刻。

1868年1月5日，這次重大會議召開的第二天，新政府的兩名議定德川慶勝和松平慶永來到二條城，通知慶喜天皇已經同意他辭去將軍之職，并傳達天皇要求他交出頭銜和土地的口諭。兩人的轎子剛進入二條城，那些忠于幕府的士兵就圍上來，大罵他們是“薩賊”的走狗、慶喜的叛徒。兩位大名絲毫不理會這些喧囂，徑直走到慶喜的房間，推開那些謾罵的護衛，傳達了天皇的諭旨。

慶喜沉默而恭敬地聆聽了諭旨，隨后謹慎地做出回答。他對天皇允許自己大政奉還的大恩表示感謝。自己本身并不反對交出頭銜和土地。但是，如果沒有準備就宣布此事，將會使家臣產生恐慌，很可能生出事端。他請求推遲答復天皇。慶勝和慶永都同意了。[[29]](#_29__Da_Jiu_Bao_Li_Qian____Yan_C)

不出慶喜所料，當幕府士兵和駐扎在二條城的各藩士兵聽到口諭時都怒不可遏，認為一切都是薩摩藩搞的鬼。暴力沖突似乎隨時可能發生。為了化解危機，慶喜離開二條城，前往大阪。他隨身帶著三位大名，他們來自最堅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三個藩國——會津、桑名和備中。

天皇的支持者和幕府的支持者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不過，這時卻出現了一個頗具喜劇性的小事件。孝明天皇的第一個忌日臨近，必須舉辦適當的法會。然而財政長官報告，宮廷并沒有舉辦此項活動的經費。于是，巖倉建議最好是由身為內大臣的德川慶喜出這筆錢。要求慶喜辭官納地的巖倉，現在卻仍稱他為“內大臣”，實在令人驚訝。財政長官去了大阪城，向慶喜說明情況，并請求他資助幾萬兩銀子。

他來得太不是時候。城里的人正對王政復古的支持者恨得咬牙切齒，這并不是一個給朝廷捐獻金錢的好時候，慶喜不愿意出錢（他也出不起那么高的數額），然而由于磨不過財政官的三寸不爛之舌，最終慶喜令幕府的財政部門撥款一千兩，并承諾由京都的地方長官補足余下的數目。1868年1月27日，幕府和宮廷之間爆發戰爭的四天前，法會舉行，用的錢正是宮廷的敵人所提供的。

1月14日，慶喜在大阪城會見了英國、法國、意大利、美國、普魯士和荷蘭的公使，告知他們政府發生的變化，但強調自己仍然掌管外交事務，因為新政府尚未做好交接的準備。[[30]](#_30__Zhe_Shi_Shi_Jing_De_Kan_Fa)三天后，慶喜宣布自己不受王政復古公告的約束，并要求宮廷撤回公告。慶喜寫信給總裁熾仁親王，表達自己的反對態度。他曾經順應民意，希望建立一個符合和平公正原則的政府，因而請求將從先祖那里繼承來的政權還給宮廷，然而令他震驚的是，一些藩國的武裝人員突然闖入皇宮，與那些前朝受處分的公卿相勾結，[[31]](#_31__Se_Ze_Rong_Yi____De_Chuan_Q)試圖推行一些威脅到幾千年來宮廷古老慣例的改革。即使這些改革的想法來自天皇，但對其勸諫不是為臣子的責任嗎？更何況天皇尚幼。目前已經可以看到天下騷亂，萬民涂炭之兆，特別是在外交上，招致艱難局面。如果他們曲解天皇的意思，以權宜之計應對外國，則會失去其他國家的信任，給皇國帶來極大的損害。[[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此前，德川慶喜一直表現得像一名忠實的臣民，無條件地接受天皇頒布的法令，然而現在他似乎預見到自己的軍隊和那些自稱效忠皇權的人之間即將爆發一場戰爭。慶喜在拒絕王政復古公告之時，以儒家的學說為自己背書，即君子誤入歧途時，臣子有規諫之責。這是他在接下來發生的戊辰戰爭中的立場。[[33]](#_33__Xian_Ran_Zhi_Yan_Cang___San)

西鄉隆盛指使浪人在江戶及其周圍地區制造了一系列的縱火和搶劫案，加速幕府軍隊和天皇軍隊之間戰爭的爆發。[[34]](#_34__Zhe_Duan_Gai_Shu_He_Fan_Yi)薩摩藩的領導人西鄉和大久保故意激怒幕府，使其做出某種過激行為，從而獲得向幕府開戰的口實。這些事件確實令幕府憤怒，但關鍵性的挑釁行為卻發生得相當偶然：1月18日，江戶城的外城被火燒了，將軍將這一切怪罪到薩摩浪人的頭上。[[35]](#_35___Wu_Chen__Shi_1868Nian_De_G)同一天，薩摩浪人襲擊維持全城治安的莊內藩公署。兩天后，幕府軍隊包圍了江戶的薩摩藩駐地，要求交出犯下各類案子的不法浪人，被拒后向對方開火，槍戰中雙方互有人員傷亡。最后幕府軍燒毀了薩摩藩的駐地。

三天后，這個消息才傳到京都。在這期間，1867年的12月28日，天皇檢閱了一次軍事演習，大約有兩千名薩摩、長州、安蕓和土佐藩的士兵參加。這次閱兵的目的可能是通過近距離接觸天皇來喚起軍隊的斗志，或者反過來，可能是為了向年輕的天皇灌輸戰斗精神（這一年他第一次騎馬）。薩摩藩的軍隊不僅在人數上占絕對優勢（一千五百人），在裝備上也是如此，特別是他們的英式制服和帽子。[[36]](#_36__Xiang_Jian_Se_Ze_Rong_Yi)閱兵結束后，天皇賜給各個藩的長官禮物，并向普通士兵敬酒。

第二天，江戶發生沖突的消息傳到大阪城時，德川慶喜剛好寫完信，同意將頭銜和土地還給天皇政府。[[37]](#_37__Zhe_Ge_Shi_Hou_You_Yao_Yan)城里的士兵聽到這個消息后非常氣憤，慶喜也被他們的憤怒所感染，改變主意，并決定正月初一（1月25日）派幕府軍進攻京都。

幕府軍的人數是一共五千人的薩長等藩國聯軍的三倍以上。一些幕府軍確實是雇傭兵，但其他士兵則受過法國教官的訓練，且配有現代的武器裝備。據說，西鄉聽到幕府和天皇的軍隊在鳥羽（位于大阪和京都之間）交戰時，激動地喊道：“鳥羽一發槍聲，比得到一百萬同盟軍還要令人高興。”[[38]](#_38__Jing_Shang_Qing____Xi_Xiang)不過，西鄉肯定也擔心戰斗的結果。戰斗尚未打響，他就已經制定出一套措施，旨在當京都受到直接威脅時保護天皇的安全。[[39]](#_39__Jing_Shang_Qing____Xi_Xiang)天皇將喬裝成宮女，和皇太后一起坐上女轎，由薩摩和長州的士兵護送到安蕓或者備后一處安全的地方。[[40]](#_40__Zhe_Ge_Ji_Hua_Yi_Gong_You_B)很難想象僅靠一頂假發和厚厚的脂粉，就能使明治天皇剛毅而富有男子氣概的臉看起來像個女人，不過化裝成女人逃跑卻是有歷史淵源的。[[41]](#_41__Jing_Shang_Qing____Xi_Xiang)

1868年1月27日，戰斗打響。會津藩和桑名藩的軍隊向京都進發，在經過鳥羽和伏見時遭遇了主要來自薩摩的天皇軍。幕府軍先鋒部隊的指揮官發話說，他們奉前將軍之命前往京都。假如有人試圖阻擋，他們將以武力突破。薩摩軍以槍炮聲作為回答。據說，一發薩摩的炮彈擊中了幕府軍長官瀧川具拳旁邊的炮架。瀧川當時正騎在馬上，受驚的馬脫韁，甩掉了瀧川并沿著鳥羽大街一路狂奔。突然的炮聲和脫韁的野馬使正沿著街道列隊的一隊幕府軍陷入混亂。對他們的進攻來說，這實在是個糟糕的開始。[[42]](#_42__Li_Ru__1159Nian_Er_Tiao_Tia)

野馬脫韁是個意外事件，但天皇的軍隊還擁有一樣秘密武器，那就是他們肩上所扛的征討叛軍時才使用的錦旗。1867年10月10日，大久保利通和品川彌二郎（1843—1900）去巖倉村拜訪巖倉具視，討論大政奉還的計策。巖倉向兩人出示了玉松操設計的錦旗圖，要求他們制作一些這樣的錦旗。大久保回到京都后，買來紅色和白色的錦緞，由品川帶到山口，做成錦旗。制成的錦旗一半放在山口，另一半放在京都的薩摩藩駐地。[[43]](#_43__Zuo_Zuo_Mu_Ke____Wu_Chen_Zh)

1月28日，天皇賜給仁和寺宮嘉彰親王一面錦旗和一把節刀，[[44]](#_44__Shi_Jing_Xiao____Wu_Chen_Zh)作為任命他為“東征大總督”的符節。[[45]](#_45__Da_Zong_Du_Chu_Zheng_Shi__T)那些反對嘉彰親王的人不僅被視為敵人，而且被視為“朝廷的敵人”（朝敵）。德川慶喜一直努力強調自己攻打的不是朝廷而是薩摩，然而錦旗使薩摩軍獲得了天皇保護者的合法身份。它在打敗親幕的軍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它不僅鼓舞了薩摩軍的士氣，還使幕府軍猶豫是否可以攻打天皇的軍隊。[[46]](#_4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任命嘉彰親王擔任大總督是一個奇怪的選擇。[[47]](#_47__Zuo_Zuo_Mu_Ke____Wu_Chen_Zh)除了具有皇族血統以外，他完全無法勝任這一職位。1858年，十二歲的嘉彰親王到仁和寺出家，不管是出家期間還是后來，都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大總督之職無疑是象征性的，真正的指揮工作留給了像西鄉隆盛這樣熱衷于戰斗的人。[[48]](#_48__Zai_1867Nian_4Yue_7Ri_Xie_G)也可能是由誰擔任總司令并沒有多少區別——日本戰爭仍然保留了許多中世時期的單挑傳統。

不管鳥羽之戰的勝利應該歸功于誰，這一仗的勝利卻是決定性的。幕府軍棄陣而逃。他們企圖在一名老中的封地淀城重新集結，但卻被拒之城外，極度吃驚之余也開始恐慌起來。這是第一次有本該效忠幕府的軍隊出現背叛行為。第二次則出現在一天之后，守護大阪門戶山崎的津藩將槍炮對準了幕府軍。前一天一份來自宮廷的諭旨（在錦旗的幫助下）成功地說服了津藩拋棄幕府，轉為擁護宮廷。[[49]](#_49__Zuo_Zuo_Mu_Ke____Wu_Chen_Zh)

品嘗到敗北滋味的慶喜在第二天傍晚，在大阪城召集謀士和軍事將領開會，商討作戰策略。大家一致要求慶喜親自擔任幕府軍的指揮，以此來提高士氣。慶喜一口同意，讓所有在場的人都感到高興。那天夜里慶喜溜出大阪城，打算登上幕府軍的“開陽丸”號軍艦。船還沒來，慶喜暫時登上了美國軍艦“易洛魁人”號（Iroquois）。[[50]](#_50__You_Yi_Zhong_Shuo_Fa_Ren_We)第二天一早慶喜乘坐“開陽丸”號逃往江戶，隨身只帶著幾名高級官員。幕府軍的殘兵聽說慶喜已經逃跑，紛紛棄城而逃。慶喜后來說，自己從未想過與宮廷作對，錦旗一出現，他就完全失去了斗志。[[51]](#_51__Se_Ze_Rong_Yi____De_Chuan_Q)

戊辰之戰并沒有結束，然而鳥羽之戰的勝利意味著天皇軍現在控制了日本的西部和南部。盡管尚未攻下江戶和北部地區，但天皇的政權已經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勝利。

1. [[1]](#_1_14)  詳細資料見Marius B. Jansen, Sakamoto Ryō"aid-3OR", pp. 343-344，以及《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45—546頁。殺手不知是誰派出的，盡管有消息稱這個人可能是幕府的一名“職業殺手”。

1. [[2]](#_2_1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75頁。英國人似乎并不覺得這些制服有多漂亮。薩道義描述了一次類似的軍演：“他們的制服模仿歐洲的樣式，黑色的褲子，褲腿兩邊滾著紅色條紋，黑色外套。那些能穿上靴子的士兵都很高興，但其他人只有草鞋可穿。他們頭上戴著圓錐形或者碟形的紙漿帽，帽子上綁著兩根水平的紅色帶子。他們使用英國步兵的訓練方式，射擊時會加上一句有趣的喊聲”（A Diplomat in Japan, p. 263）。

1. [[3]](#_3_14) 薩道義簡要但卻毫不客氣地評價了嘉彰：“我們剛離開親王的寓所，就被擋在路中間，因為要讓仁和寺宮親王先過。他騎著馬，是一個身材略胖，皮膚黝黑，嘴唇厚厚的年輕人。他的頭發剛開始長出來，因為不久之前他還是個和尚”（A Diplomat in Japan, p. 357）。

1. [[4]](#_4_1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41頁。

1. [[5]](#_5_14) 收入用大米計算；一石大約相當于185.5升。

1. [[6]](#_6_14) 大橋昭夫，《后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118頁。

1. [[7]](#_7_1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32頁。他們似乎取得了一些成功：1868年9月，朝彥親王由于試圖幫助德川家族恢復政權而被剝奪了親王頭銜（第793頁）。

1. [[8]](#_8_1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31—532頁。陪同巖倉前往的是中岡慎太郎。

1. [[9]](#_9_14) 10月19日開始建造（《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16頁）。幕府通過向全國各地每個收入超過一百石的村子征收3%的稅而籌集到了所需的資金（第528頁）。

1. [[10]](#_10_14) 12月14日幕府發行了一種有效期為兩年的紙幣（《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48頁）。這些問題是這個時期提出的八個具體問題中的四個（第532—533頁）。

1. [[11]](#_11_14) 德川慶喜對宮廷人員不習政事的回憶，見大久保利謙，《昔夢會筆記——徳川慶喜の回想談》，第271頁。

1. [[12]](#_12_1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32—533頁。諭旨的原文見第534頁。

1. [[13]](#_13_14) Sir Ernest Satow,A Diplomat in Japan , p. 285. 薩道義寫下這段印象的日期是1867年12月7日。

1. [[14]](#_14_14) 石井孝，《戊辰戦爭戦》，第74頁。

1. [[15]](#_15_13) 山內容堂建議設立的由包括德川家在內的實力大名組成的組織，作為將軍及宮廷的咨詢機構。——編注

1. [[16]](#_16_13) 西周在《議題草案》上寫的內容，見《戊辰戦爭戦》第75—76頁。

1. [[17]](#_17_13) 石井孝，《戊辰戦爭戦》，第77頁。

1. [[18]](#_18_12) 這個詞的日語是“大君のモナルキ”（石井孝，《戊辰戦爭戦》，第78頁）。

1. [[19]](#_19_12) 石井孝在《戊辰戦爭戦》一書中贊同前一種看法。佐佐木克在《戊辰戦爭》第11—12頁上做出了后面一種解釋。原口清在《戊辰戦爭》第45頁上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1. [[20]](#_20_11) 這個時期設立的三個職位（合稱“三職”）都非常短命：1869年1月設立5月即廢除的“總裁”一職是由親王擔任的監督性職位，為三職之首；“議定”一職是由親王或者大名擔任的行政及監督職位，不久被廢止，改由四名“議定”負責其監督性的職責；1868年設立1869年被廢的“參與”則由公卿、大名以及其家臣擔任，負責監督一切政府部門。

1. [[21]](#_21_11) 公告的原文和其他細節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57—560頁。亦可見石井孝，《戊辰戦爭戦》，第86頁。

1. [[22]](#_22_10) 這份榮堂發言的概要綜合了澀澤榮一的《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27頁和《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61頁的內容。這次會議最詳細的描述，見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第157—161頁。沒有說明來源的石井寫道，榮堂“怒號”著，對為實現王政復古而采用的卑鄙手段表示憤怒。石井則將榮堂的傲慢態度歸咎于長期酗酒（《戊辰戦爭論》，第86—87頁）。

1. [[23]](#_23_10) 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中，第159頁。

1. [[24]](#_24_9) 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中，第159頁。亦見澀澤榮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27頁。

1. [[25]](#_25_9) 這可能意味著他的官階會被降一級，而不是完全被剝奪。慶喜的官階是從二位。如果慶喜把土地還給政府，那么他的四百萬石收入中有兩百萬石將上交政府，但是慶喜后來告訴宮廷的敕使說幕府的收入并沒有他們想的四百萬石那么多，而是只有兩百萬石（澀澤榮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32頁；大久保利謙，《巖倉具視》，第207頁）。

1. [[26]](#_26_9) 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中，第159—160頁；澀澤榮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27—28頁。巖倉慷慨陳詞，他承認德川家康對國家的貢獻并非微不足道，但他譴責家康的繼任者犯了許多過錯，尤其是1853年外國人來后幕府的一些舉動。

1. [[27]](#_27_8) 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中，第160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62頁；佐佐木克，《戊辰戦爭》，第14頁。大久保發言的概要見澀澤榮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28頁。他并沒有說如果慶喜不遵守朝廷的命令就要鎮壓他。

1. [[28]](#_28_6) 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中，第160頁。

1. [[29]](#_29_6) 大久保利謙，《巖倉具視》，第208頁。類似的描述毛利敏彥，《巖倉具視》，第83頁；井上清，《西郷隆盛》下，第52頁；豬飼隆明，《西郷隆盛》，第22頁。《明治天皇紀》和《巖倉公実記》都沒有提到西鄉說過這樣的話。

1. [[30]](#_30_6) 這是石井的看法，他懷疑后藤會忽視近在眼前的參與之位（《戊辰戦爭論》，第88頁）。事實上，后藤于12月12日被任命為參與，同時受到任命的還有另外十四個人，他們分別來自五個藩國——薩摩、尾張、越前和土佐（《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65頁）。

1. [[31]](#_31_5) 澀澤榮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32頁。亦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62—563頁；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中，第162頁。

1. [[32]](#_32_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69頁。薩道義寫道，“他（慶喜）開始解釋自己的政策，為自己從京都退休的行為辯護，并表示他決心遵守全體理事會的決議。他對大使們的特別提問的回答是，外國人無需為日本的內部事務擔心，在政府形式確定之前，他仍然將外交事務視為自己的職責”（A Diplomat in Japan, p. 304）。

1. [[33]](#_33_4) 顯然指巖倉、三條和其他在孝明天皇統治時遭到流放的公卿。

1. [[34]](#_34_4) 這段概述和翻譯融合了《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71—572頁和《巖倉公実記》中卷第187—188頁的內容。后者據說是引用了慶喜的原文，但是由于篇幅太長這里就沒有引用。

1. [[35]](#_35_3) “戊辰”是1868年的干支紀年。

1. [[36]](#_36_3) 詳見澀澤榮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67—168頁。豬飼隆明更新的研究認為，這些事情是相樂總三在西鄉的指使下干的（《西郷隆盛》，第25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81頁。書中寫道西鄉和大久保利通都有責任。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浪人干的；有些是自稱是浪人的歹徒干的（《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74頁）。

1. [[37]](#_37_2) 這個時候有謠言稱浪人趁著城里到處著火的時機，劫持了前兩任將軍（家茂和家定）的寡妻，并將她們帶到薩摩（井上清，《西郷隆盛》下，第61頁）。因為家定的妻子天璋院是薩摩人，甚至還有謠言說她與薩摩武士有聯系，還幫助他們放火焚燒了江戶城（澀澤榮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68—169頁）。薩道義也聽到了這個謠言：“薩摩人設法燒了一部分江戶城，并將天璋院殿下劫走。天璋院殿下是他們藩主的女兒，嫁給了前任大君德川家定。政府人員隨即攻擊并焚燒了江戶所有的薩摩宅邸，屋主都乘薩摩的船逃走了”（A Diplomat in Japan, p. 309）。我們可以注意到，薩道義在這段話中將幕府的支持者稱為“政府”。

1. [[38]](#_38_1) 井上清，《西郷隆盛》下，第59頁。

1. [[39]](#_39_1) 井上清，《西郷隆盛》下，第65頁。

1. [[40]](#_40_1) 這個計劃一共有八點，主要講述天皇應該往哪里去、什么人應該陪伴他、什么人應該留在京都等。原文見多田好問，《巖倉公実記》中，第231—232頁。

1. [[41]](#_41_1) 井上清，《西郷隆盛》下，第65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83頁。飛鳥井雅道還提到一個小計謀：把御輦抬往比叡山，讓幕府軍以為天皇往那個方向走了（《明治大帝》，第117頁）。

1. [[42]](#_42_1) 例如，1159年二條天皇就曾假裝婦人，離開宮殿，到六波羅的平清盛家暫避。這件事出自《平治物語》。

1. [[43]](#_43) 佐佐木克，《戊辰戦爭》，第23頁。

1. [[44]](#_44) 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66頁。

1. [[45]](#_45) 大總督出征時，天皇賜給他的一把刀。

1. [[46]](#_4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85頁。將軍的稱號是“征夷大將軍”，然而這一次大總督的任務是征服東部德川幕府的據點。

1. [[47]](#_47) 佐佐木克，《戊辰戦爭》，第26頁。

1. [[48]](#_48) 在1867年4月7日寫給土持政照的信中，西鄉稱自己是“好戰者”（軍好き）——意為喜歡打仗的人（豬飼隆明，《西郷隆盛》，第28頁）。

1. [[49]](#_49) 佐佐木克，《戊辰戦爭》，第27頁。

1. [[50]](#_50) 有一種說法認為，他登上美國船是因為天太暗而無法將其與“開陽丸”號區分開來，但是大家普遍認為他知道那艘船是“易洛魁人”號。

1. [[51]](#_51) 澀澤榮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90頁；佐佐木克，《戊辰戦爭》，第30頁。

# 第十五章 接見公使



1868年2月9日，攻下大阪城之后正好過了一周，明治天皇終于舉行了加元服儀式。為了慶祝，朝廷宣布大赦，十九名由于各種原因被禁止上朝的公卿都得到了赦免。借此機會，朝廷也向六國的公使去信，通知他們天皇今后將在國內外事務上行使最高權力。

這封措辭生硬的正式信件除了強調天皇的新統治權之外，還暗示盡管天皇的父親強烈反對將軍與外國簽訂的條約，現任天皇卻承認這些條約的有效性。宮廷間接承認了與外國發生關系的不可避免，也顯示了朝廷希望構建和睦關系的認識。[[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敕使東久世通禧向全部公使出示了這封信的翻譯件，之后，“大家連珠炮似的向使者發問，使者很好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2]](#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現場氣氛和現代的記者招待會極其相似，令人驚奇。法國公使萊昂·羅斯表示自己將繼續支持將軍，其他公使則只承諾會向本國政府匯報。

當天政府向國內發布了一個公告，稱世態劇變，因此與外國建立友好關系這件曾經令前天皇憂慮不已的事情已得到批準。民眾的行為必須盡量符合天皇的意愿，政府將不再容忍針對外國人的暴力事件。另外，為了光耀國威于海外萬國，日本將加快軍備建設，并將根據國際法修改條約的不平等之處。[[3]](#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與幕府軍的戰爭（這一次位于箱根的邊境以東）重新打響之前，親子內親王（以前的和宮）給東海道平叛總督橋本實梁（她的娘家親戚）寫信，請求原諒德川家族，免除他們“朝敵之污名”。她說，慶喜完全沒有料到會爆發戰爭，在被視為朝敵之后，立刻就返回了江戶。考慮到慶喜所犯的錯誤，怎么處罰都可以，但是看在自己的份上，不要將德川家族視為朝敵。如果天皇軍打垮了德川家族，她肯定會自殺。生命對她而言毫無意義，但是一想到將和朝敵死在一起，就心痛不已。親子內親王乞求宮廷答應她的請求。[[4]](#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她現在已經將自己視為德川家族的一員。

親子內親王的請求自然不會完全被忽視，然而它在決策層卻起不了什么作用。許多大名支持，只要慶喜正式道歉，就保全他的家族。這種處理方法正是巖倉所希望的，他派了一名使者到江戶去，敦促慶喜盡快同意。然而巖倉認為使者帶回來的回答缺乏誠意，對這位前將軍的態度轉為強硬。這時，數以千計的薩摩和長州士兵已從海陸兩路圍攻江戶城。

慶喜自己也搖擺不定，不知應該投降還是抵抗到底。2月9日，他寫信給英國公使巴夏禮爵士，稱德川政權仍然控制著對外事務。慶喜說如果巴夏禮會見天皇政府的代表，就是違反了兩國之間的約定。他以這種方式維護自己的權威。但兩天后，慶喜的謀臣小栗忠順被免職。小栗支持抵抗政策最為堅決，這表明慶喜準備尋求和解。2月11日，慶喜寫信給最愿意從寬處理自己的兩名朝臣松平慶永和山內榮堂，辯稱鳥羽和伏見之戰并未得到他的批準。慶喜說不知自己為何會被追捕，并請求他們為自己說情。[[5]](#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2月13日，慶喜第一次在江戶城會見羅斯，這樣的會面一共進行了三次。這位法國公使依然支持德川政府，相信盡管他們在鳥羽和伏見受挫，但最終將會取得勝利。慶喜告訴羅斯，自己將盡一切努力保留祖先留下來的領地。他說天皇現在形同監禁，無法做符合自己意愿的事，所謂的天皇政府實際上是由薩摩人和長州人控制。

他們第二次會面時，慶喜說自己打算退位并將職位傳給紀州藩大名德川茂承。2月15日，慶喜再次寫信給慶永和榮堂，告訴他們（就跟他和羅斯說的那樣）自己打算退位，因為自己已經是一名朝敵，且身體狀況不佳。他請求兩位大名為自己洗雪朝敵的污名。



英國駐日使館翻譯薩道義



英國公使巴夏禮



法國公使羅斯

2月23日，慶喜和羅斯最后一次見面。他向羅斯遞交了一份聲明書，為大政奉還以來自己的行為辯護。慶喜強調自己不僅打算遵守與外國簽訂的條約，還準備對其進行“完善”，暗示修改后的條約將會對外國更加有利。也許他還計劃將基督教合法化。[[6]](#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但是，自己忍耐的程度有限，希望對方理解。也許慶喜是在間接地說，自己在許多問題上都可以妥協，但卻無法容忍外人入侵自己的藩國。羅斯對慶喜的話一點也不感到吃驚，因為這份聲明的草稿正是他起草的。

在外國公使中，羅斯是唯一一位堅持自己的判斷，認為一個在大君領導下的穩定政府對西方貿易者來說最有力。巴夏禮的反應要比他快得多。他迅速地意識到，京都的天皇政權最終將統治整個國家，而慶喜則僅僅是個只擁有一個藩國的失敗者。[[7]](#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3月4日，慶喜離開江戶城，到上野寬永寺內的大慈院隱居。他宣布從今以后自己將徹底投降，并專心進行懺悔。慶喜將天皇的發怒完全歸咎于自己，并說已準備接受“天誅”。他唯一的請求就是派已經出家的公現親王到京都去，替自己向天皇說明。[[8]](#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除了擁有皇室身份，迄今為止公現一直默默無聞，但不久之后他將成為皇位的競爭者。

在慶喜猶豫著怎么做才合適時，京都的政府內部出現了關于未來都城選址的新紛爭。大久保利通建議將都城遷往大阪。遷都意味著摒棄舊政權和京都貴族，建設一個新的開明政府。“大阪之地為外國交際之道，最適講富國強兵之術，建海陸軍。”最重要的是，天皇從御所出來，將會打破他與天下萬民隔離這一長年弊習。“諸外國帝王唯攜一二從者，行走國中。愛撫萬民為君道之第一義也。”[[9]](#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2月17日，大久保在宮廷議會上提出這個建議時，遭到以議定中山忠能為首的公卿的激烈反對，他們認為這是薩長兩藩為了謀取私利而策劃的陰謀。公卿反對遷都的一個更重要原因無疑是他們非常依戀京都這個他們一直生活的地方。[[10]](#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大久保的遷都計劃沒有立刻得到批準，然而同時提出的誠懇要求并非無人理會。他請求天皇離開閉塞的御所，親自指揮東征的討伐軍。2月25日，天皇自孩提時代以來第一次離開御所。他乘坐蔥華輦（一種天皇乘坐的非正式轎子），隨身帶著象征皇位的寶劍和勾玉，參觀了幕府在京都的權力象征——二條城。天皇抵達時受到了總裁熾仁親王的歡迎。接著天皇來到位于城堡正中的會客廳，坐到用竹簾隔開的上房，總裁、議定和參議（高級顧問）坐在中房，下級顧問和其他人則坐在下房。他們在此討論了天皇是否適合親討叛軍以及設立最高指揮官的問題。朝儀結束后，天皇將熾仁親王召到簾后，下達親征之令，稱慶喜及其叛軍走卒已經逃往江戶城，正變得越來越無法無天。天皇不能容忍這種四海鼎沸、萬民涂炭的情況發生，已經決定親征。天皇接下來打算挑選一名合適的人擔任最高統帥。畿內七道的大小藩國的所有軍隊都應做好準備，幾天之內陛下將參加作戰會議并發布命令。一旦接到命令，各方應該立刻集結。諸軍應齊心協力，奪取這場忠誠之戰的勝利。[[1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3月1日，天皇任命熾仁親王為最高統帥，授予他一面錦旗，由津和野藩的兩隊士兵護衛。熾仁親王是德川慶喜的姻親，因此，他特別要求擔任東征軍的大總督。3月7日，熾仁親王正式辭別了天皇。

熾仁親王發布了數條陸軍法令，如“軍中無論貴賤，同寢食勞逸”；“禁亂毀神社佛閣、火燒民家、掠奪家財、強賣等事”；“遇外國人暴行無禮等，捕之上申中軍，檢查曲直，糾至其國公使以求至當之處置。禁無故開槍斬殺等，禁亂入外國人居處”。這些法令的目的顯然是為了讓全世界相信，日本軍隊遵守國際公認的戰爭準則，并不是一群沿途燒殺搶掠的匪徒。

宮廷希望改善與外國人的關系，這一點顯然也反映在允許外國公使覲見天皇這個決定上。反對的聲音非常強烈，尤其是宮里的人。松平慶永和巖倉具視在天皇面前解釋說，君主接見外國公使是國際通行的原則。5月9日，天皇發布公告，允許外國公使覲見。公告解釋說天皇異常匆忙地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自己即將離開京都，率軍親征。[[12]](#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明治愿意會見外國人，說明他沒有受到痛恨外國人的父親的影響。

公告下面是一份總裁、議定、參議論證接見外國公使正當性的奏折副本，其中引用遠古時代日本天皇進行類似接見的例子。盡管這些例子真實性非常模糊，但引用先例是日本宮廷的傳統。雖然除了中國和朝鮮之外，天皇沒有接見過來自其他國家的外國人，但公告將這歸咎于日本航海技術的尚未成熟。現在日本已經和全世界建立了聯系，如果不遵守國際通用的慣例，將會導致其他國家的不信任。為了友好的國際關系著想，有必要做出一些妥協。[[13]](#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改善與外國人關系的第一步，是允許他們訪問京都。歐內斯特·薩道義爵士興致勃勃地描述了在古都的見聞，并衷心希望外國使節從此以后可以住在這座城市（盡管氣候不太好），而不是江戶，“因為人們都認為這個國家的政府將會設在京都”。[[14]](#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正在這個時節，堺市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排外事件。“杜布雷”號（"aid-417"）上的十一名法國水手被土佐藩的武士殺害。根據日本人的描述，幾個法國水手（和六名同伴）在堺市的街道上晃來晃去，行為無法無天，于是遭到正在維持秩序的土佐藩武士的襲擊。薩道義的描述則截然不同：“這些日本人殺害了毫無惡意且手無寸鐵的船員，這些船員從未做出一絲的挑釁行動。”法國公使萊昂·羅斯立即寫信，要求處死造成此次事件的土佐藩武士、賠償被殺害的水手家人的撫恤金十五萬美元、外國事務長官山階宮親王親自道歉、土佐藩的大名山內榮堂道歉、禁止帶刀的土佐武士進入開放的商埠。[[15]](#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日本答應了全部要求。

殺害法國水手的二十名土佐武士被抓獲后，被勒令切腹自殺。法國船長目睹了十一名武士切腹自殺的剛毅情景，舉手請求暫停這種行為，羅斯也要求赦免剩下的九個人。薩道義對此感到遺憾：“在十一個人受完刑之后，佩蒂特·圖瓦爾（Petit Thouars）船長認為有必要停止行刑，對此我們只能感到遺憾。這二十個人的罪行相同，一命償一命的方法更像是為這十一名法國人報仇，而不是伸張正義。”[[16]](#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薩道義之前曾目睹過一名犯法的備前藩官員切腹自殺[[17]](#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18]](#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并被這種高尚的懲罰形式所折服。十一個人切開腹部，隨后又被斬首的情景，似乎并未令他感到恐懼，這或許是因為當時公開行刑在歐洲非常普遍，而且這類活動還帶有一種類似狂歡節的氣氛。他寫道，

說到因切腹自殺的場面過于惡心而恥于親臨現場，我感到非常自豪，因為我沒有退縮，勇敢地目睹了一場自己盡力促成的懲罰。它并不惡心，而是一場最體面和高雅的儀式，與我們為了公眾的娛樂習慣而在紐蓋特監獄前所做的處刑相比，這種做法要尊貴得多。[[19]](#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3月23日，明治天皇接見了法國公使羅斯和荷蘭政府的代理人德克·德·格雷夫·范·波爾斯布魯克（Dirk de Graeff van Polsbroek）。[[20]](#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下午2點，天皇身穿引直衣[[2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帶著寶劍和勾玉，到紫宸殿，坐在豪華的屏風后面。副總裁三條實美和輔弼中山忠能站在他的身旁，外國事務總督晃親王[[22]](#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和副總裁巖倉具視則站在屏風外面，一些級別較低的官員分別站在他們左右。外國事務副長官東久世通禧領著法國公使來到天皇面前，鞠了一躬。天皇的聲音傳來：“貴國國君身體無恙，乃朕之喜悅。望自今兩國之交際日益親睦，永世不變。”[[23]](#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羅斯的回答相當長，最后他以拿破侖三世的名義祈禱日本繁榮昌盛、天皇得到神靈的保佑。說完，法國公使退下，荷蘭公使被領到天皇面前，天皇對他說了同一番話。之后賜給兩位公使茶點。接下來見的是英國公使，他已經離開自己和下屬住的知恩院，正騎馬朝皇宮走來，英日的護衛隨行。日本人中包括中井弘（1838—1894）和后藤象二郎。當他們一行人來到新門前路和繩手路交叉處時，

有兩個人從馬路對面突然沖出來，拔出劍襲擊人群和馬匹，他們一路瘋狂砍殺。中井看到之后立刻從馬上一躍而下，與右邊的一個刺客交手，兩個人打得難解難分。打斗當中中井的腳被肥大的褲子絆住，跌了個四腳朝天。敵人一刀劈向他的腦袋，但是被中井躲過了，只受了點皮外傷，就在這時，中井一刀刺進了這個人的胸膛。受傷的刺客轉過身來背對中井時，又被后藤從肩膀砍了一刀，徹底倒在了地上，這時中井一躍而起砍下了他的頭。[[24]](#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另外一名刺客在殺害了許多英國護衛之后，向薩道義逼過來，刺傷了他的馬。僥幸逃過一劫的薩道義騎到隊伍的前頭保護公使。他看見“巴夏禮爵士穿著漂亮的全權公使的服飾，鎮靜地騎著馬，立在十字路口的中央” 。第二名刺客不久就被抓獲。“在三條的一名家臣的幫助下，我們對他進行了審問。他表示極為后悔，并請求把頭砍下來公開示眾，以向全國人民昭示自己的罪行。”[[25]](#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刺客一口咬定沒有其他同伙（盡管后來三名共犯被流放）。京都有許多人同情襲擊者，他們認為，如果讓外國人進入皇宮，將會嚴重削弱這塊神圣土地的神力，如果讓外國人看到天皇的臉，將會褻瀆天威。[[26]](#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天皇得知巴夏禮被襲的消息之后，深感遺憾，政府官員急忙跑到巴夏禮身邊慰問。巴夏禮回答說，這不是對他，而是對天皇的暴行，政府肯定知道如何維護主權的尊嚴。[[27]](#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巴夏禮的許多護衛都受了重傷，那天不可能去覲見天皇了。

（知恩院）變成了一座醫院。我們的傷員鮮血直流，好像馬上就要死了，他們耐心地躺在走廊上，等著外科醫生來給他們做手術。只穿著襯衫的外科醫生，好像一下子麻利了幾倍，迅速而熟練地為每一名傷員處理傷口。襯衫和被單被撕成一條一條的繃帶，一桶桶的血水倒光了又被注滿。放眼看去，每一個人都非常可怕，渾身既濕漉漉又血淋淋。這真像是夢魘。就在這時中井砍下的那個人頭被拿了進來——真是太可怕了。[[28]](#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天皇和巴夏禮以及年輕的翻譯官米特福德（A. B. Mitford）[[29]](#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的會面延遲到4月14日進行。米特福德寫道：“我們自己的隨行人員減少了，這實在令人傷心。我們只有兩名騎馬的護衛，他們手握著劍分別騎在巴爵士的兩邊。”當英國人抵達御所時，他們吃驚地發現那里甚至沒有加強防衛，四周是普通的白色圍墻，然而米特福德說：“盡管樸素，但御所還是有自己的一種宏偉在里面。”[[30]](#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巴夏禮和米特福德被領到會客廳，在那里會見了明治天皇，這也許是外國人第一次見到日本的天皇：

中間是一頂華蓋，由四根黑漆的細柱子支撐著，上面張著白色的綾綢，綾綢上繡有紅色和黑色的花紋……華蓋下面是年輕的天皇，他坐在（或者應該說是靠在）一張很高的椅子上。他的后面跪著親王，如果需要，隨時準備接替他的任務……

我們一走進去，天子就站起來向我們鞠躬致意。他是個個子高高的年輕人，有著明亮的眼睛和清晰的五官。他的神情非常莊重，對于一個歷史比地球上其他主權國家都要長好幾百年的王朝來說，這樣的表情極為相稱。他穿著白色的上衣，很長的紫紅色綢的褲子，后面帶有拖尾，就跟婦女的曳地長裙一樣。他的帽子和大臣的一樣，但按照慣例，上面加了一根長而硬的薄紗狀羽毛。我稱之為羽毛是因為想不到更好的詞，但其實它一點也不像羽毛那么毛茸茸。他的眉毛都剃掉了，然后重新畫在高高的額頭上；他的臉頰涂上了胭脂，嘴唇也涂上了紅色和金色。他的牙齒是黑色的。如此滑稽而扭曲的形象，卻仍然顯得莊重，這本領確實不小；然而高貴的血統[[3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卻無法否認。我也許可以補充一句，不久之后，這位年輕的君主就會把所有這一切陳腐的風氣和古老的束縛，連同其他許多過時的東西，一并拋棄了。[[32]](#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天皇與英國公使的會面和他與法國和荷蘭公使的會面差不多，但他加了一句，為三天前他們來皇宮路上發生的“不幸之事”表示遺憾。巴夏禮禮貌地回答說，天皇的仁慈話語已經使他完全忘記了這件不幸的事情。[[33]](#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米特福德后來寫道，天皇“由于非常年輕，而且剛剛脫離宮闈，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情形” ，因此有點害羞。他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因此要由在他右手邊的親王把話重復一遍，再由伊藤俊輔翻譯成英語。[[34]](#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巴夏禮和米特福德與天皇會面后三天，正向江戶進逼的天皇軍和近藤勇領導的約兩百名新選組成員發生了第一次沖突。板垣退助領導的天皇軍取得了勝利。[[35]](#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可能天皇軍江戶之行最值得紀念的事情就是他們唱的一首歌，這首歌的歌名是《宮先生、宮先生》，是品川彌二郎在鳥羽和伏見之戰時創作的。[[36]](#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這首歌不僅傳遍了日本，還傳到英國，創作于1885年的輕歌劇《天皇》就吸收了這首歌的曲調和部分日語歌詞：

宮様、宮様、お馬の前のぴらぴらするのは何じゃいな。とことんやれとんやれな。ありゃ朝敵征伐せよとの錦の御旗じゃしらなんか。とことんやれとんやれな。[[37]](#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 1. [[1]](#_1_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95—596頁。
  2. [[2]](#_2_15)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24.
  3. [[3]](#_3_15) 原文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96頁。亦可見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114頁。薩道義寫道，“城里到處張貼著一張由巖下、伊藤和寺島署名的告示，通知人們天皇會遵守條約，并叮囑大家對待外國人要有正確的舉動”（A Diplomat in Japan, p. 326）。他指的可能是2月16日發給各國大使的另外一份文件。
  4. [[4]](#_4_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00—601頁。收件人橋本實梁（1834—1885）已經離開京都到東部去了。他在桑名收到了親子內親王的信。這封信深深打動了橋本，他讓送信人把信帶回京都給參議萬里小路博房看，并讓宮廷考慮下這件事。
  5. [[5]](#_5_15) 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120—121頁。
  6. [[6]](#_6_15) 石井孝，《戊辰戦爭論》，123頁。
  7. [[7]](#_7_15) 石井孝，《戊辰戦爭論》，124頁。
  8. [[8]](#_8_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18頁。“公現”是伏見宮邦家親王第九個兒子的法號。這個時期更加常用的稱呼是能久親王或者輪王寺宮。
  9. [[9]](#_9_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03頁。盡管路易·菲利普國王也與普通民眾接觸，但這里提到的君主可能指的是維多利亞女王。
  10. [[10]](#_10_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02—603頁。
  11. [[11]](#_11_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11頁。上一次他離開御所時皇宮發生了大火，大部分的宮殿都陷入火海。
  12. [[12]](#_12_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27頁。
  13. [[13]](#_13_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28頁。
  14. [[14]](#_14_15)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37。
  15. [[15]](#_15_14)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p. 347, 353；《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0頁。
  16. [[16]](#_16_14)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47。薩道義的同事米特福德（即后來的雷德斯代爾勛爵）的看法與此不同。他聽一位“親眼目睹事件之恐怖”的法國軍官說，“第一個犯人走上來，將匕首用力刺向自己的腹部，內臟隨即流出來；他用手托住內臟，開始唱歌，歌中痛罵外國人污染了這片神圣的‘眾神之地’并表示要向他們復仇，他一直在唱著恐怖的歌曲，直到最后斷氣”（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 446）。根據米特福德所聽到的消息，十一個人以這種方式行刑之后，“法國人再也看不下去了，佩蒂特·圖瓦爾船長請求寬恕剩下的九個人”。
  17. [[17]](#_17_14) 薩道義描寫了發生在神戶的這次事件。備前藩的人在瀧善三郎的指揮下，向外國人開火，并殺死了一個美國水手（A Diplomat in Japan, pp. 319-320, 344）。他隨后被命令切腹自殺。
  18. [[18]](#_18_13) 西方人更為熟悉的一個詞是“腹切”（Harakiri），傳統武士更喜歡使用“割腹”（Kappuku）。但是不管名稱如何，這個行為都是用匕首深深地劃開自己的腹部，以顯示內臟潔凈無瑕。
  19. [[19]](#_19_13)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p. 346-347.
  20. [[20]](#_20_12) 羅斯在日本的職位是高級外交官。范·波爾斯布魯克雖然職位比較低，但是可能因為日本和荷蘭之間的長期關系而先于巴夏禮被天皇接見。
  21. [[21]](#_21_12) 天皇所穿直衣的名稱。——編注
  22. [[22]](#_22_11) 他還有一個名稱叫“山階宮”（1816—1898）。他是伏見宮親王的長子，八歲（1824年）出家，但是后來還俗，并積極參加明治維新。米特福德在覲見天皇之前與他短暫見了面，他這么描述他：“親王穿著舊式的紫色朝服，頭戴一頂用黑色皺紙做成的奇怪帽子（烏帽子）。他染了牙齒，但是由于黑齒需要每兩三天重新染一次，當時正處于過渡階段，因此它們看起來并非最佳。幾天后我們再見到他時，他的牙齒剛剛新染過，錚亮得就跟漆皮一樣”（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 447）。
  23. [[23]](#_23_1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5頁。
  24. [[24]](#_24_10)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59。關于對英國使團的攻擊，米特福德另有描述。有一段尤其令人難忘：“我聽到槍聲和劍擊聲，有人在喊，‘我們被襲擊了！’‘殺了他！’‘朝他開槍！’，諸如此類。我以此生從未有過的敏捷速度跳出轎子，向前狂奔而去。街上一攤攤的血跡，我看到有個殺手斗志昂揚地向我走來，這個時候他自己已經受傷，但并不嚴重。他的劍在滴血，臉也在流血，我知道日本人的劍術，心里很清楚要是一劍劈下來自己肯定躲不過，因此我乘他不注意沖過去，一把奪下那把滴血的劍。我把他扭送給第九（連隊）的人，但是被他掙扎著逃跑了，他沿著小路狂奔，沖進一處庭院，我跑去看巴夏禮是否安全。讓我倍感欣慰的是他正騎在馬上，非常鎮定地和薩道義在一起，薩道義的馬在流血，謝天謝地，他也沒有受傷。我在追趕他們時被什么東西絆了一下。那是一顆人頭。”（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 450） 9月1日，英國女王分別賜給后藤和中井一把寶劍，以表彰他們救了英國公使一命（《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9頁）。
  25. [[25]](#_25_10)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60。行刑前兩小時，名為三枝蓊的僧侶被拍了照片。他瞪著照相機，沒有絲毫懺悔之意。在犯人抓捕歸案后，米特福德曾與那名試圖殺害自己的罪犯談話，他也提到那名罪犯一再希望快點被砍頭（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p. 452-453）。《甦る幕末》第164—165頁上刊登了另外一名襲擊者林田貞堅的頭顱的照片。4月15日，三枝和林田的頭顱被掛起來示眾，三名共犯被流放到隱岐。三天之后發布了一道公告，告誡人們不要攻擊外國人，說這不僅違背了宮廷的意愿，而且還損害了天皇的聲威，并很可能導致國際沖突（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p. 455-456；《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9頁）。
  26. [[26]](#_26_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6頁。
  27. [[27]](#_27_9)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61.
  28. [[28]](#_28_7)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p. 451-452.
  29. [[29]](#_29_7) 正如米特福德所解釋的，薩道義無法陪他們到皇宮去，因為“他當時并未覲見過我們自己的陛下，因此，按照禮儀，不能覲見外國君主”（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 458）。
  30. [[30]](#_30_7)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p. 456, 457.
  31. [[31]](#_31_6) 原文為意大利語，即英語的“貴族血統”（blue blood）。
  32. [[32]](#_32_5)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p. 459-460.
  33. [[33]](#_33_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8頁。
  34. [[34]](#_34_5)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 461.伊藤俊輔自然就是伊藤博文。1863年他到英國留學并掌握了流利的英語。
  35. [[35]](#_35_4) 新選組成立于1863年，由一群精心挑選的浪人士兵組成，主要被幕府用來鎮壓京都的攘夷運動。1864年新選組的成員粉碎了寺田屋的陰謀。即使在鳥羽和伏見戰役失敗之后，成員們依然奮力地為前將軍賣命。盡管在和皇軍的交鋒中多次敗北，但是它身上有著一種特殊的光環，并經常出現在人們的筆下，這無疑是因為受到成員們那種明知不可而為之的極端忠誠精神的感染。關于當時對這次戰斗的描寫，請參考新人物往來社編，《新選組史料集》，第205—214頁。
  36. [[36]](#_36_4) 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126—127頁。
  37. [[37]](#_37_3) 這段歌的大意是：“閣下，閣下，你的馬前面飄動的是啥？” “那是錦旗和給我的命令，‘打敗朝敵！’你沒看出來嗎？”《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89頁。此段是“宮さん”，而不是吉爾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的輕歌劇中所寫的“宮さま”。

# 第十六章 五條誓文



1868年4月7日頒布的《五條誓文》，無疑是年輕天皇發布的第一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法令。天皇當著天地神祇宣誓時，包括公卿和大名在內的百官都在場。宣誓的前一天，天皇頒布詔書，宣布恢復長期以來被武家強制中止的各種神道教儀式。其目的明顯是恢復古代祭政一致的制度。[[1]](#_1___Gu_Dai__Zheng___maturigoto)

復古計劃的一個核心是重新設立神祇官。這個職位早在8世紀初就已設立，但是這幾百年來只是名義上的虛職而已。如今，神道教的神官、宮廷和神社舉行的神道教儀式都將受神祇官管轄，而神官也將恢復長期以來被替代的各種功能。重視神官職務、強調神道教和佛教分離的態度在四天之后更加清晰：新政府頒布了一項更為詳細的法令，要求那些本身是和尚的神官必須放棄佛教的身份、職位，廢棄袈裟，還俗蓄發。[[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一千多年來，盡管神道教和佛教之間天生存在矛盾，但大多數日本人都同時信仰兩種宗教。例如，根據神道教的教義，現世是美好而歡樂的，死后的世界——黃泉——則是污穢和腐敗之地。與此相反，佛教的教義則認為現世充滿了痛苦和磨難，但此生的所作所為卻能使我們死后享受極樂凈土的快樂。那些論述宗教問題的日本人完全忽略這些根本性的分歧，廣為民眾接受的是“本地垂跡”說，即認為神道教神祇是佛教的佛與菩薩在日本的化身。[[3]](#_3__Zhe_Ge_Shi_Qi__Fei_Fo_Hui_Sh)天皇計劃恢復神武（初代天皇）時期的祭政一致體系，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在這時遭到了排斥甚至迫害。[[4]](#_4___Ben_Di_Chui_Ji__De_Zui_Zao)

長期以來，佛教的官方地位都比神道教重要得多。天皇們時不時出家，死后還以“院”（寺廟的名稱）作為稱呼，然而皇室卻從未忽視神道教。天皇履行的最重要的儀式都和神道教有關，每一年都以祭拜四方的“四方拜”開始。這個儀式于新年那天的寅時舉行，天皇向自己生辰星（屬星）、天地四方的神祇、父母親的墳墓方向遙拜，祈禱五谷豐登和長治久安，即現世的一切幸福遵照的都是神道教的現世觀。儀式中包括天皇的屬星，表明神道教儀式受道教的影響很深。宮廷常常依靠陰陽師占卜運氣的好壞。在咨詢陰陽師之前，宮廷不會有任何行動。

明治初期日本人的宗教生活包含了神道教、佛教、道教等信仰，其中也有或許可以稱之為迷信的因素。神道教，尤其是神祇官得到特別的重視，當然與天皇的重要性增加有密切關系，因為神道教認為，天皇是世界上地位最高的人。

天皇宣布《五條誓文》時的儀式完全是神道教的。那天的儀式在紫宸殿舉行，公卿、大名和低級官員身著各自的朝服濟濟一堂，場面甚是壯觀。儀式一開始是灑鹽水和撒米，這是祓除的儀式。接下來由神道教的大神官白川資訓演唱降神的神歌。祭品擺好之后，天皇身著引直衣，在兩名副總裁（三條實美和巖倉具視）、兩名輔弼（中山忠能和正親町三條實愛）等高官的陪同下走了進來，坐在皇位上。天皇面朝南方，[[5]](#_5__Qi_Dao_Wen_De_Yuan_Wen_Jian)神座在他右手邊的斜對面。四幅描繪四季風景的屏風圍繞著天皇的寶座。

三條大聲朗讀了一份神道教的祈禱文。他首先向天地諸神祈禱，[[6]](#_6__Gen_Ju_Zhong_Guo_De_Tian_Wen)念完之后，天皇走向祭壇前方的跪墊，叩拜禱告，貢上系有布帛的楊桐枝。接著三條大聲宣讀天皇的《五條誓文》：

廣興會議，萬事決于公論。

上下一心，盛行經綸。

官武一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破除舊來之陋習，一本天地之公道。

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國之基礎。

眾所周知，誓文的撰寫者并不是明治本人，而是由兩位武士出生的學者由利公正（1829—1909）和福岡孝弟撰寫，再經過木戶孝允的修改。[[7]](#_7__Shi_Wen_You_You_Li_Gong_Zhen)一些學者不太相信誓文的重要意義，他們認為這些看似自由的理想掩蓋了誓文的真正目的：在第二天攻打江戶城的戰斗中，贏得全國人民的支持。[[8]](#_8__Yuan_Shan_Mao_Shu_Bian____Mi)

如果你以為五條誓文意味著政府領導人打算近期成立議會，則大錯特錯。但是，不管誓文是否真心追求進步，它使用的語言都是日本甚至整個漢字文化圈前所未有的。“萬事決于公論”絕對不是習慣的做法，認為下層人民享有管理國家的權利也不是——不管你如何定義“下層人民”。第四條誓文——“破除舊來之陋習，一本天地之公道”——誠然模棱兩可，非常容易引起歧義，但是人們通常都贊美過去的習俗，將其與現在的墮落風氣相比較，絕不認為那是“陋習”。最后一條表示將在全世界范圍內追求知識，看起來甚至和復古的基本理念——借鑒日本的過去，而不是借鑒其他國家——相抵觸。后來，五條誓文表達的原則受到淡化，有時還被忽略，然而卻從未被否定。五條誓文被保留下來，因為它體現了那些希望日本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有識之士的理想。[[9]](#_9__6Yue_19Ri__Zheng_Fu_Bu_Men_J)

誓文宣讀完畢，公卿、大名等在場人士都在文件上簽名，以表示堅定擁護《五條誓文》的決心。他們“誓死奉戴綸旨，勤勉從事，以安天子之心”。那些沒有到場的公卿和大名后來都到宮廷簽了名，加起來一共有七百六十七人。[[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天皇自己如何看待這個儀式？就算他和身邊的人說過一些看法，也沒有留存下來。天皇還太年輕，起草誓文時很可能沒有人咨詢過他。因此我們甚至可以想象，他是在聽三條實美大聲朗讀時才第一次知道誓文的內容；但是，要說這個儀式——他繼位以來最令人難忘的一個場景——以及《五條誓文》的宣言沒能打動他，也難以想象。正因為天皇既年輕又缺乏經驗，誓文體現的理想主義或許才深深感動了他。統治初期，天皇本人確實表現出贊同五條誓文的行動。

《五條誓文》頒布的同一天，還頒布了天皇的一封信。信中天皇描繪了祖先的功績，安慰民眾，并承諾將提高國家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威望：

朕以幼弱猝繼大統以來，思慮以何與萬國對立，方可恭奉列祖，朝夕恐懼難堪也。中世朝政衰落，武家專權，表推尊朝廷，實敬而遠之，至億兆百姓之父母，不能知赤子之情，遂億兆百姓之君主僅存名諱。故今日于朝廷之尊重，較古時或有倍增，然朝威倍衰，上下相離，隔如天地。如此形勢，朕以何君臨天下？今般值朝政一新之時，若天下億兆臣民，有一人不得其處，皆為朕之罪。今日之事，乃朕勞身骨，苦心志，立于艱難之處。故履列祖之蹤跡，勤于治世，方始履天職，不背億兆之君之義務。往昔列祖親臨萬機，若有不臣之事，親自為將而征之。朝廷之政裁簡易，如此，君臣相親，上下相愛，德澤天下，國威耀于海外。然近來值宇內大開、各國自四方飛來之時，獨我國固守舊習，不求一新。朕若僅安居于九重中，偷一日之閑，忘百年之憂，恐我國受各國輕蔑，上辱列圣，下苦百姓。故朕在此同百官諸侯共誓，繼列祖之偉業，不問一身之艱難辛苦，親經營四方，安撫汝等民眾。終開萬里之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置天下如富岳山（富士山）之安。汝等民眾僅以舊來之陋習為尊朝廷之事，則不知神州之危急。朕舉手頓足，則生非常之驚，生種種疑惑，萬口紛紜。然朕喪失此志，即是朕失為君之道時，亦失列祖之天下時。汝等詳察朕志，去私見，采公義，助朕之業，保全神州。慰列圣之神靈，乃朕生前最幸事也。[[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這封信特別有意思，因為它和孝明以及任何一位前天皇寫的信都非常不一樣。信的主題是天皇希望與民眾建立更親密的關系。天皇譴責武家為自己營造了一個光環，使民眾無法理解自己，而自己也無法理解民眾的感受。他說，自己現在打算拋棄天皇的被動角色，主動承擔起治理國家的責任。天皇在這里是呼吁大家在即將發生的大變革中與其配合。他的祖先們從未想到與民眾通力合作的重要性。

4月8日，《五條誓文》發布的第二天，寫有五條禁令的新布告牌代替了幕府的布告牌。前三條禁令與幕府長期以來的規定相似，余下的兩條則是為了應對當前的危機而定下的權宜之策。

第一條禁令依照慣例是：“遵守五倫之道；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禁止殺戮、縱火、偷盜及其他的惡行。”

第二條禁令保留了幕府原來的規定，禁止謀反、通過非正規的途徑上訴、集體離開鄉村以及其他反抗行為。第三條禁令嚴禁傳播基督教，并通過懸賞的方式鼓勵人們向當局舉報任何可疑的傳播者。

前三條禁令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但是剩下的兩條才是重點。第四條顯然想嚇退那些仍然抱有“攘夷”思想，試圖通過恫嚇或流血來趕跑外國人的人：

茲王政一新，乃循朝廷條理，交際外國，依萬國公法履行條約，不可加害外國人。背此者有悖朝命，釀成國難，乃至失國際信義，傷皇國威信，故應處至當之刑。

第五條禁令可能是為了阻止那些不滿家鄉生活條件的人。他們計劃趁幕府垮臺，旅行更為方便之機搬到更舒適的地方居住：“嚴禁士民逃離本國。對國家及主家有意見者，許建言太政官。”

較之當著公卿和大名的面宣讀的《五條誓文》，這些遍布全國的告示更為普通民眾所了解。[[12]](#_12__Tian_Zhong_Zhang____Wei_Wan)第四條禁令尤為重要，它宣告了“尊王攘夷”口號中“攘夷”部分的終結。

就在這時，西鄉隆盛和慶喜的顧問勝海舟（1823—1899）正在江戶就江戶開城的問題進行談判。勝海舟咨詢了英國公使哈里·巴夏禮爵士的意見。歐內斯特·薩道義爵士寫道：

（勝）說他準備為保衛慶喜而戰，并且相信西鄉有能力阻止宮廷下達令天皇蒙羞或延長內戰的諭旨。勝懇求巴夏禮爵士利用自己對天皇政府的影響力，避免這種災難的發生。巴夏禮確實一再這么做，特別是4月28日西鄉來訪時，他一再強調，嚴懲慶喜及其支持者（尤其在人身處罰方面），將會損害新政府在歐洲各國心目中的威望。西鄉說新政府不會要前將軍的命，對那些煽動慶喜進攻京都的人也能同樣從寬處理。[[13]](#_13__Sir_Ernest_Satow_A_Diplomat_1)

江戶無血開城的談判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這名外國人的建議。4月26日，在橋本實梁和西鄉隆盛的帶領下，約六十人進入江戶城，新主人德川慶賴在西門恭迎他們。雙方同意在一周后，即5月4日，把江戶城移交給天皇的軍隊。那天，天皇的軍隊順利接管了幕府的這個據點。[[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江戶開城談判。左為西鄉隆盛，右為勝海舟。圣德紀念繪畫館，結城素明所繪

此時發生了一件對明治天皇同樣有著重要意義的事情。4月14日，天皇擔任軍隊的總司令，離開御所，向大阪進發。他乘坐一頂蔥華輦，隨身攜帶著神圣的八咫鏡，一路上錦旗飄揚。博經親王、三條實美和中山忠能率領二十九名公卿騎馬陪同。熾仁親王則在前方率領前鋒部隊。皇太后和公卿百官身著正式服裝，目送天皇離開。天皇的坐轎經過堺街和三條通時，沿路的民眾都跪著觀看這一盛儀。晚上8點，隊伍抵達石清水八幡宮，天皇在神社過夜。隊伍前進的速度緩慢，直到4月16日下午天皇才抵達大阪的東本愿寺別院。[[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4月19日，天皇在天保山檢閱艦隊時第一次看到瀨戶內海，對他來說，這可能是此次重大旅行途中最激動人心的一個時刻。他在阿吉河邊登上一艘小艇，溯流而下，兩岸站著守衛的士兵。中午時分，天皇抵達天保。隸屬于佐賀藩的“電流丸”號軍艦鳴放禮炮，向天皇致敬，隨后，一艘停泊在那里的法國軍艦也鳴放了禮炮，“電流丸”號隨后鳴炮向對方回應。午飯后，天皇觀看了軍艦調度的演習。這確實是天皇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不僅離開了御所的封閉世界，還看到了成片的大海，并受到了海軍的鳴炮歡迎。

戊辰戰爭并沒有結束。北部的戰斗仍在持續，榎本武揚把將軍的艦隊開往北海道，江戶城依舊在彰義隊的威脅之下。江戶開城后，一些仍支持被廢黜的將軍的人組成彰義隊，以上野寬永寺為中心活動。鎮壓這些叛亂分子需要時間，但是（至少回想起來是這樣）很明顯，天皇軍已經不再面臨嚴重的威脅。[[16]](#_16__Dang_Shi_De_Ren_Suo_Chi_De)

與此同時，年輕的天皇正在大阪過著舒適的生活。5月22日，他接見了英國全權公使哈里·巴夏禮爵士，后者遞交了維多利亞女王的國書。與巴夏禮一道覲見的有海軍上將開帕爾（A. B. Keppel）、米特福德、薩道義、各使館成員以及海軍人員。見面的地點在東本愿寺別院。鑒于上次見面時發生了針對巴夏禮及其隨從的暴力事件，這次的安保措施特別嚴格。薩道義對這次見面的描繪極為有名：

天皇坐在高臺的最深處，一頂黑漆柱子的華蓋之下，簾子高高卷起。我們列成兩隊走到屋子中央。右邊一隊是海軍人員，由海軍上將帶領，左邊是使館工作人員，由公使領頭。所有人都鞠了三次躬，第一次在走向屋子中央的時候，第二次在高臺腳下，第三次在走上高臺的時候。高臺很寬闊，足以容納所有人。我們每次鞠躬天皇都要從華蓋下起身。外國事務總督和另外一位大人跪在天皇御座的兩邊。

御座的前方兩側各放著一只木刻的小獅子。這些都是古物，極受日本人的崇拜。御座后面是朝臣，他們分兩排站立，頭戴黑色的紙帽，身穿五顏六色的漂亮錦袍。天皇站起來時，他的臉上半部，包括眼睛都會被擋住，然而他一走動我就能看到他的全貌。天皇的臉色蒼白，也許是化妝的緣故。他的臉型不好，用醫學術語來說是“突顎”，但是總體上臉的輪廓還不錯。他把眉毛全部剃掉了，再畫在距離原來兩三厘米高的地方。天皇身穿寬松的黑色長披風，像斗篷一樣的白色上衣，還有肥大的紫色褲子……

哈里·巴夏禮爵士向前一步，將女王的國書交給天皇，天皇顯然太過害羞或者難為情，不得不由山階宮幫忙。[[17]](#_17__Geng_Jia_Wei_Ren_Shu_Xi_De)他的職責是從天皇手里接過國書。接著陛下忘了該說什么，但是經左邊那位大人提醒，勉強說完了第一句話，伊藤（博文）隨即念了事先準備好的整段話的翻譯稿。然后哈里爵士逐一介紹我們，接下來是海軍上將介紹海軍官員。天皇表示希望上將麾下的艦隊一切順利，接著我們退到前廳，一邊走一邊鞠躬，暗自慶幸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18]](#_18__Sir_Ernest_Satow_A_Diplomat)

有關這個時期天皇接見外國人的情況，日本人的描繪極少，原因無疑是出于敬畏。5月1日，大久保利通被天皇召至他臨時駐蹕的東本愿寺，在日記中他提到自己流下了喜悅和感激的淚水，因為想到身為區區一介武夫，竟然得以蒙恩覲見天皇。他無法控制自己，那天余下的時間一直都在喝酒。[[19]](#_19____Da_Jiu_Bao_Li_Tong_Ri_Ji)5月9日，木戶孝允和后藤象二郎也被召至東本愿寺覲見天皇。木戶在日記中寫道：

天子問天下之形勢、海外萬國之大勢……

布衣之身，于咫尺間奉拜天顏，數百年未曾聞之。感淚滿襟。今日只浩嘆中興之大業實行未果。午后，（天皇）于簾內睿覽角力（相撲）。[[20]](#_20__Sidney_DeVere_Brown_and_Aki)

橫井小楠（1809—1869）在給家人的信中，也描繪了7月13日天皇的一次接見給他留下的印象：

他的臉很長，皮膚黝黑，聲音洪亮，身材纖細。至于長相，我猜你也許可以說他長得很普通，但是給人的整體印象卻是儀表堂堂，我極度惶恐而又高興。[[21]](#_21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

明治在大阪的日子遠沒有在御所時受那么多規矩限制。他的功課沒有拉下，但可能很享受相對自由的生活。5月4日，他從簾后觀看了一場日本劍術的表演。接著學習《大學》、《孫子兵法》和《三略》。[[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后兩本都是兵法書。5月9日，天皇上了一堂講授《孫子兵法》的課，此后他每天都要聽（高級公卿有時也會參加）講授日本和中國典籍的課。天皇的教育成為他身邊的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大阪之行使天皇的形象變得明朗起來，至少在他的顧問和外國精英眼中是這樣。不過德川慶喜已經甘愿接受處分，大家便都認為天皇作為遠征軍總司令的職責已經結束，計劃讓他回到京都。大久保利通自然很不高興，因為他希望都城遷往大阪，擔心天皇回到京都之后又會跟以前一樣遠離臣民。[[23]](#_23__5Yue_23Ri_Da_Jiu_Bao_Xie_Ge)

5月28日，天皇離開大阪。這一次比來時走得快，第二天就到了京都。天皇的轎子一進皇宮的大門，雅樂的樂師和舞妓就演奏起慶祝天皇凱旋的《還城樂》。

那天天氣特別好，普通民眾蜂擁到大街上，希望一睹天皇勝利歸來的風采。宮門上方懸掛的象征天皇親自指揮作戰的錦旗已經被取下來。天皇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首次凱旋了。

1. [[1]](#_1_16)  古代“政”（まつりごと）這個字的含義就包括祭祀神靈和治理國家兩層意思。這道法令被印在《太政官日志》上，于1868年2月12日首次頒布。副本被送往幕府各個藩國和幕府直接統治的各個區域（《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2頁；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28頁）。 神道教的復興導致許多保存在神社中的佛教經文、藝術品以及法器被摧毀和破壞，并導致政府下令禁止神官出現這類放肆的行為（《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65—666頁）。

1. [[2]](#_2_1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46頁。那些不想放棄佛教職位的人被責令單獨申請。4月21日，政府公布了禁止將神道教和佛教混淆在一起的法令。被稱為神道教眾神“本地”的佛像，必須立刻搬離神社，佛教的禮器、大鐘、鑼等等也要一起搬離。甚至有呼聲要求禁止佛教（《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63頁）。

1. [[3]](#_3_16) 這個時期“廢佛毀釋”（意為廢除佛教，摧毀釋迦牟尼）一詞被頻繁使用，盡管官方的政策是將兩種宗教分離，而不是要摧毀佛教。有關描寫明治時期對佛教迫害的英文著作，請參考James Edward Ketelaar,Of Heretics and Martyrs in Meiji Japan 。

1. [[4]](#_4_16) “本地垂跡”的最早例子似乎可以追溯到公元937年，當時人們認定有兩位神是菩薩的化身。經過一段時間之后，每個神據稱都是某位佛陀或者菩薩的化身。佛教真言宗的十三位佛陀成為了大多數神靈的“本地”。神道教的宗教儀式吸收了加持祈禱、護摩、護符、預兆等眾多真言密教的教義。佛教和神道教之間融合最重要的產物是“兩部神道”，這是一個真言宗（金剛界胎藏界兩部曼陀羅）與伊勢大神宮（內宮外宮）結合后衍生出來的術語。

1. [[5]](#_5_16) 祈禱文的原文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48頁。禱文描繪了當時的情形，然后將話題轉向天皇即將公布的誓文。

1. [[6]](#_6_16) 根據中國的天文學說，皇帝的位置在北方，面朝南面的大臣和諸侯。

1. [[7]](#_7_16) 誓文由由利公正首先起草，經福岡孝弟多次修改，木戶孝允多次提出意見。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52—655頁。

1. [[8]](#_8_16) 遠山茂樹編，《明治維新》，第192—193頁。遠山認為，《五條誓文》以及明治天皇統治初期所頒布的類似措施，看似自由，實際上“不過是在將天皇的專制制度推向世界時，為了緩解陣痛而打的麻醉劑。這是開明的專制制度實施之前的典型做法”。他還更加具體地批評了誓文：例如，由利公正第三條提到允許普通民眾追求自己的事業，但那僅僅是基于經濟上的考慮，讓富商富農在政府中有一定的發言權。田中彰認為第一條誓文僅僅是個口號，注定將被遺忘，因而不去考慮它（《未完の明治維新》，第24—28頁）。他還認為其自由的基調是為了讓外國列強相信，在發生了許多針對在日外國人的暴力事件之后，新政府已經變得非常開明。田中還引用了久米邦武的文章，文中說1872年木戶孝允似乎已經完全忘了他自己曾參與擬寫這份誓文，說明他并未將它看得有多重。

1. [[9]](#_9_16) 6月19日，政府部門進行改革時，據說目標就是為了符合《五條誓文》（《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08頁）。另外，田中說自由民權黨的領導們非常欣賞《五條誓文》的民主主義特色（《未完の明治維新》，第28頁）。

1. [[10]](#_10_1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49頁。

1. [[11]](#_11_1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49—652頁。

1. [[12]](#_12_16) 田中彰，《未完の明治維新》，第28頁。

1. [[13]](#_13_16) Sir Ernest Satow,A Diplomat in Japan , p. 365-366.

1. [[14]](#_14_1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71頁。

1. [[15]](#_15_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61頁。

1. [[16]](#_16_15) 當時的人所持的觀點并不一定如此。例如，木戶孝允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如果目前的情況再持續一年，不僅國家將會陷入貧困，最終也無法建立天皇的統治”（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 1, p. 32）。木戶對戰斗的結果做了幾個悲觀的預測，這只是其中一個。

1. [[17]](#_17_15) 更加為人熟悉的名字是“晃親王”（1816—1898），他是伏見宮許多個兒子中的長子，八歲時出家為僧， 1864年還俗并建立山階宮。1866年，他和巖倉具視以及其他人因為政治原因而被幽禁。明治維新之后，他成了一名議定，這時他擔任外國事務總督。

1. [[18]](#_18_14) Sir Ernest Satow,A Diplomat in Japan , pp. 370-371.日本人對會面的描寫包含了一個薩道義沒有提到的細節：當巴夏禮爵士將維多利亞女王的國書呈給天皇時，誠惶誠恐，以至晃親王不得不扶著他（《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86頁）。當然，這聽起來不像是我們平時所了解的巴夏禮爵士的樣子。

1. [[19]](#_19_14) 《大久保利通日記》第一卷，第452頁。亦可見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25頁。

1. [[20]](#_20_13) 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 1, p. 12.

1. [[21]](#_21_13)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25。《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05—706頁上橫井的原話有些不同。

1. [[22]](#_22_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70頁。

1. [[23]](#_23_12) 5月23日大久保寫給木戶的一封信的摘錄，見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26。有關大久保建議都城遷往大阪的奏折，亦見遠山茂樹編，《天皇と華族》，第6—8頁。

# 第十七章 親王叛亂



天皇從大阪返回京都不久，就頒布了一項公告，宣布將親自處理一切國事：[[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主上年幼，故迄今住居后宮，[[2]](#_2__William_Elliot_Griffis__The)然依先前誓言及主上所思慮，今后移居前殿，每日辰時出御學問所，[[3]](#_3__Yuan_Wen_Jian_Yuan_Shan_Mao)為萬機之政，聽輔相[[4]](#_4___Hou_Gong__Tong_Chang_Cheng)奏聞。亦時時親臨八景之間。[[5]](#_5___8Dian___Chen_Ke__Yuan_Zi_Li)御清暇之時研習文武，申時歸前殿。此順序為御制定之事。

參與（新政府的顧問）橫井小楠在一封信里（上文已經提到過）表示，自己極度崇拜認真工作的天皇。他記載了明治早朝時是如何坐在“玉座”上——有兩個榻榻米高，放在八畳[[6]](#_6__Dang_Shi_Guan_Liao_Zhi_Du_Xi)間的中央——完全沉浸在工作中的。身旁的煙灰缸是唯一的陳設。[[7]](#_7__Ba_Jing_Zhi_Jian_Shi_Fu_Xian)兩三名“近習”[[8]](#_8__Wei_Ri_Ben_Mian_Ji_Dan_Wei)在距離他約兩米遠的地方伺候，大臣們則坐在在門檻的另一側。議定和參議走上來匯報工作，單獨一人或者兩三個人一起。橫井說：“如斯盛事，實千余年絕無之事。”[[9]](#_9__Zhe_Ge_Xi_Jie_Bie_Chu_Bu_Jia)

同時，政府也宣布重組，此前的太政官將分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10]](#_10__Tian_Huang_De_Tie_Shen_Shi)做此安排的人顯然是以美國或歐洲國家為模板，[[11]](#_11__Chan_Shi_Jian___Ming_Zhi_Ti)然而他們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仿效外國，而是為了實施《五條誓文》。盡管肯定沒有人能想到（或者要求）短時間內就實現民主，任何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參政（只有親王、公卿和大名才有資格成為一等官[[12]](#_12__Zhe_Li_De_Tai_Zheng_Guan_Bi)），然而重組卻為那些有能力的武士甚至平民打通了升遷的通道，使他們得以晉升為二等官。[[13]](#_13__Ou_Nei_Si_Te__Sa_Dao_Yi_Jue)官員將由選舉產生，任期四年，之后再輪轉，[[14]](#_14__Ming_Zhi_Shi_Qi_Ri_Ben_Guan)并允許連任。所有人無論等級高下——不管是大名抑或只是農民和商人——都要為新政府納稅，用以維持一支軍隊，維護國內的安全；官員則必須將收入的三十分之一繳納給國家。

這段時期還公布了許多其他的規定，有些特別詳細，有些則是普通的告誡。一切規定都是為了建立一個不亞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國家這一明確的目標。

戰斗并沒有結束，特別是在國土的東北部和北部。一眾高級公卿被派往騷亂地區擔任司令，即便他們從未有過專業訓練（將來也不會入這一行），并不能勝任軍事指揮的工作。例如，以自由思想而著名的西園寺公望（1849—1940），軍事才能并不出眾。6月15日，他被任命為北國鎮撫使，并于次日啟程前往越后國履新。可能與其他被選為司令的公卿一樣，西園寺只不過是個掛名的首腦，但是這些任命表明，人們依然相信軍事才能與傳統的儒家經典教育息息相關。[[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這個時期最為神秘的參戰公卿要數能久親王。他生于1847年，是伏見宮邦家的九子。1858年，能久親王在江戶上野的天臺宗皇家寺廟輪王寺剃度出家，被賜法號“公現”。[[16]](#_16__Dan_Shi__Wei_Le_Bao_Zheng_Z)1867年，公現被任命為寺廟的主持，就他的年紀而言這是個很高的職位。假如不出什么意外，他的余生將在祈禱和冥想中度過，然而德川慶喜宣布臣服宮廷之后，便離開江戶城住進了上野的寬永寺，請求公現到京都去一趟，在天皇面前為自己說情。[[17]](#_17__9Yue_11Ri__Yan_Cang_Ju_Shi)

公現這時被稱為輪王寺宮。1868年3月3日，慶喜派特使拜訪公現，請求他在熾仁親王面前為自己求情，但被拒絕。輪王寺宮說，自己從小便出家做和尚，已經不熟悉塵世的事務，沒有能力在這種國家大事中擔任仲裁。再說，自己雖然熟悉念經誦佛，但是在為人處世和說服別人方面卻毫無經驗。如果一定要有個人去，希望派遣其他人。[[18]](#_18__Da_Bu_Fen_Miao_Xie_Ta_1868N)

第二天，慶喜親自拜訪輪王寺宮，正式請求他去京都。輪王寺的管理人覺王院義觀代替親王回應說，輪王寺公的父親現在已高齡，如果他去京都，或許很難回來，屆時無疑會使江戶人心動搖，因此另找他人更妥。[[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義觀提到，假如輪王寺宮不能平安回來，“江戶人心動搖”，這表明輪王寺宮很受歡迎或者至少是非常出名，也許這是因為他和宮廷的關系非常親密。

慶喜不情愿地離開。然而3月15日，慶喜請來義觀并告訴他，天皇軍的大總督熾仁親王已經離開京都，正率軍朝江戶攻來。他再次請求輪王寺宮親自去一趟宮廷，為了說服他，慶喜第二天還給輪王寺宮寫了封信。3月7日，山岡鐵舟（1836—1888）等幕府高官也聯名給義觀寫信。慶喜等人的鍥而不舍表明，他們認為，假如輪王寺宮到京都去求見天皇，以他崇高的地位，天皇不可能拒絕他，而這是慶喜獲得天皇原諒的最佳機會。3月9日，親王最終同意接受使命，并將動身的日子定在3月13日。他將帶大約六十名隨從前往，這跟他平時的出行差不多。隨從不僅包括和尚和武士，還包括一名醫生、一名法律顧問、一名秘書、一名廚師、三名茶童以及包括轎夫在內的許多男仆。盡管如此，對于當時像他這樣身份的人來說，這個排場算是很小的了。[[20]](#_20__You_Ma_Lai_Yi____Bei_Bai_Ch)

3月13日早上大約10點，親王的轎子啟程離開上野。隨行人員的家人不分老幼都來送行。他們大概是擔心親王會被扣留在京都回不來，因此別離時特別悲痛。江戶人民看到轎子經過，都含淚鞠躬，親王不顧自身安危到京都為德川家求情的無私精神感動了江戶市民，他們在路旁目送。

3月17日，親王一行抵達小田原，比原來的計劃晚了兩天，但親王由于身體不適無法繼續前行。兩天后，天皇軍的先頭部隊開進了小田原，一些來自薩摩、長州和大村藩的人以及大總督的一名特使和義觀見了面。他們問義觀為何要去京都，以及為何要帶這么多士兵。特使又問了幾個問題之后，命令輪王寺宮呆在小田原，等候大總督的決定。他還堅持讓親王的護衛返回江戶。親王聽從了命令，遣散了所有隨從，只留下有僧籍的人。[[21]](#_21__You_Ma_Lai_Yi____Bei_Bai_Ch)

3月26日，一名薩摩武士通知輪王寺宮大總督將于次日抵達靜岡，要他趕去那里。親王天沒亮就啟程離開小田原，當時正下著瓢潑大雨。親王和隨從經過箱根湯本村時，遇到了一隊正朝小田原進發的薩摩士兵。士兵們高聲歌唱，嘲笑親王：“為什么親王要冒雨上京？”[[22]](#_22__You_Ma_Gu_Ji__Xiang_Lun_Wan)

士兵走近親王的轎子，試圖用刺刀和槍托去推轎門。當轎子來到親王準備休息的屋子附近時，他們發現房屋被士兵圍得水泄不通，只好在一間寺廟里暫避。重新上路時，路上的士兵更多，而且比先前那一撥更無禮。親王一行本打算在箱根的一間寺廟里用午餐，那天早上也已經準備好了便當，但那間寺廟同樣都是士兵，于是他們只好餓著肚子繼續趕路。當時天色已晚，雨一點也沒有減弱的樣子。一個被派去三島打探的人回來說，親王打算過夜的那所房子也駐扎著士兵，而且也沒有其他的地方可住。最后親王找到一間寺廟過夜。裝有食物和餐具的箱子已經提前送往三島，此時不得不再送回來。直到雞鳴時一行人才吃上晚飯。[[23]](#_23__You_Ma_Lai_Yi____Bei_Bai_Ch)隨從們那天晚上都在外面和衣而睡。



晚年的輪王寺宮，即北白川能久親王

3月29日，經過漫長而艱苦的跋涉，親王一行終于抵達靜岡。他被邀請住在總持院，但親王卻予以拒絕，因為聽說附近神社的一幫神官特別憎惡輪王寺宮。竟然有人對一個幾乎一生都在隱居的人懷有如此強烈的感情，實在令人奇怪。可能是神道教神官已經聽到了風聲，知道親王此次出行是受前將軍的安排。

3月30日，輪王寺宮抵達熾仁親王的行轅。他呈上慶喜的奏折，說前將軍現在正在上野蟄居，請求對其從輕發落。熾仁親王回答說，正是因為慶喜的叛國行徑非常惡劣，天皇才下令征討他，現在已經沒有回旋的余地了。熾仁的部下稱，即使慶喜確實已經表示臣服宮廷并住進了寺廟，仍不足以取消這次征討。慶喜在奏折中為自己過去的行徑找的種種借口，不正好證明他仍未完全服罪嗎？[[24]](#_24__Sen_Ou_Wai____Neng_Jiu_Qin)

輪王寺宮回答說，自己此番來求情，并不僅僅是為了救慶喜一命，還因為天皇軍的進攻將導致江戶人民受苦，他擔心天皇知道后心里不安。這番話似乎打動了眾人，盡管心存疑問，但他們還是同意考慮他的請求。

4月5日，輪王寺宮和熾仁親王再次見面。輪王寺宮問，慶喜應該怎么做才能證明自己是真心屈服。熾仁表示這要問自己的參謀。盡管熾仁是大總督，但參謀們顯然才是軍事上的決策者。熾仁的部下簡明扼要地回答說，慶喜必須交出江戶城和艦隊。親王認為這很合理，于是對熾仁說，他將派使者把他們的要求告訴慶喜，自己則按原計劃繼續到京都去。熾仁反對這么做，他說輪王寺宮的使命已經完成，不必再去京都了。[[25]](#_25__You_Ma_Lai_Yi____Bei_Bai_Ch)他讓親王返回江戶，并勸他親自將投降的條件告訴慶喜。兩天后，輪王寺宮啟程返回江戶。

關于輪王寺宮此時的感受并沒有記錄下來，然而身為親王，他很可能為薩摩士兵對自己的態度以及熾仁命令他回江戶時的傲慢語氣感到惱火。這些怒氣，再加上他原本就不滿薩摩和長州為首的遠征軍進攻德川慶喜，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他后來愿意結交那些仍在抵抗天皇軍的人。[[26]](#_26__Sen_Ou_Wai____Neng_Jiu_Qin)

親王回到江戶后不久，彰義隊的領導便來找他。彰義隊是3月4日在德川家的家廟——上野的寬永寺——成立的支持德川家族的一個組織。覺王院義觀是彰義隊的熱心支持者，可能在他的影響下，親王與這個組織有了合作（雖說是被動的）。許多藩士用血將自己的名字題寫在彰義隊的花名冊上，發誓要還德川慶喜的清白，并摧毀他們眼中“君側之奸”——薩摩藩士。[[27]](#_27__You_Ma_Ren_Wei_Zhe_Shi_Yin)

天皇軍占領江戶城之前的這段時間里，彰義隊得到前幕府的授權，在街上巡邏。可能這時他們確實有助于維持秩序，但是政府軍一來，彰義隊就轉而挑起事端，有時還做出搶劫的事情來。熾仁親王下令解散彰義隊，包括勝海舟和山岡鐵舟在內的前幕府官員都支持他。他們認為彰義隊的行為實際上是在害慶喜，然而他們的話根本就不起作用。義觀痛罵山岡，“今日之事，名雖朝廷，實乃薩長所為”。他指責山岡被薩摩愚弄，認為有志之士聚集在上野“欲報效王家”再自然不過。他們不僅是保護前將軍，而且是為了保護“東照宮以來歷代之靈宮”。最后他指責山岡是一名“忘恩之賊臣”。[[28]](#_28__Long_Chuan_Zheng_Ci_Lang)

輪王寺宮的在場使得政府軍很難向上野的彰義隊據點發起進攻。假如他在戰斗中受傷或者死亡，情況將變得極為尷尬。因此他們讓親王的父親給他寫信，要他回京都向天皇請安。彰義隊的成員知道這件事后非常氣憤，他們相信親王一走天皇軍就會對寬永寺發起全面進攻。他們給親王寫信，告訴他如果他試圖離開上野，那么彰義隊的每一名成員都將在寺廟山門前切腹自殺，親王要離開的話將不得不跨過他們的尸體。[[29]](#_29__You_Ma_Lai_Yi____Bei_Bai_Ch)

江戶城的市民也懇求親王不要去京都，他們認為只有他在才能使江戶免于戰火。親王猶豫不決，一會決定留在上野，一會又改變主意。一些和尚建議他到比較安全的京都去，其他人則反對這么做，擔心他一旦回到京都，將會被迫還俗，而這將是天臺宗的一大損失。大總督命令親王立刻離開上野，這樣才能對彰義隊展開進攻，但是這封信被義觀攔截了。

熾仁親王最后等不及了。6月6日凌晨，政府軍發起了進攻。戰斗異常激烈，人數劣勢的彰義隊被迫撤退。午后不久，薩摩軍隊占領了寬永寺的黑門。那天早上，親王和平時一樣到大堂禮佛念經。槍炮聲響起后，身邊的和尚勸他離開，但他一直等到念完經才走。在此期間，和尚們拿出幾件預備緊急之時穿的便服。親王脫下袈裟，換上了便裝。

他要逃往哪里？那天，幾個和尚和他一個地方又一個地方漫無目的地亂走，很擔心被抓住。親王似乎沒有想到要向政府軍投降，他好像寧肯受苦也不愿這么做。在一個地方，一名長期受寬永寺照顧的商人自告奮勇帶他們到一處安全的地方。

他們跟隨他走進一處農舍。農舍只有一個小房間，而且并不是親王可以待的地方。他們打開儲藏室，看到堆在一起的農具、稻草和干草。角落里鋪著大約一平方米的木板，地板的前面則是泥地。和尚們把親王安置在木板上，自己則恭敬地坐在前面的泥地上。親王說有點冷，于是他們借來兩床臟兮兮的棉被。親王注意到他們猶疑的神色，告訴他們不必擔心。他拿起被子，往頭上一蒙。那時正是凌晨3點。由于蚊子太多，親王整晚都無法入睡。[[30]](#_30__You_Ma_Lai_Yi____Bei_Bai_Ch)

第二天早上，一名服侍親王的和尚給他做了早飯。雖然餐具又臟又破，但他還是做了飯團和一些味道不太好的味增湯。“親王說，要不是遇到這種情況，他永遠不可能知道老百姓的味增湯是什么味道。他強迫自己喝了一口，然后笑著推開了。”[[31]](#_31__You_Ma_Lai_Yi____Bei_Bai_Ch)

親王似乎能夠笑著接受艱苦的逃難生活，然而天皇軍的小分隊卻在四處搜索彰義隊的殘余勢力。大總督下令，任何知道輪王寺宮消息的人都必須立即上報。軍隊包圍了紀州大名的宅邸進行搜索，因為他們認為親王可能在姐姐（大名的妻子）那里避難。這些行為使親王藏身的寺廟的主持明白，熾仁親王這人不可靠。他勸親王由海路逃往北方，還安排人將喬裝過的親王護送到品川，讓他從那里登上榎本武揚的軍艦。[[32]](#_32__Sen_Ou_Wai____Neng_Jiu_Qin)

那天夜里，親王和隨從被人用小船送上“長鯨丸”號，他們在船上受到了熱情的接待。榎本從主艦“開陽丸”趕來。他遣散眾人后問親王，是否想去熾仁的指揮部。如果是，他可以派一隊隨時準備赴死的人護送他去。但如果親王決意要去北方，那么就要服從他的命令。親王回答說，自己上野的寺廟已經毀于戰火，現在已經無處可去。江戶的每一處地方都很危險，即使投降熾仁也不會安全。因此他寧可到北方去，那里有他的寺廟的分院，而且沒有受到戰爭的波及。他可以在那里等待官軍平定全國。榎本同意按照親王的想法去做，但是為了不重蹈南北朝時期的覆轍，他請求親王寫一份聲明，證明這確實是他自己的選擇。[[33]](#_33__Sen_Ou_Wai____Neng_Jiu_Qin)這表明榎本這時已經預見到輪王寺宮可能會成為派系的領導，與明治天皇爭奪國家的統治權。

根據無法證實的消息，親王的聲明是按詔書的格式書寫的，詔書還任命榎本及其下屬擔任新朝廷的重要官員。[[34]](#_34__Sen_Ou_Wai____Neng_Jiu_Qin)如果真是這樣，那說明親王已經僭越稱帝了。[[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這份書面文件使人們對輪王寺宮產生矛盾的印象。他由于害怕卷入戰爭才逃到北方，然而北方卻是幕府活動的中心區域。該如何將他的不問世事與后來與叛軍的合作聯系起來呢？無論他是否承認，皇室成員的加入都使叛軍得以舉起合法的旗幟。[[36]](#_36__Long_Chuan_Zheng_Ci_Lang)

5月，北方和東北方的藩國組成反政府聯盟，并于6月22日簽署了同盟書。[[37]](#_37__Qin_Wang_De_Tian_Huang_Chen)一個月后，輪王寺宮出現時，聯盟成員懇請他擔任聯盟的“象征”。他們希望他擔任軍事領導，但他以自己是僧人拒絕了。8月5日，輪王寺宮被選為“聯盟領導”。那天舉行的聯盟會議起草了一份聲明，確立了親王的身份。聲明一共有七條內容。前三條如下：

1.親王暫居白石城。

2.開銷由前幕府在奧羽的土地收入負擔。

3.彰義隊將繼續保護其安全。

8月30日，輪王寺宮搬到白石城居住。在各藩國的集會上，他既是名義上也是實際上的領導者。[[38]](#_38__Tong_Meng_Shu_De_Ming_Cheng)仙臺和米澤藩的大名被選為總督，同時還任命了次一級的官員，一個與京都對抗的朝廷實際上已經形成。根據菊池容齋（1788—1878）手抄的文書，[[39]](#_39__Zuo_Zuo_Mu_Ke____Wu_Chen_Zh)從8月5日起，北方的年號改為太政元年，輪王寺宮則加冕為東武天皇。[[40]](#_40__Yi_Wei_Li_Shi_Ren_Wu_Hua_Ji)[[41]](#_41__Zuo_Zuo_Mu_Ke____Wu_Chen_Zh)由于沒有其他的證據，我們不清楚這篇文章的可信度有多高，然而它的存在本身表明，當時的人們認為這樣的發展合情合理。

親王一直待在北方，直到戰爭結束。1868年10月22日，在聯盟已失去大部分兵力，勝負已見分曉之際，親王寫了一封道歉信，為自己對抗宮廷的行為深感后悔。[[42]](#_42___Dong_Wu__Zhe_Ge_Ming_Zi)傳聞聯盟的殘黨計劃將親王綁架到船上駛往外國，并下令對他嚴加看管，然而事實上他一直待在仙臺（和后來的白石城），并在11月30日才啟程前往京都。次月，輪王寺宮被裁定為“失大義”，被判由其父親處置。他必須立刻趕到京都閉門思過。[[43]](#_43__Sen_Ou_Wai____Neng_Jiu_Qin)1869年11月17日，他結束悔過并恢復親王地位。宮廷對一名（不愿是否出于自愿）曾經擔任叛軍重要人物的親王表現出了極大的寬容。同一年輪王寺宮出國，先去了美英，后來又去德國學習軍事。[[44]](#_44__Sen_Ou_Wai____Neng_Jiu_Qin)[[45]](#_45__Sen_Ou_Wai____Neng_Jiu_Qin)1872年，親王被封為北白川宮，晚年即以這個稱呼而為人知曉。1895年，親王在擔任近衛師團攻臺司令官時死于臺灣。

由于與一樁推翻政府的陰謀有關，1868年10月1日，另一名有爭議的皇室成員朝彥親王被流放到廣島。一年前他已經因為形跡可疑而被勒令閉門思過，但是，1868年8月，一名告密者揭發他陰謀恢復德川家族的地位。告密者說他計劃派榎本武揚的艦隊將士兵送往各個登陸點，揭竿起義。[[46]](#_46__1872Nian_2Yue_14Ri__Ta_Bei)經調查發現罪證確鑿，于是朝廷剝奪了他的親王稱號、官銜以及仁孝天皇養子的身份。但是，懲罰逐漸變輕，1872年2月，他得到赦免并恢復了身份。[[47]](#_4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這個時期最著名的反抗無疑要數榎本武揚的反叛。江戶無血開城五個月之后，榎本武揚率八艘軍艦叛逃。他在平潟把輪王寺宮送上岸后，繼續駛往蝦夷（北海道），打敗了守衛的松前藩和弘前藩士兵，并在函館附近的五棱郭安頓下來。1869年1月14日，榎本通過英國和法國公使傳信給宮廷，申請委托其開發北部地區。1月26日，巖倉具視回信給兩國公使，說榎本言行不一，無法逃脫叛國者的罪名。[[48]](#_4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這番嚴厲的答復可能是榎本宣布成立“蝦夷共和國”的原因。蝦夷共和國得到了當時恰好駐扎在函館的英法分艦隊的有條件承認。1869年6月27日，這種試圖建立一個使幕府支持者按照幕府傳統生活的國家的嘗試最終失敗，榎本向黑田清隆帶領的天皇軍投降，然而，在伴隨明治維新發生的所有起義之中，榎本堅持的時間最長。[[49]](#_4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這是緊接著明治維新之后發生的，最后一次反抗宮廷的大起義，但此后還發生了一些規模較小的類似事件。W. E.格里菲斯寫道

1871年又發生了一起，他們試圖擁立一個新天皇并恢復以前的那一套……一切都按照長久以來的那種方式進行，首先是控制某個具有皇室血統的親王。有了天子在手，篡位者就能以他的名義為所做的一切披上神圣而合法的外衣。[[50]](#_50__Guan_Yu_Jia_Ben_Zheng_Fu_De)

1871年4月，又一起陰謀曝光。由于看到物價高漲導致人民生活艱難、自從都城遷往東京以來京都日益衰敗以及（最主要的）對國內猖獗的外國人和外國勢力感到憤怒，兩名公卿（外山光輔、愛宕通旭）密謀推翻政府，完成孝明天皇未竟的“攘夷”事業。[[51]](#_51__William_Elliot_Griffis_The)他們吸引了包括朝彥親王的家臣在內的一些公卿。根據格里菲斯的說法，“他們計劃在東京放火，把天皇帶回京都，并改變政府的整套制度”。[[52]](#_5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其中一名謀反者建議炸毀京都府的府治，殺死里面那些害人的官員。另外一名謀反者則對將外國人趕出神戶更感興趣。幸運的是，不法分子在實施計劃之前就被逮捕。即使在被捕之后，外山和愛宕仍公然蔑視宮廷頒布的法令，顯然怙惡不悛。因此， 1872年1月12日，宮廷勒令他們自殺。他們的追隨者也受到了懲罰：一些被降為平民，有一些被判處終身監禁。[[53]](#_5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除了這些貴族高官的陰謀之外，還爆發了許多起農民起義——僅1868年就發生了一百二十六起，其中許多都發生在上野國一帶。[[54]](#_54__Shi_Jing_Xiao____Wu_Chen_Zh)這些起義通常都由幕府的前支持者和其他心懷不滿的人煽動，不過他們偏向于反抗富商或者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因此有些起義實際上幫助了政府。[[55]](#_55__Shi_Jing_Shuo__Jia_Ru_Dong)

對于這些不滿皇室統治的表現，我們不清楚年輕的天皇知道多少。他肯定知道當時的形勢，[[56]](#_56__Li_Ru__1868Nian_8Yue_12Ri)并聽說過輪王寺宮和朝彥親王的種種行為。不管怎么說，這兩人都具有高貴的皇室血統而且都是仁孝天皇的養子。根據報告，天皇知道北部的軍隊取得節節勝利，形勢已在掌控之中。但是，他的注意力可能已從戰事轉移到即將到來的加冕典禮和江戶之行。與遙遠北國發生的戰事相比，這兩件事對他的影響更加直接。但就像明治天皇清楚所知的那樣，在徹底消除幕府復辟的威脅之前，所有的起義都必須鎮壓下去。

1. [[1]](#_1_1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36頁。薩道義肯定聽說了這方面的謠言。他寫道，“輪王寺宮，這位一直都擔任寺廟住持的親王，這位拒不從命的德川家族說要擁立為天皇的人，最終被這些幸存者給說服了”（A Diplomat in Japan, p. 375）。

1. [[2]](#_2_17) William Elliot Griffis, 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p. 184.

1. [[3]](#_3_17) 原文見遠山茂樹編，《天皇と華族》，第9頁。公告頒布的日期為1868年6月13日（《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05頁）。

1. [[4]](#_4_17) “后宮”通常稱為“大奧”，是天皇的私人住處，由女官掌管；在土耳其等被稱為“seraglio”。

1. [[5]](#_5_17) “8點”（辰刻)源自另一個文本（遠山茂樹編，《天皇と華族》，第9頁）。

1. [[6]](#_6_17) 當時官僚制度下男性的最高職位；巖倉具視和三條實美同時擔任“議定”和“輔相”。

1. [[7]](#_7_17) 八景之間是輔相的辦公室，之所以這么叫是因為那里掛著“八景”，可能是“近江八景”。《明治天皇紀》加以引申，說天皇到輔相的辦公室去是為了看他們如何地忙于公務。

1. [[8]](#_8_17) 為日本面積單位，1畳約為1.55平方米。——編注

1. [[9]](#_9_17) 這個細節別處不見，似乎清楚地表明天皇這時已經吸煙。

1. [[10]](#_10_17) 天皇的貼身侍從，是這個時候設立的新職位。其規則包括（1）不得泄露任何有關天皇在哪的消息；（2）未經合適的程序，不得就國事直接向天皇提出訴求；（3）當著天皇面絕對不許說出和做出低俗或者不禮貌的言辭和舉動；（4）（這一點毋庸置疑）無論是否當值，無論白天還是黑夜，他們都不得仗著天皇的一絲寵幸，而在皇宮內外做出玷污陛下聲譽或者炫耀他們威權的事情來。剩下的六條規則都與他們的職責有關（《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06—707頁）。其他附文詳細列舉了“近習”們應有的資質。很難在公卿中找到符合所有條件的人，但是最后選出了十個人。他們的名字見第707頁。

1. [[11]](#_11_17) 闡釋見《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05—706。

1. [[12]](#_12_17) 這里的太政官并非日本古代與神祇官相對的國家機關，而是明治維新后設立的新機構，相當于國務院。最初下設議政官等七個部門。1869年改革后下設民部省等六個部門。1885年內閣制度確立后被廢除。明治早期日本官制變化復雜，詳情請參相關研究書籍。——編注

1. [[13]](#_13_17) 歐內斯特·薩道義爵士寫道，他見過幾個“議會”，最近的那個于那年的六月設立。他說，“明顯可看到美國政治理論的痕跡，相當一部分框架都是大久保和與他同為薩摩藩士的副島[沃貝克(Verbeck)博士的學生]定的，這點我幾乎不懷疑。其中一條的措辭是‘太政官的權力和權威（換言之，政府）分為三部分，立法、行政和司法’。另外一條規定‘所有官員必須每四年更換一次’。政府官員應該投票決定，并由得票最多的人出任。第一屆政府官員的任期到了之后，半數的現任官員必須再留任兩年，以確保公共事務不受影響。’從這里我們似乎看到了‘獵官制’的影子。大隈解釋說‘行政’代表了美國憲法中的行政部門，‘由總統和他的顧問組成’，然而實際上卻由神道教、財政、戰爭和外事部門的領導組成”（A Diplomat in Japan , p. 377）。

1. [[14]](#_14_17) 明治時期日本官制等級，一等大略相當于陸海軍中將、省部級正職文官，二等官大略相當于陸海軍少將、省部級副職文官。——編注

1. [[15]](#_15_1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08頁。這個時期晉升為二級官員的人有后藤象二郎、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副島種臣和橫井小楠——一連串熠熠發光的杰出人士。

1. [[16]](#_16_16) 但是，為了保證政策的連續性，有些第一屆任期滿的人會再續任兩年。

1. [[17]](#_17_16) 9月11日，巖倉具視要求擔任佐賀藩兩千名士兵的前鋒。在他寫給天皇的請愿書中，他承認自己生于公卿家庭，并沒有什么作戰知識，但他仍然希望與北方的叛徒戰斗，發揮自己的“螻蟻之力”。巖倉后來雖被勸阻，但也并非因為他缺乏足夠的軍事訓練（《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74頁）。

1. [[18]](#_18_15) 大部分描寫他1868年活動的文獻都是用這個名字，但我將稱他為輪王寺宮，這是整個時期他最為人所熟知的名字。

1. [[19]](#_19_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18頁。亦可見有馬賴義，《北白川宮生涯》，《別冊 文藝春秋》105號，第239—240頁。

1. [[20]](#_20_14) 有馬賴義，《北白川宮生涯》，《別冊 文藝春秋》105號，第239頁。

1. [[21]](#_21_14) 有馬賴義，《北白川宮生涯》，《別冊 文藝春秋》105號，第240頁。

1. [[22]](#_22_13) 有馬估計，像輪王寺宮這樣級別的人，應該有幾百名護衛（《別冊 文藝春秋》105號，第244頁）。

1. [[23]](#_23_13) 有馬賴義，《北白川宮生涯》，《別冊 文藝春秋》105號，第241頁。

1. [[24]](#_24_11) 森鷗外，《能久親王事績》（《鷗外全集》第三卷，第516頁）。

1. [[25]](#_25_11) 有馬賴義，《北白川宮生涯》，第242頁。事實上森鷗外也有一模一樣的描述，見森鷗外，《鷗外全集》第三卷，第516頁。

1. [[26]](#_26_11) 森鷗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17頁。

1. [[27]](#_27_10) 有馬認為這是因為巖倉具視擔心輪王寺宮可能會影響天皇，并干涉奪取江戶城的計劃。盡管已經派出東征軍，但是巖倉并不打算攻擊江戶城，因為他認為城內的主要談判者勝海舟太寶貴了，不值得為了一座城而犧牲他（《北白川宮親王生涯》，第247頁）。

1. [[28]](#_28_8) 瀧川政次郎，《知られざる天皇》，第125頁。

1. [[29]](#_29_8) 有馬賴義，《北白川宮生涯》，《別冊 文藝春秋》105號，第249頁。

1. [[30]](#_30_8) 有馬賴義，《北白川宮生涯》，《別冊 文藝春秋》105號，第250頁。亦可見澀澤榮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247頁、第248頁。

1. [[31]](#_31_7) 有馬賴義，《北白川宮生涯》，第250頁。

1. [[32]](#_32_6) 森鷗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32頁。

1. [[33]](#_33_6) 森鷗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33頁。

1. [[34]](#_34_6) 森鷗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35頁。關于親王喬裝的描述（喬裝成一位出診的醫生），請見第536頁。

1. [[35]](#_35_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36頁。

1. [[36]](#_36_5) 瀧川政次郎，《知られざる天皇》，第126頁。瀧川說這個消息是他直接從已故的尾佐竹猛博士那里聽來的。他并沒有親自看到文獻資料，但他對尾佐極為尊崇，認為他的消息非常可靠。

1. [[37]](#_37_4) 親王的天皇稱號是“東武”。

1. [[38]](#_38_2) 同盟書的名稱為《白石盟約書》（詳見佐佐木克，《戊辰戦爭》，第115—123頁）。亦可見石井孝，《維新の內亂》，第122—127頁。

1. [[39]](#_39_2) 佐佐木克，《戊辰戦爭》，第131頁。

1. [[40]](#_40_2) 一位歷史人物畫家。他的《前賢故實》描繪了五百位杰出人物（包括天皇、忠臣，以及烈女）的畫像并附有小傳，時間跨度從神武天皇一直到后龜山天皇，達兩千年。該書于1836年至1868年間發行。

1. [[41]](#_41_2) 佐佐木克，《戊辰戦爭》，第132頁。

1. [[42]](#_42_2) “東武”這個名字——“東方的武士”（“東武”的音同“東部”）——表明他只是國家東部的天皇，而把西部留給了明治。然而，根據菊池的說法，他的稱號是外國國王或者皇帝使用的“皇帝”（こうてい），而不是“天皇”（てんのう）。

1. [[43]](#_43_1) 森鷗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46頁。

1. [[44]](#_44_1) 森鷗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53頁。

1. [[45]](#_45_1) 森鷗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57頁。

1. [[46]](#_46_1) 1872年2月14日，他被封為三品，這是皇族中的最高級別。同一天，他的哥哥，同樣野心勃勃的朝彥親王也升為三品。德川慶喜被封為從四位，而在短暫的東武天皇統治時期曾擔任“權征夷大將軍”的伊達慶邦則被封為從五位。政府的寬大處理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1. [[47]](#_47_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92—793頁。關于朝彥陰謀的詳細描述，請參考澀澤榮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268—269頁。

1. [[48]](#_48_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23頁。

1. [[49]](#_49_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的927頁。

1. [[50]](#_50_1) 關于榎本政府的創立、國際關系以及淪陷，請參考石井孝，《維新の內亂》，第204—249頁。

1. [[51]](#_51_1) William Elliot Griffis,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 p. 182。我并未確定這次陰謀的主要參與者。

1. [[52]](#_5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22—424頁。

1. [[53]](#_53)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03—604。

1. [[54]](#_54) 石井孝，《戊辰戦爭論》，第149頁。

1. [[55]](#_55) 石井說，假如東北部的農民起義是針對政府的話，那么政府與長岡藩叛軍之間的戰斗結果將很難預料，然而他們并非針對政府，而是針對村長（莊屋）（《維新の內亂》，第149頁）。

1. [[56]](#_56) 例如，1868年8月12日，他親自任命正準備出發到會津去的嘉彰親王為“東征大總督”，并賜給他一面象征皇權的錦旗（《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54頁）。另外，8月22日，他派了一名敕使到北方去，代他撫慰受到戰火摧殘的士兵和民眾。天皇還給軍隊送去了清酒和食物（第757頁）。戰斗持續期間，類似的勞軍行動一直都在進行。

# 第十八章 東都江戶



1868年9月12日舉行了明治天皇的加冕典禮。儀式本來定于去年的12月舉行，但國內形勢不穩，無法舉行盛大的儀式，而且準備典禮的時間也不夠，因此加冕典禮被推遲到第二年。[[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眾人手頭有其他更緊要的事情，直到6月份才開始考慮典禮的細節問題，巖倉具視要求現在是神祇事務局官員的前大名龜井茲監（1824—1885）查閱文獻，裁定“皇國神裔繼承”的規范。巖倉知道，大家心目中的傳統禮儀其實大多都是照搬中國的模式。他認為，在這個維新變革的時代，非常適合對禮儀進行修改，從而為后世的加冕典禮樹立榜樣。

8月，龜井茲監和福羽美靜（1831—1907）接到正式命令，為加冕典禮設計一套新程序。這時福羽提出了一個不符合古老傳統的建議。多年以前，德川齊昭（1800—1860）曾送給孝明天皇一個地球儀，希望不僅可以使他熟悉總體的世界格局，還能激起他的雄心壯志，揚國威于海外。福羽提議，如果把地球儀作為加冕典禮的焦點，將會喚起在場百官的崇高志向，深化他們的認識，而且可以使普通民眾感受到加冕典禮的莊嚴。[[2]](#_2__Shi_Shi_Shang__Di_Qiu_Yi_Zai)他還提議神道教的加冕祝詞中必須要體現所有民眾的祝賀之情。巖倉也希望全體人民都能參與典禮，而迄今為止這項儀式只限高級公卿參加。

不用說，儀式舉辦的時間咨詢過陰陽師。陰陽師認為加冕典禮應該在9月12日的早上8點舉行。被委任主持各部分儀式的官員們，根據自己對日本典籍的理解，提出了許多不同的建議。宮廷提前去神道教的主要神社祭拜，祈禱典禮舉行那天不要刮風下雨。[[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他們還派神官前往神武天皇、天智天皇和前代三帝的陵前，告知他們加冕典禮即將舉行。

典禮經過精心的安排，參加者的每個動作都經過設計。那天一早天皇就穿上束帶。這件長袍和神道教神官穿的袍子很相似，顯示日本拋棄中世以來唐制禮服的傳統。10點，天皇從清涼殿出發，穿過木橋，來到儀式的舉辦地紫宸殿。兩名宮女在前面引路。接著是兩名掌侍[[4]](#_4__Guan_Xian_Zui_Gao_De_Nu_Guan)，一人捧著神劍，另一人捧著勾玉。[[5]](#_5__Tian_Huang_De_Shen_Qi_Bao_Ku)天皇身后跟著一名捧著放有笏的盒子的官員，另外一名官員拖著束帶的下擺。天皇從后面的帷幔進入大殿，坐在寶座上，這時眾人都還看不見他。兩名女官將神劍和勾玉放在天皇左邊的臺子上，然后退下。笏獻給了天皇。接下來，隨著一聲鑼響，兩名宮女拉開竹簾，天皇出現在眾人面前。全體官員在警衛長的口令下立即拜倒在地。一名官員向天皇獻上“幣”[[6]](#_6__Yi_Gen_Bang_You_Zhi_Tiao_Huo)，隨后神祇事務局的長官走上來將其拿走。儀式結束后，又是一聲致敬，于是全體鞠躬。然后典儀[[7]](#_7__Que_Qie_Di_Shuo__Shi__Xuan_M)冷泉為理走到指定的位置，手舉文書，大聲宣告天皇繼位，并祝愿他福壽綿長，國內五谷豐登。

宣讀完畢，一名歌者唱起了一首古老的歌謠：



明治天皇像。圖片中，明治身著正式服裝，頭上戴著高高的冠冕。此照片可能是1872年由內田九一拍攝

無數黃沙子。

綿延遍海涯。

祝君千萬壽，

為數亦如沙。[[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歌曲結束后，隨著伏原宣足的口令，全體再次鞠躬。熾仁親王跪行到天皇的寶座前，告訴他儀式已經結束。隨著一聲鑼響，宮女將簾子放下，天皇退下，從大家的視線中消失。議定和參與來到小御所向天皇祝賀典禮圓滿成功。參加儀式的其他人聽到鼓聲后各自散去，中午時分，加冕典禮結束。這時雨停了，天突然放晴，所有人都非常高興，把這看成一種吉兆。官員放假一天，普通民眾也停止了勞作，以示慶祝。[[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為了進一步鞏固天皇與民眾之間的關系，天皇的生日被定為國家節日，即天長節。[[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把天皇的生日定為節日最早可追溯到公元775年，但這種做法早就中斷了。此時復興這一做法無疑也是希望恢復古老傳統的又一例子。

10月31日，政府宣布年號由慶應四年改為明治元年，而且從今以后一任天皇只用一個年號。[[11]](#_11__Zhe_Yao_Zuo_De_Yuan_Yin_Bin)“明治”二字出自中國古老的占卜書《易經》中的一段：“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新年號公布的前一天，天皇親自來到內侍所，從學者提交的幾個年號中抽取一個。天皇當時可能不知道，他同時抽了一個后世稱呼自己的名字。以前的天皇，就像明治的父親和祖父那樣，都以住處或者死后的謚號作為名稱。“明治”意為“開明的統治”，這個名字看來精確地描繪了他的統治。像明治父親和祖父那樣的名字，盡管吉祥，卻不太適合他們的時代。

加冕典禮一結束，擺在這位年輕君主面前的下一個任務就是訪問東京。這次出行早在9月19日就已公布，當時的公告稱天皇認為“海內一家東西同視”。因此，他給江戶取了個新名字——“東京”，即東部的首都。出行的正式理由是，今春以來，東部百姓一直飽受戰火煎熬，天皇很久以來就希望能慰問他們。[[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這次出行在巖倉具視看來非常重要，他堅持要在加冕典禮的次日正式公布天皇的出行日期。10月12日，巖倉提交一份名單，對誰將陪同天皇訪問東京、誰將在天皇出行期間留在京都處理政事和保衛都城都做了安排。

一些人反對操之過急，認為朝彥親王的陰謀和幕府艦隊的逃脫都證明東部地區仍未徹底平定。然而，首次提出遷都東京的江藤新平（1834—1874）強調天皇必須立即訪問東部。他說，東部人民長期習慣于接受幕府的恩惠，對天皇的仁慈和感化仍很陌生。隨著幕府的垮臺，這些人感覺好像失去了主人一樣，不知道該求助于誰。假如天皇擔心叛軍的艦隊而推遲東京之行，政府將會失去國內外的信譽，而錯過這次撫慰東部人心的機會，可能會有難測之禍。江藤的口才加上巖倉的政治才干，使這個日子定在了最近。[[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盡管如此，反對的聲音仍未斷絕，有些人擔心北部尚未徹底平定，有些人考慮到自鳥羽、伏見之戰以來政府的巨額開支，擔心天皇和隨從出行的花銷會使本已捉襟見肘的國家財政雪上加霜。京都民眾也擔心此次東京之行是遷都的前奏（眾所周知，大久保利通贊成遷都東京）。[[14]](#_14__Sa_Dao_Yi_Zai_Ri_Ji_Zhong_X)

東京民眾則熱切地盼望天皇到訪，認為越快越好。幕府垮臺，這座城市已經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人們擔心它會逐漸被遺忘。這種擔憂并不只限于東京居民。歐內斯特·薩道義爵士在日記中寫道：

由于購買商人物品的大名都返回各自的家鄉，人口自然減少了。江戶衰落是一件讓人惆悵的事，因為它是遠東最美麗的城市之一。盡管沒有漂亮的公共建筑，但是她位于海邊，外側是大名游玩的花園，令人嘆為觀止的巨大護城河圍繞著城堡流淌，城堡上點綴著蠻石墻和松柏的美麗剪影，城市本身有無數的田園風景，這一切都給人以偉大的印象。[[15]](#_15__Sir_Ernest_Satow_A_Diplomat)

薩道義傷感的筆觸表明，他預見在將軍和大名離開之后，這座城市將會失去它的偉大之處，甚至連其本身的動人之處也一并喪失。武士的居住區看上去非常荒涼，甚至一片死寂。東京復興的唯一途徑就是被選為日本的國都，而這正是大久保所希望的。10月28日，他從擔任東征軍大總督參謀的東京回到京都，此后便極力建議天皇立刻訪問東京，宮廷議會最終將天皇啟程的日期定在11月6日。接下來的那個星期東北傳來了好消息：11月1日，仙臺藩向天皇軍投降。

天皇的乘輿按計劃啟程，前往東京。那天早上8點，天皇來到紫宸殿，從那里登上乘輿，隨身攜帶著皇室三信物之一的八咫鏡。巖倉具視、中山忠能和大名們帶領三千三百名扈從跟隨。水口藩的大名加藤明實擔任八咫鏡的護衛。皇太后和淑子內親王在道喜門目送他們離去。住在京都的公卿和大名則在南門外的道路兩側送別天皇。沿途并未警蹕，然而即使沒有發出往常那樣的警告，圍觀的路人也都神情虔敬，秩序井然。表達敬仰的拍手聲一刻也沒有停過。[[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隊伍向東走到栗田口，在天臺宗的皇家寺廟青蓮院做短暫的停留，天皇在這里用了午膳。隨后天皇換乘輕便的板輿，這是皇室成員長途旅行時用的一種相對樸素的轎子。隊伍穿過蹴上坂來到東山另一側的山科。天皇在路上遙拜了天智天皇的陵墓。大約下午2點，隊伍到達大津，天皇在驛站暫時安頓下來。八咫鏡則安放在另一所房子里。

這時權大納言大原重德騎馬追了上來。他強烈請求天皇返回京都。大原說11月2日豐受大神宮舉行祭祀儀式時，神宮的鳥居自然跌落，神官認為這是天照大神發出的警告，因此立即派使者通知宮廷。從一開始就反對天皇到東部去的大原，希望通過這種方法阻止隊伍前行。然而巖倉卻不為所動。他答應將專門進行祈禱，并打發大原回京都。[[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那天（而且確實在沿途的每一站都這么做了）天皇派官員到沿途所有神廟里舉行祭拜儀式。此外，還向老人、孝子、貞婦、忠臣以及對公共事業做出貢獻的人發放賞銀。那些生病的、遭遇不測或是極度貧窮的人也都得到了賞銀。這些善舉全部加起來數目不小，幸運的是，京都和大阪的富商支付了此次出行的大部分花銷。

隊伍沿著連接京都和東京的東海道穩步前進。消息不斷地傳來，11月8日，會津藩投降；11月9日，莊內藩投降；11月19日，長岡藩投降；11月22日，盛岡藩投降。現在只剩下蝦夷的榎本武揚叛軍在抵抗政府軍了。

年輕的天皇如何看待這次耗資巨大的初次出行？他似乎沒有把自己的情緒用詩歌記錄下來（詩歌不久便成為他表達情感的主要方式），但偶爾還是可以發現一些線索，讓我們知道哪些東西給他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10月12日，天皇停下來，坐在板輿里觀看農民收割稻子。巖倉具視向一個農民要了幾穗稻谷，拿給天皇看，尾張藩的大名則作了下面這首短歌獻給天皇：

當我看到歉收

的莊稼時

不禁心生憐憫。

陛下忠誠的子民

該作何感受

根據記載，天皇賞賜了這些農民糕點，以慰藉他們的辛勞。[[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11月14日，天皇在靜岡海邊的潮見坂，第一見看到了太平洋。這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天皇見到大海的記錄。天皇靜默不語，木戶孝允則大聲說，從今天開始，帝國的榮耀將光照四海。[[19]](#_19__Duo_Tian_Hao_Wen_Bian____Ya)第二天，天皇渡過濱名湖，湖面很平靜，據說天皇很高興。這時巖倉作了一首短歌，他很謙虛，沒有在自己的游記里提到這首詩：

以海浪和大風

著名的新居湖

只是名字上兇猛而已

天皇乘坐的船已經平穩地

滑過了湖面[[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一路上還有其他的有趣時刻。朝廷提前在以波濤洶涌著稱的大井川上，搭建了一座木板橋，以便天皇通過。安倍川上有一座浮橋，對天皇來說更是前所未有的體驗。然而他最難忘的還是11月20日看到了富士山。這可能是第一次有天皇見到這座蜚聲日本文學作品的山峰。明治命令侍從們每人作一首有關富士山的和歌，必須在他到達東京之前完成。

11月26日，天皇抵達東京。大總督熾仁親王、三條實美和東京府的知事在品川迎接天皇。在一眾身著正裝、佩戴寶劍的親王、公卿和大名的簇擁下，天皇進入東京。這個盛大的儀式是在巖倉具視的建議下舉辦的。他認為關東地區的民眾長期生活在專制統治下，已經變得非常野蠻，要控制并軟化他們的猛烈性情的最好方法就是讓他們見識見識宮廷的服裝和禮儀。[[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天皇一行人在增上寺做了短暫停留，板輿換成了鳳輦。隊伍從和田倉門進入江戶城，從此以后江戶城改名為東京城，并被視為皇居。數以萬計的民眾帶著敬畏的心情觀看天皇入城，一想到今天見到了天子，他們就激動得淚流不止。[[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戰斗仍未結束。事實上，12月4日，政府軍在蝦夷遇挫，被榎本武揚的軍隊打敗。不過大家普遍認為，叛軍已經不再對政權構成嚴重威脅。[[23]](#_23__Zhe_Shi_Yan_Cang_Ju_Shi_De)12月15日，熾仁親王將錦旗和節刀還給天皇，意味著東北部針對政府軍的抵抗力量已經被消滅。

12月17日，為了慶祝此次訪問，天皇向東京市民發放了大量的清酒。他一共分發了兩千九百九十桶酒。連同清酒一起發放的，還有五百五十只裝酒的錫壺和一千七百捆墨魚干。這些總共花費了一萬四千三十八兩銀子。東京市民狂歡了兩天。這件事成為最初的明治文學的題材。大沼枕山（1818—1891）作了一首四行詩：

天子遷都布寵華，

東京兒女美如花。

須知鴨水輸鷗渡，

多少簪紳不顧家。[[24]](#_24__Mu_Xia_Biao____Ming_Zhi_Shi)

“布寵華”指的是發放清酒這件事。在京都的公卿看來，“鴨水”（京都的鴨川）現在的吸引力遠沒有“鷗渡”（東京的隅田川）來的大，以致他們都忘了祖先的家園。事實上，當1月10日，天皇公布將于下個月初返回京都時，身為公卿領導人之一的三條實美卻反對天皇離開東京。他說國家的興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東部地區民眾的態度。如果天皇這么快就回京都，他們肯定會心灰意冷。他說，東京的繁榮影響著整個國家的繁榮，即使京都及其周圍地區都陷落了，只要東京還在，國家就不會陷落。[[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在東京期間，天皇與一些對他來說極為重要的人見了面。他見到了現在被稱為親子內親王的和宮，也許會想起她的哥哥——已經去世的孝明天皇。天皇還和慶喜的弟弟，現在的水戶藩大名德川昭武（1853—1910）見了面。昭武曾在法國學習一年，天皇詢問他一些國外的情況。昭武的描述顯然給明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來經常把昭武召來，詢問他一些西方的事情。1月，只有十五歲的昭武接到了前往蝦夷的命令，作為水戶藩的大名前去鎮壓函館的叛軍。[[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毫無疑問，派遣昭武去并非因為他有軍事才能，而是因為他的名字：政府軍一方有德川家的人——前將軍的弟弟——也許可以從精神上打擊榎本武揚的支持者。

明治在東京期間，開始就一些事情與住在橫濱的外國外交官交涉：在政府與叛軍的沖突中，停止他們的中立政策；摧毀函館的叛軍；如何處置信仰基督教的日本人；發行紙幣。談判進行得并不順利。以令人敬畏的巴夏禮爵士為首的外國代表，拒絕考慮任何似乎威脅到神圣的貿易權利的要求——不論是在函館還是其他地方。

1月2日，位于東京筑地的互市市場開放，并允許外國人入住。武士沒有書面許可不得進入這個區域。禁止武士進入租界可能是為了消除外國人對帶刀武士的恐懼，但這必然降低了武士的地位。不久，武士接到了保護外國船只的任務，這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大沼枕山寫了一首詩描繪他們的困境：

小揚州是新島原，

關訶邦士護蠻船。

勸郎莫帶兩條鐵，

勸郎須帶十萬錢。[[27]](#_27__Mu_Xia_Biao____Ming_Zhi_Shi)

1868年冬，政府拆除筑地的大名宅邸，為外國人的居住區騰出地方，同時在附近又開放了一個以京都的島原命名的街區。詩中的最后兩句表明，對新島原的妓女而言，金錢比顧客的階層更為重要。對武士來說，這種羞辱不亞于保護外國人，因為幾年前他們都是堅定的攘夷派。

1月5日和6日，天皇接見了外國使節，表明他希望改善日本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按照西方的外交慣例，皇帝接見外國使者并為他們提供茶點并沒有什么出奇之處，然而在日本卻前所未有。如果我們想到孝明（他認為外國人出現在神圣的日本國土是對神明的可怕褻瀆）才駕崩不到兩年，就會更加驚訝。年輕的明治天皇不僅愿意滿足外國人的要求，還對他們非常友善。

1月11日，天皇第一次登上日本戰艦，觀看艦隊演習。三條實美和巖倉具視經常催促他坐船從橫濱出海，但外祖父中山忠能卻表示反對，擔心會遺失神劍和勾玉。天皇最終決定視察軍艦，不過他出發時把神劍和勾玉留在了濱離宮，并派重兵把守。天皇登上富士艦的時候，一艘美國軍艦鳴放了二十一響禮炮，富士艦隨即作出回應。陪同天皇的宮廷官員（包括議定中山忠能和參議大久保利通）都被炮聲嚇了一跳，但是天皇卻異常平靜，表情甚至可以說非常愉快。天皇后來聽到附近傳來的爆炸聲或者類似的噪聲時，都表現出同樣的鎮定，這與他孩提時代一聽到炮聲便暈倒的傳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天皇的海上之行極為成功。晴朗的天氣加上天皇的好心情（誰都看得出來），被認為是未來日本海軍發展的好兆頭。第二天，天皇頒布諭旨，稱“海軍之儀，乃當今之急務”，要更加“講究精勵”。

1月15日，輔相巖倉具視和外國事務副總督東久世通禧拜訪了橫濱的英國使館，希望說服外國人放棄在政府和幕府支持者之間的中立政策。政府之所以提出這個迫切的要求，主要是因為他們購買了美國制造的裝甲艦“斯通威爾·杰克遜”號（"aid-51R"）。這艘船由幕府訂購，然而還沒交貨，內戰就開始了。外國采取了中立政策，不愿把船交給任何一方。政府已經數次要求外國人放棄中立政策，但都被拒絕，“斯通威爾·杰克遜”號依舊停泊在橫濱灣。巖倉、東久世說，戰爭實際上已經結束，沒有理由繼續保持中立。根據薩道義的描述，巴夏禮爵士這時回答說，他的同事“愿意宣布戰爭結束，但卻不愿放棄‘斯通威爾·杰克遜’號。為了保證扣留船只的合法性，他們不會撤回中立公告”。[[28]](#_28__Sir_Ernest_Satow_A_Diplomat)巖倉再次重復之前的說法，稱天皇政府根本沒有想過購買“斯通威爾·杰克遜”號用來攻擊榎本武揚，他們反而是決定對他寬大處理。

巴夏禮竭力勸說其他外國公使。多虧他從中斡旋，他們才最終同意放棄中立政策。[[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我們很難理解巖倉說“天皇政府”根本不打算用“斯通威爾·杰克遜”號去攻擊榎本這番話是什么意思。中立政策剛剛取消，政府就將這艘船派往函館，它在那里英勇地投入了海上的戰斗。不過巖倉這時許諾的對叛軍的寬大政策并不假。1869年6月27日榎本投降后，被關了三年，隨后在1872年獲得特赦并被任命為北海道開發局的官員。

其他的叛軍首領也同樣得到寬待。東北的戰事結束后，天皇發布聲明稱，自己不想成為叛軍的唯一仲裁官，為了確保絕對公平，將由輿論來決定應該對他們施加什么刑罰。會津藩的大名松平容保本應以叛變罪處以死刑，但最終被減刑。實際上不僅松平，其他所有大名的案子也都用了這個建議。沒有一個與政府對抗的大名被處死。松平被流放到四國地區的鳥取，但是不久就被免除處分。其他大名都被剝奪了藩國，但是很多人不久就有了新的封地。只有木戶孝允一人堅持認為應該實施死刑，他說盡管自己并不討厭叛亂分子，但痛恨他們犯下的罪行，而且也無法忘記許多忠誠的士兵死于他們之手。木戶認為不應該為了寬大而扭曲法律，但他的話并不能動搖政府中的其他人，寬大處理是當時的政策。[[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1月20日，天皇啟程返回京都，承諾春天會再來江戶。天皇的隨從人員一共有兩千一百五十三人，比來時減少了很多，說明敵對分子的威脅變小了。一路上天皇又看到了富士山并欣賞了三保的松原[[31]](#_31__Ri_Ben_Jing_Gang_Hai_Bian_D)。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滿意。在他離開京都的不到三個月時間里，東北已經徹底平定；盡管函館還有叛軍在抵抗，但是就連許多外國公使也都認為他們已經打贏了。長期作為幕府根據地的江戶城，現在是他的。此外，天皇的御輦前所未有地經過東海道，無疑增加了他在遠離京都的民眾心目中的威望。[[32]](#_32__Duo_Mu_Hao_Er_De___Tian_Hua)2月5日，天皇的御輦回到京都，剛好趕上8日舉行的紀念孝明天皇逝世的儀式。三天之后，明治的新娘一條美子進宮，為這個日本歷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1. [[1]](#_1_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94頁。

1. [[2]](#_2_18) 事實上，地球儀在加冕典禮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05頁）。

1. [[3]](#_3_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96頁。祈禱并不靈驗，因為典禮舉行期間雨下得很大。

1. [[4]](#_4_18) 官銜最高的女官。

1. [[5]](#_5_18) 天皇的神器包括一把寶劍、一面鏡子和一塊勾玉。鏡子通常供奉在伊勢，但是其他兩樣寶貝則由天皇保管。

1. [[6]](#_6_18) 一根綁有紙條或者布條的木棍。祭司在人前揮動木棍，以達到驅邪的目的。

1. [[7]](#_7_18) 確切地說，是“宣命”的宣讀者。“宣命”是一種用上古日語書寫的天皇敕諭。這次的宣命使是冷泉為理。

1. [[8]](#_8_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12頁。這首賀詩是《古今和歌集》的第344首。

1. [[9]](#_9_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12頁。

1. [[10]](#_10_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04頁。“天長”截自“天長地久”這個成語，意為祝愿天皇的生命如同天地一般長久。1873年采用陽歷之后，明治1852年的生日從陰歷換算成了陽歷，于是天長節也相應地改在11月3日慶祝。但是，1868年生日對應的陽歷是11月6日。歐內斯特·薩道義爵士寫道，“11月6日是天皇的生日，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儀式”（A Diplomat in Japan , p. 386）。

1. [[11]](#_11_18) 這么做的原因并沒有說明。也許，隨著日本熟悉了西方確定年份的方法，日本原來那種經常變換年號的方法看起來效率太低了。

1. [[12]](#_12_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87頁。

1. [[13]](#_13_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14頁。

1. [[14]](#_14_18) 薩道義在日記中寫道，“（1868年8月）23日，我和小松帶刀、中井弘一起吃飯，并與大久保見了面，這個薩摩政治家一年前曾建議都城從京都遷往大阪。我毫不懷疑，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將政府的中心最后定在江戶，并將其名字改為‘東京’或者‘東都’”（A Diplomat in Japan , p.380）。1868年2月，大久保陳述了自己之所以同意遷都大阪的理由。后來他認為東京更好（遠山茂樹編，《天皇と華族》，第6—8頁）。

1. [[15]](#_15_17) Sir Ernest Satow,A Diplomat in Japan , p. 366.

1. [[16]](#_16_1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38頁。

1. [[17]](#_17_1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39頁。

1. [[18]](#_18_1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47頁。多田好問寫了另外一則軼事，內容驚人地相似（《巖倉公実記》第二卷，第570頁）。11月6日，乘輿到達東海道上的石部驛站時，伊達宗城走到路邊的一處稻田，摘了五莖稻穗獻給天皇，同時附上下面這首詩：君見ませ五月の雨のふりすぎて/刈り穂の稲のとり実すくなき。這兩則軼事和詩歌的意思相同，都是為了讓從未見過農民在田里勞作的天皇知道，由于收成不好，他們的生活非常艱難。

1. [[19]](#_19_16) 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中，第572頁。

1. [[20]](#_20_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52頁。詩的要點在于“新居”這個雙關語，“新居”是附近的一個鎮，還有“洶涌”的意思。盡管從名字上看波濤洶涌，然而實際上卻很平緩。

1. [[21]](#_21_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65頁。

1. [[22]](#_22_1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65—66頁。

1. [[23]](#_23_14) 這是巖倉具視的觀點（《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06頁）。

1. [[24]](#_24_12) 木下彪，《明治詩話》，第3頁。

1. [[25]](#_25_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06頁。

1. [[26]](#_26_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05頁、第913頁。1869年2月20日，派昭武去北方的計劃取消，因為叛軍已經遭受沉重打擊，他們的投降指日可待；但是關于他去東海道的計劃卻提前了很多，以致昭武請求允許他按原計劃啟程。實際上他出發的日期是下月初（《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1頁）。

1. [[27]](#_27_11) 木下彪，《明治詩話》，第12頁。

1. [[28]](#_28_9) Sir Ernest Satow,A Diplomat in Japan , p. 404.

1. [[29]](#_29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15頁。

1. [[30]](#_30_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 第917—919頁。

1. [[31]](#_31_8) 日本靜岡海邊的一處名勝，以古松著名。——譯注

1. [[32]](#_32_7) 多木浩二的《天皇の肖像》一書對天皇展示在民眾面前的形象描寫得極為有趣，還描繪了天皇東巡期間同步發行的各種“錦繪”。這些畫非常熱銷，尤其是那些展示天皇進入東京的圖畫，它們為普通民眾提供了一種政治體驗（第9—11頁）。

# 第十九章 剛、毅、木、訥，近仁



1869年是在一種特別歡樂的氣氛中開始，這種情況近幾年來從未有過。[[1]](#_1___Ming_Zhi_Er_Nian__Bi_1869Ni)按照古老的習俗，京都的皇宮在新年這一天舉行了傳統的慶祝儀式。在東京的公卿、大名和住在城里的其他官員則歡聚在東京城，互相祝賀新年。英國和美國的公使也發來了新年的賀信。

這個月4號，輔相、議定、參議等高級官員被召到宮廷聽天皇發布詔書，詔書由輔相巖倉具視宣讀。天皇表示擔心自己德行不夠，可能危及祖先傳下來的萬世一系的皇統。長年累月的戰事導致民眾受涂炭之苦，但幸運的是今日因百官將士的努力，已經使臣民生活安定。天皇表示，自己決心延續祖先的功績，要求臣民毫不猶豫地更正自己的錯誤。[[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天皇的詔書措辭大體遵循傳統，應該不是他參與擬定的詔書內容，[[3]](#_3__Zhe_Ge_Shi_Qi_Zhong_Yao_De_Z)但他顯然希望參與未來政府的所有決策。天皇不僅將參加內閣會議，還將參加政府各部門的無數會議，幾乎持續到他去世為止。天皇通常在會上不會發言，然而他的到場卻大大增加了會議的嚴肅性和重要性。

沒過多久，新年的喜慶氣氛就被粗暴地打斷了。2月15日下午2點左右，參議橫井小楠乘坐轎子從宮廷回家，經過寺町路時，突然有幾個人朝轎子開槍。橫井推開門，從轎子里出來，想用短刀自衛，然而他正值大病初愈，身體還很虛弱，根本無力反抗，當場就被刺殺。盡管橫井的家臣和仆人奮力追趕，殺手還是跑了。

暗殺的消息傳到皇宮，天皇極為震驚，立即派一名宮廷侍者到橫井家去了解情況。天皇向襲擊中受傷的家臣和仆人贈銀四百兩，作為他們的醫藥費。第二天天皇指示熊本藩的大名細川韶邦務必以適當的規格安葬橫井，他自己則捐了三百兩銀子作為料理喪事的費用。這些迅速而熱心的舉動令人難忘，因為只需對比一下近幾年其他人（甚至是比橫井更親近的人）遭到暗殺時他的冷淡態度就知道了。天皇這次表現出了發自內心的關心，可能是因為他還年輕。后來，隨著君主觀念的增強，天皇逐漸意識到自己該怎么做，這類自發的行為便往往被一種極少表露自己情感的公平無私的態度所代替。

經過大范圍的搜索，加上封鎖進出京都的所有入口，刺殺橫井小楠的兇手最終在高野山被抓獲。兇手稱刺殺橫井是因為橫井是個卑鄙的叛國賊，和那些計劃在日本推廣基督教的外國人互相勾結。[[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兇手被關押在福岡藩大名位于京都的住宅里，不久他們就成為人們同情的對象：福岡藩的大名要求對他們寬大處理，許多人為他們請求特赦，連政府的公訴人都在搜索橫井可能犯下不軌行為的證據，希望能為殺手辯護。這類同情心表明，新政權開明的外表下依然隱藏著過去的排外情緒，殺死任何對外國人有好感的人都會得到原諒。直到1870年11月，四名兇手才被處死。

當然，橫井的目的并不是要讓日本人都信仰基督教。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儒士（他是明治的保守派老師元田永孚的老師），而且從未放棄自己的信仰。橫井早年是個熱心的攘夷派，但是后來轉向實學[[5]](#_5__Guan_Yu__Shi_Xue___Jian_Ben)[[6]](#_6__You_Guan_Shi_Xue_Zai_Zhong_G)。這使他轉而支持外國學識的輸入，包括西方的經濟和政治理念。基督教并不是他思想的基礎，但是正如這個時期的一名西方權威所說的，“基督教對橫井來說是實用或者說是理性的道德體系……與那些出生時間比他晚得多的日本作家相比，橫井更加敏銳地看到西方的科技和經濟力量與基督教之間的密切聯系，他將其理解為現代性和一種合適的道德體系之間的關系”。[[7]](#_7__H__D__Harootunian_Toward_Res)兇手稱他們擔心原始而純潔的日本傳統信仰遭到外國勢力的玷污，拒絕承認橫井的學識對新日本的價值。

橫井走在時代的前頭。喬治·桑塞姆（George Sansom）爵士在研究了橫井的政治思想的發展后認為，最后“他甚至形成了世界和平以及兄弟情誼的思想，并提出 ‘一個世界’的學說”。[[8]](#_8__George_B__Sansom_The_Western)傳統的儒家教育很可能使人懷有兄弟友愛的思想，但這并非德川時代末期日本最典型的儒家思想。殺害橫井的兇手們年輕時是武士，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教育，他們認為，這樣的暴行是儒家思想允許的：根據儒家的經典，寬容和不寬容都有道理。

年輕的天皇學習的內容，代表了當時人們認可的儒家正統思想，包括中國思想的典籍以及日本歷史的有關著作。天皇每個月要上六堂《論語》課和六堂《日本書紀》課。稍后他的課程表便擴展到日本典籍北畠親房所著的《神皇正統記》[[9]](#_9__Paul_VarleyJiang_Qi_Fan_Yi_W)和儒家四書的其他典籍。然而明治的顧問們仍沒有打算讓他了解世界地理或歷史知識，更不要說科學了。

這個時期明治的老師對現代做的一個讓步，便是允許他一個月騎六次馬。兩年前明治第一次騎馬時就對這項運動有著濃厚的興趣，接下來那年他觀看了很多次馬術表演。木戶孝允是天皇僅有的幾個朋友之一，他在日記中描繪了天皇如何卷起御座前的竹簾，命令他去參加“馬術大閱兵”的。木戶的表現非常出色，天皇在他的食物和點心盤上放了一枝花，還賜他很多清酒，木戶都喝醉了。[[10]](#_10__1868Nian_10Yue_9Ri_De_Ri_Ji)不久，天皇就迷上了騎馬。這使廷臣們非常苦惱，他們認為天皇應該把時間更多地花在讀書，而不是騎馬上。[[11]](#_11__1869Nian_5Yue_10Ri__Yi_Ding)年輕天皇的這些行為與父親靜止不動的生活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孝明不僅從未騎過馬，而且實際上從未離開御所一步。這些行為也許可以解釋明治為何與武士階層——保留了最多日本武士傳統的一群人——關系親密。

1869年2月25日，天皇參加馬術表演，身穿白上衣和紫紅色的褲子騎在馬上。其他的騎手不僅包括大名（他們的教育自然主要都放在武術和運動上），還包括像三條實美和明治的外祖父中山忠能這類公卿。人們鼓勵天皇騎馬本來是為了使他擺脫長期由女人撫養而形成的柔弱氣質，但現在周圍的人都被他騎馬的熱情所感染。那些騎術不錯的人都受到天皇的尊敬。

天皇的教育是大臣們極為關心的問題。木戶的日記一再披露自己對此格外擔心，特別是在接下來的十年里。巖倉具視也意識到，必須讓年輕天皇的身邊都是真正能夠輔佐他的顧問。1869年3月5日，巖倉寫信給三條實美，強調培養“君德”（即君王道德）的重要性。“今大政維新之初，天皇年若少經驗，故輔導之任一日不可或缺。”[[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巖倉建議從公卿、大名和資深武士中挑選一些篤實謹嚴、器識高遠、通曉和漢洋學的人。他強調天皇聰敏而有明德，掌握了為帝之道，即是政府所需之君。

一開始沒有什么具體的建議。1871年，天皇的課程表增加了一些與現代有關的資料。授課計劃每十天制定一次。十天里有四天天皇上的課是《西國立志編》，這是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amiles）幾個月前剛出版的著作《自助論》（"aid-57K"）的日文譯本。這位年輕人——一直以來，他的書本知識都主要局限于儒家經典以及描寫日本天皇神圣血統的書——讀到像本杰明·富蘭克林這樣的人靠自身的天賦和努力最終克服了貧窮和階級障礙時，可能會感到吃驚。天皇每天還要學習德語，[[13]](#_13__Xuan_Ze_De_Yu__Er_Bu_Shi_Yi)但是不久就因為公事的壓力過大而無法繼續。

盡管引進了新知識，舊式文化依舊盛行于宮廷。2月21日，宮廷舉辦了天皇統治期間的第一場音樂會，天皇和皇后都參加了。所有的表演者都是宮廷成員：笙由包括前左大臣在內的八名公卿演奏、篳篥由六名公卿演奏、笛子由包括天皇的外祖父中山忠能在內的另外六名公卿演奏、琵琶由三名公卿演奏、箏由另外五名公卿演奏。宮廷非常重視能在雅樂表演中演奏一種樂器，就像在平安時期一樣。

明治似乎并沒有學習任何樂器，但是他很小就開始在父親的指導下創作短歌，而且終身保持著這種愛好。2月19日，明治參加了自己統治期內的第一場詩會——歌御會。天皇就“春風海上來”的詩題創作詩歌如下：

千萬年來

不變的

春之訊

拂過海岸的春風

多么柔和

同一詩題皇后創作的詩歌如下：

岸邊的浪花

裹在霧中，躍出海面

又四面散開

風勢減弱

告訴我們春天已經來了[[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這些詩歌沒有什么個性。天皇和皇后與千百年來無數的宮廷詩人完全一樣，表達了春天到來時的喜悅心情。他們沒有使用令人意外的語言和意象。創作這些韻律準確的詩只是他們熟悉宮廷文化的表現。

宮廷習俗的另一方面可以從3月20日的一份簡短的布告中看出來，布告稱權大納言橋本實麗的女兒夏子被冊封為典侍。第二天，天皇接見了夏子并賜給她一杯清酒，[[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隨后還賜給她綾羅綢緞作為禮物。這個女孩年紀太小，只有十二歲，還不能成為天皇的妃子，但是四年半之后，1873年11月12日，她給天皇生了一個女兒，并在同一天死去。

天皇和皇后的婚姻非常幸福，但他們似乎很早就意識到皇后無法生育。即使天皇不愿和其他的女人同床共枕，他也有責任生一個王位繼承人。大約從這個時期開始，他便與精心挑選的貴族女子共度良宵，希望其中至少有一人能夠懷孕。這些女子的年齡大多為十幾歲（橋本夏子死時只有十六歲），出身無可挑剔，但卻沒有受過什么教育。實際上，她們唯一的目標就是為皇室生育孩子。這些女人為了爭寵而鉤心斗角。然而，即便有人幸運地懷上了天皇的孩子，她也不太可能享受做母親的喜悅，因為孩子會從她的身邊抱走，并被視為皇后的親生孩子。不過，我們從明治的母親中山慶子的例子可以看出，盡管那可能意味著孤獨的一生，但皇室孩子的母親依然獲得了很高的封號和其他優厚的待遇。即便孩子死了，她的生活依然相當優渥。[[16]](#_16__Xiang_Jian_Jia_Teng_Ren)

明治有十五名子女，分別由五位不同的典侍所生。從流傳下來的照片看，這些默默無聞的宮廷女子梳著僵硬的發型，穿著正式的宮廷長袍，看起來幾乎沒有什么區別。很難說天皇是否特別喜歡某位女子，不過有兩個女人（圓祥子和小倉文子）服侍他的時間要比其他人長得多。圓為明治生了八個孩子，其中四個活了下來。在歐洲，國王的私生子沒有繼承王位的權利，但是根據日本的特殊傳統，皇后生的孩子和那些通過“借用”另一個女人的子宮而來到這個世上的孩子并沒有什么區別。

關于明治的性生活，一直流傳著各種謠言，直到今天依然有人驕傲地宣稱自己是他的非嫡系后代。這些話通常都沒有什么證據。[[17]](#_17__Zai___Ming_Zhi_Tian_Huang_o)據說天皇經常被漂亮的藝妓所吸引，并要求她們陪睡。這種事可能確實發生過，但是那些認識年輕天皇的人沒有一個證實過。明治一直都有六名年輕的妃嬪，她們都是貴族女子。那些他不喜歡的人很容易就被換掉。天皇沒必要到別的地方去找女人。

很容易想象，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頂著生子的壓力，可能遲早會耽于肉欲而耽誤功課。木戶在日記里，尤其是從1874年開始，經常提到天皇的教育停滯不前，暗示天皇的心思都在其他事情上。那年，天皇的老師要求木戶敦促天皇用功學習，以便配得上他的皇室血統。也許這是在間接地建議明治不要花太多的時間在女人身上。

這段時間他們擬了一份詳盡的課程表，包括中國經典和經典的日本歷史著作以及歐洲歷史和德語，然而天皇的學習進度卻非常緩慢。木戶在見過教日本歷史的福羽美靜和教德國法律的加藤弘之（1836—1916）之后，在日記中說，大家對天皇的學業頗為擔心，因此要求他充分利用與皇室的關系，為天皇制定更好的學習計劃，并協助天皇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書本上。木戶提了自己的看法，得到眾人同意。因此，他決定直接向陛下匯報調查結果。[[18]](#_18__1874Nian_5Yue_19Ri_De_Ri_Ji)

天皇對木戶一直很親切，木戶顯然受到了鼓勵，他建議天皇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實現“天職”。一年后，木戶毫不委婉地對天皇說，“陛下如不盡天職、戒游玩，則臣等杞憂不堪。”[[19]](#_19__Jian_Sidney_DeVere_Brown_an)

天皇的酗酒是大家擔心的主要問題。木戶記載有一次在中山忠能家看完狂言[[20]](#_20__Ri_Ben_Gu_Dian_Xi_Ju_Zhi_Yi)演出之后，在場的一些人擔心天皇在隨后的狂飲中可能“喝過頭了”。[[21]](#_21__Jian_Sidney_DeVere_Brown_an)許多服侍過天皇的人，包括侍從高島鞆之助（1844—1916）都證明天皇的酒量過人。高島回憶說，天皇無論頭天晚上喝得多醉，第二天早上從未表現出絲毫宿醉的樣子。天皇不僅體格健壯，而且似乎比普通人睡得少。他一旦醒來（不管是否只睡了四五個小時），就會馬上到辦公室準備工作。高島欽佩地說：

陛下特別勤奮。每天都起得很早，然后就到辦公室去，一直工作到下午五六點才回內宮休息。有時他甚至到那時都不肯離開，而是命令說：“今晚大家在我的辦公室里聚一聚。”他會滔滔不絕說上幾個小時，直到深夜。后來，到了陛下睡覺的時間，人們立刻從后宮為他取來被褥。在走廊上值夜對我們這些侍從來說是家常便飯。[[22]](#_22__Gao_Dao_Tomo_Zhi_Zhu____She)

皇后非常擔心天皇喝酒過度。人們對她下面這首詩的解釋是這樣的：

我希望你

在花之春

或者紅葉之秋

喝清酒時

能保持節制[[23]](#_23__Yin_Zi_Jia_Teng_Ren____Ming)

皇后提到“花之春”和“紅葉之秋”，似乎是因為這兩個季節（現在也依然如此）是大喝清酒的時節。

明治年輕時喜歡喝清酒，后來卻改喝法國葡萄酒和香檳。他的酒量驚人，但并非時時能自制。從1886年起便擔任侍從的日野西資博回憶說，明治一次能喝掉兩瓶香檳。他喝得醉醺醺的，路都走不穩，因此侍從們總是竭力限制他喝酒。[[24]](#_24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只要桌上還有酒，他就不會離開餐桌。通常晚上11點前明治會回內宮休息，但是一些傳聞說他有時會喝到深夜。

不過所有的消息來源都承認，明治每天很早就到辦公室處理公務。盡管有時會忽略學業，令木戶等顧問感到失望，但是他有強烈的責任感，從未忽略國事。明治對天皇身份的深刻認識給外國評論員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們紛紛稱贊，并拿他和歐洲在位的君主相比。查爾斯·萊曼（Charles Lanman）于1882年寫的一段話，便是對他的典型贊美：

跟許多歐洲王子和王公不一樣，明治并不耽于享受，而是以提高自己的修養為樂；為了獲取知識，他不辭辛勞也不怕麻煩。他還很年輕，但是卻經常出席樞密院的會議……明治經常參觀行政部門，并出席大家希望見到他的各種公開場合。他一方面繼續學習文學和科學，一方面定下最嚴格的規定，每天花幾個小時做專門研究，并嚴格地遵守這些規定。據說明治個性聰明、果斷、進取而有抱負。登基伊始，他便謹慎地選擇臣下，使自己身邊都是全國最優秀的政治家。毫無疑問，這些人對他的成長功勞不小。因此幾乎可以肯定，本世紀日本的皇冠戴在了一個最配此最高榮譽的人的頭上。[[25]](#_25__Charles_Lanman_Leading_Men)

萊曼接著贊揚明治“熱切地希望，幾乎毫無偏見地從其他國家吸取一切他認為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東西”，并說他與彼得大帝驚人地相似。也許木戶認為這些贊美之詞有些過分，然而任何人只要熟悉歐洲皇室的缺點，可能都會贊揚明治的敬業精神。

日本人發現了明治性格中的其他優點。他的簡樸和不喜排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一名侍從回憶說，明治的毛筆用到頭都禿了，墨也磨得只剩最后一點（他自己磨墨）。他長年穿著同一件飾有盤扣的舊式制服，而其他人早就換成款式更加時尚的衣服。這件制服補過很多次。明治的鞋子穿舊了松了后，侍從給他買來新鞋，但他下令把舊鞋修一修。天皇知道修補衣服和鞋子有時比更換新的費用更高，但他依然堅持自己的原則：“如果東西修補后能用，那就補一補。”[[26]](#_26__Fang_Cheng_Jun_Liang____Gon)許多回憶錄作者都提到過皇宮臟兮兮的簾子和發黑的窗戶紙，這些都是明治堅持節儉（以及用蠟燭而不用電）的結果。

盡管沒有一位老師認為明治有學者風度，然而高辻修長（1840—1921）回憶說，明治聽課時全神貫注，任何不懂的地方，總是要問到懂為止。[[27]](#_27__Gao_Sip_Xiu_Chang____Yu_You)加藤弘之每周為天皇講授一節憲法和國際法的課，可惜的是，天皇必須優先處理繁忙的公務，因此他的課總是落后于木戶定下的進度表。于是，

安排每天為天皇增加一個課時，夏天的每天早上7點，冬天的每天早上8點半，陛下會到辦公室來。陛下的勤奮確實很鼓舞人心。他每天早上5點起床，在辦公室等候老師的到來。[[28]](#_28__Jia_Teng_Hong_Zhi____Yu_gaS)

加藤摘錄并翻譯了一些西方的憲法書籍，大概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市、鎮和鄉村自治的制度，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期的歐洲憲法史等。一開始，加藤用自己翻譯的德國作家，特別是約翰·布倫奇特（Johann Bluntschli）的文章作為教材，但他擔心天皇一味依賴譯文，可能無法獲得真正的理解。因此加藤決定改為讓天皇讀原版的德文，但是不久就發現，天皇明顯沒有時間（也許是沒有天賦）學習外語。不過，加藤依然認為，天皇是一名用功的學生：

先帝的天性極為認真且鍥而不舍。他似乎不愿半途而廢，在完全理解基本原理之前，不會停下來。假如，有一天我講了一件他不明白的事，第二天他就會問，直到完全明白為止。陛下的學習進度很慢，然而一旦掌握了某樣東西，就永遠不會忘，而且總是能充分地利用它。陛下的這個本領一直使我驚嘆不已。作為一名教育家，這么多年來我接觸過很多學生，但卻從未遇見過像陛下這樣無需參加考試，純粹為了智力訓練而用功學習的人。[[29]](#_29__Jia_Teng_Hong_Zhi____Yu_gaS)

許多認識天皇的人都提到他驚人的記憶力。海軍中將有地品之允（1843—1919）回憶道：

沒有什么宮廷儀式、典禮或任何其他歷史事件是陛下不熟悉的。他從未忘記自己接見過的任何一人的名字，不管這人的身份多么卑微。他參加陸軍和海軍學校以及大學的畢業典禮，且從未忘記那些受到表彰的優秀學生的名字，或者是在他面前演講過的學生的名字……他請人共進晚餐時，會描述上一次見到那人時的情景，以及他們當時討論過的所有事情，一切都栩栩如生，仿佛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一樣。[[30]](#_30__You_Di_Pin_Zhi_Yun____Yong)

這段話是有地回憶剛剛去世的天皇，因此或許存在夸張的成分。不過，即便考慮到這一點，明治的記性之強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明顯不是一名知識分子，不過這些認識他的人的評價讓人想起《論語》里的一句話：“剛、毅、木、訥，近仁。”

明治“剛毅”的個性突出地表現在他積極參加軍事演習上。他甚至騎馬揮劍，統率士兵。第一次演習時，天刮著大風，下著大雨，然而天皇完全不為所動，使全軍受到極大的鼓舞。冷靜是他治世的一貫作風。不管環境多么惡劣和悲慘，他從未抱怨或者自艾自憐過。

治世的這一段時間，他還是個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因此別無選擇，只能依靠身邊那些杰出人才。盡管這些人對他畢恭畢敬，而且無疑尊他為君主，可是他們的政治和戰略、文學和哲學也可能使他望而生畏。天皇對學習明顯缺乏熱情（這點木戶抱怨過），也許正是由于感到自己永遠無法達到他們那樣的成就。

到目前為止，明治極少有機會展示自己的內在氣質。假如他年紀輕輕就死去，或者像父親一樣沒有活過三十六歲，人們可能只會模糊地記得他是維新時期的一名君主。但是，長壽加上兢兢業業，最終使這名年輕人成為長長的天皇名單中最著名的一位。

1. [[1]](#_1_19) “明治二年”比1869年更為準確。陰歷和陽歷的差別在新年時尤為明顯，因為陰歷的新年第一天是陽歷的2月11日。

1. [[2]](#_2_1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頁。

1. [[3]](#_3_19) 這個時期重要的詔書均出自玉松操（1810—1872）之手（《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9頁）。

1. [[4]](#_4_1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頁。他們對橫井的指控原文，見森川哲郎，《明治暗殺史》，第29頁。其中一位名叫上田立夫的刺客尤為憤怒，因為他看到橫井在筑地的外國人居住區晃蕩，而且還穿著西裝，戴著洋帽子。

1. [[5]](#_5_19) 關于“實學”，見本書第219頁正文。——編注

1. [[6]](#_6_19) 有關實學在中國和日本的發展情況，請參考Wm. Theodore de Bary and Irene Bloom,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 , pp. 189-511。

1. [[7]](#_7_19) H. D. Harootunian,Toward Restoration , p. 335.

1. [[8]](#_8_19) George B. Sansom,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 p. 283.

1. [[9]](#_9_19) Paul Varley將其翻譯為“A Chronicle of Gods and Sovereigns”。

1. [[10]](#_10_19) 1868年10月9日的日記，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 p. 105。

1. [[11]](#_11_19) 1869年5月10日，議定中御門經之給巖倉具視寫了封信，內容大意如此。他說天皇現在隔天騎一次馬，敦促他遵守一個月騎六天馬的規定（《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09頁）。

1. [[12]](#_12_1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30頁。

1. [[13]](#_13_19) 選擇德語（而不是英語或者法語）可能是因為德國法律對正在生成的新日本法有著重要的參考。天皇的老師加藤弘之曾在德國留學過，德語非常流利（引自加藤弘之，《予が侍読に召されし頃》，《太陽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38頁）。

1. [[14]](#_14_1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7頁。

1. [[15]](#_15_18)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4頁。

1. [[16]](#_16_18) 詳見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新潮 45》，7(10)(78)。

1. [[17]](#_17_18) 在《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一書中，加藤提到許多人認為自己是明治的私生子，但他卻不愿承認他們。

1. [[18]](#_18_17) 1874年5月19日的日記，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 3, p. 32。

1. [[19]](#_19_17) 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 3, p. 199。1875年8月20日的日記。

1. [[20]](#_20_16) 日本古典戲劇之一，形成于日本的奈良時代，由唐朝的散樂（雜技）發展而來，是日本喜劇的鼻祖。——譯注

1. [[21]](#_21_16) 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 3, p. 375。1876年10月13日的日記。

1. [[22]](#_22_15) 高島鞆之助，《神武以來の英主》，《太陽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33頁，轉引自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48頁。

1. [[23]](#_23_15) 引自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新潮 45》，7(10)(78)，第60頁。

1. [[24]](#_24_13)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81頁。日野西還描繪了天皇有一次在土方伯爵家喝完酒后，連路都走不了，不得不靠在日野西身上。不幸的是，日野西的個子并不高，實在難以支撐天皇沉重的身體。快要到目的地的時候，他們雙雙倒下了（第83頁）。

1. [[25]](#_25_13) Charles Lanman,Leading Men of Japan , p. 18.

1. [[26]](#_26_13) 坊城俊良，《宮中五十年》，第14頁、第16頁。

1. [[27]](#_27_12) 高辻修長，《御幼時の進講》，第30頁。

1. [[28]](#_28_10) 加藤弘之，《予が侍読に召されし頃》，《太陽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38頁。

1. [[29]](#_29_10) 加藤弘之，《予が侍読に召されし頃》，《太陽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38頁。

1. [[30]](#_30_10) 有地品之允，《勇壯、闊達、細心、諧謔、勤倹に渡らせらる》，《太陽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52頁。

# 第二十章 英國公爵來訪



第二次東京之行，至少對明治而言，是1869年最重要的事情。前一次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當京都的民眾得知天皇向東京的居民賞賜了清酒等禮物后，感覺受到了輕視。回到京都后的天皇，在新年也向京都的民眾賞賜了同樣數量的清酒，[[1]](#_1__F__V__Dickins_and_S__Lane_Po)也許天皇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安撫他們，讓他們不必擔心舊都很快就會被東部的新都所代替。

盡管有這些舉措，但人們對都城即將遷往東京的憂慮還是與日俱增。3月5日，巖倉具視針對這種擔憂，特別起草了一份聲明。巖倉描繪了京都和大阪的許多市民是如何為遷都的傳聞所困擾。江戶去年確實改名為“東京”，但是，這絕不意味著天皇打算“改變玉座的位置”。相反，天皇這么做是基于 “四海為家”的寶貴思想，希望對東部和西部一視同仁。京都自桓武天皇以來就被定為國都，已經有超過一千年的歷史，而且歷代天皇的山陵都在這里。即使再過一千年也不會遷都，因此京都完全不存在被拋棄的危險。天皇希望將帝國統治之光傳播得更遠，甚至傳到蝦夷和更遠的千島群島，因此他覺得有必要第二次到東部去，以便將新政府的恩澤撒播到那些仍未受他的仁慈感化的地方。巖倉承認宮廷有人建議遷都，但他本人是徹底反對的。如果天皇根據自己的判斷下令遷都，那么巖倉也沒有辦法，不過作為一名臣子，他是不會贊同這個決定的。[[2]](#_2__Ba_Xia_Li_Dui_Yi_Shi_De_Jie)

不管是否是作為遷都的前兆，天皇第二次東部之行的計劃漸漸成型。3月20日，宮廷宣布為了方便參拜伊勢神社，天皇的乘輿在去江戶時將會半路繞道。這個決定改變了旅行的性質。也就是說，這次旅行不僅，政治上將帝國的影響擴大到遙遠的疆土，還從宗教上展現天皇和神道教的親密關系，未來幾年神道教將得到重視。十天后，另一份公告宣布了天皇啟程的日子（4月18日），并命令沿途的接待一切從簡。過分熱情的官員不得騷擾沿途正在做生意的人們或者干擾農事。這種對質樸的強調也許是為了與傳統上大名出行的排場形成對比，對農業的強調則暗示了明治此行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接觸正在勞作的子民。

4月2日，天皇向叛亂仍然持續的北部人民頒布特別諭旨。他說：“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茍生于本邦，朕視之皆如赤子，一民不得其所，朕心深惱。”[[3]](#_3__Redesdale__Memories_of_Lord)這些話都是儒家用語，然而又與過去天皇可能說的話迥然不同。很難想象孝明天皇會因為“一民不得其所”而感到不安。這位年輕的天皇不僅親近自己的子民——每一個日本人，不管地位高低，或者住在國土的哪個地方——而且還擔心他們的幸福，不愿做任何可能干擾他們日常生活的事。

開放天皇的私家花園，是拉近天皇和國民之間距離的另一種方式。4月5日，東京城內的吹上御苑前所未有地開放三天，市民們欣喜若狂，蜂擁而至，以致八人被擠壓而死，多人受傷。天皇捐了三百兩金子作為遇難者的撫恤金。[[4]](#_4__Li_Wu_Bao_Kuo__Qi_Qi___Xie_C)

明治按照計劃啟程，包括三條實美和他的外祖父中山忠能在內的一些高級公卿陪同。隨從中還有一批不必要的“親兵”——一群自愿保護天皇在京都個人安全的士兵。一個名為約翰·布萊克（John Black，1827—1880）的英國人這么描述這些“親兵”：

他們認為自己尤其充滿了“古代日本之魂”。他們的信條是 “效忠于天皇，置夷人于死地”。這些人紛紛來到天皇面前，懇求他不要離開這座神圣之城，也不要與夷人接觸以免玷污了自己。看到陛下對他們的請求置若罔聞后，他們說現在別無選擇，只好跟隨陛下，一路保護他的安全。他們大約有兩千人，個個身強體壯，隨時準備拔出鋒利的刺刀，故而為所欲為。就這樣，他們向首都進發了。[[5]](#_5__F__V__Dickins_and_S__Lane_Po)

和上次一樣，天皇一開始沿著東海道走，但是在關市停留一段時間之后，隊伍沿著參拜伊勢的道路來到了松坂，當晚天皇就在那里休息。第二天隊伍來到伊勢神宮的外宮，天皇在那里過夜。第三天早上，天皇身穿只有正式場合才穿的黃色的袍子，走下乘輿，來到神社，認真進行祭拜。午飯后天皇再次出發，這一次是到更加重要的內宮祭拜。文武官員全都身著正式服裝，跟在他后面。短暫休息之后，天皇沐浴更衣。下午2點天皇在神社舉行了祭拜儀式。

這是歷史上首次有天皇來神道教最重要的神社祭拜，因此天皇命令神祇官設計一份新的祭拜儀式。神官將明治比作古代的神武天皇和景行天皇，[[6]](#_6__John_R__Black__Young_Japan)對他的智慧和美德極盡溢美之詞。[[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在明治準備離開時，津藩的繼承人藤堂高潔參見天皇并送給他一個望遠鏡和一些糕點。[[8]](#_8__Duo_Tian_Hao_Wen_Bian____Yan)這個望遠鏡就像天皇加冕典禮上那個占據重要位置的地球儀一樣，目的似乎是為了擴大年輕天皇的視野。天皇第一次來到可以說是日本人心靈故鄉的伊勢地區。

祭拜完伊勢神宮之后，天皇又去了熱田神宮。隊伍在岡崎折回東海道，繼續朝東京前進。旅途期間并未發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但北方不斷傳來的戰報還是讓大家擔心不已。榎本武揚的三艘軍艦襲擊了停泊在宮古灣的政府軍艦，福山城也落入叛軍手中。大家擔心叛軍可能會襲擊本州地區。從這時一直到6月16日榎本武揚投降、五棱郭的大門向天皇軍開放，打擊叛軍的軍事行動進展緩慢，成為壓在大家心頭的一塊大石。[[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政府軍禮貌地勸榎本投降，有時甚至許以禮物。榎本的一些手下不堪長期的戰斗和物資的匱乏，幾百人幾百人地投降，但榎本不愿放棄自己的信仰，一直堅持到最后。

明治在東京一住下，就馬上恢復了熟悉的日常生活：學習中國和日本典籍以及騎馬。他的生活非常平靜，沒有跡象表明他參與了這個時期的政府決策，但是政府卻以他的名義發布了許多公告。例如，5月14日的一份公告中，天皇下令設立史官以重新編寫日本歷史。公告說，

修史乃萬世不朽之大典。舉祖宗之盛舉，《三代實錄》[[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以后斷絕，豈非缺典哉。今鐮倉以降武門專權之弊已除，政務振新，故開史局，繼祖宗之芳躅，施文教與天下。任（三條實美）總編之職，以速正君臣名分之誼，明華裔內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綱常。[[11]](#_11__John_R__Black_Young_Japan)

政府面臨許多問題。打擊北部叛軍的行動進展緩慢且耗資巨大，政府為償付戰爭費用而發行的紙幣并不為民眾所接受。一開始，為平衡所謂的紙幣與金銀之間的差額，政府將兌換比率定在一百二十元紙幣換一百元鑄幣，結果造成許多投機分子囤積紙幣。政府隨即宣布紙幣和鑄幣等值，但卻造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簡直就是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的一個完美例子]。[[12]](#_12__Ke_Neng_Zhi_Shi_Ge_Qiao_He)明治政府采取的措施和應對政策正是其不成熟和國內危機仍在持續的表現。

懲罰罪犯的政策同樣在極端嚴厲和相對寬容之間搖擺不定。5月26日，軍隊頒布了針對拉幫結派的處罰規定，派系首腦將被處死，其他人將被拘禁；士兵若攜帶武器軍服脫逃，將處以死刑，若在逃跑前便上繳武器和軍服，初犯處以五十天監禁，再犯則處以流放；那些無端向人要錢或者強制兜售的人將按情節輕重，處以死刑或流放。[[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后來軍隊又頒布法令，對在東北地區的戰事中對抗政府軍的叛軍首領處以斬首，那些已死的人將會被模擬處決，誅滅親族。這些嚴厲的措施與對榎本武揚將寬大處理的承諾完全不一樣。

6月2日，公議所[[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會議投票決定廢除基督徒的死刑，將懲罰改為鞭刑。但是舊政權的精神并未消亡：6月7日，會議投票決定不禁止切腹自殺，[[15]](#_15__Zhi_Dao_Wu_Yue_Fen__Huan_Yo)幾周后會議又全體通過不禁止佩戴刀的決議。不過，禁止在8月進行各種形式的酷刑，包括曝尸、當眾游街和砍頭。

減輕對基督徒的處罰也許是一種做給一直反對禁止基督教的外國列強看的姿態。阿伊努人也得到了外國人的同情。政府覺察到北部的地方官員偶爾會虐待阿伊努人，因此有些阿伊努人對仁慈的外國人頗有好感，漸漸變得更喜歡他們。政府擔心外國人會以解救阿伊努人的苦難為名，煽動他們起來造反。為了杜絕此事發生，他們鼓勵日本人移民北海道。

針對外國人的暴力行為仍然持續。英國公使對這些事件感到憤怒，向日本政府施壓，要求緝拿罪犯。5月14日，德大寺實則和蜂須賀茂韶登門向英國公使道歉，然而公使卻不明白他們的意思。因此，輔相三條實美、議定正親町三條實愛和參議大隈重信登門向英國公使做進一步解釋。第二天政府頒布法令，嚴禁任何針對外國人的暴力行為。但是群眾的排外情緒依然高漲，對外國人的襲擊事件也在繼續，令外國使節大為光火。他們隨時準備制造事端，使那些忙于處理內政事務的日本領導人恐慌不已。[[16]](#_16____San_Dai_Shi_Lu____Shi_Zui)

除了經常出現騎馬相關的記載以外，這個時期有關天皇活動的記錄很少。他還在繼續學習中國典籍，正跟著老師讀《詩經》和《孟子》。[[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天皇有時會檢閱軍隊，觀看炮彈射擊。當榎本投降，期待已久的勝利終于來臨時，天皇接見了海軍和陸軍的高級將領。我們不清楚明治是否知道所有的進展，但他確實參與了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事件——各大名將自己控制的土地和臣民還給天皇，即“版籍奉還”。

7月25日，天皇頒布法令，同意各藩國奉還版籍的請求。那些沒有提出申請的藩國也必須將版籍奉還。早在這年正月，薩長在內的四個主要藩國宣布愿意奉還版籍，其他藩國紛紛仿效。最終，二百七十四名大名將自己的土地和人口還給中央政府，而作為補償，政府任命他們為各自藩國的行政長官。[[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政府還廢除“公家”（貴族）和“大名”的頭銜，代之以“華族”的稱號。日本向行政統一邁出了一大步。

8月15日，政府進一步重組，成立了更多的部門。三條實美被任命為右大臣，巖倉具視和德大寺實則（1839—1919）被任命為大納言。天皇的外祖父中山忠能被任命為神祇官最高職位的神祇伯。王政復古的其他重要人物也都在新政府中出任要職。

與此同時，天皇又有一個重要活動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著。1869年的夏初，英國公使巴夏禮爵士接到消息，維多利亞女王的二兒子愛丁堡公爵計劃指揮 “加拉蒂亞”號（Galatea）軍艦訪問日本。去年，公爵乘坐這艘軍艦開始環游世界。他在大多數地方都受到歡迎，但在澳大利亞卻受到一名愛爾蘭愛國者襲擊，差點死掉。假如不是首位訪問日本的歐洲王室成員，愛丁堡公爵在日本的短暫訪問幾乎沒有什么值得回憶。

公爵即將來訪的消息傳到宮廷，當時的一份記錄這樣寫道：

“進步派”希望天皇下定決心，盡可能地遵照外國君主在此類場合的慣例；然而強大的“反對派”激烈地反對天皇自降身份。他們認為，這是在承認外國王子與作為神之后裔的日本皇室處于同等地位。[[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幾個月后，英國公使才收到宮廷的回信。信中說，天皇得知英國王子即將來訪的消息后“甚喜”，還說，“如果王子殿下同意下榻于陛下的海邊宮殿濱御殿，陛下將會非常開心。”約翰·布萊克的《年輕的日本》（"aid-5HS"）一書非常詳盡地描述了此次訪問的背景，他認為尤為重要的是，皇宮舉行正式的接待儀式后，“在帝國的一處花園房子里，在英國公使和一名英國使館翻譯的陪同下，陛下與王子會面并進行了平等的交談。”[[20]](#_20__Gong_Yi_Suo__Ming_Zhi_Chu_Q)

對英國公使巴夏禮來說，接待英國王子的方式顯得極為重要，他堅持“天皇應該像對待和自己一樣具有皇室血統的王室后代一樣平等地對待王子”。他還說“假如我在最后一刻看到他們（日本人）的安排有任何貶低之處，我將會婉謝他們的接待。”中國政府已經拒絕給愛丁堡公爵“合適的接待”，因此他是悄悄地訪問中國。巖倉具視告訴巴夏禮：

王子的接待問題使政府大費思量。這個問題首次提出時，大家對應該遵循的規矩意見不一。然而，大部分的聰明人還是看到，盡管必須犧牲一些古老的觀念和習慣，但這是一個向外國示好，表示愿意與其發展更親密關系的機會。因此，為了以一種英國能夠接受的方式接待王子殿下，天皇將不得不采用一種全新的禮節。[[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明治天皇史無前例地在東京城接待了公爵一行。布萊克說，“從那以后其他的王子和顯貴受到了更友好的接待，但那是在宮廷和整個國家已經習慣了這些新觀念，不再討論這些問題之后。”[[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接見于9月4日舉行。每個步驟都經過精心安排，一開始是去祭拜漢神，祈禱公爵平安到達。[[23]](#_23__Guan_Yu_Ta_De_Xue_Xi__Jian)公爵踏上橫濱的那一刻鳴放了二十一響禮炮。他離開橫濱時從橫濱去東京的沿途所有道路都修整一新并打掃得干干凈凈，政府也事先祈禱路神保佑他一路平安。公爵東京途中的安保措施比擬天皇的出行。根據米特福德的描述，“臨街房屋樓上的百葉窗全部用紙封起來，這樣偷窺狂就看不到這位尊貴的人士”。[[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旅途的終點也舉行了祭拜儀式：“王子殿下預計抵達江戶的那天，將在品川舉行驅除惡魔的宗教儀式。王子殿下到達時，一名親王將會拜訪他，向他問候健康。”[[25]](#_25__John_R__Black_Young_Japan)

在歡迎愛丁堡公爵的九條安排中，第八條是“當王子殿下即將進入城門時，舉行‘幣’的儀式。”米特福德在回憶錄中解釋說，“‘幣’是一種驅邪儀式，使用的道具是一根拍子似的東西，上面綴有麻做的流蘇。”[[26]](#_26__John_R__Black_Young_Japan)沒有一名英國人反對這個儀式，但是美國代理公使波特曼（A. L. C. Portman）向美國總統提交了一份題為《愛丁堡公爵的凈化儀式》（The Purification of the Duke of Edinburgh）的報告。根據福澤諭吉的自傳，這份報告是這么寫的：

日本是一個狹小而偏僻的國家，非常自傲，也非常自大。因此，居民習慣地認為外國人屬于和動物一樣的低等生物。事實上，當英國王子到來并準備會見天皇時，他們在城門口為王子舉行了一個凈化儀式……這是這里的一種古老儀式，日本人在愛丁堡公爵身上用這個儀式，那是因為，在他們眼里，一切外國人，不管是王公貴族還是普通平民，都跟動物一樣污穢。[[27]](#_27__John_R__Black_Young_Japan)

也許波特曼是想說些有趣的事情來吸引總統的注意，但他可能距離真相不遠。1868年2月，宮廷討論了天皇接待外國公使的規格問題，最后決定可以允許外國人進入皇宮，但是為保證圣地的純潔，要在皇宮四個方向的大門舉行驅邪儀式。愛丁堡公爵進入皇宮前舉行的那個儀式有著同樣的目的：舉行“幣”儀式不是為了保護公爵免受惡魔的糾纏，而是為了避免皇宮受到外國人的污染。[[28]](#_28__F__V__Dickins_and_S__Lane_P)當一名美國使館翻譯把這些告訴他時，福澤并沒有笑。他寫道：“這實際上是令人羞愧的事情，我聽完之后并沒有笑，反而想哭。”

似乎沒有一名英國人因為儀式的含義而感到不滿，公爵與天皇的會面也進行得非常順利。公爵進入皇宮，一下馬車，就有一群高級官員迎上來，簇擁著他來到接待室。過了一會，公爵被引至會客廳，天皇正站在高臺等他。天皇說了幾句歡迎詞，公爵禮貌地作答，隨后天皇邀請公爵到花園里做更私密的交談。米特福德回憶說，

各位親王和宮廷高官紛紛走上來向公爵致意，這么過了一會，公爵被引向城堡花園一處精致的小茶屋——紅葉茶屋，那里擺著茶和各色精美的茶點。不久他便被請到瀧見茶屋，天皇正在那里等他。只有我、巴夏禮爵士和海軍上將陪著公爵。[[29]](#_29__Redesdale_Memories_of_Lord)

巴夏禮一直都在擔心公爵與天皇的見面。他寫道：“我想年輕的天皇真是可憐，他太害羞了，大臣們擔心王子會認為他枯燥無味。王子殿下自己也很害羞。”[[30]](#_30__Fu_Ze_Yu_Ji_Jie_Shi_Shuo__B)根據記錄，明治與英國王子的交談雖無亮點，卻也中規中矩。天皇說自己為能接待一位來自遙遠國家的王子而感到極為榮幸，并懇求王子待久一點，以補償旅途的勞頓。王子表示感謝天皇的親切招待，相信女王陛下知道了肯定會很高興。天皇鄭重地告訴王子，一想到此次訪問將有助于鞏固兩國之間的友誼自己就很開心。天皇懇求公爵想到什么盡管提出來，這樣自己才有幸為他效勞。王子說，接待工作沒有絲毫不足之處，甚至超出了期望。他一直希望訪問這個聞名已久的國家，這次參觀沒有失望，諸如此類。今天我們不難想象類似的談話。

從一開始，愛丁堡公爵阿爾弗雷德就知道場面可能會很沉悶，但他只能無奈地接受。米特福德在回憶錄里并未掩飾自己的無聊心情，他承認自己無法“對獻上的鉆石鼻煙壺產生絲毫的藝術熱情。”這個鼻煙壺是王子告別前送給天皇的紀念品，亨利·開帕爾（Henry Keppel）爵士這么描述它：“一個漂亮的金盒子，盒蓋上鑲嵌有他自己（公爵）的迷你人像，人像四周圍著一圈鉆石。”[[31]](#_31__Du_Bian_Ji_Zhi_Lang____Ming)天皇送給英國客人的禮物則要藝術得多。[[32]](#_32__Redesdale_Memories_of_Lord)王子還要求天皇親筆作一首詩，準備回國后獻給維多利亞女王。他收到了下面這首有政治寓意的短歌：

如果君王的統治

能造福人民

那么天地

肯定將千秋萬世

維持下去[[33]](#_33__F__V__Dickins_and_S__Lane_P)

兩個年輕人對這次會面的反應并沒有記錄下來。對阿爾弗雷德來說，明治可能是一個無名（盡管并不野蠻）國家的統治者，因此他并不是很感興趣，但可能對自己停留期間所受到的招待心生感激。[[34]](#_34__Sir_Henry_Keppel_A_Sailor_s)對明治來說，可能在第一次與歐洲王室見面時過于緊張，因而沒有對這位英國王子留下什么印象，但他知道自己必須討好對方，以免日本和強大的英國之間的關系受到損害。不管這次會談的內容如何，這種平等接待外國王子的態度都為后來開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先例。

愛丁堡公爵離開后一個月，由安東尼·馮·佩茨（Antony von Petz）男爵率領的奧匈帝國使團抵達日本，開始和約的談判工作。男爵也帶來了禮物：一架送給皇后的鋼琴和一座送給天皇的奧地利皇帝全身雕像。[[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日本與奧匈帝國的和約（這次的談判速度前所未有得快）簽訂時，據說明治寫了一封親筆信 “給他的‘兄弟’——奧地利皇帝”。[[36]](#_36__Zhe_Xie_Zhao_Dai_Bao_Kuo_Yi)布萊克在講述這些事情時說：“除了中國皇帝，迄今為止天皇從未給任何國家的君主寫過類似的信。”在歐洲人看來，明治已經收獲了一群新的親戚——世界上所有的君主。

1. [[1]](#_1_20) 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2, pp. 121, 142；亦見John R. Black, "aid-5MD", 2, pp. 267-268。Black似乎看過巴夏禮1869年8月23日寫給克拉倫登（Clarendon）伯爵的信，信中他說了這樣的話。巖倉關于公爵來訪期間應該注意的禮節的詳細描述，見多田好問，《巖倉公実記》中，第768—773頁。

1. [[2]](#_2_20) 巴夏禮對儀式的解釋是這樣的：“‘漢（韓）神’實際上是中國的神。這個上古的儀式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那時日本除了通過朝鮮與中國之間有些聯系之外，與外國沒有聯系。因此，漢神成了外國人的守護神，被總稱為‘唐人’或者‘中國唐朝人’的外國人都在該神的保護之下”（ 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2, p. 143）。米特福德的資料來源可能和巴夏禮一樣，因為他們的用詞一模一樣（Redesdale, "aid-5MM", 2, p. 496）。日本人的文獻中很少提到這個儀式，也沒有解釋這個詞，但是《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59頁上提到過7月23日慶祝“韓神祭”。在這個儀式上，中山忠能朗誦了一份祝詞。多田說公爵抵達的前幾天將舉行“韓神祭”（《巖倉公実記》中，第768頁）。

1. [[3]](#_3_20)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2, p. 496.另外，"aid-5MS"寫道，“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殿下受到的禮遇堪比天皇出行。房屋上層的窗戶全部封起來，這樣就沒有人能夠俯視看女王的兒子了”（p. 45）。

1. [[4]](#_4_20) 禮物包括“漆器、脅差、根付、青銅器、陶器、琺瑯”（A Guide to the Works, p. 45）。

1. [[5]](#_5_20) 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aid-5O7", 2, p. 151. Black對鋼琴的評價是，“我深深地懷疑它能否使皇后接受外國音樂。我不止一次聽說皇后正在上鋼琴課——但是我不相信”（Young Japan, 2, p. 273）。

1. [[6]](#_6_20) John R. Black, Young Japan, 2, p. 274. 但是，明治給奧地利皇帝的兩封信中都沒有“兄弟”的字眼（《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90—193頁）。盡管歐洲的君主之間習慣互相稱呼對方為“兄弟”或者“表兄”，但這并不是日本的慣例。明治稱呼弗蘭茨·約瑟夫（Franz Josef）為“皇帝陛下”，他對中國皇帝也用這個稱呼。

1. [[7]](#_7_2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0頁。

1. [[8]](#_8_20) 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 中》，第688—689頁；《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31頁。

1. [[9]](#_9_2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3頁。

1. [[10]](#_10_2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5頁。

1. [[11]](#_11_20) John R. Black,Young Japan , 2, pp. 254-255.

1. [[12]](#_12_20) 可能只是個巧合，幾年后（大約1875年）明治的老師元田永孚問他，古代的帝王中他最敬佩哪一位時，他回答的是神武和景行。這兩位天皇都與日本的建國和統一有聯系（安場末喜，《純忠至誠の大儒元田永孚先生》，第9頁）。

1. [[13]](#_13_2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7—78頁。

1. [[14]](#_14_2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9頁。

1. [[15]](#_15_19) 直到五月份，還有報道稱“狡猾的”叛軍讓政府軍無法取得進展；但是5月28日，他們成功地從海上和陸路兩方面展開攻擊。

1. [[16]](#_16_19) 《三代實錄》是最后一部官方編撰的史書，于901年成書。

1. [[17]](#_17_1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95頁。

1. [[18]](#_18_18)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97頁、第109—110頁。據報道，7月14日，三座主要城市（京都、東京和大阪）以外的居民仍然不相信紙幣，而這三座城市則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人民的生活大為艱難（第135頁）。

1. [[19]](#_19_18)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00—101頁。

1. [[20]](#_20_17) 公儀所，明治初期設立的日本立法機關。1869年3月設立，由各藩和一些學校選拔出的人士擔任“公務人”（后改為“公議人”），享有提案權。1869年7月改稱“集議院”。雖存續時間短暫，但提出廢刀、禁止切腹等重要議案。——編注

1. [[21]](#_21_17)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12頁。

1. [[22]](#_22_16)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08頁。

1. [[23]](#_23_16) 關于他的學習，見《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19頁、第124頁、第131—132頁等。

1. [[24]](#_24_14)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40頁。

1. [[25]](#_25_14) John R. Black,Young Japan , 2, p. 267.

1. [[26]](#_26_14) John R. Black,Young Japan , 2, pp. 266, 267。

1. [[27]](#_27_13) John R. Black,Young Japan , 2, pp. 268-269.

1. [[28]](#_28_11) 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 2, p. 143.

1. [[29]](#_29_11) Redesdale,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2, p. 497.

1. [[30]](#_30_11) 福澤諭吉解釋說，波特曼用這個題目（和正文）是為了吸引總統的注意，總統“一般不親自閱讀駐外國公使的報告，除非內容非常有針對性或者講述的事情非同尋常”（Kiyōka Eīchi, trans,The Autobiography of Yukichi Fukuzawa , pp. 205-206）。

1. [[31]](#_31_9) 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104頁。根據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的描述，“在距離會客廳有一小段距離的地方，身著白袍，頭戴黑帽的祭司手執‘幣’和其他神道教用品舉行儀式，目的是為了驅除任何可能跟隨異國的客人而來的惡魔。根據正統的神道教解釋，英格蘭和蘇格蘭這樣的異國是天皇的祖先在造完天國日本之后，用剩下的海水泡沫和泥土建造的（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 p. 159）。

1. [[32]](#_32_8) Redesdale,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 2, p. 499.

1. [[33]](#_33_7) 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 2, p. 147.

1. [[34]](#_34_7) Sir Henry Keppel,A Sailor’s Life Under Four Sovereigns , 3, pp. 289, 292. 開帕爾寫道，“明天，我們將巡游，王子將會見天皇，兩樣我們都厭煩得要死”（p. 289）。

1. [[35]](#_35_6)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68頁。

1. [[36]](#_36_6) 這些招待包括一頓日本飯（可能比現在接待來訪貴賓的飯菜更為正宗！）、相撲、劍術表演、雜技、雜耍以及一場（氣氛憂郁的）能樂和狂言表演（《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65頁）。據說這是外國人第一次看到能樂（Redesdale,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 2, p. 498）。演出的劇目包括四場能樂（《弓八幡》、《羽衣》、《小鍛冶》和《經政》）和兩場狂言（《墨塗》和《太刀奪》）（中山泰昌，《新聞集成 明治編年史》第一卷，第303頁）。為了使公爵和他的隨行人員更好地理解，米特福德準備了劇目梗概，但是難以相信他們竟然坐著看完了所有的劇目。這需要將近十個小時。可能當時只演出了一些片段。名演員寶生九郎表演了《羽衣》。

# 第二十一章 帝師元田永孚



1869年，明治第二次離開京都到東京去時，京都居民都以為是遷都的先兆。巖倉具視表示都城不會變后，他們暫時安心，但得知皇后也計劃到東京去后，不安再次膨脹。盡管官方在辟謠，但他們認為遷都的危險確實存在，紛紛到神社去祈求神靈干涉，不要讓皇后離城。想到天皇和皇后將不再住在京都，民眾人心惶惶，當地官員擔心市民或許結黨請命，屆時憤激的民眾可能做出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1]](#_1__Guan_Yu_Zhe_Zhang_Zhao_Pian)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京都的居民平靜下來。

京都居民將皇后的東京之行看作即將遷都的證據。不管這種觀點正確與否，1869年11月8日，皇后的乘輿還是在四藩精選侍衛的保護下離開御所，經過十九天的愉快旅程后抵達東京。皇后顯然對新居非常滿意，不久她就在吹上御苑宴請了政府的高級官員。[[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1869年初，明治天皇打算第二次訪問東京時，告知京都的居民自己會在來年的四五月份回來，并在冬天舉行大嘗會[[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的慶祝儀式。這項聲明平息了大家的疑慮，但1870年春，民眾卻被告知，由于國內的叛亂尚未平定以及政務繁忙，天皇必須推遲返回京都的時間。一年之后的1871年5月15日，天皇宣布大嘗會將在東京舉行。5月24日，天皇派大納言德大寺實則作為特使到京都孝明天皇的山陵前匯報世界形勢以及天皇由于國事繁忙而不得不推遲返回京都。德大寺還覲見皇太后，告訴她天皇的回程將會推遲若干年。[[4]](#_4__Zhe_Shi_Ge_Ji_Wei_Zhong_Yao)

實際上，除去一次數日的短暫停留外，天皇直到1877年才回到京都。這期間，官方并沒有發布遷都公告。不過，當明治最終返回京都時，官方文書中稱“行幸”，意為從住處到某個地方去，而不是1868年使用的“還幸”，意為返回住處。[[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1877年，東京成為日本功能上的首都，因為天皇和所有的政府機關都在這里，而且外國使館也在這里。然而政府也許是擔心京都民眾的反應，不愿正式宣布這個消息。明治死后被葬在京都，1915年，他的兒子大正天皇的加冕儀式也在京都舉行，這暗示著一個固執的觀念，即在某些方面京都依然是國家的首都。你甚至可以說直至今日京都仍是日本的首都，因為日本到現在都沒有發布首都在何地的公告。

官方在解釋明治無法返回京都時強調了國事的緊迫性。這并非不正確，但我們卻很難看到天皇在國家推行的諸多變革中具體扮演的角色。《明治天皇紀》中專門提到他的條目，大部分都是描繪他騎馬的次數或是學習中國典籍的進度。

騎馬已成為天皇的一大愛好。有一陣子他隔天騎一次，而且每次都要花上幾乎一整天的時間。即使是那些認同健身愿望的人也覺得年輕的天皇在騎馬上花費了太多時間。議定中御門經之（當時在京都）在得知天皇騎馬騎得如此頻繁之后，寫信給巖倉具視，建議將頻率限制在一個月六天。[[6]](#_6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g)這個建議似乎起了一些作用，然而天皇對騎馬的熱情卻有增無減。

明治這個時期的學習主要集中在儒家典籍，同時師從神道教的護教者平田篤胤的孫子平田延胤學習《日本書紀》。[[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1871年7月17日，明治天皇的主要老師元田永孚首次出現在天皇的面前。

元田1818年出生于熊本藩一個中等的武士家庭，在舒適的環境下長大。十五歲時元田決定學習圣賢學說，以報效國家。不到二十歲，他就認識了包括橫井小楠在內的許多學者，并向他們學習朱子學。早在1847年，元田就向父親講述了自己的基本哲學觀：

今本不庸言，然臣子之道在于忠孝，忠孝之道在于明理，明理在于實學，實學之外，皆虛文腐儒，不足以明忠孝之道。今日以此實學事奉父君，他日亦欲以此實學事奉國君。[[8]](#_8__Ming_Zhi_Er_Nian_Liu_Yue_Dui)

今天，“實學”的意思是與理論或者哲學知識相對應的“實際學問”，例如工程學或醫學，但是在元田的時代它的含義可不是這樣。這個詞可以追溯到朱熹（1130—1200），剛開始是指一種儒家學說。這種儒家學說與佛教和道教不同，強調高尚的道德修養本身并非目的，以之為國家服務才是真正的目的。后來這個詞的含義發生了變化，然而不論如何解釋，它都強調思想和行動的一致性。[[9]](#_9__Yuan_Tian_Zhu_Yan___Hai_Hou)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與一些儒家學者的抽象思考相比，這種哲學非常適合現代國家的統治者。

這種儒學流派并不受熊本藩大名的待見，父親擔心這會阻礙元田的前程，于是要求他放棄實學。元田一開始拒絕，然而這時他和家人陸續遭受各種疾病的打擊，自然而然地疏遠了老師，并最終與父親和解。[[10]](#_10__Ba_Mu_Qing_Zhi____Jing_Yan)1858年，元田繼承了父親的職位，擔任熊本藩大名的顧問，1860年大名死后，元田陪同大名的繼承人前往江戶，在那里積極地參與政治。剛開始，元田在橫井小楠的影響下支持“尊王開國”。作為一名大眾眼中頑固的保守派，這個觀點頗為開明。

第一次長州戰爭期間，元田遵循自己“公武合體”的觀點，參加了熊本藩的軍隊，然而他反對參加第二次長州戰爭。熊本藩不顧元田的反對，派兵參加戰斗并且損失慘重，而元田對政治形勢的正確判斷使他聲譽大增。他的職位逐漸提升，1871年被任命為熊本藩大名（現在稱為知事）的侍讀（老師），并和大名一起住在東京。[[11]](#_11__Zai_Yu_Fu_Qin_Fa_Sheng_Fen)

這個時期聽過元田講課的人都夸獎他的熱情。元田和許多儒家學者不同，他強調的不是個別詞語，而是真正有助于培養心智的內容。一名1871年首次聽過他講課的弟子回憶說，

他會舉古今許多重要例子，不僅使我們理解了課文，而且讓我們不禁受到感動。元田的每一個行為似乎都是為了遵守圣賢之道。對我們年輕人來說，關于他的一切——他的言談和舉止、外表和態度——看起來都非常精彩。我們視他為一顆完美而沒有瑕疵的珠寶。他沒有一丁點的不自然或者僵硬：他的氣勢夾雜著一種說不出的慈祥和溫暖。[[12]](#_12__Ju_Shi_Jin___Zhong_Cun_Hong)

大約這時，元田給知事寫信，講述自己對宮廷的看法。這封信雖然很短，但卻受到很高的贊譽：

當此維新之際，輦轂之下兇徒逞暴意，皆因朝威未振。朝威未振則因王政之實未立。仰愿自今起，天皇陛下御臨南殿，令諸大臣奏議于前，取其公議，親裁萬機，則公明正大之治體相立，人心始服。地方之不服政化，乃不得地方官之人。宜登用人才，普施政教，廢臣等向來門地之知事。故謹請罷免。[[13]](#_13__An_Chang_Mo_Xi____Chun_Zhon)

這份建議書包含了兩點重要內容。第一點是希望當著天皇的面討論法律法規，由天皇親自決定是否應該采納。前文已經提到，明治認真參加內閣會議以及類似的會議，甚至是那些不太重要的會。天皇頻繁地參加此類會議，這種敬業精神可能是受到了元田的激勵。第二點廢除高官的世襲制則并沒有很快實現。

所有看過建議書的人都對元田的提議贊不絕口，這份建議書最終到了大久保利通手里，他大為感動，承諾將立刻啟奏天皇。大久保當時正在為天皇尋覓老師，于是他向熊本縣知事詢問元田的品格。熊本縣長官回答說，自己不敢說元田是帝師的最佳人選，但他的品格絕對沒有問題。由于熊本縣知事的推薦，元田于1871年6月30日被任命為天皇的侍讀。7月21日，他第一次給天皇上課，講的是《論語》。[[14]](#_14__Yuan_Tian_Zhu_Yan___Hai_Hou)從那時起，元田每月向天皇講授十二節《論語》課，后來還講授《日本外史》。[[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他一直為天皇授課，直到1891年去世。

當元田首次得知自己被選為帝師時，非常吃驚，并表示自己的資歷不夠。元田認為自己的年紀太大（五十三歲），無法像四十剛出頭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和板垣退助那樣為政府效力，這些人已經是新政府的名人。他建議挑選年輕一些的人擔任此職，并認為如果自己接受任命，將會自取其辱，還說希望回熊本去。[[16]](#_16____Ri_Ben_Wai_Shi____Shi_Lai)但是元田尊敬的藩士下津休也阻止了他，并對他說：“你不能這么做。元田的學養、德行加上西鄉的膽識，將無人可出其右。請你務比接受。”[[17]](#_17__Yuan_Tian_Zhu_Yan___Hai_Hou)類似這樣的贊語使得元田無法繼續拒絕。他在日記中記錄了第一次向天皇授課的情形：

著衣冠，膝行進，于三間[[18]](#_18__An_Chang_Mo_Xi____Chun_Zhon)外稽首拜龍顏。復膝行退。此乃親近天皇之始，心中敬畏喜悅交集，感激不能自已。畢，面會德大寺實則，傳侍讀專務之旨，受任官相當之待遇。余初謙退，不敢當此任，然大命已降，不欲復辭，乃決然奉之。[[19]](#_19___San_Jian__Shi_Chang_Yu_Dia)

一些同時期的人認為元田是個頑固的保守派，[[20]](#_20__Yuan_Tian_Zhu_Yan___Hai_Hou)然而他卻贏得了天皇的絕對信任以及政府主要官員的欽佩，他們稱贊起他來簡直毫無保留。極少贊美別人的大久保利通在提到元田時說：“只要他在陛下身邊，我就放心了。”副島種臣說：“元田先生是成就陛下無上美德居功至偉的那個人。要說對明治時代貢獻最大的臣民，除了他，我找不出第二個。”[[21]](#_21__Li_Ru__Shi_Cong_Men_Bing_Bu)盡管今天元田幾乎已經被人遺忘，但他對天皇的影響，似乎比天皇身邊任何著名的政治家都要大。

成為帝師之后，元田再次燃起對實學的熱情，這意味著他重新回到孔子和孟子的基本學說。元田強調應該在《六經》[[22]](#_22__An_Chang_Mo_Xi____Chun_Zhon)中，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尋找“道”。他承認西方科學技術的價值，并鼓勵日本人以“格物”的精神去學習它們。“格物”這個詞在《大學》里的意思是“究事物之理”。元田認為，西方在人倫方面沒有什么貢獻，這方面只能在《六經》中尋找指引。他還說：

方今，厭漢籍之陳腐，專喜洋書之新工，然恐此亦終成洋文癖之曲學。[[23]](#_23__Si_Shu____Lun_Yu______Meng)

德川時代末期，佐久間象山首次提出將東方的道德觀與西方的科學技術相結合。這個觀點成為明治，尤其是他晚年的主要觀點，其中可能也有元田學說的影響。

元田除了在宮里授課，還撰寫一些諸如與國教有關的文章，[[24]](#_24__Ju_Shi_Jin___Zhong_Cun_Hong)但他最為人所知的是參與了1890年《教育敕語》的起草工作。這份文件把儒家的倫理思想和“忠君愛國”的原則放在主要位置，而這兩個詞正是元田政治思想的結晶。

天皇在元田等人的指導下，接受傳統的道德教育，但他在公共場合卻越來越多地受到西方的影響。1870年4月28日，天皇閱兵期間首次在日本人和外國人面前公開露面，[[25]](#_25__Ju_Shi_Jin___Zhong_Cun_Hong)而他所學的儒家典籍并沒有提到閱兵這種活動。大久保利通希望天皇表現得像一名現代的歐洲君主，顯然，正是在他的極力主張下，明治才從宮闈深處走出來，進入公眾的視野。

1871年覲見過天皇的奧地利男爵亞歷山大·德·許布納（Alexander de Hubner）描述說，一名侍從坐著一輛“香港制造的輕便馬車來接他。也許那是宮里唯一的一輛，因為宮里可能并不需要大型馬車。天皇從不離開宮廷一步”。他還在腳注中補充道：“幾個月后，在思想進步的大臣的建議下，天皇坐著一輛敞篷馬車，出現在震驚的臣民面前。這年（1872年）夏天，他們看見他坐著出租馬車穿過橫濱的街道。這位眾神之子身穿一件奇怪的歐式軍服，看起來既像水手又像大使！”[[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明治的軍服胸前點綴著獨特的金色盤扣，其靈感來自歐洲，但是卻讓這位奧地利男爵感到好笑。國外早已看不到類似的款式，但天皇仍舊繼續穿著這件軍服。每天早上離開神秘的內宮時，天皇會脫下日式睡袍，換上西服，一般是軍服或大禮服。他的飲食也開始逐漸加入西方的食物和飲料：我們確切知道他喝第一杯牛奶和吃第一口牛肉的時間。[[27]](#_27__Baron_Alexander_de_Hubner_P)

自然，歐洲人開始感嘆日本人摒棄傳統服裝，改穿西式服裝的匆忙態度。無數的卡通畫描繪了日本人穿著不合體西服的別扭樣子，他們看起來毫無美感，且很滑稽。然而德川時代晚期為越前藩大名工作過的日本通格里菲斯卻不同意這種觀點：

不管藝術家和那些對日本人的獨特和奇怪情有獨鐘的人會怎么說，日本人自己卻洞察人性，并懂得真正的穿衣之道。他們的宏愿是被當成人，當成文明人，而且是與西方同等的人看待。他們知道，如果穿著古老的服裝，自己和國家將永遠不會受到嚴肅的對待。

很快我們就看到了服裝上的變化，改變的不僅是士兵和武士，還包括政府官員甚至天皇本人……可以肯定的是，摒棄武士服加速了古老野蠻的封建風俗的衰退。事實上，服裝的革命極大地幫助日本取得了全世界的認可，日本被認為是與世界各國平等的國家。[[28]](#_28__Zai___Ming_Zhi_Tian_Huang_J)

1871年12月明治訪問橫須賀時，秘密拍攝了一張和陪同人員一起的合照。盡管天皇身著傳統服飾，但是除了三人以外，二十名隨從人員全部穿著西服。[[29]](#_29__William_Elliot_Griffis_The)

過去的風俗習慣在表面上仍繼續被尊重，但是一條接一條地被拋棄，甚至禁止，原因是它們不適合現代國家。例如，1870年3月6日，政府頒布了禁止染黑齒和剃眉毛的法令，而那些本是高級公卿在元服儀式上的傳統習慣。兩個月后，政府還禁止了用死囚的尸體試刀鋒的做法。武士不得繼續以所謂的“不敬”為由而懲戒（甚至殺死）平民。[[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明治很快就適應了外國東西以及接見重要的外國訪客時需要注意的禮儀。他知道自己應該握手、微笑（一開始他老是記不住），同時禮貌地問客人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熱心的宮廷官員很快就熟悉了外國人的行為舉止，并想盡辦法讓客人感到放松。他們在接待時提供歐式食物，看到外國權貴在覲見時不喜歡脫鞋，便在榻榻米上鋪了層地毯。[[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為了緩解外國人見到佩刀武士時的緊張情緒，早在1869年就有人提議將武士佩刀的規定改為自愿。改革派認為日本社會已經一派和平景象，因此佩刀——動蕩與暴力時代的象征（日本有幸已經脫離了那個時代）——除了作為正裝的配飾之外，已不再是必需品。然而其他人卻迅速地起來為佩刀辯護，他們堅持認為佩刀表達了皇國的尚武精神，是神州正氣之所在。他們反問到，難道一個擁有大和魂的人會拋棄自己的佩刀嗎？這些理由頗有分量，提案被一致否決。[[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然而，1871年9月23日，政府出臺了一項法令，允許武士剪頭發和不再佩刀，并且可以選擇穿軍裝或者簡便軍裝。包括木戶孝允在內的幾名政府高官都已經把頭發剪短。似乎很少有人反對這類現代和開明的象征，即使侍從和侍從官也都剪了發。

在新政府的開明政策下，日本的治安有所好轉，然而暗殺行為卻仍在繼續。任何人只要開口表達一些非傳統的觀點，便時時有被殺害的危險。即便是那些最勇敢的人，想到自己時刻可能死于殺手的刺刀之下，也不禁感到害怕。福澤諭吉感到自己的處境異常危險，因為他以擁護“啟蒙”而著稱。他在自傳中寫道：“沒有什么比活在暗殺的陰影之下更糟糕，更令人不安，更可怕了。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無法真正地想象這種滋味。”1871年，福澤創辦的大學慶應義塾搬到三田，他在住所建了一個暗門，以備自己在遇到危險時得以逃脫。[[33]](#_33__Eichi_Kiyoka__trans__The_Au)

明治初期最令人震驚的暗殺事件是長州藩武士大村益次郎之死。[[34]](#_34__Jiang_Qi_Cheng_Zhi_De___Da)大村在大阪緒方洪庵創辦的學校學習荷蘭語，后來又到長崎學習西醫。1853年，他受大名伊達宗城之邀來到宇和島。這時外國列強對日本的壓力已經越來越大，藩國命令大村回長崎學習軍艦制造和航海技術。1856年，大村陪同大名前往江戶，并在那里成為幕府番書調所（研究外國人書籍的機構）的一名教師。大村在橫濱隨美國傳教士赫伯恩（J. C. Hepburn）學習英語。他漸漸地獲得了軍事專家的美譽，1861年大村回到長州之后，著手改革軍隊，并堅持認為有必要對武士和平民進行作戰訓練。第二次長州之戰（1866年）期間，大村訓練的軍隊打垮了幕府軍，在推翻幕府的鳥羽、伏見之戰中這支軍隊同樣表現出色。兩年后的1868年，大村領導的軍隊摧毀了彰義隊。

明治維新后，被任命為兵部大夫（國防大臣）的大村，在任期間致力于創建一支現代化軍隊。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人們經常稱他為“日本軍隊之父”。大村的計劃最顯著的一點是向平民征兵，這件事激惱了武士，他們認為這威脅到了自己的特權地位。大村對彰義隊的打擊也使他樹敵很多，特別是那些心懷不滿的、依然緊抓著業已被拋棄的攘夷理想不放的武士。大村完全有理由遭遇某種暴力行為。

1869年8月中旬，大村為創辦一所士官訓練學校而前往關西。他自己清楚有遭到暗殺的危險，朋友木戶孝允也明白這一點，于是為他安排了特別的安保措施。大村從知情人口中得知，一些可疑的人正尾隨他來到關西，他格外小心地使行動保密。然而10月9日晚，當大村與同伴在京都的一家小酒館放松時，八個人（主要來自長州藩）闖了進來，隨后在黑暗中進行了一番可怕的廝殺。[[35]](#_35__Guan_Yu_Zhe_Ci_Zhan_Dou__Ji)大村身中數刀，靠躲在蓄滿臟水的洗澡桶里逃過一劫。他腿部的傷最為嚴重，而且遲遲不見愈合，最終被送進了大阪的一家醫院。為他治療的荷蘭著名醫生鮑德溫（A. F. Bauduin）建議立即截肢，但是像大村這樣的高級官員沒有政府的批準不能做手術。批準書遲遲沒有下來，12月，大村因傷重去世。[[36]](#_36__Sen_Chuan_Zhe_Lang____Ming)

殺害大村的刺客被抓住并判處死刑，但最后卻緩期執行。跟橫井小楠那次一樣，民眾尤其是高級武士對這些刺客非常同情。他們認同他們的觀點，認為大村的軍制改革是對自己階層無法容忍的冒犯。直到一年后這些罪犯才被處死。

接下來遇刺的重要人物是顧問廣澤真臣。1871年2月27日，廣澤在家中遇害。刺客沒有找到，作案的動機迄今成迷。[[37]](#_37__Guang_Ze_Bei_Sha_Shi_Zheng)罪犯的行徑以及警察抓捕行兇者動作的緩慢令天皇感到極為失望，他頒布了一道諭旨：

故參議廣澤真臣遭變，朕既不能保庇大臣，又使其賊逃逸。自維新以來，大臣罹害者及三人。此朕之朝憲未立，綱紀不肅所致，朕甚憾焉。詔令天下嚴加搜索，必捕此賊。[[38]](#_38__Li_Yuan_Long_Yi____Zhan_Jia)

為了使西方國家相信自己是個遵紀守法的文明國家，日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兩年之內接連有三名政府高官遇害，對年輕的天皇來說，肯定非常難堪。接下來三十年間又發生了許多暗殺事件，這使西方國家對日本的印象非常不好，而日本也因此很難說服他們終止治外法權。

不過，日本繼續大步朝著現代化的方向邁進。鐵路和電話線很快就延伸到國內的許多地方，國內幾乎每天都能看到新的西方事物，不管是物品還是衣服，是食物、機器還是照片。不過，這些舶來品盡管非常受歡迎，卻無法阻止人們偶爾沉醉于激情的往日之中——德川幕府末期那些令他們心旌搖蕩的騷動歲月。

年輕的天皇與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在接受新事物的同時并不排斥舊的，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為兩者安排了不同的位置。他喜歡京都勝過任何其他地方，但是他知道新的日本必須摒棄古都的傳統重新開始。孝明天皇拒絕接受絲毫的西方文化，但他的兒子卻成為近代日本具有象征意義的領袖，而日本也在大膽地從西方攝取一切能幫助自己成為現代國家的東西。當然，天皇也并沒有忽略元田關于東方智慧永恒的教誨。

1. [[1]](#_1_21) 關于這張照片的描述，見《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99頁。1912年9月的《太陽》雜志的扉頁刊登了這張照片（《朝日新聞》，2001年5月25日，第20頁）。 話說回來，一些外國人喜歡上了日本服裝。巴夏禮爵士在描寫時任日本外務省顧問的“美國卓越律師”裴辛·史密斯（Peshine Smith）時，說他“奚落起他的雇主來真是不遺余力，他穿著日式短掛和寬松的褲子到處走，腰上還佩著幾把刀，并公開宣稱‘十個該死的在日外國人中沒有一個被殺害’”（F. V. Dickins andS. Lane-Poole, "aid-61A", 2, p. 193）。

1. [[2]](#_2_2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24頁。

1. [[3]](#_3_2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21頁。

1. [[4]](#_4_21) 這是個極為重要的儀式，天皇一生舉行一次，通常在他登基后那年的早冬。

1. [[5]](#_5_2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77—278頁、第445頁。

1. [[6]](#_6_21)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37頁。

1. [[7]](#_7_2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09頁。他建議天皇只在每個月的3號、13號、23號、8號、18號和28號騎馬。

1. [[8]](#_8_21) 明治二年六月對他的學習有更詳細的描述，當時他除了1日、6日、11日、21日和26日之外每天上課。除了閱讀經典，他還聽福羽美靜講授日本歷史，并參加《貞觀政要》的輪讀。《貞觀政要》是中國8世紀的一本政論性史書，長期作為日本天皇的教科書（《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31—132頁；亦見第299—300頁）。他的老師包括中沼了三、松平慶永和秋月種樹。

1. [[9]](#_9_21) 元田竹彥、海后宗臣編，《元田永孚文書》第一卷，第127頁。在自傳《還歷之記》里，元田講述了他的父親如何因為擔心他的未來而建議他暫時放棄實學，不再去聽長岡是容的課。長岡是熊本藩大名的前家老，已經失寵。前面一段文字講述的是元田對他父親建議的回答。亦可見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27頁。

1. [[10]](#_10_21) 八木清治，《經驗的實學の展開》，第176頁。八木在文中引用源了圓的多本著作，源是這方面的杰出權威。元田的老師橫井小楠的“實學”見本書第十九章。

1. [[11]](#_11_21) 在與父親發生分歧后不久，元田開始患上眼疾，醫生禁止他進行任何研究。這件事導致元田沒有繼續跟隨長岡是容學習實學（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28頁、第33頁）。

1. [[12]](#_12_21) 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45頁。

1. [[13]](#_13_21) 安場末喜，《純忠至誠の大儒元田永孚先生》， 第6頁。這本書的作者是安場保和（1835—1899）的義子，而安場保和是元田的密友，并且都是橫井小楠的門生。

1. [[14]](#_14_21) 元田竹彥、海后宗臣編，《元田永孚文書》，第118—119頁。亦可見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46頁。

1. [[15]](#_15_2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75頁。元田自明治五年五月七日開始給天皇授課的內容，見元田竹彥、海后宗臣編，《元田永孚文書》。這些講義用容易理解的古典日語撰寫。

1. [[16]](#_16_20) 《日本外史》是賴山陽（1780—1832）的著名作品，描繪了日本歷代的戰爭傳統。

1. [[17]](#_17_20) 元田竹彥、海后宗臣編，《元田永孚文書》，第126頁；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47頁。

1. [[18]](#_18_19) 安場末喜，《純忠至誠の大儒元田永孚先生》， 第7頁。亦可見元田竹彥、海宗臣編，《元田永孚文書》，第127頁；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48頁。

1. [[19]](#_19_19) “三間”是常御殿西南面的三間小屋，天皇一些非正式的接見在此進行。

1. [[20]](#_20_18) 元田竹彥、海后宗臣編，《元田永孚文書》，第127頁；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49頁。

1. [[21]](#_21_18) 例如，侍從們并不喜歡他，因為他們認為他在向天皇灌輸一些古板的禮儀（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20頁）。

1. [[22]](#_22_17) 安場末喜，《純忠至誠の大儒元田永孚先生》，第4頁。

1. [[23]](#_23_17) 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加上《詩經》《書經》，合稱六經。

1. [[24]](#_24_15) 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53頁、第225頁。元田說這番話的時間是1871年。

1. [[25]](#_25_15) 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72—74頁。

1. [[26]](#_26_15)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95頁。這一次，來自三個藩國的步兵、炮兵和騎兵部隊首次被編成一個團。由于三個藩國的軍隊訓練方法各不相同（分別按照英國、法國和荷蘭的方法），制服也不一樣，因此看起來有點參差不齊。

1. [[27]](#_27_14) Baron Alexander de Hubner,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 2, p. 10.許布納與明治天皇見面的詳情，見《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16頁。

1. [[28]](#_28_12) 在《明治天皇記》第二卷的目錄中，提到明治在統治初期第一次吃西方食物的情況：明治三年八月十二日，他在延遼館吃了外國食物；明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天皇和皇后在御醫的推薦下，第一次喝牛奶；明治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解除了長期以來的吃肉禁令，天皇開始吃牛肉和羊肉。

1. [[29]](#_29_12) William Elliot Griffis,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 p. 194. 格里菲斯用輕視的口吻描寫了1872年5月島津三郎率領的薩摩軍隊出現在首都的情形：“當他和他那兩百個薩摩人的隊伍到達時，那樣子非常可悲。他們穿著過時的衣服，看上去就像剛從中世紀走出來的。他們全都穿著高高的木屐，佩著套上紅色劍鞘的長刀，前面和兩側的頭發剃去，光著腦袋并時常光著胳膊到處走。總之，他們就像是一群古代的暴徒。他們發現自己被盯著看，甚至被當成過時的人時，覺得非常尷尬，并要求主人允許他們取下他們的殺人工具”（p. 238）。

1. [[30]](#_30_1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27頁。

1. [[31]](#_31_1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324頁。

1. [[32]](#_32_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22頁。

1. [[33]](#_33_8) Eīchi Kiyōka, trans.,The Autobiography of Yukichi Fukuzawa ，pp. 225, 226. 亦可見長尾和郎，《暗殺者》，第12頁。

1. [[34]](#_34_8) 江崎誠致的《大村益次郎》一書第74頁有大村的年表，雖然簡短但卻非常有用。

1. [[35]](#_35_7) 關于這次戰斗，見長尾和郎，《暗殺者》，第16—20頁。

1. [[36]](#_36_7) 森川哲郎，《明治暗殺史》，第35頁。

1. [[37]](#_37_5) 廣澤被殺時正和情婦一起睡覺，因此有人認為他被害的原因是嫉妒，而非政治。天皇的顧問佐佐木高行在日記中說，他懷疑是木戶孝允身邊的人制造了這次暗殺，但是并沒有給出原因（栗原隆一，《斬奸狀》，第363頁）。光澤和木戶一樣，都來自長州。

1. [[38]](#_38_3) 栗原隆一，《斬奸狀》，第362頁。明治追授了他更高的官職，并給了他的家人三千兩銀子的賻贈（《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392頁）。當天皇說廣澤是“第三個遇害的大臣”時，他可能是想到了橫井小楠和大村益次郎。

# 第二十二章 廢藩置縣



1871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無疑是8月29日“廢藩置縣”（廢除藩國，設立縣制）法令的頒布。那天早上，天皇將維新和新政府中表現最積極的四藩——長州、薩摩、肥前和土佐的領導人召到皇宮，感謝他們在1869年擁護版籍奉還，同時命他們支持接下來的重大舉措——廢藩置縣。右大臣三條實美宣讀了天皇的詔書，詔書說，“內以保安億兆，外以對峙萬國，故今廢藩為縣，務去冗就簡，除有名無實之弊，更張綱紀，政令歸一，以示天下之所向”。“有名無實之弊”就是封建主義，即將國家分成各個藩國，分別由大名統治的制度。

從封建制度到中央集權的轉變順利得不可思議。8月29日下午，天皇派人請來上述四藩的領導，他們提出以府縣制代替藩國的建議，天皇聽后非常高興。[[1]](#_1__Mao_Li_Min_Yan____Ming_Zhi_L)那天下午晚些時候，天皇請來五十六個藩國駐東京的領導（知事），以公告（由三條實美宣讀）的方式宣布了這項偉大的改革。大名們匍匐在地以示服從天皇的諭旨。第二天，同樣的消息被送往各縣的大名代表。9月1日，外務卿巖倉具視向各國公使通報，日本已被廢除藩國，并代以縣制。

9月5日，巖倉會見了代理英國公使亞當斯（F. O. Adams），親自把這個變化告訴他。亞當斯祝賀巖倉成功地完成了精彩的一幕。他說，對歐洲政府而言，沒有幾年時間外加使用武力，根本不可能完成類似的重大改革。[[2]](#_2__Ran_Er__Ri_Ben_Yi_Qian_Suo_W)

版籍奉還的動力來自各藩本身，但廢藩置縣則是一道加在各藩頭上的諭旨。摧毀一種自12世紀末就已存在（幾經改良）且保證了大名及其家臣許多特權的制度，非常可能遭到反對，但卻沒有一個人起來抗旨。這基本上算是精心籌劃的結果。大久保利通是這項計劃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為了爭取西鄉隆盛的配合遠赴薩摩。西鄉以維新總設計師的身份和毫無瑕疵的品格而備受尊崇。他對廢藩置縣的支持必不可少，一旦獲得西鄉的支持，許多原本可能起來反對的大名都將受到影響。

到了這時，像大藏卿[[3]](#_3__Ban_Ji_Feng_Huan_Qi_Jian__Xu)大久保利通和軍人山縣有朋（1838—1922）這樣的人已經意識到廢藩的必要性。山縣剛剛結束一年的歐洲之行回到日本，他在歐洲學習了各種不同的軍事制度。盡管政府看似沒有受到暴動的直接威脅，但它顯然需要和任何其他政府一樣，擁有一支軍隊來處理任何可能發生的意外危機。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這么評價那個時期的政府：“沒有一名國家軍人，有的只是道德力量。改革能夠進行到底完全是出于對天皇這個名字極大的敬畏心理。”[[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政府的財政收入也非常有限，現金極度匱乏。在改革者看來，唯一的方法便是以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府縣制代替幾乎自治的藩國制，然而這個政策絕非容易實施。武士階層可能會為自己的權利而戰，而大部分的普通民眾還不知道有比大名更高一級的統治者存在，如果大名抗旨，他們幾乎不會反對。大名的影響無處不在，藩國內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有他的痕跡。廢藩置縣業已過去一百二十余年的今天，當我們去金澤時，依然能回想起前田家。統治這里數百年的前田家的家徽在金澤依然可見。

當廢藩的詔書到達越前藩藩主所在的福井時，格里菲斯正好在場：

在福井城，我有充分的機會看到這份詔書在封建制度下產生的即刻效果。三個場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個是在地方政府辦公室，時間是1871年的7月18日，接到天皇詔書的那個早上。錯愕、強壓著的憤怒、恐懼與不祥的預感和忠誠交織在一起。我聽到有人在議論要殺死由利（公正）。他是朝廷派駐當地的代表和1868年《五條誓文》的起草者。

第二個場景發生在城堡的大廳里，時間是1871年的10月1日，越前藩的藩主召集了好幾百名世襲家臣，命令他們將對藩主的忠誠轉換為愛國主義，他還發表了一次崇高的演說，敦促他們由考慮地方利益過渡到考慮國家利益。

第三個場景是在第二天的早晨，城中全部四萬民眾似乎都聚集在街道兩旁，最后一次送別越前藩的藩主。他將離開祖宗傳下的城堡，到東京去，并以一名普通紳士的身份住在那里，沒有任何的政治權力。[[5]](#_5__Da_Cang_Sheng_Wei_Cai_Wu_Bu)

其他大大小小二百七十個藩國，無疑也上演過類似的戲碼。大名們喪失了世襲的特權，得到的補償只是一個名義上的頭銜——自己原先統治的藩國的知事。然而他們竟然平靜地接受了這一切，不禁令人感到驚訝。明治維新只是改變了日本社會的頂層，并沒有改變社會結構。廢藩置縣則是帶來一個更大的影響：將近兩百萬人的武士階層失去了收入，他們原來由大名支付工資，現在卻面臨永久失業。幾年后，政府支付一筆失業補償金，希望他們能夠利用這筆錢重新開始。然而大多數武士不習慣做買賣或者新日本的其他職業，不久就把這筆錢花光，有些人被迫做些不體面甚至卑微的粗活。大沼枕山的漢詩《車夫篇》，就描繪了這樣一個武士。詩歌采取了車夫和顧客對話的形式。

車夫何早起？

拂拭車上塵。

車客猶未到，

結束立凌晨。

昔日胡為者？

三千石幕臣。

出門乘輿馬，

揭揭上士身。

今日渾忘此，

快載商賈人。

東西南北挽，

終日得數緡。

妻子待薪米，

余錢能飲醇。[[6]](#_6__William_Elliot_Griffis_The_M)

許多武士的確在政府部門找到工作，并在接下來的五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繼續成為知識分子的骨干，[[7]](#_7__William_Elliot_Griffis_The_M)但是有些人卻從未適應這些變化。前面那個成為車夫（或者是做一些同樣不體面的工作）的武士是當時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一個形象，而且有傳言說武士階層的年輕女子在吉原的妓院里謀生。

這種改變顯然加強了天皇的威權。至少在原則上，天皇取代了幾乎獨立統治自己藩國的無數封建領主，成為整個國家的唯一統治者。他自己也親身感受到這種變化。不過，不久之后發生的另一種改變可能對他的影響更為直接。廢藩置縣詔書頒布的同一個月，宮內省和天皇的后宮發生了劇烈的人事變動。此前，只有高級貴族（堂上華族）才能在宮里任職。為了與古老的世系保持一致，他們繼承古代的行為方式，做事時墨守先例和傳統。天皇的后宮則由貴族出身的女官管理，她們大多從前朝起就在宮里任職。這些女官既保守又倔強，而且利用自己對天皇的影響力來阻礙改革。[[8]](#_8__Mu_Xia_Biao____Ming_Zhi_Shi)政府官員，甚至像三條實美和巖倉具視這樣的公卿也對此深感遺憾，想改變這種狀況，然而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習慣很難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9]](#_9__Si_Ma_Liao_Tai_Lang_____Ming)

來東京支持廢藩置縣的西鄉隆盛認為是時候做出改變了。他認為應該將“柔弱華奢之風的舊公卿”換掉，改為由“剛毅清廉之武士”出任天皇的顧問。西鄉在咨詢過大久保和木戶之后，正式向三條和巖倉提出建議，并要求他們立刻做出決定。8月19日，決定下來了：薩摩藩的藩士吉井友實（1828—1891）被任命為宮內大臣，全權掌管宮內省和天皇后宮的改革事宜。一直支持改革的公卿德大寺實則被任命為侍從長兼宮內卿。

改革的建議很快就提交上來。自此以后，任命侍從時不會考慮他們是出身公卿世家還是武士階層。人們期待，即使侍從中只有幾名武士，他們也將根除長久以來形成的陋習。侍從還有一項新任務，即向天皇提供包括東西方在內的各種新舊信息。高級侍從還將協助天皇拓展知識。受影響的不止天皇：根據決定，皇后及其侍女也必須熟悉日本、中國和西方的古今大勢，因此天皇上課時應允許她們旁聽。[[10]](#_10__1868Nian__Zai_An_Pai_Wai_Gu)

天皇的侍從中，像三條西、里松和綾小路這樣的貴族名字被村田新八這樣的武士名字所代替。[[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9月15日，全部女官都被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年輕女子。[[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1872年1月20日，西鄉隆盛寫信給舅舅椎原與三次，信中帶著明顯的滿意口吻說：

行諸種變革，最喜之事為主上身邊侍奉之事。此前非華族之人不得出御前，偶有士族[[13]](#_13__Guan_Yu_Bei_Jie_Gu_De_Gong)之宮內省官員亦不能出御前。右等弊習今日悉改，侍從亦可自士族召入。公卿武家華族并士族皆同樣，士族出身之侍從更得天皇恩寵，實為可喜之事。

主上厭煩居后宮，自晨至晚始終在外殿，學和漢洋之學問，次同侍從討論，修業無寸暇。較之大名等，衣著亦簡單；較之眾人，修業之學習格外努力。然今日之天皇非昔日之天皇，此點三條、巖倉兩卿亦稱是。主上本為英邁之資，身體至極強健。公卿言，近來未有如此壯健之主上。天氣宜時，主上每日習馬，兩三日內召御親兵一小隊調練，此后隔日調練，亦有人言主上欲親率大隊，自任元帥，此實為難得之事也。[[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月底，太政官制度被廢止，取消了左大臣、右大臣、大納言及許多更低的職位。政府被分為三個部門：以天皇為首的行政院（正院）、立法院（左院）和司法院（右院）。

國內的這些重大改革一旦完成，政府就能對國際事務投入更多的精力。首當其沖是勘定北方的邊界。為防止俄國人捷足先登，蝦夷（1869年9月改稱北海道）的開發迫在眉睫。政府將北海道和千島群島劃分成十一個縣和八十六個郡，派許多重要官員去擔任行政管理工作。[[15]](#_15__Ri_Ben_De_Shi_Zu_Zhi_De_Shi)1869年10月5日，政府將“大國魂神”作為北海道開發區的祭神，舉行鎮座祭[[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各主要寺廟都鼓勵信眾移居新開發區。

日俄邊界的主要問題是薩哈林島。兩國都有居民在島上居住，國家之間的界線不是那么容易劃分。1870年3月，庫頁島（即薩哈林島）發展委員會成立，然而日俄尚未建交，不可能開展任何談判。3月3日，寺島宗則（1832—1893）、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與美國常駐公使查爾斯·德隆（Charles E. De Long）會面，討論薩哈林島的問題。愛管閑事的德隆強調，這一邊界問題對全球其他國家也很重要，并自告奮勇充當兩國的調解人。他指出美俄之間關系親密，承諾假如將這項使命交與他，他將為達成解決方案而不遺余力。[[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日本人接受了德隆的建議，但提出一個條件，即以緯度來劃分邊界：北緯五十度以北為俄國領土，五十度以南為日本領土。

盡管德隆非常自信，但他的斡旋卻沒有任何結果。日俄居住者之間繼續有小沖突發生，日本仍未決定采取何種策略。他們至少有三種選擇：（1）向俄國定居者支付一筆錢讓他們離開，然后統治整個島嶼；（2）把島嶼一分為二，讓俄國定居者搬到邊界線以北，并補償他們一筆搬家費；（3）把整個島嶼讓給俄國，并收一筆補償金。[[18]](#_18__Ri_Ben_Shen_Dao_Jiao_De_Yi)

1871年6月，副島種臣被派往薩哈林島的俄國控制區與俄方進行談判。出發之前天皇告訴他說：

我邦最近魯邦（俄國）之壤土，應交誼最厚。尤如樺太之地，彼我人民雜居往來，各營其利，我國豈不盡心于保全此地之道哉。嘉永五年（1852），魯帝派全權使臣，議定疆界，然互有事由，其議未成。而后，慶應三年（1867），于彼得堡暫結雜居之約。朕竊察方今樺太之形勢，言語義脈不通，致民心疑惑，偶生爭隙釀仇怨，恐終使兩國失懇親之道，故議定經界為最急務之事。此非獨朕之深憂，魯帝亦嘗勞心。所以委爾種臣全權，以定疆界。切望爾機宜從事，以保兩國人民之慶福，促兩國交誼益厚綿延永久。爾種臣篤體斯旨。[[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值得注意的是，天皇說沙皇和自己一樣希望和平處理邊界問題。他說和平是彼此的共同愿望，他們都希望自己的臣民能夠不受干擾地繼續生活。這番陳述說明天皇現在意識到了君主對臣民的責任以及希望不同國家的君主之間互相配合的愿望。

接下來幾個月，副島種臣和俄國特使葉甫根尼·卡爾洛維奇·比措夫（Evgenii Karlovich Biutsov）多次見面，然而會談毫無進展，根本無法解決薩哈林島的現狀。[[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1873年2月，北海道開拓次官黑田清隆上書天皇，極力主張日本完全放棄薩哈林島。黑田說把資金用來開發北海道的大片土地，要好過用來開發薩哈林島的荒地。他說薩哈林島上谷物、煤炭和漁獲的銷售收入不太可能滿足島上居民的需求，同時贊揚俄羅斯人1868年因為類似的原因而將阿拉斯加賣給美國人是英明之舉。[[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這個問題直到1875年5月才得到解決，當時全權公使榎本武揚和俄國全權公使亞歷山大·戈爾恰科夫（Alexander Gorchakov）簽訂了一份協議，約定日本天皇陛下放棄薩哈林島的全部權利，將其讓給俄國沙皇陛下，而作為補償，后者將千島群島的十八個島嶼讓給日本天皇陛下。兩國以群島最北端的占守島和堪察加島南端的洛帕特卡角之間為界。[[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在此期間，天皇的注意力放在了遠離日本的一些事情上。普法戰爭（1870年7月至1871年5月）爆發后不久，日本政府派出了四名高級武士前往觀察。他們到達歐洲時，普魯士已經節節取勝，包圍了巴黎。這些日本觀察家來到巴黎，開始編寫詳盡的戰事報告，分析作戰雙方各自的長處和缺點、使用武器的優劣、勝敗的原因以及歐洲的總體形勢。他們無一例外都被普魯士軍隊的實力和戰術所深深震撼。迄今為止，日本在組建現代軍隊時一直都遵照法國的模式，然而法國的戰敗使日本換了老師：從此以后，德國軍隊成為日本學習的楷模。[[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天皇對這場戰爭格外感興趣。多年后，軍官高島鞆之助回憶說，天皇認真地檢查送上來的普法戰爭報告，并向顧問咨詢交戰雙方采用的策略。戰爭結束后不久，一艘德國軍艦來到橫濱，船長向天皇進獻了一些戰爭照片，并請求允許他親自進行講解，天皇欣然同意。船長不僅描繪了照片中發生的事，還介紹了整個戰爭。高島說，“龍顏大悅”。[[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這件事發生的時間具體不是很清楚，但天皇為這樣的目的而接見一名外國人顯然是前所未有的事。[[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之后，天皇又一次打破常規，接見獲得升遷的代理英國公使亞當斯。他表示自己為亞當斯的工作獲得君主的認可而感到高興，并為亞當斯的即將離職感到遺憾。自己雖有惜別之意，但無法強留，希望他在回家的路上好好保重。[[26]](#_26__Gao_Dao_Tomo_Zhi_Zhu____She)天皇的話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但它表明宮廷已經迅速適應了歐洲的習慣。

普法戰爭獲勝后，1871年1月，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加冕為德意志皇帝，并將自己新的顯赫身份通知了明治天皇。后者回信表示祝賀，并附上兩本大和繪畫冊，作為前年秋天皇帝送的戰爭照片的回禮。日本和歐洲仍然相距遙遠，然而日本在全球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經足以使天皇了解 “親戚”們——歐洲的君主們——的最新情況。

1871年12月23日，巖倉使團出訪美歐，無疑是這時拉近日本與世界其他國家距離的最重要的一件事。[[27]](#_27__Du_Bian_Ji_Zhi_Lang____Ming)1858年7月日本與美國簽訂的通商條約規定，可以在約十四年后重新審議條款，因此現在是一個派使團出訪與日本簽訂過和約的各個國家的恰當時機。[[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這些條約規定了治外法權和固定的進口關稅，兩者都侵犯了日本的主權，因而非常不受日本人的歡迎。日本希望通過談判能夠剔除這些討厭的條款。

1871年2月，時在華盛頓的伊藤博文給許多高級官員寫信，建議近期派一個由優秀官員組成的使團到歐洲和美國去考察各國的狀況，包括友邦關系、貿易和關稅，提前為滿足和約修改的條件做準備。伊藤希望使團能夠成功地說服各國相信日本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不應被視為法制和金融均不可靠的落后之地。使團的主要目的是贏得西方大國的信任，并向他們表達日本政府希望修改和約的愿望。

1871年5月，政府命令參議大隈重信和財政部官員吉田清成（1845—1891）進行調查，研究為修改和約而派使團到西方去是否可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應該派使團出去，于是太政官準備了一份報告并提交給天皇。

報告一開始便認為各國之間的關系應該以平等為基礎，認為日本和外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歸咎于幕末官員懶散和拖延的習慣。到了維新之初，人們希望收回日本的權利，擺脫條約帶來的恥辱，然而條約已經生效，無法修改。現在，是時候和外國政府討論修改條約，建立以平等為基礎的友誼了。條約的修改將以國際法為基礎，因此日本的制度或法律中任何與國際法不一致的地方都必須修改。這可能需要一年或者更長的時間，然而條約上明確寫著1872年7月1日可以開始修改，因此現在有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同時也帶來巨大的挑戰。各國的外交官無一例外都會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考慮，假如日本的制度、法律或者宗教存在任何與普世道德觀相違背的地方，都有可能受到他們的攻擊，甚至可能要求日本立即更改成他們的方式，以作為修訂條約的交換條件。對日本來說這并非易事，結果必定造成雙方在談判桌上對峙。

外交使團可能有助于避免這種分歧。使團成員將對各國進行禮節性訪問，同時表示希望日本政府的變化能使兩國之間的關系比以往更加親密。他們還將告訴各個國家，日本政府的目的是修改條約，并建議對此進行談判。為使日本知道成為國際社會一員所需的條件，派使團出訪歐美是個好辦法。隨團出訪的專家將會考察各國的制度、法律、經濟、教育等等，判斷日本該引進這些的方法。使團將使日本人獲得一個在各方面改變自己國家的機會，從而說服外國列強相信日本已是開明國家。[[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第二份報告描繪了日本需要改變的一些地方，包括法律、外國人行動和隨意選擇居住地點的自由、啟蒙教育以及掃除宗教自由的障礙等。

假如使團遵守提議的主張，沒有要求立即修改條約，那么這次出訪可以說是一次空前的成功，但是許多歷史學家認為使團沒有能夠成功修改條約，因此一敗涂地。不過當時的外國人卻并不這么認為，他們認為使團的出行，是日本歷史上光輝的一頁。格里菲斯在1900年寫道：

也許1871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派了一個巨大的使團到基督教世界去。關于這件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圭多·沃貝克（Guido F. Verbeck）一手促成的。

1871年11月21日，沃貝克先生在東京寫道：

“政府將派一個非常高級的使團到美國和歐洲去……我希望并且祈禱，這個使團能實現我們渴望已久的對基督教的寬容，至少是接近一點……其中八九人是我的前學生。我們希望出訪的結果令人滿意，而且，在神的恩賜下，獲得對宗教的寬容。我一直在朝著那個方向努力。”[[30]](#_30__Zhe_Ge_Shi_Jian_Yao_Dao_187)

據沃貝克回憶，1871年10月25日，巖倉要求他上門拜訪。見面后巖倉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有沒有寫過一篇文章，然后交給自己的重要下屬？”[[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巖倉指的是幾年前沃貝克寫給大隈，建議其派使團出訪歐美的一篇文章。他說他直到三天前才聽說這篇文章，現在已經叫人翻譯出來了。

最后他告訴我，那恰恰是他們最要做的，他們將不折不扣地執行我的計劃……使團將按我文中建議的方法組建……在巖倉和天皇收到我這篇文章的兩個月后，使團出發了。[[32]](#_32__Da_Jiu_Bao_Li_Qian____Yan_C)

格里菲斯補充道：

使團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設法刪除條約中的治外法權條款，為此，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日本可能需要進行全面的改組。但是，代表們卻沒有獲得天皇的全部授權。他們出發前，美國公使查爾斯·德隆閣下告訴了我這一點。[[33]](#_33__Bu_Qing_Chu_Yan_Cang_Shuo_D)

學者們爭論的焦點是，修改條約是否是使團的主要任務。那些認為是的人強調使團在外國逗留時間之長以及費用之高，并描繪了成員們返回日本后的沮喪情緒。盡管大家都熱切地盼望修改條約，但最初的目的顯然不是這個。可能是陪同使團前往華盛頓的德隆頑皮地對日本人說了一句“是時候要求美國修改條約了”。他可能在想，假如這件事成功了，將有助于提高自己在日本的聲望。日本使團在美期間，所到之處均受到非常友好的接待，使他們深信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34]](#_34__Da_Jiu_Bao_Li_Qian____Yan_C)

然而使團抵達華盛頓后，國務卿卻對他們說，他們的國書中并沒有包含條約的修改，于是大久保和伊藤不得不返回東京重新請求一份國書。盡管耗費了很多時間、精力和經費，[[35]](#_35__Da_Jiu_Bao_Li_Qian____Yan_C)巖倉卻認為，單方面與美國簽訂條約將對日本不利。根據條約的最惠國條款，向美國做出的任何讓步都將適用于其他任何國家，而且不一定會有補償。他決定中止與美國人關于條約修訂的談判，改為在將來的某個時候，與各國代表坐在會議桌前一起進行談判。巖倉、木戶和山口尚芳拜訪國務卿，告訴他使團不能單獨與美國進行談判，因此他們將回到出訪的最初任務，即對各國進行禮節性的訪問。使團在美國逗留了六個半月（包括在華盛頓長期等待的時間），之后才前往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但是這些時間并沒有白費，只要看到久米邦武那本詳細記載使團見聞的《米歐回覽實記》，就能清楚地知道這一點。

哲學家、歷史學家三宅雪嶺認為，使團離開美國后，行動就墮落為毫無目的的漫游。使團成員們很清楚這一點，但是他們別無選擇，只好繼續往前走。發達國家的見聞使他們感到好奇，認為自己可以因此而熟悉世界形勢，并以此安慰，但是這并不能掩蓋他們的失敗，甚至連他們自己也欺騙不了。[[36]](#_36__Da_Jiu_Bao_He_Yi_Teng_Si_Hu)然而在久米的這部巨著中，我們看不到一絲沮喪的情緒。不管使團成員的心里是否始終意識得到，他們都是在幫助日本成為一個現代國家。

由于經濟原因，西方國家不愿修改不平等條約。繼續控制日本的進口關稅對他們有利。如果日本施壓，他們會以暗殺歐洲人的事件仍在繼續因而無法相信日本會公正地懲罰罪犯為由加以拒絕。[[37]](#_37__San_Zhai_Xue_Ling____Tong_S)他們或許也主張先解除對基督教的限制，然后再來談條約修改的問題，但是這類保證超出了使團的權力。無法修改條約這點令人極為失望，但事實上使團出色地完成了原來的任務。假如他們沒有更大的野心——要修改條約——就不會浪費幾個月的時間等伊藤和大久保從東京回來，也就沒有人會質疑他們的成功了。

無論如何，這些人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認識了西方，而這種認識是無法通過其他途徑獲得的。他們有幸觀察了繁榮和樂觀時期的西方各國，他們可以將這些知識——不論是先進的機器、政治或者僅僅是歐洲人待人接物的禮儀——應用于日本。從這個角度看，巖倉使團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天皇和全體日本人民將分享他們通過漫長航程帶回的碩果。

1. [[1]](#_1_22) 毛利敏彥，《明治六年政変》，第23頁。毛利提到，當時在華盛頓特區的森有禮高估了美國人的友誼，認為修改條約的大好時機已經來到。伊藤博文和他的看法一樣（《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59頁）。使團成員討厭森，因為他公開在美國人面前批評日本。木戶孝允的日記中包含了以下段落：“最近這些日子森的行為令人震驚。相比之下，美國人非常理解我們的感受，而且了解我們的風俗習慣。但是，我們那些正在美國學習的學生缺乏對我國傳統習慣的深刻理解。他們崇拜美國的習俗，完全不知道他們自己賴以立足的傳統。他們草率地崇尚自由和共和，那些無憂無慮的輕薄理念我幾乎不忍卒聽。大家對我國派駐這里的公使森議論紛紛，說他當著外國人的面肆意地嘲笑自己的國家”（1872年4月15日的日記，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aid-6CC"2, pp. 149-150）。

1. [[2]](#_2_22) 然而，日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處理那些自稱為刺客的人，格里菲斯欣喜地記錄下了這一點：“1871年1月13日，兩名英國人在東京遭到三名持雙刀刺客的襲擊，傷勢非常嚴重。我和沃貝克有幸護理他們，使他們恢復健康。三名刺客被迅速捉拿歸案，經過一番刑訊逼供，三人對自己罪行供認不諱，隨后公布了對他們的判決。令英國公使感到驚喜的是當時已經完成了五分之二的新刑法的出臺。根據刑法條款，兩名罪犯被絞死，一名被判處十年苦役，三人的武士身份被撤銷……在這種彬彬有禮的壞蛋與殺人犯一視同仁，重犯被斬首的新方法下，暗殺很快便不再流行”（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pp. 183-184）。

1. [[3]](#_3_22) 版籍奉還期間，許多藩都上書天皇，請求廢藩置縣（《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99—501頁）。這次召見的四個大名都曾細述過廢藩理由。德島藩的大名蜂須賀茂韶強烈譴責藩國林立導致國內一盤散沙，并認為將各藩士兵統一由戰爭大臣領導是明智的做法。名古屋、熊本藩和鳥取藩的大名也提出了類似的請求（第404—405頁）。1881年5月17日，丸龜藩大名京極朗徹上書請求廢藩置縣；5月28日，天皇批準了他的請求（第446頁）。三田藩大名九鬼隆義甚至走得更遠：他不僅要求解散藩官，將他們的權力移交宮廷，還贊成逐步將藩內的武士轉變為農民和商人。他還贊成取消“華族”（貴族）和“士族”（武士）之間的界限（第470—471頁、第500頁）。大溝藩和津和野藩的大名成功請求并入大藩（第478頁、第483頁）。這些事件雖然在全國并不普遍，但是卻說明當時的氣氛是有利于廢藩置縣的。

1. [[4]](#_4_2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98頁。

1. [[5]](#_5_22) 大藏省為財務部門，大藏卿即財務大臣。——編注

1. [[6]](#_6_22) William Elliot Griffis,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 p. 181.

1. [[7]](#_7_22) William Elliot Griffis,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 pp.190-191。

1. [[8]](#_8_22) 木下彪，《明治詩話》，第50—51頁。亦可見拙著Dawn to the West , 1, p. 41。這首詩有40行。

1. [[9]](#_9_22) 司馬遼太郎，《〈明治〉という國家》，第111頁。他指出，直到20世紀20年代官僚機構和學術界都充斥著武士階層，因為他們很快意識到只有通過教育才能擺脫經濟困境。他進一步指出，直到大正時代末期武士階層才開始影響農商界。

1. [[10]](#_10_22) 1868年，在安排外國公使參觀紫宸殿時，以明治的母親中山慶子為首的大奧女人們又哭又叫，為天皇即將見外國人這件事感到氣憤。東久世通禧派人找來幾名高級女官，勸她們平息這些人的反對情緒。但是中山慶子找到了她的父親中山忠能，后者以醫生說天皇發燒為由請求推遲。巖倉讓另外一名醫生給天皇檢查身體，結果發現天皇安然無恙。會面照常進行（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23頁）。

1. [[11]](#_11_2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04—505頁。

1. [[12]](#_12_2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05—506頁。

1. [[13]](#_13_22) 關于被解雇的宮廷官員以及他們的繼任者，參考《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06頁。木村被任命為宮內大臣。

1. [[14]](#_14_2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07頁。其中三人被任命為權典侍，這是天皇妃子的頭銜。

1. [[15]](#_15_21) 日本的士族指的是武士階層。——編注

1. [[16]](#_16_2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09頁；亦可見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42頁。

1. [[17]](#_17_2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75頁。“國”是相當于縣的面積比較大的行政區域，“郡”是比縣低一級的行政區域。

1. [[18]](#_18_20) 日本神道教的一種宗教儀式，在神社創建當天、祭神初次鎮座時舉行的祭典。——編注

1. [[19]](#_19_2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67頁。

1. [[20]](#_20_1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63頁。

1. [[21]](#_21_1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63—464頁。

1. [[22]](#_22_18)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0頁。他們見面的地點在東京，而不是在北部。副島提議日本花二十萬日元把薩哈林島買下來，但是比措夫卻提出俄國獨占薩哈林島，并將千島群島給日本作為補償。雙方都不肯讓步。也許是為了打破僵局，副島說日本愿意放棄，讓俄國獨占整個薩哈林島，只是他們必須簽訂協議，同意在日本參加亞洲大陸的軍事行動時，允許日本軍隊自由通過他們的領土。比措夫回答說，他沒有權力討論這類問題，談判就此中斷。

1. [[23]](#_23_18)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1頁。黑田奏折的原文見《副島伯経歴偶談》第三卷，第23—24頁。

1. [[24]](#_24_16)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44—445頁。

1. [[25]](#_25_16)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327頁、第333頁。板垣退助原本被選為這個四人觀察家團的領導，但是他因藩內事務繁忙而拒絕了。高級團員有西鄉隆盛的堂弟大山巖，他后來成為陸軍大臣，在中日戰爭期間擔任第二軍的司令官。另外一名成員品川彌二郎在歐洲待了五年，后來升任內務大臣。

1. [[26]](#_26_16) 高島鞆之助，《神武以來の英主》，第34頁。但是，渡邊幾治郎記載的是德國公使（而非船長）給天皇看了這些照片并作了解釋（《明治天皇》第一卷，第129頁）。

1. [[27]](#_27_15) 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第一卷，第129頁。

1. [[28]](#_28_13)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66頁。

1. [[29]](#_29_13)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82頁。關于啟程的詳細描述，見久米邦武，《米歐回覧実記》，第42頁；田中彰，《巖倉使節団》，第8—10頁。

1. [[30]](#_30_13) 這個時間要到1872年10月，但是通常認為1872年7月1日就可開始重新審議（田中彰，《巖倉使節団》，第41頁）。日本與荷蘭、普魯士、瑞士、比利時、意大利和丹麥都簽訂了類似的條約。后來與瑞典—挪威、西班牙、德國和奧匈帝國簽訂條約時，遵照了美國的模式，這樣一來日本就無法剔除那些討厭的條款（《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47頁）。

1. [[31]](#_31_1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48—550頁。

1. [[32]](#_32_10) 大久保利謙，《巖倉使節の研究》，第257—258頁。大久保復制了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的Verbeck of Japan 的一部分內容。盡管沃貝克被視為美國人（嚴格說來，他是個無國界人士），但他卻出生于荷蘭，并在荷蘭接受教育。1859年他被荷蘭歸正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派往長崎，除了傳教之外，還教授英語、法律、政治、經濟和西方科技。（他大學時獲得過工程學的學位。）他的學生包括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和副島種臣。

1. [[33]](#_33_9) 不清楚巖倉說的“你的重要下屬”指的是誰。

1. [[34]](#_34_9) 大久保利謙，《巖倉使節の研究》，第254頁。新澤西州新不倫瑞克(New Brunswick)歸正教堂的Gardner A. Sage 圖書館發現了沃貝克1869年6月11日寫給大隈的親筆信的復印件，證實了沃貝克的話（田中彰，《巖倉使節團》，第28頁）。

1. [[35]](#_35_8) 大久保利謙，《巖倉使節の研究》，第257頁。

1. [[36]](#_36_8) 大久保和伊藤似乎認為他們已經獲得了授權，可以與美國人就條約修訂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是實際上他們只是獲得了開始談判的權利。他們并不是要單獨與美國修改條約，而是受命到歐洲與所有簽訂過和約的國家的代表見面，并展開談判。巖倉收到一封電報，詢問美國人是否將派一名特派公使到談判地點去。1872年6月19日，天皇給他的“好朋友”——各國的國王和總統——去信，介紹了使團主要成員，并告訴他們，使團成員即將訪問他們首都，而為了使國家之間的關系更加和平友好，使團成員已經獲得授權，與各國進行談判。他提醒他們原定的條約修訂日期即將到來，并希望修訂工作能在惠及所有人的情況下進行（《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77—679頁；毛利敏彥，《明治六年政変》，第26頁）。

1. [[37]](#_37_6) 三宅雪嶺，《同時代史》第一卷，第339—343頁。轉引自毛利敏彥，《明治六年政変》，第32—33頁。

# 第二十三章 初次巡幸



巖倉使團在華盛頓焦急地等待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從日本回來之時，日本正醞釀著再派出一個“使團”。它的目的與巖倉使團原來的任務很相似：考察所到之處的情況，并且使各地人民感受到日本新政府的威望。這個使團由天皇親自帶領，不同之處主要在于不是去國外，而是去日本的邊遠地區。

1872年6月16日，天皇公布了近期將由海路訪問中國和西國[[1]](#_1__Ya_Li_Shan_Da__De__Xu_Bu_Na)地區的計劃。為了準備實際的出行，這天還進行了全面彩排。[[2]](#_2__William_Elliot_Griffis__The_1)天皇對彩排很滿意，不久就將出行的日子定在7月10日。這次巡幸開啟了天皇的日本各地之旅。

此前公布的一份官方文件，解釋了此行特殊的意義：自中古時期以來，武家一直將天皇禁錮在皇宮的高墻之內，因此這次旅行將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天皇將遍游全國，觀察各地區的地形、總體情況、人民和氣候。沒有制定一個讓天皇熟悉自己國家的計劃是個嚴重的失誤，但是現在錯誤已經得到彌補。天皇將乘船游覽大阪、兵庫、下關、長崎、鹿兒島、函館、新潟以及沿岸其他城鎮。這樣的旅行將有助于天皇更好地謀劃整個國家的福祉。不幸的是，在一些窮鄉僻壤，人們仍未感受到宮廷的善意，這意味著天皇的影響力還不能說已完全滲透。假如不抓住眼前的機會改變這種情況，國內對未來的疑慮將會越來越多，成為進步和啟蒙道路上的嚴重障礙。[[3]](#_3__Dang_Shi_Zai_Lun_Dun_De_Mu_H)

天皇實際面臨的情況甚至比上面文件所說的還要嚴重。明治時代初期，許多平民，甚至可以說是絕大部分平民都對天皇不感興趣。[[4]](#_4___Zhong_Guo__Zhi_Lai_Hu_Nei_H)注意到這點的大久保利通早就敦促天皇學習歐洲君主的做法，向人民展示自己。他確信將天皇從躲在高墻和簾子后面的神秘形象變為臣民熟悉的可視形象，在政治上來是不可或缺的。

天皇所接受的教育并未把他培養成公眾人物。歐洲人早期的描述說明他在陌生人面前異常害羞，以致說話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5]](#_5__Wei_Le_Li_Yong_Zhang_Chao_De)他那想必是從宮內女官那里學來的奇怪步姿讓人品頭論足[[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而天皇身上的服裝和那張涂了油彩的臉則表明他是這個世界的另類。天皇個人形象的轉變以及在人民面前露面的決定，并非他本人的意愿，而是在大久保等顧問的建議下才這么做的。

天皇“人性化”的嘗試最初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從東京到京都的一路上他都沒有在公開露面，民眾最多只能看到他的乘輿。然而，早在1868年，天皇的形象就開始出現在錦繪（一種為平民取樂的木刻版畫，浮世繪的一種）上，這表明公眾已經萌發了對天皇的興趣。[[7]](#_7__Duo_Mu_Hao_Er____Tian_Huang)

這些進展雖然令人欣喜，但并沒有完全符合計劃。大久保本想按路易十四的路子把年輕的天皇打造成一位君主，希望以此作為君主立憲制創建過程的中間階段。然而，日本的君主傳統并不適合培育巴洛克式的富麗堂皇。以路易十四為例，“歐洲專制主義的政治手段非常直觀：藝術和權力體現在國王來訪時城市的游行隊伍、宮廷的假面舞會、富麗堂皇的宮殿建筑和花園之中。國王通過這些藝術形式成為一個可視的形象”。[[8]](#_8__Li_Ru__Xiu__Ke_Er_Ta_Qi__Hug)日本的君主則是非可視的。人們不僅看不到天皇本人，甚至御所周圍的空白圍墻也與法國國王凡爾賽宮周圍的宏偉建筑和花園沒有絲毫的相似之處。

不過，我們在閱讀描寫路易十四及其宮廷生活的文章時，還是會覺得有些地方與明治很相似：“在同時代人的眼里國王是個神秘人物。”[[9]](#_9__Duo_Mu_Hao_Er____Tian_Huang)孩提時的路易就以嚴肅和沉著給外國使節留下了深刻印象：“威尼斯特使指出，1643年路易只有五歲，他很少笑，也幾乎不在公眾場合露面。”[[10]](#_10__Duo_Mu_Hao_Er____Tian_Huang)路易接受的似乎是西班牙宮廷禮儀的訓練，因為據說他的岳父，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四世，在正式會見時身體保持不動，“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這個描述與外國人對明治在正式會見時的描述驚人地相似。[[11]](#_11__Peter_Burke_The_Fabrication)害羞和禮儀同樣造成明治在會見時身體靜止不動，但是在法國或者西班牙，國王雕塑般的形象卻是戲劇表演的一部分。一名學者這樣寫道：“因此，應該把國王的不茍言笑和隱身視為宮廷戲劇的一部分。當時的人無法經常看到費利佩，實際上卻使他的公開露面變得更加耀眼和炫目。”[[12]](#_12__Peter_Burke_The_Fabrication)

當路易長大成人，與明治登基的年齡相仿時，他表現成一名模范君主。“年輕的國王在17世紀60年代展示的形象，是那種罕見地獻身于國事和臣民福祉的君王形象。”[[13]](#_13__De__Xu_Bu_Na_Nan_Jue_Zhe_Ya)然而，不久路易對國民表面上的關心就被日益增長的自戀和驕傲所代替。相比之下，明治對人民的關心，從他登基之日起一直延續到他的統治結束。

兩位君主之間的相似之處使人好奇，但這些相似之處簡短而又時斷時續。日本沒有路易十四那么多的騎馬雕像，沒有描繪國王保衛天主教或者在戰場上打敗外國人的復雜繪畫，也沒有為了提高形象而委托同時代的人或者后代創作的詩歌、戲劇和音樂作品。法國已經成立了一個名為“榮耀部”的機構，負責國王的形象展示。明治的“榮耀”無須這樣一個“部”。他的榮耀來源于他長時間的統治以及從未改變的對日本人民的深切關懷，而不是什么美化的形象。

也許諾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對路易十四的評價最能體現兩位君主的相似之處：

毫無疑問，路易十四以自己的方式成為西方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之一，影響非常深遠。但他本人的才智和天賦并不出眾。只能說中等，談不上偉大……

剛才提到的與路易十四“偉大”有關的悖論表明：有時，最重要的任務并非由那些——我們多少有些浪漫地認為——具有創意或創造力的人，或者由那些具有非凡動力和活動能力的杰出人士完成，而是由那些沉著溫和的中等人才所完成。路易十四的情況就屬于這一種。[[14]](#_14__Peter_Burke_The_Fabrication)

大久保努力想把明治變成路易十四那樣的君主，這是誤入歧途，幸運的是，他沒有成功。不過他認為天皇必須變成一名日本人民看得見并認得出的嚴厲慈父的想法卻是正確的。

1872年的巡幸從6月28日一直持續到8月15日，全程都非常成功。這次出行與路易十四的巡游不同，甚至與德川時代盛期大名的出行也不一樣，明治一行非常謹慎小心，要求各地不得阻礙交通、人們跟往常一樣勞作、無須修路或者遮掩那些骯臟的地方、不得收取禮物。出行的目的是使天皇看到國家的實際情況，而不是讓他看巧妙偽裝過的波將金村[[15]](#_15__Peter_Burke_The_Fabrication)。

反對天皇此次出行的主要是那些仍然留在京都的人。天皇的外祖父中山忠能聽說在國內人心未定的情況下決定巡幸這種大事后非常震驚，很擔心巡幸的結果。皇宮中的變化也讓京都貴族橋本實麗（1809—1882）震驚。6月20日，他到東京的宮殿參見天皇，恭恭敬敬地行完禮起身后，驚訝地發現天皇穿著西服坐在椅子上。橋本后來注意到走廊都鋪上了地毯，侍從等不必脫鞋，工作時都坐在椅子上。[[16]](#_16__Norbert_Elias_The_Court_Soc)

橋本并非唯一一個為宮廷西化速度之快感到不安的人，但是天皇完全顧不上這些。6月28日早上4點，他踏上巡幸之途時，第一次穿上了那件最有代表性的服裝——綴有盤扣的燕尾服。[[17]](#_17__Chu_Zi_E_Luo_Si_Li_Shi_De_Y)他的穿著不免遭到保守派臣民的批評。天皇在長崎時，有人向他提出抗議，懇求他停止穿西服。宮內卿德大寺實則與西鄉隆盛討論該如何應對。西鄉派人把這個人叫來，并對他吼道：“你難道還不了解世界形勢嗎？”這個人驚恐地退下了。[[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只有在三四年前許多武士仍然嚷著攘夷時，這樣的抗議才可能受到重視。

那天天皇騎馬從皇宮出發，在濱離宮短暫停留，吃了一些點心，然后在早上的5點30分乘坐小艇，登上停泊在品川的“龍驤”號軍艦。同行的是七十余人隨從[包括西鄉隆盛及其弟弟西鄉從道（1843—1902）]以及一隊禁衛兵。天皇一踏上軍艦，樂隊就奏起了歡迎的樂曲。十二年前，當第一支日本使團遠渡太平洋來到美國時，使團成員不斷地抱怨受到刺耳的“番樂”折磨，但是現在日本海軍卻為天皇奏起了類似的音樂。其他的歡迎儀式包括主桅桿升起一面錦旗、懸掛信號旗、水手們行分區列隊禮以及鳴放二十一響禮炮。[[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除了第一項，其他所有禮儀均位近十年學自西方海軍的做法，然而它們已經牢牢地成為日本海軍傳統的一部分。

出行的第一站是去參拜伊勢神宮。6月30日上午，“龍驤”號和其他護衛艦停靠在鳥羽灣。天皇一行人從那里出發去伊勢神宮的所在地山田。領頭的是當地官員，其次是工部、海軍部、陸軍部等官員。兩名侍從捧著天皇的神劍和勾玉，天皇自己騎馬，兩側各有一名侍從護衛。一半的禁衛軍在前面引路，一半殿后。官員都身穿燕尾服，佩戴西洋劍，步行跟隨在后面。道路兩邊歡迎的民眾都為天皇著裝之簡樸感到震驚，這和過去大名出行時隊伍之鮮艷簡直有天壤之別。民眾跪在道路兩旁，仿佛是在拜神一樣地拍手。這次的巡游和接待方式是天皇此次出行的典型模式。

第二站是大阪。一艘半路相遇的俄國軍艦鳴放了二十一響禮炮，以示對“龍驤”號上的錦旗的尊重。天皇到晚上10點才抵達臨時住處。大阪市民在街道兩邊拍手歡迎，同時山呼萬歲！[[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松島居住區的外國人沿路點燃了篝火，并脫帽向天皇致意。

7月7日，天皇離開大阪，登上了一艘開往京都的江輪。這是他三年多來第一次回到古都。到達京都時已經天黑，但是沿途的每一家門口都點著燈籠，照亮了通往御所的路。京都民眾拍手歡迎，據說人們看到天皇時，無不激動得熱淚盈眶。[[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在京都停留的短暫期間，明治見到了自己的家人——外祖父中山忠能、姑姑親子內親王和淑子內親王。[[22]](#_22__Guan_Yu_Zhe_Yi_Dian____Ming)他在給父親孝明天皇上墳時，沒有穿西服，而是穿上了正式的宮廷長袍。之后他參觀了京都的一個商品展，展出的物品包括傳統的“西陣織”[[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以及新發明的碾米機和西式雨傘。明治參觀了一所中學，觀看學生上課，并聽了學生們如何回答有關句讀、算術和外語等問題。他還參觀了一所原來專門教貴族子女外語（英語、德語和法語）和手工藝的學校，現在這所學校也接收平民的孩子。明治接見了外國教師，之后頒布詔書稱外國教師們“盡心于生徒教育，朕甚嘉之。望汝等勤勉，生徒益研學不怠”。[[24]](#_24__Ren_Xiao_Tian_Huang_De_San)

天皇此次和后來每次巡幸，所到之處從未忘記視察當地的物產和學校。他在學校觀看化學等科學實驗，并聆聽學生們用日語和外語演講。天皇還到野營地視察軍隊。這些行動展示了天皇最典型的一面：鼓勵本地商品的生產、表現出對教育的興趣、鼓舞軍隊的士氣。他似乎認定現代日本的未來將由這三個因素所決定：工業、教育和軍隊。報紙《長崎航訊》除了表達慣常的敬畏和感激之情外，還高度贊揚天皇的來訪使城中居民擺脫了頑固的無知，鏟除了他們的狹隘思想，并掃清了文明和進步道路上的荊棘。[[25]](#_25__Yi_Zhong_Fang_Zhi_Pin_De_Mi)

不用說，天皇無論走到哪里，都被臣民崇拜的目光注視著。他也很受外國人的歡迎，不論是學校的教師還是被請來教日本人西方科學與機械知識的政府雇員。也許這次旅行最不尋常的事件發生在熊本。天皇去拜訪外語學校的老師勒羅伊·簡斯（Leroy L. Janes），簡斯太太站在二樓的陽臺上，朝正進屋的天皇頭上拋撒花瓣。這種歡迎方式他此前從未遇過，此后也沒有再經歷。[[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天皇最喜歡在吃飯時和大臣們分享的一個趣聞，是他和護衛去鹿兒島的一個外國人家里訪問的事。住在那里的老婦人拿出了豐盛的西式菜肴和糕點招待他們，然而（天皇說完放聲大笑），“她連我是誰都不知道！”[[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很難想象天皇和隨從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到外國人家里去的，又或者，即便這個老婦天性如何好客，她是如何這么快就做出一桌豐盛的飯菜的，但是這個故事卻廣受歡迎。它有著我們熟悉的主題——貴人微服私訪，來到一戶簡陋的人家家里，卻受到年老的主人熱情款待[[28]](#_28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只差在末尾加上一句：這位客人向毫不知情的恩人贈送了慷慨的禮物。

天皇坐船離開鹿兒島之后，他待過的地方開放給普通民眾參觀。凌晨便等候著的人們恭恭敬敬地接過一些零碎的草席和柳杉針葉。草席是天皇祈禱時跪過的，柳杉針葉是他夜里納涼時平臺上的裝飾，人們把這些東西用來驅邪。[[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天皇的船從鹿兒島直開到四國的丸龜，到達丸龜的時間是8月7日。那天下著大雨，還伴有閃電和狂風。第二天天放晴，天皇從臨時搭建的祭臺上，朝白峰的崇德天皇山陵和淡路島上的淳仁天皇山陵遙拜：這兩位天皇都死于流放地。那天，東京傳來消息，薩摩人為主的禁衛軍內部發生沖突。身為薩摩人的西鄉隆盛和西鄉從道趕緊乘坐快船返回東京，因為大家認為能平息暴動分子的唯有他們兩人。[[30]](#_30__Wo_Xiang_Qi_Le_Fei_Li_Men_H)天皇按照原計劃繼續前行，在返回橫濱時短暫逗留神戶。

返回東京后，明治繼續對教育表示出極大的興趣。9月3日，第一個公立圖書館在上野開放。第二天，天皇頒布諭旨，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并公布了各級的教育計劃草案。草案計劃設立8所大學和53760所小學。所有年滿6歲的兒童都必須到學校上學，從滿足男孩和女孩、城市和農村等不同需要而設立的各種學校中選擇一所。教育制度將學習法國。這些計劃是為了兌現天皇在《五條誓文》中“破除舊來之陋習”以及“求知識于世界”的承諾。[[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經過多年動蕩，國家似乎最終安定下來了。東京都21座用于軍事防御的外城門已經拆除，只剩下地基和石墻。專職保護外國公使、居民和各縣雇傭的外國人的特警也被普通警察所代替。但各縣仍有零星的農民起義發生，而國際問題則變得尤為重要。

9月26日， “瑪利亞·路斯”號（Maria Luz）的判決結果公布。這艘秘魯輪船在從澳門開往秘魯的途中受到嚴重損毀，7月9日停泊在橫濱進行維修。一天夜里，一名中國勞工越過船舷逃跑，被一艘英國軍艦救起，并被送往神奈川當局。這名中國人訴說了自己和船上另外231名中國人受到虐待的事情，并請求日本政府保護他們。神奈川當局傳喚了秘魯船長，將這名逃跑的中國人交給他，但警告他必須人道地對待船上的中國人，同時嚴肅地叮囑他不得懲罰這名逃跑的人。然而船長不僅狠狠地懲罰了他，還繼續殘忍地對待船上的其他中國人。代理英國公使沃森（R. G. Watson）聽說后，親自登上“瑪利亞·路斯”號查看情況，發現那個逃跑的中國人說的都是事實：船上中國勞工的生存環境幾同奴隸。沃森要求外務卿副島調查這件事。

副島立刻下令禁止這艘秘魯輪船離開港口。經過進一步調查后得知，船上的官員在澳門連哄帶騙地讓這些目不識丁的中國人簽了賣身契，把他們關進船艙，殘忍地對待他們。預審時判決秘魯船公司有罪，并允許全部中國人上岸。8月27日，朝廷同意了這個判決。日本將判決書寄給在日本的每一名外國代表，并咨詢他們的意見。只有英國支持這個判決。美國領事拒絕做出評論，因為這件事和他自己國家無關。其他國家都反對這個判決，他們援引1867年10月簽署的一份關于管理橫濱外國人居住區的條例，質疑日本政府是否有權處理發生在國土之外的事。裁判長大江卓（1847—1921）請示副島，副島說尊重法庭的裁決。

8月30日，大江裁定，秘魯船長釋放全部中國人，允許船長乘坐自己的船離開，免于鞭刑。秘魯人依然不肯服輸，他們試圖證明自己在澳門與中國勞工簽的合同合法且具有約束力。9月26日，法庭維持了大江的原判，稱秘魯船長的行為不僅違反了國際法，而且與日本的法律相違背。一些船上的中國人聽到判決后大為鼓舞，棄船逃跑，船長也許是擔心自己有生命危險，棄船逃往上海。中國政府隨后感謝了日本政府的友好行為。[[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1873年6月，這件事被提交給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仲裁，兩年后沙皇維持了日本法庭的判決。[[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是明治天皇的虔誠崇拜者，他這么描述明治在判決中所起的作用：

睦仁于8月中旬回到橫濱。他在逗留期間與市長大江卓就秘魯輪船“瑪利亞·路斯”號的案子進行了長時間的磋商。這艘船因為天氣原因停靠在這里，船上滿載著中國勞工，他們中了別人的圈套，實際上是被綁架了，而且受到殘酷的對待。其中有一個人游向當時停泊在港口的一艘英國軍艦，他們的情況才為人所知。

明治不畏“共和政治的惡弊”，不畏秘魯的裝甲艦，不畏那些落后于時代的人的反對，決心擁護人類的自由。庭審結束后，中國勞工踏上了日本國土，被收留直至收到北京政府的回信。這是日本首次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亞洲宣示人權。一些外國人嚴厲批評政府的行為，甚至想象秘魯軍艦會來索賠。然而事情通過仲裁解決了，俄國沙皇裁決日本這么做是正確的。[[34]](#_3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格里菲斯提到天皇在處理“瑪利亞·路斯”號案件時發揮的個人作用，并未經其他同時代人的證實。假如格里菲斯沒有說錯，那么這是一個天皇介入司法案件的罕見例子。格里菲斯還回憶說：“庭審時，日本古典詩歌翻譯家、英國律師狄金斯（F. V. Dickins）強有力的論辯起了很大作用。[[35]](#_35__Mao_Li_Min_Yan____Ming_Zhi)那些被迫做可恥行當的年輕女孩，實際上獲得了人身自由。那些她們不情愿簽下的，將束縛她們好幾年的舊合同，被宣告無效。”

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的狄金斯被秘魯政府聘用，就與中國勞工簽訂的合同是否構成奴役辯護，他列舉了日本的妓女買賣，認為如果這算合法，那么秘魯人就沒有犯法。這個論點把日本人嚇了一跳，審判長大江匆忙宣布休會。最后大江判決，即使日本確實存在奴役，例如妓女買賣，但是仍禁止向外國輸出奴隸。秘魯船長試圖將中國的奴隸勞工從橫濱輸往國外，因此觸犯了法律。經過這番七彎八拐的論證，大江下令釋放這些中國人。[[36]](#_36__Guan_Yu_Di_Jin_Si_Yan_Jiu_R)

日本人感到極為尷尬，因為他們人口買賣的實情已經讓法庭上旁聽的外國領館官員給聽去了。大江敦促政府盡快廢止這種非法交易。11月1日，天皇頒布了嚴禁人口買賣這道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法令。[[37]](#_37__Mao_Li_Min_Yan____Ming_Zhi)所有妓女的賣身契均被廢止，取消與此相關的一切債務。學徒合同也改為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一年。

日本政府這個時期的一系列行動使得它與家門口兩個國家——朝鮮和琉球王國——的關系變得復雜起來。

在大約四百年的時間里，日本一直在朝鮮設有一個貿易據點——有點像長崎出島的荷蘭商館。[[38]](#_38__Yuan_Wen_Jian___Ming_Zhi_Li)日本在釜山設立的“草梁倭館”只由對馬藩的人員擔任，因為對馬藩的地理位置處在日本和朝鮮中間，歷史上一直充當兩國之間的交流媒介。盡管日本人受到嚴厲的監管，有時甚至是無禮的對待，但他們一直都沒有離開，因為貿易——主要是實物貿易——的利潤非常可觀。

明治初期，日本與朝鮮的關系變得緊張起來。在得知幕府（他們的關系一直很好）被推翻后，[[39]](#_39__Guan_Yu_Wei_Guan_De_Jian_Ya)朝鮮政府不太愿意與明治政府建立聯系。[[40]](#_40__1869Nian_1Yue__Dan_Ren_Ri_B)1869年，為了打破僵局，日本政府決定取消對馬藩前大名宗重正的談判代表之職，改由自己談判。1870年3月，政府派兩名外務少丞到朝鮮，通知此番人事變動，然而朝鮮只是回復說他們無法接受日本人的信件。兩名特使碰壁后回到日本，強烈主張征韓（入侵朝鮮）。

同年10月，日本再次派出的使團同樣沒能取得進展。三名特使要求會見當地官員，但卻遭到拒絕。朝鮮人說，三百年來對馬藩一直都是兩國之間的使者，為什么現在要打破這個傳統？如果日本想加強兩國之間的聯系，唯一的方法就是遵守過去的慣例。他們又一次吃了閉門羹。

1872年2月，東京又一次派出的一批使團抵達釜山。專門負責日本事務的訓導以生病為由拒絕與使團的成員見面。直到4月使團負責人相良正樹才將委托書成功交到代理訓導的手上，并附上自己此次出使目的的聲明。6月，訓導來到倭館，說等討論過相良的聲明后會給他答復，但是不能保證什么時候。朝鮮人的曖昧說法和拖延時間的態度讓相良等日本人大為光火，他們不顧規定，離開倭館徑直走到當地政府。當地的政府領導不僅拒絕接見這些日本人，還嚴厲指責他們擅離倭館、硬闖禁區。[[41]](#_41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Xi)

日本人只好返回倭館。使團成員返回日本，向外務卿副島種臣匯報了情況。副島認為，鑒于歷史和尊嚴的原因，倭館應該保留，9月12日他向正院提交了一系列建議，9月20日，朝廷和天皇批準了他的建議。建議第一條認為倭館作為日本在朝鮮的前哨必須保留，清晰地傳達了他的觀點。[[42]](#_4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9月30日，外務少丞花房義質（1842—1917）為執行副島的命令來到朝鮮。他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將草梁倭館那些來自對馬藩的工作人員全部換成外務省的官員，并將倭館置于外務省的管轄之下。倭館不再是對馬藩的貿易據點，對馬和朝鮮政府之間的賬目必須結清。談判再次拖延，因為朝鮮正在等待前訓導官復原職。最后，12月10日，朝鮮宣布拒絕接受花房帶來的物品（用以結賬），也不接受他們派駐的官員。

日本人發現朝鮮人與自己不同，他們拒絕接受“文明開化”的政策，已經無可救藥地落在了時代的后頭。這一印象使日本人更加憤怒。朝鮮依舊沒有向西方開放，日本人看朝鮮就跟以前的歐洲人看日本一樣，這使得他們對朝鮮的落后產生侮蔑之念。過去，日本人把朝鮮看成中國文化的傳播者而非常尊重，對比之下，這一轉變實在巨大。[[43]](#_4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另一個鄰國琉球王國也開始感覺到日本新政權崛起的威脅。這個國家的地位長期以來都很模糊。1186年，幕府曾經賜予薩摩家族的創始人沖繩和“南海”其余十一個島嶼的“地頭”頭銜。沖繩三個王國之間發生了內戰時，日本的戰事使得島津家族無法派兵前去協助沖繩，其中一個國王于1372年派使者到明朝乞求幫助統一國家，并請求成為明朝的藩屬。明朝同意，并賜國號“琉球”。但琉球長期以來與日本的附庸關系并未因為與明朝的新關系發生變化而停止：1441年足利義教將軍確認了島津忠國對琉球王國的控制權。到了德川幕府時期，琉球王國或多或少地為島津家族所占有，盡管它一直和中國保持著聯系。

1872年，鹿兒島縣的參事派兩名使者到琉球，承認過去治理時犯下的錯誤，并希望改善關系。琉球國王尚泰（1843—1901）表示同意。與此同時，大藏卿井上馨認為應該明確琉球王國的身份。常駐沖繩的鹿兒島官員接到參事的命令，轉達了日本政府的失望之情，原因是王政維新以來，琉球國王尚未到宮廷向親政的天皇表示祝賀。他敦促國王立即派代表前往東京。[[44]](#_4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尚泰聽從了命令。10月5日，他派出的三名高官抵達東京。10月16日，琉球使團覲見了天皇和各位大臣。使節宣讀了國書，琉球國王在國書中表示自己居于南方小島，聽聞維新盛事感到高興不已。天皇回答說，作為長期以來薩摩附庸的琉球效忠日本政府，自己非常滿意。天皇隨即下令，賜予琉球國王“藩王”的稱號，并加封他為日本貴族。天皇還向琉球國王和王妃贈送了大量禮物，包括各種布匹、三把獵槍、一副馬鞍和一對景泰藍花瓶。[[45]](#_45__Zhao_Shu_De_Yuan_Wen_Jian)

藩國已經被廢除，然而琉球國王卻獲得了“藩王”的頭銜，不得不說是件奇怪的事。這只能解釋為權宜之計，目的是將琉球王國牢牢地置于日本的管轄之下。而最終的目的是將琉球王國納入日本的版圖，這個愿望直到1879年才實現。

明治五年還有最后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采用陽歷。12月10日，在用陽歷取代陰歷之前，舉行了變更歷法的儀式。那天早上10點，在遙祭過伊勢神宮之后，天皇宣布12月3日為次年的1月1日。天皇向祖先匯報了這個變化。隨后，他來到正院，將一份解釋為何要采用陽歷的詔書遞給三條實美。

天皇首先提到使用陰歷的不便之處。為了與陽歷保持一致，陰歷需要每隔兩三年便插入一個閏月。陽歷則要準確得多，只需每隔四年增加一天；即使使用了七千年，誤差也不會超過一天。陽歷極高的準確性，正是天皇采用它的原因。[[46]](#_4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天皇沒有在詔書中提到采用陽歷的主要原因。從去年9月開始，日本政府各部門就開始按月發工資。如果按照陰歷，那些有閏月的年份政府將不得不發十三次工資——政府顯然不愿意這么做。

12月3日的第二天變成了1月2日，這使一些日本人覺得失去了生活中一個寶貴的環節，盡管陰歷不再受到官方認可，其使用卻延續了一些年，特別是在舉行宗教儀式時。不過，不管怎么說，在大多數情況下，日本現在正與西方發達國家生活在同一時間框架內了。

1. [[1]](#_1_23) 亞歷山大·德·許布納男爵在會見明治天皇后寫道，“根據禮儀，皇帝在和我說話時，只是在牙齒間發出模糊的聲音，幾乎聽不清。”（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2, p. 16）。天皇第一次接見巴夏禮爵士時在場的英國大使米特福德寫道，“不出所料，對于一個剛離開深閨不久的人而言，由于年紀太小再加上情況新奇，天皇顯得有些害羞。幾乎聽不到他說什么，于是他的話便由在他右手邊的親王重復并由伊藤俊輔翻譯”（Hugh Cortazzi, Mitford’"aid-6JP"p. 121）。弗蘭克·布林克利（Frank Brinkley）回憶說他和其他英國人“向他表達了最崇高的敬意，但是陛下坐得筆直，連眼睛也不眨一下。他一句話也沒說……一些人懷疑他是不是個人偶，他的樣子太像神了”。（“Sentei heika,” p. 46）。

1. [[2]](#_2_23) William Elliot Griffis, 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p. 226.

1. [[3]](#_3_23) 當時在倫敦的木戶從紐約的報紙上得知朝鮮扣留了一名日本特使，并遣返了其他人。他在日記中寫道，“那個國家的愚蠢和頑固真是讓人惡心”；“另外，我們與西方的貿易正開始活躍起來，我們緊鄰的那些亞洲國家必需成功地向文明進化，否則我們將無法完全實現我們將來的目標。”他暗示，如果朝鮮不愿與時俱進，將會損害到日本的利益，日本可能唯有訴諸戰爭（1872年9月1日條，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2, p. 206）。

1. [[4]](#_4_23) “中國”指瀨戶內海的北岸（廣島、岡山等）；“西國”是這個時期九州的別稱。

1. [[5]](#_5_23) 為了利用漲潮的高水位，天皇一行人凌晨3點便離開皇宮，趕往濱離宮，在那里登上“龍驤”號軍艦，駛往浦賀，并于當天夜里抵達浦賀。“龍驤”號那天晚上停泊在浦賀灣內，于第二天一早駛回濱離宮。

1. [[6]](#_6_23)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74頁。

1. [[7]](#_7_23) 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6頁。

1. [[8]](#_8_23) 例如，休·科爾塔齊（Hugh Cortazzi）引用了1872年8月15日《遠東》（The Far East）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他的步伐僵硬，就像靴子不合腳一樣”。（Victorians in Japan , p. 81）1873年11月見過天皇的Lady Brassey寫道，“他很年輕，長得并不好看，一幅悶悶不樂的樣子，兩條腿則好像不屬于他似的——我猜測是太少走路以及長時間坐在腳后跟上的緣故；因為直到近幾年人們還認為天皇太過神圣，而不允許他把腳放到地上”（“Sentei heika,” p. 333）。

1. [[9]](#_9_23) 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9頁。

1. [[10]](#_10_23) 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10頁。

1. [[11]](#_11_23) Peter Burke,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 p. 11.

1. [[12]](#_12_23) Peter Burke,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 p. 44。

1. [[13]](#_13_23) 德·許布納男爵這樣描寫自己和明治見面的情況，“天皇在等著我們上前時，像雕像一樣站在那里”（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2, p. 15）。

1. [[14]](#_14_23) Peter Burke,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 p. 180.

1. [[15]](#_15_22) Peter Burke,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 p. 61。

1. [[16]](#_16_22) Norbert Elias,The Court Society , p. 126.

1. [[17]](#_17_22) 出自俄羅斯歷史的一個典故。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將金官至陸軍元帥，為了使女皇對自己領地的富足留下良好印象，波將金不惜工本，在女皇的必經之路旁邊建起一批豪華的假村莊。于是，波將金村成為弄虛作假，做表面文章的代名詞。——譯注。

1. [[18]](#_18_2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75頁、第683頁。不消說，御所里面的人以前從未坐過椅子。

1. [[19]](#_19_2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91頁上對這件衣服有更詳細的描繪：衣服的材質是黑色羊毛呢，胸前用金線繡有菊花和葉子的形狀，后腰上繡有一只鳳凰。褲子同樣是黑色羊毛呢做的，鑲有一條一寸寬的絳帶。黑天鵝絨做的三角帽，兩側各用金線繡著一只鳳凰，邊緣鑲有金色的絳帶。“鉤子”似乎指上衣的掛扣。5月13日，一名歐洲裁縫從橫濱來，給天皇量了做西服的尺寸。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讓別人給他量體裁衣（《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66頁），見《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11頁。

1. [[20]](#_20_2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11頁。

1. [[21]](#_21_2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91頁。

1. [[22]](#_22_19) 關于這一點，《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95頁的記載顯得非常謹慎：“據說現代的‘萬歲’口號始于1889年憲法頒布時。這里基于當時的記錄而說大阪市民高呼‘萬歲’，但是民眾實際上有沒有喊‘萬歲’，抑或只是記錄使用了‘高呼萬歲’這個常見于日本和中國典籍，用以表達快樂的詞語，我們不知道。還有一份資料顯示1870年9月上午11點，在海軍慶祝天皇生日的儀式上，每個人都按照官階高低排列站在甲板上，齊聲高呼‘萬歲’”。

1. [[23]](#_23_1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96頁。

1. [[24]](#_24_17) 仁孝天皇的三女兒淑子內親王是桂宮家族的成員；她1881年去世，這個顯赫的親王家族也隨之斷絕。

1. [[25]](#_25_17) 一種紡織品的名稱，為日本的傳統工藝品，因出產于京都的西陣地區而得名。——譯注

1. [[26]](#_26_17)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00頁。

1. [[27]](#_27_16)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11頁。

1. [[28]](#_28_14)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50頁。

1. [[29]](#_29_14)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19頁。

1. [[30]](#_30_14) 我想起了菲利門和巴烏希斯（Philemon and Baucis），但同時也想起了發生在日本的一些例子，比如喜歡微服私訪的最明寺入道時賴在破敗的村舍受到的款待。

1. [[31]](#_31_1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26頁進一步說道，其他一些天皇到過的地方也有類似的報道，以此證明民眾對皇室深深的崇拜之情。

1. [[32]](#_32_1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27—728頁。天皇知道西鄉隆盛有卓越的領導才能，回到東京后不久就任命他為元帥（第733頁）。

1. [[33]](#_33_1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35—737頁。

1. [[34]](#_34_1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44—747頁。這種感激之情將使1873年2月日本在與中國的談判中受益。

1. [[35]](#_35_9) 毛利敏彥，《明治六年政変》，第40頁。

1. [[36]](#_36_9) 關于狄金斯研究日本文學的描述，見Kawamura Hatsue,F. V. Dickins 。1866年狄金斯翻譯的詩集《百人一首》出版。

1. [[37]](#_37_7) 毛利敏彥，《明治六年政変》，第52—54頁。

1. [[38]](#_38_4) 原文見《明治六年政変》，第54—55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67—768頁。

1. [[39]](#_39_3) 關于倭館的簡要介紹以及它存在的理由，見上垣外憲一，《雨森芳洲》，第90—93頁。更為詳細的介紹見姜范錫，《征韓論政変》，第16—19頁。姜對倭館和出島上的荷蘭“蘭館”做了有趣的對比。

1. [[40]](#_40_3) 1869年1月，擔任日本政府特使的對馬藩高級官員樋口鐵四郎通知朝鮮政府，天皇已經恢復統治，幕府統治的時代已經結束（《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944頁；亦見姜范錫，《征韓論政変》，第11頁）。

1. [[41]](#_41_3) 飛鳥井雅道，《西郷隆盛は平和主義だったか》，第109頁。他說從朝鮮的立場來看，明治政府用武力推翻了德川幕府，因此是個篡位者。朝鮮還認為新政府未經許可便使用 “皇”和“敕”這樣的字眼不太合適，這些字眼只有中國皇帝才能使用。木戶孝允在日記中寫道，他贊成派特使到朝鮮去質問他們的無禮。“如果他們不認錯，我們就公開他們行為，進攻他們的領土，將我們神圣的領土跨海擴展到他們那里”（ 1869年1月26日的日記，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 1, p. 167）。亦可見姜范錫，《征韓論政変》，第11頁 。

1. [[42]](#_42_3)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41頁。

1. [[43]](#_43_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42頁。他一共提了七條建議，包括讓貿易站那些非必要的日本官員返回日本、中斷對馬每年一次的航船以及將漂流過來的朝鮮人送回等問題。

1. [[44]](#_44_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55頁。

1. [[45]](#_45_2) 詔書的原文見《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56頁。開篇便宣布天皇是萬世一系帝祚的繼承人，廣袤領土都在他的統治之下。詔書接著便解釋為何琉球王受到如此尊重。他的國家與日本有著相同的習俗和語言，而且長期以來向薩摩朝貢。國王自己也已證實了他的忠誠。最后，詔書命令“藩王”充分重視自己的藩國的責任，并協助皇室。

1. [[46]](#_46_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81頁。詔書的原文見遠山茂樹編，《天皇と華族》，第31—32頁。與此同時，一天被均勻地劃分為二十四小時，而以前日本的白天和黑夜的時長并不相同。

# 第二十四章 “征韓”論爭



明治六年（1873）正月初一的迎新儀式，在某些方面是沒有先例的。首先，新年依照陽歷，而不是陰歷計算。這意味著詩人們在創作迎新詩歌時將無法像過去那樣提到山間的霧氣、溫暖的春風、小溪的融雪等新年景象：1月1日天氣還太冷，無法看到春天的預兆。明治天皇前幾年創作的迎新詩中有諸如“拂過海岸的春風多么柔和”、“暖風吹拂”和“大地在春風的吹拂下一天天變軟”這樣的句子，今年他創作的迎新詩則完全沒有聯想到大自然。

這些慶祝活動在其他方面也與傳統背道而馳。政府中的外國雇員首次被允許向天皇祝賀新年。1月10日，政府又開了一個先例，允許外國公使的妻子陪同丈夫向天皇和皇后祝賀新年。[[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1月7日，天皇和皇后一起上了開年的第一課，內容包括元田永孚講的《大學》第一章。天皇新的學習計劃已經擬好。每個月除了有六天休息外，要上十二次日本歷史課和另外十二次的《西國立志編》。明治這一年的學習計劃試著平衡傳統的東方學說和西方的實踐指南。現代讀者可能會感到奇怪，被選來代表西方的竟然是斯邁爾斯的暢銷書，而不是重要的歷史或哲學著作，但是這個時期日本人從西方尋找的不是智慧，而是實用技能。除了這些，天皇每月還要上三次詩歌創作課。除了休息日，天皇每天還要學習德語。此外，他還要學習書法和日文語法。[[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1872年底決定的征兵令于1月10日正式頒布。年滿二十歲且身體健康的男子將應征入伍，加入陸軍或者海軍。1月22日，規定尼姑可以蓄發、吃肉、結婚或者還俗。2月1日，天皇去騎馬，身穿西服，配備著西式的馬具裝備。2月8日，實行新的郵資制度，國內的信件互寄無論距離遠近資費統一。2月12日，第一家工業企業成立，是一家制造西式紙張的公司。3月14日，停止宮中的佛教儀式，代之以神道教的儀式。宮中供奉的歷代天皇的靈位和佛像將全部搬到京都的泉涌寺。

這一系列事件典型地反映了那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每一件事都影響著許多人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同時也預示著更大的改革。不過，1873年之所以成為日本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年，與其說是由于這類國內事件，還不如說是由于與外國的關系不斷演變。

外交上的第一個重大事件是，2月27日天皇頒布諭旨，任命外務卿副島種臣為出使中國的特命全權大使。副島的使命是交換兩國最近批準的和約的有關文書，并呈上明治天皇寫給光緒皇帝祝賀其親政和大婚的賀信。[[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副島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任務。1873年3月9日，天皇下旨命令他與清朝討論如何懲罰臺灣土著的問題。1871年，臺灣土著殺死了五十四名因船舶失事而漂流到臺灣的沖繩人。[[4]](#_4__Zhe_Fen__Shang_Yu__Yuan_Wen)天皇關心的背后，隱含著一個他預感到的清朝主張，即沖繩人并非日本國民。眾所周知，去年琉球國王已經被授予藩王的稱號，副島也正式通知了東京的外國代表，稱日本已經對這些島嶼全權負責，但是清朝還沒有放棄他們的宗主權。在信中天皇間接挑戰了清朝，因為后者聲稱對整個臺灣島擁有主權，而只有通過懲罰犯法的土著才能證明這一點。[[5]](#_5__Fu_Dao_De_Xiang_Xi_Ren_Wu_Sh)

派使節到中國去的計劃，源于1872年10月副島和美國公使查爾斯·德隆以及美國將軍查爾斯·勒讓德（Charles LeGendre）的一次討論。勒讓德是美國駐廈門（面對臺灣海峽的一個港口）領事，非常熟悉土著問題。對副島來說非常幸運的是，勒讓德返回美國途中剛好經過橫濱。副島詢問他的意見時，勒讓德說，日本用兩千人就可輕易地占領臺灣，他還提供了臺灣的地圖和照片。副高為日本擴張的前景感到興奮，表示招募一支萬人左右的軍隊也沒問題，但是首先必須試探清政府的意思。他打算給清朝一個兩難的選擇。假如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擁有全島的統治權，那么不僅要懲罰土著，還要賠償被害者的家屬。但如果他們宣布對土著的行為不負責任，那么日本將有充足的理由入侵臺灣。[[6]](#_6__Zai_Le_Rang_De_De_Jian_Yi_Xi)

3月9日，天皇向副島下達命令，同時附上一張自己的照片，這是寵愛對方的象征。3月12日，副島在勒讓德（這時他已經從美國外交部辭職，改為在日本外務省任職）和兩名翻譯官的陪同下，[[7]](#_7__Liang_Ming_Fan_Yi_Shi_Zheng)登上了“龍驤”號軍艦（前“斯通威爾·杰克遜”號），并于當天在輕巡洋艦“筑波”號的護衛下從橫濱起航。讓副島乘坐弱小的日本海軍中威力最大的一艘軍艦出訪中國，顯然是為了引起中國人的注意。[[8]](#_8__Gen_Ju_Fu_Dao_De_Shuo_Fa__Zh)這是日本軍艦第一次造訪外國。[[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副島特別有資格出使中國。他的書法是明治政府所有官員中最好的，而且能嫻熟地創作漢詩。這種藝術才能再加上他熟知中國歷史、哲學和風俗，使他在應對清朝官員時游刃有余。清政府感激他釋放了被扣押在“瑪利亞·路斯”號上的二百三十二名中國勞工，這對他的出使也非常有利。

在去中國的途中，“龍驤”號和“筑波”號停靠了鹿兒島，副島利用這個機會拜訪了西鄉隆盛。[[10]](#_10____Fu_Dao_Bo_Jing_Li_Ou_Tan)隨后兩艘軍艦又停靠了長崎。3月31日，軍艦抵達上海，去年11月曾在日本受到熱情接待的俄國大公阿列克謝（Alexis）設宴款待了副島。4月8日，兩艘船從上海起航前往天津，但由于導航出了問題，直到4月20日才到達。兩天后，副島來到直隸總督李鴻章的辦公室，李鴻章衷心地感謝他解救了“瑪利亞·路斯”號上的中國人。副島與李鴻章交換了前一年批準的友好通商條約。但是，當時在場的勒讓德寫道，李鴻章對待副島的態度“冷淡”，“對我幾乎可以說是粗魯”。當副島向李鴻章介紹勒讓德時，李問了句勒讓德是誰。副島告知后，李鴻章回答道：“我們此前已經簽訂過很多和約，無需外國人告訴我們怎么做。難道有什么特別的理由嗎？”[[11]](#_11__McWilliamsYuan_Yin_Mei_Guo)李鴻章還批評了副島使團成員身上穿的西裝，對此副島回應道：

閣下，洋服或許不美，但極其便利，特別是在軍艦上。要是傳統的衣服，無論如何也無法操縱索具或者槍炮。更換服裝以來，一切順利。事實上，渡我們至清朝的裝甲艦和輕型巡洋艦上一個外國人也沒有。[[12]](#_12__McWilliamsYuan_Yin_Le_Rang)

這是副島第一次嘗到清朝官員的傲慢，但是他卻通過對比日本的現代化和中國人的頑固保守，將李鴻章的批評扭轉為日本的優勢。[[13]](#_13__McWilliamsYuan_Yin_Le_1873N)第二天，副島和李鴻章進行了一次更為親切的會面，他們詳細地討論了中日關系。副島充分利用自己的中國古典文學知識，批評中國人對外國的鄙視和傲慢態度，說這不符合古代圣賢的教導。他的批評似乎深深打動了對方：李鴻章在隨后寫給下屬的信中說，日本自從西化以后已經變得強大，清朝現在已經落后了。

5月5日，副島離開天津，兩天后抵達北京。他到達后發現，各國公使們就覲見皇帝的禮儀問題和清朝宮廷膠著“已百余日之久”。他們堅持認為，清朝宮廷應該按照其他地方的慣例，皇帝站起來接待外國貴賓，然而宮廷卻希望貴賓遵照中國的傳統，在坐著的皇帝面前下跪。雙方看來都不肯讓步。中國人自滿族統治最強盛的17世紀——康熙皇帝的時代——就要求歐洲人在皇帝的面前下跪。歐洲人當然非常討厭下跪。康熙在回應俄國使節的抱怨時說，俄國人在中國，就應該遵守中國人的規矩。反過來，如果中國使節到了俄國，他也會遵守俄國的規矩。俄國人最后屈服了。在面見皇帝的那天在廊檐前下跪，而皇帝則高傲地安坐在寶座上。俄國人沒有辦法，只好按要求行了三跪九叩之禮。[[14]](#_14__Zhe_Fan_Miao_Shu_Yuan_Zi)

令副島感到憤怒的是，清朝沒有意識到19世紀的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依然認為自己是中華——世界的中心——并要求外國的外交官屈辱地遵照康熙時定下的禮節。然而，他的回憶錄中沒有提到不久前日本宮廷也是類似的狀況。1872年4月，代理英國公使沃森來到東京，要求會見天皇并奉上國書。沃森表示希望日本宮廷能改變接待外國人的傳統方式，要求天皇按照西方的一般習慣，站著接待外交官，而不是坐在玉座上，以示互相尊重。當時身為外務卿的副島嚴詞拒絕了這個請求，說“外國使節者，入其國從其禮”——而這恰恰就是令副島惱火的中國宮廷的態度。副島告訴代理英國公使，如果他堅持天皇應該站著接待，就永遠見不到天皇。[[15]](#_15__Zhe_Fan_Miao_Shu_Yuan_Zi)沃森一言不發地走了。

一段時間之后，俄國使節葉甫根尼·比措夫來日本討論薩哈林島的歸屬問題，并要求面見天皇。他對副島說，由天皇決定是站著還是坐著接見他。副島很喜歡這種息事寧人的態度，安排了兩人會面。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明治這次站著接待了俄國人。英國公使知道后，為自己之前的不知變通感到尷尬，請求覲見天皇，并說這一次天皇以什么方式接待自己都無所謂。沃森獲準覲見天皇，這一次明治又站著接見了外國使節。這是他自己的決定。明治顯然希望證明自己愿意遵守國際禮儀規范，只要外國使節不再要求他按照他們的方式行事。據說因為這件事，沃森成了日本的忠實朋友。[[16]](#_16__Zhe_Fan_Miao_Shu_Yuan_Zi)

不管副島在日本表現如何，他還是不愿像歐洲人那樣，按照中國的習慣在覲見皇帝時行叩頭禮。他確信自己的國家比中國先進得多，因此日本人來到清朝宮廷，不必再誠惶誠恐。

5月24日，副島到總理衙門拜見清朝官員，其間，他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像他這樣的大忙人需要等這么久才能覲見皇帝。一位官員解釋說恭親王病了（在中國和東亞其他地區，生病是不見客的一個無懈可擊的借口），并說清政府正在研究歐洲和美國使節提交的接見禮儀。副島問，為什么清朝覺得有必要在中國禮儀的問題上考慮外國人的意見，并以日本的做法作為對比：“如我國，先自定接使之禮節，以待來使。故凡國使今日到京，明日遂得覲謁。不曾容異議，以昭我君權。”[[17]](#_17___Qing_Guo_tonoXiu_Hao_Tiao)

副島拿出一把折扇，上面用文言寫著他認為皇帝應該如何接見外國使節的簡要觀點。副島用儒家術語引出政府首腦和來訪使節之間的關系：“此即朋友之交。”誠實和互敬應該是會面的基調。禮節應該按照使節自己國家的標準，而不是接待國宮廷的標準。這個觀點正好和他在日本時的態度相反。

副島在與清朝官員會談時，引用了中國典籍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例如，在痛斥中國人對外國人的鄙夷態度時，他說：“夫夷亦人國也，以君子待，即君子之為，以蠻夷待，即蠻夷之為。”他諷刺了中國人沒有（像他那樣）依賴自己的古老智慧。[[18]](#_18___Qing_Guo_tonoXiu_Hao_Tiao)

6月1日那天，看似已經痊愈的恭親王拜訪了副島。為了顯示這名熟悉中國典籍的日本人與那些無知的歐洲人不同，恭親王說，副島肯定不會反對按規定的儀式向皇帝行禮。副島聽后大怒，回答說，身為明治天皇的代表，自己在清朝皇帝面前下跪有損尊嚴。第二天，總理衙門宣布同意西方使節的提議，以五鞠躬代替傳統的叩頭儀式。副島寫信回復道，自己無意遵守這項新規。如果必須在皇帝面前鞠躬，他希望皇帝也向自己鞠躬。勒讓德勸副島不要把信發出去，擔心這只會使中國人變得更加固執，但是副島堅持這么做，他預測自己的極端言辭會起作用。[[19]](#_19___Qing_Guo_tonoXiu_Hao_Tiao)

談判仍在繼續。副島決心在接見時與清朝皇帝平起平坐（以自己大使的身份）；他還希望被優先接見，因為那些西方外交官只有公使職位。副島的這兩個要求一開始遭到中國人和西方外交官的拒絕，但是最后他卻贏了。副島獲得了這項榮譽，因為他的級別非常高，甚至那些西方人也向他表示祝賀。最終，副島先于任何一名其他外交官，得到了皇帝的私下接見。

到目前為止，副島尚未提及來清朝的主要任務——對臺灣土著的懲罰問題。6月21日，他派副使柳原前光（1850—1894）和翻譯鄭永寧到總理衙門去商討臺灣土著、中國與朝鮮的關系性質等問題。這時對朝鮮的關注，說明他已在考慮懲罰朝鮮，以報復其對日本使節的無禮。

在討論臺灣問題時，柳原強調清朝顯然無力控制土著居民。他指出臺灣的本來所屬，并說它后來落入荷蘭人手里，再后來被國姓爺（鄭成功）掌管。清朝從未領有超過一半的臺灣，沒有管理好延伸至島嶼東部的土著居民，而這些人兩年前殺害了幾十個遭遇海難的日本人。日本打算派一支遠征軍去討伐這些土著，然而由于跟清域近，日本認為還是將自己的意圖通知清朝比較好。

清朝回應說，他們聽說過琉球臣民被殺的事，但他們不是日本人。清朝官員把那些幸存者救了出來，并送他們回國——琉球王國。柳原反對說，自“中葉以降”（中世紀以后）這些島嶼就屬于薩摩藩，沖繩人作為日本的臣民，理應受到日本政府的保護。[[20]](#_20____Fu_Dao_Bo_Jing_Li_Ou_Tan)

在隨后的討論中，清朝承認自己的政治統治并未深入臺灣的每個地方，那些“生蕃”與那些接受清朝統治的“熟蕃”不同。這份聲明被日本人用來作為1874年4月攻擊臺灣土著的理由。

至于朝鮮，清朝稱，盡管其國王受到清朝皇帝冊封，但國內事務和戰爭與否問題都由朝鮮人自己決定。這番說法使副島深信，假如日本進攻朝鮮，清朝不會介入。

出使的最后，副島會見了皇帝。[[21]](#_21__Ta_Shi_Zi_1793Nian_Yi_Lai_D)他沒有下跪，而是鞠了三個躬。會面結束后，皇帝集體接見了俄國、英國、美國、法國和荷蘭的公使。盡管他們的國書幾乎二十年前就已出具，但是直到現在才得以呈上，這很大程度上還得感謝副島。

會面結束后，各國公使接到邀請，參加一個按中國習俗舉辦的正式宴會，然而天氣太熱，西方公使們私下里決定不去赴宴。當清朝問副島是否也不想去時，副島（他非常熟悉中國禮儀）“然不否，欣然赴宴”。這使得清朝的親王和官員對他的印象很好，他們認為謙恭有禮的副島和那些無禮地拒絕皇帝邀請的西方公使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這件事也沒有使歐洲人對副島疏遠起來。副島離開北京前，英國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爵士登門拜訪了副島，并代表所有外國外交官，感謝他解決了皇帝如何接見這個曠日持久且妨礙交流的問題。[[22]](#_22__Ju_Shi_Jin___Zhong_Cun_Hong)

中國人也對他的付出表示感謝。當副島的船離開大沽（天津的港口）時，港口鳴放了二十一響禮炮，這是中國人首次在自己的港口對一名外國人鳴炮致敬。[[23]](#_23____Fu_Dao_Bo_Jing_Li_Ou_Tan)另外，副島回國途中，在天津短暫逗留期間，盡管李鴻章還在為弟弟服孝，但仍然換掉喪服，到副島下榻的旅館和他會面。兩人談了幾個小時。李鴻章還交給副島一封信，稱贊他對“瑪利亞·路斯”號事件的處理，并希望同處東方的兩國，世代友好下去。[[24]](#_24__Xin_De_Yuan_Wen_Jian___Fu_D)

副島凱旋日本。他深信，日本現在可以擴土到朝鮮半島和臺灣島。副島抵達橫濱之前停靠的每一站，都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他在長崎時寫的一首漢詩體現了回國的喜悅之情：

才入本朝風氣醇，

山川秀麗自然真。

卻思曾在北京日，

滿地風沙沒了人。[[25]](#_25__Ju_Shi_Jin___Zhong_Cun_Hong_1)

7月27日，副島覲見天皇，呈上自己在中國簽署的條約及清朝宮廷贈送的禮物。天皇慰勞副島，賜予酒肴。

在這期間，日本和朝鮮的關系也在逐步惡化。日本希望與朝鮮開展貿易和外交關系，然而卻被朝鮮高傲地拒絕，為此感到憤怒。朝鮮的實際統治者大院君[[26]](#_26___Da_Yuan_Jun__Yi_Ban_Shi_Ge)決心不對西方開放，并認為日本發生的變化非常可疑。他堅持兩國之間的關系應該按照三百年來的慣例進行。

7月，負責倭館事務的當地官員發現，有一些并非來自對馬藩的日本商人進出倭館，危機隨之爆發。朝鮮人對此極為不滿，他們在倭館門口張貼“潛商禁止之令”，[[27]](#_27__Zhe_Fen_Wen_Jian_Bei_Ri_Ben)強烈譴責這種違背三百年來傳統的行為。他們還對這些日本人外表上的改變——剪西式頭發，穿西式服裝——表示驚愕，并宣布“此則不謂日本之人”。他們堅持認為，以對馬藩人士作為中間人的兩國傳統貿易方式不可改變，來自日本其他島嶼的人不得參與貿易，這些人來到倭館說明日本已經變成“無法之國”。他們責令日本人向上司轉達這些話，以免將來后悔不及。[[28]](#_28__Wan_Zheng_De_Yuan_Wen_Jian)

學者們指出，朝鮮并無辱罵全體日本人之意，只是特別針對那些到倭館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的非法行為，因為他們想擺脫傳統的朝日貿易框架。[[29]](#_29__Jiang_Fan_Xi____Zheng_Han_L)這一觀點令人信服，但當時的日本人可不這么看。對日本人尊嚴的明顯侮辱，特別是 “無法之國”這個詞引起了全日本的騷動，呼吁懲罰朝鮮的聲音高漲。天皇得知這些情況后非常苦惱，下令三條實美著手處理朝鮮事件。[[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三條在內閣[[31]](#_31__Ci_Chu_De_Nei_Ge_Shi_Ming_Z)會議上提交報告，詳細描述日朝之間發生的所有令人惱火的沖突。1871年，政府派使節前往釜山，意欲通知朝鮮廢藩置縣的消息，并希望與相關官員會面，討論這個變化可能對兩國關系造成的影響，然而日本使節沒能見到朝鮮方面負責倭館事務的訓導。訓導不下二十次以生病為由拒絕見日本人。后來，訓導去了首都，回來后回復說，日本的會面請求必須要等官方開會討論后才能決定。日本人問需要等多長時間，得到的答復是六到十年。[[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三條還說，最近一次事件則是倭館門口豎立的侮辱性牌子。

三條說，以自己所見，不知道日本將來可能還會受到什么侮辱。自維新以來日本一直努力想與朝鮮建立睦鄰友好關系，結果卻受到對方的羞辱。日本應該派一小隊陸軍和海軍保護在朝鮮的日本僑民，必要的話可以增援。三條最后請求議會批準自己的提議。

西鄉隆盛首先發言。他反對出兵，認為這樣的行動肯定會讓朝鮮恐懼，懷疑這是日本企圖吞并朝鮮的預兆，而這并非日本的原意。政府應該派一名全權公使去曉諭他們。如果朝鮮不聽并辱罵使節，他們的罪過將昭然于世，到那時再出兵攻打他們。末了他提議由自己擔任特使。[[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西鄉的提議得到了大多數政府領導的支持。不過一些關鍵人物正在國外，還有些人沒有參加朝廷會議。[[34]](#_34__Fu_Dao_Dang_Shi_Huan_Mei_Yo)到了這個時候，三條實美像往常一樣，又開始猶豫起來。他建議打電報給巖倉，讓他立刻回來參加討論。但是，8月3日西鄉給三條寫信，要他堅定地執行朝會的決議。8月16日，沒有收到回信的西鄉親自登門拜訪三條，措辭強烈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如果等巖倉回來，將錯失一次寶貴的行動機會。他非常肯定地認為，日本特使一到朝鮮就會被殺死，只有那時才可出兵討伐罪犯。他還說，近年日本國內也出現了不滿的跡象，可能會導致騷亂，這時應該將累積的憤怒情緒轉向國外，以揚日本國威于海外。[[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三條意識到自己無法說服西鄉，便于8月17日召集了一次朝會，會議決定按照西鄉提議的方法，派一名特使到朝鮮去。只有黑田清隆反對這么做，他認為處理與俄國的薩哈林島爭端更為急迫。此外，如果派特使去朝鮮，他將代替西鄉前往。[[36]](#_3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8月初,為了躲避盛夏的酷暑，天皇和皇后離開東京到箱根的宮下去。天皇后來不愿以任何私人原因離開首都，這次卻罕見地向脆弱的意志做出讓步，可見天氣炎熱程度。天皇很喜歡周圍的環境和食物，特別是河里抓來的魚（他不喜歡吃海魚）和剛挖的芋頭。[[37]](#_3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然而，他在這個時候離開首都卻有點不太方便。在接下來的商議中，希望咨詢天皇意見的政府官員必須在這段當時并不算短的路途上來回奔波。8月19日，三條來到宮下，一直待到23日，每天都去拜見天皇。盡管會議已同意派西鄉去朝鮮，但三條仍然猶豫不決，希望巖倉能及時趕回來提些建議。我們不知道三條和天皇討論了些什么，但是最后天皇要求政府等巖倉回來后慎重討論是否派西鄉出使朝鮮后，再向自己匯報。三條匆忙回到東京，將天皇的要求轉達給西鄉。

很難判斷到底是明治自己要求等巖倉回來，還是三條在見面時說服了天皇。假如確實是天皇下的決定，那么這是他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政治決定。當時許多日本人都熱切地盼望和朝鮮開戰，但這對兩個國家來說都將是場災難。即便撇開道德問題和侵略將對朝鮮人民造成的可怕災難不說，日本的軍事力量還不夠強大，并沒有十足的把握打一場速戰速決的勝仗。對雙方來說戰爭的成本可能都太高了。[[38]](#_38__Jiang_Fan_Xi____Zheng_Han_L)

7月29日至8月17日期間，西鄉給板垣寫了五封信。一開始他反對板垣提出的立刻出兵朝鮮的計劃。西鄉認為軍隊應該用來保衛日本，防備俄國從北部入侵。沒有足夠的挑釁行為便入侵朝鮮，會惹來國際輿論批評，最好還是先派一名特使去。西鄉在第一封信的末尾寫道：“如公然遣使，則應被殺，伏請遣余前去。雖不如副島君優秀，赴死之事定可完成。”[[39]](#_39__Ryusaku_Tsunoda__Wm__Theodo)

在8月14日的信中，西鄉這樣寫道：

如果我們不抓住這次機會發動戰爭，將很難再找到同樣的機會。我們如此溫柔地引誘朝鮮人，肯定能使他們為我們提供一個發動戰爭的機會。但是，如果您認為我在戰前就死去屬于不幸，或者有任何姑息的想法，那么這個計劃注定將失敗。死終究會到來，唯一的區別只在于戰前還是戰后而已。您對我一直有很濃的深情厚誼，如果盡力促成此事，那么即便死去，我也會深深地感激您。[[40]](#_40__Ryusaku_Tsunoda__Wm__Theodo)

這些信反復出現“死”字，使某個歷史學家認為與其說西鄉渴望找到解決朝鮮問題的方法，還不如說他渴望赴死。6月29日，西鄉寫信給舅舅椎原與三次，說他自5月初以來一直受到疾病的折磨。傳統的和醫完全沒有效果，他已經放棄希望，覺得自己的病可能已經治不好了。天皇曾派自己的私人醫生和一名德國醫生為西鄉診治，暫時緩解他的痛苦。[[41]](#_41__Jiang_Fan_Xi____Zheng_Han_L)8月23日，西鄉寫給板垣的信中用到了“視死如歸”這個成語。他在后文中承諾不會匆忙赴死，但他似乎決心無論如何都要死在朝鮮，也許因為那看起來比毫無意義地死于疾病更勝一籌。[[42]](#_42__Jiang_Fan_Xi____Zheng_Han_L)

從西鄉的信及其在朝會上的發言可以明顯地看出，他認為自己死在朝鮮能為日本提供一個發動戰爭的合理借口。然而，一些學者希望洗雪西鄉好戰的罪名，認為他其實是個愛好和平的人，希望自己能夠說服朝鮮向日本妥協。西鄉主張，被派往朝鮮的日本使者應該身穿宮廷的衣服，而且不帶一兵一卒和一艘軍艦。這些被認為是他愛好和平的證明。但是，除非西鄉在給板垣的信中故意歪曲了自己的真實想法（一名學者正是這么認為的[[43]](#_43__Mao_Li_Shou_Yan____Ming_Zhi)），否則他顯然希望發動戰爭。死于朝鮮不僅使戰爭成為可能，還能給他帶來為國捐軀的滿足感。對于那些痛恨失去地位，準備叛亂的武士階層而言，朝鮮戰爭還可為他們提供一個抗擊外國的日本士兵身份。西鄉警告說，除非立刻采取行動，否則將喪失寶貴的機會，然而今天大多數人肯定很感激當年他的計劃受挫。[[44]](#_44__Ru_Guo_Bu_Shi_Ri_Ben_Ren__J)

8月31日，天皇為了迎接一周前抵達橫濱的熱那亞公爵——意大利國王的侄子而回到東京。9月9日，天皇接見了琉球國王尚泰，9月12日，接見了勒讓德將軍。9月13日，巖倉具視經過二十一個月，游歷了十二個國家之后回到東京。

巖倉回來并不能平息征韓論的呼聲。10月15日，朝議又一次投票，決定派西鄉去朝鮮。但是反對該計劃的聲音正在不斷增大。木戶孝允在9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

四點，至三條公處，談論西鄉參議所提出兵臺灣討伐朝鮮之建言云云。朝廷已欲決議，不堪深憂。今萬民困苦，新令履下，民益迷惑，去年來蜂起數次，政府以為常。現今語方略，無急于治內政，云義務，無急于保護唐太（樺太）人民……制有罪何必論時遲速然？現今以治內政為第一著。[[45]](#_45__1873Nian_9Yue_3Ri_De_Ri_Ji)

木戶提到的內政和外交上的利益沖突，正是后來國家政策辯論的焦點。在木戶和巖倉使團的其他成員看來，與西方主要國家相比，日本的弱點太明顯了，他們確信現在不適合與朝鮮開戰。由于木戶生病，無法參加朝會，所以巖倉成為反戰派的領導。他意識到自己需要大久保利通的支持才能阻止西鄉被派往朝鮮。大久保一再反對擔任參議，然而只有參議才能參加朝會。于是，連在國外時與大久保有過沖突的木戶也加入了說客的行列。大久保最后同意，條件是副島也必須擔任參議。[[46]](#_46__Ta_Yao_Qiu_Yi_Teng_Bo_Wen_Y)這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因為他們并非盟友，副島是堅定的征韓派。也許大久保希望，即使決定派一名使者去朝鮮，朝廷也應該派不愿送死的副島，而不是一心想去送死的西鄉。

10月12日，明治任命大久保為參議。第二天副島也接到了同樣的任命。10月14日，巖倉在朝會上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日本面臨三個問題：解決與俄國的薩哈林島爭端、懲罰臺灣土著以及派使者去朝鮮。其中，最后一個最為次要。西鄉反對說，薩哈林島和臺灣問題并不緊急，而朝鮮問題則關系到天皇和國家的聲威，因此不能拖延。假如朝廷認為薩哈林島問題最為緊迫，自己愿意出使俄國。在論爭中，雙方的陣營變得清晰起來，朝會中有四人（板垣、后藤、副島和江藤）支持西鄉，三人（大久保、大隈和大木）支持巖倉。[[47]](#_4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10月15日，三條實美宣布支持西鄉的觀點，似乎意味著西鄉被派往朝鮮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但那天晚上三條寫信跟巖倉說，自己又改變主意了，因為擔心西鄉可能會做出什么事來。10月17日，大久保請求辭職，以此抗議西鄉一方的明顯勝利，木戶也這么做。巖倉以生病為由不參加10月18日的朝會。第二天，不知如何處理西鄉提議的三條由于精神過于緊張而不省人事了。

天皇聽說三條生病，便派自己的私人醫生以及兩名德國醫生去為他診治。那天晚些時候，天皇親自去三條家看望他。離開三條家之后，天皇來到巖倉家，他命令巖倉代替三條擔任太政大臣。10月23日，巖倉上書天皇，陳述自己反對派使節到朝鮮去的理由，并請求天皇裁定此事。巖倉在奏折中強調，日本必須加強實力，趕上國際水平，才能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維新才過了四五年，現在并不是與外國起沖突的時候。巖倉預計使節一到朝鮮，戰爭就會爆發，因此應該等日本強大之后再派使節去，否則，那只會帶來災難。[[48]](#_4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第二天，10月24日，天皇的決定下來：他支持巖倉的建議。[[49]](#_4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征韓論就這樣慢慢偃息了。西鄉及其支持者（江藤、后藤、板垣和副島）全部稱病辭去了參議之職。[[50]](#_50__Ju_Shi_He_Zhong_Cun_Shuo_Zh)天皇對此感到非常難過，然而這避免了朝鮮之戰的發生。[[51]](#_51___You_Ren_Shuo__Ji_Shi_Na_Xi)

1. [[1]](#_1_24)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9頁。只有兩位夫人進宮，她們分別是美國大使和俄國大使的妻子，然而先例卻已經確立。

1. [[2]](#_2_2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頁。這主要是指1871年9月15日皇宮人事大變動后確立的課程表（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113—114頁）。1839年山縣太華出版的《國史纂論》是一本自神武天皇至后陽成天皇的歷史散文合集，這本書由福羽美靜和元田永孚主講；《西周立志篇》由福羽美靜、加藤弘之和元田永孚主講；詩歌由三條西季知和福羽美靜主講。

1. [[3]](#_3_2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8頁。

1. [[4]](#_4_24) 這份“上諭”原文的影印件見Wayne C. McWilliams,“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41。關于諭旨的解讀，見《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8頁。

1. [[5]](#_5_24) 副島的詳細任務是天皇通過太政大臣三條實美轉達給副島的（《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8—39頁）。

1. [[6]](#_6_24) 在勒讓德的建議下，副島提出占領臺灣南部。他認為通過談判能夠達到這個目的，而且占領了臺灣南部，將有可能通過外交手段在四五年內獲得島上的其他地方（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p. 243）。

1. [[7]](#_7_24) 兩名翻譯是鄭永寧和平井希昌，他們都能說中文和英語。兩人都在外務省工作。鄭是中國人。

1. [[8]](#_8_24) 根據副島的說法，這個計劃奏效了：當兩艘軍艦到達上海時，他被中國的官員稱為“大日本將軍副島”（《副島伯経歴偶談》，第24頁）。

1. [[9]](#_9_2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9頁。1860年開到舊金山的“咸臨丸”嚴格說來并不是軍艦。

1. [[10]](#_10_24) 《副島伯経歴偶談》，第24頁。他們談話的內容并不為外人知曉。

1. [[11]](#_11_24) McWilliams援引美國駐天津領事寫給北京的美國公使鏤斐迪（Frederick Low）的信件(“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48）。

1. [[12]](#_12_24) McWilliams援引勒讓德1873年7月2日寫給巴布科克（O. E. Babcock）將軍的信（“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48）。

1. [[13]](#_13_24) McWilliams援引了1873年5月7日美國駐天津領事寫給北京的美國公使鏤的信的部分內容：“日本人看似已經把自己完全視為外國人……這不符合總督自己的東方優越性理念，他忍不住給了這些從‘日出之國’來的親戚們一巴掌，以教訓他們盲目聽從西方野蠻人的教導”（“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p. 248-249）。

1. [[14]](#_14_24) 這番描述源自《副島伯経歴偶談》第25頁。

1. [[15]](#_15_23) 這番描述源自《副島伯経歴偶談》，第17頁。

1. [[16]](#_16_23) 這番描述源自《副島伯経歴偶談》，第17—18頁。

1. [[17]](#_17_23) “清國トノ修好條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147—148頁（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56有引用。這份被McWilliams稱為《使清日記》的文書見《日本外交文書》第六卷，第132—154頁）。

1. [[18]](#_18_22) “清國トノ修好條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152頁。轉引自 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58。

1. [[19]](#_19_22) “清國トノ修好條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166頁。轉引自 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59。

1. [[20]](#_20_21) 《副島伯経歴偶談》，第29頁；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65。

1. [[21]](#_21_21) 他是自1793年以來第一位被皇帝接見的外國特使，當時被接見的是馬戛爾尼（Macartney）勛爵。

1. [[22]](#_22_20) 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158頁。

1. [[23]](#_23_20) 《副島伯経歴偶談》，第32頁。但是，根據“清國トノ修好條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 第198頁記載，他只受到十九響禮炮的禮遇。

1. [[24]](#_24_18) 信的原文見《副島伯経歴偶談》第33頁；亦見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73。

1. [[25]](#_25_18) 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159頁。

1. [[26]](#_26_18) “大院君”一般是給本身并沒有王位的在位國王父親的封號，但是卻經常用來指一個特定的人，即高宗的父親李昰應。大院君安排自己的二兒子當上了國王，但是自己卻在幕后指揮，這與日本平安時代末期的院政非常相似。

1. [[27]](#_27_17) 這份文件被日本人稱為《東萊府傳令書》。“東萊府”是倭館所在的地區。

1. [[28]](#_28_15) 完整的原文見《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5頁；亦可見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下，第45—46頁。這一卷（第1—90頁）包含了與日朝關系有關的其他文件。

1. [[29]](#_29_15) 姜范錫，《征韓論政変》，第44—46頁。文中這些商人是三井吳服店派去的。外務大臣花房義質1873年1月21日寫了封信給森山茂，信中有三名計劃到倭館去做生意的三井職員的名字（第45頁）。

1. [[30]](#_30_1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6頁。

1. [[31]](#_31_13) 此處的內閣是明治六年（1873）改革（見本書215頁）后，由太政官正院中的太政大臣和參議組成的合議機構，負責國家政事。1885年12月，確立由內閣總理大臣和內閣各部長官組成的內閣制后，這一內閣被廢止。——編注

1. [[32]](#_32_1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6頁。

1. [[33]](#_33_11)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7—118頁。

1. [[34]](#_34_11) 副島當時還沒有從中國回來參加辯論。木戶和大久保已經從歐洲回國，但是木戶（真的）生病了，無法參加朝會。大久保并非參議，因此沒有資格參加。巖倉仍在國外。贊成提議的有三名參議：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和江藤新平。

1. [[35]](#_35_10)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8頁。西鄉在8月17日寫給板垣退助的信中重復了他的這個預測，“幾乎不用我說，那（派特使去朝鮮的計劃）同時是一個意義深遠的計謀，那些希望國家發生內亂的人的注意力將轉向國外，從而對國家有利”（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 p. 657）；原文見大川信義編，《大西郷全集》第二卷，第756頁。

1. [[36]](#_36_10)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8—119頁。副島（7月23日回到日本）希望被派往朝鮮，恰好與西鄉決心成為特使的愿望起了沖突。

1. [[37]](#_37_8)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1—112頁、第114頁。天皇一行人坐火車從新橋到神奈川，再從那乘坐馬車。旅途一共花費了兩天。

1. [[38]](#_38_5) 姜范錫，《征韓論政変》，第54—55頁。朝鮮之前（1868年）擊退了法國和美國軍艦的進攻（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58—59頁、第66頁、第80—81頁）。

1. [[39]](#_39_4) 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 pp. 655-656；原文見大川信義編，《大西郷全集》第二卷，第736—738頁。

1. [[40]](#_40_4) 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 p. 656；原文見大川信義，《大西郷全集》第二卷，第751—752頁；亦可見姜范錫，《征韓論政変》，第131—132頁。

1. [[41]](#_41_4) 姜范錫，《征韓論政変》，第129頁。醫生認為是肥胖導致了西鄉的高血壓，為了減輕他的體重，給他開了一天五六次的強力瀉藥。很容易想象西鄉的身體是如何變虛弱的。

1. [[42]](#_42_4) 姜范錫，《征韓論政変》，第135—136頁、第150頁。后來，大隈重信在描述各人支持“征韓”的原因時說，西鄉是在尋找犧牲的地方（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168頁）。

1. [[43]](#_43_3) 毛利壽彥，《明治六年政変》，第117—118頁、第127—131頁。

1. [[44]](#_44_3) 如果不是日本人，就很難理解西鄉的崇高聲望。他的個性、外表以及圍繞著他的各種傳奇故事似乎使日本既原諒了他此時的態度，也原諒了他后來的反政府暴動，但是朝鮮人是否也這么崇拜他就不一定了。

1. [[45]](#_45_3) 1873年9月3日的日記，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2, pp. 370-371；亦可見姜范錫，《征韓論政変》，第167—173頁。

1. [[46]](#_46_3) 他要求伊藤博文也成為參議，但是伊藤是二等官，任命他為參議意味著越級擢升，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作為擔任參議的一個條件，大久保還要求三條和巖倉發誓，一旦下了“征韓”的決定，他們就不再搖擺不定（毛利敏彥，《明治六年政変》，第166頁）。

1. [[47]](#_47_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39—141頁；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164—65頁。盡管木戶是參議，但他缺席了會議，因此無法投票。

1. [[48]](#_48_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43—144頁、147—149頁。

1. [[49]](#_49_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50頁。

1. [[50]](#_50_2) 巨勢和中村說這四個人顧慮到外國會如何看待他們的辭職，于是決定以“某種或者其他”疾病為由請辭（《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167頁）。

1. [[51]](#_51_2)  有人說，即使那些最反對介入朝鮮的人本來也是支持征韓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在這個時候反對而已。木戶據說贊同征韓，但是認為花費太大，而日本當時銀根又太緊（毛利敏彥，《明治六年政変》，第144頁）。據說大久保并不過分擔心任命西鄉為特使（姜范錫，《征韓論政変》，第192頁），甚至告訴副島他會同意征韓，假如給他五十天的時間創立內務省的話（巨勢進、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167頁）。然而，這番大久保本質上同意征韓的見解，卻很難與他反對出兵朝鮮的詳細報告相一致（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pp. 658-662；原文見清澤洌，《外政家としての大久保利通》，第28—31頁）。

# 第二十五章 江藤新平之死



1873年跌宕起伏的政治事件注定使明治的個人生活黯然失色，不過也發生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這年5月，葉室長順（前權大納言）之女、權典侍葉室光子懷孕五個月，系上了腹帶。7月1日，為了備產，光子從宮里搬到一處屬于宮內省的房子里居住。1873年9月18日，明治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是個男嬰。但孩子是個死胎，他的母親四天后也死了。[[1]](#_1__Mei_Guo_Chuan_Zhi__Sha_Fu_Ci)

11月2日，橋本實麗之女權典侍橋本夏子也系上了腹帶。她提前搬到哥哥實梁家待產。毫無疑問，大家對即將到來的分娩極為小心，特別是剛剛發生了葉室光子母子死亡的事情。但是11月13日，夏子的子宮劇烈疼痛起來，出現子癇癥狀，并且情況迅速惡化。巖倉具視、德大寺久則等官員聽到消息立刻趕到現場。在征得天皇同意后，他們讓醫生使用人工手段分娩，然而不管醫生如何努力，嬰兒還是死了，是個女嬰。第二天橋本夏子也死了。

頭兩個孩子的夭折肯定使明治傷心不已，在得知自己垂幸過的兩名貴族女子年紀輕輕就去世時，明治可能也灑過淚，但是他對外沒有顯露出一絲的私人情感。

1873年5月5日，一場意外的災難襲擊了天皇及其家人。一名宮女不小心，沒有熄滅余燼，導致宮中的庫房發生了火災。衛士試圖撲滅大火，然而風助火勢，江戶老城內的房子一座燒過一座，最終全部都被大火吞噬。天皇和皇后安全逃離，大部分至關重要的寶貝（包括皇室的神器）都幸免于難，但是許多重要文件和其他財物都化成了灰燼。天皇暫時住在前紀州藩的住所赤坂離宮。他在那里住了超過十年，直到1889年新宮建成。

為了使離宮適于天皇居住和辦公，必須對房子做些改動，然而天皇下令一切從簡。[[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宮廷成員希望新宮能盡快建成，以代替被大火焚毀的舊宮，但是，5月18日，天皇給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下了一道諭旨，稱其他許多地方都需要用錢，自己不希望在這個國庫拮據的時刻重建宮殿。 “勿為朕之居室，損民產，苦黎庶。”[[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天皇所受的儒家教育培養了他的克己精神，使他一生都不喜歡奢侈和炫耀。

也許天皇這時最大的樂趣在于參加軍事演習。1873年4月29日，他帶領近衛兵到下總國去。那天早上6點，天皇騎馬從皇宮出發。號角聲響起，四營的士兵舉槍向他致敬，天皇揮劍，下令部隊出發。隊伍走了大約三十公里，中途只有幾次短暫的休息。到了目的地后，士兵支起了帳篷，天皇和軍官以及士兵們一起，就在帳篷里過夜。

那天夜里刮起了大風，還下起了暴雨，帳篷搖搖欲墜。陸軍元帥西鄉隆盛跑到天皇的帳篷去看他是否安全。天皇相當鎮靜地回答他說：“只是很苦惱漏雨。”[[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這個廣為流傳的故事顯示了天皇和西鄉的親密，今天的學者也樂于證實這一點。盡管天氣不佳，天皇卻認為這里是理想的演習場所，并給它起了個更適合的名字“習志野”，以彰顯其新的重要性。

6月12日，天皇觀看近衛兵在行宮的庭院內進行實彈演習，這是禁闈之內首次響起槍聲。有人提議為天皇搭建一個看臺，但天皇拒絕，坐在樹下的一張椅子上觀看了演習。

從1873年10月天皇拍的一些官方照片上，我們可以近距離一睹這個時期年輕天皇的風采。這些并非他最早的照片。我們前面已經知道，1871年11月在橫須賀海軍造船廠拍的照片里面就有他。1872年5月，天皇還讓攝影師內田九一給自己拍了一組照片，當時天皇身穿傳統的宮廷服裝，仍未留胡子。[[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這些照片是為了與巖倉使團收到的外國君主的照片交換才拍攝，應該會送給外國首腦。然而官方的說法是照片沒及時準備好，所以無法讓大久保利通（從美國回來作短暫停留）帶去華盛頓。大概大久保對這些照片感到失望，因為照片中的天皇看起來不像一名現代國家的首腦，所以決定不將它們帶往國外吧。[[6]](#_6__Guan_Yu_Zhao_Pian_He_Dang_Sh)



明治天皇

明治1873年10月8日拍的照片明顯要時尚一些，照片中他身穿日后習慣裝束的西式制服。[[7]](#_7__Dan_Shi__Tian_Huang_Ben_Ren)明治坐在一張西式椅子上，表情很不自然。旁邊的桌子上放著他的刺繡三角帽。頭發（那年3月剪的）[[8]](#_8__Zai_Yan_Jiu_Le_Qi_Ta_Jun_Zhu)中分，臉上開始有了后來照片中經常見到的髭須和胡子。他兩手交疊放在劍柄上，看起來依然年輕，然而表情非常嚴肅。[[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天皇外表上的改變，是為了使自己在世人眼中顯得像一名現代君主。皇后和皇太后也仿效他，外表上做了類似的（盡管規模要小一些）改變：1873年3月，她們停止在額頭上畫假眉毛，而且不再染黑齒。那些古老的建筑也在發生變化：1873年2月，長期以來皇室在京都的神圣住所——御所——被移交給京都市，并在第二個月被“借用”，作為博覽會的舉辦場地。一些迄今為止從未公開展示過的皇室珍寶，在這里展出了九十天。

“留守政府”[[10]](#_10__Zhao_Pian_De_Fu_Zhi_Pin__Ji)這時頒布的許多新法令似乎都是為了向世人展示，日本人愿意并有能力采用國際慣例。官方允許日本人和外國人結婚，釋放了近兩千名拒絕改變信仰的“隱匿的基督徒”，從而結束了日本與西方在這個問題上曠日持久的爭論。[[11]](#_11__Zhi_Suo_Yi_Bei_Cheng_Wei__L)

改革激起了日本人，尤其是下層人民的強烈抗議，甚至暴動。不過，1873年的第一次大暴動卻源于一次簡單的誤會。去年12月頒布的征兵令中使用了“血稅”這個詞，作為“兵役”的委婉說法。北條（岡山）縣的農民按字面理解，認為服兵役會抽走他們的血。傳聞有人在附近的村子里看到了穿白衣的醫務人員，這更加深了誤會。不久，為反對這一法案，三千多人在鄉下起義。然而，他們的首個目標卻是一個穢多（部落民）[[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村莊，他們將村子燒成了灰燼，理由是這些以前俯首帖耳的穢多，現在在新政府的鼓勵下變得盛氣凌人。他們還對為建設小學而征稅、剪西式頭發和宰牛表示強烈不滿。從這些具體的牢騷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對服兵役的誤會是暴動產生的導火索，但本質上，暴動表達的是對努力實現現代化的政府改革的憤怒。[[13]](#_13___Bu_Luo_Min__Zai_Ri_Ben_Shi)

另一次暴動發生在北海道。由于漁獲歉收，減稅的呼聲很高。黑田清隆親自平息了此次叛亂并釋放了所有被捕的人，暴動隨之平息。福岡縣的農民策劃了一次更大的起義，以反對那些過度哄抬米價的奸商。人們將導致農民歉收的旱災歸咎于貪婪的商人褻瀆了山神。6月16日暴動開始，幾天之內便席卷全縣，參加人數據說達到三十萬人。暴徒到處縱火、焚燒房屋、割斷電報線、燒毀官方名冊、殺害官員。6月20日，暴徒沖進福岡和博多市，第二天攻擊并放火焚燒了縣政府。在鄰縣士兵的幫助下，政府終于將暴亂鎮壓下去。對貪婪米商的仇恨是這次暴動產生的直接原因，但它的規模之大卻說明人民對新政權帶來的變化心懷不滿。或許可以說，在新體制變革之中被壓抑的不滿，以一種很難界定的對封建時期的懷念之情表現出來。[[14]](#_14__Guan_Yu_Zhe_Ci_Bao_Dong_De)

數百人在暴亂中喪生，但是假如好戰分子成功地發動了朝鮮戰爭，傷亡人數顯然比這還要高。幸運的是，這一年直到年底沒有再發生任何騷亂。1873年12月31日《明治天皇紀》的最后一條寫的是，供職于教育部的德國醫生西奧多·霍夫曼（Theodor Hofmann）向那年喝酒喝得很厲害的天皇建議不要喝清酒，改為喝葡萄酒，并且一頓飯不要超過一瓶。[[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可以想象，明治失去了頭兩個孩子和他們的母親，心情肯定悲傷不已，而征韓與反征韓兩派之間的斗爭可能也使他感到筋疲力盡。酒是天皇最容易獲得的一種安慰。

1874年新年伊始便有一項創新：皇后第一次與天皇一起參加祭拜。1月4日，天皇到正院聆聽各種報告和建議。即使在酗酒最厲害的時候，天皇也從未忽略過自己所認為的職責，例如參加這些會議。1874年間，天皇到正院開會的次數超過四十次。他繼續聽各位老師講課，皇后也和他一起。原來的計劃是讓明治繼續學習德語，但由于他極為厭惡而作罷。如果明治堅持下去并真正掌握了德語，那么日本宮廷的第二語言可能就是德語，而不是英語了。

1874年1月13日，巖倉具視與天皇共進晚餐之后，在回家途中被八九名刺客襲擊。遇襲的地點在赤坂。巖倉跳下馬車，跌進壕溝，然后爬到岸上的灌木叢后面躲了起來。此時，刺客被聞聲趕來的人嚇跑。[[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天皇和皇后聽到這個消息后非常震驚，雙雙到宮內省探望正在那里處理傷口的巖倉。天皇命令巖倉搬到宮里來住。1月17日，天皇得知罪犯仍未歸案，派人叫來三條實美、大久保利通和大木喬任，向他們強調事件的嚴重性，并質問為何刺客仍逍遙法外。

那天晚上抓了五名刺客，剩下的四個也很快被捉拿歸案。他們都是高知縣的武士、板垣退助的追隨者，對巖倉阻止板垣和西鄉隆盛的征韓計劃感到憤怒，于是決心除掉巖倉，希望以此改變朝廷的政策。7月9日，對這幾名犯罪未遂的刺客的判決下來了：剝奪他們的武士頭銜并斬首。[[17]](#_17__Guan_Yu_Zhe_Ci_Shi_Jian_De)

從某種意義上說，朝鮮危機已于1873年10月結束，然而這個問題繼續攪動著許多武士階層的心。大部分武士仍未在新政權下找到工作，經濟上的困窘加深了無法向鄰國報所謂的一箭之仇的憤慨。和朝鮮打一仗也許可以使他們擺脫經濟上的困境，甚至可以結束大藩之間的恩怨情仇，然而由于這種辦法未被許可，許多武士變成了暴徒。

早在1874年2月，佐賀縣的武士中就出現了暴動的跡象。一些人成立了“憂國黨”，反對政府為實現現代化而做的種種努力，提倡回歸封建制度，包括攘夷政策。這些人強調加強軍事力量的重要性，認為應該實現這個目標之后再征韓；一旦結束內部的分裂狀態，國家再次變得強大之后，日本不僅應該征服朝鮮，還應該征服中國、俄國和德國。[[18]](#_18__Jiu_Ming_Ci_Ke_Zhong_Ba_Ren)與這個政黨有聯系的人大部分都四五十歲，他們無不強烈地懷念過去幕府統治下的日子。

佐賀縣的另一個主要政黨[[19]](#_19__Guan_Yu_You_Guo_Dang_Ti_Chu)征韓黨則主要由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組成，他們大體上擁護新政權的改革，但是不滿政府沒有按照大多數議員投票決定的結果派使者到朝鮮去。征韓黨贊成在第一階段實施這項決議，然而他們的最終目的卻是征韓。這兩個政黨的許多觀點截然相反，有一點卻是相同，即他們最關心的都是武士階層的困境問題。當時，武士們無所事事，似乎找不到其他出路，非常不幸。兩個政黨都積極發展新成員，并從1874年初起，開始囤積武器和物資，為叛亂做準備。佐賀的征韓黨力量只有大約兩千人，不過他們宣稱在鹿兒島、高知等地有武士盟友。

江藤新平辭去了參議后一直留在東京，因為他接到命令，必須繼續為政府服務。江藤在征韓問題上失敗，然而作為司法部長，他繼續忙于自己提出的那些計劃。江藤的能力并沒有喪失，正是這種能力使他從最低級的武士爬到了參議這個顯赫位置。他向來支持成立議會，并堅持認為必須尊重人權，是1月17日向左院提交請愿書的簽名者之一，而這份請愿書呼吁通過普選產生立法機構。[[20]](#_20__Di_San_Ge_Zheng_Dang_Shi_Zh)但是1月13日，就在遞交請愿書的四天前，他不顧政府的命令，突然離開東京，去了佐賀。江藤應征韓黨的請求來擔任他們的領導。他不顧東京友人的警告，接受了征韓黨的請求，[[21]](#_21__Mao_Li_Min_Yan____Jiang_Ten)從而無法挽回地走向了悲劇的結局。如此睿智開明的人，怎么會跟一場考慮欠周且注定失敗的運動扯上關系，實在令人費解。[[22]](#_22__Fu_Dao_Ye_Bei_Yao_Qiu_Hui_D)

江藤告訴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自己打算回佐賀，讓那些頭腦發熱的征韓黨人冷靜下來；但是有消息稱，江藤私下里對認識的人講，他認為第二次“維新”的時機已經到來。[[23]](#_23__Zhong_Ye_Hao_Fu_He_Wo_Yi_Ya)也許江藤一開始并不想完全和政府作對，但是隨著他的到來，征韓黨人的好戰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讓他不得不那樣做。

巖倉遇刺事件之后，緊接著是佐賀縣的形勢報告。大久保對此感到震驚，決定將佐賀縣令[[24]](#_24__Zhong_Ye_Hao_Fu____Zuo_He_n)換成自己的心腹巖村高俊（1840—1915），并命令他恢復秩序。傲慢無能的巖村壓根不清楚佐賀的情況，沒有人比他更不適合這個職位。他還無意中為自己樹敵，使情況變得更糟糕。巖村在船上偶然碰到同行的薩摩武士島義勇（1822—1874），島曾擔任侍從，后來還擔任過秋田縣的權令，但得知憂國黨請他回去做領導者，就辭去了職位。島應三條實美的要求到佐賀幫助平息局面。然而，在船上的交談中，巖村侮辱佐賀士族，并要將所有的叛亂分子一網打盡。這些話激惱了島，他決心與江藤一道保衛佐賀，對付這名新權令。[[25]](#_25__Gen_Ju_1872Nian_Gong_Bu_De)

大久保一再接到佐賀沖突一觸即發的警告。他認為盡快將暴亂鎮壓下去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決定親自到九州檢查是否已采取了有效措施。2月10日，就在出發的四天前，大久保受到天皇的邀請，與他共進晚餐。2月13日，大久保在接見時，對天皇講了自己的擔憂。

就在這天，江藤與征韓黨人磋商后發布聲明，稱如果不懲罰朝鮮的膽大妄為和大不敬，日本的國威將喪失殆盡。若真縱容這類恥辱則將使日本成為其他國家鄙視的對象。他和他的政黨發誓為天皇和無數日本人雪恥，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雖然政府已經派軍阻礙他們的愿望，但是他們要學習堅持大義而同幕府對抗的長州，不得不做出這樣的行為。[[26]](#_26__Mao_Li_Min_Yan____Jiang_Ten)

第二天，2月14日，江藤最終決定進攻佐賀城的政府軍，成立新政府。他似乎相信那些心懷不滿的薩摩和土佐武士會來支持他，[[27]](#_27__Yuan_Tian_Ri_Ji____Jiang_Te)但是唯一幫助征韓黨的只有島和他的憂國黨。

2月16日凌晨，戰斗開始了。叛軍的首個目標是佐賀城堡內的縣政府辦公室。政府軍人數不多而且設備簡陋，直到2月18日才成功沖破封鎖線，逃往筑后，留下許多傷員在身后。

這是整個暴動期間叛軍取得的唯一一次勝利。江藤不久就意識到自己嚴重失算，他原以為戰斗一打響，薩摩和土佐就會派兵來助陣。[[28]](#_28__Yuan_Tian_Ri_Ji____Jiang_Te)2月17日，三條實美在給各縣長官的公告中，稱佐賀叛軍試圖在其他縣爭取征韓的支持者，然而毫不成功，連鹿兒島也全無動靜。盡管有人謠傳土佐（反政府情緒的另一溫床）將發生暴動，但這些都是無稽之談。

2月19日，大久保抵達博多，在此設立指揮部，并發布公告，呼吁摧毀佐賀叛軍。20日，政府軍攻入佐賀縣。 22日，兩軍在福岡和佐賀邊界附近交火，政府軍攻破了叛軍的防線。23日，江藤認為再抵抗下去只會增加死亡人數，于是解散了這支征韓軍隊。[[29]](#_29__You_Zheng_Ju_Xian_Shi__Jian)他說自己將到鹿兒島尋求支援。如果鹿兒島不肯出手，他將到土佐去，如果土佐也不肯相助，那么他還有另外計劃（他沒有透露這個計劃的內容）。那天夜里，江藤和七名追隨者乘坐一艘漁船，逃往鹿兒島，想請求西鄉隆盛幫助自己再發動一次叛亂。

江藤的逃跑使佐賀叛軍的士氣大跌，但他們繼續頑強抵抗。最激烈的一場戰斗發生在2月27日，政府軍再次取得了勝利。第二天晚上，素來宣稱希望死在佐賀城的島義勇和幾名親信逃到鹿兒島。他拒絕向政府軍投降。3月1日，政府軍兵不血刃地開進了佐賀城。一些地方仍有零星的交火，但等到奉天皇之命擔任征討大總督的東伏見宮親王來時，叛軍已經完全停止了抵抗。3月3日，兩天前抵達佐賀的大久保給正院發電報，宣布已經平定了叛亂。[[30]](#_30__Yuan_Tian_Dui_Jiang_Teng_Zh)

3月1日，政府發出逮捕江藤和島的通緝令，上面附有他們的體貌特征。[[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諷刺的是，創立警察的江藤，現在卻正被警察追捕。連最高層人士也深深地同情這些逃亡者。三條替島給大久保寫信，承認島義勇參加了叛亂，然而他始終忠于天皇，絕非奸邪之徒。4月5日，江藤被捕后，木戶給三條的信中說，江藤是征韓論的臣魁，攻打臺灣的時候讓他擔任先鋒如何？[[32]](#_32__Xiang_Qing_Jian_Yuan_Tian_R)

2月27日，江藤一行人逃到鹿兒島。第二天他們去拜訪西鄉，被告知西鄉在宇名木溫泉。3月1日，江藤來到宇名木溫泉。兩人私談了三個小時。那天晚上大約9點鐘，江藤離去，第二天卻又折回。這一次兩人的談話持續了大概四個鐘頭。談話有時很激烈，連外面的人都聽得見聲音。談話的內容沒有公開，然而不管是此時（佐賀叛軍顯然已經失敗），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某個時間，西鄉似乎都拒絕支持江藤。西鄉或許還會這樣說：自己已不在政府供職，江藤不應該向他，而應該向擔任內閣顧問的島津久光求助。但是，島津2月2日已經接到天皇的諭旨，要他保證西鄉不會支持佐賀的叛軍。[[33]](#_33__Mu_Hu_Feng_Ci_Di_Shuo___Wo)

3月3日，江藤再次坐漁船離開鹿兒島。那天晚上，風浪太大，他和少數同黨只能停靠櫻島。第二天，他們到奧比拜訪小倉處平（1846—1877）。小倉是征韓論的支持者，剛從國外學成歸來。他向逃亡者表示歡迎，并在附近找了個地方把他們藏起來。后來他為自己的仁慈坐了七十天的牢。[[34]](#_34__Yuan_Tian_Ri_Ji____Jiang_Te)

3月10日，九人乘坐小倉為他們雇來的一艘漁船離開了土佐，以躲避跟蹤的警察。接下來的海陸兩程充滿了艱辛和危險。江藤最終抵達高知，并見到了一直信任的林有造，然而林的態度卻非常冷淡。毫無疑問，林知道追兵就在后面。不愿把林牽涉進自己的罪行的江藤當天晚上就離開了高知，在山中漫無目的地亂走，在凄風冷雨中度過了三個夜晚。江藤說，自從出生以來，他還從未經歷過如此艱難的情況。[[35]](#_35__Yuan_Tian_Ri_Ji____Jiang_Te)

不知什么原因，江藤似乎希望回到東京，向自己的前同事披露佐賀叛亂的真實情況。如果他們認為他有罪，那么他準備切腹自殺。[[36]](#_36__Yuan_Tian_Ri_Ji____Jiang_Te)3月28日，他從土佐和阿波國交界的深山中走了出來，來到一個名叫神浦的海邊小村。江藤希望找到一艘船把自己帶回東京，但是一名警覺的警察發現了他，要求他出示證件。剛開始江藤想假裝是大阪商人，不過他很快就改變了故事，稱自己是東京來的密探，目的是為了查找刺殺巖倉具視的幕后真兇。他要求警察為自己帶信給巖倉。信寫于3月27日，江藤在信中說，由于安保措施太過嚴厲，自己被困在土佐，無法返回東京，他要求巖倉下令，以便自己可以回到東京。[[37]](#_37__Zhe_Shi_Ta_Gen_Pu_Ren_Shuo)

警察打開信封，發現里面寫著江藤的真實姓名。他現在確定自己抓的這個人是通緝犯，但是卻不知道逮捕一名不久前還是參議的大人物應該遵守什么樣的程序。最后他邀請江藤到另一個房間下圍棋，這樣就把江藤及其兩名同伴分開。江藤執白棋，警察執黑棋。一人落完一子，警官正落第二粒黑子時，突然大叫起來，“江藤閣下，江藤閣下”，隔壁的警察聽到暗號立刻沖了進來，“江藤閣下，我們很榮幸逮捕您。”[[38]](#_38__Xin_De_Yuan_Wen__Jian_Yuan)他們逮捕時說的話既滑稽又禮貌，但還是把江藤五花大綁，跟對待普通罪犯一樣。江藤沒有反抗。

逮捕者對江藤很好，到高知的這段路本來只需三天，他們故意慢慢地走了五天。這也許是預見到他的生命已經所剩無幾。江藤和兩名同伴從高知乘坐軍艦，后來又轉成陸路。4月4日他們抵達佐賀，被投進一所臨時建造的監獄。

4月8日，對江藤、島[[39]](#_39__Yuan_Tian_Ri_Ji____Jiang_Te)以及其他參與佐賀叛亂的人的審判開始。第二天，審判結束，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置信。這是大久保的指示，他極不耐煩地想讓訴訟程序盡快結束。從一開始大家就很清楚，江藤等人將被判刑。審判長河野敏鐮（1844—1895）曾是江藤的下屬，是江藤把他提拔到現在這個位置的，然而在整個審判期間他對江藤都非常粗暴，以致江藤一度高呼：“敏鐮——你怎么敢在我面前出現？”[[40]](#_40__Ta_Yu_3Yue_7Ri_Bei_Bu____Mi)據說河野聽后低下了頭，但是，4月13日他公布的審判結果卻非常嚴厲，特別是考慮到刑法的舊典和新典（江藤是制定者）都沒有懲罰叛亂者的先例時更是如此。人們之前沒想到會有這種罪行吧。河野在宣判時引用了中國法律。江藤和島被剝奪了武士身份，并被處以梟首示眾。兩個黨派的領導人也都被斬首，但免受頭顱示眾之辱。

江藤聽到審判結果后，試圖向審判長求情，但話還沒說完就被拖離法庭，當天就被處決。砍頭通常由部落民操刀，然而大總督東伏見宮親王認為由部落民來處決像江藤和島這樣才能出眾的人有些失禮，于是改由一名武士為他們行刑。江藤行刑前作了一首辭世的和歌：

武士即使在擰干

被淚水打濕的

衣袖時

也感到心緒

只隨著主人起伏

江藤的頭顱示眾了三天。他死時只有四十歲。距離他離開東京，踏上悲劇的佐賀之行剛好三個月。

大久保在4月13日的日記中表示對審判結果感到滿意：“今日圓滿結束。大安心。”這里無絲毫對江藤的憐憫之情。稍后的“江藤的表現真是丟臉，令人震驚”一句也許是指江藤被拖離法庭前的高呼行為。有一陣子，江藤的首級被拍成照片在東京出售，然而，5月27日，東京政府下令所有購買照片的人必須將照片還回去。但是據說大久保在內務省的會客室里掛著一張這樣的照片。[[41]](#_41__Yuan_Tian_Ri_Ji____Jiang_Te)

沒有資料顯示天皇對審判和江藤之死有如何的反應。也許，跟已被鎮壓的佐賀叛亂相比，他這時更關心臺灣局勢的發展。自從1873年6月副島種臣與清朝官員會面討論如何懲罰臺灣土著（這些土著殺害了沖繩的臣民）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拖著。1874年1月，大久保和大隈就當時的形勢提交了一份報告。他們的結論是，鑒于清政府的聲明，生番地區不屬于任何國家，日本政府有義不容辭的義務，為遭到暴行的臣民復仇。

2月6日，大臣和參議接受了這個決定。木戶沒有參加會議，這說明他依舊反對任何形式的外侵。[[42]](#_42__Zuo_Mu_Long_San____Si_Fa_Qi)3月，大隈重信、參議和外務卿寺島宗則、駐清朝全權公使柳原前光以及陸軍大臣西鄉從道在大久保家會面，討論派兵征討臺灣土著的問題，決定軍隊3月18日自熊本出發前往臺灣。此時佐賀叛亂已經徹底平定，政府可以對臺灣采取軍事行動了。

4月6日，天皇全權委派西鄉從道進攻臺灣土著，在諭旨中命令嚴懲那些殺害日本人的罪犯。天皇在一份單獨的指令中說，如果讓土著為所欲為，他們的危害將更加大。“今朕行膺懲之意，在于教化彼野蠻，安我良民。汝察此旨，為事之際恩威并施，鎮定之后教導土人，使其開明，行于我政府有益之事業。”[[43]](#_43__Mu_Hu_Xiao_Yun_Zai_1874Nian)

但是，木戶再次反對出兵臺灣。他指出，佐賀叛亂平定才沒幾天，人們就已經叫囂著入侵臺灣，令他十分驚訝。 “夫張國威于海外，開版圖于異域，人情豈不喜哉。然政府之務，自有內外本末之別，緩急先后之序，今三千萬之民眾未享政府之保護，蒙昧貧窮之人未能持權利，國非國也。”木戶接著說，在某些方面目前的政治制度還不如封建制度。人們對新政府缺乏信心并非沒有原因。自維新以來，沒有一年沒有發生過暴亂。自己的建議不受重視，軍事將領已經開赴海外。自己的觀點和內閣相差如此之大，已經無法繼續留在那里，否則就是在欺騙自己和世人。即使沒有生病，他也無法繼續留任，何況考慮到自己的病情，他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繼續做下去？[[44]](#_4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盡管木戶反對，攻臺的計劃卻穩步進行。西鄉從道和大隈重信現在正在長崎，準備前往臺灣。由于英美兩國承認臺灣是清朝領土并極力反對此事，大臣和參議們決定先咨詢清政府，再做進一步行動。大隈接到命令返回東京，西鄉從道則被要求留在長崎待命。他強烈抗議任何拖延，認為軍隊已經準備出發，任何拖延都將影響士氣，屆時后果將比佐賀叛亂嚴重得多。西鄉已經決定，如果下令他停止行動，他將退還天皇授予的委任狀，變成一名叛徒，去進攻那些生番的巢穴，這樣一來，整個事件就和國家無關。大隈努力勸他不要這么做，但是西鄉完全不聽他。那天夜里，西鄉從道下令軍艦離港，并裝載上燃料和淡水。大隈給正院發去電報，說士氣高漲，自己根本無法控制。[[45]](#_4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4月27日，西鄉派日本駐廈門領事給閩浙總督李鶴年帶去一封信，信中表達了為重視和清朝的睦鄰友好關系，事先通報出兵臺灣的意向。西鄉隨即解釋自己即將乘船前往臺灣，完成天皇委派的任務。船只將經過清朝控制的海域，然而自己并無惡意，因此要求清朝不要介入。他打算制服那些桀驁不馴的生番，以確保他們不會再對日本人胡作非為。如果這些生蕃到清朝政府控制區避難，他請求清政府把他們抓起來并通知日本。

西鄉迫不及待地想去臺灣，但他必須要等候東京的批準。5月2日，西鄉最終決定不再等下去。一千多名士兵乘坐四艘軍艦，向臺灣出發。緊接著的5月17日，大隈也從長崎出發。他因為和美英兩國洽談購買兩艘要用于戰斗的商船而耽誤了行程。[[46]](#_4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清朝對日本侵略臺灣自然感到極為不快，他們申明臺灣是自己的領土，并一再要求日本撤軍。清朝聲稱擁有臺灣和琉球的主權，并派了兩艘軍艦到臺灣去。5月22日，清朝軍艦抵達臺灣。其中一艘軍艦的船長和西鄉會面，要求他對此聲明做出回應。西鄉回答說，一切有關此事的討論都應該找日本駐清朝公使柳原前光。就他而言，針對土著的軍事行動差不多已經結束。士兵正忍受著高溫的煎熬，他只是在等候返回日本的命令，以便凱旋。

盡管西鄉說對土著的軍事行動幾乎已經結束，但日本軍隊并沒有立刻撤退。他們不僅與土著戰斗，還要繼續與熱帶的炎熱和疾疫作斗爭。與清朝的談判還在繼續，但是日本擔心談判隨時可能中止。那樣的話，日本是否應該向清朝宣戰？包括山縣有朋在內的大多數軍事將領都持反對意見，認為日本還沒準備好，但有兩名少將覺得日本沒什么可怕的。他們認為，清朝在使用拖延戰術，同時也在瘋狂備戰，日本不該讓清朝占了先機。7月9日舉行的朝廷會議宣布，將與清朝一起努力尋求和平的解決方法，但如果清朝先開戰端，就只有迎戰。[[47]](#_4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中國是日本文明一千多年來的榜樣。和清朝開戰的可能性自然造成了極大的恐慌。但另一方面，一些人認為清朝已經不再是以前的中國，因此日本應該履行必要的職責，例如取代虛弱而不稱職的清朝，教化臺灣土著。[[48]](#_4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8月1日，天皇命令大久保利通到中國，與清政府斡旋臺灣問題。談判進行得并不順利。10月2日，清朝拒絕了大久保覲見皇帝的請求，稱日本正在集結軍隊準備進攻，此時要求皇帝接見是對清朝的侮辱。10月10日，大久保發出最后通牒，但是中國人又巧妙地延遲答復。雙方都在重復說過的理由。

10月31日，日本和清朝最后卻達成了協議。協議規定，清朝承認日本進駐臺灣的行為合法；清朝將賠償日本人員傷亡、筑路、建房等費用；兩國間火藥味濃厚的來往文書將被撤回銷毀；清朝將保證海上通道的安全，使來往船只免受臺灣土著的襲擊。12月20日為日本軍隊撤離臺灣的日期。[[49]](#_4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12月9日，大久保回國，天皇接見了他以及其他在戰爭中有突出表現的軍官。天皇感謝了所有人，并向他們贈送禮物。13日，天皇通過權宮內卿萬里小路博房賞賜大久保一萬元金幣，但大久保予以拒絕。他說條約的成功簽署并不是他自己的功勞，應該歸功于天皇的英明領導。他還提到平定臺灣土著花費巨資，而且皇宮仍未重建。

12月23日，天皇耐不住其他人一再迫切請求，最終同意重建皇宮。不過理由不是為了自己享受，而是因為臨時宮殿過于狹窄，導致許多公務無法正常開展。

這一年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政府只付出很少的代價便平定了危險的佐賀叛亂，入侵臺灣也達到了真正的目的，即讓清朝承認沖繩，然而兩次勝利都沒有完全解決涉及的問題。佐賀叛亂是更加危險的薩摩叛亂的前奏，而二十年后，與中國的爭端導致了中日戰爭的爆發。

明治七年的最后一條記錄是12月31日巖倉具視寫給天皇的一份奏折，奏折概述了自1853年海軍準將佩里的艦隊來后日本發生的許多變化。那些適當的舉措，例如廢藩置縣和派巖倉使團出使美歐，都歸功于天皇念念不忘國家的需要，但同時也發生了許多不幸的事件。事實上，也許可以說，只有在經過了二十年的喧囂騷動之后的現在，國家才安定下來，四海才變得平靜。巖倉最后希望“陛下誠宜于此時，銳意勵精，鑒前慮后，愛重諸名臣，責之以大計，委之以重任，使其協同一致，各效其才竭其能，整內治外，以貫徹當初之圣意，顯復古之成績，對峙宇內”。[[50]](#_5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1. [[1]](#_1_25) 美國船只“沙夫茨伯里”號（Shaftsbury）被重新命名為“社寮丸”，英國船只“德爾塔”號（"aid-7F9"）被重新命名為“高砂丸”。這兩個名字都和臺灣有關：社寮是日本遠征軍將使用的港口，高砂則是日本人對島上土著的稱呼（《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59頁）。

1. [[2]](#_2_2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30頁。

1. [[3]](#_3_2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5—66頁。明治將花銷限制在五萬日元以內。

1. [[4]](#_4_2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0頁。

1. [[5]](#_5_2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7—58頁。

1. [[6]](#_6_25) 關于照片和當時的情況描述，見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116—118頁。《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39頁上說，內田“之前”曾給天皇和皇后拍過照片，那是在1872年9月9日。天皇和皇后把照片送給了皇太后。10月9日，皇太后反過來讓內田給她拍了張照片。10月17日，內田將他拍給天皇、皇后和皇太后拍的全部72張照片交給天皇。照片中的天皇時而穿著束帶，時而穿著直衣。還有一張（攝于1873年之前）是天皇騎馬的照片。除了兩三張以外，這些照片都沒有公開，我只有通過《明治天皇紀》的描述才知道它們。

1. [[7]](#_7_25) 但是，天皇本人似乎并不討厭這些照片。1873年3月9日他送了一張給即將到中國去的副島種臣（《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9頁）。3月20日，他還洗了一張送給他的姑姑親子內親王（第42頁）。同一張照片（或者是同時期拍攝的另外一張）被送往日本各駐外使館，供張掛之用（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118—119頁）。

1. [[8]](#_8_25) 在研究了其他君主的制服之后，6月3日日本確定了天皇的制服款式。詳見《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7—78頁。

1. [[9]](#_9_2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7頁。在剪頭發的那天早上，他跟平時一樣讓一名宮女給他整理頭發，并給他臉上撲粉。他去到書房，在他的命令下，侍從有地品之允把他的頭發剪去。侍從長米田虎雄和侍從片岡利和輪流為天皇剪發。當他出現在大奧時，宮女們都為他形象的改變感到意外和震驚。

1. [[10]](#_10_25) 照片的復制品，見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121頁。他對這張照片的描述見第118頁。這次一共照了兩張照片，一張全身照，一張半身照（《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34頁）。當時在日本的熱那亞公爵收到了一張放大的天皇全身照。隨后，這張照片被洗出來送往各縣；那張半身照則從未公開過。

1. [[11]](#_11_25) 之所以被稱為“留守政府”是因為許多高層領導隨巖倉使團身在國外。

1. [[12]](#_12_2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2頁。

1. [[13]](#_13_25) “部落民”在日本是個帶有歧視性的詞語，意同“賤民”。日本歷史上有四民兩部落之說，四民指士農工商，兩部落指穢多和非人，這種觀念一直延續到現代。至今，穢多部落民仍然從事祖先從事過的屠宰和皮革行業，而非人部落民還是從事與死亡有關的行業，如殯葬業等。——譯注

1. [[14]](#_14_25) 關于這次暴動的描述，見《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3—74頁。

1. [[15]](#_15_2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87頁。6月名東（德島）縣又發生了一起武裝暴動。這次的暴動與發生在北條縣的那次很相像，都是由于誤解了“血稅”這個詞而引起。這次暴動的領導者受到極為嚴厲的懲罰，另有1689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93—94頁）。

1. [[16]](#_16_2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81頁。

1. [[17]](#_17_24) 關于這次事件的詳細描述，見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下，第94—96頁；《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89頁。隨同格蘭特將軍訪問日本的楊約翰1879年見過巖倉，他說，“巖倉有著一張令人印象深刻的臉，線條分明，顯示出他堅毅的性格，而且你會看到一條傷疤”（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 2, p. 527）。

1. [[18]](#_18_23) 九名刺客中八人的判決書原文，見栗原隆一，《斬奸狀》，第366—367頁。

1. [[19]](#_19_23) 關于憂國黨提出的綱領，見園田日吉，《江藤新平と佐賀の亂》，第144頁。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他們抗拒基督教，認為它污染了日本的宗教。刺殺巖倉的事件發生后，憂國黨立刻起草了一份新的宗旨，但是并沒有表示反對征韓（第145頁）。

1. [[20]](#_20_22) 第三個政黨是中立黨，最終站在了政府軍的一邊。

1. [[21]](#_21_22) 毛利敏彥，《江藤新平》，第202頁。

1. [[22]](#_22_21) 副島也被要求回到佐賀，但他屈服于板垣的強大壓力而留在了東京（毛利敏彥，《江藤新平》，第205頁）。江藤則不顧板垣（和大隈）的勸阻，毅然前往。

1. [[23]](#_23_21) 中野好夫和我一樣對江藤的決定感到疑惑不解（《佐賀の亂と江藤新平》，第213頁）。

1. [[24]](#_24_19) 中野好夫，《佐賀の亂と江藤新平》，第215頁，江藤沒有詳細說明“第二次維新”指的是什么，但是可能包括征韓。

1. [[25]](#_25_19) 根據1872年公布的《縣治條法例》，明治政府將各縣行政長官的官員由“知縣事”改為“縣令”（四等官）或“權令”（五等官），東京、京都、大阪三地行政長官則稱“知事”，1886年全部改稱“知事”。——編注

1. [[26]](#_26_19) 毛利敏彥，《江藤新平》，第206頁。

1. [[27]](#_27_18) 園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亂》，第154—55頁。《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12頁上的篇幅較短，但本質上屬于同一份聲明。長州之戰在第二十一章有描述。

1. [[28]](#_28_16) 園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亂》，第156頁。不僅這兩個縣的人承諾將支持他，而且愛知和熊本兩個縣的人也都表示支持他；亦可見中野好夫，《佐賀の亂と江藤新平》，第216頁。

1. [[29]](#_29_16) 有證據顯示，江藤派去鹿兒島見西鄉隆盛的中山一郎回來報告說，如果佐賀起兵，西鄉一伙人將會追隨它的領導，但是似乎難以相信西鄉本人會做出這種承諾（中野好夫，《佐賀の亂と江藤新平》，第216頁）。

1. [[30]](#_30_16) 園田對江藤這次的聲明做了一番解釋（《江藤と佐賀の亂》，第194—195頁）。他說除非解散軍隊，否則班長以上級別的人都將被政府軍殺害。他要求他們脫下軍裝，分散開來，再等待下一次起義的時機（這一天肯定會到來）。

1. [[31]](#_31_1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21—224頁。關于戰斗的詳情，見園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亂》，第163—190頁。

1. [[32]](#_32_13) 詳情見園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亂》，第200頁。江藤的通緝令開頭是：“年齡41。身材高大魁梧。長臉，高顴骨。眉毛長而粗。”

1. [[33]](#_33_12) 木戶諷刺地說，“我們現在贊同的，正是江藤去年贊同的。”他似乎將江藤的急于攻韓等同于當時正在進行的日本攻臺之戰（園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亂》，第205頁）。

1. [[34]](#_34_12) 園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亂》，第190—191頁。

1. [[35]](#_35_11) 園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亂》，第207頁。

1. [[36]](#_36_11) 園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亂》，第208頁。

1. [[37]](#_37_9) 這是他跟仆人說的。他敦促對方回家，否則將會與叛亂的罪行相牽連（園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亂》，第209頁）。

1. [[38]](#_38_6) 信的原文，見園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亂》，第210頁。盡管信封上寫著巖倉親啟，但是內文的收信人卻寫著木戶、大久保、大隈和大木。信封上的發信人寫的是他當密探時用的化名的一部分，但是在信中他署了自己的真實名字。

1. [[39]](#_39_5) 園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亂》，第211頁。

1. [[40]](#_40_5) 他于3月7日被捕（《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39頁）。

1. [[41]](#_41_5) 園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亂》，第219頁。江藤高呼的內容根據來源而有些不同。

1. [[42]](#_42_5) 佐木隆三，《司法卿江藤新平》，第408頁。中野好夫說《東京日日新聞》強烈譴責九州地區銷售江藤和島斬首的照片（《佐賀の亂と江藤新平》，第218頁）。他說他不愿相信大久保是幕后主宰，但是傳聞卻是如此。

1. [[43]](#_43_4) 木戶孝允在1874年4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臺灣一事連印（簽字），余對兩大臣（三條和巖倉）相辭此事。其故，昨年（天皇）下問時，余曰察今日內地之形勢，人民貧弱，應專以內政，提人民之品位，然后著手建不后之議。此雖當年，其說未異。”

1. [[44]](#_44_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34—235頁。

1. [[45]](#_45_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43—244頁。

1. [[46]](#_46_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45頁。

1. [[47]](#_47_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80頁。

1. [[48]](#_48_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82頁。

1. [[49]](#_49_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25頁。

1. [[50]](#_50_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68—373頁。

# 第二十六章 早蕨之局



明治統治的第八個年頭——1875年——可以說是最平靜的年份之一。1月1日，按照慣例舉行了慶賀新年的儀式。第二天，明治到青山御所向皇太后請安。4日，他出席了正院的新年開幕儀式。明治先在那里分別祭拜了伊勢神宮、賀茂神社和冰川神社，隨后聽取了眾大臣提交的報告。報告的內容五花八門，例如“為保衛人民”而派駐全國各地的警察人數、即將實施的郵政匯票制度。去年修建了許多學校，現在全國有1297112名小學生，約占日本總人口的1/24。大藏卿大隈重信向太政大臣提交了未來六個月的財政預算，并預測扣除開支后，將有近四千萬日元的盈余。[[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簡而言之，日本的一切似乎都在朝好的方向發展。

天皇繼續自己的學業，他每月聽福羽美靜、元田永孚和新任命的西村茂樹（1828—1902）講課。[[2]](#_2__Ta_Dang_Shi_Shi_Wen_Bu_Sheng)此外，天皇還師從元田和長炗學習書法。

除此之外，天皇的生活被以下的內容排得滿滿當當：各種各樣的儀式（例如各位已逝天皇的忌辰）、會見外國使節、獎勵有功的日本人、觀摩軍事演習和創作和歌。新年的第一次詩會以“都鄙迎年”為題，天皇的和歌表達的意思并不復雜：



柳原愛子，大正天皇的生母。明治天皇稱其為“早蕨”

在首都

和在遙遠的村莊

人們現在都在忙著

迎接又一個新年的

開始[[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1月21日，權典侍柳原愛子[[4]](#_4__Gui_Zu_Liu_Yuan_Guang_Ai_De)在青山御所庭院一處特別搭建的房子里分娩，為天皇生了第二個女兒。前兩個嬰兒都夭折的事情讓大家有些沮喪，但這個新出生的嬰兒看起來非常健康，人們都感到無比欣慰。接下來的幾天，陸續有客人來宮里祝賀。27日，天皇給小內親王起名為熏子。[[5]](#_5__Zhe_Ge_Yue_Zao_Xie_Shi_Hou_Z)她將住在梅御殿，因此也叫梅宮。熏子的出生和命名都告知了神靈，宮里也辦起了宴會。大家紛紛祝內親王福壽綿長，皇室人丁興旺。天皇請嘉賓和自己一起分享喜悅的心情。

2月日本爆發了天花疫情。天皇和皇后都種了牛痘，這使那些原本可能害怕注射外國針劑的日本人也有了打疫苗的勇氣。連小小的內親王熏子也打了疫苗。2月20日，熏子在母親愛子、外祖父柳原光愛和舅舅柳原前光的陪伴下，第一次進宮。從此以后，她經常被帶進宮。父親無疑希望盡可能經常見到熏子，但把她留在宮里會破壞規矩。明治很小的時候就必須離開自己的父母，跟外祖父和外祖母住在一起，現在他不得不遵守同樣的規定。按慣例，熏子將和外祖父外祖母一起住到五歲。

熏子的母親柳原愛子是明治的妃嬪中最著名的一位。1912年，齋藤溪舟在描寫明治的后宮時，形容“早蕨局”（早蕨是愛子的典侍名，由明治天皇所起）[[6]](#_6__Jiang___Yuan_Shi_Wu_Yu____Zh)是所有宮廷女官的榜樣。[[7]](#_7__Zhai_Teng_Xi_Zhou____Nu_Guan)齋藤說她不僅貌美而且還非常聰明；此外，她的行為一絲不茍，同時又不失溫柔。大奧的每個人都仰慕愛子，并承認她的行為無可指摘。

愛子和其他的權典侍一樣，即使在宮中也非常神秘。不像宮里的其他侍女，被鼓勵多參加活動，偶爾還陪皇后外出，典侍們極少離開宮闈，從未曝露于日光之下，因此多半臉色蒼白。[[8]](#_8__Jia_Teng_Ren____Ming_Zhi_Tia)權典侍的地位比大部分天皇的隨從女官都要高（一些女官后來被擢升為典侍，敘任正一位），然而她們周圍總是彌漫著一股神秘的氣氛。地位比權典侍低得多的山川三千子寫道：“用世俗的話說，權典侍就是小妾。她們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顧天皇，在他去大奧時，輪流服侍他。”[[9]](#_9__Shan_Chuan_San_Qian_Zi____Ji)

權典侍照顧天皇的個人需求以及日常起居，例如穿衣或者沐浴。但她們最重要的功能，正如山川三千子所暗示的，是侍候他睡覺。這項特別的職責是官方安排的：她們是唯一收到脂粉錢的宮廷侍女。[[10]](#_10__Shan_Chuan_San_Qian_Zi____J)夜里由哪位權典侍陪睡并不由天皇自己決定，而是由一名高級女官決定。[[11]](#_11__Jia_Teng_Ren____Ming_Zhi_Ti)在眾多的陪睡者當中天皇并沒有強烈地偏好哪一位。如果天皇不喜歡某個妃子，可以解除她的職位，然而這種事情極少發生。天皇的最后八個孩子（生于1886年和1897年之間）都是他和權典侍圓祥子所生，這說明他偏愛她多一些，但也可能僅僅因為她的生育能力特別強而已。包括小倉文子在內的幾位權典侍都沒有生下明治的孩子。[[12]](#_12__Shan_Chuan_San_Qian_Zi_1909)

柳原愛子作為熏子內親王的母親，受到很多優待，然而她的第三個孩子——未來的大正天皇出生時，分娩異常困難，伴隨著歇斯底里和痛苦的尖叫，因此宮里不允許她再和天皇同床。[[13]](#_13__Shan_Chuan_San_Qian_Zi____J)但愛子被擢升為典侍，敘任正二位，死后還追贈從一位，這一切都源于她是皇太子的生母。[[14]](#_14__Liu_Yuan_Ai_Zi_Shi_Bei_Fu_S)

熏子內親王只活了一年半，便突發腦膜炎，盡管御醫竭力搶救但還是去世了。[[15]](#_15__Xiang_Jian___Ming_Zhi_Tian)熏子出生后兩年，皇室才迎來了下一個孩子。不難想象，明治是多么焦急地希望聽到權典侍系上腹帶的消息。

在此期間，明治每天和平時一樣，接見外賓、騎馬、偶爾頒布與時事問題相關的法令。他還不得不閱讀官員提交的奏折，并給出自己的意見。例如，2月底，明治收到巖倉具視寫的一份很長的奏折，其中比較日本和主要的西方國家，強調了日本的弱點。這無疑是巖倉對自己外國之行反思的成果。[[16]](#_16__Xiang_Jian___Ming_Zhi_Tian)他察覺到日本在軍事和工業上的落后，因此極力反對派西鄉隆盛到朝鮮去。相反，巖倉認為應該警惕俄國對中國的威脅，他在奏折中使用了中國典籍中慣用的一個詞語：唇亡齒寒。[[17]](#_17__Xiang_Jian___Ming_Zhi_Tian)巖倉建議加強與清朝之間的關系，共同構筑堡壘，抵御俄國的入侵；兩國應該像車的兩輪或者鳥的雙翼一樣，互相扶持。這份建議與眾不同，因為當時的日本官員將清朝視為敵人、朝鮮半島控制權的有力競爭者、驕傲自大而又腐朽無能的國家，日本可以公然挑戰其臺灣主權而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巖倉還在奏折中提到自己如何佩服天皇的英明決策。他請求天皇從今以后屈尊紆貴，親自處理一切國事。假如天皇將智慧慷慨地賜予大家，還有什么計劃不能實現呢？一旦國家在皇恩的沐浴下完全統一，我們將獲得與外國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帝國的光輝將永遠照耀下去，萬年不變。[[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這并不僅僅是奉承之語。也許因為在國外生活過，巖倉似乎已經開始相信，天皇應該（至少原則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這一點上，巖倉與木戶、大久保和伊藤等支持逐漸實現民主政體的人意見不同。但是巖倉心目中的專制統治依照的并不是歐洲模式，而是古代的日本模式。作為眾神之子的天皇，將平靜地統治國家，他將自己的智慧傳遞給各位大臣，完全不受他們的政治矛盾的影響。[[19]](#_19__Da_Jiu_Bao_Li_Qian____Yan_C)

巖倉認為天皇必須擁有無上的權力，可能是因為覺察到一些重要人物對政府表現出了敵意。島津久光身任左大臣，但長期以生病為由拒絕上朝，并且一貫地反對任何改革。他對現在大多數官員以西服作為日常裝束的做法尤為惱火。另外，回到鹿兒島的西鄉隆盛絲毫沒有返回東京的跡象，依然無聲地和政府對抗。[[20]](#_20__Tian_Huang_Gei_San_Tiao_Xia)

4月14日，天皇來到正院，在議員等重要官員前，宣布將創建元老院和大審院。[[21]](#_21__Yuan_Lao_Yuan_Shi__Senate_D)天皇還決定創建地方議會。這些措施是在為建立政府的議會制做準備。明治說：

朕即位初首，會群臣，以五事誓神明，定國事，求萬民保全之道。幸賴祖宗之靈、群臣之力，得今日之小康。顧中興日淺，內治之事少振作更張之士，朕今擴充誓文之意，茲設元老院，以擴立法之源；置大審院，以固審判之權。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圖公益，漸次立國家立憲之政體。冀汝等民眾俱賴其慶。[[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4月，巖倉又向天皇提交了一份長長的奏折，其中稱，“宇內萬國之人，其風俗異，其言語殊途，然均是人也”。[[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現代讀者可能會覺得這是老生常談，但它卻是巖倉分析日本與外國之間關系變化的前言。巖倉接著說，過去德川家康閉關鎖國，只向少數的中國和荷蘭商人開放長崎一地，這種做法已經不再可行。日本無法忽視西方主要國家取得的成就以及為其繁榮和強大做出貢獻的許多設備。“富民強兵之術，百工藝能之技廣開”，路上有蒸汽機車，海上有蒸汽輪船，電報使他們幾秒鐘之內就能和地球上最遙遠的地方取得聯系。“昔日萬里今日階前，東西如比鄰。”巖倉和十年前那些狂熱的攘夷派不同，他認為日本必須承認他國人民的本事比自己強，并學會接受這個事實。

巖倉擔心俄國人在領土上的野心，但這個時期日俄簽訂了一份協議，似乎有可能解決長期爭議的薩哈林島歸屬問題。協議規定日本天皇放棄整個薩哈林島，作為回報，俄國沙皇將千島群島的十八個島嶼送給日本。[[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不久，沙皇在仲裁秘魯船只“瑪利亞·路斯”號一案時，做出了有利日本的裁決，這樣一來，連那些視俄國為最大敵人的日本人也放下心來。[[25]](#_25__Sha_Huang_De_Cai_Jue_Yu_5Yu)兩國之間的友好關系看來有可能占上風，明治向沙皇表達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千島群島的獲得，使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北方。1875年7月，三條實美、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上書，請求天皇訪問北海道，以了解當地的地理和民情。他們相信，“凰輦斷然進北海道，則全國之民皆轉眼，矚目陛下之舉措，瑣瑣紛議自行消歇”。三條想借此機會擴大國威，并給愚昧的當地人帶去文明和開化。[[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這個時期政府也開始將注意力轉到國土另一端的沖繩，向琉球王國施加壓力，迫使他們遵循日本的習慣。7月，一名使者來到首里城，命令國王尚泰中止與清朝的附庸關系：從今以后琉球政府將不再派使者去中國，不再祝賀清朝皇帝登基，也不再接受清政府的冊封，琉球將使用明治的年號。然而琉球人卻不愿割斷與中國的歷史聯系。

日本殘余的攘夷情緒現在表現為反對進口外國商品。進口已經導致貿易逆差和白銀的流出。左大臣島津久光是包括天皇外祖父中山忠能在內的排外派的代言人。天皇聆聽了他們的傾訴，承諾將認真考慮，但朝臣們卻越來越不愿關注島津的抗議——不論是貿易逆差、上朝時穿的服裝，還是有關陽歷的問題。[[27]](#_27__You_Yu_Dui_Dao_Jin_Jiu_Guan)任何禁止進口外國商品的嘗試肯定會導致西方國家的不滿。

大久保利通也為日本的貿易逆差感到擔憂，但他啟動了一個更加積極的計劃來縮小逆差。兩年前大久保雇用一名美國人引進養羊業，并建了一間生產毛毯的工廠，希望以此來降低日本的羊毛進口量，并開發那些迄今為止貧瘠的土地。大久保在全日本招收養羊專業的學生，9月，大久保在視察過下總國[[28]](#_28__Ri_Ben_Gu_Dai_Di_Qu__Fan_We)的一塊荒地之后，親自決定將養羊的牧場建在那里。可惜的是，這個計劃未能幫助扭轉貿易逆差。

1875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9月發生在朝鮮的江華島事變。根據日本人的記載，[[29]](#_29__Guan_Yu_Zhao_Xian_Dui_Zhe_C)日本軍艦“云揚”號在測量對馬海峽時，由于燃料和淡水短缺而駛往中國，途中經過了朝鮮半島的西海岸。9月20日，這艘船停泊在江華島外，船長乘坐小艇尋找可以靠岸并獲取淡水的地方時，突然遭到槍擊和炮轟。“云揚”號回以軍艦炮。船長想上岸質問，但水位太淺，軍艦無法靠岸，而且自己人手太少，對作戰不利，于是調轉船頭，下令停止交火。第二天凌晨，日本人襲擊了江華島，一番短暫而激烈的交鋒后占領該島。日本死亡一人，朝鮮死亡三十五人，另有十六名朝鮮人被俘。9月28日，日本軍艦返回長崎。[[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這個事件只是一次小沖突，雙方都只有幾十人參加，但日本官員有意將其夸大為危機，并以此為借口，要求朝鮮做出讓步。江華島事件的消息傳來，朝廷召開一次御前會議。會議決定派一艘軍艦到釜山，以保護朝鮮的日本僑民安全。天皇為事態的發展深感不安，他派人請來巖倉，“朝鮮國有事，其詳細雖未知，思之是為國家之重事，朕甚憂念。汝雖自四月以來以病居家，然應勉就其職，以之輔翼”。

幾年前，木戶孝允反對派西鄉到朝鮮去，因為他認為與所謂的雪恥相比，增強內部的國力更加重要，但他現在改變了看法。木戶認為以前攻打朝鮮的理由并不充分，但是向日本軍隊開火則是顯而易見的敵對行為。他提出由自己擔任特使，出使朝鮮。木戶寫信給三條實美，稱“我政府于朝鮮國修好，用力已久，國論紛紛連歲不止。前年政府變革及去春佐賀騷亂皆因此起，今又生一大事變。（中略）昨年，琉球藩民等受暴逆，故施臺灣蕃地處分之舉，況今日之事，辱我國旗。且朝鮮國與臺灣相異，我官民在留其國，不可不問此。（中略）先舉朝鮮事變之始末，以之問清國政府，令其代我處理。若清國政府不肯，則委之與我，余乃始以此事詰問朝鮮國政府，行妥當之處分。而彼若終不應，則茲始問其罪。（中略）若朝廷委予以一切機敏終始從其事，予當竭力，不損我帝國之榮光”。

江華島事件使民眾輿論紛紛，[[31]](#_31__Guan_Yu_Ri_Ben_Dui_Zhe_Ci_S)然而政府卻耽于國內事務而無法立刻采取行動，特別是左大臣島津久光向天皇上書，攻擊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島津說，如果自己的建議——即解雇三條——不被采納，日本將淪為西方列強的奴隸。他極力主張天皇親自掌控政府。[[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島津的指控非常模糊，天皇為此困惑不已。10月22日，天皇派人請來島津，拒絕了他的請求，并說三條對國家一直盡忠盡職，自己非常信任他。島津久光回答說，如果自己的請求遭拒，他將別無選擇，只好辭職。天皇回應說，考慮到朝鮮危機，自己無法接受島津的請辭。

天皇在這次以及當時的其他論爭中都表現出一種堅毅的精神，表明他少不經事的時期已經結束。當然，天皇在決定之前會先咨詢大臣，尤其是木戶，但最后拍板的卻都是他自己。

11月1日，右大臣巖倉具視和議員在三條家開會，會議決定派一名使者到朝鮮去，同時為更好地理解情況而在清朝設一名特命全權公使。11月10日，天皇任命森有禮為駐清朝全權公使，命令他通過清政府的中間人，刺探朝鮮為何會向只想獲得淡水的日本人發動攻擊。

12月9日，政府派一名特使前往朝鮮。木戶一再毛遂自薦，但是就在這時腦溢血發作，因此由陸軍中將兼議員的黑田清隆代替他前往。三條在給黑田的指示中說，“求相當我國旗受辱之賠償”，但他說日本政府并未放棄與朝鮮改善關系的希望。可能江華島事件只是某個地方官員的決定，并非出自朝鮮政府的命令，關鍵在于找出是誰下的命令。如果朝鮮愿意與日本開展友好關系并允許兩國之間進行貿易，特使有權接受此讓步，以代替對“云揚”號的賠償。但是，如果朝鮮政府拒絕承擔江華島襲擊事件的責任，而且無意恢復兩國間的傳統友誼，那么特使將有權采取恰當的措施。[[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1876年1月6日，黑田帶領兩艘軍艦、三艘運輸船和三個連共約八百人的海軍[[34]](#_34__Woonsang_Choi_The_Fall_of_t)向朝鮮出發，這是日本海軍所能提供的最大程度的護航。這些軍艦的裝備極差，和美國海軍準將佩里二十三年前帶到日本的那些軍艦根本無法比較。為了應對萬一談判破裂，日本還制定了軍隊增援的秘密計劃。軍人的休假均被取消，參謀總長山縣到下關為可能的出征做準備。

日本軍艦停泊在距離漢城約三十二公里的江華島外。1月16日，日軍列隊走向江華島上的談判所，在那里與兩名朝鮮專員見面。黑田一開始認為與朝鮮人談攏的希望渺茫，因為不確定的因素太多。他要求增派援軍，然而政府拒絕了他的請求，認為過早展示軍力可能會阻礙和平協商，使朝鮮人懼怕日本人。

兩國代表的第一次會談持續了四天。談判雙方都非常地友好禮貌，但卻一直重復著一些老掉牙的論據。日本人想知道為什么自己訂立和平友好協議的愿望一再被拒；反過來，朝鮮人想知道為什么日本人要用一個與清朝皇帝對等的稱謂來稱呼他們的天皇，從而使朝鮮處于從屬的地位。日本否認對朝鮮主權有任何非分之想，接著問為什么自己的船只在江華島受到襲擊。朝鮮回答說因為日本海軍穿著歐式制服，他們以為是法國人或者美國人。[[35]](#_35__Woonsang_Choi_The_Fall_of_t)朝鮮并沒有道歉，僅僅說地方官員沒有認出日本船只。日本代表接著質問朝鮮政府，為何沒有告知地方官員日本船只懸掛的旗幟，并堅持要求對方道歉。朝鮮司令官回答說自己的職責只是接待日本客人，并沒有道歉的權力。

談判一天天拖延下去，中間有幾次被朝鮮專員和漢城政府之間的磋商打斷，然而1876年2月27日，日朝之間最終簽署了友好協議。[[36]](#_3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簽約儀式結束后，日本向朝鮮贈送了禮物，不僅有傳統的成匹綢緞，還包括一門大炮、一支六發式左輪手槍、一枚懷表、一只晴雨表和一個指南針。這些禮物（綢緞除外）與日美首次簽訂協議時美國送給日本的禮物出奇地相似，而且協議本身的意義也幾乎一模一樣：日本正在“打開”朝鮮——這個隱士之國的大門，與其建立外交和貿易關系。[[37]](#_37__Xie_Yi_De_Fan_Yi_Jian_Woons)一名西方學者后來評論道：

正如西方列強對她所做的那樣，她現在依樣畫葫蘆，毫不內疚地引誘朝鮮簽字放棄其行政主權和關稅自主權，并賦予境內那些妨礙公正的日本僑民完全的治外法權，就像歐洲人在日本享有的一樣。[[38]](#_38__Joseph_H__Longford_The_Evol)

協議簽訂的消息傳到東京的外交界，各國公使紛紛請求覲見天皇以便當面向他表示祝賀。天皇在芝離宮宴請了他們，每位公使都有機會表達自己對簽約的喜悅之情以及日朝之間的友誼與日俱增的希望。[[39]](#_3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與此同時，幾乎每天都有細微的變革，每一件都比江華島事件更影響大多數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例如，3月12日，星期天正式被定為休息日。政府對這一步有所顧慮，擔心民眾可能會認為這是出于對基督教的尊重。然而有必要使日本與西方開明國家保持一致，最終政府還是冒著被認為討好基督徒的風險，頒布了這項法令。一個月后，星期六下午也被定為法定假期。

3月29日，政府頒布了禁止所有人（士兵和穿制服的警察除外）佩刀的廢刀令，違者將被沒收佩刀。多年以來，人們一直爭論是允許武士像過去一樣佩刀，還是將其視為現代日本的反常現象予以禁止。現在這個問題最終得以解決，而這無疑使歐洲人感到安心。刀這種東西一直令他們精神緊張。

4月4日，天皇、皇后和皇太后到巖倉具視家做客，在那里觀看了能樂表演。盡管京都的宮廷里一直都有能樂表演，皇太后也特別喜歡這種藝術，然而能樂長期都是和幕府關聯在一起。儒家傳統認為優秀的政府應該重“禮樂”，為了符合這一傳統，幕府將能樂作為“樂”并加以弘揚。隨著幕府的垮臺，能樂的未來變得渺茫。一些演員跟隨德川家族“流放”到靜岡，由于沒有觀眾，大多數人只好轉行。只有少數人在東京堅持能樂表演。那些依舊住在城里的大名偶爾會要求他們演上一兩場，以此來招待客人。但是大名們回到地方之后，能樂表演者就不再有主顧幫襯了。誠然，愛丁堡公爵訪問日本時欣賞了能樂表演（維新以來的第一次演出），但演員們迫切地希望再次有外國貴賓來訪；他們需要養家糊口，而外賓卻遲遲未見到來。

寶生九郎（1837—1917）可能是當時最著名的演員，1870年他申請從舞臺引退，并認真考慮過是當一名商人還是農夫。表演能樂的劇場只有兩個——京都金剛流運營的劇場和1872年梅若實（1827—1909）在東京淺草自己家建的劇場。兩個劇場都很少演出能樂。

因此，巖倉家的能樂表演對于能樂的復興有著重大意義。巖倉在歐美旅行期間，曾多次被邀請觀看歌劇，人們告訴他，這是最著名的一種歐洲戲劇。（東道主邀請巖倉觀看歌劇，可能是覺得他即使理解不了唱詞，至少可以欣賞音樂。）巖倉在國外觀看歌劇時想到了能樂，回到日本后，他要求兩名使團成員制定一個能樂復興計劃，使能樂成為一種適于招待外賓的娛樂節目。

包括梅若實和寶生九郎在內的演員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在天皇面前。除了皇室成員以外，觀看表演的還包括四位前大名、三條實美、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重要的政府官員。在表演完既定的節目《小鍛冶》、《橋弁慶》和《土蜘蛛》之后，寶生九郎還應天皇的要求，表演了《熊坂》。據說天皇看起來興致勃勃。在巖倉隨后準備的西式晚宴上，天皇親自為巖倉等大臣和議員斟酒。

這是天皇第一次在東京觀看能樂表演。他似乎由衷地喜歡這種藝術形式。偶爾興致特別好時，他會唱上一兩段唱詞，甚至還教宮女們怎么唱。[[40]](#_4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在這個能樂前景黯淡的時刻，天皇的熱情無疑是這種藝術得以保存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后，天皇無論是到國家重臣家還是公卿貴族家做客，通常都會觀看能樂。

不久之后的4月14日，明治再次到一名顧問家里做客。當天他到飛鳥山賞櫻并視察造紙廠，在返回皇宮的路上，順路去了位于染井村的木戶孝允家。[[41]](#_41__Bie_Shu_De_Di_Dian_Wei_Yu_X)天皇把木戶叫到面前，對他說了以下這番贊揚的話：“汝孝允，自維新伊始，鞅掌國事，今幸國家太平，此因汝等輔贊之攻。朕茲親臨，偕盡歡欣。”[[42]](#_4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天皇送給木戶五百元金幣、一對薩摩燒大花瓶、一對銀杯和三箱進口葡萄酒。他接見了木戶夫人，在木戶的花園里散步，隨后和其他客人一起吃了盒飯。這是天皇第一次到武士階層家里做客。木戶自然非常高興。[[43]](#_43__Mu_Hu_Xiao_Yun_Zai_Ri_Ji_Zh)

天皇幾年前宣布的巡幸全國計劃，由于各種各樣的緊急事情而暫時推遲——是否派特使到朝鮮去的爭議、佐賀叛亂、出兵臺灣以及最近的江華島事件——但是這些問題這時都已解決，于是天皇的北方之行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

天下已大抵太平，但農民暴亂時有發生（例如五月初和歌山爆發的一次），表明國內仍殘留著不滿的情緒。5月，木戶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很長的奏折，一開始即大膽地聲稱“政府乃為人民所設之所，人民非供政府使役者也”。在描述了維新之前的社會情況后，木戶稱，在武家統治的七百多年里，人民一直受到政府的壓迫，但是天皇“以至仁之睿智發維新之令，一掃積年之惡習”。這可以說是人民的極大福氣。[[44]](#_4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讀到這里，你可能會想，木戶將力勸天皇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根除那些過去遺留下來的陋習。然而木戶并沒有這么做，他反過來警告改革不應該過激。例如，隨著廢藩置縣的實行，地方官一般是外地人。因此，跟那些熟悉當事人的官員相比，他們在處理地方事務時沒有那么熱心，也不那么害怕留下壞名聲，使兒孫背上罵名。

木戶實際上是在請求保留一項過去的“積習”。5月9日，木戶拜訪了三條實美之后，在日記中寫道：“妄想時興日變，數百年之慣習輕易破除，必有枘鑿不容之患。”[[45]](#_45__1876Nian_5Yue_19Ri_De_Ri_Ji)

停發武士薪俸的計劃尤其使木戶深感不安：“萬不得止，則希望緩延手續，開其生路，行寬大措施。”

木戶支持改革，但是希望過程不疾不徐且適當地考慮“人文”關懷。他想必把這些想法告訴了天皇，因為與當時的其他政治家相比，木戶被天皇咨詢的次數最多。

明治的反應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他的時間大部分都被與穩步推進現代化直接相關的事情占據。例如，5月9日，明治參加了上野公園的開幕儀式，這是日本的第一個公園。這一次內務省提供了具有新時代特征的點心，包括白葡萄酒、香檳和冰淇淋。[[46]](#_4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6月2日，天皇終于啟程，開始東北部之行。[[47]](#_47__Dui_Zhe_Ci_Lu_Xing_De_Yi_Xi)他帶了二百三十名隨從，包括內閣成員、史官、侍從和醫生。一行人于當天下午3點抵達旅行的第一站草加。天皇剛在臨時住處安置下來，就受到埼玉縣縣令等官員的正式歡迎。第二天凌晨4點，天皇起床，隊伍繼續前行。在去蒲生村的路上，天皇命令馬車停下，以便他觀看農民插秧。農民都臨時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男人用白帶子挽著袖子，婦女則用紅帶子，所有人都戴著草帽。他們一邊插秧，一邊唱歌，歌聲傳得很遠。天皇看得入神，讓馬車一直等著，直到自己看夠為止。[[48]](#_48__An_Tian_Yin_Xiang____Dong_B)

那天下午，隊伍抵達第二站幸手市。天皇派人請來縣令，詢問他有關縣里的情況。縣令描述了當地的地形、生活條件和物產。他說縣民最大的災患來自河水的泛濫。天皇問，民眾對以金錢代替農產品繳納地租的制度是否心存不滿。縣令回答說，大部分民眾歡迎這項新制度，但是希望可以分多次繳納。天皇后來會見當地官員時，巖倉具視和木戶孝允都有參加。

隊伍每到一個地方，天皇幾乎都要視察小學，聆聽學生朗誦，并向那些成績優秀的學生頒發獎品（通常是字典或者地圖集）。他在教室外面觀看孩子們上體操課。天皇不可能對這些參觀抱有很大興趣，但他從未對所見所聞表現出任何不高興。也許天皇很高興看到年輕的國民正專心地從事智力和體育訓練，或者他甚至可能認為，身為君主，參觀學校和工廠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

只有當附近有一些特別有趣的景點時，旅行看起來才不僅僅是履行仁慈的義務。例如，天皇在參觀日光市的東照宮時，仔細觀看了建筑、雕塑以及來自日本國內外的寶貝。他還瞻仰了德川家光的墳墓，并要求將記載德川家康事跡的圖書送到自己下榻的地方，以便空閑時研讀。那天晚上，天皇要求隨從以日光山八景為題作詩。天皇在參觀與德川家族關系密切的景點時，并未顯示出絲毫的猶豫，甚至出資修復一些德川家廟內的建筑。

天皇所到之處，都受到民眾的夾道歡迎。許多人作詩，以此寄托心情，他們希望有一天天皇能親自看到自己的作品。這些農民詩人心里非常清楚，如果通過正當途徑將詩獻給天皇，當地官員必定會攔下，讓這些詩永遠都到不了天皇那兒。因此他們要么懇求隨從將詩獻給天皇，要么將詩放在最可能引人注意的地方。每天晚飯后，侍從長會收集并整理這些詩，然后將它們拿給天皇過目。

天皇每到一處還要檢查當地的物產，并且不忘聆聽附近地方的農歌。每到一處，人們還給他看古代傳下來的古董，不論是字畫還是年代久遠的農具。天皇看到新開墾的農田時總是很高興，看到工業化開端的工廠時也一樣開心。他在仙臺參觀了伊達家族物品的公開展覽，其中包括一幅支倉六右衛門的油畫（支倉于1615年訪問羅馬，畫中的他正在朝拜耶穌受難像）和一本支倉從歐洲帶回來的拉丁文羊皮紙書。[[49]](#_4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天皇接受了當地官員和謙卑的民眾贈送的禮物，例如古河的小學生送的一籠螢火蟲。天皇偶爾會買些自己喜歡的當地產品。

也許天皇認為訪問的最后一站函館最有意思。他到函館醫院視察時，那里剛好正進行蟾蜍血液循環的實驗。他通過顯微鏡觀看了蟾蜍的血液循環，這是他首次使用這種儀器。參觀完學校回到住處時，天皇發現那里已經為他安排了一個當地的商品展，其中包括阿伊努人的生活器皿和衣服。那天晚些時候有五十多個阿伊努人來謁見天皇。晚上，花園里點起了數百盞紅燈籠，燈火通明。沿街每一所房子的屋檐下都掛著燈籠，連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也掛起了燈串。沿岸的一排石燈籠點燃了，附近的村莊燒起了篝火。

7月17日，天皇參觀了政府軍與敵軍戰斗的最后的地方——五棱郭，并爬上了城墻。他向一名當地官員詢問戰爭的情形。聽說約有五十名阿伊努人（有男有女）趕來函館觀看游行隊伍時，天皇派人把他們請來，并觀看了他們表演的舞蹈。

從函館返回橫濱的一路上波濤洶涌，幾乎所有人都暈船了。然而除此之外，這次旅程堪稱完美。當然，木戶孝允擔心天皇缺乏運動，曾勸他下來步行或是騎馬，但是沒有成功，天皇一路上似乎極少離開自己的馬車或者乘輿。[[50]](#_50__Bu_Guo__Ling_Mu_Hu_Bei_Gan)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是武士階層的不滿甚至騷動，沿途的地方官員不停地提到這個問題。這一年結束之前，這種郁結的不滿將以一種激烈的形式爆發出來。

1. [[1]](#_1_26)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77頁。

1. [[2]](#_2_26) 他當時是文部省官員。（《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78頁）

1. [[3]](#_3_26)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83頁。

1. [[4]](#_4_26) 貴族柳原光愛的女兒。（《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92頁）她于1873年2月20日被封為權典侍。她為明治生了四名子女，其中三個夭折了，剩下的一個就是后來的大正天皇。

1. [[5]](#_5_26) 這個月早些時候制定了親王和內親王出生后的慶祝儀式。規定為了與清和天皇以來的皇室傳統保持一致，男孩起名應該以“仁”字結尾，女孩起名應該以“子”字結尾（《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84—385頁）。

1. [[6]](#_6_26) 將《源氏物語》中的女性名字贈予側室是長久以來的傳統。這可能是為了給那些贖買游女的商人一個印象，讓他們以為自己跟古代的源氏一樣，跟紫姬或者六條妃子睡過覺。明治以花草和樹木為他的妃子們命名。這些名字供天皇和她們之間互相稱呼使用。除了典侍名，這些妃子還有昵稱，也是由天皇所賜。

1. [[7]](#_7_26) 齋藤溪舟，《女官物語》，第91頁、第93頁。

1. [[8]](#_8_26) 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第60頁。

1. [[9]](#_9_26) 山川三千子，《禁斷の女官生活回想記》，第196頁。

1. [[10]](#_10_26) 山川三千子，《禁斷の女官生活回想記》，第16頁。

1. [[11]](#_11_26) 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第60頁。高倉壽子擔任宮中高級女官（女官長）的時間幾乎貫穿了明治的一生，她似乎是個厲害的角色，會跟她選出來陪天皇過夜的權典侍說，“今天是你”。

1. [[12]](#_12_26) 山川三千子1909年入宮時，小倉文子和圓祥子是僅有的兩個為天皇侍寢的女人。

1. [[13]](#_13_26) 山川三千子，《禁斷の女官生活回想記》，第196頁。她引用了一個曾服侍了柳原愛子很多年的不知名女人的話。這個女人回憶說，愛子的尖叫聲非常可怕，不僅其他的宮女避開了她，甚至連護士也被嚇跑了。

1. [[14]](#_14_26) 柳原愛子是被浮世繪畫家月岡芳年畫過肖像的七名權典侍之一。月岡的這一系列肖像畫于1878年刊印發行。所有這些女人姿勢都大致相同，但是愛子的畫像卻激怒了宮內省，因為她的姿勢讓人聯想起芳年經常描繪的妓女（這幅畫像刊登于1999年第21期的Impressions 上）。據說因為這個原因，浮世繪畫家才被禁止在作品中描繪天皇，但是，如果這道命令確實頒布過的話，那后來觸犯它的人非常多。

1. [[15]](#_15_25) 詳見《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23頁。

1. [[16]](#_16_25) 詳見《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05頁。

1. [[17]](#_17_25) 詳見《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06頁。這個詞語源自中國歷史典籍《左傳》。如果中國失敗了，日本將會感受來自俄國的西伯利亞寒流。

1. [[18]](#_18_2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07頁。

1. [[19]](#_19_24) 大久保利謙，《巖倉具視》，第218—219頁。

1. [[20]](#_20_23) 天皇給三條下了一道諭旨，敦促他回來，并以一名忠臣的身份，參加到人民精神的復興和設計一個繁榮強大的國家的事業中來（《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27—428頁）。

1. [[21]](#_21_23) 元老院是“Senate”的一個譯法。預計它將履行立法和咨詢的職能。大審院是最高法院。

1. [[22]](#_22_2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25—426頁。

1. [[23]](#_23_2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36頁。

1. [[24]](#_24_20)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 第444—445頁。這份協議簽訂于5月7日，簽署的雙方分別是代表日本的榎本武揚和代表俄國的亞歷山大·戈爾恰科夫（Alexander Gorchakov）公爵。

1. [[25]](#_25_20) 沙皇的裁決于5月9日公布（《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53頁）。盡管俄國的這個舉動受到歡迎，但是許多日本人仍然認為，俄國在東亞的擴張是日本安全的主要威脅。

1. [[26]](#_26_20)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73頁。

1. [[27]](#_27_19) 由于對島津久光糾纏于瑣事不放感到惱火，巖倉決定不再見他（《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98頁）。久光懷有一份改正時代不幸的秘密計劃：模仿唐玄宗的做法，在鎮壓叛亂之后，嚴禁奢華，并下令焚毀所有精美的物品（第500頁）。當巖倉聽到此“秘密計劃”時，他只是一笑了之。

1. [[28]](#_28_17) 日本古代地區，范圍包括現在的千葉縣北部、茨城縣西南部、琦玉縣東部、東京都東部。——譯注

1. [[29]](#_29_17) 關于朝鮮對這次事件的解釋以及這次事件在導致日朝之間條約簽訂的連鎖反應中的作用，見姜在彥，《朝鮮の攘夷と開化》，第140—142頁、第163—171頁。

1. [[30]](#_30_17)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96—497頁。其他資料給的日期有所不同。“云揚”號的小船試圖登陸的地方正好位于島上主炮臺的正前方，這是對朝鮮守軍的明顯挑釁（姜在彥，《朝鮮の攘夷と開化》，第164頁）。

1. [[31]](#_31_15) 關于日本對這次事件的新聞報道（無疑對輿論有影響），見杵淵信雄，《日韓交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30—48頁。

1. [[32]](#_32_1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20—522頁。

1. [[33]](#_33_1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41—542頁。

1. [[34]](#_34_13) 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6；《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68頁上寫是兩個排，而不是三個連的海軍士兵。兩艘軍艦分別是“日進”號和“孟春”號。

1. [[35]](#_35_12) 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p. 6-7.

1. [[36]](#_36_1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69頁。

1. [[37]](#_37_10) 協議的翻譯見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p. 124-127。協議一共有十二條。第四條規定釜山的倭館繼續營業，且人員不限對馬島藩的人。另外將開放兩個港口，“用于與日本國民貿易之需”。

1. [[38]](#_38_7) Joseph H. Longford,The Evolution of New Japan, p. 105.

1. [[39]](#_39_6)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78頁。

1. [[40]](#_40_6)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84—585頁。

1. [[41]](#_41_6) 別墅的地點位于現在的駒込驛附近，那里豎有一根紀念明治曾經到訪的石柱。

1. [[42]](#_42_6)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90頁。

1. [[43]](#_43_5) 木戶孝允在日記中寫道，“臨幸士族之家，始臣孝允。昔九年前被召御前，布衣奉按咫尺，以臣孝允始”（1876年4月11日的日記，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281）

1. [[44]](#_44_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06頁。

1. [[45]](#_45_5) 1876年5月19日的日記，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297。

1. [[46]](#_46_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99頁。

1. [[47]](#_47_4) 對這次旅行的一系列詳細描述，見吉野作造編，《明治文化全集》第十七卷，第327—572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14—681頁。

1. [[48]](#_48_4) 岸田吟香，《東北御巡幸記》，第342頁；《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16頁。

1. [[49]](#_49_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46頁。支倉的畫像無疑正是現在在仙臺博物館展出的那一幅。

1. [[50]](#_50_4) 不過，令木戶倍感欣慰的是，7月11日，天皇走了約80米的下坡路（《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64頁）。

# 第二十七章 西南戰爭



1876年余下的時間，現代化的步伐繼續快速前進，絲毫沒有減退的跡象。9月4日，天皇的專艦“迅鯨”號在橫須賀造船廠下水。第二天，連接京都和神戶的最后一段鐵路竣工，經由大阪連接這兩個城市的火車開始運營。9月7日，天皇向元老院頒布諭旨，要求在廣泛研究各國的法律之后，起草一部憲法草案。9月9日，兩份報紙被送到天皇面前，一份是《東京日日新聞》，另一份是《橫濱每日新聞》。此后，他每天都會收到幾份報紙。每一樣新生事物——交通、政治進步、信息傳播——都在說明日本社會將迎來什么樣的變化。

天皇和各國首腦之間的聯系也更加緊密。例如，10月1日，天皇給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總統去信，祝賀為紀念美國獨立一百周年而舉辦的費城世界博覽會開幕。兩天后，天皇收到俄國沙皇的照片和他要求的圣彼得堡冬宮的建筑圖紙，天皇想在修建東京的新住所時參考這些圖紙。

并非所有國民都對這些新生事物感到滿意。許多武士仍堅持原來的尊王攘夷思想，痛恨政府為使日本成為一個現代國家而做的每一步努力。他們為外國人可以在“神州”購置房產、在外國人居住區以外的地方自由居住而感到憤慨。而那年早些時候頒布的，要求他們剪西式發型和不準佩刀的法令尤其令他們氣憤。他們認為這是公然違背日本傳統（尤其是自己階層的傳統）。許多人陷入的經濟困境，更是給這一憤怒火上澆油。

佐賀叛亂首次用暴力表達了這種憤怒，但被熊本的政府駐軍合力鎮壓下去。熊本的“愛國”團體的領導們意識到，現在駐軍的人數遠遠低于正常人數，可能正是襲擊他們總部的好時機。當時熊本有四個“黨”。其中兩個——敬神黨（更為人熟悉的名字是“神風連”[[1]](#_1__1876Nian_2Yue_5Ri_De_Ri_Ji)）和學校黨——反對改革，希望恢復被明治政府摒棄的武士傳統。另外兩個黨——實學黨和民權黨——則支持現代化。[[2]](#_2___Shen_Feng__De_Yin_Du_Wei__k)天皇計劃到國外去的謠言更使神風連的憤怒達到了頂點。[[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10月，神風連的領導太田黑伴熊（1835—1876）經過數次神道教的占卜儀式[[4]](#_4__Xiong_Ben_Bu_Jin_Wu_Shi_De_M)之后，認為起義最終獲得了神的首肯。他聯系其他縣那些與自己有共同信仰的武士，希望熊本的勝利能鼓勵他們也舉行類似的起義。對明治維新以來發生的變化（尤其是武士階層地位的變化）的痛恨，是將這些人聯系起來的紐帶。神風連的成員最為極端。他們并不僅僅滿足于遏制西方影響的傳播，還決定將西化的痕跡也抹去，無論是穿西服還是使用西歷。例如，當不得不經過電線下方時，一些神風連的成員會以白扇遮頭，以此保護自己不受外來邪惡的影響，同時表達他們對電的痛恨態度。許多人隨身帶著鹽，看到和尚[[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穿西服的日本人或者葬禮便撒（這是一種去晦的方式）。甚至有人認為紙幣來自西方，擔心自己被污染，于是拒絕用手摸它，只用筷子接紙幣。[[6]](#_6__Shen_Feng_Lian_De_Zhe_Xie_Yi)在即將到來的與政府軍的戰斗中，意識形態上的一個決定對神風連有著致命的影響——他們拒絕使用現代武器，用劍和矛對付持有槍炮的士兵。

10月24日深夜，不足兩百人的神風連成員秘密地集結起來。他們迅速分成小分隊，每個小分隊都有具體的任務。一支小分隊襲擊了熊本鎮臺[[7]](#_7__Shen_Feng_Lian_Cheng_Yuan_Ta)，乘對方不注意殺死了許多守衛，并放火燒毀了步兵和炮兵的營房。其他暴徒則沖進電報局，砸毀他們痛恨的外國設備，即便這意味著切斷與外界，包括與自己盟友的聯系。還有一些人襲擊了縣令安岡良亮、鎮臺司令官陸軍少將種田政明和參謀長陸軍中佐高島茂德的住宅。種田和高島被殺，安岡受重傷，宅邸被燒毀。

神風連不分青紅皂白地大肆屠殺。他們完全沒有警告就對營房進行襲擊，許多身穿睡衣手無寸鐵的士兵束手就擒，但也未能使神風連停止殺戮。即使對那些傷勢嚴重無法自衛的人他們也毫不手軟。這次戰斗駐軍士兵的傷亡人數超過三百人。與神風連不同的是，駐軍士兵都是應征入伍者，大多是農民。神風連的武士在屠殺這些膽敢霸占自己軍人地位的卑賤農民時，似乎有種特別的快感。

一開始叛軍似乎取得了全勝，然而一旦駐軍的軍官們回過神來，便開始集結剩余的士兵，并利用人數和現代武器的優勢，徹底擊潰了襲擊者。叛軍在炮火面前一批批地倒下；太田黑身負重傷，命令手下把自己的頭砍下來，他們照做了。大部分活下來的人都切腹自殺，將日本的傳統保留到了最后一刻。凌晨時分，叛軍放的火被撲滅，槍炮聲停止。戰斗結束了，然而整座城市卻陷入了恐慌，逃離此地者終日不覺。11月3日，緊急狀態解除。[[8]](#_8__Zhen_Tai_Shi_1871Nian_Dao_18)

神風連的暴動除了造成大約五百人死亡之外，一無所獲。這些人本來可能為國家甚至為世界做出貢獻。熊本的櫻山神社埋葬著一百二十三名神風連成員，每座墓碑上都刻著一個人名及其卒年，不管這個人是死于戰斗還是死于自己的短刀，這兩排長長的墓碑很可能使我們聯想到迅速凋零的櫻花和武士死亡的類似象征。游客今天站在墓碑前，可能會為這些人為了一項注定失敗的事業而獻身的精神所感動，而忘記了他們極端殘忍，且這些年輕人（大部分都是十幾歲或者二十幾歲）為之獻身的理想并無絲毫的理性可言。

盡管如此，一百八十人左右的神風連還是證明假如襲擊出其不意且自己愿意赴死的話，以少勝多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可以使對方陷于恐慌之中。這個恐怖主義經驗傳遍了日本那些持不同政見的武士，不久就有人聲稱也準備以一小撮人發動類似叛亂。[[9]](#_9__San_Dao_You_Ji_Fu_Dui_Shen_F)

10月25日，神風連暴動的消息傳到宮廷。巖倉具視和木戶孝允立刻將自己知道的消息告知天皇，但由于熊本的通訊被切斷，他們并不知道細節。第二天，與熊本駐軍之間的電報線恢復，三條實美和大久保利通向天皇提交了一份比較詳細的報告。政府派官員們去九州，以獲得第一手資料，陸軍少將大山巖代替已經犧牲的種田，出任熊本鎮臺的司令官。

10月23日，熊本之戰前夕，神風連派一名使者到福岡縣的前秋月藩，向那些心懷不滿的武士披露起義計劃，并請求他們參加暴動。政府拒絕接受島津久光的建議，也拒絕停止全國西化進程，令秋月藩的武士感到憤怒，他們已經秘密聯系了神風連和萩城的不平武士。干城隊（秋月藩的武士這么稱呼自己）[[10]](#_10__Si_Ma_Liao_Tai_Lang____Fei)的政治思想有一點很獨特，即支持海外擴張。政府拒絕征韓自然激怒了他們。

秋月藩的武士在宮崎車之助的領導下，決定響應神風連的請求，派兵援助熊本。10月26日，人數不滿二百人的秋月藩武士，準備向戰場出發。[[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并非所有的前秋月藩武士都同意這個決定。一些人主張宮崎解散軍隊，然而武士們激情澎湃，只有戰斗才能滿足他們狂躁的心。秋月藩武士舉著一條白色的橫幅出發了，橫幅上寫著大大的“報國”二字。[[12]](#_12__Ta_Men_De_Ming_Cheng_Yi_Wei)不久，政府軍接到密報后趕來，大敗干城隊。11月1日，深感疲憊和勝利無望的干城隊領導，大部分選擇了自殺。

第三次暴動發生在萩城。前原一誠是吉田松陰的杰出學生，曾在吉田位于萩城的著名學校求學，后來又到長州接受西式教育，并曾在長州和明治的軍隊服役。他在會津若松市的戰役中的表現尤為英勇。前原被晉升為兵部大輔，1870年以生病為由辭職，但實際原因是對木戶孝允向朝廷提出的對待前大名的態度感到憤怒。他還不滿政府高官的政治觀點，尤其是他們擁護現代化的觀點。前原開始考慮發動叛亂，并聯合了其他異見分子，特別是神風連。[[13]](#_13__Ta_Men_Xian_Ran_Bu_Zhi_Dao)

聽說神風連起兵后，10月26日，前原召集一批親信，宣布改變國家政體的時機已經到來。他建議向山口縣發動急襲。其他人同意了，于是前原發布檄文，向那些有相似看法的人發出呼吁。10月28日，前原的支持者聚集在一起，準備戰斗。他們的人數只有大約一百人，但決定當晚就行動。山口縣的縣令聽到風聲說萩城正在醞釀暴亂，于是派一名官員通知前原說熊本的叛亂已被鎮壓，命令他立刻解散隊伍。

前原意識到暴亂注定將失敗：只有出其不意地襲擊才有成功的可能，然而現在縣令已經知道自己的計劃，并且請求鎮臺出動鎮壓，試圖攻擊山口縣已沒有任何意義。前原改變計劃：他要贏得日本海沿岸武士的支持，一起到東京去，在天皇的腳下自殺抗議。

前原及其支持者抱著這種想法，一邊搶奪武器等，一邊朝山口縣東北海岸的須佐進發。前原在須佐召集了更多人，將他們編為殉國軍。[[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他計劃從須佐乘船到石見國的濱田，然而風浪太大，他們由漁船組成的小型船隊無法出航，只好被迫返回萩城。那時前原發現自己秘密藏于萩城的彈藥都被倒進了海里，他知道自己已經沒有成功的機會，于是和幾名支持者偷偷溜出萩城，最終于11月5日被抓獲。殉國軍的其他成員則被政府的陸軍和海軍合力殲滅。

其他地方那些持有類似觀點并同情叛軍的武士意識到不會有什么結果，紛紛放棄起兵計劃。12月3日，熊本、秋月和萩城的三名叛亂領導人受到審判并被處以極刑。武士叛亂暫時停止，但從茨城縣和三重縣的農民暴動可以看出，國內的不滿情緒依然很嚴重。

12月31日，木戶孝允作為最坦率的一名政府官員，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和右大臣巖倉具視提交了一份報告，將最近發生的武士和農民暴動歸咎于政府的執法不力，但是，最終的責任卻不在這里：自1873年危機爆發以來，國內的大部分麻煩都起源于薩摩。為了舉例說明這種流毒的危害，他提到了薩摩對征韓和征臺的支持。政府一直處于不得不對薩摩亦步亦趨的地位。木戶對薩摩武士的行為的尖刻解讀，也許可以用其長州背景來解釋，但這顯然不是全部；木戶同情那些因社會動蕩而饑寒交迫的農民，他們除了舉起長矛起來反抗之外，并沒有其他泄憤的方式。

木戶為改善農民階級的狀況提出了六點計劃。比如，第一項建議是“節諸省之經費，止不急之工事，以休養民力”。另外，“察民情之如何，勿妄發法律規則，使之束縛”。木戶對那些贊成延遲創立議會的人表示不耐煩，“以人智未進為由，稱開設民選議院尚早，然而施政于民，則不問人智開或不開，不論事適不適合，我定之事即施于民，而又急其所成，此非激進哉”？[[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就在木戶提交報告的第二天，皇宮嚴格按照傳統習慣，舉辦了1877年的迎新儀式。天皇今年26歲了。1月4日，天皇宣布土地稅由3%降至2.5%，希望以此減輕人民的負擔。木戶孝允在日記中寫道：“平生仰愿，實屬榮幸。此后惟愿睿旨貫徹，致人民幸福。”[[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國庫收入的減少將導致一些政府部門的縮減，天皇要求官員們厲行節儉。

在天皇決策的背后，我們可以察覺到大久保利通的存在。1876年12月27日，他向三條實美遞交報告，認為非常有必要紆緩民困。新政府不僅沒有幫助農民，連考慮他們問題的時間也沒有。近來全國各地爆發的農民起義就是他們悲慘生活的證明。一直強調農業為立國之本的政府，有責任讓農民過上體面的生活。[[17]](#_17__1877Nian_1Yue_4Ri_De_Ri_Ji)大久保建議將稅收降至2%，并預測農民生活的改善將會帶來普遍的富裕。天皇宣布的2.5%大概是個折中方案。

1月4日，天皇去騎馬。這件事本來不值得一書，但是從這天開始，天皇著迷似地迷上了騎馬。他幾乎每天都騎，從下午2點一直騎到日落。天皇不僅在東京這樣長時間地練習騎馬，當月下旬到京都之后也是這樣。

1月24日，天皇啟程離開東京到京都去。此行的官方原因是天皇希望祭拜畝傍山的神武天皇山陵以及在孝明天皇逝世十周年時參拜京都的泉涌寺，同時祭拜京都和奈良地區的其他天皇山陵。政府計劃由海路自東京至神戶。[[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從北海道返回時的驚濤駭浪天皇肯定記憶猶新，因此明治對兩程均走海路不是很熱心，并試圖說服顧問們至少同意他走一程陸路。但他們告訴天皇必須立刻返回東京，而走海路要比走陸路快，因此懇求他返回時走海路。[[19]](#_19__1876Nian_11Yue_22Ri_Gong_Bu)天皇最后同意，但是（我們可以從他這個時期創作的詩歌看出）他仍然對海上的波濤心有余悸。第一首短歌創作于1月21日，起航的前一天，事實上這一天風浪太大，從而推遲了出發的時間：

我能夠聽到呼嘯的

海風在用力地

朝這邊吹

藍色的汪洋大海

激起了高高的海浪

第二首短歌似乎是在船上創作的：

昨天和今天

海上

狂風呼嘯

被吹跑了的船只

只好暫停一會兒[[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1月24日早上，天皇和隨從乘坐火車到橫濱，從那里登上“高雄丸”。當天早上，“高雄丸”在兩艘軍艦（“春日”號和“清輝”號）的護衛下起航。那天天皇創作了下面這首短歌：

不懼

驚濤駭浪

輪船在海面上

如履平地

煙囪冒出一縷煙[[21]](#_21__Shi_Ge_He_Xu_Yan_De_Zi_Liao)

這首詩說明不論天氣如何，天皇都對輪船充滿信心，然而洶涌的波濤還是超出了他的預期。在猛烈的東北風和雨水的狠狠鞭打下，海浪漲得很高，船搖擺得太厲害，于是他們決定在鳥羽停泊，等風浪小一點再走。天皇用下面這些句子描述了自己的心情：

狂風

拍打著海浪

向我們猛擊

我們只能不情愿地

將船往回劃[[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風暴持續了幾天。直到1月27日，船才繼續行駛，第二天他們抵達神戶。上岸并在郵局短暫停留之后，天皇自己騎馬到火車站，沿途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天皇從神戶坐火車到京都，在東本愿寺（天皇臨時休息的地方）小休之后去到御所，一路上都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天皇回到兒時生活的地方，肯定深有感觸，不過我們只能從這首短歌中窺探到他的喜悅之情：

一想到

今年我將看到

這座我生活了這么多年的

華麗之城的第一場雪

我就非常興奮[[23]](#_23____Xin_Ji_Ming_Zhi_Tian_Huan)

皇后和皇太后在常御殿里迎接天皇。那天晚些時候，天皇會見了皇室的其他成員。1月29日，天皇在御學問所接見了一眾公卿。他向親王、內親王以及高級公卿贈送了禮物。看起來京都往日的榮華似乎至少暫時得到恢復。不過在天皇離開的這段時間里，御所的建筑物顯得有些破敗和荒涼。[[24]](#_24____Xin_Ji_Ming_Zhi_Tian_Huan)

那天夜里，一群年輕人（他們被稱為“私學生”）突襲了鹿兒島牟田的陸軍彈藥庫，西南戰爭爆發，而宮里慶祝的那些人還完全不知道。

“私學生”（那些參加西鄉隆盛創辦的私學校[[25]](#_25__Ming_Zhi_Kan_Dao_Zi_Ji_Jin)的武士）暴動的直接原因，是聽說政府軍擔心形勢不穩，派一艘汽船準備將鹿兒島的彈藥轉移到大阪的炮兵兵工廠去。接下來一個星期他們繼續進攻陸軍彈藥庫及其附近的造船廠和兵器局。造船廠的副指揮一再請求鹿兒島縣令派警察保護，但是沒人理他。2月3日，副指揮關閉了造船廠，懷疑縣令拒不施救的原因是他和襲擊者有同樣的想法。兩天后，“私學生”占領了兵工廠并開始制造武器和彈藥。

這些行動的背后，是請求擔任出訪朝鮮的使節最終被拒之后，以西鄉隆盛為代表的鹿兒島武士感到的失意和憤怒。他們回到鹿兒島之后，認為武士需要特別的訓練，才能有效地保衛家鄉。在他們眼里，鹿兒島幾乎就是一個自治國家。1874年6月，西鄉在鹿兒島城外的城山腳下，利用舊薩摩藩的馬棚建了一所學校。之后在城內創辦了一所規模較小的分校，不久，鹿兒島的其他地方便紛紛設立了分校。西鄉隆盛是這些“私學校”的精神領袖。他親自擬寫了一套準則，張貼在每一所學校里面，其中一條是“尊王憐民為學問之本旨”，即究天理、為民直面困難、履行統治者的義務才是武士的本分。[[26]](#_26__Jian_Chi_Cheng_Zhe_Xie_Xue)

學校的教義強調閱讀漢文書籍，尤其是兵書的重要性，同時強調學習武士階層的傳統。[[27]](#_27__Jie_Shi_Jian___Ming_Zhi_Tia)學校完全沒有提供國學（例如神道教或者和歌創作）或西方科技方面的指導，其目的是為了使武士們明白，盡管他們被東京的政府所忽視，但卻是日本傳統知識的寶庫。私學校雖然強調學習的重要性，然而酷似一個政黨。學生們宣誓效忠于一套行動綱領，而且他們對學習的興趣也并非學術上的。

一些鹿兒島武士并不愿意到私學校上學，特別是那些來自其他市的學生，然而迫于社會壓力，他們最終與班上的其他學生保持一致。學校獲得了縣令的秘密支持，一些“學生”在當地的政府部門任職。

1876年12月，政府派警察中原尚雄等人[[28]](#_28__Zhe_Xie_Chuan_Tong_Da_Duo_Y)到鹿兒島調查私學校搞顛覆活動的傳聞。他們剛到達不久就被學生抓起來，并被指控是間諜。后來的罪名甚至更加嚴重：他們被指控此行的目的是為了暗殺西鄉。中原不堪折磨，被迫認罪。[[29]](#_29__Zhe_Xie_Ren_Bao_Kuo_Shi_Min)他后來翻供了，但是暗殺消息卻已經在鹿兒島傳播開來，連西鄉也相信政府打算殺自己。[[30]](#_30__Ta_De_Zi_Bai_Shu_De_Yao_Dia)這給了那些與私學校有聯系的人很好的口實，即他們是為了保護西鄉才發動叛亂。

天皇知道鹿兒島事態的發展，但卻沒有趕回東京或是擔任指揮鎮壓叛亂的打算。相反，他在京都視察學校、釀酒廠和各種工廠，甚至包括二條河東邊的畜牧用的大農場。他參拜了許多神社，還在皇后、皇太后和姑姑淑子內親王的陪伴下，在桂宮觀看了一場能樂演出。[[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即便鹿兒島的事態急速惡化，天皇仍在進行這些悠閑的活動（以及瞻仰祖先的墳墓）。

2月6日，鹿兒島的緊張局勢傳到東京，造成了極大的驚訝和恐慌。這些消息和內務省官員林友幸（1823—1907）做的評估完全相反。林在視察完鹿兒島返回東京后，向木戶報告說并無異狀。[[32]](#_32__Zhe_Yi_Ci_Ta_Guan_Kan_Le)現在他請求朝廷再次將自己派往鹿兒島，以便更全面地掌握事態的變化。三條實美、木戶孝允和伊藤博文同意了林的請求，并命令他與海軍大將川村純義（1836—1904）一起返回鹿兒島。他們尤為擔心騷亂蔓延到地理上或精神上與鹿兒島毗鄰的日本其他地方。[[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考慮到事態的嚴重性，他們建議林、川村等人乘坐最快的“高雄丸”到鹿兒島去。

2月7日，“高雄丸”從神戶起航，兩天后抵達鹿兒島。一名傳令官向當地官員匯報了他們到來的消息。不久，縣令大山綱良來到船上。他告訴林和川村，私學校的學生們人心不穩是因為聽說政府派人暗殺西鄉。事實上全縣的人都憤怒不已。大山轉達了西鄉的請求，讓川村（西鄉的連襟）上岸和自己一起討論。林回答說不可能有刺客被派往鹿兒島。他要求大山和西鄉一起平定騷亂。[[34]](#_3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大山剛離開“高雄丸”，就有七八艘小船靠攏過來，每艘船上都坐著十幾個荷槍實彈的人。他們試圖登上“高雄丸”，但是船長立刻砍斷纜繩，下令將船駛往櫻島。那天晚些時候，大山返回時，再次帶來西鄉迫切想和川村見面的口信。林回答說，只有等騷亂平息之后，他才能允許川村上岸。林將攻擊政府船只的行為視為大逆不道，并在大山離開之前告訴他說，鑒于目前事態的發展，“高雄丸”將馬上離開。[[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1月12日，“高雄丸”返回神戶。山縣有朋和伊藤博文聽說鹿兒島的消息之后，趕來和他們會面。當晚，他們在神戶的一家旅館里討論出兵鹿兒島的計劃。戰爭的爆發看起來只是時間早晚了。

1. [[1]](#_1_27) 1876年2月5日的日記，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aid-84Q"3, p. 435。在描述了1月30日和31日鹿兒島武士占領了陸軍和海軍的彈藥庫之后，木戶寫道，“這與林有幸基于一月初的觀察所做出的描述非常不同。現在薩摩的強大聲勢已經回蕩在全國各個角落；十幾個縣的那些心懷不滿的士族正在注視著薩摩的一舉一動。”

1. [[2]](#_2_27) “神風”的音讀為“かみかぜ”。成員們用這個名字來命名他們的組織，以此來表明他們就像那股曾經挫敗了蒙古入侵者的“神風”一樣，將保護日本免受傷害。

1. [[3]](#_3_27)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09頁。實學黨建立美國式的民主的理想，來自它的導師橫井小楠。

1. [[4]](#_4_27) 熊本不僅武士的民族主義活動異常突出，而且還以基督教思潮而聞名。1876年，神風連之亂的同一年，三十五名年輕人在美國教師簡斯（L. L. Janes）的指引下皈依了基督教，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為“Kumamoto Band”的組織，并宣誓通過基督教來拯救自己的國家。關于Janes的詳細資料，見F. G. Notehelfer,American Samurai 。

1. [[5]](#_5_27)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10頁。由加屋霽堅所寫（并向神風連成員大聲宣讀）的檄文，見荒木精之，《神風連実記》，第138頁。他們攻擊政府，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還因為政府總是討好外國人，禁止佩刀，秘密幫助基督教傳播，而且打算把土地賣給外國人。熊本縣令安岡良亮任命神風連成員擔任主要神社的神官，因此，1875年太田黑成了新開大神宮的神官。（太田黑所進行的）這種占卜儀式名為“宇氣比（うけい）”。為了獲得神諭，將三種不同的行動方案分別寫在紙條上，放進一個空筒里面。搖動這個筒，從筒里掉出來的紙條就被認為是神的旨意。神風連的所有重要決策均由這種方式決定，神靈給予的答復得到了絕對的服從，即便得出的指令是令問卦者失望的否定某些行動。太田黑曾幾次被神靈禁止進攻政府軍，直到最后他終于得到了批準行動的指令（司馬遼太郎，《飛ぶが如く》第六卷，第227—228頁）。關于“宇氣比”在神風連精神上的重要性，請參考荒木精之，《神風連実記》，第35—36頁。神風連的導師林桜園（1798—1870）寫了一本研究“宇氣比”的專著，認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事記》。其中傳說須佐之男命沒有聽從天照大神的命令，兩人之間爆發的爭吵。

1. [[6]](#_6_27) 神風連的這些以及其他同樣令人發笑的狂熱行為，見小早川秀雄，《血史熊本敬神黨》，第22—23頁。作者雖然大體上同情神風連，但是卻將這類行為形容為“病態”。

1. [[7]](#_7_27) 神風連成員討厭和尚，認為他們不干凈，且他們的宗教源自日本以外的地方，因此與日本格格不入。

1. [[8]](#_8_27) 鎮臺是1871年到1888年間的日本陸軍最大單位，后改名為“師團”。——編注

1. [[9]](#_9_27) 三島由紀夫對神風連有高度戲劇化的描寫，從太田黑第一次獲得神靈的許可發動起義直到他們失敗為止（《奔馬》，第458—504頁）。三島的描述不能視為歷史證據，但他無疑廣泛閱讀過幸存的資料。

1. [[10]](#_10_27) 司馬遼太郎，《飛ぶが如く》第七卷，第42頁。

1. [[11]](#_11_27)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12頁。“報國”字面上的意思是“報效國家”。

1. [[12]](#_12_27) 他們的名稱意為“盾牌（干）和城堡部隊”，表明他們保護主人（可能是指天皇）免遭一切敵人傷害的決心。

1. [[13]](#_13_27) 他們顯然不知道熊本的叛亂已經失敗。

1. [[14]](#_14_27)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13頁。

1. [[15]](#_15_26)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15頁。“殉國”的意思是“為國捐軀”。

1. [[16]](#_16_26)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42—744頁。

1. [[17]](#_17_26) 1877年1月4日的日記，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 3, p. 419。有關天皇的簡短諭旨的內容，見《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頁。

1. [[18]](#_18_25)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頁。

1. [[19]](#_19_25) 1876年11月22日公布了天皇即將出行的消息（《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29頁）。

1. [[20]](#_20_2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0頁。

1. [[21]](#_21_24) 詩歌和序言的資料源自《新輯明治天皇御集》上卷，第45頁。在《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1頁上兩首詩前后的順序相反。

1. [[22]](#_22_23)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1頁。

1. [[23]](#_23_23)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上卷，第46頁。序言和詩歌都提到將船“劃”進鳥羽的港灣，可能是汽船行駛的一種詩意表達。

1. [[24]](#_24_21)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上卷，第46頁。

1. [[25]](#_25_21) 明治看到自己僅僅在在東京住了八九年御所就這么破敗，心里非常難過，當即安排每年撥款四千日元用于御所的修繕，同時責令京都府考慮如何才能更好地對它進行保護（《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8頁）。

1. [[26]](#_26_21) 堅持稱這些學校為“私學校”是為了說明它們不在政府資助的教育系統控制之下。

1. [[27]](#_27_20) 解釋見《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6頁。在西鄉流傳下來的書法作品中，有一條是“敬天愛人”的格言，但是在私學校中，使用的格言是在尊王攘夷時代常見的“尊王”。

1. [[28]](#_28_18) 這些傳統大多源于儒家思想，但是“私學校”教的并不是諸如《四書》這樣的“主流”儒家典籍，因為一般認為那些書是為未來的官員，而不是為武士準備的。

1. [[29]](#_29_18) 這些人包括十名巡察（警察）和幾名學生，全都來自鹿兒島。他們都是武士，但是由于來自窮鄉僻壤而被駐守在鹿兒島城的武士們嘲笑。雙方都懷恨在心，無疑促成了中原和其他人與中央政府的合作。

1. [[30]](#_30_18) 他的自白書的要點，見齋藤信明，《西鄉と明治維新革命》，第361—362頁。中原曾經跟一位信得過的老朋友（此人立刻將這個消息通知他的上級）說，他的主要任務是離間武士和私學校之間的關系。這在鹿兒島縣的邊遠地區比較容易，但在城內卻非常困難。摧毀城內私學校的最佳方法就是殺死西鄉和他的兩名副官——桐野利秋和篠原國干。中原在這份正式的自白書中說，一旦暗殺了西鄉，將發電報通知東京，隨后將是陸軍和海軍的介入。齋藤相信這份自白書的真實性，他雖承認自白書是通過嚴刑拷打獲得的，但是強調嚴刑拷打在當時是合法的。

1. [[31]](#_31_16)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5—36頁。上田滋強調中原以及那些和他一道的人不可能接到刺殺西鄉的命令，因為西鄉被認為是一種牽制力量（《西郷隆盛の悲劇》，第157—159頁）。那些政府官員心里非常清楚，西鄉的死就像捅了一個馬蜂窩。上田暗示是政府故意散布暗殺的傳聞，從而引發爭端。

1. [[32]](#_32_15) 這一次他觀看了《翁》、《三輪》、《羽衣》、《安宅》、《正尊》以及《殺生石》（《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4頁）。如果這些劇目全部演完的話，需要一整天。

1. [[33]](#_33_1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6頁。他們提到的縣有熊本、佐賀、福岡、高知、岡山、鳥取、彥根、桑名、會津和莊內，其中一些縣隨后被廢除。

1. [[34]](#_34_1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7頁。

1. [[35]](#_35_13)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7頁。

# 第二十八章 功臣？叛臣？



1877年2月是日本現代史上值得紀念的幾個月份之一。這個月爆發的西南戰爭是日本的最后一場內戰，也是維新功臣之間的一場較量。戰爭不僅威脅著政府要員們所期望的民主進程，還關系到政權的存亡。西南戰爭并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如果薩摩取勝，肯定將改變日本的整個政治形態。

從叛亂剛剛萌芽開始，明治天皇就掌握著戰爭的最新情況，而且他對收到的消息并非漠不關心；然而這段時間，天皇在京都的生活似乎完全未受到鹿兒島突發事件的影響。他參觀學校、聽學生朗誦、給優秀學生頒發購書的獎金。剛開始天皇幾乎每天都去騎馬。有時他會離開京都。例如，2月5日他視察了新開通的京都—神戶鐵路線上的所有站點。木戶孝允的日記令人想起這種儀式的沉悶刻板之處：

九時，御乘車至大阪停車場。（天皇）著，兵隊整列奏樂，諸官員奉迎。于停車場中設御座，各國公使等列御座下左方；太政大臣不快，以余為始皆列右方。式部頭[[1]](#_1__Gong_Ting_Fu_Ze_Yi_Shi_De_Zu)引介大阪府知事，知事引書記區長等進御前，陳上祝辭。（天皇）有賜語。[[2]](#_2__1876Nian_2Yue_5Ri_De_Ri_Ji)

兩天之后的2月7日，明治出發前往大和國，祭拜先祖神武天皇的山陵。這是他長久以來的愿望。中途，天皇在宇治川的橋上駐足停留，觀看漁人從幾十艘小漁船上撒網捕魚的情景。當晚天皇在宇治市過夜，賞月時他創作了這首短歌：

朝日山——

在為許多家族的士兵

所熟悉的

宇治川的月光下

清晰可見[[3]](#_3__Zhe_Shou_Duan_Ge_Fei_Chang_F)

第二天天皇去鳳凰堂，參觀這座名剎的建筑和珍寶。隨后天皇來到奈良，駐蹕于能夠欣賞附近山巒美景的東大寺。

2月9日，明治祭拜春日大社。神社舉行了神道教儀式，天皇聆聽了神樂演奏。下午，明治參觀了東大寺和法隆寺的珍寶展覽，還觀看了金春流演員表演的能樂《石橋》。[[4]](#_4__Jin_Chun_Liu_Zai_Nai_Liang_F)

那天晚些時候，明治天皇在正倉院參觀了王室珍藏的寶貝。這座建筑通常大門緊鎖，這一次卻敞開迎接客人。天皇表示對那塊古老的香木——著名的“蘭奢待”非常感興趣。15世紀的足利義政和16世紀的織田信長都得到過“蘭奢待”的薄片，作為彰顯自己地位的象征。回到住處后，天皇請求獲得一片“蘭奢待”。博物館館長切下一塊兩寸長的薄片，獻給天皇，天皇將其分成兩半，點燃了其中一塊。“熏煙芬芳，充溢行宮。”[[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天皇將剩余的“蘭奢待”帶回東京。

2月11日，按陰歷這天是神武天皇加冕的日子，[[6]](#_6__Zhe_Yi_Tian_Bei_Shi_Wei__Ji)天皇到神武天皇的墳前祭拜。1863年，有一處地方被指定為神武天皇的山陵，并在孝明統治期間進行了修復。但從那以后那里一直遭到忽視，直到現在它才得到適當的尊重。天皇祭拜山陵后，觀看了吉野郡國棲村至今保存的古代民間舞蹈和舞樂，隨后還參觀了用來制造著名的三輪素面的機器。

2月12日，明治參觀了和菅原道真有關的遺址，菅原在流放的路上曾經過這個地區。那天早上“白雪霏霏，崇高之氣滿天地”。天皇對初世祖的神圣之地，對與國家歷史的關系如此密切的大和國不舍，希望再待一天，但是宮內省回答說，“日程俄變，勞煩民眾，且鹿兒島情勢風云告急，陛下應早日還幸東京”。天皇立刻同意了。

在面對鹿兒島傳來的緊急消息時，天皇鎮靜得令人吃驚。當然，他的大和鄉村之旅并非只是消遣活動。天皇或許高度重視祭拜神武天皇以及其他天皇的山陵，但除此之外，此行（就像之前的九州和北海道之行）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作用，即拉近和民眾之間的距離。天皇不顧戰爭的威脅，決定按原計劃訪問奈良，可能是聽從了木戶孝允的建議。木戶在2月10日的日記中描述完鹿兒島的緊張局勢后寫道：“余本動搖，然還幸之御愿，必不可俄然變化。還幸前有暴動之時，可駐輦。”[[7]](#_7__1877Nian_2Yue_10Ri_De_Ri_Ji)

不管怎樣，天皇在大和附近繼續自己的休閑之旅，他參觀學校、紡織廠和帝陵，此時宮廷衛戍部隊以及東京和大阪的駐軍正被派往九州。2月12日，陸軍卿山縣有朋接到熊本鎮臺發來的情報，立即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通報對策。山縣警告說，鹿兒島的形勢極為危險。如果戰爭爆發，雖很難預料會發生什么事以及結果將會如何，但絕對不會無足輕重。而且，一旦鹿兒島開始行動，日本各地的其他縣可能會加入他們。

山縣承認自己不知道萬一爆發全面叛亂，鹿兒島會采取何種策略，但他列舉了三種可能性：西鄉的軍隊可能會利用汽船突襲東京和大阪；他的軍隊可能會攻擊長崎和熊本鎮臺以便控制九州；他們也可能藏匿在鹿兒島，同時密切留意全國各地的陰謀跡象，等待合適的時機再次發動叛亂。山縣正確地推斷出西鄉將采取第二個方案——攻擊熊本鎮臺——而且認為，對付這種策略最好的方法莫過于海陸聯軍進攻鹿兒島城這一西鄉軍隊的神經中樞。他認為，一旦拿下這座城，摧毀其他地方的叛軍將變得輕而易舉。[[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2月13日早上8點，三條離開京都，半夜才趕到天皇在奈良的下榻處。他是來請求天皇同意出兵鹿兒島的。天皇同意了，于是三條（凌晨2點）退下。他下令位于神戶的海軍少將伊東祐麿開始行動，后者立刻拔起“春日”號的船錨，向長崎駛去。“龍驤”號已經在那里等待了。

先前，由于沖突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巖倉具視曾向大久保利通建議，如果鹿兒島發生騷亂，應該派一名特使去告誡西鄉隆盛和島津久光。就在西鄉私學校的“學生”奪取武器的消息傳來時，巖倉提出自己充當特使，立即趕往鹿兒島。大久保不同意，認為天皇此時正在西部，巖倉的責任過于重大，不能離開首都。但是，隨著東京收到越來越多有關鹿兒島的報道，顯然需要做點什么來阻止“學生們”的暴動。大久保決定到京都去見天皇。由于仍不清楚西鄉和島津會采取什么行動，巖倉決定不公開派討伐軍到九州去的消息。

此時天皇正在繼續游覽關西地區的勝景。2月14日，他身穿朝服，參拜了住吉神社。之后，他換上便服參觀了豐臣秀吉曾經喝過茶的茶屋。接著天皇一行來到大阪，駐軍士兵一路向他舉槍致敬。為了迎接天皇的到來，街道兩旁的房子都掛上了旗子、燈籠和色彩鮮艷的三角旗。炮兵向他鳴炮致敬，天皇在駐防區接見了山縣有朋和木戶孝允。午飯后他來到大阪英語學校，聽學生用英語朗誦，并觀看了科學實驗。之后，天皇又來到大阪師范學校，再次參觀教室，并向優秀學生贈送禮物。最后，天皇來到大阪造幣局，在那里接見了許多高官，并吃了一頓西餐。

即使天皇依然年輕，這樣一天下來肯定也很累，而余下的旅程同樣讓人疲憊不堪。15日，在參加完其他活動之余，天皇對市小學的優秀學生做了日本歷史測試，考問他們六位天皇（景行、仁德、后白河、后宇多、正親町和后陽成）的有關功績。短暫休息之后，他又提問一群鄉間小學生有關日本地理的問題。16日，天皇在離開大阪之前，參觀了一家靛藍染廠，并觀看了整個工藝流程，之后回到京都。

這個時刻是明治一生中的重要時刻，傳記作者特別想知道他這時的想法。作為一個極為重要的縣，鹿兒島正處在反抗國家統治，企圖獨立的邊緣，其他縣市也有呼應叛亂的跡象，明治在得知這一消息后感受如何？西鄉不僅是維新的功臣，還是天皇特別喜歡的人，明治的政府軍不久之后可能將和西鄉隆盛領導的軍隊作戰，天皇對此的反應如何？也許明治馬不停蹄地進行日常訪問，正是為了逃避這些問題。他在京都余下的日子里所表現出的冷漠，可能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2月16日，大久保從東京來到神戶會見伊藤博文和川村純義。三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之后，大久保和伊藤到京都去見三條實美。第二天，他們（和木戶一起）來到御所，在天皇在場的情況下進行了幾個小時的磋商。后來趕到的山縣也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派一名特使到鹿兒島去。天皇召來熾仁親王，命令他擔任敕使。熾仁計劃2月18日乘坐“明治丸”出發。船正要離開之時，熊本鎮臺傳來消息，稱“鹿兒島暴徒先鋒，已闖入縣內抵達佐敷，不日戰端將開”。于是熾仁推遲了出發的日期。

14日，西鄉帶領的鹿兒島軍隊進入熊本縣。所有的資料均稱西鄉不愿發動戰爭，但是被暗殺謠言激怒的鹿兒島武士已經無法控制。12日，西鄉與副手桐野利秋和筱原國干聯名給鹿兒島知縣大山綱良寫信，告知他自己是為了到京都訊問政府幾個問題。[[9]](#_9__Xin_De_Yuan_Wen_Jian___Ming)第二天，大山依次給三條實美和幾名縣令去信，通知他們西鄉及其護衛上京途中將經過他們縣。他還暗示西鄉對刺殺他的陰謀感到委屈。[[10]](#_10__Yuan_Wen_Jian_Shan_Xia_Yu_F)各鎮臺也收到了同樣的信。

鹿兒島軍未收到任何答復，就開進了熊本縣。西鄉的軍隊由七個步兵大隊以及炮兵和輜重部隊組成，一共約一萬五千人，[[11]](#_11__Shu_Ju_Jian___Ming_Zhi_Tian)其中大多數都持有現代武器。即使收到西鄉的軍隊已經越過邊界進入熊本的消息，天皇在京都的生活仍然保持原樣。例如，2月18日，天皇到天龍寺村參觀愛國詩人山中獻（1822—1885）的宅邸。午飯后，他觀看了漁人在大堰川捕捉鯉魚的過程，還視察了一間造紙廠。

那天晚上，太政大臣三條實美認為鹿兒島私學校的學生明顯是要造反，于是和木戶、山縣、大久保以及伊藤進行磋商。第二天早上，他將緊急情況上奏天皇，天皇下令鎮壓叛軍，任命熾仁親王為征討總督。陸軍卿山縣有朋和海軍大輔川村純義將協助熾仁作戰。天皇宣布，自己將留在京都直到平定叛亂。

西鄉的軍隊離開鹿兒島那天，地面的積雪有六七寸厚，這是通常溫暖的九州五十年來最厚的積雪。盡管西鄉的軍隊經過嚴格的訓練，紀律嚴明，但整支軍隊看起來肯定很奇怪。西鄉、桐野、筱原等高級將領由于仍未從政府辭職，都穿著跟政府軍一樣的制服。其他軍官則穿著海軍、警察，或是文職人員的制服。軍官的手臂上戴著顯示他們所屬分隊的袖章，還系著一條縐綢或者白棉布的腰帶。他們的左胯插著一把刀，右手執一面鮮艷的紅旗。普通士兵的著裝則更為奇怪。其中最奇特的是剛從國外回來的村田新八，他騎著馬，身穿燕尾服，頭戴高禮帽。[[12]](#_12__Shan_Xia_Yu_Fu____Yan_Jiu_X)

鹿兒島兵的目的是攻下政府在九州南部的軍事重鎮熊本城。守城的士兵跟去年被神風連屠殺的那些士兵一樣，都是應征入伍者。他們士氣低迷，享譽全國的西鄉的威名讓他們害怕。

熊本鎮臺不能指望熊本武士伸出援手，因為他們有些和鹿兒島軍有秘密聯系。守城士兵的唯一希望是堅守城池并等待政府軍的到來。當時城內的倉庫著火，所有儲備的糧食燒毀殆盡。他們沒有辦法，為了對付可能持續幾周的圍城，只好向附近的村莊征糧。2月19日，鹿兒島縣令派信使給陸軍少將熊本鎮臺司令官谷干城（1837—1899）送去三份文件——西鄉要求到東京去的原始文件、縣令的回復以及中原尚雄供述暗殺計劃的副本。鎮臺司令官拒絕接受這些文件，并告訴信使，如果西鄉的士兵強行要從城下經過，守城的士兵只能予以阻擊。西鄉的先頭部隊現在距離他們只有八公里。

2月21日，雙方第一次交鋒。鹿兒島方面的幾支小分隊試圖強行進入熊本城，但是被守城的士兵用炮火擊退。谷少將向位于大阪的征討軍總部發電報告開戰的消息，山縣將消息轉給京都的三條實美。京都來信要求谷堅持住，一舉殲滅叛軍。第一旅和第二旅承諾將于2月25日抵達。

22日，叛軍主力開始兩面夾攻熊本城。23日他們加強了進攻，但卻未能前進一步。他們意識到城內的農民兵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不堪一擊，于是做好了長期圍城的準備。

2月22日夜，“月色煌煌如晝”，代理連長陸軍少佐乃木希典（1849—1912）帶領小倉第十四步兵連，與叛軍展開激戰。叛軍高喊口號，抽出佩刀，近身廝殺。政府軍支持不住，被迫后退。當夜戰斗極其激烈，連隊護旗手戰死，隊旗丟失。乃木見狀，驚駭萬分，拼死返回戰場，試圖奪回連旗，但是被部下勸阻。征討軍總司令認為當時形勢不得已，未追究乃木有關旗幟的事，但是乃木沒有忘記，三十五年后，乃木為贖罪而自殺。

與此同時，熊本的武士開始成批地倒向西鄉的軍隊，他們數落政府沉溺于西方經驗，而忽略了日本傳統，認為這將使日本無法重振昔日的雄風。隨著懷有這種信念的武士倒戈，不久西鄉的軍隊就暴漲到兩萬人左右。在這些武士當中流行著尊王攘夷的思想，一點也不令人吃驚。他們不僅痛恨西化政策造成自己生活的變化，還受到神風連成員視死如歸精神的鼓舞。西鄉本人并不反對西化（喬治·華盛頓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然而私學校的學生卻表現出強烈的攘夷思想，我們可以從他們唱的一首歌中看出來。這首歌的開頭是這樣的：

不管現在還是過去這里都是神國，

俄羅斯、美國、歐羅巴，

人們被愚蠢的外國做法所迷惑

他們借用外國的法律

毫不關心日本的混亂情況……

他們不僅公開反對外國的影響，還質疑維新的成果：

他們取消大名時

說是要回到過去，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這首歌特別選出大久保和三條作為攻擊對象，它的控訴如下：

他們的賣國心都干了什么？

他們把國家賣給骯臟的外國人

還命令我們上繳武器和佩刀

這種法令我們以前沒有聽過以后也不會聽到……

歌曲的末尾表達了武士對死亡這一宿命的迷戀，這與其他國家以勝利為基調的戰歌形成了鮮明對比：

我們已經忍無可忍

為了拯救數以萬計的民眾

我們武士只能盡力而為，

今天是我們的最后一天，我們正在死亡之旅上行進。[[13]](#_13__Zheng_Shou_Ge_De_Ge_Ci__Jia)

戰爭已經正式開始，但西鄉仍堅持自己的目的只是到東京去問政府幾個問題。他強調自己的計劃毫無秘密可言：很久以前他就已經通知沿途將經過的縣和鎮臺。然而熊本鎮臺卻不讓他通過，因此他別無選擇，只好抵抗。

2月28日，鹿兒島縣令大山寫信給三條和巖倉，解釋西鄉為何會發動戰爭。大山對政府下令平定鹿兒島感到震驚，并堅持認為西鄉“且開學校，導以忠孝，故往年雖有佐賀之亂、熊本·山口之變，鹿兒島縣內未見些許動搖。然以何嫌疑而下暗殺隆盛等命令，其理由不能不知。又隆盛等東上之際，隨行之徒攜帶兵旗，此是有暗殺之命，途中異變難測，不得已而為之”。最后大山“愿賜至急敕諭，鎮撫縣民，順令隆盛貫徹其趣意”。[[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但是，巖倉接到這封信時，已經下了新的最后通牒。憤怒的西鄉寫信給熾仁親王，說如果一再無視自己的請求，他將別無選擇，只好武力強攻熊本。

熊本之圍一共持續了五十四天，直到4月14日才解除。在這期間，守軍與外界之間的聯系幾乎完全中斷，僅偶爾有信使偷偷溜出敵人的封鎖線，向外報告城內的情況。3月4日，已經在大阪總部待了幾天的木戶回到京都，向天皇詳細報告了戰斗的進展以及未來的目標。天皇聽說戰爭正變得有利于政府軍時，大大松了一口氣。然而，一想到西鄉被打上叛徒的烙印，他的心里就不好受。天皇對一名曾經盡忠職守的臣子表現出來的深情，令木戶大為感動。[[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熊本鎮臺的指揮官及幕僚。前排中為谷干城，右二是樺山資紀，后排中為兒玉源太郎

對比歐洲君主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做出的反應，明治顯得非常富有同情心。他們在得知自己曾經寵信的人現在竟帶頭起來造反時，可能會強烈地批評這個人忘恩負義，而絲毫不去考慮被逼造反的這個人所承受的痛苦。明治對西鄉隆盛的寵愛之情可能使他希望，西鄉的軍隊與政府軍之間的對決仍有可能避免。事實上，直到3月9日，天皇才解除了西鄉、桐野和筱原的官階和職務。

相反（而且與歐洲典型的叛軍領導不同），完全沒有跡象表明西鄉對明治天皇不滿，或是他希望以另一種政體來代替君主制。西鄉似乎認為天皇的直接統治是政府的理想形式，即便那是專制統治。[[16]](#_16__Zhu_Si_Long_Ming____Xi_Xian)那些為他而戰的武士也有著同樣的觀點。對他們來說，西南戰爭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清除天皇周圍那些邪惡官員，使他在統治時免受他們的壞影響。

其實，天皇身邊如木戶孝允等人，并沒有（像戰時經常發生的那樣）將叛軍領導描繪成叛徒或者忘恩負義者。木戶說西鄉當然不是像足利尊氏那樣舉起叛軍大旗反對后醍醐天皇的壞人；相反，他只是“識乏而不知形勢，為一朝之怒所激，以至亡身害國。隆盛之所業固惡，然政府亦當反省”。[[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熊本城攻防戰是決定性的戰役。如果熊本城落入叛軍手中，讓他們進入肥前國，那么九州全境就將落入叛軍之手。[[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但是如果叛軍在熊本吃了敗仗，戰斗將會很快結束，因為叛軍領導不可能退回鹿兒島打持久戰。[[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然而援軍卻來得極慢。農民兵的堅韌使叛軍吃了一驚，在克服了最初的驚訝之后，叛軍模仿普法戰爭期間普魯士人對梅斯的圍攻，包圍了熊本城。[[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一百名精心挑選的警察組成的“拔刀隊”，取得了政府軍的第一次勝利，他們拔出刺刀，向一處政府兵連日累攻不下的堡壘發動猛攻。[[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3月15日，政府軍向田原坂的敵軍據點發動攻擊。這次戰役最為緊張激烈，雙方均傷亡慘重。20日，政府軍取得突破性進展，攻下了位于山頂的堡壘。“賊兵斃者數百，死尸塞路，壕水為赤。”敵軍四處逃竄。三個星期后，熊本城的包圍才能解除，而戰斗一直持續到九月底才終止，然而田原坂的勝利預示了戰爭的結果。薩摩武士盡管驍勇善戰，但終究被裝備先進且人數占優的政府軍打敗。

戰斗一打響，天皇似乎就無法思考戰爭以外的事情。除非需要接見什么人，否則他極少到御學問所去，但是天皇每天都會聆聽三條實美匯報戰斗的最新消息。大部分時間他都被后宮的女人包圍著。天皇的主要謀臣——三條、巖倉、木戶等人——費盡心機地想提升天皇的君德，尤其關心他在國家危難時的表現。他們一再懇求天皇到御學問所去，但是沒有效果。3月20日，三條在與木戶討論過對策之后，徑直走到內宮，規勸天皇，天皇最后同意改正自己的行為。從21日開始，他將隔天一次到御學問所聆聽戰事報告。天皇將自己的老師元田永孚從東京招來，詢問他相關的地理知識（元田是熊本縣人）。他還要求元田講述日本和中國歷史上的著名戰役。[[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3月25日，在木戶的要求下，天皇同意離開御所，在城中騎馬巡幸。天皇總是拒絕走出深宮，令木戶非常擔憂，他懇求天皇到京都周圍轉轉，雖然有些風雪，但他一定會喜歡。盡管天皇非常喜歡騎馬，但是自從戰事開始以來，他只在御所內騎過兩次；然而那天上午10點，天皇在木戶、多名侍從和宮廷官員的陪同下，騎馬出了南門。街道泥濘不堪，弄臟了天皇的衣服。也許木戶希望天皇騎馬的樣子能討得京都民眾的歡心。熊本之戰進行了一個月，民眾已經表現出了厭戰的情緒。[[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叛軍依然頑強抵抗，不讓政府軍解開熊本之圍。政府擔心如果被發現軍隊戰力不強，可能會激發國內其他地方的不安定因素，使他們紛紛以政府軍為試刀石，一試自己的實力，甚至可能導致政府垮臺。4月4日，三條、木戶、大久保和伊藤商討后決定，如果未來幾天形勢沒有好轉，他們將請求天皇搬到離戰事更近的下關去。[[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三天后，他們甚至想出了更果斷的一步：請求天皇親征。雖然有征兵，但政府軍人數依然不夠，而且公眾對戰爭局勢抱有疑慮，天皇親自掛帥是喚起民眾熱情的一種方式。

這時，熊本城內的情況正持續惡化。食品和彈藥嚴重短缺，士官的午飯是小米飯，早晚則是粥，工兵一天三頓都是小米飯。煙草是使士氣保持不落的一樣東西，然而那些“煙草”實際上卻是茶葉。即便如此，城里的糧食估計只能維持十八天。

4月12日，征討參軍黑田清隆指揮政府軍的全部力量，將叛軍夾擊在熊本城下。叛軍指揮永山彌一郎覺得大勢已去，選擇自殺。那天下午，城內的守軍指揮看到政府軍已經來了，便下令士兵出城廝殺，從而與政府軍形成鉗形攻勢。下午4點，陸軍中佐山川浩帶領第二旅沖破了敵軍的防線。城內的士兵高舉旗幟，大聲歡呼，歡樂的叫聲響徹整個熊本城。熊本之圍解除。

4月15日，黑田進入熊本城，第二天，山縣也來了。這場戰爭至此已經造成七千五百人死亡，熊本市十之八九被燒成灰燼。即使取得了熊本之戰的勝利，戰斗仍繼續了五個月，但叛軍的人數在不斷減少。西鄉的士兵在潰散，只有靠他出色的指揮才使他們免于被包圍和殲滅的命運。偶爾西鄉還能打敗人數占優的政府軍。[[25]](#_25__Xi_Xiang_8Yue_19Ri_Zai_San)

這段時間明治越來越無心學習。5月，他將元田送回東京。元田在離開之前，向天皇講述了什么是君主的正確行為。盡管元田的措辭非常委婉，但意思卻再清楚不過：“有德則可為人君；無德不可為人君。”[[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天皇不僅中斷了學業，連太政大臣和參議要見他一面也不容易。天皇曾同意按時到御學問所去，但也只在早上去，下午他就在后宮休息。

經過長時間與病魔的斗爭，5月26日，木戶孝允去世。他的死對天皇是個沉重打擊，但卻沒有改變他的低落狀態。7月，三條實美覺得木戶已死，自己對天皇的教育責任比以前更大了。他認為最好是讓元田和福羽美靜回到京都，繼續授課，但是沒有天皇的許可，不能把他們叫來。要獲得天皇的許可非常困難，然而兩位老師最終還是來到京都。三條奏請天皇接受他們的指導。天皇同意，宣布從今以后將努力學習，然而他連一堂課也沒有上。

7月28日，天皇離開京都，啟程返回東京。由于擔心對九州的軍隊有不利影響，他已經把行程推遲了幾次，但是政府分隔兩地造成的不便又使他必須回去。在從神戶返回橫濱的船上，天皇望著高聳入云的富士山，創作了三首短歌，其中一首是：

輪船匆忙地

向東駛去

看到長滿樹木的富士山

出現在波浪之上

是多么地令人欣喜[[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他用鉛筆在筆記本上匆匆寫下三首詩，然后撕下，遞給詩歌造詣頗高的侍從高崎正風（1836—1912），請他直言不諱地做出評價。高崎恭敬地閱讀了這些詩之后，說第二首做得特別好。天皇問他其他兩首的問題出在哪里。高崎回到說，其他兩首沒有問題，只是不如第二首好。天皇要高崎解釋第二首好在什么地方。隨著談話的深入，天皇的興趣越來越濃。他給高崎看了自己之前創作的一些短歌，高崎對每一首都認真研究了一番。結果天皇給他看了三十多首。這件事有助于消磨船上的時光，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戰爭而情緒低落，對一切了無興趣的天皇，可能從這個時候開始，重新燃起了對生活和天皇職責的興趣。[[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7月4日，權典侍柳原愛子系上了腹帶。天皇的頭三個孩子出生后都夭折了。醫生認為接下來這個孩子應該在最佳的環境下分娩。因此，考慮到她身體素來虛弱，大家決定不將愛子送到京都分娩。9月23日，就在九州戰事結束的前一天，愛子在東京的梅御殿[[29]](#_29__Zhe_Shi_Wei_Yu_Qing_Shan_Yu)誕下一名男嬰。

西鄉最后抵抗的據點是城山，他開辦第一所私學校的地方。西鄉只剩下四十個人，而且身負重傷。他朝著皇宮的方向跪下，把頭一低，副官別府晉介立即將他的頭砍下。戰爭結束了。

1. [[1]](#_1_28) 宮廳負責儀式的最高長官。——編注

1. [[2]](#_2_28) 1876年2月5日的日記，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 3, p. 434。

1. [[3]](#_3_28) 這首短歌非常復雜。やそうじ（八十氏）意為“許多家族”，但是它的掛詞（和歌用語，指一詞多義的詞語。這里うじ即可和前面組合，解釋為“氏”，又可和后面組合，解釋為“宇治”。——編注。）卻是“宇治川”這個許多家族的士兵曾經戰斗過的地方。水中的月兒圓圓，但是すむ可能是雙關語，意思是“住著”——月亮住在河里。月光中的 “旭山”（あさひ山，“あさひ”意為“早晨的太陽”）可以看成是月亮和太陽之間的對比。

1. [[4]](#_4_28) 金春流在奈良非常強大。

1. [[5]](#_5_2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54頁。

1. [[6]](#_6_28) 這一天被視為“紀元節”。1873年采納陽歷時，這一天被定為節日。

1. [[7]](#_7_28) 1877年2月10日的日記，見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441。

1. [[8]](#_8_2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1頁。亦可見Roger F. Hackett,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 pp. 77-78。

1. [[9]](#_9_28) 信的原文見《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7頁；亦可見山下郁夫，《研究西南の役》，第132頁。

1. [[10]](#_10_28) 原文見山下郁夫，《研究西南の役》，第133頁。

1. [[11]](#_11_28) 數據見《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7—78頁。西鄉領導的軍隊約三萬人，見山下郁夫，《研究西南の役》，第137頁。士兵的主體是一萬三千名私學校的“學生”。

1. [[12]](#_12_28) 山下郁夫，《研究西南の役》，第152頁。這些資料源自各種當代文獻，例如河東祐五郎的《丁丑弾雨日記》以及武野正幸的《血史西南役》。

1. [[13]](#_13_28) 整首歌的歌詞，見山下郁夫，《研究西南の役》，第127—129頁。不知道作者是誰。最后一句提到“死亡之旅”表明，歌曲作于進攻熊本之時。歌中的每一句都按照伊呂波歌的音節順序開頭。

1. [[14]](#_14_2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00頁。

1. [[15]](#_15_2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08頁，轉引自《木戶孝允文書》第七卷，第334頁。這些話被記錄在木戶寫給伊藤博文的信中，可能是寫于1877年3月4日的那封信。

1. [[16]](#_16_27) 豬飼隆明，《西郷隆盛》，第224頁。

1. [[17]](#_17_2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21頁。

1. [[18]](#_18_26)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20頁。亦可見木戶1877年3月4日寫給宍戶璣的信中，見《木戶孝允文書》卷七，第331頁。

1. [[19]](#_19_26)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19頁。

1. [[20]](#_20_25)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巧合的是，對梅斯和熊本的圍攻都堅持了五十四天。

1. [[21]](#_21_25)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25頁。亦可見木戶1877年3月14日的日記（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463）。“拔刀隊”隨之在詩歌中被不朽地傳唱。

1. [[22]](#_22_2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30—131頁。

1. [[23]](#_23_2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34頁。木戶在3月22日的日記中寫下了這番話（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468）。

1. [[24]](#_24_2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46頁。

1. [[25]](#_25_22) 西鄉8月19日在三田井村取得勝利，詳細描述見《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37頁。

1. [[26]](#_26_2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81頁。

1. [[27]](#_27_21)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23頁。

1. [[28]](#_28_1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47—249頁。八月底高崎成為明治的詩歌老師。

1. [[29]](#_29_19) 這是位于青山御所內的一棟房子，是皇太后的居所。

# 第二十九章 大久保遇刺



至少就天皇而言，1877年余下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處理西南戰爭的善后工作。參加戰爭的各位將領和下級士兵一起凱旋，對勝利有突出貢獻者被授予獎章。西鄉隆盛的行為沒有得到原諒，但人們對他頗為同情。西鄉死后的第二天，天皇要求皇后為西鄉隆盛創作一首短歌。她寫道：

海浪已經平靜的

薩摩岸邊

并非淺灘——

以分歧開始

卻以傷感結束[[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薩摩結束抵抗，意味著不會再有人死于這場不受歡迎的戰爭。天皇到醫院探訪正在治療的傷員。一些人失去了胳膊或者手指，有些人失明。天皇感到很難過，要求把五名傷殘人員帶來見他。他和藹地問他們受傷的地點和時間、現在還疼不疼。接著，天皇神情哀傷地摸了摸他們的傷疤。傷員們頭低低地，感激地哭了起來。山縣有朋看到天皇如此富有憐憫心，不禁立正并敬了個禮，在場的每個人看到這一幕都潸然淚下。[[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在這個時期和后來天皇與臣民接觸的描述中，我們一再遇到“感泣”這個詞。一百年前的人比現在更容易掉眼淚，即使武士落淚也不會被視為懦弱。十年前隱于御所高墻后的神秘天皇，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威嚴而仁慈的人，他關愛民眾的每個動作都使人們感激涕零。

天皇回到東京之后，生活又回復到他在京都變得低落之前的那個樣子。他每天早上從10點開始，參加三十分鐘的內閣會議。[[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天皇再次在內廷進行夜話，不管那天當值的顧問是誰。例如，10月4日，高崎正風和元田永孚就陪伴著他。在談話中間，天皇拿起毛筆寫了幾個大字，隨后作了序和和歌，其中兩首是：

今夜

在臣下們的陪伴下

我拿起筆

將一切東西寫下來

并給他們看

無倦于

漫漫秋夜

我挑燈

并欣喜地寫下

這些字

根據明治的生活記載，“兩人（高崎和元田），感泣睿慮，不覺拜伏”。皇后問高崎是否寫一首詩作為答復。高崎立刻作了下面這首短歌：

在審視

天皇留下的墨跡時

我體會到

他的感情之深

不禁淚濕衣袖

元田覺得自己不能繼續保持沉默，于是創作了兩首漢詩。天皇非常喜歡這樣的夜話，此后便不時地與那些侍候自己的人交流詩作。10月12日，侍從荻昌吉畫了一個葫蘆。山口正定在畫上題詩道：

我將用這個葫蘆飲酒

以體會

顏回

或者也許秀吉

那么喜歡喝酒的原因

天皇和皇后看到這首詩都笑了。[[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這種對他們家庭生活的罕見描述真是非常可愛。

長期荒廢學業之后，10月23日，天皇在書房和元田永孚一起讀了一個小時的書。[[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漸漸地，他的學習計劃再次包括了聽課和讀書。元田認為，他們閱讀的典籍為君主提供了德行的榜樣，他用詳細而通俗的語言解釋課文，將其與近代歷史對比，并列舉了歷代有德君主的例子。元田一直嘗試——而且通常都能成功——激發天皇的興趣，盡管剛開始他并不知道什么東西能特別引起天皇的興趣。一天晚上，在讀了周宣王被姜后的規諫所感動，決定勵精圖治的故事之后，天皇要求妃子們以“感諫勤政”為題創作一首和歌。[[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明治仰慕那些衷心接受規諫并改過自新的君主。

天皇在學業長期荒廢之后，自我反省意識重新覺醒，并樂于接受顧問的批評，這些都使元田非常感動。12月13日，一份更加全面的學習計劃開始實施。[[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不久前，在青山御所的一次賞菊大會上，天皇公正而英明的觀點給元田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他對外國的看法。元田從未聽過天皇說話如此流利，他希望外國人能夠聽到天皇說的話。[[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天皇還恢復了騎馬的熱情。一開始這挺受顧問們歡迎，但是后來他們認為天皇的行為過火了，擔心他由于過度疲勞而從馬上摔下來。巖倉具視向天皇提過建議，但是沒有效果。1878年1月初，雨下個不停，然而天皇每天都要到皇宮庭院的小徑上騎馬，絲毫不介意小腿全是泥濘。皇家馬廄的車夫和馬夫都累得筋疲力盡。1月12日，兩名侍補[[9]](#_9___Shi_Bu__Zhe_Ge_Ming_Zi_You)土方久元（1833—1918）和高崎正風勸諫天皇。“（天皇）溫顏聽之，言終稱所申為善。以來馬場之事，一任馭者意見。”天皇如此樂于聽從他們的意見，兩名侍補泣涕而退。[[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第二天，天皇和土方一起去騎馬。在經過一處松樹林時，土方的馬脫韁，人差點摔下來。天皇立刻騎上來問到，“土方無恙吧？”前一天他剛被勸諫，今天就發生了同伴差點摔下馬的事，內心不免有所觸動。那些過后聽到天皇這番話的人都由衷地贊美他的寬宏大量和高尚品質。

這個時期，明治與其他國家政府首腦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給法國總統帕特里斯·麥克馬洪（Patrice de Mac-Mahon）寫信，落款是“保有天佑踐萬世一系之帝祚日本國皇帝，睦仁”。[[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他從未在給外國人寫信時使用這個強大的頭銜。相反，中國皇帝在寫信給他時，往往自稱“大清朝大皇帝”，而稱呼明治為“大日本國大皇帝”。[[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將兩個皇帝放在同等的位置，對清廷來說是前所未有的事。

明治似乎對日本歷史有了自覺的認識，不管是1877年9月美國人愛德華·莫爾斯（Edward Morse）發現的貝冢，還是西南戰爭，都被他視為自己統治期內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他對自己的祖先重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慣常的宮廷禮節、互相拜訪和交換禮物以及作詩迎新，揭開了新的一年——1878年的序幕。1月下旬，天皇頒布詔書，強調農業為立國之本。既然已經平定了所有的叛亂，作為治國之道的基本政策被再次提起。

我們只是偶爾才知道一點與天皇有關的問題。天皇從善如流，似乎是在鼓勵身邊的人對自己的行為提出異議（自然是用極尊敬的語氣）。例如，2月3日，盡管那天是星期天，但當值的侍補山口正定請求面見天皇。山口冒著惹天皇不悅的危險，要求天皇飲酒的時候更加節制，因為前年他患的腳氣病很可能復發。[[14]](#_14__Ta_Di_Yi_Ci_Fa_Bing_Shi_Zai)這一年，在歡度新年等節日時，天皇一直都過度放縱自己。在1月10日的一次聚會上，他一直喝到凌晨3點，而三天前他在會見山縣時一直喝到凌晨5點。山縣懇求天皇不要喝這么多，尤其是在深夜。

天皇欣然接受了這些“規諫”，據說，人們再也沒見他喝醉過。[[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沒有跡象能夠解釋明治為何會喝得這么兇。即使很久以后，仍然有許多認識的人證明明治喜歡喝酒。曾參加過西南戰爭的陸軍少將高島鞆之助回憶說：

當時的宮廷崇拜男子氣概和尚武精神。天皇喝得很兇。有時他會召集喜歡的朝臣，大開酒宴。盡管承認這一點有些難為情，但我的酒量不大，一直都在逃避這種聚會。但是山岡鐵舟和大納言中山忠能都是酒鬼，天皇每次開宴，總是會叫上他們。一邊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一邊聽人講英雄故事。沒有什么比這更令他感到愜意的了。他那時用的并非平常的小杯，而是和玻璃杯一樣的大杯，而且每次都斟滿。[[16]](#_16__Yin_Zi_Gao_Dao_Tomo_Zhi_Zhu)

1886年起擔任侍從的日野西子爵寫道，“天皇即使已經喝過了餐后咖啡，但是只要餐桌上還有酒，他就不會退到內宮”。[[17]](#_17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

天皇的主要顧問，儒家學者元田永孚則做了一次性質迥異的規諫。當時（1878年2月）有人提議按照歐洲的做法，使林地隸屬于皇室。但是元田反對這個計劃，他說，皇室的維持并非靠土地，而是靠“至德大仁”為紐帶來維系民心。古代政府只收取一小部分的稅。接著，在談到君民的權利時，元田說，“施至德大仁愛育人心，則人心思慕敬重帝室愈深，至天下悉舉我私有土地之貢租，以供帝室。茍失人心，悉有天下之土地，然民皆起而奪之”。[[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天皇采納了元田的意見，皇室占用林地的計劃被擱置。這個例子表明儒家的規諫仍然起作用，但是有時候那些想規諫的人，懾于天皇的優秀品德，往往會把話吞回去。有一次天皇要求侍從把自己的鞋拿去修補。這名侍從私下里問侍補佐佐木高行（1830—1910）和高崎正風，天皇為何要選擇補鞋而不是扔掉并直接換雙新的。他們回答說，這件事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是卻體現了君王的美德，因此有重要意義。不過，高崎詢問了天皇補鞋的原因，說如果天皇是出于節儉而下令補鞋，那么這種行為確實值得欽佩。但如果他因為小氣才下這道命令，則有些遺憾了。天皇回答說，他正打算把這雙鞋送給權侍從藤波言忠（1852—1926），但發現鞋子有些舊，于是下令把它補一補，這樣藤波就可以省下一筆錢。天皇這么愛護自己的侍從，高崎不禁感動得熱淚盈眶。[[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4月23日，天皇向東京都捐獻了兩萬元，用以建造一座治療腳氣病的醫院，這件事體現了天皇君德的另一面。他自己去年飽受這種疾病之苦，于是同情那些和自己一樣患病的人。如果天皇自己的病情復發，醫生很可能跟往常一樣，建議他異地療養。巖倉具視預見到了這一點，建議在地勢較高且空氣清新的地方為天皇修建一處離宮。天皇回應道：“轉地療法可，然腳氣病為全國人民之疾患，非朕一人之病。移居之事朕可行之，然全國之民不能悉遷住處。故為全國民眾，欲慮其他預防之法。且巡幸東奧之際，視彼地之鎮臺兵，皆屯營高燥之地，然惱腳疾者數十人。思之，擇居處非必免此患之法。聞該病不存西洋各國，只存本邦，果其然，則其原因應在米食。朕聞有漢醫遠田澄庵者，其療法絕米食，食小豆麥等，此必有一理，不可妄斥漢醫之固陋。洋醫漢醫各有所取，和法亦不可棄。”[[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巖倉“敬服而退”。后來大久保利通提議天皇搬到別處去住，也得到了同樣的答復。我們不能確定天皇是否真得說了這番話，但這可能是他有記錄以來第一次發表長篇大論。7月10日，天皇捐資修建的醫院開業。他后來還捐資修建了東京的第一所精神病院。

天皇至死都討厭身邊的醫生，尤其討厭做體檢。上一年天皇患了腳氣病，沒有告訴醫生自己感覺不舒服，等醫生有所察覺時，病情已經發展得很嚴重了。強壯的體魄使他通常不太注意自己的健康。至于宮廷醫生，他們依然依賴傳統的，有時是愚昧的治療方法。例如，1877年8月，親子內親王感染腳氣病時，醫生能給出的最好的處方就是療養。于是她去了箱根，三個星期后的9月2日去世，死時只有三十三歲。[[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這個不幸的女人——先皇的妹妹和將軍的妻子——的悲慘結局似乎加深了明治對醫生的不信任。佐佐木高行花了整整兩個小時才使他同意接受體檢。

顧問們多次進諫以及他自己愿意聽從（一開始的反抗情緒之后）他們的建議，似乎使天皇展示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成熟感。他仍未完全擺脫早年在御所所受教育的影響，幸運的是，天皇周圍有一幫才能出眾的人，這些人表現出了指導天皇所需要的毅力，甚至勇氣。

在這些顧問當中，最有才華但卻最不受歡迎的，可能是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只對天皇一人負責的他，無疑是政府中權力最大的人。1873年大久保從美歐歸國，自那以來他的目標便是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增強國力，使之可以與西方發達國家比肩并立。大久保通常采用高壓政策，從而令左（這些人認為他的保守做法阻礙了民權的發展）右（這些人將拒絕征韓和西鄉隆盛的失敗怪罪到他的頭上）兩派的支持者都痛恨不已。他們認為在大多數日本人（尤其武士）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時，大久保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全國各地那些心懷不滿的武士，一邊喊著口號，一邊將憤怒發泄在他一個人身上。他們的口號令人聯想起德川時代末期尊王攘夷派用的那些口號。

金澤的一群武士開始了他們的暗殺計劃。這是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陰謀策劃地。首先，加賀藩在維新中一直扮演著特別不顯眼的角色。其次，前田家族的俸祿是所有大名中最高的——一百萬石。金澤市一直都是一個文化活動中心。它的繁榮也許可以解釋，明治天皇統治的前十年，日本其他地方都經歷著深刻的變化，唯獨這里沒有經歷政治的動亂。

就在其他藩陷于政治糾紛的漩渦時，加賀藩的和解戰術卻使它得以蓬勃發展，一些金澤武士對此感到沮喪。[[22]](#_22__Yuan_Shi_Hao_Gui____Li_Tong)拒絕派西鄉去朝鮮這件事尤其令他們難受，他們支持西鄉的反政府斗爭，盡管斗爭最終失敗。長連豪是暗殺計劃的一名設計者，他曾兩度到鹿兒島與西鄉會面，并進入私學校學習。[[23]](#_23__Yuan_Shi_Hao_Gui____Li_Tong)金澤的反政府活動中心是一群名為“三光寺派”的武士。[[24]](#_24__Zhe_Ge_Ming_Zi_Lai_Yuan_Yu)他們并沒有政治綱領，但卻贊成為達到目的而使用武器和暴力。領導人島田一郎是暗殺計劃的中心人物。有時“三光寺派”會和一個大得多的民權運動團體“忠告社”合作。這兩個組織的理想迥異，但是在反對以大久保為首的寡頭政治上卻目標一致。謀殺案發生后，發給報社的聲明中也納入了一些忠告社的民權思想。[[25]](#_25__Yuan_Shi_Hao_Gui____Li_Tong)

西南戰爭期間，這些人站在西鄉一邊。在得知所謂暗殺西鄉的陰謀時，他們都憤怒不已。他們為西鄉剛開始的勝利感到高興，又為西鄉的敗局已定感到悶悶不樂。1877年底，島田一郎和長連豪造訪了忠告社的領導陸義猶（1843—1916），說西鄉現在失敗了，他們不能坐視不管。[[26]](#_26__You_Guan_Lu_Yi_You_Ci_Qian)他們認為，西鄉的死，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負的責任最大，應該把這兩人殺死。陸不同意他們的暗殺提議，但說自己會認真考慮，要他們幾天后再來。他希望等待能使他們的熱情冷卻，但他們的決心反而變得越來越強烈。5月26日木戶去世，暗殺計劃從此以后便只鎖定一個人——大久保利通。

島田四處招募同謀者。一開始他還謹慎地避免透露自己的意圖，但是到了11月，他已經毫無顧忌地和未來的同伴討論計劃了。令人驚訝的是沒有人向警察告密。毫無疑問，島田依賴的是武士階層的忠誠，不過有時為了擺脫潛在的跟蹤者，他也會聲稱已經放棄了暗殺大久保的計劃。[[27]](#_27__Yuan_Shi_Hao_Gui____Li_Tong)

1878年3月25日，島田啟程前往東京。從他離家前所作的和歌中可以看出，他一心想殺死大久保，如果成功，無疑是真的死而無憾，但是一想到將再也見不到妻子兒女，他就感到痛苦不堪。島田作了兩首離別和歌。第二首是“我知道這一天終會到來，但是離別使我現在多么悲傷”。[[28]](#_28__Hei_Long_Hui_Bian____Xi_Nan)島田的和歌文學造詣不高，但是都發自肺腑。在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難以想象殺手在出發去執行必死的任務前會作詩。對于清楚知道自己死期的島田來說，這些和歌無疑是他向這個世界的告別詩。

島田和長兩人同時從金澤消失，引起了縣當局的疑心，他們懷疑這兩個著名的極端主義者可能在策劃什么陰謀。中央政府也在警惕那些持不同政見的武士和自由民權運動成員，并派了無數便衣到各地去。大久保利通身為內務卿，控制著派往全國各地的警察網絡，但他可能認為無須過于關注金澤。

兩名領導人到了東京之后，第一個任務便是起草聲明，羅列殺死大久保的理由。他們按照德川時代末期的慣例，將解釋性的紙條附在被害者的頭顱或者尸體上。[[29]](#_29____Zhan_Jian_Zhuang_____Fen)聲明是這么開始的：

石川縣武士島田一郎等叩首昧死，仰奏天皇陛下，俯告三千余萬人眾。一良等，熟察方今皇國之時狀，凡政令法度，上非出自天皇陛下之圣旨，下非由眾庶人民之公義，都在要路官吏數人之臆斷專權。

這些話表明，這些謀反者（就像以前和很久以后的其他謀反者一樣）堅持認為自己的行為符合天皇的真實愿望，而他們將剪除天皇周圍那些阻止其親政的惡吏。盡管如此，謀反者的做法還是有些自相矛盾，因為他們還要求以公開討論的方式傾聽人民的愿望，這可能是對陸義猶的自由民權思想的妥協，而這份暗殺辯護書的創作者正是陸義猶。

聲明接著指控官吏貪污腐敗，中飽私囊，不顧大部分普通民眾生活窘迫。他們列舉了五條“惡罪”：（1）杜絕公議，抑壓民權，私議政事；（2）亂施法令，公行請托，恣張威福；（3）興不急之土木，事無用之修飾，徒費國財；（4）排斥慷慨忠節之士，懷疑憂國敵愾之徒，釀成內亂；（5）誤外交之道，喪失國權。[[30]](#_30__Hei_Long_Hui____Xi_Nan_Ji_C)

謀反者的直接目標是暗殺大久保，但是聲明中也提到了其他該死或者不能容忍的人。之前的名單中包括巖倉具視和剛剛去世的木戶孝允；后來的名單則包括大隈重信、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和川路利良。還有一些像三條實美那樣的“奸吏”，但是可以預料“斬滅其根本，則枝葉隨之枯落”。[[31]](#_31__Hei_Long_Hui_Bian____Xi_Nan)有跡象顯示，島田及其同伙期待隨后將會有繼承遺志的第二輪暗殺行動。[[32]](#_32__Yuan_Shi_Hao_Gui____Li_Tong)

聲明第一部分的結尾是“愿基明治一新之御誓文，由八年四月之詔旨，改有司專制之弊害，速起民會，取公議，以致皇統隆盛，國家永久，人民安寧”。[[33]](#_33__Hei_Long_Hui_Bian____Xi_Nan)在這里，尊重天皇和堅持民權又一次相提并論。陸義猶起草公告的目的是為了證明謀殺的合法性，但這些殺手是否理解他的高談闊論則令人懷疑。[[34]](#_34__Yuan_Shi_Hao_Gui____Li_Tong)他們腦子里只想著一件事——殺死大久保。

六名殺手一旦在東京聚頭，便開始做有組織地準備。他們確定了大久保去赤坂離宮的日子、他走的路線、馬車的明顯特征，當然，還有他的面部特征。大久保的馬車為避開人群通常會走一條小道，他們便把這條小道作為行動地點。他們發現議員一個月有六天要參加太政官會議——4號、14號、24號、9號、19號和29號——于是決定在5月14日實施暗殺計劃。14號的前幾天，島田不顧同伴的反對，給大久保寫信，警告他會有生命危險。他顯然認為除非大久保收到了警告，否則暗殺的理由將不為人所知。[[35]](#_35__Yuan_Shi_Hao_Gui____Li_Tong)或許大久保沒有理睬這種威脅：他并非第一次收到恐嚇信。

出發前的最后一刻，島田和長分別給自己的妻子寫信，告訴她們自己的決心，并希望孩子們好好念書。[[36]](#_36__Liang_Feng_Xin_De_Jie_Xuan)島田的信采用和歌里的長歌形式，其中痛斥大久保的話是這樣說的：“進讒言，于我敬畏之君。殘殺盡，忠貞之臣。大惡臣集聚，欺上責下，千島換樺太。”[[37]](#_37__Yuan_Shi_Hao_Gui____Li_Tong)

大久保并非聲明或謀反者的家信所描繪的那樣一個惡魔。那天早上出發去皇宮之前，大久保會見了福島縣的縣令，他預測需要分三期，每期十年才能完成維新大業。日本現在即將進入第二期，大久保認為這一期非常重要，整頓內政，充實國力就在這一期。自己雖然不肖，但仍決心盡十分力帶領日本走過這一期。第三期將由下一代來完成。[[38]](#_38__Yuan_Shi_Hao_Gui____Li_Tong)大久保殖興產業的一個計劃便是開發新土地，那天早上他還討論了要在福島縣修一條運河的計劃。

為了防備突襲，大久保通常會在馬車里放一把手槍，但是那天晚上他要去參加清朝公使舉行的招待會，叫人清理了馬車，并將手槍留給下屬保管。可能正是這一點要了他的命。

由于準備充分，暗殺行動進行得非常順利。兩人打傷了兩匹馬的前腿，其他四人殺死一名車夫后，把大久保拖出馬車，再殘忍地將其殺死。在給大久保補上致命一刀時，殺手的力氣非常大，把大久保脖子刺穿后刀尖還插進了地上。六名殺手將武器在尸體旁擺好之后，便走到附近的皇宮自首。他們向警察提交了聲明的副本。當問到是否有其他同伙時，他們回答說：“有，除了官吏，三千萬日本人都是我們的同伙。”[[39]](#_39__Yuan_Shi_Hao_Gui____Li_Tong)

消息很快傳到皇宮。元田永孚正在書房準備給天皇講授《論語》。一名宮廷官員沖進來告訴元田大久保遇襲的消息。元田立刻報告天皇，天皇隨即派了一名侍從到大久保家詢問事情的詳細經過。不久侍從帶回大久保已死的消息。天皇聽到這個消息后悲痛萬分，派宮內卿德大寺實則轉達自己的悲痛之情。皇太后和皇后也分別派使者到大久保家慰問。

第二天，天皇追封大久保為右大臣，并贈送五千元作為喪事費用。那天晚些時候，天皇發布正式公告，“朕深悼股肱之良臣，此為國家之不幸。”他令伊藤博文代替大久保，擔任內務卿之職，以確保這個重要職位的連貫性。

即使外國報紙也在哀悼大久保利通之死。[[40]](#_40__Yuan_Shi_Hao_Gui____Li_Tong)他的喪禮盛況空前，日本第一次舉行國葬。政府機關降半旗致哀，軍艦鳴放二十一響禮炮。宗教儀式完全是神道教的。當時對佛教的普遍否定無疑造成了這種與傳統的割裂。

伊藤的接任意味著大久保的政策不會被否定，然而殺手的聲明似乎得到了認真的對待。早在襲擊發生之前，三名侍補（佐佐木高行、高崎正風和吉井友實）便認為應該設立一個輔助天皇的官職，5月14日清晨，他們拜會了伊藤博文，希望推薦大久保為這個職位的最佳人選。伊藤同意，然而隨后他們就聽到了令人震驚的襲擊的消息。

在檢查殺手留下的聲明時，大家忍不住同意這些人的觀點，即目前的法律既非出自天皇也非出自人民的公議。他們認為迫切需要讓天皇親政，并決定告訴天皇他們得出的這個結論。

5月16日，侍補們得到一次接見的機會，可以暢所欲言。佐佐木說，盡管原則上是天皇執政，但實際上他把全權委托給了大臣。這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實際上是幾個大權在握的官員在管理國家，進而激起民眾的不滿，最近的襲擊事件正說明了這一點。除非采取積極的措施，否則維新大業的結果將變成“水泡畫餅”。此外，假如要將日本的聲威擴展到國外，最重要的是將天皇的愿望付諸實踐。因此天皇應該“自今日行親征之實，通曉內外之事”。

高崎正風走上前說，“利通在世時，常深憂圣德涵養之事，遭難之前日，亦至臣家談此事，此為其深慮之所在……”高崎似乎無法控制自己，一邊啜泣一邊說出自己的觀點，即天皇“萬機親裁”非常有必要。聽到這里，天皇的眼眶也濕了。米田虎熊還說，希望天皇對待政事能像每天騎馬那么熱心。天皇動容地說：“朕嘉納汝等之忠言，而后謹注意，爾等亦協力，盡輔佐之任。”高崎等眼里噙著激動的淚水退下。[[41]](#_4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天皇似乎記住了顧問們的話。他對政事不再表現得毫不在乎。例如，5月21日，他向兩名當值的侍補表達了自己對當時一些陋習的看法。一些官員修建了新的西式房子。對于那些需要和外國使節打交道的高級官員來說，也許有必要建造這樣的房子，但是在普通民眾看來，這些官員是在榨取人民的血汗錢，只顧中飽私囊。因此天皇下令官員暫時不要建造這樣的房子。如果他們再等幾年，等新皇宮落成之后再建自己的房子，抱怨聲將會自動消失。

維新以來，政府的職位主要由薩摩、長州和土佐三個縣的人擔任，天皇對此感到不滿。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全國各地都有高素質的人才——即便是遙遠的東北地區——應該讓他們為政府效力。[[42]](#_4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令人震驚的大久保之死以及侍補們的規諫，似乎喚起了天皇新的責任感和新的個人權威感。

1. [[1]](#_1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69頁。

1. [[2]](#_2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13頁。天皇這個動作并非像歐洲的君主那樣，認為觸摸一下就能使傷員痊愈。

1. [[3]](#_3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76頁。逢休息日或者宗教節日則不參加會議。他仍然沒有從在京都染上的腳氣病中恢復過來，醫生敦促他將身體復原放在第一位。

1. [[4]](#_4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79頁。顏回是孔子的得意門生。葫蘆通常用于裝清酒。

1. [[5]](#_5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91頁。他們讀了《通鑒覽要》，這是清朝時姚培謙和張景星編纂的一本歷史著作，講述從上古到明朝時期的中國歷史。

1. [[6]](#_6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92頁。皇后的詩為“除非你改過自新，并聽任頭上的花朵掉落，即使早晨的太陽光也不會明亮”。意思似乎是安逸的生活（頭上的花朵）會毀了幸福。

1. [[7]](#_7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29頁。那天講課的老師包括福羽美靜、西村茂樹和西周。從1878年1月7日開始，天皇和皇后上了一系列難度更高的課程，其中包括元田講的一節《論語》課、西村茂樹講的美國人寫的一本有關道德的書、近藤芳樹講的一節《古事記》。除了天皇身體不適之外，這些課一直上到他離開到北陸和東海地區去為止。關于他上課的更加詳細的內容，見第350—351頁。

1. [[8]](#_8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16頁。

1. [[9]](#_9_29) “侍補”這個名字由伊藤博文所起，是宮內省的一個官職，主要任務是服侍天皇并向天皇提出建議，以彌補執政過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

1. [[10]](#_10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55—356頁。

1. [[11]](#_11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30頁。這封信于1877年12月17日寄出，信中日本接受了參加次年于巴黎舉辦的博覽會的邀請。

1. [[12]](#_12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38頁。這封信于12月28日由中國公使送達。

1. [[13]](#_13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31—332頁。天皇命令所有與戰爭有關的資料，包括戰敗方士兵的口頭證詞，都送往一個史料編纂機構（修史館）。他還下令撰寫一部戰爭史。

1. [[14]](#_14_29) 他第一次發病是在1877年在京都的時候。從那以后，每逢夏秋換季之時，就很容易發作。1882年那一次發作最為厲害，幾個月才康復。腳氣病在當時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軍隊。估計超過三分之一的海軍都患了這種病，極大地降低了海上船只的效率。軍醫上將在回答天皇提問的報告中，將腳氣病歸咎于惡劣的飲食。伙食得以改善后，患者的人數急劇下降，并于三年后幾乎完全消失（《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140—141頁）。天皇的腳氣病不太可能由糟糕的飲食引起。當時日本的醫生可能并不知道維生素的重要性，盡管英國的皇家海軍為避免海員患上腳氣病，早就讓他們服用檸檬汁。

1. [[15]](#_15_2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68—369頁。

1. [[16]](#_16_28) 引自高島鞆之助，《神武以來の英主》，第33頁。內容略有縮簡。

1. [[17]](#_17_28)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80頁。

1. [[18]](#_18_2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72—373頁。

1. [[19]](#_19_2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86—387頁。

1. [[20]](#_20_26)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99—400頁。

1. [[21]](#_21_26)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53頁。

1. [[22]](#_22_25) 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27頁。

1. [[23]](#_23_25) 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33頁。我非常感激遠矢對暗殺的杰出研究，他暗示長連豪在鹿兒島時，就已經抱有武士軍事獨裁的理想。

1. [[24]](#_24_23) 這個名字來源于成員們聚會的一個金澤佛教寺廟。

1. [[25]](#_25_23) 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80頁。遠矢對這份聲明（《斬奸狀》）的評論見第81—92頁。

1. [[26]](#_26_23) 有關陸義猶次前活動的詳盡描述，見黑龍會編，《西南記伝》下卷（一），第407—418頁，以及下卷（二），第1014—1017頁。陸在鹿兒島度過很長一段時間，并經常與西鄉的副官桐野利秋見面。陸介紹長連豪與桐野認識，并安排長接受后者的“指導”[下卷（二），第411頁]。

1. [[27]](#_27_22) 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66頁。

1. [[28]](#_28_20) 黑龍會編，《西南記伝》下卷（二），第1004頁。亦可見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65頁。

1. [[29]](#_29_20) 《斬奸狀》（分兩部分）的全文，見黑龍會編，《西南記伝》下卷（一），第436—457頁。

1. [[30]](#_30_19) 黑龍會，《西南記伝》下卷（一），第43頁；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82頁。《斬奸狀》中這些罪狀的完整解釋，見黑龍會編，《西南記伝》下卷（一），第440—457頁。

1. [[31]](#_31_17) 黑龍會編，《西南記伝》下卷（一），第438頁；亦可見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83頁。

1. [[32]](#_32_16) 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70頁、第83頁。

1. [[33]](#_33_15) 黑龍會編，《西南記伝》下卷（一），第439頁；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84頁。

1. [[34]](#_34_15) 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94頁。

1. [[35]](#_35_14) 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100頁。島田還說他們行動之后就沒有時間向人們敘說緣由了。

1. [[36]](#_36_13) 兩封信的節選，見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102—104頁。

1. [[37]](#_37_11) 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101—102頁。這首長歌接著以七言和五言交替的方式，列數了大久保和他的同伙的罪狀，并描述了薩摩的英勇抗爭。

1. [[38]](#_38_8) 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127—128頁。

1. [[39]](#_39_7) 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138頁。

1. [[40]](#_40_7) 遠矢浩規，《利通暗殺》，第154—155頁有倫敦《泰晤士報》一篇文章的翻譯。

1. [[41]](#_41_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10—411頁。

1. [[42]](#_42_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13—414頁。

# 第三十章 吞并琉球



1878年5月23日，天皇決定8月份啟程，巡幸計劃已久的北陸和東海地區[[1]](#_1__Bei_Lu_Wei_Ben_Zhou_Zhong_Bu)。他原計劃1877年出發，作為上一年北方之行的延續，但西南戰爭的復雜形勢使得計劃無法進行。跟往常一樣，天皇是為了親自視察這片陌生的國土和民情。[[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天皇依然記得北方之行的點點滴滴，他宣布此行不愿給任何人添麻煩。天皇特別提到參觀學校時，學生應該全都穿普通服裝，而不應該戴新帽，穿新鞋，或是穿上其他為了慶祝而特制的衣服。天皇還希望在參觀縣政府時，能夠看到當地的地圖、人口統計數據以及賢人善行記錄。此外，他還要求提交警察局和巡邏警官的人數報告、殖興產業的方法、牧場與牛的數目以及未開墾土地和已開墾土地的面積。天皇并未把此次旅行當成游山玩水，他的首要目標也不是為了激發人們的敬畏之情或者甚至是愛戴之情，而是增進自己的教育，使他更了解自己的臣民及其謀生之道。天皇的顧問無疑還希望，天皇的到訪能使邊遠地區的人民更加充分地意識到東京政府的存在，并效忠國家甚于效忠當地政府。

歐洲帝王巡游時非常重要的排場問題，在這里蹤影全無。[[3]](#_3__Duo_Mu_Hao_Er____Tian_Huang)天皇的各縣之行另有一點和歐洲帝王不同：天皇并不想讓日本人熟悉自己的容貌，不管是在旅行時，還是在硬幣或紙幣的圖像上。明治一般乘坐封閉的御輦出行，而不是那種人人都可以看見他的敞篷馬車。過去只有高級公卿才有機會看到他的臉，即使現在他也不愿向公眾展示自己。明治的照片很少，而且一般買不到，他拍照并非為了公開展示。外國公使離開日本時偶爾會收到天皇的照片，但是日本人不管多么忠誠，都很難獲得天皇的照片。

1874年，東京開始有人（未經許可）出售內田九一拍攝的天皇照片的復制品。這件事使內田靈機一動，他請求政府允許自己出賣所拍的底片。對售賣天皇照片是否合適這個問題，政府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4]](#_4__Gong_Nei_Qing_De_Da_Si_Shi_Z)最終結果是禁止出售，那些已經出售的照片則被勒令上交。沒有照片，也沒有其他自我膨脹的標志，充分表明天皇巡幸的克制特征。隊伍經過時，城鄉街道兩旁的人群也許能瞥見明治一眼，然而他并沒有用鮮艷的服裝或者漂亮的馬車吸引人們的注意，而且他的慷慨施贈也只限于向小學生和耄耋老人贈送些小禮物。

就在明治打算離開東京之前，發生了一件使整個行程差點推遲的事。8月23日，因對薪酬和口糧被削感到不滿，宮廷衛戍部隊的炮兵營發動兵變。兵變只有大約一百人參加，除了兩名士官，全都是士兵，而且大部分來自鹿兒島或者高知這兩個富于軍事傳統的地區。在這次短暫的兵變中，起義者殺害了幾名軍官，炮轟了大藏卿大隈重信的住宅，并朝他們打算去請愿的赤坂離宮發射了兩枚山炮。大約九十人沖到皇宮，與事先已經接到消息的正規軍相遇。起義者最后都被逮捕了。

叛亂第二天凌晨4點已經平定，但巖倉具視等侍補考慮到大久保利通剛剛遇刺不久，局勢依然動蕩，于是建議天皇推遲出行的日期。他們承認這次騷亂的規模很小，但可能預示軍隊中存在更嚴重的不安定因素。三條實美和大部分議員反對這個建議，認為如果因為一次微不足道的兵變就推遲出行，天皇的威望將會受損。天皇在咨詢了侍補佐佐木高行之后，決定按原計劃出行。

8月30日，天皇和隨行人員[[5]](#_5__Pei_Ban_Ta_Tong_Qu_De_You_Sa)啟程。第一天晚上他們住在埼玉縣的浦和。第二天上午，天皇在接見縣廳的官員時，聽到的不是（你可能認為的）那些居民生活非常幸福，而是中津川地區人民的悲慘狀況。這個村子只有二十五戶，一百二十九人，非常貧窮和落后，村民連棉布衣服也穿不上，而且全是文盲。村民病了沒有醫生，死了也沒有可供埋葬的寺廟[[6]](#_6__Jiang_Hu_Shi_Qi_Ri_Ben_Ren_S)。他們的主食是黍和稗，而不是大米。大部分村民甚至不知道世上還有諸如學校、藥店、酒館或者魚販這樣的東西存在。這個地方距離天皇的住所僅僅數十公里，人們的生存條件如此之差，不能不說是明治天皇輝煌統治的一個污點。當地官員說，他們計劃對通往村子的道路進行修繕，逐漸引導村民過上文明的生活。[[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天皇對此事的反應沒有記錄下來。后來他參觀了當地政府的各個部門、法院以及幾所學校，在學校觀看了學生們上課，并向優秀的學生頒獎。接著天皇參觀了一個工業博物館，并觀看了機器模型展、礦石展和藝術作品展。他對狹山出產的茶葉和高麗郡出產的生絲特別感興趣，因為茶葉和絲綢是日本這個時期的主要出口商品。此次巡幸中，無論天皇走到哪里，都對當地特產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天皇一行從浦和來到前橋，希望一睹龍顏的民眾特別多。他們從那里到松井田町。自從天皇離開東京以來，幾乎每天都下雨，道路泥濘不堪。有些地方御輦根本無法通過，天皇只好下來，在泥濘中跋涉前行。幸運的是，天皇的腿非常強壯。不過隨從們的稟賦就沒這么好，舉步維艱，被遠遠地拋在了后面。天皇經過碓冰峰那天，天終于放晴，他從山頂上欣賞了壯麗的景色。接下來天皇經過了輕井澤、追分和小諸，但低低的云層擋住了這個地區最為高聳的淺間山的景色。

天皇在長野時，接見了名剎善光寺的住持。天皇不太和佛教的僧人來往，也很少參觀寺廟，但他可能認為善光寺是長野的中心，不能忽視。天皇在高野時，暫住在當地的一所學校里，并派侍從到死于戊辰戰爭的士兵墳前祭奠。他們一行人離戰場越近，這種祭奠就越發頻繁。天皇在高野買了一些糖果，寄給皇后和皇太后，一起寄去的還有他在長野買的糕點和水果。天皇此舉無疑使城中居民開心不已。天皇購買而不是無償獲得糖果這件事，也使他有別于歐洲的君主。

高野到柿崎的路大部分都沿著日本海沿岸，天皇似乎陶醉于壯美的景色。路并不好走，窄窄的馬路布滿一個個沙坑，據說路已修過，但每次車輪陷進沙里，小小的馬車都要劇烈地顛簸一番。陽光透過玻璃窗照進來，車廂內又悶又熱，陪伴天皇的佐佐木高行實在忍受不了。他得到天皇的許可，下來步行，天皇則一如既往地堅韌，忍受著馬車的顛簸和高溫的折磨。抵達柿崎時，天皇感到很不舒服，他克服了對看病的厭惡，找來了醫生。

回報這番大抵痛苦的旅程的只有沿途的美麗風光。例如，在出云崎町時，天皇興致勃勃地觀看了數百艘漁船夜間捕魚。當然，旅途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天皇每天都要在狹窄的御輦里面按照日本式的坐姿坐上一整天，夜里還得依照習俗，在椅子上筆直地坐到10點，等睡覺的時間到了，他才能伸展四肢。在出云崎町的那天晚上，天皇的住處不僅狹窄，而且蚊子肆虐。侍從極力主張他使用蚊帳，但天皇的回答是：“巡幸專視下民疾苦，親嘗艱苦，否則如何得通下情。朕毫無所厭。”[[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天皇的這番話似乎太過儒家而顯得不夠真實，但卻與旅途記錄的其他情節相符，它顯示出一個迄今為止不知痛苦為何物的人對自己民眾的惻隱之心。

抵達新潟之后，天皇驚訝地發現罹患沙眼的病人很多。他回想起兩年前在北部旅行時，就注意到有人患上這種病，他還問過醫生這種病是否可以醫治。醫生回答說窮人負擔不起費用。現在，天皇發現新潟患沙眼的病人甚至更多，于是命令自己的私人醫生調查患病的起因以及可能的治療和預防方法。兩天后天皇收到報告，稱氣候、水土以及不潔的房屋都是沙眼傳播的罪魁禍首，而最主要的原因是這種病具有高傳染性。天皇捐了一千日元用于研究沙眼的治療和預防方法。

旅途也有一些亮點。在長岡，天皇欣喜地看到，這座幾乎毀于戊辰戰爭且戰后極度貧窮的城市正在逐漸恢復。這里有許多東西令他想起十年前的那場戰爭。在戰役的發生地福島村，人們用白旗標出了政府軍的位置，紅旗標出了叛軍的位置，這樣一來天皇就知道戰斗是怎么打的了。[[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旅程的大部分時間都很狼狽。長時間的陰雨連綿，使得道路泥濘不堪，即使天放晴了，暴漲的河水也使他們難以通過。多年以后（1899年），天皇在一首短歌中回憶了這次旅行：

我在山路上旅行

在高志的春雨中全身濕透

已經過去很久了

那里即使夏天

也非常寒冷[[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他們來到日本海沿岸最危險的地方親不知子不知[[11]](#_11__Qin_Bu_Zhi_Zi_Bu_Zhi_Shi_Xi)時，每個人都已筋疲力盡。直插入海的峭壁上，海浪沖刷著僅有的一條道路。不過一旦安全通過了這個可怕的地方，明治便下令停車，欣賞沿岸的美景。景色實在是妙不可言，從飛濺的浪花中天皇能窺見佐渡島和能登半島的輪廓。[[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人們擔心金澤存在著另外一種危險，因為這里是暗殺大久保的刺客密謀之地，民眾中可能仍殘留著不法分子，但什么意外也沒有發生。相反，天皇像往常一樣——參觀學校、兼六園和一個展出國內外產品的博物館。在小松時，天皇收到了皇后和皇太后寄來的信和禮物，他可能像任何一個收到家書的游子一樣歡樂。

從這時開始，旅途變得相對容易一些。從金澤出發，天皇經過小松、福井、敦賀、大津，回到京都。在京都時，天皇有一天晚上給隨從講維新前御所發生的事。這些不過是十年前發生的事情，聽起來卻好像是遙遠過去的回響。

天皇原計劃途徑東海地區時到伊勢神宮參拜，但三重縣暴發了傷寒疫情，他們不得不改變計劃，把路線改為經草津、大垣和岐阜到名古屋。天皇跟往常一樣，每站都要參觀學校和當地的物產展覽。他絲毫沒有倦怠的神色，也沒有迫切想回到東京的樣子。西南戰爭期間消失了的強烈責任感，此時再次顯露出來，并將伴隨明治的一生。

11月9日，明治回到東京。這次他一共歷經十一個縣，走了一千七百多公里，費時整整七十二天。盡管旅途非常勞累，但他看起來氣色很好，興致勃勃。這一天被定為節日，東京到處都是搖旗吶喊歡迎天皇歸來的市民。

這一年余下的時間總的來說平靜如水，但是就在年底——12月27日——宮廷議會突然下令廢除琉球藩。內務卿伊藤博文已經決定將琉球藩降級為縣：琉球將不再是王國，而只是眾多縣中的一個。這一決定的背景是琉球藩拒絕遵守日本的命令，沒有與清廷斷絕來往。琉球國王曾接到特別命令，不得派使者到中國祝賀皇帝登基，也不得接受清朝皇帝的冊封。但他沒有把這些放在心上，秘密地派了一名家族成員到中國去，請求清廷幫忙對付日本。他還讓東京的琉球藩代表向中國、美國、法國和荷蘭的公使求助。日本政府收到不下十四封來自琉球王的奏折，要求恢復過去的形式，允許琉球向日本和清朝雙重效忠，琉球王一直重復“父皇（日本）母清”的說辭。[[13]](#_13__George_H__Kerr_Okinawa___p)

但日本方面則堅持認為“一國奉侍二帝，等一妻服侍兩夫”。[[14]](#_14__Da_Tian_Chang_Xiu____Jin_Da)琉球王國幾百年來一直侍奉著兩位主人——中國和薩摩，并向兩方朝貢，這是沒有什么資源和軍事力量的小國賴以生存的唯一方式。日本決心斷絕琉球群島和中國的聯系，特別不滿琉球國王的拖延戰術。最后，伊藤決定以琉球王的不妥協為由，廢除琉球藩。他命令內務大臣松田道之（1839—1882）制定一份終止琉球藩的計劃。該計劃不僅廢藩為縣，還強行將琉球王從沖繩遷往東京。太政大臣和朝會批準了這個計劃。琉球王被勒令在一周內服從接到的旨令。如果拒絕，日本政府將采取“斷然的措施”解散該藩。與此同時，駐在東京的琉球官員也被勒令立刻返回沖繩，作為結束琉球半自治狀態的第一步。[[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1879年1月，松田道之離開橫濱前往那霸，并于25日抵達。次日，松田前往首里城，會見琉球國的高級官員，并大聲宣讀了三條實美的聲明，聲明中稱早在1875年5月29日，日本就禁止琉球派遣隔年一次的向中國朝貢的使團、派遣朝賀特使去慶賀清朝皇帝登基、王位更替時請求清朝冊封。但琉球認為這是“請求”，迄今仍未提交遵守命令的聲明。此外，1876年5月，日本向琉球派遣法官，此時應迅速移交法律事務，但琉球仍是哀求，并無執行之意。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如果琉球繼續不遵守命令，日本將不得不采取適當的措施。這是緊急命令。[[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松田念完后，將文件交給琉球王的弟弟尚弼，并威脅說，如果琉球不遵守命令，日本政府將會采取極端措施。松田將2月3日上午10點定為琉球王答復的最后期限。1月29日，松田再次給琉球王送去一份文書，命令他在提交服從命令的聲明時外加一份起誓文書。鑒于此前的事情，如果沒有起誓，日本政府將認為琉球王很有可能重蹈覆轍，不會真正地信守承諾。松田還要求他和代表一起到內務省去。但是，2月3日，琉球王沒有露面。相反，他派了幾名高級官員把自己的回信帶給松田。

琉球王用恭敬的語氣解釋了自己的艱難處境。如果（像松田要求的那樣）拒絕向清廷朝貢和慶賀，拒絕接受他們的冊封，他的藩國一定會受到清朝的懲罰。他的這個小國，處在兩個大國之間，實在兩難，希望日本能閔察這一狀況，“舉藩一同伏奉哀愿，頓首百拜”。

尚泰絕非值得敬仰的人，但一國之君在一官員面前俯首哀愿，難免有些可憐。然而在松田看來，在肩負解決琉球問題面前并無同情尚泰的余地。他指責說，琉球王的信證明他仍拒絕遵守宮廷議會的命令，并宣布自己將返回東京，詳細報告發生的事情。松田讓琉球官員等待進一步的命令。官員們懇求他再考慮一下，松田不僅一口回絕，還增加了一條罪狀：幾年前日本政府已經命令琉球以明治為年號，但他們的文件仍使用中國皇帝的年號光緒，這使他感到氣憤。松田說這是絕對禁止的行為。

第二天松田便回東京。3月11日，天皇下令廢除琉球藩，并命令琉球王及其繼承人搬往東京去。[[17]](#_17__Ming_Zhi_De_Fa_Ling__Jian)沖繩將廢藩置縣，其王室成員將被授予日本貴族頭銜。松田再次前往沖繩，這次他帶來了一百六十多名警察和五百名步兵。琉球王稱病拒絕會見松田，然而，3月29日，琉球王離開琉球五百年來的政治中心和他一輩子生活的宮殿，搬到了王儲尚典的宅邸。

尚泰的抵抗似乎有一些效果。4月5日，天皇派侍從富小路敬直詢問尚泰的健康情況。他私下指示富小路敦促尚泰盡快到東京來，為了保證國王一路安全，還派了政府屬下的軍艦“明治丸”供其使用。

4月13日，富小路抵達那霸，在三十名警察的護衛下，來到首里。尚泰以生病為由拒絕會見這名天皇的特使，并請求由尚典代替自己接待客人。富小路拒絕，并和松田直接來到尚泰的臨時住處。諸王子和高級官員在門口迎接。富小路在尚典的帶領下，來到尚泰的病榻前。尚泰在枕頭處放上朝衣和帽子（以示對天皇特使的尊敬）。接著，在兩名侍者的攙扶下，尚泰起床下跪，行了拜禮。

特使傳達了天皇的意旨，尚泰用極謙卑的語氣表示感謝。富小路問他是否服從天皇的命令，國王回答說自己將在第二天答復。

正式的會面結束后，松田離開座椅，坐到床邊，對國王的病情及其過去幾個月來遭受的精神焦慮深表同情。富小路也說了一些慰問的話。他們離開病房后，一致認為尚泰明顯不是裝病，不過他雖看起來臉色蒼白，但并沒有任何大病的跡象。[[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4月14日，松田召集前琉球藩的主要官員，要求他們說服國王給出答復。國王極不愿離開沖繩，以生病為由懇求推遲啟程的日子。15日，尚泰的弟弟尚弼和二十多名高級官員一起，懇求富小路和松田將日期延長四五個月，并提出派一名王子到東京去（做人質）。16日，一百五十名琉球士族和各位王子以及高級官員一起，懇求將日期延長九十天。這些都被富小路和松田一口回絕。他們指出，國王一路將受到國家級的特殊保護，因此無須擔心。

日本官員不肯讓步的背后，是擔心國王之所以推遲到東京去，是希望在這期間清朝會出兵幫助自己。他們推斷，尚泰越早到東京去，清朝干預的機會就越小。

國王原定4月18日啟程，但就在啟程的前一天，尚泰和其他高級官員最后一次向松田求情。他們說，延遲九十天不僅是因為尚泰的病情需要，還因為最近的變化已經把這個前藩國攪得人心惶惶，需要國王親自勸誡，民眾才能繼續日常的生活。這一次他們提議把太子尚典送到東京去。松田最后心軟了，但是堅持認為沒有理由推遲那么久。他將縮短延期，并于翌日告訴他們國王出發的確切時間。

松田并不擔心琉球可能發生騷亂，如果國王執意拒絕，自己甚至打算出動軍隊將國王擄到東京去。但是如果把尚典留在沖繩，則沖繩官員可能擁他反叛，屆時可能引來清朝的干預。最好的計劃是將尚泰和尚典都帶往東京。因此他決定接受把尚典送到東京去的建議，而尚泰能否延遲出發將由太政大臣決定。一旦尚典安全抵達東京，他們可以說尚泰的請求被拒。這樣一來，將尚泰帶到東京去的責任就落在政府最高層的頭上。屆時再派一名敕使到沖繩，將尚泰帶到東京去就可以。[[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4月18日，尚弼率領琉球重臣拜會了松田。這次他們請求只推遲八十天，并再次提出將尚典送到東京去。松田說如果他們的要求少于四十天，那他還可能要求敕使富小路推遲返程的時間。那樣的話，尚典為謝恩，必須立即到東京去。第二天富小路同意了這個安排，并決定尚典和自己一起返回東京。4月19日，富小路敬直和尚典登上“明治丸”，離開了那霸。

5月1日，船抵達橫濱。5日，明治接見了尚典及五名隨行人員，他們從門檻外向天皇鞠躬致敬。那天，尚典向天皇和皇后贈送了禮物，并請求太政大臣允許父親延遲來東京，然而請求被拒絕了。一切均如松田所料。

同一天，陸軍少將相良長發和御醫高階經德啟程前往沖繩，為琉球王看病。5月18日，二人抵達沖繩，并與松田一起來到國王位于首里的臨時住所。高階診斷國王的病為神經紊亂和下腹擁堵，認為這種病沒有即時危險，但是不太可能在幾個月或者幾年內痊愈。松田聽后，取出一份文件，宣布政府已經拒絕尚泰延遲出發的請求，尚泰必須在一個星期之內啟程前往東京。國王最后完全屈服，但是要求給他三個星期的時間。六十多名來自首里、那霸、久米、泊的貴族也提出了同樣的請求，然而都被松田嚴詞拒絕了。國王啟程的日期定在5月27日。[[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這時清朝終于提出了抗議。5月10日，日本駐北京公使收到了一封有恭親王等大臣署名的信，稱琉球王國幾百年來一直使用中國的年號并向中國朝貢。清朝將其視為獨立完整的國家，并一直給予琉球完全的政治和立法自由。日清的協約國中世有與琉球簽訂條約的，這正說明了各國承認其為主權國家，但是，現在日本卻強行接管琉球。這不僅違背條約，還摧毀一個國家，甚至斷絕其宗廟祀享。這種行為只能被視為對中國等國家的蔑視。日本只有放棄侵占琉球主權的計劃，才能增進兩國之間的友好關系。[[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中國的抗議有些弱。根據1874年10月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大外保利通和清朝外交大臣在北京簽署的協定，日本認為琉球人民被承認為其臣民。清朝政府還同意向被臺灣土著殺害的琉球漁民的家人支付賠償金。[[22]](#_22___Hugh_Borton__Japan__aid_90)

外務卿接到清朝的抗議信后，回答說，琉球問題的處理是日本的內政，其他國家不得干涉。清朝對于勸阻日本還存有一絲希望：5月訪問清朝的前美國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打算到日本去。他可以代表恭親王進行溝通，以格蘭特的威望，也許能改變日本人的想法。

5月27日，尚泰最終離開那霸，并于6月9日抵達橫濱，住進宮內省為其準備的房子。陪伴他同來的有次子尚景和四十多名家臣。[[23]](#_23__Zhe_Ge_Shu_Zi_Shi___Ming_Zh)6月17日，尚泰和大兒子尚典以及約十名前家臣來到皇宮。天皇接見了尚泰和尚典。史書沒有記錄明治見到這位被廢黜國王時的反應。明治也許痛恨尚泰不肯遵守日本的法令，但他肯定認為政府已盡可能地減輕了王位廢黜——現代日本難以避免的宿命——帶來的痛苦。同一天，尚泰被授予從三位的官階，尚典則被授予從四位。松田由于在處理琉球問題上的突出表現而被授予勛章。到日本吞并朝鮮以后，日本將建立起一套對待廢君的做法。

尚泰在寓居東京期間受到很好的招待。[[24]](#_24__Xia_Wei_Yi_Nu_Wang_Li_Liu_Q)據說他在東京過得比三十一年的君主生涯還要快樂。擺脫沖繩各派系之間無休止的爭吵，無疑令他感到開心。[[25]](#_25__Qi_Zhong_Bei_Cheng_Zuo__Kai)一些人甚至說尚泰在東京時，就像土包子首次進城那么高興。[[26]](#_26__Zhong_Shan_Sheng_Mao_Bian)但他似乎很向往那塊曾經統治過的土地。1884年，尚泰得到允許，對沖繩進行了一百天的訪問。

弘前藩武士笹森儀助在日記中記錄了自己1893年在琉球群島的一次經歷。盡管笹森并非廢王的支持者，但他覺得有必要記錄下民眾依然崇敬尚泰及其家族的事實。那年6月，北白川宮親王訪問沖繩。他贊揚了廢王的兒子尚典，并瞻仰了王陵。盡管親王做出了這些和解的姿態，但幾天后他舉辦宴會時，尚氏一族沒有任何人接受他的邀請。笹森寫道：“這是何等無禮啊！”[[27]](#_27__Sey_Sen_Yi_Zhu____Nan_Dao_T)

笹森還注意到從那霸到首里一路上的情形，非常憤怒。“那霸沿道各家，敷席于門前，男女正列而坐。問其故，本日因知事招請，尚典一族來，彼等皆為拜見。”[[28]](#_28__Sey_Sen_Yi_Zhu____Nan_Dao_T)

笹森多次注意到，不管日本人多么仁慈，都會被沖繩人看成是入侵者。他寫道，沒有一個沖繩人與“來自他縣”的人結婚，也沒有一個“來自他縣”的人在沖繩永久居留。[[29]](#_29__Sey_Sen_Yi_Zhu____Nan_Dao_T)盡管歐洲人和美國人都是異族，但他們經常加入日本籍并與日本人結婚。他總結道：“土人之情，眷戀復藩，至今日仍未釋然。”

吞并沖繩在日本歷史上幾乎微不足道，尚泰也只是人物傳記辭典中的一個簡要條目而已。他在位期間并非重要，最后三十年則默默無聞。但是，即便現在，一個小國的國君成為處于現代化初期的大國的犧牲品，遭到罷黜時，仍令人不勝唏噓。

1. [[1]](#_1_30) 北陸為本州中部日本海側的區域，一般指現在的新潟縣、富州縣、石川縣和福井縣；東海為本州中部太平洋一側的區域，指現在的愛知縣、岐阜縣、三重縣和靜岡縣。——編注

1. [[2]](#_2_3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14頁。

1. [[3]](#_3_30) 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81—82頁。

1. [[4]](#_4_30) 宮內卿德大寺實則贊成可以出售照片的觀點。他請求政府批準，但是1874年3月卻決定不允許出售，并下令東京都將那些出售照片的人列入監管。5月，外務卿寺島宗則懇請復核這條決議。他說，無法獲得天皇的照片會使外國人感到失望，即便在西方，君主的照片也是自由出售的。日本現在既然已經是個開明的國家，那么出售天皇的照片肯定不會有引發不敬的危險；事實上，照片有助于引發人們的尊敬之情。12月神奈川縣的一名官員說，在頒布禁令之前，當地有人出售天皇、皇后和皇太后的照片，但沒有規定，他們也無法禁止。接下來的3月，政府就頒布了禁止銷售照片的法令（《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35—436頁）。

1. [[5]](#_5_30) 陪伴他同去的有三百多名高官、侍從、醫生、騎兵步卒、馬夫等隨從以及四百名警察（《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66頁）。這樣的隨從人數跟一般大名出行的規模相比，依然小得多。

1. [[6]](#_6_30) 江戶時期日本人死后多火葬，骨灰葬在寺院。——編注

1. [[7]](#_7_3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68頁。

1. [[8]](#_8_3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90頁。

1. [[9]](#_9_3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503頁。

1. [[10]](#_10_3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528頁。

1. [[11]](#_11_30) 親不知子不知是新潟縣絲魚川市西部的一處懸崖，路況極其難行。——編注

1. [[12]](#_12_3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512頁。

1. [[13]](#_13_30) George H. Kerr,Okinawa , p. 374.

1. [[14]](#_14_30) 大田昌秀，《近代沖縄の政治構造》，第92頁。

1. [[15]](#_15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585頁；亦見George H. Kerr,Okinawa , p. 377。

1. [[16]](#_16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03—604頁。

1. [[17]](#_17_29) 明治的法令，見《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28頁。

1. [[18]](#_18_2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42頁。

1. [[19]](#_19_2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59頁。

1. [[20]](#_20_2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63—664頁。

1. [[21]](#_21_2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65—666頁。

1. [[22]](#_22_26)  Hugh Borton, Japan’"aid-90L", pp. 160-161。Borton用了一個中文詞組，表示那些被殺害的漁民是日本人（p.169）。

1. [[23]](#_23_26) 這個數字是《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90頁上提供的。按照大田的說法，則一共有九十六名家臣。（《近代沖縄の政治構造》，第104頁）

1. [[24]](#_24_24) 夏威夷女王利留卡拉尼（Liliuokalani）1893年被美國人廢黜之后，就沒有這么好的待遇。

1. [[25]](#_25_24) 其中被稱作“開化黨”的一派支持國家現代化；稱為“頑固黨”的一派則反對一切變化，認為是對傳統的破壞。前者傾向于支持日本；后者則支持中國。關于兩個政黨更完整的描述，見仲原善忠，《琉球の歷史》，第131—132頁。

1. [[26]](#_26_24) 中山盛茂編，《琉球史辭典》，第419頁。

1. [[27]](#_27_23) 笹森儀助，《南島探険》（一），第131頁。

1. [[28]](#_28_21) 笹森儀助，《南島探険》（二），第123頁。

1. [[29]](#_29_21) 笹森儀助，《南島探険》（二），第204頁。大田描繪了沖繩各島對日本占領者的強烈反抗（《近代沖縄の政治構造》，第106—107頁）。

# 第三十一章 格蘭特到訪



明治天皇會見的外國訪客中，沒有人像美國前將軍、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那樣，給他留下如此深的印象。1877年，格蘭特將軍（即便在他擔任兩屆總統的任期內，人們也這么稱呼他）開始了著名的環球之旅。這次旅行的目的主要在政治上。格蘭特在內戰中立下的赫赫戰功已經被總統任期內的腐敗事件給玷污，顧問們認為他暫時離開美國一段時間為好，因為這樣一來選民可能會忘記那些丑聞。格蘭特還雄心勃勃地想第三次參加總統競選。

旅行的第一站是英國。此站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他們以維多利亞女王客人的名義住進了溫莎堡。接下來的兩年里,他們游覽了歐洲的許多國家，隨后又去了埃及、印度、暹羅、中國，最后來到日本。格蘭特夫婦是熱切的觀光客，但同時也在展示他們自己。正如格蘭特的傳記作者所寫的：“這位身穿黑色西裝的樸素男子是他們國家最偉大的戰斗英雄，世人都想看他一眼。將軍夫婦是美國式樸素和美國式力量的代表。”[[1]](#_1___John_Russell_Young__Around)

知道格蘭特總統丑聞的外國人并不多（或許他們比美國人更容易原諒那些事件），作為偉大軍人、合眾國救星的格蘭特，威望早已深入人心，所到之處均受到熱烈的歡迎。倫敦《泰晤士報》的一篇社論說，“格蘭特將軍將成為繼華盛頓之后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2]](#_2__William_S__McFeely_Grant___p)國王、王后和貴族都很高興地會見他，盡管之后有人不免批評他沒有禮貌。

不論去到哪里，格蘭特都保持著那種美國式的輕松隨意。例如，在去拜訪歐洲最有權勢的俾斯麥時，格蘭特漫不經心地走進首相官邸的庭院，扔掉半截雪茄，并向受驚的衛兵回禮。也許格蘭特此行最大的成功不是受到皇室的接待，而是受到英國北部工人階級的歡迎。他們喜歡這個人，覺得他是自己人。與永無休止的國宴相比，格蘭特當然更喜歡礦工等工人發自內心的歡迎。在國宴那樣的場合，沉悶的氣氛有時會使他喝得酩酊大醉。印度總督利頓（Lytton）勛爵在信中用嘲諷的語氣描繪了格蘭特的行為：

在這樣的場合，“我們尊貴的客人”、“偉大的西方共和國”的前雙料總統喝得爛醉如泥，像任何一個貴族那樣放蕩。他追著A太太亂摸、強吻了尖叫的B小姐，把胖胖的C太太捏得青一塊紫一塊，還追著想強奸D小姐。[[3]](#_3__William_S__McFeely_Grant___p)

格蘭特夫婦從印度去了新加坡，以及西貢、曼谷和香港，然后才到中國大陸。他們在天津會見了李鴻章總督，李以一句簡單的話歡迎客人：“格蘭特將軍，你我兩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后來李鴻章解釋說，這句話是指格蘭特和自己都成功地鎮壓了國內的大規模叛亂。[[4]](#_4__William_S__McFeely_Grant___p)

格蘭特在北京期間，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請求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解決中日之間有關琉球群島主權的爭端。恭親王譴責日本企圖“消滅一直向中國進貢，并歷來友好的琉球國”。格蘭特將軍回答說，除了國恥和滅國，任何一種方法都比戰爭強。“戰爭，”他說，“是巨大的不幸。只有在沒有其他方法能避免一場更大的戰爭時，才能使用它。而像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將會帶來無盡的災難。”[[5]](#_5__Li_Hong_Zhang_Ti_Dao_Zi_Ji_Z)

格蘭特痛恨戰爭及一切與戰爭相關的事情令人吃驚，因為他自己正是一名戰績輝煌的將軍。格蘭特甚至討厭那些描繪戰爭的畫作，他對同行的作家楊約翰（John Russell Young）說：“我從未見過一幅令人喜歡的戰爭畫。我試著去欣賞凡爾賽宮陳列的那些畫，然而卻發現它們令人作嘔。”格蘭特毫不留情地批評自己參加的1845年墨西哥戰爭：“墨西哥戰爭期間，我一直在和良心斗爭。我從未完全原諒自己參加了戰爭。對于這個問題，我的觀點非常堅定。沒有什么比美國對墨西哥發動的那場戰爭更邪惡了。我那時就這么認為，只是還年輕，沒有血性辭職不干。”[[6]](#_6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h)

格蘭特參軍是因為討厭父親的硝皮匠職業。他進了西點軍校，這是獲得良好教育的唯一途徑。畢業后格蘭特離開了軍隊，但事業碰壁，盡管討厭打仗，別無選擇之下只好又當了一名軍官。他說：“我從來都不是自愿或滿懷熱情地上戰場，戰爭結束時總是很高興。我從來沒想過再次帶兵。我對軍隊不感興趣。當劍橋公爵邀請我到奧爾德肖特檢閱軍隊時，我對王子殿下說，我最不想再看到的就是閱兵。”[[7]](#_7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h)

諷刺的是，對軍隊完全不抱幻想的格蘭特居然要到日本去，在那里，明治天皇對閱兵和演習正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楊寫道：“日本天皇非常喜歡自己的軍隊，并急于向格蘭特將軍展示，甚于超過想展示帝國的任何其他機構。”[[8]](#_8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h)最后，盡管格蘭特將軍極為厭惡，還是不得不遵循天皇的意愿，檢閱了日本軍隊。[[9]](#_9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h)

1879年6月21日，格蘭特乘坐軍艦“里士滿”號（Richmond）抵達長崎。迎接他的是貴族伊達宗城（1818—1892）和日本駐美國全權公使吉田清成（1845—1891）。楊這樣寫道：

伊達說自己受天皇之命迎接格蘭特將軍抵埗，代表天皇歡迎他，并在將軍逗留日本期間作為天皇的私人代表負責接待將軍……吉田是眾所周知的日本駐美公使，他謹慎而有才華，是帝國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之星。吉田在將軍當政期間擔任公使，又認識將軍，因此政府將其召回，以便他能陪伴格蘭特將軍并負責接待工作。[[10]](#_10__Yue_Bing_De_Di_Dian_Zai_Ri)

不久，格蘭特發表了在日本的第一次演說，演說包括以下內容:

美國在東方有許多利益，沒有其他國家能超過。但是，除非得到東方人民愉快的默許，并保證你們獲得的利益和我們一樣多，否則美國將什么也得不到。假如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特別是與這些非常有趣的古老東方帝國的關系，是以除此之外的其他思想為基礎，我將為此感到羞恥。[[11]](#_11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

格蘭特原本計劃訪問京都，然而關西地區爆發了霍亂，日本政府不想讓他去冒險。這些美國人并沒有將霍亂的威脅放在心上，但是作為日本的客人，他們是在天皇代表的看管之下，而代表堅持認為美國人不應該踏足關西。于是他們去了橫濱，并于7月3日抵達。

他們受到包括巖倉具視在內的一大群公卿的歡迎，巖倉和格蘭特握了手。握手這個動作對美國人來說似乎很重要：第二天，天皇在會見格蘭特時，走上前和他握了握手，使他們大受感動。楊寫道：“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然而對日本陛下而言卻是破天荒的第一次。”[[12]](#_12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對于天皇的舉止，楊認為，“天皇在會見其他來訪的皇室成員時，從未失禮過。但他是以親王之禮對待英國、俄國和德國親王，而以朋友之禮對待格蘭特將軍。”[[13]](#_13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

在日本的安排下，天皇和格蘭特將軍的第一次會晤定在7月4日——美國的獨立日舉行。天皇在首次會見格蘭特時表示，自己很高興在這一天舉行會晤。楊對明治天皇的描寫表明，盡管天皇表現得很友好，但在與外國客人相處時仍感覺不自在：

天皇的表情拘謹，幾乎可用別扭來形容，這是人在第一次做某件事，又想努力把它做好時的表情。天皇和將軍握完手之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他一只手放在劍鞘上，站著看著這些身穿繡衣，渾身上下金光閃閃的杰出客人，其神情仿佛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存在。[[14]](#_14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

兩人之間的寒暄都是些客套話。天皇說：“您對我的大臣說的關于日本的許多事情，我都已經聽說了。您已見到這個國家和人民，我迫切地想和您交流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并為沒能早點有這樣的機會而感到遺憾。”

格蘭特將軍回答說，自己完全聽從天皇的吩咐。他說很高興見到陛下，并對自己在日本受到的親切招待表示感謝。在國外，可以說沒有人比他對日本更感興趣，沒有人比他對日本人民的感情更真摯。也許格蘭特說的是真心話。優美的風景使他心情愉快，他發現日本“美得難以形容”，而明治宮殿之樸素也給他留下極佳的印象。楊寫道：“天皇的住處非常簡樸，就像鄉紳的宅邸一樣……這所宅子的特點便是簡樸和品味”； “日本教世人認識了整齊和紋理細密的天然木頭之美以及玻璃和油彩的夢幻之感。”格蘭特喜歡樸素和自然，這使他對日本的審美產生了共鳴。當人們告訴格蘭特，原計劃在燒毀的宮殿原址上修建新宮殿，但這個計劃卻“被天皇阻止，因為天皇不愿增加財政負擔，而甘于住現在的房子”時，他再次被感動了。[[15]](#_15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

格蘭特與天皇第一次會晤時，楊對日本公卿的描寫是珍貴的資料，因為這些人的外貌極少出現在日本人的作品中：

太政大臣（三條實美）顯得很突出。他個子瘦小，身材像個女孩，面孔精致、英俊、迷人，既像二十歲男孩，又像五十歲男人……巖倉有著一張令人印象深刻的臉，線條分明，顯示出他堅毅的性格，而且你會看到一條傷疤，刺客企圖把他殺死，就像不久前殺死日本最出色的政治家大久保一樣。

天皇站著，幾乎紋絲不動，顯然沒有注意到也沒有意識到那些對他表示的崇敬之情。他很年輕，身材苗條，比一般的日本人高，在我們眼中大概屬于中等身材。他的五官很醒目，嘴巴和雙唇令人想起哈布斯堡家族特有的嘴巴。他的前額飽滿而狹窄，有著濃黑的頭發，淺淺的髭須和胡子。頭發的顏色使得他那在國內稱得上黝黑的膚色顯得更黑了。他的臉沒有任何表情，假如那雙烏黑閃亮的眼睛不是全神貫注地看著將軍，你也許會將天皇誤以為是面無表情的雕塑。皇后穿著高貴又樸素的日本服裝，站在天皇身邊。她臉色蒼白，體型很苗條，幾乎像個孩子。頭發簡單地挽起來，并用一根金簪別住。天皇伉儷非常和藹，天皇尤其顯得親切而堅定。[[16]](#_16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

根據楊的描述，這次會晤，天皇和格蘭特在芝離宮聊了很久。會談由吉田清成擔任翻譯，雖然內容并沒有記錄下來，[[17]](#_17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但天皇顯然對格蘭特印象很好，他表示希望能私下跟格蘭特友好地見面。下次會面被安排在將軍從日光市回來之后。[[18]](#_18__Tian_Huang_Zheng_Shi_Huan_Y)

7月7日，天皇和格蘭特進行了第二次會晤。那天上午，天皇和將軍觀看了隊列式。能夠展示訓練有素且設備精良的日本軍隊，天皇無疑感到非常開心，另外，他可能以為（他不知道格蘭特厭惡這類閱兵）客人對此特別感興趣。閱兵結束后，明治對格蘭特說：“參加閱兵的士兵太少，您可能沒什么興趣。我聽說貴國只有一支很小的常備軍。一支小小的軍隊就能滿足一個如此大的國家之需，實在使我欽佩萬分。”[[19]](#_19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天皇關于美國軍人數量很少的說法，可能出自日本人訪問華盛頓時的觀察。他們看到只有少量警察保護著美國總統。

之后，天皇前往芝離宮，格蘭特夫婦隨后也來到這里。天皇和他們握手，歡迎他們來到日本。其他客人包括香港總督夫婦，以及美國公使夫婦。格蘭特將軍領著熾仁親王妃到餐廳去，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則牽著格蘭特夫人的手，將她領到餐桌前。[[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不久之前，日本派去西方的使團成員還在為女性在莊嚴的國事場合出現而感到吃驚（甚至驚愕），但是現在太政大臣卻毫不猶豫地牽起一名外國夫人的手，并有禮貌地將她領到餐桌前。

晚宴結束后，格蘭特夫婦應邀到另外一個宮殿里喝咖啡。天皇一邊喝咖啡一邊和前總統聊天（由吉田清成充當翻譯）。天皇問了幾個問題，并對格蘭特的環球之旅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

“前年以來各國漫游，山水風景之外，得益之事定不少云云。”

“印度地方熱氣相當困擾云云。”

“印度風俗異于歐米，御覽之種種，何事最為深刻云云”

“是否御覽長城及其他名所古跡等云云”[[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天皇之前和外國客人交流有困難，現在卻能夠超越談論天氣和感謝遠道而來的客人這樣的陳詞濫調了。起初，天皇不愿和外國人共進晚餐，在宮內卿德大寺實則的勸說下才改變了主意，[[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但現在天皇似乎很享受這種場合，即使氣溫升到近三十四攝氏度，身上還穿著軍禮服。天皇不僅和格蘭特交談，還和香港總督交談。皇后在和格蘭特太太談話時，慰問了他們的旅途勞頓，格蘭特太太回答說，她和丈夫訪問過的許多國家中，沒有一個在接待他們時像日本這樣親切。[[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7月17日，格蘭特和太太在吉田清成和伊達宗城的陪同下，前往日光市。第二天，天皇派伊藤博文到日光市[[24]](#_24____Xin_Wen_Ji_Cheng_Ming_Zhi)去，以確保格蘭特夫婦在那里過得舒適。為格蘭特安排日光之行可能是為了使他避開東京的酷熱，也可能是為了彌補他無法游覽京都的遺憾。7月22日，格蘭特在日光會見了日本政府派來的代表，正式談到了中日之間的琉球問題。格蘭特受恭親王和李鴻章總督之托，講了清朝的立場。伊藤博文回答說：“日本對琉球的主權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格蘭特解釋自己的全部興趣源于對日本和中國的親切感。他說：“日本在軍事物資、陸軍和海軍方面都比中國強。對日本來說，中國毫無防備，而且根本不可能傷害日本。”[[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格蘭特準確地估計了中日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顯示出他作為一名職業軍人的專業素養，而即便到了甲午戰爭（1894—1895）時期，大多數的外國觀察家仍然相信，中國的實力遠在日本之上。



格蘭特與李鴻章，1879年。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中日兩國政府之間就琉球群島的歸屬問題繼續交換意見。外務卿寺島宗則給清政府去信，指出琉球群島的文字、語言、信仰和風俗都和日本一樣，而且島上的居民自一千年前的隋唐時代起就向日本進貢。12世紀時，源為朝[[26]](#_26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就到過琉球，娶了酋長的妹妹為妻，源的兒子舜天后來當了國王。寺島在信中還詳細敘述了琉球與薩摩之間的特殊關系，并強調現在已經廢除藩國，因此琉球群島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清朝在回信中列舉了大量事實，證明琉球很早以來就承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并譴責日本吞并了一個獨立的國家。清朝說，這不僅是對清朝，而且是對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極端蔑視。為證明自己擁有主權，日本在回信中再次列舉了一些歷史證據。[[27]](#_27__Ping_An_Hou_Qi_Wu_Jiang__Yu)

這確實不是一個外人介入的有利時機，但格蘭特自7月底從日光回來之后，便請求天皇定下下次會面的日子，想必是想找機會討論中日之間的緊張關系。8月10日，他們在濱離宮會面。當天下午，天皇身著便服，在三條實美、德大寺實則和侍從長山口正定的陪同下，來到濱離宮。格蘭特在兒子和秘書的陪同下，來到天皇面前。天皇站起來和格蘭特握手。在接下來的會談中，日本方面，只有三條和翻譯吉田清成待在天皇身邊。[[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天皇和格蘭特之間的會談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當時天皇二十七歲，格蘭特五十七歲。會談記錄是英文的，估計是格蘭特的秘書記下來的，然而記錄太短，不可能涵蓋兩小時的所有談話內容。日本人自己似乎沒有做記錄，而是后來把英語的文本翻譯過來。[[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可惜的是明治實際說的話并沒有保留下來。它們本來可以顯示一些信息，譬如，在面對這位年齡是自己兩倍大的舉世聞名的將軍和總統時，這名年輕的君主是如何說話的。

談話甫一開始，天皇便為沒能早點安排與格蘭特的會晤感到抱歉，格蘭特也為自己在日本受到的熱情招待表示感謝。接下來主要是格蘭特的評論和建議。他顯然希望在天皇眼中豎立起日本友人形象，為此毫不客氣地譴責在亞洲的其他歐洲人和美國人的態度：“這方面，我發現新加坡以東的各國之中，只有兩種報紙愿意站在亞洲人、歐洲人和美國人共同的立場上思考，即日本的《東京時報》和《日本郵報》。只有這兩份報紙認為東方國家也有受尊重的權利。除了極少數之外，所有的西方官員全都一個樣。只要對自己有利的事，他們就擁護，完全不管中國和日本的權利。”

“有時看到這種不公平的自私行為，我禁不住熱血中燒。”[[30]](#_30____gurantoJiang_Jun_tonoYu_D)

格蘭特在后來的談話中反復譴責在亞洲的歐洲列強：“就我對他們外交政策的判斷，歐洲列強在亞洲的利益沒有一項不涉及對亞洲人民的侮辱和鎮壓。他們的外交政策總是非常自私，在他們看來，中日反目可能對自己有利。”[[31]](#_31____gurantoJiang_Jun_tonoYu_D)

這些話很激進，但是從一個認為美國和歐洲國家不同、美國社會本質是平等的人口中說出來，似乎有幾分道理。盡管格蘭特沒有指名道姓地說出具體的冒犯者，但他很可能是指英國，這位歐洲列強中的老大。格蘭特離開日本時舉行了送別會，楊約翰在描寫會上的各色人物時，比較了美國公使約翰·賓漢（John Bingham）和著名的巴夏禮爵士：

賓漢先生那張棱角鮮明的臉隨著歲月的風霜變得柔和，他正在和英國公使巴夏禮爵士說話。巴夏禮是一位輕巧、活潑、容易激動的中年男士，有著撒克遜人鮮明而開放的特點，是在場最快樂、最有趣、最和藹的紳士，他認識所有人，也跟所有人聊天。聽著巴夏禮那輕快而讓人心旌搖蕩的玩笑話時，你不會想到這是一只鐵腕，他的政策則是所有強硬嚴厲的英國政策的化身。[[32]](#_32____gurantoJiang_Jun_tonoYu_D)

格蘭特認為，自己和同胞沒有受到傲慢的歐洲人的影響，不像巴夏禮那樣完全不顧亞洲國家的死活，不停地努力為英國攫取最大的利益。他對天皇說：“除了陛下自己的子民，沒有人比我更關心日本的福祉。在這點上，我可以公平地代表大部分美國人。”他說這番話時很可能是真心的，盡管確實不難發現，美國人和格蘭特所攻擊的歐洲人一樣自私。格蘭特曾警告天皇尤其要小心外國人的恩惠：

一個國家最需要避免的事情莫過于向別國借貸了……你多半知道，有些國家非常渴望借錢給那些弱國，從而凌駕于它們之上，并對這些國家施加過分的影響。它們借錢是為了獲得政治權力，并一直在找機會出借。因此，它們會很樂意看到日本和中國，亞洲僅存的兩個尚未完全受到外國統治或者控制的國家打起來，這樣它們就能按照自己的條件借錢給這些國家，并控制這些國家的內部政策，而這就是它們追求的目標。[[33]](#_33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

格蘭特還主張日本在與清朝談判琉球問題時應該采取更加和解的姿態：“本著大度和正義的原則，日本應該向清朝讓步。中日之間的友誼如此重要，兩國應該彼此向對方讓步。”[[34]](#_34____gurantoJiang_Jun_tonoYu_D)格蘭特希望從天皇口中聽到肯定的答復，但天皇只是說（至少在記錄中如此）：“至于琉球，伊藤等人已得到批準，很快會與您談論這個問題。”

格蘭特還對日本與外國訂立的關稅公約感到不滿。[[35]](#_35____gurantoJiang_Jun_tonoYu_D)進口關稅只有百分之五，太低了，而“出口關稅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最壞的事”。他說外國政府應該同意修改合約的建議。（美國已經同意，只要其他其他國家跟著做，然而卻沒有一個國家這么做。）[[36]](#_36__Yang_Xie_Dao___Ying_Guo_Zai)最后，格蘭特在贊揚了日本的教育體系之后，間接地建議挽留那些經驗豐富的外國教授，讓他們指導年輕的日本教師：“美國在聘請外國人時毫不猶豫，只要他們對我們有用。那些為你們創立工科大學的人都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人才，你們應該留住他們，能留多久留多久。”[[37]](#_37__1879Nian_1Yue_5Ri__Ba_Xia_L)

格蘭特的建議總體而言令人贊賞。他在談話中警告不要匆忙地設立立法機構，鑒于他對日本民眾的贊美和他自己的民主信念，這一點看起來可能有些奇怪。[[38]](#_38____gurantoJiang_Jun_tonoYu_D)

難以衡量這次談話對天皇和日本政策的影響有多深。格蘭特對外國貸款的警告也許是談話中發揮最大效果的一部分。當新上任的大藏卿大隈重信試圖尋找解決政府財政危機的方法，而提出向外國貸款五千萬日元時，他的建議被駁回了，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格蘭特的這番警告。[[39]](#_39____gurantoJiang_Jun_tonoYu_D)

格蘭特對日本逐步設立立法機構的建議，與大多數日本政治家喜歡的方式完全契合，他們根本無須從外國客人那里聽來。[[40]](#_40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此外，日本早就不滿強加于自己頭上的關稅條例，無須格蘭特提醒他們這種不公平待遇。只是他們尚無能力迫使歐洲列強同意簽訂更公平的合約。

格蘭特建議日本在琉球群島的主權問題上采取更加緩和的態度，然而這條建議沒有被采納。他后來寫信給巖倉具視和恭親王，建議清朝和日本直接進行談判，但也沒能即刻產生效果。[[41]](#_41__Fei_Niao_Jing_Xie_Dao__You)1879年12月1日，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總統在國會中說，美國政府愿意促成琉球爭端的和平解決，[[42]](#_4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然而這一提議并無后文。1880年8月，正如好心的格蘭特建議的那樣，中日之間開始直接談判，然而就在協議達成之后，清朝卻改變了主意。琉球群島的主權問題再也不是可以協商的問題。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格蘭特建議的和平協商的可能性已經徹底失去。

天皇后來在應對外國政要時更加自信，這也許是他與格蘭特會晤最為持久的效果。不過，格蘭特來訪對日本文化的影響遠遠不止與天皇之間的對話。格蘭特所到之處均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他經過的街道都用燈籠和竹子裝飾一新。[[43]](#_43__George_H__Kerr_Okinawa__p)

慶祝的最高潮是8月25日在上野公園舉行的公共慶典。這一慶典表面上是為了慶祝東京遷都十二周年而舉辦的。天皇親臨現場，與觀眾見面，同時也借此機會招待格蘭特。天皇一到，軍樂隊便奏起了軍樂，接著是騎馬射擊、劍術和煙火表演。[[44]](#_44____Xin_Wen_Ji_Cheng_Ming_Zhi)格蘭特將軍和天皇一起觀看了慶典，慶典結束后，格蘭特坐車回酒店的那段路令人難忘。楊的記錄如下：

在延續幾公里的道路上，將軍的馬車慢吞吞地行駛在幾十萬擁擠的人群中間。樹木和房屋都掛著燈籠，點著燈，馬路上方懸掛的燈飾形成一道道的拱門。夜晚晴朗而溫和，這樣的景象我從未見過，也不可能再見到。[[45]](#_45__Guan_Yu_Zhe_Xie_Huo_Dong_De)

這次慶祝令人想起19世紀60年代美國人和歐洲人歡迎首個日本使團時的情景，但是這次更加不同凡響：在歡迎格蘭特的人群中，肯定有許多人幾十年前喊過反對外國人的口號，有些甚至打算對外國人見一個殺一個。昔日的仇恨不可思議地化成了愛。這位樸實的前軍人并沒有帶來什么貴重的禮物，但他通過不加修飾的行為和對日本的喜愛，俘獲了日本人，甚至是天皇的心。

格蘭特的形象被印在無數的木刻版畫上，諸如紀念他參觀了賽馬、在校學生的體操表演、日光的華嚴瀑布和劇院等。8月，他送了一塊幕布給新富座戲院，以感謝7月16日在那里看了一場歌舞伎表演。[[46]](#_46__John_Russell_Young_Around_t)這出戲（一出兩幕劇）叫做《后三年奧州軍記》，是由當時最出色的劇作家河竹默阿彌創作的。戲文表面上講的是11世紀源義家將軍如何鎮壓奧州地區的一場叛亂，其實是為了表現格蘭特將軍的偉大勝利。[[47]](#_47__Lian_Zi_Shi_An_Hong_Se_De)表演開始時，七十二名藝妓身著美國國旗圖案的和服跳舞——她們的身上和左臂是紅色和白色的條紋，右臂是藍色的背景和星星。

除此之外，暢銷書作家假名垣魯文寫了一本名為《格蘭氏傳倭文賞》的準傳記，使其名留后世。這本小冊子的封皮采用了木刻版畫，上面畫著七十二名藝妓以及手拿扇子的格蘭特夫婦。

格蘭特對藝術最重要的貢獻也許源于他在巖倉具視家觀看了一場能劇表演。就在巖倉決定支持能劇復興時，格蘭特來到日本，并向巖倉表示希望觀看日本的古典藝術。格蘭特極少這么做。在歐洲時他常被邀請去看歌劇，但他認為那是“一種永恒的折磨”。在馬德里時，他受美國公使、詩人約翰·拉塞爾·洛威爾（John Russell Lowell）之邀看了一場歌劇。“五分鐘后他說，他唯一能聽出來的聲音就是號角聲，并問洛威爾夫人：‘我們還沒看夠嗎？’”[[48]](#_48__Guan_Yu_Zhe_Chu_Xi_De_Nei_R)

格蘭特對能劇的反應則截然不同。據說寶生九郎的《望月》、金剛泰一郎的《土蜘蛛》和三宅正一的狂言《釣狐》都使他大為感動。后來他對巖倉說：“像這種高貴典雅的藝術，很容易受到時代的影響，從而失去往日的尊貴，陷入衰退。你們應該珍惜并將它保存下去。”[[49]](#_49__William_S__McFeely_Grant_p)

外國貴賓的這番話并沒有被當成耳邊風。巖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清楚挽救能劇的必要性。為了確保能劇能存活下去，他在前大名和貴族的支持下，采取了積極的措施。8月14日，巖倉家舉行了一次專場演出，包括天皇、太政大臣和四名參議在內達官貴人觀看了表演。能劇確實在慢慢復興。

8月30日，格蘭特將軍在皇宮舉行的儀式上向天皇道別。格蘭特為自己所到之處受到的友好接待表示感謝。他注意到日本既沒有特別富有的人，也沒有特別貧窮的人，而這種情況他還從未在其他地方見到過。日本擁有上天恩賜的肥沃土壤、大面積未開墾的土地、許多迄今仍未開采的礦產、天然的良港、不計其數的漁業資源，尤為重要的是，日本有一群勤勞、滿足而節儉的人民。日本實現富裕和強大的計劃什么也不缺。他極力主張日本不要讓外國人插手自己的內政，這樣國家就能積累財富，而不必依賴其他國家。格蘭特最后說，日本的獨立和繁榮并不只是他一個人的愿望，而是全體美國人的愿望。他殷切地希望天皇極其子民在上天的福佑下過上快樂的日子。[[50]](#_50__Liu_Ze_Ying_Shu____Bao_Shen)

天皇用簡短的話感謝了格蘭特。根據楊的記載，天皇朗讀時嗓音清晰悅耳，跟他第一次見外國人時的囁嚅含糊形成鮮明的對比。楊這樣描寫天皇給自己留下的最后一個印象：“天皇不是你們所說的那種優雅人士，他的行為似乎有些焦慮，一點也不放松——他希望討好別人，并且不出任何差錯。但在這次歡送會上，他似乎比我們以往見到的更加放松和自然。”[[51]](#_5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從各個方面來看，格蘭特的訪問都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只除了一點：他沒能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但是格蘭特不會忘記日本，而日本人，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也不會忘記這個樸實無華，一點也不像英雄的人。

1. [[1]](#_1_31)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602.

1. [[2]](#_2_31) William S. McFeely,Grant , p. 450.

1. [[3]](#_3_31) William S. McFeely,Grant , p. 457。

1. [[4]](#_4_31) William S. McFeely,Grant , pp. 453, 463, 472。

1. [[5]](#_5_31) 李鴻章提到自己鎮壓太平天國叛亂的同一年，格蘭特鎮壓了南方各州的叛亂。（William S. McFeely,Grant , p. 474）

1. [[6]](#_6_31)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411.

1. [[7]](#_7_31)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p. 443, 447-448。

1. [[8]](#_8_31)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451。

1. [[9]](#_9_31)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533。

1. [[10]](#_10_31) 閱兵的地點在日比谷閱兵場，時間是7月7日的上午（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 2, p. 532）。詳見《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02—703頁。

1. [[11]](#_11_31)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 2, p. 477.

1. [[12]](#_12_31)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 2, p. 481。

1. [[13]](#_13_31)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 2, p. 529。不清楚這是不是真的。明治可能之前就與阿爾弗雷德王子這樣的客人握過手。

1. [[14]](#_14_31)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 2, p. 567.

1. [[15]](#_15_30)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 2, pp. 533, 530。

1. [[16]](#_16_30)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 2, pp. 542, 526, 538, 548。

1. [[17]](#_17_30)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 2, pp. 527-528；《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98—700頁上亦有簡略的描述。

1. [[18]](#_18_29) 天皇正式歡迎格蘭特的話以及格蘭特的回答見《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99—700頁。明治表示很高興能與一位名望如此之高的前輩見面，感謝他總統任內對到訪的日本人的友好招待（特別是巖倉使團到訪期間），以及自己對格蘭特在環游世界期間對日本進行訪問的喜悅之情。

1. [[19]](#_19_29)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534.

1. [[20]](#_20_2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03頁。

1. [[21]](#_21_2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03頁。

1. [[22]](#_22_2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04頁。

1. [[23]](#_23_2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05頁。

1. [[24]](#_24_25) 《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四卷，第75頁。

1. [[25]](#_25_25)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12頁。西鄉從道和森有禮也被派往日光市。

1. [[26]](#_26_25)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 2, pp. 558-559.

1. [[27]](#_27_24) 平安后期武將，源義經、源賴朝的叔父。保元之亂中支持崇德上皇一方，同平清盛等對抗，戰敗自殺。源為朝遠渡琉球是一種傳說，非確切史實。——編注

1. [[28]](#_28_2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08—710頁。楊約翰在8月15日和9月1日的《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 ）上詳細描述了中日之間關于琉球問題的對立觀點。文章的日文譯本刊登于10月14日—10月27日的《報知新聞》上，亦可見《グラント將軍との御対話筆記》第69—95頁。

1. [[29]](#_29_2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20頁。

1. [[30]](#_30_20) 《グラント將軍との御対話筆記》 p.xiii上有一頁英語文本的復印。筆跡正常，且相當清楚，可知并不是速寫。有些詞做了訂正，可能是因為匆忙之中寫錯了，或者是因為格蘭特自己即席發言時犯了語法錯誤。訂正者的筆跡似乎是格蘭特的。天皇的話要比格蘭特的建議性話語少得多。有時候他用了第三人稱（“表示他希望與中國保持最和平友好的關系”），說明翻譯只將天皇的話概述給了格蘭特。英語文本和島田胤則的日文譯本一開始保存在吉田清成的家里，但是后來都捐給了京都大學圖書館（《グラント將軍との御対話筆記》，第99頁）。

1. [[31]](#_31_18) 《グラント將軍との御対話筆記》，第21—22頁。這里的英語表達有些不同尋常，但是意思卻非常清楚。也許出現錯誤的是我用的英語打字員，而不是格蘭特或者翻譯。

1. [[32]](#_32_17) 《グラント將軍との御対話筆記》，第22—23頁。

1. [[33]](#_33_16)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605.

1. [[34]](#_34_16) 《グラント將軍との御対話筆記》，第15頁、第18—19頁。

1. [[35]](#_35_15) 《グラント將軍との御対話筆記》，第22頁。

1. [[36]](#_36_14) 楊寫道，“英國在東方的一個奇怪現象就是，英國允許自己的殖民地自己決定關稅事務，選擇自由貿易還是關稅保護，但她卻堅持日本和中國必須僅僅在有助于英國貿易的情況下安排自己的進口和關稅”（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p. 582）。

1. [[37]](#_37_12) 1879年1月5日，巴夏禮爵士從“江戶”寫了封信，信中他說，“美國人已經和日本簽訂了一份條約！但是那是一份規定只有其他國家都同意它才會生效的條約，美國人通過這種方式把自己保護得很好，而我們，作為其中的一員，當然不可能這么做”（引自.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 2, p. 268）。關于這份條約（從未真正實施過）生效的條件，見《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四卷，第72—73頁。這份條約是吉田清成和美國國務卿威廉·埃瓦茨（William M. Evarts）1878年8月7日在華盛頓簽署的。明治于1879年2月7日批準了條約。

1. [[38]](#_38_9) 《グラント將軍との御対話筆記》，第26頁。

1. [[39]](#_39_8) 《グラント將軍との御対話筆記》，第17頁。

1. [[40]](#_40_8)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83頁。

1. [[41]](#_41_8) 飛鳥井寫道，由于格蘭特是一名發達國家的領導人，他對逐步建立立法機構的支持，可能極大地幫助了本就傾向于逐步建立議會的天皇（《明治大帝》，第183頁）。與此相反，這個時期大隈重信則贊成為兩年內召集議會設置一個時間表。

1. [[42]](#_42_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29—732頁。格蘭特極力主張日本收回對中國使用的粗暴言語，中國也同樣收回對日本使用的粗暴言語。有關中日之間談判的一份有用的摘要，見George H. Kerr,Okinawa, pp. 389-392。

1. [[43]](#_43_6) George H. Kerr,Okinawa, p. 389.

1. [[44]](#_44_6) 《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四卷，第75頁。

1. [[45]](#_45_6) 關于這些活動的完整描繪，見《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35—740頁。

1. [[46]](#_46_6) John Russell Young,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573.

1. [[47]](#_47_5) 簾子是暗紅色的，上面繡有白色的“泰平”的字樣。一側用金線繡有“グラントより”（由格蘭特）的字樣。

1. [[48]](#_48_5) 關于這出戲的內容，見《演劇百科大事典》第二卷，第477頁。盡管它匯聚了許多歌舞伎巨星——九代目市川團十郎、初代市川左團次、三代目中山仲藏等等——但是并不成功。

1. [[49]](#_49_5) William S. McFeely,Grant,p. 468.

1. [[50]](#_50_5) 柳澤英樹，《寶生九郎伝》，第34頁。

1. [[51]](#_51_3)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41頁。《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四卷，第97頁上有類似但并非一模一樣的話。我兩者都有引用。

# 第三十二章 教育改革



1879年8月31日，明治的第三個兒子出生，孩子的母親是權典侍柳原愛子。天皇和皇后立即將嬰兒服和一把守刀送到青山御產室，當天晚上舉行了慶祝親王誕生的晚宴。明治的外祖父中山忠能被任命為親王的養護人，但是由于他的歲數太大，正親町三條實愛被選為他的助手。9月6日，天皇給兒子起名嘉仁；他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明宮。[[1]](#_1___Ming_Gong__Zhe_Ge_Ming_Zi_D)

宮中舉行了將親王誕生的消息及時匯報了各位神靈的傳統慶祝儀式，并舉辦了宴會，參加的人包括皇室成員、大臣、參議、宮廷名流和柳原愛子的父母。宴會氣氛無疑非常喜慶，但是在場的許多人都知道這次的分娩異常困難，而且每個人都清楚明治的頭兩個兒子都夭折了。也許這就是大臣們打破傳統慣例，沒有獻上祝辭的原因。

親王從誕生之日起，就得了皮疹，全身都是疹子。9月23日，疹痂脫落，親王洗了澡，但情況反而更糟糕。第二天親王的肚子開始抽搐，并逐漸蔓延到胸部。伴有黏痰的咳嗽使他更加痛苦。凌晨3點，抽搐消退，但仍未完全康復，時不時會有輕微的復發，這使得天皇和皇后非常焦心。御醫試了包括針灸在內的一切方法，年老的忠能日夜不停地守著曾孫。直到12月，親王的病情才逐漸減弱，只有12月9日復發了一次。嬰兒的母親柳原愛子產后身體未能復原，而且御產室太過擁擠，于是她被送回宮里休養。[[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直到12月4日天皇才第一次見到親王。那天下午，天皇在跑馬場上練習騎馬之后，騎著馬來到青山御產室。中山慶子懷抱著親王給天皇看，天皇見到兒子非常高興。第五天，皇后打算來看自己名義上的兒子。宮內早在9月30日就已決定，親王被視為皇后之子，先放在中山忠能家撫養（就跟他父親一樣）。但是那天親王又開始發病，于是看望的時間被推遲了。12月7日親王搬到中山忠能家。12月28日，出生已一百二十天的親王在中山家舉行了“初箸”儀式[[3]](#_3__Huang_Shi_Li_Yi_Zhi_Yi__Hai)，但是親王的健康持續讓天皇操心，由于擔心引發痙攣，天皇對親王比對其他孩子更加寵溺。

這個時期天皇除了操心兒子的健康之外，還操心著其他事情。他已經被歐洲王室視為“兄弟”，因此相應地接待了王室定期的造訪。德國的海因里希（Heinrich）王子給明治帶來了德國政府的一枚勛章，這是亞洲君主首次受此殊榮，也是明治佩戴的第一枚外國勛章。后來來訪的熱那亞（Genoa）公爵給他帶來了一枚意大利最高軍事勛章“阿努齊亞塔” （Annunciade）勛章，天皇回贈他一枚大勛位菊花大綬章，并向他演示如何佩戴。天皇還收到一尊由米蘭的雕塑家朱塞佩·烏戈列尼（Giuseppe Ugolini）創作的自己的胸像、天皇夫婦的肖像。[[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除了來訪的外國王室，天皇還定期收到其他君主的生活通報。他正確地回應了這些“親戚”。西班牙的阿方索十二世再婚時，俄國沙皇遇刺并僥幸逃過一劫時，他都向他們表示祝賀。[[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國內的事情也牽動著天皇的心。1879年10月，一些政府成員商量好要踢掉副島種臣，以某種任務為名將他派到國外。黑田清隆是反副島派的領袖，他稱國外的報紙指控副島，說他在給天皇授課時發表過違背政府政策的言論，而且副島在擔任外務卿處理臺灣問題時，與外國人——美國將軍查爾斯·勒讓德——互相勾結。黑田的指控得到了包括參議西鄉從道在內的其他高級官員的支持，然而大隈重信稱，如果副島被免職，他也會辭職。伊藤博文稱贊副島的學問了得，但得不到大多數人的信任，因為他的思想太保守了。他同意將副島派到國外去考察政治環境，這樣可以提升他那本已非常杰出的西學知識。伊藤暗示副島將來有一天也許會重返內閣。

需要做決斷的天皇與儒學老師元田永孚商議，結果元田極力維護副島。他說自己聽過副島給天皇上的課，認為副島心中只有“保帝室之尊嚴，揚顯圣德”，因此任命副島“于陛下有益，于政府無害”。黑田從未聽過副島講課，對他的指控缺乏依據。相信“世上之浮說”，并要彈劾副島，就是在質疑陛下的智慧。如果報紙上說什么，就相信什么，內閣有多少人不被開除？如果聽從黑田的自私建議，肯定將天下人批評；但是，如果黑田不滿提議被拒，進而要求辭職，即便陛下批準其辭職，又有誰會質疑這個決定呢？[[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天皇并不急于下決定，他幾次三番地和自己極為看重的元田商議。元田的回答越來越坦率。他將黑田排擠副島歸咎于個人恩怨。副島壓根沒有錯，即使有千萬人討厭他，天皇也應該繼續任用。副島擔任帝師只有七個月，連《大學》都沒講完，這時候怎么會有人提議將他派到國外去？黑田辭去參議，還有另外九名參議，但是如果副島走了，天皇將不僅失去一位罕見地能增進自己學識的人，還將鼓勵那些叛亂分子攻擊政府，從而造成不可估計的危害。最后，元田的雄辯占了上風：天皇決定不將副島派往國外。曾威脅說提議不被采納就要辭職的黑田也依舊留任。[[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時隔一個多世紀，我們現在回顧這一事件時，似乎明顯地看到，在黑田等薩摩人堅持將副島調離原職的背后有一些個人（或者藩國）恩怨在作祟。但這個事件值得注意卻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人們有時會以為明治政府的所有決定都是協商一致的結果，這個例子卻說明，天皇信賴元田這個超越政治派別的人，而且做出了不同于大臣們意見的決定。

大約同一時期，天皇廢除了兩年多前設立的侍補，或者說顧問之職。[[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盡管侍補中有些非常杰出的人物——德大寺實則、佐佐木高行和元田永孚等。一開始他們就被阻止對天皇行使規勸之職，因為政府官員指控他們渴求權力。伊藤將侍補對政府的準干預比作宦官的邪惡行為，并預測他們將混淆宮廷和政府的職能。將侍補和臭名昭著的腐敗太監相提并論的比喻最終惹惱了失意的侍補們，而黑田試圖除去支持侍補的副島同樣令他們憤憤不平，于是他們請求廢除自己的職位，希望大臣和參議在規定的工作之外履行侍補之職。內閣最后同意廢除侍補，并向大臣和參議分派了類似的宮內職務。

天皇似乎并不歡迎這個決定。10月20日，就在廢除侍補的一個星期后，天皇召見德大寺、佐佐木和元田等人，告訴他們盡管已經廢除了侍補之職，但他們要是有什么事情想跟他說，盡管大膽開口。天皇親自贈送給他們各色成匹的絲綢，并邀請他們與太政大臣和右大臣共進午餐。這并不是唯一一次政客們的決定令天皇感到惱火，但他們總是強調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為了執行天皇的旨意。

1879年下半年主要爭論的問題是教育。《五條誓文》曾許諾日本將在全世界范圍內追求知識，以趕上發達國家。天皇不管去到哪里都一再地參觀學校，也說明他一直對教育有著濃厚的興趣。天皇自己一直在接受元田永孚等儒家學者的指導。元田認為儒家最重要的美德是“忠”和“孝”，這個觀點對天皇影響尤深。這兩則在中國和日本德川時期的儒家著作并沒有特別強調。明治統治期間，儒家的四種美德仁、義、忠、孝經常出現在論述教育的有關文件中，被認為是官員們提倡的“文明和開化”政策的輔助；[[9]](#_9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g)但是，“仁”和“義”的受重視程度不及能立即幫助到新國家政策的“忠”和“孝”。

天皇還接受日本傳統著作和（程度相對較低的）西方歷史的教育。不管哪個科目，他對教育的觀念仍然非常保守，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下面這首詩中看出來：

千萬年來

不曾改變的

是古代

圣賢們

留下的教誨

天皇的詩還流露出他意識到僅僅靠傳統學識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夠：

如果我們落后于

飛速發展的世界

那么即使

把文學作品都研究透

也沒什么用[[10]](#_10__Zhe_Shou_Shi_He_Qian_Mian_Y)

天皇認為向過去學習非常重要，然而新的教育政策卻傾向于西方。例如，1876年7月14日，天皇視察了青森縣的一所小學，十名學生用英語作了演講和作文。他們演講和作文的題目如下：

演講：漢尼拔鼓勵士兵的演說

作文：慶祝陛下訪問青森

演講：安德魯·杰克遜在美國國會的演講

作文：一首贊美開明和進步的頌歌

演講：西塞羅對喀提林的攻擊

作文：一首贊美教育的頌歌[[11]](#_11__An_Tian_Yin_Xiang____Dong_B)

演講和作文還沒結束，就到了天皇不得不離開的時候。他走時，學生們用英語為他唱了一首歌。天皇給了學生每人五元錢，讓他們購買《韋氏中級英語辭典》。然而返回東京后，他對元田說，自從1872年學校體系建立以來，“美國式教育”在實踐中的流弊已深，表現出來便是學生忽視了日本。[[12]](#_12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

1878年從北海道和東海道回來之后，天皇把巖倉具視召來，告訴他有必要加強學校的日本傳統道德教育。孩子們對日本傳統一無所知，卻能用英語流利地做關于漢尼拔和西塞羅的演講，這顯然令天皇不太高興。

天皇不僅對學術性機構感興趣，還對教授“實用之學”的技術培訓學校感興趣。1878年1月24日，天皇參觀了內務省勸農局下設的農學校（東京大學農學院前身），并發布詔書稱“朕思，農為國之本”。[[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強調農業對國家的重要性自然不是什么新鮮事：儒學家們一千多年來一直都這么說。區別在于學生們現在是在學校里學習現代農業的方法。他們不必像過去那樣，為了成為優秀的農夫而在田間辛苦地勞作。學校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消滅一代代傳下來的傳統農耕方法，而是為了使正規的科學技術幫助提升農業產量，促進社會繁榮。

1878年7月15日，天皇在工部大學的開幕典禮上講話。對日本來說，系統傳授科技的學校是新興事物，是“啟蒙”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把日本的科技水平提高到發達國家的水準，必須雇用外國專家擔任教師。明治在參觀全國各地的學校時，總是特別留意那些外國教師。在他們完成合同準備回國之際，明治通常會接見他們，而這種榮譽極少發生在日本人身上。我們已經知道，格蘭特總統極力主張日本留住外國顧問。盡管他希望有一天每個教職都由日本人擔任，但認為匆忙地解雇外國人并不是明智之舉，“沒必要匆忙地解雇外國專家……我認為你們應該留住外國人，能留多久留多久，例如那些為陛下創建工科大學的世界知名專家。”他的意見被采納了。

明治還鼓勵（家境優渥的）日本人到國外留學，了解其他國家的情況，掌握實用的學問，從而避免使日本落后于其他國家。[[14]](#_14__Du_Bian_Ji_Zhi_Lang____Ming)他甚至在自己的詩作中強調吸收西方文明的重要性：

它們在我的花園里

茂盛地生長著——

因為我種植

并精心培育了

國外植物和樹木的幼苗

1872年，政府為了使全國教育標準化，主要參考法國教育制度，頒布了一項教育指令（《學制》）。[[15]](#_15__Guan_Yu_Zhe_Xiang_Zhi_Ling)盡管結果證明這項計劃過于理想主義，在日本有限的資源下無法實現，但卻表明明治統治伊始便對教育非常重視。

新的教育制度公布后不久，便有怨言說當局耗資巨大，為了推行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而罔顧成本。行政官員也被指責過于干涉學校事務，盲目一刀切似地處理。由于國內的種種不滿情緒，文部大輔田中不二麿（1845—1909）被派往美國考察教育制度。他回國后提出的建議背離了1872年建立的基本制度，即教育制度應該符合國力、民眾的生活狀況和目前的文化。分權式的教育制度將取代法國式的教育體制，責任轉移到地方。[[16]](#_16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1878年5月，田中向伊藤博文提交了草案，伊藤做了某些修改，例如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權，將中央政府的干涉減到最少。草案通過了元老會的進一步審議，隨后被送到天皇面前，等待批示。

與此同時，受天皇之托，身負融合傳統道德和新教育之任的巖倉已經決定必須改變教育政策。像佐佐木高行和元田永孚這樣的人認為教育應該以忠孝為基礎。道德教育（修身）一直以來都是小學的基本課程，[[17]](#_17__Sheng_Bu_Zhen_Chang___Se_Ch)[[18]](#_18___Xiu_Shen__Zhe_Ge_Ci_De_Jie)并使用《大學》之類的儒家典籍作為教材，但這些人認為修身可能會被外國學問掩蓋而黯然失色。

1878年4月16日，巖倉和佐佐木在天皇身邊服侍時，天皇向他們強調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稱無論是漢學者、勤王家，還是（像福澤諭吉和加藤弘之那樣的）洋學者都不能忽視教育。5月5日，巖倉遞交了一份奏折，敦促天皇比以前更加勤勉地處理政事。天皇說，政府的政治行為必須公正，且最關鍵的問題是教育。“察晚近之世情，徒追洋風，不念獨立自尊。如洋人稱《論語》為良書，則即刻取而讀之，若稱其為惡書，則即刻丟而棄之，恰如愚夫愚婦爭相參拜稻荷。”[[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6月26日，天皇收到修改草案的第二天，鑒于問題的重要性以及自己的濃厚興趣，天皇承諾將自己的觀點寫下來。由元田記錄下來的內容顯示，這份文件分為兩部分。文件雖說是天皇的觀點，實際表達的卻幾乎是元田的。第一部分是這樣的：

教育學問之要，在于明仁義忠孝，究知識才藝，盡人道。此為我祖訓、國典之大旨。然最近專尊知識才藝，值文明開化之末，破平行亂風俗者諸多。維新之始，因舍舊來之陋習，求知識于世界，故取西洋之長處。雖日日奏功，然忽仁義忠孝，單追洋風，則將來可危，或至忘君臣父子之大義。此非教學之本意。故今后基祖宗之訓典，專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尊誠實品行，同時于各學問中須應才器，學業益進，道德才藝皆完備。如此中正之教育學問行之天下，則我國獨立之精神無恥于天下。[[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在第二篇文章中，天皇提到了巡游的經歷：

去年秋，訓覽各縣學校，親察生徒學業，然如農商之子，發言皆為高尚之空論。縱西洋語通達者，亦不能譯之為日語。如此學生卒業后，歸家難就本業；高尚之空論，就公職亦無作用。之后或成夸耀博聞，目無尊長，妨礙縣官吏之徒。[[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天皇還主張開設農業和商業課程，以代替那些賣弄學問的學科，這樣農商子弟就能重拾他們謀生的基本職業，并獲得成功。他召見伊藤博文，告訴他自己希望提升教育，改正作風，并征求伊藤的意見。

伊藤在給天皇的奏折中，一開始便控告道德的崩潰已經成為時代的標志。他把“風俗之弊”看做一種“病”，為了治療這種疾病，則有必要找出病因。伊藤認為目前這種令人不快的情形源于維新導致的“非常之變革”。閉國時代和封建制度的終結意味著武士階層不再受到傳統教條的約束。這種解放雖然可喜，然而舊制度下的“淳風美俗”也隨之喪失殆盡。原有的生活來源被剝奪后，武士成為對前途迷茫、為不平所蠱惑的“政談之徒”，有些受到了來自歐洲的激進思潮的影響。

道德的崩壞不能僅僅歸咎于維新以來沒有引進新的教育制度。然而即使教育不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它也是當前形勢的最佳療法。如果政府率先促進教育并彌補現行制度的不足，則有理由相信日本能夠成為一個“文明”國家。伊藤反對以傳統經典為基礎，創立新舊折中的國教，因為那必須要等待圣賢出現，而這是政府無論如何都控制不了的。

儒家偏愛空洞的政治論爭，這種論爭導致年輕的武士很容易受到西方激進思潮的影響，伊藤贊成以技術教育的方式使他們放棄這種偏好。教育的核心應該是實用知識，而不是政治討論。最后他建議只有杰出的學生才可以學習法律和政治。[[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天皇給元田看了伊藤的奏折，元田承認，伊藤的見解發展了圣意，補充了遺漏。但是，用力太過，反而有誤解天皇本意的地方。元田請求允許自己草擬一份答復，在答復中完全否定了伊藤的觀點。元田堅持認為儒家的四書五經應該作為教育的核心，接下來是與倫理道德相關的國學著作，最后才是西方的書籍。伊藤說不應該期望教育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元田反問道，如果今天不打好基礎，將來會怎么樣？伊藤極力主張不要建立國教，至少目前不要，但元田問他什么時候才是合適的時間。即便歐洲國家也有國教。從遠古以來，日本就一直通過尊崇神圣的祖先和采納儒家學說，即“祭政教學一致”而取得進步。“今日之國教，無他，亦復古也。”[[23]](#_23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

不管怎么樣，元田還是很高興看到天皇任命了文部卿。這個職位曾長期空缺，最近才由寺島宗則兼任。他希望天皇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告訴寺島。第二天天皇派人請來寺島，給他看了元田的兩篇文章、伊藤的奏折以及元老院通過的教育草案。[[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新的教育草案一共有四十七條。其中規定開辦從小學到大學的各級學校；除非已經有了令人滿意的私立學校，否則每個村鎮都將設立公辦的小學；在那些辦學條件不足的地方，應該提供巡回老師；兒童的教育將持續八年，從六歲到十四歲；家長和監護人有責任送孩子到學校接受教育。雖然法案的漏洞使家長得以規避這項責任，但它已經與全日本兒童的強制性義務教育法非常接近。盡管日本長期缺乏資金，政府依然非常重視教育。

這項根據1872年的《學制》修改的制度并不成功。過去七年辛苦建立起來的新教育制度陷入混亂，教育水平也明顯下降。原本為了使學校擺脫官僚機構的束縛，獲得解放，結果卻產生了放任自由的政策，而這是政府官員和天皇都不希望看到的。河野敏鐮替換了寺島宗則擔任文部卿。他在陪同天皇參觀鄉村學校時，看到的情況令人震驚。因此河野決定改革教育法，加強中央和地方官員的權力。[[25]](#_25__12Yue_9Ri_He_Ye_Ti_Jiao_Le)1880年12月，元老院通過了修訂過的教育法，修身列于所有科目之首。[[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大約從這個時期開始，明治的觀點似乎明顯地趨于保守。天皇在教育上堅持儒家的價值觀，顯然是受了元田的影響。當然，每一代都喜歡將當時那些沒出息的年輕人和過去那些簡單真誠的年輕人做對比，但是教育政策的改變表明，盡管政府致力于發展和宣傳實學，但卻并不僅僅滿足于哀嘆舊道德的喪失，而是準備迫使年輕人向傳統屈服。正如飛鳥井雅道所說的：“通往1890年《教育敕語》的道路已經開通。”[[27]](#_27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

1. [[1]](#_1_32) “明宮”這個名字代表了皇太子，但是這個嬰兒當時還沒有被指定為皇太子。

1. [[2]](#_2_3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55—756頁。可能愛子在生產時仍然受到歇斯底里癥的折磨。

1. [[3]](#_3_32) 皇室禮儀之一，孩子出生一百二十天后舉行。食盤里放上青石和用紙包著的紅娘魚，旁邊放紅豆粥。以筷子取一些粥喂給孩子，祈求其平安成長。——編注

1. [[4]](#_4_3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821頁、第827頁。這些藝術品于6月抵達日本。政府認為這些東西應該由宮內省接收，但是直到12月這些作品才確認收到。烏戈列尼收到了錢和許多昂貴禮物。他畫的天皇像被收錄在《明治天皇の御肖像》一書中。

1. [[5]](#_5_3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46頁、第820頁。不久之后，明治給險些遇刺的阿方索十二世發電報，祝賀他逃過一劫（《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頁）。

1. [[6]](#_6_3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73—774頁。

1. [[7]](#_7_3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77—778頁。

1. [[8]](#_8_3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45頁。

1. [[9]](#_9_32)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75—176頁。

1. [[10]](#_10_32) 這首詩和前面一首都引自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159頁。渡邊沒有指明前面一首作于1907年，后面一首作于1909年（《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911頁、第1023頁）。渡邊似乎認為這兩首觀點迥然不同的詩，都表現了明治的典型特征。

1. [[11]](#_11_32) 岸田吟香，《東北御巡幸記》，第396頁。

1. [[12]](#_12_32)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73頁。

1. [[13]](#_13_3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64—365頁。

1. [[14]](#_14_32) 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220頁。

1. [[15]](#_15_31) 關于這項指令（文教省于1871年9月5日發布）的詳情，見國立教育研究所編，《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第477—489頁。簡要來說，這項計劃要求將全國分成8個大學區，每個大學區進一步劃分為32個中學區，每個中學區再劃分為210個小學區。這樣全國就總共有53760所小學，即每600名學生就有一所學校。這種教育系統明顯受到法國影響，而且幾名負責人都寫過或者翻譯過法國的教育論著（勝部真長、澀川久子，《道德教育の歴史》，第11頁）。在沃貝克和其他美國人的影響下，學校的課程實際上傾向于美國模式。但是法國是唯一一個將“道德和宗教教育”列入必修課的大國，這一點正合日本人的心意（勝部真長、澀川久子，《道德教育の歴史》，第211頁）。

1. [[16]](#_16_31)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76頁。

1. [[17]](#_17_31) 勝部真長、澀川久子，《道德教育の歴史》，第13頁。

1. [[18]](#_18_30) “修身”這個詞的解釋是“行儀の告誡”（意為“行為舉止的教育”）。修身課一直保留在課程表之中，直到1945年底。

1. [[19]](#_19_3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58頁。

1. [[20]](#_20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58—759頁。

1. [[21]](#_21_2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59頁。

1. [[22]](#_22_2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60—763頁。伊藤博文給天皇的奏折的翻譯文本見Herbert Passin,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Japan , pp. 230-233。

1. [[23]](#_23_28)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78頁。

1. [[24]](#_24_26)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60—764頁。

1. [[25]](#_25_26) 12月9日河野提交了一份奏折給天皇，向他解釋必須改變教育制度的原因。河野的解釋見《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48—250頁。他否認政府官員過分“介入”學校事務。亦可見國立教育研究所編，《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第三卷，第930頁。

1. [[26]](#_26_2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50頁。

1. [[27]](#_27_25)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78頁。

# 第三十三章 籌備憲法



二十九歲的天皇依照習俗舉行了1880年的新年慶祝儀式。天皇和皇后接待了熱那亞公爵，德意志皇帝的孫子海因里希王子則從長崎港的軍艦上發來賀電。新年的第二天，明治天皇給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二世發去賀電，不過不是慶賀新年，而是慶賀國王僥幸逃過一劫，幸免遇刺。[[1]](#_1__2Yue_17Ri__Ming_Zhi_Gei_Sha)天皇與歐洲君主的聯系比以前更加頻繁，然而，即便在為各位國王僥幸逃過一劫感到高興時，天皇也可能認為，他們的世界和自己相距遙遠，自己當然不必擔心遭到暗殺。

這可以說是明治行使天皇例行職權的第一年。參議提出的建議須等天皇做最后決定，而不（像前幾年那樣）僅僅是走個過場。他們需要聽聽天皇的意見，以打破內閣的僵局。這種新的責任也許導致他減少了其他活動。例如，天皇看望皇太后的次數和騎馬的次數都有明顯地下降。他的正規教育也受到影響：4月和12月之間元田永孚等學者的課他只上了二十三次，而原來的計劃是每周上四五次。不過明治幾乎每天都參加內閣會議，[[2]](#_2__Ban_Ben_Yi_Deng____Yi_Teng_B)且經常和政府高級官員共進午餐，商討國事。這個時期伊藤博文特別渴望建立起天皇和內閣之間的聯系，并讓天皇在決策時發揮主要作用。[[3]](#_3__Ban_Ben_Tao_Lun_Le_Yi_Teng_X)

財政問題是1880年政府面臨的主要問題。政府的收入遠遠不能滿足支出。盡管去年3月天皇已經下令大臣、參議等人員厲行節儉，并下令宮內卿為宮廷樹立起避免浪費的全國模范形象，但收效甚微。大臣們都說無法再縮減開支，而且宮廷的支出據說反而增長了。部分原因是因為通貨膨脹，然而這個消息促使天皇再次要求節儉：禁止下屬對皇宮做任何非特別緊要的修繕，并且禁止購買任何新東西。

大隈重信認為要克服財政困難，應該實施更加積極的政策，而不是單純地節儉。1879年6月，他提出了作為改善措施的四點方案。第一點是贖回1877年西南戰爭期間作為經費印發的大部分紙幣。鈔票濫發使民眾對它喪失了信心，現在一銀元等于一日元四十三錢紙幣。通貨膨脹異常猖獗，重塑民眾對紙幣信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將不可兌換的紙幣換成可兌換為硬幣的紙幣。贖回紙幣的錢一部分可以通過出售國有工廠的方法籌得，然而大隈的主要建議是借一筆五千萬日元的外債，分二十五年償還。他預計這些措施可以使政府贖回七千八百萬元不可兌換的日元紙幣。[[4]](#_4__Jia_Ding_De_Dui_Huan_Lu_Wei)另外兩千七百萬日元紙幣將以可兌換紙幣的方式贖回。

關于是否向外國貸款的問題，內閣成員的意見是五五分。大隈獲得了薩摩派的支持，但是以伊藤博文為首的長州派和參議們則反對貸款。他們的理由各不相同。反對貸款最激烈的是右大臣巖倉具視，他（身為貴族）不停地和宮廷溝通。巖倉的那些前侍補盟友，特別是佐佐木高行和元田永孚，也仍有機會向天皇吹耳邊風。元田極力反對向外國貸款，認為國家可能因此而遭難。他提醒眾人格蘭特將軍的慎向外國借款的警告。元田（和巖倉）質疑如果日本無法償還債務，那該怎么辦？為了還清債務，日本是不是得放棄部分領土——比如，四國或者九州？[[5]](#_5__Ban_Ben_Yi_Deng____Yi_Teng_B)這些人強調，克服財政危機的唯一方法就是厲行節儉。

天皇知道大隈的計劃后并不喜歡，可是他也擔心內閣一直分裂下去，就像征韓論爭那次一樣。他詢問各部門領導的意見，但他們的意見也不統一。既然兩邊都給不了清晰的建議，天皇最終決定不向外國借款。1880年6月3日，他頒布了這道諭旨：

朕思，明治初年以來國用多事，生會計之困難，遂至十三年后之今日，正貨（鑄幣）流出海外，隨之紙幣失信。故一覽大隈參議之建策，又聽內閣諸省意見未一。朕素知會計之難，然知外債于今日最為不可。昨年格蘭特盡言此外國債之厲害，其言猶在耳邊。今日會計之困難迫在眉睫，需定前途之目的。勤儉之主義即在此時。卿等宜體察朕意，以勤儉為本，定經濟之法，內閣諸省熟議后奏之。[[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天皇的命令自然沒有人違抗，但對于如何實施還是進行了討論。天皇的決定實際上樹立了宮廷的絕對權威，當內閣和眾卿內部產生分歧時，宮廷的決定就是最后的決定。不久之后，一項提議就要求天皇做出類似的決定。該提議認為，為了抑制米價飛漲，應該恢復幕府時代的做法，要求農民用大米，而不是現金納稅。但是，問題還沒到最緊要的關頭，天皇就必須再次巡幸了，這次是去山梨縣、三重縣和京都府。[[7]](#_7__Shi_Shi_Shang_Ta_Yan_Tu_Huan)

3月30日頒布的巡幸公告顯示，天皇的出發日期定在6月16日。5月，長野縣下伊那郡的群眾向天皇請愿，懇求天皇途經他們家鄉，看看那里的落后情況，而不是取道路已經修好且不久還可能通火車的木曾。這樣的訪問將有助于提升絲綢產量和當地的工業，并且“拜見天日之幸福”給那些一輩子都無法踏足“王城之地”的婦女兒童一次難忘的經歷。[[8]](#_8__Yuan_Shan_Mao_Shu_Bian____Ti)天皇并沒有接受他們的請求，不過這件事卻表明人們非常渴望天皇參觀自己地區。

為了便于天皇出行，一些道路進行了維修。例如，從笹子村向前的路過去都是危險小道，現在路面拓寬，并在陡峭的地方加上了護欄。[[9]](#_9____Zhao_Ye_Xin_Wen____Shang_K)不久，天皇的隊伍行經之處，修路費便成為報紙和當局爭論不休的話題。據一份報紙說，當地的每家每戶都要出一筆修路費，并承擔旗幟、路燈等東西的費用。據說許多人盡管非常期待能在天皇經過時向他頂禮膜拜，但是卻抱怨即便把所有的家當全賣了，也籌不到他們應繳納的三元五十三錢三厘。[[10]](#_10____Da_Ban_Xin_Wen____1880Nia)不過，北深志町的領導卻否認為接待天皇花了許多錢。他說并沒有向民眾征稅，所有的費用都由熱心公益的人士贊助。[[11]](#_11__Yuan_Shan_Mao_Shu_Bian____T)

4月4日刊登在《東京橫濱每日新聞》上的社論，也許是天皇這次出行最引人注目的一篇評論。作者在“要巡幸之時、不要巡幸之時”這一點論證說，在統治初期，“東北之人民知德川而不知朝廷。西南之人民知其藩主而不知其上尚有朝廷”，這時天皇的確有必要去訪問這些地方，并讓人們知道他的存在。但是，社論接著寫道：

全國之人民知天子，不知其他應敬畏之人。所謂在宮墻之中，統御天下，卓然有余裕之時。當此治世，豈為不拘暑熱之侯，煩龍駕之時乎。（中略）如明治十三年之時，可云御巡幸不必之時。[[12]](#_12__Yuan_Shan_Mao_Shu_Bian____T)

這種觀點似乎得到了天皇的顧問們的認可，在余下的統治時間里，天皇僅僅又旅行了兩次。[[13]](#_13__Li_Shi_Xue_Jia_Shuo_De__Liu)

有人認為天皇有必要出行，因為可以了解“全國之事情”，對于這種論調，社論的作者也予以批駁。他說通過讀報足以了解國內的情況。有人認為讓天皇“視察地方貧民之疾苦”，然而天皇的轎子進過的大抵都是“國道繁華之地”，而不是貧民居住的“僻地”。認為到邊遠地區旅行是天皇了解民眾艱難生活的唯一途徑是“瀆我明治天皇陛下之圣德”。

另外一篇社論（刊載于《朝野新聞》）則向天皇即將經過的沿途民眾發出呼吁，要他們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讓天皇知道他們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樣子。社論說，正是基于這個目的，天皇才到邊遠地區旅行。當然，民眾有機會見到天皇的乘輿總是非常高興，但他們不應該沉浸于歡迎天皇的喜悅之中，而“以虛飾遮蔽民間之實況”、“隱蔽民間之真情”。這么做不僅“誤巡幸之圣旨”，而且他們的過分屈從將“污圣德”。[[14]](#_14__Yuan_Shan_Mao_Shu_Bian____T)

難以想象乘輿經過時，普通民眾要怎么做才能將生活的實情展示給天皇。不過，日本似乎并沒有為了欺騙天皇，讓他以為民眾都過上了好日子而搭建起“波將金村”。

最后，《日本郵報》的一篇英文社論這樣闡述了天皇旅行的目的：

這次的旅行結束后，陛下對國家的了解將會比大多數民眾了解的還要多。學校、工廠、企業、古董或者有歷史價值的文物都將受到仔細地考察。這類出行的目的并非僅僅為了享受。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不論陛下多么奢華，國內旅行都是享受的反義詞。陛下和大臣無疑希望他通過親身觀察，了解自己統治的這個國度，從而更好地履行莊嚴的職責。[[15]](#_15__Yuan_Shan_Mao_Shu_Bian____T)

這可能是天皇本人和政府官員當時的想法，不過最近一些學者從效果方面解讀了天皇的出行，認為出行為天皇樹立了威嚴的形象，使百姓知道他并不只是希望了解臣民生活狀況的仁慈統治者，還是一直關注他們生活的“監督者”。[[16]](#_16__You_Qi_Ke_Can_Kao_T__Fujita)

1880年6月16日，天皇如期出發。他帶了三百六十名隨從，其中包括貞愛親王、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一名參議、一名大臣、高級軍官、宮內卿、侍從、一名御醫、騎兵步卒、馬夫等等。以我們的標準來看，這是一支龐大的隨從隊伍，而且每到一處還有當地的安保人員補充，但是以日本當時的標準來看這個規模并不大。即使在平時，天皇身后也總是跟著一大批隨從，[[17]](#_17__Li_Ru__1881Nian_4Yue_11Ri)那些見過天皇出行的民眾不可能為其人數之多或者排場之大而感到吃驚。

第一站是八王子市，天皇視察了諸如絲線和礦產這類當地物產。他收到在附近一條河上捕捉到的螢火蟲，并將其送給了皇太后和皇后。后者以一首詩作為答復，詩中同時流露出天皇不在的寂寞之情和禮物帶來的安慰。

與1878年的新潟和北陸地區之行相比，這一次要容易得多，即便仍很難與歐洲皇帝出游相提并論。例如，6月18日，天皇早上4點起床，在雨中被抬著走過曲折的山路。他一整天都在趕路，有時是坐轎子，有時是坐馬車，直到下午5點才到達目的地。那天晚上天皇的住處只是一間搖搖欲墜的茅舍，因為村里沒有更好的房子。[[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這次旅行有一點值得注意：天皇每次看到優美的風景，都會讓攝影師拍下來。后來，天皇告訴攝影師，不必等候命令，只要看到特別美麗的風景就拍下來。天皇以這種方式來回憶自己經過的風景。

炎熱的夏天使旅行一點也不舒適。天皇跟往常一樣視察學校、工廠和（在山梨縣的）一座葡萄酒釀酒廠。在甲府，他參觀了一座建于1872年的醫院，并觀看了醫院內的陳列品，其中有從一名患怪病的女孩口里吐出來的二十多種昆蟲、大約五十年前去世的妙心法師的干尸。[[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天皇一行受到了桑名民眾特別熱烈的歡迎，盡管十四年前宮廷和幕府戰爭時，桑名曾是抵抗天皇軍時間最長的藩國之一。天皇在津市的師范學校，觀看了兩名優秀學生做化學實驗，后來又在中學聽了五名學生關于世界歷史的演講。

7月8日，盡管天氣酷熱，天皇還是穿上制服，奉上劍和玉（草薙劍、八尺瓊勾玉），去參拜伊勢神宮的外宮和內宮（即豐受大神宮和皇大神宮）。天皇首先來到伊勢神宮的外宮，盥手之后，穿過“玉垣”（神廟的護欄），來到“濱床”（通往神殿的樓梯底部平臺）。他脫下帽子，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隨后，天皇來到伊勢神宮的內宮，舉行了完全一模一樣的儀式。天皇參拜這兩座神廟的先后順序，顯然是因為他認為農業女神豐受大神是一切存在的基礎。然而神道學的專家在得知天皇的參拜順序后，卻堅持認為天皇應該先參拜自己的始祖天照大神。他們的抗議沒有被采納，天皇還是遵循1869年第一次到伊勢參拜時定下的順序，當時他首先參拜的便是伊勢神宮的外宮。[[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天皇一行人來到龜山時，天氣非常炎熱，天皇凌晨3點就起床了，以便利用早上涼爽的天氣。早上5點半，天皇離開住所，到四日市附近觀看軍事演習。第二天，天皇凌晨2點半起床，騎馬去觀看龜山和關町之間舉行的軍事演習。有人說明治喜歡看演習勝過其他一切，這么說是非常公允的。

旅途的最后部分，從大津到京都的一段，天皇選擇了坐火車。這是因為新挖了貫穿京都東部山脈的鐵路隧道，這是日本第一條這樣的隧道。天皇固然很高興回到京都，但令人失望的是，極少有關于他活動的記載。7月15日，天皇回來后的第二天，接見了包括佛教高僧在內的達官貴人。他捐了一百日元用于重修1864年毀于戰火的佛光寺。16日，天皇參拜了父親山陵所在的泉涌寺。返程時，他在妙法院稍事停留，并觀看了院里的珍寶。天皇對佛教寺廟的重視并不令京都人感到意外，因為京都是一座布滿寺廟的城市；然而這卻與他統治初期的反佛教措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意味著對佛教的迫害已經結束。

天皇此次訪問京都，感觸最深的可能是，在去探訪姑姑淑子內親王的路上，他停下來看了一眼“祐之井”。這口井是在1853年干旱時于中山忠能家花園里挖的。孝明天皇有感于水質的甘甜和豐沛，用明治的乳名“祐”命名了這口井。[[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天皇到了內親王的住處，送給她兩個景泰藍的盒子，其中一個裝著伊勢山田產的各式糖果，另一個裝著來自大阪的冰糖。這些樸實無華的禮物實在惹人喜愛。內親王安排了五場能樂和四場狂言為天皇解悶。一些仍然住在古都的貴族也觀看了演出，這是一個恢復他們昔日榮光的短暫時刻。

天皇余下的旅途一路都非常平靜。他從京都抵達神戶，從那里乘船到橫濱，并于7月23日抵達東京。8月16日，天皇在休息了幾個星期之后，召集大臣和參議開會，討論讓農民用大米而不是現金納稅是否可行的問題。盡管政府一再要求，大臣們還是無法削減支出，因此為了緩解財政危機領導們只好另尋他法。他們的結論是，危機起源于用現金征收土地稅，解決方法是恢復用大米向農民征稅的古老做法。參議大木喬任（1832—1899）是這項政策的主要支持者。

支持者說物價普遍上漲的原因可以歸結為米價的飛漲，進而導致其他的一切商品都受其影響。如果政府用大米征稅，就可以控制米價。米價高時，政府可以賣出庫存的大米，米價低時，又可以買入大米，這樣就可以將米價保持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他們憂心忡忡地指出，高昂的米價給鄉村帶來了繁榮，農民甚至開始沉迷于各種奢侈品。他們現在購買昂貴的進口商品，傷害了日本的工業。

黑田清隆是強烈支持改變征稅方式的官員之一。他指出，過去農民滿足于吃粗糧，但現在他們把米作為主食。財政危機的產生是因為大米的銷售完全由農民控制。因此，應該要求他們至少用大米支付部分租金，這樣政府就可以用這些大米來維持米價的穩定。

參議們意見不一。8月16日，太政大臣和左大臣到皇宮解釋這項提議。他們說只有天皇本人的決策才能打破僵局，并建議各派代表當著天皇的面進行討論。[[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8月31日，巖倉提交了一份將日本從財政危機拯救出來的十一條計劃。巖倉認為第一條最為重要，即規定地租的四分之一用大米支付。他譴責高額的米價使得即使是最卑賤的農民也變得不吃其他雜糧而只吃大米。這意味著武士、商人和工匠的大米不夠吃，只能進口。農民新近對奢侈品的嗜好使得棉布、砂糖、煤炭、食用油等的需求量大增。他們也變得懶惰起來，而這預示著農業將會萎縮。農民應該像以前一樣吃粗糧，這樣日本不僅不用進口大米，還可以出口大米。[[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巖倉及其支持者的冷酷無情不僅出人意料而且令人震驚，他們含蓄地拒絕了農業是立國之本的儒家格言（所有人都將這句話掛在嘴上）。即使農民現在吃著大米，他們的奢侈也肯定比不上東京的官員，[[24]](#_24__Ke_Neng_Zui_She_Chi_De_Yao)然而后者卻看不慣社會最底層的生活標準有任何提高。對所謂懶惰農民提出的忠告，詮釋了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的那句話：“讓他們吃高粱！”

并非所有官員都相信這個簡單的方法能化解財政危機。佐佐木高行強調社會各階層厲行節儉的重要性，同時指責農民流于奢侈背后有上層社會的責任：“見聞奢侈輕薄之上流社會風俗，誤解為文明、自由，以致天下模仿。”[[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可能是受到了佐佐木和元田兩位儒學者的影響，明治最終決定拒絕參議提出的用大米征稅的建議。[[26]](#_26__Du_Bian_Zhao_Fu_Jue_Cha_Dao)9月15日，他和伊藤博文討論了用大米征稅的問題，伊藤的意見也使他受益匪淺。[[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伊藤似乎意識到，打敗支持大米稅的巖倉的唯一方法，就是贏得天皇的支持。

9月18日，天皇召見各位大臣，向他們頒布諭旨，感謝他們為解決財政危機所做的努力，但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對態度，并稱這個計劃“頗不穩”。解決危機的唯一方法，他已經說過很多次，就是厲行節儉。天皇命令參議們考慮執行這個愿望的方式。

在諭旨頒布之前，天皇曾私下向佐佐木和元田透露，自己反對這個計劃。天皇很肯定地認為，征收大米稅將激起農民的極端憤怒，國內將到處出現叛亂。他特別指出，1880年5月剛公布地租（用貨幣支付）將保持不變，直至1885年。如果現在廢除這份聲明而回歸以前的做法，征收大米稅，政府將會失去公眾的信任。事實上，這是不恢復大米稅的主要原因。[[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明治這時面臨的第三個問題是有關創建議會和憲法的問題。天皇統治伊始頒布《五條誓文》時，曾許諾將設立議會機構，一切事務均經過公開討論后再做決定。不管1868年誓文頒布時的背景如何，這個時候它們已經具有天皇承諾的意味，即天皇承諾將設立議會，并且將在憲法的框架下運作。

這并非政府第一次考慮撰寫憲法。早在1872年5月，左院成員宮島誠一郎（1838—1911）就強烈要求起草憲法，對統治者的權力進行約束。宮島認為非常有必要這么做，因為近年來，連“無智之國民”也通過了解其他國家的政治，以個人自由的名義堅持自己的權利。一些人甚至要求成立共和國。在目前的情況下，難以確定怎么對付這種人，可是一旦將統治者的權力用憲法明確下來，任何冒犯者都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宮島強調自己不贊成由統治者一人獨享權力的憲法，認為那會使人民感到壓抑，而且會阻礙現代化的進程。理想的解決方法是君主和人民聯合執政，然而現在日本教育水平仍非常低，人民不太可能具備選出合適代表所需的智力。因此，君主應該親自起草憲法，同時把聯合執政的原則考慮進去。這個提案被移交正院討論，[[29]](#_29__Zheng_Fu_De_Zui_Gao_Zheng_Z)同時開始了起草憲法的準備工作。

1872年6月，左院議長后藤象二郎（1838—1897）和副議長伊地知正治（1824—1886）遵照《五條誓文》，聯合提議成立下院。建議書說，除非成立兩院——上院代表貴族和武士，下院代表普通百姓——否則將沒法確定預算，甚至法律的基礎。按照歐美模式成立的下院應該成為公開討論的地方，在這里可以聽到公眾的意見。提議雖然獲得了左院的批準，但是直到第二年才開始實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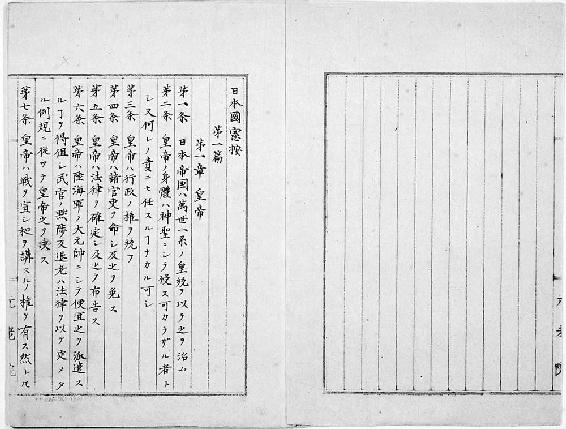
1873年，天皇下令左院起草憲法。這之前，伊地知正治上書稱，憲法將是國家的基礎，同時規定政府的基本要素。當然，《五條誓文》可以說是所有人的憲法，但仍需要一個章程來作為國家的基本法。

盡管大家一致同意應該擁有一部憲法，但是進展卻非常緩慢。1876年9月，天皇下令元老院成員擬寫一份草案，草案應該忠于日本傳統，同時吸取其他國家憲法的優點。[[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不久，元老院議長熾仁親王便接到天皇的旨令，受命撰寫第一份憲法草案。10月，熾仁和自己委派的委員會成員完成了第一份草案。盡管草案撰寫的速度有些慢，但大家還是對它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一年后，訪問日本的格蘭特將軍在與明治交談時說：“貴國的媒體和部分民眾現在普遍擁護的似乎是民選議院。”格蘭特提出了以下意見：

我不知道時機是否已經成熟，但是這類議會在適當的時候對所有國家都很有好處……貴國早晚要成立議會，因此政府應當向民眾灌輸這種思想，并教育他們，適當的時候會為他們創建議會這一事實。民眾應該知道這一天終將到來，為了負起責任他們應該接受教育。但是您必須一直謹記，像這樣的特權永遠不可能召回。在把投票權和代表權給予他們時，您已經永遠地給他們了。因此在建立這樣的議會機構時，再怎么謹慎也不為過。匆匆忙忙成立是非常危險的。您不會希望看到由于過早成立議會而出現無政府狀態。[[31]](#_31____gurantoJiang_Jun_tonoYu_D_1)

作為一個以民主傳統為榮的國家的前總統，格蘭特的這番話引起了日本政治家的共鳴。身為保守派軍人和政治家的山縣強烈同意成立憲法和議會機構，1880年8月，另一名保守派成員巖倉具視也向天皇建議，設立一個審查憲法的部門。這條建議提得有些晚，但巖倉顯然認為實施天皇《五條誓文》的時機已經成熟：



1876年的日本憲法草案

陛下登極之初，夙察宇內之形勢，行非常之改革，以誓文五條，大張皇紀，創維新之鴻業，以來萬機皆據誓文之旨也。[[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巖倉接著建議纂寫憲法，但強調首先應該“廣斟酌歐洲各國之成法，至其布告樣式，皆詳細調查，方可大成全備，無遺漏處”。

巖倉的審慎表明他的真正目的可能是為了推遲行動，但身為進步人士的伊藤博文則沒有這么小心。在日本為什么應該擁有憲法這個問題上，卓越的歐洲歷史知識使伊藤提出了比巖倉更加自信的理由。

伊藤指出，百年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已經深入歐洲各國，有些國家摒棄過去，固執于全新的方式，乃至招致動亂，至今未穩；一些開明的領導人則未等發生革命就已預見到變化。然而不管如何，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逃避這個影響，即統治者必須分權與人民。歐洲的政府新理論書籍已經涌入日本，連最邊遠的山村都能看到它們的蹤影。新政府的概念已經無法遏制。

關于未來兩院制的構成，伊藤提出了具體的建議，認為上院由貴族和武士組成，下院由普通民眾組成。他認為君主和人民共同統治是非常理想的方式，但不應貿然做出改變。伊藤特別希望天皇積極參加所有的討論。[[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1876年，熾仁親王開始憲法的起草工作，直到1880年12月才完成。親王還主張對其他國家的憲法做進一步的研究。[[34]](#_34__Ta_Ti_Chang_Nei_Rong_Jie_Yo)

熾仁親王的憲法草案沒有絲毫的緊迫性。他和巖倉、伊藤等人一樣，似乎認為循序漸進地向民主過渡要好于立刻采取行動。但許多人卻不這么認為。1880年4月，愛國社的成員在大阪開會，通過了要求召集議會的決議，并將決議散播到全國各地。3月，愛國社二十四縣的代表在大阪集會，正式更名為“國會期成同盟”。[[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同盟試著向天皇請愿，呼吁召集議會。盡管政府和元老院從中作梗，但他們的嘗試并非沒有效果。巖倉本來主張漸進式改革，現在突然開始要求加速編纂憲法。他的緊迫感來源于這封請愿書所引起的恐懼心理，巖倉擔心，如果不采取行動，皇室可能會有危險。[[36]](#_36__Li_Yuan_Ying_Yan____Tian_Hu)1880年12月，同盟決定成立政黨——自由黨。整個19世紀80年代，都貫穿著這類政黨要求建立全國性議會的斗爭。

1. [[1]](#_1_33) 2月17日，明治給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發去賀電，祝賀他逃過炸彈。炸彈爆炸造成了他的宮殿部分損毀（《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1頁）。

1. [[2]](#_2_33)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國家形成》，第24頁。之前（從1879年4月4日開始），天皇每逢周一、周三和周五的早上參加內閣會議，但是自從1880年3月17日更改了管理內閣會議的法規之后，天皇除了周日和節日舉行的會議以外，參加所有的內閣會議。關于法規的更改，見《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5—36頁。請注意“內閣”這個詞并非現代意義上的“內閣”，而是由“大臣”的正式顧問“參議”所組成的一個機構（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國家形成》，第20頁）。

1. [[3]](#_3_33) 坂本討論了伊藤希望天皇參加內閣會議的種種原因（《伊藤博文と明治國家形成》，第12頁、第15頁、第19頁）。其中主要原因是讓他作為一個權威的象征性領導出現在大家面前，而不是要他提出新觀點或者是代表觀點保守的侍補發言。

1. [[4]](#_4_33) 假定的兌換率為一元十五錢的紙幣兌換一元銀幣（《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1頁）。

1. [[5]](#_5_33)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國家形成》，第29頁。

1. [[6]](#_6_33)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4—75頁。

1. [[7]](#_7_33) 事實上他沿途還參觀了其他縣（包括神奈川、長野縣和滋賀縣），但是正式訪問的主要是這三個縣。

1. [[8]](#_8_33) 遠山茂樹編，《天皇と華族》，第81頁。

1. [[9]](#_9_33) 《朝野新聞》上刊登了一個名為野田千秋的記者所作的一篇天皇游記。遠山茂樹所編的《天皇と華族》第82—86頁上有這篇游記的幾段節選。第一段描述了一名老人試圖直接向天皇遞交陳情書，但是卻被警察阻止了。他們辯解說這個人是瘋子，并把他趕走，但是陳情書的主題是有關召集議會的問題，可能相當理性。第二段節選簡要描述了警察對《伊呂波新聞》的一名記者采取行動的事。這名記者在文章中描寫了一名警察發現了天皇的隨行公卿與他從東京帶來的一名藝妓睡覺。警察警告記者無中生有，散布謠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要求他今后發表文章之前先提交警察過目，這是新聞審查制度的開端。

1. [[10]](#_10_33) 《大阪新聞》1880年5月29日條，轉引自遠山茂樹編，《天皇と華族》，第94頁。

1. [[11]](#_11_33) 遠山茂樹編，《天皇と華族》，第94—95頁。瀧澤繁寫的這篇描繪巡行途中新澙縣一段的文章，明確地說巡幸的費用由當地的富豪所出（《北陸巡行と民衆統治（上）》，《新澙史學》第24號，第36頁）。他們被禁止奢侈地接待天皇，因此可能謊報了費用。最極端的一個例子，實際花費了45000元，報告上卻只寫了90.3元。

1. [[12]](#_12_33) 遠山茂樹編，《天皇と華族》，第88頁。

1. [[13]](#_13_33) 歷史學家說的“六大巡幸”。并非天皇的所有旅行都被稱為“大巡幸”。他后來的三次長期旅行中，1881年那次（到本州北部和北海道）和1885年那次（到山口、嚴島、廣島和岡山縣）都算是“大巡幸”，但是1890年去吳市、江田島和佐世保那次則不算，也許因為這次是走海路而不是陸路的原因。明治還無數次白天到橫濱的騎馬場、到千葉的演練場以及去橫須賀參加新船下水典禮等，而且1894年和1895年中日戰爭期間，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廣島。這些旅行當然與“巡幸”的性質非常不同。

1. [[14]](#_14_33) 遠山茂樹編，《天皇と華族》，第90頁。

1. [[15]](#_15_32) 遠山茂樹編，《天皇と華族》，第101頁。

1. [[16]](#_16_32) 尤其可參考T. Fujitani,Splendid Monarchy 。書中寫道：“通過這些巡行以及各種寫下來和沒有寫下來的描述，人們可以開始想象，天皇正處于全景式政權的最頂端，是管理這個國家和目光所及的人民的監督者”（pp. 55-56）。關于這些事情的稍微不同的解釋，見瀧澤繁，《北陸巡行と民衆統治》，第24—25頁。

1. [[17]](#_17_32) 例如，1881年4月11日，天皇到吹上御苑騎馬，跟隨他的隨從就有160多人（《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28頁）。

1. [[18]](#_18_31)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87頁。

1. [[19]](#_19_31)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93頁。

1. [[20]](#_20_30)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28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6—77頁。

1. [[21]](#_21_30)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44頁。明治的名字叫“祐宮”，直到有了“睦仁”這個名字為止。

1. [[22]](#_22_29)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64頁。

1. [[23]](#_23_29)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71—173頁。

1. [[24]](#_24_27) 可能最奢侈的要數海軍省，他們迫不及待地購買歐美發明的新武器，有時拿到手的東西與他們認為訂購的東西很不一樣（《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82頁）。

1. [[25]](#_25_27)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79頁。

1. [[26]](#_26_27) 渡邊昭夫覺察到，在明治發布有必要節儉的聲明中，有“特別濃重的”元田和佐佐木觀點的影子（《天皇制國家形成途上における「天皇親政」の思想と運動》，《歴史學研究》254號，第2頁）。他這個時期的其他聲明也是這樣。

1. [[27]](#_27_2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76頁；亦可見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國家形成》，第37頁。

1. [[28]](#_28_23)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81頁。

1. [[29]](#_29_23) 政府的最高政治機構，于1871年設立，由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和參議組成。1877年廢止。

1. [[30]](#_30_21)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96頁。明治命令熾仁親王起草憲法的法令于1876年9月7日頒布（《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45頁）。

1. [[31]](#_31_19) 《グラント將軍との御対話筆記》，第17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22頁。

1. [[32]](#_32_18)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68頁。

1. [[33]](#_33_17)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34頁；亦可見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國家形成》，第43頁。

1. [[34]](#_34_17) 他提倡內容借用英國、美國和法國的，而形式則借用德國、奧地利、荷蘭、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46頁）。

1. [[35]](#_35_1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49頁。

1. [[36]](#_36_15) 笠原英彥，《天皇親政》，第174頁。

# 第三十四章 卡拉卡瓦訪日



1881年是明治統治期內的一個多事之秋。新年伊始，天皇祭拜了四方神祇，一切都顯得非常平靜，不過不久就連新年的慶祝活動也發生了變化。天皇和皇后接受了親王、高級官員及其妻子的祝賀。那天晚些時候，外國公使也第一次在妻子的陪伴下，向天皇祝賀新年。

沒有人解釋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但它可能反映了日本外交官對歐洲宮廷慣例的理解。一些問題也隨之產生。例如，如果日本婦女參加這類重要的宮廷活動，該如何著裝？最后的決定是她們應該穿袿袴[[1]](#_1__You_Xiao_Gui___Dan___Ku___Xi)，沒有這些日本正式服裝的大使夫人則可以穿外國服裝；此外，丈夫和妻子走向天皇時，他們的相對位置應該怎樣？妻子是否應該像傳統的日本婦女那樣，走在丈夫的后面？最后大家決定夫妻應該一起走向天皇，丈夫在右邊，妻子在左邊，即便左邊的地位通常高于右邊。這類決議并非輕易就能達成。禮賓司的官員們正在創建傳統，未來的許多年里宮廷禮儀將被這些傳統所主宰。

身為這段時期天皇身邊的親信之一，佐佐木高行用以下詞語描寫了這個變化：

本年夫妻參賀初始，夫人不參者尤多。外國人以此為榮譽，吾國人則人情大異。夫人視其為不好抑或不慣，有憚狀。又，外國若本為藝娼妓等出身，即正妻亦不可相列于上流社會。是社會賤之，風俗決不可使之出頭。此可稱為美。吾國維新前本為如此，維新之際，要路之正妻身份低賤者亦多，其弊流至今日，故有自然參賀等不恰當之論。今日應復本，以至良風。[[2]](#_2__Zuo_Zuo_Mu_Gao_Xing____Bao_G)

天皇想必同意儀式中的這項改革，然而卻拒絕做出其他修改。例如，當外務卿井上馨提出外國大使作為客人，應該先于日本人向天皇道賀時，天皇并沒有批準他的提議。天皇回答說，新年伊始接待官員的主要含義是為了“正君臣之禮”，因此日本官員先于外國友人道賀是非常應該的。這和平時的接待不一樣。[[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1月3日，天皇去騎馬。去年他一共騎馬一百四十四次，但是今年他只騎了五十四次，這表明天皇的時間越來越少。1881年他參加了六十六次內閣會議，每次通常都從上午10點一直到中午。1月10日，天皇和皇后上了今年的第一堂課，比平時晚了三天。[[4]](#_4__1Yue_7Ri__Tian_Huang_Ben_Lai)課由元田永孚主講，題目是關于傳說中的中國皇帝堯和舜。這一年的余下時間里，副島種臣和西村茂樹也給天皇上課，然而不知是由于公務的壓力還是天皇已經對儒家智慧失去了興趣，1881年他只上了十七次課。[[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1月5日，外國大使第一次受邀參加皇宮舉辦的傳統新年宴會，這是宮廷自愿適應外國習俗的又一例子。盡管當時厲行節儉的政策仍然生效，但這次因為要招待貴賓，錫制餐具全部換成了銀質的。

從這一年開始，明治經常在周三和周六與親王、大臣、參議等高級官員共進午餐。顯然他對政府運作有著濃厚的興趣。午餐時，此前一直都是沉默的旁觀者的天皇，有時會發表一下個人意見。例如，1月29日，周六的午餐會結束后，天皇將佐佐木高行叫到書房，詢問他有關廢除死刑的新刑法。新刑法定于7月1日生效。天皇問，是不是有相當多已經被判死刑的犯人將逃過一劫（如果到那天還未執行的話）？他詢問司法卿田中不二麿的意見，田中表示，希望天皇頒布特別旨令，讓那些依照舊刑法應該被判死刑的犯人可以延遲到7月，等死刑廢除后再宣判——換言之，就是將不再有死刑。天皇認為如果目的是為了廢除死刑，那么那些設計新刑法的人應該一開始就講清楚。突然宣布停止死刑極不符合常規。要么按照目前的法律執行死刑，要么在死刑案件移交高等法院裁決時，負責的官員延緩到7月，然后再按照新刑法進行處罰。天皇又說，這些問題是因為匆忙公布新刑法所導致。鑒于迫切希望與外國列強修改條約的心理，這樣的匆忙無可避免——減少酷刑可能會給外國人留下好印象——然而它仍免不了受到編纂馬虎的指摘。[[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這個對天皇造成困擾的問題看起來也許沒有什么重大意義，然而天皇對法律問題的關切表明他的成熟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還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佐佐木后來在談話時毫不猶豫地問天皇是否需要改革元老院，因為各派的意見分歧已經妨礙了它的功能發揮。天皇的回答不僅坦率得令人吃驚，而且非常自信，這說明天皇雖然沒有在內閣會議上發言，但對于相關的問題及政治家是有自己的看法。

不過，對政治的熱衷并沒有使天皇達到忘卻其他娛樂的程度。1881年2月，天皇突然對打野兔產生了興趣。他一直拒絕為了避開東京冬夏的極端天氣而到別的地方去。當顧問建議天皇休假時，他總是說想和絕大部分民眾一樣。天皇知道大多數日本人不管氣溫高低都在工作崗位上忙碌著，因此自己不能隨意地逃避嚴寒和酷暑。

這其中只有一個例外，即他曾經兩次到多摩地區打野兔。當時這個地區人煙稀少，野兔比吹上御苑和赤坂離宮這些業已狩獵過的地方要多得多。天皇喜歡一直打到天黑，人們擔心他在多摩昏暗的夜色中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下令沿途的居民在門外點燃火把，為天皇照明。一天晚上，天皇回到府中的住處后，說自己留意到沿路有一支火把其實是點燃的竹掃帚。他要求下屬調查是誰把點燃的掃帚放在外面的，結果發現掃帚是一位獨居老婦人的。她太窮了，沒有火把，只好把掃帚點燃充當火把。天皇把老婦人找來，贊揚了她的無私行為，并賞賜了她一些東西。[[7]](#_7__Sen_Xian_San____Ming_Zhi_Ren)

2月23日，天皇從美國大使約翰·賓漢口中得悉，夏威夷國王卡拉卡瓦（Kalakaua）將借環球旅行之機來到日本。[[8]](#_8__Xia_Wei_Yi_Wang_Guo__1810Nia)國王此行將隱姓埋名，但他有些國事需要辦理：他希望鼓勵日本人移民夏威夷，并與日本政府簽署一份協議。因此日本視其為貴賓，任命嘉彰親王為國王此次訪問的專員，另派兩名官員負責招待工作。

3月4日，卡拉卡瓦抵達橫濱。停靠在港口的日本軍艦和外國軍艦都鳴放二十一響禮炮向其致敬。日本人派一艘小船到“遠洋”號（"aid-A2A"）接客人到酒店去，船靠岸時，他們聽到日本軍樂隊在用力吹奏夏威夷國歌。日本的音樂家竟然知道一個如此遙遠而渺小的國家的國歌，使他們極為震驚。[[9]](#_9__Zhe_Shou_Guo_Ge_De_Le_Pu_Shi)國王一行人大為感動，差一點流下眼淚。在去旅館的途中，他們注意到橫濱的房子都交叉裝飾著日本國旗和夏威夷國旗。盛大的歡迎儀式使國王一行人目瞪口呆。

第二天，卡拉卡瓦乘坐皇家火車抵達東京，在新橋車站舉行了正式的歡迎儀式之后，國王直接去了赤坂離宮。歐洲宮廷禮儀規定，接待來訪的君主時應該站在皇宮門口，天皇遵照禮儀，在緊鄰皇宮大門的房間迎接了貴賓。他穿著金光閃閃的軍禮服，上面掛滿了勛章。兩位君主握了握手。夏威夷人已被告知天皇一般不握手，因此這個舉動被他們視為特殊的榮耀。寒暄過后，兩位君主并肩走進里間。國王的侍從，同時也是他環游世界的記錄人阿姆斯特朗（W. N. Amstrong）曾經聽說，天皇具有神圣的血統，因此從不允許任何人走在自己旁邊；即便皇后，也走在他的后面。“但是，自歷代天皇當政以來，他第一次走在與自己同為君主的貴客身邊。”[[10]](#_10__William_N__Armstrong_Around)

皇后正在接見室等待貴賓。明治將卡拉卡瓦介紹給皇后。“她沒有起身，而是用頭和眼睛微微回應了國王的問候。”井上馨的女兒末子擔任皇后的翻譯，末子曾在英國呆過幾年。（阿姆斯特朗說她的英語說得很好。）之后端上了點心，但是之前夏威夷人已被告知不得在天皇面前吃東西，于是他們都婉拒了。

天皇的個子在當時的日本人中不算矮，但是卡拉卡瓦更高，像是個巨人。他有著夏威夷人特有的黑皮膚，這使得膚色黝黑的天皇看起來白了點。之前外國來賓在描述明治的容貌時，總是會提到他的下顎突出，但是現在這些地方都被胡子遮住。相反，阿姆斯特朗注意到是天皇高聳的額頭以及那雙洞察一切的黑眼睛。它們似乎在說他并非“一個完全任由大臣擺弄的人”。[[11]](#_11__William_N__Armstrong_Around)

兩位君主聊了大約二十分鐘，直到受寵若驚的國王覺得是時候告辭了。天皇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卡拉卡瓦一行離開皇宮，來到濱御殿，這棟建筑位于濱離宮，是外國權貴下榻的地方。隨后，為了遵守歐洲禮儀，即君主來訪后一小時內主人應該回訪的規定，天皇拜訪了夏威夷來客，當時他們都已脫掉沉重的禮服，換上了襯衣。

卡拉卡瓦本來只打算在日本待三天，但是外務卿井上馨認為對于這名首次到訪日本的外國君主，應該以某種方式慶祝一下，于是派人捎去口信說，天皇已經準備了許多活動，其中包括“在皇宮舉辦一場新秩序建立以來最令人矚目的盛大舞會；另外，還將舉行大型的閱兵儀式、戲劇專場演出以及其他的娛樂節目”。[[12]](#_12__William_N__Armstrong_Around)國王立即推遲了行程，并對天皇的盛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謝。國王還讓隨團的法律專家阿姆斯特朗告訴井上，自己將立刻同意廢除日本和夏威夷和約中的治外法權條款。井上非常高興，說那“將使天皇和日本人民無比開心”。

夏威夷只是個小國，盡管如此，治外法權高墻中的這道裂縫還是受到日本的極大歡迎。美國公使得知此事后，贊揚了國王的做法，然而，“由于歐洲各國政府的強烈抗議”，取消舊和約的法律文件并沒有執行。需要再等十七年，這項屈辱的條款才從所有的條約中剔除。[[13]](#_13__William_N__Armstrong_Around)

3月11日，國王請求并與天皇進行了一次私人會晤。吃過點心之后，除了擔任翻譯的井上馨以外，全部日本官員均退下。卡拉卡瓦說他計劃下一年舉行加冕典禮，并請求天皇屆時派代表團到夏威夷去，明治同意了。

卡拉卡瓦接著說到一個需要保密的問題：“我這次旅行的目的是為了推廣一個我已經考慮了好幾年的想法——亞洲國家聯盟。歐洲國家的政策只考慮他們自己。他們永遠不會考慮可能給其他國家造成的傷害，也不會考慮可能給其他人民造成的麻煩。在應對東方國家的戰略上，他們總是喜歡一起合作。反過來，東方國家卻互相隔絕，誰也不幫誰。我們在應對歐洲國家時沒有戰略，而這就是現在東方國家的權益被歐洲國家捏在手里的一個原因。因此，為了維持東方的現狀，東方國家有必要成立聯盟，以此來抵抗歐洲國家。是時候開始行動了。”

明治回答說：“歐洲和亞洲的總體情況確實如您所述。關于成立東方國家聯盟一事，我的觀點與您相同。但是您怎么能肯定現在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呢？”

國王接著說：“到目前為止，東方國家一直飽受每個歐洲國家的壓迫，現在正是到了自覺必須奮起的時候，而這正是實施我的想法的時機。”

天皇說：“我想詳細了解一下您的計劃。”

國王回答道：“這次環球旅行，我將會和中國、暹羅、印度、波斯以及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會面，并和他們討論成立聯盟的利與弊。但是，我的國家只是一群小島，人口也微不足道，缺乏實力來實施這一偉大的計劃。貴國與我聽說的完全一樣——你們不僅確實取得了驚人的進步，而且有無數天性頑強的人民。這就是為什么，如果亞洲國家聯盟成立，陛下必須向前跨出一步，成為其領導人的原因。我將成為陛下的犬馬，畢生為這項事業奮斗。如果陛下成為聯盟的領導并致力于實現其目標，那么一定能迫使歐洲國家放棄治外法權。巧合的是，1883年紐約將舉行博覽會。陛下應該借此機會到美國走一走。您還應該將親王秘密派往歐洲各國，讓他們說服各國領導人在紐約博覽會上碰頭。如果您直接對參加博覽會的領導人說，亟須終止治外法權，肯定會有效果。接下來，回國之后，您應該舉辦一個博覽會，并邀請亞洲和歐洲國家的領導人參加。簡言之，治外法權的終止以及東方國家聯盟的成敗，取決于陛下是否愿意擔任聯盟的領導。”

天皇說：“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是，像清朝這樣的大國，既自大又傲慢。即使邀請了，它也很可能不來。”

國王回答說：“不能奢望亞洲國家的領導人全都參加。但是，我肯定暹羅國王、波斯國王以及印度的各位國王都會參加。這已經足以啟動聯盟。然而這種性質的計劃不是開兩三次會就能實現的。我應該提醒您，您邀請歐洲國家參加貴國舉辦的博覽會，目的是為了避免觸怒它們。當然，您只對亞洲國家的領導人敞開心扉。如果陛下接受我的建議，那將是我的福氣，我將請求陛下將戒指賜予我。”[[14]](#_14__Jiao_Huan_Jie_Zhi_Ke_Neng_Y)

天皇考慮了一會，回答說：“我理解您的觀點。但是，我國的發展并非外表看上去的那樣。我們還有很多問題，尤其是與中國的關系問題。中國總是認為我們要侵略它。與中國維持和平關系已經非常困難，更不要說您的提議了。我會和內閣磋商，詳細考慮之后再答復您。”

國王接受了天皇的這個決定，于是，在經過了一小時二十分鐘之后，談話結束。國王離開時送給天皇一張自己的照片和一本描寫夏威夷政治局勢的書。他還向皇后贈送了一張自己王后的照片。[[15]](#_15__Guan_Yu_Ming_Zhi_He_Qia_La)

在和天皇談話期間，國王提到了另外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需要鋪設一條連接日本和夏威夷的海底電纜，以加強兩國之間的聯系。第二個是懇求將自己的侄女卡奧拉尼（Kaiulani，當時五歲）許配給定麿親王。[[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國王很喜歡自己的護衛，即十六歲的海軍學校學生定麿，認為他將是侄女的好丈夫。沒有子女的卡拉卡瓦已經決定將來把王位傳給卡奧拉尼。如果這個提議被采納，未來的夏威夷女王的丈夫將是個日本人。卡拉卡瓦可能希望借此保護夏威夷免遭美國吞并；反過來，日本政府則擔心聯姻會引起美國甚至歐洲列強的反感。天皇沒有立即答復這兩個請求，但是1882年2月10日，井上馨寫信給卡拉卡瓦，回絕了他的這兩個請求。[[17]](#_17__Huang_Yu_Hong_Yi____karakau)

卡拉卡瓦對自己在日本受到的禮遇感到非常開心，因為這大大超出了他的期望。卡拉卡瓦是個基督徒，但佛教寺廟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跟夏威夷那些冷峻的新英格蘭風格的教堂相比，他發現寺廟更加符合自己的品位，卡拉卡瓦還跟侍從說有機會要把佛教引入夏威夷。他唯一感到失望的是，預定的盛大舞會由于俄國沙皇遇刺而取消了，因為日本皇室需要舉哀。

阿姆斯特朗嘲笑起主人來總是不吝筆墨。據他描述，卡拉卡瓦并不聰明，考慮事情也不周到，還很容易轉移注意力。假如那樣，那他的亞洲國家聯盟計劃是如此出人意料：這份計劃說明他有著任何夏威夷人都意想不到的政治洞察力。但就跟他在日本提出的幾乎所有其他建議一樣，這一計劃最后被拒絕了。[[18]](#_18__You_Yi_Ge_Li_Wai___Jing_Sha)明治顯然知道，即使亞洲國家聯盟成立，中國也不會同意由日本人主導。盡管很容易就說暹羅、印度和波斯有亞洲傳統，但他們的語言和風俗都沒有什么聯系，除了對西方侵略者的憤怒，很難找到什么東西將它們團結起來。[[19]](#_19__1882Nian_1Yue_24Ri__Ming_Zh)

3月14日，卡拉卡瓦離開東京之前，拜訪了天皇，天皇親自為國王戴上了日本的最高勛章——大勛位菊花大綬章。他還按照慣例送了國王一些離別禮物——景泰藍花瓶、手鐲、漆盒、刺繡等等。皇后送了兩塊白色錦緞的布料給夏威夷王后。[[20]](#_20__Huang_Yu_Hong_Yi____karakau)

對明治天皇來說，卡拉卡瓦國王來訪的重要性當然比不上格蘭特將軍。卡拉卡瓦的亞洲國家聯盟計劃沒有任何結果，他與天皇秘密會晤時提的其他建議不久就被遺忘了。然而從明治作為一名政治家的成長來看，這次會面具有重大意義。明治在與格蘭特交談時，說的話簡短且含糊不清，但是在回答卡拉卡瓦時，他顯得非常自信，這說明明治很了解東亞形勢。也許他的自信源于某種優越感，因為夏威夷只有幾個小島和一支七十五人的軍隊，然而明治在接待卡拉卡瓦時非常周到，沒有任何失禮之處。與十年前那個不善辭令的男孩相比，明治已經變得儀表堂堂，并給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881年，明治又接待了兩名王室貴賓——未來的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的兒子阿爾伯特·維克多（Albert Victor）王子和喬治（George）王子，10月21日，兩名王子乘坐英國皇家海軍的艦艇“巴坎堤”號（"aid-A45"）抵達橫濱。他們從橫濱坐火車到東京，再坐馬車到下榻的濱御殿。兩名王子日本之行的報告描寫他們首先坐人力車游玩了淺草。他們無疑聽說過這個玩樂的地方，并希望親身體會一番。那天晚上吃飯的時候，三條實美和巖倉具視拜訪了兩位王子，天皇還派了自己的“私人樂隊”為他們助興。喬治王子的反應是：“這些音樂家從里間發出的聲音既微弱又哀傷，我們中有些人無知地誤以為是樂隊在調音，就這么過了一段時間，才詢問他們什么時候開始演奏。”[[21]](#_21___Hugh_Cortazzi___Royal_Visi)

第二天，兩名王子拜訪了天皇。他們這么描繪天皇：“雖然還不到三十歲……但他的外表看起來要成熟得多。他很鎮靜，顯然極力想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并不緊張。”[[22]](#_22__Hugh_Cortazzi___Royal_Visit)從這番描述中，可見天皇這一次沒有上次和卡拉卡瓦國王會晤時那么自在。盡管兩名王子仍很年輕——分別為十八歲和十六歲——但他們來自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天皇可能覺得有必要表現出長者的威嚴。

兩名王子顯然對皇后更感興趣。喬治（后來的喬治五世）寫道：“她的個子小小的，如果不是按照日本傳統把臉涂得那么白的話，她會非常漂亮。”她想以“愉快而親切的方式”開始談話。大王子請皇后收下他們從澳大利亞帶來的兩只小袋鼠。“小袋鼠是船上所有人的寵物，因為一到餐點，它們就在甲板上又蹦又跳，還發出低沉的吼聲，像老鷹一樣瘋狂。”皇后似乎很喜歡這個禮物，第二天兩只小袋鼠就被送進皇宮。難以想象它們在宮里四處跳躍的樣子。同樣難以想象，那個在自己統治的二十五年里為集郵者所熟悉的，留著胡子，一臉嚴肅的喬治五世，會讓日本的文身師給自己的手臂文身：“他花了大約三個小時，沿著手臂蜿蜒而下，文了一條青紅相間的龍。”[[23]](#_23__Hugh_Cortazzi___Royal_Visit)

10月31日，兩名王子邀請天皇到“巴坎堤”號上共進午餐。天皇在三名親王、巖倉具視、井上馨和眾多公卿的陪同下來到船上，神奈川炮臺以及停泊在港口的日本船只和外國船只都向他們鳴炮致敬。天皇在船上受邀觀看了一次魚雷發射的全過程。[[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第二天，兩名英國王子啟程到神戶去，接下來的一個多星期里，他們游覽了京都、奈良、大阪以及關西地區的其他地方。

這之前的7月31日，天皇又一次巡幸，這一次是到山形、秋田和北海道。大約四百二十人準備隨行，然而由于沿途沒有足夠的住處，于是將人數降到三百五十人。[[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盡管天氣酷熱難耐，但這次旅行相對來說比較平靜。天皇通常在小學學校過夜，一方面是因為那里有足夠大的地方，可以容納他的大隊人馬，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對教育的興趣一直沒變。[[26]](#_26__Ta_Huan_Zhu_Guo_Fu_Ren_De_J)天皇跟往常一樣，每到一處都要參觀學校。在鶴岡時，一名中學模范生介紹了中國典籍《左傳》，隨后一名小學生講了《日本史略》，天皇對此肯定非常高興。[[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他不喜歡聽學生談論古羅馬的消息似乎已經傳開了。

盡管天氣炎熱，天皇一行還是欣賞了美麗的風景，觀看了當地的物產和古董，天皇的馬車或乘輿所到之處都受到民眾的夾道歡迎。這次的北部巡游有一個新特點，即通訊方便了不少。天皇不僅能夠收到日本其他地方的新聞，還能夠收到全世界的新聞。例如，他通過電報知道了京都的淑子內親王生病和去世的消息。9月19日，天皇幾乎立刻就知道了詹姆斯·加菲爾德（James A. Garfield）總統的死訊；兩天后，天皇給加菲爾德的繼任者切斯特·艾倫·阿瑟（Chester Alan Arthur）發去了唁電。

不過，天皇旅行期間收到的最重要的新聞，是和當時的一宗丑聞有關的。政府將出售北海道開拓使[[28]](#_28__Bei_Hai_Dao_Kai_Tuo_Shi_Shi)官產的消息披露后引發了公憤，嘉彰親王對此深感不安，8月21日，他給熾仁親王寫信說明情況，熾仁當時正和天皇一起在埼玉縣。嘉彰親王說，北海道將變成縣這個突然的消息使北海道開拓使長官黑田清隆大為惱火。黑田跟許多高級官員說，北海道目前的發展全是他努力的結果，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由他來決定撤銷開拓使和設置縣的事情。黑田說如果這個建議被采納，他將立即宣布同意撤銷開拓使。官員們同意了。黑田隨即請求允許將開拓使的官產出售給前薩摩武士五代友厚（1834—1885）。五代在開拓使任職期間，曾在大阪成立了一家貿易公司。[[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內閣沒有立即批準黑田的申請，他們認為天皇即將訪問北海道，應該等他參觀完那個地方后再做決定。這個決定惹惱了黑田，他尖叫著咒罵某位高官，還朝他扔了一個燭臺，完全不顧自己的行為。

天皇臨出發到北方去的那天，已經同意按照去年決定的計劃，將工廠、礦產以及其他的政府資產出售給私人企業。然而，計劃的細節——價值約三百萬日元的資產以三十萬日元出售，且在三十年內無息償還——被披露之后，引發了報紙和民權派的強烈不滿。黑田和五代都來自薩摩這個事實，使得這個銷售建議顯得更加可疑。

嘉彰親王認為不能再沉默下去，決定請求覲見仍在巡幸途中的天皇。他派人請來佐佐木高行和內務省官員土方久元，要求他們陪自己去。他說自己從未在天皇面前表達過政治觀點，擔心無法說服他。嘉彰深信，有這兩名天皇的親信陪同，成功的機會將大大增加。但他們認為最好還是親王自己去。天皇討厭欺騙，親王最好是將情況如實地向天皇匯報。[[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嘉彰接受他們的建議到了埼玉，并將情況匯報給天皇。

不過天皇可能已經知道了。根據報紙的說法，天皇一個月前（在北海道）就已經從一名宮內省官員的口中知道了公眾的反應，這名官員一路趕到北海道向他匯報這宗銷售引發的騷動。據說天皇還從報紙上讀到薩摩派政客計劃聯手除掉某位參議的報道。他猜得沒錯，他們正是沖著大隈來的。

10月11日，明治回到赤坂離宮。他派人召來元田永孚，元田主張立刻解雇大隈。他說，如果認可大隈立即成立議會的主張，“則眾論沸騰，危禍忽到”。天皇猶豫，沒有采取行動。而后，在眾參議奏請罷免大隈時，他質問道，薩摩派參議聯手除掉大隈的傳聞是不是真的，有沒有大隈犯錯的證據。大臣說，盡管很難找到確證，但是福澤諭吉的弟子可以作證。另外，大隈、福澤和巖崎彌太郎（1834—1885）[[31]](#_31__San_Ling_Shang_Hui_De_Chuan)參與了密謀。大臣們強調，對大隈不滿的并不只是薩摩派參議，而是所有參議。假如天皇不信任薩摩派參議，內閣將面臨解散的結局。天皇只好同意，但是吩咐不得不由分說便強迫大隈辭職。

伊藤博文和西鄉從道被選為代表，去說服大隈辭職。大隈毫不猶豫地同意。作為交換條件，10月12日，天皇下令三條實美撤銷官產的出售許可。政府宣布大隈辭職的原因是風濕病復發使他無法履行職務。其他一些和大隈有聯系的政治家也都辭職了。[[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多年來內閣中薩摩和長州兩派的關系一直不好，但他們在外來威脅（大隈來自佐賀）面前團結在了一起。為了安慰大隈的支持者，官方宣布將于1890年兌現承諾，成立議會，而這對那些主張漸進的人來說有些太快了。

黑田出售官產的計劃受阻，然而政敵大隈被解雇，讓他頗為欣慰。身陷丑聞漩渦的黑田，出丑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多久； 1888年他還坐上了首相的位子。盡管如此，這個常常被稱為“明治十四年政變”的事件并沒有被人們遺忘。它是強權政治中尤其令人不快的一個例子。

與此事有牽涉的大多數政治家，似乎都不得明治喜歡。據曾跟隨他到北部巡幸的侍從荻昌美說，有一天晚上，天皇一邊洗澡一邊評價各位參議：“黑田想做大臣，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他簡直太討厭了。西鄉（從道）參議總是一副醉醺醺的樣子，說話也讓人不知所云。幾年前英國議員里德（Reed）來日本訪問時，川村參議的接待方式并不合我的意。[[33]](#_33__Wo_Bu_Qing_Chu_Chuan_Cun_Re)在建議沒被采納時，黑田經常以生病為由不參加朝會。只要他不在，西鄉和川村也會無緣無故地不參加。真是讓人費解啊。” 荻又說：“他知道井上（馨）參議狡猾多端，因此并不喜歡他。至于其他人，陛下在最近這次巡幸期間評價說，大木（喬任）完全像個木偶。陛下真正信任的人只有參議伊藤博文。”[[34]](#_34__Zuo_Zuo_Mu_Gao_Xing____Bao)

從這個時期開始，我們偶爾能夠從千篇一律的詔書和獨特的語氣中聽到明治的聲音。他已經聽得夠多，認為是時候自己開口說話了。

1. [[1]](#_1_34) 由小袿、單、袴、小袖等構成的套裝，明治十七年（1884）被定為婦女的和服禮服。——編注

1. [[2]](#_2_34) 佐佐木高行，《保古飛呂比 佐佐木高行日記 十》,第1—2頁。

1. [[3]](#_3_34)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54頁。

1. [[4]](#_4_34) 1月7日，天皇本來應該去聽他今年的第一堂課的，但是他卻到橫濱視察意大利軍艦去了。熱那亞公爵將乘坐這艘船離開日本（《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57頁）。

1. [[5]](#_5_34)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59頁。這個數字甚至比1880年本來就極少的23次還要少。副島講授的是儒家的經典著作《中庸》。西村講的可能與倫理學有關，這是他當時憂心忡忡的科目。所有的課元田都有參加，即便不是他自己講的課。

1. [[6]](#_6_34)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65—266頁；亦可見佐佐木高行，《保古飛呂比 佐佐木高行日記 十》，第66—68頁。佐佐木自己的描述中有關于這次對話的更為詳細資料。

1. [[7]](#_7_34) 森銑三，《明治人物夜話》，第19—20頁；亦可見《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81—282頁。

1. [[8]](#_8_34) 夏威夷王國：1810年由歐胡島、茂夷島、莫洛凱島、拉奈島及夏威夷等島嶼的小型獨立部落，在經過一場戰爭后所統一成立的王國。1894年，成立夏威夷共和國，夏威夷王國滅亡。1898年，夏威夷共和國與美國合并，成為美國的一個地區。——編注

1. [[9]](#_9_34) 這首國歌的樂譜是由美國領事羅伯特·沃克·歐文（Robert Walker Irwin，本杰明·富蘭克林的一名后裔）將軍從一位曾經在夏威夷當傳教士的外國婦女那里借來的，歐文將軍隨后將樂譜交給了日本軍樂隊（荒俁宏譯，《カラカウア王のニッポン仰天旅行記》，第70頁）。

1. [[10]](#_10_34) William N. Armstrong,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 , p. 37.

1. [[11]](#_11_34) William N. Armstrong,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 , p. 39。

1. [[12]](#_12_34) William N. Armstrong,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 , pp. 47-48。

1. [[13]](#_13_34) William N. Armstrong,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 , p. 50。

1. [[14]](#_14_34) 交換戒指可能意味著天皇不會違背他的口頭承諾。很明顯，明治沒有將他的戒指給卡拉卡瓦。

1. [[15]](#_15_33) 關于明治和卡拉卡瓦國王的秘密會面的描寫源自《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94—298頁。在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 一書中，卡拉卡瓦顯然沒有將他的建議透露給他的隨行人員。阿姆斯特朗對國王秘密離開下榻的地方感到惱怒：“這種對他自己的隨從人員的忽視完全有悖于禮儀。他的神秘兮兮讓我們感到困惑，因為他平時絕對地信任我們”（p. 62）。《明治天皇紀》提供了不下十三處的資料來源，但是井上馨的信與長崎省吾（翻譯）的報告可能提供了這次秘密會面的大量信息。

1. [[16]](#_16_33)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96頁。山階宮定麿親王（1865—1921）是伏見宮彰仁親王的兒子。他1882年1月14日給卡拉卡瓦去信，解釋自己為何不能與卡奧拉尼公主結婚。這封信現在收藏于檀香山的主教博物館。親王說他很小的時候就定親了，因此無權考慮與公主的婚姻。盡管親王沒有說，但是皇族成員與外國人結婚無疑會遭到反對。根據阿姆斯特朗的說法，“天皇饒有興趣且有禮貌地聽完他的建議，但是說這件事需要從長計議，因為這件事對日本傳統的背離令人驚詫”（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 , p. 63）。（能久親王在歐洲時已經與一名德國貴族結了婚，但他不得不跟對方離婚。）阿姆斯特朗把這個結婚計劃看成國王的“波利尼西亞人腦子深處的奇怪”想法，他相信“假如天皇接受這個計劃，那么夏威夷將有望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這是所有的大國都不希望看到的。”

1. [[17]](#_17_33) 荒俁宏譯，《カラカウア王のニッポン仰天旅行記》，第298—300頁。海纜牽涉兩個問題。第一，日本缺乏建造這個工程的資金；第二，必須優先考慮美國人賽勒斯·菲爾德（Cyrus Field，他已經成功鋪設了連接美國和英國的大西洋海底電纜）的請求（《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74頁）。

1. [[18]](#_18_32) 有一個例外。井上馨熱情地接受了國王的鼓勵日本人移民夏威夷的請求（《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74頁；荒俁宏譯，《カラカウア王のニッポン仰天旅行記》，第151頁）。

1. [[19]](#_19_32) 1882年1月24日，明治給卡拉卡瓦寫了封信，表示感謝卡拉卡瓦提出的要他當亞洲君主聯盟首領的建議，以及感謝他對這項計劃的全力支持；但是他重申道，他相信這項計劃極難實現，因為各國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他還用恭敬的語言婉拒了聯盟首領一職。這封信保存在檀香山的主教博物館（卡皮歐拉尼—卡拉尼歐拿歐雷藏品）（荒俁宏譯，《カラカウア王のニッポン仰天旅行記》，第299—300頁）。

1. [[20]](#_20_31) 荒俁宏譯，《カラカウア王のニッポン仰天旅行記》，第139頁；《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98頁。

1. [[21]](#_21_31)  Hugh Cortazzi, “Royal Visits to Japan in the Meiji Period,” p. 84. 這段信息來源于由兩位王子的日記、信件和筆記所編纂的The Cruise of Her Majesty’"aid-A85"。

1. [[22]](#_22_30) Hugh Cortazzi, “Royal Visits to Japan in the Meiji Period,” p. 85.

1. [[23]](#_23_30) Hugh Cortazzi, “Royal Visits to Japan in the Meiji Period,” pp. 85-87。

1. [[24]](#_24_28)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67頁。

1. [[25]](#_25_28)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417頁。

1. [[26]](#_26_28) 他還住過富人的家里、佛教寺廟、博物館（在山形縣）、郡衙門、醫學院（在福島縣）等。

1. [[27]](#_27_27)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06頁。在米澤市時，他聽了一名中學模范生講《日本外史》、一名小學模范生講《日本略史》（第521頁）。

1. [[28]](#_28_24) 北海道開拓使是日本政府為開發北海道等地區而設立的地方最高行政機關，相當于縣政府。1869年設置，1882年廢止。——編注

1. [[29]](#_29_24)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35頁。

1. [[30]](#_30_22)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36頁。

1. [[31]](#_31_20) 三菱商會的創立者。據說他為沒能買到在售的政府資產而非常生氣。

1. [[32]](#_32_19)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48頁。

1. [[33]](#_33_18) 我不清楚川村惹惱天皇的原因。愛德華·詹姆斯·里德（Edward James Reed）和兒子于1879年1月訪問日本。他監督了三艘日本軍艦——“扶桑”號、“金剛”號和“比叡”號在英國的建造工作，這三艘軍艦后來成為日本海軍的中堅力量。他訪問日本時，受到了明治的接見，后者高度贊揚了里德在令三艘軍艦成功下水方面的功勞（《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586—597頁）。

1. [[34]](#_34_18) 佐佐木高行，《保古飛呂比 佐佐木高行日記 十四》，第495頁。《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58頁上的描述基于佐佐木的著作，但是在用詞和細節上有些出入。我在翻譯時綜合了上述兩個版本。

# 第三十五章 自由民權



1881年，頒布憲法和成立國民議會的呼聲高漲，讓人覺得那些倡議者似乎不久就能取得成功。自從1876年9月天皇許諾以來，憲法的起草并沒有取得多少進展。不消說，沒有人公開反對憲法，因為那將違背圣意，[[1]](#_1___Zao_Xie_Shi_Hou_Ceng_You_Gu)但許多人都支持“漸進主義”的政策，希望憲法的頒布可以無限期地拖延下去。然而要求制定憲法、開設國會的人已經厭煩等待，許多人要求立即行動。

要求政府采取具體措施的壓力也來自令人吃驚的陣營。1879年12月，山縣有朋給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寫了一封長信，表達自己對立憲政體是否可行的看法。山縣列舉了民眾對政府的諸多不滿的原因，認為失業、強制節約[[2]](#_2__1877Nian_He_1880Nian_Jian_Mi)、拋棄傳統的道德習慣等都疏遠了民眾，助長了自由民權運動。山縣認為當下迫切需要改革立法、行政和司法之權，否則肯定會發生更多像佐賀、鹿兒島等地那樣的武裝叛亂。他相信，恢復民眾對政府信心的唯一方法就是頒布憲法。將來可能存續很多代的憲法顯然不可能一天一夜完成，但現在至少到了應該確定其基本原則的時候。一旦內閣政治及國家各部門的運行明顯遵循這些原則，未來的路線也就被確立，人民將會再次擁護政府。

山縣強調，不應該將新憲法理解為侵犯皇權。早在《五條誓文》頒布時，天皇就親口承諾將逐步成立立憲政體。府縣郡區的下層議會機構已經設立，應該從這些機構中選拔最有才華的成員，組成和元老會對應的平民議會。

三條同意了山縣的建議，巖倉隨后也同意了。他們將此建議提交天皇，天皇欣然接受，并要求每位參議提交一份報告，說明自己對立憲政體的看法。[[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在全部報告中，伊藤博文的最為詳盡。他列舉了武士對廢藩以來諸多改革的痛恨，并將他們目前的情況與幕府時代相比較。在幕府時代，武士們受到良好的教育，享有薪俸還擁有房產，自然認為自己有為國效力的義務。這種想法現在也還存在。武士一發表政治聲明，普通民眾就會動搖：“譬之人身，士族如筋骨，平民如皮肉，筋骨動而皮肉從之。”[[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伊藤警告說，法國大革命早晚會影響每個國家。政府分權于民的觀念已經隨著書本等歐洲商品一起進入日本，在武士和平民中廣泛傳播，現在已經蔓延到千村萬落。一些煽動者胡言亂語，嚇唬聽眾；另一些人則完全不顧天皇的計劃，無病呻吟，并煽動群眾做出令人不知所措的瘋狂行為。這一切都像“雨露降而草木生，深不足怪”。[[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伊藤似乎已經接受了政府必須要與普通民眾分權的觀點，但他強調不可像一些人主張的那樣匆忙地起草議會計劃。“起國會，以成就君民共治之大局，雖為甚望之事。然此系國體之變更，實曠古之大事。”政府必須按照先筑根基，再建柱子，最后建屋頂的順序來推進。伊藤支持模仿歐洲的模式，建立兩院制議會。上院（元老院）由一百名貴族和武士組成，其特別職能在于支持皇室和保留日本傳統。伊藤希望通過允許武士直接參與政府事務減輕他們的敵意。

下院將由地方議員中選出的“公選檢查官”組成，其職責只限于財務審查問題。上院明顯比下院重要得多。伊藤認為這樣有利于穩定，而且上院可以避免下院走向激進。[[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結尾時他說，“漸次進步，以完成大局，全仰陛下之乾剛不息”。

參議大隈重信一開始不愿發表自己的觀點，天皇讓熾仁親王去勸他，要他發表對這個關鍵問題的看法。熾仁回來匯報說，大隈希望能面陳自己的觀點，因為他擔心如果寫下來，可能會泄露出去，但天皇卻堅持要求他提交書面陳述。1881年3月，大隈終于將奏折交到左大臣熾仁親王的手里，同時要求在天皇御覽之前，任何參議，甚至是太政大臣或者右大臣都不可以拆看。熾仁同意了。

大隈的意見一共有七條。第一條呼吁立即公開宣布設立議會的預計日期，確定憲法起草的人選，并開始著手建造議會大樓。

第二條規定，任命高級官員時應考慮人民的支持度。在未來憲法框架之下運作的議會應體現民意。議會的決議也應符合大部分成員的愿望。獲得大部分民眾支持的政黨領導應該擔任議會的領導。[[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君主立憲政體使天皇毫不費力就可以找到最適合的助手。依賴選舉產生的官員，將使天皇免去判斷潛在顧問資格的麻煩。但是，大隈指出，選民選出的政黨將來可能因不稱職而失去民心。如果那樣，政權將移交給新獲得最大支持的政黨。天皇隨即從這個政黨中選出一名首相，要求他組閣。[[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大隈的第三條建議是，將那些職位隨著執政黨變化而變化的官員（政黨官）和那些不管哪個政黨執政職位都不變的官員（永久官）區分開。后者是官員的主體（除了各部門領導之外），不允許擔任議員。而且維持國家治安、公平的官員應當是永久中立官，包括三大臣、軍官、警察和法官。

第四條規定憲法將由天皇頒布。憲法非常簡單，完全由總則組成，同時澄清行政權力的職責以及公民的個人權利。第五條建議1883年初召開議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本年（1881年）應該頒布憲法，并在次年年底之前選出議會成員。

第六條要求各政黨確立政綱，各政黨之間的競爭將是他們不同政綱之間（而非個人之間）的競爭。第七條是總論，要求政黨必須忠實于憲政精神。如果他們遵循字面的意義而非內在的精神，那將不僅是國家的不幸，還會給執政者自身帶來災難，使他們留污名于后世。[[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熾仁親王讀完這份文件之后，為大隈提出的議會召開日期之近感到震驚。盡管已經對大隈承諾過，他還是秘密地將奏折給三條實美和巖倉具視看后才呈交天皇圣裁。伊藤聽說大隈向天皇遞交了奏折，于是問三條自己可不可以看一眼。三條從天皇那里取回奏折，并于6月27日拿給伊藤看，伊藤看后非常憤怒。[[10]](#_10__Hou_Teng_Jing____Zi_You_Min)議會召開的時間距離現在只有兩年—這在他看來也太快了—而且天皇側近的顧問也將由普選產生，等于完全放棄了君主的特權。7月1日，伊藤寫信給三條，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并威脅說如果大隈的建議被采納，自己將辭職。第二天他又寫信給巖倉，說只要大隈的意見和自己相反，他就不會參加參議的會議。[[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巖倉勸說無果，于是派人把大隈請來，向他解釋自己為何要將他的奏折拿給伊藤看以及伊藤的反應如何。大隈為自己的激進主義辯護，認為“如群集而入門內，若開半扉，則必招雜沓，莫如開其雙扉，導之入內”。1883年召開議會這個大膽而激進的措施就是“開其雙扉”。在巖倉的建議下，大隈和伊藤隨后見面，并最終達成了和解。伊藤又開始參加內閣會議，但他們在許多政治問題上的觀點依然相距甚遠。

作為漸進派，伊藤非常關心天皇未來的角色。天皇的個人決策—反對向外國貸款以及反對農民用大米交稅—表明他可能不肯再扮演被動或者象征性的角色，而是想積極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伊藤擔心這種傾向可能導致天皇要對政治行動擔責，進而導致有關天皇制正當性的爭論。因此他寧愿天皇扮演一個完全象征性的領導角色，擔任為自己服務的內閣的指導者一職。伊藤特別警惕那些不必承擔政治責任的宮中人士通過天皇施加影響，他相信這只會導致政府的不穩定。[[12]](#_12__Ban_Ben_Yi_Deng____Yi_Teng)

有一點使伊藤和大隈走到了一起，那就是他們都討厭薩摩人。薩摩派的川村純義再次被任命為海軍大臣時，得到了所有海軍軍官的支持，但遭到伊藤的強烈反對。大隈也和伊藤站在一起。他們譴責薩摩人習慣將海軍視為自己的私人領地，并且確信川村沒有能力處理海軍未來的發展。但最終，川村還是順利地復任。因為巖倉等三大臣希望通過平衡長州和薩摩的勢力來維持內閣的和平。他們可能還希望任命川村之后，那些平時懶得參加內閣會議的薩摩參議（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勤勤懇懇的長州參議）將會再次參加會議。三大臣有越來越多的理由為失去木戶和大久保感到遺憾，因為他們維持著內閣中長州和薩摩之間的勢力均衡。[[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盡管被迫在川村復任問題上讓步，但伊藤仍是政府中最為得勢的人。他得到了天皇和三大臣的信任，然而佐佐木高行卻在日記中說“至來年春，內閣必破裂”。他滿心歡喜地期待這一刻的到來，因為那是佐佐木一直以來希望的由天皇親自執掌大權的好機會。他敦促天皇為這件可能發生的事做好準備。天皇回答說，左大臣（熾仁親王）身為皇族，比另外兩位大臣身份更高，因此他很期待其表現。但是現在成為內閣成員的熾仁，似乎已經失去了他在元老院期間展現出來的自信。佐佐木為熾仁辯護說，熾仁的資質良好，但是缺乏毅力。天皇隨后說了一番非常有說服力的話：“大臣、參議于維新之際雖有功勞或軍功，然無政治學問，非長于政事之人物，故今日內閣艱難亦是當然。因之，唯希真政治家漸入內閣。然此亦依局勢，只可待時機十分之時。”[[14]](#_14__Zuo_Zuo_Mu_Gao_Xing____Bao)

這就是困擾明治政府的癥結所在。戰場上的英勇表現并不能保證勝任政治事務，然而大部分內閣成員入選都是因為赫赫戰功，而不是敏銳的政治洞察力。薩摩籍參議不參加內閣會議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已經厭煩聽取行政報告。明治對黑田清隆和西鄉從道這兩名軍人的反感，或許就說明他注意到其缺乏認真處理民事問題的能力。

軍人參政這個問題將一直持續到明治死后，但是，這時候讓軍人們不插手政治，尤其是不違抗君命變得尤為必要。早在1874年，加藤弘之就在《明六雜志》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文章的開頭寫道：“如文明開化各國，武官只管恭順君命，以成最要至良之事。”[[15]](#_15__William_R__Braisted__trans)就在這一年，三名陸軍少將為了表達對大久保外交政策的不滿而辭職。[[16]](#_16__Hou_Teng_Jing____Zi_You_Min)為了應對這些公開表達政治觀點的軍人，尤其是告誡那些曾在西南戰爭中參加西鄉一方的叛逆士兵，1878年，山縣起草了一份《軍人訓誡》，并分發全軍，其中有一條便是“禁是非朝政，議論時事”。[[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盡管頒布了訓誡，但還是有軍人參加當時席卷全國的政治示威。1880年4月5日，為了控制（在他們看來）威脅到公共安全的示威活動，政府頒布了稱為《集會條例》的十六條法規，規定以后一切示威活動—不管是政治訴求、攻擊政府的漸進政策，還是要求召開議會等——都需要得到警察的批準。另外，嚴禁軍人、警察和教員等參加公眾集會和政治團體。[[18]](#_18__Hou_Teng_Jing____Zi_You_Min)不過，軍人參加民權運動的問題繼續存在：1882年1月《軍人敕諭》頒布時，第一條便要求軍人“故當毋為世論所惑，不為政治所拘，唯以守己本分之忠節為主”。[[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可能正是在這種禁止軍人參與政治活動的壓力，爭取“自由民權”的運動完全由普通人，主要是中下層武士領導。1880年12月15日，第一個為此目的而成立的政黨“自由黨”成立。[[20]](#_20___Zi_You_Dang_Cheng_Li_De_Ri)在此之前，國內的許多地方都已建立了政治組織，每個組織都有一個獨特而吉利的名字，但卻不一定有明確的目標。即便那些高聲叫嚷著要頒布憲法和召開議會的政治社團，也極少考慮憲法應該包含什么內容，或者是立法機構應該怎么組織這些問題。[[21]](#_21__Hou_Teng_Jing____Zi_You_Min)

高知縣的“立志社”是武士積極分子成立的組織中最突出的一個。1874年，與“自由民權”運動有聯系的板垣退助等人共同成立這一組織。“立志”這一名字來源于塞繆爾·斯邁爾斯的暢銷書《自助論》（日譯本叫《西國立志編》）。這個名字本身說明，較之于建立議會，它原本更接近于實現武士教育和自我提升。[[22]](#_22__Mi_Yuan_Qian____Zhi_Mu_Zhi)也許這就是板垣1875年創立愛國社的原因。它是一個特殊的政治組織，意在建立立志社和各自由民權組織之間的聯系。

然而，沒過多久，立志社就開始涉及重要的國家議題。西南戰爭使它的活動發生了轉變。1877年戰爭爆發后，一直堅定支持西鄉的板垣回到高知。西鄉的戰敗清楚地說明，用軍事力量與政府對抗是沒有用的。因此，立志社的主張將通過言論和報紙傳播，而不是刀劍。

板垣是立志社的創立者和最著名的成員，但是實際推動自由民權運動的則是一個名為植木枝盛（1857—1892）的二十歲小伙子。植木出生于高知的一個高級武士家庭。1872年，植木來到東京學習。[[23]](#_23__Gao_Zhi_Fan_De_Xue_Xiao_Fei)他廣泛地涉獵各種書籍，尤其是有關法律、政治經濟和自然科學的書。其間，植木還對基督教產生興趣，經常到教堂做禮拜。

1873年底，植木回到高知。五個月后，板垣在立志社的一次演講令植木特別感動，他開始學習自由論和議會制度的理論。1875年植木回到東京繼續學習，這一次他的閱讀興趣由翻譯書籍轉到傳統漢籍，尤其是陽明學派的著作。[[24]](#_24__Zhe_Yi_Xue_Pai_De_Ru_Jia_Xu)這一年，植木開始向主要的報紙投稿，邁出了作為自由民權活動家的第一步。1876年，植木因寫了一篇名為《猿人君主》的文章而被捕入獄。他在文中說，人類和猿猴的區別在于人類具有思考和想象的能力，但是政府通過壓制言論自由，已經把人變成了猿。[[25]](#_25__Mi_Yuan_Qian____Zhi_Mu_Zhi)但是，植木認為“有教育后有智識，有智識后有議院”，對于百姓尚未接受足以明智投票的教育之前就進行全國普選深表懷疑。

就在這一年，西南戰爭爆發，植木隨后回到高知。他在板垣家住了一段時間，開始積極為立志社工作。植木擔任主要執筆人，撰寫了要求召開議會的請愿書草稿，還為立志社當時出版的許多短命雜志寫稿。同時，他作為一名演說家也聲名鵲起。1877年一年里，他就做了三十四場演講，觀眾人數一般為一兩千人。植木在日記中寫道，6月23日，他到一個可以容納兩千人的劇院演講，但是還有兩千人無法進場。由于太過嘈雜，演講不得不中途散場。高知是自由民權運動的最前線，全國各地的有識之士都聚集在這里。植木這時已經完全相信必須建立議會，并將未能建立的原因歸咎于西南戰爭。[[26]](#_26__Mi_Yuan_Qian____Zhi_Mu_Zhi)

植木對自由的倡導也擴展到性。他說人類的目的是“滿足己之欲望，盡愉樂，極幸福” 。[[27]](#_27__Mi_Yuan_Qian____Zhi_Mu_Zhi)他的日記記錄了自己夢到的一些性幻想，其中一個是這樣的：“與天皇同寢。又與皇后同衾，夢交媾之事。”[[28]](#_28__1881Nian_2Yue_2Ri_De_Ri_Ji)植木將天皇和自己同一視之的奇怪認知一次次出現在他的日記里，他認為自己是天皇，甚至使用相應的敬語。從1883年起，植木甚至在皇歷（以神武天皇建國為起點的歷法）、西歷之外，另以“寰宇大皇帝”（意為他自己）的誕生時間紀年。1884年3月13日，植木在日記中寫道：“天皇、夜、行幸芳原（吉原[[29]](#_29__Wei_Yu_Dong_Jing_Du_Tai_Don)），于紅髯樓招妓女長尾。”[[30]](#_30__1884Nian_3Yue_13Ri_De_Ri_Ji)

植木從未解釋為何一直自稱天皇。他無疑對天皇這個人有著獨特的興趣。植木的日記一般只寫自己的事，但從1873年開始，他開始提到“圣上行幸”“皇女分娩”“拜見龍顏”等。我們可以想象，這種對天皇的癡迷正是植木反君主情緒的反面。1879年8月2日，植木做了一個夢。他這么回憶夢里發生的事：“在東京，一人因不敬天子、近共和政治等大惡余，以二少年刺余，然傷小未死。”[[31]](#_31__1879Nian_8Yue_2Ri_De_Ri_Ji)

不消說，這類日記和明治本人沒有一點關系，但是植木的朋友橫山又吉寫道，植木短暫一生的最后幾年，“可以說已經瘋了。他認為自己就是天皇” 。[[32]](#_32__Mi_Yuan_Qian____Zhi_Mu_Zhi)如果植木僅僅是個瘋子，那我們不會對他自稱天皇的古怪言論感興趣，然而就在植木寫下這些言論的同時，他還積極地發表支持自由民權運動的演講和文章。

1880年1月，植木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盡管有些人害怕共和政體，但是假如他能有一些真正的理解，就會知道這種政體其實會給國家帶來好處。[[33]](#_33__Wai_Qi_Guang_Guang____Zhi_M)然而，總的說來，植木似乎認為日本天皇制的存在是“確定的”。他于1881年起草的憲法以天皇存在為前提，并規定了天皇的一些特權。植木并沒有公開擁護共和制。[[34]](#_34__Mi_Yuan_Qian____Zhi_Mu_Zhi)

植木還有一篇文章被人記起，叫《就男女同權之事》。也許這是日本最早呼吁男女平等的文章。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植木是在妓院寫下了反對賣淫嫖娼的著名社論（發表于1882年1月），但沒有證據支持這個觀點。不管怎么說，植木還在跟妓女縱情玩樂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宣傳婦女的平等權利了。植木承認短期內難以廢除賣淫，但他極力主張應該基于自由主義的原則，努力教育妓女。

在運動方針眼花繚亂的變化之中，植木一心為自由民權事業貢獻出自己的力量。1880年，愛國社更名為“國會期成同盟”，1881年，同盟變成了自由黨。植木起草了黨綱和規則。

明治對這些新事物的看法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我們能想到他應該不太喜歡。他當然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前文已經說過，自由民權活動家煽動起的民眾憤怒，導致出售北海道開拓使官產計劃流產。天皇認為安撫自由黨成員是明智的做法。1881年10月12日，明治宣布將于1890年召開議會。[[35]](#_35__Zai_San_Tiao_Shi_Mei_He_Sa)

這一諭旨是在自由黨等政治組織的強烈要求下匆忙定下來的，但是許多重要的策略問題仍未決定。新政府將按照英國的模式還是普魯士的模式？這種差異的背后隱藏著一個基本的問題：政府的構成是來自人民（英國式）還是由天皇任命（普魯士式）？

一個更加基本的問題是，這些未來的立法委員幾乎完全缺乏議會程序的培訓。在1881年10月召開的自由黨結成大會上，后藤象二郎當選為議長，馬場辰豬當選為副議長，但是根據馬場的日記記載，后藤幾乎從不參加會議。于是主持會議的責任便落在了馬場頭上。他曾在倫敦的中殿律師學院學習過，熟悉英國議會進行的方式。黨員們連議會討論的基本原則都不知道，令馬場感到震驚。當馬場批評他們時，這些人回答說，不管歐洲的議會如何進行，他們是日本人，按照“日本的方式”來就行。馬場堅持己見，必須要進行議事，最后自由黨正式宣布成立。[[36]](#_36__Ma_Chang_De_Ri_Ji_Zhai_Lu_J)板垣退助當選為新黨的總理。[[37]](#_37__Gen_Ju_Da_Qiao_Zhao_Fu_De_S)

天皇已經保證將召開議會，然而自由黨未來的目標卻曖昧模糊。自由黨的對手，由大隈于1882年4月成立的立憲改進黨則有更加明確的目標，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種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由立憲制君主擔任領導。大隈在立憲改進黨成立大會上演講時強調，君主在他所支持的民主政府中扮演象征性（而非積極主動）的角色：“有些人盡管自稱‘尊敬天皇’，也以此為裝飾，但實際上是想建立幾個豪門世家來充當皇室的屏障，或者是用軍隊來保衛皇室，甚至他們會把君主推到最前方，讓他直接管理國家。這是通過支持皇室，將皇室置于危險境地的做法。”[[38]](#_38__Du_Bian_Ji_Zhi_Lang____Da_W)

大隈一再強調自己對皇室的一片忠心。他在同一次演講中說：“冀望維新中興之業大成，建帝國萬世之基礎，保皇室之尊榮于無窮，全人民之幸福于永遠。”

1882年4月6日，板垣在岐阜演講后遇襲，一名行兇者用匕首刺傷了他。盡管傷口不深，兇手也立刻就被制服，但據說以為自己可能馬上就要死了的板垣高聲喊道：“板垣可以死， 但自由不死！”[[39]](#_39__Da_Qiao_Shuo__Jin_Guan_Zhe)天皇聽說后十分震驚，立即派侍從去當地看望板垣。[[40]](#_4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這件事為板垣贏得了許多同情，全國各地有許多新成員加入自由黨。但是政府對它的行動限制也越來越嚴格，一些黨員因抗議福島縣令殘暴地鎮壓農民起義而遭到監禁，最后被以叛國罪論處。

政府以一個更加巧妙甚至狡詐的計劃解除了自由黨的領導權。1882年3月，伊藤博文和許多顧問一起去歐洲考察各國的組織結構。伊藤出發前不久，板垣來拜訪他，伊藤借機勸從未出過國的板垣到歐洲去，研究研究各國的政治和風俗。伊藤說，除非親自了解歐洲的情況，否則很可能被那些認為外國一切都好的人所影響，到頭來誤導了日本人民。板垣聽后心動，表示如果經費有著落的話自己愿意去。[[41]](#_41__Da_Qiao_Zhao_Fu____Hou_Teng)

伊藤秘密和井上馨商量，一致認為削弱自由黨實力的最好方法就是讓板垣和后藤到國外去住上一段時間。伊藤和井上開始為他們的旅行籌措經費，最后三井銀行同意給他們兩萬美元，條件是在資金存取方面和軍隊再續三年合約。

1882年底，板垣突然宣布要到歐洲去，不久之后后藤也宣布了同樣的決定。這兩人完全沒有準備，就要去研究歐洲的情況。根據馬場辰豬的說法，他們連羅馬字母都不會讀，更不要說外語了。他們根本不可能學到什么重要知識。盡管有一名翻譯協助他們，然而這個人的主要工作（雖然他們并沒有起疑心）卻是監視他們，并將他們的行蹤報告給井上。[[42]](#_42__Fan_Yi_Jin_Cun_He_Lang_Ceng)

關于經費的來源，板垣和后藤從未收到滿意的答復，不過這似乎未能給他們造成困擾。他們迫切地渴望出國，因此當自由黨成員質疑兩人此行是否明智時，他們變得相當地不理智。[[43]](#_43__Da_Qiao_Zhao_Fu____Hou_Teng)

我們很容易就可預見到，歐洲之行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好處。后藤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巴黎，偶爾（也許是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會去普魯士、奧地利或者英國走走。在伊藤的建議下，后藤在維也納聽了十次左右洛倫茨·馮·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教授的講座。伊藤建議后藤跟施泰因學習，以矯正那些受英國、法國或者美國影響的人所闡述的過度自由主義，以此來加強皇室的基礎。但是斯泰因教授那年的課程都是與拿破侖三世政變有關的一些雜燴言論，后藤一點收獲也沒有。

板垣很驕傲地見到了克萊孟梭和維克多·雨果，然而他在法國的時間主要都用在觀光上面，就像他回日本后出版的游記所描繪的那樣。他成功地見到了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這位日本知識分子的偶像，然而就在板垣含糊不清地闡述自己的觀點時，斯賓塞突然憤怒地叫了起來：“別說了，別說了！”隨即起身離開了房間。[[44]](#_44__Da_Qiao_Zhao_Fu____Hou_Teng)

1883年，板垣和后藤回到日本。他們發現自己不在的這段時間，自由黨和立憲改進黨這兩大自由派政黨已經開始憤怒地互揭對方的老底。毫無疑問，這正是政府中的保守派領導所希望的結果，他們花大筆資金讓板垣和后藤到歐洲去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那些希望板垣給他們講講法國的共和制政體或者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政體的自由黨成員非常失望，因為板垣跟他們說，“盡管日本的生活標準落后于歐洲，但是政府則要比它們先進得多”。他敦促黨員們“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平”，同時警告說，“如果海軍的實力得不到加強，日本將會非常危險”。[[45]](#_45__Da_Qiao_Zhao_Fu____Hou_Teng)沒有一點和自由主義運動有關的東西。

1884年10月29日，自由黨解散，而它的死對頭立憲改進黨隨著兩名主要領導人大隈和河野敏鐮辭職，事實上也于同一年的12月17日解散了。自由主義政黨已經沉寂，需要再過幾年，才能重新煥發生機。

1. [[1]](#_1_35)  早些時候曾有過反對建立民選議會的思想。例如，加藤弘之的論文《ブルンチュリ氏國法汎論摘訳民選議院不可立ノ論》（伯倫知理的《一般國家法》中關于不適宜建立公民大會的摘譯），見Kato Hiroshi, “An Abridged Translation of Bluntschli’s ‘Allgemeines Staatsrecht’ on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Establishing a Popular Assembly” in William R. Braisted, trans., "aid-AFU"（明六雜志）, pp. 47-49。加藤在翻譯之后寫下了這樣的話：“我懇求讀者們相信，這份譯文并非為了否認公議和民意的合法性。我只想對不顧時間和人民的條件，不顧一切地擴大公論這種錯誤的行為進行解釋。”亦可見后藤靖，《自由民権》，第39頁。

1. [[2]](#_2_35) 1877年和1880年間米價翻了一番，其他商品的價格也飛速上漲（后藤靖，《自由民権》，第135頁）。

1. [[3]](#_3_35)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832—836頁。

1. [[4]](#_4_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28頁。

1. [[5]](#_5_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29頁。

1. [[6]](#_6_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31頁。亦見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國家形成》，第42—43頁。

1. [[7]](#_7_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09頁。大隈顯然受到英國議會制度的很大影響，這是他和那些贊成普魯士模式的政治家們對立的一個揮之不去的因素。

1. [[8]](#_8_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10頁。當然，大隈的建議并沒有什么新意，只是描述了英國議會的運行方式。但是，對日本人來說，按照人民（或者，至少是選民）的愿望運行政府的觀念仍然非常陌生。我略去了一些大隈解釋的細節。

1. [[9]](#_9_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13頁。

1. [[10]](#_10_35) 后藤靖，《自由民権》，第162頁。

1. [[11]](#_11_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14頁。巖倉對這些事件的描述以及伊藤信件的原文，見多田好問編，《巖倉公実記》下，第698—700頁。巖倉說，他問過大隈他的觀點是否和伊藤1880年12月14日提交的奏折上的觀點一致。大隈回答說差異很小。幾天后，巖倉會見了三條，并建議將大隈的建議拿給伊藤看，以驗證他的觀點是否和大隈的大體相同。三條同意了，并從天皇處取來了文件。伊藤讀了文件后，非常震驚，請求辭去參議的職務。我的描述依據《明治天皇紀》，并參考了許多當代的資料。

1. [[12]](#_12_35)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國家形成》，第44頁。

1. [[13]](#_13_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18—319頁。

1. [[14]](#_14_35) 佐佐木高行，《保古飛呂比 佐佐木高行日記 十》，第152—153頁。亦見《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19頁；措辭稍有不同，但是基本意思和佐佐木的描述一致。

1. [[15]](#_15_34) William R. Braisted, trans.,Meiroku zasshi , p. 90.

1. [[16]](#_16_34) 后藤靖，《自由民権》，第45頁。三名將軍分別是山田顯義、鳥尾小彌太和三浦梧樓。

1. [[17]](#_17_3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64頁。

1. [[18]](#_18_33) 后藤靖，《自由民権》，第144—145頁。《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47頁簡要地提到了十六條規定，但是沒有詳細闡述。不過其中卻提到佐佐木高行（在巖倉具視和大木喬任的支持下）早前曾反對實施這些規定，但因為可能會激起公憤，他們的意見沒被采納。

1. [[19]](#_19_33)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02頁。

1. [[20]](#_20_32)  自由黨成立的日期有各種說法。一些資料說是1880年12月15日，即國會期成同盟的代表在東京召開大會的日子。植木枝盛在這次會議上發表演講，建議將組織的名字改為“自由黨”。許多人反對，但是，最終卻獲得表決，成功通過了成立自由黨的決議。他們在這次大會上起草了一份由四條內容構成的黨綱，并一致決定次年10月再次召開大會（《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35頁；米原謙，《植木枝盛》，第96頁）。通常說的成立日期是1881年10月29日，這是國會期成同盟和自由黨合并形成擴充后的自由黨的日期。這標志著一個比1880年達成的協議更加正式的政黨成立了。它所宣布的綱領則沒有變化（《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66頁；后藤靖,《自由民権》，第173—174頁）。

1. [[21]](#_21_32) 后藤靖，《自由民権》，第171頁。

1. [[22]](#_22_31) 米原謙，《植木枝盛》，第24頁。

1. [[23]](#_23_31) 高知藩的學校廢除以后，他被送到東京的軍校學習。軍校的授課大部分都是法語和軍事學，可能是聽不懂法語，植木輟學了。關于他的早期生活，請參考米原謙，《植木枝盛》，第17—26頁。

1. [[24]](#_24_29) 這一學派的儒家學說提倡知行合一。

1. [[25]](#_25_29) 米原謙，《植木枝盛》，第32頁。

1. [[26]](#_26_29) 米原謙，《植木枝盛》，第44頁、第52頁。

1. [[27]](#_27_28) 米原謙，《植木枝盛》，第56頁。

1. [[28]](#_28_25) 1881年2月2日的日記，見《植木枝盛集》第七卷，第258頁。

1. [[29]](#_29_25) 位于東京都臺東區淺草北部，為妓院區。——編注

1. [[30]](#_30_23) 1884年3月13日的日記，《植木枝盛集》第七卷第338頁。

1. [[31]](#_31_21) 1879年8月2日的日記，《植木枝盛集》第七卷第205頁。

1. [[32]](#_32_20) 米原謙，《植木枝盛》，第14頁。亦可見家永三郎，《植木枝盛選集》，第300頁。

1. [[33]](#_33_19) 外崎光廣，《植木枝盛と女たち》，第53頁。

1. [[34]](#_34_19) 米原謙，《植木枝盛》，第112頁。他在日記中對自己撰寫憲法的記錄非常簡潔明了：“我為日本起草了憲法”（1881年8月28日的日記，見《植木枝盛集》第七卷，第273頁）。

1. [[35]](#_35_17) 在三條實美和薩摩派參議的建議下選擇了這個日期。巖倉曾經建議議會推遲7年召開，而大木喬任則建議推遲30年。關于天皇的諭旨，見《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47頁。他說他一直希望建立憲政制度，并提到他朝著這個方向已經采取的漸進步驟，如1875年設立了元老院，以及1878年設立了縣一級的議會機構。他說1890年議會的召開將代表這個長期愿望最終得以實現。

1. [[36]](#_36_16) 馬場的日記摘錄見萩原延壽，《馬場辰豬》，第145—146頁。萩原指出，馬場的日記寫于1885年，即與板垣退助關系破裂之后，因此閱讀他關于自由黨成立（特別是他與板垣的關系）的描寫時應該多加小心。亦見米原謙，《植木枝盛》，第117—118頁。

1. [[37]](#_37_13) 根據大橋昭夫的說法，板垣（投票時他正出發去東北地區進行巡回演講）希望后藤成為“總理”，而大會也確實選了他，但是后藤卻婉拒了這個職位（《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17頁）。

1. [[38]](#_38_10) 渡邊幾治郎，《大隈重信》，第93頁。轉引自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 p. 693。大隈在寫到那些聲稱他們的政黨支持“尊重天皇”的人時，他可能想到了“立憲帝政黨”。這個右翼政黨支持成立一個由天皇授予而不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議會。1882年3月福地源一郎（櫻癡）成立了這個政黨。關于福地1880年以后的觀點的簡要敘述，請參考《福地桜癡集》第364—366頁上的《國約憲法會議ヲ開クノ議》一文。這個政黨得到了神道教神官和佛教僧侶的支持。它于1883年9月解散，但就像其他的政黨一樣死而復生，直到1940年才真正壽終正寢。

1. [[39]](#_39_9) 大橋說，盡管這一喊非常著名，但并不知道板垣是否真的喊了這樣的話（《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21—222頁）。行兇者是個小學老師，受到了《東京日日新聞》（福地櫻癡任編輯）上激烈批評板垣的文章的影響。據報道，當地醫生知道岐阜的知縣是反自由黨的，于是拒絕為板垣治療，擔心自己可能會被貼上支持自由黨的標簽。結果是后來成為杰出政治人物的醫生后藤新平為他治療。

1. [[40]](#_40_9)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87頁。一開始人們建議他派侍從長德大寺實則作為敕使去，但是天皇不同意，說派一名普通侍從去更合適。這表明他對板垣的態度有點冷淡，但是岐阜知縣（臭名昭著的反自由黨）的態度則更加冷淡。他表現得好像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似的，甚至對板垣的傷勢不聞不問。這激怒了自由黨人，他們稱這次未遂的暗殺行動是由政府唆使的。一些板垣的追隨者認為他不應接受天皇給他的300撫慰金，但是板垣斥責他們，說一名臣子不可能拒絕天皇賜予的禮物。知縣在聽說天皇送禮之后，才派人詢問板垣的傷情。

1. [[41]](#_41_9) 大橋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23頁。

1. [[42]](#_42_9) 翻譯今村和郎曾在法國學習，能夠勝任法語的翻譯。不久前，他接到井上的委任狀，在政府任職（大橋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29頁）。

1. [[43]](#_43_7) 大橋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27—228頁。

1. [[44]](#_44_7) 大橋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36頁。有關斯賓塞對板垣的見解的反應描述，見時在倫敦的日本大使森有禮寫給伊藤的一封信。

1. [[45]](#_45_7) 大橋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37—238頁。

# 第三十六章 濟物浦條約



在明治十四年的動亂事件后，1882年——至少是前半年——似乎異常平靜。和往年一樣，這一年在天皇舉行四方拜[[1]](#_1___Hugh_Cortazzi__Sir_Harry_Pa)和其他傳統新年儀式中拉開了序幕。

這一年，第一件值得關注的事件發生于1月4日。當天，天皇召見了陸軍卿大山巖，親自向他頒布了《軍人敕諭》。[[2]](#_2__Ping_An_Shi_Dai_Chu_Qi_Cuo_E)隨后，大山巖下令在軍隊中廣泛發布敕諭，并在往后的六十多年，在每年向士兵和水手發放的袖珍手冊的扉頁印刷這一敕諭，以供閱讀、銘記和遵守。

敕諭開篇稱，自神武天皇起，日本軍隊世代向天皇效勞。在古代日本，軍隊為天皇所親御，而后因長期處于太平盛世，皇室逐漸喪失兵馬大權，兵權遂落入職業軍人，即后來興起的武士之手。

近七百年來，武家不顧皇室意愿，執掌國家統治大權，然而到了弘化、嘉永時（1830年代至1840年代），幕府政治日衰。此時正值外夷叩擊國門、威脅日本安全之際，天皇祖父仁孝天皇、父親孝明天皇日夜憂慮。但是，明治仍為幸運。雖年幼登基，但幸得忠臣輔佐，政權復歸于天皇掌中，恢復古制。

在過去的十五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如今陸海軍由天皇親統，天皇向軍隊宣布：“朕既為汝輩軍人之大元帥，則倚汝輩為股肱，汝等亦當仰朕為元首，效其親愛。朕之能否保衛國家，上應天心，以報祖宗之殊恩，全視汝輩軍人之能否恪盡其職。”[[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開篇之后是五條訓諭，闡明了天皇對軍人的期望。第一條要求軍人應當對國家忠貞不渝。天皇措辭嚴厲地問道：“夫既享生于我國，其誰無報國之心？”“軍人報國之心即未能堅固，則雖技藝嫻熟、學術良優，亦猶木偶而已。”軍人須“知義有重于泰山，死有輕于鴻毛”。

第二條要求軍人以禮儀為重。下級者承上級之命，實際上無異于承天皇之命;反過來，上級者對于下級，亦不可有輕侮驕傲之舉，而必須懇切慈愛。“上下一致，以勤王事。”

第三條主要講述尚勇的重要性。好勇無謀，動輒肆威，不能稱之為勇。軍人應當恪盡職守、小敵不侮、大敵不懼、善明義理。此外，天皇還命令軍人待人接物要以“溫和”為第一，力圖博得民眾的敬愛。

第四條和第五條分別要求軍人以信義為重和以儉樸為旨。

《軍人敕諭》較之于任何國家的統帥向其軍隊頒布的命令而言，最明顯的區別在于，它強調陸海兩軍士兵直接聽命于天皇。明治天皇宣布，他倚賴陸軍和海軍，視他們為“股肱”，命令他們視天皇為“元首”，建立一個彼此依附的關系。若軍人們竭力為國，則可與天皇共其榮；若軍人們威之不振，則天皇也無法光耀四海。

《軍人敕諭》頒布幾天后，參謀總部長官山縣有朋編寫了一份《擴充軍備意見書》，并呈遞給陸軍卿大山巖。山縣有朋談到常備兵數量不足，只有四萬人。盡管征兵制度已經實行了九年，但仍沒有達到規定的人數；日本不同地區的駐軍均缺乏步兵、炮兵和工程人員。此外，外部情況絕非安定：日本與清朝、朝鮮的關系尚不明朗，琉球群島的形勢是引發沖突的潛在根源。“若夫際有事之日，始論兵備之不完，則已遲矣。故雖假令于財政上有若干之影響，仍不可不于今年度起，年年征募以至完備。”[[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山縣提到清朝和朝鮮應當引起日本的注意，因為1882年的后半年日本主要忙于處理與這兩個國家的關系。

1882年另一件大事占據了朝廷的注意力，那就是修改條約這一曠日持久的問題。日本屢次試圖修改在之前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向外國列強做出的種種讓步。盡管日本已設法使大多數國家同意修改條約，但英國仍堅決反對。

起初，明治并未直接參與處理此類問題。這個時期的官方記錄中，關于明治天皇的記載大多都是向日本國民贈送禮物和向公共機構捐款。例如，1月19日，他從內庫中拿出一千日元，贈送給位于高野山的金剛峰寺，用于重建在1843年火災中被燒毀的大寶塔。[[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明治確實在幼年就接受了佛教訓誡，但他這樣做不太可能是因為被佛教的虔誠精神所感化。[[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也許他覺得，和當代歐洲君主一樣，他愛民如子，把錢捐贈給宗教、學術協會和慈善機構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7]](#_7__Bao_Cun_Zai_Quan_Yong_Si_De)又或者捐錢重建寶塔可能反映出他有意復興過去的遺跡。

此時，天皇對保護日本傳統越來越關心。在經過一段時期不加鑒別地模仿西方教育制度后，儒家美德被重新作為教育的根基。聽到此事，天皇高興萬分。他評論說：“閱今回設立文部省之學制諸則，知朕與前任文部卿寺島宗則所論之旨，及今日終達成。”[[8]](#_8__Fu_Lan_Ke__Pu_Luo_Cha_Si_Qia)在敕諭中，他表示，盡管國民力促采用德國教育或俄國教育的一些特色，但他希望在未來的幾年，文部省不要被此類呼聲所左右，而是堅守現行制度，十年之后必定能夠證明該制度大獲成功。

此后不久，為回答天皇提出的問題，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等呈遞了關于立憲政體的意見書，確定了設立議會的時間，并向元老院遞交了憲法草案。但憲法的條文照搬歐洲憲法，并不適合于日本民眾的民族感情，不加修改就無法采用。人們紛紛就如何使憲法生效、應將哪些規定作為指導原則建言獻策。唯一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憲法是天皇御賜的，而非人民奮斗爭取的結果。而有關主權由誰掌握的爭論一直在繼續。有些人提出了主權在民的觀點，另一些人則認為應采用君民同治，還有人聲稱應由天皇獨攬大權。所有人都旁征博引歐洲的理論和制度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這些分歧使天皇陷入了苦惱，他命令三條就帝國憲法的原理、議會和皇權之間的關系以及設立議會的準備工作提交一份詳細的奏折。2月24日，三條提交了奏折，強調“君王立不可干犯之地，宰相代任其責”。三條重申，政府政策實行的是漸進式改革。他了解“天下之人心反喜急躁”，但堅信應循序漸進，因為數百年來日本都鄙視外部的一切，與世隔絕，偏安一隅；當他們突然間與外國接觸，反而走向極端，要與外國競爭，盡可能趕超對方。目前，歐洲的極端政治思想已經滲透到了城市和農村，年輕人沉醉于新奇的觀點之中。現在最需要做的就是“令平正著實先入為主，毋使其陷淺薄偏僻之流”。

三條強調維持皇室財政獨立的必要性。[[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他還認為貴族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將來的議會中組成上議院，保護皇室。貴族之下是士族，但他們因政府的變革而變得窮困潦倒。三條懇請采取措施為他們提供援助。在另行起草的一份文書中，他列舉了為著手開設議會需要采取的措施。[[10]](#_10__Tian_Huang_De_Ge_Ren_Cai_Ch)

強調保護日本傳統并不意味著朝廷拒絕向外國尋求指導。2月，元老院議長寺島宗則提議派遣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歐洲各國的憲法，以便確定哪些特色可被日本憲法所采用；他本人也將擔任全權公使為此目的赴美考察。天皇恩準了這一提議，伊藤也為此行辭去參事院議長一職。3月，就在動身前，伊藤收到了天皇列出的一長串的考察事項。

修約問題繼續困擾著日本，為討論這一問題，日本召開了關于修改條約的預備會議。井上馨發表意見說，由于外國從修改條約和放棄法外治權中得不到任何好處，為了達到目的，日本將不得不做出重大讓步。于是，他給出了兩條讓步建議。第一條是由參議山田顯義提出，主張如果外國人愿意在所有問題上遵守日本法律，則允許外國人像日本人一樣，在全日本享有生活、工作和通商的權利。[[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第二條是由伊藤博文提出，承諾給予的特權更少：允許外國人在日本內陸享有通商的權利，但前提是，如果外國人違反了行政規章或警察條例，需在日本法庭接受審判；日本政府恢復對所有民事訴訟進行裁決的權利。

3月5日，三條實美向天皇提交了兩條建議，讓天皇決定首選方案。天皇裁斷，并提出三條建議。首先，“大臣參議等去小異，就大同，一致方可全此大業”；其次，嚴加保密，“閣議貴機密，改正之議未成，不可忽泄露，釀世間紛議，如前年開拓使出售官產事件”；最后，他反對山田的提議，稱“我國民智識未及彼，財力亦頗劣，若與彼居住、經營之權，許其通商，其結果頗可憂慮。卿等宜深謀遠慮，以之為備”。[[12]](#_12__Qing_Can_Kao_You_Guan_Jin_Z)

天皇的建議未能結束爭論。井上馨夾在舉棋不定的預備會議和要求迅速采取行動的英國公使之間，最后想要辭職。三大臣竭盡全力安撫他。最后，內閣顧問中的一名德國人羅斯勒（K. F. H. Rösler）重擬了兩條提議。新擬的第一條提議允許外國人擁有“不動產所有權”，但收回“民事、刑事裁判權”。第二條提議只收回“民事裁判權”，作為交換條件，只允許外國人“內地通商”。這兩個提議被再次提交給天皇。天皇決定按照第一條提議與外國人進行公開談判，若第一條提議不成，則采用第二條提議。如果兩個提議都不成，再進一步商議，并向天皇提交商議結果。[[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4月，在條約改正的第七次預備會議上，井上馨宣讀了一份備忘書，聲稱為實現在外交關系方面的目標，日本準備向與其簽訂條約的國家做出讓步。在對此類讓步進行闡述之前，備忘書中列舉了日本的現代化以及日本有資格與大國平起平坐的證據：日本一直遵循全世界公認的法律和道德準則；已經結束了封建制度，讓所有人享有平等權利；對政體進行了改革，并分離了行政和司法體系；推廣教育，放寬對基督教的禁令；建立了郵政系統，加入了萬國郵政聯盟；建立了電報系統、鐵路系統，并沿海岸建造了燈塔；制定了刑事法典和上訴法。并且，日本并不滿足于所取得的這些成就，而是要爭取更大進步和改善，并希望與所有國家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系，增進互惠互利。

備忘書繼續說道，但不幸的是，在與外國人建立友誼和進行通商的道路上依然障礙重重。按照現行條約，外國人不得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生活或通商。一直以來，日本政府都在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消除這些障礙，深信現在恰逢其時。在外國人遵守日本法律的前提下，日本允許外國人在全國自由旅行、在他們喜歡的地方生活、擁有動產和不動產、進行通商和經營產業；在新制度生效的當天，外國公民將受到日本法律管轄，此類管轄雖與他們在通商口岸受到的管轄不同，但將是公平的。這種公平性將會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并將徹底改變日本人和外國人之間的關系，在二者之間建立起友誼。隨著自由通商的開展和外國資本的流入，將會帶來工業和貿易的繁榮，而這將會創造一個大規模的進口商品市場。[[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6月1日，井上在預備會議上正式提交了一項修改條約的議案（該議案以他在4月份發表的備忘書作為依據）。議案規定：在新條約簽署五年后，將向外國人開放日本全國，允許外國人按意愿在任何地方旅行、生活和工作，在通商或就業方面享有和日本人同等的權利；為減輕外國人對日本法律的擔憂，日本將全力獲取外國人的信任；新法完全采用在西方盛行的法律原則作為依據，日本將把所有法律和法規翻譯成至少一種歐洲語言，并進行分發；外國法官可以與日本法官一同進行審判；在陪審團制度適用的情況下，若案件涉及外國人，將由部分外國人擔任陪審員。

在宣讀議案的時候，德國公使立刻對議案的互惠互利方案大加贊賞，尤其是對向外國人提供的慷慨擔保稱贊不已。他說，他將向德國政府匯報議案的內容，并建議修改條約。接著，比利時、葡萄牙、奧匈帝國、荷蘭、西班牙、意大利和俄國的公使紛紛贊成德國公使的意見。美國公使贊揚日本方案的合理性，并說他很樂意建議美國政府接受該方案。他還補充說，取消治外法權將會減輕日本民眾的不滿和痛苦，維護與日本人民的友好關系，推動商業和貿易的開展。只有英國公使哈里·巴夏禮爵士拒絕同聲同氣地稱贊該議案，說他將對該議案進行仔細研究。[[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7月18日，巴夏禮在預備會議上回答說英國政府堅決反對井上的提議，并呈上了一份意見書說明原因。他說，盡管日本自批準新條約之日起將擁有管轄權，但在五年期限中日本不會給予外國人所承諾的特權。在此期間，外國人享有的唯一好處就是可以在日本內陸自由地進行公務旅行；外國人不能在日本內陸生活、擁有不動產或在日常活動中使用外國貨幣。此外，日本承諾的司法制度和裁判方法含糊不清，完全不足以對外國人的權利和利益進行保障。由于日本政府尚未制定民法典或商法典，新的刑法也僅僅實施了一年而已，英國政府極難對新法是否有效做出判斷。他預計批準該提議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此建議日本政府和其他當事國謹慎處理。巴夏禮認為，當前提議沒有獲得英國民眾的信任，無法吸引日本今后發展繁榮所需的外國資本流入日本。[[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他引述“一位有才干的日本國際法學家”在1879年底發表的言論說，“法律并沒有對日本民眾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給予適當保護，在獲得日本民眾的普遍認可之前還需要進行重大改革”。[[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盡管英國是唯一一個公然反對該提議的國家，但巴夏禮的話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建議各國公使一起討論該議案，然而，公使們都決定不再討論，而是向各自的政府上報此事。因此，7月27日，第十六次預備會議就這樣結束了。

在看過巴夏禮對井上取消治外法權的提議提出的異議后，很難不承認他的論點有理有據。無論是巴夏禮還是英國政府，都覺得沒有理由急著修改條約，在不能完全確定新制度將會讓他們享有同等有利條件的情況下，他們不愿貿然放棄既有權利。在意見書中，巴夏禮說自己體恤日本人民徹底廢除領事裁判權的愿望，可他的體恤之情似乎并不深。他似乎沒有像美國公使（約翰·賓漢姆，John Bingham）那樣覺察到日本民眾對外國政府強加的治外法權感到不滿。外國政府施加治外法權明白無誤地表明它們認為日本尚未開化。巴夏禮引述的“一位有才干的日本國際法學家”的那番話，雖然并沒有暗示出日本人民有不滿情緒，但較之于對新法的不確定，日本民眾感受更為強烈的大概還是這種憤恨之情。總之，巴夏禮正在維護一個日本民眾都討厭的制度，該制度否定了自明治維新時起日本所取得的一切。

與此同時，日本民眾的注意力也從由來已久的修約問題轉向了迫在眉睫的事情——7月23日，漢城爆發了朝鮮士兵起義。起義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下令改革軍隊，導致民眾心生憤恨。1881年底，朝鮮高宗及其正室閔妃[[18]](#_18___Min_Fei__Zong_Shi_Bei_Dang)為推動朝鮮的現代化，邀請日本公使館的武官堀本禮造中尉擔任教官，建立一支現代化軍隊。一百名年輕的貴族弟子接受了日式軍事訓練，舊式軍隊的士兵知道這支年輕軍隊的裝備和待遇遠在自己之上，十分惱怒。他們中有一千多名年老病殘的士兵在改造軍隊的過程中被迫解甲，而其他士兵已經有十三個月沒有領到糧餉，6月，在得知這一情況后，高宗下令向士兵發放一個月的糧餉。他命令宣惠廳堂上[[19]](#_19__Zhao_Xian_Guan_Zhi__Xiang_D)閔謙鎬發放糧餉，閔謙鎬將此事交由家仆負責，家仆則將賜予的好米售出，用所得的錢購買谷子，并在其中摻雜礫石和糟糠。這些食物腐爛惡臭，根本沒法吃。[[20]](#_20__Woonsang_Choi_Cui_Wen_Heng)

憤怒的士兵沖向閔府，因為他們懷疑閔謙鎬騙取了他們的大米。閔謙鎬得知有人反抗，下令捕盜廳逮捕了一些為首鬧事的士兵，并宣布在第二天早上斬首示眾，以示懲戒。但是，在聽說此事后，士兵們沖進閔府進行報復。閔謙鎬不在府中，士兵們只能通過破壞家具和其他財產來泄憤。

起義士兵轉移到武庫，在那里盜取了武器和彈藥。戴著從軍以來最好的一次裝備，他們前往監獄（義禁府），不僅釋放了那天被閔謙鎬關押的犯人，還釋放了很多政治犯。正在宮中的閔謙鎬召集軍隊鎮壓起義，但一切為時已晚：隨著城市貧民和其他反抗者的加入，起義者的隊伍不斷壯大，已變得聲勢浩大起來。

一隊起義者前往堀本中尉的府邸，輪流刺向這位嚇得縮成一團的軍隊教官，慢慢將其殺死。[[21]](#_21__Pian_Ye_Ci_Xiong____Li_Zhao)另一路人馬約三千來人，身強力壯，在掠奪武庫、奪取武器后前往日本公使館。王宮立刻將消息告知公使館并稱國王無力鎮壓起義者。[[22]](#_22__Jiao_Tian_Fang_Zi____Min_Fe)日本公使花房義質（1842—1917）和十七名使館人員及十名警官正在公使館內。起義者圍攻了公使館，叫喊著要殺光日本人。

花房下令燒毀公使館。公使館書記立刻將油潑在重要文件上，放火焚燒。火勢迅速蔓延，在火焰和煙霧的掩護下，花房等人從后門倉皇逃離。他們逃到港口，登船從漢江前往仁川。起先，他們在仁川府使的官邸避難，但是，當漢城起義的消息傳來時，官邸主人改變了態度。日本人意識到此地不再安全，冒著暴雨逃到港口，朝鮮士兵窮追不舍。六名日本人被殺，另有五名身受重傷。幸存者帶著傷員登上一艘小船往公海駛去。三天后，他們被一艘英國測量船“飛魚”號（"aid-AO6"）搭救。[[23]](#_23__Ru_Xu_Le_Jie_Guan_Yu_Ci_Lei)

7月24日，就在襲擊日本公使館后的第二天，起義者闖入王宮。他們找到并殺死了閔謙鎬和十多名高級官員，并四處搜尋閔妃，要殺死她。因為閔妃屬于他們憎惡的閔氏外戚集團，并且完全操縱著腐敗的政府。閔妃化裝成宮女，一位忠誠的侍衛背著她，謊稱是自己的妹妹，從而僥幸逃脫。[[24]](#_24___Jiao_Tian_Fang_Zi____Min_F)

起義者中有一名王室成員，即高宗的生父興宣大院君。[[25]](#_25__Ren_Men_Du_Yong_Zhe_Yi_Tou)他憎惡閔氏外戚集團，因為他們推翻了他的王權統治。[[26]](#_26__1863Nian__Zhao_Xian_Zhe_Zon)由于沒有閔妃在身旁指點，倒霉的國王再次向父親求助，請求父親出面主政，于是，興宣大院君在退隱九年之后終于如愿以償復位。他執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為閔妃（人們推定閔妃已死于宮廷襲擊事件之中）舉行國葬，并廢除了由日本人訓練的現代軍隊。

花房回到了日本。我們可以想象日本政府聽聞這一消息后會有多憤慨。8月30日，井上馨召開了內閣特別會議。天皇命井上前往下關負責處理危機，還命令海軍少將仁禮景范準備四艘軍艦，陸軍中將高島鞆之助派一個大隊的步兵，在常駐公使花房重返朝鮮復職時作為護衛隊共赴朝鮮（并保護朝鮮的日本僑民）。

8月2日，井上離開東京。他在下關和花房見面，并交給花房一份指示，其中描述了朝鮮暴徒的惡行引發的憤怒和對日本國家聲譽造成的侮辱，并指責朝鮮政府怠于鎮壓這些不法分子，未能足夠重視兩國應有的睦鄰關系。但是，考慮到朝鮮人民的民族感情，日本政府認為此時興師問罪稍嫌過早。公使將重返漢城，因為無法預測起義者是否還會發起新一輪的暴行，他將受到陸軍和海軍的保護。

花房接受的命令是，在漢城會見朝鮮高級官員，勸說他們確定一個日期，按照令日本政府滿意的方式處置起義者。如果起義者膽大妄為、發起突然襲擊，那么無論朝鮮政府采取哪些措施，日本都將被迫使用武力進行鎮壓。

雖然現階段沒有戰爭的危險，但卻隱藏著危機。花房收到的指示中還包括下面這條命令：如果有任何跡象表明朝鮮政府藏匿罪魁禍首而不施以懲罰，或者拒絕參加日本提出的談判，那么此舉顯然意味著朝鮮政府破壞了兩國和平。在此情況下，公使可以向朝鮮政府發出最后通牒，揭發其罪行，并立即動身前往仁川，陸軍和海軍隨即將占領仁川港。到達仁川后，公使將立刻向東京進呈詳細的奏折，并等待進一步的指示。如果清朝或其他國家站出來調解爭端，應予以拒絕。不過，這些指示以一個出人意料的溫和論調結束：日本政府并不認為朝鮮政府有意破壞兩國的和平關系，因此，公使應真心實意地努力恢復兩國的傳統友好關系,以當前事件為契機，努力促使兩國達成永遠的和平。[[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盡管最后的言論稍顯樂觀，但在8月初，日本政府下令征召常備兵。井上馨將日本政府決定向朝鮮派遣軍隊和軍艦以保護日本僑民一事告知了住在東京的各國公使。他強調說，政府的意圖完全是為了和平。然而，美國政府提出進行調解的建議立刻遭到了日本的拒絕。[[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由于擔心局勢的發展，天皇派侍從長山口正定作為敕使前往朝鮮。山口一直留在朝鮮，直到簽署《濟物浦條約》[[29]](#_29__Ji_Wu_Pu_Shi_Han_Cheng_Gang)為止。

日本和朝鮮在就條約的條款進行談判時，國內出現了很多關于迫切需要增加軍備的討論。支持者指出，派往朝鮮的四艘軍艦就是日本的全部海軍，沒有留下一艘來保衛日本。山縣有朋向天皇遞交了一份請愿書，呼吁擴張軍備，建議通過增加煙草稅來滿足軍備開支。8月16日，天皇向巖倉征求意見。巖倉回復道，如果清朝繼續視朝鮮為藩屬國，那么與清朝開戰將不可避免。現在有必要為戰爭籌建軍隊，他請求天皇頒布密令。8月19日，山縣向巖倉發函一封，其中稱，“與清國開戰以今日為好機”。[[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8月22日，在兩個中隊的護送下，花房進入漢城王宮。他向朝鮮國王提出了日本的一系列要求，并限國王在三日內做出答復。此類要求包括就燒毀日本公使館賠償五十萬日元。國王命令其政府限期做出答復，興宣大院君立刻召開議政府會議。然而，日本提出的不合理的賠償數額（五十萬日元相當于朝鮮政府全年總收入的近六分之一）激怒了議政府成員，朝鮮政府并沒有做出答復。花房認為朝鮮政府不太可能會滿足日本的要求，遂決定前往仁川。戰爭似乎不可避免。花房按照井上的指令，在離開漢城前向朝鮮國王發出最后通牒。國王立刻致函花房，懇請他回來，但花房沒有改變主意。花房從一位名叫洪淳穆的政府成員手中收到一封很是失禮的信，洪淳穆公然宣稱朝鮮不會按照日本的要求“派高官謝罪”，這激怒了花房。[[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8月25日，花房抵達仁川。第二天，洪淳穆致函花房，稱他打算辭職并請求進一步會談。花房同意等兩天再起航。

此時，閔妃在其藏身之地向朝鮮國王修書一封，力促他請求宗主國——清朝——出兵朝鮮鎮壓起義，這一意料之外的舉動讓局勢變得復雜起來。朝鮮國王一如既往地聽從了閔妃的建議，派密使前往天津聯系駐津的兩名朝鮮高級官員。官員前往北京，將朝鮮國王向清朝請兵一事告訴了李鴻章。李鴻章絲毫沒有猶豫：這是恢復大清對朝宗主權的大好時機，數年來，大清宗主權喪失頗多。

清朝立刻召集一支由三艘軍艦和六艘商船組成的艦隊前往朝鮮。這些載有四千名士兵的船艦將在仁川會合。有了這支軍隊，清朝可以輕而易舉地奪取仁川，但是，士兵們聽從了李鴻章下達的命令：“不得與日本制造不必要之事端”。當清軍看見位于仁川港的日本軍艦“金剛”號時（該軍艦比其他日本軍艦提早抵達），先是撤離，但在8月22日又返回仁川港，軍隊中有近兩百名士兵在第二天登陸。

清朝通知花房，他們此行是為了鎮壓藩屬國的兵變。花房認為朝鮮是一個獨立國家，聲稱目前日朝關系緊張與清朝無關。清朝提議合力鎮壓起義，但花房回復說，他正在等待朝鮮答復他的最后通牒，任何國家都不要干涉。

清朝只好接受日本不愿合作的態度，開始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動路線。清朝派遣三名海軍提督禮節性地會見了興宣大院君。在準備離開時，他們請興宣大院君在清軍大營參加重要會議。出于禮節規定，興宣大院君答應回訪，并按要求于第二天（9月26日）前往清軍大營。雖說這是清朝和朝鮮之間常見的禮尚往來，但一看見信號（舉杯恭祝興宣大院君長壽），清兵立即沖進房內，逮捕了興宣大院君，將他塞在轎子里，運到清軍“威遠”號軍艦上，并押到清朝。直到軍艦抵達天津，興宣大院君才從轎子里出來。李鴻章對興宣大院君進行了審問，試圖讓他承認自己是兵變的罪魁禍首，但未果。李鴻章命人將興宣大院君塞回轎子，轉運到北京西南約一百公里的一個縣城。此后三年，興宣大院君被軟禁在一間屋子里，嚴加看管。[[32]](#_32__Pian_Ye_Ci_Xiong____Li_Zhao)

最有威望的人物興宣大院君都無法反抗之后，朝鮮政府別無選擇，只得與日本談判。8月30日，日朝簽署了《濟物浦條約》，正式結束了兩國之間的緊張關系。條約規定：（1）朝鮮政府將在二十日內逮捕和嚴懲殺害日本人的暴徒；（2）朝鮮政府優禮瘞埋日本遇害者，以厚其終事；（3）朝鮮政府向死傷的日本遇害者家屬賠償五萬日元；（4）朝鮮政府應就暴徒給日本公使館造成的損害及水陸兵費賠償五十萬日元，每年支付十萬日元，五年付清；（5）為日本公使館配備兵員若干以示保護。

這一事件激發了日本民眾的愛國熱情，一些人自愿應征入伍或者解囊為軍費籌資。9月28日，花房返回橫濱，搭乘專列回到東京，受到了半個排騎兵的迎接。天皇在宮中接見了花房，并授予他勛二等旭日重光章。

朝鮮高宗對最近發生的不幸事件表示遺憾，派遣三名高級官員表達歉意并贈送禮物。天皇接見了朝鮮公使樸泳孝，樸泳孝向天皇呈遞了一封朝鮮國王的信函。在信中，朝鮮國王稱贊天皇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并請求維持和平與長久友誼。[[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11月3日，在朝鮮被殺的堀本中尉和其他日本人被供奉到靖國神社。11月17日，天皇向搭救了花房等日本人的“飛魚”號船長賞賜了一對青銅花瓶和幾本書，包括一本關于古代征服朝鮮的書籍。12月，樸泳孝及其同僚準備離開日本時，受到天皇接見。天皇對他們的離開表示遺憾，并請他們向朝鮮國王傳達友誼之情。他還賞賜了五百挺槍，令他們轉交朝鮮國王。無疑，此舉暗示天皇希望他們能將這些槍用于鎮壓日后的起義。樸泳孝說，對朝鮮來說，沒有什么能與槍支更重要了，他確定朝鮮國王收到這份大禮會十分高興。[[34]](#_3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樸泳孝還向天皇口頭稟報了朝鮮的近況，并懇請日本向朝鮮提供經濟援助，以幫助朝鮮維護國家獨立。回到朝鮮后，樸泳孝和金玉均（1851—1894）組建了新的開化黨，以期在日本的幫助下使朝鮮擺脫清朝統治的枷鎖、破除積弊。對于他們來說，日本就是他們期望在朝鮮開展的文明開化運動的楷模。[[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盡管一些日本政府成員警告說，不要挑唆清朝發動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但這一年在天皇頒布的相當樂觀的詔敕中畫上了句號。[[36]](#_36__Zhe_Shi_Yan_Cang_Ju_Shi_De)1882年12月23日，明治天皇頒布敕諭，開篇寫道：“保全東洋全局之和平乃朕切望之所在。而今次因朝鮮倚賴，以鄰交之好誼，助其自守之實力。且涉政略，以使各國認其為獨立之國。”此番言論中透露出的信號，成為引發十二年后日清戰爭的一大原因。

1. [[1]](#_1_36)  Hugh Cortazzi, Sir Harry Parkes, p. 15. 此處引述的話語來自于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aid-ARR", 2, p. 319-322。

1. [[2]](#_2_36) 平安時代初期嵯峨天皇開始的一種新年儀式。天皇向四個方位的神靈朝拜，祈求國泰民安、五谷豐收。——譯注

1. [[3]](#_3_3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00頁，“軍人”自然包括海軍和陸軍。

1. [[4]](#_4_3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01—602頁。

1. [[5]](#_5_3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08頁。

1. [[6]](#_6_3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17—618頁。

1. [[7]](#_7_36) 保存在泉涌寺的一個文殊菩薩小雕像據說是明治的私人護身符。泉涌寺位于與皇室關系密切的京都真言宗古剎內（照片請參閱《皇族の御寺》，第36頁）。與佛教真言宗派的關系促使明治積極地在高野山重建寶塔。對于重建西教寺——一個重要的天臺宗寺廟，明治只提供了50日元（《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51頁）。明治并非捐贈寺廟的唯一皇室成員，皇太后和皇后也捐贈500日元用于重修位于京都的臨濟宗派禪寺——東福寺（第690頁）。

1. [[8]](#_8_36) 弗蘭克·普羅查斯卡（Frank Prochaska）在《皇室恩賜》（Royal Bounty ）中描述了英國皇室（主要在19世紀）向學校、醫院、孤兒院和其他慈善機構贈送的禮物。明治偶爾向學校和醫院捐錢。1881年8月5日，傳染病流行期間，明治私掏腰包向東京都捐贈了7萬日元的巨款，用于衛生和疾病防治。（《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36—737頁）1882年7月27日，霍亂蔓延期間，他捐贈了1000日元用于疫情救援（《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47頁）。他甚至越來越頻繁地為宗教或科學組織慷慨解囊。例如，1882年2月3日，天皇同意每年向皇典講究所——一所為教習日本經典、神道教、儀式、音樂和武術等而新成立的研究機關——資助2400日元，為期10年（《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24—625頁）。

1. [[9]](#_9_3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33頁。

1. [[10]](#_10_36) 天皇的個人財產是常常需考慮的問題。原則上，日本的全部土地均為王土，但并沒有文件規定。在1872年廢除《禁止田地永久買賣法令》后，即使是平民也能擁有土地的所有權。1876年，木戶孝允意識到皇室擁有適量財富的重要性。木戶說，如果親王和皇室成員住不起與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宅邸，又該如何維護他們的尊嚴？在全世界還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皇室擁有如此之少的財富（《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44頁）。

1. [[11]](#_11_3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40—641頁。

1. [[12]](#_12_36) 請參考有關禁止外國人在日本內陸旅行的限制。外國人可以因“健康、衛生研究或科學調查”等申請頒發護照。1878年，伊薩貝拉·伯德（Isabella L. Bird）持因哈里·巴夏禮爵士代為求情而獲得的護照從東京前往北海道，她詳述了護照封面用英語載明的旅行條件：持有者禁止在林中點火；禁止騎馬進入火災現場；禁止非法侵入田地、圈地或禁獵區；禁止在寺廟、神社或墻壁上亂寫亂畫；禁止在狹窄的道路上快速行駛；禁止無視“不準通行”的公告；持有者必須“遵守秩序，對日本政府和民眾客氣”；“凡官員有要求的，必須向官員出示護照”，違者將被拘捕；在內陸時，“禁止射殺，禁止與日本人通商或訂立貿易合同，禁止房屋或客房的租賃期限超過逗留時長”。（Unbeaten Tracks in Japan , p. 33-34）

1. [[13]](#_13_3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57頁。

1. [[14]](#_14_3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58頁。

1. [[15]](#_15_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83—684頁。

1. [[16]](#_16_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12—713頁。

1. [[17]](#_17_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43頁；另請參閱Hugh Cortazzi,Sir Harry Parkes , p. 15。

1. [[18]](#_18_34) “閔妃”總是被當做其名字，但“閔”是她的姓氏，如同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被稱為“哈布斯堡王朝皇后”一樣。

1. [[19]](#_19_34) 朝鮮官職，相當于財政大臣。——譯注

1. [[20]](#_20_33) Woonsang Choi（崔文衡）,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17；《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46頁；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56頁。

1. [[21]](#_21_33)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57頁。

1. [[22]](#_22_32)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115頁。盡管本書以小說的形式寫成，但很顯然是一部嚴謹的研究成果。

1. [[23]](#_23_32) 如需了解關于此類事件的不同描述，請參閱Hilary Conroy,The Japanese Seizure of Korea , p. 102。

1. [[24]](#_24_30)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121頁；另請參閱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18，以及Kibaik Lee（李基白）, "aid-ASK", trans. Edward W. Wagner, p. 273。

1. [[25]](#_25_30) 人們都用這一頭銜來稱呼他，他是朝鮮國王的生父，但未曾登過基，本名叫李昰應。

1. [[26]](#_26_30) 1863年，朝鮮哲宗李昇駕崩，因其早逝無子，出生皇族的李熙即位（即朝鮮高宗）。因其當時年僅十一歲，其生父大院君李昰應攝政。1873年，高宗的王妃閔妃以“國王親政”為由，排斥大院君勢力，奪取大權。閔妃在宮中形成了閔氏外戚集團，但大院君不甘退出政治舞臺，由此朝鮮國王室形成了以閔妃和以大院君為首的兩個勢力集團，彼此形同水火，不斷內斗。——譯注

1. [[27]](#_27_29)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50頁。

1. [[28]](#_28_2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52頁。

1. [[29]](#_29_26) 濟物浦是漢城港口仁川的舊稱。

1. [[30]](#_30_24)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59—762頁、第766—767頁。

1. [[31]](#_31_22)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71頁。對于花房離開漢城的直接原因說法不一。根據崔文衡的說法，是因為花房要求對日本遭受的損失予以賠償，興宣大院君“反駁道，倘若日本堅持要朝鮮政府賠償，則朝鮮政府認為有必要對在朝開展貿易的所有日本商人征稅”（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18）。片野則認為，在規定的三天期限過去后，花房得知由于要為閔妃舉行葬禮，他將無法得到朝鮮的答復（《李朝滅亡》，第68頁）。他憤怒于朝鮮將內部事務看得比他的事情要重，于是叫嚷著他已經放棄了和平解決此次危機的希望。根據崔碩莞的說法，花房的要求讓朝鮮朝廷大吃一驚，尤其是三天的答復期限（《日清戦爭への道程》，第33頁）。由于國內形勢緊迫，朝鮮國王派去答復花房的洪淳穆試圖獲準延長期限，但花房將此舉解釋為朝鮮不愿認真談判，于是在8月22日向朝鮮國王發出最后通牒后前往仁川。

1. [[32]](#_32_21)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61—63頁。

1. [[33]](#_33_20)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800頁。

1. [[34]](#_34_20)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818頁、第838頁。

1. [[35]](#_35_18)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840頁；Kibaik Lee,A New History of Korea , p. 276。

1. [[36]](#_36_17) 這是巖倉具視的觀點。（《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841頁）

# 第三十七章 巖倉逝世



熟悉的新年儀式揭開了1883年的序幕。1月4日，天皇參加了本年度元老院的第一次會議；1月18日，在第一次宮廷詩會上，天皇以“四海清”為題創作了賀歲和歌。

這一年，天皇似乎恢復了騎馬的愛好：他騎馬五十一次，通常在騎馬后前往青山御所看望皇太后，或者在新宿御苑的涼亭里飲酒聚會。

天皇偶爾也在青山御所或者1881年4月16日開放的芝公園的能樂劇院內觀看表演。1883年5月23日，天皇和皇后以及皇室成員、參議、宮內省官員等在青山御所觀看了一場由八出能樂和六出狂言組成的精彩演出。能樂似乎正被再次認可為皇室的官方戲劇，然而，盡管皇太后——能樂演出的最慷慨資助人——平時向表演者贈送禮物，但并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持表演者或培養接班人。直到二十世紀初，能樂表演者的生計才有了經濟上的保障。[[1]](#_1__Ya_Le_Le_Shi_Shou_Dao_Zheng)

較之于這一年為天皇舉辦的講課，大概能樂給天皇帶來的樂趣更多些。這一年的講座有元田永孚講解《論語》的部分內容、西村茂樹講授日文翻譯的布隆赤里（J. K. Bluntschli）的《國法泛論》（Allgemeines Staatsrecht）、高崎正風講解《古今集》的序言、川田甕江講授唐朝政論性史書《貞觀政要抄》。

盡管1883年以充滿希望的方式開了頭，但卻打上了天皇個人悲劇的烙印。1月26日，權典侍千種任子[[2]](#_2__Ren_Zi_Shi_Gong_Qing_Qian_Zh)產下天皇的第四女章子公主。1880年8月3日千種任子生下第三女韶子公主。韶子在襁褓中患上了腦膜炎，但治療后有了起色，看起來已經痊愈。隨著章子的出生，天皇有了三個孩子——嘉仁王子和這兩位公主。然而，喜悅并沒有持續多長時間。8月，（據說）夏季的極端高溫導致韶子公主疾病復發，這一次宮廷醫師們竭力挽救她的性命，但無力回天。9月6日，韶子公主病逝。襁褓中的章子公主自出生起便患上了格魯布性喉頭炎，9月1日開始出現慢性腦膜炎的癥狀。天皇派御醫前來治療，但治療毫無起色，于是他命令陸軍軍醫總監橋本綱常（1845—1909）為公主治病。就在姐姐離世兩天后，章子公主也夭折了。[[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天皇的七個孩子中已有六人在嬰兒時期夭折。雖然史料中通常都沒有記載他對子女的離世有何反應，但面對這次雙重打擊，他顯然悲痛欲絕。天皇取消了一天的奏事議政，下令停辦歌舞三天，以示哀悼。他還命令軍隊降半旗致哀，鳴炮致以隆重的悼念。舉行葬禮那天，人群聚集在街頭，悲哀痛惜地看著小小的棺材被抬進陵墓。

由于未能治愈這兩位公主，皇室子女的侍醫淺田宗伯[[4]](#_4__Han_Fang_Yi_Shi_Qian_Tian_Zo)請求辭職。他把失敗歸咎于交替嘗試中醫和西醫。但是，盡管近期發生了這樣的悲劇，天皇仍相信應該使用中醫和西醫來治療疾病。他任命受過西方教育的橋本擔任宮中醫務局長。[[5]](#_5__Qiao_Ben_Gang_Chang__1845__1)橋本和另兩名接受西方教育的醫生[[6]](#_6__Ta_Men_Shi_Du_Ceng_Jie_Shou)需咨詢學習傳統醫學的醫師，以制訂治療方案。在兩位公主死后，天皇比以往更關心他僅剩的一個孩子——王儲。自出生時起，這個孩子的健康就是一個大問題。[[7]](#_7__1884Nian_12Yue__Jia_Ren_Wang)

這一年，天皇的健康也出現了問題：9月，他的腳氣病又犯了。幸運的是，天皇的腳氣病并非致命性的，但醫師們認為東京是最易發生感染的危險地區，天皇的腳氣病很可能會發展成致命性的。他們建議在距離東京一百多公里、環境優美、空氣清新的地方修建一座離宮，促請天皇在每年的危險時節離開東京。[[8]](#_8__Tian_Huang_De_Jiao_Qi_Bing_K)不用說，明治又沒有理睬他們的建議。

侍醫們也對六位王子和公主的夭折深感悲痛，他們都是同一種疾病的受害者：腦膜炎。侍醫們認為，將來出生的皇室嬰孩應采用不同于傳統宮廷習俗的方式來撫養。他們建議修建一座宮殿，以便孩子們避暑。更重要的是，他們將王子、公主的早逝歸咎于先天性身體虛弱，并建議從確認母妃懷孕起便采取所有可行的預防措施。天皇欣然同意了這些建議，隨后在箱根建造了一座宮殿，在日光市和其他地方修建了住處，當侍醫認為天皇側室產下的皇室子女需要移地療養時，這些子女將被送往此類住處；但天皇卻對自身的健康狀況關注甚少，從來沒在此類住處待過。若是天皇能夠設法遠離朝事幾日、視察一下軍事演習，對他來說似乎已經是最快樂的事情了。[[9]](#_9__Li_Ru__Cong_4Yue_16Ri_Dao_20)

1883年上半年，伊藤博文仍在歐洲考察各國憲法，以期為日本將來制定憲法找到合適的模本。伊藤大部分時間待在德國和奧地利，他認為這些國家的憲法最符合日本的需求。兩名憲法學者——魯道夫·馮·格耐斯特（Rudolf von Gneist）[[10]](#_10__Yu_Yi_Teng_Ju_Jian_Ta_Shi_D)和洛倫茨·馮·施泰因[[11]](#_11__Shi_Tai_Yin__1815__1890_Shi)給伊藤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邀請施泰因同他一道回日本，擔任籌備憲法和制定日本大學教育政策的顧問。

施泰因拒絕了邀請，聲稱自己年事已高，無法出國游歷，還說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必須以該國的傳統為依據。他認為，如果有人覺得借鑒其他國家的法律是明智之舉，那么首先必須溯本追源地探究這些法律存在的緣由，研習這些法律的歷史，再判斷這些法律是否適用于自己的國家。[[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聽到這一答復，伊藤更加佩服施泰因了，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施泰因不會前往日本。伊藤詢問俾斯麥能否推薦其他人來代替施泰因。俾斯麥在高度贊揚了日本所取得的進步后，提到了三名學者。伊藤立刻給內閣發電報，請求獲得授權邀請這些學者。外務卿井上馨給伊藤回了封電報，同意他委任這些學者，但警告說日本不應受到俾斯麥和德國勢力的過度影響。井上回想起日本邀請法國官員訓練日本軍隊時的情景，法國官員堅持事無巨細都應遵循法國的做法，從而導致與陸軍卿意見不合。井上說，不管怎樣，政府的用意并非采用純德國式的憲法和法律，并建議伊藤仔細挑選擔任日本公職的德國顧問，此類顧問應能夠按照合同條款有效地履行義務。

盡管此番言論明顯流露出對伊藤的設想缺乏熱情，但伊藤沒有放棄希望從德國和奧地利的法律專家那里獲得建議的想法。10月10日，天皇同意委任施泰因成為日本駐奧地利公使館的一員，任命其作為顧問，以解決與日本法律制度有關的問題。[[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8月初，伊藤及其使節團隨員從歐洲返回。他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歷訪德國、奧地利、英國、法國、俄國和意大利，考察它們的憲法。伊藤告訴巖倉，他已經從格耐斯特和施泰因那里了解到了國家機構的一般原理，掌握了奠定皇室根基的必要知識。他認為，建立君主立憲制、完善皇權制度、制定立法和司法制度的時機已經成熟。很多日本民眾受到英法兩國極端自由主義的誘惑，為了限制這些人，最好的辦法就是采納他的提案。

伊藤的腦子里關注更多的是日本的未來，以至于似乎沒有注意到日本的傳統正在被迅速侵蝕。日本當然也在努力恢復節日和其他傳統信仰。[[14]](#_14__Li_Ru__Hui_Fu_Zai_Ming_Zhi)7月20日，巖倉具視離世，這也許象征著日本與過去徹底告別。1854年，巖倉被任命為孝明天皇的侍從，當時明治只有兩歲。那可能是巖倉在天皇的記憶中留下的最早印象。從那時起，巖倉便在對君主政體造成影響的幾乎每一個重大事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盡管他出生于公卿中的底層，但他是貴族，這一差別將他與明治政府的多數成員區分開來。也正是這一差別導致了他不時和武士階層發生沖突，[[15]](#_15__Zheng_Lun_De_Yi_Ge_Jiao_Dia)然而，這也使得巖倉與天皇建立了特殊關系。與其他貴族（如熾仁親王或三條實美，這兩人的地位都比他高）相比，他是明治政府中更為活躍的人物。

在5月的時候，巖倉曾前往京都，監督皇宮修復方案的實施。天皇越來越關心失修問題，不僅僅是皇宮，也包括整個京都市。當巖倉提議采取措施以防止發生進一步毀損時，天皇欣然恩準。[[16]](#_16__Bei_Lu_Xun_Xing_Shi__Tian_H)于是，天皇派遣巖倉和其他官員前往京都視察情況。

巖倉的方案包括：在內務省建立一個分支機構，以管理宮廷、皇家花園、離宮和陵墓；建立一個分支機構負責該地區的神社和寺院；恢復節日，并在御所修建神社，紀念被尊為京都創始人的恒武天皇；修建道路，劃分御所周邊曾矗立著貴族宅邸的地區；大力植樹；改造溝渠，清潔河道；拆毀不必要的建筑；修復修學院離宮；正式承認二條城為離宮；在外國貴賓可能駐留的鴨川一帶建造西式建筑。[[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最終，這些方案得以實施，有利于扭轉京都的持續衰落趨勢。即使巖倉感到胸口疼，即便他患上了急性幽門狹窄無法進食或喝水，但對這項工程的熱情使他繼續堅守崗位。天皇得知巖倉的病情后，十分擔心，立刻派御醫伊東方成前去問診。

巖倉的病情有所好轉，使得他能夠返回東京，但抵達后病情復發。7月5日，天皇擔心巖倉的健康，表示想去病房探視。出于敬畏和擔憂，巖倉派其子前去回絕這份殊榮，但那時已經來不及了：鑾駕已經到達。連忙更換好衣服的巖倉從病床上起來，在兩個兒子的攙扶下走近天皇，以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看到巖倉身體虛弱，天皇于心不忍，熱淚盈眶。

一周后，當得知巖倉仍沒有好轉的跡象時，皇后決定去看望他。“然而，”皇后說，“右大臣恭敬重禮，聞之必用心送迎，反害病癥，此非余之本意。余今日以一條忠香之女探望卿之病情，則可于病床相見。”[[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7月19日，天皇再次前去探望巖倉。在準備離開皇宮時，他告訴德大寺實則：“朕欲親去與右大臣永訣。”他叫人備好御輦，沒等護衛到齊便離開了皇宮。一名侍從武官走在天皇的前面，通知巖倉天皇隨后就到。巖倉感激涕零。當天皇到達時，巖倉想起身鞠躬，但病重身體不聽使喚，他能做的只有拱手表示感激。看到巖倉的狀況，天皇失聲痛哭，幾乎沒法詢問他的病情。巖倉無法回答。天皇和他的大臣一言不發地對視了一會兒，隨后離開。就在那一天，巖倉的辭任請求獲得了批準。7月20日，巖倉病逝。

天皇悲痛萬分，罷朝三天，并為巖倉舉行國葬。在悼詞中，天皇追封巖倉為“太政大臣”——日本臣民可以獲得的最高官位。在贊揚了巖倉的功績（這些功績使得巖倉成為“國家之棟梁”）后，天皇聲情并茂地描繪了他和巖倉的關系：“朕沖年踐祚，全賴匡扶，啟沃納誨，誼同師父。天不慭遺，曷勝痛悼？”[[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多數情況下，明治發表官方言論時都采用套話，但是，這番話卻流露出他痛失良師時難以掩蓋的悲痛之情。[[20]](#_20__An_Zhao_Tian_Huang_De_Zhi_Y)

不久之后，天皇向多年來在其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另一位人士道別：哈里·斯密·巴夏禮爵士。他將被調到中國。在皇宮舉行送別午宴期間，天皇發表綸言，對駐日本十八年的巴夏禮，他“不堪惜別之情”。天皇很有禮貌地對巴夏禮表示了感謝，“能親睦兩國之交際，又翼贊明治維新之政圖，勸誘有益之事業，朕甚嘉之”。在承認巴夏禮為日本立下的功勞后，天皇打算向巴夏禮頒發旭日大綬章，但英國政府不允許這樣做。因此，他轉而向巴夏禮贈送了兩件私人財物：一個香爐和一只花瓶。他說：“卿若愛玩此物，為朕厚意之紀念，則為朕滿足之所在。”[[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天皇的這番話語氣真誠，與他平時向外國政要道別時所說的話不同。天皇如此親切地和巴夏禮交談，讓人感到驚訝，因為巴夏禮平常在與日本人打交道時態度傲慢、性情急躁，（據歐內斯特·薩道義爵士所說）當時巴夏禮成了“日本民眾心中的怪物”，日本人討厭他、害怕他，就像英國人討厭、害怕拿破侖一樣。[[22]](#_22___Hugh_Cortazzi__Sir_Harry_P)巴夏禮最近反對結束治外法權，此舉應該讓天皇不快，但他設法克服了反感，慷慨地贈送了一份禮物。薩道義雖然經常批評巴夏禮，但也對巴夏禮表達了贊賞：

對于巴夏禮所起的作用，日本欠他一個人情，這個人情日本從來沒有償還，也從來沒有完全承認。如果他在1868年的革命中站到了另一邊，如果他和大多數同事只是應付照辦，那么日本天皇的維新之路將會出現無法克服的困難，內戰也不會這么快就結束。[[23]](#_23__Sir_Ernest_Satow_A_Diplomat)

翌年，也就是1884年，令人驚訝的是，天皇很少參與重大事務了。天皇的大多數活動都與上一年一樣。也許追封光格天皇的生父為“慶光天皇”是明治天皇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4]](#_24__1884Nian_3Yue_19Ri_Ban_Bu_Z)多年前，光格天皇為行孝試圖向父親贈予“太上天皇”的尊號，即使其父從未登基。幕府沒有同意光格的提議，最終（于1792年）命令光格天皇推遲這一行動。在那些支持光格的貴族中，最突出的一位是前參議中山愛親——明治外祖父（中山忠能）的曾祖父。中山愛親被召喚到江戶問話，隨即被幕府軟禁。[[25]](#_25__Teng_Tian_Jue____Mu_Mo_noTi)毫無疑問，明治追封“慶光天皇”這一謚號，是在為先祖長期遭受的不公進行平反。

4月，中國和法國就安南[[26]](#_26__Yue_Nan_De_Gu_Cheng__Dang_S)主權爆發戰爭。日本政府決定和其他三個中立國（德國、美國和英國）合作，保護戰爭波及地區民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這是日本第一次以這種方式與其他國家開展國際合作。[[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天皇對本次戰爭有何反應，史料并無記載，但是，對于清朝似乎能夠頑強地抗擊法國這一結果，他也許感到高興。在與夏威夷國王的談話中，他強烈譴責歐洲列強侵略亞洲。但這一次，由于琉球事件造成日本與清朝的關系緊張，使他對清朝獲勝的感受卻并非單純的高興或者憂慮。

無論如何，天皇都不太可能過多地關注中法戰爭。從4月的后半月起，他因病經常未能參加內閣會議。宮內卿伊藤博文十分擔心，請求天皇派人去請醫生池田謙齋。天皇一直都不喜歡醫生，伊藤力勸讓醫生給他做檢查時，他拒絕了，說自己只是感冒而已，沒什么大礙。伊藤多次懇請，天皇最終才勉強答應。[[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沒有跡象表明天皇受到了疾病的困擾。與其說他身體微恙，不如說他憂郁過度。侍從藤波言忠晚年回憶說，這段時間天皇讓人難以接近。[[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他提到，天皇常常以身體不適為由，不參加內閣會議。即使伊藤博文請求參見天皇，奏報朝廷大事或國家大事，天皇有時候都拒絕接見。宮中制度規定，若非情況緊急，即使是太政大臣也不能探視天皇的病房，伊藤很想知道天皇究竟是真病，還是假病。

伊藤心煩意亂也是可以理解的。作為宮內卿，他有要事須親自稟報，但天皇拒絕接見他。就算天皇真的身體不適，似乎也沒有嚴重到無法會見眾卿的地步。伊藤認為，國事緊急，不容忽視，即使是短期內也來不得半點怠慢。他想知道天皇是不是因為對他反感，才不愿與他討論政府大事。最后，伊藤認定自己無法再肩負這一重任，向侍從遞交辭任書，離開了皇宮。

了解緣由后，吉井友實和伊藤的其他幕僚都焦慮不安。吉井派人去請侍從藤波言忠。他對藤波說：“圣上不豫，既不見宮內卿，何況臣等。臣等無可為，乞君深慮此事，許宮內卿拜謁。”他之所以選擇請求藤波幫忙，是因為他知道藤波自孩提時起便侍奉在天皇左右，天皇允許藤波自由出入其私人宮室。

藤波并不支持這條建議：“奏聞此事，非侍從之職。且奏此事，必多少勸諫天皇，此亦非職責之所在。”

吉井答道：“君言非無理，然君若因奏此事觸逆鱗，予等為君盡力。愿君賭命上奏。”

面對此等需要膽量之事，藤波下定決心奏明天皇。他先將決定上奏皇后，之后還告訴了侍女。最后，眼看找到了合適的機會，他便設法私下覲見天皇。他說：“近日，宮內卿伊藤博文以事屢屢請謁見，然陛下以床中之故未聽之。圣明素知國務一日不可廢，而如以他人傳宮內卿之上奏，臣覺其甚不妥當。聞古代賢帝正襟而聽大臣之言，然今日之時勢不許，請枉聽博文上奏。”

天皇面露慍色，訓斥藤波道：“此非汝應奏之事。切莫忘汝之職責。”

藤波又說道：“臣素知此言悖自職，然為圣上，為國家，不能不言，故敢而為之。嚴譴不敢有所辭，伏愿圣慮再思。”

怒氣沖天的天皇一言不發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徑直朝寢宮走去。皇后示意藤波退下，于是藤波告退。

第二天早上，在詢問了天皇的健康狀況后，藤波正準備像往常一樣履行職責。當他走進另一間宮室時，天皇讓一位小侍從去看看藤波是否在附近。藤波讓小侍從稟報天皇說他已退下。天皇突然命令請宮內卿進宮。

一接到消息，伊藤立刻前往皇宮，覲見天皇。雖然之前試圖覲見都以失敗告終，但伊藤的臉上并沒有露出不悅，天皇也沒有提及此事。伊藤說國事已堆積如山，提請天皇重視這些國事，隨即便退下了。伊藤意識到，他能覲見天皇，功勞全在藤波，于是對藤波的忠誠盡責表示感謝。

在這一事件過去大概兩個月后，某日天皇召見了正在走廊值勤的藤波。天皇說：“汝前日為朕盡言，朕頗喜之。今后若有如此事，可不憚而言。此等輕微之事但交與汝。”他賞賜了藤波一塊金表和一匹絲綢。藤波泣涕漣漣。

這個故事發生于1884年4月到夏季的這段時期，天皇在該時期內所發生的事件很少被提及。但是，這一時期絕非完全空白：天皇會見了外國賓客等；6月25日上野到高崎的鐵路完工時，天皇搭乘火車去了高崎。相比其他年份，這一年與天皇有關的記錄依舊較少，可以推測天皇并沒有對國事給予充分關注。在上述事件發生很久后，藤波在回憶錄中提到了此事，對于1885年7月伊藤因要事奏報天皇卻因天皇拒絕接見而試圖辭任宮內卿，他可能并不太清楚這段時間發生了什么。[[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晚年，藤波也不會虛構出與贈送金表有關的事情。

無論如何，7月底天皇已恢復處理日常政務。7月28日，他接見了被派去德國深造的二等軍醫森林太郎（即著名作家森鷗外）。同一天，他出席了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典禮，并賜給優秀畢業生禮物。

本月發生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但天皇并沒有直接參與。外務卿井上馨強調亟須修改條約，于是提議解除基督教禁令。雖然從1873年3月（當時釋放了所有因自稱信仰基督教而被關押的人）起就沒有再執行這一禁令，但這一禁令在法律上仍然有效，而這一直被某些外國列強批評。[[31]](#_31__Ri_Ben_Si_Hu_Yi_Jing_Bu_Zai)

同樣引發關注的還有一個自稱“皇道”的反動集團的興起。其成員譴責基督教，稱基督教信徒為“教匪”，要求驅逐基督教徒。他們還厭惡外國人，要求將歐洲的影響從這個國家中清除掉。井上認為這些人違背了天皇在誓詞中闡明的意愿，擔心他們會阻礙國家進步和妨礙修約談判的進行。

另一個宗教問題是決定政府對神道教和佛教的控制程度。1872年，政府對神道教和佛教設置了教部省和教導職，從而使得政府能夠直接干預宗教事務。但針對這一制度的反對意見此起彼伏，1877年，政府廢除了教部省。隨后，政府在1884年8月撤銷了教導職，由這兩個教派的負責人取而代之。[[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政府對宗教控制的解除并未獲得一致好評。在得知廢除教導職后，大阪、京都、神戶等地的神官倍感失望。他們確信，這將導致基督教的傳播，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褻瀆帝國神社的締造者（神武天皇）、毀壞神社、目無君主、不敬父母、漠視國家、藐視法律、完全扭曲忠孝義觀念等行為，可能會將災難推向頂點，最終導致人心徹底崩塌。為此，八十一名神官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聯名上書，請求立即采取行動停止實施井上的提議。

1884年10月下旬，明治天皇向朝鮮高宗發函一封，告知日本根據《濟物浦條約》獲得的賠款除朝鮮已支付的十萬日元外，剩下的將無須支付。天皇之前已告訴內閣成員，為確保實現東亞和平這一目的，給予朝鮮經濟援助是明智之舉。金玉均和樸泳孝——致力于按照日本模式將朝鮮打造成為一個強大、繁榮國家的人士——現在都已參與了朝鮮政務，正在為實現國家獨立而做出艱苦卓絕的努力。然而，嚴峻的經濟形勢使得朝鮮無法取得任何進展。天皇決定派遣竹添進一郎作為代理公使[[33]](#_33__Zhu_Tian_Jin_Yi_Lang__1842)，向朝鮮國王傳達天皇決定取消賠款一事。朝鮮國王深表感謝。

與此同時，朝鮮開化黨派的領導者認為，中國正在與法國開戰，無暇顧及朝鮮，現在是一個推翻腐敗政府，用一個致力于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政府取而代之的絕好時機。[[34]](#_34__Zhe_Chang_Zhan_Zheng_Chan_S)日本支持這些人士的主張，說這是確保將朝鮮從清朝獨立出去的必走的一步棋。

此時，朝鮮有兩個“黨派”。政府由事大黨（事奉大國，即侍奉清朝）控制，它們采取親清朝（清朝是朝鮮的宗主國）的立場，反對進行重大變革，與閔妃及其外戚集團關系密切。而開化黨[[35]](#_35__You_Shi_Ye_Cheng_Wei_Du_Li)主張將朝鮮從清朝獨立出去，由目睹了日本現代化的成功并深有感觸的人士所領導。11月4日，開化黨領導者在漢城樸泳孝的家中會面。日本公使館的一名成員也加入其中。他們考慮了各種行動方案，最后決定采用這一個：于12月4日郵政總局開業之際發動政變。

當晚，新近被任命為郵政大臣的洪英植在郵政局舉辦宴會。晚宴于6點開始，約7點時火警響起，慶祝活動中斷。街對面的一棟房子著火。閔妃的一個侄子前去調查火情，被身穿日本制服的士兵砍傷。其他賓客見狀紛紛逃之夭夭。[[36]](#_36__Ru_Xu_Le_Jie_Dang_Dai_Xue_Z)

金玉均和樸泳孝連忙奔向日本公使館，確保日本軍隊會協助開化黨。事實上，日軍已經整裝待發，準備發起攻擊。金玉均和其他開化黨人出發前往王宮，此時開化黨的支持者在宮中引爆炸彈，王宮已經一片混亂。金玉均等人走到朝鮮國王的面前，告訴他清軍正準備來捉拿他。朝鮮國王不信，但已無力抵抗，金玉均建議朝鮮國王請日本公使前來保護。國王拒絕，但一名謀反派成員以朝鮮國王的名義匆匆寫了一道王旨[[37]](#_37__Zhi_Qian_Cheng_Wei__Jiao_Zh)。沒多久，公使和日本士兵便抵達了。

第二天清早，金玉均利用朝鮮國王的御璽假傳王旨，召事大黨領導者前來宮中議事。他們剛一抵達便被抓捕殺害。在日本的協助下，開化黨控制了政府，并由其成員組成新的議政府。政變似乎取得了成功，朝鮮國王正準備宣布對政府進行改革；然而，得知消息的朝鮮人前去通知駐扎在漢城的清軍司令官袁世凱，請他調停。清軍人數遠遠超過日軍，是日軍的七倍，他們攻入王宮，營救朝鮮國王，朝鮮國王立刻宣布鎮壓謀反者。日軍和清軍展開了激烈的戰斗。此前假裝親日的朝鮮士兵臨陣倒戈，加入了清軍一方，壯大了清軍的隊伍。

一百五十人的日軍損失三十多人。他們撤離王宮，并帶走了開化黨的領導者。不久，連同難民在內的三百多人勉強擠進日本公使館，然而，公使館的食物甚至都不夠他們一天食用。竹添決定殺出漢城，前往海岸。[[38]](#_3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他們也的的確確是這樣做的。12月8日，他們抵達仁川。第二天，朝鮮國王向竹添發函，對他目前處境困難表示同情，并請他回漢城解決問題，很顯然，朝鮮國王忽略了日軍和清軍爭斗的焦點。英國和美國也力勸竹添再等等，但12月11日，竹添與一船的日本人和朝鮮逃亡者向長崎駛去。

這一事件尚未結束。12月21日，天皇接見了井上馨，派他作為特命全權公使前往朝鮮，一些高級軍官陪同前往。竹添回國后詳細匯報了政變失敗的經過，由此引發的爭議促使天皇采取了這一措施。清朝駐日公使也稟報說，清朝已派重兵前往朝鮮。井上將致函朝鮮國王，聲言已準備好與朝鮮高官進行商議，確定誰應為近期的事件負責，查看是否對肇事者給予了適當懲罰，并聲稱日本應就公使館的損害獲得賠償。如果朝鮮國王的確已經請求日本公使予以保護（正如日本人所說的那樣），則應向天皇發布謝罪書，消除國內外的疑慮，并說明事情原委。此外，為保和平，日本應要求清朝同意一起撤軍。

井上請求派兩個大隊的軍隊護送他前往朝鮮，天皇恩準并另派三艘軍艦保護井上。此時，井上得出結論，認為日本的所作所為導致了這場事變。在決定推動朝鮮獨立后，日本已經干預了朝鮮的內政，并試圖勸說其他國家接受日本的立場。而今，日本也打算在兩條路線中擇其一：第一條是要求朝鮮實現獨立，哪怕這意味著要和清朝開戰。與鄰國維持友好關系固然重要，但拖延妥協將會造成后患，并且日本無法容忍任何可能損害日本聲譽的事情。鑒于清朝正與法國交戰，要是日本通過充分展示武力的方式向朝鮮提出要求，朝鮮朝廷很可能會接受。這就是為什么井上請求派遣兩個大隊。如果這條路走不通，維護和平比其他考慮事項都重要，那么就采用第二條——放棄朝鮮獨立的計劃，承認清朝對朝鮮的宗主權。對于日本應采取哪一種策略，井上請求政府盡快回復。[[39]](#_3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就在當天，井上收到了三條的回復，三條力勸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與清朝開戰。三條提醒井上必須遵守最初的指示，以便達成日本和清朝都能接受的和平解決方案。他說，派遣兩個大隊的軍隊不是為了以武力示威，而是擔心在政變失敗后朝鮮可能會成為一個危險之地。他補充說，目前還無法決定是否應當支持朝鮮獨立，哪怕不惜與清朝開戰。

12月30日，井上抵達仁川，但仍不確定該走哪條路。他并不是唯一一個感到困惑的人。因為在下一個十年，與清朝和朝鮮的關系仍然是日本外交官要仔細思量的一個謎題。

1. [[1]](#_1_37) 雅樂樂師受到政府的優待，無疑是因為他們的音樂與朝廷儀式直接相關。他們終身受聘于朝廷，并獲得足以支付生活開銷的俸祿（《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299頁）。

1. [[2]](#_2_37) 任子是公卿千種有任的第三女。

1. [[3]](#_3_37)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105—106頁。

1. [[4]](#_4_37) 漢方醫師淺田宗伯（1815—1894）在德川幕府時代末期擔任宮內省侍醫。

1. [[5]](#_5_37) 橋本綱常（1845—1909）曾師從松本良順學習西醫，后師從荷蘭醫生鮑迪安（A. Bauduin）在長崎學醫。1870年，橋本成為（兵部省）軍事醫院的醫官，該院派他留學德國。1885年，橋本擔任日本軍醫總監。

1. [[6]](#_6_37) 他們是都曾接受荷蘭醫學培訓的伊東方成（1832—1898）和巖佐純（1836—1912）。伊東方成起初師從有名望的伊東玄樸，隨后在長崎跟隨彭培·凡·米爾德沃特（Pompe van Meerdevoort）學醫。他還在烏得勒支大學學習，明治維新后不久回到日本（《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68頁）。巖佐在日本跟隨彭培和鮑迪安學醫，1884年前往歐洲學習。

1. [[7]](#_7_37) 1884年12月，嘉仁王子患上了流感。天皇非常擔心，得知嘉仁王子的外曾祖父中山忠能和外祖母中山慶子拜佛求神祈禱王子康復時，傳話懇請他們繼續祈禱。大概過了一個月的時間，嘉仁完全康復（《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16頁）。

1. [[8]](#_8_37) 天皇的腳氣病可能是由于缺乏維生素所引起，大概當時日本尚未認識到這一病因。

1. [[9]](#_9_37) 例如，從4月16日到20日，天皇在埼玉縣的飯能市及周邊地區觀看了近衛軍的春季操練演習（《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7—42頁）。

1. [[10]](#_10_37) 與伊藤舉薦他時的政治思想相比，此時魯道夫·馮·格耐斯特（1816—1895）的政治思想更加自由。受益于英國民主，格耐斯特形成了自己的政體哲學。

1. [[11]](#_11_37) 施泰因（1815—1890）是維也納大學的教授。他的政治觀點比較保守，反對普選制和政黨政府。他對日本憲法制定者產生了尤其深刻的影響。

1. [[12]](#_12_37)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14—15頁。

1. [[13]](#_13_37)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121頁。他獲得了2000日元的高額薪俸。

1. [[14]](#_14_37) 例如，恢復在明治維新時廢止的賀茂祭和男山祭兩個古老儀式。巖倉具視是復興此類傳統的倡導者；保護京都也是其方案的一部分（《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6頁、第111頁）。該儀式于1884年5月15日按照傳統方式初次舉行（第206頁）。

1. [[15]](#_15_36) 爭論的一個焦點是做出卓越貢獻的武士階層的成員是否應被視為貴族成員。伊藤博文強烈主張在擬成立的議會中將此類武士成員同世襲的貴族一道納入參議院，但巖倉堅決反對（大久保利謙，《巖倉具視》，第236頁）。在巖倉死后的1884年7月頒布了《華族令》，將貴族分為五個等級，取代了舊時的貴族頭銜，根據門第和勛功授予爵位，從而使得這一問題得以解決（《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220—225頁）。

1. [[16]](#_16_36) 北陸巡幸時，天皇駐足京都，看到京都的失修破舊感到驚愕。在天皇看來，就像在俄國舊都莫斯科舉辦主要儀式（如皇家加冕禮和葬禮）一樣，日本的類似儀式也可以在京都舉行。1883年4月，天皇就此頒布了正式的詔書。巖倉早在該年1月就提交了一份保護京都的詳細奏折，主張不僅要保護舊皇宮，也要按照舊時平安京的規模維護京都，他希望制訂方案以便為京都的日后繁盛奠定基礎。巖倉對京都美麗的自然環境和輝煌歷史進行了描繪，稱保護京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6—48頁）。5月，在巖倉前往京都時，其于1月擬定的京都保護方案的大部分內容均得以實施。

1. [[17]](#_17_36)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6頁。

1. [[18]](#_18_35)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81頁。婚前，皇后的身份是一條忠香的女兒。以該身份（這比皇后的身份卑微許多）探望，巖倉可以不用下床迎駕。

1. [[19]](#_19_35)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89—90頁。

1. [[20]](#_20_34) 按照天皇的旨意寫的一篇更加正式的悼詞刻在巖倉的墓碑上，列舉了巖倉的各項成就。悼文由重野安繹撰寫（《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96頁）。

1. [[21]](#_21_34)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99頁。

1. [[22]](#_22_33)  Hugh Cortazzi, Sir Harry Parkes, p. 16. 這是薩道義于1881年在給巴夏禮的未來傳記作家迪金斯（F. V. Dickins）的一封信中發表的評論。薩道義多年來擔任巴夏禮的翻譯，經常提到巴夏禮脾氣火爆，例如“在對基督教問題進行熱烈討論時，日本人說得有理有據，哈里爵士也說得合情合理，但不幸的是，他對木戶采用的論據大發雷霆，并且使用諸如‘我不想再說一遍’等激烈的言辭”（"aid-B5O", p. 398）。

1. [[23]](#_23_33) Sir Ernest Satow,A Diplomat in Japan , p. 141.

1. [[24]](#_24_31) 1884年3月19日頒布詔書。在此之前（1883年12月28日），天皇告知其外祖父中山忠能，說已經非官方地決定向閑院宮典仁親王授予尊號。典仁親王的名字“Sukehito”也讀成“Keikō”。

1. [[25]](#_25_31) 藤田覺，《幕末の天皇》，第102—112頁。

1. [[26]](#_26_31) 越南的古稱，當時是清朝的藩屬國。——譯注

1. [[27]](#_27_30)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200頁。9月9日，日本正式宣布在此次戰爭中保持中立（第285頁）。

1. [[28]](#_28_27)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210頁。該條目的日期是6月1日，表明此時天皇的疾病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

1. [[29]](#_29_27)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39—342頁。

1. [[30]](#_30_25)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49—342頁。

1. [[31]](#_31_23) 日本似乎已經不再為基督教禁令擔憂，信仰基督教的人數穩步增加。截至1882年，已有93個基督教會，逾4300名基督教徒。但是，直到1889年2月11日頒布憲法時才全面解除基督教禁令。憲法第28條規定，日本臣民在不妨礙安寧秩序、不違背臣民義務的前提下，有信教之自由。

1. [[32]](#_32_22)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275—276頁。

1. [[33]](#_33_21) 竹添進一郎（1842—1917）寫了一部與眾不同的旅行日記（《桟雲峽雨日記》），描述了他在清國的旅行。請參閱拙著Modern Japanese Diaries。

1. [[34]](#_34_21) 這場戰爭產生了一個奇怪的后果：法國聲稱為了兩國的共同利益，提議日法結成聯盟。如果日本缺乏足夠的資金與清國開戰，法國承諾在巴黎募集資金、按照最有利的條件協助日本。但是，日本未予回應，于是這件事就這樣不了了之（《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28—329頁）。

1. [[35]](#_35_19) 有時也稱為獨立黨。如需了解開化黨的介紹，請參閱Kibaik Lee,A New History of Korea , trans. Edward W. Wagner, p. 275-276。

1. [[36]](#_36_18) 如需了解當代學者對此事的描述，請參閱Hilary Conroy,The Japanese Seizure of Korea , p. 154。

1. [[37]](#_37_14) 之前稱為“教旨”，是上對下的告諭，中國古代皇太子、諸侯王所下命令的稱呼。朝鮮國王對臣下的辭令文書也沿用中國慣例，稱作“教旨”。至朝鮮世宗七年（1425年）改稱為“王旨”。——譯注

1. [[38]](#_38_1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18—321頁。亦參考了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21-23的資料。崔文衡主要依據當時在朝歐洲人的陳述。

1. [[39]](#_39_10)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37頁。

# 第三十八章 江戶的舞會



1883年11月28日，外務卿井上馨與妻子武子主持了鹿鳴館的落成典禮。這是一棟兩層的西式建筑。之前用于招待外國政要的老舊的延遼館（最初招待的是愛丁堡公爵）造價便宜，原本是幕府建造的海軍學員培訓學校，盡管在改造成外國賓客的住所時對內部進行了裝修，但時至今日已極其陳舊。[[1]](#_1__Fu_Tian_Ren____Lu_Ming_Guan)因此，需要建造一棟新的建筑。

鹿鳴館由英國建筑師喬賽亞·康德（Josiah Conder）按照“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其采用了孟莎式屋頂[[2]](#_2__Fa_Guo_Cong_Wen_Yi_Fu_Xing_S)）進行設計，但正面的拱形門廊隱約呈現出摩爾式建筑[[3]](#_3__Bei_Fei_Ji_Yi_Bi_Li_Ya_Ban_D)風格，柱子亦極具印度風格。只有花園（里面種有松樹，砌有池塘，飾有石燈籠）才顯示出這個兼收并蓄的獨特建筑坐落在日本。鹿鳴館的建筑風格反映出井上具有世界性的品味，而武子出席落成典禮，要是放在十五年前的國事活動中是沒法想象的事情。現在它標志著將來女性會更多地參與這棟新建筑里舉辦的活動。

鹿鳴館建在薩摩藩的軍械庫舊址上，總耗資十八萬日元（外務省的辦公大樓耗資四萬日元）。[[4]](#_4__Ji_Tian_Guang_Yi____Lu_Ming)無疑，沒有什么能比這個浮夸的新建筑更加背離薩摩藩武士階層的簡樸風紀了。它那童話般的外觀取代了幕末時期武家風格建筑中令人生畏的圍墻，成了僅僅十五年間發生的巨大變化的象征。鹿鳴館的名稱出自中國古代詩集《詩經》的《鹿鳴》，該詩描繪了主人迎賓會客的情景。取這個名字十分恰當，因為招待外國賓客是這棟新建筑的主要功能。[[5]](#_5___Fu_Tian_Ren____Lu_Ming_Guan)外國人不再因褻瀆神國而被斥為贅疣，而是在鹿鳴館受到隆重的接待。

鹿鳴館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作用，即它是一個舞臺。在這里，日本人向外國人展示他們已經摒棄了過去陳腐的生活方式、學會了歐洲的餐桌禮儀并能夠舉辦舞會。鹿鳴館的饗宴精美別致，很多菜都配有法語菜單。[[6]](#_6__Ju_Ti_Cai_Dan__Qing_Can_Yue)在舞廳，日本紳士身穿從英國訂購的燕尾服，女性則身著在巴黎設計的禮服，隨著陸海軍軍樂隊演奏的歐洲最新音樂，跳著方陣舞、華爾茲、波爾卡、瑪祖卡或加洛普。對于那些還沒有學會跳舞的人士，居住在東京的外國人便充當起了老師的角色。[[7]](#_7__Yi_Wei_Zhuo_You_Cheng_Jiu_De)

保守派評論家對參加交際舞的日本人皺起了眉頭，他們警告稱，在公共場合擁抱的男男女女很有可能滋生出荒淫行為。比如下面這篇當時媒體對交際舞的報道：

一位美麗的女士將頭靠在一位男士的肩膀上，漂亮的臉蛋朝著男士的耳朵。她袒露的胳膊環繞著男士的脖子，抖動的胸部貼著男士的胸膛，隨著呼吸一起一伏。她的雙腿與男士的雙腿交織在一起，如同松樹上的葡萄藤一般。男士強壯有力的右臂緊緊地環繞著女士嬌小的后背；每移動一步，他便使女士更加緊密地貼在他身上。美麗女士光芒閃動的眼睛直直地盯著男士，但她目眩神迷，什么也看不清。音樂激起她的感情，但她聽不見音樂聲。她聽到的是遠處瀑布的回聲，像在夢境中一般移動著舞步，她的身體緊依著男士的身體。當一個女人處于這種狀態，哪里還有良家女子固有的矜持可言？[[8]](#_8__1887Nian_7Yue_9Ri_De___Nu_Xu)

很多日本人從道德的角度反對交際舞，但是，上流社會的成員卻認為這是一項必不可少的社交本領。為提高跳舞技能，他們參加自1884年10月起于周日晚上在鹿鳴館舉辦的練習課程。當時的一篇文章是這樣報道的：

上流社會的已婚婦女和年輕女性，從參議井上、參議大山和文部卿森有禮的妻子到下級官員的妻子，于該月27號晚上6點聚集在鹿鳴館練習跳舞。這是為下月3號，也就是天皇生日當天舉辦的舞會做準備。女士們的舞技穩步提高、日漸嫻熟，如果紳士們的舞蹈技能還不熟練，將非常不幸地無緣成為女士們的舞伴。因此，外務省、宮內省和其他機構的官員也開始上舞蹈課，對于他們是否可能在下月3號使舞技純熟，坊間有很多流言蜚語。[[9]](#_9__Fu_Tian_Ren____Lu_Ming_Guan)

除了展示他們昂貴的服飾和舞蹈技巧外，也許在鹿鳴館跳舞的人大多都沒有考慮其他方面，但是，井上希望通過這種同樣的趣味與外國政要建立關系，來勸說他們相信日本學習歐洲文化已經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應對日本平等相待。他的最終目標是要取消治外法權，治外法權表明歐洲不相信日本的司法制度，也是外國人優于日本人的最明顯的實例。

鹿鳴館這一交際場所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不平等條約的結束很值得懷疑。與日本人的期望背道而馳的是，對于日本人為證明其能夠輕松自如地掌握像歐洲人那樣行為舉止所做出的努力，參加舞會的歐洲人不為所動。事實上，他們發現身穿昂貴外國服飾的日本男女看起來很有趣，甚至很滑稽。法國藝術家喬治·比哥（Georges Bigot）畫了一幅漫畫，描繪了一男一女站在鏡子前。女子的頭發盤到一個很高的高度，上面戴著一頂有羽毛的帽子；她的裙撐和陽傘是最能體現巴黎式優雅的地方。她的同伴留著小胡子，拿著高頂禮帽，但在優雅剪裁的外套下露出的那雙腿卻像火柴棍一般。鏡中照出的男女竟是猴子臉。[[10]](#_10__Ru_Xu_Cha_Kan_Zhe_Fu_Man_Hu)

比哥開的這一殘酷玩笑題為“行走在上流社會的先生和夫人”。這就是日本貴賓在鹿鳴館給外國人留下的印象。皮埃爾·洛蒂[[11]](#_11__Fa_Guo_Xiao_Shuo_Jia__Zhu_Y)于1886年7月抵達日本，應邀參加11月的天皇生日舞會，在其日記和小說《江戶的舞會》（"aid-B9J"）[[12]](#_12___Wai_Guo_Ren_Yi_Zhi_Dao_Don)中，他對鹿鳴館舞會給他這個外國人留下的印象做了如下描述：

11月中旬在東京舉辦的第一個歐式舞會簡直就是一場猴戲。年輕女子身穿白色的平紋細布衣服，戴著長及肘部的手套，坐在椅子上，白如象牙的手指間夾著書籍，臉上強顏歡笑。現在，她們已經能夠跟著歌劇音樂的旋律，或多或少地正確地跳波爾卡和華爾茲，盡管我們的旋律一定讓她們的耳朵感到非常不舒服……

這種粗鄙的模仿在到訪的外國人看來一定有趣極了，但是，它揭示出日本這個民族毫無品位，完全缺乏民族自豪感。[[13]](#_13__Fu_Tian_Ren____Lu_Ming_Guan)

洛蒂對幾位女士的描繪顯得寬宏大量些。外務卿的妻子井上武子給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她陪著丈夫站在樓梯口，面露微笑，說著歡迎詞，迎接賓客的到來。她從容自如、頗有教養，表明她曾陪同擔任外交職務的丈夫出國訪問，是有過此類經歷的第一批日本女性。洛蒂反復提到他聽到的一個傳聞：井上武子以前曾是藝伎（只是猜測）。無論怎樣，他說，按照巴黎的標準來看，武子的服飾基本及格，她的舉止也沒有瑕疵。在描述的結尾，洛蒂對武子所展現出來的從容自如大加贊賞，甚至她伸出手要和洛蒂握手時的樣子簡直就像美國女人一樣。[[14]](#_14__Jin_Teng_Fu_Zhi____Lu_Ming)

1885年，井上的養女末子芳齡二十，她也曾陪同井上前往歐洲。末子不僅容貌美麗，而且才華橫溢，能使用英法兩種語言來招待鹿鳴館的外國賓客。[[15]](#_15__Jin_Teng_Fu_Zhi____Lu_Ming)井上有充分理由為妻子和女兒熟練運用外國禮儀感到驕傲。然而，與他所期望的截然不同，鹿鳴館的宴會只是加深了人們的刻板印象：日本是一個“只會模仿的民族”，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化，只會借鑒和模仿中國或西洋的文化。

這絕不是外國人第一次見日本人身穿洋服。早在很久以前，日本男性就意識到，如果他們堅持穿古雅的本土服飾，外國人就不會把他們當回事兒。日本女性（尤其是那些上流社會的女性）也喜歡穿著歐洲流行的服飾。但是，日本人不滿足于將身穿洋服作為時髦的象征，他們還把自己裝扮成了鹿鳴館化裝舞會的樣子，并練習與這些服飾相稱的禮儀，而這惹來了外國賓客的嘲笑。

將鹿鳴館文化推向頂點的事件，是兩年后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在其官邸舉辦的化裝舞會。四百多名貴族成員、政府高官、外國外交官偕夫人穿著奇裝異服參加舞會。伊藤和妻子梅子裝扮成威尼斯貴族，他們的女兒則化裝成意大利農村姑娘。[[16]](#_16__Ru_Xu_Le_Jie_Bu_Fen_Chu_Xi)

然而，將西洋文化——甚至是西洋文化的特例（如化裝舞會）——納入日本文化的主流之中，卻是這一時期的中心事件。當時天真的日本人對西方抱有極大的熱情，今日看來似乎會讓人忍俊不禁。不過，近代作家對鹿鳴館的曇花一現有著某種懷舊之情。在那個時期，有些日本人大膽擺脫過去上流社會的幽暗，走入一個燈火通明的、讓人聯想起拿破侖三世時期的巴黎[[17]](#_17__1852Nian__Qiao_Zhi__Ou_Ren)的舞廳。

井上馨勸誘外國人結束治外法權這一終極目標最后以失敗告終。1887年，他辭去外務大臣一職。他曾一次次地認為修改條約已經近在咫尺，但一些外國列強的舉措總是使他頻頻受挫。早在1882年，德國就表示，如果日本完全開放國門與外國通商并擁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那么德國愿意在八到十年內完全放棄治外法權。美國早已同意廢除治外法權和對關稅的控制，但前提是其他國家也這么做。德國和美國都愿意就司法管轄權做出讓步，以換取通商的有利條件。[[18]](#_18__James_E__Hoare_Extraterrito)即使是英國——治外法權最堅定不移的擁護者——也顯露出有可能做出讓步的跡象。[[19]](#_19__Fu_Tian_Ren____Lu_Ming_Guan)1884年8月，巴夏禮的接任者弗朗西斯·普倫凱特（Francis Plunkett）向井上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聲稱永久維持治外法權并非英國的用意所在，只要日本政府完善民法、商法和訴訟法并對此類法律進行翻譯，那么英國將放棄治外法權。[[20]](#_20__Fu_Tian_Ren____Lu_Ming_Guan)1886年，英國貿易委員會表示將會關注此事，避免英國拒絕同意日本就治外法權提出的要求會損害到英日之間的貿易往來。[[21]](#_21__James_E__Hoare_Extraterrito)

然而，釋放出的這些積極信號未能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在日本的外國人堅信，一旦他們聽憑日本司法的處置，就會被無故逮捕，并遭受東方的嚴刑拷打，因此拒絕改變。日本人繼續爭取結束治外法權，直到1899年8月4日才最終結束這一體制，而完全恢復關稅自主權要到1911年。但正如一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

毫無疑問，日本人急于恢復關稅自主權；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結束外國享有的治外法權及其對日本作為主權國家的踐踏，這一愿望是日本反對幕末簽訂條約的主要推動力。日本人打算將全面恢復關稅自主權推遲到1911年，以換取外國列強在1894—1898年間放棄治外法權，這并非偶然。[[22]](#_22__James_E__Hoare_Extraterrito)

1885年，鹿鳴館的影響力和魅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不同于曾在鹿鳴館舉辦的璀璨奪目的宴會，這一年成為日本文化史中難以忘懷的一年，涌現了很多文學和評論作品，包括坪內逍遙的《小說精髓》、東海散士的《佳人奇遇》，以及布爾沃·李頓的小說《凱奈寧·齊林萊》（Kenelm Chillingly）的出色翻譯。

然而，在明治看來，1885年（和1884年一樣）是令人沮喪的一年，在這一年，他發現自己難以將精力集中在朝政大事上。盡管據說在隨后的幾年，明治每天在書桌前工作很長時間，但此時他每天僅在辦公室工作兩個小時——從上午十點到中午。除此之外，他大部分時間是與侍從長和其他隨員閑聊宮中事務，即使眾卿和參議想要商議政事，也只能徒勞地等待著天皇的接見。甚至是既深得天皇信任又肩負宮廷事務重責的伊藤博文，在有要事奏報的時候，也無法覲見天皇。他再次感到心煩失望，又有了辭去宮內卿一職的打算。

在寫給三條實美的書信中，伊藤表示擔心明治“聰明睿智之德質遂歸于空名”。“今遭遇千古未曾有之變遷，應成就中興之鴻業，垂萬世以遺訓。如無為而消光，則上不能對歷代之祖宗，下難面萬世之皇孫。”天皇將國家大事交由大臣和少數官員決定，很少詳細地審閱向他提交的內閣會議的奏折。即使當他極其罕見地批閱奏折時，也從不發問。伊藤很想知道，天皇雖然天資聰穎，但僅靠這種方式是否就能全面掌握當時極為復雜的國家大事。天皇的心腹——侍從長德大寺實則和儒學侍講元田永孚——都是值得敬重的人士，但他們卻對世界局勢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某個具體政策對日本是有利還是不利。此外，他們并非當選官員，因此無需就其行為向任何人負責。伊藤警告，“今日形勢之艱難危急，古今東西史上未有其類。若誤方向、失處置，國家之存亡間不容發。”[[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目前尚不清楚伊藤是否真的向三條寄送了這封書信，我們也不明白為什么明治對國家大事如此漠不關心。也許主要是因為厭煩。在伊藤看來極其重要的事情，也許激不起天皇的興趣。參加鹿鳴館的舞會可能會給他帶來一些好處，當然，那樣一來又有失天皇的身份。[[24]](#_24__11Yue_19Ri__Huang_Hou_He_Hu)

造成天皇低落的另一個原因也許在于其健康狀況。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上一年天皇以生病為由，常常缺席內閣會議；而這一年，他又一次次地遭受感冒、發燒之苦。4月，他將前往福岡觀摩一場由駐守廣島、熊本的軍隊聯合參加的大型軍事演習，并將在返程途中巡幸山口縣、廣島縣和岡山縣。然而，疾病使他無法出席軍事演習，巡幸也被推遲。毫無疑問，無法出席能帶來極大樂趣的軍事演習，肯定會讓天皇感到非常失落。不安排巡幸可能會讓天皇松了一口氣，不過，這三個縣的百姓感到失落，于是天皇承諾將在該月月末進行巡幸。

或許惡劣天氣，尤其是給房屋和莊稼造成巨大損失的暴雨和大風是造成天皇情緒低落的另一個原因。天皇命令提交有關莊稼損失（而非其他事宜）的奏折。奏報的消息讓人感到很沮喪。預計茶葉收成只有往年的一半，小麥只有平常的四成。人們回憶說，這距離1833年到1836年的大饑荒也不過五十年時間，并且忐忑不安地揣測這是否會再次演變成一場大饑荒。在春末夏初的時節，暴雨連連，河流漫過了堤岸，引發了洪水，造成大量房屋受損。[[25]](#_25__8Yue_Zai_Xun_Xing_Shi__Tian)

唯一幸存的兒子——嘉仁親王——可能讓天皇感到欣慰，但親王居住在其外曾祖父中山忠能的宅邸，明治很少見到他。既然親王已到了七歲（根據日本的算法），其教育和健康便成了天皇記掛的事情。3月，天皇決定從今以后接親王到宮中生活。兩年前，文部卿福岡孝弟曾提議在宮中建造一所幼兒園，對親王進行教育。天皇仔細地考慮了這個提議，但由于這與按照傳統向王位繼承人提供教育的方式背道而馳，天皇十分謹慎地采取措施以實施該提議。于是，朝廷在青山御所建造了幼兒園，并挑選了和嘉仁同齡的男孩作為同學。不過由于嘉仁親王身體羸弱，該方案無法實施。[[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盡管如此，天皇仍開始著手處理親王的教育問題，并令年邁的侍講元田永孚制定課程和學習方案。

令人驚訝的是，元田所制定的不是循規蹈矩的方案。他建議：教師應不受宮中規則的束縛，即使親王在玩耍時也應不拘禮節地給予引導；應按照循序漸進的方式為親王設置教育節奏，而不是按照時間表；每天早上利用兩個小時對親王進行閱讀、寫作、算術和道德方面的教育，每天下午運動兩小時；每隔一天讓親王練習唱歌半小時。

該方案于1885年3月實施，但親王的健康狀況仍不明朗。6月，親王獲準返回中山忠能的宅邸看望外曾祖父。當晚，回到宮中后，親王突然生病，發起了高燒，并伴有抽搐。一個月后親王身體才恢復。[[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也許這是一種心身疾病，是由于他不愿離開戀戀不舍的、充滿溫情的中山宅邸而前往莊嚴肅穆的皇宮。

9月，天皇打破讓皇室子女接受私人教育的傳統，決定讓嘉仁親王來年進入學習院學習。天皇責令元田和其他各類官員為親王制定教育課程，并在皇族和高級貴族中挑選十五到二十名男孩作為親王的玩伴。在該年的晚些時候，天皇命令推崇西洋學說的學者西村茂樹負責親王的教育，反映出他確信宮中沿用多年的舊式教育方法不再行得通。他希望西村向未來的天皇提供適應現代潮流的教育。[[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7月26日，天皇如約動身，開始巡幸山口縣、廣島縣和岡山縣。[[29]](#_29__Ru_Xu_Le_Jie_Guan_Yu_Xun_Xi)這大概是他最乏味、最無趣的一次行程，主要是因為天氣極其炎熱。[[30]](#_30__Zai_Yong_Jin_Suo_You_Xing_R)一路上，民眾因為目睹了天皇的龍顏喜極而泣，但天皇自己卻感到筋疲力盡。盡管他像往常一樣為忍受旅途中的艱難跋涉做好了準備，但這一次熾熱的高溫讓他也吃不消。當皇室一行人抵達嚴島時，天皇派一名侍從代他參拜神社；在到達閑谷學校附近時，他派遣侍從長進行視察。閑谷學校是池田光政于1668年興建的儒家書塾，是明治平常最喜歡參觀的一類地方。盡管高溫炎熱，天皇還是被迫會見了當地政要，考察了當地的生產情況，但他應該沒有什么興致。[[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天皇的行船于8月12日返回橫濱，船上和岸上的民眾紛紛行禮致敬。此次巡幸僅持續了十八天，但天皇每一天都是早上四五點就起床，直到深夜才睡。由于天氣異常炎熱，此次旅途無論是在陸地還是在海上都苦不堪言。巡幸雖然讓臣民感到歡欣雀躍，但天皇甚至一天都無法休息。

回到東京后，天皇恢復了日常作息。卡拉卡瓦國王向天皇贈送了自畫像，以示友誼和尊重。教皇利奧十三世（Pope Leo ⅩⅢ）致函，向天皇慷慨對待基督教傳教士表達了謝意，并請求在日本和梵蒂岡之間建立關系——諸如梵蒂岡與歐美大國的統治者所締結的類似關系。經商議后，天皇準許會見教皇的使節。在會見中，他向使節保證讓基督教徒享有和日本人一樣的保護。[[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意大利國王翁貝托一世（UmbertoΙ）請求天皇贈送幾只日本鹿，隨后便收到天皇贈與的一對鹿。在收到西班牙阿方索十二世逝世的消息時，朝廷哀悼了二十一天。

在1885年，天皇最滿意的方面大概是外交關系。2月，朝鮮高宗就1884年12月發生的事件（多名日本人在這次事件中被殺）做出正式賠禮道歉，于是，這一年就以充滿希望的方式開了頭。[[33]](#_33__Zhi_Qian_Xin_De_Quan_Wen_Qi)

同月，曾被駐派朝鮮的陸軍中將高島鞆之助和海軍少將子爵樺山資紀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文書，將日本采用歐美的行政、教育、法律和軍事體制而在現代化進程中取得的穩步成就與清朝頑固堅持的腐朽方式進行了對比。這兩個國家正朝著不同的方向前行，由此使清朝產生了嫉妒和猜疑。高島和樺山回顧了近年來中日兩國之間的沖突（侵略臺灣、吞并琉球、江華島事件等），尤其是1884年的事件。當時清軍襲擊了在朝鮮的日本軍隊，造成傷亡。他們敦促“今斷然決意速掃妖云，蕩盡禍氣，否則兩國之間難測生不虞之變”。他們確信，現在是增強國家實力、提高皇室聲望的難得機會。[[34]](#_3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朝廷對此做出的回應是派遣伊藤博文作為全權大使前往清朝，處理清日之間日益加深的裂痕。伊藤肩負著簽署一份防止清朝進一步干涉朝鮮的條約的任務。日本駐清特命全權公使榎本武揚接到秘密指示，要求其請求哈里·巴夏禮爵士（雖然此人長久以來都是日本的痛苦之源，但現在是英國駐北京公使，有可能成為日本人的朋友）從中斡旋，以探明李鴻章的意圖。如果李鴻章拒絕就朝鮮問題與日本達成協議，那么日本政府準備要求賠償。

日本政府向伊藤頒發了將要呈交給清朝皇帝的國書，并做出指示，告知政府的意愿是維護兩國之間的和平，但前提是清朝答應兩個條件：（1）嚴懲命令軍隊參與12月6日事件的軍官；（2）清軍必須撤離漢城。如果清朝接受上述條款，日本也準備在同一時間撤離駐扎在漢城的保衛日本公使館的軍隊；但是，如果清朝拒絕簽署該協議，日本將被迫采取行動以捍衛國家利益。在此情況下，清日之間早晚必有沖突，責任全在清朝。[[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2月28日，伊藤一行人乘船駛往清朝。天皇完全相信伊藤有能力達成和平解決方案，然而，日本民眾已經產生了反對清朝的情緒，并發出了征服清朝的呼聲。這種氣氛讓人聯想起了民眾慫恿入侵朝鮮的那一時期，對此，太政大臣三條向各部領導等達官政要發送內諭，強調天皇維護和平的意愿，令其安撫民心，防止出現騷亂。[[36]](#_36__Ru_Xu_Le_Jie_San_Tiao_Han_J)

3月14日，伊藤抵達天津。清朝希望他立刻與全權代表李鴻章進行談判，但伊藤認為先前往北京覲見清朝皇帝、遞交國書才是適宜之舉。他還希望在北京進行談判，但清朝的大臣們以皇帝尚且年幼為由拒絕，力勸伊藤在天津與李鴻章談判。伊藤一行人于4月2日回到天津。他與李鴻章之間的談判進行得很艱難，不過，4月15日最終達成了協議。雙方簽署了規定兩國從朝鮮撤兵的條約[[37]](#_37__Shi_Cheng___Zhong_Ri_Tian_J)。參與12月6日事件的清軍指揮官將不受懲罰，但清朝將對傷害日本人的罪行進行調查，并將對實施了此類罪行的清兵給予相應懲罰。伊藤接受對其最初要求進行的這一修改，稱“（天皇）顧慮東洋之大局，體察重和好之旨，允諾此事”。[[38]](#_3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伊藤回到東京后，天皇向他表示了誠摯的感謝。第二天，天皇傳話給三條，詢問是否可以向伊藤授予與大久保利通在北京成功解決臺灣問題后所獲得的相同的獎賞（一萬日元），以及是否可以官至一品或者享受年度薪俸。[[39]](#_3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一些朝廷官員認為理應向伊藤授予侯爵封號。三條建議向伊藤獎勵一萬日元外加一套金杯；[[40]](#_4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可是，根據之后的幾個月的記錄，伊藤獲得的物質獎勵是天皇贈送的一匹馬。[[41]](#_4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月7日，天皇和二十多名貴族成員及高層官員拜訪了伊藤的宅邸，作為皇室贊許的象征。[[42]](#_4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毫無疑問，天皇非常尊敬伊藤，不過他并不像伊藤那樣對西洋文化懷有無限熱情。9月，天皇恢復了在星期五與親王、參議以及高級政府官員、軍官共進午餐的習慣，也許表示天皇要摒棄對朝政漠不關心的態度。11月，宮內卿伊藤提議，鑒于交際耗費掉天皇大量的時間，與日本人和外國人共同進餐，以及出席宴會和舞會將被限制在賞菊或賞櫻期間進行。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另一名政治家開始成為高層政界中的顯要人物，他就是黑田清隆。1883年2月，黑田辭去少將一職[[43]](#_43__Jing_Hei_Mi_Tai_Lang_Zai)，并請求前往中國。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清朝推銷北海道的產品。井上馨拒絕了這一請求，說鑒于清日兩國關系緊張，目前并非派遣政府高級官員訪問清朝的理想時機。[[44]](#_4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1885年2月，黑田再次請求前往清朝，這一次是為了觀察中法兩國之間的戰爭。他覲見了天皇，天皇表示同意，因為清朝是日本最重要的鄰邦。天皇要求黑田提交關于中法戰爭的報告。[[45]](#_4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盡管這是一次非官方的旅行，天皇仍向黑田提供了四千日元的經費。

就在伊藤抵達天津的同一天，黑田首先抵達了香港，并從香港前往新加坡。他本打算往南方走，但4月16日得知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簽署條約后，他決定往北前往北京，不久后，他就在北京與日本公使榎本武揚開懷痛飲。[[46]](#_46__Jing_Hei_Mi_Tai_Lang____Hei)9月5日返回日本。

這一年，三條考慮讓黑田擔任右大臣，以便填補因巖倉逝世而留下的職位空缺。他征求伊藤的意見。伊藤回答道，沒有人比黑田更適合這個職位，并承諾將竭盡所能給予協助。黑田有意接受這一委任，但當三條向天皇奏明時，得到的卻是出乎意料的答復：右大臣一職責任重大，必須要由德識名望皆備的人擔任，黑田很難說適合。天皇頗有深意地補充說，如果黑田擔任這一職務，他將很快發現實權掌握在伊藤的手里，很可能會憤懣不平。[[47]](#_47__Jing_Hei_Mi_Tai_Lang____Hei)

隨后，三條提議讓伊藤擔任右大臣，但伊藤意識到如果接受，那就是在鞏固太政官制這一腐朽的官僚制度，從而失去了廢除它的機會。伊藤拒絕，并堅持任命黑田擔任右大臣。他們將此事再次稟報天皇，天皇詢問是否所有的參議都同意任命黑田。事實上，天皇敬重的一位人士——參議佐佐木高行——并未參與定奪。佐佐木私下里反對黑田，批評黑田目無法紀，有很多不好的傳聞，尤其是他還酗酒。[[48]](#_48__Jing_Hei_Mi_Tai_Lang____Hei)三條大概是通過威脅罷免佐佐木的參議一職才最終說服他不要提出反對意見。

大概是因為在北海道有功，黑田才被提名為右大臣，但是，讓現今的讀者摸不著頭腦的是，為什么一個嚴重涉及1881年北海道開拓使出售官產丑聞的人能夠被提名擔任政府第三高的職位？此外，黑田的個人生活也絕不是無可非議。他是明治時期政界中有名的酒鬼，有時候因喝酒太多而無法處理復雜的問題。酗酒經常導致他脾氣暴躁。他的妻子于1878年“神秘”離世。[[49]](#_49__Jing_Hei_Mi_Tai_Lang____Hei)

三條告知黑田他獲得了參議的一致支持，但令他再次驚訝的是黑田拒絕，表示自己不配擔任連西鄉隆盛或大久保利通都未曾獲得的職位。他還提到，自己不愿成為伊藤的上級。無論這些是否是真實感受，但他很可能已經聽說了天皇和佐佐木的反對，并且還意識到了三條和伊藤是出于怎樣的動機才會支持他。就這樣，黑田暫時從公眾視野中淡出。盡管一直有謠言說是他殺死了自己的妻子，但11月11日，天皇親臨黑田的宅邸，讓黑田感到非常寬慰。[[50]](#_5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三條實美建議天皇任命黑田清隆擔任右大臣，其目的是為了在政府中維持長州藩勢力（以伊藤為代表）和薩摩藩勢力（黑田是薩摩藩人）的平衡。他還希望鞏固太政官制。三條懷疑伊藤正在計劃重組政府，創建一個由伊藤擔任內閣總理大臣的內閣。伊藤意識到三條有多么不愿意放棄其職位，于是決定假裝迎合他，并支持他推薦黑田的提議。[[51]](#_51__Jing_Hei_Mi_Tai_Lang____Hei)

與此同時，伊藤變革政體的計劃漸趨成熟。[[52]](#_52__Ban_Ben_Yi_Deng_Zai___Yi_Te)廢止太政官制有利于創建一個由總理大臣領導的內閣，那不僅是一次在行政層面進行的變革，還將標志著有名無實的貴族統治的終結，而士族成員取而代之居于領導地位。

可以理解的是，三條對即將失勢感到驚愕沮喪，然而，當天皇下令仔細研究如何重組政府時，他并沒有提出反對意見。12月22日，三條覲見天皇，主張改革政府，并請求罷免自己的職務。[[53]](#_5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天皇恩準，同一天，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參議和各個機構的長官等職務被廢止，由議會內閣所取代。議會內閣由總理大臣以及九個分支機構的長官組成。伊藤博文被任命為總理大臣[[54]](#_54__Nan_Yi_Yong_Ying_Yu_Miao_Sh)，井上馨擔任外務大臣，山縣有朋擔任內務大臣。[[55]](#_55__Ji_Di_Yi_Jie_Yi_Teng_Nei_Ge)

內閣成員的挑選工作按照伊藤的建議進行。起初，天皇不同意任命森有禮擔任文部大臣，因為森有禮可能偏向基督教，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但伊藤毫不讓步。他向天皇保證，在他擔任內閣總理大臣期間，不會發生破壞和平安寧的事情。已經將組建內閣的事情交由伊藤負責的天皇決定暫時允許其自主行事，自己則靜觀其變。[[56]](#_5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此刻，伊藤已經獲得了最高職務，地位僅次于天皇。鹿鳴館的精神取得了勝利。

1. [[1]](#_1_38)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58頁。

1. [[2]](#_2_38) 法國從文藝復興時期到古典主義時期典型的屋頂形式，為四坡兩折，每一坡被折線分成上下兩種坡度，下部坡較上部坡陡一些，屋頂多設老虎窗，與復斜式屋頂相似。——譯注

1. [[3]](#_3_38) 北非及伊比利亞半島的阿拉伯人的建筑風格，屬于一種伊斯蘭教風格。——譯注

1. [[4]](#_4_38) 磯田光一，《鹿鳴館の系譜》，第23頁；另請參閱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116頁；他說，建造這棟建筑的費用由外務省、陸軍省以及其他機構和東京都共同承擔。

1. [[5]](#_5_38)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7頁。“鹿鳴館”是由井上馨夫人的前夫中井弘取名。中井不僅精通中國詩詞，也是一位巴黎通；他在京都創辦了類似于歌舞演出的京都歌舞會（第51頁）。盡管鹿鳴館主要用于舉辦舞會、宴會、義賣和類似社交活動，但一些外國貴賓駐留東京時會待在鹿鳴館。“鹿鳴館”得名于《詩經》第161篇，詩歌是這樣開頭的：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Arthur Waley, "aid-BFO", p. 192）

1. [[6]](#_6_38) 具體菜單，請參閱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189—190頁。

1. [[7]](#_7_38) 一位卓有成就的老師是德國人約翰內斯·路德維希·詹森（Johannes Ludwig Janson），他是東京駒場農學校的老師（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165—167頁）。

1. [[8]](#_8_38) 1887年7月9日的《女學雜志》，轉引自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174頁。

1. [[9]](#_9_38)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164頁。

1. [[10]](#_10_38) 如需查看這幅漫畫的照片，請參閱《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215頁。

1. [[11]](#_11_38) 法國小說家，著有《冰島漁夫》、《菊子夫人》等。——譯注

1. [[12]](#_12_38)  外國人以知道東京的舊稱（江戶）而自豪，直到1885年也不太愿意使用新名稱東京。該章節選自Pierre Loti,"aid-BGE"’automne。

1. [[13]](#_13_38)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23頁。

1. [[14]](#_14_38) 近藤富枝，《鹿鳴館貴婦人考》，第154頁。

1. [[15]](#_15_37) 近藤富枝，《鹿鳴館貴婦人考》，第146頁。四年前，在卡拉卡瓦國王訪日期間，末子曾擔任皇后的翻譯（詳見本書第34章）。

1. [[16]](#_16_37) 如需了解部分出席的嘉賓和貴賓的名單，請參閱近藤富枝，《鹿鳴館貴婦人考》，第187—189頁。照片上顯示兩名政府成員裝扮成福神惠比壽和大黑天神，兩名女士分別扮成能劇《松風》中的松風和村雨，詳情請參閱《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177頁。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32—733頁。

1. [[17]](#_17_37) 1852年，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調任巴黎所在的塞納行政區任行政長官。十八年任期內，奧斯曼啟用了著名的城市建筑師歐仁·貝爾格朗德等一批建筑師、規劃專家和水利專家，對巴黎市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譯注

1. [[18]](#_18_36) James E. Hoare,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p. 95.

1. [[19]](#_19_36)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70頁。1883年12月11日，外務卿為此向日本駐英公使森有禮發送了一份備忘錄。

1. [[20]](#_20_35)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71頁。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272頁。普倫凱特的親切友善和巴夏禮的毫不妥協形成鮮明對比，使巴夏禮（在1886年7月）贏得了明治天皇的稱贊。天皇準許接見巴夏禮，并在接見中表達了感激之情。關于天皇在該場合發表的講話的全文（包括對德國公使的類似態度的稱贊），見《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615—616頁。

1. [[21]](#_21_35) James E. Hoare,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p. 95.

1. [[22]](#_22_34) James E. Hoare,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第72頁。另請參閱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31頁。

1. [[23]](#_23_34)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47—448頁。

1. [[24]](#_24_32) 11月19日，皇后和皇太后前往鹿鳴館，但不是去跳舞或參加宴會。當時在舉辦慈善義賣，她們購買了一些物品（《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97頁）。天皇不喜歡過度吹捧西洋的東西，加之他遵從儒家思想中關于統治者言行舉止需要得當的教誨，因而沒有參加鹿鳴館的舞會。但有傳聞說，1885年6月天皇在訪問彰仁親王時，他詢問“dance”（跳舞）是什么意思。親王與妻子共舞一支，以此回答天皇的詢問，天皇對舞蹈表示贊許。關于該傳聞，請參閱近藤富枝，《鹿鳴館貴婦人考》，第186頁；對于此次訪問，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21頁。

1. [[25]](#_25_32) 8月在巡幸時，天皇派遣能久親王視察曾遭受洪水重創的大阪、京都和滋賀等地。在滋賀，河流沖毀了超過2000個地方的堤壩，近40000面臨饑餓威脅的人們獲得了援助。這些人里面有23000人之后生活難以自足（金井之恭，《西巡日乗》，第628頁；《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62—463頁、第468—469頁）。

1. [[26]](#_26_32)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77頁、第382頁、第385頁。

1. [[27]](#_27_3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26頁、第443頁。

1. [[28]](#_28_28)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04頁、第510頁。

1. [[29]](#_29_28) 如需了解關于巡幸的描述，請參閱金井之恭，《西巡日乗》，第604—631頁。

1. [[30]](#_30_26) 在用盡所有形容詞來描述逐漸上升的高溫后，8月10日，《明治天皇紀》的嚴謹編纂者聲稱高溫像箭一樣刺穿人體（“炎日射人”）。

1. [[31]](#_31_24)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53頁。

1. [[32]](#_32_23)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75頁。

1. [[33]](#_33_22) 致歉信的全文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65頁，明治的簡短答復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66頁。朝鮮國王稱明治為“大皇帝”，自稱為“大君主”。明治稱朝鮮國王為“大王”。

1. [[34]](#_34_22)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67頁。

1. [[35]](#_35_20)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69—370頁。

1. [[36]](#_36_19) 如需了解三條函件的全文，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73頁。

1. [[37]](#_37_15) 史稱《中日天津條約》或《朝鮮撤兵條約》。內容包括中日同時從朝鮮撤兵；中、日均勿派員在朝教練；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等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如要派兵，應先互相行文知照等。——譯注

1. [[38]](#_38_12)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97—398頁。日本的對外政策不夠堅定，這惹惱了很多日本人。很多日本臣民密謀殺害朝鮮領議政\*和事大黨的其他成員，并用樸泳孝、金玉均和其他開化黨人取而代之，以讓朝鮮脫離清朝的枷鎖而取得獨立，消除清朝的影響力。他們認為這也有助于在日本創建一個議會政體。于是，20多名日本人橫渡到朝鮮，打算謀害事大黨。他們起草了一份告示，并在全國散發。但是，由于缺乏資金和密謀集團的內部沖突，他們被逮捕。共計約130名日本人涉事，1887年4月在日本對其中的58名進行了審判。（《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00—502頁）（\*領議政：朝鮮最高行政機關議政府的最高領導人，相當于中國的宰相或丞相。——譯注）

1. [[39]](#_39_1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05—406頁。

1. [[40]](#_40_10)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06頁。這一信息記錄于德大寺實則的日記（而非官方記錄）之中。伊藤不是唯一一個在該場合獲得獎賞的人士，井上馨因努力解決漢城局勢而獲得10000日元的獎勵，西鄉從道和榎本武揚各獲得6000日元的賞賜。5月9日，井上從天皇手中接過賞賜，但是其他人獲賞的日期沒有定下來。

1. [[41]](#_41_10)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33頁。

1. [[42]](#_42_10)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36頁。皇室為這次訪問做了很充裕的準備，天皇向伊藤賞賜了一套刻有皇冠的銀杯、一對刻有皇冠的青銅花瓶和1000日元。天皇是因為看重本次訪問才給予這些賞賜，而不是對伊藤在清朝取得的成果給予獎賞。

1. [[43]](#_43_8) 井黑彌太郎在《黒田清隆》一書的第91—92頁對導致1873年任命黑田擔任陸軍中將的奇怪情形進行了描述。山縣最初反對這一任命，熾仁親王聲稱此舉只會招致災難。

1. [[44]](#_44_8)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15—16頁。

1. [[45]](#_45_8)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71頁。5月底，黑田在上海，當從南方前往北京時，他給三條發了一封電報，描述了歐洲帝國主義列強最近在東亞采取的動作。他還提到自己聽到的廣州和福州海岸的防御。

1. [[46]](#_46_7) 井黑彌太郎，《黒田清隆》，第195—196頁。

1. [[47]](#_47_6) 井黑彌太郎，《黒田清隆》，第200頁。

1. [[48]](#_48_6) 井黑彌太郎，《黒田清隆》，第201頁。毫無疑問，當佐佐木向天皇闡述其觀點時，天皇受到了影響。

1. [[49]](#_49_6) 井黑彌太郎，《黒田清隆》，第118頁。有傳聞說黑田在酒醉的狀態下將妻子刺傷或毆打致死。

1. [[50]](#_50_6)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03頁。當天皇訪問一些政要顯貴的宅邸時，通常都會舉辦能樂演出以款待天皇，但黑田在其宅邸中專門修建的圓形場地內舉辦相撲比賽，以此接待天皇。

1. [[51]](#_51_4) 井黑彌太郎，《黒田清隆》，第198—199頁。

1. [[52]](#_52_1) 坂本一登在《伊藤博文と明治國家形成》一書中描述了伊藤成功地穩步推進其政府改革方案。如需了解伊藤在1883年（此時伊藤從歐洲回來，他在那里考察普魯士憲法）和1885年（此時他的內閣政府方案得到天皇的恩準）間的活動，請參閱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國家形成》第105—136頁。

1. [[53]](#_53_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14頁。如需了解他為了說明原因而向天皇呈遞的奏折，請參閱第514—516頁。

1. [[54]](#_54_1) 難以用英語描述政體變革。之前的政體（太政官制）由三位大臣組成：太政大臣、左大臣和右大臣。此外，還有八個部門的長官——卿。按照內閣制，設有一位總理和九個部門的長官——大臣。伊藤致力于建立一個像英國一樣的議會民主制，內閣由同一政黨的成員組成，向選舉他們的民眾負責。英語單詞“minister”，不僅翻譯成總理和大臣，也翻譯成駐外國的公使。

1. [[55]](#_55_1) 即第一屆伊藤內閣（1885年12月22日—1888年4月30日）。——譯注

1. [[56]](#_56_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16—517頁。如需了解天皇于12月23日宣布重組政府的相關詔書，請參閱第518—519頁。

# 第三十九章 太子嘉仁



明治十九年（1886年）不同于往年，這一年并沒有在傳統的新年儀式中拉開帷幕。官方記載中沒有做出進一步的解釋，只是說天皇因病無法舉行四方拜，由鍋島直大代為操持各類儀式。然而，天皇卻和往常一樣出席了其他慶典，表明其并沒有病到完全不能舉行儀式的程度。在這一年中，官方記錄一次次地談及天皇的健康狀況，以解釋為何沒能參加某個慶典，但是，天皇到底得了什么病卻沒有記錄。[[1]](#_1__Ru_Xu_Le_Jie_Ti_Dao_Tian_Hua)我們還知道，1886年，天皇經常騎馬，次數是前一年的兩倍，[[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表明厭倦官方儀式（而非生病）才是天皇一再缺席的原因。

2月，子爵土方久元從柏林給三條實美發函一封，描述了威廉一世的九十歲壽辰慶典。他敦促對細節了解得一清二楚的外務省德國問題專家青木周藏向天皇進行奏報。土方希望此舉能夠激勵天皇出國游歷，考察外國局勢并會見西方國家的統治者。

時任駐奧地利特命全權公使的西園寺公望在之前寫給伊藤博文的書信中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并認為現在是天皇游歷西方的絕佳機會。[[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如果天皇親自參加柏林的慶宴，目睹這些新奇的景象，也許會擺脫對政事的淡漠態度。但是，不清楚諸位大臣是否奏報，也沒有跡象表明天皇曾經考慮過要出國游歷。

天皇頻繁生病、缺席重要場合的一個后果，就是使得皇后更多地出現在公眾視野，一次又一次地代天皇參加各類活動。在此之前，皇后的公眾活動有限，但現在甚至開始出現在通常僅有男性貴族和政府高官出席的聚會上。例如，當天皇因身體不適而明顯無法出席原定在3月26日舉行的星期五晚宴時，皇后便代其參加，并邀請宮中女官和政府高官夫人陪同她一起。



內田九一拍攝的美子皇后。截止到1886年，美子皇后依然穿著日本傳統的和服，但此后大部分時候都穿西式服裝

天皇計劃于3月30日訪問橫須賀造船所，為軍艦“武藏”號舉行下水儀式，但當日身體不適，皇后便代其前往。她坐車到達橫須賀，登上了“扶桑”號軍艦。即使在天皇出席慶典的情況下，皇后通常也會陪伴左右。4月13日，他們前往赤羽村觀摩近衛軍演習。“南軍”和“北軍”之間的一場模擬戰爭也許讓不懂兵法的皇后迷惑不解，但據我們所知，皇后坐著馬車觀看了南軍的追擊，隨后前往荒川南岸觀看炸毀橋梁。[[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7月30日，在視察貴族女子學校、觀看畢業典禮和授予文憑時，皇后第一次身穿西式服裝出現在公眾場合。8月2日，她去青山御所探望皇太后時，也穿的是西式服裝。從那時起，不僅僅是皇后，就連大多數女官也逐漸開始穿起洋裝。8月10日，天皇和皇后在宮中舉辦西洋音樂演奏會時，皇后第一次身穿西式服裝迎接外賓。她的這種裝扮方式也許并不是在模仿西方（鹿鳴館中的裝扮方式），而是在無聲無息中彰顯出她的新式著裝風格。

1887年1月17日，皇后頒布了關于女性著裝的《思召書》。她認為當代日本女性的著裝風格是十四世紀南北朝戰亂時期的遺風，不僅無法適應現代生活，也與早期日本女性所穿的服飾截然不同。同目前所穿的和服相比，事實上西式服裝與古代日本女性所穿的服飾更為接近，“宜效之以為我之制”。除了鼓勵日本女性穿西式服裝外，她還希望此舉能夠推動日本布匹的銷售。

皇后的服飾改革倡議，是其在政府中所起到的新的積極作用的部分體現。1886年11月26日，她和天皇前往長浦，視察最近完成的巡洋艦“浪速”號和“高千穗”號，并觀看海軍演習，包括發射魚雷。當天，皇后作了幾首短歌，包括一首名為《魚雷火》的短歌：

今得觀魚雷

一發掃射千里晃

不懼列強猖

縱有堅船掀波浪

定當摧毀把威揚

毋庸諱言，這首詩的主題并非傳統樣式。皇后開始穿起西式服裝、創作以魚雷為主題的新式題材詩歌，大概是因為她也已經厭倦了宮廷生活。留有宮中歲月回憶錄的侍從們一致認為天皇一直很體貼皇后，從不會表現得像個暴君。然而，皇后在婚后不久便得知她永遠不能生育，而這是天皇的正室應履行的最重要角色。因此她在宮中只能作為擺設。對一位聰明過人的女性來說，這一定是件很讓人心灰意冷的事情。即使她從來沒有對伺候天皇就寢的各個典侍表現出不滿，但可能會嫉妒她們。尤其是天皇（擁有不同的女子為他生育的四個孩子，并且還會臨幸其他女子）似乎把心思主要放在典侍園祥子的身上時，那種感受可能會增強。[[5]](#_5__Ju_Shan_Chuan_San_Qian_Zi_Su)那些敢于描寫天皇這方面生活的作家都十分小心謹慎，但事實上，園祥子在1886年到1899年間生育了天皇的最后八個孩子。其中有四個孩子都是女孩，在天皇駕崩后仍在世。

園祥子是伯爵園基祥的長女。[[6]](#_6__Yuan_Ji_Xiang_Shi_Yuan_Ji_Ma)園基祥（于1905年逝世）在幕未時期的活動最為人所知。從照片上看，祥子并沒有非凡的美貌，也沒有趣聞軼事可以解釋她有什么品質能讓天皇如此著迷，但無論出于何種原因，在天皇的晚年，祥子是他偏愛的同床共枕之人。

1885年底，當證實祥子懷孕時，對于她應接受哪一種醫學治療爭論不休。[[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天皇之前有七名子女，但有六名夭折，這使得人們質疑是否應該繼續信賴傳統醫學，還是說采用西醫醫生可能更好。天皇向中山忠能征求意見。中山無論是在醫學還是在其他方面都忠于傳統方式，但在1883年9月兩名小公主夭折后，他開始動搖自己的信念：在皇室子女滿十歲之前，應由學習傳統醫學的醫師負責治療。現在，他愿意承認傳統醫學不一定優于西方醫學。此外，東京似乎還沒有一位頗有名望的傳統醫師，而且中山擔心傳統醫術可能會就此消亡。最后，他答復說他無法在這兩種醫學中做出選擇。仍偏向傳統醫學的明治命令中山和侍從長遍尋東京，直到他們找到一名傳統醫學名醫為止。[[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1886年2月10日，園祥子產下了天皇的第五個女兒靜子公主。天皇給公主取名，當晚宮中舉行了慶典，皇族親王和其他達官顯要（包括嬰兒的外祖父伯爵園基祥）都參加了慶典。[[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3月12日，公主被帶入宮中讓天皇探視，這是天皇第一次見到公主。和天皇側室生育的其他子女一樣，公主將被正式認定為是皇后的孩子，至于公主的養育，她的生母不會過多地參與其中。

靜子公主的一生相當短暫。1887年4月4日，公主夭折。前一年的元旦，公主突然發燒、吐奶。她被診斷為長牙時發燒，并且出現了令人不安的腦膜炎早期癥狀，而腦膜炎是造成天皇之前多名子女夭折的罪魁禍首。一位在荷蘭學醫的醫生和另一位傳統醫師對適合的療法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最后只好征詢天皇的意見。天皇支持西醫的建議，并命令最受尊敬的西醫池田謙齋一同參與商議。起初，新的療法似乎很有效，然而，3月下旬的一次寒潮讓公主再次發燒，不久后公主夭折。

天皇唯一幸存的皇子——嘉仁親王——反復遭受疾病的折磨。由于再三經歷失去子女的痛苦，天皇想必非常擔心嘉仁是否能夠活到成年。這可能是為什么天皇同意彰仁親王的請求，納定麿親王為養子的原因。這個年輕人現在是名海軍軍官，在英國學習，1886年5月1日被正式領養，（作為皇族親王）改名依仁。[[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正如前文所述，定麿親王給卡拉卡瓦國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國王希望這位日本親王能夠與他的侄女結婚。也許明治也將依仁視作一位可能的繼承人。

盡管天皇擔心嘉仁的健康狀況，但仍有必要把嘉仁當做會毫無疑問地繼承王位一般對待。多年來，親王的教育一直是天皇關心的頭等大事。1885年12月，天皇安排西村茂樹負責親王的教育。選擇西村這位推崇西洋學說的專家，表明天皇覺得傳統的宮廷教育已經無法適應現代形勢。[[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天皇親自將他希望親王在來年學習的科目和課時告訴了西村。盡管已經規定嘉仁只能在特定的時間探視父母，但一個月后，也就是1886年1月，天皇決定，如果嘉仁想進宮參見，應予以恩準。采取這一舉措，是因為天皇認為這是一個向親王灌輸尊重父母、和父母培養感情的絕佳方式。

1886年4月，勘解由小路資生和另兩名上了年紀的貴族奉命輪流給親王授課，但他們的教育觀念陳腐守舊，沒法成功教導這個讓人頭疼的男孩。非常希望親王獲得系統教育的伊藤博文與文部大臣森有禮商議。森建議應按照現代理念對親王進行教育，提議讓文部省官員湯本武比古（1857—1925）擔任親王的老師。4月12日，湯本被任命為親王的老師。

湯本奉命教授閱讀、寫作和算術，每次授課不超過三十分鐘。不過，湯本很快發現親王完全不遵守紀律，注意力很容易分散。湯本回憶道：

臣已奏報過，臣的課程（諸如五十音圖和1、2、3之類的知識）委實不難。然殿下對規則之事毫無概念，在此方面無甚進步。若殿下喜歡，學習三四十分鐘；但若殿下不喜，則叫道“湯本，夠了。”隨即起身離去。一直在走廊等候的侍從和護衛，以及坐在教室課桌前的其他同學，遂跟隨殿下一同外出，獨留臣一人在教室，茫然不知所措。若殿下心情不佳，則會猛推面前的課桌，然后去往他處。曾有一次，在教授書法時，殿下說，“湯本，已經可以了。”臣回答，“不，殿下需再練習少許。”殿下因此大發雷霆，拾起一支蘸有紅墨的大毛筆，對著臣扔過來。毛筆落在臣的胸膛，滴在臣最好的、嶄新的大衣上，墨汁遍染衣衫。[[12]](#_12__Fan_Ze_Kuang____Yi_Shi_Ming)

為什么嘉仁的言行舉止如此無禮？大概是因為身邊的人擔心責罵親王可能會導致他抽搐，于是事事由著他。[[13]](#_13__Gen_Ju___Ming_Zhi_Tian_Huan)湯本向宮內大臣伊藤博文遞交了辭呈，但伊藤勸說他繼續擔任親王的老師，說這是忠臣應盡的職責，還說湯本應當具備不亞于軍人的犧牲精神。

天皇得知了兒子在課堂上反復無常的行為。根據湯本的奏文，天皇令親王稱呼其為“湯本老師”，并在沒有得到老師指示的情況下不得離開座位。此外，天皇命令湯本整天和親王待在一起，以期對親王的行為進一步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天皇還命令侍從和女官（有時派遣天皇自己的侍講）前往教室，視察湯本的授課。當天皇詢問湯本為何不按照元田為教導幼童所挑選的課本時，湯本回答說這些課本內容高深，不宜用于教親王。湯本編寫了新課本，親王開始有了迅速的進步，這讓天皇松了一口氣。[[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5月，伊藤宣布，天皇決定讓嘉仁和其他貴族子女一同入學習院就讀。

9月，仍然為親王的教育事宜憂心忡忡的天皇任命朝廷要員土方久元負責親王的教育。土方接受重任，但前提條件是不允許任何人干涉他的決定。天皇恩準，并派侍從長告知中山慶子從今以后不再需要教導親王。此外，天皇還指示湯本就所有教育事宜與土方商議。慶子拒絕剝奪教育外孫的權利。10月，土方遵旨，同意與慶子分工負責，慶子將負責在宮中撫育親王相關的各項事宜，包括親王的日式著裝和膳食。最后，按照醞釀已久的計劃，嘉仁于1887年9月19日進入學習院。他每天去學校，在其他男孩的陪同下學習，他的課桌與其他人的課桌并排靠在一起。[[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這是王位繼承人第一次接受公共教育。

1886年底，西村茂樹在帝國大學發表了三次關于日本道德的演講。[[16]](#_16__1886Nian_3Yue_1Ri_Jiang_Don)曾是明六社[[17]](#_17__Ri_Ben_Ming_Zhi_Chu_Qi_Xin)成員的西村，以前經常在天皇面前講解有關西方的內容，之后也是如此；但這三次演講——后來結集出版為《日本道德論》——絕不是號召向西方學習。

數年之后，西村回憶說，當時伊藤內閣效仿西方的法律制度、風俗習慣和禮節禮儀，盲目地舉辦模仿西方的娛樂活動（如舞會、化裝舞會和舞臺劇），以求外國人的歡心。他將這種諂媚奉承與日本悠久的道德觀（如忠孝、節義、勇武、廉恥等）進行比較，反對拋棄這些美德。他為這一現象感到悲痛，由此發表了這些演講。[[18]](#_18__Xi_Cun_Mao_Shu____Ri_Ben_Da)

第一篇演講以探討兩種思想體系在道德方面的差異為開篇。第一種他稱之為“世教”，第二種稱為“世外教”（或宗教）。他將儒教和西方哲學歸為第一類，將佛教和基督教歸為第二類。顯而易見，他贊同第一種。在中國，儒教是一個起源于遠古時期的中國本土思想體系，但佛教只是一個外來的宗教，影響力不及儒教。然而，在日本，儒教和佛教都是外來的。起初，這兩者被社會各階層所接受；可是在隨后的時代，盡管下層階級依然信奉佛教，但只有極少數的中上層階級仍保持這一信仰。因此，日本人缺乏一個所有階層均接受的普世道德觀。事實上，自明治維新時起，所有的道德標準都已銷聲匿跡。[[19]](#_19__Xi_Cun_Mao_Shu____Ri_Ben_Da)

現在，亞洲受到歐洲列強的威脅，歐洲各國紛紛建立殖民地。飽受威脅的亞洲國家不顧一切代價爭取實現現代化。西村評論說，“文明開化固應希望之事，然有國則需文明開化，若失其國，則文明開化無可實施之所。”日本的關鍵任務是保持國家獨立，不容許外國踐踏其尊嚴。無論一個國家擁有多少軍艦大炮，如果其人民道德淪喪，那么它也不會得到其他國家的尊重。歷史告訴我們，羅馬帝國的衰落乃是民眾墮落和道德缺失所致。或者我們可以回顧一下近代歷史上最可悲的例子——波蘭。雖然波蘭人不像羅馬人那樣墮落，但他們分裂成幾個派系，沒有力爭維護國家的統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波蘭落得個被一分為三的下場。[[20]](#_20__Xi_Cun_Mao_Shu____Ri_Ben_Da)西村繼續向日本民眾講述普遍原理：

（日本）農工商三民昔無教育之事，固不足以之論道德之高下，然士族以上之民，祖先以來數代間受儒學之熏陶，加之本邦有一種固有之武道，足有力量以鍛煉人心，盡護國之職。王政維新以來儒教雖稱國教，然勢力大失；如武道之所，至今日已無人言之。[[21]](#_21__Xi_Cun_Mao_Shu____Ri_Ben_Da)

西村對武士階層也道德淪喪感到失望。日本急切地向西方學習，卻忘了歐美各國都信奉某個宗教，以捍衛人們的道德觀。西村概括說：

元來邦人其天資敏捷伶俐者多，然思慮淺薄且乏遠大之識，有雷同之分而自立之志弱。見近來西國學術之精妙，其國力強盛富饒，則漫心醉之，不知己踏足之處。（中略）人情風土之異，西國學術等豈能盡用之于東洋哉。[[22]](#_22__Xi_Cun_Mao_Shu____Ri_Ben_Da)

西村主張回歸儒教的道德規范。雖然他并沒有指出自己偏愛儒教的哪個學派，但他強調將所學道德規范付諸實踐，表明他或許推崇王陽明的學說。不過，西村并沒有掩飾儒教和西方哲學的缺點，并且還承認佛教和基督教各有優點，都可以加以采用。他指出，最關鍵的是要為現代日本創建一個道德規范，一旦建立，可以就具體內容向其他思想體系借鑒。[[23]](#_23__Ru_Xu_Le_Jie_Ru_Jiao_De_Wu)

西村倡議的道德規范的具體內容并沒有讓人感到意外。他支持教育和施舍窮人，支持投資有利于國家的企業；另一方面，他將日本的退休制度與西方人民長期而充實的生活進行比較，批評男性在四五十歲這樣早的年紀不繼續為社會做貢獻反而退休。他不贊成早婚，因為尚未完全發育成熟的夫婦生下的子女容易感染疾病，使得整個民族身體虛弱。此外，早婚往往導致生育眾多子女，造成家庭貧困。此外，西村反對奢侈，尤其是在婚禮和葬禮上鋪張浪費。[[24]](#_24__Xi_Cun_Mao_Shu____Ri_Ben_Da)

很難想象有人會不同意他的大部分建議，人們對于西村的演講非但贊成，簡直是壓倒性地支持。接受過儒教教育的人——大多為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武士階層——紛紛響應擁護舊風俗的號召。與西村同為明六社成員的文部大臣森有禮一向主張進步，但他被《日本道德論》深深打動，表示要把它用作從中學到大學的課本。[[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然而，這本書卻激怒了伊藤博文，他認為此書誹謗政體，阻礙了政治進步。他派人請來森有禮，痛斥森有禮對此書大加贊揚。得知伊藤不悅，西村承諾進行修改，隨后他刪除了幾篇批評政府的親西方政策的文章。然而，他已經挑戰了政府的功利主義。西村的書，是對伊藤的政策的初次反對聲明，成為了不久后日益突顯的極端民族主義的開端。

1886年需要提及的另一個事件，是英國貨輪“諾曼頓”號（Normanton）沉船事件。10月23日，“諾曼頓”號從橫濱起航前往神戶，在準備進入和歌山縣時觸礁破損。盡管英國船員悉數獲救，但他們并沒有對二十五名日本乘客及十二名印度船員施以援手，這些人全都溺水身亡。在此次災難被廣為人知后，日本人對于英國船員表現出來的明顯的種族歧視提出了強烈抗議。11月5日，“諾曼頓”號的船長約翰·威廉·德雷克（John William Drake）在位于神戶的英國領事館接受審訊，但因無過失而被開釋。

剛開始，急切渴望贏得外國人認可的日本領導人并沒有抗議，但全國各地的呼聲如此強烈，政府無法再置之不理。報紙為在“諾曼頓”號事件中喪生的遇難者家庭募捐，民眾發表演講，對公然炫耀“白人至上”憤怒不已。最后，政府正式要求英國對船長進行審判（由于治外法權，日本無法干涉）。12月8日，審判在位于橫濱的英國領事館進行。德雷克船長犯有過失罪，被判監禁三個月，其他英國船員無罪。[[26]](#_26__Gai_Xu_Shu_Zhu_Yao_Chu_Zi_C)然而，“諾曼頓”號事件仍然留在日本人的記憶里，特別是一首為此次災難譜寫的歌曲一直傳唱。[[27]](#_27__Ru_Xu_Le_Jie_Fan_Yi_Ban_Ge)

盡管一些精通海事法的日本人認為判決公平，但對德雷克的輕微處罰無法令大多數日本人滿意。[[28]](#_28__Bing_Fei_Zhi_You_Ri_Ben_Ren)“諾曼頓”號事件和西村關于日本道德的演講彰顯出了一種與鹿鳴館式的崇洋背道而馳的趨勢，為翌年發生更嚴重的抨擊政府的事件定下了基調。

1887年初的新年儀式在方方面面都按照傳統方式進行，但有一點除外：在接受宮中成員的新年祝福時，皇后身穿正式的西式禮服。西式服裝已成為皇后在此類場合的慣常服裝。“諾曼頓”號事件的不滿呼聲似乎并沒有傳到宮中，日本皇室與外國皇室交換禮物的風氣有增無減。[[29]](#_29__Ran_Er__Ye_Xu_Ri_Ben_Zhao_T)推遲了很長時間的新宮殿建造計劃最終開始，但財務問題顯現，威脅到了宮殿的完工。

1月25日，天皇和皇后動身前往京都，參加1月30日在孝明天皇陵舉行的儀式，二十年前的1月30日孝明天皇駕崩。[[30]](#_30__1Yue_14Ri_Di_Da_De_Huang_Ta)這次行程最值得一提的是皇后的出席。除此之外，此次京都之行、視察學校和參觀名勝古跡與天皇此前的出行并沒有什么差別。天皇夫婦在京都一直待到了2月21日。

2月24日，天皇夫婦回到東京，并恢復了各項日常活動。皇后視察了學校，包括工部大學和陸軍大學。[[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4月，皇后陪同天皇觀摩了近衛軍演習。她已經成為了官方活動（甚至是軍事演習）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1887年3月，皇后賜給貴族女子學校兩首鼓舞人心的歌。第一首是這樣開頭的：

純凈剔透晶瑩鉆，

千磨萬擊倍璀璨。

此言此理與人同，

勸君惜時莫留恨。

學問功夫須勤力，

危時報國顯本真。[[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隨后這首歌被配上旋律，成為了貴族女子學校的校歌。這首言辭懇切的道德之歌讓人想起該時期抗議者的呼聲，但親西方派的政府領導人不受這種美德呼聲的影響，仍頻繁出入鹿鳴館，[[33]](#_33__Dong_Jing_Ju_Le_Bu_Cheng_Li)希望借此熟悉和掌握西方禮儀，為日本贏得西方先進國家的友誼和尊重。他們確信，克服日本財務和軍事弱點以及保持日本獨立的最佳方式，就是證明日本是一個有著和歐洲人相同文化的現代化國家。為此，他們穿歐洲人所穿，吃歐洲人所吃，極力消除社會的陳舊方面。一些人不僅愿意采用西方的法律制度，還信奉基督教，并且愿意將英語作為國語；另一些人（為提高日本國民的身體素質）準備娶歐洲女人為妻。[[34]](#_3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為滿足鹿鳴館的歌舞升平而源源不斷流出的錢財與絕大多數人的貧困生活形成了鮮明對照，激起了反對的浪潮。堅定的儒學者元田永孚多次試圖會見伊藤，以表達對大肆建造西式建筑和舉辦奢侈宴會的不滿，但伊藤總是借故繁忙而不見。1887年5月，勝海舟發表了《二十一條時弊》，譴責為了采納西洋文化而破壞日本本土美德的瘋狂行為。在德川時代后期，勝為掌握航海和艦炮射擊術而學習荷蘭語，并擔任“咸臨丸”號的船長。“咸臨丸”號是日本第一艘橫渡太平洋的船艦。他當然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儒學者，但政府的西化政策對日本社會風俗造成極壞的影響，令他非常憤怒，這一點不亞于元田。他認為國家大肆浪費財富，造成了道德敗壞。

與此同時，為廢止治外法權，1887年4月22日的第二十六次修約會議決定對外國人做出極大讓步。他們同意在交換新條約批準文書后的兩年內，日本整個國土將向外國開放；日本國民享有的權利和特權將擴展到駐日外國人；兩年之內，日本的法律制度將在所有方面符合西方的實踐標準；日本將把所有法律翻譯成英文（英文譯本將視同正本），并在十六個月內送交各國政府；在日本完全向外國人開放國門后，領事法庭將持續三年；審判涉及外國人案件的大多數法官應由外國人擔任。[[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只要能夠結束讓日本人憎惡的治外法權、象征性地承認日本的平等地位，日本似乎準備屈服于外國提出的任何要求。

然而，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愿意做出這樣的讓步。近期剛從歐洲回國的農商務大臣谷干城[[36]](#_36__Zai_Ou_Zhou_Dai_Le_Yi_Nian)目睹當時的道德墮落后震驚不已，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伊藤聽說了谷干城贊揚盧梭和其他法國民權擁護者以及抨擊政府的傳聞，認為谷干城受到了煽動性民權思想的影響。天皇聽聞此事，對內閣大臣持有這種觀點深感不安。他命令佐佐木高行直接詢問谷干城的政治主張。

篤信國粹的谷干城很快便使佐佐木相信其根本不是一名民權論者。但是在7月，就在谷干城辭任前，他對政府的政策發表了措辭嚴厲的抨擊。他要求停止為實現修約做出的努力，并呼吁采取措施扭轉道德淪喪的局面。和西村一樣，谷干城對沉迷于鹿鳴館舞會的人士的頹廢和奢侈感到震驚，他哀嘆百姓正在遭受的苦難，因為他們的血汗錢被白白地浪費在力圖使這個國家歐化上。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伊藤，認為應迅速停止修約中的錯誤做法。谷干城也向內閣提出了同樣的看法，并與井上馨展開激烈的爭論。他不顧有人反對，堅持譴責這項政策，認為這是“貪一時之名，不顧百年之害”。井上和其他人強調，為結束治外法權必須修改條約，但是谷干城問道，讓外國人干涉本國內政豈不是更加糟糕？他痛斥外務大臣獨斷專行，在不征詢其他大臣的意見下秘密決定，犯下了嚴重錯誤。[[37]](#_3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伊藤和井上十分生氣，即刻反駁道，眼下正是日本事事都以西方先進國家作為楷模的時期，修改日本法律以便與西方法律相協調是不可避免的。意識到內閣不會接受他的建議，谷干城決定采取果斷措施。7月20日，他覲見天皇，詳細上奏了反對修改條約和認為必須糾正當前腐化墮落現象的原因。他請求天皇就修約是否可取征詢宮中顧問官的意見，尤其建議向近期從歐洲回國的黑田清隆征詢意見。天皇側耳傾聽，但一言不發。谷干城退下，隨即提交了辭呈。

谷干城提出這一請求，表明他知道宮廷中批評政府的觀點。侍奉在天皇左右的官員（包括佐佐木高行、土方久元和元田永孚）早些時候就曾發表過此類觀點。當谷干城從海外歸國后，他們發現谷干城對修約表現出懷疑，于是決定與他攜手合作，并繼續尋找有類似看法的其他人。很多在政府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包括黑田清隆）都公開反對條約修正案。

當天皇征求元田的意見時，元田說，他認為谷干城已經非常忠誠地說出了他想說的話，放眼全國，沒有一個人不同意谷干城對當下弊端的譴責。元田相信，除非立刻停止為了實現修約而向外國做出的讓步，否則將發生不可估量的災難。[[38]](#_3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擔任內閣法律顧問的法國人古斯塔夫·布瓦索納德（Gustave Boissonade）表示反對條約修正案。他試圖向井上馨提出反對意見，但未果；他向司法大臣山田顯義表明立場時，山田表示自己無法深思此事，因為超出了他的權限范圍。此時，曾嚴重懷疑修約可取性的內閣圖書寮長官井上毅（1844—1895）秘密拜訪了布瓦索納德，聽取了他對條約修正案的反對意見。布瓦索納德確信這會給國家造成極大的危害。井上毅被說服，決定盡一切努力來結束修約。

布瓦索納德堅持不懈地向內閣成員提交意見書，解釋為什么必須停止修約。他認為這將無可避免地損害日本的威望，削弱日本的安全，降低日本民眾的地位。他對條約修正案的各個條款進行了抨擊，包括采用外國法官這一條款：此舉需向外國法官支付令他們滿意的薪水，而這將造成國家資源的大量外流。他警告說，日本民眾對損害日本利益和破壞國家聲譽的行為感到憤慨，一旦新條約獲得批準，日本人民也許會起來反抗，而這有可能導致外國進行干涉。[[39]](#_3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7月12日，井上毅給井上馨寫了一封信，闡明反對條約修正案的原因，宣稱這將使日本淪落到半獨立國家的地步。他還預測國家將被分為支持修約派和反對修約派兩大陣營，可能會引發公開沖突，造成巨大損失。最后，井上馨被迫承認其方案造成了動亂。他說，如果自己只顧埋頭前進，而不對之前就日本法庭的運作與外國列強所達成的約定進行修改，那么將會造成一場全國性的危機。在7月18日的會議上，井上馨告知各國代表，日本政府已經決定對條約中法庭相關事項進行些許改動。

9月17日，伊藤辭去宮內大臣一職，但仍保留內閣總理大臣的職位。起初，天皇不愿意接受伊藤的辭呈，并拒絕伊藤提出的讓黑田清隆接任其職的建議。《皇室典范》尚未制定，皇室財產也沒有系統地界定，而伊藤是唯一一個可以有效處理此類事務的人。對于黑田，由于性格原因，天皇并不希望他長期在宮中任職。天皇向元田永孚征求意見。元田回復說，盡管從原則上來講，在君主立憲制中皇室和國家團結一致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但這取決于一個特定的人，一個忠心耿耿、才能超群的人，例如中國的諸葛亮，普魯士的俾斯麥。伊藤能力出眾，但他道德品質卻稍有欠缺。他繼續在宮中任職可能會造成危害。元田勸天皇接受伊藤辭去宮內大臣一職。[[40]](#_4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天皇不愿失去伊藤，但最后還是接受了伊藤的辭呈，并任命土方久元接任宮內大臣。黑田被任命為農商務大臣。元田提議罷免井上的外務大臣一職，該提議于9月16日實施。此后由伊藤擔任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41]](#_4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盡管這些政治變革極大地擾亂了天皇的情緒，但他這一年并非完全陰郁慘淡。8月22日，園祥子生下天皇的第四個兒子猷仁親王。8月31日，在嘉仁親王9歲生日那天，他被定為儲君，并過繼為皇后的兒子。當晚舉行了生日宴會，天皇、皇后、皇太后和嘉仁出席。三十九名皇室成員和宮內官員應邀參加。天皇心情愉悅，倍感輕松，把賓客一個接一個地叫到身邊。他親自為皇太后、皇后和嘉仁倒上清酒。不久，在酒精的作用下，餐廳內充滿了歡快的聲音。天皇吩咐眾人唱歌跳舞。《明治天皇紀》中說：“蓋君臣愉樂之狀如此者，未曾有之。”[[42]](#_4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確實，在天皇的一生中，這樣的歡樂時光少之又少。

1. [[1]](#_1_39) 如需了解提到天皇病狀的極少數實例，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95頁。該頁記錄天皇患上了胃病。

1. [[2]](#_2_3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30頁。

1. [[3]](#_3_3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42—543頁。

1. [[4]](#_4_3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72頁。不久后，距離天皇的馬車數十步遠的一顆流彈擊中了一位侍從，子彈射穿了他的大腿。近衛軍指揮官認為這是一次極其嚴重的冒犯，于是請求辭職。但是，大約一個月后，天皇認為此次冒犯不至于造成辭職。從此時起，皇后似乎對軍事事務越來越有興趣。1887年3月28日，皇后訪問了陸軍士官學校，視察了該校的各項活動（第721頁）。

1. [[5]](#_5_39) 據山川三千子所說，明治晚年只寵愛兩名典侍——園祥子和小倉文子（《禁斷の女官生活回想記》，第194頁）。小倉沒有孩子，因此未能載入明治妻妾的系譜之中。

1. [[6]](#_6_39) 園基祥是園基茂的第三子。中山忠能的妻子愛子是園基茂的養女。這意味著園基茂既是明治的外曾祖父，又是園祥子的祖父。

1. [[7]](#_7_3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09頁。

1. [[8]](#_8_3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09頁。

1. [[9]](#_9_3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44頁。根據這一敘述，尚不清楚為公主的降生采用了哪一種醫學。

1. [[10]](#_10_3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79頁。

1. [[11]](#_11_3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44頁、第510頁。

1. [[12]](#_12_39) 飯澤匡，《異史明治天皇伝》，第53頁。

1. [[13]](#_13_39) 根據《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630頁記載，與親王有關的一切事務均交由中山慶子（天皇的生母）處理。盡管她對睦仁要求嚴格，但嘉仁身體纖弱，使得中山慶子對他的管教過于寬松。

1. [[14]](#_14_3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70—571頁。

1. [[15]](#_15_38)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808頁。

1. [[16]](#_16_38) 1886年3月1日將東京大學更名為帝國大學。這次更名在文部大臣森有禮的建議下進行，反映出其認為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培養服務于國家的人才這一信念。如需了解與當時帝國大學的結構更改有關的描述，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51—552頁。

1. [[17]](#_17_38) 日本明治初期新型知識分子組成的具有啟蒙性質的思想團體。1873年（明治六年）發起，遂起名“明六社”。成員包括森有禮、福澤諭吉、加藤弘之、西周、津田真道等。——譯注

1. [[18]](#_18_37) 西村茂樹，《日本道德論》，第117頁。此處引用吉田熊次的解說。西村茂樹于12月11日、17日和26日在大學的演講廳發表這一系列演講，并向學生和大多數社團公開。

1. [[19]](#_19_37) 西村茂樹，《日本道德論》，第10—11頁。

1. [[20]](#_20_36) 西村茂樹，《日本道德論》，第12頁、第14頁。

1. [[21]](#_21_36) 西村茂樹，《日本道德論》，第14頁。

1. [[22]](#_22_35) 西村茂樹，《日本道德論》，第15頁。

1. [[23]](#_23_35) 如需了解儒教的五大缺陷（如對身份卑微者不公平、男尊女卑），請參閱西村茂樹，《日本道德論》，第28—29頁；如需了解哲學的四大缺陷，請參閱第31—33頁。

1. [[24]](#_24_33) 西村茂樹，《日本道德論》，第60—64頁。

1. [[25]](#_25_33)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670頁。

1. [[26]](#_26_33) 該敘述主要出自川合彥充，《ノルマントン號事件》，第4—5頁。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644頁、第666—667頁。

1. [[27]](#_27_32) 如需了解翻譯版歌曲（“諾曼頓號沉沒之歌”）的開頭和作曲，請參閱William P. Malm,Modern Music of Meiji Japan , p. 287。歌曲開頭如下：勇士搏大浪/來把歌高唱/貧弱盡受欺/夢醒嘆悲愴/青海碧波滾/海中四尋望/吾輩諸同胞/何處尋安放/呼救聲不絕/涕淚漣漣淌。

1. [[28]](#_28_29) 并非只有日本人表現出了不滿情緒。法國藝術家喬治斯·比哥出版了一幅漫畫，描繪的是英國船員平安無事地坐在劃艇上，而日本人只有浮在水面上的頭部可見。船長向希望獲救的日本人索要金錢。色川大吉的《近代國家の出発》第438頁轉載了這幅漫畫。

1. [[29]](#_29_29) 然而，也許日本朝廷對外國皇室的熱情并沒有得到充分回報。1887年6月，彰仁親王代表日本皇室在倫敦參加維多利亞女王登基五十周年慶典。當親王看到在參加慶典的外國貴賓的名單中漏掉了他的名字時，感到不悅。此外，親王下榻的酒店的膳宿要比歐洲皇室成員的遜色。當他準備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時，沒有為他提供公務車，他得租車前往；當他到達時，他發現自己與暹羅和夏威夷皇室（而非與歐洲的皇室成員）坐在一起。這些（以及其他公然冒犯行為）使他確信英國人仍認為日本只不過是東洋的蕞爾島夷而已（《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64—765頁）。

1. [[30]](#_30_27) 1月14日抵達的皇太后也在京都和他們共同參加了此次儀式。

1. [[31]](#_31_25)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21頁。

1. [[32]](#_32_24)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12—713頁。

1. [[33]](#_33_23) 東京俱樂部成立于1881年，是日本和西方紳士締結友好關系的場所。

1. [[34]](#_34_23)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32頁。另請參閱Donald H. Shively,The Japanization of the Middle Meiji , p. 94。他從1884年出版的高橋義雄的《日本人種改良論》一書中引述了一段話。在該書中，作者聲稱，“就憑日本人低下的智商和孱弱的身體”，無法指望他們與白人抗衡，在激烈的競爭下只會感到精疲力竭。唯一的補救方法就是與白人通婚以改良人種。1892年當問及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觀點時，斯賓塞表示強烈反對。

1. [[35]](#_35_2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35—736頁。另請參閱井上清，《條約改正》，第108—109頁。

1. [[36]](#_36_20) 在歐洲待了一年多后，黑田于6月23日返回日本，他在歐洲考察那里的農業、商業和工業情況。他看到那里的軍備大量增加，意識到全世界形勢危急。也許這就是為什么他在維也納師從洛倫茨·馮·施泰因學習國際法的原因（《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65—766頁、第777頁）。

1. [[37]](#_37_16)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78—779頁。

1. [[38]](#_38_13)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82頁。

1. [[39]](#_39_12)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88—789頁。另請參閱井上清，《條約改正》，第112—113頁。

1. [[40]](#_40_1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804頁。

1. [[41]](#_41_1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803—806頁。

1. [[42]](#_42_1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99頁。

# 第四十章 帝國憲法



1888年，明治天皇因病無法操持絕大多數儀式或出席野戰演習和畢業典禮。最嚴重的一次患上卡他性肺炎，從2月7日持續到了5月5日。[[1]](#_1__Bi_Li_Shi_Zhu_Ri_Gong_Shi_A)在脫離危險后，醫生建議天皇去海邊空氣清爽的地方休養，但和以往一樣，因為君王的責任感，他拒絕離開皇宮。[[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該年稍晚時候，天皇患上了重感冒，但他極端討厭醫生，不在意他們的建議。在諸多場合，尤其是天皇生病時，皇后代天皇出席，比如接見暹羅的使節、出席軍艦下水儀式或者視察東京帝國大學的醫療和科學設施。

記錄中宮廷醫師的醫術并不盡如人意，但天皇仍執著于傳統中醫學，不愿意更換宮廷醫師。[[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11月12日，盡管宮廷醫師竭盡所能（在最后一刻也請來陸軍和海軍的外科醫生），但天皇的又一個孩子猷仁還是死于腦膜炎。9月，園祥子又產下一女（天皇的第六個女兒）。和往常一樣，宮中舉行了慶生宴會，但參加宴會的大多數人無疑會想起已有多名年幼的皇室子女夭折，想必也會懷疑為祝福小公主昌子健康而說的祝酒詞究竟能產生多大的作用。

在新年年初，天皇和往常一樣聽了幾個講座：福羽美靜講授《日本書記》景行天皇卷；元田永孚講解《中庸》里的一節；西村茂樹講授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著寫的《萬國公法》（"aid-C0F"）中“自治”的含義。[[4]](#_4__Ju_Da_La_Si__Fen_En_Suo_Chen)這些講座主題的選擇反映出在對天皇的教育中，力求在日本歷史傳統、中國道德教化和西方實踐學習中實現平衡。



吉歐索尼所繪的明治天皇像

此時發生的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天皇的幾件事情中，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宮內大臣土方久元認為有必要為天皇畫一幅近期肖像畫（最近一次的照片是由內田九一于1872年拍攝的），以便贈送給外國君王和政要，于是請意大利畫家愛德華多·吉歐索尼（Eduardo Chiossone）——他也是印務局的一名工作人員——速寫了一幅相似度較高的肖像畫。最簡單的方式無疑是拍照，但是天皇不喜歡照相，因此這個方法行不通。不久前，伊藤博文也曾多次懇請天皇同意拍一張新的照片，但每次都被拒絕。意識到要讓天皇改變主意是件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后，土方在承諾如有任何差池均由他負責的前提下，請吉歐索尼悄悄地對天皇的容貌特征進行速寫。

在征得侍從和其他官員的同意后，土方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日子選在了1月14日，就在天皇外出用膳時。躲在推拉隔斷背后的吉歐索尼用蠟筆仔細地勾畫出天皇的龍顏、姿勢和談笑時的表情。[[5]](#_5__BortonDui_1946Nian_Xian_Fa_D)土方對吉歐索尼素描完成的肖像畫很滿意，決定向天皇展示，他首先就沒有獲得天皇事先允許而認錯謝罪。當天皇看到畫像時，既沒有發表贊許之詞，也沒有說出不滿的話。雖然土方很想知道天皇的沉默究竟是何用意，但他又不好讓天皇明說。正好這一時期，皇宮收到了歐洲提出的求取天皇照片的請求。土方懇請天皇簽名并同意奉上吉歐索尼的肖像畫。天皇照做，讓土方大松了一口氣，他將此舉解釋為天皇對畫像很滿意。[[6]](#_6__Erwin_Baelz__Awakening_Japan)從此以后，吉歐索尼的肖像畫照片（在原始畫像的基礎上翻拍的照片）被送到外國皇室乃至全國各地的學校，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們在御真影[[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面前畢恭畢敬地鞠躬。這幅畫像如此逼真，以至于大多數人都認為它是一張照片。[[8]](#_8__Zai_1888Nian_Xia_Tian__Jia_R)

1888年2月1日，天皇任命大隈重信擔任外務大臣。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大隈的前任井上馨因眾人反對其修約方案而辭職，但他希望大隈能夠接替他的職位。[[9]](#_9__1888Nian_12Yue_Jie_Shou_Xi_F)任命過程中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勸說內閣顧問官黑田清隆接受大隈重信。自北海道開拓使出售官產丑聞事件后，黑田清隆一直與大隈重信關系緊張。

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同意幫助勸說黑田。對于大隈，他持有保留意見：盡管大隈的立憲改進黨不像自由黨那么激進，但該黨提倡進行伊藤所反對的改革。[[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不過，伊藤還是跨越了政治上的不相容，勸黑田支持大隈。他的勸說奏效了。某日，黑田突然出現在大隈的宅邸，為過去發生的事情致歉，并承諾將來會與大隈攜手合作。[[11]](#_11__Wu_Yi__Zhao_Pian_De_Xiang_S)

黑田的舉動讓大隈很是感動，然而，由于可能會給立憲改進黨帶來不利影響，他不愿踏足內閣。他提出了接受這一職務的條件：在召開議會后的七八年內，成立一個由議會成員組成的內閣；參加議會選舉的選民資格不得高于地方選舉中的選民資格；確保有序、穩定的進展，避免陷入過激的混亂。[[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大隈還提出，如果同意他的條件，應予以公開宣布。幾個月里，伊藤都不愿意接受這些條件，以致只好繼續兼任外務大臣，但最后伊藤讓步，大隈就任。

在結束治外法權方面，大隈的決心不亞于井上馨。他對井上的提議（包括允許外國人在日本內陸旅行、居住和擁有不動產這一備受爭議的提議）進行了修改。根據大隈的方案，外國法官的作用將受到限制，并且新頒布的民法典的權威版本將采用日語，而非英語。[[13]](#_13__Dui_Tian_Huang_Zhao_Pian_De)然而，這些讓步并沒能安撫政府中的反對修約派，1888年到1889年的大部分時間，大隈的提議引來了一片批評之聲。

同時，在1888年4月28日，天皇設立了樞密院。他在詔書中聲言，“朕選元勛及練達之人，咨詢國務，倚其啟沃之力。察此為必要，故設樞密院，以之為朕至高顧問之府”。[[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樞密院的主要職能是商討與制定憲法有關的事項，[[15]](#_15__Ru_Xu_Le_Jie_Da_Wei_Dang_Pa)其成員均為對國家做出了杰出貢獻的較年長人員（年齡在四十歲以上），包括議長和副議長等十五名成員。在憲法生效時，樞密院將作為政府和議會的中間機構以及天皇的咨詢機關。

伊藤是樞密院的主要倡議者。他堅信必須將憲法視為天皇恩賜的禮物，天皇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做出的裁定為最終決定。樞密院將對天皇提供指引，尤其是在政府和議會發生沖突時——例如，是否替換大臣或解散議會。

為強調這個新成立機構的重要性，伊藤辭去總理大臣一職，就任樞密院議長。按照伊藤的建議，黑田清隆將被任命為接任人。天皇不愿讓伊藤辭去總理大臣一職，但仍批準將其調入樞密院，這大概是因為伊藤是唯一一個能夠掌控商議大事的人。[[16]](#_16__Ru_Xu_Le_Jie_Hei_Tian_Hui_J)除生病外，天皇出席樞密院的每一次會議，這強化了樞密院會議的重要性。會議過后他有時會派人請來發言者，向他們提問，但在會議上他仔細聽取發言，不說一句話。[[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在夏季，舉行討論的房間有時候酷暑難耐，但明治絲毫不受酷熱的影響，孜孜不倦地聆聽發言。

為什么天皇愿意花這么多時間聆聽那些往往讓人覺得荒謬、重復的辯論呢？大概是因為與每年舉行朝廷儀式和無數次接見外國賓客的無聊相比，天皇最終發現了一些能夠吸引他注意力的事情。這些商議可能有助于天皇了解他在日本的未來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1888年4月，伊藤向樞密院提交了憲法草案。早在1884年，伊藤就在宮中設立制度取調局，并擔任局長，著手進行憲法調查。伊藤令井上毅、伊東巳代治、金子堅太郎調查，并請太政官雇用的德國人羅斯勒（之后成為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教授）作為顧問；然而，由于還肩負其他職責，伊藤一直沒有取得進展。1886年，他開始認真起草憲法。伊藤將這項工作的三大不同方面分配給上述三位同僚，將真正執筆這一重任委托給了井上。

伊藤曾在維也納研習憲法，他的想法大概也反映了他在維也納的所學所得，即“樞軸”對于立憲政體的重要性。1888年6月18日，伊藤在樞密院發表的演講中提到，在歐洲，立憲政體在古代就已萌芽，并且幾個世紀以來得到了穩步發展，人民熟悉這一制度。而且宗教構成歐洲國家的樞軸，深入民心并使他們團結。然而，日本的宗教（佛教和神道教）力量甚為薄弱，尚未對民眾的內心產生影響，無一能夠作為國家的樞軸；在日本，可以作為樞軸的唯有皇室。憲法制定者應始終將這一事實銘記于心。在制定憲法時，應尊重天皇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力求不加束縛。君權便成為了伊藤及其同僚編纂的憲法草案的樞軸。[[18]](#_18__Joyce_C__Lebra_Okuma_Shigen)

在本年度的剩余時間中，與憲法有關的討論繼續以從容的步調進行。其他事情（如爭取結束治外法權）也沒有被忘卻，但并沒有取得什么進展。11月，日本與墨西哥簽署了一份條約，給予墨西哥人在日本內陸生活和購買不動產的權力，但未給予治外法權。這是兩個對等國家簽訂的條約，是日本的第一個平等條約，但其他國家并沒有效仿墨西哥。英國和法國根據與日本簽署的條約中的最惠國待遇條款，要求獲得墨西哥人獲得的任何特權。該條約并沒有發揮很大效果，因為當時在日本的墨西哥人只有一人。[[19]](#_19__Shu_Mi_Yuan_De_Wu_Da_Zhi_Ne)

年底，新宮殿竣工，皇室預定于1889年1月11日遷往新宮。從1873年起，明治及其皇室便一直生活在擁擠的臨時宮殿內。天皇一向不喜歡奢侈浪費，甚至不愿意考慮建造一座新宮殿，但是，最終讓步：日本君主需要一個更加體面的住所來彰顯其威信。

新宮殿耗資巨大，旨在展示日本皇室的莊嚴宏偉。造訪的外國人大多數都感受到了震撼。[[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宮殿的東翼專為天皇預留，作為公共場合時使用，比如坐在鍍金御座上接見外國賓客。作為天皇的私人宮室的西翼為日式風格。后部則是天皇舉行典禮儀式的神殿。該建筑群由日式風格的走廊銜接，四周花園環繞。

明治似乎完全不在乎新宮殿的外觀。子爵日野西回憶道，用于裝飾走廊的人造花懸掛有三四年的時間，直到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天皇似乎未曾注意到這些。在天皇駕崩時，這些人造花已變得骯臟不堪，不得不將其燒毀。[[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宮殿通上了電，可以在國事廳使用，但天皇卻拒絕在其私人宮室中使用電燈，因為他擔心短路可能會引發火災。然而，使用蠟燭熏黑了天花板，讓宮殿的外觀極其不雅，尤其是在天皇的晚年時候。

眾人排著隊列從臨時宮殿遷往新宮殿。天皇和皇后在皇族親王和內閣成員及其他要員的陪同下，于上午10點出發，一個小時后抵達。學童沿著隊列高唱國歌《君之代》，軍樂隊奏響樂曲。當隊列抵達架在圍繞宮殿流淌的護城河上的二重橋時，燃放起了日景煙花，龐大的人群高呼“萬歲”！

1889年，天皇的健康狀況要比上一年好些，不過有時候仍會因為疾病而無法參與國事。這是他在位期間最忙碌的年份之一，大臣們時常請他定奪。其中尤其困難的決定是關于陸軍中將谷干城。谷干城無疑是一位精明能干之士，但他卻喜好爭斗，曾與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尖銳對立，以致辭任農商務大臣一職（正如我們已經講述過的）。現在，他已離職一年半。政府懷疑他可能在秘密謀劃一些活動，于是派密探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天皇擔心谷干城可能會與其他持不同政見者為伍，從而步江藤新平和西鄉隆盛的后塵，發動叛亂。最好的辦法是將谷干城納入樞密院，由此來規制他。1888年12月，天皇令元田永孚拜訪谷干城，探明他是否愿意在樞密院任職。谷干城拒絕了任何任命，并且不改變主意。

為了勸說谷干城改變主意，曾我祐準——嘉仁親王的老師[[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谷干城的老朋友——在元田的陪同下多次拜訪。在得知天皇殷切地希望他接受任命后，谷干城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但仍說自己不能違背其向同僚們所立下的誓言，即成為上院議員，詳細闡明反政府的觀點。[[23]](#_23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如果他在眼下階段加入政府，就會失去信任。他堅稱，反對政府并不代表不尊重皇室，日本反政府勢力（與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或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不同）對天皇忠心耿耿。他請求政府取消密探。[[24]](#_24__Dang_Jia_Ren_Zai_Re_Hai_Shi)

樞密院中繼續進行著各種討論。1889年1月，伊藤提議將憲法草案翻譯成歐洲語言，那樣樞密院成員可以從外國法律專家的意見中獲益。他意識到，無論多么小心翼翼地制定新憲法，仍無法避免一部分批評，但他下定決心避免給子孫后代留下一份有著明顯缺陷的文書。即使在馬上就到了發布時期的節骨眼兒上，他仍然進行了修改。例如，在提交的最后建議中說，憲法應規定僅限于男性繼承人繼承王位。[[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2月5日，樞密院通過了《皇室典范》、《帝國憲法》、《議院法》、《眾議院議員選舉法》和《貴族院令》。每部法律均制作了副本，其中兩份副本呈交給了天皇。[[26]](#_26__Dang_De_Zhi_Gu_Gan_Cheng_Bu)六天后的2月11日，也就是神武天皇即位之日，天皇在賢所[[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頒布了《皇室典范》和《帝國憲法》。明治借此機會向皇祖皇宗發布了一份告文，將今日能舉辦這一重大事件歸功于先祖的諄諄教誨。他發誓將躬身遵守憲法的規定。不久后，他跪在皇祖皇宗的神龕前，再次陳述了告文。

在當天早上晚些時候舉行了憲法發布的儀式，天皇公開宣讀了憲法。皇室成員、內閣成員、高官顯貴、各都道府縣[[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的知事、法官、其他國家機構的高層代表以及外國公使匯聚一堂，聽取天皇發表敕語。天皇不僅向皇祖皇宗表達了敬意，也稱頌了祖宗的忠良臣民。作為神之子孫的自己要和臣民一起，廣揚帝國光榮于內外，使祖宗之遺業永久鞏固。[[29]](#_29__Gong_Nei_Gong_Feng_Shen_Qi)

在發表完敕語后，天皇象征性地將《帝國憲法》交給總理大臣黑田清隆，此舉旨在表明是天皇將憲法御賜給了整個日本。在皇室效勞的德國醫生歐文·貝爾茨對儀式進行了如此的描述：

國家大臣和最高官員排列在天皇面前稍左的位置。站在天皇身后的則是顯赫貴族。其中，我發現了德川龜之助，若不是王政復古，他現在應該是幕府將軍；我還看到了薩摩町的島津侯，唯一一個梳著日本舊式發型的人（盡管穿著一身西裝）。他這身打扮真奇怪！緊靠著天皇右手邊的是外交使節團。大廳周圍的走廊擠滿了其他高級官員和一些外國人。皇后身后跟著公主和宮女。皇后身穿粉紅色的歐式禮服，拖著裙裾。從御座的兩側各走上來一名達官顯貴，其中一位是前太政大臣三條公爵。兩人都捧著一卷紙，三條捧著的是憲法。天皇接過另一份文書，打開它，大聲宣讀。其中的內容是說天皇決定自愿向國民御賜所承諾的憲法。之后，天皇將憲法交給總理大臣黑田，黑田滿懷崇敬之情地接過憲法。天皇隨即點了點頭，離開了大廳，皇后和隨員緊跟其后。整個儀式持續了大約十分鐘。外面燃放起煙花，四處敲響鐘聲。儀式莊嚴而精彩。唯一的缺點就是正殿——一個非常精美的大廳——被漆成了紅色，因此顯得太暗了。[[30]](#_30__Du_Dao_Fu_Xian__Ri_Ben_De_X)

1. [[1]](#_1_40) 比利時駐日公使阿爾伯特·德·阿內唐（Albert d’Anethan）男爵的夫人在其日記中記載道，“我們和意大利人吉歐索尼紳士一同喝茶。他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我們參觀了他的青銅器、漆器、日本版畫和古老刺繡等精美收藏。他還向我們展示了他畫的天皇和皇后的畫像，這是當時僅有的天皇和皇后陛下的原版畫像。吉歐索尼紳士憑著記憶速寫了這些相似度極高的畫像，天皇或皇后應當拋棄日本的禮儀規矩或忠于王室的理念，允許自己為畫像或照相擺姿勢”（"aid-CFF", p. 53-54）。 明治不喜歡照相，但皇后卻不同。1889年6月24日，皇后派人去請攝影師鈴木真一，讓他為自己拍照。第二天，她派人去請另一名攝影師丸木利陽，他也為皇后派了一張照（《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87頁）。如需了解向小學傳發照片的情況，請參閱第424頁。

1. [[2]](#_2_4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0頁；該話的意譯本請參閱Hugh Borton, Japan’"aid-CG6", p. 141。

1. [[3]](#_3_4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64—165頁、第324—325頁。另請參閱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aid-CGN", p. 27。

1. [[4]](#_4_40) 據達拉斯·芬恩所稱，“但大多數外國人，如貝爾茨醫生、比利時男爵夫人德·阿內唐、英國勛爵雷德斯戴爾和紐約金融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都認為皇宮富麗堂皇”（ Meiji Revisited, p. 94）。例如，德·阿內唐男爵夫人將正殿描繪成“這是一個宏偉、巨大的殿堂，鋪著鑲木地板”（"aid-CGS", p. 48）。

1. [[5]](#_5_40) Borton對1946年憲法的規定和1889年憲法的相應條款進行了敘述（Japan’"aid-CI0", pp. 490-507）。

1. [[6]](#_6_40)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3。

1. [[7]](#_7_4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0頁。

1. [[8]](#_8_40) 在1888年夏天，嘉仁親王（4月的時候患上了百日咳）的老師建議將嘉仁帶到箱根去避暑。他請求明治恩準，明治顯然很不悅，非常不情愿地準奏，規定只能待一周，并且必須由元田永孚陪伴親王（《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16頁）。也許是因為他一想到親王與他相距遙遠而感到不安，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他認為與其他日本民眾一同忍受夏季酷暑，是他和親王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顯而易見，待在箱根對親王的健康是有益的，并且在夏季和冬季離開東京前往氣候更溫和的地方成為了親王的一個習慣。

1. [[9]](#_9_40) 1888年12月接受西方培訓的醫生取代了宮廷漢方醫師（《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67頁）。1889年2月，天皇令陸軍和海軍的外科醫生對為什么其眾多子女夭折進行調查（第203頁）。

1. [[10]](#_10_4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4頁。

1. [[11]](#_11_40) 無疑，照片的相似度會更高些，但是（由于那時在室內拍照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照明），吉歐索尼無法在天皇未察覺的情況下在室內為天皇拍照。

1. [[12]](#_12_4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頁。

1. [[13]](#_13_40) 對天皇照片的敬稱。——譯注

1. [[14]](#_14_4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6頁。井上辭職后接任的是伊藤，伊藤暫時擔任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

1. [[15]](#_15_39) 如需了解大隈黨派的目標，請參閱Joyce C. Lebra,Okuma Shigenobu（大隈重信） , p. 69-76。

1. [[16]](#_16_39) 如需了解黑田會見大隈的有關概況，見渡辺克夫，《明治二十二年の條約改正反対運動》，第4頁。

1. [[17]](#_17_3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7頁。另請參閱Joyce C. Lebra,Okuma Shigenobu , pp. 84, 164。在談判時大隈更改了條件。如需了解詳情，請參閱渡邊克夫，《明治二十二年の條約改正反対運動》，第6—18頁。

1. [[18]](#_18_38) Joyce C. Lebra,Okuma Shigenobu , p. 86.

1. [[19]](#_19_38) 樞密院的五大職能詳列于《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1頁。所有職能均與擬議憲法的內容和修改憲法規定的程序有關。

1. [[20]](#_20_3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2頁。

1. [[21]](#_21_3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4—75頁、第92頁、第94頁。另請參閱土方久元，《叡明比べなき大皇帝》，《太陽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58頁。“激辯常常持續若干個時辰，然而，每次發言，陛下都孜孜不倦地悉數聆聽，即便是在就寢的時辰過后，陛下也會議論說今日辯論中某某某的觀點準確，并且會對不同意見做出好壞評判。陛下的評判準確、清晰，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 [[22]](#_22_36)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93頁。

1. [[23]](#_23_36)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71頁。

1. [[24]](#_24_34) 當嘉仁在熱海市過冬時，谷干城也居住在那里。這便于曾我頻繁拜訪谷干城。

1. [[25]](#_25_3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92—193頁。谷干城指出，由于他在軍隊立下的功勞獲得認可而被授予了子爵的爵位，因此他可以在上議院（貴族院）任職。

1. [[26]](#_26_34) 當得知谷干城不愿意在樞密院任職時，天皇拒絕接受“不”這樣的答復。他令侍從長派一名宮內省官員去勸說谷干城改變主意。聽聞天皇的失望之情，谷干城很受感動，但他請求給予時間重新考慮（《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01—202頁）。之后，谷干城在任職樞密院或任職內閣中進行選擇。雖然谷干城不會對內閣造成不利影響，但他不希望像后藤象二郎那樣同時又去填補內閣的職位空缺。最后，總理大臣黑田任命的人是后藤而非谷干城（第246頁）。文部大臣的職位由榎本武揚填補，后藤接替榎本之前擔任的通信大臣。

1. [[27]](#_27_33)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97頁。

1. [[28]](#_28_3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00頁。

1. [[29]](#_29_30) 宮內供奉神器八咫鏡的房子，以前稱為“內侍所”。——編注

1. [[30]](#_30_28) 都道府縣：日本的行政劃分，日本現有一都（東京都）、一道（北海道）、兩府（京都府和大阪府）和四十三縣（相當于省）。——譯注

1. [[31]](#_31_26)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06—207頁。

1. [[32]](#_32_25) 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p. 81-82. 德川龜之助是徳川家達（1863—1940）的幼名。Baelz稱其為“imperial chancellor”，即“總理”之意。

1. [[33]](#_33_24) 得知天皇反感黑田，元田舉了中國歷史上對有嚴重缺點的人士予以獎勵的一個例子：漢高祖殺了最喜歡的一名大臣，并向討厭的一名大臣封爵，以安定民心、使百姓順歸其統治（《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13—214頁）。天皇沒有被元田的論據所說服，只向伊藤授予了勛章。

1. [[34]](#_34_24) 根據貝爾茨所說，報紙將這位行刺者描繪成英雄，“位于上野的西野墓地出現宛如祭拜一樣的情形！特別是學生、演員、藝妓眾多”（Awakening Japan ,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p. 85-86）。

1. [[35]](#_35_2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26—227頁。

1. [[36]](#_36_2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27頁。1889年3月4日，共和黨人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宣誓就任總統。

1. [[37]](#_37_1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37頁。

1. [[38]](#_38_14) 第24條規定，“不得剝奪日本臣民接受法定法官審判的權利”。第58條部分規定，“從具備法律規定資格者中任命法官。除非依照刑法接受裁定者或受懲戒處分者外，不得免除法官的職務。”

1. [[39]](#_39_13)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84—287頁。

1. [[40]](#_40_1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97—298頁。

1. [[41]](#_41_1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15頁。

1. [[42]](#_42_1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33頁。

1. [[43]](#_43_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39—340頁。

1. [[44]](#_44_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42頁。這些是勝海舟提出的問題。

1. [[45]](#_45_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49頁。

1. [[46]](#_46_8)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52頁。

1. [[47]](#_47_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64—65頁。來源于西村于1889年9月寫就的《建言稿》。參閱日本弘道會編，《泊翁叢書》第一卷，第397—411頁。其中第399—406頁中特別記載了，如果日本允許外國人在租借地以外的地方生活和擔任大審院的法官后會發生的可怕事情。西村研究的英文版，請參閱Donald H. Shively, “Nishimura Shigeki: A Confucian View of Modernization”。應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很多日本人對外國人生活在他們之中（即內地雜居）的前景表示樂觀（稲生典太郎，《條約改正論の歴史的展開》，第266—268頁）。

1. [[48]](#_48_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25頁。根據貝爾茨所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日本人想要的是將條約修改成他們可以得到一切，但卻不給予任何回報”（Awakening Japan ,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0）。

1. [[49]](#_49_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71頁。

1. [[50]](#_50_7) 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1-92.



佩里來航圖，隨船畫家William Heine畫的石版畫，1854年



蛤御門之變，亦稱禁門之變。森雄山所繪



美子皇后



江戶末期留學荷蘭的日本學生。后排中間是榎本武揚，前排最右是西周



巖倉使團部分成員。從左到右依次是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山口尚芳、巖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征韓論之圖》，楊洲周延所繪。左上巖倉與有棲川宮之間應是明治天皇。神奈川縣立博物館藏



江戶博物館的鹿鳴館復原圖。可見正面的孟莎式屋頂和拱形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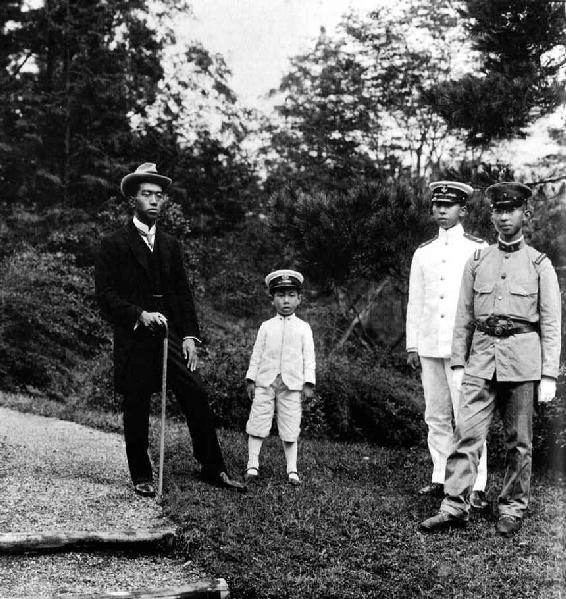
1888年6月，明治天皇在樞密院會議上審議憲法草案，右側站立者為伊藤博文。圣德紀念繪畫館，五姓田芳柳繪



尼古拉二世在長崎時的照片，上野彥馬拍攝



幫助尼古拉二世的兩位車夫，胸前佩戴的是尼古拉及日本頒發的勛章



大正天皇之子，1921年拍攝。左起第一人為裕仁親王，即后來的昭和天皇

1889年的憲法是亞洲國家中最先進的憲法，也比眾多歐洲國家的憲法更加自由。但是，這部憲法堅稱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表明它距離天賦人權還有很大的距離。[[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盡管如此，憲法的頒布標志著日本代議制政府的開始。在同一天頒布的詔書中，天皇宣布將在1890年召開議會，憲法將于召開議會的同一天生效。

作為慶典活動的一部分，天皇向伊藤博文授予了最新鑄造的勛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由于向長州藩人士進行了授勛，為保持平衡）有人建議應向總理大臣黑田清隆（來自薩摩藩）授予類似的勛章，元田也表示支持，但明治還是拒絕了。[[32]](#_32__Erwin_Baelz_Awakening_Japan)為了在這一美好時刻努力彌補過去的創傷，曾作為謀反者而被判處死刑的一些人不但被赦免，還被授予了勛章：西鄉隆盛被追贈正三位官階，吉田松陰被追贈正四位官階。

就在同一天，當文部大臣森有禮即將出發前往皇宮參加儀式時，一名男子上門求見。森有禮令人接待來客，就在離開宅邸時，這名來客跳到他身上，用刀將他刺成重傷。行刺者西野文太郎當即被擊斃。據查實，西野聽說森有禮在參拜伊勢神宮時不但沒有脫鞋就進入了神圣的建筑之內，還用手杖撩起藏有神鏡的簾子，向里窺視。森有禮的行為激怒了西野，他認為此類行為褻瀆了神靈并有辱皇室，于是決定刺殺他。

在西野身上發現的“斬奸狀”中，西野寫道，他曾前往伊勢神宮去查證森有禮是否真的有不敬的行為，確信那種說法并非虛言。（但是，文部次官在森有禮死后進行了調查，得出結論是該說法并非屬實。）次日，森有禮過世。天皇致函表達了悲痛之情，贊賞了森有禮取得的成就，并向他追贈正二位官階。[[33]](#_33__De_Zhi_Tian_Huang_Fan_Gan_H)

公布憲法的激動之情平息下來后，政府成員又轉身投入到未完成的事務之中，尤其是修改條約一事。大隈認為有必要摧毀歐洲和美國政府為針對亞洲而建立的聯盟，決定與各個不同國家進行單獨談判。1888年11月，大隈與德國簽訂了新條約；12月，大隈向美國公使提交了修訂后條約的草案，希望能夠迅速得到美國政府的批準。他承諾，不管其他國家做出怎樣的決定，美國公民都將獲得新條約賦予的好處。如果其他國家聲稱根據最惠國待遇條款，自己也應該獲得同樣的好處，那么日本將告知這些國家，除非同意結束治外法權，否則它們將得不到任何好處。

大隈認識到，除非日本能夠勸說歐洲國家接受修訂后的條約，否則與美國簽訂的新條約毫無意義。但是，如果他把日本將與美國簽訂新條約一事告訴其他國家，將會鼓勵其他國家的駐日公使力爭達成類似協議。[[34]](#_34__Gen_Ju_Bei_Er_Ci_Suo_Shuo)

大隈與美國公使理查德·哈伯德（Richard B. Hubbard）簽訂的《友好通商及航海條約》標志著日本朝結束治外法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該條約于2月11日（即公布憲法的同一天）生效。之所以匆忙簽約，是因為日本擔心新的共和黨政府可能不會同意民主黨的哈伯德所采取的行動。[[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正如已經預見到的那樣，即使日本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來勸說，英國仍反對修約。1888年12月29日，大隈提醒英國公使說，英國是日本最重要的進口國，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已經占到了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駐日的外國人中有一半是英國人，他們的利益已經遠遠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據大隈所言，日本人沒有忘記哈里·巴夏禮爵士在明治維新時的諸多恩惠，但是，如果英國繼續阻撓修改條約，感激之情也會轉變成仇恨之意。如果英國接受修約，那么其他國家也會效仿，日本將會從心里感激英國的支持。日本這個有著四千萬人口、十八萬軍隊和一支由幾十艘軍艦組成的艦隊的國家，將會成為英國在遠東的同盟國。

盡管大隈一再懇求，英國還是不準備答應日本的請求。英國在答復中稱，日本的法律不符合西方的標準，并具體指出了修訂后的條約存在著哪些不足之處。如果日本真的希望外國人遵守日本司法，那他們應該立刻開放日本內陸。在五年后，如果日本制定了法院體系、完成了法典的編纂以及就法庭的有效運行做出擔保，那么英國將廢除領事法庭并結束治外法權。對于修改關稅，英國也列出了類似的條件。[[36]](#_3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駐美特命全權公使陸奧宗光是第一個從日本一方對修訂后的條約提出質疑的人。他指出，在簽訂條約后的至少十二年，外國法官將在大審院任職，但這違反了憲法第二十四條和第五十八條。[[37]](#_3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大隈回復稱不存在沖突，但有關外國籍法官的爭議仍然持續。

1889年6月11日，日本與德國簽署了修訂后的條約。德國在最后一刻要求日本做出進一步讓步，但日本駐德公使西園寺公望向德國外交部長赫伯特·馮·俾斯麥（Herbert von Bismarck）提出請求，俾斯麥做出了讓步。對于此次取得的成功，日本政府大為滿意，請求各國的常駐公使向他們的國家轉呈修訂后條約的副本。[[38]](#_38__Di_24Tiao_Gui_Ding___Bu_De)

與美國和德國取得的成功談判并沒能結束日本國內反對修約的呼聲。立憲改進黨的機關報《郵便報知新聞》刊登了以改正條約問答為主題的十四篇文章。作者矢野文雄（1850—1913）的目的是消除人們對條約可能起到的作用的擔憂。例如，一些人擔心聘任外國籍法官可能造成其他國家干涉日本內政，但是矢野回答說，此類法官的聘任權和解聘權完全在日本人民的手里。再比如說，如果法官入籍日本，那么就不會有外國干涉的危險。在回答那些擔心向外國人開放日本內陸或允許外國人購買土地會威脅到日本主權的人們時，矢野認為國際關系必須平等。日本民眾已經能夠在其他國家自由出行、購買土地，那么不允許外國人享有同等特權是有失公平的。對于擔心外國人可能會全部買下日本的土地，矢野認為日本還有很多更加有利可圖的投資，外國人涌入日本不會只購買土地。[[39]](#_3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雖然矢野提出的論據很有說服力，但日本民眾反對修約的呼聲卻日漸高漲。天皇派元田永孚詢問大隈，是否有人控訴修訂后條約的條款違反了新憲法。大隈否認，但元田力勸天皇與伊藤商議。7月24日，天皇召來伊藤，詢問入籍法可能會對外國法官的聘任造成多大影響。一開始，伊藤很贊成大隈的修約方案，并建議天皇批準這些方案。但是，隨著反對的聲音越來越激烈，伊藤開始動搖。29日，當天皇再次去請伊藤時，伊藤感到悲觀（他推辭說自己病重，無法進宮覲見）。他預計未來困難重重，并承認自己沒有權宜之計。[[40]](#_4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關于修約，仍有許多問題急待解答。首先，如果某個大國拒絕接受修訂后的條約，那么與該國簽訂的現有條約應當取消嗎？英國——最重要的大國——尚無跡象表明其愿意考慮修改條約。如預料的那樣，日本授權美國人在內陸進行通商后，英國按照最惠國待遇的條款要求享有同等權利。對此，大隈予以否決，認為對英國來說仍為時過早，因此，修約交涉一度擱淺。與此同時，日本于8月與俄國簽署了修訂后的條約。

8月14日，以副島種臣為首的數名高層官員造訪了外務大臣的官邸，商議修約事宜。陸軍中將鳥尾小彌太（1847—1905）提到外國法官一事。他認為聘任這些法官是不符合憲法規定的，并詢問為什么日本如此積極地保護外國人的利益，而對日本人的利益漠不關心。大隈承認此類批評是有些道理，但認為治外法權對日本造成的傷害遠遠超過了擬議讓步所帶來的損害。如果日本希望擺脫主要危害，那么做出讓步是不可避免的。鳥尾追問大隈是否真的打算把修約進行到底。大隈回答說，他下定決心要這樣做，但是，如果天皇未能批準新條約，那么一切也將就此結束。鳥尾反駁說，大隈的唯一可行舉措就是辭職并結束其方案。[[41]](#_4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反對修約的人士并非僅限于政客。來自各個縣的人群抵達東京，要求取消修約。8月18日，各類組織（包括反政府報紙）的代表召開了一個全國性的“反對修約聯盟”會議，超過一百八十人參加。他們從25號開始連續三天舉辦了大型演講會。8月22日，這些人成立了一個反對修約（和反對全國西化）的組織——日本俱樂部。新聞報道也越來越多地對修約進行抨擊，民眾試圖通過天皇信任的顧問官（特別是元田和佐佐木高行）求見天皇。不久，他們發出了要求大隈下臺，甚至彈劾大隈的呼聲。[[42]](#_4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反對的呼聲演變成了公開排斥外國人。聘請外國人作為法官的提議遭到了特別猛烈的抨擊。人們反問道：“嗚呼，昔日攻擊幕府之諸賢，何勇幕府而怯外國？”如果修訂后的條約生效，國家獨立會變成怎樣一番模樣？[[43]](#_4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井上毅致函總理大臣，敦促他停止修約交涉。剛開始，井上毅曾支持采用入日本籍的外國法官，但他現在確信除非徹底放棄修約，否則國家將面臨無法挽回的災難。他決心向總理大臣黑田請求辭任，但未果。井上向司法大臣山田顯義發函一封，回憶說1883年巖倉具視重病時，曾吩咐他千萬不要忘記：只要外國人享有法律特權，那么絕對不允許外國人在內陸居住，這個國家的命運取決于這兩者的平衡。井上擔心，如果日本繼續進行修約，民族權利的擁護者將會越來越情緒化，愛國者將與愚蠢的政客聯手，屆時肯定會發生排外事件。如此一來，日本必定會遭受和埃及一樣的命運。[[44]](#_4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之前似乎也支持修改條約的天皇現在也憂心忡忡。他召來大隈，詢問與英國交涉的情況以及自簽署條約后與俄國的關系。大隈向天皇保證，盡管困難重重，但他確信很快就能與英國簽訂條約。天皇并未信服。在天皇的印象中，黑田將所有事情都交由大隈處理，而大隈正試圖獨攬大權、掌控國家，他擔心將事情交到一人手中并不安全。伊藤第一次提出修約問題時并沒有說這可能會與憲法相沖突，因此天皇才同意修約。問題是現在應該做什么？是否要放棄為修約做出的努力？或者是否仍需對修訂后的條約進行進一步修改？他令伊藤提交一個方案。[[45]](#_4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伊藤無計可施，然而，反對修約派變得越來越強硬，要求天皇罷免大隈。此時，憂國的預言家也紛紛高聲吶喊。西村茂樹列舉了反對修約的理由，說修約將使不友好、性格不羈的歐美人變本加厲地侵略日本。如果日本人被外國人的學說所打動、被外國人的財富所迷惑，相信他們的恭維話，并被他們的宗教領入歧途，那么最后，日本人將落入外國人設下的圈套，日本將遭受與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國家相同的命運。考慮到日本與西方的國力強弱、人民的智愚、財產的貧富等，如果允許外國人在內陸居住以及購買不動產，則受益的只可能是外國人，而遭受損失的只可能是日本人。百年之后，所有的地主都將是外國人，現在的這些地主將會變成佃農。幾千年來，自建國時就一直由皇室掌管的土地將落到外國人的手中。商業和工業也將被外國人掌控。他們會完全像對待奴隸那樣對待日本人。當然，現有條約不是沒有缺陷，但跟修訂后的條約相比，給日本造成的傷害要小得多。現有條約隔離外國人，但新條約卻拉近了外國人的距離，那將會是一場災難。[[46]](#_4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盡管因為對西方體制有著獨到的認識而被選為天皇的侍講，但西村對外國人的評價卻很苛刻。多年來，治外法權一直被認為是最可恨地體現出了西方人優于日本人的實證；然而，與日本為結束治外法權而做出的犧牲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諷刺的是，完全不認為日本人是受害者的英國，對于德國向日本做出這么大的讓步卻換回這么小的回報而感到吃驚！[[47]](#_4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10月3日，越來越擔憂這一事態的天皇派一名官員去命令黑田與伊藤會見，以決定是否要繼續推進修約。無論會遭遇多少阻礙，黑田下定決心要進行修約，但原先支持修約的伊藤此時已失去了將修約進行到底的勇氣。他以生病為由拒絕會見任何人。[[48]](#_4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一直以來都是天皇信任的顧問官之一的佐佐木高行奏報說，反對修約的呼聲日益高漲。如果天皇不做出決定，他預計將發生大動蕩，但天皇想先等等看，等到與英國的談判結束時再議。他也在等待著伊藤、黑田和大隈能商議出一個決策來。

內閣成員召開了天皇參加的會議，但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改變自己的觀點, 會議以僵局收場。與會者對達成一個解決方案失去了信心，反復懇請天皇做出定奪，然而，在伊藤未提出具體建議的情況下，天皇似乎不愿采取行動。雙方都想贏得山縣的支持，但山縣只是建議將事情緩一緩再說。

10月18日，大隈被一名“愛國者”炸成重傷。當天，在大隈退朝并正準備返回官邸時，一名男子跳出來，朝他的馬車里扔了一顆炸彈。大隈身受重傷。給大隈治療的貝爾茨認為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對大腿進行截肢。貝爾茨補充說，“付出了如此之多的辛勞，具備如此之多的本領，終于實現了幾乎所有日本人長久渴望的一切的大隈，現在卻被譴責為與國為敵，被斥責要將國家拱手讓給外國人。這種無意義的言論最終導致了企圖刺殺他的可惡行為。幾天前，樞密院議長伊藤伯爵辭職。他真是一個狡猾的逃兵！”[[49]](#_4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大隈最終從傷病中恢復過來，但他失去了左腿，而修約一事至少目前再度被擱淺。貝爾茨憤怒地寫道，“去聽聽日本人是怎樣說的吧，去看看日本的報紙是怎樣寫的吧，人們會認為是外國人一直想促成修約，是外國人想要逼迫日本人進行修約！……一年以后，他們將看得更清楚，也許將再次希望進行修約。”[[50]](#_50__Erwin_Baelz_Awakening_Japan)

黑田稱他愿意對修約失敗全權負責，并向天皇遞交了辭呈。他推舉山縣作為接任人，但是，在山縣愿意接受這一職務之前，三條實美這位安全但不太果斷的人物被任命為臨時總理大臣。大隈辭去了外務大臣一職。對修改不平等條約進行的斗爭也告一段落，至少目前如此。

# 第四十一章 修學習業



1890年的新年正日，天皇（而今三十九歲了）再次未舉行四方拜。皇室對外宣稱天皇抱病，但我們懷疑，因為天皇花了很多時間聆聽與憲法和其他重要大事有關的辯論。與其說天皇病了，還不如說他是厭倦了例行儀式。不過，盡管有時候怠慢了各類儀式，但今年他懷著比以往更大的熱情投入工作，幾乎一日無休。侍從長德大寺實則在7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近日，雖炎熱如焚，圣上日日出御座，親裁萬機，無倦怠之色。”[[1]](#_1__Mary_Crawford_Fraser__A_Dipl)

儀式性工作已經成為相當耗費時間的事情。天皇不僅僅需要會見絡繹不絕的外國賓客，重復表達歡迎或惜別之情，而且由于日本皇室熱忱地與外國皇室交往，當歐洲皇室有皇嗣誕生時，天皇不得不發賀信。更乏味的事情是，在獲悉外國君主或其他皇室成員辭世時，必須要進行哀悼。大多數歐洲皇室之間存在著血緣關系或婚姻關系，舉行哀悼是可以理解的。然而，1月8日，威廉一世的配偶奧古斯塔（Augusta）皇后逝世，盡管這對于明治天皇而言并沒有什么重大意義，但他卻讓日本皇室為此哀悼了二十一天。1月20日，奧斯塔（Aosta）公爵與世長辭，日本皇室再次舉行了為期六天的哀悼。由于這些“表兄弟姐妹們”頻繁離世，日本不得不制定與適當哀悼期限有關的法律。該法將外國分成大國（俄國、英國、德國、中國及意大利）和小國（荷蘭、西班牙、比利時、夏威夷、瑞典、葡萄牙等），大國的君主、配偶和王儲辭世的，哀悼二十一天；小國的皇室成員辭世，哀悼不超過三天。[[2]](#_2__Mary_Crawford_Fraser__A_Dipl)

眼下，天皇最擔心的事情就是王儲的健康狀況。盡管園祥子在2月產下了天皇的第七個女兒，但兒子兼王位繼承人——嘉仁——的健康狀況卻讓天皇無休無止地操心。

天皇關心的另一件事情是高級貴族陷入了困境，其中有很多人已經變得貧困拮據。一個解決方案就是任命他們為神道教的神職人員，但這往往難以令人滿意。皇室最善辯的成員朝彥親王屢次懇請天皇給予他的階層特殊待遇，一次次地挑戰天皇的耐心。4月，天皇視察京都，對窮困潦倒的貴族深表同情，向他們捐贈了一萬日元。[[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雖然這些事情對天皇而言相當重要，并造成了直接影響，但他關注的焦點還是轉移到了政治上，尤其是即將到來的、計劃在7月1日舉行的大選。這一事件在亞洲可謂史無前例。當然，前一年激烈爭論的事件——修改條約——也沒有被遺忘，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進展甚微。去年12月24日任命的外務大臣青木周藏走馬上任，于1月29日向天皇遞交了一份修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將被遞交給與日本簽訂了條約的各個國家。宮內大臣土方久元深信，除非能夠使天皇采取行動支持新方案，否則談判無法取得圓滿成功。為贏得民眾的衷心支持，天皇的行動也是至關重要的。

深切關注此事的天皇咨詢了伊藤博文和佐佐木高行。常年擔任顧問官的佐佐木堅持認為內閣是處理此事的適宜機構。他說，在其他國家情況可能并非如此，但是，日本的國家政體和民眾對神的崇敬使得日本不同于歐美國家。天皇評論說，內閣成員或上層人士的所思所想與普通民眾相隔太遠，借此對那些自稱代表全體日本民眾發言的官員進行了批評。他的質疑精神甚至讓極端保守的佐佐木也備受感動。[[4]](#_4__Jin_Guan_Gui_Zu_Yuan_Yu_Zhon)

天皇繼續就議會的今后工作與伊藤商議。他提出了一些相當敏銳的新問題，比如即便某項議案對于治理國家而言是絕對必要的，但倘若議會未能通過該項議案，將會發生什么？伊藤回答道，未取得議會的同意，什么事也沒法干。在此情況下，內閣成員應盡一切努力來獲得議會的同意。之后，天皇又問道，如果貴族院和眾議院意見不一，或者如果議會和內閣的觀點分歧無法解決，那該怎么辦呢？伊藤回答說，在此情況下，樞密院將發揮重要作用。[[5]](#_5__Mo_Song_Qian_Cheng_Sheng_Che)

盡管天皇提出的問題并不深奧，但這揭示出他對政治非常感興趣。內閣成員也是這番情形。之前，正如天皇所抱怨的那樣，大臣們只是偶爾參加內閣會議，但現在大臣們需要場場會議都參加，一次也不落下；因身體狀況未能參加的，需要事先告知他人。當某個大臣提出一項議案進行商議時，他需要向在場的大臣們提供相關內容說明的副本，并指出其中的注意事項。進行這些改革，是希望能提高內閣會議的效率。[[6]](#_6__Andrew_Fraser__R__H__P__Maso)齊聚一堂的國家高層官員似乎都變成專業人士，而非相互嘲弄和分割政治利益的親信或對手。這樣的場景還是第一次出現。伊藤對議會程序的研究開始結出了果實。

2月8日，青木向與日本簽訂條約的國家遞交了備忘錄，聲稱確保平等將是日后簽訂任何條約的必要條件。隨著議會的召開和憲法的實施，前幾任外務大臣懷著促成修改條約的希望而提出的讓步顯然已不合時宜。既然日本擁有了立法機構和憲法，就不應再被認為是落后于西方先進國家。青木指出，他對井上馨和大隈重信提出的讓步做了四個改動：（1）取消在大審院任用外國法官的承諾；（2）取消對日本法典的編纂和實施情況進行審查的約定；（3）撤銷授權外國人擁有不動產的協議；（4）對授權外國人享有與日本人相同權利的協議增加限制規定。[[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青木補充說，盡管他意識到三十年前賦予外國的某些權利并不能在一天之內全部廢除，但新日本不能容忍傷害人民的利益或有損日本主權國家尊嚴的任何事情。

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幾乎不太可能接受日本單方面的更改，但去年出現了強烈反對修約的呼聲，使得亟須出現一個新的談判基礎。修約一事不能簡單地被置之不理。天皇已向元田永孚表達了他對上一年交涉失敗的不悅之情，元田將此轉告給樞密院。然而，通過外交途徑沒有取得什么進展，于是日本開始著手改革法律制度，以便在歐洲國家擔心其國民可能會受到日本的原始或不成文法律的制裁時進行駁斥。

3月18日，天皇決定重組法院，這是今年諸多改革中的第一項。27日，經過長時間的籌備工作后，天皇頒布了民法。早在1876年，天皇就任命一個委員會起草法典；1878年，初稿完成，但政府對初稿仍不滿意，派人到國外考察立法和政治理論，以期出臺一部更好的法律。1880年，司法省聘請古斯塔夫·布瓦索納德來編纂法典；1886年，司法省對該法典進行了詳細審查，并最終翻譯。之后，法典又經過數次修訂后最終完成，但直到此時元老院和樞密院才批準通過。[[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民事訴訟法和商法也出臺。這些進展應該可以讓外國人相信日本司法不會武斷，也不會腐敗，但是，外國人卻毫無跡象表明他們愿意滿足日本人對平等的渴望。[[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天皇對司法制度的改革有何反應，尚無史料可查。也許天皇已經把心思全部投入到即將前往愛知縣進行視察的大規模演習之中。3月28日，天皇乘坐火車前往名古屋，在沿途停靠多個站臺后，于當天下午5點抵達。名古屋市的民眾熱情洋溢地歡迎天皇的到來。燃放到天空的煙花、沿著街道點亮的大紅燈籠以及在天皇的行程路線中豎起的常綠拱門，都突顯出民眾的熱忱。天皇的名古屋之行并不算做巡幸，大概是因為此次出行的目的是為了觀看演習，而非體察民眾的生活；但對于提高天皇的人氣來說，名古屋之行的作用不亞于巡幸。

演習采用的是“東軍”（日本）和“西軍”（侵略者）進行一場模擬戰爭的形式。西軍因擁有一支強大的艦隊而獲得了制海權，并在各個島嶼和沿海地區成功登陸。東軍的使命是保衛東京灣，阻止從各個方向逼近的西軍的侵襲。3月30日天下起了暴雨，阻礙了演習的進行；31日，雨下了一整天。但天皇不畏風雨，似乎并沒有留意到路面的泥濘不堪。

剛開始，“戰爭”似乎有利于東軍，但入侵的西軍在精明強干的軍官（如乃木希典）的指揮下一直保持不敗，這也許讓更希望侵略者被擊退的天皇有些失望。經過陸地和海上的五天戰斗后，演習結束。在此之間，也有一些奇聞逸事，比如天皇在一所小學吃午餐的情形：他喝茶時用的是供學生使用的杯子，辦公時使用的是教室的課桌。[[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在名古屋，皇后加入到了天皇的行程之中，一同前往京都。1889年10月，東京到京都的鐵路竣工，出行變得比以往要方便得多。是夜，他們抵達京都御所時，發現櫻花盛開，這激起了天皇的懷舊之情。仍將京都視為故鄉的天皇賦詩一首：

今訪舊故鄉

櫻花盛放告春駐

花色撩人思

畫眉嚶嚶耳聞入

舊日依依心頭浮[[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他們剛剛抵達便前往孝明天皇的陵前祭拜。之后，皇后視察了一所聾啞學校，天皇則在一所中學里觀看了健美操表演和軍訓。4月9日，應京都府知事和滋賀縣知事的真誠邀請，天皇和皇后視察了近期竣工的疏水工程，該工程將琵琶湖的水引入京都。[[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4月15日，維多利亞女王第三子、亞瑟王子康諾特公爵及其夫人露易絲·瑪格麗特（Louise Marguérite）抵達東京進行訪問。幸運的是，此時天皇和皇后正在京都，因而免于接待這些重要貴賓。他們并不急著返回東京。由于擔心自己一直忽視了海軍，天皇于4月18日離開京都，前去觀看在吳市舉行的海軍檢閱。之后，他參觀了位于吳市和佐世保市的主要海軍基地。而皇后則前往奈良市，參觀了市內和周邊農村地區的主要神社。5月6日，他們返回東京。

在此期間，公爵和公爵夫人乘坐人力車、購買古玩、欣賞櫻花，以此來消遣娛樂。英國公使的妻子瑪麗·弗雷澤（Mary Fraser）寫道：

確實，公爵夫人是一名熱情的觀光客，她似乎只害怕一件事，那就是錯過普通游客體驗到的一些有趣經歷。在大隊人馬到來之前，他們已派人傳話說希望進行一次非正式的訪問，那樣他們可以盡可能自由地觀光游覽。[[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在公爵和公爵夫人于5月8日乘船前往溫哥華的前兩天，天皇才返回東京。在起航的當天早上，小松宮親王來到這對皇室夫婦下榻的英國公使館，呈上天皇和皇后贈送的禮物。日本人在造訪時極度守時，常常讓外國人嚇一大跳。守時是他們沿襲下來的一個傳統。弗雷澤夫人回憶道，“在離九點還差一刻的時候，小松宮親王在沒有預先通知的情況下到達了，公爵和公爵夫人都還沒有為如此之早的拜訪做好準備。”[[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康諾特公爵夫婦的此次訪問在沒有任何意外發生、沒有造成任何不必要麻煩的情況下順利完成，這顯示出日本在處理與重要外國貴賓的關系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成熟度。就在他們離開后不久，新上任的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對內閣進行了重大變革，標志著日本政壇的新時代已經到來。早在幾個月前，當山縣決定讓并非來自前薩摩藩的人士擔任警視廳領導時，此類變革已經開始發生。多年來，警察一直由薩摩藩人士掌控，這種長久不變的掌控導致很多人濫用職權。山縣決定在召開第一次議會之前改變這種局面，于1889年12月任命來自土佐藩的田中光顯（1843—1939）擔任警視總監[[15]](#_15__1890Nian_7Yue_15Ri__Ri_Ben)。

這次任命雖打破了先例，但并沒有發生多大變化：土佐藩（今高知縣）是西部四強藩之一，而內閣成員均來自于這四強藩。[[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山縣的下一步動作更大。他將兩名并非來自四強藩的人士納入內閣：任命來自山川藩（今德島縣）的芳川顯正擔任文部大臣，任命來自紀州藩（今和歌山縣）的陸奧宗光擔任農商務大臣。[[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這些任命遭到了四強藩政客的反對，甚至天皇也持保留意見。天皇一直以來都不喜歡陸奧，并懷疑自“（明治）十年事件” 后，他的品性是否有所好轉。[[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天皇還補充說，芳川明顯缺乏聲望。他敦促山縣在選任這些人之前再三思量。

山縣回答說，在獄中度過的歲月已經讓陸奧贖清罪行。如果不向他授予一個與其能力相匹配的職位，他可能會加入給政府制造事端的某些政黨。山縣向天皇保證，不會讓陸奧重蹈早年犯下的錯誤（陸奧已經為這些錯誤承擔了個人責任）。至于芳川，他與芳川是舊識，雖然芳川可能尚未做好擔任內務大臣的準備，但他完全能夠處理好文部大臣的工作。山縣承諾將向芳川提供指導。他完全了解教育的重要性，這也是為什么長期以來勸說文部大臣榎本武揚制定未來目標的原因，但榎本優柔寡斷，因而一事無成。如果任命芳川擔任文部大臣，他預見芳川將制定出即使是下一任文部大臣也無需進行修改的教育制度。天皇恩準。[[19]](#_19__Jing_Cha_Ting_Zui_Gao_Ling)此類任命進展順利，天皇對山縣的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6月提拔山縣為陸軍大將。

在一個民選、立憲的政府可以開展活動之前，仍然存在許多問題。6月28日，就在選舉前，《行政訴訟法》獲得批準；兩天后，在最后一刻，內閣提議限定樞密院和內閣的活動范圍，以便讓政府為新選舉的議會有序地開展工作。

選舉于7月1日按照《眾議院議員選舉法》的規定進行。該法由天皇于1889年2月11日頒布，那天也是憲法的公布日。[[20]](#_20__Chu_Le_Lai_Zi_Sa_Mo_Fan___C)本次選舉總共有300個席位，覆蓋除北海道、沖繩縣和小笠原群島外的日本全國。選舉權受到嚴格限制。女性不能參與選舉，并從年齡、居住地和財產方面限定了男性的選舉資格。選舉人必須是年滿25周歲且在都道府縣居住滿一年的永久居民，并繳納國稅15萬日元以上。這意味著只有450365名男性有權投票，約占近4000萬人口的1.14%。雖然不參與投票不會受到任何處罰，但在有資格投票的人中，大概95%的人進行了投票，顯示出選舉激起了民眾的極大興趣。[[21]](#_21__Roger_F__Hackett_Yamagata_A)

雖然不久前日本發生了國內沖突，但令人驚訝的是，選舉在沒有發生暴力的情況下順利進行。盡管不識字的人在投票時可能出現一些微小的弄虛作假，但總體來看，幾乎沒有出現違反選舉法的行為。[[22]](#_22__1878Nian__Lu_Ao_Yin_Qian_Sh)正如梅森（R. H. P. Mason）所評論的那樣，“與兩年后第二次大選時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本次選舉中，政府沒有濫用行政或司法權力來打敗對手。法律是中立的，并且由警察和上層政治或司法機關不偏不倚地執行。”[[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天皇未對選舉做出任何反應。即使這些結果不會對他造成直接影響,但我們也很難想象天皇會對結果漠不關心。天皇繼續努力勸說伊藤博文接受貴族院議長一職或恢復樞密院議長一職，表明他對政府的未來深深擔憂。伊藤多次拒絕這兩項任命，但最終還是接受了貴族院議長的職務，前提是他可以在議會的第一次常會后辭任。[[24]](#_24__Roger_F__Hackett_Yamagata_A)

議會政體的采用，使得能夠更加自由地集會和結社。7月25日，政府頒布了一項法律，簡化了召開政治集會和組建黨派的流程；但同時也禁止婦女和兒童參加政治會議或加入政黨；在召開帝國議會的常會期間，禁止民眾在議會大廈十二公里的范圍內舉行戶外集會或大規模活動。[[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此時的皇室出現了另一個歷史特征：全國不同地區的皇室土地以及最新并入皇室所有的財產數量穩步增加。[[26]](#_26__Qing_Can_Yue___Ming_Zhi_Tia)土地和收入的增加自然而然地鞏固了皇權。盡管天皇本人幾乎從來都不使用不斷被納入皇室領地的各種圍場、溫泉和觀光勝地，但這些也許會對天皇身邊的人起到安撫作用。因為這樣一來，天皇就無需遭受拮據生活的威脅，而那樣的生活是部分先帝曾經遭遇過的。

11月29日，議會召開。在召開前的幾個月中，各種緊急修改意見被提出來。9月24日，以佐佐木高行為首的高層政要向總理大臣提交了一份建議，請求設置一個專門負責神道教祭祀事宜的政府機構。該機構將負責國家的宗教典禮、儀式以及文武百官的宣誓事宜。其長官將被授予最高官階，以強化這一職務的重要性。他將向天皇提出建議，并負責全國的宗教生活。佐佐木確信，為了維持國家秩序，必須要維持一個永恒不變的國家政權，而崇敬神靈是這個政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了增強民眾的團結，必須要拓展忠君愛國的皇道。他認為，明治天皇的神圣統治存在的最大不足，就是缺少一個負責敬奉皇室祖先和祭拜天地神靈的高級政府機構。[[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山縣向內閣提交了這一建議。剛開始，讓宮內省同意設置神道教機構幾乎沒有什么困難，然而，雖然山田顯義原則上同意佐佐木堅稱的崇敬神靈的重要性，但他也看到了實際操作上的困難。根據佐佐木的方案，所有神道教神社均由該機構進行管轄，但是日本全國分布有逾三萬座神社，如果算上不正規的神社，那么該數字將超過八萬。該部門要如何管理全部的神社？面臨這一難題，內閣選擇了最保險的方式：將該建議交由天皇審議。

天皇轉而向伊藤博文捎話，詢問他是支持還是反對。伊藤回答說，毋庸贅言，崇敬神靈是一種適宜的做法，但設置政府機構是一件大事，應當由內閣成員進行徹底調查后再交由天皇定奪。宮內次官吉井友實征詢了三條實美的意見，三條反對佐佐木的建議，他指出設置一個機構花費不小，并警告說這將會不必要地增加神官的數量。其他內閣大臣也紛紛提出反對意見。他們認為，如果該建議獲得通過，將使外國人懷疑此舉是一個政治策略，其目的是驅逐外國宗教；而在國內，這又會使佛教徒認為此舉意在將神道教設為國教并排斥佛教。在初次建立議會政體之際，將宗教和政治混為一談并非明智之舉。

佐佐木回答道，敬奉祖先，即是皇國的國體。設置神道教機構是將神祇崇拜明確為皇國固有之道，并確保宗教自由。[[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最終，這件事情沒有做出任何決定，但神道教和國家之間的特殊關系將成為未來幾年的頭等大事。

在10月的時候還發生了另一件事，雖然微小，但卻產生了長時間的影響。最初，政府僅向由中央創辦的學校頒發天皇和皇后的照片，但之后也向都道府縣的學校以及地方小學和幼兒園頒發。老師和學生在三大節日對著照片鞠躬，以此培養忠誠和愛國之情。[[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也許大多數老師和學生（至少在最初階段）承認這項義務是一種愛國行為。然而，膜拜的對象是照片，而非國旗或其他象征物這一事實終于導致一些人因宗教或其他原因拒絕鞠躬。對于那些向天皇的照片畢恭畢敬鞠躬的人們來說，心中則已經種下了崇敬天皇、甚至是神化天皇的種子。

10月30日，天皇筋疲力盡地視察完軍事演習，從茨城縣歸來后立刻頒布了《教育敕語》。長久以來，天皇都特別關注教育，并鼓勵儒學顧問官元田永孚編寫課本，將“忠孝”作為教育的基礎教化年輕人。元田承認，為使日本在一個充滿威脅的世界中保持獨立和尊嚴，有必要采用和模仿西方的文物制度；但是，他對隨之出現的趨勢予以譴責，這一趨勢忽略了國家政權的本質和教育的淵源。在2月召開的一個縣知事會議上，代表們紛紛敦促文部大臣結束過分推崇西方的傾向，并鼓勵重視日本的本土道德。他們請求盡快制定新的教育政策。[[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關注教育的天皇曾命令文部大臣榎本武揚編寫一套教育箴言，供學生誦讀和銘記。榎本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嘗試編寫，但無果而終。芳川顯正接任后，天皇再次下令編寫，隨后，芳川草擬了《教育敕語》的初稿，其中納入了天皇的心愿。簡略地說，該初稿闡明了忠、孝、仁、義是日本之道。這些美德既易于學習，又易于實踐。事實上，它們是日本國體之精華，是教育之本，日本的教育政策只應該基于此。[[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初稿的最明顯缺陷在于儒學的色彩——至少當代人認為是儒學，這使得它似乎沒有包含什么新穎內容和日本特色內容。確實，很難想象有人會否認被稱作日本國體之精華的忠孝理念。也許讓教育政策顯示出為日本獨有的唯一方式，就是強調皇室的重要性。事實上，在制定《教育敕語》時采納了這一路線。

關于芳川的敕語初稿，眾人向被公認為解決問題專家的井上毅（據說他是伊藤博文的智囊）征詢意見。井上提出了各種反對理由。首先，教育敕語不同于服務于政治目的的敕語，或者不應與適用于軍事教育的敕令一樣。他認為，在教育敕語中提到敬天敬神有引發宗教紛爭的風險，這是不明智的。他還建議，教育敕語不應向哲學那樣深奧難懂或帶有政治色彩，應當淺顯易懂，并且其基調不應該是取悅一個派系而惹怒另一個派系。井上承認，規避這些風險比建造空中樓閣都要難得多。[[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從井上的大致觀點可以明顯看出，他的意見大多數是負面的，但之后，他自己起草了一份敕語。他拿給元田看，并根據元田的批評意見又擬寫了第二份草案。山縣和文部大臣芳川批準了井上的修訂草案，在對幾個文體上的問題進行改正后，他們把這一臨時草案呈交給天皇。天皇非常仔細地閱讀了草案，對一些地方不是很滿意，尤其提到該草案未能提到儒家的四大美德。8月26日，元田將敕語草案返還給井上，并傳達了天皇的意見。井上和元田對正文進行了多次商議，一字一句地增補添削。最后終稿完成，10月21日，他們再次將終稿呈交給天皇審閱。天皇仔細閱讀，并對每一個字進行細細推敲，直到10月24日才予以批準。

《教育敕語》雖然短小、簡潔，但使用了生僻字和深奧的詞語，使得它的原文要比英文翻譯版更加難以理解：

敬告臣民：

朕思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其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33]](#_33__Ryusaku_Tsunoda__Wm__Theodo)

毫無疑問，具有日本特色的文書在開篇必定會提到皇祖皇宗。盡管《教育敕語》中提到了忠孝美德，如同它們自遠古時期起便開始流傳下來一樣，但在《古事記》[[34]](#_34__Ri_Ben_Gu_Dai_Guan_Xiu_Shi)中這些并沒有被著重強調；在正統宋明理學的創立者——朱熹——的教義中，它們也未必是法定的。朱熹當然宣傳孝道的重要性，但他堅持用敬長輩（例如弟敬兄）這一美德取代了對國家的忠誠。而且，《教育敕語》中并沒有體現出朱熹強調理學研究的重要性。它強調的不是學術卓越，而是日本的世世代代，自帝國建立之初起，衷心效忠于皇室。《教育敕語》在結尾部分闡明：

斯道也，實為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之所當遵守。通諸古今而不謬，施諸中外而不悖。朕庶幾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35]](#_35__Ryusaku_Tsunoda__Wm__Theodo)

《教育敕語》提到了天皇希望臣民“修學習業”，但幾乎沒有提到現在或將來教育的內容。作為好臣民，天皇的臣民被要求“重國憲，尊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但另一方面，它卻沒有觸及與此有關的問題。是要對所有人都實行義務教育嗎？如果是，普及到何種程度？女子能像男子一樣接受相同類型和程度的教育嗎？西學（科學、法律、醫學等）是否和道德教育一樣重要？日本的傳統工藝技能可以被視作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嗎？體育教育重要嗎？從內容來看，《教育敕語》并不比明治天皇年少時發表的《五條誓文》更進步。

然而，《教育敕語》（并非《五條誓文》）不僅廣受好評，還備受推崇。1891年1月，就在頒布幾個月后，高中教師內村鑒三（1861—1930）[[36]](#_36__Ri_Ben_Ming_Zhi___Da_Zheng)被要求（和其他老師及學生一樣）“按照佛教和神道教儀式規定的，以在皇祖遺像前鞠躬的相同方式”，在印有天皇御名御璽的《教育敕語》前鞠躬。在該事件發生兩個月后，內村在寫給一位美國朋友的信件中回憶道：

我根本就沒有準備好遵循這一奇怪的儀式，因為這是校長新發明的東西。我是第三個依次上前的人，幾乎沒有時間思考這件事。因此，我秉承基督教的良心，在猶豫懷疑之中采取了較為安全的做法：當著六十名教師（均為非基督教徒，我身旁的兩名教師缺席）和一千多名學生的面，直直地站立，沒有鞠躬！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恐怖的時刻，因為我即刻明白了我的行為會帶來怎樣的后果。[[37]](#_37____Nei_Cun_Jian_San_Quan_Ji)

當朋友勸他在學校鞠躬行禮時，他回答說“良君不應向臣民頒布鞠躬的箴言，而應頒布臣民在日常行事中自然遵守的箴言”。但最后，不希望解雇他的校長擔保說，不鞠躬并非意味著大不敬，于是內村決定“看在學校、校長和學生的份上”鞠躬。[[38]](#_38__Ryusaku_Tsunoda__Wm__Theodo)毫無疑問，也有其他人和內村一樣認為“該儀式愚蠢至極”，但在所有同事都鞠躬行禮時，拒絕鞠躬是需要勇氣的。無論他們的內心有多么抗拒，最終大多數人還是鞠躬行禮，并一同加入到了贊美“文明之偉大根基”的大合唱之中。[[39]](#_3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教育敕語》的作用并沒有馬上顯現出來。11月初，文部大臣發表有關高等教育的聲明。他沒有提到《教育敕語》的理念，而是指出并悲嘆大學集中在東京的趨勢。確實，據說東京有五千名大學生，從全國的數字來看，非常不均衡。一些私立大學與政黨建立了聯系，其他大學則向英國、法國或德國學習，不顧及日本傳統。無教育素養的年輕人毫無目的地學習了一些法律或政治科學，然后沉湎于無意義的投機買賣或深陷理論的泥潭之中，而非投身于為國家謀福祉。[[40]](#_4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11月29日，日本舉行了期待已久的議會開幕儀式。當天早上，天皇于10點30分離開皇宮前往貴族院。陪同天皇一同前去的有熾仁親王、宮內大臣三條實美、總理大臣山縣有朋、樞密院議長大木喬任和各高級官員。抵達議會大廈時，天皇遇見了其他政要。眾議院和貴族院的議員已經聚齊，各位大臣和各外國公使館的其他官員、親任官[[41]](#_41____Da_Ri_Ben_Di_Guo_Xian_Fa)、獲一等勛章的人士和特邀貴賓都已到齊。天皇出現在儀式大廳，受到了式部長[[42]](#_42__Gong_Nei_Ting_Shi_Bu_Chang)的接待。侍從手捧著劍和玉站在一旁，親王和天皇的隨從亦在列。天皇坐在御座上，在場的所有人深鞠一躬。總理大臣走上前，向天皇呈上帝國議會召開的敕語，于是天皇大聲地宣讀起來。

敕語說，天皇對自登基以來的二十多年在建立政府機構方面所取得的進步表示滿意。他希望這些進步能使外國人了解日本的繁榮昌盛和人民的忠誠勇敢。他對與外國建立友好關系深感滿意，并希望擴大通商，使日本的繁榮興旺再邁上一個臺階。對于與日本簽訂條約的國家，他希望能與這些國家建立更加親密友好的關系。[[43]](#_4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雖然敕語的基調比《教育敕語》更加國際化，但它也把日本民眾所取得的進步歸功于皇祖皇宗。貴族院議長伊藤博文走上前，從天皇手中接過文書。所有在場的人士再次深鞠一躬，天皇點頭示意。之后，天皇退席，儀式結束。

第一屆議會的召開標志著很多人（尤其是大隈重信）的夢想得以實現。對于行將開幕的議會，即使是通俗小說的作者也陷入到了一種興奮的狀態之中。此時，日本涌現出了吸引大批讀者的新型小說——即1880年代的政治小說。這些讀者滿懷欣喜地期待著，有一天，日本也能向西方強國那樣，由一個能保證所有日本民眾的自由以及承諾向日本民眾提供更好生活的議會來統治。然而，關于議會實際程序的爭論，很快讓眾多有著如此高期望的人士的幻想破滅。日本無疑是朝著民主邁進了一大步，然而前方的道路已經覆上了一層陰影。

1. [[1]](#_1_41) 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aid-CRH", p. 159.

1. [[2]](#_2_41) 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aid-CRM", p. 166。

1. [[3]](#_3_4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11頁。此時頒布的三部法律是《議院法》、《眾議院議員選舉法》和《貴族院令》（R. H. P. Mason, Japan’"aid-CSB", pp. 27ff）。

1. [[4]](#_4_41) 盡管貴族院與眾議院同時召開，但貴族院并非采用相同的方式進行選舉。251名議員由終身制議員（如王孫、親王、世襲制貴族）、敕任議員和皇族推選議員（終身制）構成。如需了解貴族院的相關探討，請參閱Andrew Fraser, “The House of Peers （1890-1905）,” in Andrew Fraser, R. H. P. Mason and Philip Mitchell, Japan’"aid-CSG"。

1. [[5]](#_5_41) 末松謙澄聲稱，“如果一位目不識丁的人投票，他會把權兵衛寫成八兵衛、把五助寫成六助，結果導致村長和書記串通舞弊。我經常目睹對選舉人最最有害的做法”（《二十三年の総選挙》，請參閱《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第217頁）。引自Andrew Fraser, R. H. P. Mason, and Philip Mitchell, Japan’"aid-CSL", p. 43。

1. [[6]](#_6_41) Andrew Fraser, R. H. P. Mason, and Philip Mitchell, Japan’"aid-CSQ", p. 52.

1. [[7]](#_7_4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00頁。

1. [[8]](#_8_4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463頁。另請參閱第568頁，在本頁中提到，在朝鮮國王的正室死后，朝廷打算舉辦為期9天的哀悼。

1. [[9]](#_9_4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84—687頁、第691—693頁。7月3日，專門留出群馬縣伊香保町的皇室財產，以供皇族歇息和娛樂之用（第586頁）。

1. [[10]](#_10_4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467頁。

1. [[11]](#_11_4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471頁。

1. [[12]](#_12_4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472頁。

1. [[13]](#_13_4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475頁。

1. [[14]](#_14_4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07—510頁。

1. [[15]](#_15_40) 1890年7月15日，日本收到了英國政府對青木的修約提議做出的盼望已久的答復。在指出這些提議與上一年的提議有很大不同后，索爾茲伯里（Salisbury）勛爵預計，英國放棄其特權至少需要5年時間。

1. [[16]](#_16_4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21頁。天皇偶爾也會食用地位較低者吃的簡單食物，大概是為了表示自己與他們休戚與共。例如，當視察軍艦“八重山”號時，他吃的是海軍士官食堂提供的食物（第484頁）。

1. [[17]](#_17_4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24頁。

1. [[18]](#_18_3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26—527頁。

1. [[19]](#_19_39) 警察廳最高領導。——編注

1. [[20]](#_20_38) 除了來自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和肥前藩的人士外，出生于其他藩的兩名人士（勝海舟和榎本武揚）也接受了內閣職務的任命，大概是因為他們長期效勞幕府的緣故。

1. [[21]](#_21_38) Roger F. Hackett,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 p. 135.

1. [[22]](#_22_37) 1878年，陸奧因牽涉企圖顛覆政府的土佐立志社事件被判入獄五年。他被監禁了四年零四個月。天皇赦免了卷入該事件的其他人，但拒絕赦免陸奧。如需了解這一事件的扼要敘述，請參閱萩原延壽，《陸奧宗光》，第47—48頁。

1. [[23]](#_23_3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54頁。

1. [[24]](#_24_35) Roger F. Hackett,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 p. 137. 10月，伊藤被正式任命為貴族院議長（《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58頁）。

1. [[25]](#_25_35)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03頁。

1. [[26]](#_26_35) 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32頁、第564頁、第565頁、第583頁、第586頁、第595頁、第596頁、第602頁、第607頁、第614頁、第621頁、第622頁等。如需了解1890年11月起草的皇室財產的清單，請參閱第698—700頁。該清單并不詳盡，大概是因為其只列舉了世襲繼承的財產。截至12月31日，皇室所持財產總計超過101.6045萬町的第一類御料\*和超過263.3756萬町的第二類御料所，請參閱第701頁（\*御料、御料所：指天皇、幕府等直接支配的土地。——譯注）。

1. [[27]](#_27_3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36—37頁。如需了解佐佐木提議的全文，請參閱津田茂麿，《明治聖上と臣高行》，第698—703頁。1877年廢除了教部省，并且沒有采用其他機構進行代替。

1. [[28]](#_28_3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38頁。

1. [[29]](#_29_3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45頁。這三個節日是新年（四方節）、紀元節（神武天皇即位之日）和天長節（天皇生日）。

1. [[30]](#_30_2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71—672頁。

1. [[31]](#_31_2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72頁。

1. [[32]](#_32_26)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73頁。

1. [[33]](#_33_25) 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p. 646.

1. [[34]](#_34_25) 日本古代官修史書，記載了憑記憶記下來的一些舊事記中的故事以及一些數代口口相傳的故事。——譯注

1. [[35]](#_35_23) 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 第647頁。

1. [[36]](#_36_22) 日本明治、大正時期教育家。1874年入東京外國語學校，三年后畢業，入札幌農學校，受該校虔誠而熱烈的基督教精神感染，于1878年接受洗禮。1884年入美國阿瑪斯特大學學習。1890年回國，任東京第一高級中學校教師，反對把《教育敕語》神格化，1891年在該校校長捧讀天皇《教育敕語》時，堅持不鞠躬，被視為“大不敬事件”。——譯注

1. [[37]](#_37_18) 《內村鑑三全集》第二第十卷，第206—207頁；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 第852—853頁。

1. [[38]](#_38_15) 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p. 853-854.

1. [[39]](#_39_1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76頁。

1. [[40]](#_40_13)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81—682頁。

1. [[41]](#_41_13) 《大日本帝國憲法》下的最高級別官吏，由天皇親自任命，包括內閣總理大臣、樞密院議長、朝鮮總督等。——編注

1. [[42]](#_42_13) 宮內廳式部長官。式部為負責儀式的部門。——譯注

1. [[43]](#_43_1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04頁。

# 第四十二章 大津事件



1891年的新年正日，天皇操持了傳統儀式，誰知才過了兩天便患上了重病。一場流行性感冒席卷全國，甚至連皇室都沒能幸免。首先病倒的是一些宮女，接著是皇后，最后是天皇，這場病使天皇臥床四十天。盡管生病期間朝廷官員一直向他匯報需要注意的事項，但直到2月16日天皇才恢復工作。

這場流行病讓天皇身邊的人成為了受害者。1月22日，元田永孚在患病一周后離世。天皇一得知元田身體不適，立刻派歐文·貝爾茨醫生前去問診，并多次詢問元田的情況。21日傳來了元田病危的消息，為表彰二十年來擔任侍講和儒學顧問所做出的貢獻，天皇授予他男爵爵位和從二位官階。明治派樞密院顧問官井上毅到元田的病床前傳達這個消息。“永孚感泣，合掌稽首謝天恩厚重”，不久后病逝。

元田向天皇傳授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應該忠誠履行天職的儒學信仰。即使成年后，天皇仍就國策征詢元田并尊重元田作為導師所提出的意見。盡管元田（和早期的儒家學者不同）對西方頗有了解，但他基本上屬于保守派，不愿承認新學說的價值。在此方面，他似乎并沒有對明治造成影響，但天皇特別奉職敬業、反感奢侈浪費、決心與民同苦，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這位導師。伊藤博文得知元田病逝的消息時，勸說天皇不要安排繼任之人。“永孚之業永孚始能為之。雖碩學博識不能代。”[[1]](#_1__Mary_Crawford_Fraser___aid_D)

這場傳染病持續到了2月。2月18日，三條實美病逝。就在前一天，天皇得知三條病情惡化，決定在三條臨終前必須去探望。沒等到召集好護衛隊，天皇便和三名侍從在僅有兩名護衛和三名騎兵的保護下，出發前往三條的宅邸。在此之前，天皇已派宮內大臣傳詔書，稱贊三條取得的成就，授予他正一位官階。天皇擔心，如果他親自頒發這一詔書，三條可能會起床接旨，反而加重病情。在被領進病房后，他詢問三條感覺如何。三條絲毫沒有提及自己的病情，而是對天皇一直表現出來的寬厚仁愛表達了感激之情，并對自己躺在病床上接待天皇深感愧疚。他懇請天皇寬恕。

天皇在短暫探視后離開，但隨后頒布了一道詔書，其中說自己深受三條的恩惠，稱三條為良師、慈父。這些話讓人回想起他在巖倉具視死后所說的哀悼之詞，但他對二者的感情無疑是有差別的。在王政復古之前，三條是尊王攘夷派的急躁冒進的公卿。1863年，他粗野地迫使孝明天皇非常不情愿地參拜石清水八幡宮，懇請進行攘夷。第二年，他與另外六名激進的公卿一起逃到長州，以反對朝廷的公武合體政策。那時明治年幼，還未能完全了解這些忤逆天皇的事件，但不管怎么說，他都已經原諒三條很久了。

在王政復古后，三條與之前截然不同。因優柔寡斷而出名的他似乎無法做出一個果斷的決定。相較于巖倉、木戶或伊藤，明治對三條的依賴當然要少得多；三條在政府中居于高位主要是因為他是高級貴族。鮮有公卿對新政府的成立做出貢獻，心里常常重視家世門楣的天皇，或許對三條評價得更高。天皇以國葬之禮，將其葬在東京的護國寺。盡管三條并沒有做任何逢迎平民百姓的事情，但據說人群聚集在道路兩旁，當送葬隊伍經過時，他們灑淚哭泣。[[2]](#_2__Mary_Crawford_Fraser___aid_D)

由于天皇和皇后抱病稱恙，年度第一次詩會（通常在新年過后不久舉行）直到2月28日才舉辦。天皇以“社頭祈世”為主題作詩一首：

滿腹虔誠意

且求民安人心順

萬世太平開

伊勢神靈安在哉

永保我國昌隆態[[3]](#_3__Mary_Crawford_Fraser___aid_D)

這首詩歌名為《述懷》，在以傳染病和兩位親近人士離世而開啟的一年，天皇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的憂懼之情。然而，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

1月9日，身患流感的天皇收到俄國皇太子尼古拉計劃訪日的消息。毫無疑問，天皇龍顏大悅。盡管日本與俄國就北方諸島的所有權問題發生沖突，但俄國是近鄰，保持兩國之間的友好關系是至關重要的。天皇曾接待過其他皇室貴賓，但尼古拉將會成為進行國事訪問的最重要人物。[[4]](#_4__Mary_Crawford_Fraser___aid_D)作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的長子，尼古拉有朝一日將成為全俄羅斯皇帝、世界上最大國家的統治者。

尼古拉將和表兄希臘喬治（George）王子一同訪日。謝爾蓋·維特（Sergei Witte）——當時可能是俄國政府最有能力的人——在其回憶錄中記下了兩位王子此番行程的背景：

當他（皇太子）成年后……皇室決定送他出國，以提高他的政治發展。此時，沙皇有了派皇太子去遠東的想法。皇太子在弟弟喬治的陪同下踏上了此次遠東之行，喬治在行程結束前就已經返程，因為他出現肺癆的癥狀，不是怕冷就是心不在焉。此外，陪同皇太子的還有希臘的喬治王子，但大公[[5]](#_5__Mary_Crawford_Fraser__A_Dipl)或王子們可不能以喬治王子的行為作為榜樣。[[6]](#_6__Barbara_Teters__The_Otsu_Aff)

期待這次訪問的日本人做了精心的準備。在東京，皇室貴賓將下榻在有棲川宮熾仁親王位于霞關的西式宅邸，這套宅邸花了兩萬日元的巨款進行修繕和裝修。[[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英國公使的妻子瑪麗·弗雷澤描述了東京對即將到來的訪問所表現出來的激動之情：

為這次皇室訪問，日本做了非常充分的準備工作。位于海邊的宮掖[[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都進行了重新布置，修飾一新，他們還修建了凱旋拱門、燈飾和宮廷舞廳。天皇打算以異常慷慨的方式來宴請和招待貴賓。[[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4月27日，尼古拉及其隨行人員抵達了長崎。他們于去年11月離開圣彼得堡，在的里雅斯特（奧匈帝國的主要港口）登上“帕米特·佐瓦”號（"aid-D0N"）軍艦。在抵達日本前，他們乘坐軍艦一路經過許多國家和城市，包括埃及、孟買、錫蘭、新加坡、爪哇、西貢、曼谷、香港、廣州和上海。尼古拉原打算訪問日本的不同地區，然后前往海參崴，在那里出席烏蘇里江鐵路（該鐵路連接海參崴和哈巴羅夫斯克）的開工儀式。[[10]](#_10__Zhi_Qian_De_Huang_Shi_Gui_B)派遣年輕的尼古拉（他當時二十三歲）進行此次遠東之行，無疑反映出俄國對東亞的興趣日益濃厚。

在長崎，尼古拉受到了國賓級接待。熾仁親王的弟弟威仁親王帶領著歡迎隊伍，在俄國王子訪日逗留期間全程陪同。此次接待尼古拉可謂是規模宏大，每一個細節都做了周密的部署，甚至在王子們游覽各個城市期間，每到一站應提供哪種茶品或糕點都安排得面面俱到。[[11]](#_11__Gui_Zu_Tou_Xian__Ji_Bie_Jin)

不過，年輕的尼古拉似乎希望得到除茶品和糕點以外的其他東西。在登陸長崎的前一晚，尼古拉讀到皮埃爾·洛蒂的小說《菊子夫人》（"aid-D10"），這本書似乎激起了他想獲得一個臨時日本“妻子”的愿望。在抵達長崎的當天晚上，他會見了駐扎在稻佐地區的八名俄國海軍初級軍官，并得知他們都娶了日本妻子。他感慨道：“我也想效仿他們。”之后，他補充說：“但是在圣周（耶穌受難周）即將到來時，思考這樣的問題真是太羞愧了。”[[12]](#_12__Count_Sergei_Iulevich_Witte)

5月3日是復活節，預計尼古拉將在禱告中度過復活節前的一周。得知這一消息，日本政府在5月4日以后才安排了官方活動，但尼古拉迫不及待地想要參觀城市，他沒有專心致志地在船上做禱告，而是坐著人力車偷偷跑去觀光。[[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街道、房屋干凈整潔，人民友好和善，讓他感到很欣喜。他每到一處，都有日本便衣警察尾隨其后保護他的安全。他們對尼古拉何時去了哪里、在紀念品商店買了什么等一舉一動都進行了秘密翔實的報告。[[14]](#_14__Hao_Wu_Yi_Wen__Ta_Zhi_De_Sh)尼古拉效仿洛蒂，在右手臂上紋了一條龍。那花費了七個小時，從晚上9點直到次日凌晨4點。[[15]](#_15__Bao_Tian_Xiao_Yi____Zui_Hou)

5月4日，尼古拉的活動不再受到宗教方面的限制，他受到了長崎市民熱情無比地歡迎。三十多年來，俄國太平洋艦隊和長崎市的長期聯系使得長崎市民對俄國人態度友好。在日記中，尼古拉對會說俄語的人數感到大為吃驚。當天，長崎市知事舉辦了豪華的日本宴會來招待尼古拉。飯后，他和希臘王子觀賞了有田陶瓷和其他日本藝術品，隨后參觀了諏訪神社——長崎市的代表神社。之后，他們回到了軍艦上。然而，當天晚上，尼古拉和喬治偷偷溜上岸，去了稻佐。在那里，他們會見了常駐此地的俄羅斯軍官及其日本妻子。藝伎為他們表演了舞蹈。尼古拉在日記中寫道：每一個人都喝了一點酒。[[16]](#_16__Ru_Xu_Le_Jie_E_Guo_Wang_Zi)

對于秘密警察報告的那晚消遣活動的具體細節，尼古拉并沒有記錄在日記中。秘密警察提到，俄國人受到來自丸山的五名藝伎的款待。酒宴過后，藝伎們翩翩起舞，兩位王子唱起俄國歌曲。那天深夜，他們去了一個叫做諸岡松的女人經營的一家西餐廳，直到凌晨4點才返回軍艦。其他消息稱諸岡在其宅邸的二樓為兩位王子安排了私人娛樂活動。但相關女人的姓名有爭議。[[17]](#_17__Bao_Tian_Xiao_Yi____Zui_Hou)對于離開長崎，尼古拉深表遺憾，他尤其稱贊長崎市干凈整潔。

下一個停靠港是鹿兒島，但薩摩藩仇視外國人是出了名的，這個選擇讓人覺得有些奇怪。從島津忠義拒絕剪發或拒穿歐式服裝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他特別保守，并且他不喜歡外國人。但當他得知俄國王子將要訪問日本時，決定邀請王子來鹿兒島。5月6日，俄國人抵達了鹿兒島。

島津忠義采用的是早年間的款待方式。當尼古拉到達忠義的宅邸時，忠義和一百七十名年長的武士穿著傳統的盔甲出門迎接。忠義六歲的兒子忠重領舞，武士們跳起了帶有戰爭色彩的舞蹈，忠義則表演騎馬射箭。[[18]](#_18__Bao_Tian_Zai___Zui_Hou_noro)鹿兒島的款待讓尼古拉很開心。尤為高興的是，在鹿兒島市看不到其他歐洲人，這證明該地區仍然“未遭破壞”。他享用了精致的日本料理，但最重要的是，他對島津忠義的保守主義感到很滿意，這很符合他的品味。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深受感動：陪同皇太子的烏克霍托米斯基（E. E. Ukhotomskii）王子抱怨說，鹿兒島是武士主義和仇外主義的誕生地，是神道教和封建傳統的溫床。他覺得武士舞蹈的音樂很陰郁，武士發出的喊殺聲有些粗腔橫調。[[19]](#_19__Gou_Mai_De_Suo_You_Wu_Pin)但是，尼古拉與島津家族建立的關系在未來幾年中一直維持著。當天黃昏，俄國軍艦離開了鹿兒島。

5月7日和8日是在海上度過的。“帕米特·佐瓦”號穿過下關海峽，經過瀨戶內海向神戶駛去，9日晌午剛過，軍艦抵達神戶。在花了大約兩個小時參觀神戶市的名勝后，俄國人登上了前往京都的火車，并于當晚抵達京都。尼古拉很喜歡京都。他把京都比作日本的莫斯科，意指這兩個城市都曾是首都。他下榻在一家現代酒店——常盤酒店，但卻拒絕使用為他準備的西式客房，而是偏愛于日本傳統客房。那晚，尼古拉突然說他想觀看“京女郎”跳舞。于是，他被領到祇園[[20]](#_20__Bao_Tian_Xiao_Yi____Zui_Hou)的中村樓，在那里一直待到凌晨2點。

第二天是在觀光和購物中度過的。尼古拉參觀了京都御所、二條城和最大的兩個佛教寺廟——東本愿寺和西本愿寺（以及其他許多地方）。他觀看了飛鳥井家族成員表演的蹴鞠和弓術。無論看到什么，他似乎都很欣喜；不用說，無論他走到哪里，都受到人群的歡迎。他花了一萬日元購買藝術品；在西本愿寺，他為救濟窮人捐了兩百日元。每進入一棟建筑物之前，他都詢問是否要脫鞋，周全的考慮給日本民眾留下了深刻印象。

次日上午，尼古拉、喬治和隨行人員離開京都的酒店，前往大津欣賞琵琶湖和周圍群山的美景。尼古拉身穿條紋羊毛西裝，戴著一頂灰色的圓頂高帽，坐在一輛人力車上。在京都和滋賀縣的邊界立著一個常青樹拱門，頂上穿插著日本、俄國和希臘的國旗。這一行人經過拱門時，受到了沿路排成一列的大津市軍隊指揮官、滋賀縣警察局長、大津市官員、教師、學生等的歡迎。[[21]](#_21__Bao_Tian_Xiao_Yi____Zui_Hou)

這一列長長的人力車隊伍延伸超過百米。和尼古拉訪問過的其他日本城市一樣，他們一進入大津市，人群就歡呼起來，揮舞著旗幟。隊伍首先到達三井寺，皇室貴賓在那里參觀了寺院的珍寶并聽了有關寺院悠久歷史的介紹。他們從寺院遠眺琵琶湖的美景，不過一會兒，他們就被護送著來到湖邊，登上“保安丸”號。這艘精心裝飾著綠葉和鮮花的船只駛向唐崎神社，隨著外國王子的靠近，神社燃放起（既有景又有聲的）日景煙花，歡迎他們的到來。在神社參觀完盔甲展后，他們返回“保安丸”號，回到了大津。[[22]](#_22__Bao_Tian_Xiao_Yi____Zui_Hou)



西南戰爭時期的津田三藏

皇太子在縣廳享用午餐。1點半，他和隨行人員踏上了返回京都的歸途。滋賀縣和京都的警察及文官坐著四輛人力車為這一行人開路。尼古拉坐在第五輛人力車里，喬治坐在第六輛，威仁親王坐在第七輛。[[23]](#_23__Bao_Tian_Xiao_Yi____Zui_Hou)曾有謠言說，那天俄國王子可能會發生不測之事，因此，沿路都部署了警察。隊伍勉強穿過狹窄街道兩旁的人群，在離開縣廳、經過六七個町時，突然一個警察跳了出來，用軍刀砍向皇太子的頭部。第一刀砍落了皇太子的帽子，擦傷了前額。尼古拉在日記中寫道：

我坐著人力車，沿著同一條街道返回。街道兩旁的人群排成一列。我們左轉，駛入了狹窄的街道。就在那時，我的右太陽穴傳來一陣強烈的痛感。我轉過身，一個丑到讓我反胃的警察用雙手揮舞著一把軍刀，正準備對我進行第二次襲擊。在接下來的一瞬間，我跳下人力車，落到平整的路面上，大聲叫道，“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嗎？”這個惡棍追著我跑，沒有一個人試圖阻止他。我一邊把手按在流血的傷口上，一邊盡全力快跑。我本想躲在人群中，但卻沒法那樣做，因為日本民眾驚慌失措，四下逃散。

我一邊跑，一邊再次回頭，看見喬治跟在這個追我的警察后面。在跑了大概有二十米遠后，我在一個狹窄巷道的角落里停下來，轉過身。襲擊結束了，我大松了一口氣。喬治用他的竹拐杖擊倒這個惡棍，多虧了喬治，我才能活下來。當我回到事發地點，我看到人力車車夫和幾個警察拖著惡棍的腿，其中一個人用軍刀朝惡棍的脖子揮去。

每個人都站在那里，一臉的茫然。我沒法理解，為什么喬治和我還有這個瘋子，就我們三人在大街上跑，為什么沒有一個人跑過來幫我阻止這個警察。但是，我能理解，為什么我的護衛隊中沒有人過來幫我。有棲川宮親王坐在這個隊列的第三輛人力車上，他可能什么也沒有看見。為了讓他們放心，我故意盡可能久地站立著。[[24]](#_24__Bao_Tian_Xiao_Yi____Zui_Hou)

尼古拉的敘述應該說很清楚，但是，多名其他證人的證詞則明確地證明他的幾個細節有誤。他說是喬治擊倒了警察，并說當他和喬治遭受生命危險時沒有人來幫他們，這是不準確的。在審判時，證人證實喬治的確是第一個抗擊襲擊者的人。他那天購買了一根竹拐杖當紀念品，他用的正是這根竹拐杖。不過，竹拐杖并沒有絆倒襲擊者，只是讓襲擊者退縮，但這使得尼古拉的人力車車夫有充分時間抓住襲擊者。軍刀從這個警察的手中跌落下來，喬治的一個車夫撿起軍刀，朝襲擊者的脖子和背部砍去。不久，這兩名人力車車夫在救助俄國王子的性命時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不僅得到了日本民眾的認可，也得到了俄國民眾的承認。[[25]](#_25__Jing_Du_De_Yi_Ji_Qu_______Y)

尼古拉敘述中的錯誤可能歸因于他極度激動和受了傷，但他對人力車車夫給予的獎賞證明他后來承認他們勇氣可嘉。盡管如此，在每年的5月11日——大津事件周年紀念日，尼古拉都在禱告中感謝喬治（而非車夫）救了他的命。[[26]](#_26__Ye_Cun_Yi_Wen____Da_Jin_Shi)

然而，我們可以推測，被人群所拋棄的感覺使尼古拉對日本產生了怨恨。這些人群關心自身的安危勝過從一個瘋子的手中拯救兩個手無寸鐵的人的命。他在日記中并沒有明顯地表露出這種跡象；相反，日記中提到，當他看見日本民眾沿街而跪、雙手合十祈禱、為降臨在他身上的災難致歉時很受感動。[[27]](#_27__Ru_Xu_Le_Jie__Dang_Dai_Zi_L)此外，在遭到襲擊后，他立刻安慰威仁親王，說微不足道的傷口一定不會使他對日本懷有惡感。[[28]](#_28__Ru_Xu_Le_Jie_Xing_Ci_Shi_Ge)

然而，在回憶錄中，維特伯爵對王子的反映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讀：

在我看來，襲擊讓皇太子對日本和日本民眾產生了敵意和蔑視，這可從官方報道中看出來。在官方報道中，他稱日本人為“狒狒”。

如果不是因為他認為日本人是一個讓人討厭、卑劣可鄙、軟弱無能的民族，俄國巨人一舉便可摧毀，我們也不會采取一項導致我們與日本爆發不幸戰爭的遠東政策。[[29]](#_29__Bao_Tian_Xiao_Yi____Zui_Hou)

維特自身對尼古拉二世存有的“敵意和蔑視”可能使他在敘述中有所渲染，但他非常了解尼古拉二世，不可能虛構出這些偏見。從這個角度來看，大津事件看起來可能無足輕重，但卻是引發十三年后日俄戰爭的重要一步。

行刺未遂的消息最初傳到東京時被極度夸大。據瑪麗·弗雷澤所說，第一封電報是這樣描述的：“頭部兩處深傷，不能愈合。”之后，她是這樣轉述接下來的電報的，“他受了重傷。可憐的年輕人。但沒有那些驚慌失措的人寫的那么嚴重。”[[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即使后來大家都清楚尼古拉輕傷痊愈，但日本人還是深感震驚。

民眾的情緒很可能以擔憂為主。很多日本人確信襲擊皇太子可能導致與俄國開戰，而在這場戰爭中，日本不是這個橫跨亞歐大陸的龐大帝國的對手。也有人意識到，這給日本作為一個文明、現代國家的聲望造成了沉重一擊。瑪麗·弗雷澤是這樣描述行刺事件的：

要是發生在歐洲，這將被視為一場巨大的不幸，但也就僅此而已。歐洲人不會從中得出什么推論；面對著該國的驚恐失措，敵國也不會使勁炫耀這道傷疤，并由此呼吁文明人不應與這個國家結交友誼，和這個國家訂立條約是荒謬的，與這個國家談平等是不切實際的。但可憐的日本所發生的一切，都因這道傷口而苦惱，但最讓她痛苦的是給國家的榮譽造成了創傷。那位受到天皇歡迎的貴賓遭到了背棄。[[31]](#_31__Bao_Tian_Xiao_Yi____Zui_Hou)

明治收到的關于大津事件的第一條消息，來自于威仁親王在行刺發生二十分鐘后發送的電報。電報上說俄國王子受了重傷，并要求立刻派陸軍軍醫總監橋本綱常奔赴現場。一小時后，威仁向天皇發送私函，請他前往京都。天皇聞訊大驚，在與總理大臣和其他內閣成員商議后，立即派能久親王奔赴京都。他還命令橋本和其他幾名醫生（包括他的御醫）立刻趕到受傷王子的身邊。隨后，他通知威仁親王，自己將于次日早上親赴京都探望皇太子。明治還向尼古拉發送了一封電報，對“親密朋友”遭受行刺深表痛惜和憤怒，并祝愿他早日康復。皇太子回函說，讓天皇擔心他深感愧疚，還說他沒有感到有什么不適。明治還向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發送了私函，告知了其子受傷的事情。皇后也向俄國皇后發送了類似函件。[[32]](#_32__Bao_Tian_Xiao_Yi____Zui_Hou)

天皇按計劃動身前往京都，他于早上6點30分離開新橋站。當晚抵達后不久，他便前往俄國王子養傷的酒店請求探望。俄國公使拒絕了明治的請求，解釋說深夜造訪對病人不利。這一定是明治一生中為數不多的被拒事件之一，但他沒有堅持，而是說明早再來探視。同時，天皇派來的醫生請求查看王子的傷口，但俄國醫生拒絕了他們的請求，說傷口沒有什么異常的地方，不希望拆除繃帶。他們還說，王子不愿讓其他醫生進行檢查。第二天，日本醫生再次來到酒店時再次遭到了拒絕，因為王子將于該日轉移到“帕米特·佐瓦”號軍艦，俄國醫生不允許他們對王子進行檢查。[[33]](#_33__Wei_Zuo_Zhu_Meng____Da_Jin)

第二天一早，天皇離開住了一宿的御所，前往酒店探望尼古拉。喬治王子接待了天皇，領天皇來到受傷王子的客房。天皇對該事件表達了痛惜之情，并對尼古拉的父母深表同情，他們遠離兒子，一定非常擔心。他向王子保證會立刻嚴懲兇手，并希望王子早日康復、日后能訪問東京和參觀日本其他地方的觀光勝地。尼古拉回答說，他感激天皇和日本民眾所表現出來的友善，他受的只是輕傷，不會因此改變這種感激之情。至于訪問東京，他必須等待俄國方面的指示。[[34]](#_34__Count_Sergei_Iulevich_Witte)

是日，尼古拉將從京都去神戶。他遵照母后的命令，準備回“帕米特·佐瓦”號軍艦進行休養療傷。天皇得知王子正準備返回軍艦，大吃一驚，意識到這意味著王子將不會訪問東京。他派伊藤博文請求俄國公使勸說王子留在日本。公使解釋說，俄國民眾非常擔心王子的安全，尤其是沙皇和皇后深表憂慮。盡管王子本人希望前往東京，但他沒有選擇，只能服從父母的安排。最后，公使含淚懇請伊藤讓天皇把王子當做自己的親生兒子一般，陪同王子前往神戶，以確保王子的安全。[[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伊藤同意向天皇傳達公使的請求，并說天皇宅心仁厚，預計將會恩準。

天皇雖然很失望，但還是同意了公使的請求。他令馬車停在王子的酒店，他們一起前往火車站。在喬治王子和威仁親王的陪同下踏上了專列。火車戒備森嚴，從火車站到“帕米特·佐瓦”號停靠的港口的一路上都排列著警察。到神戶后，天皇一路陪同皇太子到碼頭，他們在碼頭握手揮別。

這并不是這兩人的最后一次會面。5月16日，尼古拉向明治發函一封，告訴明治他將遵照父皇的旨意被迫于19日離開日本。[[36]](#_3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天皇邀請尼古拉于19日在神戶共進午餐，但尼古拉回復說醫生告誡他不要離開軍艦。尼古拉也邀請天皇在“帕米特·佐瓦”號共進午餐，天皇應允。內閣成員獲悉邀請的消息時極為震驚，他們都回想起朝鮮的興宣大院君是如何被清朝人綁架，如何被抬上一艘船，然后在清朝監禁了三年。他們堅信俄國人（當時俄國停靠在神戶港的船只要比日本的多）將會擄走天皇。對于內閣成員的反對，天皇平靜地表示無論如何他都將前往，他回答說：“豈敢為如爾等憂慮之蠻行？”

5月18日，在熾仁親王和能久親王的陪同下，天皇登上了俄國軍艦。午餐進行得很順利。之后，俄國公使奏報說，他第一次聽天皇這樣大聲說話。天皇為大津事件道歉，皇太子就此事回答說，每一個國家都有瘋子，不管怎樣他受的是輕傷，天皇無需多慮。用餐時，他們按照俄國的抽煙風俗，向彼此遞煙。[[37]](#_3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當天下午2點，天皇離開軍艦；幾個小時后，軍艦向海參崴駛去。能久親王遵照天皇的旨意，登上“八重山”號軍艦來給俄國軍艦送行，直到軍艦航行至下關。[[38]](#_38__Wei_Zuo_Zhu_Meng____Da_Jin)

天皇親訪俄國軍艦一事在平安無事中落下了帷幕。也許此次親訪有利于這兩人言歸于好和擦除尼古拉腦海中的痛苦回憶。從天皇這一方來說，此行需要極大的勇氣，這再次表明無論大臣們持何種意見，天皇都會下定決心做自己認為必要的事情。

與此同時，日本國內對這一事件的焦慮情緒升溫。受此事件影響最深的人大概是皇后。弗雷澤夫人寫道：

在此期間，有一個人既無法幫助可憐的年輕王子，又無力懲處行刺者：勇敢而溫柔的皇后。她忘記了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種種自制，忘卻了她在一生中的任何場合所表現出來的符合其身份的高度冷靜，在那個不幸的夜晚，她整夜走來走去，走來走去。她內心涌上悲傷之情，痛哭不止……她唯一想到的就是那個年輕人——還有他的母后。[[39]](#_39__Ru_Xu_Le_Jie_Han_Jian__Ri_W)

整個日本似乎都陷入到悲傷苦惱之中。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40]](#_40__Tian_Huang_Tong_Chang_Bu_Hu)在其名為《勇子：一個美麗的追憶》（Yuko: A Remembrance）的文章中描繪道：

城市靜得出奇，似乎在舉行一個莊嚴肅穆的全體哀悼，甚至連流動商販也壓低嗓門，用比平常低得多的聲音叫賣。平常從清晨到深夜都擠滿人的劇院也都關閉了。關閉的還有每一個游樂勝地、每一場展出——即使是花展也不例外。同樣關閉的還有所有的宴會廳。在寂靜的藝伎街區，就連三味弦的叮當作響聲也聽不到。大型酒館里沒有飲酒狂歡者；客人們用低沉的聲音交談，甚至是大街上遇見的一張張面孔也不再露出慣有的笑容。布告上公布說宴會和娛樂活動無限期推遲。[[41]](#_4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對于“全民自發想要彌補錯誤的愿望”，小泉八云繼續進行了描繪。富人和窮人把身上穿戴的最值錢的傳家寶和最寶貴的家藏珍寶摘得干凈，將它們送到“帕米特·佐瓦”號。

最讓小泉八云感動的是“一個叫勇子的侍女（勇是昔日武士用的名字，意味著勇敢）”。他寫道：

四千萬人沉浸在懊悔傷心之中，但她做得比其他人多得多。為什么西方人完全不明白呢？西方人又怎么會完全明白呢？我們只能模糊地猜測，她的身心被情緒和沖動所支配。[[42]](#_42__Xi_La_Ren__Guo_Ji_Ji_Zhe)

5月20日，勇子在京都府廳前捅喉自殺，享年二十七歲。人們在她身上發現了遺書，其中一封是這樣寫的（用小泉八云的話說）：“民女獻上微軀賤命，以此謝罪，懇請天子勿再傷憂懊惱。”[[43]](#_43__Lafcadio_Hearn_Xiao_Quan_Ba)不久，日本人為她建了一座紀念碑，以此緬懷。[[44]](#_44__Lafcadio_Hearn_Xiao_Quan_Ba)

全國各地的民眾向“帕米特·佐瓦”號贈送禮物，數量之多，造成“軍艦很可能因這些禮物而沉沒”。[[45]](#_45__Lafcadio_Hearn_Xiao_Quan_Ba)日本民眾還向王子發來成千上萬封電報，表達對大津事件的愧疚和悔恨之情。[[46]](#_4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與向俄國王子表現出來的無限憐憫之情相比，日本民眾對刺殺未遂者津田三藏懷有的只有仇恨。山形縣金山村通過了一項法令，禁止居住在村子里的任何人以津田作為姓氏或者以三藏取名。[[47]](#_47__Ru_Xu_Le_Jie_Xiang_Shou_Sha)雖然津田只是一名警察，但他出生在一個效忠于醫師世家（該醫師世家是伊賀的大名）的武士家庭。津田出生于1854年12月（按陽歷算是1855年1月下旬）。[[48]](#_48__Wei_Zuo_Zhu_Meng____Da_Jin)小時候在藩立學堂就讀，學習中國經典著作和武術。1872年，津田應召入伍，隨后在西南戰爭中表現出色，獲嘉七等功勛，并晉升為中士。[[49]](#_49__Ma_Li__Fu_Lei_Ze_Cheng_Qi_W)1882年，他退伍并成為了一名警察，剛開始在三重縣任職，而后在滋賀縣。人們對他的印象是少言寡語、不善社交。[[50]](#_50__Ru_Xu_Le_Jie_Jin_Tian_Fu_Yi)

津田的動機立刻引起了人們的熱議。貝爾茨醫生做了最簡單的解釋：

也許行刺者只是黑若斯達特斯（Herostratus）那一類的人，渴望出名。[[51]](#_51__Er_Dao_Wei_Qian____Da_Jin_S)但是，毫無疑問，多年來日本對俄國的仇恨之情有增無減，這必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俄國在不斷擴張，吞并了弱小的鄰國。這讓日本焦慮不安。[[52]](#_52__Zhi_Wei_Le_Cheng_Wei_Yi_Ge)

其他消息稱，津田對將庫頁島割讓給俄國深感憤怒，堅信俄國王子此行是為了打探日本的虛實，為入侵日本做準備；尼古拉先去長崎和鹿兒島消遣娛樂，而非首先前往東京會見天皇，讓津田感到十分惱怒。[[53]](#_53__Erwin_Baelz_Awakening_Japan)對津田的動機做出的最有趣的解釋是：津田篤信謠言，認為西鄉隆盛并沒有死，并將和俄國人一同回到日本。參加過西南戰爭的津田不希望西鄉歸來。他甚至擔心自己在戰爭期間獲得的殊榮可能會被剝奪。[[54]](#_54__Ke_Yi_Zai_Shen_Pan_Shi_Jin)

在庭審時，津田透露，剛開始，他決定在那天早些時候在三井寺當班時行刺俄國王子。為了更好地飽覽風景，尼古拉和喬治坐著人力車前往因紀念1878年明治到訪而得名的御幸山。山上建有一塊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在西南戰爭中陣亡的大津將士。津田看著碑文，不禁拿曾經戰時的榮耀與今日卑微的警察地位進行比較，激起了對外國貴賓的怨憤之情。他想刺殺俄國王子，以消解挫敗感。就在這時，這兩名外國人出現了。他們并沒有對陣亡將士紀念碑表現出絲毫的尊重，而是向人力車車夫打探風景。津田認為，他們提出的問題就是他們偵查行為的最好證明，于是愈發憤怒。然而，他不確定這兩個人誰是俄國王子，同時回想起警察局局長的吩咐（局長向屬下強調了王子此行對天皇的重要性），因此決定推遲行動。[[55]](#_55__An_Teng_Bao____Da_Jin_Shi_J)之后在唐崎神社，他距離尼古拉非常近，能夠行刺，但他卻延誤了時機。在尼古拉及其一行人準備離開大津時，津田意識到這是他最后的機會，如果他讓尼古拉毫發未損地離開，那么，終有一日尼古拉會以入侵者的身份歸來。這就是津田行刺的原因。[[56]](#_56__Er_Dao_Wei_Qian____Da_Jin_S)

很明顯，津田行刺皇太子是有預謀的。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應立刻將他處決，但唯一的問題是應采用刑法的哪一條規定。元老和內閣大臣們認為除非處決津田，否則俄國不會滿意，到時不知道將會發生什么。他們確信應當處決津田，以撫慰沙皇和俄國民眾。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條規定，凡企圖加害天皇、皇后或皇太子者，一律處以死刑。唯一的問題是，這條規定是否適用于外國皇室成員。

5月12日，總理大臣松方和農商務大臣陸奧宗光會見了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警告他說傷害俄國民眾的感情將造成大患。兒島回答說，沒有任何理由能夠假定第一百一十六條的規定適用于外國王子，堅持要維護法律的權威。但松方說，有國才能有法，堅持強調法律的重要性而忽視國家的生死存亡實乃愚蠢之舉。陸奧指出，第一百一十六條言及的是天皇，但沒說是日本天皇，因此該規定適用于所有君王。然而，兒島回答說，1880年元老院對刑法進行修訂時，他們有意沒有使用“日本天皇”這一用語，是因為“天皇”一詞僅指日本君主。兒島拒絕做出讓步。

第二天，兒島會見了大審院的其他法官，所有人都一致認為“天皇”僅指日本天皇。對此，司法大臣威脅說要頒布地位高于刑法的戒嚴令。同一天，準備審理津田的大津大審院的法官奏報說，應當按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和第一百一十二條的規定判決津田的罪行——謀殺普通人未遂罪。該罪的最高刑罰是判處無期徒刑。

事情并沒有就這樣結束，面對種種威脅，兒島必須勇敢地為日本司法的正直性抗爭。他指出，按照俄國法律，對企圖謀殺其他國家君主的處罰要比企圖謀殺沙皇寬大得多；根據德國刑法典，該罪僅判監禁一到十年。判處津田無期徒刑的嚴厲程度實際上已經高于其他國家的刑罰。[[57]](#_57__Wei_Zuo_Zhu_Meng____Da_Jin)他堅持認為，如果曲解法律以適應特殊情形，將有損憲法。對于如果不處決津田則俄國可能給予無情報復這一警告，兒島回答說，俄國并非蠻夷之邦，而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俄國在謀劃報復行動。外國人不斷抱怨日本法律和法官存在著不足，現在正是證實日本尊重法律的大好機會。

5月20日，兒島和大審院的其他法官到御所面見天皇，并接到詔書：“今次露（俄）國皇太子之事為國家大事，應注意速處理。”眾人對這個玄妙深奧的詔書做出的解釋明顯不同：一些人將“注意”看作是不要激怒俄國的一個忠告，另一些人則認為天皇的意思是讓他們不要篡改新憲法。[[58]](#_5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兒島將天皇的旨意解釋為：他必須反對內閣將第一百一十六條的規定曲解為包括外國皇室在內。

為了讓七名法官同意津田三藏的行為適用第一百一十六條，大臣們向這些法官施加了巨大壓力。內閣成員接近和他們來自同一藩閥的法官，眼看著就要成功說服他們，但最后，法官們的司法良知取得了勝利。在七名法官中，有五名反對適用第一百一十六條。5月24日，就在開始審判津田的前一天，兒島告知司法大臣山田顯義：不可能適用第一百一十六條的規定。

山田大為震驚，內務大臣西鄉從道也被激怒了。他要求兒島詳細說明具體原因。兒島回答說，法官也只是遵照天皇的旨意行事。采用第一百一十六條將違反刑法的規定，違背憲法，在日本歷史上留下一個一千年都無法擦除的污點，并且還會褻瀆帝王的美德。此外，這還會給法官留下不公正、不誠實的惡名。

西鄉說道，“余本不知法律論，然若果如卿所言，不出處分，則有悖圣旨。且露國艦隊涌至品川灣，一發之下我帝國成微塵，至此法律非保國家和平之具，而成破壞國家和平之具。”他補充說，要是事態發展至此，天皇得有多悲痛，而這也正是他和其他人按照天皇的旨意前來拜見的原因。他詢問兒島：法官們是否打算拒絕服從王令。然而，兒島依舊毫不讓步。[[59]](#_59__Ru_Xu_Le_Jie_Dui_Zhe_Yi_Qin)

當山田、西鄉和其他人意識到兒島不會改變主意時，他們接近其他法官，但所有法官都設法回避。5月25日，對津田三藏的審判如期舉行。大審院毅然做出判決：判處津田三藏無期徒刑。當判決的消息傳到俄國時，俄國當局沒有派遣一艘軍艦來炮轟品川。事實上，俄國公使已經向外務大臣傳話，如果判處死刑，沙皇將請求天皇寬大處理。[[60]](#_6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津田被送往北海道監獄，1891年9月30日死于肺炎。[[61]](#_61__Er_Dao_Wei_Qian____Da_Jin_S)

大津事件并沒有像政府眾多官員擔憂的那樣引發戰爭。這次刺殺未遂有可能導致尼古拉形成反日偏見，從而引發了十三年后的日俄戰爭，但人們對此爭論不休。大津事件最重要的結果是加強了日本司法的獨立性。毫無疑問，這多虧了兒島惟謙的勇氣。兒島也沒有因為反對政客而遭到非難：1894年，他成為貴族院議員。他日記中關于大津事件的描述在有生之年被禁，直到1931年才得以出版。[[62]](#_62__Ri_Ji_He_Xiang_Guan_Zi_Liao)兒島無疑是日本近代歷史上的英雄之一。

雖然當時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對王子受傷深表同情，但他們對俄國人仍然持高度的懷疑態度。貝爾茨醫生寫道，日本人愚蠢到在1875年把庫頁島割讓給俄國，這表明日后俄國很可能入侵日本；在提到位于駿河臺的巨大的東正教教堂時，他補充說，“建造這個教堂顯得特別荒謬，因為除了公使館的工作人員外，東京沒有一個俄國人。”[[63]](#_63__Erwin_Baelz_Awakening_Japan)

也許對刺殺未遂事件做出的最有同情心的評價來自小泉八云。在1893年8月26日寫給朋友西田千太郎的一封信中，他說：

順帶提一下，我覺得后世將會對津田三藏做出更加寬大的處理。他的罪行只是一種“瘋狂效忠”。他因為在一瞬間采取了瘋狂的舉動而被認為是瘋子，這種瘋狂的舉動理由充分、時機恰當，本應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他眼前看到的是來自讓人生畏的強國的活生生代表，這個強國甚至讓英國都渾身顫抖，為對抗這個強國，西歐召集了一支超過一百五十萬人的軍隊。他看見了，或者我認為他看見了（也許他確實是看到了：時間可以證明）日本的敵人。而后，他只是跟隨著內心的感受，想都沒想就刺了過去。[[64]](#_64__Gai_Xin_Han_Cun_Yu_Fu_Ji_Ni)

1. [[1]](#_1_42) Mary Crawford Fraser, "aid-D99"’s Wife in Japan, p. 275.

1. [[2]](#_2_42) Mary Crawford Fraser, "aid-DBC"’s Wife in Japan, pp. 281, 284.

1. [[3]](#_3_42) Mary Crawford Fraser, "aid-DBH"’s Wife in Japan, p. 283。

1. [[4]](#_4_42) Mary Crawford Fraser, "aid-DCC"’s Wife in Japan, pp. 286-287.

1. [[5]](#_5_42) 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aid-DD4", p. 289. 保田轉載的一幅圖畫顯示甲板上擠滿了屏風、箱子和其他笨重的物品（《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55頁）。瑪麗·弗雷澤寫道，即使是非常窮困的民眾也帶來了禮物——大米、醬油或雞蛋。據估計，這些禮物可以裝滿16個木箱（《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23頁）。

1. [[6]](#_6_42) Barbara Teters, The Otsu Affair, p. 59.

1. [[7]](#_7_4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37頁。

1. [[8]](#_8_4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54—756頁。

1. [[9]](#_9_4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59頁。

1. [[10]](#_10_42) 之前的皇室貴賓都是君王的次子或三子（如果有兩位英國王子為順位繼承人，則來的是君王的孫子）。

1. [[11]](#_11_42) 貴族頭銜，級別僅次于國王。——譯注

1. [[12]](#_12_42)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 trans. Sidney Harcave, pp. 126-127.在軍艦抵達印度后，尼古拉的弟弟格奧爾格返回俄國（《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95頁）。

1. [[13]](#_13_4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51頁。相比之下，天皇僅贈送了200日元用于修復京都最古老的寺廟——廣隆寺。該寺因其宏偉的菩薩像而聞名（第78頁）。

1. [[14]](#_14_42) 毫無疑問，她指的是浜離宮。

1. [[15]](#_15_41)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9頁；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 trans. Sidney Harcave, pp. 125。1891年5月18日，尼古拉參加了慶典。

1. [[16]](#_16_41) 如需了解俄國王子訪問長崎的詳細描述，請參閱野村義文，《大津事件》，第9—88頁。

1. [[17]](#_17_41)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22頁、第21頁。

1. [[18]](#_18_40) 保田在《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25頁轉載了一張尼古拉在長崎坐人力車的照片。

1. [[19]](#_19_40) 購買的所有物品、物品價格及購物商店詳列于野村義文，《大津事件》，第80—85頁。

1. [[20]](#_20_39)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24頁。尼古拉的表兄、未來的英王喬治五世在日期間也文了身。

1. [[21]](#_21_39)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31頁。

1. [[22]](#_22_38)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32—33頁。根據當地一位編年史家所說，藝伎菊奴招待尼古拉，榮招待喬治，但野村認為榮的招待更深得尼古拉的喜愛（《大津事件》，第86頁）。

1. [[23]](#_23_38)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36頁。第39頁轉載了一張在該場合表演武士舞蹈的照片。

1. [[24]](#_24_36)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39頁。

1. [[25]](#_25_36) 京都的藝伎區。——譯注

1. [[26]](#_26_36) 野村義文，《大津事件》，第111頁。在同一天的午餐時分，尼古拉就日本士兵給他留下的良好印象對指揮官大加贊揚，這是他在抵達日本后獲得的第一感受（安藤保，《大津事件に就て 上》，第144頁）。

1. [[27]](#_27_35) 如需了解（當代資料中）與游覽有關的詳細報道，請參閱安藤保，《大津事件に就て 上》，第141—144頁。

1. [[28]](#_28_32) 如需了解行刺時各個人力車車夫的位置圖，請參閱《大津事件に就て 上》第177頁。

1. [[29]](#_29_32)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11—12頁。

1. [[30]](#_30_3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28頁。皇太子將兩名車夫召到他的船上，親自向每個人賞賜2500日元。他還向他們頒發了圣安娜勛章，并提供1000日元的終身撫恤金，盡管他擔心這些無知的人會以有損于他們的方式使用這些錢。明治也對此表示擔心，并命令外務大臣青木周藏敦促這兩個車夫不要以得不償失的方式使用這些錢。青木不僅告誡他們，還指示京都府和石川縣（這兩名車夫來自這兩個地方）的知事密切監視這兩名剛剛發了財的車夫。如需了解其中一名車夫向畑治三郎的概況，請參閱尾佐竹猛，《大津事件》，第252—257頁。

1. [[31]](#_31_28)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16—17頁。日記中最后的內容寫于1916年——他逝世前的一年。

1. [[32]](#_32_27)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12頁。

1. [[33]](#_33_26) 尾佐竹猛，《大津事件》，第51—53頁。

1. [[34]](#_34_26)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 trans. Sidney Harcave, pp. 126-127.

1. [[35]](#_35_2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12頁、第813—814頁。

1. [[36]](#_36_23)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17—818頁。實際上，天皇派去的其中一名醫生不是日本人。斯科里巴（Scriba）醫生是醫科大學的外國教授。歐文·貝爾茨寫道，“斯科里巴以及天皇派去京都的日本權威外科醫生都沒能謁見皇太子。他們說俄國人的態度極其不友好”（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6）。

1. [[37]](#_37_1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19—820頁。

1. [[38]](#_38_16) 尾佐竹猛，《大津事件》，第100—101頁；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21頁。后者的敘述有些混亂：該書在同一頁中說道，尼古拉因擔心自身安危懇請天皇陪同，但是這與尼古拉在當時說出的其他話不符。

1. [[39]](#_39_15) 如需了解函件（日文翻譯版），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25頁。

1. [[40]](#_40_14) 天皇通常不會隨身攜帶香煙，但這次場合他特意準備了香煙，毫無疑問是受到了知曉這一習俗的人士的提醒。

1. [[41]](#_41_1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29—831頁。

1. [[42]](#_42_14) 希臘人，國際記者、作家。致力于向西方讀者解釋日本人民的思想、文化和風俗。1890年赴日，先后在東京帝國大學和早稻田大學開講英國文學講座，與日本女子小泉節子結婚，1896年加入日本國籍。——譯注

1. [[43]](#_43_11) Lafcadio Hearn（小泉八云）,Out of the East, p. 254.

1. [[44]](#_44_10) Lafcadio Hearn（小泉八云）,Out of the East, p. 256。

1. [[45]](#_45_10) Lafcadio Hearn（小泉八云）,Out of the East , p. 260。如需了解有關畠山勇子的嚴謹介紹，請參閱尾佐竹猛，《大津事件》，第257—263頁。此類介紹中不含有小泉八云的引述內容。

1. [[46]](#_46_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26頁。

1. [[47]](#_47_8) 如需了解向受傷皇太子發送電報的機構列表，請參閱安藤保，《大津事件に就て 上》，第489—493頁。

1. [[48]](#_48_8) 尾佐竹猛，《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第79—80頁。

1. [[49]](#_49_8) 瑪麗·弗雷澤稱其為“一位年長的陸軍軍士長”，但大津事件時他年僅36歲。

1. [[50]](#_50_8) 如需了解津田服役的詳細情況，請參閱安藤保，《大津事件に就て 上》，第251頁；另請參閱兒島惟謙，《大津事件日誌》，第193—194頁。

1. [[51]](#_51_5) 兒島惟謙，《大津事件日誌》，第193頁。如需了解更全面的傳記資料，請參閱尾佐竹猛，《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第248—252頁。

1. [[52]](#_52_2) 指為了成為一個“歷史名人”而縱火焚燒了位于以弗所的戴安娜神廟的人。

1. [[53]](#_53_2) 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5.

1. [[54]](#_54_2) 可以在審判時津田所提供的證詞中獲悉他對這三點的憤怒之情。（尾佐竹猛，《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第133—134頁；《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34—835頁）

1. [[55]](#_55_2) 安藤保，《大津事件に就て 上》，第248—254頁。津田的姐夫證實津田曾說過他相信這一謠言，并擔心西鄉歸來將造成的后果。

1. [[56]](#_56_2) 兒島惟謙，《大津事件日誌》，第192頁；尾佐竹猛，《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第135頁。

1. [[57]](#_57) 尾佐竹猛，《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第135—136頁。

1. [[58]](#_58)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40頁。

1. [[59]](#_59) 如需了解對這一情況的明確介紹，請參閱Barbara Teters,The Otsu Affair, p. 55。

1. [[60]](#_6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48—849頁。

1. [[61]](#_61) 兒島惟謙，《大津事件日誌》，第194頁。沒有跡象表明肺炎明顯是由治療不佳所引發。

1. [[62]](#_62) 日記和相關資料現在均容易獲得，見家永三郎編注成的《東洋文庫》系列。1892年6月，有謠言散布說兒島沉迷于與同僚賭博（《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6頁）。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對兒島不利的供詞因為需要提供證據而一一消散。（第97頁）然而在8月23日，兒島辭職，聲稱患病。很明顯，關于其賭博的小道傳聞，即使不真實，也讓他覺得自己無資格擔任法官（第120頁）。

1. [[63]](#_63) 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5.

1. [[64]](#_64) 該信函存于弗吉尼亞大學的圖書館。

# 第四十三章 條約改正



在大津事件引發的騷動平息后，1891年的余下時間相對平靜。當皇太子尼古拉仍在九州時，日本發生了這一年最重要的政治變動：山縣有朋奏請辭去總理大臣一職。他在3月傳染病流行期間患上了流感，盡管已經康復但仍感不適。山縣推薦貴族院議長伊藤博文作為接任人。天皇確信勸說他留任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一同說服伊藤接受這一職務。已經遞交了貴族院議長辭呈的伊藤正在關西地區游玩，使者追上伊藤，請他返回東京。

4月27日，伊藤覲見天皇，天皇表明了任命他為總理大臣的意向。伊藤拒絕了此次任命。他回憶說，當1881年大隈重信提議召開議會時，他表示反對，認為準備工作尚不充分，并且日本民眾還不夠成熟。他提議推遲召開議會，在他考察了各國的憲法和政治制度后再舉行，之后天皇恩準。伊藤回國后制定了憲法，隨后召開了第一次議會；但是，日本民眾的知識水平仍然較低，實行憲政政府確實舉步維艱。伊藤確信，無論誰擔任總理大臣，都不會在這個職位上長時間留任。如果他強行擔任這一職務，很可能會遭到暗殺。他并不在乎失去微不足道的生命，但是，如果被害，誰來協助皇室和維護政府？[[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伊藤提議說，內務大臣西鄉從道或大藏大臣松方正義（1835—1924）是合適人選。得知西鄉不愿意接受該職務，天皇隨即選定了松方。松方一開始也拒絕，但天皇拒絕聽他的理由。5月6日，松方宣誓就任總理大臣。松方在任的六個月中，議會爭論不斷，12月，議會解散，并在第二年進行重新選舉。

7月，清朝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謁見了天皇。這次謁見按照東方的傳統禮節交換了禮物，然而，清朝艦隊的六艘軍艦（比日本海軍的任何一艘軍艦都要威武強大）引起了一些日本民眾的恐慌。

此次清朝艦隊造訪，對于接受傳統教育的日本民眾來說，是展示對中國文化有多了解的一個契機。一些日本民眾謙恭地稱清朝為“兄”。[[2]](#_2__Zhuo_Zhu_The_Sino_Japanese_W)提督丁汝昌和其他清朝高級軍官無論走到哪里都受到了盛情款待，他們完全融入到了日本民眾的生活當中，而這種程度是歐洲人沒法做到的。日本文人和學者與這些來訪政要體會交流中國詩歌的樂趣，因為漢字超越了國界，并且清朝和日本都奉行文人的觀念。也許參加了展現兩國友誼的各種活動的人士做夢都沒有想到，在三年后，日本和清朝會爆發一場惡戰。

在1891年的夏季，最讓天皇感到愉悅的消息，大概是8月7日園祥子產下了天皇的第八女允子。截至目前，天皇已有三個孩子——皇太子、昌子公主和允子公主。在失去了眾多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后，天皇希望能開心地看到孩子們成長、成年。

10月，天皇向俄國皇太子送了一套鎧甲、一把太刀、一把短刀、一副弓箭以及天皇自己的照片，并附上一封私人書信。[[3]](#_3__Shang_Bu_Qing_Chu_Song_De_Sh)也許這些禮物是為了對大津事件作進一步的道歉。除此之外，這一年沒有發生其他大的事情。

1892年的第一件重大事情是2月15日舉行的選舉。天皇為議會的未來深感擔憂。他告訴松方，自己擔心如果總是相同的成員獲得連任，可能會一次又一次地導致議會解散。他建議地方官員鼓勵優秀民眾參加競選。

在內閣大臣中，最把這番話放在心上的是內務大臣品川彌二郎（1843—1900）。他向地方官員傳達指示，解釋了政府政策，并敦促選舉公正中立、不偏不黨的名士。品川似乎認為之前與政黨關系密切的官員應該被免職。[[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他命令警察要嚴厲處理恐嚇或賄賂行為，暗示這是政黨慣用的伎倆。但是，和他的指示相反，1892年的選舉可能是日本歷史上最腐敗的一次，而最令人痛恨的罪魁禍首不是別人，正是品川。

與上一年的和平選舉不同，1892年的選舉充斥著暴力和縱火事件。民黨（在野黨）和吏黨（政府支持的政治勢力）發生沖突，各地都出現死亡、傷害事件。[[5]](#_5__Gong_You_25Ren_Si_Wang__Jin)匪徒偷走了高知縣第二選區的投票箱，并迫使佐賀縣的部分地區無法進行投票。一般認為這些違法亂紀行為都是品川策劃的，他認為反對政府的政黨都是不忠之士，必須進行鎮壓。不過，盡管此次選舉充滿了狡詐和暴行，但民黨系仍贏得了眾議院的多數席位——民黨系獲得一百六十三席，吏黨系獲得一百三十七席。[[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選舉后不久，天皇被有關恐嚇和暴力行為的奏折弄得心煩意亂，他派遣侍從前往違法亂紀行為最嚴重的四個縣：石川、福岡、佐賀和高知。[[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5月6日，日本召集了新一屆眾議院。5月11日，貴族院通過了一項決議，對選舉方式進行譴責：

眾議院議員之選舉，不得以官吏之職權干涉，此本不待論。故于政府，絕無下賜干涉命令訓諭之理。然本年二月，行眾議院議員選舉之際，官吏干涉競爭，激成人民之反動，遂至流血之慘狀。此事眾目所示，眾口所述，今地方各處憤怒官吏之干涉選舉，有敵視官吏之狀。今于政府，宜速處之，必示民庶以公正。若忽之，實害國家之安寧，其極者招至不可救濟之大不幸。故本院茲此建議，希冀政府深省慮此事，現今處理，遏止其于將來。[[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關于此次選舉，內閣成員的觀點對立。松方決定拜訪伊藤，咨詢他的意見；但是聽聞此事的伊藤提前向陸奧發函一封，抱怨說每當內閣出現問題時，松方總是讓他去解決。現階段他拒絕參與此事，建議松方及其內閣成員在征詢他的意見之前首先要就日后政策達成一致。松方及其內閣商議后的結論是，克服這場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讓伊藤組建內閣。他們請求伊藤接受，但伊藤予以拒絕。[[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伊藤一次次試圖辭去貴族院議長一職，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復雜。在這種情況下，伊藤像往常一樣用生病做托詞，但天皇擔心失去了在政府中最信任人士的效勞，后果將不堪設想，因此他拒絕了伊藤的請求。3月11日，天皇派侍從長德大寺實則前去伊藤的府邸送話：“朕知卿陳情之極切，但朕望常咫尺間倚卿啟沃，卿以加餐靜養，朕甚懷慰。解樞詢之職朕不允也。”[[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伊藤感泣，急忙趕往宮中撤回辭呈。

對品川彌二郎在選舉期間自認為忠實的舉動，內閣的反應讓他一點兒也不滿意。他確信自己行為恰當，憤懣于自己的初衷被誤解，決定辭職。[[11]](#_11__Pin_Chuan_Dui_Qi_Zai_Xuan_J)新內閣剛成立沒多久就要對內閣進行改組，松方感到局促不安，他請求山縣勸阻品川，但品川向山縣提交了能隱晦傳達其心情的兩首短歌。第二首如下：

吾愚鑄罪錯

天地為證皆衷心

無奈釀苦果

羞愧無顏悲吟坐

堪笑無力為哪般[[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同一天，品川以健康狀況為由請求辭職，天皇恩準。各方人士（當然包括伊藤）都被看成是內務大臣一職的候選者。最有可能的候選人是副島種臣，但天皇反對，認為對于一個要求頗高的職務來說，副島年紀太大。他擔心副島可能中途辭任。天皇推薦河野敏鐮，但松方指出副島的威望遠在河野之上，河野在縣級官員中沒有什么人氣。盡管天皇反對，松方還是決定任命副島擔任內務大臣。[[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這一插曲表明明治（盡管很少公開表達政治觀點）密切注視著政府官員的一舉一動，對他們的能力有自己的判斷。它還表明，盡管明治干涉任命事宜，但未必能自主行事。

長期擔任顧問官的佐佐木高行在其日記中明確記錄了天皇對政府主要人物的看法。例如，在3月19日舉行的一次談話中，天皇說，“品川雖正直，然狹量而無忍耐。縱使內閣會議亦憤慨涕泣，事理不辨。前日，伊藤詢選舉中亂紀行為，非難干涉選舉之事實，品川大激昂，云伊藤欲辭職組建政黨等，‘君組織政黨關余何事，君若有暴激之言論，余直以戒令處分君’。伊藤怫然作色曰：‘以內務大臣之職權，豈可隨意處分伊藤？’二人互罵。”[[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當品川和伊藤相互威脅時，明治顯然在非常專注地傾聽。他對這兩個人以及對副島、后藤象二郎和陸奧宗光等人品性的評論很直白且具有啟示性。佐佐木是天皇能夠自由表達自己觀點的少數對象之一，盡管佐佐木總是很恭順，但他也會向天皇講明自己的看法。

正如天皇所預料的，副島的任職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6月，副島辭任，并被任命為樞密院顧問官。這是對辭任或被罷免的大臣所采用的慣常做法。個人與政黨之間爭論不斷成為了日本政治局面的一大特征，井上毅得出結論：要想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唯一希望在于天皇。他懇請天皇下達“大敕令”，率先制定一條國家應遵循的道路。他特意請求以崇尚簡樸而出名的天皇減少各類儀式的浪費性開支，建議將朝廷開支削減一成，用于擴充海軍。[[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毫無疑問，天皇大體上同意了井上的節儉呼吁。天皇寧愿對制服修修補補，也不愿新買一套。然而即便如此，由于身邊的其他人生活奢侈，他也必須做出相應的回應。在訪問大臣或其他政要的宅邸時，他希望能受到適度款待，而不在乎花費多少。例如，7月4日，天皇訪問了后藤象二郎位于高輪的宅邸。他不得不依照先例送給后藤幾件合乎慣例的禮物——一套刻有皇冠的銀杯、一對景泰藍花瓶和一千日元，送給后藤夫人一匹絲綢，送給其子女一些禮物。后藤回贈天皇一把銘刀、一個朝鮮茶葉罐和一只陶制的貍貓狀花瓶。當天下午，當時優秀的表演者——觀世鐵之丞、寶生九郎和梅若實——表演了能戲。晚飯過后，公認的藝術大師桃川如燕和西幸吉分別為皇室一行人表演了評彈和薩摩琵琶[[16]](#_16__Zhan_Guo_Shi_Dai__Sa_Mo_De)。除了這些特殊的娛樂表演外，宮內廳的樂師還演奏了一整天的日本音樂和西洋音樂。晚上，數千只燈籠被點燃，并在樹下燃起篝火。池塘上方放飛了成千上萬只螢火蟲，那一景象比任何照片都要美麗。直到過了午夜，天皇才離開。第二天，皇后也受到了同樣的款待。[[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盡管天皇崇尚簡樸，但他無疑很喜歡那晚后藤準備的過于鋪張浪費的款待。

不到一周，也就是7月19日，天皇訪問了鍋島直大的宅邸。雖然這次款待的規模不及后藤，但在像往常一樣交換禮物后，鍋島安排了武術比賽、盛宴、魔術和評彈等，不過沒有能戲表演。[[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天皇的此類親訪雖然得到了宅邸主人的高度贊賞，但對推行節儉政策毫無益處。

盡管天皇再一次告知宮內省其打算在皇室中施行節儉政策，以便籌集資金建造軍艦，但他指出有兩個方面的資金是沒法克儉的——用于皇祖皇宗祭拜儀式和修繕皇祖皇宗山陵的費用，以及皇太后的日常開支。皇太后得知宮中實行節儉政策，希望將日常開支的費用削減十分之一，但天皇生氣地拒絕了，說皇太后無需為此事多慮。[[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不管怎樣，天皇和皇后并沒有把皇室里的大量資金用在自己身上，而是用于幫助處于困境中的人，或者用于在遭受火災和其他災害的村鎮建造學校。皇室也有義務保護和鼓勵藝術。例如，7月12日，皇后向芝加哥的哥倫布博覽會日本婦人會捐贈了一萬日元，用于提升日本展覽品的品質。[[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天皇和皇后也向長久以來被忽視的佛教寺廟提供資金，用于修繕佛寺建筑和藝術作品。此外，他們還在皇室成員（即使是遠親）締結婚姻或修造新舍時饋贈禮物。即使天皇和皇后所希望的只是過著簡樸的生活，但他們仍需要資金來履行公共義務。

1892年發生的最重要的政治大事是隱居在小田原市的伊藤復出。在小田原，伊藤一直扮演著政府的幕后操縱者。伊藤曾再三拒絕重新擔任總理大臣。7月底，松方辭任，伊藤立刻離開東京，返回小田原，并稱突患急病。看起來伊藤似乎（像從前一樣）逃避任職，但當天皇派宮內大臣去請伊藤返回東京時，伊藤顯然認為擔任總理大臣的時機已經成熟。不過，他希望所有元老都加入內閣并協助他的工作。這一請求得到了天皇的恩準。伊藤的內閣包括山縣有朋（司法大臣）、黑田清隆（通信大臣）、井上馨（內務大臣）、大山巖（陸軍大臣）、后藤象二郎（農商務大臣）、陸奧宗光（外務大臣）、河野敏鐮（文部大臣）、仁禮景范（海軍大臣）和渡邊國武（大藏大臣）。這屆內閣的組成人員都是能人志士，很難想象還有什么人會比這些人更有能力。[[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當伊藤走到天皇面前接受總理大臣的任命時，他承諾“大事件悉侯叡慮不怠，他事總任其責”。天皇回答說：“卿所言善，朕無疑干涉何事，唯奏聞告知意見即可。”

相較于之前的內閣，本屆內閣更有效，任職時間也更長，但11月，伊藤乘坐的人力車被途經的馬車撞翻。伊藤的頭部和臉部受傷，直到1893年2月才恢復進宮參見天皇。[[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1893年的新年揭幕方式成為了如今的標準形式：天皇沒有舉行四方拜，大多數其他新年儀式都由式部長鍋島直大操持。宮中為天皇舉辦了講座，內容關于英國歷史、儒家經典《禮記》的節選和《萬葉集》[[23]](#_23____Wan_Ye_Ji____Shi_Ri_Ben_Z)的詩歌。天皇按照慣例在青山御所給皇太后拜年。今年詩會的主題是“巖上龜”。

一切都顯得風平浪靜。然而，1月12日眾議院投票贊成削減官員薪俸和建造軍艦的預算，新年的喜慶氣氛被粗暴地打斷。盡管政府不斷呼吁節儉，但總有一些領域是沒法削減經費的。政府提出的預算已經削減了11%。眾議院議員認為減少薪俸是合理的，不會導致官員辦事效率低下。他們還認為，在尚未制定國防政策的情況下就擴大海軍規模有些為時過早。然而，大藏大臣渡邊國武（1846—1919）回答道，削減文官薪俸的預算將會阻礙行政機關發揮職能。任何一方都不讓步，眾議院休會五天。這是政府和議會第一次正面沖突，它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政府是否有權自行處理其認為至關重要的事情，即使這會違背憲法賦予議會的特權？[[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在確定他們唯一能求助的對象只有天皇后，眾議院議員提交了一份一百四十六人簽名的請愿書。天皇暫停會議到2月6日。[[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2月7日，眾議院議長星亨（1850—1901）向天皇呈遞了一份請愿書，對削減預算決定的正當性進行了解釋，并代眾議院懇請天皇保留憲法賦予議會的權利。同一天，眾議院進行了投票，支持向天皇提交一份對內閣進行譴責和懇請天皇進行調解的請愿書。[[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伊藤請求眾議院重新考慮其做出的決定，不要給天皇增添苦惱，但是眾議院以二百八十一票贊成、一百零三票反對批準了這項決定。

能夠結束這一沖突的唯一人士就是天皇。天皇經常被歷史學家們描繪成一個有名無實的傀儡。請求天皇圣裁確實是一種傳統的儀式性做法，但它并不只是單純無意義的形式主義行為。這次就是諸多例子中的一個。只有天皇的裁決才是各方都尊重的唯一決定。

2月9日，伊藤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議天皇從兩條道路中擇其一：（1）命令眾議院和政府進行公開談判以達成和解。如果眾議院未能遵守該命令，或者談判無法取得預期結果，則解散眾議院；（2）立即解散眾議院。翌日，天皇公布了決定。他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在其他國家變得越來越具有威脅性的時刻，有必要增強日本的軍事準備。因此，他決定削減宮廷開支六年，每年從宮廷經費中劃撥三十萬日元用于軍備。同時，所有文官和武官的薪俸減少10%，作為建造軍艦的補助費用。[[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眾議院恭順地做出回應，表示接受天皇的命令，并承諾與政府達成和解。2月14日，貴族院議員也同意捐獻薪俸的10%用于建造軍艦。天皇的決定代表了一種折中方案：削減文官和武官的薪俸——這是眾議院所提議的；但是，削減的資金將被用于建造軍艦——這并非眾議院贊成的事情。整個皇室將自愿削減5%—15%的開支，但皇后堅持在此后六年將宮中開支減少20%。[[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1893年，眾議院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修約。多年來，不平等條約（大多數是在幕府日漸衰微的時日里簽訂的）已成為引發民眾不滿的導火索。每一個人都希望結束治外法權和恢復關稅自主權，但是，日本為實現這些目標所付出的代價被屢屢證明是個絆腳石。一些人斷言，與允許外國人借此機會控制日本國土和日本民眾的生計相比，治外法權所帶來的羞辱更容易讓人忍受。

1892年5月，眾議院草擬了一份呈遞給天皇的議案，呼吁結束治外法權和外國對關稅的控制。其最終目標是要取得平等。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日本雖拒絕讓外國人持有土地或者擁有或經營礦山、鐵路、運河和造船廠，但將允許外國人在日本內陸居住。此外，日本還要求與其簽訂了條約的各國提供最惠國待遇。[[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然而，由于議會解散，該提案毫無進展。12月，在召開新議會時，該提案被再次提出，并在1893年2月的秘密會議（經政府要求而召開）上進行了商議。

盡管進展甚微，但修約一事并沒有被遺忘。7月，眾議院通過一項決議，呼吁結束治外法權。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認為修改條約的歷史是一段失敗的歷史，而失敗的原因始終在于內部，即日本無法做到和衷共濟。他自己草擬了一份新的通商航海條約，提交給內閣以供審議。在擬寫條約時，他以1883年的《英意條約》為基礎，參考《日墨條約》。這兩個條約都是在平等的基礎上簽訂的。他提議讓新條約在簽訂五年后再生效，以便給予新舊條約充分的過渡時間。[[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陸奧認為，最好的途徑是與各國分別進行談判。他首先選擇與長期以來反對平等條約的英國進行談判，推選駐德國全權公使青木周藏作為談判人。天皇批準了這一方案。9月，青木會見了（當時正在倫敦休假的）英國駐日公使休·弗雷澤（Hugh Fraser），并開始著手與英國政府進行磋商的初步準備工作。

修改條約絕非易事。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多次抗議日本禁止他們居住在內陸，將該限制與日本人可以自由地在西方主要國家四處旅行和生活進行比較。一些日本人擔心允許外國人與他們共同生活將會引發災禍，甚至有人會對外國人實施暴力行為。熊本、茨城兩縣的反對者就宣稱要通過暴力行為讓外國人明白自己并不受歡迎，然而，這些人的行為卻讓日本政府難以安撫外國人。外國人擔心如果結束治外法權，日本法院將不會懲治此類暴力行為。可是，修改條約對于大多數日本人而言具有重大的心理安慰作用，它將表明日本已經被認可成為一個現代國家。

支持修約派和（相比于允許外國人在內陸居住而選擇）延長現有條約派的對立貫穿了整個1893年。這一問題的核心在于大多數日本人普遍存在的仇外心態。12月，當陸奧在眾議院審查與修約有關的各項提案時，對提案的內容感到驚愕。他評論道：

此等諸案以異類視外國人，恰如露西亞（俄）國待猶太人，背離我開國之皇道。故政府于此際，斷然明示開國主義之維新以來方針，鎮壓反對此之非開國主義。若默而不管，則其勢焰益彌漫國內，遂恐惹起內外交涉之大紛亂，與當下著手條約之改正交涉大阻障。政府今已為一日不可躊躇逡巡之秋。[[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12月11日，陸奧在內閣會議上發表了類似聲明。內閣不愿采取積極行動，他宣布打算辭職。但是，伊藤提醒陸奧說急躁冒進并非解決這一重要事情的辦法。他力勸不要操之過急。陸奧隨即平息下來，并收回了辭呈。

在眾議院中，反對修改條約的呼聲繼續高漲。12月19日，延長現有條約派提出了一項決議，呼吁政府在條約中闡明日本的權利和義務。他們還附上了一份說明，描述了日本放松對內陸的控制后，外國人將會出現擾亂秩序的猖獗行為。

辯論變得如此激烈，以致天皇突然頒布詔書，下令議會休會十天。在辯論的過程中，勢同水火的爭論讓天皇大為煩心。他派侍從旁聽會議過程，并向他匯報。在就重大問題出現爭議時，侍從們每時每刻都通過電話向天皇匯報相關情形。[[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12月29日，眾議院的兩派繼續辯論。陸奧發表了反對續訂現有條約的聲明，再次堅稱自明治維新時起，政府的基本政策就是建立一個開放和進步的國家。續訂現有條約違反了這一國策。這些條約并不適應自首次簽約以來逐漸發展的現代社會。眼下正是摒棄幕府時期采用的“鎖攘主義”政策以及收回曾經喪失的權利的大好時機。作為回報，給予外國人現有條約中未提供的某些特權也是適宜之舉。此外，日本不應忘記，如果外國人可以在內陸自由旅行，那么他們消費的金錢也將使生活在內陸的人們變得富足起來。如果日本希望修改條約，首先要讓外國人了解日本已經取得了怎樣長足的進步，而這只能通過遵循“開放國門”的政策而獲得。最后，陸奧請求眾議院撤回保留現有條約的提案。這一請求沒能獲得支持。于是，天皇再次頒布詔書，命令議會停會十四天。[[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12月30日，總理大臣伊藤和樞密院議長山縣有朋覲見了天皇，之后眾議院被解散。在此之前，伊藤懇請天皇同意停會，以便阻止眾議院通過一項支持延長現有條約的決議。這就是上述停會十四天的原因，然而，眾議院卻沒有要重新考慮的跡象。伊藤認為，除了解散眾議院，沒有其他辦法來處理這一局面。就在同一天，天皇下令解散眾議院。

天皇得出了和伊藤相同的結論——無論休會多少次，都不太可能改變眾議院的態度。在向佐佐木高行傾訴時，天皇認為政府和眾議院之間的沖突是由過于倉促成立議會所造成的。[[34]](#_3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從此刻起，天皇的政治觀點明顯變得保守。他開始認為他引以為傲的兩件事——頒布憲法和成立議會——都為時過早了。

1. [[1]](#_1_43)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04頁。

1. [[2]](#_2_43) 拙著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 p. 261-262.

1. [[3]](#_3_43) 尚不清楚送的是哪張照片；也許送的不是照片，而是吉歐索尼蝕刻版畫的復制品。同年11月25日宮廷默許出售天皇、皇后和皇太后的肖像畫（《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934頁）。

1. [[4]](#_4_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頁，品川最初是以作詞家的身份名聲大噪。

1. [[5]](#_5_43) 共有25人死亡，近400人受傷。

1. [[6]](#_6_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9頁。Roger F. Hackett在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一書中給出的數字是平民派獲得183個席位。

1. [[7]](#_7_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5—26頁。

1. [[8]](#_8_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7頁。眾議院通過了一項類似決議，證實官員干涉選舉，并要求內閣大臣承擔責任（第68頁）。

1. [[9]](#_9_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2頁。

1. [[10]](#_10_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2頁。

1. [[11]](#_11_43) 品川對其在選舉中采用的辦法并沒有感到悔悟。他解釋說，“如果蓄意阻撓者獲得連任，將會危及國家安全。因此，要采用各種方式對選舉施加影響，由此打敗蓄意阻撓者，讓忠誠的代表當選。如果將來發生類似情況，我還會這么做，并會鏟除蓄意阻撓者”（奧谷松治，《品川彌二郎伝》，第286—287頁；Roger F. Hackett,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 p. 152）。

1. [[12]](#_12_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2頁。

1. [[13]](#_13_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3頁。

1. [[14]](#_14_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9頁。天皇對身邊人的其他評價轉引自于佐佐木的日記，見第107頁、第126—127頁。

1. [[15]](#_15_4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4頁。

1. [[16]](#_16_42) 戰國時代，薩摩的大諸侯島津忠良為了教育武士的子弟，命盲僧淵脅壽長院創作一批道德內容的琵琶彈唱作品，從此琵琶在這個地區得到了更廣泛的流行，其流派成為薩摩琵琶。明治維新后，因為尊王攘夷運動的骨干力量多為薩摩藩武士，進入中央政府從政的薩摩藩士很多，所以薩摩琵琶也傳入東京，并逐漸向全國發展和普及。這個流派的特點是注重內容，幽雅與悲壯并存。——譯注

1. [[17]](#_17_4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00—101頁。

1. [[18]](#_18_4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03—104頁。

1. [[19]](#_19_4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27頁。

1. [[20]](#_20_4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04頁。隨后，天皇（于1892年11月25日）向世界博覽會日本婦人會追贈5000日元的禮物。

1. [[21]](#_21_4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17頁。

1. [[22]](#_22_3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61頁。

1. [[23]](#_23_39) 《萬葉集》是日本最早的詩歌總集。所收詩歌來自4世紀至8世紀中葉的長短和歌。——譯注

1. [[24]](#_24_3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87—188頁。正如我們（在第四十一章）所了解的，明治預見存在這種可能性。伊藤已告知明治，在此情況下，政府應試圖勸說議會改變主意。

1. [[25]](#_25_3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89頁。

1. [[26]](#_26_3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95—197頁。

1. [[27]](#_27_36)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06頁。

1. [[28]](#_28_3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09頁、第239頁。

1. [[29]](#_29_3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11—212頁。

1. [[30]](#_30_3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73—274頁。

1. [[31]](#_31_2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40頁。其在12月11日的內閣會議上發表了類似聲明。

1. [[32]](#_32_2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48頁。

1. [[33]](#_33_2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59頁。

1. [[34]](#_34_2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72頁。

# 第四十四章 對清宣戰



1894年的新年正日，天皇再次沒有主持四方拜和其他規定的儀式，而是由代行官操持。天皇未能操持此類儀式，大概所有人都不會感到驚訝。近年來，天皇經常拒絕出席這些儀式，有時抱病稱恙，有時沒有任何理由。人們似乎已經忘記了，數百年來主持此類儀式一直都是天皇的主要職責。

對宮中的人來說，正日里最難忘的一件事大概就是皇太子向天皇恭祝新年。在這一年里，皇太子拜見天皇的次數變得更加頻繁——每月好幾次——表明二者更加親密。之前皇太子也拜見天皇，但那是朝廷禮節規定的，而非因為感情上的聯絡。當然，每次太子生病時天皇都很苦惱，不過，他最擔心的可能是王位繼承，而非這個獨子的生活。他的其他子嗣都在嬰兒時期夭折，盡管嘉仁身體虛弱，但似乎越來越有可能成為他的繼承人。也許在很多情況下，天皇都對兒子不像自己小時那樣身體健康、精力充沛而感到遺憾吧。

盡管如此，仍有必要為親王的未來登基做好準備。天皇下定決心讓兒子接受合乎需要的教育。正如我們已經了解到的，他之前決定讓皇太子和其他男孩一同進入學習院就讀，而不是像皇室成員平常那樣接受私人教育。皇太子是一個平庸的學生，他缺乏勤奮好學的天資，但這并沒有造成他學業終止。在明治看來，日本的下一位天皇不僅需要深諳日本和中國的歷史及文化，還要了解西方的相關內容。皇太子還必須能寫得一手好字，能以傳統方式創作和歌。[[1]](#_1__Wei_Yu_Fei_Zhou_Bei_Hai_An)然而，盡管天皇費盡心思安排皇太子的教育事宜，但嘉仁的健康狀況總是首要的考慮事項，他的學業經常因疾病或醫生的決定而中斷，醫生認為東京寒暑嚴酷，不適宜繼續留校就讀。

皇太子似乎已經被從來不會展示慈父一面的父親給威嚇住了。明治常常擺出冰冷的面孔，按照正統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傳統父親形象對待兒子。他似乎是在模仿孝明天皇對自己的嚴厲行為，但并沒有像孝明天皇那樣，每天都指導他的兒子創作和歌。事實上，天皇似乎對其繼承人的教育沒有給予直接的幫助。

1894年，嘉仁進宮朝見的次數增加，表明父子之間的親情終于生根。本年底發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最好的證明。1894年11月17日，嘉仁抵達廣島，打算拜見父皇（明治已于清日戰爭期間移居廣島）。他于次日上午10點30分出現在大本營，在和父皇簡短交談后，便一同前去參觀一匹滿洲馬。隨后，他們一道登上了天守閣，欣賞廣島全市的秀麗風光。一位內廷隨從擔任向導，借助于望遠鏡和地圖向他們介紹風景名勝。稍后，天皇父子共進午餐。天皇的隨行人員一直都想知道他是否喜歡這個兒子，今日見到天皇慈愛溫柔，感到非常高興，并決定稟報皇后。但是，這種極其少見的親密行為并沒有讓天皇忘記自己的職責。在11月24日皇太子起身前往東京之前，他也只是找了兩次機會與其共進午餐。[[2]](#_2__Mutsu_Munemitsu_Lu_Ao_Zong_G)

盡管皇太子實際上很少與天皇一同出席各類場合，但從1887年起，浮士繪中常常描畫他與天皇皇后一起的情景。其中也有皇太子站在父母中間的場景，仿佛是在強調皇室家庭的和諧。[[3]](#_3__Zhuo_Zhu_The_Sino_Japanese_W)另外，從1894年公開慶祝天皇和皇后結婚二十五周年的慶典中也可以了解皇室的家庭生活。在此之前，日本君王的結婚紀念日都不是普天同慶的節日，但是，當天皇得知外國皇室慶祝“銀婚”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時，他很高興地恩準了這個擬議的慶典。為確保慶典的順利進行，政府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研究外國的具體實例。政府公布慶典將于3月9日舉行。

在這個值得慶賀的時刻，日本鑄造了金、銀的紀念章，雕飾相稱的吉祥圖案（如菊花和雙鶴）。[[4]](#_4__Huang_Tai_Zi__Wei_Lai_De_Da)天皇恩準購買紀念章的人在余生佩戴紀念章，并可以傳給子孫后代。為慶祝這一時刻，3月9日，政府發行了一千五百萬張郵票，這是日本第一次發行紀念郵票。

慶典日在賢所、皇靈殿、神殿[[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舉行的儀式中揭開了帷幕。天皇和皇后都沒有出席這些儀式，但是，皇太子、親王和內閣成員都參加了祭典。皇室警衛炮兵團和海上船艦鳴響皇家禮炮。當天上午11點，天皇和皇后出現在鳳凰之間[[6]](#_6__Zai_1887Nian_8Yue_8Ri_Chu_Ba)，那里已經聚集了兩百多名貴族和內閣成員以及他們的妻子。天皇身穿正式的制服，并佩戴了所有的勛章。皇后穿著一套白色的禮服，佩戴著飾物和皇冠。她的禮服裙擺上裝飾著用銀線繡成的花朵和鳥兒的圖案。稍后，法國、英國、德國、俄國、美國、比利時、朝鮮和奧地利的公使紛紛代表各自的政府道賀，天皇謙和地予以回復。

當天下午2點，天皇和皇后同乘馬車前往青山閱兵場檢閱軍隊。當天皇夫婦走出皇宮時，在皇宮正門外，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和其他組織的成員站成數列，向他們歡呼喝彩。人們成群結隊地佇立在街道的兩旁，渴望一睹天皇和皇后陛下的尊容。2點45分左右，他們到達了儀式舉辦場地，彰仁親王和高級官員在那里迎接。各隊舉槍致敬，軍樂隊奏起了國歌。在接待了貴賓（包括日本和外國的政要）后，天皇和皇后再次登上打開了車篷的馬車，在閱兵場巡游，受到了民眾的大聲歡呼。之后，他們檢閱了軍隊。

慶典持續了一整天，在舞樂表演和酒宴中落下帷幕。雖然官方并未使用“銀婚”一詞，[[7]](#_7__Jin_Zhang_Shi_Wei_Huang_Zu_Z)不過皇室向賓客贈送的禮物或者賓客向天皇夫婦呈獻的禮物大多為銀制品。那些無福被邀請參加慶典的人可以呈獻禮物。這些禮物并非都是銀制品，很多是詩歌、清酒、醬油、墨魚干、刀劍、繪畫、陶瓷、漆器、盆景等。二十五名男士和二十五名女士（根據二十五周年而采用該數字）——包括貴族成員、內閣大臣和經常參加宮廷詩會的人士，以“鶯花契萬春”為主題創作了詩歌。筋疲力盡的天皇和皇后直到凌晨1點45分才就寢。[[8]](#_8__He_Cheng__Gong_Zhong_San_Dia)

銀婚慶典的喜慶氣氛久久沒有散去，一直持續到了3月28日。該日朝鮮政治家金玉均在上海的一家日本旅館被暗殺的消息傳來。在日本時便一直陪同金玉均的這名兇手是奉朝鮮保守黨領導人之命行事的，他們恨透了金玉均，因為他是開化黨人。

在1884年政變失敗之前，金玉均曾在日本生活過。在1881年第一次訪日后不久，他便與福澤諭吉成為朋友。福澤諭吉大力支持在朝鮮成立開化黨，并認為日本必須起到領導作用，促使朝鮮和清朝走上現代化國家的道路。[[9]](#_9__Feng_Huang_Zhi_Jian__Huang_G)然而在1885年，當意識到開化黨無力控制朝鮮政府后，福澤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在文章中，他主張與其坐等鄰國實現開化，倒不如脫離它們的隊伍，與西方文明國家共進退。

1884年12月，金玉均和另外八名朝鮮志士逃往日本，他們都堅信朝鮮應當效仿日本，走上國家現代化的道路。這幾名朝鮮人給自己取了日本名字，并穿上了西式服裝，試圖討好日本領導人。[[10]](#_10__Bu_Guo__Nan_Zhai_Nian_Zhong)他們大概期待著受到日本政府的優待，但獲得的只是最低限度的保護。1885年2月，朝鮮政府派使臣前往日本，要求日本送交金玉均。日本政府拒絕，朝鮮便向日本派遣刺客，刺客攜帶著國王高宗簽名的刺殺金玉均及其同黨樸泳孝的文件。[[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在得知這一密謀后，金玉均上報了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井上馨。井上致函朝鮮政府，要求召回刺客，并承諾將把金玉均驅逐出日本。

當時金玉均居住在橫濱大飯店。井上命令神奈川縣知事將金玉均強行驅趕出享有治外法權的飯店，并將他關押在三井家族的宅邸。1886年6月，內務大臣山縣有朋命令知事以金玉均威脅日本安全和阻礙與外國的和睦關系為由，要求其在十五天內出境。[[12]](#_12__Ru_Xu_Le_Jie_Guan_Yu_Fu_Ze)盡管金玉均持有親日的觀點，但日本官員視他為包袱，擔心他的滯留可能會在日本尚未做好準備之前引發一場戰爭。[[13]](#_13__1884Nian_Di_Da_Ri_Ben_Hou_B)最后，金玉均沒有被送往外國，而是被移送到一個偏遠的島嶼——位于小笠原群島上的父島，在那里度過了兩年孤苦伶仃的流亡生活。那里的氣候對他的健康狀況造成了極大傷害，因此，他被從氣候炎熱的小笠原群島押送到了北部寒冷的北海道，之后一直待在那里，直到1890年才被允許返回東京。[[14]](#_14__1894Nian_5Yue_17Ri__Zi_You)多虧了眾多日本同情者提供金錢資助，他才得以在流亡歲月中活了下來。

1894年3月，在請求日本政府協助朝鮮進行開化的希望落空后，金玉均準備動身前往上海。他的目的是會見李鴻章。在李經方（李鴻章之子）擔任清朝駐日公使時，金玉均與他頗有交情，并在其回國后繼續保持書信往來。金玉均希望李經方能讓他會見其父——清朝最有權勢的人物。他尤其希望向這位地位顯赫的元老重臣提出他的計劃：聯合東亞三國之力，共同抵御西方列強的進一步侵略。[[15]](#_15__Jiang_Zai_Yan____Zhao_Xian)雖然有人警告金玉均此次出行有危險，[[16]](#_16__Jiang_Zai_Yan____Zhao_Xian)但他覺得，如果有機會得見李鴻章，哪怕只有五分鐘，也值得為此冒一次險。[[17]](#_17__Jiang_Zai_Yan____Zhao_Xian)

居住在大阪的朝鮮人李逸植為此次出行提供了資金（并償還了金玉均在日本欠下的債務）。李逸植還給了金玉均一張匯票，用于支付他在清朝期間的費用，但告訴他說，為了用匯票兌取現金，他需要朝鮮人洪鐘宇陪同他前去。洪鐘宇一直在法國學習，直到最近才來到日本。[[18]](#_18__Jiao_Tian_Fang_Zi____Min_Fe)這一行人還包括金玉均的日本朋友和田延次郎。

3月27日，金玉均抵達上海。第二天，當和田出去買東西時，金玉均正躺在床上看書，這時，洪鐘宇闖入房間，朝金玉均開了兩槍。金玉均從床上逃到走廊時背后又中了一槍，這是致命的一槍。這位聰穎杰出、漂泊不定、富有魅力的犧牲者享年四十三歲。[[19]](#_19__Li_Ru__Dang_Shi_Dan_Ren_Wai)

和田為金玉均買了一口棺材，與“西京丸”號的船長商量將靈柩帶回日本。金玉均和其他人正是乘坐“西京丸”號前來上海。但是，就在船起航的前一晚，日本領事館的官員命令和田聽候指示。和田拒絕拖延時，領事館稟告了租界當局，租界當局扣押了靈柩，并移交給了清政府。[[20]](#_20__Ta_Dui_Gong_Qi_Tao_Tian_Shu)獲知謀殺消息的李鴻章派軍艦“威遠”號將靈柩和兇手送回朝鮮。清朝和日本政府似乎都急于擺脫這個棘手的理想主義者。

靈柩到達朝鮮后，朝鮮政府對金玉均的尸體進行了肢解。他的腦袋和手腳被砍下，高懸在寫有“謀叛大逆不道罪人玉均”的木樁上；軀干被拋放在附近的地面上。[[21]](#_21__Ju_Jiang_Zai_Yan_Suo_Shuo)此類殘暴行為并沒能消除朝鮮政府的心頭之恨：金玉均的家庭成員也被處決。[[22]](#_22__Ru_Xu_Le_Jie_Jin_Yu_Jun_De)洪鐘宇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

金玉均的被刺引發了日本民眾的憤懣。他們將仇恨之情的矛頭指向清朝，因為清朝在這一事件中扮演了幫兇的角色。外務次長林董（1850—1913）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確信幾個月后與清朝爆發的戰爭，是由刺殺金玉均和清朝卷入這一罪行所引發。[[23]](#_23__Zhe_Xie_Xu_Shu_Lai_Zi_Yu_He)

福澤諭吉對被謀殺者深表同情，對清朝將靈柩引渡回朝鮮感到氣憤，對朝鮮政府可恥的分尸行為感到震驚。他譴責清朝違反了《天津條約》，該條約規定由清朝和日本共同維護朝鮮的秩序。他認為清朝的弊病在于其“芯已腐敗為朽木”，而這是由滿族統治者頑固不化、拒絕進取所造成的。福澤預言，如果清朝繼續視朝鮮為藩屬國，那么戰爭不可避免；要是清朝再不思改進之道，他對清朝能否保持獨立也表示懷疑。[[24]](#_24__Ru_Xu_Le_Jie_1894Nian_4Yue)

然而，當時尚無直接原因與清朝開戰，而朝鮮宗教團體東學黨發動的起義為清日開戰提供了契機。1894年4、5月間，東學黨人在全羅道和忠清道揭竿起義。[[25]](#_25__Teng_Cun_Dao_Sheng____Ri_Qi)東學創始人崔濟愚（1824—1864）力勸追隨者驅逐西方影響、恢復朝鮮本土信仰，他將此稱為“東學思想”（即與“西學”相對）。盡管原則上他反對儒家思想，因為該思想也起源于外國，但實際上他的宗教集儒、佛、道為一體。他的主要敵人是基督教。[[26]](#_26__Lin_Dong_Xie_Dao___Hao_Wu_Y)朝鮮政府對東學運動嚴加禁止，與其說是因為它的教義，倒不如說是因為它獲得了農民的普遍歡迎。他們害怕農民被煽動起來造反。

最終，崔濟愚被捕，并被當做天主教徒斬首。東學黨的一些宗教活動表面上看起來與在朝鮮遭到鎮壓的羅馬天主教活動相似，因此捕盜廳反而讓這位反基督教的狂熱人士“殉道而死”。在失去了創始人后，東學黨被迫轉入地下活動，但仍然保持著對農民的控制。對農民來說，東學教派的吸引力并非神秘的咒語和妖術，而是其對“人人平等、現世利益”所做出的承諾。[[27]](#_27__Chu_Yuan_Xin_Xiong____Fu_Ze)

即使遭到取締，該教派的人數仍在增加，到1893年，朝鮮半島南部已在東學黨的控制之下。該年1月，東學黨的新領袖崔時亨召集東學信徒集會，提議請求政府免除崔濟愚的罪責、結束對東學黨的取締。3月，由東學信徒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漢城，請求政府宣布崔濟愚無罪。他們在王宮的大門前伏地上訴三天三夜，懇求國王為他們的教祖平反。[[28]](#_28__Qing_Can_Yue_Kibaik_Lee_A_N)這一請愿沒有得到恩準，但已經成功表明了他們的強大信念。從這時起，東學黨公開喊出趕走外國人的口號；最初矛頭直指歐洲人，但現在他們把日本人也包括在內。農民對歐洲人僅有模糊的概念，但都與寡廉鮮恥的日本商人打過交道。這些日本商人購買他們的稻谷，還按高利貸借錢給他們。

朝鮮政府畏懼東學黨信徒起事，反而讓他們變得更加大膽。他們在外國公使館和領事館的墻上張貼驅逐洋人的標語，對館內的外國外交官大聲咒罵，[[29]](#_29__Pian_Ye_Ci_Xiong____Li_Zhao)甚至連清朝的公使館也沒能躲過。清政府的代表袁世凱意識到這些運動很容易升級為更大的騷亂，于是緊急致函李鴻章，請求派遣兩艘軍艦。李鴻章立刻派“靖遠”、“來遠”二艦奔赴仁川。日本公使館的成員害怕遭到襲擊，佩戴武器，采取臨戰準備。

陸奧宗光對導致爆發清日戰爭的情形所進行的描述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他不僅是所述事件的機敏觀察者，而且作為外務大臣積極參與了決策制定。在戰爭記錄《蹇蹇錄》[[30]](#_30__Pian_Ye_Ci_Xiong____Li_Zhao)中，他以對東學黨起義的看法作為開頭：

或視之為混雜儒、道之宗教團體；或視之為政治改革希望者之團體；或視之為一群好斗不逞之徒。今在此研究其性質無必要，姑且從略。要之，以此為名之亂民，于明治二十七（1894）年四、五月之交，自朝鮮國全羅、忠清兩道各處蜂起，劫掠所在民舍，驅逐地方官，其先鋒本部進京畿道，全羅道首府全州府亦一時落入其手里，勢頭頗猖獗為事實。[[31]](#_31__Pian_Ye_Ci_Xiong____Li_Zhao)

日本對東學黨初期取得的成功反應不一。一些人支持向朝鮮派遣日軍，幫助無能的朝鮮政府鎮壓叛亂。其他人則認為東學黨是改革派，他們的目標是要從腐敗的政府手中解救出受苦受難的朝鮮民眾。最近幾年，一些學者對東學黨起義的宗教意義的評價大打折扣，認為盡管它披著宗教的外衣，但本質上來說是一場農民運動。[[32]](#_32__Fan_Yi_Le_Gai_Shu_De_Ge_Den)

起初，觀察人士認為東學黨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推翻現有政權，然而，當東學黨接近漢城時，朝鮮政府驚慌失措，并請求袁世凱幫忙鎮壓叛亂。6月2日，陸奧從日本駐朝公使館代理公使杉村浚那里獲悉了朝鮮的請求，于是立刻告知內閣，希望派遣“若干”日軍奔赴朝鮮半島，以便維持日本和清朝在朝勢力的均衡。內閣一致同意，總理大臣前往皇宮請求天皇恩準。天皇準奏，并在簡短的敕令中稱，“今次朝鮮國內內亂蜂起，其勢猖獗，故為保護同國寄留我國民，派遣軍隊”。[[33]](#_33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6月5日，恰巧在日休假的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1832—1911）收到指令，要求他盡全力保全日本國家榮譽，維護清日兩國在朝均勢。若非萬不得已，仍應以和平手段解決事局。陸奧寫道：“倘若清日之間發生沖突（中略），我國決定盡可能居于被動地位，事事讓清朝成為主動者。”[[34]](#_34__Li_Ru__Qing_Can_Yue_Da_Jian)

清朝政府通過駐日全權公使汪鳳藻照會日本政府，清朝按照朝鮮國王的請求，正向朝鮮派遣“若干”軍隊，以便鎮壓東學亂黨。據陸奧所說，汪鳳藻“見日本官民爭執，逐日激烈，妄斷日本到底無余力處置他國事情”。

日本議會沒完沒了、針鋒相對的辯論給清朝留下了日本國內疲憊不堪的印象。這是清朝國內極少見到的一種政治現象。伊藤博文也被對他自己以及內閣的不斷攻擊所激怒，在給天皇的報告中說，縱使憲法生效已經過去了五年，國家前途大計仍不免是“亡羊之嘆”。反對政府的各個政黨都試圖戰勝對方，即使有損于日本未來也不在意。伊藤的解決之道是請求天皇召見所有黨派的領導者，命令他們聽從天皇的旨意。[[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目前尚不清楚伊藤實際上是否提交了這一報告；總之，天皇沒有做出任何反應。

清朝知道日本各黨派在議會上提出的觀點存在著巨大分歧，但他們很難體會到日本人所懷有的強烈的愛國精神（被激怒的伊藤有時候也會忘記這種愛國精神），如果日本遭受另一個國家的威脅，這種精神將會掃除一切分歧。清朝自認為其陸軍和海軍強于日本，很多日本人也這樣認為。林董寫道，“日清戰爭前，日本人口頭笑侮清人之固陋，然實甚恐之。”[[36]](#_36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6月7日，陸奧向日本駐北京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1855—1911）發送電報，指示他將日本政府打算按照《天津條約》向朝鮮派兵一事告知清朝。清朝回復道，此次出兵完全按照朝鮮的請求，以便協助鎮壓叛亂，此舉是為了保護屬國。日本政府并沒有裝作沒看到“屬國”二字。陸奧在其答復中聲稱，“我政府未認朝鮮為清朝屬國”。[[37]](#_3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在隨后發生的戰爭期間，日本也從未停止堅持這一觀點。然而，事實上朝鮮請求的清朝——而非日本——來保護他們。

6月9日，大鳥在三百名日本海軍的陪護下抵達仁川，并繼續前往漢城。隨后，日本派來了一個大隊的陸軍。在此期間，東學黨的勢頭受挫，幾乎停止了進逼漢城。直接原因是清軍抵達。大鳥發現漢城異常平靜后，認為沒有必要再向朝鮮派遣大量日軍，但這沒能改變陸奧的看法，他認為“若危機一發之時，成敗之數全在兵力優劣”。[[38]](#_38__Lin_Dong____Hui_Gu_Lu_____D)6月11日，陸軍少將大島義昌率一支混合旅團離開宇品，前往仁川。6月15日，東學黨起義似乎已經結束，但是清日兩國的軍隊均無撤離朝鮮半島的跡象。[[39]](#_39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在這個節骨眼兒上，伊藤提議清日兩國聯手鎮壓叛亂，在亂匪平定后，派出特派員幫助改革朝鮮內政，尤其是改善財政和軍備。如果清朝不同意日本的提案，日本將獨自挑起這一重擔。伊藤將該提案上奏天皇，但天皇似乎對“必要時日本將單方面采取行動”這一條規定感到不安。（這條規定是陸奧后來增添到伊藤的初始提案中的。）天皇派侍從長前去質詢這一條。陸奧來到皇宮，進行了詳細解釋，最后天皇準奏。[[40]](#_40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正如陸奧預料到的，清朝不愿意接受該提案。6月21日，清朝公使報告說，政府已經拒絕了日本的提案，原因有三：

第一，朝鮮內亂現已平定。目前清朝軍隊已無須代朝鮮政府討伐亂黨，清日兩國合力鎮壓叛亂一事，可作罷論；第二，日本政府為朝鮮謀善后之策，用意雖善，但朝鮮內政應由朝鮮自行改革……最后，《天津條約》已有明文規定，叛亂一經平定，清日兩國即刻退兵。故此番毋庸贅言，清日雙方理當相互撤兵，實無必要再議。[[41]](#_4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雖然清政府的辯詞無可反駁，但陸奧說：“依我政府所見，如不祛除朝鮮內亂根底之禍因，則無法安穩。”他告知清朝政府說，日本政府不可能下令從朝鮮撤離軍隊。對于處于如此悲慘境地的朝鮮，日本無法袖手旁觀，這有違鄰國之間的友好情誼。6月23日，山縣有朋發覺清日之間的戰爭已無法避免 。

6月26日，大鳥圭介謁見了國王高宗，力主朝鮮進行內政改革的必要性。28日，他詰問朝鮮當局，朝鮮是獨立國家，還是清朝的藩屬國。這個問題讓朝鮮朝廷陷入了恐慌，而且討論來討論去也沒能得出任何結果。正在此時，大鳥接到日本政府的訓令，上面說除非摧毀清朝的影響力，否則無法在朝鮮實施改革。毫無疑問，這促使大鳥強硬地要求朝鮮給出答復。6月30日，朝鮮朝廷最終聲明為獨立國家。[[42]](#_4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7月3日，在得到朝鮮是獨立國家的確定回答后，大鳥謁見了朝鮮國王，提議對朝鮮的行政、財政、司法、軍制和教育進行改革。朝鮮政府仍然由保守的事大黨控制，他們畏懼清朝并且憎惡改革；然而，大鳥的提議有日本的軍事力量作為后盾，朝鮮無法拒絕。國王發布了罪己詔，將朝鮮的危機歸咎于自己，對多年來的糟糕統治感到愧疚，并對接連不斷的內亂深感悲憤。他將所有的錯誤歸因于自身不德和官吏瀆職。國王成立了一個改革委員會，并命令該委員會遇事與日本公使商議。[[43]](#_43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元老們相繼站出來支持開戰。伯爵松方正義獲悉，在前一天的會議上，內閣沒能就與清朝開戰做出決定。隨后，他于7月12日拜訪了伊藤博文，對政府遲疑不決表示擔憂。他宣稱清朝的傲慢自大與日俱增，并譴責清朝在朝鮮犯下的各種蠻橫行為。松方痛惜日本政府沒能利用這個天賜良機來履行使命。伊藤認為宣戰的理由仍不充分，但松方稱日本民眾（即使是政府的敵人）都團結一致支持開戰。他預言，如果在接下來的幾天沒能采取行動，將無法控制民眾的騷亂，也無法保證一些外國列強不會插手干預。撤離日本在朝鮮的軍隊是有損日本國威的一件事，并且會再次導致國內人心離散。最后，松方威脅說，如果伊藤無視他的建議，他將再也不與伊藤會見。

伊藤同意考慮松方的意見，但是，和不在政府為官的松方不一樣，伊藤無法忘記自己作為總理大臣的職責。此外，他與天皇關系密切，知道天皇非常不想開戰，擔心清日戰爭可能會給第三國創造了插手干涉的機會。[[44]](#_4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李鴻章請求俄國調停，俄國欣然答應。俄國對朝鮮的興趣（尤其是在朝鮮獲得一個不凍港）成為未來幾年俄國在朝勢力發展的重要原因。日本感謝俄國參與調停，聲稱只要形勢允許，日本將即刻從朝鮮半島撤兵。[[45]](#_4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英國也表達了維持東亞和平的愿望。1894年4月，英國政府批準了新修改的條約。盡管英國拒絕放棄治外法權成為日本長久以來的心頭之痛，但英國即將成為第一個給予日本平等地位的大國。[[46]](#_4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成立了新內閣的英國首相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宣稱，他不僅認為繼續在日本保留領事裁判權不合適，還認為對于加強兩國之間的友好關系而言，廢除這些已是當務之急。但是，當7月17日英國參與調停時，已經決心開戰并且對英國的提議沒有興趣的日本，故意提出了他們明明知道清朝不會接受的條件。日本宣稱，但凡清朝在朝鮮增派軍隊，都將被視為挑釁。英國政府提出抗議，聲稱這一規定違反了《天津條約》；然而，日本回答道，這并非英國可以提出質疑的事情。于是，英國放棄了對調停所做出的努力。[[47]](#_4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7月23日，日本混合旅團于黎明時分進入漢城。當他們靠近王宮時，朝鮮士兵突然開火。日軍予以反擊，之后進入宮殿區，趕走了朝鮮軍隊，并取而代之地守衛王宮。國王急召父親興宣大院君出面主政。盡管興宣大院君一直都有強烈的反日情緒，但被監禁在清朝的經歷改變了他的看法，現在，他歡迎大鳥進入王宮。他告訴大鳥，朝鮮國王已經讓他全權改革政府，承諾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將征詢大鳥的意見。7月25日，興宣大院君宣布廢除朝鮮與清朝簽訂的條約。[[48]](#_48__Ru_Xu_Le_Jie_You_Guan_Jie_S)

7月25日，日本艦隊遭遇了兩艘駛向牙山的清朝軍艦（一艘巡洋艦，一艘炮艦），第一次戰爭不宣而戰。清朝軍艦不僅未向日本國旗敬禮，并且全體船員均已進入戰位。當兩支艦隊距離大約三千米時，“濟遠”號巡洋艦開火，三艘日本軍艦予以反擊。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濟遠”號遭到重創，敗退而走；另一艘炮艦靠岸擱淺并被遺棄。此時，另外兩艘船艦逼近，一艘是軍艦“操江”號，另一艘是搭載一千名清軍奔赴牙山的英國商船“高升”號。在隨后的戰事中，“操江”號掛白旗投降。“浪速”號艦長東鄉平八郎命令“高升”號起錨，跟在“浪速”號的后面。“高升”號抗命不遵，東鄉便擊沉了這艘商船。“高升”號的船長和另外兩名英國官員獲救，但清朝船員和一千名士兵墜海溺亡。剛開始，商船被擊沉惹惱了英國人，但英國國際法專家為日本辯護，稱日本在戰時采取的行動是妥當的，于是這一事件被擱置不議，因為這樣做對英國政府是有利的。[[49]](#_4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7月29日，陸軍少將大島率領的混合旅團在成歡附近遭遇清軍，第一次陸戰爆發。日本依舊將戰事描述為清軍先開火，日軍只不過是反擊而已。不管怎么說，日本擊敗清軍，并占領了清軍位于牙山的營地。

8月1日，日本對清朝宣戰。天皇向軍隊頒布敕令，鞭策他們“于陸上海面對清國交戰，努力達國家之目的”。天皇鼓勵軍隊“盡一切手段”贏取勝利，但前提是在“國際法所限”范圍內。[[50]](#_5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

毫無疑問，日本民眾對戰爭表現出了極大的熱忱。自16世紀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后，這是日本軍隊第一次在國外與外國人開戰。這場戰爭似乎確立了日本在世界各國中的新地位。相比之下，清朝就像是日本所摒棄了的種種陋習的化身。在日本人看來，清朝是一個“無知蒙昧”的老大之邦，得意于過去的輝煌，而非今日的成就。

啟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福澤諭吉發表了一篇文章，宣稱勢必要與清朝開戰，以便喚醒清朝開展獲益匪淺但被冥頑不化的滿族統治者排斥的啟蒙運動。他將清朝干預朝鮮視為極力阻止啟蒙思想傳播的無法容忍的暴行，這場戰爭與其說是兩國之間的一場爭斗，不如說是“為世界文明”而戰。[[51]](#_5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

1894年8月，后來作為反戰主義者而知名的內村鑒三用英文發表了一篇題為《朝鮮戰爭之義》（Justification of the Korean War）的文章。他確信“日本和清朝之間發動的清日戰爭”是一場正義的戰爭。[[52]](#_5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他寫道：

日清戰爭決定了是應當將“進步”之道作為東洋的法則，正如西洋長久以來所遵循的那樣，還是讓“退步”之風永久橫亙于東洋。“退步”曾是波斯帝國的庇護所、迦太基[[53]](#_53____Fu_Ze_Yu_Ji_Quan_Ji____Di)的立國方針、西班牙的鼓勵之策，最后，又被清帝國選擇（吾等希望這是世界歷史上的最后一例）。日本的勝利，對于東洋六億人口而言，意味著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教育自由和通商自由。[[54]](#_54____Nei_Cun_Jian_San_Quan_Ji)

文末，內村宣稱，“日本是東洋‘進步’的擁護者，除了被打敗的敵人清朝（這個無可救藥地仇視進步的政權）外，還有誰不希望日本獲勝？”

日本軍隊在朝鮮取得的最初勝利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愛國熱情，這些勝利被畫成浮世繪，并像報紙一樣傳播至全日本。成歡之戰產生了兩位英雄，他們的事跡被各類藝術家描繪紀念，并有日本和外國的詩人作詩贊頌。第一位英雄是艦長松崎直臣。在腿部中彈后，他繼續戰斗，直到另一顆子彈打中他的頭部。“被打中了”是他的最后一句話。另一個平民白神源次郎[[55]](#_55____Nei_Cun_Jian_San_Quan_Ji)的名聲很快蓋過了松崎。白神參加了1894年7月29日的戰斗。據報道說，盡管白神身中子彈，但他繼續吹號，直到用盡最后一口氣。尸首被發現時，他的嘴唇還貼在軍號上。不久后，受這個英雄號手事跡的啟發，日本民眾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和浮世繪。例如，外山正一[[56]](#_56__Shi_Hou_Fa_Xian_Shen_Fen_No)創作了一首名為“吾乃吹號郎”的長詩，詩歌的開頭如下：

聽聞岡山有賢人，

喚做白神源次郎。

槍林彈雨均不懼，

叉腰仰頭軍號響。

人人贊佩縱紛紜，

彼乃英勇吹號郎。

白神擺手自謙曰，

吾乃一介吹號郎。[[57]](#_57__Wai_Shan_Zheng_Yi__Ri_Ben_J)

這幾句詩沒有提到白神并非武士階層，而僅僅是一個吹軍號的應召士兵。實際上，清日戰爭中的大多數英雄均為出身卑微的人士。這些士兵所表現出來的迄今為止只有武士階層才具有的英勇行為，證實了全體日本民眾都具備勇敢和忠誠的德行。

8月11日，天皇向皇祖皇宗正式供奉了宣戰詔敕。儀式在宮中皇靈殿舉行，天皇還派遣高層貴族向伊勢神宮和孝明天皇陵匯報消息。幾天前，就在天皇發布宣戰詔敕后沒多久，宮內大臣土方久元覲見天皇，詢問天皇打算派哪一位敕使前往伊勢神宮和孝明天皇的陵墓。天皇回答說：“未及其儀。今回戰爭素非朕之本意，閣臣等奏戰爭不得已，故僅許之。以之奉告神宮及先帝陵，朕甚苦。”土方聞言大吃一驚，他勸慰天皇道：“曩既裁可宣戰詔敕，然于今言此，或為過也。”天皇勃然大怒道：“無需再謂。朕不欲復見汝。”土方帶著恐懼和惶惑的心情退下。[[58]](#_58____Zhu_Shan_Cun_Gao____Hou_B)

回到官邸后，土方細細思考了當前形勢。天皇已經向海內外發布了宣戰詔敕，并且陸軍和海軍正趕往前線。天皇向來言而有信，這是毋庸置疑的，但一想到天皇的話可能對今后戰事的發展造成影響，他就憂愁難耐。土方想咨詢伊藤，但又擔心這只會使事情變得更加復雜。那晚他擔心苦惱，無法入睡。然而，第二天一大早，侍從長前來捎話，說天皇命令土方抓緊時間選定敕使，以便派往伊勢和京都的神宮。土方速速趕到皇宮，看見天皇心情舒暢，與昨晚大不一樣，于是他匯報了兩名敕使的姓名，之后感泣退出。

顯而易見，在細想了整個事件后，天皇知道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已經不可能取消戰爭。但是，是什么讓天皇如此不愿意批準宣戰？也許正如他之前所說的，他擔心戰爭可能會讓某些國家插手干預，從而對日本不利；也可能是想到眾多日本士兵將戰死沙場，因此不想開戰；又或者是他擔心日本不是清朝的對手。因為外國媒體一致預言，一旦日本喪失了遵守紀律和做好戰事準備這一最初優勢，大清朝將取得勝利；[[59]](#_5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又或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天皇接受了儒家經典教育，因而不想與產生了圣人的國度開戰。

為什么明治不愿向神靈或先皇的陵墓匯報宣戰詔敕，我們可能永遠都無法知道；但是，第二天早上，明治改變了主意，并且從那時起一直到戰爭結束，他對日本在亞洲大陸和海上之戰所投入的熱情再也沒有動搖過。

1. [[1]](#_1_44) 位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與羅馬隔海相望。在三次布匿戰爭中均被羅馬打敗。 ——譯注

1. [[2]](#_2_44) Mutsu Munemitsu（陸奧宗光）, "aid-E3B"（蹇々録）,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5.

1. [[3]](#_3_44) 拙著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66.

1. [[4]](#_4_44) 皇太子（未來的大正天皇）是一名杰出的書法家，他創作的漢詩也非常精妙嫻熟。據說他還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和德語（請參閱Meech-Pekarik,The World of the Meiji Print , p. 128），但這似乎有些不可思議。

1. [[5]](#_5_4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84頁、第586頁、第595頁。

1. [[6]](#_6_44) 在1887年8月8日出版的楊洲周延所繪浮世繪《扶桑高貴鑑》中，皇太子站在天皇和皇后的中間，天皇坐在右邊，皇后坐在左邊。他的臉朝向皇后，但他正向天皇比劃著。皇太子身后桌上放著三本書，也許此舉意在表明他是一位勤奮的學生（彩色復印件見Meech-Pekarik,The World of the Meiji Print , plate 23）。稍后（1887年8月23日），周延所繪《女官洋服裁縫之図》中，描繪了皇太子、皇后和一位小女孩在一個房間中，一名宮女在操作一臺縫紉機，另一名在用剪子剪斷布匹（見plate 24）。

1. [[7]](#_7_44) 金章是為皇族鑄造的（《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82—383頁）。

1. [[8]](#_8_44) 合稱“宮中三殿”，位于吹上御苑東南，是舉辦一些傳統儀式的場所。——編注

1. [[9]](#_9_44) 鳳凰之間，皇宮內舉行儀式宴會等的場所。——編注

1. [[10]](#_10_44) 不過，南齋年忠的《大日本帝國銀婚御式》是描繪該慶典和刻畫各個日本和外國政要向天皇道賀的最負盛名的浮世繪，這證實了“銀婚”一詞至少被用于非正式的場合。該浮世繪描繪的場景源自于想象，因為它在舉行實際慶典之前就已經出版。如需了解復印本，請參閱小西四郎，《錦繪 幕末明治の歷史 〈11〉 日清戦爭》，第16—17頁。同一時期出版的其他浮世繪還有豐原國輝和春齋年昌創作的名稱中含有“銀婚式”的作品（第18—19頁）。

1. [[11]](#_11_4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84—390頁。如需了解宮中晚餐的菜單，請參閱秋思會編，《天皇家の饗宴》，第41頁。

1. [[12]](#_12_44) 如需了解關于福澤同金玉均和其他朝鮮知識分子的關系的探討，請參閱姜在彥，《朝鮮の攘夷と開化》，第193—203頁；杵淵信雄，《福沢諭吉と朝鮮——時事新報社説を中心に》。后者全面探討了福澤對朝鮮的看法。

1. [[13]](#_13_44) 1884年抵達日本后不久，金玉均化名為巖田周作，但當他于1894年前往中國時，改名為巖田三和。“三和”意指其提出的東亞三國共同抵御外國侵略的計劃（姜在彥，《朝鮮の攘夷と開化》，第174頁、第184頁）。

1. [[14]](#_14_44) 1894年5月17日，自由黨的35名成員就刺殺金玉均和暗殺樸泳孝未遂一事向政府提出質問。他們聲稱，朝鮮刺客已經帶著這一使命三入日本，每次都宣稱是遵照朝鮮國王的命令行事（《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12頁）。

1. [[15]](#_15_43) 姜在彥，《朝鮮の攘夷と開化》，第185頁；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624—625頁。

1. [[16]](#_16_43) 姜在彥，《朝鮮の攘夷と開化》，第183頁。

1. [[17]](#_17_43) 姜在彥，《朝鮮の攘夷と開化》，第185頁；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107頁。

1. [[18]](#_18_42)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186頁。

1. [[19]](#_19_42) 例如，當時擔任外務次官的林董在其回憶錄中寫道，他曾建議金玉均放棄上海之行的計劃，“對你來說，上海不也是敵地嗎？”金玉均回答說，上海是一個中立的地方（大概是指上海的公共租界），因此沒有危險，但他答應，在福澤諭吉從九州返回后，他將就上海之行的可取性征求福澤的意見（林董，《回顧録》，第73頁，亦見林董著、由井正臣校注，《後は昔の紀 他》，第253頁。）。

1. [[20]](#_20_41) 他對宮崎滔天說了這番話（姜在彥，《朝鮮の攘夷と開化》，第174—175頁）。

1. [[21]](#_21_41) 據姜在彥所說，這張匯票是假的（《朝鮮の攘夷と開化》，第176頁）。洪鐘宇是第一個在法國學習的朝鮮人。在1893年離開巴黎后，他沒有回到漢城，而是前往東京。他與在日本的朝鮮人聯系，希望他們能幫他在朝鮮政府謀一份差事。很顯然，李逸植承諾，如果洪鐘宇能刺殺金玉均，他將幫助洪鐘宇（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188頁）。林董（與洪鐘宇有私交）認為洪鐘宇之所以刺殺金玉均，是為了贏得朝鮮閔妃的好感（林董，《回顧録》，第73頁）。

1. [[22]](#_22_40) 如需了解金玉均的人格和成就，請參閱姜在彥，《朝鮮の攘夷と開化》，第187—193頁；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96頁的扼要介紹。

1. [[23]](#_23_40) 這些敘述來自于和田的回憶，詳述于姜在彥，《朝鮮の攘夷と開化》，第179—180頁。當時在國際租界最有實力的是英國總領事。他將金玉均的尸體移交給清政府，但沒有按照正確的程序，因而埋下了讓英國遭受縱容罪犯這一指控的伏筆（杵淵信雄，《福沢諭吉と朝鮮——時事新報社説を中心に》，第160頁）。眾議院于5月18日給出了不同表述：立憲改進黨質問政府，在將靈柩抬上船和完成所有程序后，為什么靈柩會被清朝奪去并被抬上清朝的船。他認為清朝此舉是對日本的一大侮辱。5月31日，日本政府回答說，對于發生了什么政府心中有數。據說和田接到靈柩，但是他沒有將靈柩抬上船，而是留置在路上，然后離去。國際租界當局的警察局局長按照法規將靈柩搬至警察局。和田在沒有對接收靈柩做出任何安排的情況下返回日本。清政府確實對靈柩進行了處置，但并不像所宣稱的那樣“奪取”靈柩，日本政府沒有理由干預。無論這一官方表述是否準確，這表明日本政府非常不愿意牽涉其中（《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13頁）。

1. [[24]](#_24_38) 如需了解1894年4月24日《時事新報》對這一可怕情景的描繪，請參閱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118頁。杵淵的描述摘錄自日本媒體對這一罪惡活動的報道。如需查看關于懸掛的首級和銘文的模糊照片，請參閱藤村道生，《日清戦爭》，第48頁。

1. [[25]](#_25_38) 藤村道生，《日清戦爭》，第49頁。

1. [[26]](#_26_38) 林董寫道，“毫無疑問，向牙山派軍是日清戰爭的導火索，然而，吾認為，事實上，刺殺金玉均和清朝此時的行為才是引爆戰爭的原因”（《回顧録》，第74頁）。據藤村所說，林董“證實”外務大臣陸奧決定就金玉均被刺和清朝的行為與清朝開戰（《日清戦爭》，第49頁）。

1. [[27]](#_27_37) 杵淵信雄，《福沢諭吉と朝鮮——時事新報社説を中心に》，第156—160頁。

1. [[28]](#_28_34) 請參閱Kibaik Lee,A New History of Korea , trans. Edward W. Wagner, pp. 258-259；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28頁。

1. [[29]](#_29_34)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103頁。

1. [[30]](#_30_32)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104頁。

1. [[31]](#_31_30)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104頁。

1. [[32]](#_32_29) 翻譯了該書的戈登·馬克·伯格（Gordon Mark Berger）偏向于保留該書名的羅馬拼音，但他將該書名直譯成“忠君報國、無私奉獻之秘錄”（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57）。

1. [[33]](#_33_28)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5.

1. [[34]](#_34_28) 例如，請參閱大江志乃夫,《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爭》,第282頁。他拿東學黨起義（他認為這一術語掩蓋了農民戰爭的本質，因而放棄這一術語，統一稱為“甲午農民戰爭”）與英國的瓦特·泰勒起義、發生在波希米亞的揚·胡斯（Jan Hus）派農民起義、德國農民起義和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進行比較。

1. [[35]](#_35_2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28頁。

1. [[36]](#_36_24)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8.

1. [[37]](#_37_2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27頁。

1. [[38]](#_38_17) 林董，《回顧録》，第69頁。

1. [[39]](#_39_16)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5. 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33—434頁。

1. [[40]](#_40_15)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0.

1. [[41]](#_41_1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37頁。

1. [[42]](#_42_1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37頁。

1. [[43]](#_43_12)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4. 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41—442頁。

1. [[44]](#_44_1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46頁。

1. [[45]](#_45_1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52頁。

1. [[46]](#_46_1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56頁。

1. [[47]](#_47_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49頁。

1. [[48]](#_48_9) 如需了解有關結束治外法權的最終談判的敘述和陸奧宗光草擬的條約草案，請參閱Louis G. Perez,Japan Comes of Age。

1. [[49]](#_49_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64頁。

1. [[50]](#_50_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66頁。

1. [[51]](#_51_6)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67頁。如需了解霍蘭德（T. E. Holland）博士的觀點（霍蘭德是英國國際法方面的權威人物，其認為日本行為恰當，故“無須向我國政府道歉”），請參閱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p. 89-90。

1. [[52]](#_52_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73頁。

1. [[53]](#_53_3) 《福沢諭吉全集》第十四卷，第500頁。另請參閱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63。

1. [[54]](#_54_3) 《內村鑑三全集》第十六卷，第27頁。

1. [[55]](#_55_3) 《內村鑑三全集》第十六卷，第35頁。另請參閱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63-264。

1. [[56]](#_56_3) 事后發現身份弄錯了，號手不是白神，而是木口小平。木口的名字很快取代了白神，并成為一個傳奇人物；他成為了忠誠美德的象征。“木口小平死的時候，嘴唇還壓在軍號上”被選入小學教科書，作為忠誠美德的典型例子（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78-279）。

1. [[57]](#_57_1) 外山正一：日本教育家、啟蒙家、詩人。在日本西南戰爭期間，為政府軍的軍歌《拔刀隊》寫了歌詞。——譯注

1. [[58]](#_58_1) 《丶山存稿》后編，第309頁。另請參閱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p. 278。

1. [[59]](#_59_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81頁。

# 第四十五章 旅順屠殺



日本與清朝的戰事進展得如此迅速，不久后，政府便對戰爭勝利后應對朝鮮采取什么樣的政策進行了討論。1894年8月17日，陸奧宗光在內閣會議上提交了四個方案：

一、宣布朝鮮獨立，并有必要對朝鮮內政進行改革，對于朝鮮未來的命運，日本政府應完全任其自主；

二、在名義上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但由日本政府直接和間接地永久或長期扶植朝鮮獨立，并竭力代為擔任防御外侮之責；

三、若日本政府認為朝鮮自己無力維持獨立，并且日本單獨負擔保護朝鮮之責是不明智之舉，則由日本和清朝共同維護朝鮮領土的完整；

四、若第三個方案不可取，則由各強國擔保，使朝鮮成為類似歐洲比利時和瑞士一樣的中立國。

內閣認為采用固定政策仍然為時過早，但就眼下而言，應將第二個方案作為總體策略。[[1]](#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為踐行友好扶植朝鮮這一政策，8月20日，天皇命令樞密院顧問官西園寺公望前往朝鮮，向國王高宗贈送禮物和書函。書函中說，明治高度關注朝鮮近期發生的事件，他相信朝鮮國王的英明決斷一定能穩固國基，實現朝鮮的繁榮昌盛。天皇贈送了禮物——一把太刀和一對花瓶，以示友誼永固。朝鮮國王以同樣的方式回贈了明治，對明治加強日朝之間的情誼表示欣喜，并感謝明治派遣日軍來維護朝鮮獨立。[[2]](#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日本擔憂在朝鮮所采取的行動會給外國產生的印象。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向全權公使大鳥圭介以及日本駐朝陸軍和海軍指揮官傳了同樣的話，提醒他們必須避免采取侵犯朝鮮獨立的行動，即使這將造成軍事上的不便或不必要的浪費。有時候可能別無選擇，需向朝鮮政府提出要求，但這些要求不得超過朝鮮作為獨立國家、在不丟顏面的情況下能夠接受的范圍。此外，他提醒道，朝鮮不是敵人，而是日本的盟友，凡購買軍事或其他物資者，必須支付足以令賣主滿意的價格。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給人留下日本劫掠朝鮮的印象。

8月26日，日本和朝鮮簽署了同盟條約，約定兩國協同合作，以便將清軍驅逐出朝鮮的領土，鞏固朝鮮獨立，推進日本和朝鮮的利益。

前文已述，天皇剛開始不希望日本與清朝開戰，但很快他便全身心投入到軍隊最高指揮官這一角色當中。由于政治和軍事大權都集于一身，所以經常需要他做出定奪。在清日戰爭期間，日本召開了大約九十次御前會議，不僅軍官將領要出席，在天皇的要求下，伊藤博文也參加了會議。[[3]](#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作為一名文官，伊藤所關注的是取得戰爭勝利，以及如果這是一場持久戰，其他國家干預戰爭的可能性。[[4]](#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幸運的是，與英國的修約談判最終取得了成功，遭人痛恨的治外法權的廢止已經近在眼前。[[5]](#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9月1日，天皇接見了總參謀長熾仁親王，熾仁親王請求將大本營遷往廣島，以便加強與在朝作戰的軍隊的聯絡。遷移大本營的提議最初由伊藤提出，他認為（位于其故鄉長州藩的）下關是一個適宜之地，因為下關是最靠近朝鮮的港口。但軍隊支持遷往第五師團司令部所在地廣島。廣島是東京到宇品港（廣島港）鐵路西段的終點站，是赴朝軍隊的登船地點。把大本營遷往廣島將加強與前線的聯絡，但也給大多仍留在東京的外國外交官的協商造成了阻礙。[[6]](#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9月8日，天皇下令將大本營遷往廣島。作為統帥的自己也將隨同移步廣島，一同前去的還有侍從、御醫、書記官等。總理大臣伊藤博文也奉命一同前往廣島。[[7]](#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9月13日，天皇乘火車離開東京。很多政要在新橋站送行。在通往車站的道路上，士兵、學生和平民排列在街道兩旁，當天皇的鑾駕經過時，他們高呼“萬歲”。當天皇所坐的車廂經過各個村莊時，鐵軌兩旁的所有民眾都恭恭敬敬地向天皇致意。天皇在名古屋過夜，第二天一早前往神戶。神戶采取了極為嚴格的陸路和海上安保措施，因為那里居住著很多中國人，但是天皇無視可能出現的危險。當晚，他一邊欣賞著秋月，一邊與隨行人員閑聊說笑到深夜。天皇不受微不足懼的小事的影響，給服侍他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8]](#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9月15日夜晚，天皇抵達廣島，隨后立刻前往設在一棟簡單的兩層木結構建筑內的大本營。[[9]](#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明治的住所——辦公室、浴室、衛生間和更衣室——位于第二層。該層剩下的部分以及一層的全部空間，都被用作參謀部工作人員的住所和軍事會議室。在天皇的辦公室，唯一不同尋常的地方是在其座位和兩張桌子背后立著一塊金屏風。兩張桌子有一張上面擺放著神圣的劍和玉，另一張上面放置著御璽。他就在這間屋子辦公、用膳和就寢。早上，他洗漱時，侍從將他的床移開，換成桌椅。除了從東京帶來的桌子、椅子和一些物件外，房間里沒有其他家具，墻上的唯一裝飾品是一只便宜的鐘。[[10]](#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后來，房間里才有了一些裝飾品，包括吳市駐軍的候補士官和水手制作的人造花以及從前線繳獲的戰利品。

天皇并不想把他的住所弄得更舒適。侍從建議天皇使用安樂椅或者（在天冷時）使用爐子，但天皇都拒絕了。他反問道，前線也可以找到這些東西嗎？當其他人提議擴建大本營以讓天皇擁有更多空間時，他再次拒絕，不想為了讓自己感覺舒適而進行擴建。他說：“思及出征將卒之勞苦，此地有何不便？”[[11]](#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就在天皇將大本營遷往廣島的同一天，進入朝鮮北部的日軍攻擊了駐扎在平壤的清軍。參與戰事的清軍和日軍在人數上旗鼓相當，均為近一萬兩千人，但是，想要贏得包圍戰的勝利，進攻士兵必須是防守士兵的三倍多，這是一條人盡皆知的準則。此外，清軍的裝備比日軍的更加先進。[[12]](#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除了這些人員裝備上的不利，日本部隊在開赴平壤的漫長征途中，已經筋疲力盡。盡管如此，日軍還是發起了全面進攻。

清軍頑強抵抗。盡管日軍已經占領了一些陣地，但主要的防御工事太強大，難以攻克。在激戰的千鈞一發之際，一名日本士兵翻越城墻，打開了北邊的玄武門，隨即日軍蜂擁進入平壤。城內的大多數清軍（包括駐平壤總司令葉志超）看到戰事對他們不利，于是棄城逃往中朝邊界的鴨綠江方向。一名清朝軍官因其有些任俠式的勇敢而被人們銘記：左寶貴認為投降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他穿上清朝皇帝御賜的衣冠，帶領士兵燃炮轟擊，最終被日軍的炮彈擊中，戰死疆場。[[13]](#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日軍有一百八十人死亡，超過五百人受傷，而清軍死亡超過兩千人，被俘六百人。平壤是清朝在朝鮮的最后一個基地，之后戰火便燒到了清朝境內。

平壤戰役涌現出了一位英雄，他就是打開了玄武門的一等兵原田重吉。因這一功勞（使得日本才有可能在戰爭中獲勝）他當場被晉升為上等兵——這是對其非凡勇氣的適當認可。他還被授予了金鴟勛章。另外，他的勇敢行為被作為長久稱道的標志，繪成眾多浮世繪作品：為從城內打開城門而翻越城墻；在城內與清軍戰斗；站在城墻頂部對著燃燒的城市陷入沉思，一旁是剛被殺死的清兵。[[14]](#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日本民眾也在一些歌曲中對原田進行了歌頌，包括以下文開頭的一首歌曲：

潛行如雨的彈丸下

如猿猴般攀登上城墻，

如此矯健的那個人

正是原田氏的重吉[[15]](#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原田的事跡被改編成一部叫做《海陸連勝日章旗》的戲劇，由尾上菊五郎扮演主角原田（在劇中喚做“澤田重七”），在歌舞伎戲院上演。然而，對于原田來說，英雄的稱謂顯然讓他有些吃不消。戰后，他賣掉了金鴟勛章，把獲得的錢款拿去舉杯痛飲。他也曾一度出現在舞臺上，再度表演自己的英雄事跡。原田之所以放縱，一個原因可能是人們發現他并非第一個翻越城墻的人。一批敢死隊已經翻越了城墻，其中一位叫做松村秋太郎的隊員一開始被認為已死亡，但后來死里逃生回到了日本。日本當局擔心事情被公開后，松村的事跡會抹殺原田的榮耀，于是禁止將此事公之于眾。[[16]](#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在得知占領平壤后，天皇送去了祝賀的敕諭，稱贊士兵忠誠英勇。該敕諭電傳至第五師師長野津道貫，野津在回電中說，“將校下士皆感泣，誓將更奮進，以一死酬奉圣恩”。[[17]](#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在陸戰勝利后，緊接著，日本在海戰中也取得了重大勝利。9月17日，就在平壤失陷后的第二天，日本聯合艦隊與清朝北洋水師在黃海海域展開激戰。這是兩國蒸汽動力船之間進行的第一次海戰。日本艦隊由十一艘軍艦組成，由坐鎮旗艦“松島”號上的海軍中將伊東祐亨（1843—1914）擔任指揮。清朝艦隊由十二艘軍艦組成，這些軍艦噸位略小，射速略慢于日本軍艦，但有兩艘軍艦（“定遠”和“鎮遠”）是鐵甲艦，據說是東洋最強大的軍艦。[[18]](#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清軍的指揮官中除了一名德國少校外，還有數名英美軍官。

在交火的當天早晨，日本艦隊在海平面上發現了煙柱，很快，他們發現了更多類似煙柱，這表明他們遇到了清朝軍艦。當天下午1點左右，“定遠”號在距離大約三千米的地方開火。日本艦隊回之以猛烈的炮火。日本船艦遭受重創，“松島”號也被擊中，但清朝軍艦也沒有能夠逃脫受傷的厄運，有三艘被擊沉。雖然兩艘鐵甲艦設法撤退到了旅順口，但是，朝鮮周邊的海域以及華北周邊海域的制海權都落到了日軍的手里。[[19]](#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這場海戰也產生了一名英雄，他是“松島”號的水手，被清軍發射的炮彈擊中而身受重傷。在垂死之際，他問安慰他的軍官：“定遠號還沒有沉嗎？” 佐佐木信綱用這些話作了一首詩，并配以音樂，于是成為戰時涌現的眾多歌曲中最令人難忘的一首。歌曲的結尾如下：

定遠尚未沉沒乎？

此語話短意深長。

為國效勞忠誠士，

長久銘記在心田。

定遠尚未沉沒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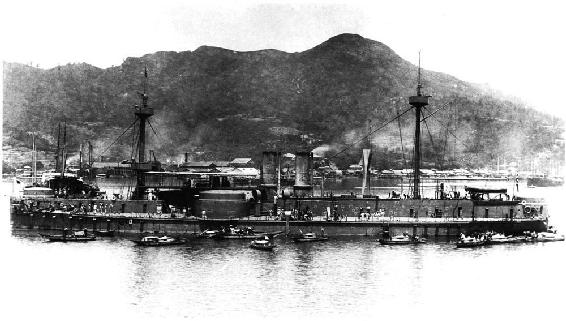
拳拳之心肺腑言。

愛國如家忠貞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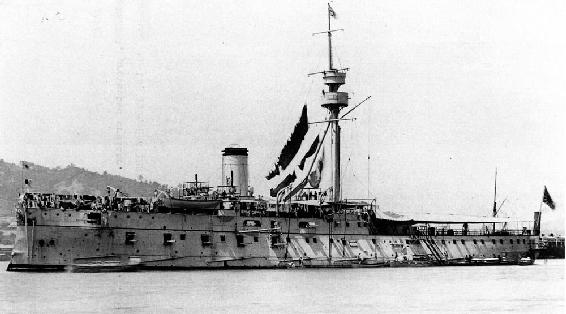
印在赤血熱胸膛。[[20]](#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和號手及翻墻士一樣，這名水手也是日本軍隊中的地位卑微人士。稱頌他們永垂不朽，使得戰勝清朝看起來好像是全體日本民眾贏得的勝利，而不是（同日本更早前的戰爭一樣）武士之刀取得的勝利。

盡管天皇是統帥，但他并不干預戰事指揮。他之所以移步廣島，是為了表明他與戰士同心同德以便安撫戰士，是為了激勵戰士表現出英勇行為和愛國精神。[[21]](#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這就是為什么他堅持忍受各種不適、不允許自己在前線戰士面前有任何奢侈行為。他拒絕讓皇后或宮女來服侍他，因為前線的戰士也沒有女人伺候。他的身邊只有不善家政的侍從。[[22]](#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清朝艦隊主力艦“鎮遠”號



日本艦隊主力艦“松島”號

在沒有從前線傳回急件時，天皇偶爾進行蹴鞠和射箭，以此作為消遣。為緩解煩悶，軍士們向天皇表演劍術、展示廣島各地的美術品。有時候，天皇讓參謀本部軍士中技藝出眾者按照他指定的主題作畫，偶爾他也自己畫畫。侍從日野西資博回憶道：“陛下的畫并不是很出色，但是，倘若陛下能贈我一張，我將視為家中珍寶。然而，陛下在畫成后立即撕毀，我沒有得到任何一張。真是可惜。”[[23]](#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讓人驚訝的是，天皇在駐留廣島期間并沒有創作很多短歌。[[24]](#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但是，他創作了一首名為《成歡役》的軍歌，軍歌包含下列歌詞：

我勇猛之將士，

踏彼我之尸體，

奮勇奮勇向前。[[25]](#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10月26日，當天皇晚餐時，這首歌被配了樂，由軍樂隊演唱。然而，天皇對配樂不滿意；兩天后，樂隊采用加藤義清創作的《軍號之音》的旋律進行演唱。《軍號之音》是天皇非常喜歡的一首曲子，每晚晚餐后，他幾乎都會下令演奏該曲。[[26]](#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天皇還創作了一部叫做《成歡站》的能樂配詞。他讓內務省的一名官員給這首詞配樂，作品完成后，軍樂隊在天皇面前演唱。[[27]](#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10月18日到10月22日，臨時帝國議會在廣島召開，這讓天皇在廣島的生活變得有生氣起來。這次會議由通信大臣黑田清隆和內務大臣井上馨向伊藤博文提議。他們稱，如果天皇親自宣讀召開會議的詔書（而非讓其他人在東京代為宣讀），將會對議員產生更加強有力的影響。因此政府做了如此安排。在召開議會的敕語中，天皇對清朝忘記維護東洋和平的義務而造成此番現狀深表遺憾。既然戰火已經點燃，若不實現目標，日本不會就此停止。他希望帝國臣民在他身后共同努力，以期取得全面勝利，迅速恢復東洋和平以及提高日本的聲譽。[[28]](#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會議主要討論如何給戰爭籌集資金，同意發行一億公債來彌補赤字。議員的觀點略有不同，但是，所有議員都下定決心要看到戰爭的勝利，并對天皇親自指揮軍隊表達了感激之情。

正當帝國議會在廣島召開的時候，日本第一軍的部隊行進到鴨綠江岸，并于10月24日跨江渡河。清軍奮力抵抗，但在兩軍交火的各個戰役中，日軍“連戰連勝”。11月2日，天皇出席了在臨時議會大廈舉辦的宴會，慶祝勝利。墻壁上掛著的畫像描摹了虛誕自負的袁世凱、悲痛流涕的李鴻章、戰死疆場的左寶貴等內容。當天晚些時候，還上演了能戲和狂言。[[29]](#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翌日，也就是天皇的生日，在臨時住處舉辦的一場慶宴上，天皇親自演唱了《熊野》。[[30]](#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11月8日，美國駐日公使愛德溫·鄧恩（Edwin Dun）向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發了一封來自美國政府的函件：

日本和中國之間的這場戰爭令人痛惜，但并沒有危及到美國在亞洲的戰略。美國對兩國交戰的態度是：不偏不倚，重視友誼，嚴守中立，衷心希望維護兩國安寧。若戰爭延長，乃至無法制止日本的海陸進攻，與東洋局勢有利害關系的其他列強難免會提出不利于日本將來安全和福祉的要求。美國總統對日本一向懷有最友好的尊重之情，在不損害中日兩國聲譽的前提下，美國欲為維護和平進行善意調停，貴國是否同意，望告知。[[31]](#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在這些話語的背后，我們可以感受到美國對英國一貫抱有的不信任，以及希望日本將其視為在領土或其他方面對東亞沒有野心的朋友。盡管陸奧對美國的調停建議表示感謝，但他（在征得日本政府和天皇的許可后）答復道：“自交戰以來，日本軍隊連戰連捷，目前無需乞助貴國政府特意協助，以息戰爭。”陸奧認為，“察清國之情勢，彼今非蒙更加打擊，則難真心悔悟，感誠實講和之必要。而我國內，主戰氣焰未稍有減卻，即今開講和端緒，時間亦早”。[[32]](#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陸奧向鄧恩保證，日本并不希望“乘勝獲得應得正當、合理結果以外的東西”，然而，其他日本人卻有著更加野心勃勃的計劃。山縣就朝鮮未來向天皇上奏了一份建議書，在建議書中，他深信保全朝鮮獨立和防止清朝干預是極其困難的事情。他提到日本已經和朝鮮簽訂一份秘密協議，在釜山到漢城之間修建鐵路，但是，此舉還不足夠。除非鐵路通至平壤北部的義州，否則日后必定后悔。因為義州乃戰略要地，日本應駐扎在此，以便最大限度減少清朝的影響力。何況釜山至義州的鐵路，也是直達印度的大道，日本想要稱霸亞洲，必須即刻修建這條鐵路。[[33]](#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雖然山縣的建議并沒有得以執行，但自第二軍于11月6日攻占金州城后，山縣便迫切要求日本在亞洲大陸進行擴張。清朝無力阻止日軍深入國境，渴望盡快結束戰爭。據報告稱，李鴻章已經決定，無論日本提出怎樣的賠款要求，都要與日本議和。他懇請各國（包括德國和俄國）探明日本議和的條件。德國外交部長拒絕調停，建議清朝直接與日本政府進行談判。俄國外交部長也給出了類似答復。

下一場大戰在旅順口打響，旅順口是清朝北洋水師的母港，防御堅固。十多年來，清朝不惜巨資建造防御工事，使旅順口被譽為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三大要塞之一。這里駐軍一萬以上[[34]](#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擁有約一百五十座炮臺。11月22日凌晨1點30分，日軍發起進攻。第一道防線很難攻下，不過，一旦這些陣地被占領，清朝的抵抗便土崩瓦解，幾乎所有的守城者都棄城而逃。盡管旅順口吹噓其防御工事多么堅固，最終還是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35]](#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11月22日，就在日本和美國簽訂新的通商和航海條約的同一天，美國駐北京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向駐東京的愛德溫·鄧恩發送電報，聲稱清朝政府已經授權并請求他“直接提出議和之事”。清朝提出的議和條件是承認朝鮮獨立以及給予合理的軍費賠償。[[36]](#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日本將該提議（這項提議的條件被日本稱作“砍價”）解釋為清朝并非真心乞求和平。他們答復說，如果清朝真心謀求和平，應委派全權公使，屆時日本將把停戰條件告知該公使。

在目擊了攻占旅順的外國媒體記者進行大肆報道之前，一切似乎都對日本有利。這些報道不僅嚇壞了國外的讀者，也一度對日本作為現代文明國家的聲譽造成了威脅。

第一個對日軍攻陷旅順口后的行徑進行報道的是倫敦《泰晤士報》的駐外記者托馬斯·柯文（Thomas Cowen）。在離開旅順后，他于11月29日抵達廣島，并在第二天約見了外務大臣陸奧。柯文詳細描述了他親眼目睹的恐怖場景，這讓陸奧感到十分震驚。是夜，陸奧向林董發了一封電報：

《泰晤士報》記者從旅順口歸，今日與其會面。彼人言日軍戰捷后，有相當粗暴之舉動。殘殺俘虜，及平民乃至婦女，此類言說似為事實。彼人稱此事實不僅歐美各記者目睹，各國艦隊軍官，尤其英國海軍少將亦親眼所見。[[37]](#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柯文質問陸奧，日本打算采取哪些措施來挽救局面。陸奧回復說，如果報道屬實，這實在是太讓人痛惜，但是日本政府目前沒有收到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將軍的報告，故不能發表意見。他認為日本軍隊素來軍紀森嚴，會犯下如此罪行實在讓人難以置信。但是，倘若確實發生了此類事件，必定有其原因；如果真的有理由，也許可以或多或少地減輕罪狀。陸奧讓林董將獲悉的所有消息都悉數告訴他。

12月3日，《泰晤士報》刊登了柯文的第一篇戰事報道。文章以日本官方對這一事件的看法作為開頭：清兵脫去軍服，換上民服，并隱藏武器（包括炸彈）；平民也參加了戰斗，他們從屋內向外開火，因此日軍認為有必要殲滅他們；日本俘虜抑或被活活燒死，抑或被砍掉手腳，此類尸首的慘狀進一步激怒了日軍。

之后，柯文描述了自己的所見所聞。在日軍進攻獲勝后的四天中，他一直待在旅順。盡管城內已無人抵抗，但日軍仍肆意殺戮了幾乎每一個男性居民，一些婦女和兒童也被意外殺害。日軍對整個城市進行了洗劫。他曾向子爵陸奧報告說他目睹了很多清朝俘虜的手被綁在背后，衣服被扒光，被日軍用劍亂砍。一些人腸流滿地，手腳被砍斷。許多尸體上都有燒焦的痕跡。[[38]](#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日本政府迅速對這篇報道和刊登在外國媒體上的類似報道做出了回應，意圖使外國媒體發布有利于日本的報道。[[39]](#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他們向路透社行賄，要求其發布親日文章，甚至還直接用錢財收買了一些外國報紙（如《華盛頓郵報》），促使其刊印宣揚日本的文章。[[40]](#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當時，各類外國記者都被日本的金錢收買。[[41]](#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正在這一時期，日本對媒體進行了軍事審查。政府草擬了十項要求，在“勤錄忠勇義烈之事實，獎勵同仇敵愾之志氣”下面另有四個注意事項，違反此類事項的人士將受到相應處罰。[[42]](#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紐約報紙《世界報》的駐外記者詹姆斯·克里曼（James Creelman）發表了一篇簡短電訊稿，讓旅順發生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43]](#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11月21日，日軍進入旅順，對幾乎全城的人口進行了血腥屠殺。

毫無防備、手無寸鐵的居民在家中被虐殺，尸體被肢解，慘狀無法言訴。毫無節制的殺戮持續了三天。整個城市被這場駭人聽聞的暴行洗劫一空。

這是日本文明的第一個污點。在這場事件中，日本再次墮落成蠻夷之邦。

日本企圖對殘暴行為的合理性進行證實，所有借口都是赤裸裸的欺騙。暴行的細枝末節讓文明世界毛骨悚然。

被恐怖場景嚇住的外國隨軍記者一致逃離了日本軍隊。[[44]](#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日本媒體從清朝士兵狡黠透頂的角度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他們說清兵即使在脫下軍服、換上民服后仍然抵抗，要是將他們釋放到人群中，他們像瘋狗一樣危險，日軍毫無選擇，只好在他們咬人之前將其殺死；[[45]](#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日媒反復提到“被俘日兵的尸體遭到殘酷屠尸”，稱這一暴行是造成日軍仇恨清軍的一大原因。[[46]](#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關于“大屠殺”，英國在印度犯下的罪行要嚴重得多。毛利人也曾在新西蘭被屠殺。近期，亞美尼亞人被服務于奧斯曼帝國政府的保加利亞軍隊屠殺，而這遠比東亞發生的屠殺嚴重得多。在美國德克薩斯州，人們用私刑處死了一名黑人（僅僅是因為他渴望獲得良好教育），然而，這些并沒有（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被用做種族偏見的可悲案例，而是表明文明人（例如美國的實施私刑者或日本人）覺得難以對野蠻人（如黑人或中國人）產生同情。[[47]](#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三名外國記者——柯文、克里曼和《北美評論》的弗雷德里克·維耶利爾（Frederic Villiers）——對旅順大屠殺的詳盡報道讓世人驚駭。他們都見證了這樣一個事實：日軍見人就殺，即使他們不抵抗。老人跪在地上乞求饒命，但日軍將刺刀刺向他們，砍下了他們的頭顱；婦女和兒童倉皇地向山上逃去，日軍追趕而來，開槍掃射。掃射對象不加選擇,只要是在動的東西，哪怕是一只狗、一只貓或是一頭慌不擇路的驢，都無一幸免。柯文說，據他所見，沒有人從屋內向日軍開火，但這并不能阻止日本不計后果地射擊。如照片所示，街道上布滿了尸體，血流成河。根據外國記者的敘述，沒有一具尸體看起來像是士兵，也沒有一具尸體攜帶有武器。[[48]](#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日軍并沒有抓獲俘虜，盡管日本官方宣稱有三百五十五名俘虜受到了優待，并且很快將被送抵東京。[[49]](#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12月4日的《萬朝報》上有一篇自問自答的文章，在回答為何俘虜如此之少時，文章說如果日本陸軍和海軍想抓獲俘虜，他們樂意抓多少就能抓到多少。然而，數量眾多的俘虜是件麻煩事。因此，凡攜帶武器者或者看起來好像是在抵抗日軍的人都被第二軍殺死。這就是俘虜如此之少的原因。[[50]](#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事實上，只有少數清朝人沒有被殺害，大概是因為日軍需要他們來幫助掩埋死尸。他們獲得一張白布，上書“順民勿殺”、“此民不可殺 某某隊”。[[51]](#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盡管國際法禁止軍夫[[52]](#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攜帶武器，但為日軍效勞的軍夫非常熱心地參與了屠殺行動。當日軍無法否認發生了大屠殺的時候，便指責說此類暴行是醉酒后的軍夫所為。日軍對旅順的家家戶戶進行了劫掠，搶走了貴重物品，但陸軍大將大山卻正式否認了這種說法。[[53]](#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11月23日，日本在旅順的造船廠舉辦了宴會，以慶祝“新嘗祭”[[54]](#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在宴會的最高潮，眾人向大山巖和其他高級官員敬酒，慶祝戰爭勝利。當晚，第二軍的法律顧問有賀長雄與外國記者閑聊。有賀曾是東京大學的高材生，據說是唯一一位完全理解歐內斯特·費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的藝術講座的學生，[[55]](#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但此刻，他卻是日本軍隊的辯護者。有賀強烈要求維耶利爾毫不猶豫地表明，是否認為過去幾天發生的事情構成了大屠殺。維耶利爾沒有做出正面回答，但他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另一個詞來給該事件定性：“冷血的屠殺”。[[56]](#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如果沒有外國記者，也許這些無法名狀的事情永遠都不會被記錄下來。[[57]](#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旅順大屠殺仍然是一個讓人痛苦的事件：人非禽獸，怎能干出這樣惡劣的行徑？在戰爭最激烈的階段，看到（或聽聞）同胞的尸體被肢解，士兵們被激怒，大概已經拋卻了正常的理智，個人信念（包括生而為人的氣度）融化成一種只被殺戮本能支配的集體情感。[[58]](#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如果西方人讀到有關歐美軍隊在世界的遙遠一隅屠殺“當地人”的報道，他們可能會聳聳肩說“必須教導野蠻人，以便讓他們的行為舉止像個文明人”。但是，當他們讀到日軍犯下的暴行時，則證實了其中一些人的懷疑：日本雖然有著美麗迷人的風景和詩情畫意的藝術，但不過是個蠻夷之邦，不能平等待之。[[59]](#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美國參議院對日美條約的批準立即受到了這一事件的影響。12月14日，公使栗野慎一郎致電陸奧：“國務卿[[60]](#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發表聲明說，倘若關于清朝旅順大屠殺的謠言屬實，必定會給參議院批準條約帶來重重困難。”陸奧即刻回電栗野：“與旅順事件有關的報道夸大其詞。確實發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流血和殺戮，然而日軍向來紀律嚴明，我認為那種狀況是因為日軍被激怒而為之。”參議院在久拖之后，最終繼續處理條約事宜。鑒于日本人在中國的行徑，一些參議員反對放棄治外法權。隨后，參議院提出了一個修正案，據陸奧所說，該修正案“無形中讓整個條約作廢”。[[61]](#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直到1895年2月，美國參議院才批準了條約。

柯文確信，日本將領和其他高級官員意識到了大屠殺已經持續了好幾天。[[62]](#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但是，身在廣島的天皇似乎不太可能知道發生了什么。他身邊的人幾乎不可能向他報告給帝國軍隊蒙羞的事情來煩擾他。天皇很少看報紙，但即使他認真閱讀報紙，所看到的也是對外國記者的文章予以否認的說法，較之自己的國人，他沒有理由更信任外國人。

天皇對戰事的深入了解，也許來自于因崇敬而向他敬獻的戰利品。盡管戰利品中有一些藝術品，但主要還是中國的服飾、旗幟和類似物品。最值得紀念的是一對駱駝，一些士兵最初發現后將它獻給陸軍中將山地。山地轉而將它們和一只鶴一同敬獻給天皇。[[63]](#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11月29日，這對駱駝抵達宇品。天皇心情大好，高興地提議說將它們送給堀河。[[64]](#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這位有些摸不著頭腦的貴族設法躲開這個不受歡迎的大禮，[[65]](#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于是，在2月的時候，駱駝作為出自皇太子之手的禮物被贈送給了上野動物園。[[66]](#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天皇以旅順口的戰役為主題做了兩首短歌：

炮起硝煙漫

將士征虜不畏苦

血海滿尸山

誓破雄關虎闞壘

使我千軍得勝還

炮響穿云霄

松壽山險亦徒勞

壘破白旗飄

叱咤精兵戰場嘯

炮聲變做凱歌嘹[[67]](#_1__Ying_Guo_Zuo_Jia_Zhan_Mu_Si)

這是在得知攻陷旅順口后，天皇感情的率直表現。

* 1. [[1]](#_1_45) 英國作家詹姆斯·艾倫（James Allan）描述其看到“日本兵士與敵軍相遇，被圍攏的敵軍殺害，日兵尸體除了遭受殘暴的刀砍或鞭抽外，大多沒有頭顱或右手，有些雙臂均無。在據點被攻陷時，尸體扔掛在樹上；昔日戰友看到這一情景而感到憤怒，這毫不奇怪，盡管主要責任歸咎于允許進行此次可怕報復的軍官”（"aid-EO1", p. 67）。 井上描述說，就在旅順戰役的前三天，在土城子之戰中被活捉的三名日本士兵的頭顱被懸掛在路旁的柳樹上。示眾的首級被割去鼻子和耳朵。就在前面不遠處，在民家的門梁上發現用鐵絲吊著兩顆日兵頭顱。對于在土城子之戰中倒下的日本第二軍的兵士，清兵將他們的頭顱砍下。日兵尸體的腹部被切開，里面裝滿了石塊；右臂被砍掉，睪丸被剜除。凡割日軍頭顱者，清朝政府有賞。一名外國記者告訴克里曼，他親眼看見了清朝政府授予獎勵（《旅順虐殺事件》，第146—147頁）。
  2. [[2]](#_2_45) 描繪戰斗中的原田的幾幅浮世繪，見Shumpei Okamoto（岡本俊平）, Impressions of the Front, p. 24。另請參閱Henry D. Smith, "aid-EKL", p. 86。
  3. [[3]](#_3_45) 盡管按現在的標準來看，日本和清朝軍艦的噸位都比較小，但在當時，這些軍艦絕對是不可小覷之物，這可以從1894年8月11日法國《畫報》（L’"aid-EL4"）的敘述中看出來，該周刊登載道：“這是一場使用具備現代科技的最強大、最新穎的動力船開展的戰役，是史上第一次，是在兩個國家之間交火。這兩個國家并非蠻夷之國，但是有著與我們截然不同的文明”（《〈イリュストラジオン〉 日本関係記事集》，第二卷，第166頁）。
  4. [[4]](#_4_45) 拙著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80。小林清親繪制的描繪了這名臨終水手的浮世繪，亦見Shumpei Okamoto, "aid-ELD", p. 28。
  5. [[5]](#_5_4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86頁。陸奧宗光認為，這些不同方案“只不過是某些人私下里的個人想法”，因而拒絕予以考慮（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9）。他補充說，“依吾之見，朝鮮改革應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重；故不必憂慮改革的困難或犧牲”。另請參閱藤村道生，《日清戦爭》，第106頁。
  6. [[6]](#_6_4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87頁、第488頁。
  7. [[7]](#_7_45) 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81—82頁。
  8. [[8]](#_8_4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97頁。伊藤參與制定軍事和政治決策。他尤其強調需在列強干預之前速戰速決、贏得勝利，天皇經常就戰時政策與伊藤商議（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82頁）。
  9. [[9]](#_9_45) 8月25日，陸奧將青木周藏于去年12月在倫敦進行的談判上奏天皇。這場談判盡管困難重重，但仍取得了勝利。他確信將逐步與其他盟國簽訂類似條約。現在，他有義務將維多利亞女王已經簽署了修訂后條約這一“欣喜消息”上奏天皇。8月27日，政府公布了新的通商和航海條約（《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93頁）。
  10. [[10]](#_10_45) 藤村道生認為，伊藤提出遷移大本營的真正用意，是為了向民眾證實戰爭是在天皇的指揮下進行，以及為了團結民眾以支持戰爭（《日清戦爭》，第112頁）。
  11. [[11]](#_11_4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05頁。
  12. [[12]](#_12_4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10頁。
  13. [[13]](#_13_45) 大本營位于由毛利輝元建于1589年的廣島城，毛利輝元是豐臣秀吉的將軍之一。在明治居住在廣島的那段時期，廣島城只剩下只有一棟五層的天守閣。
  14. [[14]](#_14_4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11頁。子爵土方久元回憶道，天皇的私人住所由兩個房間組成，一間八畳，另一間十畳。他把一間用做臥室，另一間用于處理國事。房間非常擁擠：“陛下在如此簡陋的環境中生活，瀏覽從前線源源不斷地發來的電報，不停接見即將遠赴海外的官員。陛下忙碌不迭，卻絲毫沒有流露出疲倦的跡象”（《叡明比べなき大皇帝》，第70頁。）。
  15. [[15]](#_15_4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12頁。
  16. [[16]](#_16_44) 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83頁。
  17. [[17]](#_17_44) 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516頁。
  18. [[18]](#_18_43) 拙著《日本の美意識》，第149—150頁。
  19. [[19]](#_19_43) 拙著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 p. 280；棟田博，《兵隊百年》，第109—114頁。
  20. [[20]](#_20_4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17頁。
  21. [[21]](#_21_4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18—520頁。如需了解描繪了黃海戰役（也稱為“大孤山之戰”或“海洋島戰役”）的十幅浮世繪，請參閱Shumpei Okamoto,Impressions of the Front , p. 25-30。
  22. [[22]](#_22_41) 著名記者德富蘇峰指出，清日戰爭不僅使軍隊，就連全體民眾都更加向皇室靠攏（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89—91頁）。
  23. [[23]](#_23_41)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44頁。日野西將自己描述成“不束者”，意指不能勝任者。
  24. [[24]](#_24_39)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27頁。
  25. [[25]](#_25_39)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一卷第252頁僅含有與戰爭有關的兩首短歌。但是，《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28—529頁有《新輯明治天皇御集》中未包括的一首軍歌，并提到了另外兩首軍歌（以黃海戰役和平壤戰役的勝利為主題）。
  26. [[26]](#_26_3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29頁。
  27. [[27]](#_27_38) 堀內敬三提到，在聽到白神源次郎的英勇事跡后，他立刻有了靈感，遂創作了一首詩并配了樂（《音楽五十年史》，第155—156頁）。剛開始，他嘗試用單簧管吹這首曲子，但上氣不接下氣。后來，他嘗試用上低音小號吹奏，但再一次感到氣力有些不足。最后，他在黑板上潦草寫下歌詞。憑借著狂熱的創造力，在另一位音樂家的幫助下，在半小時內完成了詞和曲。
  28. [[28]](#_28_35) 很不幸，我無法對這部作品進行查證。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29頁。此處也提到了皇后親臨廣島探望天皇時，（在天皇的請求下）就平壤戰役的勝利創作了一首軍歌。櫻井也為皇后的詩歌配了樂。
  29. [[29]](#_29_3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24—525頁、第549頁。
  30. [[30]](#_30_3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68頁。能戲采用合適的武打曲調演奏，如《大枝山》和《烏帽子折》。狂言則采用《靱猿》的曲調進行演奏（第569頁）。
  31. [[31]](#_31_3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71頁。
  32. [[32]](#_32_30)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38；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76頁。
  33. [[33]](#_33_29)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39.
  34. [[34]](#_34_2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77頁。
  35. [[35]](#_35_26) 《明治天皇紀》給出的數字是“超過一萬人”（第八卷，第589頁），但是，白井給出的數字是15000千人（《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141頁）。
  36. [[36]](#_36_25) 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143頁。如需了解目擊者的敘述，請參閱龜井茲明《日清戦爭従軍寫真帖——伯爵亀井玆明の日記》第172—177頁。龜井是日本的第一位戰地攝影師，寫了非常詳細的戰地日記，其中包括從其他來源獲得的信息。他引述了一名目擊者（一名跟隨第二軍出征的外國官員）對戰爭的報告，請參閱第172—173頁。
  37. [[37]](#_37_21)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140. 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94頁。
  38. [[38]](#_38_18)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25—26頁。下文大多數內容皆歸功于井上的這部精彩的學術書。英國“海軍少將”大概是指海軍中將愛德蒙·羅伯特·弗里曼特爾（Edmond Robert Fremantle）爵士，他是駐清總司令。11月25日，就在日本獲勝后不久，他在旅順口登陸（第127頁）。
  39. [[39]](#_39_17)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26—27頁。11月24日，龜井茲明拍下了軍夫挖坑埋葬清朝人尸體的照片，尸體位于照片最顯著的位置。與柯文的敘述相比，他對散落在街道上的成堆尸體進行的描述更加恐怖，但是，他偏向于這樣一種解釋：旅順每一個年滿15周歲的男性都被命令抵抗日軍，無法分辨出他們之中哪些是平民，哪些是士兵（龜井茲明：《日清戦爭従軍寫真帖——伯爵亀井玆明の日記》，第197—199頁）。
  40. [[40]](#_40_16) 井上描述了被日本購買的新聞機構——中央新聞（Central News ）如何向外國報紙提供“信息”（《旅順虐殺事件》，第29頁）。例如，為回應柯文的第一篇文章，該報社說除戰時正當殺傷之外，沒有殺害任何一名清朝人。
  41. [[41]](#_41_16)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72頁。在試圖賄賂外國媒體時，日本并非每次都成功。12月6日，在約見柯文時，親政府派報社——東京日日新聞社——的社長伊東巳代治對柯文說，日本政府向他支付費用，并且無論報文長短，均不向《泰晤士報》收取電報費用（第98頁）。柯文嚴詞拒絕。
  42. [[42]](#_42_16) 尤其是橫濱《日本郵報》（Japan Mail ）的社長弗朗西斯·布林克利（Francis Brinkley）。該社發行各類英語報刊。在清日戰爭期間，日本政府不僅給他發放月度津貼，還就其貢獻向他授予勛章和獎勵5000日元（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31—32頁）。
  43. [[43]](#_43_13)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40頁。
  44. [[44]](#_44_12) 此時，約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擁有的《世界報》被稱為“以宣傳社會丑聞為主的報刊”，但這并不妨礙他人相信克里曼所寫的文章。
  45. [[45]](#_45_12) 如需了解英文原文，請參閱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55頁。
  46. [[46]](#_46_11)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58頁。
  47. [[47]](#_47_10)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82頁、第85頁。12月20日的《大阪毎日新聞》報道說，有6000到10000名亞美尼亞人被殺害。
  48. [[48]](#_48_10)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153頁、第157頁、第176頁。
  49. [[49]](#_49_10)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64頁。俘虜的確抵達了日本，但他們不一定是在旅順被捕。
  50. [[50]](#_50_10)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186頁。日本政府從供應俘虜所需糧食數量的角度對不抓獲俘虜的行為進行了辯護。
  51. [[51]](#_51_7)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202—204頁。陸奧引述了霍蘭德（T. E. Holland）博士在一篇文章中的話。霍蘭德博士被稱為“國際法方面的英國權威泰斗級人物，到目前為止，他對日本的戰時行為不吝贊美之詞”。該文章說，“最后，旅順只有36名清人活口。他們只是被用來掩埋死去的同袍，每個人的帽子上都貼有一張白紙，上書‘此人不可殺’（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75）。
  52. [[52]](#_52_4) 日本軍隊中的非正規兵，起源于江戶時代，是藩閥軍后勤補給部門的編制，通稱“陣夫”。日軍遠赴國外作戰時，受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物資運輸面臨許多新的考驗和問題，迫使日軍重新起用“軍夫”，擔任向前線部隊輸送輜重、彈藥、糧草、救護等后勤保障任務。——譯注
  53. [[53]](#_53_4)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48頁、第189頁、第192頁。
  54. [[54]](#_54_4) 神道教的重要祭典之一，是慶祝收獲的祭日。——譯注
  55. [[55]](#_55_4) 拙著Dawn to the West, 1, p. 100。
  56. [[56]](#_56_4)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195頁。
  57. [[57]](#_57_2)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86頁。
  58. [[58]](#_58_2) 一名日本士兵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簡要描述說，他被惹怒，隨后，他快速地學會了如何砍下清朝人的頭顱（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187頁）。
  59. [[59]](#_59_2) 例如，孟買的一家英語報紙刊登了一篇對日本發表的社論，說“他們只是披著文明的外衣，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暴露出了野蠻本性的真面目”（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102頁）。
  60. [[60]](#_60_1) 國務卿沃爾特·昆廷·格雷沙姆（Walter Q. Gresham）感謝《世界報》刊登了克里曼的文章。剛開始，他推斷克里曼一定是夸大其詞，因為還沒有美國政府代表向他報告這么重大的事件，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他將陸奧的電報解釋為對克里曼的文章予以證實，那時才意識到，在旅順淪陷后發生的暴行要比當初報道的嚴重得多（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70頁）。
  61. [[61]](#_61_1)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p. 75, 76.
  62. [[62]](#_62_1)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222頁。
  63. [[63]](#_63_1) 丹頂鶴是在錦州捕獲的。如需了解天皇查看戰利品的情況，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6頁。該書還提到天皇查看了來自旅順和其他地方的戰利品，在花園里展覽了這些戰利品（第610頁）。他還觀看了黃海戰役的照片和中國的版畫。
  64. [[64]](#_64_1)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子爵堀河康隆負責給放置于正倉院的國寶進行編目。
  65. [[65]](#_65) 如需了解與堀河和駱駝有關的逸聞，請參閱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27頁。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7頁。日野西提到向天皇展示了清朝俘虜，但只是說“天皇從上往下觀望”。這表明他很好奇清朝人長什么樣，但又不想靠得太近。
  66. [[66]](#_66) 井上晴樹，《旅順虐殺事件》，第191—192頁。
  67. [[67]](#_67)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一卷，第252頁。第二首短歌原來是以“號角聲鳴震山裂／嘯歌突擊跋扈歸”結尾。這首詩作于1895年，可能就在旅順淪陷后的幾個月。

# 第四十六章 馬關條約



旅順慘敗后，清朝再次試圖結束戰爭。經李鴻章提議，在天津海關稅務司任職的德國專員德璀琳（Gustav Detring）攜帶李鴻章致總理大臣伊藤的照會前往日本。照會中提道：清朝皇帝令李鴻章派德璀琳奔赴日本，因為“德璀琳在清朝當差多年，忠實可靠，深得清朝信任”。德璀琳此行的使命是進行議和，并根據李鴻章的授意“探明恢復和平、言歸于好、重修舊誼的條件”。[[1]](#_1__Trumbull_White__The_War_in_t)李鴻章還附上致伊藤的私函一封，私函中提到了幾年前他曾在天津與伊藤會晤的舊誼，并堅信伊藤和他有著共同的目的。

1894年11月26日，德璀琳抵達神戶。他通過兵庫縣知事請求會見伊藤，但伊藤斷然拒絕接見，聲稱德璀琳并無交戰國代表的資格。[[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他以法理上的借口回絕了使者，表明在此階段，對于一場形勢如此有利于日本的戰爭來說，他們基本上沒有興趣結束。

與此同時，在司令官山縣有朋的指揮下，第一軍越過鴨綠江進入清朝。山縣極大地延長了補給線，此刻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抉擇——是繼續向前挺進，還是在冬營待命。帝國大本營贊成后者，認為此時將進攻轉為防守是明智之舉，但是，出于希望能與在旅順口打了勝仗的第二軍互比高低，以及由于擔心長時間的等待可能會嚴重影響士氣，第一軍的高級將領渴望更進一步地深入清朝境內。（11月3日）山縣向帝國大本營提交了三個未來行動方略，并表示愿意執行大本營選定的任何一個方略。這些方略是：（1）在山海關一帶登陸，并攻下一個基地，以便進軍北京；（2）在遼寧半島集結軍隊，并在海岸的不凍港建立一個供給基地；（3）向北進軍，進攻奉天（今沈陽）。[[3]](#_3__Okakura_Kakuzo__The_Book_of)

帝國大本營拒絕了這三個方略，然而，山縣不滿意這一答復。11月25日，他下令第三師團進攻海城這個戰略連接要點。山縣無視帝國大本營命令的行為激怒了伊藤博文，他力勸天皇于11月29日頒布詔書，召山縣回日本。官方的說法是山縣身患胃病，天皇擔心山縣的健康狀況，不過，真正內容卻是命令山縣立刻返回日本，按照表面上說，這樣天皇就能夠親耳聆聽山縣上奏前線形勢。[[4]](#_4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然而，這時第一軍已經抵達海城一帶，在那里，他們遭遇了到目前為止清軍最頑強的一次抵抗。12月13日，日軍占領海城，但是，清軍并沒有棄城潰逃，這與他們在早期戰爭中的行動形成強烈反差。他們曾五次爭取奪回海城，[[5]](#_5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日本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退了一次次的進攻。甚至有那么一陣子，好像清軍就要扭轉戰爭的局勢了。[[6]](#_6__Bai_Jing_Jiu_Ye____Ming_Zhi)最嚴重的一次威脅發生在2月底，當時清軍主將劉坤一制定了一個方案，擬調動十萬名士兵圍殲位于海城的日軍。該方案遭到了清軍大本營的反對，也沒有獲得大清皇帝的恩準。清朝的最高指揮部沒能執行劉坤一的方案，或許使得日本免于遭受一場災難性的戰敗。

較之于敵軍采取的行動，前線日軍遭受更多的是挨冷受凍。數百名士兵飽受凍瘡的折磨。12月19日，第三師團的軍隊于黎明時分離開海城，意圖襲擊前往牛莊的清軍。路面積雪已超過三十厘米，嚴重阻礙了日軍的行動。日軍勇猛作戰，一舉拿下好幾個壁壘森嚴的陣地，然而，清軍頑強抵抗。當天結束時，激戰和寒冷讓日軍筋疲力盡。夜幕漸漸降臨，主將桂太郎命令軍隊立刻返回海城，但軍隊疲憊不堪，直到次日早上才散亂地回到海城。

在清日戰爭期間創作的不計其數的浮世繪中，最感人的是那些描繪士兵不畏懼滿洲的極度寒冷和冰天雪地的作品，有時候士兵們聚集在火旁，有時候躺在雪地里瞄準步槍，有時候翻身上馬，和馬匹一起備受嚴寒的折磨。[[7]](#_7__Zhao_Shu_De_Zheng_Wen_Qing_C)盡管天寒地凍，日軍仍穿著夏季入朝時的制服，因為他們并沒有攜帶冬服；此外，對于載人行走在結冰路面上的馬匹來說，它們的馬蹄鐵無法對馬蹄起到保護作用。不過，日軍仍繼續向前挺進。

德璀琳未能會見伊藤，清朝通過美國駐清公使田貝和美國駐日公使愛德溫·鄧恩傳話，請求日本匯總議和的條件，并聲稱在未獲悉此類條件的前提下清朝無法派遣全權公使。日本回復道，在與具備相關資格的全權代表會晤之前，日本不會透露議和的條件。[[8]](#_8__Zhe_Xie_Fan_Gong_Fa_Sheng_Yu)清朝再次任命美國公使作為調解者，并對日本說，他們將遵從日本的建議，委任全權代表，并要求在上海與日本代表會晤。日本回復道，會晤必須在日本舉行。清朝提議將長崎作為談判地，因為長崎毗鄰清朝，但日本堅持在廣島會晤。日本承諾說，他們將在清朝代表抵達后的四十八小時內舉行會晤。[[9]](#_9__Bai_Jing_Jiu_Ye____Ming_Zhi)

盡管清朝急切地呼吁結束戰爭，但直到1月31日清朝代表才抵達廣島。日本政府任命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會見代表，然而，從一開始，便有人抱怨清朝代表的職務和頭銜較低，懷疑清朝是否真心想進行談判。日本進一步發現，清朝代表并沒有攜帶全權委任狀，僅攜帶了一份國書和清朝皇帝的敕諭，敕諭委任這兩名人士擔任出使日本的代表，但并沒有對談判人士的權力進行清楚地說明。清朝皇帝明確表示希望這兩名代表電傳匯報談判的各項進展，并在采取下一步行動前等待他的指示。日本請求清朝書面答復這些代表是否具有進行議和談判的全部權力。在2月2日送交的照會中，清朝承認這些代表不具有自行做出決定的權力。伊藤隨即宣布不可能進行進一步的談判。[[10]](#_10__Guan_Yu_Miao_Hui_Ri_Jun_Zai)

盡管正在進行此類會晤，但1月20日，日軍在山東半島北部海岸的榮成灣登陸后繼續向威海衛進軍。威海衛是清朝艦隊的最后一個據點。2月2日，第二軍在沒有遭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占領了威海衛，日本聯合艦隊成功將剩余的北洋水師圍困在威海灣。[[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不過，劉公島炮臺仍發起猛烈的轟擊，阻止了日軍對清朝艦隊發起攻擊。2月5日晚，日本的魚雷艇設法偷偷潛入劉公島，在距離目標五十到一百米的時候，魚雷艇擊沉及重創清朝的三艘主軍艦。[[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6日晚，日本魚雷艇發起新一輪的攻擊，致使兩艘清朝軍艦受損。7日，日本軍艦炮轟了位于威海灣的劉公島和日島。位于日島的彈藥庫被擊中，發生了爆炸。這場災難似乎摧毀了清軍的抵抗意志。[[13]](#_13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2月9日中午左右，日軍炮彈擊中了“靖遠”號的彈藥庫，導致該艦發生爆炸。“靖遠”號艦長見此情景，命令炸沉軍艦（該艦已遭到毀壞），隨后開槍自殺。次日，清軍幸存軍艦的諸位艦長力勸海軍提督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命令他們戰斗到底，但沒有一個官員同意。丁別無選擇，只好向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傳話請求投降。早些時候，司令長官伊東曾勸丁汝昌投降。他用英語書寫了一封勸降書，以便讓丁汝昌的外國顧問參與商討投降事宜，部分內容如下：

大日本帝國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祐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仆與閣下從事于疆場，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仆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仆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旁觀者審。今有人焉，于進退之間，雖有國計身家兩全之策，而為目前公私諸務所蔽，惑于所見，則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發起三思乎？仆之瀆告閣下者，亦惟出于友誼，一片至誠，冀閣下三思。[[14]](#_14__Wei_Hai_Wei_Shi_Yi_Ge_Bi_Lu)

當司令長官伊東收到丁汝昌表明想要投降的書信時，出于禮貌，他回送了葡萄酒、香檳和柿餅，以示安慰。2月12日早上，清朝“鎮北”號炮艇懸掛白旗，攜帶著丁汝昌致司令長官伊東的正式請降書，駛向日本聯合艦隊的旗艦“松島”號。丁汝昌為保障清軍和外國顧問的安全，愿將威海衛地區的軍艦和軍械交與日本。16日，丁作詩一首，表示愿為清朝海軍的失利全權負責，隨后服毒自殺。

丁提督的最后舉動為他贏得了日本人的尊重。浮世繪畫家滿懷同情地對他服毒前的最后一刻進行了描繪。在水野年方的畫作中，丁提督手中舉著一杯毒酒，凝望著港口燃燒的船艦；在右田年英的同時期作品中，描繪了一個滿臉凄楚的男士一邊癱倒在椅子上，一邊讀著絕筆書，旁邊的桌子上放著一小瓶毒藥。

在獲悉丁提督自殺的消息后，司令長官伊東命令聯合艦隊的船艦懸旗哀悼，并禁止船艦演奏音樂（但重大典禮除外）。他詢問負責安排投降事宜的清朝官員，哪艘清朝船艦的承載能力最強。該官員回答道，除“康濟”號外，其余都是軍艦，都不適合運送部隊；“康濟”號最初為運輸船，大概可以搭載兩千人。之后，伊東透露他一直在和其他日本官員商量如何處理丁提督的靈柩。他們建議說，應和其他靈柩一同放置在清朝的小帆船上，然后駛進海里。但伊東回復道，“汝昌為北洋水師長官……雖一朝戰敗，如置提督之柩于一葉帆船，非日本男兒所能忍受。余為慰提督之靈，特止收容‘康濟’號，以任貴官自由處理。若載提督靈柩后尚有余地，不妨搭載士官以下等。”[[15]](#_15__Ru_Xu_Le_Jie_Gong_Ji_De_Xia)

一名外國觀察員報告說，“日本艦隊向這位英勇的對手說了一段感人的悼詞，以示緬懷。當‘康濟’號緩緩駛出港口時，所有日本船艦都降半旗。在‘康濟’號起航后，伯爵伊東的指揮艦鳴放志哀禮炮。停靠在威海衛的歐洲軍艦也降半旗，這是對這位已故海軍提督所表現出來的英勇予以認可。”[[16]](#_16__Bai_Jing_Jiu_Ye____Ming_Zhi)

司令長官伊東對戰敗的敵人表現得極為寬宏大量。他不僅允許清朝將盡可能多的士兵安置在“康濟”號上以便讓士兵撤離，還同意平民自行選擇離開威海衛。威海衛戰役結束了，日本不僅大獲全勝，還借此在旅順的恐怖事件后對其武士道進行了洗白。

毫無疑問，不久后，作為統帥的天皇便獲悉了戰爭勝利的消息。不過他的日子似乎過得有些單調。他參加了多次政策會議，（盡管他的確出席了敲定憲法的會議）但顯然從未說過一句話。在1895年的新年正日，平時舉辦的宮廷儀式一場都沒有舉行；不過，天皇觀看了蹴鞠比賽[[17]](#_17__Zheng_Wen_Qing_Can_Yue_San)，并令一名官員為他朗讀《平家物語》中的文章。在新年之初，為天皇舉辦的傳統講座中出現了天皇自選的作品，這大概還是頭一次。

12月，熾仁親王感染傷寒。在他一次次似乎就要恢復的時候，疾病又卷土重來。他離開廣島，來到位于舞子[[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沿岸的別邸中養病，但易地療養并沒有帶給他半點好處。天皇向這個垂死的人授予了勛章，包括金鴟勛章[[19]](#_19__12Yue_12Ri__Tian_Huang_Zai)。熾仁是第一個獲得這項殊榮的人。盡管對熾仁盡全力醫治，但他還是于1月15日病逝。由于擔心可能會給軍隊造成不利影響，他患病的消息一直秘而未宣，但在23日，官方正式發布他病情危重的消息。熾仁的遺體被送回京都，即使是天皇也不知道他已經病逝。23日，天皇派一名官員前去探視熾仁的病情，這才得知熾仁已經病故。1月29日，天皇為熾仁舉行了國葬。在葬禮上，天皇送了兩根楊桐[[20]](#_20__Wei_Yu_Shen_Hu_Shi_Chui_Shu)樹枝，這是他第一次向并非王子或公主的人士贈送此類禮物。[[21]](#_21__Jin_Chi_Xun_Zhang_Yu_1890Ni)

天皇在獲悉熾仁病故后是怎樣的心情，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這肯定是一個打擊，因為他又失去了一名自維新時期就一直陪在他近側的人。接替熾仁擔任總參謀長的是彰仁親王。[[22]](#_22__Shen_Dao_Jiao_Yi_Shi_Zhong)

3月19日，皇后抵達廣島。在帝國大本營服侍天皇的人們都知道侍從們對天皇的照顧很不周到，[[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一直希望皇后能親訪大本營。最后，天皇恩準。皇后和一群宮女一同前往，其中包括天皇最寵愛的側室千種任子和園祥子。[[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典侍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她們在宮中的住處，對她們來說，這次長途旅行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像皇后這樣胸襟大度的女人，要是放在歐洲，是很難想象的。一心以天皇需求為重的皇后，帶來了天皇的其他女人，而這些女人將會代替她為天皇侍寢。在官方記錄中，沒有任何資料表明此前天皇在廣島有女性陪護，也沒有記載天皇在見到兩位側室后有何反映。子爵日野西資博回憶，在逗留廣島期間，皇后居住在帝國大本營后面的樓房中，但在抵達后近一個月的時間，天皇都未曾去看望過她，而是像以前一樣居住在孤寂的房間中。一天晚上，天皇得空去看望皇后，從那以后，天皇夜夜都去那里，次日早上才回到帝國大本營。

抵達廣島后的第二天，皇后提出想去受傷士兵療養的醫院探視。醫生建議她休息幾日再去，但從3月22日開始，她每隔一天便去醫院安慰受傷的士兵。浮世繪中描繪了皇后熱心探望每一個病房的情景，纏著繃帶的傷員帶著深切的敬畏之情蹲坐在病房的床上。皇后在廣島待了一個多月。

就在皇后抵達廣島的同一天，以李鴻章為首的清朝代表團抵達下關[[25]](#_25__Li_Ru__Ju_Shuo_You_Yu_Que_F)，就結束戰爭與日本進行公開談判。這一次，日本對代表的資格應該沒有任何疑慮了：李鴻章是清朝的直隸總督。日本之所以選擇下關，部分原因是：1864年西方列強組成的聯合艦隊炮轟了這座城市，自此以后這一地名被西方國家所熟悉。[[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清朝代表抵達后的第二天，談判開始。日方代表是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等人。雙方交換了全權委任狀，這一次沒有任何問題。同日，李鴻章正式提出了休戰請求，李鴻章說的那一番話，在幾個月以前美國駐北京公使也曾說過。

3月20日，伊藤列出停戰條件：日本占領大沽、天津、山海關以及這三座城市周邊的城壘；位于這些地區的清軍須將所有軍事裝備和軍需品移交給日本軍隊；天津到山海關的鐵路由日本軍官管理；在休戰期間，清朝政府需負擔日軍的軍事費用。如果清朝對上述條件有異議，必須提出可行的休戰條件，日本不會再考慮其他提議。這一苛刻條件讓李鴻章驚慌錯愕，他請求給予三天時間考慮。

3月24日，李鴻章、伊藤及各自的幕僚在下關會晤。李鴻章撤回休戰提議，取而代之地提出了希望即刻進行議和談判的請求。伊藤承諾將于次日提交一份議和方案。會談結束后，在返回酒店的途中，一位叫小山豐太郎的瘋子向李鴻章開了一槍，致使其臉部受傷。[[27]](#_27__Gu_Cheng__Chi_Jian_Guan___C)

刺殺未遂的消息傳到位于廣島的帝國大本營，立刻匯報給天皇。他大為不安，并派兩名高級軍醫前往下關為李鴻章治療。第二天早上，皇后派一名護士攜帶她親自制作的繃帶前往下關。次日，天皇頒布敕諭，其中說即便日本正在和清朝交戰，但發生此次襲擊事件依然令人悲痛和遺憾。他宣布，將按照法律對襲擊者（已被捕）進行懲處，并命令所有臣民遵照旨意，不得再有任何損害日本榮譽的舉動。[[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在發生試圖刺殺李鴻章的事件之前，浮世繪中一直把李鴻章描繪成一個老態龍鐘的老朽，一個軟弱無能、虛浮不實的清朝民眾的代表；此外，日本也有一些嘲笑他的歌曲。然而，這次襲擊讓日本民眾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同情，大批禮物和慰問書信絡繹不絕地涌入下關。陸奧宗光回憶道，“曾對李鴻章放不堪入耳之惡口雜言者，今日俄然痛惜李之遭難，出諛詞般溢美言語。更有甚者，列李既往功業，言東方將來之安危全系于李之生死。”[[29]](#_29__Dang_Xi_Ji_Zhe_Kai_Qiang_Sh)

日本民眾對此次刺殺未遂的反應與對大津事件的反應有所不同，因為清朝不太可能進行報復。但是，這可能使日本因戰爭勝利而獲得的海外聲譽蒙上污點，并使李鴻章借此次事件博得西方的同情，由此為第三國插手干預戰事提供了絕佳機會。[[30]](#_30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陸奧認為，需采取一些大動作，以使清朝和其他國家相信日本真心對此次襲擊感到痛心。他極力主張，應無條件答應李鴻章提出的休戰數周的請求。伊藤博文同意陸奧的觀點，勸說內閣成員和帝國大本營同意停火，即使一些人認為休戰對日本不利。在獲得天皇恩準后，3月28日，陸奧攜帶休戰協議草案，來到李鴻章的病榻前。草案的序言部分寫道：“大日本國天皇陛下聞悉今回不幸事件，鑒于妨礙議和談判之進行，茲已向議和談判全權大使下令，承諾一時休戰。”[[31]](#_31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陸奧解釋說，“休戰完全因天皇陛下的寬厚體恤”。但是，很顯然，天皇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他只是接受了這個建議而已。這個建議最初由陸奧提出，而后由伊藤呈遞給天皇。序言中的那番話，可能是為了提升天皇在清朝人眼中的權威形象。[[32]](#_32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無論如何，李鴻章帶著明顯的喜悅之情接受了休戰協議的草案，并說雖然他無法親自出現在談判桌前，但若能在病房里舉行，他會非常高興。3月30日，雙方簽署了休戰協議，協議規定：自該日起，所有海軍和陸軍部隊停戰三個星期。

4月1日，日本向李鴻章轉交了議和條約的草案。條件十分嚴苛，除了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外（清朝在數月前已接受了這一提議），還要求清朝將奉天省南部地區、臺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清朝還將向日本賠償三億兩白銀。此外，還規定日本國民在清朝享有通商特權。

李鴻章竭力削減日本的要求。回復稱，“我國與貴國提攜、共圖進步，以與泰西日新月異之文化爭衡，并防止白色人種之東侵”，但這一點未能打動伊藤。伊藤說十年前已經建議中國改革，但貴國不圖改進，以至今日。對于割地，李稱，“今查擬清所讓之地，如果勒令中國照辦，兩國子子孫孫永成仇敵，傳至無窮矣”。

接著，李鴻章對日本要求的巨額軍費賠償提出質疑。他說，“中國并非首先開釁之人，戰端已開之后，中國亦并未侵占日本土地，論理似不當責令中國賠償兵費。惟上年十月間，我政府因戰爭不息，美使愿出調停，有允償兵費之說，原為息事安民起見。”不過，他還是愿意（正如他之前告知美國公使的那樣）給予賠償，但數額須合理。“且估定兵費數目，亦應酌量中國財力能否勝任。如中國財力實在短絀，一時勒令立約畫押，后來不能如數賠償，日本必責中國以負約之罪，兵端必因而復起。”在備忘錄的結尾，他懇請日本發發慈悲：

本大臣回溯服官中外近五十年，現在自顧晚景無多，致軍澤民之事，恐終于此次之和局，所以極盼約章一切妥善，毫無流弊，兩國政府從此永固邦交，民生從此互相親睦，以副本大臣無窮之愿望。[[33]](#_33__Xiu_Zhan_Xie_Yi_Zhong_Bu_Ba)

然而，這番言論并沒能打動日本。日本提醒李鴻章，日本是戰勝國，清朝是戰敗國。一旦談判破裂，六七十艘日本船艦將和等待命令的軍隊一同登陸奔赴戰場，屆時北京命運也危險。伊藤要求李鴻章對日本所提出的條件做出接受與否的答復。

清朝政府提出了修改意見：縮減割讓給日本的領土范圍，將軍費賠償減少至一億兩白銀。李鴻章還建議，如果日本和清朝日后再起爭端，將請求第三國進行調解；若無法就調解人達成一致意見，美國總統將是最合適的人選。[[34]](#_34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4月10日，日本遞交了最終提案，再次要求給出接受與否的答復。他們將割讓的領土范圍縮減至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并將軍費賠償減少至兩億兩白銀。其他條款保持原樣。在再次試圖獲得讓步未果后，李鴻章接受了日本的條件。4月17日，雙方簽署了議和條約[[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陸奧評論道：“發揚我國光，增進我民福，東洋天地再開泰平盛運，皆賴我皇上之威德。”[[36]](#_36__Ji___Ma_Guan_Tiao_Yue)

4月21日，天皇就恢復日清之間的友好關系頒布敕諭。在敕諭的開頭，天皇說他堅信唯和平盛世，方能增加一國之財富；他相信維護和平是其使命，這一使命傳承自皇祖皇宗。自繼位時起，自己就把維護和平作為目標，但不幸的是，清日兩國爆發戰爭，他無力結束這場超過十個月的戰爭。他向促成戰爭勝利的所有人（尤其是軍隊）表示了感謝，他們經歷了不計其數的艱難困苦：“此雖賴朕祖宗之威靈，然非百僚臣庶之忠實勇武精誠貫天日，安能至此？”[[37]](#_37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在敕諭的結尾，天皇告誡日本國民，切莫因勝利變得桀驁不馴、無端藐視他國，從而喪失友邦之信任。他希望與清朝簽署議和條約后，兩國能恢復友好關系，睦鄰之情能勝于往昔。[[38]](#_3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此番聲明，無論是否由天皇親自撰寫，大概與他的真實感情相符。他說，事實上，（正如官方聲明宣告的那樣）戰爭取得勝利、日本在海外的威望得以提高，并非僅僅歸功于他的恩威和盛德；要是沒有國民的努力和犧牲，戰爭不會取得勝利。對于（以二十世紀西方統治者的姿態）戰勝可恨的敵人或者消除清朝對朝鮮獨立的威脅，他并沒有表現出喜悅之情。相反，他祈禱兩國能夠恢復被這場不可避免的戰爭中斷了的傳統友好關系。天皇希望日本和清朝之間的睦鄰關系能勝過往日，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么他在第一次獲悉將與清朝開戰的決定后大發雷霆。

在下關簽署議和條約后，天皇表示他打算前往京都。一直以來，他都很喜歡舊都，在廣島擁擠的空間內生活了一段時間后，也許很期待暫住在京都御所。出發時間定在4月27日。

4月23日，俄國、德國和法國公使拜訪了外務次官林董，告訴他三國政府反對將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俄國沙皇在函件中說：遼東半島歸日本所有，不僅會破壞朝鮮獨立，還會危及北京，從而妨礙遠東的永久和平。沙皇以天皇的真誠朋友的身份，力勸日本放棄遼東半島。[[39]](#_3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毋庸諱言，對于俄國的這份友情，日本并沒有照單全收。

三個歐洲強國對清朝都有領土方面的野心，也都懷疑日本想要在亞洲進行擴張。俄國是這個同盟的領袖。4月11日，俄國召開了特別會議，確定對日政策。財政部長謝爾蓋·維特伯爵說，作為戰勝國，日本有權獲得數額可觀的賠償，并且俄國同意讓清朝割讓條約規定中的臺灣給日本。但是，俄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必要時將動用軍事力量）將日本軍隊驅逐出遼東半島。[[40]](#_40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_1)他勸告道，如果日本不答應，俄國將直接采取行動。自三月底開始，有關俄國在海參崴集結海軍力量以及在敖德薩部署護航隊的消息不時傳入日本。[[41]](#_4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俄國政府邀請法國和德國加入同盟。法國做出加入這個同盟的決定，至少從表面上看讓人迷惑不解，因為到目前為止，法國對清朝的興趣完全限定在南方。在法國得知英國拒絕加入同盟后，曾有一段時間考慮是否要退出該同盟。但最后，他們決定不能反對自己的盟友俄國。作為在東方擴大勢力范圍的領軍人，英國并沒有加入這個同盟，這是因為他們認為議和條約沒有損害到他們的利益。德國之所以加入，是因為他們希望借與俄國建立更加緊密的關系來削弱法俄同盟。他們還希望，采取親清朝的行動，也許能讓他們從感激涕零的清朝人手中獲得一個軍事基地。

毋庸置疑，日本對此的普遍反應是驚慌至極。來自歐洲三大最強國的威脅，讓戰爭勝利及簽署議和條約所帶來的喜悅之情降到了冰點。4月24日，伊藤為日本列出了下列三個方案：

一、即便新增敵國也在所不顧，斷然拒絕三國的勸告。

二、召開列國會議，將遼東半島問題交由該列國會議處理。

三、完全接受三國的干預建議，將遼東半島交還清朝，以示恩惠。[[42]](#_42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對這三個選項進行斟酌的內閣成員一致否決了第一個。眼下，海軍和陸軍的精銳部隊都駐扎在清朝，日本列島的防備幾成空虛之勢。此外，經過十個月的戰爭，軍隊疲勞，軍需缺乏。日本已無力對抗俄國，更別說應付三國聯合。第三個選項勢必會表明日本氣度寬宏，但未免會被認為是畏懼歐洲，鑒于此，應當拒絕。因而，內閣私下同意采用第二個方案，然而，日本卻沒有安排任何會議。[[43]](#_4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最終，日本遵循了第三個方案，盡管該方案令人不悅。

英國和美國都保持中立。日本判斷美國對日本有好意。令日本感到驚訝的是，意大利不僅不援助日本，而且宣布毫不保留地支持三國的要求。

俄法德三國的態度各有不同。盡管三國都堅持自己的主張，但俄國和法國均禮貌客氣地提出，而德國公使則發表了一番言辭激烈的講話，大意是指責日本無視德國的好意相勸，簽署了一份要求清朝做出過多讓步的條約，德國對此當然會提出抗議。林董問道，如果日本不遵從，德國是否會以開戰相威脅。公使讓步，請求從記錄中刪除他那番激烈言辭。然而，公使的態度無疑是帶著威脅的。[[44]](#_4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4月27日，天皇離開廣島前往京都，自此以后，京都便成了帝國大本營的所在地。對于三國干涉，他沒有任何反應。很顯然，他只能接受放棄遼東半島。[[45]](#_4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日本民眾仍然不知道這三個外國列強的要求，為慶祝勝利，從廣島到京都的一路上，家家戶戶都彩旗飄揚。日本民眾向天皇乘坐的火車致敬，發自內心地高呼“萬歲”；每一個車站都人潮涌動，民眾向天皇歡呼喝彩。

皇后于前一天抵達京都，此刻，她站在建禮門的階梯上迎接天皇的圣駕。這是近幾年來天皇第一次回到京都御所，他愉快地參觀了御所內的建筑和花園。他向跟隨的侍從講述了各個場所的歷史，指出孩提時他曾玩耍的地方。他爬上位于花園里的一座小山，這座小山最初是由他的父親孝明天皇規劃設計的。天皇撿起一塊石頭，拂去上面的灰土，并贈送給隨從武官，督促他妥善保管。看到天皇流露出來的孝順之情，這名隨從武官流下了熱淚。[[46]](#_46__Mutsu_Munemitsu_Kenkenroku)

顯而易見，明治很喜歡回到京都，當政府宣布將于5月29日把帝國大本營遷回東京時，他以一些對擊敗清朝有功的重要人物尚未凱旋為由拒絕離開。但是，在最后一批戰爭英雄凱旋后，已經沒有任何理由再留在京都了。5月29日，天皇動身前往東京。

然而，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根據議和條約的條款，日本將獲得臺灣，這是和解協議的一部分；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日軍在臺灣登陸。日本派海軍大將樺山資紀（1837—1922）從清朝官員手中接管臺灣島。日本有必要盡快宣布對臺灣島的所有權。希望三國干涉還遼能再次上演的清朝，請求樺山推遲前往臺灣，但日本政府已經猜到了清朝的用意，拒絕了這一請求，稱臺灣的情況與遼東半島截然不同。5月17日，樺山離開京都，前往臺灣就職。[[47]](#_4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臺灣民眾當然不希望他們的島嶼成為日本的囊中之物。在獲悉議和條約的條款后，臺灣發生了無數暴力事件。日本預料到臺灣民眾會有所抵抗，但卻不知道需要多少士兵來進行鎮壓。政府決定派遣近衛師團，該師團由于抵達清朝的時間太晚，未參加清日戰爭。近衛師團于5月22日和23日前往臺灣。正在這個時候，日本接到報告，說清朝政府于5月20日將其文武諸官從臺灣召回，臺灣已經形同無政府狀態。[[48]](#_4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當臺灣民眾意識到不會有三國干涉來為他們爭取利益時，一群人士建立了“臺灣民主國”，由軍人唐景崧任“總統”。他們設計了一面旗幟（藍底黃虎），并向臺灣島和西方列國宣布新的“臺灣民主國”獨立。當時，島內有大約五萬名清軍，還有近五萬名非正規軍——在危急時刻拿起武器的農民。

5月29日，在能久親王的指揮下，近衛師團在基隆附近大舉登陸。6月3日，日軍占領基隆。大約兩三千“賊民”（日本人是這樣稱呼非正規軍的）發起抵抗。在第一次交戰中，日本至少殺死了兩百人。唐景崧得知戰敗的消息后，和近一千名清兵于6月6日離開臺灣島，逃往廈門。6月7日，重鎮臺北落入日軍之手。至6月25日，臺灣島北部地區已被占領，但南部地區反抗日軍的戰斗仍在持續。海軍大將樺山對臺灣民眾發起的戰斗感到憤慨，他向起義者的領袖發函一封，建議其投降，但該領袖嚴詞拒絕。[[49]](#_4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日本似乎沒有預料到會持續這么長時間。傷亡人數持續增加，7月9日，皇后向傷兵贈送了她親自制作的三千個繃帶。直到8月3日，日軍才鎮壓掉臺北和新竹交界區域的非正規軍，估計臺灣南部地區還有兩萬名起義者。10月21日，日軍的先遣部隊攻入臺南——起義者的最后一個據點。至此，臺灣全島業已全部被占領。[[50]](#_5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3)

本次戰爭代價巨大。雖然只有396名士兵在戰斗中喪生，但有10236名士兵死于熱帶疾病。[[51]](#_5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死于瘧疾的人當中就有能久親王。[[52]](#_52__Ru_Xu_Le_Jie_Qing_Ri_Zhan_Z)他病故后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1月4日才發喪。在此期間，天皇對他在戰場中的英勇行為大加贊賞，向他授予了大勛位菊花章和金鴟勛章，并晉升他為陸軍大將，讓人覺得他好像還在人世一樣。在官方宣布他的死訊后，天皇命令為這位昔日的叛逆者舉行國葬，并發表悼詞，極力稱贊他將畢生奉獻給了日本軍事。[[53]](#_53__Zai_Zhi_Ye_Sheng_Ya_De_Bu_T)

戰爭的結果，就是日本奪得了臺灣島。遼東半島的喪失讓日本的愛國人士義憤填膺，他們的怨恨之情仍在持續，不過，如今的日本已經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像一個“帝國”了。在每一個宣言中，天皇都被贊譽為戰爭獲勝的源頭；毫無疑問，大多數日本民眾也是這樣認為的。同樣，在海外，天皇也獲得了從未有過的稱贊。1894年12月，《紐約太陽報》發表的一篇社論是這樣開頭的：

在今年年初，人們對天皇仍知之甚少；而如今，在年底，他已經在全世界的統治者中最受矚目。他是一位異常開明的統治者，了解實際情況的人對此都毫不懷疑。他完成了維新大業，結束了封建制度。之后，他頒布憲法，召開議會。在采納歐洲文明的同時，他也保持著自己國家的傳統風俗。他整頓海軍、陸軍，使日本一躍成為東洋最強大的國家。他鼓勵發展工業。

文章結尾寫道，在世界的所有歷史時期，還從未出現過這樣一位君主。[[54]](#_54__Dao_Ci_Zheng_Wen_Qing_Can_Y)

1895年4月，另一家美國報紙進行了如下報道：

從芝加哥博覽會（1892—1893年舉行）開始，外國人逐漸對日本文化有了一些了解，但是，這也僅限于日本出產的精美陶瓷、茶葉和絲綢。然而，自去年清日戰爭爆發，處處都可以感受得到對日本的尊重，除了“日本這樣”或“日本那樣”外，人們沒有其他的談資……最有趣的是，對日本女性的服飾掀起了一股狂熱之潮。很多美國女人身穿日本服飾參加宴會，即使非常不合身；她們對日本取得戰爭勝利給予大肆贊揚，聽起來就像是在夸耀自己的國家一樣。[[55]](#_5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

岡倉天心諷刺道，當日本沉浸于優雅和平的技藝時，外國人一貫視日本為蠻夷之邦；然而，當日本在戰場上贏得勝利后，外國人卻改口稱日本是文明國家。[[56]](#_56__Zhuo_Zhu_The_Sino_Japanese)

1. [[1]](#_1_46) Trumbull White, The War in the East, p. 641. 轉引自Shumpei Okamoto, "aid-F4C", p. 44。

1. [[2]](#_2_46)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30—732頁。如需了解敕諭的全文，請參閱Mutsu Munemitsu, "aid-F5I",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74。

1. [[3]](#_3_46) Okakura Kakuzo, The Book of Tea, p. 7.

1. [[4]](#_4_46)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28.

1. [[5]](#_5_46)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p. 128-129。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0—601頁。

1. [[6]](#_6_46) 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145頁。

1. [[7]](#_7_46) 詔書的正文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1頁。另請參閱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146頁。12月8日，山縣收到詔書，并于同日向熾仁親王發送電報，告知其被召回，將把第一軍的指揮權移交給陸軍大將野津，并將于12月9日動身前往日本（《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2頁）。

1. [[8]](#_8_46) 這些反攻發生于1月17日、1月22日、2月16日、2月21日和2月27日（《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42—643頁、第645—646頁、第679頁、第687頁、第695頁）。

1. [[9]](#_9_46) 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146—147頁。

1. [[10]](#_10_46) 關于描繪日軍在冰天雪地中的浮世繪，丹波恒夫的《錦絵に見る明治天皇と明治時代》第160—165頁轉載了一些。

1. [[11]](#_11_46)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4頁。

1. [[12]](#_12_46)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17頁。

1. [[13]](#_13_46)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52-157. 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58頁。

1. [[14]](#_14_46) 威海衛是一個比旅順口要大得多的軍港，其防御堅固。在日軍發起攻擊時，有8艘軍艦和較小的船艦停靠在此（《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37頁）。

1. [[15]](#_15_45) 如需了解攻擊的詳細情況，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65—666頁。白井說，有一艘魚雷艇試圖在1月30日發動襲擊，但那天溫度達到零下30度（《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161—162頁）。波浪拍打著結了冰的甲板，魚雷艇的發射管口結成冰柱，導致無法發起攻擊。

1. [[16]](#_16_45) 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162頁。

1. [[17]](#_17_45) 正文請參閱三宅雪嶺，《同時代史》第三卷，第44頁；譯文請參閱Shumpei Okamoto,Impressions of the Front, p. 44。

1. [[18]](#_18_4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84頁。

1. [[19]](#_19_44) 12月12日，天皇在蹴鞠時被侍從踢的球擊中，這位侍從被自己的行為給嚇住了。但是，天皇微笑著說，“海軍發射了一枚魚雷”，并沒有責怪這位可憐的侍從（《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9頁）。

1. [[20]](#_20_43) 位于神戶市垂水區的西南部。——譯注

1. [[21]](#_21_43) 金鴟勛章于1890年2月11日（紀元節）制定，分為7個等級，是戰前日本對大日本帝國陸軍、海軍的軍人、軍屬所授予的唯一勛章。“金鴟”的名稱來自于日本的神話傳說。據稱神武天皇在東征時，神武天皇的弓上停了一只發出金色光輝的鴟，迷惑了長髓彥軍。前面提到的原田重吉獲得的是功七級，熾仁親王獲得的是功二級。——譯注

1. [[22]](#_22_42) 神道教儀式中使用的植物，日本稱為“榊”。——編注

1. [[23]](#_23_4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53頁。

1. [[24]](#_24_4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48頁。

1. [[25]](#_25_40) 例如，據說由于缺乏合適的女性侍從，天皇只能自己修剪手指甲和腳指甲。

1. [[26]](#_26_4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21頁。

1. [[27]](#_27_39) 古稱“赤間關”，赤間關的“間”字在日語里發音與“馬”字相同，因此也寫作“赤馬關”。中國一直以來稱為“馬關”。——譯注

1. [[28]](#_28_36)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17頁。

1. [[29]](#_29_36) 當襲擊者開槍時，李鴻章正坐在轎子里。子彈擦傷了他眼睛下部的右臉頰，只是輕傷。如需了解日本媒體報道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石田文四郎，《新聞記録集成明治・大正・昭和大事件史》，第225—228頁。

1. [[30]](#_30_34)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75.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38—739頁。

1. [[31]](#_31_32)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76.

1. [[32]](#_32_31)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78。

1. [[33]](#_33_30) 休戰協議中不包括臺灣或澎湖列島。3月24日到3月26日期間，日軍占領了澎湖列島（《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33頁）。

1. [[34]](#_34_30)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86-187. 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51—753頁。

1. [[35]](#_35_2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56頁。

1. [[36]](#_36_26) 即《馬關條約》。日本稱《下關條約》或《日清議和條約》。——譯注

1. [[37]](#_37_22)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99.

1. [[38]](#_38_1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73頁。

1. [[39]](#_39_1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74頁。

1. [[40]](#_40_17)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03.德國和法國政府提出了大同小異的照會。亦見《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76頁；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183頁。

1. [[41]](#_41_1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78頁。另請參閱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182頁。

1. [[42]](#_42_17)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11；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183頁。

1. [[43]](#_43_1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80—781頁。另請參閱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07。

1. [[44]](#_44_1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81頁。另請參閱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07。

1. [[45]](#_45_1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80頁。

1. [[46]](#_46_12) Mutsu Munemitsu,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10.

1. [[47]](#_47_1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06頁。

1. [[48]](#_48_1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17頁。

1. [[49]](#_49_1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22頁。

1. [[50]](#_50_1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49頁。

1. [[51]](#_51_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20頁。

1. [[52]](#_52_5) 如需了解清日戰爭期間的傷亡人員表，請參閱藤村道生，《日清戦爭》，第183頁。在亞洲大陸的戰役，日本總共有2647人喪生；在臺灣戰役中，共有10841人喪生。

1. [[53]](#_53_5) 在職業生涯的不同時期，他的宮號有“滿宮”、“公現”、“輪王寺宮”和“北白川宮”。（見本書第十七章）10月28日，他在臺南病逝（《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23—24頁）。

1. [[54]](#_54_5) 悼詞正文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32頁。

1. [[55]](#_55_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22—623頁。之后，這篇文章將明治天皇和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英國、法國和美國的統治者進行比較，認為天皇更勝一籌。它還將天皇與羅馬的奧古斯都、英格蘭的阿佛列大帝、拿破侖和威廉一世等歷史名人進行比較，認為這些名人也都遠遠不及。

1. [[56]](#_56_5) 拙著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94.

# 第四十七章 暗殺閔妃



與清朝開戰，名義上是為了維護朝鮮獨立。1895年5月10日，就在與清朝簽訂議和條約后不久，天皇在敕諭中聲言，“朕恒眷平和，至竟于清國交兵，無非為永遠鞏固東洋平和之目的”。5月30日，朝鮮國王高宗致函明治天皇，感謝日本承認朝鮮獨立。[[1]](#_1__Yi_Ban_Qing_Kuang_Xia__Min_F)

如果日本認為，打贏一場為了使清朝承認朝鮮獨立的戰爭，就能讓朝鮮感激涕零，并加強其與日本的關系，那么他們很快就會從這種想法中幡然醒悟過來。朝鮮宮廷的親俄派勢力強大，其中包括在1884年起義失敗后流亡日本十年的內務大臣樸泳孝。1894年10月20日，由于駐朝公使井上馨的調解，樸泳孝被準許回到朝鮮，隨即得到了高宗的赦免。[[2]](#_2___Official_Report_on_Matters)毫無疑問，井上希望此舉能讓樸泳孝成為日本的堅定盟友，然而，（和金玉均一樣）在日期間樸泳孝沒有得到優待，大概阻礙了他對日本產生感激之情。[[3]](#_3__Kibaik_Lee__A_New_History_of)

井上暫時返回日本，并在6月21日覲見了天皇。他想勸說政府改變對朝政策，不然朝鮮可能會落入俄國的控制之下。7月初，井上提交了一份關于提供貸款、在朝鮮修建鐵路、架設電報線路、保衛漢城以及限制日本人去朝鮮的意見書。其中指出，無論是精力上還是財力上，近期的戰爭都讓朝鮮精疲力竭，因此他提議從清朝將向日本支付的賠款中拿出五百萬到六百萬日元的資金給朝鮮，其中的三百萬日元借給朝鮮政府；剩余資金中的一半贈送給朝鮮王室，另一半用于開展政府支持的產業。[[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井上提議，將在漢城至仁川之間鋪設鐵路，并把日軍架設的電報線路移交給朝鮮，但仍由日本維護。他認為有必要駐扎兩個大隊的日軍保衛王宮，但必須要由朝鮮國王明確提出請求。最后，他警告要特別注意近期前往朝鮮的某些日本人。井上稱這些人有著極其陰暗的背景，并且其行動使朝鮮人產生反日情緒。因此，必須密切注視這些人的一舉一動，讓他們處于掌控之中。[[5]](#_5__Woonsang_Choi_The_Fall_of_th)

井上馨似乎把朝鮮的利益放在心上。即使當代的韓國學者常常直截了當地譴責日本在朝鮮的行為，但卻對井上做出的努力大加贊賞。[[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鹿鳴館的大美人、井上的妻子武子甚至與日本的公敵——閔妃——交好。[[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確實，如果井上繼續擔任駐朝公使，那一年的悲劇事件可能就不會發生了。

井上曾計劃按照日本政府的開化路線來對朝鮮政府進行改革。他的接替人三浦梧樓認為，井上的計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朝鮮不明白進行財務和其他方面改革的緊迫性。例如，日本稅務專家堅持認為有必要建立預算，并且應將開支控制在預算的限度之內，但這激怒了高宗。他雖然缺乏財力，但習慣了隨心所欲地花錢。在聽取了關于財政償付能力的重要性的會議后，他點頭表示答應，但沒過多久就又回到了習以為常的奢侈浪費之中。[[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三國成功迫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讓朝鮮清楚地意識到日本并不像他們自己所宣稱的那樣強大。此時，閔妃與俄國公使卡爾·維貝（Carl Waeber）及其妻子交好。閔妃的大獻殷勤和尋求庇護讓維貝十分高興，他希望借此清除日本在朝鮮王宮的影響力。維貝通過他人向閔妃灌輸日本與閔妃、閔氏家族歷來關系糟糕的觀念。盡管人們說朝鮮和日本是鄰邦，但事實上，這兩個國家之間隔著一片汪洋大海。朝鮮和日本的距離絕不像與接壤的俄國那樣近。即使從地理位置的角度來看，很明顯，朝鮮和俄國才應該是朋友。此外，俄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可從俄國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一事上得到證實。俄國不會侵犯朝鮮的獨立，也不會干涉朝鮮內政。對朝鮮來說，最穩妥的策略就是依靠俄國的保護。同為君主專制國家的俄國，毫無疑問會保護朝鮮君主的權利。[[9]](#_9__Li_Ru__Cui_Wen_Heng_Cong_Yi)

7月6日，行動向來聽閔妃指揮的朝鮮國王突然指控樸泳孝謀反，剝奪了他的官職，并下令逮捕他。[[10]](#_10__San_Pu_Wu_Lou____Guan_Shu_J)樸泳孝設法逃走，但此后再沒有人能夠制約閔妃了。在這個時候，井上返回了朝鮮。他感覺到氣氛變了，決定自己當前的主要任務不再是鼓勵朝鮮進行改革，而是取悅國王和閔妃。在謁見了朝鮮國王后，他奏報說，日本政府將向國王贈送三百萬日元。他嘗試通過結交閔妃的族人來逢迎國王。此外，他還與之前的盟友——開化黨——保持距離。[[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盡管井上做了這番努力，可他很快便意識到，即使是厚禮也無法打動朝鮮王宮。宮中依舊彌漫著濃厚的反日親俄氛圍。井上請求辭職。

7月19日，三浦梧樓被任命為駐朝特命全權公使。[[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根據回憶，他非常不愿意接受這一職務。他抗議說自己對外交不在行，沒有能力勝任此類事情。過去政府曾提議讓他擔任駐法公使，但被他拒絕。如今，他又多次拒絕目前的委任，但日本政府施壓，最后三浦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即使在接受后，他仍然不知道政府要他做什么。他需要弄清楚政府的意圖，是要讓朝鮮獨立，或者是要吞并朝鮮，還是打算與俄國共同控制朝鮮？三浦請求政府明確告知支持哪一項政策。[[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然而，他所接到的只是山縣有朋下達的要他立刻赴朝上任的指令。在無任何指導的情況下，三浦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按照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行事。

9月3日，三浦向高宗遞交了國書。盡管他自稱不知道日本政府希望他做什么，但這位軍人所做出的選擇表明，日本領導者希望他對日本的敵人采取行動——或許是非常強硬的行動。井上的友好扶植政策無法取信于朝鮮王宮，他親自推舉三浦為接替人。臥病在床的陸奧宗光表示反對，但長州派促成了這一任命。

當三浦前往朝鮮時，有多名顧問官陪同他赴朝，其中包括岡本柳之助。身為極端主義者的岡本深入參與了暗殺閔妃的密謀事件，但他也曾經是進步分子金玉均的朋友。當得知金玉均在上海遭到暗殺時，他立刻從日本奔赴上海，希望取回金玉均的遺體，以防敵人（無論來自朝鮮、日本還是清朝）對遺體進行凌辱。[[14]](#_14__Lai_Zi_Chang_Zhou_Fan_De_Sa)盡管岡本到達得太晚而沒有完成這一目的，但他卻對這位朝鮮朋友十分忠誠。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政治制度和朝鮮需要進步這一信念的鼓舞，他參與了暗殺閔妃的密謀。

到達朝鮮后不久，三浦拜訪了朝鮮王官。他在自我介紹中將自己描述成一位普通軍人，并不擅長外交辭令，由此為自己塑造了非常好的形象。他說，若無國王召見，他將留在公使館，抄寫佛經[[15]](#_15__San_Pu_Wu_Lou____Guan_Shu_J)，坐賞朝鮮的自然美景。他希望親手抄寫一部觀音菩薩經獻給閔妃。[[16]](#_16__Gang_Ben_Liu_Zhi_Zhu____Fen)

正如他所說的那樣，三浦很少離開公使館。他將大量的時間用于誦讀佛經，因此也被稱為“讀經公使”。[[17]](#_17__Shi_Shi_Shang__San_Pu_Shi_Y)但私下里，他卻在謀劃暗殺閔妃一事。目前尚不清楚三浦在離開日本前獲悉了關于閔妃的哪些消息，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在他抵達漢城后，公使館的成員和日本社會團體的領導者告訴他，閔妃是強硬的反日派，堅決反對朝鮮進步。于是，根據軍人的簡單思維方式（并且在日本沒有下達反對指示的情況下），三浦顯然認為挽救局面的唯一手段就是除去閔妃這個阻礙朝鮮和日本交好的最大障礙。

最初，三浦計劃在1895年11月執行暗殺，但在獲悉朝鮮國王（大概是按照閔妃的提議）打算解散訓練隊后，暗殺日期被提前。訓練隊是一支由八百多名裝備精良的士兵組成的隊伍，由日本人負責訓練。[[18]](#_18__Jiao_Tian_Fang_Zi____Min_Fe_1)在三浦的計劃中，親日兵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必須在解散這支隊伍前實施暗殺。[[19]](#_19__Jiao_Tian_Fang_Zi____Min_Fe)

三浦策劃了一個方案，可以讓日本把謀殺閔妃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對外宣稱閔妃是在興宣大院君發動政變期間被殺。日本軍隊（按照與清朝簽訂的議和條約駐扎在王宮附近）將協助政變，然而，謀殺閔妃的任務將交由身在漢城的不守規矩的日本浪人來完成。朝鮮方面只有訓練隊參與。除了一小部分日本人外，這一方案對所有人保密。[[20]](#_20__Pu_Zong_Gen____Ri_Qing_Zhan)

獲得興宣大院君的同意是必不可少的，但即便如此，三浦也沒有向興宣大院君透露暗殺閔妃的計劃。10月5日，岡本柳之助（按三浦的要求）以想要在返日前向興宣大院君表達敬意為名，拜訪了興宣大院君。其間，他提到即將舉事，并詢問興宣大院君是否同意日本公使館擬好的四項“承諾”。第一項是承諾今后的活動僅限于宮中事務，不得干涉政治。第二項和第三項是關于將來閣僚的任命，第四項是送大院君的孫子赴日留學三年。[[21]](#_21__Ling_Yi_Zhi_Dui_Wu_Wu_Bai_R)

興宣大院君對這些承諾有何反應，我們尚不得知。在廣島對參與謀殺閔妃的人士進行審判時，其中一位供稱興宣大院君欣然同意了所有四項條件，并且一字不改；[[22]](#_22__Ji_Shi_Shi_Xun_Lian_Dui_Di)然而，岡本回憶的卻恰恰相反：剛開始興宣大院君說自己年老力衰，無力參與政壇新事，請求讓他順其自然地死亡。岡本花了很大一番力氣，才說服大院君答應。[[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第二天，岡本動身前往仁川。得知岡本離去，閔妃打消了心頭的疑慮。[[24]](#_24__Xiao_Zao_Chuan_Xiu_Xiong)

日文報紙《漢城新報》社長安達謙藏主要負責招募民間人士。據說，在安達抵達朝鮮后不久，三浦便對安達說，“我們肯定要去抓狐貍[[25]](#_25__Pu_Zong_Gen____Ri_Qing_Zhan)，你手下有多少壯士？”安達猜測“狐貍”可能是指閔妃，回答說手下有人，但都是他從日本帶過來的溫良恭謹的新聞人士。如果三浦需要身強力壯的年輕人，他將向熊本發送密電，毫無困難地募集到足夠多的年輕人。[[26]](#_26__Jiao_Tian_Fang_Zi____Min_Fe)三浦說沒有這個必要，并警告安達對這次談話絕對保密。安達開始在當地召集志愿者，但并沒有告訴他們這次行動的目的。10月7日下午，三浦派人請來安達，告訴他情況有變，必須在當晚進行突襲。安達將謀殺閔妃的計劃告訴其他人，眾人毫不猶豫地同意了。

10月8日凌晨時分，一群日本民間人士和警察（其中一些人穿著朝鮮制服）[[27]](#_27__Pu_Yong_Xiao_Zai_1895Nian_D)闖入興宣大院君的宅邸。從仁川秘密返回的岡本柳之助便是其中一員。一些人回憶說，興宣大院君滿面喜色地歡迎日本人，并表示迫不及待地希望前往王宮；[[28]](#_28__An_Da_Qian_Cang____An_Da_Qi)然而，事實上，當日本人到達時，興宣大院君正在酣睡之中，他沒有料到日本人會在當晚造訪。即使在被喚醒后，他仍然神思恍惚，慢吞吞地拖延著起身離開的時間。一些浪人擔心再這樣拖延下去，可能會使在天亮前暗殺閔妃的計劃泡湯，于是，他們將興宣大院君強行拖出來，并塞進轎子里。在前往王宮的路上，興宣大院君停下轎子，要岡本承諾不會傷及國王和王世子。[[29]](#_29__Zhi_Fu_He_Mao_Zi_Cong_Shou)事實上，興宣大院君是否意識到了身邊的人要前去謀殺閔妃這一點都尚不清楚。

當興宣大院君的轎子抵達王宮時，天已漸漸亮了起來。六十多名浪人和日本士兵（一些身穿便服）參加了這次行動。起事者翻越宮墻，打開宮門。在宮內，他們遭到了侍衛隊士兵七零八散的射擊，但不久后，侍衛隊便紛紛東奔西逃。在朝鮮當局發布的《開國五百零四年八月二十日事變報告書》中，描述了浪人闖入國王和閔妃宮室的情形：

日本人將校率三十余壯士，拔出刺刀，沖入殿堂。他們搜索密室，不斷抓住宮女，揪發毆打以詢問閔妃所在。多人目睹此景，包括與陛下護衛有關的外國人士巴津（Sabatin），當時他在宮苑短暫停留。他看見日本士官指揮日本軍隊，目睹了他們對朝鮮宮女犯下的暴行，日本兵士還不時向他打聽閔妃所在，并威脅道，若不說出閔妃的下落，他將會有生命危險……

在尋搜各房后，浪人發現閔妃正試圖藏身于廂房，遂一把抓住，揮刀砍倒。

雖然身受重傷，但不能確定閔妃此時是否真正斃命。然而，浪人用絹布（作為被單）包裹尸體，置于木板之上，移出宮殿，放入宮苑。不久，在日本浪人的指揮下，尸體被移至附近鹿園的樹林中。而后，浪人在尸體上澆上煤油，周圍堆起柴把，點燃大火……

由此，受人尊崇和敬仰的朝鮮閔妃、王世子殿下的生母被殘忍殺害。為銷毀罪證，她的尸體被付之一炬。[[30]](#_30__Pu_Zong_Gen____Ri_Qing_Zhan)

1. [[1]](#_1_47) 一般情況下，閔妃從不出現在外國男人的面前，但她接見外國女人。武子比閔妃年長一歲，是唯一一位見過閔妃的日本女人。著名旅人伊薩貝拉·伯德（Isabella L. Bird）也見過閔妃，她是這樣描述的：“王后陛下當時年屆四十，容貌美麗，身材苗條，頭發烏黑亮澤，皮膚非常白皙，她的臉色因擦了珍珠粉而更顯蒼白。她的雙眸是冰冷敏銳的，大體上給人一種聰穎、睿智的印象”（"aid-FIM", 2, p. 39）。另請參閱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278—279頁。 根據葛生能久的敘述，當井上謁見朝鮮高宗時，可以聽到從簾后傳來閔妃對國王進行指點的聲音（《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卷，第521頁。）。漸漸的，她露出半邊臉，最后她完全拉開簾子，和國王及井上一同進行商議。據我所知，此處描述不見其他材料中。

1. [[2]](#_2_47) “Official Report on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Events of October 8th,1895, and the Death of the Queen” （The Korean Repository Ⅲ, 1896）, p. 133.關于國王譴責閔妃的全文以及簽署該詔敕的官員姓名，請參閱Isabella L. Bird，Korea and Her Neighbours, 2, p. 69-70。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43頁。10月10日，國王頒布了詔敕。同時，他仍不知道閔妃已經被殺害（直到12月5日才下令為閔妃舉行哀悼）。當國王第一次見到詔敕并被告知必須簽署時，他說他寧愿雙手被砍，也不愿簽署（Isabella L. Bird，"aid-FMK", 2, p. 69；白井久也，《明治國家と日清戦爭》，第215頁）。最終，迫于三浦的壓力，國王屈服了，三浦承諾用撤離宮殿周圍的日軍作為交換（樸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第250頁）。國王頒布詔敕一事被告知各個公使館。表現出極大震驚和煩擾的三浦回答說，出于尊重王室和保護人民福祉，閔妃的行為應受到這樣的處置。美國代表埃倫（Allen）博士用一句話回答道，“我不承認這個詔敕是出自國王陛下之手”（“Official Report on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Events of October 8th,1895, and the Death of the Queen”, p. 135）。 第二天達成一項妥協：考慮到閔妃是王世子的生母，宣布將其頭銜從“庶人”升為“嬪”（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333頁）。1897年11月22日，朝鮮為閔妃進行了盛大的國葬，并追封謚號。現在，人們只記得她是一個不幸的受害者（兒島襄，《大山巌》第四卷，第266頁）。

1. [[3]](#_3_47) Kibaik Lee, A New History of Korea, trans. Edward W. Wagner, p. 301.

1. [[4]](#_4_4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07頁、第829頁。

1. [[5]](#_5_47) 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26-27.

1. [[6]](#_6_4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46頁。

1. [[7]](#_7_4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他還提出了一個可供選擇的方案，內容可能不太受朝鮮王室和政府的歡迎，但會減輕普通百姓的負擔。

1. [[8]](#_8_4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51頁。約瑟夫·朗福德（Joseph H. Longford）寫道，“日本最差勁的無賴和惡霸——日本出現了眾多此類無賴和惡霸——涌入這個不幸的國家。他們搶劫掠奪、威脅恫嚇，讓當地人驚恐不已，歐洲人目睹了這一現象，充滿了憤怒和恐懼；這些行為還讓當地人一提到日本，由來已久的仇恨之情便增加了十倍”（The Evolution of New Japan , p. 118）。

1. [[9]](#_9_47) 例如，崔文衡從以下角度將井上與其接替人三浦梧樓進行比較，“井上是一個極有才智之人，他為朝鮮改革做出了諸多貢獻，然而和井上伯爵不同，三浦在建設能力和管理能力方面都頗為欠缺”（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27）。

1. [[10]](#_10_47) 三浦梧樓，《観樹將軍回顧録》，第269頁。

1. [[11]](#_11_4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66頁。據說維貝通過查爾斯·勒讓德（Charles W. LeGendre）向朝鮮王宮傳了這些話。勒讓德之前受聘于日本外務省，1890年被朝鮮政府聘用（《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86頁；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180頁）。

1. [[12]](#_12_4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66頁。鑒于樸泳孝持親俄的觀點，這一行動讓人困惑不解；但是，長久以來，樸泳孝一直提倡對朝鮮進行改革，這也讓人們認為他實際上是親日派。在逃離漢城后，樸泳孝再次在日本尋求庇護（第891頁）。

1. [[13]](#_13_4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67頁。開化黨也叫進步黨。

1. [[14]](#_14_47) 來自長州藩的三浦得到了三名長州派成員（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井上馨）的舉薦。在這種支持下，他的委任幾乎不可能失敗。

1. [[15]](#_15_46) 三浦梧樓，《観樹將軍回顧録》，第266—267頁。

1. [[16]](#_16_46) 岡本柳之助，《風雲回顧録》，第222—223頁。

1. [[17]](#_17_46) 事實上，三浦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不久前，他曾呼吁調解佛教曹洞宗派的兩個分支之間的糾紛（三浦梧樓，《観樹將軍回顧録》，第245—265頁）。

1. [[18]](#_18_45)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283頁；兒島襄，《大山巌》第四卷，第237頁。

1. [[19]](#_19_45)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284頁；兒島襄，《大山巌》第四卷，第238頁。葛生說，三浦被稱為“念佛公使”，但是，作為一名禪宗信徒，三浦大概不會念佛（《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卷,第517頁）。

1. [[20]](#_20_44) 樸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第241頁。

1. [[21]](#_21_44) 另一支隊伍五百人，稱為“侍衛隊”，成立于1895年6月。該隊伍由美國軍官威廉·戴伊負責進行訓練，旨在保衛王宮，但大多數成員都沒有武器。這支隊伍是反日派（樸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第241頁）。

1. [[22]](#_22_43) 即使是訓練隊第二大隊的指揮官（其為朝鮮人）都不知道該方案。10月7日，他奔至日本公使館，告知三浦，國王私下命令解散訓練隊。他抵達的時候，三浦和另外兩名人員剛剛草擬完成最終暗殺方案。本應在這個時刻自然而然地向這名指揮官告知第二天的計劃，但他卻被領進一間房，并且沒有被告知任何情況。很顯然，他們覺得即使是親日的朝鮮人也不能保守秘密（樸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第235頁）。

1. [[23]](#_23_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09頁。另請參閱小早川秀雄，《閔后暗殺》，第318頁。另一名拜訪興宣大院君的日本人是領事官侯補堀口九萬一，他偽裝成日本游客，并通過用毛筆書寫中國文言文的方式與興宣大院君進行交談（堀口九萬一，《外交と文蕓》，第118—131頁）。興宣大院君用香檳和哈瓦那雪茄款待了堀口，但是，這里的感謝，可能是大院君覺得如果有三浦的協助，可以恢復自己原來的地位（第130頁）。

1. [[24]](#_24_41) 小早川秀雄，《閔后暗殺》，第318頁亦有這樣的描述。葛生持相同的意見，見《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第一卷，第523頁。

1. [[25]](#_25_41) 樸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第233頁。樸宗根認為，興宣大院君一字不改地接受這四項承諾是不可能的。在暗殺后，他的行為表明他一點也不愿意向政治權力屈服。從興宣大院君的照片來看，他的確是一位年紀很大的老者，但在暗殺閔妃前不久見過興宣大院君的堀口寫道，他的面色年輕，眼神敏銳，看起來精神抖擻。堀口認為，興宣大院君五十歲出頭，但看起來更加年輕；事實上，大院君已經七十多歲了（《外交と文蕓》，第119頁）。

1. [[26]](#_26_41)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300頁。

1. [[27]](#_27_40) 樸泳孝在1895年對三浦梧樓說“閔妃是朝鮮的大狐貍，萬事都是障礙”，而后，三浦梧樓便給謀殺閔妃的計劃取名為“狩狐”。——譯注

1. [[28]](#_28_37) 安達謙藏，《安達謙藏自敘伝》，第57頁。安達是熊本縣（他的籍貫地）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熊本的惡棍遠近聞名。三浦用“壯士”來稱呼這些惡棍，但安達在敘述中將他們改稱為“年輕人”。安達沒有記錄這次談話的日期，不過大概發生在10月初。

1. [[29]](#_29_37) 制服和帽子從守候在興宣大院君宅邸的朝鮮巡檢的身上奪來（樸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第237頁）。一些浪人身穿日本服裝，另一些人穿著西式服裝。一些在肩上扛著大刀，一些在腰間掛著日本刀，另一些則佩戴著手槍（小早川秀雄，《閔后暗殺》，第330頁）。

1. [[30]](#_30_35) 樸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第237頁。當興宣大院君被從睡夢中叫醒時，小早川當時在現場，他說興宣大院君欣然接受了提議，并陪同日本人前往王宮。（《閔后暗殺》，第333頁）

1. [[31]](#_31_33) 小早川秀雄，《閔后暗殺》，第337頁。

1. [[32]](#_32_32) “Official Report on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Events of October 8th,1895, and the Death of the Queen”（《開國五百零四年八月二十日事變報告書》）（The Korean Repository Ⅲ , 1896）, p. 126.

1. [[33]](#_33_31) 小早川秀雄，《閔后暗殺》，第352頁。

1. [[34]](#_34_31)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321頁。崔文衡進行了稍有不同的描述：“在砍倒閔妃后，岡本讓三名宮女對垂死掙扎的閔妃進行指認，然后把這三名宮女全都殺害，這是為了不留證據以及確認自己的杰作”（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34）。

1. [[35]](#_35_28) 樸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第246頁。 當然，XX就是閔妃。一些人認為，盡管暗殺是日本士官所為，但日本當局卻把責任推到浪人的身上。

1. [[36]](#_36_27) 樸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第247頁。

1. [[37]](#_37_23) 但是，曾在1894到1897年間訪問過朝鮮四次的伊薩貝拉·伯德卻對閔妃給予了高度贊賞。她多次獲準覲見國王和閔妃。她描述道，國王極其平庸，但可以感覺出閔妃對國王有著極大的影響力。伯德女士也對閔妃的敵人——興宣大院君——印象深刻，盡管她提到，她并不認可1866年興宣大院君下令殺害2000名朝鮮天主教徒的行為（Isabella L. Bird，Korea and Her Neighbours , 2, p. 39—49）。

1. [[38]](#_38_20) 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30.

1. [[39]](#_39_19)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159頁。關于這件事有一個故事，說當一名日本士官注意到將軍戴伊時，他讓領事官候補堀口九萬一命令外國人離開。堀口用法語向戴伊傳話，但這名將軍不懂法語。另一個人用英語重復了這番話，但將軍回答道，“我是美國人，我不聽命于日本人”（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320頁）。不過，安達謙藏寫的是，這個平常有些傲慢的戴伊感到非常害怕，他脫下帽子，鞠了一個躬，臉上流露出逢迎討好的表情。安達覺得這個變化“尤其可笑”（《安達謙藏自敘伝》，第61頁）。1995年，有報道說發現了亞歷山大·士巴津保留的日記。盡管士巴津沒有親眼看到閔妃被殺害，但他目睹了身穿便衣的日本人拽著宮女們的頭發，將她們從閔妃的宮室內拖出來，這與實際殺害閔妃的地方只有幾步之遙。這個發現是由俄羅斯科學院的教授金·萊克霍（Kim Rekho）得出（《朝日新聞》，1995年6月20日，第29頁）。

1. [[40]](#_40_18) 三浦梧樓，《観樹將軍回顧録》，第282—283頁。

1. [[41]](#_41_18) 角田房子在《閔妃暗殺》的扉頁轉載了這篇文章的翻拍版。

1. [[42]](#_42_18) 兒島襄，《大山巌》第四卷，第261頁。兒島對暗殺閔妃的描述最為詳細，但不幸的是，他沒有給出來源（第250—283頁）。

1. [[43]](#_43_1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11頁。兒島給出的答復很簡單，“昨夜宮中舉事，閔妃下落不明”（《大山巌》第四卷，第263頁）。

1. [[44]](#_44_14) 兒島襄，《大山巌》第四卷，第263頁。

1. [[45]](#_45_1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14頁。

1. [[46]](#_46_1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17頁。

1. [[47]](#_47_12) 11月5日，井上謁見朝鮮國王，傳達天皇對這一事件的深切關注，并進獻了天皇和皇后贈送的禮物（《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30頁）。11月15日，在井上返回日本之前，井上（和小村）再次謁見了朝鮮國王。國王對井上不能繼續留在朝鮮表示遺憾，在他們起身離開時，國王與井上握手（第935頁）。

1. [[48]](#_48_1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21頁。

1. [[49]](#_49_1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43頁。

1. [[50]](#_50_12) 樸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第249頁。

1. [[51]](#_51_9)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334頁。另請參閱Isabella L. Bird，Korea and Her Neighbours , 2, p. 73。國外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1898年9月21日，國王和王世子在用餐時被下毒（《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97頁）。

1. [[52]](#_52_6) 樸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第260頁。

1. [[53]](#_53_6) 不過，他更有名的稱呼是“《佳人奇遇》的作者”。《佳人奇遇》是一部在1890年代享有盛譽的小說（拙著Dawn to the West, 1, p. 82-86）。

1. [[54]](#_54_6) 樸宗根，《日清戦爭と朝鮮》，第260—261頁。樸永坤引述了安達謙藏的話，說是日本公使館書記杉村浚提供的資金（每人200日元）。這明顯表明這些錢款來自于三浦，而非興宣大院君。

1. [[55]](#_55_6) 兒島襄，《大山巌》第四卷，第271—274頁。兒島襄對10月17日在漢城舉行的戶外酒會進行了生動描繪。當其中一名浪人山田烈盛表明，他們可能會被指控犯有蓄意謀殺罪或共謀罪時，他的話引來一串喧鬧的笑聲。另一名浪人回答道：“我們按照三浦公使的命令行事，代表的可是日本帝國。我們只是對興宣大院君的信賴做出了回應。我們為國家而戰，與蓄意謀殺或共謀毫無關系。”

1. [[56]](#_56_6) 三浦梧樓，《観樹將軍回顧録》，第286頁。

1. [[57]](#_57_3) “Official Report on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Events of October 8th,1895, and the Death of the Queen”, p. 123.

1. [[58]](#_58_3) “Official Report on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Events of October 8th,1895, and the Death of the Queen”, 第141頁。《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0—21頁在重大細節方面與這份報告書有出入。例如，其寫道，親日內閣的總理大臣（金弘集）和農商工部大臣（鄭秉夏）被逮捕，并被用劍刺死。兒島說，當這兩人乘著轎子去王宮時，他們被一群暴徒包圍，暴徒殺死了他們，并讓他們暴尸街頭。兒島還說，大約有50名俄國警察于深夜偷偷潛入王宮，護送國王和王世子前往俄國公使館（《大山巌》第四卷，第279頁）。根據崔文衡的說法，親俄派領導人李范晉和李允用與俄國公使卡爾·維貝以保護俄國公使館為托詞，安排俄國軍艦的100名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在仁川登陸（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37）。李范晉隨后前去看望國王，并力勸他向俄國公使館尋求庇護。崔文衡補充說，“宮女還給守衛帶來了熱食，這些善意的舉動自然讓守衛放松了對內命婦所乘轎子的警惕”（p. 50）。



興宣大院君



朝鮮高宗，身穿的是日本禮服

朝鮮官方的報告書并沒有夸大謀殺的情景。在日本和朝鮮進行審判時，目擊者證明，日本人對國王和王世子使用了暴力。強行進入國王宮室的闖入者逼迫國王和王世子說出閔妃的下落。當他們無法回答時，闖入者便開始動粗，并用刀槍威脅。宮女們也遭到了浪人的威脅，被逼問閔妃藏身何處，但宮女們聽不懂日語，只能驚恐地尖叫。[[31]](#_31__Xiao_Zao_Chuan_Xiu_Xiong)

在甩脫試圖阻攔的國王后，日本闖入者沖進下一個房間，在那里，他們殺害了試圖保衛閔妃的宮內府大臣李耕植。在閔妃的宮室中，他們殺害了三名容貌美麗的宮女，但日本闖入者不確定哪一位才是閔妃，因為誰也沒有見過閔妃。于是，他們將其他宮女和王世子拖入房間進行指認。[[32]](#_32___Official_Report_on_Matters)

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誰殺死了閔妃。岡本柳之助被控犯有謀殺閔妃的罪名，不過，其他人也吹噓是自己殺的閔妃。一位名叫寺崎泰吉的藥商回憶了他和另兩名日本人闖入閔妃宮室的情形：“到了后面，進入××宮時，有宮女二三十名”。我們“一次推倒一個。隨后，我們檢查了被子下面，某個宮女穿扮得和其他宮女一模一樣，但相當冷靜，沒有大驚小怪，看起來就像是地位顯赫的人物，這表明她就是××。我們抓住她的頭發，把她拖出藏身處。正如預料到的那樣，她絲毫沒有受到驚嚇……我朝她的頭部揮刀砍去。中村正揪住她的頭發，因此，手也被砍傷。我從頭部往下砍，因而一刀便足以讓她斃命。其他人批評我，說我太魯莽，還沒有確認她就是××，便將其殺害；不過后來最終證明她的確就是××。”和其他日本人（包括沒有完全進入閔妃被殺時所在宮室的一些人）一樣，寺崎對自己的成就大肆夸耀。[[33]](#_33__Xiao_Zao_Chuan_Xiu_Xiong)

在閔妃死后，浪人們偷走了她的財物。日本領事內田定槌報告說：“佐佐正之奪去閔妃身配的香袋及其他貴重物品，其他亂入者亦自王妃室奪去種種物件。”[[34]](#_34__Jiao_Tian_Fang_Zi____Min_Fe)

據說，閔妃被捅了幾刀后，“他們扒光了她的衣服，查看了她的私密部位”。她的尸體被抬到花園，并在那里焚毀。當時她四十五歲，但據說看起來不超過二十五六歲的樣子。

閔妃是一位傲慢、腐敗的女人。[[35]](#_35__Pu_Zong_Gen____Ri_Qing_Zhan)即使人們堅決擁護她反日的立場，但了解她行為舉止的朝鮮人民也不會“尊崇和敬仰”她。然而，她被極其殘暴地殺害了。與日本人的期望背道而馳，她的死并沒能解決日本在朝鮮的問題。借用一名朝鮮外交官的話說：

盡管日本官員企圖最大限度地減輕對謀殺事件的責任，但在當時西方人的眼中，這種做法給日本帶來更多的卻是危害。自清日戰爭后，日本在朝鮮樹立起來的影響力突然間消失殆盡。確實，直到日本在與俄國進行了另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后，日本才重新恢復其在朝鮮的威望。[[36]](#_36__Pu_Zong_Gen____Ri_Qing_Zhan)

謀殺事件逐漸被其他國家知曉。要不是兩名外國人——訓練侍衛隊的美國將軍威廉·戴伊（William M. Dye）和俄國電氣工程師亞歷山大·士巴津——親眼目睹，恐怕這一事件永遠不會被世人所知。[[37]](#_37__Dan_Shi__Ceng_Zai_1894Dao_1)他們將發生的事情告訴其他人，于是，這一傳聞便在漢城的外國群體中傳播開來。

美國和俄國公使拜訪了三浦，要求給予解釋。三浦態度鎮定，并做出高興的怪樣，指出他們的雙腿在哆嗦。三浦告訴他們，“貴國還沒有國民在這里居住，然而，我卻要為整個日本群體操心。至于所發生的事情，對我國政府，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實在是沒有理由接受你們對我的職責所提出的質詢。正如你們所說，日本很可能涉及了此事，但是，在查明是否均系日本人所為之前，我們一無所知。朝鮮時常故意敵對日本，他們深信，若不如此，他們可能會被日本輕視。這就是為什么他們常常使用日本刀劍的原因，也正是我們必須進行調查的原因。我們要查明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日本人，有多少人是假冒者。僅僅因為他們的行為舉止表現得像日本人，佩戴著日本刀劍，便證明他們是日本人，是胡亂猜忌。但這些都是我自己的職責，沒有道理接受你們的質問。”[[38]](#_38__Woonsang_Choi_The_Fall_of_t)他拒絕接受進一步的質問。

十分偶然的是，《紐約先驅報》的著名記者約翰·艾伯特·考克里爾（John Albert Cockerill）上校當時恰好在漢城。在從戴伊那里得知謀殺的消息后，他試圖向《紐約先驅報》拍發電訊稿，但三浦給電報局施壓，令他們阻止消息傳出。10月14日，這個消息最終抵達華盛頓。在他們向日本公使館尋求確認時，日本公使館說道：

僅收到消息說，閔妃提出裁減和解散一支朝鮮軍隊，這支朝鮮軍隊聽聞后異常激動，在大院君的帶領下向王宮進發。電訊稿未說明閔妃是否已經被殺，不過從內容來推斷，閔妃已經遭此厄運。[[39]](#_39__Pian_Ye_Ci_Xiong____Li_Zhao)

三浦想讓世人相信所發生之事純粹是朝鮮的私事：興宣大院君在朝鮮軍隊（這支軍隊對閔妃做出解散他們的決定感到不滿）的援助下發動政變。[[40]](#_40__San_Pu_Wu_Lou____Guan_Shu_J)若不是那兩位外國目擊者知道三浦在撒謊，大概世人會相信這種無稽之談。三浦第一次向東京發送的電報（于10月9日抵達）措辭含糊，以致日本政府懷疑三浦是不是隱瞞了一些內容。外務省向天皇發送的消息含糊不清，讓天皇很是不安。[[41]](#_41__Jiao_Tian_Fang_Zi_Zai___Min)據說，侍從武官川島令次郎向他奏報所發生之事時，他皺著眉頭說道，“梧樓為一旦決意即斷行不憚之人”。[[42]](#_42__Er_Dao_Xiang____Da_Shan_Yan)很明顯，天皇已經猜到三浦是這一事件的幕后黑手。

10月9日晚，天皇派川島前往參謀本部，探明漢城發生的事情，并命令陸軍進行調查。川島受到副指揮官的接待，副指揮官承諾立刻派人奔赴漢城進行調查。13日，天皇下達命令，禁止未獲恩準的日本人前往朝鮮，因為他擔心“無謀之輩”可能會制造新的外交事端。[[43]](#_4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10月17日，三浦梧樓被召回日本。職業外交官小村壽太郎將接替他擔任外務大臣。

10月19日，一名朝鮮大使抵達東京，帶來了朝鮮國王進獻給天皇和皇后的禮物和一封書信。信中，朝鮮國王對清日兩國簽署議和條約表示欣喜，并宣稱朝鮮獨立和政府改革完全歸功于天皇深厚的鄰邦友情。天皇和皇后向朝鮮大使回贈了禮物，令其帶回去給朝鮮國王。[[44]](#_44__Er_Dao_Xiang____Da_Shan_Yan)在這樣一個最不合時宜的時段按照老規矩交換禮物，無非是為了掩蓋當事人的真實感受。

10月21日，伊藤博文決定派井上馨作為特使前往朝鮮。他說，近期發生的涉及閔妃的事情，不僅違背了日本政府迄今為止一直遵循的政策，也讓國際社會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反應。為此，他對井上的權限和職責做出了明確指示，以免將來產生誤解。井上的使命是就閔妃遇害向朝鮮國王傳達日本皇室的同情，并對日本國民參與這一事件表達歉意。[[45]](#_4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關于日本今后的對朝政策，伊藤認為，幫助朝鮮進行內部改革毫無意義可言，更別提迫使朝鮮人自行進行改革了。日本將逐漸實施脫朝政策——將朝鮮事務交由朝鮮人處理。他認為，日本對待朝鮮應采取被動政策。如果有必要采取較為積極的措施，常駐公使在行動前應等待日本政府下達指示。

10月24日，朝鮮駐日公使任期屆滿、即將返回朝鮮，天皇接見了公使，并對閔妃遇害表示痛惜。[[46]](#_4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同一天，由于未能聽從政府的命令，三浦梧樓被正式解除職務。11月5日，日本政府暫時取消了三浦的貴族特權。

閔妃被暗殺給幾乎每一個相關的人都帶來了災難。朝鮮國王不僅失去了美麗的妻子，還被迫簽署了一份詔敕。在詔敕中，他指責閔妃“壅蔽朕之感覺，強奪國民；混濁亂朕之政令，賣官鬻爵”。因此廢除了閔妃的“王后”頭銜，將其貶為庶人。[[47]](#_47__11Yue_5Ri__Jing_Shang_Ye_Ji)暗殺事件的總策劃人三浦顏面盡失。伊藤博文為使日本能獲得像世界強國那樣的認可而制定的種種計劃，因為這次不體面的行動而受挫。井上馨改革朝鮮政府的希望，也因不得插手朝鮮內政這一新政策而破滅。此外，由于閔妃被殺，俄國也喪失了在朝鮮王宮的影響力。[[48]](#_4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對事態進展感到滿意的，恐怕只有興宣大院君了。在成功“發動政變”后不久，他要求高宗用他選出的親日派人士來替換內閣成員。[[49]](#_4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國王的私人護衛隊——侍衛隊——被并入了訓練隊，此舉實際上是將國王囚禁起來。國王無奈地答應了向他提出的一切要求，但他深信有人想毒害他，除非是在外國公使館的廚房里烹制，否則拒絕任何食物。[[50]](#_50__Pu_Zong_Gen____Ri_Qing_Zhan)

然而，輿論繼續施壓，要求懲處參與暗殺的日本人，三浦也無法再佯稱沒有日本人涉事了。他決定進行調查。結果，重懲“數名”人員，并將二十多人驅逐出朝鮮。由于日本在朝鮮享有治外法權，調查并非由朝鮮人開展，而是由某位專員領導的日本警察開展，而這位專員自身都深入參與了這場事件。[[51]](#_51__Jiao_Tian_Fang_Zi____Min_Fe)

據說，三浦的另一名顧問柴四郎[[52]](#_52__Pu_Zong_Gen____Ri_Qing_Zhan)從興宣大院君那里獲得了六千日元。這是大院君向其“恩人”贈送的錢款。這些錢大概不是由興宣大院君提供，而是來自于三浦。這是三浦使用的一個手段，用于證明是興宣大院君煽動了這一事件。[[53]](#_53__Bu_Guo__Ta_Geng_You_Ming_De)三浦還建議收買那些被驅逐出朝鮮的人，以使他們三緘其口。但是，日本政府拒絕附和這一方案，并下達指示說，在新的公使小村壽太郎抵達之前，不得對涉事人員進行處置。涉嫌參與這一事件的所有人都將被送回日本進行審判。這表明日本政府決定遵守國際法。

嫌疑人被分成三隊遣送回日本——壯士、三浦公使和他的幕僚、其余人士。他們分別于10月19日、20日和21日離開漢城。輪船直接駛向廣島縣的宇品。在抵達軍隊檢疫站時，他們被帶去沐浴，之后政府向他們送達了逮捕令，并給他們戴上了手銬，指控他們犯有蓄意謀殺罪和共謀罪。[[54]](#_54__Pu_Zong_Gen____Ri_Qing_Zhan)

在抵達宇品時，三浦也受到了同樣的待遇。不消說，三浦非常生氣，拒絕同職位低于內閣大臣的人說話。他被護送到一個相當舒適的牢房，關押了大約九十天。[[55]](#_55__Er_Dao_Xiang____Da_Shan_Yan)

1896年1月14日，軍事法庭對被控參與謀殺閔妃的日本士官進行了審判。1月20日，廣島地方法院舉行了初級聆訊，對岡本柳之助、三浦梧樓和杉村浚的指控進行審理，發現“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被指控人的確實施了其最初謀劃的罪行”。于是，被告被無罪釋放。

法院的事實認定詳細，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準確的。裁決明確表明，是日本人（而非朝鮮人）策劃和實施了王宮襲擊事件和暗殺閔妃事件。例如，裁決中稱：

三浦梧樓進一步向日本駐漢城營房長官、陸軍少校馬屋原務本下達指示，命令他部署訓練隊和召集帝國軍隊做援助，協助大院君入宮。三浦還召見了嫌疑人安達謙藏和國友重章，要求他們糾集同黨，在龍山與岡本碰頭，作為大院君的衛隊護送大院君入宮。三浦告訴他們，消滅在這個國家為非作歹二十余年的禍根在此一舉，并煽動他們入宮后除掉閔妃。[[56]](#_56__San_Pu_Wu_Lou____Guan_Shu_J)

這份報告甚至還提到，當“整支隊伍”齊聚于興宣大院君的宅邸門外后，岡本宣稱“入宮后，對狐貍隨意處分”。很明顯，這句話的意圖就是指使追隨者謀殺閔妃。報告還提到，在岡本和其他人經光化門入宮后，隨即進入了內宮，但至此報告戛然而止。雖然這些行為已經給三浦和其他人參與犯罪提供了確鑿證據，但法院似乎無法邁出宣告他們有罪的最后一步。盡管日本法官似乎盡全力要維護法律人的正直，但最終還是屈服于政府的命令，只得宣布他們無罪。

1896年2月11日，高宗逃離被囚禁的王宮，向俄國公使館尋求庇護，清楚地表明三浦的對朝政策失敗了。這次逃跑是經過周密計劃的。《開國五百零四年八月二十日事變報告書》稱：

陛下既沒有向宮中官員，也沒有向內閣相關成員透露打算。宮中看守嚴密，但陛下于清晨乘宮中宮女乘的轎子，經宮殿東門出逃。王世子與陛下同乘一轎。宮女與出入皇宮的婦人常乘此轎出入該門，守衛認為轎中之人一定是女人，免問放行。

陛下和王世子沒有帶護衛，宮中守衛認為他們已經入睡，并未發現出逃。陛下和王世子立刻奔向俄國公使館，大概7點20分抵達。隨后，陛下立刻召集了忠誠的朝鮮人士，發布詔敕，罷免多數舊內閣大臣，并宣布了六人的罪狀……詔敕中雖未宣布舊內閣的總理大臣金弘集、農商工部大臣鄭秉夏的罪狀，但他們被警務廳逮捕，在騷亂喧嚷中被殺，暴尸街頭，尸體被憤怒的民眾擲以石頭，毒打鞭撻。[[57]](#_57___Official_Report_on_Matters)

國王并沒有透露他向俄國公使館尋求庇護的原因，但是他顯然聽說了興宣大院君打算廢黜國王、立其孫子為王的傳聞。國王沒有原諒日本人謀殺閔妃的罪行，他在俄國公使館發出的第一份聲明是呼吁嚴懲兇手。

罷免親日內閣，是高宗在其一生中采取的最大膽的行動。幾個月以前，日本在朝鮮的勢力似乎還很強大，如今卻降到了最低點。俄國公使館成為了朝鮮政府的核心。在謁見朝鮮國王時，日本公使小村力勸國王返回王宮，但國王置之不理。日本人訓練的軍隊被解散，日本在朝鮮政府任職的大多數顧問也被罷免。

這些事件自然讓日本倍感狼狽。朝鮮國王逃至俄國公使館，被日本官方解釋為不僅是對日本野心的沉重一擊，也危及到了朝鮮的獨立，是涉及東洋未來、需引起嚴重關切的事情。不過，三浦將軍并沒有因為這次大為丟臉的失敗而遭受懲處，而是繼續他那輝煌的政治生涯。1897年2月，國王高宗離開俄國公使館，回到王宮。8月，他將尊號改為“光武”，并于10月宣布成立“大韓帝國”。[[58]](#_58___Official_Report_on_Matters)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一個并沒有什么軍事才能的國王偏偏選擇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稱帝。

# 第四十八章 英照皇太后



1896年1月1日，明治再次沒能按照慣例操持新年儀式。他四十五歲了，顯然對操持傳統儀式沒有興趣。盤踞在他心頭的不是日本的過去，而是日本未來在這樣一個權力沖突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雖然日本贏得了與清朝（日本多年來的老師）的戰爭，然而，勝利并沒能結束東亞的緊張局勢。朝鮮的狀況依舊混亂不清，潛伏著危機；此外，盡管臺灣的反抗已被鎮壓，但起義時有發生。不過，日本在與清朝的關系上取得了少有的稱心如意的進展，與清朝重修舊好可能激發了天皇的喜悅之情，這能從天皇在本年度第一次詩會上創作的詩歌中看出來：

俯視蒼穹下

普天繁華樂盛時

萬姓獻歌笑

盈盈歡聲入山盡

洋洋酣樂使路開[[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1月25日，昌子公主和房子公主在貞子的陪同下進宮謁見。[[2]](#_2__Zai_Zhe_Xie_Chang_He_Yi_Ji_T)貞子是御養育掛[[3]](#_3__Yu_Yang_Yu_Gua_Shi_Guan_Zhi)佐佐木高行的妻子。在覲見天皇后，皇后將貞子叫到身邊，告訴她盡管天皇的其他子女（包括皇太子）一直都受到疾病的困擾，但這兩位公主看起來很健康，讓天皇感到非常寬慰。一直以來，天皇都對佐佐木及其妻子的盡心盡力大加贊賞。天皇很關心這兩個女兒，但他一直找不到時間再次看望她們，直到該年的12月29日才再次得見。當天，在拜見父皇時，這兩位公主展示了她們在閱讀、社交和繪畫方面的才能。[[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即便天皇有很多國家義務需要承擔，但他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一次也沒有去探望自己的女兒，不免讓人感到奇怪。他的大多數子女都早早夭折，皇太子頻頻生病，天皇想必非常渴望看到兩位如此健康的孩子。9月初，佐佐木承認自己在照料兩位公主時遇到了很大的麻煩，詢問何時允許公主們返回皇宮。他回憶道，在1891年以前，公主們覲見天皇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這種場合在逐漸減少，今年，他只獲準帶公主們進宮覲見天皇一次。佐佐木試圖向天皇傳達他的遺憾之情，但沒有成功。當月晚些時候，佐佐木帶公主們來到皇宮，希望天皇看到她們茁壯成長的樣子會感到開心，然而，天皇再次拒絕接見她們。[[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也許天皇覺得對子女表現出特殊的關注與他的身份不符，但這使得他看起來似乎是位冷酷無情的父親。[[6]](#_6__Ta_Dang_Ran_Bu_Shi_Yi_Wei_Ni)

在整個1896年，兩名公主的教育依然是一個令人費心的問題。1月，佐佐木高行被告知，暑假過后，昌子內親王將在赤坂離宮接受香川敬三的教導。佐佐木將繼續負責房子的教育事宜，并且預計在五月的時候將負責撫育下一個孩子。他抗議稱，自己與妻子年紀不輕，恐怕難以勝任再撫育一個新生兒的重任。他還表示，房子內親王已經長大，完全可以離開他的養護。總之，他認為將兩位公主分開并非明智之舉。天皇讓步，同意由香川敬三對兩位公主進行教育，但他已經決定由佐佐木來撫育他的下一個孩子。也許在眾多子女早逝后，天皇將兩位公主能夠存活至今歸功于佐佐木的悉心照料。[[7]](#_7__1897Nian_Di__Fang_Zi_Gong_Zh)

這些孩子能夠存活下來當然是件令人歡欣的事情，但是，她們都是女孩，而王位繼承人只限于男性。1896年4月，侍從長德大寺實則懇請天皇召喚更多的女官侍寢。他解釋說，眾人都暗暗擔心天皇的男性繼承人太少。子嗣越多越有利于增進皇室的繁榮、鞏固國家興隆的基礎。山縣有朋、松方正義和多名其他愛國臣民反復與德大寺討論這一問題，要他懇求天皇盡快召喚更多的女官侍寢。將來有必要讓皇子參加陸軍、海軍，并統率三軍。

等到帝國大本營解散，和平恢復后，德大寺開口跟天皇談論這件事情。他解釋說，希望增加側室的數量不是為了讓天皇縱樂，而是為了對皇祖皇宗行孝。然而，天皇決定不采納這一建議。

天皇的最后八個孩子均由園祥子所生。其中，有六個是女孩，四個存活了下來；兩個是男孩，但都沒有活到兩歲。腦膜炎的詛咒一直延續到了天皇的最后一個孩子——第十女喜子公主。1899年1月11日，不到一歲半的喜子死于腦膜炎。德大寺和其他政府成員持有的這一看法或許正確。如果天皇垂幸更多的女子，那么將會有更多的繼承人。但是，（與持續至今的小道傳聞相反）盡管天皇認為王位繼承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大事，但他卻不打算獲得一個妻妾成群的后宮。他對繼承人、未來的大正天皇的撫育方式十分嚴苛，表明明治不贊成君主享有肆意妄為的特權這一傳統觀點。

1896年5月11日，園祥子產下天皇的第九女聰子。嬰兒不是男孩無疑會讓眾人些許失望。不過，皇太子將繼承王位似乎已是鐵板釘釘的事實。在慶祝聰子公主誕生后的第二天，天皇宣布，從今以后，皇太子將于每周六進宮謁見。

此時，政府開始重新考慮貴族子弟的教育問題。之前眾人認為，貴族子弟從學習院畢業后將成為軍官或貴族院議員，但是，1895年被任命為學習院院長的近衛篤麿（1863—1904）認為，學習院還應培養未來的外交官，以便在歐洲各國任職。為此，他提議修改課程。1896年6月提議獲得批準。增加的課程有社會學、西方外交史，東方外交史、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外語；但是，課程中刪除了東方和西方哲學、日本和中國文學、美學以及其他“無用的”科目。[[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此外，近衛還做出決定，即使是年輕的貴族也必須接受現代教育。

明治的勞碌繁忙——這也是他抽不出時間探望女兒的原因——大概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內部的因素。在外因中，沒有什么能比朝鮮的局勢更加耗費時間的了。在1896年全年，國王高宗繼續住在位于漢城的俄國公使館內，沒有流露出要返回王宮的跡象，即使他的長時間逗留已經讓俄國人明顯有些生厭。俄國在朝勢力持續增長，為了維持日本在朝鮮留存的影響力，日本別無選擇，只好與俄國一同保障朝鮮的獨立，并答應相互監督朝鮮內政。5月14日，日本常駐公使小村壽太郎和俄國代理公使卡爾·維貝就此簽署了一份議定書。雙方約定，朝鮮國王應盡早返回王宮，屆時，兩國將力勸朝鮮國王任命開明溫和的人士擔任大臣，以實行仁政。[[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雙方還同意，限制俄國和日本在朝鮮設置的兵力，一旦朝鮮完全恢復和平，兩國將撤離所有軍隊。

5月，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儀式。這成為日俄兩國就朝鮮未來進行進一步商談的大好機會。天皇派山縣有朋作為特命全權大使參加典禮。5月22日，山縣謁見了沙皇，在會晤中呈遞了明治天皇的一封信。在接受這封信時，沙皇說道，他非常清楚山縣具備特殊資格來擔任這一使命。不過，他大概還不知道，1895年4月，山縣曾向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強烈建議與俄國結成聯盟。山縣認為，日本無法單獨維持在東洋的霸主地位，他確信，1891年俄國皇太子訪日時被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誼所感動。大津事件是個不幸事件，但那還遠遠不足以成為兩國采取敵對行動的借口，俄國已經證實，他們希望建立友好關系，以此促進兩國的利益。山縣力勸日本改變外交政策，不是與英國，而是與俄國結盟。[[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雖然山縣的建議沒能開花結果，但大概也沒有被遺忘。就在這時，他被告知天皇將派他作為特使參加加冕禮，并指示他利用這次機會就捍衛朝鮮獨立與俄國進行初步會談。5月24日，就在謁見沙皇后的第二天，山縣與俄國外交大臣阿列克謝·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Aleksei Lobanov-Rostovskii）進行了會談，并提交了一份關于兩國在朝鮮開展日后合作的提議草案。他并不知道，就在幾天前，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已經秘密與（也來參加加冕禮的）李鴻章達成了一份清俄聯盟的密約。密約的主要內容是清朝同意俄國修建一條從西伯利亞經蒙古和滿洲北部到達海參崴的鐵路。作為交換，俄國承諾將保衛清朝的領土，以防日本入侵。[[11]](#_11__Ru_Xu_Le_Jie_Mi_Yue_Tan_Pan)當然，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沒有提到這份密約，他就朝鮮財務危機與山縣達成了一份議定書。

這份日俄議定書有兩個秘密條款。第一條規定：若朝鮮發生危及和平和秩序的重大變亂或者受到重大變亂的威脅，日俄經相互同意，可以向朝鮮額外派兵。在此情況下，為防止兩國的軍隊發生沖突，兩國須劃定雙方均不可占領的緩沖區。第二條規定：在朝鮮訓練出一支能保衛該國的軍隊之前，日本和俄國可以在朝鮮駐扎相同數量的兵力，以保衛各自的國民。[[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但是，俄國并沒有遵守與日本合作的承諾；相反，他們單獨掌控了朝鮮軍隊的訓練和朝鮮財務的管理等事宜，并用俄國人取代了朝鮮政府中的英國顧問。

對天皇來說，國內事務更加紛繁復雜。外務大臣陸奧因健康欠佳辭職。[[13]](#_13__Ta_Yu_1896Nian_5Yue_30Ri_Ci)總理大臣伊藤決定，既然他必須替換外務大臣，索性利用這一機會把內閣的其他成員一并換掉。他任命松方正義擔任大藏大臣，大隈重信擔任外務大臣。內務大臣板垣退助獲悉任命后，宣稱如果大隈踏足內閣，自己就要辭職。伊藤考慮只任命松方，但松方說，除非同時任命大隈，否則他不接受這一職務。伊藤面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如果無視板垣的反對，既任命大隈又任命松方，將造成內閣與自由黨產生摩擦。但是，如果他決定不任命大隈，那將切斷自己與進步黨——另一個重要黨派——的聯系。由于無法做出決定，8月20日，他稱自己健康狀況不佳，遞交了辭呈。

現在，這一難題交由天皇處理。最后，他既任命了松方，也任命了大隈，還接受了伊藤的辭呈，即便伊藤是他最信任的政治家。他讓樞密院議長黑田清隆在保留樞密院職務的同時臨時兼任總理大臣，直到選出新的總理大臣為止。任命大隈和松方的決定引起了諸多猜測。有人聲稱，此舉是為了將長州派系排擠出新內閣。[[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長州派的高層領導人山縣被要求就伊藤的接替人與新內閣的其他成員進行商議。事實上，天皇原打算任命山縣擔任總理大臣，但是，當山縣得知這個消息時予以拒絕，說他身體不適，不符合這一職務的要求。

似乎沒有人愿意接替伊藤擔任總理大臣。不愿意進一步介入此事的天皇，將接替人的人選交由元老處理。此時，警視總監、男爵園田安賢（1850—1924）對無人愿意承擔這一職務予以譴責，他向天皇發函一封，認為這個時候天皇不應當保持沉默。他力勸天皇站出來，向世人明明白白地展示什么才是個人統治。德國皇帝曾宣布，“我就是德意志帝國的內閣首相”。[[15]](#_15__Wo_Mei_You_Zhao_Dao_Zhe_Yi)園田希望天皇也能對內閣實行個人統治，不要把大臣的任命交給元老。他宣稱，盡管內閣大臣是由天皇任命的，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某些人無論是否獲得了天皇的信任，也能夠在內閣占有一席之地。內閣是引發無休止沖突的大環境，這些沖突擾亂了日本的和平安寧。如果天皇能夠實行個人統治，誰還敢違抗？他敦促天皇采取這一措施，并任命信賴的人士協助自己，認為這才是天皇最緊迫的任務。[[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一直以來，建立天皇的個人獨裁政府都是維新的一個理想，然而，隨著憲法的頒布和議會的成立，這個理想已經被遺忘，并且被一種新的觀念所取代：天皇只是高高在上的最高權威，而非政治事務的積極參與者。原則上，天皇的權力是絕對的，但他很少選擇行使這種權力。園田抱怨的“謙德”反倒成為了天皇所采用的立場。天皇對這封函件有何反應，尚無史料記載。大概天皇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幸運的是，他與專橫的德皇迥然不同。[[17]](#_17__Luo_Er_Qing_Chu_Di_Biao_Min)

因選任新總理大臣而引發的危機，因為任命松方正義擔任總理大臣兼大藏大臣而得到解決。松方非常不愿意接受總理大臣這一職務，因為他想不出什么解決方案來應對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剛開始，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以一貫表現出來的敬畏和惶恐姿態拒絕了天皇下達的這一命令。然而，天皇不接受否定的答復，指示松方就這一事情與黑田進行商議。最后，松方屈服。9月20日，新內閣宣誓就職，成員幾乎都是熟悉的面孔。天皇特別關心陸軍大臣的選任。他提醒松方，日本正在擴充軍備，并將繼續向臺灣增派軍隊。新大臣必須能與參謀本部和睦相處，并且能對軍隊進行有效管理。松方任命高島鞆之助擔任陸軍大臣，在第一屆松方內閣時期，高島也曾擔任過這一職務。[[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內閣中最有爭議的人物莫過于大隈重信。他支持言論、集會、出版自由，認為陸軍的擴充應以十二個師團為限，并建議從中派出三個旅駐扎臺灣。他還提議對財政進行監管，宣稱如果內閣其他成員不接受這些意見，他將拒絕就任。大隈的意見遭到了陸軍大臣的反對，他不同意限制日后的軍備擴充，但最后大家還是同意了大隈的條件。

10月，在大阪發行的一份雜志對宮內大臣土方久元進行了猛烈抨擊，列舉了他的種種劣行。這是對出版自由的一次重大考驗。在隨后的一個月，報紙《日本》轉載了這篇文章，從而讓它得到了廣泛傳播。土方提交辭呈，同時譴責這篇報道純屬捏造，聲稱這玷污了皇室的尊嚴。他要求松方和內閣成員嚴厲懲處冒犯者。嚴懲也許意味著不僅要限制或者（至少）暫時停辦此類雜志和報紙，還將提出冒犯君主和誹謗政府官員的指控。

松方詢問內閣，是否給予取締此類期刊的行政處罰。大隈反對這類措施，因為這違反了政府所采用的出版自由的原則。其他內閣成員認為，取締期刊是不可避免的。在對這一事件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研究后，司法大臣清浦奎吾反對將這一糾紛送交法院。這篇文章雖然造謠中傷宮內大臣，但沒有直接批評皇室，因此，不構成不敬罪。此外，如果作者因誹謗官員而被起訴，只會放大這一事件，使得被告及其辯護人獲得了在法庭上抨擊宮內省的機會，從而導致真正褻瀆皇室的尊嚴。

松方告訴土方，內閣已經決定不采取行政處分或者法律處分。土方自然很生氣。不過，侍從長和黑田清隆一同勸說松方，說定會采取行政措施。最后，冒犯了宮內大臣的雜志被取締，報紙被暫停發行。然而，這沒能平息土方的怒氣。他認為這個處罰仍然過輕。內閣表明實行出版自由的政策，但最終的行為卻背道而馳，讓民眾大為失望。[[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12月，天皇在貞愛親王的府邸參加一個宴會時，聽到了關于清日戰爭的最后一次余音。這是一場歡慶的宴會。當時出色的兩位能戲演員寶生九郎和梅若實表演了《小袖曾我》和其他能戲。經天皇要求，梅若實演唱了天皇創作的《成歡站》，寶生九郎演唱了皇后創作的《平壤》。[[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這兩首歌曲由梅若實進行了最新修改，高度贊揚了日本軍隊的驍勇善戰。由于朝鮮目前已經完全風平浪靜，12月21日，天皇取消了禁止前往朝鮮的禁令。

總的來說，在過去兩年與清朝開戰的激動情緒平息后，對天皇而言，1896年是相當枯燥的一年。天皇似乎再一次地離群索居。他沒有參加1897年新年正日的任何傳統儀式，皇后代替他接受了外國政要的朝賀。

新的一年剛開始沒多久，身體狀況一直不太好的皇太后患上了重感冒。1月8日，她突然感覺身體發冷，咳嗽增多，并感覺到胸口劇烈疼痛。陸軍軍醫總監橋本綱常檢查后，診斷她患上了卡他性肺炎。10日，經常為皇室成員進行治療的歐文·貝爾茨醫生對皇太后進行了檢查，結論和橋本醫生的診斷一致。貝爾茨警告說，皇太后的病情已經相當嚴重，如果再發生心臟病或肺水腫，就會有生命危險。[[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1月11日，天皇和皇后向宮廷醫師詢問皇太后的病情。他們早前被告知皇太后患病，但以為是感冒。得知她命在旦夕，他們都大吃一驚，并決定前往青山御所的病房探望皇太后。然而，他們遭到了醫生和其他人的勸阻，因為他們自己也患上了重感冒，不適宜去探望。盡管如此，天皇堅稱他和皇后將按計劃于早上9點30分前去探視。當天清晨，皇太后病情危重的消息傳到了宮中。8點50分，護衛尚未到齊，天皇和皇后就動身出發了。

一踏進病房，天皇便膝行到皇太后的病榻前。看到皇太后憔悴的樣子，他無法抑制強烈的悲傷之情，失聲痛哭。皇太后轉向他。他望著皇太后，一個勁地哭泣、鞠躬。皇太后也傷心地哭泣起來。她讓服侍的人向天皇和皇后表達謝意，感謝他們前來探望，并解釋說自己無法下床，無法向他們鞠躬。天皇的一名隨從擔心待的時間過長可能加重皇太后以及天皇和皇后的病情，于是力勸天皇和皇后離開。隨后不久，他們便離開了病房。

當晚，皇太后病逝，享年六十四歲。自1867年1月孝明天皇駕崩后，她守寡整整三十年。盡管天皇十分清楚他的生母是中山慶子（現稱為“二位殿”），但皇太后被正式認定為他的母親，而且他也一直在向皇太后盡孝。這一次，天皇的悲傷之情是真切的：撇開個人感情的紐帶不說，皇太后是與他的童年世界有著關聯的重要人物，也是這類人物中的最后一位。盡管明治身邊的人常常因敬畏和感激而哭泣，但明治自己很少流淚。這一次，他的眼淚肯定不是因后悔自己沒有當好兒子而引發。在孝明天皇過世后，他無疑已經做了能做的一切事情，確保皇太后的時日能在最愉悅的旅行中、在觀看能戲中、在出席藝術展覽中以及在類似高興之事中度過。

在皇太后病逝后的五天里，天皇暫停朝事，并下令自皇太后薨日起服喪一年。宮中人士都將穿上喪服，其他日本民眾將停止舉辦歌舞、音樂三十天。天皇命令在旗幟上綁上黑色飄帶，在隨后的十五天以及在出殯日和下葬日不得處決罪犯。[[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一些人認為，為彰顯皇室如今的榮耀，葬禮的規模應該非常宏大。皇室治喪委員會的成員表明觀點，說孝明天皇的陵墓太小，應為皇太后修建更大的陵墓。天皇提出自己的看法：“皇妣葬禮固不可不莊重，然物有其度，不可徒夸張超皇考。”[[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起初，帝國議會將葬禮的預算費用設定為八十萬日元，但威仁親王提請眾人重視天皇的意愿，要求減少預算，最終設定為七十萬日元。天皇和皇后都生病了，由于擔心寒冬氣候可能會加重天皇和皇后的病情，他們沒有參加在京都舉行的葬禮，而是由威仁親王及其妻子代為出席。

天皇下令，自此以后尊皇太后為“英照皇太后”。這個極其例外的尊號無疑反映出他對皇太后的感情。在此之前，鮮有皇太后或皇后被追封謚號的例子。[[24]](#_24__Ru_Guo_Tai_Huang_Tai_Hou)“英照”并非佛教的稱號，而是出自于唐代政治家李德裕的一首詩《春暮思平泉雜詠二十首·潭上紫藤》。[[25]](#_25__Shi_De_Mo_Ju_Shi__Fan_Ying)之所以為采用這一名稱，是因為皇太后出身于藤原家族。

2月2日，英照皇太后的靈柩被從青山御所送往京都的大宮御所。皇室成員、內閣成員、樞密院議長、外國公使以及他們的妻子都參加了出殯儀式。盡管一直在生病，天皇和皇后仍希望前往青山御所做最后的道別，然而宮廷醫生堅決不準他們冒著這樣的天氣前去。

2月7日，葬禮在京都舉行。從大宮御所到月輪山殯儀館排起了長長的送葬隊伍，感人至深。四頭牛拉著靈車，華族和政要都穿著正式的服裝，走在靈車的后面。神官們拿著楊桐樹枝、錦旗、長戟或者舉著熊熊燃燒的火把，在送葬隊伍中左右走動。近衛軍和第四師團的儀仗隊與海軍兵士一同護送著靈車。第四師團的野戰炮兵鳴放了幾分鐘的禮炮，軍樂隊演奏起《哀之極》——在皇室高級成員的葬禮上演奏的哀樂。[[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當送葬隊伍到達夢浮橋[[27]](#_27__Quan_Yong_Si_Xiang_Xia_De_Y)時，即泉涌寺之前，道路變得非常狹窄，只得把靈柩轉移到手推車上。隊伍于當晚10點抵達月輪山，11點舉行了儀式。靈柩被安放在殯儀場的中心，送葬者在這個臨時的祭壇旁排成行。隨后，送葬者從左到右一個接一個地走上前，在靈柩前鞠躬，并送上一根楊桐樹枝。那一定是個非常莊嚴、非常動人的場景，即便大多數人是在向一生中都不太了解的一個女人表達敬意。維多利亞女王的葬禮可能都沒有這么讓人印象深刻。

也許這個葬禮最讓人驚訝的地方，在于它缺少了佛教元素——沒有僧人、沒有吟誦佛經、沒有焚香。[[28]](#_28__Huang_Tai_Hou_Zang_Li_Zhong)過去，神道教神官不愿意主持葬禮，因為害怕沾染上死亡的污穢。但是維新以來，佛教失寵，神道教便開始舉辦喪葬儀式。

2月8日，午夜過后十二分鐘，葬禮結束，但直到清晨5點30分靈柩才下葬；11點55分，靈柩掩埋結束。葬禮上唯一一位來敬拜的外國人大概就是朝鮮國王派來的特命全權大使李夏榮，他在靈柩前獻上了一對裝有紙花的花瓶。這一舉動讓日本人不勝感激。在接見這位公使時，天皇向他表達了感謝之情，并贈送給李夏榮勛一等的旭日章。1897年11月22日，在為閔妃舉行喪禮時，日本也同樣派遣公使攜帶悼詞和一對銀香爐參加喪禮。[[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天皇和皇后無法前往京都參加葬禮，但4月19日，他們一同去到英照皇太后的陵前哀悼致敬。天皇和皇后在京都一直逗留了四個多月。他們原計劃于5月中旬返回東京，這時傳來了東京爆發麻疹疫情的消息，宮廷醫生告誡他們此時回宮可能有危險。于是，天皇便好好地享受在舊都的時光，即使在疫情有所減緩后，他也沒有流露出要返回東京的跡象。直到8月22日，在最終確定麻疹疫情已經結束后，天皇才依依不舍地離開了京都。[[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在離開京都的當天早上，專車將于8點55分出發，但是，天皇突然宣布，他想讓列車晚二十分鐘出發。他沒有給出任何理由，也許只是希望在京都再待久一點兒。通信省運輸局表示很難更改時刻表，但天皇非常生氣地反駁道，“此為特別御召列車，不能安排時間為何故？”最后，通信省運輸局推遲了列車的出發時間。這是天皇放縱任性的罕見例子，（和其他情況一樣）第二天他大概有些后悔了。

1897年，煩擾天皇并對將來造成影響的另一件國內事務，是足尾銅礦造成的銅中毒事件。3月24日，日本政府成立了一個內閣委員會，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該事件對環境造成的危害以及給該地區居民帶來的痛苦都沒有被夸大。在渡良瀨川及其支流，魚群已經消失；大量的水旱田瀕臨荒廢。近年來，洪水頻發，損失逐年增加。在每一屆議會會議上，眾議院議員田中正造（1841—1913）都描述了該地區遭受的嚴重破壞，呼吁采取防范措施和救助行動。但是，政府和礦山經營者都沒有采取措施來幫助當地居民，并且他們還擔心民眾會前往東京，直接向政府請愿。[[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就在調查委員會成立前不久，農商務大臣榎本武揚身穿便衣前往足尾，調查毒礦的影響。當地的景象讓他深感震驚，為對這場災難負責，他引咎辭職。[[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在得知足尾的情況后，天皇煩躁不安。4月7日，按照天皇的要求，德大寺實則向群馬縣、栃木縣、埼玉縣和茨城縣的知事發函一封，詢問他們是否認為突然爆發的公眾批評是由1896年的洪災導致的破壞所引起，還是應該回溯至1892到1893年首次發現污染造成可怕后果的時候。

當時，一些觀察使將災難歸咎于亂砍樹木導致山體滑坡、堵塞河床，進而河水流動不暢，沖破堤防并將有毒物質擴散。知事被要求做出答復，不得瞞報，亦不得扣押相關文件。[[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在收到內閣委員會的報告后，5月27日，天皇向礦山經營者古河市兵衛發布了一個包括三十七條命令的命令書，要求他提供沉淀池、濾水池、濾煙室和類似設施，以避免礦井水溢流，消除煙煤污染。古河必須在一百五十天內完成此類改進措施，否則將暫停采礦作業，直到沉淀池和濾水池準備妥當為止。如果古河違抗這些命令，將被禁止從事進一步的開采作業。[[34]](#_3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11月27日，內閣確信委員會對足尾毒礦的調查工作差不多完成，于是解散了委員會，并指派適當的大臣來監督防范措施的實施和恢復受污染的土地。[[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毒礦事件一直持續到了明治時代的后期，從這一點來看，當時政府下令的污染控制措施顯然并沒有得到嚴格執行。建立一個現代、富強國家的愿望是如此強烈，以致日本民眾趨向于容忍環境污染，即使是足尾銅礦這一極端嚴重的污染也不以為意。

就在十一年前的1886年，末廣鐵腸發表了《雪中梅》。這部作品通常被譽為是明治時期最優秀的政治小說。它以2040年（明治一百七十三年）為背景，開篇便描寫了為慶祝憲法頒布一百五十周年而鳴放禮炮、吹響號角的情景。隨附的插畫中描繪了東京的未來。那是一個矗立著一排排冷酷的磚墻建筑物的城市，一團團的黑煙從這些建筑物的高大煙囪中排出。鐵腸熱忱地寫道，“電報線如蛛網般，汽車往來八方，路上的電燈宛如白晝。”[[36]](#_36__Zhuo_Zhu_Dawn_to_the_West)

想到一個城市如此缺乏宜人性、如此遭受工業污染，今天的讀者可能會渾身戰栗，然而，鐵腸無疑認為他的讀者會為這樣的未來圖景感到高興。那是以煙囪冒出濃煙作為進步的象征。他似乎認為東京越像倫敦——西方最偉大的城市，日本的民眾就會越幸福。

侍從日野西資博回憶道：

陛下視察關西地區，每次火車快要經過大阪時，他都會說，“我們正在靠近煙霧之都……我們此刻就在煙霧之都了。”每當我們靠近大阪時，他都會眺望窗外的風景。當他看到升起眾多的煙霧時，會感到非常滿意。[[37]](#_37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

無論對明治天皇來說，還是對末廣鐵腸來說，“煙霧之都”都是個贊美之詞。然而，足尾銅礦卻是一個殘酷的告誡，它提醒著人們：這樣的進步是以犧牲環境和民眾的生命作為代價的。

1. [[1]](#_1_4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1頁。

1. [[2]](#_2_48) 在這些場合以及提到眾姐妹的其他場合中，都沒有出現天皇的第八女允子，大概是因為她與其姐妹分開養育的緣故，她的撫育者是林友幸（《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99頁）。

1. [[3]](#_3_48) 御養育掛是官職，負責天皇皇子、皇孫的養育工作。——編注

1. [[4]](#_4_48)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72頁。

1. [[5]](#_5_48)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20頁。但是，天皇接受了兩位公主進獻的禮物——離宮景色的繪畫和幾個番薯。聽說這些禮物很討天皇喜歡，這給佐佐木帶來了一些安慰。

1. [[6]](#_6_48) 他當然不是一位溺愛子女的父親。他的女兒北白川房子回憶道，第一次聽到明治大聲歡笑，是她帶著襁褓中的兒子去皇宮的時候，當時幼兒表現出了一些不得體的行為。后來，北白川房子成為了伊勢神宮的祭主（《明治天皇とその宮廷》，《リーダーズ・ダイジェスト》1968年10月號，第44頁）。

1. [[7]](#_7_48) 1897年底，房子公主突然生病。佐佐木希望將病情進展情況奏報給天皇，但他被告知，已經有諸多煩心事縈繞在天皇的心頭，除非病情極其嚴重，否則最好等到公主康復后再奏報天皇。不過，佐佐木將公主的病情向皇后進行了詳細奏報（《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65—366頁）。

1. [[8]](#_8_4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94—95頁。

1. [[9]](#_9_4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71—72頁。國王直到1897年2月20日才離開俄國公使館（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165頁）。

1. [[10]](#_10_4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46—747頁。

1. [[11]](#_11_48) 如需了解密約談判的情況，請參閱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 trans. Sidney Harcave, pp. 227-238。

1. [[12]](#_12_4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8頁。

1. [[13]](#_13_48) 他于1896年5月30日辭職，并于1897年8月24日離世（《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0頁、第292頁）。

1. [[14]](#_14_4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12頁。松方來自于薩摩藩，大隈來自于肥前藩。

1. [[15]](#_15_47) 我沒有找到這一引述，不過，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發表過多次類似的話語。他對威爾士（Wales）親王說，“我是德意志政策的唯一決定者，我的國家跟著我的意志走”（轉引自John C. G. Röhl,The Kaiser and His Court , p. 12）。

1. [[16]](#_16_47)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19—120頁。

1. [[17]](#_17_47) 羅爾清楚地表明德皇要比明治獨裁得多：“必須記住，每一個官職的任命，每一項政治舉措的實施，都需要皇帝的明確同意。每一位政治家、每一位陸海軍軍官、統治精英內部的每一個政治群體、宮廷社會的每一個成員，毫無例外地都要去獲得‘最高人物’的歡心”（The Kaiser and His Court , p. 117）。

1. [[18]](#_18_4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23頁。

1. [[19]](#_19_4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52—153頁。

1. [[20]](#_20_45)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60頁。

1. [[21]](#_21_45)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77頁。

1. [[22]](#_22_44)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80頁。

1. [[23]](#_23_44)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83頁。

1. [[24]](#_24_42) 如果太皇太后、皇太后或皇后加入了佛教宗派，那么她通常將獲得以“門院”或“院”（如建禮門院）結尾的尊號。但是，皇太后沒有加入任何佛教宗派，因此這樣的尊號也就顯得不合時宜。向太皇太后、皇太后或皇后追封謚號的例子有三例，都發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奈良時代。掌管此事的官員反對給這位皇太后追封謚號，認為在姓氏后面加諱就可以。之后，這名官員認為也可以皇太后居住的御所名稱作為謚號，稱為“青山皇太后”（《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94—195頁）。

1. [[25]](#_25_42) 詩的末句是“繁英照潭黛”。“英照”的字面意思就是“繁英映照”。比起詩人，李德裕更為人知的身份是政治家。

1. [[26]](#_26_4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99頁。

1. [[27]](#_27_41) 泉涌寺向下的一處遺址，古時曾有一座橋，今只剩一碑。非日本神話中的夢浮橋。——編注

1. [[28]](#_28_38) 皇太后葬禮中的非佛教特色為皇室開了先例。1898年2月，當光格天皇的養子晃親王過世時，他的家族希望按照他在遺囑中表明的意愿舉辦一場佛教葬禮，但這個請求遭到拒絕。樞密院副議長、伯爵東久世通禧裁定，皇室成員的葬禮必須按照先例進行——即采用神道教的方式。天皇支持這一裁定（《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97—398頁）。

1. [[29]](#_29_3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00—201頁、第207頁、第343頁。10月12日，朝鮮國王稱帝，他頒布詔書，追封閔妃為皇后，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并改年號為“光武”（第319頁）。

1. [[30]](#_30_3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56頁、第291頁。在1886年到天皇駕崩的1912年間，擔任侍從的日野西資博回憶道，當1897年4月天皇在京都時，侍從們都擔心天皇會推遲返回東京。剛巧在這個時候，一場大風暴導致列車暫停運行。天皇帶著愉悅的表情說道，“是低氣壓吧。低氣壓真是太好了。”就在列車恢復運行的同時，傳來東京爆發麻疹疫情的消息。這導致天皇第二次推遲離開京都的時間。不久后，在得知疫情逐漸減緩后，天皇說道，“朕確信還有一些病例。你們趕快調查一下”。侍從們進行了調查，發現東京還有兩個麻疹病例。在向天皇奏報此事時，他說：“你們看看，朕剛才說道還有一些病例，果不其然吧？”勸說天皇返回東京并非一件容易的差事（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73—174頁）。

1. [[31]](#_31_34)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18頁。

1. [[32]](#_32_33)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25頁。

1. [[33]](#_33_3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33頁。

1. [[34]](#_34_3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60頁。

1. [[35]](#_35_2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45頁。

1. [[36]](#_36_28) 拙著Dawn to the West , 1, p. 90。

1. [[37]](#_37_24)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98頁。我突然想起《古事記》中描述的應神天皇的故事。當應神天皇站在山上時，他望著一個村莊，發現煙囪沒有冒煙，意識到民眾沒有足夠的錢來煮菜做飯，由此豁免了苛捐雜稅。當他再一次佇立在山上，看著村莊里的煙囪冒煙時，他很開心，這表明民眾的生活富足。

# 第四十九章 藩閥終焉



另一場內閣危機發生于1897年底。松方正義——這位從來都不重視政黨意愿的總理大臣——在未事先獲得政黨同意的情況下，企圖在議會上通過立法提案。在回答樞密院議長黑田清隆對該提案的質疑時，松方回答說，他是按照天皇的圣意，盡忠盡責效勞國家大事，無須顧及政黨的向背以及議會的可否。眾議院對內閣提出了不信任案，松方也奏請解散議會。[[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面對眾多反對的呼聲（甚至來自于他自己的內閣成員），松方進退兩難。

1897年12月25日，松方解散議會，并為內閣不和負責，請求辭職。其他內閣成員也提出了相同的請求。天皇讓松方等待進一步的指示，同時命令其他大臣不要離開東京。毫無疑問，天皇一定想起過去的痛苦體驗：當他需要大臣們的建議時，他們已經身在偏遠的鄉村。為了不響應天皇的命令，大臣們常常把不在東京作為僅次于身體抱恙的借口。

天皇意識到，解散議會或者至少休會是不可避免的了。他還知道沒有辦法動搖松方辭職的決心。同一天，也就是12月25日，他派德大寺實則前往黑田清隆的府邸，講述所發生的事情，并告知黑田自己希望與他進行商議。黑田回答說他不幸染疾，三四天后才能進宮。天皇似乎判斷黑田是假裝生病。三個小時后，德大寺回到黑田的府邸，傳了天皇的另一番話，議會即將解散，總理大臣已要求辭職，黑田應立刻進宮商量處理事宜。鎮定自若的黑田說道，他將于12月28日進宮。26日，德大寺再次來到黑田的府邸，告知他天皇對黑田拒不進宮大為煩惱，要求他明天（27號）進宮，黑田同意。雖然天皇的大臣們反復聲明要絕對忠于君王，但當他們發現對自己不利時就無視天皇的意愿。

松方承認他不打算干預接替人的選任，但他提議說，伊藤博文或山縣有朋將會是合適的人選。與當時更換總理大臣和其他內閣大臣的大多數情況一樣，這次危機本身沒有多大的利害關系，但卻有著不言而喻的重大意義。來自薩摩藩的松方是個失敗的總理大臣，他提議說長州藩人士伊藤或山縣將會是合適的接替人。盡管政黨在議會中扮演著一定的角色，但這些接替人所支持的政黨并非松方舉薦他們的重要原因。無論伊藤或山縣有著怎樣的政治上的忠誠，他們能夠擔任總理大臣，是因為能力獲得認可（雖然這些能力并非針對政府當前面臨的任務），以及出生于兩大藩國之一。擔任日本政界領導的人士都來自于這兩大藩國。雖然現在總理大臣的政治忠誠度并非考慮因素，但這種情況很快就會改變。

當晚，宮內大臣土方久元遵照天皇的命令向伊藤發了一封電報，請他第二天進宮。伊藤當時正在大磯町的別邸中，他回了一封電報，稱自從去年辭職后，他就再也沒有關注過國內外形勢，如果天皇征詢他的意見，只會誤導圣上的聰明才智。此外，自己近來飽受眼疾的折磨。他請求延緩進宮覲見的時間。[[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12月28日，天皇派侍從前往黑田的府邸，將他準備任命伊藤擔任總理大臣的打算告訴黑田。他要求黑田向伊藤轉達這一決定，描述內閣的困難局面，并勸說伊藤接受這一任命。當天，黑田去了大磯町，力勸伊藤立刻動身前往東京，并勸說伊藤答應天皇的愿望以讓天皇寬心。伊藤被這些話深深打動，于是答應了這一請求。[[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

12月29日，伊藤抵達東京后即刻進宮。天皇講述了召見伊藤的原因，伊藤回答道，他非常清楚事態的嚴重性，愿意組建新一屆內閣。

和往年一樣，天皇沒有主持1898年的新年儀式，而是由代行官操持。得知伊藤患了感冒，天皇派侍從前去噓寒問暖，并表示希望伊藤能夠進一步地為國家效勞。他向伊藤贈送了一打葡萄酒和十只鴨子，這是他目前的送禮標準。

山縣拜訪了伊藤，并敦促伊藤組建內閣以發揮能力。次日，在回復中，伊藤向山縣坦白說，自己個性容易走極端。他還提到，井上馨很情緒化，動不動就掉眼淚。他擔心這些不足之處可能會給他成立的內閣造成破壞。相比之下，山縣擔任總理大臣期間，展示了自己寬嚴相濟的獨特能力。他請求山縣幫助。[[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1月8日，伊藤請求在天皇親臨的情況下召開會議，商議組建內閣的事宜。他無疑希望山縣和西鄉從道繼續擔任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他曾計劃邀請進步黨的領導人大隈重信加入內閣，以便鞏固與政黨的關系。但在1897年底，他和大隈商談加入內閣的可能性時，大隈沒有輕易答應。他開出的條件是自己擔任內務大臣一職，并讓進步黨的其他三名成員擔任內閣的主要職務。伊藤無法接受這些要求。[[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伊藤繼而轉向與自由黨建立關系。他拉攏板垣退助，只不過板垣也要求獲得內務大臣一職。伊藤拒絕了這一條件，認為如果政黨的領導人擔任內務大臣，將使即將進行的選舉出現傾斜。1月8日，他向天皇奏報說自己沒能獲得政黨的支持來鞏固新內閣。盡管遭到失敗，但東亞的緊張局勢以及國內外的諸多問題不允許推遲成立新政府。因此，伊藤力勸天皇召集元老討論這一情況，而他將在會議上提出自己的觀點。

1月10日，會議召開。伊藤對東亞局勢做出了悲觀評估。俄國從西伯利亞給清朝施壓，并占領了遼東、大連和旅順口；法國占領了云南地區；英國控制了長江的入海口；德國侵占了膠州灣和山東地區；英國軍艦正威脅著仁川。如果英國和俄國發生爭端，日本應站在哪一邊？他認為，鑒于日本兵備未實，財務未整，最好的辦法就是保持中立和維護自身安全。

山縣和其他元老都支持這一論斷，天皇也表示同意。過去，天皇在其親臨的討論中通常都保持沉默，但現在他直言不諱地表明自己的觀點。元老們一致推薦伊藤——有能力處理目前危機的唯一人士——來組建新的內閣。他們支持僅保留上一屆內閣的海軍大臣和外務大臣，并建議讓井上馨擔任大藏大臣，讓桂太郎擔任陸軍大臣，讓西園寺公望擔任文部大臣，以及讓芳川顯正擔任內務大臣。最終，伊藤組建了內閣。1月12日，松方卸任。

在準備3月15日舉行的眾議院大選時，內務大臣邀請各個縣的知事前來內務省，向他們說明了大選的重要性。他列舉了選舉程序中存在的弊端，提出有必要防范這些弊端，確保選舉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選舉候選人。眾所周知，上一次的選舉很不公正。候選人使用金錢、禮物、本票或財產來購買選票；選舉人遭到暴力或威脅；投票地點和選舉大會都發生了騷亂事件。雖然這些活動已經被嚴厲禁止，但違規行為越來越明目張膽。一個月后即將進行選舉，政府必須確保選舉活動有秩序地進行。候選人不得花錢買選票，選舉人不得遭受暴力或威脅。[[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2月8日，天皇發布了緊急命令，禁止參與選舉活動的人員攜帶槍支、長矛或棍棒。

選舉結果是：自由黨獲得九十八席，進步黨九十一席，山下俱樂部[[7]](#_7__Shan_Xia_Ju_Le_Bu_Shi_Yi_Ge)四十八席，其他小黨和獨立黨派獲得六十三席。在組建第二屆伊藤內閣時，板垣被任命為內務大臣，開啟了政府與自由黨合作的篇章，但此類合作并沒有結束，即使伊藤拒絕將板垣納入他的新內閣。選舉結束后，自由黨再次要求將板垣納入內閣，不然，他們威脅將給議會制造麻煩。但內閣揚言說，如果因為要給板垣騰地方而需撤換內閣成員，那么內閣成員將全體辭職。4月15日，伊藤向自由黨發函一封，拒絕任命板垣，并聲言將不與該政黨開展進一步的合作。[[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5月19日，議會召開。26日，政府提出了一項增加地稅、所得稅和清酒稅的議案。面對財政收入嚴重不足的情況，松方內閣早前提出了一項增加地稅和清酒稅的議案，但是還沒有對這項議案進行表決，議會就解散了。6月20日，當伊藤內閣再次提交這份議案時，議會以二百四十七票反對、二十七票贊成的壓倒性優勢否決了這一議案。隨后，伊藤解散了議會。[[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內閣和議會之間的僵局導致事態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新情況：自由黨和進步黨這對昔日的政敵，合并成立了一個新的政黨——憲政黨。6月16日，在召開的集會上，大隈和板垣就兩黨合并的迫切原因發表演講；21日，為準備第二天的新黨成立事宜，自由黨和進步黨解散。官方公告聲明如下：

憲法頒布、議會開設以來將十載，而此間議會解散已及五次之多，憲政之實全無，政黨之力亦未大伸，是以藩閥余弊尚固結，故破朝野和協，致國務遲滯。舉國忠愛之士深慨嘆之。今吾人鑒內外之形勢，斷然解自由、進步兩黨，廣糾合同志，組織一大政黨，更始一新，以期憲政之完成。因茲宣言。[[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在新黨提出的九條綱要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條：“樹立政黨內閣，嚴明閣臣之責任。”即今后將由從最強大的政黨中推選出來的總理大臣來組建內閣，取代天皇從來自薩摩藩或長州藩的人士（通常是在維新時期做出了貢獻的人）中選任總理大臣的通行做法。

對于這一綱要，伊藤做出的最初回應是籌備自己的政黨，這個政黨將由商人和熱心公益的愛國人士組成。很快，他獲得了其內閣成員的支持。不過，他們指出，為了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吸引選民，伊藤須在全國發表演講，并闡明政府的政策。他們還提醒伊藤，留給選舉前的競選活動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黑田清隆承諾，如果伊藤組建政黨，無論伊藤在哪里發表演講，即便自己拖著殘軀拄著拐杖也會陪同。

當井上馨拜訪山縣以尋求支持時，山縣回答道，“會同志以組織政黨非不可，然由政黨組織內閣則破壞明治政府之歷史，駁逆帝國憲法之精神，若遂行之，則明顯成西班牙、希臘諸國命運。”[[11]](#_11__Ta_Da_Gai_Yuan_Yin_Le_Xi_Ba)山縣措辭嚴厲地否決了伊藤的方案，使得黑田改變了支持新黨的想法，最終伊藤也放棄了這一計劃。

在成立憲政黨后，決心要維護現有政治體制的陸軍大臣桂太郎會見了山縣、井上和西鄉（從道）。伊藤表示，如果組建政黨的意愿遭到拒絕，自己將辭職，對此桂太郎深表遺憾。他提議說，如果伊藤無法處理政治時局，那么元老必須挺身而出。如果議會繼續反對政府，則可以解散議會；如有必要，還可以中止憲法。[[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天皇被這一局面攪得心煩意亂，6月24日，他召集伊藤、黑田、山縣、西鄉、井上和大山（巖）開會。伊藤在會上說道，大隈和板垣組建的新政黨在議會中占有多數席位，讓這兩人成立內閣已是無法避免的事實。山縣和黑田對伊藤的看法表示強烈反對，他們確信，如果讓大隈和板垣成立內閣，以及如果讓他們的內閣以該政黨的綱要作為根基，將與日本的國家政體相抵觸，并將嚴重違反帝國憲法的精神。

他們當著天皇的面繼續辯論，沒法達成一個解決方案。天皇的焦慮不安與日俱增，會議結束后，他召見了伊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繼續擔任總理大臣期間，伊藤應當請求自由黨與他合作，就像過去那樣。伊藤回答道，這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兩黨已經合并。伊藤建議，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大隈和板垣負責處理這一困難的局面。伊藤不僅要求辭職，還要求收回他的爵位和頭銜。[[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6月25日，天皇召見了山縣、黑田、大山、西鄉和井上。他告知說無法勸阻伊藤不要辭職。按照伊藤的意見，他和伊藤一致認為別無他法，只能推舉大隈和板垣作為接替人。七名內閣大臣立即請求辭職。當晚，伊藤私下會見了大隈和板垣，向他們簡要描述了極其嚴峻的國內外局勢。他說，他已經向天皇推舉他們二人，因為他們握有眾議院的多數席位，容易通過必要的立法來解決這場危機。他勸說道，如果天皇請他們效勞，希望他們能夠答應。第二天，他們告知伊藤說，盡管責任重大，但他們將當仁不讓。6月27日，天皇命令大隈和板垣成立新內閣。兩人宣誓說將竭盡所能，以報皇恩。[[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6月28日，大隈和板垣覲見了天皇，奏報說他們已經完成了內閣大臣的選任工作。天皇一邊看著名單，一邊對他們所選人士的性格進行了詢問。由于大多數人士為議會成員，因而沒有必要詢問他們的官場生涯、官位官階或勛章，但是，天皇想了解他們的為人處世。于是，大隈和板垣輪流對每個人進行了描述。天皇看到尾崎行雄時大吃一驚，問道，幾年前，尾崎曾遭受紀律處分，至今尚未赦免，推舉此人擔任內閣大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5]](#_15__Zhe_Da_Gai_Shi_Zhi_Fa_Sheng)第二天，當大隈和板垣進宮時，天皇重申，內閣大臣一職事關重大，任職之人必須盡忠履行職責，在處理國家大事時不能犯錯誤。也許這是在批評尾崎。

伊藤越來越確信，已經沒有辦法阻止在議會中獲得多數席位的黨派組建內閣。他清楚這意味著薩摩藩或長州藩統治的時代的結束，意味著自維新時起便與他關系密切的舊友主宰的時代的結束。事件發展的新態勢也讓天皇憂心不已。后來，松方告訴友人說，“未曾見圣上憂色如斯深”。[[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政黨內閣剛剛成為現實后不久，就有人推測它會短命。這個推測只是因為它是個特殊的內閣：隈板（大隈、板垣）內閣注定要瓦解的原因不是其成員來自于政黨，而是大隈和板垣的政見不可調和。6月30日，天皇讓新內閣宣誓就職。大隈擔任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板垣任內務大臣，尾崎行雄任文部大臣。

上任后不久，大隈召集各縣知事開會，解釋了政黨內閣的特征，并承諾公平選舉以及對各縣管理進行改革。他強調選舉是立憲政體的精髓，為確保公平選舉，將繼續對選舉進行嚴格控制，防止發生前幾次對選舉造成破壞的暴力、賄賂、恐嚇和其他事件。[[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7月14日，佐佐木高行帶著他照料的兩位公主進宮。在天皇準許接見后，作為天皇能夠暢所欲言的為數不多的對象之一，佐佐木說，他能夠想象到天皇因內閣更迭一事而有多么煩亂。天皇回答道：“今次內閣大變革如海嘯之一時襲來，其勢全然難抗。此全為時勢所然，故聽伊藤之奏請，命大隈、板垣組織內閣。而朕初以大隈為進步黨首領，板垣為自由黨總理，今共率憲政黨云云為由，信憲政黨為二人指揮，大臣等人選為二人所得。然絕非如此，二人對二人之黨勢力絕無，其意稍未行之，人選悉由黨本部決定，而自由、進步兩派調和未成，自由派推薦，進步派謂之不可，進步派推選，自由派謂之不可，而大隈、板垣亦不知如何操作，常為黨人操縱，為其要求所苦。二人于內閣之間暫安穩，然一度歸官邸，數十黨人長擁之，請托諸事，強要不已。朕最初以為委任大隈、板垣，則可整理相應庶務，遂行國政，然全繆也。”[[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

佐佐木問道，目前事態令人惋惜，這一聯合政權將來能否管理好國家事務？天皇答復道，未來雖難以預測，但很可能存在問題。最糟糕的大概就是文部大臣。“世評前大臣、次官中， 外山正一[[19]](#_19__Wai_Shan_Zheng_Yi___Ju_Chi)有學識，菊池大麓有事務之才，濱尾新無特別才能。新大臣尾崎行雄與濱尾不相伯仲，或有少許才干云云。蓋處文部之難局，期教育之振興極難也。”[[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天皇諷刺尾崎行雄，似乎反映出他對尾崎抱有深深的個人成見。

7月8日，尼古拉二世的表弟基里爾·佛拉迪米洛維奇（Kiril Vladimirovitch）大公對日本進行了國事訪問。盡管此類訪問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不再引起宮中的多大興趣，但他仍受到了天皇和皇后的體面款待。8月5日，板垣要求大隈辭去外務大臣一職，他說，為了便于接待俄國大公才準許大隈擔此職務。既然大公的訪問已經結束，現在該讓大隈放棄這個兼任的職務，保持兩黨均勢。板垣支持讓星亨或江原素六擔任外務大臣。大隈不愿辭職，從而導致了這個聯合政權第一次發生沖突。他們向最高權威天皇征詢意見。天皇認為，大隈應當繼續擔任外務大臣。他們當然都遵從了天皇的決定，但這卻加深了這兩個黨派之間的裂痕。

進步黨提議廢除警視廳，導致兩個黨派發生了第二次沖突。板垣向天皇草擬了一份聲明，說明了不應廢除警視廳的原因，但天皇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在這次沖突以及之后的政見不合中，自由黨背離了自由主義這一傳統，表現得比進步黨還要保守。

8月11日，文部省廢除了1881年以來所有旨在控制集會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的部長條例、官方通知、非官方通知、指令、私下指示等。在對這次大規模的行動進行解釋時，尾崎行雄說道，很多諸如此類的部長條例，在頒布相關法律后就顯得沒有必要了。其他為了矯正時弊的命令隨著時勢推移也已經過時。當然，其中的確有一些條例仍然休戚相關，但他認為，教育的問題最好是由校長、老師和從事教育的其他人士來解決。尾崎深信，這些條例是過去遺留下來的累贅，希望通過廢除它們達到教育改革。[[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8月22日，在帝國教育會夏令講習會的閉幕儀式上，尾崎發表了演講，其中的一句話非常顯眼：盡管日本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共和國家，但若真有那么一天，總統候選人應該來自于三井和三菱[[22]](#_22__Ri_Ben_Zui_Zao_Xing_Cheng_D)吧。也許他是用這種方式來表達當時拜金主義橫行，終有一天，（以這兩個巨頭公司為象征的）財富可能會統治這個國家。尾崎不假思索地發表了這句話，給了他的政敵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質疑他的愛國精神。他們問道，文部大臣怎么敢直言不諱地說出“日本有可能建立共和政府”這樣的話。“如果這番話不是為了摧毀日本的國家政體，那是為了什么？”《東京日日新聞》用義憤填膺的話語對尾崎進行了猛烈抨擊。新聞報道篡改他的講話，讓尾崎煩亂不安，他將講話的速記記錄公之于眾，以便對報紙發表的文章進行糾正，然而，他的對手卻聲稱他篡改了記錄。對尾崎的指責愈演愈烈，尾崎的講話也成為政府內外的一個爭議焦點。[[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8月25日，德大寺實則向尾崎傳話，向他索要演講的手稿。由于這是即席發表的演講，沒有副本，尾崎提交了一份速記記錄的謄清稿。[[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侍從長提出這一請求，表明天皇已經得知了關于尾崎發表冒犯性言論的傳聞，希望對這些言論進行審查。天皇還私下派遣巖倉具定帶著一封信前往大隈的府邸，信上說：“行雄為共和云云之演說，世論甚囂，恐難測將來惹起如何之難事。如此大臣難信任，應速辭退。”

在克服了畏怯和惶恐的心情后，大隈打算進宮親自向天皇說明情況，然而，巖倉說道：“既有宸決，卿奏聞亦無益處。若有要奏之事但告余。余代而奏之。”大隈問道：“臣亦不信任乎？” 巖倉答道：“此非余之所知。”巖倉回到宮里，向天皇奏報了他與大隈的談話。天皇說：“今回之事只限文部大臣，于他大臣無關系，可一同告知，而后令行雄提出辭表。”[[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天皇對尾崎演講中某個不合時宜的措辭所做出的反應，可能會讓如今的讀者覺得他反應過激。誠然，即使是提到將來有一天日本可能存在共和政體，也會被明治視為對萬世一系的皇統構成威脅，而讓他感到厭惡。然而，尾崎這番諷刺言論的矛頭明顯不是針對君主政體，而是針對唯金錢是圖的財閥。自從尾崎參與1887年的事件時起，明治似乎就已經開始對他反感。我們之所以得知天皇對這一事件的反應，是因為它保存在了佐佐木高行的日記中。早年前，這本日記還記載了天皇對身邊人士發表的種種批評，不過，他如此公開地表達自己的厭惡之情尚屬首次。

天皇的命令給議會政體制造了一些麻煩。如果他是君主專制政體的統治者，那他會下令砍掉尾崎的腦袋，或者不加審判便把尾崎流放到某個荒遠的小島。然而，日本有憲法、有內閣，且組成內閣的人士并非阿諛奉承者，而是有著自己綱領的政黨成員。巖倉擔心，大隈可能會以此作為理由，不遵從天皇下達的免去尾崎職務的命令，但當他發現大隈十分樂意遵從天皇的旨意時，大松了一口氣。

起初，天皇秘密派遣巖倉和德大寺將他對大隈下達的命令告知陸軍大臣桂太郎。桂太郎將這一消息傳達給了海軍大臣，他們對下一步舉措進行了討論。如果天皇在未等總理大臣提出請求的情況下解除某個大臣的職務，報紙勢必會以此大做文章，并且民眾也許想知道免職背后究竟有何原因。

很快，便有傳言說尾崎遭到了侍從和天皇近側人士的告發。佐佐木高行直言不諱地詢問德大寺這是否屬實。德大寺回答說，盡管他對尾崎的演講大為惱火，但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天皇面前提及。不過，尾崎的不當言論讓內務大臣板垣退助感到震驚，他請求大隈對尾崎采取行動。

改革派報紙《萬朝報》刊登了一篇社論，批判抨擊尾崎的“愛國者”是偽勤王、偽忠臣。文部省的一名官員高田早苗沿用《萬朝報》社論的觀點，發表了一篇演講。人們猜測尾崎是這篇演講的幕后策劃者，板垣命令警視廳進行調查。警察沒有找到他們相互勾結的有力證據，但板垣確信《萬朝報》的社論和高田的演講最終都出自于尾崎之手，于是催促大隈對尾崎進行懲處。

由于在大隈那里沒能得到滿意的答復，板垣向天皇彈劾尾崎，從而導致天皇命令大隈免去尾崎的職務。佐佐木詢問宮內大臣田中光顯，尾崎是否因侍從向天皇揭發而遭到免職，田中回答說，直接原因是板垣的彈劾，在板垣背后的是陸軍大臣桂太郎和總參謀長川上操六。此外，據田中說，桂太郎和川上頻繁拉攏他對尾崎采取行動，但他認為那些不是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因此一直都予以拒絕。

佐佐木詢問的每一個人都一致認為是板垣彈劾尾崎。[[26]](#_26__Zhen_Ye_Ying_Zhi____Ban_Yua)板垣受到了軍隊的煽動，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要免去尾崎的職務，還要以山縣為首的內閣來取代大隈內閣。陸軍大臣桂太郎（在沒有提供證據的情況下）聲稱，尾崎的“共和政體演講”使日本全國的軍隊彌漫著一種不穩的氣氛，借此來給內閣成員施壓。內務大臣板垣也提交了虛假報告，稱各地人心不安。[[27]](#_27__Zhen_Ye_Ying_Zhi____Ban_Yua)

桂太郎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曾敦促大隈勸說尾崎立刻向天皇負荊請罪。他確信天皇寬宏大量，不會對尾崎懷恨在心。他還警告說，要是延誤了請罪時機，可能會牽連到總理大臣。大隈將此告訴了尾崎，尾崎立即進宮，為他的罪行誠懇道歉。然而，他犯了一個錯誤。尾崎試圖解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發表了那番演講，聽起來好像是在為自己的言論開脫，這讓天皇十分不悅。最后，尾崎辭職。桂太郎寫道，他為尾崎道歉沒有奏效感到可惜。不過，對于故意煽動輿論致使尾崎辭職的桂太郎來說，這一說法未必真實 。[[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在尾崎離職后，下一步就是任命接替人來擔任文部大臣。憲政黨的兩個派別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板垣推舉教育家江原素六，并提出了一個條件：如果大隈不支持江原，那么大隈可以任命他中意的任何人來擔任文部大臣；作為回報，大隈須辭去外務大臣一職，并讓賢給星亨。大隈對這些建議置之不理。他進宮奏報了中意的文部大臣人選——犬養毅。天皇恩準。10月27日，犬養毅正式就職。大隈也沒有流露出要辭去外務大臣一職的跡象。

可以預料到的是，板垣惱羞成怒。在覲見天皇時，他譴責大隈言而無信，聲稱由于任命犬養毅擔任文部大臣，他和內閣的另兩名成員別無選擇，只有辭職。10月29日，在前自由黨的公眾集會上，成員們決定解散目前的憲政黨，成立一個拒絕進步黨的憲政新黨。[[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板垣向天皇提交了一份詳細描述不平的辭呈。

事態發展到這一地步，天皇感到萬分苦惱。他不希望在內閣成員中失去板垣，于是派侍從巖倉具定去請求板垣留任。不幸的是，天皇一貫信任的顧問伊藤博文當時正在清朝。山縣和井上也不在東京。為獲得更好的建議，他就憲政黨分裂一事向黑田和松方征詢意見。天皇擔心如果采用進步黨的成員來替代這三名已經辭職的自由黨內閣成員，自由黨可能會制造麻煩。問題是，應當成立一個由兩黨共同代表的新內閣，還是接受整個內閣的辭職、重新組建一個新的內閣？

大隈不愿辭職，希望用進步黨的成員來替換這三名已經辭職了的自由黨人士來維持內閣。10月29日，他請求覲見天皇，以表明這一看法。天皇沒有批準大隈的方案，而是支持桂太郎的建議——勸說板垣留任。另一方面，希望結束政黨內閣的黑田很高興尾崎的演講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當板垣宣布辭職時，黑田反對大隈繼續擔任總理大臣。他向陸軍和海軍大臣尋求幫助，10月31日，大隈（和以往一樣）以患病為由辭去職務。大隈辭職后，在內閣中任職的所有進步黨成員也紛紛辭職。只有無黨派的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留任。天皇接受了這些辭呈，就善后的策略向黑田、松方和大山巖求助。[[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第一次政黨內閣就此瓦解。

11月1日，山縣回到東京。第二天，天皇召見了他和黑田、西鄉、松方及大山，商議成立一個新的內閣。天皇提出了幾個問題：是否應成立一個非政黨內閣？是否應像過去一樣，試圖讓非政黨內閣在不借助政黨的情況下推動議會通過立法？成立一個由最大政黨的成員和資深政治家聯合的新內閣，是否更容易通過立法？山縣沒有直接對這些問題做出答復，認為這些事情均取決于天皇選用什么樣的人來組建內閣。

在遇到艱難的決斷時，天皇通常向伊藤征求意見，這次也不例外。他向身在清朝的伊藤發了一封緊急電報，令伊藤立刻返回。黑田擔心，伊藤回來后會再次建議任命大隈擔任總理大臣。于是在伊藤回來之前，他勸說山縣一同提議立刻解除大隈的職務并任命新的總理大臣。天皇最終同意，因為他知道山縣和黑田將向伊藤告知所發生的事情。

11月5日，盡管大隈還沒有正式辭職，天皇就已經命令山縣組建內閣。仍然希望獲得伊藤支持的大隈向清朝發送了緊急電報。另一方面，黑田和山縣提議說，必須盡快任命新的內閣，以便在召開下一次議會會議時發揮作用；他們強調，有必要成立一個超越黨派界限的內閣。桂太郎稱，舊自由黨成員淳樸善良而易于操控，希望這些成員（現在是大隈的政敵）將支持新內閣。[[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11月8日，山縣向天皇奏報了他選中的內閣成員，其中青木周藏擔任外務大臣，松方正義擔任大藏大臣，西鄉從道擔任內務大臣。同一天，大隈及其內閣成員（桂太郎除外）辭任。

對于天皇來說，1898年并非美好的一年。除了錯綜復雜的政治事務外（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入地參與其中），他仍不停地擔心皇太子的健康和教育。按日本的歷法計算，皇太子今年二十一歲了，這意味著他已經成年，但他的教育因反復發作的疾病而嚴重耽誤。伊藤意識到，當務之急是改善皇太子的身體健康狀況，但同時精神發展也不容忽視。因此，他力勸皇太子參加議會會議，以此了解政治和軍事問題。[[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皇太子也流露出要認真承擔新職責的跡象。6月，他第一次接見了外國外交官，和他們握手，并與他們親切交談。

不過，天皇時常認為有必要對他的兒子進行勸誡。在得知皇太子告訴眾人，由于手下工作不力而打算解雇手下時，天皇表示不安。他訓斥了皇太子，說那并非是對待手下的妥當方式。如果皇太子對他的服侍不滿意，應當私下向宮內大臣進行匯報，并等待天皇的命令。[[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11月，皇太子被晉升為陸軍少校和海軍少校。在上一年，天皇曾拒絕這類晉升，認為皇太子的年齡尚不足以擔此重任，但今年他讓了步。[[34]](#_3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不用說，皇太子無需履行與這些頭銜有關的義務，盡管這一年他的健康狀況有了顯著改善。[[35]](#_35__11Yue_11Ri__Dui_Ta_Jin_Xing)

在這一年，天皇最愉快的經歷大概就是觀摩在大阪地區舉行的大規模演習。無論刮風下雨，他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奔赴“前線”觀摩在南軍（試圖奪取大阪的外國侵略軍）和保衛大阪的北軍之間上演的模擬戰爭。演習結束后，他感到很滿意，但在給軍隊的欶語中提醒說，“時運日新，決不可有瞬時之偷安，益勵精以期他日之功”。[[36]](#_3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不幸的是，我們無法更多地獲知天皇所流露出來的個人內心感受。他于該年創作的詩歌技巧嫻熟，但在感情表達上偏于常規，不過，也許下面這首短歌就是為了傳達他的個人感受而作：

五月雨打窗

宮中臥聽一日盡

無寐愁字長

怎奈苦悶訴與誰

聽任急雨續惆悵[[37]](#_37____Xin_Ji_Ming_Zhi_Tian_Huan)

1. [[1]](#_1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60—361頁。

1. [[2]](#_2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63頁。

1. [[3]](#_3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64頁。

1. [[4]](#_4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70頁。

1. [[5]](#_5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71—372頁。

1. [[6]](#_6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84—385頁。

1. [[7]](#_7_49) 山下俱樂部是一個支持工業權益的黨派，沒有強大的政黨組織，在第六次大選時解散。

1. [[8]](#_8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25頁。

1. [[9]](#_9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45頁。

1. [[10]](#_10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51頁。

1. [[11]](#_11_49) 他大概援引了西班牙和希臘來作為因內部戰爭而導致國家四分五裂的例子。

1. [[12]](#_12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54頁。

1. [[13]](#_13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55頁。

1. [[14]](#_14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57—458頁。

1. [[15]](#_15_48) 這大概是指發生于1887年12月的事件。當時，各種機密事項被泄露給了媒體，在青年政治活動家中掀起一場騷動，這些人要求減輕賦稅、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并要求糾正外交政策中的失誤。尤其是井上馨的方案，更激起了他們的憤怒，該方案允許外國法官在日本法庭中任職，以及允許外國人在內陸生活。在第一屆伊藤內閣中擔任內務大臣的山縣頒布了由七條組成的《保安條例》，禁止成立秘密協會、禁止戶外集會、禁止擾亂治安等。因參與了此次騷亂事件，尾崎行雄成為被驅逐出東京的逾570人中的其中一位（《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856—858頁。）。

1. [[16]](#_16_4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60頁。據說，對“民主是否意味著國家存在的理由就是獲得私人權力和私人利益”所進行的長期抨擊，此時已讓天皇受到了鼓舞。這一抨擊是由擔任多屆內閣成員的野村靖發起，他認為政黨政策與君主政體不相調和。

1. [[17]](#_17_4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67頁。

1. [[18]](#_18_47)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74頁。

1. [[19]](#_19_47) 外山正一、菊池大麓和濱尾新都擔任過文部大臣。——譯注

1. [[20]](#_20_4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75頁。盡管天皇在這些話中對濱尾新給予了苛刻評價，但實際上，濱尾新是個杰出的教育家，曾兩次擔任東京大學的校長。

1. [[21]](#_21_4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89頁。

1. [[22]](#_22_45) 日本最早形成的、以家族為中心的四大財團中的兩個（另兩個為住友和安田）。——譯注

1. [[23]](#_23_45)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91頁。

1. [[24]](#_24_43)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92頁。

1. [[25]](#_25_43)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14頁。

1. [[26]](#_26_43) 榛葉英治，《板垣退助——自由民権の夢と敗北》，第296頁。榛葉寫道，板垣關于自由和人權的哲學已經完全“褪色”。

1. [[27]](#_27_42) 榛葉英治，《板垣退助——自由民権の夢と敗北》，第297頁。榛葉認為，從根本上來說，針對尾崎的陰謀是星亨的杰作。在1892年被解除了眾議院議長一職的星亨，此時正擔任駐美公使。但是，在得知大隈和板垣成立聯合內閣時，他在未獲得天皇同意的情況下，趕忙返回日本，迫切地希望結束這一行動。

1. [[28]](#_28_3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17頁。

1. [[29]](#_29_3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27頁。

1. [[30]](#_30_37)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31頁。

1. [[31]](#_31_35)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40頁。

1. [[32]](#_32_34)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41頁。如需了解對皇太子健康狀況的擔憂，請參閱第393頁、第412頁、第414頁、第418頁、第544頁。

1. [[33]](#_33_33)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05頁。

1. [[34]](#_34_33)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37頁。

1. [[35]](#_35_30) 11月11日，對他進行了體檢。醫生奏報說，他左胸的濕羅音沒有消減，但胃腸炎有了好轉，胃口也有了改善（《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44頁）。

1. [[36]](#_36_2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48頁。

1. [[37]](#_37_25)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一卷，第318頁。

# 第五十章 義和團運動



為結束治外法權而進行的長期斗爭在1899年終于結出碩果，日本獲得了和其他世界大國平起平坐的地位。不過，對于明治天皇來說，在他人生的第四十八個年頭，最重要的事情是私事，與修改條約無關。

新年伊始便不吉利。1月，就在英照皇太后過世整整兩年的同一天，天皇最小的孩子喜子公主夭折。他下令降半旗致哀，取消了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教學活動，并且還像往常一樣發布命令，禁止在東京和周邊地區舉辦歌舞。但是，在天皇以“田家煙”為主題創作的新年詩歌中，并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悲傷之情。

這一年，皇太子第一次參加了年度首次詩會，表明眾人希望已經成年的皇太子能夠作詩。皇太子的教育問題在這一年中也被經常談論，比如說，如何在不損害健康狀況的情況下增加學習內容。他與父皇的關系仍然拘謹而疏遠，甚至在他和眾姐妹想進宮謁見時，天皇也很少接見他們。2月，兩位公主為了逃離東京的寒冬準備前往鐮倉。她們進宮與父皇告別，但天皇因為身患感冒拒絕讓她們來到自己的面前，反倒是皇后，雖然也生了病，仍然堅持要接見她們。[[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女官們無法理解為什么天皇堅持拒絕接見自己的女兒，因為從天皇關注女兒們的和服樣式等瑣碎小事中，可以看出他對女兒們傾注的父愛。她們常常懇請天皇時常去看望自己的女兒，但他并不接受建議。

佐佐木高行用天皇接受的是儒家教育來解釋他的表面冷漠。天皇自幼崇尚中國的經典著作，并將為什么某些國家興、某些國家亡的論述牢記在心。他拒絕采納女官的建議，大概是因為他曾讀到一些關于皇帝聽從婦人之言而導致災難的例子。佐佐木承認，天皇也許有些過度謹慎，有時候甚至還拒絕接受身邊人提出的好建議，但這總比聽從宮中婦人之言而導致宮廷發生動蕩要好得多。甚至可以說，天皇正在扭轉這一積年惡習。也許佐佐木說得對，但再怎么說，接見自己的女兒也不可能導致國難。明治似乎把歷史的教訓過于當真。

1899年2月，出于為天皇的健康著想，御醫建議天皇去京都生活一段時間。他們請求侍從長德大寺實則勸說天皇，但德大寺沒有成功。之后，他們請求宮內大臣田中光顯勸說。于是，在天皇接見時，田中直言不諱地奏報說，御醫認為天皇越來越胖了，如果不通過運動來控制體重的增長，很可能引發心臟病。田中用舊式的表述方式說道：“夫陛下乃一國之主，萬民所倚之所在，其一身為陛下之一身，亦非陛下之一身。其努力攝養，非只為陛下之一身，實為天下蒼生。然今年政務煩巨，圣躬甚勞，陛下若在東京，恐寸暇不許。臣聞，二十八年結日清講和談判之局，大纛由廣島旋京都，駐蹕一月余，此間朝夕運動，健康甚勝。蓋京都為陛下降誕之地，山川風物皆陛下舊識。即游故園，必適圣躬也。然東京宮城，自陛下徙御后雖已及三十年，然本為幕府之古城，雖有廣闊園池，不乏風趣，然終非陛下舊識。守衛亦嚴，難享逍遙自便。昨年統監陸軍特別大演習于攝泉（攝津、和泉）之野，置大本營于大阪，未幸相距僅十余里之京都。當時人或言之，陛下幸大阪而未幸京都，是陛下不愛京都，然實有前二十八年之事，蓋知非此意。伏愿容侍醫之奏請，暫幸游京都，恢復圣體之健康。”

田中知道他這番言論不受歡迎。天皇面露慍色，說道：“侍醫局長之請，朕非無謂而拒之。京都為朕故園，如卿所知，為朕常愛之所，然以愛之為由即可游之乎？雖可為一身之攝養，然政務停滯則如何？去年朕以大演習統監幸大阪未游京都，此朕為愛京都之情所驅，一旦游該地，恐至不欲還東京，故自抑制，卿等何不解也？卿之所奏，固非無理，然朕若廢一日政，則累百司，故不能為一身之攝養，廢一日之政務。朕只應孜孜行帝道，此為朕盡天職之所在。為此死，則達朕之至愿，可謂足矣。”

天皇說著話，表情漸漸柔和下來。他繼續說道：“卿等為朕所憂之所，亦可安心。自今務運動，圖健康之回復。卿等無需復深勞意。”從那以后，他偶爾在御花園里散散步，或者做做運動，但沒過多久，他就放棄了這些努力。[[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天皇對體重很敏感。據侍從子爵日野西資博回憶，天皇因為在《中央新聞》上讀到一篇文章而停止了讀報。這篇文章說，天皇的體重超過了七十七公斤。天皇對這篇文章很是生氣，說道：“要是該報刊載的是實情，則不會憂擾到朕。可是，朕無法忍受謊言。朕再也不讀報了。”[[3]](#_3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_T)

盡管如此，但天皇于1905年作了一首詩，這首詩表明他仍在繼續讀報，至少是偶爾在讀，雖然報上的錯誤繼續激怒他：

闊談天下事

字字句句惹遐思

今人捧讀之

難忍謊言敗其絮

若無糟粕更是欣[[4]](#_4____Xin_Ji_Ming_Zhi_Tian_Huang)

很顯然，天皇的體重增加與他對騎馬失去了興趣有關，過去騎馬一直都是他最喜歡的娛樂活動。而如今，工作似乎成了唯一能讓他產生興趣的事情。我們不清楚他每天究竟把多少時間花在了辦公室里，但是，他似乎并沒有像同時期奧匈帝國的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皇帝那樣從清晨到深夜都坐在辦公桌前仔細研讀官方文件。他繼續過度飲酒，盡管此時已從清酒轉向了葡萄酒。他的胃口依然很好，這可以從他向來訪政要提供的晚宴菜單上看出來。[[5]](#_5__Bao_Kuo_1905Nian_7Yue_26Ri_X)

此時,私事之中最占據他精力的是為皇太子找一個太子妃。1899年，皇太子將滿二十歲。天皇希望在皇族里找到這樣一個女孩，如果皇族里沒有合適的，那么還可以考慮出生于上層貴族家庭的女孩。如果擴大物色范圍后仍無法找到太子妃的合適人選，那么將從父親是公爵的女孩中進行挑選。[[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早在1891年，天皇曾令德大寺實則派一些女孩作為昌子和房子公主的玩伴前往高輪東宮御所。這些女孩來自上層階級，對于與皇太子成婚來說，她們的年齡正合適。他進一步指示佐佐木高行觀察每個女孩的外貌和品性。結果，有一個候選人脫穎而出，她就是第十師團團長貞愛親王的女兒禎子。貴族女子學校的校長下田歌子強烈推薦禎子，宮內大臣土方久元將此奏告給天皇。禎子將被選為皇太子妃似乎已是確信無疑的事情。

為了看一看禎子，1896年12月，天皇和皇后造訪了貞愛親王的府邸，但直到1899年2月才召開了第一次正式會議，討論禎子是否為太子妃的合適人選。[[7]](#_7__Can_Jia_Hui_Yi_De_You_De_Da)在會議中，人們發現禎子在兩年前患上了闌尾炎。宮中醫師在醫學檢查報告書中提到，盡管她已經完全康復，但在右胸聽到肺泡呼吸音。這導致人們有些擔心她的健康狀況，不過，大多數醫生認為這一問題很可能在兩三年之內便能治愈。[[8]](#_8__Yi_Shi_Gang_Xuan_Qing_Que_Xi)然而，這一消息讓天皇感到很苦惱，他擔心禎子在健康方面的這個缺陷可能會威脅到皇族子嗣的延續。1899年3月22日，他派宮內大臣前往貞愛親王的府邸，宣布解除將禎子迎為太子妃的私約。

事情的發展似乎并沒有讓皇太子感到失望；事實上，他可能還不知道物色太子妃的活動已經開始了。無論如何，他還沒有從1895年的那場大病中完全恢復過來，而且學業也很糟糕。正如侍從抱怨的那樣，皇太子任性善變，難以取悅。皇太子沉迷于西方的事物，讓天皇很惱火。他喜歡在交談中冒出幾個法語單詞，而且還沒有打好傳統文化的基礎。[[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皇太子在當時獲得的一些勛章可能激起了對西方的喜愛之情，這些勛章包括西班牙的金羊毛勛章、法國的榮譽軍團勛章以及丹麥的大象勛章。[[10]](#_10__Zhe_Xie_Xun_Zhang_He_Qi_Ta)

此時皇太子的活動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他經常在位于葉山和沼津的別邸逗留。他避開東京（在后來的幾年，這幾乎是一種病態的強迫觀念），大概是因為他不喜歡天皇及其幕僚們在宮中悉心營造的莊嚴肅穆的氛圍。

1899年8月28日，天皇為慶祝修約成功舉辦了一場宴會。新修改的條約已于8月4日生效。在宴會上，天皇和皇后向代表們舉杯，祝福各國的統治者健康，并與賓客們一一握手。治外法權“砰”的一聲結束，不過不是大炮的聲音，而是開啟香檳酒的軟木塞的聲響。這本應是一個值得舉國上下共同歡慶的時刻，然而，這一天也只是在稍微有點意識到這一事件的重要性的情況下度過。

雖然很多外國居民擔心，在領事法庭向他們提供的保護結束時會出現最糟糕的情況，但是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逮捕，沒有手持法規記錄簿的日本警察進行搜捕，也沒有關于外國人被拷打虐待的報導。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往的種種擔心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外國人也開始想知道，為什么他們以前會認為失去了治外法權這一盾牌，就將會受到殘酷虐待。然而，即使是在新的時代開始后，要想讓外國人拋棄他們的優越感，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為了向外國人證明日本人有資格管理好自己的國家，很多日本人做出了種種努力，內心漸生怨恨。正如一位英國學者所評論的那樣，“雙方的姿態已經成為習慣，即便情形發生變化也不會簡單地改變過來”。[[11]](#_11__James_E__Hoare___Extraterri)這也就是為什么治外法權的結束沒能帶來明顯的喜悅之情。

8月21日，天皇決定讓皇太子與公爵九條道孝的第四女節子結婚，但是，皇太子的健康狀況不穩定，致使婚禮被推遲到了第二年春天。直到1900年2月，皇太子才得知了這一決定。當時，天皇派巖倉具定攜帶一封簡短的書信前往葉山，信中天皇將為皇太子選定的新娘的姓名告訴了皇太子。[[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服務于皇室的醫生歐文·貝爾茨于1900年3月23日寫道：

今天，召開了與皇太子有關的重要會議，討論他的健康狀況，確定能否在5月舉辦婚禮。我和橋本、岡一致認為，盡管出現了一些小小的不良癥狀，但舉辦婚禮是沒有問題的。去年，皇太子沒花多少時間就恢復了體重。然而，在向天皇奏報時，沒有人提到這一事實，天皇差點兒就要把婚禮推遲到皇太子的體重完全恢復后再舉行。伊藤侯爵、有棲川宮親王以及皇太子的侍從都認為婚禮不能再推遲了——因為已經決定讓（和東方習俗完全相反）皇太子在結婚前不可接觸任何女性。鑒于此類情況（無論是一般情況，還是特殊情況），我認為立刻舉辦婚禮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13]](#_13__Erwin_Baelz_Awakening_Japan)

1889年10月，皇太子乘坐軍艦從沼津前往神戶、廣島、小豆島、江田島和內海地區的其他地方。他將在一年后開始更加雄心勃勃的九州之旅。這些旅行讓皇太子了解了他將來要統治的國家，并加強了與未來臣民之間的聯系。不過，這些旅行都不像明治統治前期的巡幸那樣艱苦或重要。如今，旅行變得更加容易，工業化也得到了推進。皇太子視察的地方主要是八幡市的鋼鐵廠和長崎市的三菱造船廠。

1900年5月10日，皇太子嘉仁與九條節子舉行了婚禮。5月8日，天皇向皇太子贈送了一套禮服和一把劍。恰恰就在皇太子接收這些禮物的時候，他的生母柳原愛子前來探望。皇太子請她向天皇傳達謝意。據說，皇太子第一次得知他是愛子的兒子時，即驚訝又沮喪，因為他一直以來都以為自己是皇后所生。[[14]](#_14__Jia_Teng_Ren____Ming_Zhi_Ti)這個故事在宮女中流傳開來，甚至傳到了愛子的耳朵里。她是明治的所有側室中最美麗、最聰穎的一位，但因皇太子身體羸弱而受到指責（她也感到自責）。她的名字幾乎都沒有出現在《明治天皇紀》中。[[15]](#_15__Da_Zheng_Cheng_Qi_Mu_Qin_We)



嘉仁皇太子，即后來的大正天皇



太子妃九條節子，即貞明皇后。1912年拍攝

5月9日，就在大婚的前一天，皇后向節子授予了勛一等寶冠章，這是女人能夠獲得的最高級別的勛章。為慶祝這一盛事，天皇和皇后向東京市贈送了八萬日元，向京都市撥款兩萬日元，用于教育事業。[[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天皇還獎勵福澤諭吉——啟蒙教育的中心人物——五萬日元，并發布詔書，贊賞他對教育做出的貢獻。

第二天黎明，天皇派人向宮中賢所匯報了皇太子大婚的喜訊。8點40分，皇太子和皇太子妃在賢所進行了祭拜。皇太子向神靈朗讀了告文，夫婦倆按照禮節在神前喝了清酒。婚禮司儀向天皇和皇后奏報說婚禮儀式完成，陸軍和海軍鳴放禮炮。10點40分，天皇穿著盛裝，和皇后一同出現在迎賓館內。皇太子和皇太子妃被婚禮司儀領到皇室家族的面前。天皇和皇后賜給皇太子和他的新娘清酒。

這時，婚禮已經結束；11點20分，皇太子和皇太子妃登上一輛馬車前往皇太子的東宮御所。皇宮正門外擠滿了密集的人群，有二十分鐘他們的馬車無法向前行駛，最終費了很大一番工夫才清出一條路來。天皇派侍從長攜帶大勛位菊花章前往皇太子的東宮御所。在皇太子和皇太子妃共同進行了例行儀式后，他們回到皇宮，同天皇和皇后一同進餐。4點30分，皇室家族出現在鳳凰之間，接受貴族成員、高層官員和外交使節團的祝福。[[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5月24日，就在皇室婚禮的興奮之情剛剛平息后，不時表示想辭去總理大臣一職的山縣有朋再次請求天皇恩準辭職。他說自己擔任總理大臣已有一年半的時間，在此期間，修約也生效了。他認為，未來的總理大臣應該由非常了解國外局勢的人來擔任，自己本不具備這一資格，但大隈內閣倒臺后政府出現的殘局迫使他接受了總理大臣一職；但現在政壇穩定，沒有危機，于是他請求辭職。

天皇屢次試圖勸說山縣改變主意，然而，山縣堅決拒絕繼續留任。最后，接受了將失去山縣這一事實的天皇向伊藤博文傳話，希望伊藤能接受這一職務。伊藤拒絕了，他說即使這是天皇的下令，他也無法接受這一命令。在伊藤看來，想要組建內閣，只有經過議會批準后才能按照憲法進行組建，此外，政府不得不通過與政黨合作才能發揮作用。和山縣不同，他無法向戰場上的將軍那樣發號施令，他的任何一個失策都很可能會牽扯到君王。

隨后，天皇命令松方正義在擔任大藏大臣的同時暫時兼任總理大臣一職。松方予以回絕，提議讓陸軍大臣桂太郎擔任；然而，天皇不同意這一提議，因為此舉勢必會加劇目前已經出現的陸軍和海軍之間的競爭。

就在這個時候，宮中得知了清朝發生動亂的消息。天皇高度關注，于5月31日向山縣傳話，說他了解山縣非常希望辭職，但在這樣的節骨眼上更換總理大臣極不妥當。他讓山縣把辭職時間延期。山縣回答說，華北騷亂只不過是無知的農民發動的暫時性暴動，無需太當回事。這場動亂遠沒有嚴重到足以讓山縣改變辭職的想法。不過，山縣說，如果找不到接替人，他同意再留任一兩個月。[[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

山縣大大低估了華北動亂的重要性，西方將這場動亂稱為“拳亂”（Boxer Rebellion）。[[19]](#_19__Zhi_Suo_Yi_Zhe_Yang_Cheng_H)較之于山縣，天皇似乎更準確地把握到了清朝局勢的嚴峻性，他同意山縣暫時留任。

八個國家出兵約四萬五千人[[20]](#_20__Chu_Le_Zhen_Ya_Yi_He_Tuan_D)（約一半是日本軍隊）一同鎮壓被山縣輕視的小暴動。數以萬計的清朝人在這場戰斗中喪生。這場暴動——更確切的稱呼應該是“戰爭”[[21]](#_21__6Yue_19Ri__Qing_Zheng_Fu_Xi)——是清朝和八國聯軍之間發生的一場重大沖突。更重要的是，它成為導致1902年英日同盟和1904—1905年爆發日俄戰爭的直接原因。

這些起義者的中文名是“義和團”（意指“正義、和平的聯盟”），這表明與過去以擁立新的統治者為主要目的的起義不同，義和團的成員認為，他們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理想而發起一場運動。他們確信，實現目標的唯一方式，就是將深受基督教影響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驅逐出中國。[[22]](#_22__Yi_He_Tuan_Ke_Yi_Zhui_Su_Da)并非所有的起義者（在當時的文件中均被稱為“拳匪”）都是狂熱分子，但是，大多數起義者都認為他們受到了中國神靈的庇佑。他們相信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在發動起義的過程中，他們殺了大約二百五十名歐洲傳教士和多名外國軍人，以及大約兩萬三千名清朝基督教徒。[[23]](#_23__Xiao_Lin_Yi_Mei____Yi_He_Tu)

在19世紀爆發的一系列反對清政權的腐敗墮落以及外國列強的屢屢羞辱的暴動中，這場暴動是最近的一次。最大的一次——太平天國運動——從1851年持續到了1864年，估計有兩千萬民眾喪生。太平天國運動是為了實現一個可以稱為原始共產的準基督教的意識形態。所有財產歸信徒共同所有；男女享有平等權利；禁娼妓、蓄奴、纏足、賭博、鴉片、酗酒和煙草。這種理想（很多都被義和團所采納）表明起義者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況感到不滿。清政府費了很大的勁才把太平天國運動鎮壓下去，如果沒有外國列強的插手，這場運動或許就成功了。

1861年到1863年，另一場暴動席卷太平天國運動未涉及的山東省，這場暴動是由一個叫做“白蓮教”[[24]](#_24__Zhe_Zhi_Jiao_Pai_Yin_Gu_Li)的佛教宗派的成員發起。義和團運動也興起于山東省，并從山東蔓延到華北的其他地方。它以宗教信仰為依托，結合了對傳統神靈的崇敬和對基督教的仇視。其成員認為是基督教摧毀了鄉村的安寧與和諧。義和團得到了貧困農民的強烈支持，不過，只有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即使他們也和農民一樣仇視外國宗教）參與到這場運動中來，也許是因為他們無法放棄孔子（孔子是山東人氏）的和平理念。

義和團對基督教信徒的仇視似乎是因為后者無情地打碎他們供奉的“偶像”，有時候還在大多數村民祭祀供奉的寺廟地基上建造教堂。[[25]](#_25__Shan_Dong_De_Di_Yi_Ge_Shi_L)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劃分改變了鄉村生活的結構，對這種變化的怨恨情緒導致發生了針對“洋鬼”和中國基督徒的暴力運動。[[26]](#_26__Ru_Xu_Le_Jie_Gei_Xiang_Cun)

1897年，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省被殺，揭開了這場暴力運動的序幕。1898年，德國政府以此事為契機，強迫清朝出借青島，租期九十九年，并占領了膠州灣一帶。同年，因德國獲得了租借地，借此受益的英國從日本手中接管了位于山東北部沿岸的威海衛。自清日戰爭結束后，威海衛便被日本占領，作為支付下關條約中約定賠款的擔保。這些事態的發展激起民眾發起更大規模的反洋人運動，運動從山東擴大到臨近的河北。



戰敗被抓的義和團團民

在村里，民眾成立了民團，旨在保護當地的寺廟免遭基督徒的襲擊。民眾期待著神靈會庇佑村民，他們建造了祭壇，通過在祭壇前磕頭來從神靈那里獲得神秘的力量。那些有神靈附體的人非常有信心取得勝利，并確信外國人的刀槍傷害不了他們。[[27]](#_27__Xiao_Lin_Yi_Mei____Yi_He_Tu)在準備即將到來的戰斗時，他們積極投身于練習義和拳和其他武術，而對使用外國槍支嗤之以鼻。

和日本的“神風連”及類似團體的成員一樣，義和團的領導人致力于消除外國勢力的影響。一些近代史學家對義和團在反抗對中國傳統生活方式造成威脅的外國人時表現出來的勇氣大加贊賞。然而，仇外并非一種美德，此外，不該忘記的是，義和團的大多數犧牲者都是中國農民。

1900年5月30日，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就華北的“拳匪”活動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奏折。當月的早些時候，青木已經從美國國務卿那里獲悉了德國傳教士被拳民殺害一事。[[28]](#_28__Ban_Gen_Yi_Jiu_Bian____Qing)青木在奏折（其回憶錄中沒有提到）中描述了清朝在清日戰爭戰敗后弱點畢現，歐洲列強強迫清政府出借作為戰略基地的要地。之前清政府中有一個強硬的進步派，但外國列強的侵略行動讓要求驅逐外國人的保守派掌握了清政府的控制權，這使得清政府被置于極端保守的慈禧皇太后的控制之下，而無能為力的皇帝被囚禁在宮中。

民眾越來越頻繁地表現出仇恨情緒，無論是在街上侮辱遇到的外國人，還是公開的暴力運動。據說，清政府打算關閉口岸，驅逐蠻夷。在日本人看來，這似乎就像是在重演日本四十年前的歷史。拳民的口號“扶清滅洋”，與保皇派打著的“尊王攘夷”的旗號如出一轍。很明顯，這個效勞于統治階級的告白讓清政府很滿意，[[29]](#_29__Qing_Zhao_Tai_Zi_De_Sheng_F)不過，當拳民發出“扶清”的呼聲時，他們要的并非挽救清朝政府，而是要從所仇視的外國人的手中解救中國。[[30]](#_30__Xiao_Lin_Yi_Mei____Yi_He_Tu)

6月6日，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31]](#_31__Da_Shan_Zi_Bian____Bei_Jing)向青木描述了起義愈演愈烈的情況。無力緩和局面的清政府開始漸漸支持起義者。俄國正從西伯利亞派兵前往清朝以及德國軍隊即將從青島抵達的消息傳到了日本。公使館的一名成員被起義者殺害，日本覺得他們不能只是袖手旁觀。6月15日，內閣召開會議，決定派遣步兵、炮兵、騎兵和工程部隊，保護在清朝的日本僑民的生命安全。天皇立刻準奏。[[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此時，“聯軍”[[33]](#_33___Lian_Jun__Bao_Kuo_Ri_Ben)的船艦已經在天津的大沽口集結。6月17日，聯軍艦隊對清朝的炮臺開火。這次開火（和后續軍事行動）名義上是各國為了保護被圍困在北京的外國民眾的安全，然而，清政府被激怒，并決定利用拳民將外國人和本國基督徒驅逐出境。

6月19日，日本船艦在海軍中將東鄉平八郎的指揮下，與其他聯軍合作，攻占了大沽炮臺。清廷外交大臣立刻代表政府向各國公使發布消息，命令他們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北京城，清朝軍隊將護送他們到天津。第二天，德國公使在前往總理衙門的途中遭到清軍的伏擊，遇襲身亡。這讓（之前同意前往天津的） 外國人對清政府做出的保護承諾產生了懷疑。他們決定撤回到公使館，進行自我保護，直到援軍抵達。[[34]](#_34__Da_Shan_Zi_Bian____Bei_Jing)

6月21日，清朝皇帝頒布詔書，宣布向聯軍宣戰。詔書稱：“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梟張，欺臨我國家，侵占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圣。我國赤子，仇怨郁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毀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肯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夙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公然有社士蘭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嚇，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因此，“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抗慨以示師徒，與其茍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韃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6月29日，皇帝又下了一道完全矛盾的詔書，號召鎮壓起義，重新恢復與外國的友好關系。據說，之前的詔書是由端親王口授的，后一道詔書才是皇帝的真實意愿。[[36]](#_3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但是，第二道詔書似乎被忽視了：戰爭在繼續，圍攻外國公使館的戰斗持續了將近兩個月，直到聯軍占領北京。[[37]](#_37__Ru_Xu_Le_Jie_Yu_Wei_Gong_Yo)

在此期間，按照皇太后的懿旨被準許進入北京的義和團拳民繼續行動。他們焚燒教堂和外國人的房屋，搜尋并殺死基督教信徒和與外國人有關的其他人。外國公使館不斷遭到襲擊，一些建筑被焚毀，但外國人并沒有投降。

7月3日，清朝皇帝向明治天皇發了一封電報，請明治調停，以恢復秩序。光緒皇帝在電文開頭使用的稱呼（“大清國大皇帝問大日本國大皇帝”），表明他將明治視為地位相同的人。光緒說清朝與日本相互依存的關系就如同“唇齒相依”一般。他對日本公使館的成員被殺表現出了極大的悲憤，但他補充說，盡管清廷當局正在逮捕和懲罰犯罪之人，但外國列強已經襲擊并占領了大沽炮臺。他警告說，東西方之間存在著對抗，貪婪的西方國家難道只是對清朝虎視眈眈嗎？如果清朝無法抵抗外國列強的侵略，日本想要孤身自保恐怕也會很困難。他力勸日本和清朝停止戰斗，摒棄微不足道的分歧，共同維護穩定。他讓日本天皇放心，稱清軍將會繼續處置這些“拳匪”。[[38]](#_3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4)

對于清朝皇帝的提議，明治沒有給出答復。相反，他宣布，如果清政府能成功鎮壓起義——以此表明自己不想與外國開戰，那么日本會很樂意恢復傳統友誼。他堅稱，清政府應停止對北京的圍困，如果清政府做不到，那么日本別無選擇，只好派兵來平定起義、解救僑民。[[39]](#_3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恰巧在這個時候，侍從長德大寺實則請求天皇準許他辭職。天皇大怒，答道：“凡華族仕朝廷，宜決心犧牲其身供之，以致奉公之誠。然妄談辭職，以謀一身之安逸，其志真惡。縱卿幾度辭職，朕亦斷然不許。本來今之官吏，由士族起者多，恣意放縱，動即以辭職遁避一時，徒貪一身之安，朕常為之不快。然其身本為華族者亦效仿之，獨陷朕于苦境，不忠無出其右。”[[40]](#_4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在統治初期，明治因忽視工作遭到伊藤博文和其他官員的訓斥，但現在，他似乎已經完全沉浸到國事當中。他已經琢磨著要成為一位負責任的天皇，而非享受特權的天皇；他認為，比武士階級表現得更有責任感，是像德大寺這樣的貴族義不容辭的義務。責任觀已經支配著他的想法，他將每個“因健康之故”而提出的辭職視為一種背叛。

7月9日，聯軍和清軍在天津賽馬場附近展開了一場重大戰役。日軍作為先鋒，參與了當天的大部分戰斗，擊退了清朝的守衛者——由兩千名精銳士兵和大概五百名拳民組成的軍隊。清軍將領聶士成戰死，其部下在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后潰逃。聯軍方面，有三十余名日本士兵和八名英國士兵喪生。日本步兵表現出來的英勇行為和作戰技能得到了其他國家的稱贊。

7月13日，聯軍開始對天津城發動攻擊。日本、英國、美國和法國的軍隊從南部發動襲擊；俄國和德國的軍隊從東北方向進攻。清軍由大概一萬四千名正規軍和約一萬名拳民組成；聯軍將近八千人。天津城由高約八米的堅固城墻環繞。13日那天的戰斗并非決定性的一戰，但7月14日凌晨3點，接到炸毀城墻南門命令的工程兵井上謙吉中尉和六名士兵一起躡手躡腳地爬向城門。他們將炸藥放在城門旁邊，但電動操作的導線被敵軍的炮火切斷了。井上和士兵們被迫用手點燃炸藥，差點被炸死，不過城門被炸得粉碎。在高呼戰斗口號的日軍的帶領下，聯軍沖進城門，但發現還有一堵內墻，敵軍正位于墻頭。一等兵增田千太郎沒有被這一困難局面所嚇倒，爬上內墻，從里面打開了城門。日軍涌進城里，后面跟著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士兵。清軍遺棄的尸體約有四百人。聯軍死傷八百六十余人，其中有四百人是日本人。[[41]](#_4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8月8日，德皇威廉二世向明治天皇發了一封電報，請求任命將軍阿爾弗雷德·瓦德西（Alfred Waldersee）擔任聯軍統帥。盡管盟軍中德軍的人數要遠遠少于日軍，但天皇立刻答應了這一請求，這大概是因為他知道德國公使被殺一事。但天皇或許還不知道，7月底，在德國遠征軍準備起航前往清朝之際，德皇向官兵發表了演說，命令他們切勿留情，不留活口，讓清朝人再也不敢輕視德國人。[[42]](#_42__Ta_De_Yuan_Hua_Shi__Ni_Men)

德皇的演說被公開后，遭到了聯軍的指責。聽說任命德國人來領導聯軍，日本駐奧地利公使牧野伸顯提出反對，理由是德皇的演說已經激起了強烈的反對意見。[[43]](#_4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然而，明治已經發送了同意德皇請求的電報。就這樣，天皇在不知不覺中與沉迷于仇視“黃禍”[[44]](#_44__Huang_Huo_Lun_Shi_Cheng_Xin)的君主進行了合作。

不過，隨著戰事的發展，聯軍進軍北京的速度如此之快，使得這位德國將軍來不及擔任統帥一職。取而代之的是由日本提出并獲得了其他聯軍支持的建議：一位俄國將軍被選為統帥。8月14日，聯軍攻占了北京，解除了拳民的圍攻，外國僑民獲救。清朝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向承德。日軍和美軍守護皇宮，然而，聯軍在市內其他地區進行了肆無忌憚地掠奪。[[45]](#_4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至此，清朝危機終告平息。

1. [[1]](#_1_50)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86頁。

1. [[2]](#_2_50)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95—596頁。這一史料好像來源于與田中光顯的交談記錄。

1. [[3]](#_3_50)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53頁。日野西對這一交談有不同的敘述，因而這一軼事也出現了不同版本。該版本引述于1976年版的《新學社教友館》。另一個版本出現于1953年的《祖國社》第54—55頁。森田誠吾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說當時的報紙在傳播天皇的八卦方面比隨后的年月更為自由（《明治人ものがたり》，第37—54頁）。

1. [[4]](#_4_50)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下卷，第719頁。“nībumi”是“新聞”的訓讀。

1. [[5]](#_5_50) 包括1905年7月26日向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提供的晚宴。塔夫脫是美國最重的總統（《天皇家の饗宴》，第84—85頁）。

1. [[6]](#_6_50)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613—614頁。“Kōshaku”有時候也翻譯成“公爵”或“親王”，爵位高于侯爵。很多“公爵”都是以前的大名。

1. [[7]](#_7_50) 參加會議的有德大寺實則、土方久元、香川敬三和川口武定。

1. [[8]](#_8_50) 醫師岡玄卿確信禎子患上了結核病，這給擬訂的婚姻造成了強烈影響。多年以后，當和另一個女人結婚的皇太子有了第二個孩子時，岡玄卿前來給天皇道喜。他評論道，如果皇太子和之前的未婚妻結婚，可能就不會發生這樣可喜可賀的事情了。天皇生氣地打斷他，說禎子在婚后一年沒能生育小孩，原因未必就在禎子身上（《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615頁）。

1. [[9]](#_9_50)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751頁。當佐佐木高行此時（1900年1月）請求天皇恩準讓兩位親王學習法語時，天皇予以拒絕，說此舉為時過早。他之所以拒絕，大概是因為不滿皇太子喜歡這門語言。

1. [[10]](#_10_50) 這些勛章和其他歐洲勛章是在1897年12月到1900年3月之間得到的，這大概與他成年有關。1900年10月，他還獲得了暹羅的皇室勛章。日本頻繁向外國人授予勛章，即使這些人與日本沒有多大關系。例如，對出訪歐洲的日本皇室成員予以友好相待的歐洲人通常會獲得一等勛章。日本也向外國君王授予勛章，例如，清朝的慈禧太后獲得了勛一等寶冠章（《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652頁）。在皇太子獲得大象勛章（歐洲最為尊貴的勛章之一）后，天皇再次向把勛章帶來日本的丹麥瓦爾德馬（Waldemar）王子回贈了大勛位菊花大綬章。

1. [[11]](#_11_50) James E, Hoare,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p. 97.

1. [[12]](#_12_50)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694頁、第761頁。

1. [[13]](#_13_50) 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p. 119-120.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758頁。

1. [[14]](#_14_50) 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第67頁。

1. [[15]](#_15_49) 大正稱其母親為“二位”，在他成為天皇后，他母親的銜位排在他的后面。當御餐桌上有剩余的飯菜時，他通常說“二位にやれ”（拿與二位殿）（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第66頁）。

1. [[16]](#_16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11頁。

1. [[17]](#_17_4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13—814頁。

1. [[18]](#_18_4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23頁。

1. [[19]](#_19_48) 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在參加戰斗之前很多起義者都練習義和拳和其他武術。

1. [[20]](#_20_47) 除了鎮壓義和團的外國軍隊外，此時大概還有17萬名俄國士兵入侵滿洲。

1. [[21]](#_21_47) 6月19日，清政府向聯軍宣戰，但是，聯軍仍堅持認為他們不是在打仗，而僅僅是在執行解救自己國民的使命。

1. [[22]](#_22_46) 義和團可以追溯到18世紀成立的一個神秘的宗教和武術組織——八卦教。這個神秘社團（和類似社團）的目的是扶明滅清（滿族）。請參考勞乃宣的《義和拳教門源流考》，本書轉引自Chester C. Tan（譚春林）,The Boxer Catastrophe , p. 43-44。

1. [[23]](#_23_46) 小林一美，《義和団戦爭と明治國家》，第55頁。他給出的遇難人數是：新教傳教士188名，清朝新教徒5000名，天主教主教5名，天主教牧師48名以及清朝天主教徒18000名。但小林認為很多人不是被義和團的人殺害，而可能是被1900年夏天清政府和義和拳聯手后的清朝士兵。此外，在起義的早期階段，另有多名德國和日本外交官被殺害。

1. [[24]](#_24_44) 這支教派因鼓勵性亂交而臭名昭著，但是，傾向于支持19世紀中國起義的學者認為，這種性放縱為將女性從封建儒家思想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奠定了基礎（小林一美，《義和団戦爭と明治國家》，第7—8頁）。

1. [[25]](#_25_44) 山東的第一個事例好像發生于1886年，當時一名法國牧師在清朝基督教信徒的幫助下，摧毀了一座道教的玉皇廟（小林一美，《義和団戦爭と明治國家》，第66頁）。

1. [[26]](#_26_44) 如需了解給鄉村生活造成的破壞，請參閱小林一美，《義和団戦爭と明治國家》第36—38頁、第43—44頁。小林尤其提到傳統（如當地崇拜的神、英雄、有公德心的人以及具有超能力的傳奇人物）的消失，以及跟隨著這些傳統一同消失的信仰、祭祀和祈愿時的戲劇表演（第43頁）。

1. [[27]](#_27_43) 小林一美，《義和団戦爭と明治國家》，第50頁、第58頁。大山梓描述道，信徒們頭裹紅巾、腰系紅帶參加戰斗；紅頭巾上寫著“義和神團奉旨與清滅洋”（《北京籠城、北京籠城日記》，解說第5頁）。

1. [[28]](#_28_40) 坂根義久編，《青木周蔵自伝》，第325頁。

1. [[29]](#_29_40) 清朝太子的生父端親王與義和團秘密聯系，并且被稱為義和團的“主要庇護人”（Chester C. Tan,The Boxer Catastrophe , p. 137；大山梓編，《北京籠城、北京籠城日記》，解說第4頁）。

1. [[30]](#_30_38) 小林一美，《義和団戦爭と明治國家》，第90頁。

1. [[31]](#_31_36) 大山梓編，《北京籠城、北京籠城日記》，解說第3—4頁。如需了解鄭永昌在副島擔任清朝公使期間作為翻譯的情況，請參閱本書第24章。

1. [[32]](#_32_35)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36—837頁。

1. [[33]](#_33_34) “聯軍”包括日本、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意大利、奧地利和美國。各國的參戰程度有很大不同。

1. [[34]](#_34_34) 大山梓編，《北京籠城、北京籠城日記》，第244頁、第16頁。

1. [[35]](#_35_3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43頁。

1. [[36]](#_36_30)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44頁。

1. [[37]](#_37_26) 如需了解與圍攻有關的引人入勝的描述，請參閱大山梓編，《北京籠城、北京籠城日記》。該書主要包含陸軍中佐柴五郎（在朝鮮活躍的柴四郎的弟弟）就其經歷發表的演講，以及當時在北京作為學生的服部宇之吉教授的日記。

1. [[38]](#_38_2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51頁。提到東西方之間的對抗，我想到了德皇的“黃禍”學說。

1. [[39]](#_39_20)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52—853頁。

1. [[40]](#_40_1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54頁。這件事出自于德大寺實則的日記。

1. [[41]](#_41_1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62—863頁。

1. [[42]](#_42_19) 他的原話是“你們將與一個全副武裝的國家作戰，但是，與此同時，你們必須為死亡的人報仇，不僅是德國公使，還有很多其他德國人和歐洲人。如果你們遇到敵人，必須打敗他們，切勿留情，不留活口。用你們手里的武器，對落入你們手里的人格殺勿論。就像一千年前阿提拉國王領導的匈奴人那樣，他們因兇猛殘暴而聞名，我們仍需沿襲這一傳統。那樣，中國人才會知道德國，才不敢輕視德國人”（引自John C. G. Röhl,The Kaiser and His Court , p. 13-14）。另請參閱德皇的畫作，在這幅畫作中，他將歐洲描繪成女神，在大天使米迦勒的帶領下與“黃禍”（用佛陀的形象來表示）進行斗爭（p. 203）。

1. [[43]](#_43_1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72—873頁。

1. [[44]](#_44_15) 黃禍論是成形于19世紀的一種極端民族主義理論，宣揚黃種人對于白種人是威脅，白種人應當聯合起來對付他們。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在公開場合提出“黃禍”的說法，并命令宮廷畫家赫爾曼·奈克法斯（Herman Knackfuss）根據他的想象畫了一幅畫，畫名就叫“黃禍”。畫的內容請參閱本書第五十三章。——譯注

1. [[45]](#_45_15)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78頁。剛開始，日本士兵的劫掠被認為是小事，但隨后發現高級軍官偷了大量的銀條。之后，這些軍官被解職（《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28—229頁、第239頁）。

# 第五十一章 英日同盟



在義和團被鎮壓后，山縣有朋立刻再次請求天皇準許他辭去總理大臣一職。[[1]](#_1__Bei_Er_Ci_Yong_Yi_Xia_Hua_Yu)明治無法再將迫切需要山縣處理緊急情況作為理由，只好接受將失去山縣效勞這一事實。很顯然，山縣的接替人是伊藤博文，但之前伊藤拒絕了，他正忙于組建一個新的政黨。伊藤認為，政黨對于君主立憲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乏政黨根基的內閣，其各項立法很可能在議會中遭到各個派系的阻撓。事實上，日本已經成立了幾個政黨，但它們都處于垂死狀態，無法發揮主導作用。伊藤深信，需要組建一個由他領導的全新政黨，以便糾正政府的積弊。他將這個打算告訴了山縣，并請求宮內大臣稟報天皇。

天皇不僅同意伊藤成立一個新政黨，而且在9月14日派巖倉具定前往伊藤的府邸，向伊藤贈送了一萬日元和一匹紅白真絲綢。天皇附函一封，傳達了對伊藤奉獻精神的信任，并熱切地希望伊藤能繼續提出坦率建議，好讓他從中獲益。[[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1900年9月15日，新的政黨宣告成立，稱作“立憲政友會”，[[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伊藤任總裁。此時，憲政黨的成員宣布解散憲政黨，并表示打算加入新黨，形成新黨的核心。一些喜歡挖苦的人評論說，由于伊藤在組建政友會之前已經得到了宮中的批準，實際上他應將該黨稱為“敕許政黨”。[[4]](#_4__Zhi_Yi_Wei__Li_Xian_Zheng_Yo)

9月24日，天皇派人去請松方正義和井上馨，讓他們勸說伊藤接替山縣。這兩人分別拜訪了伊藤，但都遭到斷然拒絕。山縣也許聽說了井上前去拜訪伊藤的事情，于是于9月26日向天皇倉促提交了辭呈。他說，自己身體不佳，無法繼續履行這一讓人疲憊不堪的職務。憲政黨不愿再與山縣合作并決定加入伊藤的政黨，或許也刺激山縣做出辭職的決定，因為他的內閣目前完全得不到黨派的支持。

松方也試圖勸說伊藤擔任總理大臣，不料，伊藤竟反過來力勸他自己擔任該職務。最后，天皇意識到調解無果，于是將伊藤叫到宮中，命令他接受這一職務。伊藤仍然回避。他說，組建政友會已經讓他忙得不可開交，他還患上了感冒，身體虛弱，天皇這一命令是在他狀態最糟糕的時候下達的。10月6日，松方進行了最后一次嘗試。這一次，伊藤同意了，此時他得出結論，認為無論是國內形勢還是國外形勢都不允許再推遲下去。第二天，當著天皇的面，伊藤正式受命組建內閣。

10月19日，宮中舉行任命伊藤作為總理大臣的儀式。從一開始，新內閣的成員之間就有沖突。10月20日，陸軍大臣桂太郎（從上屆內閣留任下來）以健康為由請求辭職，天皇予以拒絕。他說，在局勢如此緊張的時刻，陸軍大臣的職位一天也不能空缺。[[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11月15日，天皇恢復了早期的習慣，前往茨城縣視察演習，在一所小學住了一晚。第二天，天氣很糟糕——風雨不斷，間有小雪，寒冷刺骨。馬車所經過的道路本來已經重修了，但連日降雨，加之士兵和馬匹川流不息，道路已經變成了泥沼。在一個叫做長方的地方，天皇走下馬車，登上一處可以觀看兩軍演習的高地。他任憑越來越猛烈的狂風暴雨的侵襲，在那兒站了一個多小時直到演習結束。天皇大概是在想，作為天皇，自己有義務以身作則，為軍隊樹立起堅韌剛毅的榜樣。

長時間的風吹雨打并沒有對天皇的身體造成不良影響，但在年底的時候，他患上感冒，臥病在床直至下一年的1月13日。結果，他沒能參加傳統的新年儀式。按照日本的算法，天皇今年五十歲了。

1月23日，日本得知了維多利亞女王去世的消息。在承認日本同其他歐洲強國享有平等地位的過程中，處于鼎盛時期的英國一直都是日本的最大障礙。然而，日本皇宮并沒有因此表現出絲毫的不滿，而是舉行了為期三周的哀悼。日本委派駐英公使林董作為特別大使參加葬禮。林董還將在今年的晚些時候，在成立英日同盟的談判中發揮重要作用。對于處理兩國之間時常劍拔弩張的關系來說，結盟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解決辦法。

在成立了盼望已久的政黨后，伊藤組建了一個完全由政友會成員組成的內閣。貴族院對政黨政府進行了猛烈抨擊，但伊藤不予理會，從而加劇了雙方之間的敵對情緒。伊藤所面臨的問題是多方面的。政府亟須支付鎮壓義和團運動所產生的費用。眾議院試圖通過增收清酒稅和糖稅以及提高關稅來籌集資金。他們還希望通過征收煙草專賣稅來擴大財源。但是，貴族院反對提高稅收，幾乎一定要對這項議案投反對票。2月27日，（經伊藤請求）天皇下令議會休會十天。

伊藤希望自己能在這十天中勸說貴族院做出讓步，但是，貴族院仍然固執地要求對稅收議案進行一次徹底的討論。伊藤希望對貴族院具有影響力的山縣能夠從中調解，然而，此時山縣正在京都。山縣和松方會面，但做出了不進行調解的決定。惱羞成怒的伊藤請求天皇召這兩人回東京。侍從向山縣和松方發送電報，第二天，兩人動身前往東京。

3月5日，在覲見天皇時，伊藤向天皇說明了貴族院拒絕征稅以償還國家債務，從而造成了緊張的態勢。他擔心，這將對日本的財政領域造成嚴重影響，并建議天皇向四位元老——山縣有朋、西鄉從道、松方正義和井上馨——征詢意見。不久，天皇接見了山縣和松方，并向西鄉和井上發送函件，請求他們一同為這場危機找出解決之道。[[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山縣和松方奏報說，他們的調解工作失敗了。議會的休會期很快就要結束，伊藤無法克制住自己的煩躁情緒。他草擬了一個方案，遞交給宮內大臣，請求天皇頒布詔書斥責貴族院從中阻撓。天皇按照伊藤的請求于3月12日召見了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并對他說：“朕近日聞貴族院對增稅案唱異論，與政府沖突，深感遺憾。命（山縣）有朋等調停之事，亦不幸失敗，而政府猶奏不能容貴族院之主張，朕甚憂慮之。夫朕意所在即載此書中，卿宜示此于議員一道，以速達融合之道。”

毫無疑問，詔書表明了天皇的立場：

“朕視中外之形勢，深憂時局之難。今支付必要之軍費，并立鞏固財政之計劃，誠屬國家之急務。

前日開議會之時，朕以意示之，且命政府所提之增稅諸法案，已經眾議院議決。

朕信貴族院各員之忠誠，必分朕日夕之憂，望速翼贊廟謨，不遺國家他日之憾。”[[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1)

近衛并非沒有預見到事態會朝著這一方向發展，但天皇的訓斥讓他大為煩心。他拜訪了巖倉具定，認為巖倉應該了解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巖倉很反感伊藤的習慣：一出現緊張局面就請求天皇頒布詔書。然而，巖倉對此一無所知。當近衛將詔書拿給巖倉看時，巖倉驚訝萬分：那道詔書既沒有天皇簽字或蓋章，也沒有國務大臣的簽名。這太不正常了。當晚，巖倉向伊藤發送了詔書的副本，詢問內閣成員是否已經了解了詔書的內容。

第二天，伊藤在貴族院拜訪了近衛，詳細講述了他自議會休會后為重新與貴族院進行談判所做出的種種努力，以及天皇如何命令山縣進行調解的情況。聽起來好像是天皇對調解工作失敗感到失望，為局面感到極其擔憂，于是便把事情包攬下來，直接發了那份詔書。伊藤補充說，內閣中沒有人事先知道詔書的事情，但是，無論是否有人知道，作為內閣的議長，他都有重責來輔助天皇，這一責任自然也擴展到將與政策有關的事情奏稟天皇。[[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伊藤的話暗示，盡管內閣中無人事先得知了詔書的事情，但他自己的意見可能對天皇造成了影響，因此天皇寫了這道詔書。詔書沒有簽字或會簽，表明天皇可能是憑著一時的沖動自行其是。

3月24日，近衛將詔書呈遞給貴族院。天皇的告誡立刻讓貴族院成員的態度大大轉變，他們在未做任何修改的情況下通過了增稅議案。[[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當月晚些時候，天皇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方面展現了自己的權威。3月27日，司法大臣金子堅太郎懇請天皇批準解雇十六名請求辭職的法官和檢察官。這些人之所以采取這一行動是因為眾議院決定不給司法官員加薪，即使加薪有充足的理由。因此，在通過的年度預算中沒有對加薪做出規定。失望的法官和檢察官開始反對這項議案。一些縣級地方法官也離開職位，加入東京的這場罷工行動。

金子不斷地警告罷工者，提醒他們不要違反官紀，但他的警告沒有奏效。罷工領導者呼吁全國的司法官員集體辭職，不久，各類辭呈便通過郵件和電報涌進了東京。金子下定決心要維護司法的尊嚴，決定接受這些辭呈，而非在罷工者的加薪要求面前屈服。他將這些辭呈轉交給了伊藤，并請求伊藤呈遞給天皇。

伊藤向天皇稟報了這一情況，并懇請天皇定奪。天皇問道，司法大臣對更換那些可能辭職的人有沒有把握。伊藤向金子轉達了天皇的問話，金子在答復中向伊藤提供了一份統計表，列舉了有資格擔任法官和檢察官的八百余人的名單。金子說，撤換罷工者沒有什么困難。伊藤將名單呈遞給天皇，天皇立刻批準了這些辭職請求，并說道：“向后有提出辭表者，雖夜中亦直提交，朕亟與裁可 。”天皇的決定鎮壓住了罷工。那些已經提交辭呈的人原以為天皇不會批準，現在紛紛請求退回辭呈。[[10]](#_10__Ru_Xu_Le_Jie_Jin_Wei_Tong_Y)

天皇的決定并沒有考慮到法官和檢察官因薪資不足而遭受的困難。他唯一關心的是能否撤換罷工者。作為一名儒家統治者，他本應表現出更大的同情心，然而，明治大概認為這些罷工者違反了法律，而他又極度討厭違法亂紀的行為。在這一點上，他和同樣信奉儒家學說的德川幕府時代的將軍很像。

5月2日，伊藤請求天皇準許他辭去總理大臣一職。他說，盡管他的身體恢復到足以參加宮中的各項事務，但無法應付日后的艱巨任務，尤其是財政問題。天皇已經私下了解到，伊藤健康狀況不佳并不僅僅是一個借口。在收到伊藤辭呈的當天，他任命西園寺公望擔任代理總理大臣，在伊藤生病期間履行職務。[[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伊藤并沒有夸大政府所面臨的困難。議會最終通過了下一年度的預算和增稅議案，但財政危機仍沒有解決。自1895年清日戰爭結束以來，政府已經把建設軍事力量當做頭等大事，大部分的國家財富都流向了軍事項目和軍事計劃，進而導致財政出現嚴重赤字。于是，政府在之前增稅議案的基礎上增加稅收，在之前發行債券的基礎上發行債券，且這一過程看似沒完沒了。財政困境看上去馬上就會引發恐慌。

大藏大臣渡邊國武提交了一份暫停國有企業的財政緊縮議案，遭到了五名內閣成員的反對，而原因主要是他們個人對渡邊不滿。伊藤被請來調解，然而，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只是使沖突進一步加劇。最后，除了渡邊外，全體內閣都提交了辭呈。

5月3日，渡邊向天皇表明了自己對財政狀況的看法。之后，天皇派人請來西園寺，問他對渡邊的看法有何意見。西園寺回答道，如果放任渡邊自行其是，將會樹立一個壞榜樣。他提議讓渡邊辭職。如果渡邊拒絕，西園寺將告訴渡邊是天皇希望他辭職。

西園寺前去拜訪渡邊，在一番苦口婆心的勸告后，渡邊同意辭職。當天，渡邊帶著兩封不同的辭呈造訪了侍從長德大寺實則，問他自己應提交哪一封。在第一封辭呈中，他以健康每況愈下作為辭職的理由；在第二封中，他說他之所以辭職，是因為內閣中的其他人都辭職了。德大寺說道，在這種情況下以健康為由辭職是慣常做法。渡邊聽從了他的建議。[[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在此期間，皇太子妃于4月29日誕下了天皇的第一個皇孫。官員們圍擠在皇太子的東宮御所，紛紛道賀祝福，不過，直到5月3日，皇太子才從葉山縣返回來看望自己的兒子。[[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這個嬰兒很健康，他出生所帶來的喜悅并沒有夾雜著天皇孩子出生時的那種擔憂之情。5月5日，天皇給嬰兒取名并賜稱號。在提交的名字中，他選中了裕仁；在兩個稱號中，他選中了迪宮。[[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天皇將名字寫在檀紙上，交給德大寺，讓他交給將于次日返回小田原市的皇太子。[[15]](#_15__Zhi_Suo_Yi_Xuan_Zhong_Zhe_X)

5月10日，天皇最終接受了伊藤的辭職請求。他令井上馨組建內閣，但無果而終。5月26日，天皇命令元老們極力舉薦的陸軍大將桂太郎成立內閣。桂太郎推遲了答復，說他希望勸說伊藤改變主意。他請求天皇和他一同力勸伊藤再次擔任總理大臣一職。天皇讓德大寺給伊藤發電報，請他即刻返回東京進宮謁見。[[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伊藤斷然拒絕再次任職。桂太郎猶豫著是否接受總理大臣一職，而他之所以遲疑不決，似乎是在遵循伊藤的做法，而非懷疑自己的能力。6月1日，他請德大寺奏報天皇，說新內閣的籌備工作已經完成，并請求在第二天舉行就職儀式。

除了按照天皇的要求讓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留任外，這屆內閣全部由新人組成。不同尋常的是，內閣中無一人是元老。這屆內閣的軍事色彩并不僅僅局限于桂太郎：所有成員都與山縣有關聯。盡管這導致了與眾議院（目前由政友會控制）的關系出現問題，但卻增進了與貴族院的合作。

6月21日，眾議院議員、政友會的一名領導人物星亨遭到行刺。在整個明治時期，星亨是最神秘的人物之一。百科詞典里的詞條將他描述成一位傲慢、腐敗的政治家，有時候拿他與現代日本的某些政客進行比較。更喜歡挑星亨缺點的作家往往會忽略他的功績，不過，無論是從正面意義還是從負面意義來看，當代讀者都可能把星亨視為第一位極具現代特征的政治家。

星亨是第一個不僅僅來自于平民階層，而且來自于社會最底層的重要政治人物。他的父親是一名泥瓦匠，酗酒，拋棄了妻子和三個孩子，沒有留給他們任何財產。他的大姐被賣給了妓院，二姐賣身為仆。母親不堪忍受養活自己和小嬰兒的壓力，打算把星亨扔進池塘里，但在最后一刻決定讓星亨活下來，因為他是男孩。[[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之后，她和一個善良的江湖醫生兼算命先生結婚，由此一家五口共同居住在江戶的一個貧民窟里。

當星亨到了上學的年紀，繼父打算讓這個男孩追隨自己的職業，送他去跟曾是自己老師的醫生學習。星亨并不是一個特別聰明的孩子，但他憑著頑強的毅力不僅掌握了醫學基礎知識，還學會了儒家經典。更重要的是，為了未來的職業，他還開始學習英語。1866年，當星亨年滿十六周歲時，一個沒有孩子的武士家庭收養了他，并送他去開成所——一所供幕府家臣的子女就讀的學校。在那里，星亨師從日本郵政制度的創始人前島密學習英語。前島對星亨產生了極好的印象，即使在星亨與武士家庭的關系終止后，他仍允許星亨繼續留在學校。[[18]](#_18__Chuan_Ji_De_Xiang_Xi_Nei_Ro)

前島向開成所的英語教授何禮之（1840—1923）[[19]](#_19__Zuo_Wei_Shou_Yang_He_Tong_D)推薦了星亨，何禮之認可這個男孩的能力，并為他在海軍學校謀得了第一份工作——英語教師。幕府統治被推翻后，這個學校便解散了。星亨寫信給何禮之，請求再介紹一份工作。何禮之向兵庫縣知事陸奧宗光推薦了星亨，陸奧聘請星亨在他于神戶創辦的一所學校里教書。陸奧的幫助對于星亨的成功而言至關重要。

星亨的生涯的一大特點是他下定決心要飛黃騰達，即使出身卑微，即使身體虛弱也再所不顧。他怨恨所謂的命運，這揭示出他對武士階層的仇視，并透露出他卯著一股勁兒要擊敗掌管政府的人。對手的職位越高，越能激起他的戰斗精神。[[20]](#_20__He_Li_Zhi_Shi_Ming_Zhao_Shi)他憑著聰明才智和不懈的鉆研克服了出生家庭的不利條件；他不斷地練習武術，由此改善了虛弱的體質。星亨在晚年拍攝的照片，顯示出他是一位散發著自信、健壯但丑陋的男人。

1871年，陸奧被任命為神奈川縣知事。兩年后，在陸奧的舉薦下，星亨在大藏省謀得一個職務，主要工作是翻譯各個國家的稅法。但他有一次毆打人力車車夫并且拒絕聽從制服他的警察，于是丟了這份工作，并被關了禁閉。他利用在家禁閉的這段時間翻譯了一本關于外國英雄的書籍。在星亨的禁閉結束后，陸奧力勸星亨日后遵守規矩，并且邀請星亨到他的府邸居住（這表明他非常看重星亨的能力）。星亨和兩名學生充分利用這次優待，不久，他們翻譯了布萊克伍德（Blackwood）的《英國法》（British Laws）。

1873年，陸奧在橫濱海關為星亨謀得一職。星亨扶搖直上，1874年1月當上了稅務顧問和海關關長。一切似乎都很順利，然而星亨的噩運來了。在與英國領事館交換文件時，他將“Her Majesty”翻譯成了“女王陛下”，而不是“女皇”。英國指控他犯了冒犯君主罪。星亨為自己辯解，指出維多利亞自稱為女王，而不是女皇，但哈里·巴夏禮爵士親自跑到外務省提出抗議，要求解雇星亨并對英國道歉。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和外務卿寺島宗則力勸星亨道歉，但星亨拒絕，認為自己沒有錯。日本政府害怕與英國為敵，于是解除了星亨的職務，以此平息巴夏禮的怒氣。[[21]](#_21__Ling_Mu_Wu_Shi____Xing_Heng)

不過，星亨保住了稅務顧問的職務，并且在1874年9月憑著這一身份被派到英國學習。1875年1月，他進入中殿律師學院就讀，兩年后，成為了第一個獲得出庭律師資格的日本人。在倫敦期間，星亨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是在房間里研讀法律和哲學書籍。[[22]](#_22__Ling_Mu_Wu_Shi____Xing_Heng)

回到日本后，星亨被任命為司法省的辯護人。當時，他的主要職業是一名律師，不過，他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自由民權和自由黨的活動之中，從而引起了當局的注意。1882年，福島縣的自由黨成員因抗議知事的專橫行為遭到逮捕。[[23]](#_23__Ju_Shuo__Ta_Ceng_Yi_Bian_Yo)他們被指控犯有顛覆政府罪。星亨為被告中的核心人物河野廣中辯護，以無可辯駁的邏輯證明顛覆政府的指控不適用，然而，被告還是被判有罪。[[24]](#_24__Gai_Shi_Jian_Cheng_Wei__Fu)

在此期間，星亨加入了自由黨。自由黨的綱領與他的社會信條十分接近。但是，他覺得政黨的官方報紙使用過于抽象的措辭，導致日本民眾無法理解。1884年5月，他創辦了一份非常受歡迎的報紙，該報為了吸引和他來自于同一階層的底層民眾，采用易于理解的語言刊發稿件，里面還配上圖片。在僅有小部分人擁有選舉權的時期，星亨為教育民眾所采取的這一嘗試是前所未有的。

1884年7月，星亨在新潟發表名為《政治的界限》的演講。在演講中，他就俄國和德國干涉公民私人生活這一點，對這兩個國家的專制和軍事主義政府進行了抨擊。盡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日本，但潛臺詞卻顯而易見。警察按照1880年頒布的法規讓星亨停止演講，并驅散了會議。

星亨被責令向新潟警察局報告，但他無視這一傳喚，說警察沒有權力傳喚他。最后，警察逮捕了星亨，并指控他誹謗政府官員。雖然星亨并沒有批評任何官員，但卻被判犯有誹謗太政大臣三條以及內務卿、陸軍卿、海軍卿、文部卿、農商務卿、工部卿和宮內卿的罪行。他被判處監禁六個月和罰款四十日元，還被剝奪了律師資格。[[25]](#_25__Zhong_Cun_Ju_Nan____Xing_He)

即使在獄中，星亨也沒有學乖。他繼續出版有插圖的報紙，并等待著時機，以便重新建立因他入獄而解散了的自由黨。然而，1888年，因為被指控公布了與修約相關的秘密文件，他再次被捕，被判處監禁一年半，別無選擇的他只好賣掉了報紙。[[26]](#_26__Ling_Mu_Wu_Shi____Xing_Heng)

星亨將獄中的時間用在了學習上。監獄絕非讀書的好地方，但從黎明到黃昏，他都在閱讀日語、英語、德語、法語和意大利語的書籍。1889年2月，在慶祝憲法頒布而實行的大赦時，他被釋放。

在離開監獄后，星亨前往美國和歐洲研習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雖說是游學，但實際上卻是他無論去到哪里，都會逛書店，買有用的書籍，然后把自己關在一家便宜的酒店房間里閱讀這些書籍。他不屑于效仿像伊藤博文那樣的政客，吹噓著自己師從魯道夫·馮·格耐斯特、洛倫茨·馮·施泰因和其他杰出人物。星亨說，這些人在歐洲的名氣不像在日本那樣響亮，只因為聽過他們的講座就裝腔作勢，實在是太可笑了。

星亨幾乎訪問了北美和歐洲的所有國家。這次旅行似乎改變了他。在回到日本后，他發表了演講，對自己以前參加自由民權運動感到失望；力勸加強軍備、[[27]](#_27__Ling_Mu_Wu_Shi____Xing_Heng)攫取殖民地、鼓勵日本人移居外國，并開始在國外積極宣傳日本。[[28]](#_28__Ta_Ren_Wei_Ri_Ben_Ying_Dang)他的留洋經歷，或者說他所閱讀的書籍，似乎讓他睜開眼睛看到了真實的世界局勢，他開始談論強權政治。

一回到日本，星亨立刻投身于重新組建自由黨。此時的黨名叫做“立憲自由黨”。1891年3月，在政黨代表大會上，星亨的政黨贏得了控制權。在1892年2月舉行的第二次大選中，星亨參加了眾議院議員的選舉，并（在陸奧宗光的幫助下）當選為眾議院議長。每一個人都預測星亨將會利用這一職位來使自由黨擁護的議案獲得通過，但事實上，他恪守公正，沒有偏袒自己的政黨成員。[[29]](#_29__Ling_Mu_Wu_Shi____Xing_Heng)

不久后，星亨與有薩摩藩和長州藩人士做后盾的總理大臣松方對立，他的傲慢也讓許多眾議院議員疏遠了他。當時的政治局面混亂不清，此處姑且從略，只需說的是議員提交對星亨的不信任案。盡管對于所有指控，他都能自證清白，然而這并沒能消除給人留下的有罪的印象。并且從那時起，腐敗的“光環”便緊緊跟著他。[[30]](#_30__Zhong_Cun_Ju_Nan____Xing_He)于是，星亨被解除了眾議院議長一職。

1896年，星亨被任命為駐美公使。（據推測）這主要是因為板垣和自由黨的其他成員覺得他是一個累贅，希望他不要擋道。[[31]](#_31__Ru_Xu_Le_Jie_Yi_Hui_Dui_Xin)在擔任公使的兩年時間里，他成功解決了兩個關鍵問題：美國有可能提高日本產品的進口關稅，以及美國即將吞并夏威夷給日本造成的影響。

星亨對贊成共和黨政府倡議的高關稅的參議員進行了勸阻。[[32]](#_32__Zhong_Cun_Ju_Nan____Xing_He)關于夏威夷，星亨決定要從美國手里奪回夏威夷國王之前給予日本的租借地。他曾一度轉向建議日本吞并夏威夷的極端立場，即使此舉存在著與美國開戰的風險。[[33]](#_33__Dang_Zhu_Can_Yi_Yuan_Xiao_Z)外務大臣大隈重信拒絕了這一具有挑釁性的建議，但星亨成功地讓美國做出保證，使在夏威夷的日本僑民享有與歐洲國家公民一樣的權利。[[34]](#_34__Ru_Xu_Le_Jie_Ta_De_Jian_Yi)

當星亨獲知成立了新的政黨（憲政黨）后，決定立刻返回日本，并希望能在下一屆內閣中擔任外務大臣。他給外務省發電報說他將回國，不料外務省卻命令他繼續擔任駐美公使。星亨無視這一指示，但主要因大隈反對，最終沒能獲得夢寐以求的職位。

之后，星亨幫助組建政友會。1900年，作為該政黨最有實力的人物，星亨在第四屆伊藤內閣中出任通信大臣。雖然這并非內閣中的重要職務，但之前從未有過像星亨這樣出生的、沒有藩閥關系的人能夠擔任地位如此顯赫的職務。除了擔任內閣成員外，1899年，星亨當選東京市議會的議員，并擔任監票官。民眾普遍認為，星亨管理市政府主要是為了他自身和他所屬政黨的利益。[[35]](#_35__Zhong_Cun_Ju_Nan____Xing_He)雖然這個謠言沒有得到證實，但星亨已經確鑿無疑地建造了一個政治利益集團，并且他的一些下屬毫不猶豫地使用了強迫手段。星亨并沒有從這些被指控的罪行中撈到半點好處。盡管報紙譴責他因簽署政府合同發了一筆橫財，但在他死時，留下的只有債務。

雖然一直到最后，星亨都堅稱自己沒有犯下任何過錯，但1900年10月，他被迫辭去東京市議會的議員，12月被迫辭去通信大臣。即便如此，他所引起的民憤繼續增加，6月，一位叫做伊庭想太郎的劍術老師刺殺星亨。伊庭是一個虔誠的儒家道德的信徒，政府的腐敗行為激怒了他，于是，他伏擊了星亨，并將星亨刺死。[[36]](#_36__Ling_Mu_Wu_Shi____Xing_Heng)

很多人無疑都相信了關于星亨腐敗的謠言，但是，仍然有許多人欽佩星亨。當送葬隊伍隨著天皇護衛隊演奏的莊嚴肅穆的音樂前進時，幾千人跟著隊伍前進。下屆內閣中的兩位重要的政治家原敬和松田正久擔任治喪委員會的領導，板垣退助發表了悼詞。[[37]](#_37__Ru_Xu_Le_Jie_Guan_Yu_Xing_H)盡管星亨遭到了指控（并且壞名聲一直持續到今天），但對于塑造現代化、日本式政黨政治的未來而言，星亨的貢獻比任何人都要多。天皇向星亨追贈從三位官階，并追授瑞寶章。[[38]](#_38__Ru_Xu_Le_Jie_Guan_Yu_Zang_L)

天皇一直關注著與星亨有關的爭論，有時候眾人還會就這些爭論請求天皇定奪。即使在1893年11月眾議院通過不信任投票后，星亨仍繼續擔任議長一職。12月2日，副議長楠本正隆攜帶上奏書進宮，向天皇奏報了不信任投票案，并為曾向天皇舉薦星亨而道歉。在看了上奏書后，明治召來楠本，說他不清楚楠本有什么要求。楠本是請求替換議長嗎？還是眾議院議員為犯了這樣的錯誤而道歉？

天皇希望避免陷入命令星亨辭去議長職務的境地。他的答復使楠本想讓天皇親自將星亨除名的希望落了空。我們尚不清楚天皇是怎樣看待星亨的，但是，他決定在星亨死后追授勛章，表明他認可星亨對國家做出的貢獻。

7月6日，天皇和皇后訪問了皇太子的東宮御所，在那里，他們觀看了皇太子和太子妃在去年收到的結婚禮物，還看望了皇孫裕仁。第二天，嬰兒被帶到了位于貍穴的海軍大將川村純義的府邸。天皇和皇后給了海軍大將一百日元，請他在小王子的童年時期負責進行照看。據說是皇太子要求進行這一安排的，但事實上這是天皇的意愿。[[39]](#_3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這一流傳下來的舊事讓天皇的御醫歐文·貝爾茨困惑不解，他寫道：

5點的時候，天皇和皇后拜訪了伯爵川村。皇太子的兒子將由這位年邁的海軍上將負責照料，他現在一定有七十歲了。這是個多么奇怪的想法！我希望將小王子帶離父母身邊、交由陌生人照料的這一反常而又殘酷的習俗能夠被廢止。然而，它卻沒有。可憐的太子妃被迫交出嬰兒，這讓她掉了不少眼淚。現在，嬰兒的父母每個月只能短暫地探望孩子一兩次……為什么在這一事件上，他們就不能像在其他方面那樣效仿德國或英國皇室的做法呢？小王子迪宮是一個很活潑、很漂亮的孩子。[[40]](#_4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8月1日，駐英國全權公使、男爵林董向外務大臣曾禰荒助（1849—1910）發了一封電報，匯報說已就清朝問題與英國外交大臣亨利·蘭斯多恩（Henry Lansdowne）商議，并得知英國政府希望和日本結成同盟。他問道：“我國政府是否準備與英國簽訂條約？如果英國愿意接受我國的條件，我國是否準備同英國結成同盟？望政府速速回復。”[[41]](#_41__Erwin_Baelz_Awakening_Japan)

英國和日本結成同盟的提議起源于俄國的遠東政策。如前所述，在清日戰爭結束后，三個歐洲列強迫使日本向清朝歸還了遼東半島。但此后不久，俄國便租借了這一領土，并與清朝簽訂了秘密條約，開始修建鐵路。現在，俄國管理著旅順和大連，并且正在穩步地拓展對清朝西北地區的控制。俄國沿著鐵路線修建了城鎮。在東亞有利益需求的其他國家都擔心俄國在韓國的行動，很多國家認為俄國和日本爆發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日本還沒有為這一戰爭做好充分的準備：很明顯，日本想在無人幫助的情況下驅逐俄國是極其困難的事情。

日本有兩個可行的行動方案。一個（獲得伊藤博文的支持）是與俄國達成諒解，將滿洲讓給俄國，作為回報，俄國應承認日本在韓國的支配權。[[42]](#_4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另一個（獲得大多數其他日本官員的支持）是日本與歐洲大國配合，牽制俄國。法國不太可能加入反俄聯盟，因為法國和俄國剛剛結成了同盟。日本最有可能的合作伙伴是德國和英國，這兩個國家都確信俄國正在侵犯它們在東亞的權利。1901年4月，在和蘭斯多恩商議時，林董發表了看法。他說，為了維護東亞的永久和平，日本和英國建立穩固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蘭斯多恩表示同意，但這也只是這兩人的個人主張。[[43]](#_43__1901Nian_8Yue__Zai_Yi_Teng)

在此之前，日本人和英國人都曾提議建立同盟。1895年，福澤諭吉寫了一篇關于提議建立同盟的社論；[[44]](#_44__Lin_Dong____Hou_haXi_noJi_T)在英國，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曾就這一問題與日本公使進行了非正式討論。[[45]](#_45__Lin_Dong____Hou_haXi_noJi_T)1898年，日本政府（當時即將結束對威海衛的占領）同意英國向清朝租借威海衛的提議，并補充說，作為回報，它希望在日本需要采取行動來保護其安全或推動其利益的時候，英國能夠予以支持，并施以援手。[[46]](#_46__Ru_Xu_Le_Jie_Zuo_Zhe_Suo_Ch)1900年，英國僑民在北京遭到義和團的圍攻，日本軍隊解救了英國僑民，此后親日的氣氛便席卷英國。在該年擔任駐英公使的林董得出結論認為，英國是日本能與之結盟以對抗俄國的唯一國家。[[47]](#_47__Hei_Yu_Mao____Ri_Ying_Tong)

林董和蘭斯多恩勛爵進行商討后，就以下六點達成了一致意見：

一、必須使清朝保持門戶開放。

二、除了條約已經劃分的租借地外，不得進一步獲得清朝的領土。

三、承認日本在韓國行動自由，因為日本在韓國獲得的利益比其他國家都要多。

四、如果同盟中的一國與其他國家開戰，另一國應保持中立；但如果第三國參戰幫助敵國，另一國也將參戰。

五、關于清朝的英德協定將繼續有效。

六、同盟只限在遠東地區有效。[[48]](#_48__Lin_Dong____Hou_haXi_noJi)

在多次商討和一些明顯退讓后，英國草擬了條約，并請求日本即刻答復。[[49]](#_49__Lin_Dong____Hou_haXi_noJi)日本對條約文本進行了修改（主要是語言表達方面），并于11月30日電傳至倫敦。電報中提到，在把擬定條約拿給天皇看時，天皇命令拿給元老和伊藤看，征求他們的意見。[[50]](#_50__Gai_Xie_Ding_Qian_Ding_Yu_1)

在激烈的討論后，元老們批準了修改后的條約，并建議讓條約立刻生效。只有支持與俄國（而非英國）結盟的井上馨表示不滿，他給出的理由是還沒有得知伊藤的看法。12月8日內閣收到了等候已久的伊藤發來的電報。伊藤對條約提出了反對意見，認為措辭上有很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并指出日本還不清楚德國是怎樣看待英日同盟的。他還說，與俄國進行商議的話也有可能簽訂條約。他敦促眾人仔細斟酌，并請求將他的意見傳達給天皇。[[51]](#_51__Ru_Xu_Le_Jie_Ri_Ben_Xiu_Gai)

第二天，總理大臣桂太郎將伊藤的電報拿給天皇看。天皇總是高度重視伊藤的意見，但這一次他說，既然內閣和元老們都批準了條約，日本就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他令桂太郎探明元老們對伊藤的意見有何反應。桂太郎找到各位元老，但在詢問他們的看法之前，桂太郎指出無法保證將會和俄國簽訂條約，如果再拖延下去可能會使英國撤銷建立同盟的提議。12月10日，他向天皇奏報說，眾議院都支持與英國簽訂條約。在獲得天皇授權后，12日，桂太郎向林董發送了電報，稱日本已經接受了修改后的條約。[[52]](#_52__Lin_Dong____Hou_haXi_noJi)1902年1月30日，林董和蘭斯多恩在倫敦簽署了條約，并于2月12日公之于眾。

很難評價條約給日本帶來了哪些好處。林董認為，結盟使得日本能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俄國。[[53]](#_53__Lin_Dong____Hou_haXi_noJi)日本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攫取了德國之前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而建立了海外帝國，都發揮了英日結盟的作用。不過，比物質利益更重要的是日本人感受到的喜悅之情。上到天皇，下到黎民百姓都因為日本被公認是與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而感到喜悅。在過去，這個國家曾一次又一次地羞辱日本。[[54]](#_54__Lin_Dong____Hou_haXi_noJi)

1. [[1]](#_1_51) 貝爾茨用以下話語就日本民眾對簽訂英日同盟的反應進行了描述：“1902年2月14日。日本民眾難以掩飾他們對訂立新同盟的喜悅之情。毫無疑問，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勝利，一個在原則上不參與結盟的大國現在和日本結成了同盟，且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同日本人——一個與他們完全不同的種族——結成的同盟。慶應義塾的學生們舉行了火把游行活動，并在英國公使館的門前高呼三聲”（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54）。

1. [[2]](#_2_5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95頁。

1. [[3]](#_3_5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90—891頁。

1. [[4]](#_4_51) 直譯為“立憲政友會”。在日本通常簡稱為“政友會”，本書也采用這一叫法。

1. [[5]](#_5_5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91頁。

1. [[6]](#_6_5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913頁。11月14日，桂太郎再次請求允許他辭職，12月23日，天皇最終批準（第923—925頁）。

1. [[7]](#_7_5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6頁。

1. [[8]](#_8_5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9—30頁。

1. [[9]](#_9_5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0頁。

1. [[10]](#_10_51) 如需了解近衛同意遵照天皇旨意的函件原文，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1頁。

1. [[11]](#_11_5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0—42頁。

1. [[12]](#_12_5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4頁。

1. [[13]](#_13_5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4—57頁。

1. [[14]](#_14_5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3頁、第57頁。

1. [[15]](#_15_50) 之所以選中這些字，是因為它們出現在中國經典著作的吉祥篇章中。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沒有拋棄使用中國經典著作中的字詞來給皇室成員命名（和賜稱號）這一傳統。

1. [[16]](#_16_50)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8—59頁。

1. [[17]](#_17_50)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68頁。

1. [[18]](#_18_49) 傳記的詳細內容，見有泉貞夫，《星亨》，第3—15頁。姐姐在妓院的悲慘經歷，讓他下定決心絕不（像明治時期的大多數男人那樣）找妓女尋歡作樂。他對妻子很忠誠（第9頁）。

1. [[19]](#_19_49) 作為收養合同的一部分，星亨的家庭需支付50兩“收養費”。他家明顯無法支付這筆費用，于是，一年后星亨與小泉一家的收養關系被取消（有泉貞夫，《星亨》，第13頁）。

1. [[20]](#_20_48) 何禮之是明朝時從中國來的難民后裔。他的英語能力和對西方的了解遠近聞名，這使他成為巖倉使節團的一員。后來，他被天皇任命為貴族院議員。前島和陸奧宗光都是何禮之的學生。

1. [[21]](#_21_48) 鈴木武史，《星亨 藩閥政治を揺がした男》，第22頁。

1. [[22]](#_22_47) 鈴木武史，《星亨 藩閥政治を揺がした男》，第33頁。

1. [[23]](#_23_47) 據說，他曾一遍又一遍地閱讀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道德與立法原理引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有泉貞夫，《星亨》，第49頁）。

1. [[24]](#_24_45) 該事件稱為“福島事件”。知事三島通庸決定修建公路，費用由縣民承擔。福島縣議會通過了反對建造公路的決議，但他置之不理，繼續修路。出不了錢或者出不了勞動力的農民的物品被縣政府公開拍賣。一些自由黨成員因為提出抗議而被捕，因此，數千人襲擊了關押被逮捕人士的喜多方警察局。此舉導致有大約50名自由黨成員遭到逮捕和審判。

1. [[25]](#_25_45) 中村菊男，《星亨》，第50—54頁。

1. [[26]](#_26_45) 鈴木武史，《星亨藩閥政治を揺がした男》，第59—61頁。

1. [[27]](#_27_44) 鈴木武史，《星亨藩閥政治を揺がした男》，第79—80頁。

1. [[28]](#_28_41) 他認為日本應當擁有一支至少和英國遠東艦隊一樣強大的艦隊（中村菊男，《星亨》，第86頁）。

1. [[29]](#_29_41) 鈴木武史，《星亨 藩閥政治を揺がした男》，第91頁；中村菊男，《星亨》，第85—89頁。在同一篇演講中，星亨力促對清朝采取新的政策，以便防止英國或俄國入侵清朝。他還聲稱，結束治外法權和終止外國對日本關稅的控制都很困難，不過后者更為迫切。

1. [[30]](#_30_39) 中村菊男，《星亨》，第104頁。中村引述了星亨在就任眾議院議長時的部分講話。星亨宣稱，他的一舉一動不是作為自由黨的成員，而是要公正無私，要與擔任這一公職的身份相符。如果成員認為他犯了錯誤，他力勸成員對他進行指正；如果成員說得對，他承諾將改正錯誤。

1. [[31]](#_31_37) 如需了解議會對星亨提起的相關指控的內容，請參閱中村菊男，《星亨》，第116—117頁。亦見《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28—329頁。

1. [[32]](#_32_36) 中村菊男，《星亨》，第156頁。

1. [[33]](#_33_35) 當著參議員小組委員會的面，星亨對增加絲綢關稅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進行了論證。他談到了實際上降低關稅將會帶來哪些良好效果（中村菊男，《星亨》，第163—164頁）。讓大隈印象深刻的是，他向星亨授予了勛三等旭日章。

1. [[34]](#_34_35) 如需了解他的建議的原文，請參閱中村菊男，《星亨》，第175—177頁。

1. [[35]](#_35_32) 中村菊男，《星亨》，第182頁。

1. [[36]](#_36_31) 鈴木武史，《星亨》，第150—151頁。

1. [[37]](#_37_27) 如需了解關于星亨遇刺的描述，請參閱長尾和夫，《暗殺者》，第135—139頁。法院因謀殺行為對伊庭進行了審訊，在隨后下達的判決書中，法院承認伊庭的行為是出于道德上的正義感，并判處他無期徒刑，而非死刑（第159頁）。

1. [[38]](#_38_22) 如需了解關于葬禮的進一步描述，請參閱長尾和夫，《暗殺者》，第158頁。鈴木武史在《星亨》的第191頁刊登了一幅送葬隊伍的照片。

1. [[39]](#_39_2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80—81頁。這篇報道提到了前幾年曝光的星亨收受賄賂的丑聞，但沒有解釋為什么這樣的人會得到天皇的賞識（如果這篇報道屬實的話）。

1. [[40]](#_40_20)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89頁。

1. [[41]](#_41_20) 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44.

1. [[42]](#_42_20)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98頁。

1. [[43]](#_43_17) 1901年8月，在伊藤準備前往美國和歐洲時，井上馨力勸伊藤訪問俄國。井上確信，與俄國達成諒解是解決韓國問題的最佳途徑。外務大臣桂太郎認為，與英國結盟或者和俄國達成諒解都能實現這一目標。伊藤認為，與英國結成同盟沒有任何用處，并將引起俄國和法國的敵對。當11月林董在巴黎會見伊藤時，（不知道與英國談判進展的）伊藤認為，為結束滿洲和韓國的緊張局勢，與俄國簽訂協議至關重要（林董，《後は昔の紀他》，第343—345頁）。

1. [[44]](#_44_16) 林董，《後は昔の紀他》，第328—329頁。

1. [[45]](#_45_16) 林董，《後は昔の紀他》，第306—307頁。

1. [[46]](#_46_14) 如需了解作者所稱的就支持英日同盟發表的“第一次看法”，請參閱黑羽茂，《日英同盟の軌跡》第一卷，第21頁。張伯倫和日本公使加藤高明的談話發生于1898年3月17日。

1. [[47]](#_47_13) 黑羽茂，《日英同盟の軌跡》，第23頁。

1. [[48]](#_48_13) 林董，《後は昔の紀 他》，第321頁、第327頁。

1. [[49]](#_49_13) 林董，《後は昔の紀 他》，第330—331頁。

1. [[50]](#_50_13) 該協定簽訂于1900年10月16日，宣布在清朝采取門戶開放政策，以及維持清朝的領土完整。如需了解當時英國和德國之間的特殊關系，請參閱黑羽茂，《日英同盟の軌跡》第24—34頁。1901年3月18日，德國駐英公使赫爾曼·弗雷爾·馮·埃卡德斯坦恩（Hermann Freiherr von Eckardstein）向林董提議建立一個包括德國在內的三國同盟，但他是在沒有獲得德國外交部授權的情況下擅自提出這一提議（第29—30頁）。

1. [[51]](#_51_10) 如需了解日本修改后條約的詳細內容，請參閱林董，《後は昔の紀 他》，第349—350頁。

1. [[52]](#_52_7) 林董，《後は昔の紀 他》，第159頁。

1. [[53]](#_53_7) 林董，《後は昔の紀 他》，第160頁。

1. [[54]](#_54_7) 林董，《後は昔の紀 他》，第306頁。

# 第五十二章 禍機暗藏



1902年在最少限度的儀式中拉開了序幕。新年儀式逐漸受到外來文化的侵蝕，通常在1月5日舉辦的新年慶宴推遲了一天：這天是周日，眾人認為奉行基督教的休息日要比遵循日本傳統更加重要。幾天后，天皇像往常一樣聽了三次分別關于日本、中國和西方歷史的新年講座。大概是建立英日同盟的緣故，今年關于西方的講座主要講述了英國的議會改革。

1月10日，典侍室町清子逝世，享年六十三歲。自1856年入宮后不久，她被任命為當時年僅四歲的未來天皇的傅母。1867年，天皇登基后，她被冊封為典侍，并以這一身份服侍了天皇四十六年。如果不贊同天皇的言行，她會毫不猶豫地嚴加指責。天皇總是拒絕聽從她的建議，稱她為“阿多福”——京都方言中用于描述丑女人的稱呼。盡管如此，天皇的語氣之中還是含有感情的。面對這一非難，室町回答說：“阿多福乃妾之天質，雖有君命亦無可奈何，唯冀采納妾之所奏。”天皇一言不發，但最后還是按照她的建議去做。天皇和皇后為她的葬禮資助了兩千日元，作為對她多年效勞的感謝。對于一位像她這樣身份的人來說，算得上一筆史無前例的巨款。[[1]](#_1__Ian_Nish__The_Origins_of_the)

關于天皇與服侍之人的人情互動的記載是如此之少，使得這一微不足道的趣聞軼事讓人覺得有些親切。使用“阿多福”一詞也說明了天皇在私下里說京都方言，而在其他軼事中人們總是將他的話轉述成標準日文。

為迎接春天的到來，宮中舉辦了傳統儀式之一的詩會。天皇不喜歡御歌所所長高崎正風推薦的兩個主題（“雄雞告曉”和“寄神祝”），高崎只好提出一個更加傳統的主題。天皇以“新年梅”為主題作了下面這首短歌：

今又舊歲去

梅開吐艷新春續

倩影晨曦舞

芬芳染身暗香來

傲蕾破雪催寒去[[2]](#_2__Andrew_Malozemoff__Russian_F)

這首詩雖然措辭巧妙，但并沒有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不過，天皇進入了詩歌創作最繁盛的時期，大多數著名的詩歌都是創作于此時到晚年的這段時期。

1月28日，第五步兵連隊一個大隊被暴風雪掩埋的消息傳來，新年的喜慶氣氛被無情地打斷。當時天皇已經就寢，但侍從還是立刻稟告了天皇。

東京和青森縣之間往來的電報漸漸揭開了這個可怕的故事。1月23日，第五連隊兩百多人的第二大隊在進行冬季演習時，在八甲田山附近遭遇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雪，失去聯系。夏季時士兵們曾在這一帶進行過軍事演習，對該地區的地形比較了解，然而，士兵們對突然的嚴寒天氣準備不足，在彌漫的大雪和怒吼的狂風中迷了路。發現第二大隊未能返回營地，軍隊立刻派出了救援隊，但暴風雪阻礙了搜救工作的進行。27日，救援人員發現了一名瀕死的幸存者。他向救援人員描述發生的事情后，救援人員冒著風雪抵達災難現場。他們找到了幾個幸存者和大約四分之三的遇難者尸體。直到5月冰雪消融時，最后一具尸體才被找到。[[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1)

得知這一悲慘事件后，天皇悲痛萬分，立刻派武官宮本照明前往現場。2月7日，宮本傳來消息：找到士兵攜帶的九十四支步槍，但很久以后，這場災難的全部情況才被揭曉：一百九十九名官兵遇難，僅十一人生還。[[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

民眾得知這一悲劇后的第一反應是，強烈抗議軍方在士兵沒有身穿合適冬服的情況下，魯莽地讓服從的士兵在肆虐的暴風雪中進行軍事演習。但是，在公布了悲劇的全部細節后，民眾的情緒普遍從憤怒轉為同情。甚至有傳聞說遇難者家屬很欣喜，認為自己兒子或孫子的死不是徒勞無益的，而是為日后帝國軍隊的勝利做出了貢獻。[[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4月8日，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向議會報告說，俄國和清朝簽署了一份條約[[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規定將滿洲交還清朝。這一事件受到了日本的高度歡迎，其中一個特別的原因是他們也曾遭遇過以俄國為首的三國干涉而將遼東半島歸還給清朝。

俄國與清朝關于滿洲的談判可以追溯到1896年。當時，李鴻章前往莫斯科參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禮。[[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2)俄國和清朝簽署了一份密約，規定：（1）如遭遇外國列強侵略，兩國應互為援助；（2）如遇緊要之事，清朝所有口岸均準許俄國軍艦駛入；（3）為便于俄國將來轉運俄兵御敵以及接濟軍火和糧食，清朝允許俄國修建一條經由滿洲北部抵達海參崴的鐵路，該鐵路由享有治外法權的俄國人管理。這份密約的有效期為十五年。[[8]](#_8__Shi_Cheng___Jiao_Shou_Dong_S)

盡管密約的制定者推定將來侵略清朝的會是日本，然而，1897年德國侵占了膠州灣。這是明顯的侵略行為，因此，（根據這份密約）俄國和清朝應互為援助。伊恩·奈什（Ian Nish）對這一形勢描述道：

清朝通過她唯一知道的方式對德國的行為做出反應，即請求俄國壓制和勸阻德國。北京獲悉德國已在膠州登陸時，李鴻章根據1896年的條約直接向俄國提出邀請，請求俄國暫時占領清朝的一個港口，以此作為對德國行動采取的一項對策。[[9]](#_9__Qing_Can_Yue_Ben_Shu_Di_48Zh)

這也正是俄國夢寐以求的，他們不久就覺得膠州無所謂了。俄國從清朝手中獲得了租借旅順口和大連，以及修建一條經過滿洲南部的鐵路的權利。現在，他們在太平洋擁有了一個長久渴望的不凍港。直到該年年底，清朝才意識到他們采用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失敗了。[[10]](#_10__Ian_Nish_The_Origins_of_the)

1898年4月25日，日本和俄國簽署了一份議定書，規定兩國承認韓國獨立，均不干涉韓國內政；如果韓國就軍事或財政問題向日本或俄國征詢意見和請求協助，日俄未經商量不得采取任何措施；俄國同意不妨礙日本和韓國建立工商業關系。這份議定書首次承認了日本在韓國的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11]](#_11__Ian_Nish_The_Origins_of_the)

兩年后，也就是1900年，義和團的起義者破壞了位于滿洲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俄國以此為借口出動軍隊，占領了東北三省。他們稱自己無意吞并滿洲，一旦清朝恢復秩序，他們將立刻撤兵。[[12]](#_12__Ru_Xu_Le_Jie___Ri_E_Xie_Din)俄國出兵占領，自然讓日本人感到不安。1901年2月，日本警告清朝不要屈從于俄國提出的進一步要求，然而，李鴻章似乎愿意犧牲清朝在滿洲的權利來換取與俄國結盟。1901年秋，曾參與鎮壓義和團起義的其他國家陸續從北京撤兵，但俄國繼續占領著滿洲。

日本和英國屢次提出抗議。起初，日本以溫和的方式提出抗議，因為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西德二郎（曾在圣彼得堡大學學習）認為與俄國達成諒解至關重要。他們仍抱著一線希望地認為，如果俄國在滿洲的野心得到了滿足，那么日本在韓國的優勢地位將會得到承認。

1901年11月，伊藤訪問了俄國，受到了俄國民眾的熱情接待。他被授予圣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帝國勛章，沙皇力勸他經由西伯利亞大鐵路返回日本。謝爾蓋·維特伯爵向伊藤保證，俄國對韓國別無所圖，并且很樂意讓日本在韓國自由行事。事實上，俄國只是希望通過對韓國做出名義上的讓步，來換取在滿洲的隨心所欲。伊藤非常失望，雖然他仍然希望俄國做出讓步，但日本政府已經決定著手建立英日同盟，不再尋求與俄國結盟。[[13]](#_13__Andrew_Malozemoff_Russian_F)不過，在這一節點，日本仍明顯希望和俄國維持和平。

1902年，日本繼續鞏固自己在韓國的地位，建立了一個以親日派為核心的韓國政治勢力。大量日本人在韓國東南部定居，日本漸漸控制了韓國的礦業、郵政和電報業。此時，日本獲得了一個新盟友——向來拒絕卷入外國事務的美國。1902年初，幾個月前剛剛當上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向明治天皇發了一封表示友誼的函件。他和日本、英國一道警告清朝說，清朝向俄國授予的特殊權利違反了“門戶開放”政策。[[14]](#_14__Gen_Ju_Nai_Si_De_Shuo_Fa)美國之所以橫插一腳，主要是擔心不僅滿洲會俄羅斯化，就連華北也會落入俄羅斯之手，而這將嚴重阻礙美國與清朝之間的貿易。

1901年1月，日本成立了黑龍會[[15]](#_15___kokuryu_Zhi_Yi_Wei__Hei_Lo)。黑龍會公開聲稱其目標是實現泛亞主義并迫使俄國從滿洲撤至黑龍江——滿洲和西伯利亞的邊境——以北。9月，公爵近衛篤麿成立了國民同盟會，主張應防止俄國永久占領滿洲，倡議日本在韓國和滿洲修建鐵路。[[16]](#_16__Ian_Nish_The_Origins_of_the)這時成立的此類組織自然都充分意識到，如果他們的政策被采納，將有可能導致與俄國開戰。

對日本而言，修建鐵路對開展貿易和最終控制韓國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對俄國來說，西伯利亞大鐵路所代表的卻是近乎神秘的構想。1900年出版的鐵路旅行手冊，關于西伯利亞大鐵路這樣寫道：

俄國在東洋的開化政策或許與其他國家不同。該政策基于另外的指導原則，旨在通過維持自己廣闊疆土的和平來促進各國的共同福利。在亞洲插下基督教的旗幟和文明的榮譽將要歸功于俄國。[[17]](#_17__Ian_Nish_The_Origins_of_the)

在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倡議人中，沒有誰比財政部長維特伯爵更積極了。他不在乎花費多少，不屈不撓地推動這項工程，鐵路由此迅速延伸。就日本一方來說，這個一直落后于歐洲列強的國家開展一項如此巨大的工程，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是，在“帝國主義目標的驅動”下，這項工程得以推進。俄國與日本之間的鐵路大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1902年8月，按照沙皇的要求，維特伯爵前往遠東，訪問了海參崴、旅順和大連等地。一路所見所聞讓他感到失望，俄國在西伯利亞的殖民面臨著十分嚴重的問題。在返回俄國途中，他前往克里米亞向沙皇匯報了自己的印象。之后，他提交了一份報告，其中寫道，只有俄國從滿洲撤兵，東亞才能恢復正常。他還強調有必要與日本達成約定，若無此類約定，事情將會朝著最糟糕的方向發展。[[18]](#_18__Count_Sergei_Iulevich_Witte)

1902年4月，俄國與清朝簽署了一份條約，規定在清朝不發生動亂的前提下，俄國將逐漸從滿洲撤兵。俄國還同意交還自1900年起占領的鐵路線。日本和英國熱情洋溢地歡迎這個聲明，將此看做“門戶開放”政策取得的勝利。然而，撤兵的前提條件是清朝無動亂，而這讓俄國鉆了一個很大的空子，因為這個地區動亂頻發。后來，維特伯爵承認，俄國從來都沒有打算過認真執行撤兵條約。[[19]](#_19__Ian_Nish_The_Origins_of_the)

除了與俄國關系緊張外，對明治天皇來說，1902年是平淡無奇的一年。皇太子的健康和進步仍然讓他操心。這一年皇太子出人意外地用功學習。歐文·貝爾茨醫生發現天皇與兒子之間的關系冷漠而疏遠，他在日記中寫道：

他（皇太子）問候父皇時，總是以非常正式的方式進行，并且有很多官員在場。如果他生病了，天皇會頻繁詢問兒子的健康狀況，但是，除非病情嚴重到危及生命，否則天皇是不會去探望的。[[20]](#_20__Erwin_Baelz_Awakening_Japan)

5月，皇太子前去視察本州中部和北部的各縣。在他動身之前，天皇下達命令說，既然皇太子此次巡幸的目的是為了考察風俗民情和地理狀況，當地官員不得中斷工作來迎接、送行或恭候。[[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事實上，這次巡幸按照天皇的規定簡簡單單地進行，沒有給皇太子帶來太多樂趣。他視察了學校、長野縣的善光寺、縣議會堂、工廠以及其他值得關注的地方。福島縣爆發麻疹疫情的消息傳來時，巡幸中途停止了。

皇太子在巡幸中身體出現微恙，使他有借口在深愛的葉山町休養了一個月。6月底，皇室成員和其他政要慶祝皇太子的第二個兒子的誕生，但此時皇太子（盡管已經得知了消息）仍在葉山町。天皇給新誕生的王子取名雍仁，賜號淳宮。[[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與此同時，宮中正在為皇太子建造一座宮殿。初始預算為二百五十萬日元，天皇批準了這一預算。然而，8月初，負責建造宮殿的官員稟報說，由于通貨膨脹，建造成本增加了。最新估計，按照計劃宮殿將于1907年建成，耗資五百萬日元，這在當時來說是一筆巨款。天皇在1889年建造自己的宮殿時堅持簡樸、節約的原則，皇太子宮殿的預算造價讓他嚇了一大跳；在該年的稍晚時候，天皇命令建筑師避免采用華麗的裝飾，應把重點放在確保結構堅固上。天皇嚴厲地囑咐說，不得再提交關于增加資金的請求。[[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日本政府愿意為皇太子的宮殿耗費這么多資金，表明他們并沒有預料到會有戰爭爆發。日本宮廷與俄國宮廷繼續保持著友好關系。例如，8月27日，天皇向沙皇發了一封電報，對彰仁親王在俄期間獲得的親切接待表示感謝。但是，有些人士預料到會爆發戰爭，力勸天皇做好適當準備。在向天皇呈遞的關于國防的奏章中，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1852—1933）描述了天皇之前捐獻個人財產用于建造軍艦，認為此舉使得日本在與清朝的戰爭中獲得了勝利。他強調說：

刻下，東洋之天地看似妖云怪霧斂跡，然臣竊恐此中包藏攪擾將來和平之禍機，在清韓兩國。帝國海軍今日足以稱雄東洋，然列國軍備骎進，尤鄰強新擴張其海軍，不期年，數倍帝國之艨艟泛東洋之上。若夫一朝緊急事態起，環海之島帝國果可高枕乎？[[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山本請求總共撥款一億一千五百萬日元，用于建造和裝備三艘大型戰列艦、三艘大型巡洋艦和兩艘小型巡洋艦。不用說，日本要防備的國家是俄國。俄國東進遭到元老們的大力譴責，他們批準了擴充海軍的請求。

1902年11月，明治準備前往熊本縣觀摩一場特別軍事演習。幾個月前爆發了霍亂，疫情迅速蔓延，對于是否取消天皇的這次出行，眾人激烈爭論，但幸運的是，當10月天氣轉涼時，疫情已經漸漸消退。11月7日，天皇在新橋站登上火車，皇后和太子妃來給天皇送行。皇太子仍在葉山町，他派侍從前往大船站，目送天皇的火車經過。[[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天皇的熊本之行，是在沿途站點經常下車的悠閑之旅。他在不同的地方都創作了短歌，最具紀念意義的一首是在火車經過田原坂時創作的。田原坂曾是1877年政府軍和西鄉隆盛軍激戰的戰場：

遙憶田原坂

短兵相接士爭先

戰聲煙塵埋

昔日松苗今參天

迎來新貌換人間[[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他將這首詩賜給了隨行的陸軍中將乃木希典，毫無疑問，這是因為乃木曾參了田原坂之戰。乃木的詩更加生動形象：

山中草木森

十里戰場滿腥風

朋輩今何尋

漫山秋葉紅似火

疑是戰友血染成

天皇恢復了創作詩歌的興趣，這大概是本次出行最積極的效果。他平常喜歡觀摩軍事演習，但這一次出乎意料地不感興趣，甚至當11月14日在熊本城為皇室成員以及眾多國內外高官舉辦宴會時發了一通脾氣。這次宴會于當天下午2點30分開始，但是，當侍從長德大寺告知天皇是時候動身前往宴會廳時，他拒絕前去。天皇沒有出現，宴會廳的賓客都焦急萬分，不知究竟發生了什么。陸軍大將山縣攔住一名隨從，詢問為什么這么晚了天皇還不來，賓客們都在急切地等待。在沒能得到一個滿意的答復后，山縣親自去請天皇，力勸他參加宴會。天皇拒絕，說他有自己的理由。

聽到這個答復，山縣驚訝不已。他對天皇說，看到天皇遵循神武天皇的傳統，日復一日出現在公眾場合，百官和將士都深受感動和鼓舞。他可以想象得到，倘若天皇未能出席宴會，眾人會有多失望。天皇的一舉一動都是眾人膜拜的楷模，倘若現在無緣無故拒絕參加宴會，勢必會打擊到全軍的熱情，讓熊本縣的官員和民眾失望。眾人恐怕會質疑天皇的英明。或許天皇對此毫不在意，但山縣說他卻無法忍受這般質疑。他的聲音因激動而越來越高，說完這番話，他懇請天皇改變主意，前往宴會廳。

天皇打斷他，說道：“初有西幸之儀，以惡疫流行之故有司請止，軍務當局以為不可，奏稱，如惡疾，嚴飲食則足以防之，至于行幸之有無，輒影響軍隊士氣甚大，懇請朕之西幸。朕以其言為禮，遂決西幸，而來有司兢兢為朕嚴庖廚，朕亦躬甚慎之。此卿已熟知，今演習既終，如今日之賜宴，僅是慰勞，目下仍為慎飲食之際，朕不欲臨之，故不去。然卿來頻催，前日以嚴飲食催朕西幸，今反強要朕臨飲食之席，卿等弄朕也？”

天皇的表達極其辛辣。盡管充滿了恐懼和不安，但山縣仍然堅持，最后天皇妥協，派人準備馬車。此時已經3點20分了。在馬車到達宴會廳時，天皇立即走到座位上，在向出席宴會的眾人點頭示意后立刻離開，酒食碰都沒有碰一下。[[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天皇如此堅決地不去參加宴會，讓人難以理解。也許僅僅是因為軍事演習讓他疲憊不堪，他感覺不適；也有可能是因為他討厭被人操縱，盡管這些人自稱有多么尊敬他，但并不考慮到他的意愿。沒有人問過他是否想去熊本；山縣和其他政府領導人都認為即使有感染霍亂的風險他也應當去。現在，山縣又堅持讓他出席宴會，不顧及他是否情愿。盡管眾人是用崇敬的言語措辭說出“陛下應當這樣做或陛下應當那樣做”，但指示就是指示，這讓天皇格外惱火。

天皇不喜歡熊本的軍事演習，但在回程的途中，他命令武官作了一首軍歌，以紀念這一場合：

明治三十又五年

寒秋霜月已過半

揮旗威武大元帥

熊本我軍演豪邁

軍歌的其他部分描繪了軍事演習和此次歸程，還（通過提到俘獲清朝軍艦的方式）描述了日本在清日戰爭中取得的勝利：

戰捷傳來龍顏悅

筑紫[[28]](#_28__Di_Ming__Wei_Yu_Fu_Gang_Xia)登車急不耐

長州還御把言歡

只因濟遠擱退敗[[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1902年12月底，眾議院再次解散。這次是因為政府為支付龐大的海軍支出而提出的增收地租稅的提議未獲通過。以伊藤博文的政友會為首的反對黨紛紛反對這一提議。天皇屢次命令議會休會，但仍未能解決這一僵局。28日，眾議院投票贊成解散。1903年3月1日，眾議院舉行了新一輪選舉。

1903年的新年儀式中，唯一一個新穎之處是在1月6日為天皇舉辦的講座上，天皇可以自行選擇與西方歷史有關的主題。這一年的講座涉及的內容是威廉·普萊斯考特（William H. Prescott）的《天主教雙王斐迪南德國王和伊莎貝拉王后的統治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the Catholic），該書的一節描述了哥倫布呼吁為其探險籌集資金一事。和往常一樣，沒有跡象顯示明治是否對這一講座感興趣。然而，現在日本正準備攫取殖民地并加入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之中，他可能希望日本也能出現某個像哥倫布那樣具有遠見卓識的人，承諾為他開拓帝國。

關于日本今后的擴張，無論明治有著怎樣的夢想，但他對于近在眼前的事情仍然比較保守。1月9日，負責昌子公主和房子公主教育事宜的佐佐木高行向侍從長傳話，說他想讓公主們搬到位于海邊的某個地方，那樣她們可以避開東京的寒冬。在征求天皇的意見時，天皇拒絕同意讓公主們離開東京。他的理由是，公主們快到適婚的年齡了，一旦女人結婚，她就必須讓自己適應所加入的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一個女人因結婚而加入的家庭，可能沒有富裕到能讓她到其他地方避寒和避暑。如果公主們漸漸習慣于到東京以外的地方避暑過冬，則會成為可能不太容易摒棄的習慣，甚至對她們的健康帶來壞處。更好的做法就是讓她們學會忍受嚴寒和酷暑。公主們將在東京度過寒冬，如果為保持健康而進行必要的室外活動的話，她們可以不時參觀離宮或宮中的花園、宅邸。[[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天皇自己從不去其他地方避暑、避寒，但并沒有堅持讓皇太子留在東京。這大概是因為他擔心酷暑或嚴寒會對皇太子的健康造成嚴重影響。他可能還擔心，強迫皇太子做他不喜歡的事情，可能會使皇太子出現抽搐或其他神經系統失調的現象，就像過去發生的那樣。皇太子是唯一一位能夠隨心所欲生活的皇室成員。

2月2日，擔任東宮輔導的威仁親王拜謁天皇，認為應廢止東宮輔導一職，理由是近期皇太子不僅在學業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甚至能夠自學，并且病況也在漸漸減退。他認為，讓皇太子更加獨立的時機已經來臨。皇太子已經二十五歲了，如果還需要東宮輔導的話，眾人會覺得很奇怪，并且對皇室造成影響。天皇回復道，如果為已經成人的皇太子設置東宮輔導不太合適的話，那就把名稱改一改。換句話說，無論把名稱改成什么，天皇都認為皇太子仍然需要輔導。上月末，在威仁征詢意見時，伊藤博文也認為皇太子仍需東宮輔導，但是，他也承認，這些年身體和精神方面的壓力已經讓威仁精疲力竭，如果繼續讓威仁擔任東宮輔導可能有些不人道。2月6日，威仁的職位名稱改為東宮顧問，但職責還是一樣的。[[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一個月后，威仁再次奏報天皇，說有必要培養皇太子的獨立精神，但是，天皇對兒子的行為舉止愈加謹慎，似乎并不贊成給予皇太子更多的獨立。他下令說，從今往后，凡向皇太子征詢意見者，都應采用書面形式，皇太子的答復也應采用書面形式。[[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1月28日，在近衛軍第一和第二步兵團的軍營前面立起了皇室另一個問題成員——已故的能久親王——的銅像。[[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毫無疑問，能久的戰爭生涯和病喪臺灣使得天皇為他建造了這座銅像，但是，他早年的經歷——無論是作為輪王寺宮公現，還是在德國當一名生活奢侈、反復無常的學生——都難以讓他配得上這項殊榮。相比之下，盡管其他君王（比如同時代的維多利亞女王）都不反對建造石像或銅像以示紀念，但明治卻沒有任何的雕像。

4月7日，明治動身前往京都和大阪，觀看一次大規模的海軍閱兵，并出席第五屆國內產業博覽會。他乘坐火車出行，沿途在多個站點停靠，并于第二天下午抵達舞子，住在威仁親王的別邸。當火車經過神戶時，在港口外待命的軍艦全都張燈結彩，鳴炮致敬。在舞子時，這些靠岸停泊的軍艦白天掛滿了錦旗，夜晚則華燈閃耀。在晚餐之前和之后的兩個小時，海軍樂隊進行演奏。按照天皇的要求，他們演奏了天皇于11月在熊本軍事演習的返程途中創作的那首軍歌。[[34]](#_3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天皇喜歡陸軍勝過海軍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他不喜歡登上軍艦，部分原因是他覺得柴油的氣味很難聞。4月10日，就在進行大規模海軍閱兵的當天，他決定穿上陸軍制服[[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那套他不分場合或季節都穿的軍裝。盡管他命令武官為這一場合創作了一首軍歌，并呈現給海軍看，但天皇沒有穿上海軍大元帥的制服，仍讓海軍官兵感到失望。

在1903年閱兵結束后的幾年，當帝國海軍準備進行另一次閱兵時，他們為天皇制作了一套海軍制服，并懇請天皇穿著這套制服出席閱兵儀式。天皇沒有答復，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擔心這意味著天皇拒絕，于是請求覲見天皇，希望天皇改變主意。他還沒張口，天皇已經猜出了他的想法，問道，“山本，是衣服的事情嗎？”天皇答應穿上新的海軍制服。據說，看到天皇身穿海軍軍裝，艦隊官兵的士氣得到了極大提升。[[36]](#_36____Sen_Xian_San_Zhu_Zuo_Ji)

4月13日，天皇離開舞子前往京都。在火車上，他用軍歌的方式作了一首詩。天皇讓侍從澤宣元記錄下來，并在展示給其他人看時令澤宣元說是他自己創作的：

舞子海濱柏山町，

威仁別邸于旁岸。

衷心效君幾春秋，

而今暫居好做伴。

朝辭舞子登速列，

山迢水遠奔大阪。

驚覺速猛不虛傳，

千里之行片刻還。

似有祥煙遮羞日，

此是吉兆商業繁。

春風拂面無寒意，

皆因喜悅暖心田。

莫問舊都何時達，

京都只在須臾間。[[37]](#_3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5)

澤宣元提議說，天皇創作的這首軍歌頌揚了大阪的繁華，大阪市的民眾知道了會非常開心，但侍從長不準澤宣元請求天皇公布這首軍歌，因為他擔心這會使天皇勃然大怒。

4月20日，天皇在大阪出席了第五屆國內產業博覽會的開幕式。毫無疑問，目睹日本在工業、農業、商業和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天皇十分高興。[[38]](#_38__Ru_Xu_Le_Jie_Xiang_Xi_Nei_R)為參加開幕式，他與陪同成員都穿上了盛裝，并佩戴了徽章，十三個國家的公使和眾多日本政要也參加了這次開幕式。這一盛會表明日本的“煙霧之都”讓眾人很滿意。

然而就在此時，從清朝傳來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俄國從滿洲的撤兵進展緩慢。俄國承諾分三個階段撤兵。第一個階段已經完成，山海關到營口（牛莊）的鐵路也已經交還，但是所有這些只意味著俄國將軍隊從遼西——日本沒什么興趣的地方——轉移到了俄國的主要軍事基地所在的遼東。俄國非常不愿意執行第二階段的撤兵，包括撤出旅順和大連。截止期限的4月8日已經過去，但他們仍未撤兵；相反，俄國又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項撤軍條件，聲稱如果清政府希望俄國歸還領土就必須滿足這些條件，其中竟有俄國完全控制滿洲的管理和經濟等條款。這意味著其他國家在滿洲開展的通商活動將遭到封鎖。[[39]](#_3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得知這些新條件，日本驚慌不安，但政府無法就如何做出應對達成一致。3月15日，在召開元老會議時，伊藤博文說，英國和德國不會對俄國在滿洲的所作所為使用武力。如果日本在沒有其他列強支持的情況下反對俄國，可能導致意見上的沖突，最后只能通過戰爭來解決。關于日本的回應措施，他支持效仿英國和德國的做法。關于韓國，日本的目標應當是維持韓國的現狀，為此應設法與俄國達成諒解，從而避免兩國發生沖突。

雖然不能輕易地忽視伊藤的意見，但是，當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得知俄國向清朝提出新條件時，立刻向清朝發出嚴厲警告，讓清朝不要屈服。與此同時，他認為與俄國進行公開的直接談判的時機已經到來。他勸說伊藤和他一同前往山縣有朋位于京都的府邸，商討基本策略。

就在這時，日本駐清朝公使發來電報，說俄國軍隊已經開始轉移。一個營正準備占領位于鴨綠江畔的森林。日本也從駐韓公使那里收到了類似情報。

4月21日，在山縣府邸召開的會議得出的結論認為，俄國在滿洲和韓國北部的活動威脅到了韓國的生存，并且與日本的政策背道而馳。這四人[[40]](#_40__Ta_Men_Shi_Shan_Xian_You_Pe)決定，在滿洲問題上可以做出讓步，但是堅決維護日本在韓國的權利，即使冒著爆發戰爭的風險。[[41]](#_41__Da_Shan_Zi____Ri_Lu_Zhan_Zh)

沒有跡象表明天皇已經獲悉了這一具有潛在危險的情況。他當時正在京都，多次前往大阪參觀博覽會。皇后通常會在第二天前去參觀天皇造訪過的同一個地方。5月2日，天皇聽了大阪的松本武一郎向博覽會出租的留聲機。天皇對這個新發明很滿意，花了七十五日元購買。之后，松本向天皇獻上五張蠟筒唱片。第一張刻錄的是國歌《君之代》，第二張是筑前琵琶[[42]](#_42__Ming_Zhi_Shi_Dai_Zhong_Qi)大師橘智定演奏的《楠宮櫻井戰》，其余的都是軍歌。[[43]](#_4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很顯然，松本了解天皇的喜好。

在吊唁孝明天皇陵和英照皇太后陵（位于泉涌寺背后的月輪山）后的第二天，天皇作了一首迄今最感傷的詩歌：

月輪陵前唁

人世相隔兩茫茫

無言淚千行

松針拂袖簌簌落

哀甚徒令存者傷[[44]](#_4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5月10日，天皇離開京都返回東京，所有貴族和其他高官政要都來送行。此次出行是一個快樂的小插曲，但兩天后，天皇回到東京，從陸軍總參謀長大山巖那里得知了韓國的危急狀況。據駐韓國的陸軍武官奏報，俄國已經占領了鴨綠江河口東岸領土，并開始建造軍事設施，意圖阻止日本進一步前行。顯而易見，俄國無意從滿洲撤兵。大山巖認為俄國的目標是要永久占據東三省。

大山將俄國和日本的軍事實力進行了比較。盡管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完工能讓俄國比以前更快地向東亞運輸軍隊，但是，這條鐵路還未完全投入使用。兩國都在不斷地增加軍隊。從目前來看，俄國的海軍實力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三，不過，如果俄國完成目前的擴張計劃，很可能在幾年之內趕超日本。

針對這一情況，大山得出結論認為，日本必須立刻采取行動，抑制俄國無休止的貪婪，維護清朝和韓國的獨立以及保護日本的權利。時間拖得越久，日本要想實現自己的目標也就越困難。如果日本將滿洲讓給俄國，并且允許俄國將長臂伸到鴨綠江對岸的韓國領土上，那么韓國的獨立將不復存在，清朝將岌岌可危。如果這兩個國家滅亡，日本如何能獨自維護自身的安全？

大山透露，他已將俄國的舉動告訴了韓國，但韓國政府束手無策，因此，日本政府別無選擇，只能將堅定的反對態度傳達給俄國。[[45]](#_4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天皇對此次稟告有何反應，我們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很可能即將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開戰，這一定讓他嚇了一大跳。在悠閑地造訪京都、重溫過去之后，他需要面對眼前這個突如其來的沖擊。

1. [[1]](#_1_52) 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41。根據安德魯·馬洛澤莫夫（Andrew Malozemoff）所說，1897年8月，當俄國沙皇會見德皇時，沙皇同意，如有需要，德國艦隊可以暫時進駐膠州灣（"aid-HCG", p. 96-101）。德國利用這一約定，于1897年11月進入膠州灣。并非嚴重關切此事的俄國，按照清朝的提議，于12月決定派出一支艦隊暫時占領旅順。馬洛澤莫夫寫道，“威廉二世很高興。12月17日，他通過外交部通知俄國，說他贊成這一行動。19日，他又自己給沙皇發了一封電報：‘請接受我對貴國軍隊到達旅順的祝賀。’就在同一天，他委托俄國駐柏林臨時代表奧斯滕·薩肯（Osten-Sacken）男爵向尼古拉二世傳話說：‘現在，你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不管他是日本人還是英國人；任何一個挑釁者，無論他是什么人，只要他想通過武力來阻撓你的意圖，德國艦隊將和俄國軍艦攜起手來共同對付。’”

1. [[2]](#_2_52) 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172-173. 謝爾蓋·維特伯爵用這些話回憶了伊藤的訪問：“很不幸，他受到了冷遇……最后，我們提出自己的建議來反駁他的建議，我們的建議是不接受日本的基本意愿。我們將建議的草案發給了此時正在柏林的伊藤：看到自己的友好建議在彼得堡得到了這樣的對待，他沒有回復，也不可能做出回復。他不再反對與英國達成約定，根據這個約定，當日本和俄國發生爭端時，英國承諾將對日本給予支持，正是這個約定導致了一場對雙方來說都是災難的戰爭”（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aid-HCT",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03）。

1. [[3]](#_3_5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176—177頁。

1. [[4]](#_4_5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181頁。

1. [[5]](#_5_5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184—187頁。

1. [[6]](#_6_5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187頁。截至2月7日，有17人生還，108人遇難，85人下落不明。一些幸存者在醫院中去世（第198頁）。

1. [[7]](#_7_5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187頁。

1. [[8]](#_8_52) 史稱《交收東三省條約》，又稱《俄國撤兵條約》。——譯注

1. [[9]](#_9_52) 請參閱本書第48章。

1. [[10]](#_10_52) Ian Nish,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31. 直到1922年，密約的規定才被完全披露。

1. [[11]](#_11_52) Ian Nish,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39.

1. [[12]](#_12_52) 如需了解《日俄協定》（Nishi-Rosen Convention）的內容，請參閱Andrew Malozemoff,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 p. 110。后來，俄國駐日本公使羅曼·羅森男爵將這份協定稱為“極其跛腳而又毫無意義的協定”。

1. [[13]](#_13_52) Andrew Malozemoff,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 p. 146. 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24—225頁。

1. [[14]](#_14_52) 根據奈斯的說法，“學界一般認為，門戶開放是由清朝海關的高級官員艾爾弗雷德·希皮斯利（Alfred Hippisley）和威廉·羅克希爾（William H. Rockhill）提出的。羅克希爾是位于華盛頓的美國國務卿約翰·海（John Hay）的初級職員”（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55）。

1. [[15]](#_15_51) “kokuryū”直譯為“黑龍”，或許可以說明該協會有著不吉祥的名聲。

1. [[16]](#_16_51) Ian Nish,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95.

1. [[17]](#_17_51) Ian Nish,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17。

1. [[18]](#_18_50)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07.

1. [[19]](#_19_50) Ian Nish,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142.

1. [[20]](#_20_49) 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249.

1. [[21]](#_21_49)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43頁。

1. [[22]](#_22_48)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61頁。這位王子后來的稱號是“秩父宮”。

1. [[23]](#_23_48)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75頁、第346頁。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赤坂離宮。該宮殿于1908年完工，但是，在明治時期，皇太子或其他人都沒有使用過。當天皇翻看這座建成宮殿的照片時，他唯一的評價是“太奢華了！”。這個評價對于建筑師片山東熊來說是沉重的一擊，片山曾多次前往歐美游歷，研究為皇室和富人建造的房屋。赤坂離宮主要為新巴洛克風格，但也含有其他許多不同的風格元素，使用的材料也多種多樣。研究現存明治時期建筑物的作家達拉斯·芬恩寫道，“無論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片山都會使用日本的材料：檜木用于椽，自然銅用于屋頂，茨城花崗巖用于望板，并且還使用了京都的絲綢以及1300萬塊當地的磚塊。但是，在建筑物的內部，正如他所說的那樣，他采用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最好材料：法國、摩洛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大理石；英格蘭的平板玻璃和地毯；美國的供暖、管道和電氣設備；法國的壁爐、鏡子、馬賽克和枝形吊燈。他還采用了法國的家具，處處滲透著法式的氣息”（Meiji Revisited, p. 236）。

1. [[24]](#_24_46)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00頁。

1. [[25]](#_25_46)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06頁。

1. [[26]](#_26_46)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08頁。

1. [[27]](#_27_45)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18—319頁。

1. [[28]](#_28_42) 地名，位于福岡縣。——編注

1. [[29]](#_29_4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25—327頁。

1. [[30]](#_30_40)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55頁。

1. [[31]](#_31_38)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66頁、第368頁。

1. [[32]](#_32_3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81頁。

1. [[33]](#_33_36)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64頁。

1. [[34]](#_34_36)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92頁。

1. [[35]](#_35_3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95頁。

1. [[36]](#_36_32) 《森銑三著作集 続編》第五卷，第12頁。

1. [[37]](#_37_28)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99—400頁。

1. [[38]](#_38_23) 如需了解詳細內容，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06頁。

1. [[39]](#_39_2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05頁。如需了解七項要求的英文譯文，請參閱Ian Nish,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146。

1. [[40]](#_40_21) 他們是山縣有朋、伊藤博文、桂太郎和小村壽太郎（大山梓，《日露戦爭の軍政史録》，第27頁）。

1. [[41]](#_41_21) 大山梓，《日露戦爭の軍政史録》，第28頁。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09—410頁。

1. [[42]](#_42_21) 明治時代中期，受薩摩琵琶的影響，橘智定根據盲僧琵琶和薩摩琵琶的綜合技法創造了筑前（日本古地名，現在的九州北部）琵琶。筑前琵琶的演奏風格優雅哀傷，演奏者以女性為中心，在琵琶的形制上分四弦和五弦兩種。因為面板用梧桐制成，所以音色較薩摩琵琶更為柔和，甚至可以彈出近似三味線（日本的一種弦樂器）的聲音。——譯注

1. [[43]](#_43_18)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16頁。

1. [[44]](#_44_1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17頁。

1. [[45]](#_45_1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23—426頁。

# 第五十三章 戰前交涉



1903年6月1日，七名法學博士向總理大臣桂太郎提交了一份關于日本未來對俄政策的建議書。[[1]](#_1__Ru_Xu_Le_Jie_Ri_Ben_He_E_Guo)他們語氣強硬，指出最近發生的一系列危機事件造成了日俄關系緊張，如果俄國無法滿足日本的要求，除了開戰無路可走。他們的觀點代表了多位日本領導人在接下來八個月與俄國進行談判時所表達的觀點。

這些法學博士說道，在清日戰爭后，日本面對三國（俄國 、德國和法國）干涉無力保住遼東半島，由此引發了第一場危機。這是造成目前滿洲危機的最終原因。第二場危機發生在德國對膠州灣虎視眈眈之時，當時日本不具備必要的海軍實力來驅逐德國。如果日本能夠防止德國占領清朝的領土，俄國也就不會這么輕易地提出租借旅順和大連的要求。最后一場危機是在義和團起義之后，日本未能就俄國從滿洲撤兵制定具體的日程安排，這使得俄國在拖延撤兵時有了可乘之機。

新一輪的危機是由俄國未能執行承諾的第二階段撤兵所引起。如果日本毫無反應地就此罷休，那就等于錯過了采取行動的黃金時機。這七名法學博士認為，日本已經錯失了上述三大良機，他們都急切地希望日本不要重蹈覆轍。他們指出，俄國已經穩步地侵占了滿洲，在陸上修建鐵路、城墻和炮臺，在海上加大了對艦隊的投入力度，以此鞏固其地位。近期傳來的消息明確表明，俄國加強軍事力量的目的就是為了恫嚇日本。每拖延一天，危險就增加一分。日本在軍事方面的優勢最多只能維持不到一年的時間。

他們說道，目前，俄國在軍事上無法與日本匹敵，但是，一旦對其軍事力量感到自信，俄國想要的不僅是滿洲，還包括韓國。一旦韓國落入俄國的手中，他們下一個目標還用說嗎？除非解決滿洲問題，否則韓國劫數難逃；如果韓國慘遭厄運，那么日本也別奢望能夠自保。

不過，日本還是有希望的。事實上，日本也存在這么一個天賜良機。俄國在遠東尚未站穩腳跟，日本擁有地理上的優勢。四千多萬同胞對俄國的行動暗懷憎恨，團結一致。如果日本未能利用這些因素，那么老祖宗留下來的遺產將岌岌可危，子孫后代的福祉將慘遭摧毀。

一些人認為日本在外交關系上必須小心謹慎，必須首先弄清楚英美的態度和摸清楚德法的意圖。對于這一觀點，七名博士進行了反駁，力勸日本即刻采取行動。他們說，這些國家的態度很明確。盡管德國和法國不支持日本，但他們也不支持俄國，因為日本和英國結盟，與日本為敵就意味著與英國為敵。此外，英國也不愿意為了滿洲而背負這種危險。美國的目標是“門戶開放”，只要保持“門戶開放”，他們才不關心滿洲是清朝的還是俄國的。他們感興趣的只有商業利潤。要是等到美國下定決心——比如在確保遠東和平與維護清朝安全這一外交政策上，和日本堅定地站在一起——那么日本將會失去行動的自由。

眾人認為，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日本都不應當失去韓國。這一主張完全正確，不過為了保護韓國，日本一定不能讓滿洲落入俄國之手。因此，至關重要的是，日本不能讓俄國將外交爭端的討論范圍僅限于韓國，因為這樣一來，就如同已經承認滿洲被俄國左右了一樣。

這七名法學博士繼續說，從法理上來說，俄國必須從滿洲撤兵。但這并不意味著從滿洲的A地轉移至B地就可以了。此外，鐵路警衛也必須撤離。日本有權要求俄國履行這部分義務。最重要的是，日本必須提防俄國政治家。他們口蜜腹劍，企圖“以滿易韓”或者采用類似的姑息措施。日本必須采取明確的措施，從根本上解決歸還滿洲領土的問題，維護遠東的和平。

盡管這七名博士并沒有說得那么直白，但很明顯，他們認為日本應向俄國發出最后通牒，如果在滿洲問題上俄國拒絕按照日本的意愿做，那么日本應趁著自己在軍事上占上風的時候宣戰。

他們的觀點得到了眾人的支持，不過，戰爭似乎并不會馬上就爆發。在這七名博士提交建議書后不久，俄國陸軍大臣、步兵上將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Alexis Nikolaevich Kuropatkin）以及視察了海參崴和旅順的九名高層官員訪問了日本。他們得到了國賓級待遇，6月13日，謁見了天皇和皇后。天皇為俄國貴賓和公使館人員舉辦了正式的午宴，山縣有朋、大山巖和內閣成員也參加了這次午宴。同一天，天皇向庫羅帕特金授予了勛一等旭日大綬章，并向他的隨行人員授予了較低等級的勛章。庫羅帕特金奉沙皇之命考察日本的情況，探察日本的意圖，但日本卻對此次訪問感到榮幸之至。

日本自然避免與來訪的俄國人探討軍事問題，但是，在非正式的談話中，他們對兩國因遠東問題而不斷出現的對立表示遺憾。庫羅帕特金希望可以避免戰爭，和平解決危機。在離開東京返回俄國之前，他向天皇傳達了沙皇的口信：“貴國與他國不同，是俄國的鄰邦，為此，我希望兩國的關系能夠特別親密。西伯利亞大鐵路已經完工，希望兩國未來的關系越來越親密。”[[2]](#_2__Maurice_Paleologue__Three_Cr)

盡管此番言論很友善，但兩國的主戰派卻越來越激進。6月22日，總參謀長大山巖向天皇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深信目前迫切需要解決韓國問題，如必要，應當使用武力。同一天，他向內閣提交了書面意見書，聲稱如果日本任由事情自然發展，那么三四年內朝鮮半島將成為俄國的領土，而這意味著與日本隔海相望的就是如虎狼一般兇猛的國家。大山支持通過談判的方式盡力與俄國達成和平解決方案，但是，如果不幸爆發戰爭，日本的軍隊也有實力和俄國的軍隊抗衡。為了國家百年大計，現在正是解決韓國問題的最佳時機。[[3]](#_3__Isaac_Don_Levine___aid_HUN)

6月23日，按照桂太郎和小村壽太郎的要求，天皇召集了九名主要閣僚舉行御前會議，商討日本未來的對俄政策。[[4]](#_4__Yuan_Wen_Jian___Ming_Zhi_Tia_1)小村準備了一份對俄行動方案。和七名法學博士提交的建議書一樣，他宣稱俄國未能遵守從滿洲撤兵的承諾，而這給了日本一個機會來解決多年來一直遲疑不決的韓國問題。最重要的是，無論出于什么樣的原因，日本都不能將韓國的領土讓給俄國。但是，在滿洲問題上可能需要對俄國做出一些讓步，因為俄國在滿洲占有優勢。他提議在東京召開會議。[[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桂太郎也同樣下定決心，不讓俄國奪走韓國的任何一塊領土，但他認為，如果韓國公開承認自己歸屬于日本則會引發沖突。

駐圣彼得堡的日本公使奉命詢問俄國是否愿意同日本談判。不過，在御前會議上，眾人表現出來的團結帶有欺騙性。伊藤的政友會雖然在這個問題上和解，但他們繼續攻擊桂太郎，尤其是在征收地租稅的問題上。第二天，桂太郎邀請伊藤、山縣和海軍大臣山本來他的府邸，告訴他們由于感到無法應對危機，自己打算辭職。他認為只有元老才能擔任這個領導職務，并請求伊藤或山縣組建內閣。雖然他將退居二線，但仍會在方方面面予以合作。伊藤和其他人表示反對，但桂太郎還是以身體健康為由提交了辭呈。[[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

由于沒有為這一僵局找到解決方案，于是，（和往常一樣）該問題便交由天皇定奪。天皇召見了桂太郎，并對桂太郎說，在準備就韓國和滿洲問題與俄國進行談判的關鍵時刻，他不允許桂太郎辭職。他命令桂太郎留任，并靜養身體。

7月13日，天皇任命伊藤博文擔任樞密院議長。毫無疑問，這表明較之于政府中其他人士的看法，天皇更重視伊藤的意見。早在7月6日，天皇就派人請來伊藤商討與俄國的關系。天皇說道，日本可能處在因滿洲和韓國問題與俄國開戰的邊緣，前景很讓人擔心，他希望伊藤能在樞密院任職，這樣他就可以就國家的重大問題向伊藤征詢意見。伊藤請求給予幾天時間考慮。8日，天皇向伊藤發了一封書面信函，解釋說是因為他需要伊藤的坦率意見，才讓他擔任額外的職務：“朕倚信卿積年之勤勞，望以匡救獎順，完其始終。”[[7]](#_7__Zhe_Jiu_Ren_Shi_Yi_Teng_Bo_W)

在天皇向臣民表達尊敬之意中，這大概是最明確的一次。伊藤回復說，他將接受陛下的圣恩，但內心絕非欣喜。他覺得這是山縣向天皇提出了策略。山縣親自會見了伊藤，并使用了所有雄辯之術勸說伊藤接受這一任命。伊藤終于答應，但條件是山縣和松方也要成為樞密院的成員。最后，天皇召見了臥病在床的桂太郎，告訴他說，只要他留任，伊藤將接受新職位。該日晚些時候，桂太郎拜訪伊藤，伊藤證實了這一說法。經過深思熟慮，桂太郎收回了辭呈。

現在，日本政府總算是團結一致了。7月28日，外務大臣小村請駐俄公使栗野慎一郎向俄國外交大臣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拉姆斯多夫（Vladimir Nikolaevich Lamsdorf）伯爵傳達口信，表示日本希望就滿洲和韓國問題與俄國進行公開談判。如果俄國大體上同意，日本政府將送來關于談判性質和范圍的建議書。栗野還奉命說，為了友誼和友好關系，日本希望此類談判能夠馬上進行。[[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

8月12日，栗野向拉姆斯多夫提交了日本建議書的文本。該建議書有六條：

一、兩國承諾尊重清朝和韓國的獨立及領土完整，并維持各國在清朝和韓國的工商業機會均等的政策。

二、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認俄國在管理滿洲鐵路方面的特殊利益。

三、日本和俄國相互承諾，不得妨礙日本在韓國以及俄國在滿洲的工商企業的發展。

四、如果韓國或滿洲發生動亂，需要派遣遠征軍，軍隊數量不得超過實際需要的數量，一旦完成使命，應立刻撤兵。

五、為了使韓國擁有一個良好的政府，俄國承認日本擁有專有權利向韓國提出建議和提供援助（包括軍事援助）。

六、本條約取代日本和俄國之前就韓國問題達成的所有議定書。[[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日本政府提交了這份建議書，滿懷信心地認為這可以作為日俄之間協議的基礎，并且希望俄國政府能本著友好精神進行修改或提出相反的看法。栗野在8月3日就收到了這份建議書的電報，但直到8月12日才得以與拉姆斯多夫伯爵會晤。拉姆斯多夫借口很忙，但真正的原因是俄國在遠東的領土管理問題上發生了重大變化。8月12日，就在栗野最終提交小村建議書的當天，沙皇簽署了一項設立遠東總督府的敕令，目的是在總督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阿列克塞耶夫（Evgenii Ivanovich Alekseev）的指揮下，對俄國在貝加爾湖以東的省份和領土上的所有軍事、經濟和外交事務進行統一管理。[[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這個變化對財政部長、俄國政府最有能力的官員謝爾蓋·維特伯爵來說是個巨大而痛苦的意外。8月28日[[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在他提交每月定期報告時，沙皇突然說撤去他的財政部長一職，任命他擔任大臣委員會主席這一體面的閑職。維特認為，他之所以失去了在政府中的要職，是因為他反對沙皇的政策——他確信這些政策將導致與日本開戰。[[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當維特得知阿列克塞耶夫——他將阿列克塞耶夫鄙視為擁有“亞美尼亞地毯經銷商心態”的“極端惡劣的野心家”[[13]](#_13__Andrew_Malozemoff_Russian_F_1)——被任命為總督時，則將此舉解釋為沙皇已經接受了強硬派極端主義分子的意見。這些極端主義分子認為俄國可以在遠東得到想要的一切，因為日本人不敢開戰。他補充說，沙皇“在內心深處渴望通過打贏一場戰爭來獲得榮耀。我確信，如果俄國不和日本開戰，也會（就阿富汗問題）和印度開戰，或者更有可能就博斯普魯斯海峽與土耳其打上一仗，當然，這樣的戰爭將轉變成更大的戰爭”。[[14]](#_14__Wei_Te_De_Hui_Yi_Lu_Shang_X)就在維特被撤職的當天，沙皇在日記中用簡潔的語言寫道，“現在，我掌權了。”[[15]](#_15__Count_Sergei_Iulevich_Witte)維特用以下話語回憶了日本的建議書：

我回到俄國后不久，日本駐俄公使粟野前來見我。1903年7月，我仍然擔任財政部長時，他曾把一份建議書交給我和拉姆斯多夫伯爵看，這份建議書將有可能和平解決兩國之間的分歧。我表示接受，但無濟于事，因為這份建議書還是被送交阿列克塞耶夫總督定奪，并對此進行了無休無止、毫無結果的討論。

這個頗有真知灼見的人（粟野）告訴我，他在積極解決這一問題，而我的國家一直在拖延談判。日本一提出什么建議，拉姆斯多夫就會說事情是由阿列克塞耶夫負責的，而阿列克塞耶夫和（羅曼）羅森則推說他們束手無策，因為皇上（沙皇）出巡去了。在日本看來，這種策略就意味著我們想要開戰，他覺得作為公使所面臨的一個聲譽攸關的問題，就是要盡力避免爆發戰爭。他勸告說，時間短暫，日本民眾的情緒越來越激昂，以致政府也難以遏止。他說，日本畢竟是一個主權國家，竟不得不如此俯就，要和一個什么“遠東大總督”進行談判，就好像遠東是俄國的，日本只不過是遠東的保護國一樣。[[16]](#_16__Count_Sergei_Iulevich_Witte)

粟野的評論很有見地。他自然意識到俄國不會原封不動地接受小村的建議書。也許俄國最不可能接受的就是第二條。為換取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的優勢利益，日本所提供的只是承認俄國能對滿洲的鐵路進行管理。這顯然不是一個平等的交易，但是，當小村提出這條建議時，毫無疑問，他預料到需要做出進一步的讓步。俄國未能立刻答復小村的建議書，日本將此解釋為蓄意羞辱，像俄國未能履行在第二階段從滿洲撤兵的承諾一樣，這激怒了日本民眾。如今，以七名法學博士為首的愛國人士公開呼吁發動戰爭。[[17]](#_17__Count_Sergei_Iulevich_Witte)

為了得到俄國提出的反建議，日本等了五十二天。對此，拉姆斯多夫伯爵給出的理由是沙皇出巡去了，并且有些問題要和阿列克塞耶夫進行商討。他建議在東京進行談判。[[18]](#_18__Andrew_Malozemoff_Russian_F)日本最初也是這樣提議的，但現在這一建議并不受歡迎，因為俄國設立了總督府：若是在東京，和日本進行談判的不是享有最高地位的俄國統帥，而是阿列克塞耶夫的下屬——俄國公使羅森男爵，這對日本來說有失顏面。[[19]](#_19__Count_Sergei_Iulevich_Witte)最后，日本讓步。10月3日，俄國向日本政府送交了第一次反建議。

反建議幾乎全盤否決了日本的最初提議。在反建議中，第一條是保障韓國（而非清朝）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在其他條款中基本上都沒有提到滿洲，暗示著俄國不會就對滿洲的控制進行討論。第八條是唯一一條提到滿洲的條款，俄國要求日本承認滿洲及其沿海地區完全不屬于日本的勢力范圍。反建議中提到了新的內容，即在位于北緯三十九度以北的韓國領土上設置中立區，日俄兩國的軍隊都不得進入，由此遏制日本在韓國的勢力。[[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兩國提出的建議差別巨大，使得雙方似乎不太可能做出讓步。

為調解日本和俄國的建議并找到和解的依據，小村與羅森男爵會晤，但是，羅森說他沒有獲得授權對建議書進行修改。10月30日，小村向羅森提交了日本的第二次建議書，共十一條。和之前一樣，第一條是日俄相互承認清朝和韓國的獨立及領土完整；第二條到第四條要求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的優勢利益；第五條是日本承諾不建立可能影響俄國自由通過朝鮮海峽的防御工事；第六條規定在韓國和滿洲邊界的兩邊設置五十公里的中立區；第七條和第八條規定，滿洲不在日本的勢力范圍之內，俄國有權采取必要措施保護其在滿洲的利益；其余條款與通商和鐵路有關。[[21]](#_21__Andrew_Malozemoff_Russian_F)

為了得到俄國的答復，日本又等了四十多天，最終于12月11日收到了答復。俄國將此次拖延歸因于皇后生病。皇后是在和沙皇一起出巡時患病。在這樣的時刻，大臣們不敢拿這些“瑣事”來打擾沙皇，因為沙皇認為遠東的局勢已經穩定下來。俄國提出的新建議比舊建議更加偏激：俄國重申了與韓國有關的條款，然而，凡是提到滿洲的地方都被刪掉了。日本認為，他們本著和解的精神參加談判，已經做出了很多讓步，但俄國傲慢自大的舉動讓人非常失望。[[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

并不是所有俄國人都不肯讓步。12月10日，步兵上將庫羅帕特金就俄國在遠東的目標向沙皇提交了一份很長的備忘錄，他建議：

俄國應把關東[[23]](#_23__Yuan_Hua_Qing_Can_Yue___Min)以及旅順和大連交還清朝，把東清鐵路的南部支線讓給清朝；但是作為回報，俄國應獲得滿洲北部的一切權利以及兩億五千萬盧布，由此作為清朝償還俄國修建鐵路和旅順的費用。[[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維特大體上同意庫羅帕特金的方案，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滿洲不是我們的。我們應當同意歸還以背信棄義的方式奪得的遼東半島和東清鐵路。美國、英國、日本以及它們的公開聯盟或秘密聯盟，還有清朝，都不會答應讓俄國占領滿洲。[[25]](#_25__Ji_Shan_Hai_Guan_Yi_Dong)

甚至是渴望獲得軍事勝利的沙皇也在十月向阿列克塞耶夫發了一封電報：“我不希望日俄之間發生戰爭，也不允許如此。采取一切措施防止戰爭爆發。”沙皇于1903年12月28日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他說：“戰爭無疑是不受歡迎的。時間是俄國最好的盟友。每一年都會使我們的力量得到增強。”[[26]](#_26__Andrew_Malozemoff_Russian_F)

然而，等到這個時候，日本的耐心也耗盡了。他們覺得缺乏外交禮貌的俄國讓他們蒙羞受辱。12月16日，總理大臣、元老和內閣成員召開了一個會議，會上做出了兩個決定：（1）關于滿洲問題，自始至終都應當通過外交途徑尋求解決方案，避免使用“最終手段”；（2）關于韓國問題，日本應當維護10月30日的修訂建議中闡述的原則，如果俄國拒絕接受這些原則，那么日本將訴諸武力以達成目標。[[27]](#_27__Count_Sergei_Iulevich_Witte)

會議決定，為達成外交解決方案，日本將進行最后一次嘗試。想到日本將采取“最終手段”，桂太郎感到不太舒服，但12月18日，他召開了內閣大臣會議，并將這一決定告訴他們。之后，他和小村一同進宮稟報天皇，探明天皇的想法。從這個時候起，盡管小村繼續盡一切努力進行談判，但桂太郎頻繁約見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和大藏大臣，準備戰爭。

12月21日，栗野收到指示，向俄國口頭告知日本第三次建議書。[[28]](#_28__A_Lie_Ke_Xie__Ku_Luo_Pa_Te)最值得注意的一個變動就是刪掉了第六條，即建立一個中立區。日本愿意建立此類中立區，盡管這將覆蓋韓國面積的近三分之一，但前提是俄國也在邊境的滿洲一側建立一個類似的軍事緩沖區；然而，俄國不屑于對這一建議做出答復。

收到日本的新建議，俄國國內的情緒很悲觀。12月23日，海軍上將阿列克塞耶夫奏報沙皇說：“12月22日，羅森男爵已經通過電報向我發來日本的新建議，這無異于要求俄國政府正式承認日本是韓國的保護國。”[[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俄國自然不愿答應，但他們提到可能在下一次建議書中認真考慮滿洲問題。不過，在東京，越來越多的政府成員認為戰爭已無法避免。12月28日，日本召開了一次特別內閣會議，商討戰爭的最后準備工作。[[30]](#_30__Yuan_Wen_Qing_Can_Yue_Shang)

在兩國關系日益緊張的這幾個月中，天皇的腦海被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占據。雖然皇太子的行為舉止本就已經讓他擔憂不已，但他大概沒有什么時間來關心自己的家人。10月，（在當了兩年少校后）皇太子被晉升為陸軍大校和海軍大校。他只需履行最少的軍事職責，但當月，他前往和歌山縣、香川縣、愛媛縣和岡山縣進行視察。除了必須視察學校和考察當地特產外，皇太子高興地參觀源平合戰的屋島、道后溫泉和各寺廟。在返回東京前，他在位于沼津的別墅休養。[[31]](#_31__John_Albert_White_The_Diplo)

天皇繼續為女兒們的教育問題擔憂。此時，受命撫育昌子公主和房子公主的佐佐木高行提議說，應當在公主們的學業中增加理科和漢文。天皇不反對增加漢文，但他認為理科知識太高深了，可能會干擾到其他必修課程，[[32]](#_32__Shumpei_Okamoto_The_Japanes)公主們需要學習的反而應該是世界地理和歐洲語言。大概天皇在心里琢磨著，他的一個或多個女兒或許會效仿歐洲皇室嫁給外國王子。

在1904年的元旦，唯一不同尋常的地方是，由于皇太子夫婦碰巧在東京，使得他們能向天皇恭賀新年。他們還第一次接受了朝拜。[[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第二天，最有前途的貴族成員近衛篤麿逝世，享年四十二歲。這對明治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為將來貴族在管理日本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深深擔憂。

1月6日，羅森向小村送交了俄國對日本第三次建議書做出的答復。[[34]](#_3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俄國仍然要求在韓國境內（而非滿洲境內）設置中立區，并堅稱日本不得將韓國用于戰略目的。如果日本滿足這些要求，那么在滿洲境內，俄國將“不妨礙日本以及其他國家根據與清朝達成的現有條約而獲得的權利和特權，但建立租借地的權利除外”。[[35]](#_35__Erwin_Baelz_Awakening_Japan)這是一個讓步，但日本認為俄國沒有對關鍵問題做出答復，覺得已經沒有什么理由繼續談判下去。

1月12日，包括元老、內閣成員以及高層陸軍和海軍官員在內的十六名官員召開了會議，天皇也參加了。盡管桂太郎和小村得出結論認為，已經沒有進一步談判的余地，必須通過軍事手段來解決這一問題，然而，海軍備戰工作尚未完成。在本月20號之前，無法在佐世保調集到運輸士兵所需的交通工具。因此，提前發動戰爭將對日本不利。桂太郎和小村編寫了最后一份修訂建議書。即便這份建議書未能使俄國做出讓步，但至少能讓日本在開戰前獲得所需的時間。[[36]](#_36__Yuan_Wen_Qing_Can_Yue___Min)

在最后一份建議書的開篇，日本要求廢止第五條，即規定日本“不得將韓國領土的任何部分用于戰略目的”；日本還要求廢止第六條中與設置中立區有關的所有內容,對俄國建議書中與滿洲有關的內容進行修改，包括要求俄國在滿洲問題上同意尊重清朝的領土完整。[[37]](#_3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對于讓俄國同意這些更改，日本幾乎沒抱什么希望。俄國認為這些言語如此挑釁，是日本發出的不容進行進一步商談的最后通牒。和往常一樣，俄國的答復姍姍來遲。與此同時，日本開始準備因談判破裂而可能導致的戰爭。1月16日，天皇命令陸軍集結四個大隊的步兵，運往漢城的港口——仁川。日本計劃占領漢城，將漢城作為戰爭期間的作戰中心。[[38]](#_38__Jin_Guan_Ri_Ben_Ren_Wei_Ci)

1月18日，宮中為天皇舉辦了關于歐洲歷史的講座，本次講座摘選了大衛·休謨（David Hume）《英國史》（"aid-HMH"）中的文章。這篇文章講述了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故事，選擇它似乎是一個奇妙的預言。[[39]](#_39__Di_Si_Ci_Jian_Yi_Shu_De_Yua)在本年度的第一次詩會上，天皇以“巖上松”為主題創作了一首短歌。這首和歌具有雙重意義，眾人將其解釋為天皇在祈禱受到戰爭威脅的日本能夠平平安安。[[40]](#_4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此時，日本和俄國似乎都已經選擇了戰爭，但法國卻在為避免開戰繼續努力。法國處于兩難的境地，因為它與俄國有聯盟關系，但近來也和英國——俄國的敵人、日本的盟友——走得很近。法國在俄國開展了巨大的投資，他們下定決心要保護這些投資。1月23日，巴黎外交事務部政治事務副部長莫利斯·帕雷奧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在日記中寫道：

（外交部長）泰奧菲勒·德爾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巧妙地繼續努力促使圣彼得堡和東京走得更近。他已經想出了一些絕妙的方案，可以同時解決滿洲問題和韓國問題。他也同樣巧妙靈活地利用從倫敦那里獲得的支持。蘭斯道恩、小村和拉姆斯多夫一直在對他表示極力感謝。

“我覺得我將成功完成這件事情”，今天早上他這樣對我說。

他的臉容光煥發，兩只眼睛炯炯閃爍。

我將最新的內幕告訴他，這些內幕讓我確信俄國想開戰，或者說無論如何俄國都在把自己推向一個境地，它向日本發布了一個具有威脅性的、導致戰爭幾乎無法避免的最后通牒。

德爾卡塞的臉立刻陰沉下來。

“你總不會認為我會相信這些吧，是嗎？我每天都和沙皇通信。就在昨天，他還感謝我很好地了解他的想法，感謝我盡心盡力謀求和平。照你這么說，原來他一直都想開戰！那接下來又會發生什么！”[[41]](#_4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

根據他和沙皇的私下聯系，德爾卡塞確信沙皇尼古拉二世迫切希望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日俄之間的紛爭。然而，（正如帕雷奧洛格指出的那樣）沙皇夢想著進一步擴大疆土，他要吞并滿洲和韓國，還有西藏、波斯，或許還有土耳其。帕雷奧洛格用這些話描述了尼古拉二世的性格：“他并不聰明，反而非常膽小、輕信、懶散、搖擺不定，很容易受到神秘學說的影響……他讓自己聽從一群空想主義者、投機主義者和從中作梗者，這些人絕對是主戰派。”[[42]](#_42__Zuo_Zuo_Mu_Xin_Gang____Ming)

帕雷奧洛格講述了尼古拉二世（他用“狡黠的偽君子”“和所有軟弱無能的人一樣”形容尼古拉二世）如何孤立那些反對與日本開戰的大臣，如何在甚至沒有與這些大臣商量的情況下設置了遠東總督府。如果總督是位真正出類拔萃的人，情況倒還有可能得到改善，但是，正如維特對海軍上將阿列克塞耶夫（在隨后的戰爭期間擔任俄軍總司令）評述的那樣，“他對陸軍一無所知，對海軍也是僅知一二”。他之所以能官居高位，是因為當大公阿列克謝在馬賽妓院尋釁鬧事被警察審訊時，他替阿列克謝承擔了罪責，說警察把阿列克謝和阿列克塞耶夫弄混淆了。為此，這位心懷感激的大公便推薦阿列克塞耶夫擔任關東州長官。[[43]](#_43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

沙皇會選用這樣的人來擔任如此重要的職位，真是讓人驚訝不已。維特將這種難以預測的行為歸結為尼古拉“具有的女性性格”，他引述了一段話，說尼古拉天生具有心血來潮的特征，這種特征會讓人覺得他是女性而非男性。每一個了解尼古拉的人都說他大體上脾氣很好，對妻子和孩子情深意切，但優柔寡斷使他成為一位難以伺候的君主。他深信自己的權力來自于上帝，并只對上帝負責，這大概可以對他為什么認為與日本開戰是其神圣使命這一想法進行解釋。他確信盡管可能需要費一番工夫，但俄國將會取得勝利。[[44]](#_44__Count_Sergei_Iulevich_Witte)

尼古拉也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影響。很難想象還有誰能夠施加比德皇更糟糕的影響力。早在1895年4月，德皇給他的這位“表弟”[[45]](#_45__Count_Sergei_Iulevich_Witte)寫信：“我應當竭盡全力確保歐洲的安寧和保障俄國的大后方，那樣一來，沒人會阻礙你的遠東行動！很顯然，開拓亞洲大陸、防止黃種人侵犯歐洲，是俄國日后的偉大任務。在這一點上，我會始終支持你，竭盡所能助你一臂之力。”[[46]](#_46__Wei_Lian_Shi_Wei_Duo_Li_Ya)在寫給沙皇的信中，德皇一次次地流露出自己對“黃禍”的憎惡，他相信阻止“蒙古人和佛教侵入歐洲古老的基督教文化”是俄國的使命。[[47]](#_47__Isaac_Don_Levine_Letters_fr)（在另一封信中，德皇畫了一幅畫，畫中歐洲的幾個大國以各自的守護天使為代表，被大天使米迦勒召集在一起，以便“團結起來抵抗佛教、異端和野蠻人的侵犯，守衛十字架”。）[[48]](#_48__Isaac_Don_Levine_Letters_fr)

隨著在信中寫下“威利”[[49]](#_49__De_Huang_He_Sha_Huang_Zhi_J)這一落款，德皇的腦海中浮現出這樣一幅圖景：他自己成為大西洋的海軍上將，尼古拉則成為太平洋的海軍上將。每一個階段，他都對尼古拉的野心極力鼓舞。例如，1904年1月3日，他寫道：“顯而易見，每一個不偏不倚的人都認為韓國必定是，也將會是俄國的。至于什么時候或者怎樣成為俄國的，眾人都不關心，那只是你和你國家的事情。”[[50]](#_50__Isaac_Don_Levine_Letters_fr)

這兩位皇帝都是絕對的獨裁者，他們手中握著上百萬國民的性命，意識到這一點讓人覺得非常可怕。被卷入即將來臨的戰爭的第三位皇帝——明治——是唯一配得上皇帝這一稱呼的。

直到1月30日，圣彼得堡才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積極地堅持強調，目前的糾紛絕不會牽扯到俄國的切身利益，因此，不存在導致戰爭的巨大風險。俄國民眾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為何有戰爭的風險。他的結論是，沙皇政府應不遺余力地尋求和平解決危機的方案”。[[51]](#_51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拉姆斯多夫得到了委員會所有成員的支持，但海軍上將亞歷山大·阿戈維奇·阿巴扎（Alexander Ageevich Abaza）除外。他被維特描述成“無賴和惡棍”[[52]](#_52__Count_Sergei_Iulevich_Witte)以及總督的工具。尼古拉集結了一群政治冒險家，每一天他們都使自己更加接近戰爭。

直到2月2日，沙皇才批準俄國對日本的“最終”建議書做出答復。與此同時，小村屢次指示栗野敦促俄國盡快答復。栗野報告說，俄國如此拖延，是為了贏得加強軍事準備的時間。[[53]](#_53__Shumpei_Okamoto_The_Japanes)1月30日，日本在總理大臣的府邸召開會議，伊藤起草了一份備忘錄，稱日本做出果斷決定的時候已經到來。他得到了參加會議的所有元老和內閣大臣的支持。兩天后，陸軍總參謀長大山巖向天皇提議說日本應先發制人。

天皇最信任的顧問官們對戰爭的結果沒有信心。他們只是詳細介紹了日本令人絕望的軍事和財政狀況。陸軍計算得出，日本有一半的幾率贏得戰爭；海軍估計將會有一半的軍事力量傷亡，但余下的一半能摧毀敵軍。[[54]](#_54__Shumpei_Okamoto_The_Japanes)盡管對日本贏得戰爭的幾率做出的評價很悲觀，但所有決策制定者都支持開戰。他們確信，與俄國進行進一步的談判是徒勞無益的，無論是對韓國還是對日本，俄國都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可想而知，如果俄國盡早對日本的第四次建議書做出答復，如果在與根據同清朝達成的現有條約而獲得的權利和特權有關的條款中刪除“建立租借地的權利除外”這一規定，那么可能會導致日本對開戰的決定重新進行考慮。然而，俄國政府于2月3日向海軍上將阿列克塞耶夫發送的電報（該電報最遲本應在4日或5日抵達東京），直到2月7日才抵達羅森男爵處。[[55]](#_55__John_Albert_White_The_Diplo)

與此同時，2月3日在覲見天皇時，總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務大臣小村向天皇詳細奏報了事到如今不得不與俄國開戰的原因。他們請求天皇于第二天召開元老和內閣大臣會議，并宣布決定。即使等待了兩周，在無數次請求俄國迅速做出答復后，日本仍未收到俄國的答復。桂太郎將這種無禮行為歸結為俄國蔑視日本，似乎認為日本缺乏斗志。日本不應該再浪費時間了。[[56]](#_5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日本駐巴黎公使接到指示，要求他無需為得到俄國政府的答復再做進一步的嘗試。

第二天，在御前會議上，日本同意斷絕與俄國的外交關系。[[57]](#_57__Yuan_Wen_Jian___Ming_Zhi_Ti)2月5日，日本帝國政府通過駐圣彼得堡公使照會俄國外交大臣，說日本政府已經決定終止談判，并將采取必要的行動來維護韓國的自由和領土完整。就在同一天，天皇向陸軍和海軍頒布詔書，通知他們說，盡管所有日本人都努力維持和平，但日本決定斷絕與俄國的外交關系。

天皇在這段時期作的一首詩表達了他的焦灼情緒（盡管以非常間接的方式）：

悲嘆多事秋

今又豈敢忘國憂

鶯啼亂庭中

苦等無果倍增愁

紛紛擾擾幾時休[[58]](#_58__Zuo_Zuo_Mu_Xin_Gang____Ming)

1. [[1]](#_1_53) 如需了解日本和俄國第一次交換的建議書的原文，請參閱John Albert White, The"aid-HRI", pp. 351-352。

1. [[2]](#_2_53)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4-5. 懷特寫道，1903年10月拉姆斯多夫訪問巴黎，這表明俄國希望借用法國的斡旋來調解兩個對手的剛性需求（"aid-HU0", pp. 124-125）。在英國和日本的要求下，德爾卡塞接受了這一重任，俄國也表示同意。但是，日本確信，進一步拖延才是俄國想要的，并且對于日本完全無法接受的要求，俄國也沒有流露出松口的跡象。

1. [[3]](#_3_53) Isaac Don Levine, "aid-HUN", p. 13. 當德皇提到“蒙古人”時，他指的是所有黃種人，尤其是日本人。在和歐文·貝爾茨醫生的一次交談中，伊藤博文說，“毫無疑問，德皇腦海里想到的蒙古人主要是日本人；如果有威脅到歐洲的任何蒙古勢力，不可能是大清朝，只能是日本——這個遠東崛起的大國”（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222）。

1. [[4]](#_4_53) 原文見《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44—449頁。他們也向陸軍元帥山縣有朋、伯爵松方正義、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和陸軍大臣寺內正毅發送了建議書的副本。

1. [[5]](#_5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52頁。

1. [[6]](#_6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58頁。

1. [[7]](#_7_53) 這九人是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大山巖、松方正義、井上馨、桂太郎、山本權兵衛、小村壽太郎和寺內正毅。這些人被稱為是把持當時日本政權的“寡頭政治家”。如需了解這一主題的延伸論述，請參閱Shumpei Okamoto,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

1. [[8]](#_8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60頁。

1. [[9]](#_9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64頁。

1. [[10]](#_10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69頁。

1. [[11]](#_11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75頁。

1. [[12]](#_12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79頁。如需了解這六點的譯文，請參閱Ian Nish,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184-185。

1. [[13]](#_13_53) Andrew Malozemoff,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 p. 224.

1. [[14]](#_14_53) 維特的回憶錄上寫的是8月13日，這是按當時俄國所使用的羅馬儒略歷計算。其他敘述寫的是8月28日，這是按歐洲和日本所采用的格里高里歷計算。

1. [[15]](#_15_52)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 trans. Sidney Harcave, pp. 315-316.

1. [[16]](#_16_52)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65。

1. [[17]](#_17_52)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66。

1. [[18]](#_18_51) Andrew Malozemoff,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226.

1. [[19]](#_19_51)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68.

1. [[20]](#_20_50)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77頁。另請參閱Shumpei Okamoto,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p. 94-99。他引述了歐文·貝爾茨醫生日記中的一段話，貝爾茨回憶道，“在火車上，我遇見了一位穿著時尚的日本男士。他告訴我說，‘民眾對俄國的憤慨之情已經無法控制了，政府應當立刻宣戰。否則，我擔心會發生內亂。事實上，甚至君王都會受到威脅’。”貝爾茨評論說，“對于像這樣不負責任的人來說，生活可真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1903年9月25日條）。岡本俊平引述自貝爾茨的兒子托古·貝爾茨（Toku Baelz）的日文翻譯。英語譯文中不包含這篇日記。

1. [[21]](#_21_50) Andrew Malozemoff,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238.

1. [[22]](#_22_49)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84頁。另請參閱John Albert White,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p. 102-103。

1. [[23]](#_23_49) 原話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16—517頁；第二次交換的建議書的譯文請參閱John Albert White,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p. 352-354。

1. [[24]](#_24_4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42頁。俄國提出的新建議大概是阿列克塞耶夫和羅森的杰作（Andrew Malozemoff,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243）。

1. [[25]](#_25_47) 即山海關以東。1905年5月，日軍占領遼東半島后，將其更名為“關東州”。——譯注

1. [[26]](#_26_47) Andrew Malozemoff,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243.

1. [[27]](#_27_46)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 trans. Sidney Harcave, p.366.

1. [[28]](#_28_43) 阿列克謝·庫羅帕特金的這篇日記寫于1903年12月28日，轉引自Andrew Malozemoff,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p. 243, 245.

1. [[29]](#_29_4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45—546頁。

1. [[30]](#_30_41) 原文請參閱上第549—550頁；日本建議書的譯文和俄國在1月6日提出的反建議，請參閱John Albert White,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354-355。

1. [[31]](#_31_39) John Albert White,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112-113.

1. [[32]](#_32_38) Shumpei Okamoto,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p. 99-100；《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55—562頁。

1. [[33]](#_33_3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03—504頁。

1. [[34]](#_34_3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08頁。

1. [[35]](#_35_34) 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240.

1. [[36]](#_36_33) 原文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68—569頁；譯文請參閱John Albert White,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356-357。

1. [[37]](#_37_29)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69頁；John Albert White,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355.

1. [[38]](#_38_24) 盡管日本認為此舉沒有用處，但關于日本提交第四次建議書的理由說法不一。除了需要更多時間在佐世保調集運輸艦隊外（《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75頁），懷特還提出了三個可能的理由：（1）日本當然不愿與一個強大的對手卷入戰爭；（2）日本當然不愿被視為侵略者；（3）日本希望證明自己是值得尊敬的、能被接受的國際社會的一員（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20）。

1. [[39]](#_39_23) 第四次建議書的原文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77—579頁；譯文請參閱John Albert White,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356-358。

1. [[40]](#_40_2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82頁。

1. [[41]](#_41_2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83頁。

1. [[42]](#_42_22) 佐佐木信綱，《明治天皇御集謹解》，第202頁；《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84頁。

1. [[43]](#_43_19)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p. 6.

1. [[44]](#_44_18)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82.

1. [[45]](#_45_18)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69。

1. [[46]](#_46_15) 威廉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子，沙皇的妻子亞歷山德拉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

1. [[47]](#_47_14) Isaac Don Levine,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 p. 10. 德皇給沙皇的信是用英語寫的。尼古拉的回信尚未公開。

1. [[48]](#_48_14) Isaac Don Levine,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p. 17. 另請參閱本書第五十章。

1. [[49]](#_49_14) 德皇和沙皇之間的親昵稱呼，德皇威廉二世稱為“Willy（威利）”，沙皇尼古拉二世稱為“Nicky（尼基）”。——譯注

1. [[50]](#_50_14) Isaac Don Levine,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pp. 96, 100.

1. [[51]](#_51_11)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p. 8.

1. [[52]](#_52_8)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p. 365, 368.

1. [[53]](#_53_8) Shumpei Okamoto,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00.

1. [[54]](#_54_8) Shumpei Okamoto,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01。

1. [[55]](#_55_7) John Albert White,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129. 他提到一個傳聞，說日本電報局故意延遲發送電報。

1. [[56]](#_56_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93頁。

1. [[57]](#_57_4) 原文見《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95—596頁。

1. [[58]](#_58_4) 佐佐木信綱，《明治天皇御集謹解》，第158頁。

# 第五十四章 “發現敵船”



日俄戰爭在雙方都沒有事先宣戰的情況下打響。在（最近向意大利購買的）“春日”號和“日進”號巡洋艦被用于抗擊俄國艦隊之前，[[1]](#_1__Sidney_Lewis_Gulick___aid_IB)日本海軍決定等待一段時間，于是屢屢否決開戰計劃，讓陸軍大為惱火。在巡洋艦安全抵達新加坡（日本盟友的軍事堡壘）后，海軍才同意開第一槍。他們意識到，搶在強大的、正在路上的俄國艦隊抵達遠東海面之前開火至關重要。

在決定向俄國開火之前，日本在徒勞地等待著俄國對他們的建議書做出答復。事實上，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似乎是日本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在過去的一年，俄國一而再再而三地讓日本等待，似乎漠不關心自己的拖拉行為給日本造成的影響。這種態度對日本政府成員（甚至是那些非常了解俄國軍事實力的人）來說是無法忍受的侮辱。要是日本民眾得知沙皇和他的親信們用怎樣輕蔑的語言嘲諷他們和他們的國家，說不定會更加迅速地采取行動。

無論這兩個政府可能采取怎樣的行動，當時的人們似乎都認為日俄之間的戰爭無法避免。1月13日，詩人石川啄木在日記中寫道：

東亞風云漸告急，已做出師準備，傳聞已起草宣戰令。進來人氣高漲，戰已不可避。既無可避，我寧早一日翼望大國民之英勇。[[2]](#_2__Maurice_Paleologue___aid_ICA)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戰爭并非完全不可避免。鑒于事態的后續發展，我們很難對戰爭爆發的表面原因信以為真：日本決定維護韓國的獨立。在日俄戰爭結束的那一年，日本自己摧毀了韓國的獨立，強迫韓國皇帝簽署了一份條約，使韓國淪為日本的被保護國。五年后，日本吞并韓國。很明顯，維護韓國獨立只是日本的一個幌子。伊恩·奈斯寫道：

從戰爭的起源上來講，日俄戰爭與其他戰爭形成有趣的反差。戰爭的起因并非來自經濟壓力，比如民眾需求多而資源供應少。誠然，日本是戰爭的發動者，并且面臨著原材料短缺和人口快速增長等問題。但是，韓國并非它要尋找的原材料供應地，也不是安放過剩人口的地方。在現階段，滿洲也不是日本進行大規模海外殖民的場所，事實上也不是商業活動之地……日本當然沒有處在社會混亂的狀態，也沒有人會認為日本尋求發動一場戰爭是為了轉移人們對國內問題的關注。在1904年，日本民眾還沒有訴諸仇外主義、民族主義或求戰主義來發泄對貧困、革命或政治的不滿。兩國在狹隘的基礎上做出的開戰決定，或許大部分是出于戰略上的考慮。[[3]](#_3__Baron_Roman_Rosen__Forty_Yea)

毫無疑問，主要的戰略考慮是將由哪個國家主宰韓國和中國東北地區。日本下定決心寸步不讓。也許清日戰爭的勝利給了他們信心，讓他們覺得自己能同任何國家抗衡，無論這個國家有多大或者軍事上有多強。1904年2月6日，日本通知俄國談判終止，以后日本將采取自認為適當的獨立行動。他們可能認為這種說法等同于宣戰，[[4]](#_4__Zhe_Liang_Sao_Xun_Yang_Jian)但是，當日本突然對位于旅順和仁川的俄國軍艦開火時，俄國譴責這是違反國際法的可恥行為。[[5]](#_5____Shi_Chuan_Zhuo_Mu_Quan_Ji)

日本當然會對他們的行動進行辯護，并且獲得了其他國家的支持。法國外交部的莫利斯·帕雷奧洛格寫道：“日本不宣而戰，是在重演敵人曾經使用過的卑劣戰術。1853年11月30日，俄國在對戰土耳其時就曾使用了這一招，當時，俄國在錫諾普發動突然襲擊，摧毀了土耳其的黑海艦隊。”[[6]](#_6__Ian_Nish_The_Origins_of_the)

被譽為“俄國問題最權威的外國專家”的狄隆（E. J. Dillon）[[7]](#_7__Ri_Ben_Zheng_Fu_Zai_Hui_Ying)在1918年寫道：

日本突然攻擊俄國艦隊的行為被批評為卑鄙行為，且有很多人認同這一批評。我覺得必須說明一下，根據我所獲得的信息，隨著危機起起伏伏，從戰爭開始到結束，天皇的政府都表現出與和平期一樣的騎士般的忠義和節制。有人認為，在突然發動初次攻擊方面，俄國會表現得與敵人不同，我覺得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根據現存的一封由沙皇（于2月8日）發送給遠東總督的電報來看，沙皇下達的一個重要訓令就是，“如果日本艦隊向北航行越過了韓國西部的北緯三十八度線,你的選擇就是在他們開第一槍之前開火。我信賴你。愿上帝幫助你”。[[8]](#_8__1904Nian_2Yue_24Ri_De__Lun_D)

這封電報表明俄國將會毫不猶豫地發動襲擊，即使沒有宣戰。但是，日本為防止對手搶占先機，先發制人。2月6日，日本電令駐俄公使回國，就在同一天，俄國駐日公使羅曼·羅森男爵被召喚到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的府邸，并被告知日本與俄國斷絕外交關系。在返回俄國公使館的途中，羅森從俄國海軍武官那里獲悉：

當天早上6點，日本艦隊拔錨起航，駛向一個未知的目的地。他們兵分兩路，一路輸送兩個師的軍隊，顯然是要在韓國的海岸登陸，大概是在朝鮮半島西海岸的某個地方。另一路很明顯是要襲擊我國停泊在旅順口外錨地的艦隊，這是日本人盡皆知的事實。[[9]](#_9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i)

羅森的消息是準確的，然而，他卻無力警告俄國政府，因為日本政府為了防止機密外泄，暫停向外國發送電報。當羅森和家人正在等待船艦接他們離開日本時，

這時發生了一件感人的事情。當皇后陛下派來的侍女抵達時，我的妻子獨自待在會客廳。侍女說，她受皇后陛下的委托，特此傳達皇后陛下的極度悲傷之情，皇后陛下對我們在這樣痛苦的氛圍中離開感到難過。她懇請我的妻子接受一個小小的紀念品，以此紀念我們曾在日本逗留的時光。這個紀念品是兩個銀制的小花瓶，上面刻有皇室的紋樣。

盡管羅森男爵夫人認為由于兩國正在交戰，接受皇后的禮物有些難為情，但她還是帶著送禮人同樣的心情接受了禮物，并請侍女傳達她的感謝之情。[[10]](#_10__Baron_Roman_Rosen_Forty_Yea)傳統的禮節就這樣以我們今日難以想象的方式延續著。

2月8日，在海軍少將瓜生外吉指揮的軍艦的護送下，遠征軍在仁川登陸。在幾乎沒有遭到反擊的情況下，軍隊占領漢城，并繼續向北朝著鴨綠江挺進。此時，有兩艘俄國軍艦和一艘商船正停靠在港口。海軍少將瓜生命令俄國軍艦在第二天中午前離開港口。如果不服從命令，他將在港口內擊沉這些船艦。第二天12點過10分，這兩艘軍艦起錨離港。羅森男爵聽說：

先是“瓦良格”號（Variag）炮艦，接著是“高麗人”號（"aid-I2U"）炮艦，他們接受了日本海軍少將的要求，慢慢起錨出發。軍艦上懸掛著軍旗，軍官和士兵列隊站立，經過停靠著的外國軍艦，伴隨著國歌的祝福，向著被敵人摧毀的命運，英勇地前進。敵人布置的眾多強大的軍艦呈半圓形排開，使得這兩艘軍艦根本沒有機會逃離。[[11]](#_11__E__J__Dillon__The_Eclipse_o)

日本對此進行的描述更加直截了當。當“瓦良格”號從港口出現時，“淺間”號發炮攻擊。在經過大約一個小時的交火后，“瓦良格”號起火，逃回港口，之后爆炸沉沒。當晚，“高麗人”號也起火沉沒，商船被船員炸毀自沉。日本艦隊首戰告捷，毫發未損。[[12]](#_12__Baron_Roman_Rosen_Forty_Yea)

2月6日，日本聯合艦隊的主力從佐世保出發。兩天后，驅逐艦小隊在旅順口夜襲俄艦，重創兩艘戰列艦和一艘巡洋艦。海軍大將、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東鄉平八郎命令十五艘軍艦按照他的指揮，向旅順口挺進。次日早上11點30分，他升起了印有那句著名標語的旗幟：“皇國興廢，在此一戰；全體將士，奮力殺敵。”

戰爭爆發時，俄國在遠東的海軍力量包括六艘大型戰列艦和一艘小型戰列艦、九艘大型巡洋艦和兩艘小型巡洋艦，以及一些小型船艦。所有戰列艦、小型巡洋艦和四艘大型巡洋艦都停靠在旅順，還有四艘大型巡洋艦靠泊在海參崴，一艘停在仁川。[[13]](#_13__Baron_Roman_Rosen_Forty_Yea)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這支俄國艦隊的大多數軍艦都遭到了重創，日本獲得了制海權，他們封鎖了旅順口，并在滿洲登陸。初嘗勝利自然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力量。在報紙上讀到日軍成功襲擊旅順口以及在韓國海岸取得勝利的有些夸張的報道時，啄木驚呼：“余欣喜不已，攜新聞紙，3時許至學校，同村人諸氏談戰。”[[14]](#_14__Baron_Roman_Rosen_Forty_Yea)

2月9日，俄國以沙皇的名義發布宣戰文告。第二天，日本以天皇和內閣成員的名義宣戰。[[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這時，日本民眾對即將到來的戰爭的激動心情已經達到了狂熱的程度，我們可以在啄木寫于2月7日的日記中窺見一斑：

今日新聞，告日露（俄）局面甚急激。村內亦召集預備兵。余扔掉手套，天賜良機已來臨。真快心之事。[[16]](#_16__John_Albert_White_The_Diplo)

日本后來在海上和陸上獲得的勝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此處不再贅述。日本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不消說，他們欣喜若狂，至少持續到了傷亡慘重的消息被公布之時。國土再次淪為戰場的韓國人就沒那么狂熱，但他們即便不愿意被日本人占領，也只能默許。日本勸告清朝中立，解釋說這樣不必再給財力已經消耗殆盡的清朝增加額外壓力（雖然清朝的自然資源和取之不盡的勞動力對日本很有吸引力）。他們還擔心，清朝卷入戰爭可能會導致驅逐外夷的暴力事件（如義和團運動）再次上演。日本承諾尊重清朝的中立，但前提是俄國也這么做。[[17]](#_17____Shi_Chuan_Zhuo_Mu_Quan_Ji)

作為日本的盟友，英國受到同盟條約的束縛，如果有第三國加入俄國，那么英國將和日本并肩作戰。因為沒有其他國家加入俄國的陣營，英國就沒有在軍事行動中參與戰爭，但英國社會對日本的戰爭大業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簡·奧克利（Jane H. Oakley）的《日俄戰爭詩》（"aid-I3U"）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全詩長二百五十頁，有八十四篇。這首鮮為人知的打油詩是押韻的抑揚格五音步詩[[18]](#_18__Ru_Xu_Le_Jie_Zhe_Liang_Fen)。幾乎每個詩節都滑稽可笑。下面這一節選自第一篇，描述的是在仁川海戰中為什么日本成功、俄國為何戰敗：

俄軍水手的勇猛呀，聞名遐邇，

但卻駕著舊軍艦，真是膽大又魯莽；

他們的操作技術似乎還不嫻熟，

日本的技術呀，更勝一籌。

日本的天皇叫“明治”，

是來自世界古老王朝的國王。

他們建國人的統治時代，

可以與巴比倫的“貝爾”（Bel）齊名。[[19]](#_19____Shi_Chuan_Zhuo_Mu_Quan_Ji)



日本軍官在沙河戰役后的合照

英國不僅是日本的盟友，而且在很久以前就是反俄派。俄國對1904年10月21日夜晚發生的人員傷亡事件漠不關心，讓英國對俄國的厭惡之情升格為仇恨情緒，甚至使很多人支持立刻向俄國宣戰。10月21日晚，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由三十五艘軍艦組成）經過北海時，在多格淺灘遇上了一組英國的拖網漁船。他們將這些沒有威脅性的漁船誤當成日本驅逐艦。無論怎么想，日本船只也不可能在北海航行，但俄國艦隊向那些船只開火。一艘拖網漁船被擊沉，多艘漁船受損。莫利斯·帕雷奧洛格評論道：“那支艦隊在夜間經過一個所有水手都熟知的淺灘，卻把一組拖網漁船誤認為是埋伏著的敵軍驅逐艦，尤其是這些拖網漁船還懸掛著規定的信號燈，此舉必定讓英國公眾目瞪口呆。”最讓人無法忍受的是，在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后，俄國海軍上將決定繼續前進，并沒有停下來去營救那些不幸的漁民。[[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

英國公眾一致要求俄國政府給予賠償。法國外交部長對帕雷奧洛格說：“即使立刻爆發戰爭，我也不會感到驚訝。”不過，他認為，俄國那邊大概也是如此，因為俄國視英國為宿敵，一個比日本更讓人恨之入骨的敵人。這一事件最終在法國的幫助下得以解決，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繼續朝著對馬島駛去，在那里它們將與日本艦隊進行一場殊死決戰。

其他國家的公眾輿論讓羅森男爵倍感失望。他說：“處處都在指責我們，甚至連我們預計最不太可能插手的美國也是如此。在某種程度上，這大概是由于作戰人員的比例明顯不均衡所致。誠然，就算是作為一場單純的比賽，也是弱勢的一方博得持中立態度的觀望者的同情。”[[21]](#_21__Yin_Bu__foot_Shi_Xi_Fang_Sh)

羅森對美國支持日本感到吃驚，大概是因為他認為，日本移民涌入加利福尼亞州的問題應該會使美國傾向于支持俄國。不過，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討厭俄國，例如他在1905年8月的信中寫道：“沒有一個人種，無論黑種人、黃種人還是白種人，能像當前體制下的俄國人那樣不誠實、那樣虛偽、那樣傲慢——簡言之，在方方面面都不值得信賴。”雖然他也偶爾批評日本（不過措辭更加溫和），但總的來說，他是一個親日派。這是因為他討厭俄國政府和它們那“荒謬、可惡的沙皇”[[22]](#_22__Jane_H__Oakley_A_Russo_Japa)；另一個原因是，作為一名熱忱的強身健體的倡導者，他對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中描述的武士傳統留下了深刻印象。《武士道》是他最喜歡的書籍之一。[[23]](#_23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

描寫了日俄戰爭的美國人通常都是親日派。基督教牧師西德尼·古力克（Sidney Gulick）博士寫下《遠東的白禍》（"aid-I51"）一書，譴責德皇威廉的“黃禍論”。古力克論述了日本所有行動的正當性，甚至包括德川時期禁止基督教的行為和幕末的排外行為。他將日本采取鎖國政策的做法歸因于日本發現了“白禍”，并得出結論：“總的來說，在對待外國人的態度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比日本更加讓人尊敬了。”[[24]](#_24__Baron_Roman_Rosen_Forty_Yea)

日本對待俄國戰俘的寬宏大量，使得古力克的論點——日本已經全盤接納了西方的行為準則——得到證實。被從俄國“瓦良格”號帶到松山[[25]](#_25__Tyler_Dennett_Roosevelt_and)的受傷水手被當做“客人”一樣對待。日本向他們提供了寬敞的住處、一名專業外科醫生、一名翻譯、一名藥劑師和十一名護士，還提供了西式風格的床以及毛毯、床單、枕頭和枕套。此外，還為他們烹制了西式菜肴。每隔幾天便在他們的房間插上鮮花。在這些“客人”康復后，還會給予他們更多的自由。古力克猜測到：“我懷疑，在此之前，這些人是否能過上一段這么愉悅的時光。”[[26]](#_26__Luo_Si_Fu_Yue_Du_Le_Jin_Zi)

相比之下，他指出，“在處理位于遠東的利益和權利時，俄國所采用的外交方法以及殘酷虐待日本婦女、偵察兵和受傷士兵的方式，在日本激起了極大的怨恨和憤怒”。在列舉了日本因俄國而遭受的所有不當對待后，他補充道：“以俄國為具體代表的‘白禍’以最糟糕的形式表現出來。它給帶有侵略性的貪婪增加了偽善，用宗教的外衣來遮掩應受譴責的犯罪行為。”他得出結論認為：“白種人必須摒棄其珍視的信念，即認為他們的種族絕對優越，他們生來具有主宰地球的權利，以及所有有色人種都應該為他們的經濟利益服務。只要白種人將這一信念作為一種理想，那么他們將繼續成為威脅地球和平與福祉的禍害。”[[27]](#_27__Sidney_Lewis_Gulick_The_Whi)

英國的前內閣成員詹姆斯·普萊斯（James Price）于1904年10月在華盛頓會見了金子堅太郎，他對金子說：“來到美國以后，我去過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會見了各行各業的人士。他們對貴國所表現出來的極大同情讓我非常驚訝。他們滿懷熱情地支持貴國，這種熱情甚至在我的國家——貴國的盟友英國——都不容易看到。他們反感俄國，這真的讓人感到很意外。”他認為，之所以出現親日反俄的情緒，是因為曾在美國留學的日本人自維新時起就建立起了友好關系。[[28]](#_28__Song_Shan__Ri_Ben_Ai_Yuan_X)

日本政府渴望與外國維持友好關系。他們將畢業于劍橋的末松謙澄（1855—1920）派往英國，將畢業于哈佛的金子堅太郎派往美國。[[29]](#_29__Sidney_Lewis_Gulick_The_Whi)金子不僅卓有成效地與羅斯福總統打交道，還成了羅斯福可以信賴的朋友。1904年3月26日，金子在白宮第一次與羅斯福總統會晤。盡管有三十多人在等候，但是總統一看到金子的名片，就立刻走上前，和金子握手并把他領到辦公室。他告訴金子，他一直都在急切地等待金子的來訪，并詢問金子為什么不早一點兒來。[[30]](#_3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1905年3月20日，就在日本軍隊在奉天戰役中大獲全勝后不久，羅斯福向金子發了一封電報，邀請他到白宮共進午餐。金子受到了總統的接見，總統的臉上因為這場前所未有的勝利而閃耀著喜悅之情。羅斯福即將前往科羅拉多獵熊，將離開六個星期。一般情況下，總統不會透露他的行程，但他告訴金子，如果金子出于某些原因希望和他討論戰爭局勢的話，他將立刻返回華盛頓。[[31]](#_31__Gen_Ju_Jin_Zi_Zi_Ji_De_Xu_S)

想到熊是俄國的象征，金子便對總統說：“俄國艦隊將進入太平洋，不久后，一定會與我國艦隊上演一場大規模的海戰。如果您能獵殺到一頭熊，這將被視為日本艦隊獲勝的預兆。我祝愿您大功告成。”對此羅斯福說：“是的，我也是這樣想的。”在簽訂議和條約后，當金子準備返回日本時，總統向金子贈送了他所獵殺的熊的毛皮和親筆寫的書信，并請他親自呈交給天皇。

雖然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官方關系非常友好，但小說家有島武郎發現歐洲存在著反日情緒。他寫道：“基督教國家和非基督教國家之間存在著沖突，隨著日俄戰爭的爆發，這一事實突然變成了一個重大問題。由于俄國是日本的敵人，俄國對日本懷有敵意是在所難免的。然而，整個歐洲的民眾都嫉妒異民族異宗教的日本，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32]](#_32__Jin_Zi_Jian_Tai_Lang____Ri)

俄國的盟友法國處于最困難的境地。政府中鮮有人想牽扯進這場戰爭。當法國官員得知俄國計劃向日本派出波羅的海艦隊時，他們力勸俄國讓艦隊取道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雖然這條航線的路途最長，但可以避開英國的海外領地——這些領地的居民無疑會把他們觀察到的俄國艦隊的動向告知日本。當然，法國考慮最多的是這條航線還可以避開法國的屬地，這樣一來就免除了為俄國艦隊提供協助的義務。

法國認為，俄國很可能打敗仗。一名曾在滿洲的俄國軍隊中擔任觀察員的法國將軍認為日本將獲勝，并力勸俄國盡快按照有把握贏取的條件進行議和，因為俄國的境況只會變得更加糟糕。11月初，法國駐俄大使從圣彼得堡回到巴黎。他報告說：“遠東的戰爭……在俄國民眾之間變得越來越不受歡迎；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受私利驅動的計劃，是俄國皇宮策劃的一次規模宏大的海盜式遠征。在很多村莊，后備軍人的動身離開都伴隨著騷亂的發生。民眾說得最多的一句牢騷話是：我們的君主發動了一場非正義的戰爭。所以上帝不保佑我們難道很奇怪嗎？”[[33]](#_33__Jin_Zi_Jian_Tai_Lang____Min)

據說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學生們組織了煽動性的集會，在集會上合唱《馬賽曲》。在巴黎的俄國高層官員信誓旦旦地對帕雷奧洛格說道：“俄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繼續戰斗，直到骯臟的日本人乞哀告饒，哪怕這場戰爭將持續兩年以上。”但是，其他俄國人說，在后備軍人動身去前線的時候，沒有一個星期不發生軍營叛亂或騷亂事件。[[34]](#_34__Shi_Wan_Jing_Zi_Bian____You)

俄國海軍上將為他的艦隊選擇的航線是沿著非洲西海岸行駛，繞過了好望角，抵達亞洲。他希望艦隊能在法國的殖民地那里獲得幫助。然而，法國并不希望他們的合作被日本人知道，于是，力勸俄國海軍上將在荒涼的地方靠岸，但這位上將堅持在主要港口停泊。在繞道好望角后，俄國艦隊請求允許他們在馬達加斯加停靠更長時間。德爾卡塞拒絕了這一請求，他擔心日本會打擊報復，但這沒能阻止俄國在那里停留。

1905年1月2日，旅順——這個“象征著俄國在中國海域的雄心，位于遼東半島盡頭的遠東直布羅陀、第一要塞”——落入日本人手中。成功逃離旅順的一艘俄國驅逐艦把安納托利·米哈伊洛維奇·斯特塞爾（Anatoly Mikhaylovich Stessel）將軍發送的以下電報呈交給了沙皇尼古拉：

日本占領了我們的防御線。我們堅持不了多長時間，不得不投降。偉大的君主，原諒我們吧，我們已經盡了一切努力。在定我們罪的時候，請您發發慈悲。過去十七個月的持續戰斗已經讓我們精疲力竭。四分之三的軍隊不是進了醫院，就是進了墳墓。最后四分之一的軍隊能堅持行進的距離也不過二十九公里，而且無法換班，甚至不能短暫地休息一會兒。所有人雖說是“士兵”，但已如亡靈一般了。

盡管斯特塞爾將軍在要塞還有充足軍需供應的情況下投降，為此遭到了許多俄國人的嚴厲批評，但他收到了陸軍大將山縣有朋極有禮貌的一封書信：“承蒙日本天皇陛下告知，鑒于貴國軍隊的英勇行為，陛下希望你們接受軍人的榮譽。即陛下下令，允許貴國軍官繼續佩劍。”[[35]](#_35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

旅順失陷立即在俄國激起強烈反響。1月19日，有人試圖謀殺沙皇；1月21日，超過十四萬名工人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進行了規模宏大的罷工游行。據說，日本軍隊在滿洲每贏得一場勝利，俄國對戰爭的不滿情緒便隨之高漲一分。帕雷奧洛格聽說，“俄國政府和民眾仍然把他們的最后一絲希望寄托在仍位于馬達加斯加的‘無敵艦隊’上”。但是，對于這支艦隊的美名，駐圣彼得堡的法國海軍武官稱，“第二艦隊的海事和軍事價值比不上普通艦隊。這支艦隊并非一個均質且有凝聚力的有機體，而是一支七拼八湊的隊伍，是一個由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船艦組成的大雜燴……船員的工作效率并不比普通艦隊高。這支隊伍鮮有經驗豐富的軍官；工程技術人員的素質非常低劣；沒有海軍士官，大多數水手都沒有接受過軍事培訓，甚至未曾出過海”。[[36]](#_36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



斯特塞爾投降后，日俄指揮官的合照。第二排右起第二人即斯特塞爾，第三人是乃木希典

這支俄國艦隊在馬達加斯加停留了一個多月，船員接受了對日行動有關的培訓。在此期間，俄國國內的反戰呼聲日益高漲。2月17日，大公、莫斯科總督謝爾蓋（Sergei）[[37]](#_37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被恐怖分子投放的炸彈炸得血肉橫飛。2月27日，莫斯科的婦女向皇后送交了一份請愿書，表達了她們熱切渴望和平的意愿：“近期發生的騷亂事件似乎是吞噬全俄羅斯的不幸的開始，我們覺得十分恐怖。除非沙皇和民眾站在一起，采取措施制止這場災難，否則，將會招致悲慘的大事。”[[38]](#_38__Ci_Chu_De_Xie_Er_Gai_Zhi_Xi)

法國外交部長希望能夠動搖沙皇將戰斗進行到底的決心。他給沙皇寫了一封信，信上說，“每一天，戰爭都讓貴國政府按照可以接受的條件爭取和平變得愈發困難。”[[39]](#_39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

3月17日，俄國艦隊最終離開了馬達加斯加，朝東北方向的蘇門答臘西端駛去。這大概是一條最糟糕的航線，因為艦隊完全暴露在位于馬來西亞的英國人的眼皮底下，日本由此能夠隨時跟蹤俄國艦隊的路線。但是，俄國仍然對其波羅的海艦隊抱有讓人難以置信的信心。沒有人懷疑他們將贏得一場重大的海戰勝利，從日本手中奪回制海權，之后俄國將好好報復日本。[[40]](#_40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

4月14日，俄國艦隊在西貢以北約三百二十公里的法屬印度支那的安南海岸拋錨。法國所希望的只是讓俄國離開，但他們幾乎沒有辦法勸說俄國駛離該地，這支艦隊的長期停留在日本引發了一場反法熱潮。就在這個時候，在這場戰爭中扮演了壞角色，時而鼓勵俄國拯救基督教徒、時而煽動日本的德國突然對法國說，如果沒有其他辦法可以維護德國在摩洛哥的權利和利益，他們將毫不猶豫地發動一場戰爭。法國參謀長驚呼：“德國發動突然襲擊的話，我們根本無法抵抗！這將比1870年[[41]](#_41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的情況還要糟糕！我們會敗得飛快，敗得徹底！想一想就知道了——首先，俄國沒有多余的精力來援助我們！我們拿什么來抵抗擁有一百五十萬名士兵的德國軍隊？我們最多只有九十萬名士兵——其中有十萬、或許二十萬拒絕上戰場。”[[42]](#_42__Zhi_1870__1871Nian_Fa_Sheng)現在，法國明顯沒有能力來幫助它的俄國盟友。

1905年5月26日，俄國艦隊駛進了日本海域。日本艦隊在海軍大將東鄉的指揮下封鎖了道路。在歷史上具有決定性的海戰中，東鄉的艦隊徹底擊潰了俄軍。5月29日，法國得知“第二太平洋艦隊”已經不復存在。帕雷奧洛格預測，對馬海戰將標志著俄國在亞洲統治的結束。

6月16日，帕雷奧洛格報告說：“近期又發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情，似乎昭示著國際政治局勢將發生重大發展變化。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插手歐洲事務。在此之前，美國曾將避開這個古老大陸上的問題（即歐洲的各種糾葛）視為國家信條。”[[43]](#_43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_1)如今，根據德皇的請求，羅斯福總統正在考慮如何調解法國與德國因摩洛哥問題發生的重大爭執。

6月20日，帕雷奧洛格寫道：“作為兩國公認的確鑿無疑的調解人，羅斯福總統剛對俄國和日本說，他將進行調解以結束戰爭。”[[44]](#_44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與此同時，在俄國，一場革命風暴[[45]](#_45__Maurice_Paleologue_Three_Cr)從波羅的海沿岸蔓延至伏爾加平原。“鎮壓常常是不可行的，”帕雷奧洛格指出，“因為軍隊拒絕介入。”

俄國海軍于對馬島遭到慘敗后，謝爾蓋·維特伯爵在回憶錄中寫道，每一個人，甚至是沙皇，都意識到必須進行議和談判。盡管日本人在旅順和奉天的陸戰以及對馬島的海戰中贏得了令人矚目的勝利，但他們也被戰爭的人力和財力消耗折磨得疲憊不堪。在得知羅斯福總統提議對日俄兩國的議和談判進行調解后，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作出了積極回應。他建議沙皇委派維特作為議和談判的首席全權代表，但沙皇沒有答復。毫無疑問，這是因為他不愿意承認維特對主戰派的種種后果所做出的預言都變成了現實。[[46]](#_46__Zhi_E_Guo_1905Nian_Ge_Ming)

與沙皇不同，明治的名字很少出現在有關戰事或議和談判的記錄中。無疑，在戰爭期間，他像往常一樣履行職責——聽取大臣的奏報，批準接見重要的外國賓客等。然而，在清日戰爭期間，為了更加接近軍隊，明治搬到了廣島，并在那里度過了沉悶的幾個月，直到戰爭勝利；但在日俄戰爭期間，幾乎沒有什么明顯的跡象表明他參與了戰事。不過，侍從日野西資博回憶道，天皇不允許在他的房間提供暖氣設備，除了吃飯和睡覺外，他幾乎整天都坐在辦公桌前。日野西說，天皇最擔心的事情是圍攻旅順。天皇說，“旅順遲早會被攻陷，然而，以這種方式讓士兵獻出生命實在是恐怖。乃木是位好將軍，但其讓士兵喪命的方式，著實讓人不安”。[[47]](#_47__Count_Sergei_Iulevich_Witte)

關于天皇在這段時間的私人生活記載少之又少，不過，來自于英國駐日公使克勞德·麥克唐納（Claude MacDonald）的一封信雖然簡短，但卻讓我們欣然洞悉了天皇的生活：

在為海軍上將諾埃爾（Noël）和我國艦隊軍官準備的午宴中，我坐在天皇的對面。在揮舞著明晃晃的刀叉之余，陛下非常友好地和周圍的每一個人聊天。有棲川宮親王、閑院宮親王端坐在兩側，順從地附和著；但是，伊藤侯爵和井上伯爵（后者坐在我身旁）似乎是以完全平等的姿態在交談，并說著笑話，讓太陽神的直系后裔哈哈大笑。在我以及讓我開懷大笑的人看來，雖然他貴為日本天皇，但其實是有人情味的人。[[48]](#_48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

如果天皇和俄國沙皇一樣堅持自行任命陸軍上將和海軍上將，或者出于一些個人不合的原因而拒絕委任最合適的人作為日本議和談判的代表，那么，即便這有可能給日本帶來危險，但他大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幸運的是，這類事情并沒有發生。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羅森男爵才會在回憶錄中提到天皇時說，“他的名字將被作為迄今所知的、世界上最偉大的君主之一而被載入史冊”。[[49]](#_49__Lai_Zi_Yu_1905Nian_10Yue_24)

1. [[1]](#_1_54) Sidney Lewis Gulick, "aid-IBE", p. 95—96. 伊萊莎·魯哈碼·賽得摩爾（Eliza Ruhamah Scidmore）對古力克關于俄國戰俘所獲待遇的描述進行了證實。伊萊莎是一名身在日本的俄國戰俘的妻子。她寫道，“在這里，政府提供的隱私權和舒適度比任何游客在茶館里所享受到的都要多；普通士兵如同置身于一個他們做夢都沒有想到過的天堂一般，這里提供了充足的資源，干凈整潔，舒適宜人，賦閑無事”（As The Hague Ordains, p. 293）。

1. [[2]](#_2_54) Maurice Paléologue, "aid-ICA", pp. 126, 133。如需了解俄國反對戰爭的精彩描述，請參閱Adrian Jones, East and West Befuddled。

1. [[3]](#_3_54) Baron Roman 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1, p. 29.

1. [[4]](#_4_54) 這兩艘巡洋艦直到1904年2月16日才抵達橫須賀（《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639頁）。

1. [[5]](#_5_54) 《石川啄木全集》第五卷，第37頁。

1. [[6]](#_6_54) Ian Nish,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255-256.

1. [[7]](#_7_54) 日本政府在回應俄國政府的譴責時，聲稱其已將采取獨自行動的意圖告知了俄國：“獨自行動意指所有行動，理所當然包括開始采取敵對行動。即使俄國無法明白，日本也沒有理由為俄國的誤解負責。學習國際法的學生都一致認為，宣戰并非開始采取敵對行動的必要條件，在現代戰爭中，在開戰后再宣戰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因此，按照國際法，日本的行動沒有理由受到譴責”[Kan’ichi Asakawa（朝河貫一）,The Russo-Japanese Conflict , p. 354]。朝河是一名居住在美國的日本學者，他說這些內容翻譯自1904年3月3日的日本報刊上的一篇文章。

1. [[8]](#_8_54) 1904年2月24日的（倫敦）《時報》 登載了俄國政府的一份聲明，“盡管斷絕外交關系絕不意味著開火，但日本政府早在8日晚上以及9日和10日期間，對俄國軍艦和商船采取了一些列令人作嘔的打擊行動，這違反了國際法。日本天皇直到11日才發布了向俄國宣戰的敕令”（Kan’ichi Asakawa,The Russo-Japanese Conflict , p. 351）。

1. [[9]](#_9_54)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 p. 16.

1. [[10]](#_10_54) Baron Roman Rosen,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 1, p. 107.

1. [[11]](#_11_54) E. J. Dillon ,The Eclipse of Russia , p. 288.

1. [[12]](#_12_54) Baron Roman Rosen,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 1, p. 231-232.

1. [[13]](#_13_54) Baron Roman Rosen,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 1, p. 232-233。在羅森回到俄國后，有謠言說他的妻子“從天皇那里收到一套價值不菲的黃金餐具”（p. 246）。沙皇也聽說了這一謠言，但是他寬慰羅森說，他的妻子接受皇后的禮物是完全正確的做法。日本對同一事件的描述揭示羅森已經忘記了從皇后那里收到的一些禮物，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623—624頁。

1. [[14]](#_14_54) Baron Roman Rosen,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 1, p. 235.

1. [[15]](#_15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613頁。

1. [[16]](#_16_53) John Albert White,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146.

1. [[17]](#_17_53) 《石川啄木全集》第五卷，第43頁。

1. [[18]](#_18_52) 如需了解這兩份宣戰書的原文，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618—622頁。

1. [[19]](#_19_52) 《石川啄木全集》第五卷，第42頁。

1. [[20]](#_20_5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616頁。

1. [[21]](#_21_51) 音步（foot）是西方詩歌中的基本韻律單位，在英語詩中是由重音和輕音組成。抑揚格音步指一個輕音和一個重音組成的音步，五步即該詩每行有五個音步——編注

1. [[22]](#_22_50) Jane H. Oakley,A Russo-Japanese War Poem , p. 9. 貝爾（Bel）是巴比倫神話中的主要神之一，是天地之神，漢謨拉比國王將其描述為“黑頭人”，并聲稱貝爾擴展了他的王國。詩中使用這一名稱，是為了表明日本王朝有著悠久的歷史。

1. [[23]](#_23_50)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p. 100.

1. [[24]](#_24_48) Baron Roman Rosen,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 1, p. 235. 當時正在美國學習的有島武郎在晚年時回憶說，當他的同學因每次傳來日本獲勝的消息而大肆贊揚日本時，他很不高興。因為他發現，在這贊揚的背后是一種對小狗戰勝大狗的喜悅。此處出自有島武郎在1919年寫的《リビングストン伝》第四版序言，見石丸晶子編，《有島武郎》，第49—50頁。

1. [[25]](#_25_48) Tyler Dennett,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119, 120.

1. [[26]](#_26_48) 羅斯福閱讀了金子堅太郎推薦的書籍，他將該書復印了30本，送給感興趣的朋友（包括國會議員），這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覺得，這本書讓他對日本人的性格有了新的認識[金子堅太郎，《日露戦役秘録》（東京府教育會編），第119—121頁；另請參閱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58]。

1. [[27]](#_27_47) Sidney Lewis Gulick,The White Peril in the Far East , p. 17—18.

1. [[28]](#_28_44) 松山：日本愛媛縣最大城市。——譯注

1. [[29]](#_29_44) Sidney Lewis Gulick,The White Peril in the Far East , pp. 118, 153, 173-174.

1. [[30]](#_30_4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899頁。

1. [[31]](#_31_40) 根據金子自己的敘述，他非常不愿意去美國，因為他確信美國是親俄派。他對這一看法給出了很多理由，包括在1812年的戰爭期間俄國曾支持美國，以及美國的女富翁頻繁與貧窮的俄國貴族成員通婚。他說，促使美國來同情日本將超越他的能力范圍，但伊藤博文勸說他接受這一任命（《日露戦役秘録》，第11—20頁）。

1. [[32]](#_32_39) 金子堅太郎，《日露戦役秘録》，第57—59頁。部長格里斯康已事先將金子即將進行的訪問告知了羅斯福。

1. [[33]](#_33_38) 金子堅太郎，《明治天皇とルーズヴェルト大統領》，第123頁。

1. [[34]](#_34_38) 石丸晶子編，《有島武郎》，第49頁。

1. [[35]](#_35_35)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p. 112.

1. [[36]](#_36_34)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p. 153.

1. [[37]](#_37_30)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pp. 163, 90。

1. [[38]](#_38_25) 此處的謝爾蓋指謝爾蓋·亞歷山大羅維奇，他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父。1905年2月17日，當謝爾蓋的馬車通過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大門時，一名刺客將一枚炸彈扔進他的懷中。大公當場被炸死。——譯注

1. [[39]](#_39_24)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p. 175。

1. [[40]](#_40_23)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p. 181。

1. [[41]](#_41_23)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p. 200。

1. [[42]](#_42_23) 指1870—1871年發生于普魯士王國同法蘭西第二帝國之間的普法戰爭。戰爭開始后，法軍接連敗北。這次戰爭使普魯士完成德意志統一，取代了法國在歐洲大陸的霸主地位。——譯注

1. [[43]](#_43_20)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p. 207.

1. [[44]](#_44_19)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 pp. 221, 255。1905年的摩洛哥危機是由德國擔心法國對摩洛哥的影響力日益增加而引發。

1. [[45]](#_45_19) Maurice Paléologue,Three Critical Years, p. 258。

1. [[46]](#_46_16) 指俄國1905年革命。這場革命發生于1905至1907年間，范圍廣泛，以反政府為目的，導致尼古拉二世政府于1906年制定等同于憲法的基本法、成立國家杜馬立法議會與施行多黨制。——譯注

1. [[47]](#_47_15)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p.420, 422.

1. [[48]](#_48_15)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49頁。

1. [[49]](#_49_15) 來自于1905年10月24日克勞德·麥克唐納爵士寫給蘭斯多恩勛爵的一封信，轉引自Ian Nish,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9。

# 第五十五章 日俄談判



1905年5月27到28日，第二艦隊在對馬島全軍覆沒，讓俄國舉國上下都“籠罩在陰郁和恐慌的陰影之下”。不久前，德皇還在鼓動沙皇與日本作戰，此刻他卻就日本的大獲全勝向日本駐德公使表示祝賀，還宣稱這場海戰是自1805年（整整一百年前）英國艦隊在特拉法爾加戰勝法國和西班牙的艦隊以來，最宏大的一場戰役。捷報傳來時，金子堅太郎正在紐約，他向羅斯福總統發送電報，稱這場戰爭是“世界歷史上最輝煌的海戰大捷”。[[1]](#_1__Song_Cun_Zheng_Yi____Ri_Lu_Z)羅斯福表示同意。他給金子回電說，“這是全世界目睹過的最偉大的奇跡。甚至特拉法爾加戰役[[2]](#_2__Tyler_Dennett___aid_IPD___p)也無法與之相比。當我第一次獲知這個消息時都不相信。但是，隨著消息接二連三地傳來，我是如此興奮，以至于覺得自己都快成為了一個日本人。我都無法好好辦公了。”[[3]](#_3__Gui_Tai_Lang_Xiang_Xiao_Cun)

這次戰敗迫使沙皇重新考慮是否還要繼續戰斗下去。在高層討論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的“主戰派”逐漸失勢，甚至在沙皇面前表示愿意啟動議和談判，那些希望議和的俄國領導者開始認為羅斯福總統是最合適的調停者。

日本也決定請羅斯福來啟動議和談判。早在1月7日和8日（就在日本攻占旅順后不久），金子已經受邀在白宮與羅斯福對召開議和會議的可能性進行了商討，日本打算在戰爭一結束立刻進行議和談判。羅斯福認為，日本有權占領旅順且將韓國納入勢力范圍，但是，他覺得應將滿洲歸還給清朝，并在西方大國的擔保下讓滿洲保持中立。盡管羅斯福堅定地表明“我們不允許日本的勝利果實再次被搶走”，[[4]](#_4__Jian_Raymond_A__Esthus__Doub)但他強調，日本必須同意在滿洲維持“門戶開放”政策——這才是美國最關注的問題，因為它與通商直接相關。在從日本駐美公使高平小五郎那里得知羅斯福期待并希望日本打勝仗后，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決定向羅斯福公開披露日本關于滿洲、韓國和旅順的打算及希望，結果證明，這些打算和希望或多或少地與羅斯福的相吻合。[[5]](#_5__Ying_Guo_Zhu_E_Da_Shi_De_Bao)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各國（尤其是法國）都試圖要把日本和俄國拉到議和會議上。日本不太相信法國，因為它是俄國的盟友，并且在召開議和會議之前，日本也不愿意就不要求俄國賠償或不讓俄國割讓領土做出承諾。顯而易見，比起法國，他們更希望讓羅斯福來召開議和會議。小村費盡力氣讓羅斯福放心，說日本會完全堅守在滿洲維持“門戶開放”政策以及將滿洲交還給清朝的立場。[[6]](#_6__Ying_Fa_Li_Shi_Shang_Ceng_Du)

在滿洲發生的奉天之戰，是近代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戰役。這場戰役于3月10日結束，日本獲勝，然而，當俄軍往北逃跑時，日軍已經太過疲憊，無法進行有效追擊。日軍贏得了一場重大戰役的勝利，但俄國并沒有就此屈服。甚至在議和會議上，俄國仍堅持認為他們只是打了幾場敗仗，而非輸掉了整個戰爭。確實，較之俄國人，大概日本人更強烈地想要議和。3月8日，當戰火還在奉天燃燒的時候，陸軍大臣寺內正毅（1852—1919）與美國公使勞埃德·格里斯康（Lloyd Griscom）進行了非正式接洽，并請他轉告羅斯福總統，“是時候停戰了”。[[7]](#_7__Wai_Wu_Sheng_Bian_Zhuan____R)

最終，寺內的計劃沒有得到落實，因為小村堅持認為沙皇應邁出走向議和的第一步。但此后，小村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4月25日，格里斯康公使給華盛頓寫信，說外務大臣“希望通過羅斯福啟動議和，衷心期待議和”。

美國的態度是一邊倒地傾向日本。明治似乎已經了解到了這一情況。1月24日，他派人請來格里斯康，就近日貞愛親王在訪美期間受到的熱情接待表示感謝。誠然，對皇室成員在國外訪問期間獲得的款待以及有時候被授予勛章表示感謝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這一次，天皇的言語似乎傳達出了他的真情實感：“思貴國常對我國有深厚好意，不勝歡喜。朕茲祝總統閣下之健康，祈貴國之繁榮，且望將來兩國之交誼愈加親密。”[[8]](#_8__Tyler_Dennett_Roosevelt_and)

日俄戰爭期間，天皇從來都沒想對戰事指揮提供建議，而且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即使在獲悉日本打了勝仗的時候也是如此。副參謀長長岡外史得知攻陷旅順后，第一時間奔向宮中奏稟天皇。天皇剛離開書房，準備去神社參拜，但得知長岡請求覲見后便返回了書房。長岡欣喜若狂，還沒等天皇坐好就奏報說，擔任報告這一喜訊的使者是他這一生最大的榮幸。在這些話脫口而出后，他開始仰望天皇的容顏，匯報戰局詳情。那張臉很鎮定平和，和往常一樣，沒有流露出一絲情感。在長岡描述勝利的十五六分鐘，天皇以幾乎讓人覺察不到的方式點了幾次頭。匯報完畢后，天皇按照之前被打斷了的計劃繼續前往神社。

長岡感到深深的失望。他知道天皇僅在很少的情況下才會流露出自己的情緒——無論是開心還是生氣，但是，他匯報的這一事件是如此不同尋常。他期待著天皇能面露喜色，或者至少能流露出似乎有些釋然的神情。圍攻旅順讓眾多日本士兵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三次全面進攻俄國守軍期間，慘烈的場面駭人聽聞。幾個月以來，舉國上下都在焦灼地等待著今日收到的消息。這場勝利不僅對日后的戰事指揮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也將對日本的國家政策產生巨大影響。然而，天皇的表情竟沒有絲毫變化。無法抑制的激動之情讓長岡覺得窘迫不安，在從天皇眼前離開時，他覺得背上全部汗濕。[[9]](#_9__Tyler_Dennett_Roosevelt_and)

天皇之所以看起來無動于衷，是因為他已經得知了攻占旅順的勝利消息。就在同一天，山縣有朋已經給侍從長打電話，告訴了勝利的消息。然而，侍從長向天皇傳達這一消息時，天皇的第一反應不是欣喜地驚嘆，而是對斯特塞爾將軍堅定不移地忠于其祖國大加贊賞。他命令山縣務必維護斯特塞爾作為一名戰士的尊嚴。山縣向乃木希典傳達了這一命令，乃木希典又將這一命令傳達給他指揮的所有士兵。也許天皇得知了十年前日本從清朝手中奪取旅順時實施的殘忍暴行，擔心歷史會重演。

即使天皇沒有向身邊的人流露出因獲勝而來的喜悅，但他的欣喜情緒可在這首短歌中窺見一斑：

歷添新歲月

忽聞捷報喜欲狂

笑談敵寇中

故壘對決干戈動

敵將力窮降軍從[[10]](#_10__Tyler_Dennett_Roosevelt_and)

在過去，天皇曾寫過軍歌，但他在日俄戰爭期間作的詩歌很少表露出好戰的意味。在1905年1月19日舉行年度第一次詩會之前，御歌所所長高崎正風推薦了兩個主題“萬民祝”和“寄道祝”。天皇都否決了。大概是因為它們跟戰爭太密切相關了。最后，天皇選擇的主題是無傷大雅的“新年山”。明治的詩歌如下：

富士山腳望

朝日爭輝萬物紅

香霧簇霞濃

今又新歲伴晴空

悠寧寄在閑云中[[11]](#_11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

即使日本在旅順口取得了重大勝利，天皇也沒有表現出任何激動之情。這可能反映出他的謹慎態度：在強敵仍保留軍事實力的情況下，進行慶賀是否妥當？在眾多日本士兵為攻占旅順捐軀的情況下，進行慶賀是否適合？

雖然天皇不想表現出輕浮的喜悅，但對日軍在華北的嚴寒中所經受的艱難困苦，他卻毫不猶豫地表現出了關切之情：

東邊之京師

今朝碧空春意濃

料峭和風至

怎及華北狂風哧

茫山雪舞冰封時[[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

當天皇得知日軍在奉天取得重大勝利時，他向滿洲軍頒布詔書：

奉天自客秋以來，乃敵軍設堅固防御工事，備優勢之兵，期必勝爭衡之所也。我滿洲軍克敵機先，驀然進攻，酷寒冰雪中力戰健斗，連十余晝夜，遂擊破頑強死守之敵，虜數萬之將卒，與莫大之損害，驅逐其至鐵嶺方向，博曠古之大捷，發揚帝國之威武于中外。

朕甚嘉爾將卒之堅韌持久，奏絕大之勛功。望益加奮勵。[[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這封詔書表達了天皇對日軍英勇戰斗、奪取奉天的贊賞，但是，如果我們想象一下德皇或沙皇在取得類似勝利后可能發表的言辭夸大的聲明，就不能不驚嘆于明治的克制。我們也想知道，如果日軍打了敗仗，天皇又會如何表達失望之情？

沙皇對俄國戰敗做出了怎樣的反應，我們已經有所了解。在會見公使高平時，羅斯福總統說，盡管很多俄國人承認奉天的重大失利，盡管沙皇的大多數顧問都傾向于議和，但沙皇堅持繼續戰爭。雖然在過去的一年俄國遭受了接連失敗，但這似乎并沒能促使沙皇為了保全士兵的性命而結束戰爭。羅斯福坦言道，他無法理解沙皇是怎樣想的，但他認為沙皇不太可能率先采取議和行動。羅斯福認為，日本通過一些途徑向俄國傳達渴望進行議和談判的意愿，并在可行的情況下說明條件會是一個不錯的主意。[[14]](#_14__Zuo_Zuo_Mu_Xin_Gang_Bian)在日本取得奉天大捷后，沒有人會認為日本是因為軟弱才這樣做的。

不久后，金子堅太郎在華盛頓向東京發了一封電報，說他受羅斯福總統的邀請訪問了白宮。總統說，他是完全站在日本這一邊的，因為日本是為文明而戰。總統最擔心的是，如何才能全力幫助日本勸說俄國進行議和談判。[[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5月27至28日，日本艦隊在一場重大的海戰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促使明治頒布了第一次公開表達其喜悅之情的詔書：

聯合艦隊于朝鮮海峽邀擊敵艦隊，奮戰數日，遂殲滅之，奏空前之偉攻。朕賴汝等之忠烈，可對祖宗之神靈。思前途尚遼遠，汝等愈以奮勵保全戰果。[[16]](#_16__Zuo_Zuo_Mu_Xin_Gang_Bian)

“祖宗之神靈”可能讓人想起沙皇在言談中著重提到的神靈，但明治并不認為日本在戰爭中取勝是因為神道教的神靈站在他這一邊。羅斯福總統表達喜悅之情的方式更加直接：5月30日，在寫給金子的信的開頭，他使用了“萬歲”一詞，之后是三個感嘆號。[[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在俄國艦隊覆滅后，眾人普遍認為進行議和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5月29日，就在勝利后的第二天，羅斯福和公使高平就與俄國進行議和談判的可能性進行了討論。5月31日，外務大臣小村給高平發了一封電報，指示他請求羅斯福協助安排談判事宜。第二天，高平向羅斯福正式呈遞了小村的電報，并請求羅斯福“直接以總統自己的意愿邀請兩個交戰方走到一起，進行直接談判。”[[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1)

羅斯福完全愿意擔此大任，但他告誡高平說，如果日本要求賠款，俄國不太可能會對議和建議做出答復。他還提醒高平說，即使日本的陸軍和海軍處處告捷，但并沒有深入到俄國的領土。如果日本希望像在普法戰爭后的德國那樣獲得賠款，日軍就要包圍莫斯科，否則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羅斯福與俄國的交談更加直言不諱。他召見了俄國大使阿圖羅·卡西尼（Arturo Cassini），并說道，對俄國來說這是一場完全無望的戰爭。[[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卡西尼擔心日本可能會提出無情的要求，但他承諾將把總統的議和建議傳達至圣彼得堡。在這個重要時刻，讓羅斯福感到意外的是，德皇支持他的建議。從德皇6月3日給其表弟沙皇的一封信中，我們可以得知德皇的想法：

從純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朝鮮海峽的失利，使你希望在緊要關頭扭轉局勢的決定性機會化為了泡影：現在，日本可以自由地將任意數量的后備軍、新兵、彈藥等運到滿洲，以圍攻海參崴。若無艦隊支持，恐怕貴國軍隊無法支撐太久……當然，即使在不利的情況下，貴國也可能繼續進行不知何時結束的消耗戰。然而，人員因素卻無法忽視。貴國已經派遣成千上萬名士兵奔赴前線，他們或者戰死疆場，或者受傷作為殘疾人度過余生……這難道不和作為一國君主的責任相矛盾嗎？難道一定要為了一己之私，違背全俄羅斯的意愿，將無數子民送上被殺戮的絕路嗎？[[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

為使俄國走上議和的道路，德皇做了他能做的事情，但他在信的結尾補充說：

也許，我要把你的注意力轉移到這樣一個事實上來：在所有國家中，日本無疑最尊重美國。因為這個有著強大艦隊、正在崛起的強盛國家是站在日本這一邊的。如果說這個世界上能有什么人可以對日本產生影響力、能讓日本覺得建議是合理的話，那么這個人就是羅斯福總統。[[21]](#_21__Jin_Zi_Jian_Tai_Lang____Ri)

從德皇與美國大使的交談中可以得知德皇態度發生轉變的原因。美國大使向華盛頓匯報了這次談話：“他認為繼續戰爭對俄國來說是無望的。俄國民眾都表示強烈反對，他們快忍受不住了，除非議和，否則他們將會刺殺沙皇。”[[22]](#_22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之前并非和事老的德皇說出的這番出人意料的話語讓羅斯福感到很高興。無論德皇的話語充滿了怎樣威脅恫嚇的意味，但毫無疑問，他擔心俄國民眾會發動起義、反抗沙皇，而這將會給所有君主帶來危險。[[23]](#_23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

德皇的信大概對沙皇產生了影響。6月6日，大使卡西尼遞交了沙皇寫給羅斯福的信。盡管信中表明俄國不想議和或進行調解，但就在同一天，在與高層貴族和軍官進行商議時，沙皇最終同意進行議和談判。第二天，他告訴美國大使，說他同意羅斯福提出的俄國和日本在無調解者的情況下進行會晤的建議，“以探明雙方是否能握手言和”。[[24]](#_24__Isaac_Don_Levine_Letters_fr)

6月8日，羅斯福總統給美國駐東京大使和駐圣彼得堡大使發送了相同的信函，要求他們分別向兩國政府傳達其意愿，“如果兩國認為在為停戰談判安排會晤的時間和地點方面，他的效勞是有所助益的話，那么他將竭盡所能”。6月10日，日本外務省答復說日本愿意“委派全權代表，在兩個交戰國相互約定的、便于兩國直接和單獨地進行談判以及締結議和條款的時間和地點與俄國全權代表進行會晤。”[[25]](#_25__Isaac_Don_Levine_Letters_fr)

俄國在給美國大使的答復中說道：“關于俄國和日本全權代表的最終會晤，是‘為了探明兩國是否有可能達成議和條款’，如果日本政府表達了同樣的意愿，那么帝國政府原則上對會晤也無異議。”[[26]](#_26__Tyler_Dennett_Roosevelt_and)但是，法語原文或俄語譯文中原本沒有“同樣的”這一詞語。少了這一詞語，俄國的答復就意味著，如果日本首先表達了希望會晤的意愿，那么俄國愿意參與。為了不讓俄國在照會中表現出來的傲慢態度惹怒日本，美國故意淡化了這一表述的語氣。[[27]](#_27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

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的傲慢（盡管他支持維特伯爵，也支持議和）繼續考驗著羅斯福總統的耐心。6月16日，羅斯福被俄國激怒了。他給參議員亨利·加博·洛吉（Henry Cabot Lodge）寫信說道：“俄國如此腐朽墮落、如此奸詐陰險、如此善變不定、如此不夠資格，我完全搞不清楚他們是否會進行議和，是否會隨時中斷談判。”[[28]](#_28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羅斯福多次表達類似這樣的情緒。即使羅斯福從未公開表達，但俄國人一定覺察到了他對俄國政府的敵意。難以理解的是，為什么俄國人愿意參加一個由具有明顯反俄傾向的總統召集的議和談判。[[29]](#_29__Tyler_Dennett_Roosevelt_and)

第一個要討論的問題是談判地點。剛開始，羅斯福提議在荷蘭海牙進行。日本反對，提出在芝罘（位于山東半島北部海岸的一個港口，與旅順隔著一個渤海灣）舉行。日本將華盛頓列為第二選項。俄國的首選地點是巴黎，不過華盛頓也是他們的第二選項。因此，羅斯福便將地點定在了華盛頓。就在羅斯福把這一決定告訴俄國大使時，拉姆斯多夫發了一封電報，說他更愿意在海牙舉行，因為華盛頓路途遙遠、夏季炎熱。但是，小村不僅拒絕將地點選在海牙，還聲稱日本不會去歐洲的任何地方。[[30]](#_30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羅斯福拒絕重新討論這一問題。拉姆斯多夫向沙皇發了一份簡信，征詢他的意見。幸運的是，沙皇在回信中寫道，“我沒有理由反對將華盛頓作為我們與日本的全權代表進行初步談判的會晤地點” 。[[31]](#_31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這封信結束了對地點的討論，但“初步談判”這個詞表明沙皇并不期待能在議和談判中做出重要決定。

下一個問題便是討論談判時間。日本代表團至少需要一個月才能抵達美國的東海岸。這意味著談判將在夏季進行。為了使代表們避開華盛頓夏季難以忍受的高溫，羅斯福提出了另一個更加涼爽的城市，于是，最后的地點定在了位于新罕布什爾州樸次茅斯市的海軍碼頭。日本和俄國都接受將樸次茅斯作為談判地點。

羅斯福提議在8月的前十天開始談判，以便日本有充足的時間抵達樸次茅斯。盡管沙皇起初不愿接受議和談判，但現在他希望談判盡快開始，因為他擔心日本可能會利用拖延時間的方式來奪取庫頁島。[[32]](#_32__Dui_Yu_Sha_Huang_He_E_Guo_Z)俄國產生這樣的擔憂也是有原因的，據金子說，羅斯福曾建議日本立刻入侵庫頁島，以便增加在談判桌上贏得勝算的幾率。[[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1)

選擇全權代表對于雙方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事。顯而易見，伊藤博文是日本代表團團長的合適人選，但眾所周知，在戰爭爆發之前他主張與俄國和解。他的朋友警告他說，如果日本代表團未能達成日本民眾所要求的議和條款，他將會因為同情俄國而遭到指責。幸運的是，天皇告知總理大臣桂太郎，說在議和談判期間需要伊藤留在東京商議談判事宜。伊藤躲過了需要為是否擔此重任做出選擇這一令人頭疼的問題。[[34]](#_34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

沙皇的干預使得俄國全權代表的選任工作變得更加復雜。盡管拉姆斯多夫令人信服地辯稱，采用財務和經濟方面的專家至關重要，但尼古拉仍反對選用維特——這個顯然再合適不過的人選。6月25日，罷工工人和政府軍隊在敖德薩發生沖突，兩天后“波將金”號（"aid-IKD"）戰艦上發生了叛變，俄國的局勢急轉直下。“波將金”號叛變[[35]](#_35__Mei_Guo_Da_Shi_Qiao_Zhi__Fe)是俄國局面動蕩不安的征兆。這次叛變得到了日本間諜的支持，他們向沙皇政府的反對者（包括列寧）提供資金，叛變活動在芬蘭和波蘭——俄羅斯帝國中渴望獨立的兩個地區——尤其猛烈。[[36]](#_36__Jin_Zi_Jian_Tai_Lang____Ri)

8月10日，日本和俄國的代表團開始談判。第二天，日本提交了一份列明了十二個要求的正式清單，包括要求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享有至高無上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俄軍撤出滿洲；俄國將租借的旅順出讓給日本；割庫頁島給日本；向日本支付戰費以及只能將連接滿洲和海參崴的鐵路用于工商業目的。[[37]](#_37__Zao_Zai_Zhan_Zheng_Kai_Shi)

俄國對日本的要求感到吃驚。維特對同行人員說，“日本的條件比我們預料的要嚴苛得多” 。但事實上，只有兩個要求給接下來的談判造成了麻煩：割讓庫頁島和支付賠款。沙皇一再強調俄國不會支付一個盧布用作戰爭賠款，也不會割讓俄國的一寸土地。他之所以拒絕這兩個條件，是出于榮譽方面的考慮，而非實際政策需要。在俄國談判注意事項的初稿中沙皇寫道：“俄國絕不會支付賠款。我絕不答應。”他在詞語“絕不”的下面劃了三條線。[[38]](#_38__Zhi_1905Nian_Fa_Sheng_Yu__B)

沙皇也反對割讓庫頁島。俄國從1875年才開始占有庫頁島。當時，俄國與日本簽訂了一份條約[[39]](#_39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用千島群島換取庫頁島的主權。曾在1890年參觀了這塊政治犯流放地的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發布了一篇報告，讓俄國人都知道了庫頁島的荒涼。為了不放棄這個荒島的一寸土地，沙皇——這個已經將觸角伸到了歐洲和亞洲的大國統治者——正準備延長一場災難性的戰爭。

小村壽太郎似乎也受到了榮譽觀的影響。4月，在召開內閣會議確定具體的議和條件（天皇對這些條件表示贊成）時，日本僅將三個要求列為“絕對必要條件”：（1）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的行動完全自由；（2）雙方在規定期限內從滿洲撤軍；（3）俄國將租借的旅順以及旅順到哈爾濱的鐵路出讓給日本。[[40]](#_40__Raymond_A__Esthus__Double_E)日本還將四個要求列為“盡可能達到但非絕對必要條件”，其中包括賠款和割讓庫頁島。如果在達成三個“絕對必要條件”后小村就已經心滿意足的話，那么談判本來可以順順利利地進行下去，然而，小村堅持要求獲得賠款，并且未告知日本政府沙皇愿意就庫頁島做出讓步（沙皇愿意讓俄國和日本分割這一島嶼），這幾乎導致談判破裂、重新訴諸戰爭。[[41]](#_41__Ji___Ku_Ye_Dao_Qian_Dao_Qun)8月26日，小村給東京發了一封電報，宣布他打算中止談判。[[42]](#_42__Shumpei_Okamoto_The_Japanes)

8月28日，總理大臣召開了一次會議，內閣成員和三名元老（伊藤博文、山縣和井上馨）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對俄國未能對日本就達成和解所做出的努力給予響應表示遺憾，但一致認為唯一能夠替代繼續談判的做法就是開戰。他們承認，在年底前攻占哈爾濱可能并不困難，但這需要額外的軍隊，且日本缺乏增設師團以及把士兵送上戰場的財政儲備。此外，即便日本最后奪取了哈爾濱和海參崴，仍不能給俄國造成致命一擊。經過幾個小時的討論，他們的結論是必須議和，即使這意味著日本不得不放棄賠款且無法獲得庫頁島。[[43]](#_43__Ai_Si_Se_Si_Xie_Dao___Gen_J)

當天下午，日本召開了三名元老和內閣大臣參加的御前會議。盡管內閣知道俄國拒絕做出讓步，也知道繼續談判存在著巨大困難，但他們決定向小村發電報，說軍事和經濟狀況迫使日本必須進行議和談判，即使會失去賠款和庫頁島。無論如何，日本開戰的基本目標——解決與韓國和滿洲有關的重大問題——已經實現。他們指示小村首先對賠款問題做出讓步，作為俄國接受日本占領庫頁島這一既成事實的交換。如果俄國在庫頁島問題上拒不讓步，那么小村應請羅斯福總統出面，讓總統建議日本為了和平和人道而撤回領土要求。[[44]](#_4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最后這一招顯然是為了保全日本的面子，避免日本因單方面撤回請求感到尷尬。

這些指示似乎承認日本在談判桌上被打敗了，日本代表團的成員感到震驚，他們開始哭泣。8月28日，維特也收到了一封令人沮喪的電報。拉姆斯多夫轉述了沙皇的話：“向維特傳我命令說，不管怎樣都要結束談判。我寧愿繼續戰爭，也不愿等待日本施恩讓步。”[[45]](#_4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8)兩名俄國代表——維特和羅森——對是否要遵守沙皇的命令意見不一。維特決定無視這一命令，再次提出了放棄庫頁島南部這一議和建議。



日俄兩方在樸茨茅次和談

8月29日，在秘密會議上，維特同意割讓庫頁島，小村按照東京的指示接受了這一約定。他們還就從滿洲撤軍和滿洲鐵路的處置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46]](#_46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所有問題都已解決。當維特走出談判室時，他宣布雙方握手言和，日本已經同意了所有事項。[[47]](#_47__Morinosuke_Kajima_The_Diplo)

當天晚些時候，在正式會議上，小村遵照指示要求獲得整個庫頁島,維特拒絕，于是小村便改口說，為了和平與人道，日本將接受俄國提出的以北緯五十度為界分割島嶼的提議。對于旁觀者來說這不過是場演戲，但是，維特建議說應立即采取行動，以便達成停戰協議，避免給士兵造成不必要的傷亡，這場會議由此落下了帷幕。9月5日，小村和維特簽署了議和條約。與此同時，已經達成和解的消息迅速傳播開來。聽到這個條約，沙皇目瞪口呆。他在日記中寫道：“入夜時候，維特發來電報，告知議和談判已經結束了。那之后的一天里，我都精神恍惚。”[[48]](#_48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

俄國人的最初反應幾乎可以說是全面否定，某個俄國俘虜的英國妻子反應最為激烈，沒有人能與之相比：“通過新型外交手段進行的議和！二十世紀的議和！在美國進行的議和！在美國的‘喀瑯施塔得’達成的議和！所有的傳統都被打破了。日本和俄國沒有進行議和——不需要議和。噢，不！那個可惡的美國總統，他煞費苦心，都是他干的好事。是他想要議和，他就想這么干。我覺得他八成是將那些參加會議的人鎖在房間里，讓他們饑餓難耐，最后不得不服從。”[[49]](#_49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

沒有親眼目睹戰爭的大多數俄國人都認為，當俄國軍隊在滿洲尚且具備比以往更好的戰斗力來抗擊日本時，進行議和是荒謬的。美國駐俄國大使喬治·梅耶（George Meyer）在日記中寫道，盡管羅斯福因在議和談判中所扮演的角色贏得了全世界的感激，但他不要指望能從俄國那里獲得感恩，因為俄國人認為要是沒有他的干預，俄國本來可以贏得這場戰爭。[[50]](#_50__Eliza_Ruhamah_Scidmore_As_T)不過，一名在戰爭期間曾在總參謀部擔任高級職務的俄國官員說道，這兩支軍隊都很強大，都花了大力氣，無論哪一方發動攻擊，都必定會釀成災難，造成慘重損失。

俄國代表團毫不懷疑地認為他們創造了一個奇跡。他們已經設法避免支付賠款，做出的領土讓步也只是割讓日本曾經占領的那個荒涼小島的一半。因此，他們會在簽約后的慶宴上喝香檳酒慶祝也就沒什么好奇怪的了。

日本沒有參加慶宴。小村和同行人員奉命不得不簽署了一份完全違背他們意愿的條約。他們能很容易地想象出來，在回到日本后將受到狂風暴雨般的接待。

最開心的人大概是羅斯福總統。法國、德國，甚至是英國（即使一些英國人最初對盟友日本做出如此多的讓步感到驚訝）都對羅斯福大加贊賞。就在這個時候，日本和英國又續簽了為期五年的英日同盟。在一份公開聲明中，英國聲稱，日本因續簽同盟而獲得的保障將會減輕他們在議和條約中的失利。無論對羅斯福進行了怎樣的批評，這些批評都快速地消退了，羅斯福收到了明治和尼古拉發來的感謝電報。就在議和條約簽訂之前，他給美國駐北京公使寫信說：“我之前是親日派，但在與議和談判的專員打交道后，我比以往更加親俄了。”[[51]](#_51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1906年，他因致力于結束戰爭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當議和條約的條款在日本的媒體上公布時，社會一片嘩然。民眾計劃于9月5日在日比谷公園召開群眾集會，抵制條約和彈劾內閣大臣，但是，警察不允許示威者進入公園。約三萬人的示威者沖破了設置在公園門口的路障，數量不多的警察無法控制這些示威者。于是，政府調來了軍隊，以保護皇宮、各個部門和外國公使館。

公園里沖突的嘈雜聲在皇宮里也能聽到，天皇無法平靜地坐在椅子上，他來回踱著步，探聽著這場騷亂的動靜。突然傳來一聲槍聲，是軍警在開槍恐嚇示威者。向來鎮靜冷漠的天皇也因宮外的嘈雜聲變得格外激動。[[52]](#_52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不久，總理大臣桂太郎趕到宮中匯報情況，當晚，天皇不停地派遣侍從打探事情的最新進展。

示威持續了兩天多。第二天，示威者縱火焚燒了街上的十多輛汽車，燒毀了許多警察崗亭。直到11月29日，天皇才解除了對東京及周邊地區頒布的戒嚴令。其他城市也發生了小規模的抗議集會。騷亂發生的第三天，一場暴雨阻礙了示威者的活動，使局面得以恢復正常。

國外對日本反對議和條約的示威游行進行了大肆報道，有些報道將此描述成日本民眾發泄仇外情緒或反基督教情緒。不過，身在東京的外國觀察家迅速予以否認。羅斯福總統認為，讓民眾期待俄國將會支付一大筆賠款的日本政府理應受到譴責。[[53]](#_5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可以肯定的是，和平是眾望所歸的，羅斯福也因為在實現和平方面發揮了作用而感到驕傲。他在寫給公使高平的信中說：“你們日本人已經將宏大的戰爭轉變成偉大的和平。”[[54]](#_54__Raymond_A__Esthus_Double_Ea)

1. [[1]](#_1_55) 松村正義，《日露戦爭と金子堅太郎》，第234—241頁；黑羽茂，《日露戦爭史論——戦爭外交の研究》，第287—311頁。陸軍大佐明石元二郎以日本駐斯德哥爾摩公使館為據點，操縱了一個間諜網絡，掌握了有關俄國局勢的情報。受芬蘭愛國人士柯尼·希力亞客士（Konni Zilliacus）的鼓動，他會見了俄國的各類革命分子（包括列寧），并給予了慷慨資助。談到明石的活動，希力亞客士說，“在獲得資助的人中，有一半不知道錢是從哪里來的，另一半則不關心”（Noel F. Busch, Emperor’s Sword, p. 122）。 在日俄戰爭結束后不久，俄羅斯帝國警察局公布的一個叫做《落花流水》的小冊子描述了明石的秘密活動。他和俄國革命分子合作，幫助這些革命分子在1905年和1917年的反政府活動中取得了成功。1988年，赫爾辛基公布了《落花流水》的部分英文譯文。關于日本戰時的情報活動，見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38-142。狄隆寫道，“罷工、示威、地下煽動活動、分發革命傳單以及在芬蘭和俄國之間秘密偷渡武器，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日本的情報活動進行了證實”（E. J. Dillon, The Eclipse of Russia, p. 184）。 金子堅太郎在晚年回憶說，著名的歷史學家和作家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他將亨利·亞當斯描述成國務卿約翰·哈依的智囊——曾向他提議說，日本應向芬蘭和瑞典派遣間諜，以便煽動那里的民眾，并制造混亂。1905年1月15日，金子和亞當斯在華盛頓會面（金子堅太郎，《日露戦役秘録》，第70—76頁；Noel F. Busch, Emperor’"aid-IR3", p. 122； Elizabeth Stevenson, Henry Adams, pp. 315-316）。

1. [[2]](#_2_55) Tyler Dennett, "aid-IPD", p. 220. 在6月4日的信中，德皇給大使陶埃爾寫信說，“考慮到會對我們所有人構成嚴重威脅，對于這種在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可能會發生在沙皇身上的重大威脅，我已經給他寫信，勸說他啟動議和談判”。他告訴陶埃爾說，“除非進行議和，否則他們將刺殺沙皇”。另請參閱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41。

1. [[3]](#_3_55) 桂太郎向小村發送的英文全文，請參閱Morinosuke Kajima, "aid-IS0", 1894-1922, 2, pp. 349-350.

1. [[4]](#_4_55) 見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1905年9月8日西奧多·羅斯福寫給高平小五郎的信。

1. [[5]](#_5_55) 英國駐俄大使的報告，見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38。

1. [[6]](#_6_55) 英法歷史上曾多次為爭奪歐洲霸主地位而爆發戰爭，特拉法爾加海戰便是其中之一，被稱為“帆船時代規模最大的海戰”。1805年10月21日，雙方艦隊在西班牙特拉法爾加角外海面相遇，戰斗持續五個小時，由于英軍指揮、戰術及訓練皆勝一籌，法蘭西聯合艦隊遭受決定性的打擊，主帥被抓，21艘戰艦被俘。此役之后法國海軍精喪盡，從此一蹶不振，拿破侖被迫放棄進攻英國本土的計劃，而英國海上霸主的地位得以鞏固。——譯注

1. [[7]](#_7_55) 外務省編撰，《日本外交文書：日露戦爭五》，第231—232頁；轉引自Shumpei Okamoto,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119。

1. [[8]](#_8_55) Tyler Dennett,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173. 羅斯福指的是清日戰爭后的三國干涉，這次干涉使日本喪失了遼東半島。

1. [[9]](#_9_55) Tyler Dennett,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23-27.

1. [[10]](#_10_55) Tyler Dennett,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180。這封報文詳述于小村在4月25日向高平發送的電報。

1. [[11]](#_11_55)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 p. 25.

1. [[12]](#_12_55)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3頁。

1. [[13]](#_13_55)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4頁。

1. [[14]](#_14_55) 佐佐木信綱編，《明治天皇御集謹解》，第244頁。《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5頁上，詩的最后一句是“つたへきにけり”。

1. [[15]](#_15_54)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0頁。

1. [[16]](#_16_54) 佐佐木信綱編，《明治天皇御集謹解》，第254頁。“ひむがしの都（東邊之京師）”是以詩意的方式借指東京。

1. [[17]](#_17_54)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83—84頁。也向鴨綠江軍隊發布了類似（但更短的）詔書。

1. [[18]](#_18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93頁。

1. [[19]](#_19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01頁。

1. [[20]](#_20_52)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56頁。

1. [[21]](#_21_52) 金子堅太郎，《日露戦役秘録》，第217頁。

1. [[22]](#_22_51)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 p. 39.原文見《日本外交文書：日露戦爭 五》，第233—234頁、第252—254頁。

1. [[23]](#_23_51)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 p. 40.

1. [[24]](#_24_49) Isaac Don Levine,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 p. 172.

1. [[25]](#_25_49) Isaac Don Levine,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 p. 175。

1. [[26]](#_26_49) Tyler Dennett,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219. 美國駐德國大使查理曼·陶埃爾（Charlemagne Tower）在6月9日的信中向總統匯報了此事。

1. [[27]](#_27_48)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p. 43, 45.

1. [[28]](#_28_45)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 pp. 224-225, 225-226. 日語原文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73頁。

1. [[29]](#_29_45) Tyler Dennett,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226.

1. [[30]](#_30_43)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48.

1. [[31]](#_31_41)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47。

1. [[32]](#_32_40) 對于沙皇和俄國政府懷疑他是親日派，羅斯福已經察覺到了這種危險（《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03頁）。

1. [[33]](#_33_39)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76頁、第177頁。

1. [[34]](#_34_39)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51.

1. [[35]](#_35_36) 美國大使喬治·馮·倫克爾·梅耶（George von Lengerke Meyer）前去謁見沙皇，勸說他同意進行直接談判，沙皇最終妥協，之后突然坦白說，“你選在一個最適當的時機前來；到目前為止日本還沒有踏足俄國的土地；但是，我意識到他們很快便會襲擊庫頁島。因此，在襲擊發生之前進行會晤是至關重要的”（Tyler Dennett,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 p. 194）。3月31日，天皇下令調集日本第十三步兵師，以便攻占庫頁島（《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06頁）。

1. [[36]](#_36_35) 金子堅太郎，《日露戦役秘録》，第225頁。金子寫道，6月8日，羅斯福敦促他給日本政府發送電報，建議日本在談判開始前占領庫頁島，甚至還詳細說明了日本為此需要的士兵和炮艇數量。羅斯福認為，除非日本占領俄國的領土，否則，日本在談判桌上將處于不利地位。就在羅斯福提出建議后的整整一個月，日本向庫頁島派了兩艘炮艇和一支混合旅。金子說，他無法確定日本采取此次行動是否因為受到了羅斯福建議的激發。亦見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46。

1. [[37]](#_37_31) 早在戰爭開始時，天皇就很信賴伊藤。當伊藤決定派遣金子赴美時，天皇坦言，這總比伊藤親自前去要好，但這一次，天皇明確表明他需要伊藤的建議，不會讓伊藤去國外（金子堅太郎，《日露戦役秘録》，第16頁）。

1. [[38]](#_38_26) 指1905年發生于“波將金”號戰艦上的一次嘩變，該艦原是帝俄海軍的驕傲，但一連數月伙食太差，肉都長滿了蛆，水兵因抱怨伙食而遭軍官擊斃，由此引發叛變。軍艦開到奧德薩階梯（The Odessa Steps）接受人民的食物補給，但步兵趕到鎮壓，進行了大屠殺。——譯注

1. [[39]](#_39_25)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84, 61.

1. [[40]](#_40_24)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p. 82-83. 6月4日向日本大使發送的初始要求的原文詳列于《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98頁。這些要求與在樸次茅斯提出的稍有不同。例如，按照羅斯福總統的建議，從要求清單上刪掉了解除海參崴的軍事管制這一要求。

1. [[41]](#_41_24) 即《庫頁島千島群島交換條約》。——譯注

1. [[42]](#_42_24) Shumpei Okamoto,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117.

1. [[43]](#_43_21) 埃斯瑟斯寫道，“根據可以查閱的記錄，無法最終確定在庫頁島問題上小村是不是故意誤導日本政府”（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 p. 151）。直到媒體上報道沙皇的決定時，小村才將俄國分割庫頁島的提議告知日本政府。羅斯福總統給德皇寫信，提議對賠款問題做出具有約束力的公斷，但無法聯系到小村對此進行確認。埃斯瑟斯認為，小村是故意不做出答復的（p. 153）。

1. [[44]](#_44_20)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281—284頁。

1. [[45]](#_45_20)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286—287頁。

1. [[46]](#_46_17)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158.

1. [[47]](#_47_16) Morinosuke Kajima,The Diplomacy of Japan, 1894-1922, 2, pp. 351.

1. [[48]](#_48_16)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159.

1. [[49]](#_49_16)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164。

1. [[50]](#_50_15) Eliza Ruhamah Scidmore,As The Hague Ordains , p. 346. 提到喀瑯施塔得，只是為了說明這個俄國海軍港口類似于樸次茅斯。此處使用“他煞費苦心”，是諷刺羅斯福喜歡吃力不討好。

1. [[51]](#_51_12)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165.

1. [[52]](#_52_9)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p. 171, 173。

1. [[53]](#_53_9)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14—315頁。

1. [[54]](#_54_9) Raymond A. Esthus,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188. 他引述了羅斯福于9月6日寫的一封信。

# 第五十六章 高宗抵抗



第一次英日同盟簽訂于1902年，有效期五年。但在1905年條約仍然有效時，英日雙方對條約進行了修改和續訂。日俄戰爭期間，英國以各種方式幫助日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出售武器彈藥。沒有這些，日本就無法持續作戰。[[1]](#_1__Jin_Ying_Long____Wai_Jiao_We)當英國發現俄國軍艦時，他們便通知日本；在阻止俄國黑海艦隊（這支艦隊本可以增強派去與日作戰的海軍部隊的力量）的軍艦通過達達尼爾海峽時，英國也幫了很大的忙。[[2]](#_2__Jing_Kou_He_Qi____Ri_Lu_Zhan)不過在戰爭期間，英國宣布其政策為嚴守中立，不會向日本提供官方援助。[[3]](#_3__Ian_H__Nish_The_Anglo_Japane)

盡管如此，日本還是充分意識到了結盟的重要性。1904年12月，英國駐東京公使克勞德·麥克唐納爵士匯報說，在與總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交談時，二人均談到“如果打贏這場戰爭，日本將謀求與英國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盟”。[[4]](#_4__Nai_Si_Xie_Dao___Ying_Guo_Ge)英國也渴望續訂盟約，這在向總理大臣提出的各類建議中不難看出來：為加強兩國之間的關系，英國將向天皇頒發最高榮譽勛章——嘉德勛章；駐日公使將被提升為駐日大使[[5]](#_5__Lai_Zi_Yu_Ke_Lao_De__Mai_Ke)；英國提議續簽為期五年的盟約。

1905年2月12日，在日本外務大臣為慶祝英日同盟成立三周年而舉辦的晚宴上，小村不僅按照慣常做法提議為國王愛德華七世的健康干杯，還表達了希望鞏固和加強同盟的意愿。英國不確定小村講話的可信度有幾分，但3月29日，國會的保守黨人克勞德·勞瑟（Claude Lowther）力勸政府以更加堅定的態度續訂盟約，認為這是“以精簡、有效的方式確保大英帝國安全的唯一可行方法。”

勞瑟對俄國給印度帶來的威脅感到擔憂。俄國不惜巨資修建了鐵路，能夠迅速向印度邊境轉運超過五十萬名士兵的軍隊，這樣一來，保護印度的最經濟劃算的方式就是和日本軍隊攜手合作。他提議說，英國不僅僅要續簽盟約，還應向盟約賦予新的角色：如果一方的亞洲屬地遭到侵襲，雙方應互為援助——英國將派艦隊，日本將派陸軍。這一約定將使英國免于維持一支印度軍隊，進而免于給英國納稅人造成不堪忍受的重擔；此外，這一約定還將為日本節省下打造一支艦隊的費用。[[6]](#_6__Zai_20Shi_Ji_Yi_Qian__Ou_Zho)

難以想象日本政府會答應為保護大英帝國免遭俄國襲擊而向印度北部派遣陸軍，但盡管如此，日本仍非常渴望繼續進行聯盟。對日本來說，聯盟的主要原因似乎是這是防止俄國發動一場復仇之戰的最好辦法；此外，聯盟還將“使俄國和法國近期打著‘黃禍’的旗幟設想成立一個歐洲聯盟來對抗日本的計劃無法實現”。[[7]](#_7__Ian_H__Nish_The_Anglo_Japane)

對于日本人不愿保衛印度的情況，自認為能夠說服日本人的一些英國政府成員提議說，如果俄國對印度北部邊境構成威脅，他們將請求日本派遣十五萬名士兵。他們堅持認為，日本在印度為英國提供援助無非是一個公平的交易，日本借此可以換取英國海軍支持以及默許日本對韓國采取的可能行動。

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的戰役中大獲全勝，極大地提高了談判地位。雙方于1905年8月12日在倫敦簽署了最終條約，有效期為十年，規定雙方在東亞、印度和東印度國家發生爭端時進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條約沒有約定秘密條款，日本也沒有承諾將向印度派遣士兵，不過，條約承認英國在印度邊境享有安全方面的特殊利益。[[8]](#_8__Lai_Zi_Yu_Ri_Ben_Zhu_Ying_Go)盡管簽訂條約的時候日俄還在樸次茅斯進行議和談判，但它對談判造成的影響不大。

就在新條約簽訂后不久，首相亞瑟·詹姆斯·貝爾福（A. J. Balfour）宣布辭職。但在離任前，保守黨政府將英國駐東京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以此表示對日本的尊重。法國、德國、意大利和美國也紛紛效仿，此舉象征性地承認日本已經成為了一流強國。英國尊重日本的第二個舉動是，政府提議向天皇授予嘉德勛章。此前，愛德華七世以不得向非基督教徒的君主頒發嘉德勛章為由，拒絕了類似提議。但在1903年，出于政治原因，盡管國王反對，英國政府仍向波斯國王授予了嘉德勛章。因此，英國政府決定遵循這一先例，堅持向天皇授予勛章。國王別無選擇，只能默許。1906年2月20日，國王任命亞瑟王子擔任授勛代表團的團長。[[9]](#_9__Tiao_Yue_De_Ying_Wen_Wen_Ben)

在這支尊貴的代表團中，有一名成員是在1866年到1870年間擔任英國駐東京公使館翻譯的雷德斯戴爾（Redesdale）勛爵，原名為米特福德（A. B. Mitford）。他在像書一樣厚的報告《赴日嘉德授勛團》（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的開頭幾頁描述了重返日本的愉悅心情：

從來沒有哪一個冬天的旭日能像1906年2月19日那天那樣讓人感到無上榮耀，王冠級大型防護巡洋艦的艦長薩沃里（Savory）載著亞瑟王子和嘉德授勛團前往日本，于黎明時分駛進了橫濱港。也從來沒有哪一天的太陽能像那天那樣照耀著如此美麗的場景。國王的旗幟在主桅上飄揚；沿岸的建筑物和停靠在海灣的船舶都張燈結彩，這些海灣像那不勒斯一樣湛藍；十一艘巨大的軍艦禮炮轟鳴，隆重歡迎我們的到來，日本樂隊演奏著《天佑國王》；遠處是松林覆蓋的箱根山脈，和我記憶中的畫面一樣美麗；不過，最美的當屬無與倫比的富士山，山巔白雪皚皚，在晨光的照耀下閃閃發光，它那神秘的錐形山峰高聳入天，欣慰的是沒有云朵來破壞它那優美的體態；山神“木花之開耶姬”令富士山愈發美麗，仿佛是在向我們送來問候，讓我們感受到了古老的日本為它的朋友和盟友——國王愛德華七世——派出的使團做好了精心準備。[[10]](#_10__Ian_H__Nish_The_Anglo_Japan)

沿著橫濱街道站立的歡迎人群讓雷德斯戴爾感到異常興奮：

街道非常擁擠；現場的每一個人都排列成行——他們以身高劃分，成人站在后面，兒童站在前面，最好的地方按照規定留給了年齡最小的人。每一個兒童都拿著兩面旗幟——一面是日本國旗，一面是英國國旗，他們熱忱地揮舞著；隨后，從這個喧鬧的高低音混合的合唱團中發出“萬歲”的呼喊聲！[[11]](#_11__Redesdale_The_Garter_Missio)

使團成員登上了一列將他們載往新橋站的火車。在新橋車站，日本政府為他們舉行了歡迎儀式：

這場儀式一定讓所有親眼目睹的日本人的內心深處澎湃不已。從最初建國之刻起，像亞瑟王子所受到的這般恭維，之前還從來沒有過。亞瑟王子被皇太子和其他皇室親王團團圍住，天皇親自迎接貴賓的到來。這位威嚴的國民尊崇至極的君王，就算實際上不是神，但至少也遠遠超出了凡俗。他公開歡迎外國王子的到來，在日本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天皇熱情地和王子握手，明確無誤地向其國民傳達這樣一個訊息：“這是我的朋友。”[[12]](#_12__Redesdale_The_Garter_Missio)

與明治天皇曾接見過的所有其他國王、王子或總統一樣，亞瑟王子確信天皇之前從未向任何人表達過這樣的友誼和尊重。雷德斯戴爾也沾沾自喜地說道：“日本天皇在神秘、隱居般的歲月中存在了八個世紀之久。我是在場唯一一個能夠想到過去時代的歐洲人。”[[13]](#_13__Redesdale_The_Garter_Missio)顯而易見，他對天皇印象深刻，四十年后再次見面時：“根據我們能夠獲得的所有信息，他的臉上流露出來的那股力量就是他的最大特征。日本的政治家告訴我們，他把全部的時間都用在了公務上，僅有的片刻休閑時間也用來寫詩消遣。”

嘉德勛章的授予儀式非常莊嚴。[[14]](#_14__Redesdale_The_Garter_Missio)嘉德勛章是授予英國騎士的一種勛章，由國王愛德華三世于14世紀設立。勛章（至少根據傳說）起源于一位宮女。這位宮女的吊帶襪掉在了王宮的地板上，國王拾起吊帶襪，還給了宮女。在場的一些人哄堂大笑，但國王用法語斥責他們說，“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心懷邪念者蒙羞），由此這句話被刻在了勛章上。

亞瑟王子告訴天皇說，這一勛章僅向國王、威爾士親王和二十五名騎士授予過，是英國公認的最高貴的騎士勛章。習慣上，除了英國騎士外，只授予那些與英國國王有著特殊、非凡的友好關系或者建立了聯盟的尊貴君王、國王和親王。

明治并沒有被威懾住。起初，在得知自己將被授予勛章時，他似乎很高興，并愉快地接受了；但之后，他召見了宮內大臣田中光顯，并說道：“朕對接英使厭苦不禁，卿宜以措辯謝絕其來航。”

驚愕的田中說道：“陛下已諾之，至今欲謝絕，然康諾特殿下已由本國出發，且如此則失信于國際上，斷不可行此。今唯待殿下至且受之。”

這些話讓天皇感到一點兒也不高興，但他一言不發，沒有再下達命令。他不愿接見亞瑟王子，大概與王子或英國沒有關系，而是因為天皇厭煩了接待外國賓客。在接見賓客之前，他總是情緒低落，常常責備安排接待事宜的工作人員。但是，一旦賓客抵達，天皇不會表現出絲毫的不悅；相反，那些曾獲得天皇接見的人都對天皇的真誠和藹留下了深刻印象。[[15]](#_15__Redesdale_The_Garter_Missio)

即便天皇勉強同意接見亞瑟王子和接受嘉德勛章，但這項殊榮對天皇來說似乎并沒有多大意義。當西園寺公望（1906年接替桂太郎擔任總理大臣）請求天皇前往橫濱迎接王子的船艦時，天皇拒絕，并說還沒有這樣的先例。他最多只同意到新橋車站迎接使團。雖然后一舉動的殷勤程度遠不及西園寺所提議的那樣，但卻被雷德斯戴爾視為“日本以最禮貌周全的方式準備的、以最彬彬有禮的態度執行的尊貴殷勤的舉動。”

天皇的抗拒情緒一直持續到了最后。禮賓官員告訴他說，在接受嘉德勛章的儀式上不得佩戴任何其他勛章，但天皇堅持佩戴多個日本勛章。最后，他摘下了大勛位菊花章，但仍在胸口別上了勛八等桐葉章等其他勛章，仿佛是在維護日本勛章的威信。

雷德斯戴爾沒有提到違反嘉德勛章授勛禮節的行為，也沒有提到授勛時發生的尷尬事情。當王子將嘉德勛章中的帶子系在天皇的膝蓋下方時，針扎到了手指，帶子上沾上了鮮血。亞瑟王子當時年僅二十三歲，顯然很緊張，但天皇看到血痕似乎很鎮定。侍從日野西資博描述了在儀式結束后，仍戴著禮帽并佩戴著在儀式上獲得的徽章的天皇是怎樣離開儀式大廳、回到私人宮室的。在脫掉禮帽并將其遞給一位宮女時，他發出一聲大笑，好像在說“為什么朕非得干這些事”。[[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當天在和末松謙澄（樞密院的一名顧問）及其他人共進午餐時，天皇講述了發生的事情，并對亞瑟王子的沉著表示贊賞。之后，他將帶有血跡的勛章展示給末松和另外幾個人看。[[17]](#_17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_1)

當晚，天皇禮節性地回訪了亞瑟王子。據雷德斯戴爾勛爵回憶，天皇對儀式的舉辦和順利舉行表示高度贊賞，巧妙地避免提到儀式上的晦氣事情。接著，他拿出一個漆盒，從里面取出大勛位菊花章的綬帶和星章，并親手將綬帶系在親王的肩膀上，將星章別在親王的胸前。雷德斯戴爾勛爵再次難抑激動的心情：“在此之前，即使接受勛章的是皇太子，也從來沒有天皇屈尊授勛的事情。一般情況下，他都是將用于盛放勛章的、沒有打開的盒子遞給對方。個別時候，他最多也就是打開盒子。但是，除了亞瑟王子外，還沒有一個人敢吹噓說天皇為自己系上了綬帶、別上了星章。”[[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2)

那天晚上，天皇舉辦國宴款待亞瑟王子和嘉德授勛團。亞瑟王子與有棲川宮親王一道引領著眾人走向宴會廳。隨后，戴著嘉德勛章的佩星和領環的天皇走了進來，跟在他后面的是東伏見宮親王；在他們后面的是其他親王和內親王。據雷德斯戴爾勛爵回憶，晚宴很棒，并且時間不是很長：

甜點剛上，天皇便站起身，舉杯向英國國王祝酒，并且鄭重莊嚴地一飲而盡，樂隊演奏起《天佑國王》。沒過多久，亞瑟王子起立，并祝愿“日本天皇陛下健康、長壽、富足”，此刻，樂隊奏響莊嚴的日本國歌。值得一提的是，這大概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舉杯祝酒。[[19]](#_19__Redesdale_The_Garter_Missio)

雷德斯戴爾用興奮的腔調結束了對那天的描述：

令人難忘的一天就這樣結束了，這是史無前例并開創了許多先河的一天，是帶著愉快征兆的一天，它標志著兩國關系步入了一個新時代。大約在四十年前，我和一位日本紳士觀看一幅使用墨卡托投影[[20]](#_20__Redesdale_The_Garter_Missio)繪制的世界地圖。他指著西邊的英國和東邊的日本說道，“看看這兩個島國！您不覺得它們就像一張臉上的兩只眼睛嗎？如果它們能像人的眼睛一樣，朝著一個方向眺望的話就好了！”這位紳士已經逝世多年，如今，他的虔誠愿望實現了——或許至少可以期望在確保遠東和平方面得以實現。[[21]](#_21__Yi_Zhong__Deng_Jiao_Zheng_Q)

2月24日，天皇在歌舞伎劇院舉辦了戲劇表演以款待亞瑟王子。戲劇以益田太郎專門為這一場合編寫的歌舞伎劇目作為開場，以英國人三浦按針[[22]](#_22__Redesdale_The_Garter_Missio)與一名叫做阿通的日本女子結婚作為收場。整個慶典在歌舞伎的舞蹈和為年輕王子演唱的歡迎之歌中落下了帷幕。據雷德斯戴爾所說，慶典的結束語是：

現在，英日兩國團結攜手，友愛長存。

若宮合唱團唱起了歡迎歌

妙！妙！妙！[[23]](#_23__Yuan_Ming_Wei_Lian__Ya_Dang)

2月26日，天皇親臨霞關離宮，向亞瑟王子道別，正式結束了授勛慶祝活動。不過為了參觀京都、奈良、九州和日光，王子在日本一直待到了3月16日。

與英國續簽盟約改變了日本與韓國的關系。日本一直擔心，如果在韓國采取的戰時措施演變成永久占領政策，會遭到各個大國的反對，但英國明確表態說其不會給日本制造任何困難。即使是最同情韓國的美國也表示，美國樂意支持日本在韓國享有占優勢的影響力。[[24]](#_24__Redesdale_The_Garter_Missio)11月2日，天皇派人請來伊藤博文，命令他作為特使前往韓國。伊藤將向高宗皇帝遞交明治天皇的親筆信：

大日本帝國天皇敬親愛之大韓國皇帝陛下白：

為全帝國之自衛，維持東亞全局之康寧，朕前不得已，同鄰邦開戰端，而來結兵禍二十月，遂能克復和平。思其間陛下長同朕分休戚，兩國臣民亦共安危，茲特派朕信任之樞密院議長正二位侯爵伊藤博文，奏報陛下光榮和平之恢復。貴我兩國將來安定之誠意得陳于陛下，則為朕之最幸喜之所在也。期貴我兩國之關系此際進一層親密。蓋貴國之不幸在國防未備、自衛之基礎未固，向來常不足確保東亞全局之和平。朕同陛下共遺憾。故去歲定兩國間之協約，以至帝國擔任貴國防衛之責務。今雖幸克服和平，然為恒久維持，杜絕東亞將來之滋端，兩帝國之結合益加鞏固極為緊要。其方法朕命政府確立之。蓋貴皇室之安寧無有損傷，乃朕之先確保之所在。冀陛下深察宇內之趨勢，顧國家民人之利害，聽朕至誠之忠言。茲祈陛下之圣德及貴皇室之康寧。[[25]](#_25__Ian_H__Nish_The_Anglo_Japan)

伊藤的使命就是告訴韓國人，在樸次茅斯簽署的議和條約中，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享有政治、軍事和經濟特權，并且承諾不會干涉日本為引導和保護韓國可能采取的任何措施。伊藤獲得授權，與韓國簽訂一份保護韓國領土完整和維護東亞日后和平的新條約。

11月15日，伊藤覲見了高宗皇帝，但還沒等他透露關于使命的一個字，皇帝便大吐苦水，對日本在韓國的行動抱怨不已。一開始，他對最開明的日本駐朝公使井上馨（他總是樂意遵循井上的意見）被召回從而導致發生無法理喻的事件（謀殺閔妃）感到痛惜。如果井上能在韓國再待久一點兒，這場災難可能就不會發生了。這場密謀的元兇雖然是韓國人，但他們無疑借助了日本人的力量。

然而，皇帝繼續說道，再提過去的事情已經沒有意義。他想談論的是自去年3月伊藤首次訪問韓國后發生的事情。日本建立了一個本應只讓韓國人控制的銀行系統，但事實上，日本的銀行——第一銀行——控制著各項交易，導致韓國人民陷入了巨大的財政危機。日本甚至插手干涉皇室的私有財產。當皇帝向陸軍大將、韓國駐扎軍司令官長谷川控訴時，長谷川宣稱那是必需的措施，皇室只能默默接受。

財政事宜并非僅有的問題。毫無警惕的韓國人在欣然接受日本人提出的“改良措施”后，郵政和電報通信——任何一個社會的命脈——便完全掌握在了日本人的手里。明治在親筆信中提到，韓國沒有充分的能力進行防衛，但這是由日本干涉造成的。根據日本下達的命令，韓國的武裝部隊急劇減少，甚至無力鎮壓匪幫賊黨，更別提抵御外國侵襲了。此外，日本軍隊還頒布了保護鐵路和電報通訊的命令，但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韓國人無法看懂隨處張貼的通知，而那些違反了日本命令的韓國人被依照軍事法判處槍決。

皇帝接著說，起初，韓國人歡迎日本人的到來，但最后韓國人民發出了憤怒的呼聲。最近有謠言說，今后外交事務將由日本人負責，導致民眾產生了更大的恐慌。這些事態的發展已經促使韓國人（無論高低貴賤）對日本用意的真誠度產生了懷疑。皇帝力勸伊藤設身處地地為韓國民眾目前所面臨的危機著想。

伊藤大概沒有料到會聽到這番控訴，他回答說，他很理解皇帝的不滿。不過，他有一個問題要問：韓國依靠誰才能殘存至今？多虧了誰韓國才能獨立？如果陛下了解這些情況的話還會抱怨嗎？

皇帝打斷他，說道：“其事朕知悉。明治十八年（1885）之《天津條約》，二十八年（1895）之《馬關條約》共明確我國之獨立。一由日本之力，又卿折沖之力甚多。”

接著，皇帝繼續長篇大論地對自己在1896年做出去俄國公使館避難的決定進行辯解。還沒有匯報使命的伊藤無法掩飾自己的不悅，在皇帝的一席話被翻譯成日語時，伊藤強行打斷道：“外臣奉我至尊之大命，來謁陛下，然未了其事，拜聽陛下言往事。事雖有枝葉之嫌，然外臣不敢厭之，他日得閑另拜聽之。外臣今陳奏使命之大體。”[[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盡管伊藤急不可耐，不太想提過去的事情，但他還是從1885年在天津與李鴻章的會晤開始講起。在那個時候，他就已經堅持要維護韓國的獨立，并且阻止了李鴻章實施將會威脅韓國獨立的計劃。1894年，清朝企圖利用東學黨起義對韓國進行統治，但日本在繼而發生的戰爭中打敗了清朝。之后，俄國成為了韓國獨立的最大威脅，在陸地和海上對韓國形成包圍之勢，似乎準備吞并韓國。日本寧愿犧牲自己國民的性命和國家財富，也要救東亞于水火。戰爭的結果就是保全了韓國的領土完整，這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伊藤清楚地知道，韓國所遭受的一些苦難是由日本采取的措施造成的，但這是無法避免的，他確信讓韓國人忍受這些苦難并不過分。因為多虧了日本的政策，韓國的領土完整才得以維護，東亞的和平才得以實現。

最后，伊藤將話題轉到了當前的問題上來：日本天皇希望永久維持和平，防止將來給東亞造成威脅，于是派他前往韓國謁見陛下，他還將天皇希望日韓兩國結成更穩固聯盟的意愿傳達給皇帝。韓國與外國的對外關系將由日本政府負責管理，但內部事務將繼續交由韓國皇帝定奪。這一變化將會結束東亞的紛爭，維護韓國皇室的安寧與尊嚴，并將有利于韓國人民的福祉。[[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皇帝回答說，他很感謝明治的關心，也并非不愿意讓日本來管理韓國的外交事務。但他請求在委任外交權時，由其保存外交的形式，即希望繼續以他的名義與外國列強進行談判，即便事實上是由日本做出決定。伊藤拒絕了這一請求，表示外交事務的形式和內容不得分離。如果韓國堅持自行管理外交事務，必定會導致東亞發生事端，對此日本無法接受，而這就是日本希望代韓國處理外交事務的原因。日本是在考慮了各種可行的方案和結合了以往的經驗后才出臺這一政策的，沒有任何變通的余地。伊藤帶來了一份協約的副本，并請求皇帝閱覽。

在閱讀了協約后，皇帝對伊藤的工作表示贊賞，并說較之于自己的大臣，他更信賴伊藤。然而，對于委任外交權一事，如果連形式也不予保存，豈不是使韓國處于奧地利之于匈牙利，或者非洲國家之于歐洲征服者的相同地位嗎？

伊藤堅稱，協約事實上是為了韓國君主和韓國的利益著想。他否認日本企圖欺騙皇帝或意圖為自己謀利。拿匈牙利作類比并不合適，因為匈牙利沒有自己的君主，但日本和韓國都有，并且都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至于非洲，古往今來還從來沒有一個非洲國家獲得了獨立。將日本和韓國的關系與這些例子做類比是具有誤導性的。為了消除可能發生災難的源頭，日本所要求的只是管理外交事務，其他事情均不會干涉。

皇帝再三懇請給他一丁點兒的權力，但伊藤每次都答復說毫無變通的余地。他所需要知道的只是皇帝的決定。皇帝有接受或者拒絕的自由，但他應當很清楚，如果拒絕協約，日本政府將決定采取哪些行動。

高宗皇帝辯解道，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他無法當場做出決定。在這種情況下，通常需要咨詢大臣并了解民眾的意愿。他請求給他一點時間。伊藤同意皇帝咨詢內閣，但他對探明民意的方案產生了懷疑。他說：“貴國尚未建立立憲政府，豈非萬機悉由陛下親裁之君主專制之國？”伊藤擔心，探明民意的真正用意是為了煽動民眾反對日本。韓國民眾容易被左右，因為他們對外交事務一竅不通，而這也是日本覺得有必要代韓國處理外交事務的原因。皇帝解釋說，他不是指進行民意調查，而是指咨詢樞密院。伊藤同意讓皇帝咨詢樞密院，但警告說日本無法容忍拖延時間的行為。

皇帝請求通過外交渠道向各國發送協約，但伊藤拒絕。他命令皇帝連夜召集內閣，令他們商議協約一事。皇帝承諾照伊藤的指示去做。他提出了最后一個要求：請求伊藤向天皇和日本政府傳達他希望在外交事務中保存象征性的認可。伊藤勸他不要抱有任何類似的希望。

高宗皇帝和伊藤博文之間的對話持續了四個小時。[[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皇帝一定覺得受到了屈辱，但他沒有辦法，只能屈服：伊藤已經很明確地表明，如果皇帝拒絕，日本將進行軍事干預，并推翻李氏王朝。在其他情況下，伊藤通常被描述成一個溫文爾雅的文明人，但現在，伊藤證明自己是綿里藏針，軟中帶硬。雖然他使用貼切、禮貌的措辭來回絕皇帝，但高宗仍感受到了其中帶有的嚴重威脅。他沒有同意以皇帝的名義發布日本人的命令，不給高宗留一點自尊。迄今為止的大多數史料都將高宗描述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尤其是在拿他與其正室閔妃做比較的情況下，但這一次，在他的統治面臨著重大危機的時刻，他展現出了尊嚴和強硬。

11月16日，伊藤邀請韓國內閣成員和政界元老光臨他下榻的酒店，與他們進行了一番友好的交談。這次交談最后演變成一場激烈的爭論，并且持續到了午夜。[[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一名韓國人描述說：“閣僚來酒店前互相發誓，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屈從于日本的要求。日本使用了種種手段，向他們提供巨額賄賂，以甜言蜜語哄騙他們，最后還威脅說如果拒絕妥協，便要了他們的命。”[[30]](#_30__Ru_Xu_Le_Jie_Suo_Fa_Biao_De)

第二天，日本代表（伊藤、公使林權助和陸軍大將長谷川好道）與韓國內閣在日本公使館召開會議。內閣成員繼續反對締約一事，因而這次會議沒能做出任何決定。皇帝懇請伊藤暫緩時日，以免這個問題演變成一場動亂，但伊藤拒絕了。相反，日本召集了陸軍和軍警。這名韓國人描述道：“街道上處處都有機關槍，甚至野戰炮也被調來控制漢城的各個戰略要點。他們偽裝成要發動攻擊，并占領宮門，持槍備戰，采取了除暴力以外的所有手段，以此向韓國人證明，為了讓韓國接受他們的要求，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31]](#_31__Woonsang_Choi_The_Fall_of_t)

當晚又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次是在宮中舉行。伊藤要求謁見皇帝，但高宗以喉嚨痛為由拒絕接見。伊藤無視皇帝的意愿，強行來到高宗的面前。皇帝拒絕與伊藤商談協約的事情，而是讓伊藤與其內閣成員交涉。回到會議室后，伊藤宣稱，“貴國陛下令諸位與我進行商議，以便解決締約事宜”。[[32]](#_32__Woonsang_Choi_The_Fall_of_t)他命令參政大臣韓圭卨輪番要求各個大臣表態是否同意締約，如果不同意告知反對的原因。最后，除了三個人（其中一個立場不明）外，其余人在勸服或恐嚇之下贊成締約。[[33]](#_33__Woonsang_Choi_The_Fall_of_t)

伊藤宣布，僅有兩名內閣成員堅決反對締約，因此應尊重大多數人的意愿。他召來議政大臣，以便按照既定程序簽署協約。他知道參政大臣（即兩名堅決反對者中的其中一名）不愿批準協約，但是伊藤威脅說作為天皇的代表，如果有人敢輕視他，他是不會保持沉默的。[[34]](#_34__Pian_Ye_Sheng_Dong_Di_Miao)

參政大臣向伊藤保證自己絕不是反日派。他很清楚，要是沒有日本的幫助，韓國無法維護獨立。但對于締約，他無法改變想法。也許這正像俗語所說的那樣，“匹夫不可奪志”，才疏學淺導致了他無法順應時代的發展，由此造成罔顧君主的意愿，持有與內閣其他成員不同的觀點,只能等著接受懲罰。他叫喊著“推察吾心！”，然后控制不住地痛哭起來。伊藤勸他擦干眼淚，拿出更大的勇氣來。[[35]](#_35__Jin_Ying_Long____Wai_Jiao_W)

高宗皇帝愿意批準協約，但他想在協約中加一句話：一旦韓國變得富足強大，足以維護自身獨立的時候，現行協約不再有效。為取悅皇帝（也許伊藤私下里認為那一天永遠都不會到來），伊藤在條款中親筆寫下了皇帝的這一要求。[[36]](#_36__Jin_Ying_Long____Wai_Jiao_W)

1905年11月18日，日韓簽訂了保護協約[[37]](#_37__Dui_Yu_Huang_Di_Shi_Fou_Qia)。協約[[38]](#_38__Shi_Cheng___Yi_Yi_Tiao_Yue)有五條：

一、日本政府今后管理韓國的對外關系，通過外交大使和領事保護國外的韓國臣民及其利益。

二、日本政府將執行韓國與他國已締結的現存條約的規定。韓國政府承諾，未經日本政府的事先同意，今后不得締結具有國際性質的任何條約。

三、日本政府設置統監一名，作為日本的代表駐留韓國。統監專為管理外交相關事務，具有親自謁見韓國皇帝陛下的權利。在韓國各開放口岸以及日本政府視為必要的其他地方，日本政府擁有設置理事官的權利。

四、日本與韓國締結的所有現存條約，除與本協約條款相抵觸者外，繼續有效。

五、日本政府保證維護韓國皇室的安寧與尊嚴。[[39]](#_3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日本強加的協約自然激起了韓國民眾的悲痛憤慨之聲。大臣們如何迅速地投票贊成締約的消息被泄露給了媒體，報紙勇敢地發表社論，對協約以及背叛國家、屈從于日本要求的大臣們予以譴責。隨后幾日，韓國都籠罩在“慟哭”之中，民眾在王宮前的廣場上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商人罷市，學生罷課，以此抗議協約，基督教堂充滿了哀慟之聲。[[40]](#_40__Pian_Ye_Ci_Xiong____Li_Zhao)

1905年12月21日，伊藤博文被任命為第一任韓國統監。[[41]](#_4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雖然向高宗皇帝做出了保證，但他在韓國的活動絕非僅限于外交事務。例如，他決心讓宮廷擺脫腐敗，以便結束宮廷對全國各地的盜匪行為和起義活動給予的保護。經韓國皇帝同意，伊藤親自指揮宮廷侍衛隊。[[42]](#_4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表面上高宗皇帝對與日本建立的新關系表示歡迎，但在一封悄悄偷帶出去的、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中，皇帝宣稱，他從來都沒有批準新的協約，這是日本人把刀架在韓國人的脖子上迫使韓國人答應的，是無效的。[[43]](#_4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這封信并沒有引起羅斯福的重視，大概是因為他已經將韓國看成是一個由日本統治的地區。

高宗皇帝別無選擇，只好繼續扮演日本忠實盟友的角色。1906年4月，日本為慶祝戰勝俄國舉行軍事慶典和檢閱，[[44]](#_4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高宗派遣陸軍中將義親王前去參加。義親王帶來了皇帝的祝賀以及祈求兩國友誼長存的信件。高宗尤其提到，他對任命伊藤博文擔任韓國統監感到高興。這個稱贊與他時常表現出來的對伊藤的極端厭惡（尤其是在得知伊藤被任命為第一任韓國統監時）相矛盾，[[45]](#_45__Ju_Pian_Ye_Miao_Shu__Dang_Y)但是，明治可能不太了解韓國皇帝的真實感受，他非常高興高宗對伊藤的治理感到滿意。

日本和韓國的君主之間不時互通書信，雙方總是對兩國的友誼不斷加深感到高興。[[46]](#_46__Ling_Qing_Can_Yue___Ming_Zh)得知韓國皇太子將舉行大婚時，明治派宮內大臣帶著送給每個人的禮物前去參加婚禮。也許明治的確相信他和高宗彼此所做出的友誼承諾，但伊藤于1907年4月向天皇進行的奏報卻描繪出了一幅動蕩不安的黯淡景象。他提到了韓國對支持締約的內閣大臣進行暗殺的陰謀，并暗示韓國皇帝可能深涉其中。日本逮捕和詢問了有嫌疑的人士，很多人都供認不諱，但調查仍在繼續進行。[[47]](#_4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身著日本禮服的純宗

為反抗日本，高宗做出了最后一次嘗試，派遣由三名人士組成的代表團前去參加1907年6月在海牙召開的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這三名人士是前議政府參贊李相卨、李儁和李瑋鐘，都因抗議《乙巳條約》而辭職。他們從漢城秘密前往海參崴，在那里會見了傳教士胡默·赫伯特（Homer Hulbert）。之后一同經由西伯利亞大鐵路抵達圣彼得堡，并從那里前往海牙。盡管李瑋鐘應邀在同時舉行的記者會上發表演講，但這幾位韓國人在試圖爭取會議的列席權時屢遭拒絕。李瑋鐘控訴了以下三點：（1）韓國皇帝從未批準1905年11月15日的協約，因此協約無效；（2）日本無權監理韓國的外交關系；（3）韓國有權派代表參加國際會議。

李瑋鐘獲準于7月5日向會議提交韓國的控告詞。他的演講讓代表們深受感動，他們決定向漢城發電報，核實這個代表團是否真的代表韓國政府的意見，但電報業務被日本人控制，于是電報落到了伊藤博文的手里。他來到王宮，就電報一事與皇帝當面對質。伊藤斥道：“陛下怎能以如此陰險的手段違背協約。要是陛下拒絕日本的保護，倒不如對日本發布堂堂正正的宣戰文告更為便捷。”懊惱的皇帝小聲回答說，他對此事一無所知。伊藤要的就是這句話：他就此答復各國代表說，韓國政府并沒有委派代表團。在英國代表（這些代表忠于英日同盟）的提議下，韓國的控告詞被駁回。[[48]](#_48__Woonsang_Choi_The_Fall_of_t)

日本政府當然不會讓皇帝的這一行為逃脫懲罰。伊藤在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的陪同下，于7月18日謁見高宗皇帝，要求他退位。高宗拒絕，但迫于巨大壓力，于當天深夜同意讓皇太子以“攝政王”的名義接管政務。高宗拒絕退位，然而日本無視這一意愿，宣稱愚鈍低能的純宗已經繼承了王位。[[49]](#_49__Chun_Zong_Zhi_Qian_Jiao_Zuo)7月21日，明治天皇發來賀電，盡管他承諾維護韓國皇室的安寧和尊嚴，但李氏王朝已經岌岌可危。

1. [[1]](#_1_56) 金膺龍，《外交文書で語る日韓併合》，第195頁。崔文衡對日本士官如何將參政大臣拖進一間別室的情形進行了描述，其他內閣大臣都以為韓圭卨很可能被殺害了（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48-49）。日本的這一舉動誘使了多名內閣大臣同意締約。對于會議的不同描述，崔文衡說道，“所有作者對會議現場的描述大同小異，即都承認會議具有脅迫性”（p. 54）。但是，杜斯說道，參政大臣異常激動地離開會議室，以致他不小心走進了宮女的宮室（"aid-J9F", p. 191，引自日本官方資料）。韓圭卨被自己的錯誤嚇呆了（并且宮女們發出了尖叫），立刻昏死過去。會議在沒有韓圭卨在場的情況下繼續進行。這兩個描述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表明任何一方的記載均非完全可信。

1. [[2]](#_2_56) 井口和起，《日露戦爭の時代》，第127—128頁。井口稱，要是沒有英國的支持，日本缺乏戰斗力來與俄國開戰。日本目前還無法鑄造出戰艦和裝甲巡洋艦所需的主炮和副炮，不僅在大炮上依賴英國，就連發射炮彈的火藥也依靠英國。此外，英國每個月向日本海軍提供兩萬噸煤。

1. [[3]](#_3_56) Ian H. 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 p. 289. 英國認為，其不“允許目前有任何船只在黑海參與作戰行動”，按照英國的要求，土耳其拒絕讓俄國黑海艦隊的軍艦通過其海峽。

1. [[4]](#_4_56) 奈斯寫道，“英國給人留下的印象更像一個中立國，而非一個盟友”（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 p. 292）。

1. [[5]](#_5_56) 來自于克勞德·麥克唐納于1904年12月23日向英國駐俄大使查爾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的匯報，引自Ian H. 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 p. 299。

1. [[6]](#_6_56) 在20世紀以前，歐洲國家一般只在大國或盟國之間或向教皇國才派駐大使，向其他二等及以下國家一般只派公使做為最高外交使節，等級森嚴。這是歐洲借外交使節把國家劃分為三六九等。——譯注

1. [[7]](#_7_56) Ian H. 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 p. 303.

1. [[8]](#_8_56) 來自于日本駐英公使林董向日本政府發送的電報，見Ian H. 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 第309頁。

1. [[9]](#_9_56) 條約的英文文本，見Ian H. 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 p. 331-333。

1. [[10]](#_10_56) Ian H. 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 p. 346。亞瑟王子的父親也叫“康諾特公爵亞瑟王子”，曾于1890年對日本進行了非正式訪問，他將那次訪問的大部分時間用于觀光和購買古玩上。讓人吃驚的是，英國政府向兒子（而非父親）委派授予嘉德勛章這樣重要的任務，而父親卻一直忙于印度的事情。

1. [[11]](#_11_56) Redesdale,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 pp. 1-2.

1. [[12]](#_12_56) Redesdale,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 pp. 5-6。

1. [[13]](#_13_56) Redesdale,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 pp. 7-8。

1. [[14]](#_14_56) Redesdale,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 p.8。

1. [[15]](#_15_55) Redesdale,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 p. 16-20。

1. [[16]](#_16_55)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92頁。

1. [[17]](#_17_55)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84頁。

1. [[18]](#_18_54)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93頁。

1. [[19]](#_19_54) Redesdale,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 pp. 22, 23.

1. [[20]](#_20_53) Redesdale,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 p. 25。

1. [[21]](#_21_53) 一種“等角正切圓柱投影”，由荷蘭地圖學家墨卡托（Mercator，1512—1594）在1569年擬創。這是地圖投影方法中影響最大的一種，廣泛用于編制航海圖和航空圖等。——譯注

1. [[22]](#_22_52) Redesdale,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p. 29.

1. [[23]](#_23_52) 原名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1564-1620），決定永久定居日本后改名叫做三浦按針。

1. [[24]](#_24_50) Redesdale,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 pp. 76-81. “よいよい　よいやさ”（妙！妙！妙！）作為這首歌曲收尾的合唱疊句，隱約表達了幸福美好的含義。

1. [[25]](#_25_50) Ian H. 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pp. 350-351.

1. [[26]](#_26_50)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74—375頁。

1. [[27]](#_27_49)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76—379頁。

1. [[28]](#_28_46)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80—381頁。另請參閱金膺龍，《外交文書で語る日韓併合》，第187—188頁。

1. [[29]](#_29_46)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81—384頁。金膺龍進行了簡短但類似的描述，見《外交文書で語る日韓併合》，第183—191頁。根據崔文衡的描述，高宗皇帝的最后一句話是“若同意你的提議，無異于亡我國家，朕寧死不從”（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46）。

1. [[30]](#_30_44) 如需了解所發表的意見，請參閱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17—218頁。韓國人注意到了這一似是而非的現象：日本表面上捍衛韓國獨立，實際上是為了剝奪這個國家的獨立。

1. [[31]](#_31_42) 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47.

1. [[32]](#_32_41) 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47。

1. [[33]](#_33_40) 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48。

1. [[34]](#_34_40) 片野生動地描述道，伊藤輪番詢問各個內閣成員是否同意締約（《李朝滅亡》，第221—222頁）。措辭含糊的回答被記為“不反對”，并標示成“O”，只有堅決反對才標示成“X”。不過片野沒有提供史料來源。另請參閱Peter Duus,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p. 190-192。

1. [[35]](#_35_37) 金膺龍，《外交文書で語る日韓併合》，第195頁。

1. [[36]](#_36_36) 金膺龍，《外交文書で語る日韓併合》，第196頁。

1. [[37]](#_37_32) 對于皇帝是否簽署了該條約，歷史學家意見不一。如需了解歷史學家的爭議，請參閱Peter Duus,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p. 193-194。

1. [[38]](#_38_27) 史稱《乙已條約》。——譯注

1. [[39]](#_39_26)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08頁。

1. [[40]](#_40_25)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25—226頁。投票支持締約的五名大臣被韓國民眾稱為“乙巳五賊”。

1. [[41]](#_41_25)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35頁。山縣有朋接替他擔任樞密院議長。他于2月2日向明治天皇告別，在抵達韓國后，于3月3日正式就任第一任韓國統監。

1. [[42]](#_42_25)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96—598頁。伊藤尤其關注叛亂，這些叛亂似乎獲得了宮中有影響人士的支持。大多數叛亂都將矛頭指向協約，但也有一些叛亂沒有針對性。

1. [[43]](#_43_22)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228頁。這封信由密使送到清朝的芝罘，并從那里電傳至華盛頓。在華盛頓，一名深得高宗皇帝信任的美國傳教士胡默·赫伯特將信交給了國務卿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魯特將信轉交給羅斯福。但這封信沒有起到任何效果，大概是因為美國駐韓公使警告國務卿，說赫伯特的判斷常常因為“受到偏見的影響”而支持韓國（Peter Duus,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 206）。

1. [[44]](#_44_21)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36—537頁。軍事檢閱于4月30日在青山閱兵場舉行。值得注意的是，明治第一次穿上了成為日本陸軍標準著裝的卡其制服。

1. [[45]](#_45_21) 據片野描述，當伊藤于3月9日遞交委任狀時，皇帝沒有說一句話（《李朝滅亡》，第238頁）。

1. [[46]](#_46_18) 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642—644頁。

1. [[47]](#_47_17)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661頁、第724頁。

1. [[48]](#_48_17) 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61-63.另請參閱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42—245頁；《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65—666頁。

1. [[49]](#_49_17) 純宗之前叫做李坧，是高宗和閔妃的兒子。他于1898年遭到投毒，雖然醫生救回了他的命，但毒藥對他的大腦造成了影響（《李朝滅亡》，第254—255頁）。

# 第五十七章 慶子去世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響。這是近代史上亞洲國家第一次在軍事上打敗歐洲強國，因而讓生活在歐洲殖民者統治之下的亞非人民為之神往。[[1]](#_1__Dang_Wo_Yu_1963Nian_Fang_Wen)然而，在日本國內，擊敗強敵而產生的喜悅和成就感很快就消退了。在戰爭期間，一些知識分子就已經對與俄國開戰的必要性產生了懷疑。1904年8月，有島武郎在日記中寫道，盡管日本軍隊攻下了旅順，但是，“彼等一日所用軍費平均五十萬美元，豈不令人驚訝？節彼等兩日之戰費，可建一雄偉大學。余不知此度戰爭是否必要，然戰爭并不必要”。[[2]](#_2____You_Dao_Wu_Lang_Quan_Ji)

敵視俄國并對戰爭燃起激情的石川啄木在1906年12月的日記中寫道：“當余對學生說，比起戰勝的日本，戰敗的俄國更偉大時，余究竟想塑造什么樣的人類 ？”[[3]](#_3____Shi_Chuan_Zhuo_Mu_Quan_Ji)啄木沒有解釋為什么他對學生說俄國優于日本；也許他只是想間接表達他的覺悟：他和其他日本知識分子意識到，眾人歡呼喝彩的戰爭勝利不過是徒有虛名罷了。日本為獲得那少得可憐的領土付出了巨大代價，而來自俄國的威脅絕對沒有結束。因獲勝而被認可為強國的滿足感，沒能彌補日本在旅順和奉天戰役中所遭受的慘重的人員傷亡。

明治天皇在戰爭期間做了幾首詩，但大多數都沒有歐洲戰爭詩歌中的那種典型的狂熱。他最負盛名的一首短歌（據說受到了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贊賞），[[4]](#_4__Zhe_Shou_Shi_You_Zao_Dao_Tia)甚至對為什么會有戰爭這樣的事情感到困惑（無論是真的還是假的）：

五湖和為貴

四海之內皆兄弟

緣何風波起

百思不解戰爭義

茫茫人間爭何必[[5]](#_5____Xin_Ji_Ming_Zhi_Tian_Huang)

另一首詩描述了戰爭對家中留守人員造成的影響：

戰場把兵點

壯士離家遠從戎

城涼家屋空

縱橫白骨競折腰

獨留老父守田壟[[6]](#_6____Xin_Ji_Ming_Zhi_Tian_Huang)

即使是在對馬海戰和奉天之戰取得勝利后，明治的詩也絲毫沒有表現出歡欣之情。外國君主稱贊此類勝利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明治只是冷靜嚴肅地說道：

今番激戰起

攻城奪險炮火轟

罕見戰事宏

自古征戰幾人回

硝煙亡骸悲長慟[[7]](#_7____Xin_Ji_Ming_Zhi_Tian_Huang)

幾年后，在明治天皇駕崩后，陸軍大將乃木希典殉死。絕大多數日本人都認為他是對在旅順戰役的數次全面進攻中陣亡數萬將士感到自責。[[8]](#_8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g)1906年1月，在東京慶祝勝利時，乃木寫了一首漢詩，其中表達的并非是獲勝的喜悅，而是自己的羞愧：

王師百萬征驕虜，

攻城野戰尸做山。

愧我何顏看父老，

凱歌今日幾人還。[[9]](#_9__Song_Xia_Fang_Nan____Nai_Mu)

與謝野晶子的著名詩歌《弟弟啊，你不能死去》通常被認為是在表達反戰情緒，也正因如此在當時飽受攻擊。事實上，晶子不僅不是一名反戰主義者，反而很重視忠于君王的家族傳統。她在詩歌中要傳達的并非和平主義的信念，而是擔心即將離家奔赴中國戰場的弟弟的安危。不過，就算這首詩不具有政治色彩，人們也很難想象它能發表在清日戰爭（陣亡人數較少的相對容易的戰爭）或者太平洋戰爭（媒體被極權主義操控，不允許發布違背國策的任何內容）期間。

日俄戰爭后，作為幻滅文學的自然主義文學運動迅速發展。自然主義小說的典型例子是田山花袋的《一兵卒》。這部小說部分根據他在中國擔任隨軍記者的經歷寫成，被視為具有反軍國主義思想，多年來只能在刪除某些段落后才能刊印。

在日俄戰爭后的幾年中逐漸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似乎感覺到了一種疏離感。大多數疏離感都是從對戰時傷亡的震驚和對戰爭結果的失望中生出，但之后在政治上便以社會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又導致老一輩對年輕一輩丟掉傳統感到悲觀失望，即造成老一輩陷入憂郁的情緒。山崎正和將這個時期稱為“苦悶的時代”。

岡義武將這一時期描述成，“一些年輕人在尋找人生意義的過程中陷入了懷疑和煩悶。事實上，這種趨勢在日俄戰爭之前就已經展露苗頭，但在戰爭結束后特別顯著。”[[10]](#_10__Oka_Yoshitake___Generationa)

人們可能會認為戰爭獲勝和外國的贊賞就算不會使日本人感到驕傲，也會使日本人變得自信，但當時的批評家煩惱的是年輕男女之間盛行的“煩悶的厭世主義”。[[11]](#_11__Oka_Yoshitake___Generationa)諷刺的是，這種厭世主義可能造就了日俄戰爭結束后的十年間涌現出來的文學上的異常繁榮。夏目漱石在這一時期寫出他最優秀也最沉郁的作品。森鷗外、石川啄木、島崎藤村的代表作大多也是這一時期完成。此外，永井荷風、志賀直哉、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也是在這時發表了成名作。

對已經五十五歲的天皇來說，1906年大體上是平安無事的一年。1月，在桂太郎辭職后，他命令西園寺公望組建內閣。貴族成員擔任了總理大臣，大概會讓天皇感到高興，因為近年來貴族在政府中所扮演的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

1月底，由清朝宗室成員組成的代表團赴東京考察。他們謁見了天皇，代表團團長貝子載澤告訴天皇說，清朝皇帝派他們來研習日本的政治制度。他說，天皇取得的軍事榮耀和開展的公民道德教育享譽五大洲；日本的政治和教育日臻完善，給他和同行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載澤希望天皇能了解他們的真誠，能憐憫他們，以便他們能夠學習日本的先進技術和值得稱贊的其他特色。他們打算以日本為楷模在清朝推行文明開化，希望由此確保東亞的日后安寧和增進民眾的福祉。[[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1)

誠然，這些贊美之詞不過是一種奉承，但貝子確實使用了某些兩國長期交往的歷史中不太可能出現的措辭來稱呼日本天皇。這似乎讓明治感到很高興：他向貝子賜座，這是很少向賓客采取的舉動。[[13]](#_13__Gen_Ju_Shi_Cong_Fang_Cheng)他還邀請清朝代表團共進午餐，之后，派遣侍從長帶著向賓客授予的勛章和其他禮物前往芝離宮（清朝代表團下榻的地方）。[[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這個小規模的清朝代表團效仿巖倉使團，在考察了日本的設施和研究了日本的憲法后，于2月13日前往美國（和歐洲）。清政府似乎真心渴望實現現代化，盡管也對其他國家進行了考察，但日本為清朝樹立了一個最易于借鑒的榜樣。

當月晚些時候，韓國代表團在高層官員李載完的帶領下抵達日本。李載完帶來了高宗皇帝感謝明治天皇派伊藤博文赴韓的信，以及敬獻給天皇、皇后、皇太子和皇太子妃的貴重禮物。翌日，天皇根據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向他們授予了不同等級的勛章。[[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如上一章所述，2月，英國嘉德授勛代表團抵達日本。外國政府對日本的關注無疑讓天皇感到很高興。日本國內的情況則與這些形成鮮明對比。3月，外務大臣加藤高明（1860—1926）因鐵路國有化議案與其他內閣成員產生分歧而辭職。加藤反對這一議案，認為該議案侵犯了私人權利，但議案仍獲得了通過，于是他向總理大臣西園寺提交了辭呈。政府成員在辭職時總是以健康不佳作為理由，但加藤卻說明了辭職的真正原因。

一直以來都恪守先例的天皇詢問西園寺為什么加藤不按照慣例提出辭職。西園寺解釋說，當請求辭職的人以健康不佳作為理由時，他說的也許是實話，也許不是。他暗示說，加藤是少有的誠實人；無論如何，他請求天皇原諒加藤的做法，并接受加藤的辭呈。天皇被說服了，結果西園寺除了擔任總理大臣和兼任文部大臣外，還臨時兼任外務大臣。[[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1906年，世界各地都發生了自然災害。3月27日，臺灣發生大地震，造成逾一千一百人喪生；4月11日，意大利維蘇威火山爆發，導致多人喪命；4月21日，舊金山發生震驚全球的大地震。日本皇室像發生重大災害時所做的那樣捐錢救助災民——他們向臺灣災民捐贈了一萬日元，向舊金山災民捐獻了二十萬日元。[[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向后者捐贈的數額較大，大概是為了對美國在日俄戰爭后的議和談判中所給予的支持表示感謝。

7月，天皇需要對一件不怎么重要的事情做出決定。當時，日本對在庫頁島的日俄界碑應該刻旭日圖案還是菊花圖案展開了激烈爭論。7月5日，天皇做出決定：采用菊花圖案。[[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3)

這一年一直到12月11日都沒有什么大事。那天，天皇同意接見韓國代表團。代表團帶來了韓國皇帝的書信，并傳達了韓國皇帝希望兩國維持永恒友誼的口諭。韓國皇帝還表示完全信任伊藤博文，并對將由其他人來接替伊藤擔任統監一職的謠言感到擔憂。他覺得更換統監不僅不合時宜，還會導致政府和民眾對未來失去信心，因此請求天皇不要更換伊藤。[[19]](#_1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從這些事情來看，我們只能驚嘆于討厭伊藤的韓國皇帝竟能說出這樣的政治謊言。

12月28日，天皇正式召開議會。當天，一名美國訪問者——耶魯大學的喬治·特朗布爾·拉德（George Trumbull Ladd）教授——參加了議會，并記錄下了他對議會的印象：

天皇親自召開議會……眾人都在10點前進入貴族院。陛下在10點半才離開皇宮。

陛下一到達貴族院，所有等待的人都被領進貴族院議事廳的相應席位……不到五分鐘，陛下也進入了議事廳，他走向御座，坐了一會兒。但他隨即起身，從總理大臣西園寺侯爵的手中接過印在卷紙上的敕諭。然后，他開始宣讀，或者說是以一種非常清晰但柔和而帶有樂感的聲音進行誦讀。整個敕諭的宣讀時間不到三分鐘。宣讀結束后，貴族院議長德川公爵從貴族院的議員席上走向講臺，而后走到御座前面。他從天皇手中接過敕諭。隨后，他回到議員席，在正對著天皇的位置鞠了一個躬。天皇隨即走下御座，離開講臺，從進入的門走出去，后面跟著眾侍從。[[20]](#_20__George_Trumbull_Ladd_Rare_D)

拉德也對自己進行了描述：

我只是一名教師。我不奢望獲得比“教師”更高的頭銜，也不渴望獲得讓人覺得更體面的官職。然而，對于我為日本國民的“道德教育”所做出的貢獻，天皇煞費苦心地在全體國民的面前予以承認、給予支持并表達了他的感激。毫無疑問，他的煞費苦心是真心實意的，也是獨特難得的。我們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為道德教育和民眾福祉所付出的努力，貫穿于整個統治時期。他沒有想過要靠此來制定外交政策、贏得顯赫名聲或者獲得回報式的支持。在當今世界的統治者中，很難找到像睦仁那樣在涉及國民利益時能如此感情深厚、如此熱心周到、如此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人。[[21]](#_21__George_Trumbull_Ladd_Rare_D)

1907年（明治四十年）在沒有舉辦任何年度特殊慶典的情況下拉開序幕。多年來天皇不再操持規定的四方拜儀式，都是讓代行官操辦這些傳統的敬拜活動。

1月8日，天皇前往青山閱兵場檢閱軍隊。他向來都是騎在馬背上進行檢閱，但這一次，他下令打開車篷，坐在馬車上檢閱軍隊。按照慣例，他通常都會接見前來觀看閱兵的資深政治家、大臣和外國使節，但今年他中斷了這一做法，交由陸軍省負責。有人指出，這種變化是因為今年僅有很少的外國來賓參加檢閱儀式，[[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不過，也可能是天皇年齡增大或疾病發端而感到疲勞的緣故。因為他不喜歡接受醫生的檢查，健康狀況一直都不被人所知。

也有其他跡象表明天皇的健康每況愈下：因天氣惡劣，他決定不按照原計劃出席陸軍戶山學校的畢業典禮。[[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過去天皇總是對天氣毫不在意，哪怕是暴風雨。

5月3日，在天皇前往靖國神社進行臨時祭之前，發生了一件奇怪而類似的事情。這天天氣晴朗，天皇為這一場合穿上了盛裝。宮內大臣田中光顯希望天皇的馬車在往返靖國神社的沿途，能讓陣亡將士的遺族（和其他觀看者）一睹龍顏。出于這種考慮，在沒有征得天皇事先同意的情況下，田中命令掌馬官打開馬車的車篷。雖然這天的天氣又熱又潮，但天皇并沒有下令打開馬車的車窗，更不用說車篷了。近年來，當天皇經過外國人居留區時或者在前往博覽會的途中，曾有過那么兩三次恩準了官員打開車篷的請求，以便讓民眾一睹龍顏；但這一次，當準備離開皇宮時，他注意到車篷打開了。他召來侍從長德大寺，令他關上車篷。天皇就站在馬車旁，直到車篷被關上為止。[[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不用說，一想到自己違背了天皇的旨意行事，官員們都嚇呆了。也許天皇惱火的，只是因為沒有經過他的同意而打開車篷，但事實卻是，盡管天氣炎熱，他仍不想打開車窗。這表明他并不是僅僅因為惱火才堅持關上車篷，還有可能是因為他像老年人怕冷一樣，不愿接觸外界。

1907年2月初，為答復天皇的詢問，陸軍和海軍的總參謀長撰寫了一份關于國防的計劃書。其中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日本必須做好準備，以便向要侵犯日本權利的國家發動攻擊。計劃書上說，撇開遵循倒退政策的德川時期不說，一直以來，前瞻性的政策——即采取攻勢并取得勝利——都是具有日本典型特征的政策，它體現了日本人的特性。

在起草國防計劃時，總參謀長們仔細考慮了哪些國家可能成為日本的敵人。自日俄戰爭敗北以來，俄國一直在遠東穩步開展軍事建設。他們還制定了重建海軍的計劃，似乎在等待時機以報仇雪恨。因此，俄國可以被列為主要的假想敵。

接下來是美國。盡管美國似乎希望與日本保持友好關系，但日本不敢保證，在將來的某個時候，美國不會因地理、經濟、種族和宗教因素而與日本發生激烈沖突。再次是英國。與英國結盟是日本國防的基本組成部分，但根據續訂的盟約，如果俄國侵略印度，日本仍有義務派遣軍隊援助英國。

總參謀長得出結論認為，日本陸軍必須能夠阻擊其假想敵俄國，日本海軍必須能夠抵御其假想敵美國。為此，必須在來年初落實國防計劃，將陸軍擴建成十九個師團，為海軍建造八艘兩萬噸級的戰列艦和九艘一萬八千噸級的裝甲巡洋艦。[[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天皇對此有何反應并沒有記載，但在日本經濟正處于從日俄戰爭中恢復過來的時期，他很可能會仔細考慮這些雄心勃勃的計劃所需要的巨大資金。

在收到這份奏折后的一個星期，天皇聽說栃木縣足尾銅礦的礦工發生暴動，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和提高工資。應栃木縣知事的要求，第十五連隊的士兵鎮壓了此次暴亂。這不是天皇第一次聽說有關足尾銅礦的事情。早在1897年3月，日本政府就成立了一個內閣委員會，對由足尾銅礦的運營所造成的土地銅污染事件進行調查。[[26]](#_26__Qing_Can_Yue_Ben_Shu_Di_Si)當時，天皇命令改善礦山的條件，并警告經營者說，如果違抗命令，從今以后他將被禁止從事進一步的開采作業。但是，這些命令并沒有得到嚴格實施。污染在繼續，礦工對工作條件愈發不滿。

這也使天皇回想起了礦山糟糕透頂的情況。1901年12月，已從眾議院辭職的田中正造為抗議政府對結束銅污染的請愿漠不關心，在天皇從議會返回皇宮的途中，不顧一切地試圖將請愿書扔進天皇的馬車里。警衛隊制止了田中的行為，并逮捕了他，但這沒能結束對污染發起的抗議活動。

抗議活動合情合理，但由于時機尚早而徒勞無功：那是一個日本不惜一切代價地要成為先進工業大國的時代。對天皇和政府其他成員來說，足尾地區的礦工和農民所遭受的傷害，從國家角度來看似乎不值一提。在1907年鎮壓暴亂的過程中，有八十二名礦工因犯有煽動暴亂罪和破壞礦山財產罪被送進了監獄。同年6月，愛媛縣一個銅礦的礦工因薪資減少發生暴亂，但也被軍隊鎮壓了下去。7月，福岡縣的一個煤礦發生瓦斯爆炸，造成四百二十多人喪生。天皇和皇后向福岡縣撥款一千二百日元，用于救助遭受不幸的災民，天皇還派遣侍從視察情況。[[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這些相繼發生的事件都使那個時代籠罩在了陰郁的情緒之下。



嘉仁皇太子在朝鮮

不過，日本與外國的關系總體上是良好的。3月，日本與俄國簽署了一份通商條約，這是兩國走向和解的第一步。8月，在視察樞密院時，天皇頒布詔書，稱他期待消除與俄國產生沖突的根源，希望兩國恢復和平關系。與俄國簽訂的新的通商條約包含一個秘密協議，協議規定：日本尊重俄國在滿洲北部的權利，俄國尊重日本在滿洲南部的權利。[[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緊接著，天皇頒布敕諭，宣布與俄國恢復友誼。

8月，伊藤博文暫時從韓國返回日本，收到了天皇稱贊他簽署日韓新條約這一功績的詔書。天皇說，伊藤“鞠躬盡瘁”，成功并完美地實現了他希望維持遠東和平以及援助韓國的愿望。9月，伊藤被升為公爵。[[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

8月27日，大韓帝國的新皇帝純宗正式即位。其弟親王李堈（日本稱其為“義親王”）英俊瀟灑、放浪不羈，本應被冊封為皇太子，但他的行為過于離譜，以致由他的弟弟李垠（英親王）于8月7日取代他成為皇太子。在李垠被冊封為皇太子后，伊藤博文提議將這個十歲大的男孩送去日本留學。盡管伊藤從來沒有明說，但韓國皇帝意識到此舉是要將皇太子作為人質。[[30]](#_30__Pian_Ye_Ci_Xiong____Li_Zhao_1)為了推動兩國的友好關系，伊藤還懇請日本皇太子訪問韓國。盡管明治很熱情地歡迎李垠來日留學，但剛開始出于安全隱患的考慮，他反對送嘉仁去國外，然而，伊藤用性命起誓說，他將會為皇太子保駕護航。最后天皇答應，但前提是由威仁親王陪同皇太子前去。

伊藤匆匆趕回漢城覲見純宗皇帝，他將日本皇太子即將進行的訪問告訴了純宗，并講述了送韓國皇太子赴日留學的具體計劃。10月16日，皇太子嘉仁在威仁親王、前總理大臣桂太郎、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和其他高層政要的陪同下抵達漢城。這次訪問雖被解釋為向韓國表示友誼，但實際上是為了讓韓國皇帝無法拒絕讓李垠赴日留學。[[31]](#_31__11Yue_19Ri__Han_Guo_Huang_D)當年晚些時候，經純宗要求，在獲得明治天皇的恩準后，伊藤成為了韓國皇太子的太子太師，也正是由伊藤于1907年12月護送李垠前往日本。[[32]](#_32____Ying_Qin_Wang_Li_Yin_Chua)

在1907年，也許對明治造成最直接、最強烈影響的事件，是10月他的生母中山慶子過世。這不是她第一次患病。歐文·貝爾茨醫生在1893年11月28日的日記中提到，他曾給天皇的生母進行檢查，當時她患有胃病。1900年1月20日，他描述了一個更加嚴重的疾病：

祈禱天皇的生母好運。這個年邁的女人目前陷入了最壞的境況，發著高燒，出現肺炎，宮中侍從問我，她是否還有好過來的機會。我說，如果她能挺過兩天以上，那么她有希望渡過難關。很顯然，他們向天皇誤傳了我的話。兩天后，當御醫岡玄卿露面，提交檢查報告時，他發現天皇守候在旁。天皇向他點頭，說道：“朕知道，太好了，她得救了。”岡玄卿啞然，不知道說什么好。但他很高興地告訴陛下，說她肺部的陰影確實變小了。天皇回答說：“貝爾茨說如果她能挺過四十八個小時以上，她就會康復。他是這么說的！”岡玄卿說，或許侍從誤傳了貝爾茨的話。但天皇仍堅持自己的意見。

事實上，他生母的情況正在好轉。[[33]](#_33__Erwin_Baelz_Awakening_Japan)



明治天皇的生母中山慶子

雖然貝爾茨醫生用幽默的語氣講述這個軼事，但它很令人感動，因為天皇很少表露自己的情緒。顯而易見，他非常關心生母的病情，當貝爾茨說，如果她能熬過兩天以上，那么就有可能康復時，天皇的掛慮使得他將這句話理解成如果他的生母能挺過兩天以上就一定會康復。御醫岡玄卿描述了明治等待著四十八小時過去、默默守候在旁的情景。這段描寫很吸引人，因為在那一刻，他似乎忘記了自己是天皇，僅僅表現得像一個兒子。

1907年10月4日，天皇從岡玄卿那里知道，中山慶子的肺炎很嚴重。皇后當下決定前去探望慶子，但她先派典侍柳原愛子前去服侍這個深受疾病折磨的女人。為什么選擇愛子，皇后沒有說明原因，但也許是因為和慶子一樣，將來有一天愛子也會是一名天皇的母親。

皇后迫不及待地前往慶子的府邸，甚至都沒有等到召集好侍衛。天皇在得知慶子的病情后，也立刻命令軍醫總監、子爵橋本綱常盡一切手段，專心救治他的生母。但是，慶子已經年過七十，而且病情非常嚴重，橋本醫生用盡平生所學救治，但她的病情還是每況愈下，已然沒有了康復的希望。最后，醫生向天皇奏報說他們回天無力。天皇憂心如焚，那些服侍在天皇身邊的人只能用擔心的目光陪著他。

某天早晨，天皇正坐在早餐桌前時，得知了生母病重的消息。他指著每天早餐都要喝的牛奶對皇后說：“人言一位（中山慶子的頭銜）今飲食不通咽喉，然若此物或可咽下。”他從桌上的三瓶牛奶（每瓶都裝有二百五十毫升左右）中拿起一瓶，遞給皇后。皇后一抵達病房，便拿出牛奶，遞給慶子，并重復了天皇的話。慶子極力控制自己的激動情緒，將牛奶喝得一滴不剩。

這個軼事（甚至在關鍵細節上）聽起來似乎是真的。雖然沒有明確寫出，但我們知道即便在生母的彌留之際，天皇也不能自由地前去探視。他曾在嫡母（皇太后）臨終前前去探望，并表達了內心的深厚感情，但天皇卻不能去探視自己的生母，因為中山的地位不夠高。誠然，如果他非要去探視的話，沒有人可以阻止，也不太可能有人會說出勸誡的話。然而，明治無法違背他所信奉的天皇必須行為舉止得體的準則。結果，他讓自己受到了良心的譴責。幾年前，貝爾茨醫生在日記中寫道，盡管天皇每年都會鄭重其事地多次去探望他的嫡母，但他卻不能自由地看望自己的生母，因為她只是一個臣民。他評論道：“多么奇怪的禮儀規矩啊！”[[34]](#_34__Qing_Can_Yue_Ben_Shu_Di_Si)天皇不能違背禮制規范，但在生母的臨終之際他應該特別想見一面吧。

10月5日凌晨，中山慶子過世，享年七十三歲。20日，天皇和皇后為葬禮資助三萬日元，為承認慶子的功勞，他們還補贈了一萬五千日元。皇太子和皇太子妃捐贈了一萬日元，四位內親王捐助了五千日元。

葬禮于10月14日舉行。天皇派遣侍從北條氏恭代他前去中山慶子的靈柩前哀悼。當天晚些時候，氏恭來到護國寺（一個與皇室關系密切的真言宗寺廟）進行禱告。天皇還向護國寺贈送了楊桐樹枝，放置在佛壇前。前一天，天皇已經送來了七個供品，即向神道教的神靈祭拜用的食物和水酒。神道教供品和佛教圣壇相結合，表明天皇在統治初期頒布的“神佛分離令”結束。也許兩種宗教相結合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神道教的葬禮不太受歡迎。[[35]](#_35__Guan_Yu_Shen_Dao_Jiao_De_Za)

雖然皇室和佛教之間的關系已變得岌岌可危，但還不能完全切斷二者的關系，因為皇室的陵墓（包括孝明天皇陵）均位于京都的泉涌寺，曾為明治天皇生下兒女的兩位過世的典侍葬在了護國寺，天皇的所有其他側室最終都將葬在佛教的寺廟里。中山慶子的葬禮還出現了一個非宗教元素：按照天皇的命令，送葬隊伍包括一個大隊的儀仗兵。

中山慶子留存的信件表明，盡管出生在一個有名的貴族家庭，但她并沒有受過教育。她大概沒法弄明白她的兒子成為天皇后日本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從所有的描述來看，如果她不同意天皇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會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天皇。天皇按照她的意見去做或許是害怕遭到她的斥責，不過這種態度不僅僅停留在尊重這種程度，在孩提時與慶子建立起來的感情貫穿了他的一生。在垂暮之年，為了見到兒子，慶子常常參內。盡管天皇不太喜歡會見任何人，但見到慶子時他總是很開心。[[36]](#_3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6)



伊藤與韓國皇太子李垠

1907年11月，在中斷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后，天皇恢復了他的一個愛好——觀看陸軍演習。該年的演習在栃木縣舉行。天皇乘坐火車前往演習地點，在沿途的各個停靠站點（通過火車車廂的窗戶）接見了前來歡迎他的當地官員。對于在天皇統治的四十年間因為生活發生變化而感到欣喜的所有民眾來說，這是一個喜慶的場合。每一個村莊都懸掛著紙燈籠、旗幟、紅白彩旗，鋪上了供天皇行走的白沙，架起了用綠葉搭成的拱門。

此次演習在天皇的命令聲中結束，隨后舉辦了包括貴族、大臣和軍事人員在內的四千八百人參加的宴會。天皇心情大好，賜給其中的六十人清酒。[[37]](#_3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7)

12月7日，在伊藤博文的護送下，韓國皇太子李垠抵達下關。宮內大臣巖倉具定前去迎接，并陪同皇太子前往東京。在京都停留片刻后，他們于12月15日抵達東京。威仁親王和年幼的韓國皇太子同乘一輛馬車，一同抵達他將下榻的芝離宮。當天下午，李垠進宮謁見。天皇甚至走到鳳凰之間的門口歡迎李垠。與天皇和皇后交談中，李垠說他遵照韓國皇帝和皇后的旨意前來日本留學，懇請天皇萬事多多指教。

午餐后，李垠向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獻上了從韓國帶來的禮物，包括一支玉笛、一張虎皮和一個繪有云鶴圖案的瓷瓶。12月20日，天皇進行了回訪，去芝離宮看望李垠。他對李垠說，李垠在日本停留的時間如此短暫，讓人感到遺憾，[[38]](#_38__Zui_Chu_Ke_Neng_Da_Suan_Ran)但他希望李垠能夠充分利用這些時間。他一面說，一面親自向李垠贈送了一塊刻有皇室的菊花紋樣的金表。他說李垠應該用這只表來記錄下在日本的學習時間。李垠看起來十分高興。

12月19日，韓國皇帝派遣的使者抵達日本。這是為了對天皇派遣陸軍大將長谷川好道代表天皇參加他的即位儀式表示感謝。這名使者是韓國皇帝的伯父，他帶來了韓國皇帝的一封信，這封信以晦澀難懂的語言向明治天皇表達了欽佩之情，并表明了希望繼續維持兩國友誼的愿望。很顯然，韓國皇帝沒有意識到，不出數年，他的王位將會斷送在這位他用過分恭維的語言稱贊的君王手上。

1. [[1]](#_1_57) 當我于1963年訪問馬達加斯加時，得知日本被譽為“自由之邦”。當時馬達加斯加雖然已正式宣布獨立，但法國人仍控制著無線電。他們很想播放我的講座，但在獲悉它與日本有關（這是一個危險的話題）之后就取消了。

1. [[2]](#_2_57) 《有島武郎全集》，第475頁。

1. [[3]](#_3_57) 《石川啄木全集》第五卷，第118頁。

1. [[4]](#_4_57) 這首詩由早稻田大學的教授阿瑟·勞埃德（Arthur Lloyd）翻譯后，呈遞給總統看（千葉胤明，《明治天皇御製謹話》，第203頁）。

1. [[5]](#_5_57)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一卷，第638頁。

1. [[6]](#_6_57)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一卷，第613頁。詳細描述見《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56—457頁。

1. [[7]](#_7_57)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二卷，第732頁。

1. [[8]](#_8_57)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78頁。

1. [[9]](#_9_57) 松下芳男，《乃木希典》，第188頁。

1. [[10]](#_10_57) Oka Yoshitake, “Generational Conflict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Conflict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The Neglected Tradition , ed. Tetsuo Najita and J. Victor Koschmann, p. 199.

1. [[11]](#_11_57) Oka Yoshitake, “Generational Conflict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Conflict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The Neglected Tradition , ed. Tetsuo Najita and J. Victor Koschmann, p. 207。

1. [[12]](#_12_57)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68頁。

1. [[13]](#_13_57) 根據侍從坊城俊良的描述，天皇僅向三個日本人賜過座：熾仁親王、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宮中五十年》，第17頁）。

1. [[14]](#_14_57)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69頁。載澤獲得的是勛一等桐葉章,其他清朝代表獲得的是較低等級的勛章。

1. [[15]](#_15_56)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72—474頁。

1. [[16]](#_16_56)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01—502頁。3月27日，天皇令牧野伸顯接替西園寺擔任文部大臣。5月19日，林董接替西園寺擔任外務大臣。

1. [[17]](#_17_56)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35頁。

1. [[18]](#_18_55)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86頁。

1. [[19]](#_19_55)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643頁。

1. [[20]](#_20_54) George Trumbull Ladd,Rare Days in Japan , pp. 18-22.

1. [[21]](#_21_54) George Trumbull Ladd,Rare Days in Japan , pp. 339-340。如需了解對拉德為日本教育做出的貢獻所進行的估算，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96頁。

1. [[22]](#_22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661頁。

1. [[23]](#_23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54頁。

1. [[24]](#_24_51)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26頁。

1. [[25]](#_25_51)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671—678頁。

1. [[26]](#_26_51) 請參閱本書第四十八章。

1. [[27]](#_27_50)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49頁、第778頁。

1. [[28]](#_28_47)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73—776頁。

1. [[29]](#_29_47)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77—778頁。“kōshaku”是華族中的最高爵位，譯成“公爵”。

1. [[30]](#_30_45)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55—256頁。

1. [[31]](#_31_43) 11月19日，韓國皇帝向其國民頒布詔書，解釋為什么送皇太子赴日留學。他列舉了歐洲將年幼的皇儲送到國外學習的做法，并提到有時候會讓這些王子加入其他國家的軍隊。他說，他把李垠的教育托付給明治天皇（《英親王李垠伝》，第70頁；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56—257頁）。

1. [[32]](#_32_42) 《英親王李垠伝》第7頁轉載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顯示伊藤身穿海軍制服，李垠穿著日本的羽褂和袴。同一頁還刊載了李垠穿著韓國陸軍軍官的制服，但佩戴著日本勛章的照片。

1. [[33]](#_33_41) 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17.

1. [[34]](#_34_41) 請參閱本書第四章。

1. [[35]](#_35_38) 關于神道教的葬禮，請參閱Helen Hardacre,Shinto and the State , pp. 34, 47。她寫道，“對于神道教的神職人員來說，葬禮是一個大問題，因為他們認為死亡是不凈之物，但是，從舉辦葬禮和祭祖儀式中獲得的收入極大地推動了他們打破這一禁忌”（p. 47）。

1. [[36]](#_36_37)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803—805頁。

1. [[37]](#_37_33)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835頁。

1. [[38]](#_38_28) 最初可能打算讓李垠在日本待較短時間，但事實上，李垠和一名日本公主結婚，直到1963年才回到韓國并定居。他于1970年在韓國逝世。

# 第五十八章 伊藤遇刺



1908年在傳統儀式中拉開了帷幕，但天皇只是最低限度地參與了這些儀式。1月6日，為天皇舉辦了三場講座，第一個關于《漢謨拉比法典》（西學），第二個講授的是朱熹的《中庸集注》（漢學），第三個講解了《古事記》中的文章（國學）。無論這些講座是否引人入勝，天皇應該都會聽得聚精會神，但他可能會認為第二天的活動更加合意。

這一天從韓國皇太子李垠（與各類韓國和日本政要）進宮朝賀新年開始。天皇向李垠贈送了玩具馬樣式和船錨樣式的置物架各一個，皇后向他贈送了一個法國產的帶有人物雕像的鍍金鐘。[[1]](#_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3)與天皇和皇后平常向忠貞的臣民（無論其年紀多大，有何愛好）賞賜的鮮魚或清酒不同，這些禮物顯然是為了讓這個十一歲的男孩開心。天皇對待這個外國皇太子要比對待自己的子女更上心，因為他認為這是國際禮節所要求的。但是，或許他的仁慈間接說明了他對自己的兒子與李垠不太一樣而感到遺憾。

1月20日，為躲避東京的寒冬，天皇的兒子——皇太子嘉仁——離開東京，前往氣候溫和的葉山海岸。身體虛弱的皇后也因為相同的理由前往沼津，從1月12日一直待到4月14日。李垠仍留在東京，盡管天氣寒冷，他仍然勤勉用功地專心于學業，天皇為此感到高興。1月29日，當李垠進宮謁見時，天皇對他說：

聞殿下滯在東京以來，不拘氣候風土殊異，身體極健全，朕甚歡喜。日本語之習得日日進步，映眼事物與自國之異同，必辯知許多，望將來更益勉勵，學業通達。[[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天皇還向純宗皇帝修書一封，告知他正竭盡全力確保韓國皇太子在學業上有卓越表現。[[3]](#_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2)2月9日，李垠從芝離宮搬進了位于鳥居坂的府邸。趁此機會，天皇、皇后和皇太子贈送了一些禮物。5月，天皇向李垠贈送了一套板球用具和一個書柜。[[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

日本和韓國宮廷互通書信，交流李垠在學業上所取得的進步，偶爾也會有韓國官員訪問日本，核實皇太子的教育是否以令人滿意的方式進行。日本盡一切努力讓韓國人相信自客居東京時起，李垠過得很開心，受益頗豐。這是他們意圖使日本和韓國走得更近的遠景計劃的一部分。

天皇不斷收到熱情洋溢的奏報，盛贊兩國合作體制成功，但他似乎并沒有完全相信。當伊藤博文于3月底返回韓國時，天皇派了一名官員與伊藤一同前往，命令這名官員為他提出的下列問題找到答案：

一、在伊藤回到日本期間，副統監曾禰荒助所治理的韓國是否出現了停滯？

二、韓國皇帝和太上皇對曾禰的信任達到何種程度？

三、韓國內閣的親日派勢力如何？

四、內閣中的部長均為韓國人，所有副部長和局長都為日本人。這是否意味著部長只是有名無實？副部長是否以強制專橫的手段行事？部長和副部長是否協調地開展合作？

五、一般韓國人對曾禰有多少信任？

六、各級韓國民眾對皇太子李垠長留日本有何反應？

這名官員花了大概一個月的時間在韓國調查這些事情，5月初，他回到日本向天皇進行了匯報。[[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

當然，天皇不太可能被告知韓國與日本的關系正在惡化、曾禰沒能贏得韓國人的信任。但事實上，天皇提出這些問題，表明他不愿意輕易相信幕僚們向他提交的樂觀報告。

天皇的質疑無疑是對的。韓國不斷爆發反對日本統治的暴力活動，日本軍隊不斷鎮壓。5月，伊藤博文給陸軍大臣寺內正毅發電報，請他派遣更多日軍到韓國。這一事件引起了天皇的重視，他告訴伊藤自己同意向韓國再派遣軍隊，并希望伊藤能利用這些軍隊盡快平息騷亂。[[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1)

10月13日，天皇頒布詔書，對日俄戰爭后國民精神逐漸松弛，尤其是風俗習慣中表現出的輕佻浮薄傾向表示擔憂。在詔書的開篇，他十分肯定地說道，東西方文明日趨相依對雙方都有利，并期待通過和外國修好國交，構建友好關系來享受這一益處。不過，他指出，在日俄戰爭結束后的短暫期間出現了國民精神松弛的現象。他力勸所有日本人忠實勤儉，奮起圖新，上下一心，不懈努力。[[7]](#_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3)

我們已經提過日俄戰爭后日本人流露出苦悶的情緒，而這種情緒似乎已經引起了天皇的重視，盡管他并沒有將此解釋為對現狀感到沮喪或幻想破滅，而是將此視為一種被膚淺的享樂行為所吸引的精神萎靡。他似乎在問，為什么日本民眾不（通過更加勤奮的工作）對他們目前與其他國家的人民共同沐浴的恩澤表示感激。

11月，天皇前往將舉行陸軍和海軍演習的奈良縣和兵庫縣。在奈良，軍演的大本營位于奈良俱樂部，這里的條件與早前進行軍演的簡樸條件大不相同。演習持續了四天時間，十八個國家的武官出席。這次演習的一個特征是可以在《萬葉集》中聞名遐邇的大和三山上觀摩。天皇在耳成山的觀察哨觀看了軍事演習。身處歷史古跡之中，他并沒有公開表現出喜悅之情，倒是他的那些隨從人員認為耳成山距離神武天皇陵（該陵墓坐落在大和三山中的畝傍山西北）不太遠，揣摩著天皇可能想去陵前祭拜，因此，提前做了準備。但是，當天皇并沒有像他們所期待的那樣下令前去陵前祭拜時，一名隨從明確詢問天皇的意愿。天皇回答說，僅僅因為皇陵恰巧在附近就前去祭拜，這是大不敬：“以事之序而拜皇陵，非禮恭之所為。朕今次為大演習統監來此地，參拜之事他日駕幸。”據說，這名隨從因為自己嚴重誤解了天皇的意愿而十分不安。[[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

大概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天皇不打算參觀法隆寺或該地區的其他著名寺廟（也可能是他對佛教漠不關心），但他派了一名武官前往談山神社，并派另一名武官去著名的忠臣北畠親房的陵前敬拜。他從奈良前往神戶，并在那里觀摩了海軍演習。盡管這場演習無疑比他前日觀摩的那場更有趣、更賞心悅目，但他偏愛陸軍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演習結束時，他大概松了一口氣。[[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1908年不是一個特別激動人心的一年，但也不乏一些私人事件。4月30日，天皇的長女昌子與恒久親王結婚。天皇在宮中接見了多位著名的外國人士，包括偉大的德國科學家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畫家橋本雅邦、法官兒島惟謙和創建過蝦夷共和國的榎本武揚都在該年過世。日本政府也收到了外國君主逝世的消息，例如葡萄牙國王卡洛斯（死于暗殺）、瑞典國王奧斯卡二世（在經歷了長久的和平統治后）、清朝的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在經歷了特別災難性的統治后）。7月，總理大臣西園寺辭職，桂太郎再次接任這一職務。在向天皇提交的政治觀點聲明中，桂太郎警告說要提防社會主義的蔓延。[[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不過對于天皇來說，這一年最難忘的一件事是他的替身兒子李垠的出現。

翌年，也就是1909年，在按照慣例舉行的儀式中拉開了帷幕。韓國皇太子李垠在鳳凰之間和日本皇室成員一同參加了新年慶賀儀式，為這一年帶來新的色彩。這可能表明日本政府進一步打算合并韓國，不過也可能只是天皇頗為喜歡韓國皇太子罷了。

2月22日，韓國宮內府大臣閔丙奭抵達東京，下榻在都會大酒店。25日，他和另外四名韓國官員在伊藤博文的陪同下參觀了皇宮，并在鳳凰之間覲見了天皇。閔丙奭帶來了韓國皇帝的一封信，信中皇帝對自己在巡幸韓國邊遠地區時收到天皇的鼓勵信表示感謝。這次巡幸是模仿明治在統治早期進行的巡幸，主要目的是讓皇帝了解民眾的生活情況。明治命令日本艦隊的船艦起航駛往釜山，以便韓國皇帝巡游到韓國南部時能夠視察這些船艦。[[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韓國皇帝對這個深深打動他的舉動表達了感激之情。因此，他特意向明治天皇寫了這封信，希望兩國能維持長久的關系，能夠更加親密。

韓國皇帝還在書信中說了很多關于伊藤博文的溢美之詞，他說，伊藤完全了解韓國的情況。從擔任統監時起，已經對韓國政府進行了改革，在眾多方面向皇帝提供幫助。例如，伊藤雖年事已高，但不顧旅途疲勞和寒冷，陪同皇帝巡幸韓國邊遠地區，竭盡所能地盡職效勞。他耐心地詢問兩國的官員和民眾，由此消除了無知的韓國民眾的誤解，這無疑對韓國的日后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韓國皇帝指示閔丙奭對天皇派遣伊藤常駐韓國、高度關注韓國表達無盡的感激之情。[[12]](#_1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2)

純宗皇帝向天皇、皇后、皇太子和皇太子妃贈送了貴重禮物。但是，盡管皇帝說了一堆的贊美之詞、送了一堆的禮物，仍難以想象他會因為伊藤在外交政策和內政方針上提供指導而真的對伊藤心懷感激。他不可能忘記伊藤逼迫高宗皇帝退位的殘忍行為。伊藤的一些改革或許真的有益，但純宗也巧妙地避免提到韓國各地不斷爆發的抗議日本統治的暴力活動。

相比之下，天皇和韓國皇太子的關系極為友好。4月30日，李垠進宮謁見，明治天皇同意接見。這一次，天皇向他贈送了一只銀花瓶和一個望遠鏡。銀花瓶是一個符合傳統習俗的禮物，不過贈送望遠鏡卻是為了取悅這個十二歲的男孩。李垠有事拜托天皇。他說，有八名韓國高層政要前來日本參觀，請求天皇予以接見。這不是那種天皇會欣然同意的請求，但天皇還是立刻答應了。他對這組參觀人員說：“朕依貴國皇太子之希望，今日引見卿等。聞卿等為觀光來游，望充分視察。”[[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天皇的話并不是很客氣。他沒有按照慣常做法說他很高興見到這些參觀者，而是說明了接見他們的原因：韓國皇太子有此愿望。

在治理韓國時，伊藤一定覺得壓力倍增，因為在那里他不僅遭人厭惡，而且還經常處于危險之中。在5月25日向天皇提交的奏折中，他自豪地提到自己在韓國取得的成就，但稱自己任職三年半，感到疲憊不堪，并請求辭職。剛開始天皇沒有答應，但6月14日，天皇接受了辭呈，任命之前擔任副統監的曾禰荒助接替伊藤。伊藤恢復了樞密院議長一職。天皇向伊藤頒布詔書，贊揚他忠心耿耿以及在擔任統監時取得的豐功偉績，還賞賜給伊藤十萬日元，這在當時來說是一筆巨款。皇后向伊藤贈送了兩個銀碗。[[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

7月6日，天皇接見桂太郎，同意了桂太郎就眼前的事情——吞并韓國——所提出的政策。在過去的幾個月，越來越多的日本和韓國的知識分子認為日韓合并無法避免了。3月，在對日本將韓國置于保護之下而獲得的好處進行評估時，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說，為使日本在朝鮮半島建立牢固的勢力，以及為確保成功實現日本的對韓國策，有必要在某個合適的時候將韓國納入日本的版圖。他提議說，政府已考慮將吞并韓國作為最終目標，在此之前，與韓國有關的各項政策都應始終與這個目標相契合。桂太郎接受了這一提議，向伊藤征詢意見。眾人普遍認為伊藤反對吞并韓國，但是，當伊藤回答說他沒有異議時，桂太郎便決定要獲得全體內閣的同意。現在，他又獲得了天皇的恩準。[[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7月，為與曾禰荒助進行職務交接，伊藤在韓國待了一小段時間。20日，他回到日本。天皇向新橋站派了一輛馬車，迎接伊藤的歸來。伊藤所獲得的接待級別僅次于送迎元帥的標準。一個由近衛步兵連隊和騎兵連隊組成的儀仗隊護送伊藤來到皇宮。

7月26日，伊藤被任命為韓國皇太子的太師，明確表明了韓國皇太子對日本的重要性。同一天，曾禰荒助向韓國總理大臣李完用提交了一份關于建立韓國中央銀行的備忘錄。這份關于建立一個中央貨幣機構（即韓國銀行）的協議規定，韓國銀行的所有活動都交由日本政府負責。[[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

10月2日夜晚，伊勢神宮舉行了二十年一次的遷宮儀式[[17]](#_17__Yi_Shi_Shen_Gong_Yi_Zhao_Za)。天皇派官員代他參加，自己仍留在東京，在皇宮里遙拜。這一次，天皇與往日不同，穿上了傳統服裝，所有侍從和文武百官都穿上了祭服。[[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4)盡管多年來天皇一直拒絕參加大多數的傳統儀式，但在神道教的重要儀式上，他覺得有必要表明他虔誠地信奉著神靈。

10月9日，在準備動身前往滿洲之前，伊藤覲見了天皇。16日，他從門司出發前往大連。在大連，他參觀了旅順戰役的遺址。之后他乘坐火車前往哈爾濱。在抵達大連時，伊藤說，此番遠行是為了去之前從未到過的滿洲散心。[[19]](#_19__10Yue_22Ri_De___Dong_Jing_Z)不過，真正目的很有可能是為了就日本吞并韓國與俄國財政部長科科夫切夫（V. N. Kokovtsev）進行商談。

10月26日上午9點，伊藤乘坐的列車抵達了哈爾濱。科科夫切夫登上火車歡迎伊藤的到來。俄國警衛隊沿著車站月臺列隊等候，但從當時拍攝的照片來看，實際上并沒有采取特別的安保措施。[[20]](#_20__Zhao_Pian_Jian_Zhai_Teng_Ch)俄國鐵路警衛隊的榮譽司令官科科夫切夫請伊藤對警衛隊進行檢閱，伊藤答應了。伊藤、科科夫切夫和其他官員一同走下火車，踏上月臺。當時拍攝的一張照片顯示，伊藤（從他的白色胡須中可以辨認出來）舉起帽子，向東清鐵路的長官致意。[[21]](#_21__Zhao_Pian_Jian_Zhai_Teng_Ch)

檢閱完畢，伊藤折返回身，開始和前來歡迎他的、居住在哈爾濱的日本僑民致意。他朝著這些僑民的方向走了幾步，突然，一個身穿西裝的年輕男子從警衛后面躥出來，將手槍對準伊藤，[[22]](#_22__An_Zhong_Gen_Bu_Que_Ding_Na)開了六槍，前三槍打中了伊藤的要害。[[23]](#_23__An_Zhong_Gen_Shi_Yong_De_Sh)伊藤被隨行人員抬進火車，醫生進行了急救，然而半小時后，伊藤死亡。在氣絕身亡之前，伊藤得知暗殺者是個韓國人。據說，他的最后一句話是“這該死的蠢貨！”。[[24]](#_24__Zhai_Teng_Chong_Gong____Yi)

俄國警衛隊很快逮捕了暗殺者安重根，但在被抓獲前，他拼盡全力高呼了三聲“韓國萬歲！”后[[25]](#_25__Zhong_Ye_Tai_Xiong____An_Zh)，人們才知道他是一個韓國人。不能責怪俄國人沒能一眼就區分出他的國籍。他的身高和普通日本人沒什么差別（一米六三），他的相貌讓人很容易地就把他當做一個日本人。為了使自己看起來像是一個前來歡迎伊藤來到哈爾濱的生活富裕的日本僑民，他還采取了非常保險的措施：穿上他可以負擔得起的最好的西裝。[[26]](#_26__Zhong_Ye_Tai_Xiong____An_Zh)

安重根于1879年生于朝鮮的一個先祖可以追溯到第二十六代世祖的兩班（貴族）家庭。[[27]](#_27__Zhong_Ye_Tai_Xiong____An_Zh)他經常使用的別名安應七，得名于他的胸部和腹部有七顆痣。[[28]](#_28__An_Zhong_Gen_Zai_Fa_Ting_Sh)家人希望他能遵循家庭傳統成為一名學者。他的祖父生了六個兒子，全都擅長舞文弄墨，其中，安重根的父親最有才氣。安重根在八九歲時便能閱讀四書和三經，被譽為天才。然而，他并沒有成為一名文人（盡管他在書法方面頗有成就），而是成為了一個活動家。甚至在孩提時，他就被看做神射手。比起書本，他更喜歡射箭狩獵。被捕后，在對他進行第一次審訊時，他說自己的職業是“獵人”。[[29]](#_29__Zhai_Teng_Chong_Gong____Yi)

在等待死刑判決的過程中，安重根在獄中寫下了自己的自傳《安應七歷史》，其中講述了是什么導致他皈依天主教。他的父親對反對知識分子的暴戾的東學黨起義感到憤怒，成立了一支由大約七十名士兵組成的“義兵”，負責保護他們的村莊免遭反叛者的侵襲。[[30]](#_30__Ru_Xu_Dui_Yi_Shi_You_Geng_D)安重根加入了這支隊伍，然而，他們在人數上與東學黨有天壤之別。他寫道，跟他們作戰，就好比“以卵擊石”。不過，這支“義兵”不屈不撓，逐漸在對抗兵力上占優勢的東學黨時贏得了幾場勝利，不料最后卻遭到了新成立的親俄政府的攻擊。[[31]](#_31__Ru_Xu_Le_Jie_Guan_Yu_Dang_S)

逃離這場混戰后，安重根在一個叫威爾海姆（Wilhelm）的神父那里避難。威爾海姆的韓國名字叫做洪錫九。他在威爾海姆的教堂里躲了幾個月。這位神父鼓勵安重根利用這段不得不空閑出來的時間學習天主教教義，安重根聽從了他的提議，將大量時間用來閱讀《圣經》以及和威爾海姆討論天主教的教義。神父最終讓安重根相信了天主教的真理，1897年1月，安重根受洗入教，教名多默（Thomas）。[[32]](#_32__Zhong_Ye_Tai_Xiong____An_Zh)幾年后，他和父親積極傳播天主教信仰，直到逝世時，他都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在他寫給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要求讓他們的長子成為一名神父。[[33]](#_33__Shi_Shi_An_Sha_Hou__An_Zhon)

在講述自己的一生時，他回憶道，他曾跟從神父威爾海姆學習了大概三個月的法語。[[34]](#_34__Zhong_Ye_Tai_Xiong____An_Zh)這是他學過的唯一一門外語。當一個朋友問他為什么停止學習法語時，他回答說：“學日語者，淪為了倭國的奴隸；學英語者，淪為了英國的奴隸。若我學習法語，也無法逃脫淪為法國奴隸的命運。這就是我放棄法語的原因。一旦韓國享威望于世界，世人都將學習韓語。”[[35]](#_35__Zhong_Ye_Tai_Xiong____An_Zh)安重根的這番話或許并非是字面上的意思，或許他與威爾海姆之間有了某些分歧。即使安重根未曾動搖過對天主教的信仰，但他不再相信外國人了。[[36]](#_36__Ye_Xu_Zhe_Ge_Ren_Bu_Shi_Wei)

雖然安重根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但他也曾提出過東亞三國（中國、韓國和日本）結盟的構想。或許這一構想是受“黃禍”論（德皇的邪惡構想）影響而設想出來的相反的觀點。安重根警告要提防“白禍”，指出掠奪成性的歐洲國家突然撲向茫然無助的亞洲國家就是“白禍”的一個例證。如果東亞國家想要結束西方列強的侵略威脅，最好的辦法就是團結起來。尤其是飽受歐洲列強侵略的中國和韓國，必須攜起手來抗擊歐洲列強。如果這兩國攜手，那么歐洲列強將望而卻步，東亞將恢復和平。[[37]](#_37__Zhai_Teng_Chong_Gong____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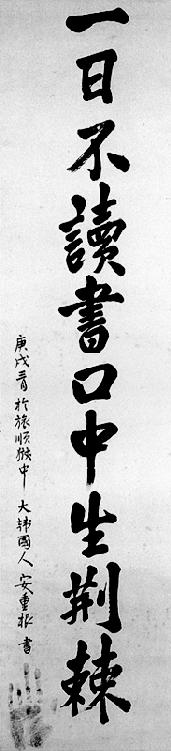
安重根并不反日。毫無疑問，他最崇敬的人就是明治天皇。他對伊藤博文進行了言辭激昂的指控，其中之一是控訴伊藤博文故意欺騙天皇。安重根說天皇想要的不是征服韓國，而是東亞和平及韓國獨立。[[38]](#_38__Qing_Can_Yue_Zhai_Teng_Chon)他從1904年日本向俄國發布的宣戰公告中清楚知道了天皇的意愿。[[39]](#_39__Bu_Guo__Zhai_Teng_Zhi_Chu)在得知日本戰勝俄國后，安重根非常高興，高呼著要和同胞們一起分享代表“白禍”之一的俄國被打敗的喜悅之情。[[40]](#_40__Zhai_Teng_Chong_Gong____Yi)但遺憾的是，日本在俄國全面投降之前就匆匆結束了戰爭。

安重根確信，很多日本人都和他一樣憎恨伊藤博文的政策。他描述了自己與各類日本戰俘進行的交談。其中一位是駐韓士兵，他一邊哭泣，一邊向安重根講述他思念仍在日本的家人。安重根說道，如果東亞恢復和平，韓國就不需要日本的衛隊了。這名士兵表示贊成，認為都是那幫奸詐卑鄙的老臣擾亂了和平，迫使他非常不情愿地來到這個遙遠的國度。他還說，盡管自己一個人根本沒法完成，但還是希望能殺掉伊藤。

安重根與農民、商人、天主教神父等日本人進行了類似交談。他們都對日本的現狀悲嘆萬分。和之前的那名士兵一樣，商人也希望自己能干掉伊藤。安重根從這些人的身上獲悉了他們對伊藤所懷有的強烈仇恨，認為這些人可以代表全體日本民眾。[[41]](#_41__An_Zhong_Gen_Shi_Fang_Le_Su)如果連日本人都想殺掉伊藤，那么很輕易就能想象出因為伊藤的命令而失去家人朋友的韓國人是多么痛恨他了。安重根聲稱要以“大韓義軍參謀中將”的身份暗殺伊藤，因為伊藤破壞了東亞和平，使日韓兩國日漸疏遠。[[42]](#_42__An_Zhong_Gen_Mei_You_Jie_Sh)

安重根仍然希望兩國的關系能更加親密，樹立一個供全世界效仿的榜樣。他勸說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日本檢察官不要擔心他是否會被判處死刑。他的全部要求就是想讓日本天皇知道他為什么要犯下這樣的罪行。[[43]](#_43__Zhong_Ye_Tai_Xiong____An_Zh)他確信，如果天皇意識到伊藤的政策錯得有多離譜，就會了解自己的行動，并會為之欣喜。安重根期望，如果將來按照日本天皇的意愿改善對韓治理方針，那么日韓之間可保萬年太平。

<



安重根書法

安重根將日本人在韓國犯下的所有罪狀都歸于伊藤身上，因此不僅寬恕了天皇（很多罪行都是以天皇的名義實施的），也寬恕了所有日本民眾。一旦日本擺脫了這個使兩國關系惡化的毒瘤，那么有著眾多共同傳統而注定要成為朋友的日韓兩國就沒有理由不會安享永世太平了。在這些論述中，安重根似乎一直沉迷于他所構想的“撒旦伊藤”的畫面之中，他將伊藤視為在《圣經》中讀到的現實版的撒旦。

安重根控訴了伊藤的十五項罪狀，包括謀殺閔妃。其中，最令人驚訝的一項指控是，伊藤在四十二年前弒殺了孝明天皇。他說這在韓國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就算這個傳聞是真的，也很難弄明白為什么安重根會認為弒殺孝明天皇是一項侵犯韓國民眾的罪行。[[44]](#_44__1867Nian__Yi_Teng_De_Zhi_We)安重根的其他指控描述了日本在強迫韓國締結不平等條約后給韓國造成的難以言表的后果。控訴伊藤的這十五項罪狀的最后一項是：伊藤佯稱韓國安寧、繁盛，欺騙日本天皇和其他國家的統治者。[[45]](#_45__Zhai_Teng_Chong_Gong_Dui_Zh)

安重根向韓國人民的最大敵人開了槍，內心無疑很爽快。他剛開完六槍，就被俄國警衛隊制伏并送進了監獄。11月3日的《東京日日新聞》引述了安重根在獄中的話，“我是冒著觸犯重罪的危險，為國獻身。這是高尚的愛國志士所具有的行為。但是，你們所呈上的卻是難以下咽的食物，這并非愛國志士應獲得的待遇。我堅決拒絕食用。”[[46]](#_46____Yi_Teng_Bo_Wen_woJi_tutaN)據這篇文章描述，他連續兩天拒絕吃任何東西。

在俄國人把他交給日本人后，安重根的待遇得到了極大改善。檢察官溝淵孝雄在審訊結束后向他遞金紙嘴香煙，并在隨后的閑聊中表現出了同情。安重根在自傳中記錄道，在他揭露伊藤博文的十五項罪狀時，溝淵大呼：“按照你剛才所說的話，顯而易見，你是東亞義士。我相信，不會對義士判死刑的。你無需擔憂。”[[47]](#_47__Zhong_Ye_Tai_Xiong____An_Zh)

監獄中的其他日本官員也對安重根留下了深刻印象。安重根的態度和行為大多表現出了日本英雄所具有的氣概，似乎引起了他們的共鳴。在新年之際，典獄向安重根和另外兩名被捕的韓國人（其同謀）提供了日本新年的傳統美食。他的書法剛勁豪放，非常受這些看守的歡迎。安重根為他們書寫了五十多張，所有的落款都是“于旅順獄中大韓國人　安重根書”。

12月13日，安重根開始寫自傳，在1910年2月7日開始的審判期間繼續寫。審判時，根據日韓簽署的協約（協約規定自此以后，日本對在國外的韓國民眾進行保護），安重根不得聘請韓國律師辯護。參與審判的所有人——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和翻譯——都是日本人。這對不懂日語的安重根來說特別困難。翻譯員非常謹慎地翻譯，[[48]](#_48__Zhai_Teng_Chong_Gong____Yi)安重根的律師誠懇地希望能被判無罪，[[49]](#_49__Ta_Men_Lie_Ju_Le_Ceng_Yin_Z)但他感到孤掌難鳴。

盡管溝淵再三讓安重根放心，但判決已經事先定好了。2月14日，安重根被判處死刑。[[50]](#_50__Zhai_Teng_Chong_Gong____Yi)這個判決不是由法庭上的工作人員做出的，而是來自外務省。12月2日，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發了一封電報，“此事關于政府，安重根之罪行極重大，由懲惡之精神，應施以極刑”。[[51]](#_51__Zhong_Ye_Tai_Xiong____An_Zh)

雖然安重根已經預料到了會有這樣的判決結果，但在宣布時，他極為惱怒。他曾希望自己不被認為是暗殺者，而是一個為國除敵的戰俘、義士，但這個請求被置之不理。法官平石之前曾向安重根承諾說，即使他被判有罪，但政府也一定會同意緩期幾個月執行，然而，東京方面要求立即行刑。執行死刑的日期定在了3月26日。考慮到上訴沒有用，安重根沒有對判決提起上訴。他所要求的只是希望推遲兩周再執行，那樣他可以完成著作《東洋和平論》。他請典獄栗原貞吉幫忙，雖然栗原對他深表同情，但也無力更改行刑日期。于是，安重根提出了最后一個要求：他請求穿上潔白的韓服奔赴刑場。栗原答應了這一請求。[[52]](#_52__Zhai_Teng_Chong_Gong____Yi)不久后，栗原對未能挽救安重根的性命感到沮喪，辭去了典獄一職，并回到了日本。

3月9日和10日，神父威爾海姆聆聽了安重根的告解，為安重根做彌撒、舉行圣禮。[[53]](#_53__Pian_Ye_Ci_Xiong____Li_Zhao)在生命的最后幾周，安重根繼續寫作。在行刑的當天早晨，他穿上了白色的韓服。當時拍的一張照片顯示他平靜地看向遠方。在白色衣服的襯托下，他那有著一頭茂密黑發的腦袋、眼睛和胡須清晰可見，他的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安重根于3月26日上午的晚些時候被絞死。當天上午10點，一名日本醫生宣布他死亡，遺體被安葬在大概三公里外的一個公共墓地里。

明治天皇對安重根的死有何反應，我們尚不清楚，不過，或許他認為對謀殺他最重視的顧問——伊藤博文——的人處以死刑是適當之舉。盡管安重根提出了懇切的請求，但天皇不太可能得知他暗殺伊藤的原因。無論如何，伊藤的死對天皇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沒有公開表露自己的感情，行動也和伊藤死前沒有什么不同。然而，給天皇當了多年侍從的日野西資博回憶道，天皇在得知伊藤的死訊時極為震驚，好像突然間變成了一個老人。伊藤的葬禮在東京舉行，有四十萬名民眾前來哀悼。

安重根被視為愛國志士和英雄，尤其是在戲劇作品中。在中國的眾多戲劇中，就有一部由周恩來和妻子鄧穎超編寫的《安重根》。在韓國，安重根被譽為民族英雄。哈爾濱成為了韓國人憑吊英雄人物的神圣場所，是重振民族精神的地方。[[54]](#_54__Zhai_Teng_Chong_Gong____Yi)

很快，伊藤被暗殺的消息便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響。第二天，石川啄木在《巖手日報》發表了一篇以下文開頭的文章：

10月26日。天陰。午后3點剛過，飛報至天外到，東京之一隅頃刻陷入驚愕之中。疑惑之聲，驚悼之語，刻刻蔓延。微雨一過，暮色漸起。“號外”之呼聲帶異常之響，充斥都城。人心忽騷然，如百潮一時涌來。不論老幼貴賤，皆齊為此國民之兇報喪心。此實為驚殺日本國民之兇報，又同時為世界之一大事變。而本日此報道自帝國領土之一隅傳至另一隅，隨處皆聽哀慟之聲。

噫，伊藤公逝矣！[[55]](#_55__Yin_Zi___Bai_Hui_Tong_Xin)

啄木繼續回憶伊藤近期訪問東北地區的情景：

余略可想象接此悲報時盛岡人之顏色，彼等迎送公北游未出百日。公辭統監歸故國，尚無席暖之暇，遂同韓太子共巡游東北、北海道，歸來又匆忙就北滿之旅。

啄木在文章結尾寫道：“（公）受數位批評家之非難，然誰可否認明治日本之今日，負生涯一貫為溫厚進步主義者之伊藤公最多！”

1. [[1]](#_1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3頁。

1. [[2]](#_2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3頁。皇太子李垠于1908年11月7日用日語寫的一篇文章的照片，表明他的日語取得了相當顯著的進步（《英親王李垠伝》，第8頁）。

1. [[3]](#_3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3—14頁。

1. [[4]](#_4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7頁。9月4日，李垠訪問關西地區后回到東京，天皇向他贈送了一臺幻燈機和一套板球裝備（第102頁）。我們尚不清楚韓國皇太子是否打過板球。

1. [[5]](#_5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36頁。

1. [[6]](#_6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4—55頁。

1. [[7]](#_7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21頁。

1. [[8]](#_8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38頁。另請參閱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53頁。

1. [[9]](#_9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49頁。書中并沒有說明天皇在這一場合穿的是哪套制服。他通常都是穿那套獨一無二的陸軍制服，但有時候會在勸說下穿上海軍制服。例如，5月15日，他出席海軍大學校的畢業典禮，穿上了海軍制服（第229頁）。

1. [[10]](#_10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5頁。

1. [[11]](#_11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73頁。

1. [[12]](#_12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89頁。

1. [[13]](#_13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221—222頁。

1. [[14]](#_14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231—233頁、第242頁。

1. [[15]](#_15_57)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255頁。另請參閱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62—63頁；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67頁。

1. [[16]](#_16_57)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263頁。

1. [[17]](#_17_57) 伊勢神宮依照造替制度，每隔二十年年就會搬遷一次，屆時重建內宮（皇大神宮）、外宮（豐受大神宮）及所有宮，稱為“神宮式年遷宮”。——譯注

1. [[18]](#_18_56)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283—284頁。

1. [[19]](#_19_56) 10月22日的《東京朝日新聞》摘錄了這番話，見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68頁。

1. [[20]](#_20_55) 照片見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9頁。照片中位于前景部分的是閑聊的俄國軍官，一些人背對著火車，警衛隊的主力距離月臺有一段距離。《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 ）的記者提到俄國警衛隊有些松懈，認為這些士兵來自于以暗殺聞名的國家卻沒有給予足夠的警惕，令人吃驚（第10頁）。

1. [[21]](#_21_55) 照片見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8頁。

1. [[22]](#_22_54) 安重根不確定哪一個日本人是伊藤，因為他甚至連伊藤的照片都沒有見過。他將這個“黃臉白須”、似乎率領著其他人的老者作為目標（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45頁、第192頁）。他在距離大約五米的地方朝伊藤開槍。在暗殺伊藤后，他認為其他人也有可能是伊藤，于是朝另外兩名日本人開了槍，但大概是因為一名俄國警衛干擾到了他的目標，他的子彈射偏了（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35頁）。

1. [[23]](#_23_54) 安重根使用的是一把裝有七發子彈的勃朗寧自動手槍。在朝伊藤開了三槍后，他對著另外兩名日本人開了三槍。在審判時，他被問及是否將最后一發子彈留給自己，安否認自己曾有過自殺的念頭（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45—46頁）。

1. [[24]](#_24_52) 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84頁。這句話的真實性讓人產生懷疑。如果伊藤真的說了這句話，他可能是想說，安重根認為謀殺他就可以阻止日本合并韓國的想法是十分愚蠢的。但是，根據其他史料，伊藤的最后一句話是問誰向他開槍，是否還有其他人被擊中。

1. [[25]](#_25_52)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4頁。目擊者是這樣說的，但安重根在法庭作證時說，他不是用英語或俄語高喊，而是用韓語高喊“大韓萬歲”。“韓”就是指韓國（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0頁）。

1. [[26]](#_26_52)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91頁；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23頁。11月3日版的《東京日日新聞》報道說，安重根的大衣和西裝是法國制造的（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46頁）。為裝扮得像個日本人，安重根還戴了一頂布帽。

1. [[27]](#_27_51)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03頁。如需了解關于安氏家族的詳細描述，請參閱Norbert Weber,Im Lande der Morgenstille , p. 331-349。

1. [[28]](#_28_48) 安重根在法庭上解釋說，三年前，在他成為一名義士時，曾使用“安應七”這個名字（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39頁）。在古代中國，身上有七顆痣被視為偉大人物的標志，大概是因為它們與北斗七星有關。

1. [[29]](#_29_48) 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34頁。

1. [[30]](#_30_46) 如需對義士有更多的了解，請參閱Peter Duus,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 pp. 117, 224-227。

1. [[31]](#_31_44) 如需了解關于當時戰斗的描述，請參閱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08—110頁。

1. [[32]](#_32_43)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18—119頁；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63頁。中野沒做任何解釋地說道，安重根和他的父親安泰勛在通過教義問答的考試后都受洗入教（《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18頁），但是，他之前說安泰勛曾在之前的某個日子受洗入教，教名為“皮特魯斯”（Petrus）（第108頁）。“Thomas”這個名字是用漢字書寫的，這表明這個名字的發音應為“多默”（和法語一樣）。

1. [[33]](#_33_42) 實施暗殺后，安重根的全家逃到了海參崴。長子于1916年12歲的時候死于海參崴（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225—256頁；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21頁）。

1. [[34]](#_34_42)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39頁。盡管神父威爾海姆的名字表明他是一個德國人，而非法國人，但他可能曾教過安重根法語，因為在韓國傳播天主教的活動中，法國傳教士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

1. [[35]](#_35_39)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27頁。

1. [[36]](#_36_38) 也許這個人不是威爾海姆，而是威爾海姆的上級——漢城主教，他很煩安重根。當安重根向主教提交在韓國創建一所大學的計劃時，主教沒有批準，說創辦教育對韓國民眾信仰天主教是有害的（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27頁）。當威爾海姆（安重根認為威爾海姆是站在他那一邊的）同意了主教的看法時，安重根大概感到很失望。如需了解安重根和威爾海姆疏遠的另一種說法，請參閱第144—145頁。安重根非常惱怒，決定直接上訴教皇。但是，在他死前不久，當威爾海姆來看望他時，他感到很高興。一張照片顯示這兩人在一張桌子上交談（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10頁）。

1. [[37]](#_37_34) 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14頁。這些評論請參閱安重根在死時尚未完成的論文《東洋和平論》。

1. [[38]](#_38_29) 請參閱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84頁。

1. [[39]](#_39_27) 不過，齋藤指出，安重根一定聯想到了天皇在清日戰爭時頒布的宣戰詔敕（《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90頁）。日俄戰爭的宣戰詔書存在著顯著差異，它所呼吁的不是維護東亞和平，而是“維護和平和恢復秩序”；不是維護韓國獨立，而是保持“韓國完整”。

1. [[40]](#_40_26) 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78頁。另請參閱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209—210頁。盡管安重根之前將總理大臣李完用在日俄戰爭期間幫助俄國抗擊日本的行為斥責為“忤逆上天的罪行”，但他在后來發生的事情中表示，如果李完用召集一支“義兵”來抗擊日本的話，將是順應天意。然而伊藤的無恥行為截然不同（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60頁）。

1. [[41]](#_41_26) 安重根釋放了所有沒有受傷的戰俘，甚至還送還了他們的步槍（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71頁）。

1. [[42]](#_42_26) 安重根沒有解釋為什么他成為參謀中將，也沒有說明是否還有頭銜比他高的大將。“Uibyong”（日語“ぎへい”），譯為“義軍”或“義兵”，在英語中沒有確切對等的詞語。它指被正義打動的士兵，相對于只是服從命令的普通士兵。

1. [[43]](#_43_23)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4頁。

1. [[44]](#_44_22) 1867年，伊藤的職位還沒有高到能夠面見天皇。此外，在孝明天皇駕崩時，伊藤在長州身患重病，而非身在京都。

1. [[45]](#_45_22) 齋藤充功對這十五項指控都進行了簡短描述，見《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72—175頁。

1. [[46]](#_46_19) 《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46頁。

1. [[47]](#_47_18)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7頁、第13頁。

1. [[48]](#_48_18) 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00頁。

1. [[49]](#_49_18) 他們列舉了曾因政治理想而實施暗殺但被判處較輕刑罰的人士，但沒有提到最近發生的類似例子：1907年，一個叫做達勒姆·史蒂文斯（Durham W. Stevens）的美國人曾被日本人聘請在韓國任職，在前往華盛頓的途中，他先抵達舊金山，在一場記者招待會上宣稱伊藤博文做了很多有利于韓國民眾的事情。第二天，他遭到了兩名憤怒的韓國人的暗殺。其中一位叫常義汗（Chang In—hwan），因為這一罪行被判入獄十五年。如需了解日本報紙報道的謀殺史蒂文斯的文章，請參閱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66—267頁。另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1頁；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78。

1. [[50]](#_50_16) 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03頁。

1. [[51]](#_51_13)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29—30頁。齋藤提到了法官平石與外務省倉知鐵吉之間的對話，倉知奉小村之命前來旅順（《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01頁）。倉知傳達了政府的意見：判處死刑是明智之舉。

1. [[52]](#_52_10) 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24頁。

1. [[53]](#_53_10)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84頁。

1. [[54]](#_54_10) 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31頁、第32頁。

1. [[55]](#_55_8) 引自《百回通信》，《石川啄木全集》第四卷，第192頁。一名韓國學者指出，通常認為啄木的詩《一握砂》所提到的是被執行死刑的幸德秋水，但實際上它抒發感情的對象可能是安重根（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50—151頁）。但是，在《百回通信》中，啄木的評論語氣充滿了震驚，而非對政黨成員表示同情。

# 第五十九章 吞并韓國



1910年8月22日，日本和韓國簽訂協約，正式宣告吞并韓國。十個月前伊藤博文遇刺事件加速了這一進程。韓國人刺殺最受尊敬的日本政治家，無疑加深了日本國內已經存在的一種認識：韓國人目無法紀，無法自治。此外，如果伊藤沒有被暗殺，他也許會制止日韓合并的主張，盡管日韓合并的決定早在一年前就已經被提出來，盡管日本政府只是在等待著一個合適的機會來實施這一計劃。

日本以維護韓國獨立為借口打了兩場仗。但是，較之大多數日本人不感興趣的韓國獨立，日本更在乎的是要阻止清朝和俄國干涉其開發韓國資源的計劃。一些韓國人（如安重根）將天皇在向中國和俄國發布的宣戰詔敕中聲稱的戰爭目標，視為維護韓國獨立。比安重根更受到日本感化的個別韓國人，開始公開擁護日韓合并。

1904年，在日俄戰爭期間為日本人擔任翻譯的宋秉畯成立了一個致力于與日本合作的團體——一進會。這個新成立的團體吸納了與東學黨有關聯的李容九，并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尤其是頭山滿、杉山茂丸和內田良平這些臭名昭著的黑龍會的創始人）合作。[[1]](#_1__Chu_Yuan_Xin_Xiong____Ri_Han)1906年10月，統監府兼職雇員內田成為了一進會的顧問，此后便開始擔任伊藤博文和韓國親日派的中間人。1906年底，伊藤決定利用一進會，于是從次年1月起，統監府每月向該團體提供大約兩千日元的資助金。[[2]](#_2__Sen_Shan_Mao_De____Ri_Han_Bi)

在統監府設置后成立的第一屆韓國內閣由樸齊純擔任領導。雖然受過良好教育的樸齊純支持伊藤提出的改革，并且和伊藤相處融洽，但在得知自己成為了反日活動的主要目標后，他情緒低落。此外，“義軍”的反抗活動日益增加。盡管伊藤請求樸齊純留任，但他仍堅持辭職。伊藤不得不在1907年5月組建了一個新內閣，推選李完用[[3]](#_3__Li_Wan_Yong_De_Zhi_Ye_Sheng)擔任總理大臣，推舉宋秉畯擔任農商工部大臣。

伊藤向新內閣發表的“鼓舞士氣的講話”包含以下內容：

如今日之發展，夫韓國之滅亡非因他國，在于韓國自身也……余助諸君，盡力得韓國之自立，然韓人……尚未覺醒……為獲韓國之存在，最適切緊要方針在于與日本誠實親睦，決心與日本共存在。[[4]](#_4__Sen_Shan_Mao_De____Ri_Han_Bi)

這些話表明伊藤確信與日本合作對于韓國日后的繁榮而言必不可少，但他并不建議立刻合并兩國。不過，他含蓄地警告說，如果對于他為韓國人所做的一切，韓國人未能心懷感激，那么他可能會采取更加嚴厲的政策。

“義兵”在朝鮮半島各個地方發起的反日活動明確表明全體韓國民眾都痛恨日本統治韓國。不過也有一些韓國人認可伊藤的改革，認為與日本合作能給韓國帶來實質性好處。

李完用的內閣成員都是堅定的親日派，但他們之間也有分歧。比如說，李完用仇視一進會。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他是貴族，而一進會是由出生卑微的人領導。然而，伊藤主要關心的問題似乎不是韓國人之間的爭吵或反日活動，而是俄國進行干涉的可能性。1906年，當俄國向漢城任命新的總領事時，理應按照《乙巳條約》（該條約規定由日本管理韓國的外交事務）向日本外務省遞交國書。但是，他們卻把它交給了韓國皇帝，表明其仍然視韓國為獨立國家。[[5]](#_5__Sen_Shan_Mao_De____Ri_Han_Bi)伊藤擔心，這可能意味著俄國并沒有放棄干涉韓國的野心。實際上，伊藤踏上了前往哈爾濱的黃泉路，大概也是希望能夠改善與俄國的關系。

宋秉畯公開擁護日本吞并韓國，認為與不徹底的被保護國狀態相比，合邦可能是一項更加成功的治理韓國的政策。[[6]](#_6__Woonsang_Choi_The_Fall_of_th)1906年11月，得知伊藤小心翼翼地觀望當前局勢的發展，而不愿立即采取行動逼迫韓國皇帝退位，他感到很沮喪。[[7]](#_7__Sen_Shan_Mao_De____Ri_Han_Bi)內田良平認為伊藤無意吞并韓國，于是于1908年加入到了一進會要求日本政府罷黜伊藤的倡議之中。1909年，宋秉畯辭去內閣職務前往日本，力勸總理大臣桂太郎抓緊時間吞并韓國。[[8]](#_8__Chu_Yuan_Xin_Xiong____Ri_Han)伊藤擔心宋秉畯的辭職可能會導致韓國內閣垮臺，于是升任宋秉畯為內部大臣。

總之，在日本作為韓國保護國的三年半中，伊藤對沒能贏得韓國民眾的擁護感到失望，決定辭職。顯而易見，他的漸進政策失敗了。“義兵”的反抗活動日益加劇，加上日本政客的攻擊愈演愈烈（這些政客聲稱伊藤的懷柔政策削弱了日本的威望），使他覺得沒有必要繼續在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職位上浪費時間。然而，即使在1909年6月辭去統監一職后，他對日本政府仍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而他的死則意味著吞并之路的最大障礙被掃除了。

伊藤死后，一進會（此刻由李容九領導）加快了踐行合邦主張的步伐。1909年12月5日，日本媒體報道說，一進會于前日發表了《合邦聲明書》。一進會向統監府和總理大臣李完用提交了建言書，要求他們將建言書轉交給日本天皇和韓國皇帝。[[9]](#_9__Chu_Yuan_Xin_Xiong____Ri_Han)此舉并非僅僅是跟風的機會主義：李容九確信韓國已陷入垂死狀態，命若懸絲，保全韓國的唯一希望在于與日本合并，日韓合邦將造福韓日民眾。他向韓國皇帝的上疏似乎反映了他的真實想法：

一進會長李容九等代表百萬會員二千萬臣民，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大皇帝陛下……今我大韓國，擬之如病人，命脈已絕久矣。臣等呼號之，徒為抱死尸而慟哭……幸我與日本源自同族，枳橘之迥異未生[[10]](#_10__Zhi_He_Ju_Shu_Yu_Tong_Yi_Ke)，今相鬩未甚，廊然撤其疆域，劃除兩鄰之藩籬，兩民自由于一政教下嬉游，均享同居同治之福利，誰敢辯此為兄、此為弟？即日本天皇陛下之至仁，必給同等之民，化育我二千萬同胞……吾蟬脫保護劣等國民之名實，列于新大合眾、世界一等民族之上，則可謂云華始開，景星鳳凰相見之時也。[[11]](#_11__Ri_Wen_Yuan_Wen_Zui_Chu_Den)[[12]](#_12__Gen_Ju_Chuan_Shuo__You_Tan)

12月4日，李容九遞交了自己和“一百萬民眾”署名的建言書，引起了民眾的強烈抗議。他們痛斥一進會成員為賣國賊。[[13]](#_13__Peter_Duus_The_Abacus_and_t)韓國政府對此置若罔聞，統監曾禰荒助告訴日本記者，對于日韓合并，他仍沒有任何明確的話語。他強調，一進會發表聲明一事，日本政府絕對沒有牽涉其中。日本政府認為合邦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只有等到恰當時機，并在做好適當準備后才可以行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一進會并沒有耐心等待，也沒有做好充分準備。[[14]](#_14__Chu_Yuan_Xin_Xiong____Ri_Ha)

李容九聲稱的韓日民眾基本上屬于同一人種、有著相同傳統的主張，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屢屢被日本人重提，來證明征服韓國是正當行為。[[15]](#_15__Ru_Xu_Le_Jie_Dang_Shi_Ri_Be)兩國的正式國界線被取消后，一些日本人甚至稱韓國人為“半島人”。這是一個讓韓國人覺得極具冒犯性的叫法，因為它否認了韓國的存在，認為其只是一塊土地的投射而已。也許李容九所表達的無非是韓國人和日本人都是中華文明的傳承者，即從小接受儒家四書教育的韓國紳士和接受了同樣教育的日本紳士可以毫不費力地“筆談”，而且兩國宮廷遵從的復雜禮節基本上都是以中國的禮節作為藍本。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前東學黨仇外主義的倡導者竟會安之若素地盤算著讓外國人來統治韓國，而這個外國人不僅說著不同的語言，還擁有一個與韓國不同的徹底西化的政府。

對于占領一個和自己一樣有著古老傳統的國家，日本似乎沒有絲毫懷疑這一行為的正當性。現在，韓國的軍事力量弱小，在東亞國家的現代化競賽中被遠遠地甩在了后面。對于韓國抗拒日本送來的現代文明的大禮，日本政府感到很不解，只能將此視為無知。日本領導人中最不同情韓國的山縣有朋稱：“朝鮮未有如我國足以吸收新文明之素養及力量，其國民上下姑息，茍且偷安……”[[16]](#_16__Da_Shan_Zi____Shan_Xian_You)

無疑，吞并韓國是統監府的目標，但其官員決定在日韓合并之前對“義兵”的抵抗進行鎮壓。1909年9月，日本開始在韓國南部進行鎮壓反抗的軍事行動。這場行動采用殘酷的肅清法，取得了徹底的勝利。這一方法此后被全國各地的類似行動采納。很多韓國人直至今日仍抱有的對日本的仇恨之情，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產生的。[[17]](#_17__Sen_Shan_Mao_De____Ri_Han_B)

1910年5月，寺內正毅接替患病的曾禰擔任統監，同時繼續擔任陸軍大臣。7月，就在寺內乘船駛往韓國前不久，總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向天皇奏報了韓國的情況。聽了奏報后，天皇令寺內攜帶一封私信和各種禮物送交給韓國皇帝。[[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5)讓人驚訝的是，就在日本政府要奪去韓國皇帝的帝位之前，天皇還在遵循著東方社會自古與其他君主禮尚往來的做法。也許他還不清楚合邦將給韓國君主造成多么巨大的影響。

甚至在抵達韓國之前，寺內便為就職采取了一系列行動，其中一項是將韓國的警察活動全部納入日本的指揮之下。在被問及為什么日本憲兵數量大大增加時，據說他是這樣回答的：“比起普通警察，使用憲兵來管制未開化的民眾更容易些。”[[19]](#_19__Woonsang_Choi_The_Fall_of_t)

從擔任統監起，寺內便耐心地等待著合適的時機，以便啟動日韓合并機制。8月，這一刻似乎來臨了。寺內收到越來越多的關于韓國各界人士同意日韓合并的報告。但是，仍有一個主要的關注事項有待澄清，即民眾擔心韓國皇室的待遇以及內閣總理大臣和其他高官政要的將來地位。寺內向韓國內閣成員悄悄傳話，解釋說日本天皇寬宏大量，日本政府公正合理，他們不會讓韓國人——無論是皇室成員還是謙卑的農民——陷入困境。內閣成員即便全體辭職，也不會對日本政府的決定產生什么影響。但是，他們的逃避行為，反而會傷害到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國家。[[20]](#_2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1)總理大臣李完用被說動，決定面對危機，而不是逃避。寺內猜測李完用的態度已經改變，于是于8月16日派人去請李完用到統監官邸。

李完用一抵達統監府，寺內便遞給他一份與合并條約有關的備忘錄。備忘錄以我們熟悉的概括性話語作為開篇：日韓兩國國土相連，文化相似，自古以來兇吉利害與共，最終形成不可分離的關系。正因如此，日本敢于冒兩次大戰的風險，犧牲數萬生命和數億財富來保護韓國。自那以后，日本政府雖熱心投入精力幫助韓國，但由于現行保護國的制度過于復雜，無法永久、充分地保護韓國皇室的安全與日韓全體人民的福祉。因此，日本認為兩國應聯合起來，合為一體。

備忘錄繼續說，毋庸諱言，兩國合并不應被視為是戰爭或敵視的結果。相反，這份條約將是雙方帶著友好的感情簽訂的。考慮到目前形勢，韓國皇帝自愿將統治權讓與日本；韓國皇帝將退位讓賢，日后將居閑職；為保護韓國皇帝、太上皇、皇太子和其他皇室成員的安寧，以及為確保所有階層的韓國民眾的福祉，日本認為有必要締結合并條約。[[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最終向韓國政府遞交的合并條約由八條規定組成，主要是向韓國皇帝和貴族做出了確保他們在合并后得到善待的保證。[[22]](#_2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1)總的來說，日本兌現了這一承諾。韓國皇室成員和其他高層貴族獲封日本的爵位，并獲得足夠的資金來按照習以為常的方式繼續生活。[[23]](#_23__1910Nian_10Yue_Xiang_76Ming)退位后，純宗和太上皇高宗繼續住在漢城的德壽宮。1920年，在日本接受優質教育的韓國皇太子李垠與梨本宮親王的長女方子結婚。在他擔任日本軍官的卓越的職業生涯中，李垠最終晉升到第一航空軍司令。

寺內給李完用看的備忘錄包含有較早版條約的條款。例如，備忘錄提議說，從今以后稱韓國皇帝為大公殿下、稱皇太子為公爵殿下，這些爵位可以世襲。備忘錄承認，一些人可能會因為此舉將降低韓國皇帝和皇太子的目前地位而提出反對，但是，這些爵位并非韓國的爵位，而是日本的。此外，如果人們從歷史的角度回顧這一事件，將會發現從日本對韓國提供保護和宣布韓國獨立的時候開始，韓國的國王才當上了皇帝。那些說韓國皇帝的稱號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的，純粹是臆造；事實上，認為韓國皇帝的地位比十三四年前有所降低未必正確。無論如何，日本向韓國宮廷提供的經費絲毫沒有減少。更重要的是，由于獲得了日本皇室成員所享有的特權，韓國皇帝將擁有永久、穩定的地位，并且這一地位永遠不會改變。[[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備忘錄承諾，韓國貴族成員將享有日本貴族的同等爵位，并且由于日本天皇寬宏大量，每年增加向他們提供的歲費。韓國的現任內閣成員將繼續留任，直到任期屆滿為止，之后將獲得足以使他們舒舒服服地度過余生的養老金。普通國民將獲得資助金，以便他們繼續維持生計。[[25]](#_2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在聽取了長篇累牘地講述日本承諾給所有人提供好處的將來政策后，李完用只向寺內提出了兩個請求。第一個是合并后保留韓國的國號，第二個是允許韓國皇帝保留國王的稱號。盡管李完用支持合并，但他明顯擔心若廢除國號和國王的稱號，韓國的身份將喪失殆盡。寺內回答說，保留國號和國王的稱號與合并韓國后的實際情況相矛盾。如果兩國合并為一國，那么使用一個表明該國是完全獨立國家的稱號是不恰當的，并且當日本天皇對合并的國家進行統治時，國王行使不了任何職能。李完用請求與他的顧問農商工部大臣趙重應進行商議，寺內同意了。

當晚，趙重應（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拜訪了寺內，并對寺內說，除非保留韓國的國號和國王的稱號，否則他和李完用拒絕簽約。很明顯，在他們的印象中合并就是兩國合邦，各自保留主權地位，而不是采用像奧匈帝國或瑞典—挪威聯盟那樣的方式。寺內對他們這么不了解日本的用意感到很驚訝，但他最后同意使用原來的國號“朝鮮”。在回答有關保留國王稱號的請求時，寺內讓步，同意稱韓國皇帝為“李王殿下”。“王”這一稱號與“國王”并不一樣。在日本，“王”指的僅僅是親王，但這個讓步似乎滿足了韓國人受損的自尊心。[[26]](#_26__Pian_Ye_Ci_Xiong____Li_Zhao)太上皇高宗稱被為“太王殿下”，皇太子李垠被稱為“王世子殿下”。趙重應同意了這些變更，并告訴了李完用。李完用對寺內說，他確信能夠在第二天的會議上說服內閣接受寺內的讓步。

8月18日，桂太郎向天皇奏報了寺內與韓國內閣的談判。寺內請求政府批準這兩個讓步，承諾一旦得到批準，將在幾天內簽訂條約。[[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天皇恩準了寺內的請求，桂太郎將此電傳給寺內，寺內立刻通知了李完用。他建議李完用采取措施以便正式簽署條約。同一天，李完用召集了內閣，請求他們支持合并。8月22日，內閣召開了韓國皇帝親臨的御前會議。

韓國皇帝、總理大臣、皇室成員代表和其他高層官員參加了這次會議。皇帝宣布將把韓國的統治權讓與日本天皇，在全權委任狀上親自簽了名并加蓋了御璽。他將委任狀遞給李完用，隨后李完用向皇帝呈遞了合并條約，供皇帝御覽，并對條文進行了解釋。皇帝很高興地批準了條約。

會議一結束，李完用便來到統監府，將會議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寺內，并向寺內出示了全權委任狀。他請求寺內簽署條約。在查看了委任狀后，寺內斷定這份委任狀完整、準確。他評論說，對政治局勢采用如此內斂、友好的解決方案，對日本和韓國來說都是一件幸事，這是一個值得慶賀的場合。他和李完用在條約的日本文本和韓文文本上簽了名。[[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8月29日，日本公布了合并條約的全文。天皇發布詔書：

朕念永遠維持東洋之和平、保障帝國安全為必要之事，又常思韓國為禍亂之淵源。前朕之政府同韓國政府協定，置韓國于帝國保護之下，杜絕禍源，以期確保和平。

而來經時四年有余，其間朕之政府銳意改善韓國施政，雖見成績，然韓國之現制尚未足以完全保持治安，疑俱之念每充溢國內，民難安堵。為維持安寧、增進民眾之福利，加革新現制已瞭然不可避。

朕與韓國皇帝陛下共鑒此事態，念舉韓國與日本帝國合并以應時勢要求之外，別無他法，茲決定韓國與帝國永久合并。

合并后，韓國皇帝陛下及其皇室各員受相當之優遇，民眾直接立于朕之綏撫之下，增進其福祉；產業及貿易于治平之下，亦見顯著發達。而東洋之和平，依此愈見鞏固基礎，此為朕所確信無疑之所也。

朕特置朝鮮總督，以承朕命，統率陸海軍，總轄諸般政務，百官有司詳體朕意行事，施設之緩急得其宜，以使百姓永享治平之慶。[[29]](#_2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4)

和以天皇的名義頒布的其他詔書一樣，我們不清楚詔書的哪一部分（如果有的話）是天皇的意思表示。但是，詔書的內容與他對韓國的切身命運所持有的觀點相吻合。置身事外的我們看來，那些決心將韓國合并到日本的人都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鑒于與外國打交道的經驗，那些認為合邦將帶來共同繁榮的韓國人理應預見到，外國總是把為自己謀利放在了給韓國民眾帶來昌盛之前；即便是傀儡領袖（如韓國皇帝）能過著舒適的退位生活，但韓國民眾仍是被剝削的命運。在現代文明的各個方面都領先于韓國人的日本人，必將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一優勢地位。

那些真心相信日本公開宣稱的目標的日本人應當意識到，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擔任總督統治韓國的軍人將會對韓國真正感興趣。他們只不過是將韓國作為日本在亞洲大陸上進行進一步擴張的跳板。盡管很容易就可以預料到合邦的最壞之處，但似乎沒有人擔憂那些方面：在韓國的日本人將在行為舉止中表現出主宰種族的傲慢姿態，而韓國人為了能在日本的統治下求生存，將學會如何取悅日本人。這對當時的韓國來說，是一種羞辱體驗。

即便韓國政府已經預料到了日本人的統治將會給韓國民眾造成怎樣的影響，但在現階段也無力抵抗。合并條約強調給國王和貴族相應的善待，大概反映了日本人的信念：只要滿足了上層階級，即使無知的民眾出現不滿也無關緊要。

不久后，只是作為王的韓國皇帝，就像他在8月29日頒布的詔書中明確表示的那樣，已經無法成為韓國獨立的象征性存在。詔書中說，為實現改革，他竭盡所能卻徒勞無功。由于十二年前飲用毒咖啡，積弱成痼，已經疲憊到了極限，無望恢復元氣。他日夜憂慮，雖力圖為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尋思善策，但無法收拾時局。他認為托大任于他人為上策，于是決定將韓國的統治權讓與一直以來親信依仰的鄰國的大日本皇帝陛下（天皇），借此對外鞏固東洋之和平，對內保全八域之民生。他敦促韓國民眾深察國勢、順應時宜，無須為國家狀況擔憂，只需各安其業，服從日本帝國這一新政權的文明統治，共享福澤。最后他說，今日之舉并非忘卻了韓國民眾，而是出于救活韓國民眾之懇愿。

這封詔書不太可能是純宗皇帝親筆書寫的，但所傳達的強烈感情表明作者非常了解皇帝的感受，甚至一些話也許真的是皇帝自己寫的。純宗身體虛弱、未老先衰、牙齒掉光，但他想讓韓國民眾知道他并非是屈從于日本。他耗盡了有限的精力，為韓國所面臨的危機尋找其他救國方法，然而徒勞無功。[[30]](#_30__8Yue__Li_Wan_Yong_Gao_Zhi_C)

就在同一天，也就是8月29日，日本天皇頒布了一系列的詔書，宣稱從此以后韓國的國號為“朝鮮”，在朝鮮設置總督，對朝鮮實行大赦，向朝鮮皇室賜予大量賞金。其他詔書涉及對日本進口的朝鮮貨物征收關稅，以及與專利、設計、著作權和通商有關的事宜。[[31]](#_3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在經歷了統治者多年松散的統治后，朝鮮民眾開始親身感受到了日本的效率。

明治天皇對桂太郎巧妙高明地處理合并條約一事表示感謝。9月1日，日本采用宗教儀式的形式在皇宮舉辦了合并韓國的慶典活動，巖倉具定代表天皇主持儀式。就在同一天，天皇派遣九條道實前往伊勢神宮匯報合邦一事。第三天，他派遣九條到神武天皇陵匯報；第四天向孝明天皇陵匯報了此事。[[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從奉告消息的場所數量來看，合邦比清日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還要重要。

8月29日，《萬朝報》刊載了一首民間歌謠，歌詞包括“似有相似處，眾人可見乎？西鄉閣下（ Saigō Don）者，正與閻王飲。”[[33]](#_33__Chu_Yuan_Xin_Xiong____Ri_Ha)大約三十年前，西鄉曾倡議征服朝鮮，而如今無需打仗，朝鮮便成為了日本的屬地。因而，想必此刻西鄉正在和閻王爺舉杯暢飲。

日朝關系發生的改變，沒有給天皇對李垠的喜愛之情造成影響，他時不時地向王世子贈送一盒蛋糕或水果。既然王世子不再被稱為“皇太子”，天皇便決定稱其為“昌德若宮”。[[34]](#_3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0)

10月，寺內遞交了一份正式奏折，描述了自他擔任統監到合并韓國期間的各個事件。他對行政機關進行了重組，并簡化了流程。他大幅削減開支，推動區域化管理。采取這些措施使得“朝鮮上下士民皆浴皇化之德澤，感激優待寵裕”。[[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6)

在奏折中，寺內沒有提到朝鮮年號的使用情況，他禁止使用這一年號；此后，所有官方文件都按照明治的統治年份來記錄日期。朝鮮的首都漢城——這個自李氏家族建都時起使用了五百多年的稱呼——被禁止使用，改稱“京城”。[[36]](#_36__Pian_Ye_Ci_Xiong____Li_Zhao)即使是在合邦的早期階段，寺內似乎已經下定決心要摧毀朝鮮人的國民意識。

一些朝鮮人，尤其是上層階級人士，很可能會對日本統治下的政府效率更高和獲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心懷感激，但是，絕大多數朝鮮人對聽命于外國人感到非常不滿。這些外國人將他們視為下等國民，試圖最終剝奪他們的語言和姓名。令大多數日本人感到高興和自豪的是，如今日本天皇不僅統治著日本列島，還統治著臺灣島、庫頁島，現在又統治著朝鮮半島。在遠東，日本所做的一切要勝過英國、法國和美國：英國只擁有香港和清朝的幾個口岸；法國的步履還沒有超出過中南半島；美國在菲律賓的統治飽受動亂的困擾。當時，鮮有日本人意識到了殖民主義是一種毒藥，它所毒害的不僅是被殖民者，也毒害了殖民者。

1. [[1]](#_1_59) 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4頁。另請參閱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8—129頁。

1. [[2]](#_2_59)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9頁。

1. [[3]](#_3_59) 李完用的職業生涯充滿波折。1896年，他是親俄派領導人中的一員，力勸國王高宗到俄國公使館避難。那一年稍晚時候，他被推選為獨立協會副會長。獨立協會是一個親俄組織，反對外國干涉朝鮮事務。1905年，他擔任學部大臣，是“乙巳五賊”中第一個簽署《乙巳條約》（該條約規定將韓國的外交權讓給日本）的人。1906年，高宗拒絕與新政府進行更加積極的合作，他極其生氣，建議日本廢黜皇帝（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5頁）。此舉使得李完用贏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當伊藤于1907年成立新的內閣時，李完用被推選為總理大臣。

1. [[4]](#_4_59)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30頁。

1. [[5]](#_5_59)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31頁。

1. [[6]](#_6_59) 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70.

1. [[7]](#_7_59)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9頁。

1. [[8]](#_8_59) 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4頁。

1. [[9]](#_9_59) 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6頁。

1. [[10]](#_10_59) 枳和橘屬于同一科系，這一科系還包括柑橘。枳也稱為“唐橘”，或簡稱為“橘”。這兩種植物容易被混淆。

1. [[11]](#_11_59) 日文原文最初登載于1909年12月8日的《東京朝日新聞》，轉引自閱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6頁。

1. [[12]](#_12_59) 根據傳說，優曇華（婆羅花）三千年才開一次花，景星（一顆福星）和鳳凰都預示著未來的好運。

1. [[13]](#_13_59) Peter Duus,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 pp. 239-240.

1. [[14]](#_14_59) 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7頁。

1. [[15]](#_15_58) 如需了解當時日本人如何論證日本人和韓國人有著“共同文化”和“共同祖先”，請參閱Peter Duus的絕妙分析，見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 pp. 413-423。

1. [[16]](#_16_58) 大山梓，《山県有朋意見書》，第284頁。相比之下，伊藤對韓國接受現代文明的可能性表現得更加樂觀。他認為，韓國人之所以落后于日本人，并非因為他們天生懶惰，而是因為上層階級腐敗和抗拒變化（Peter Duus,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 p. 199）。

1. [[17]](#_17_58)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78頁。

1. [[18]](#_18_57)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30頁。

1. [[19]](#_19_57) 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74. 崔文衡的資料出自福田東作，《韓國併合記念史》，第597頁。

1. [[20]](#_20_56)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5—456頁。

1. [[21]](#_21_56)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1—452頁。

1. [[22]](#_22_5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61—462頁；譯文見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 p. 136-138。統監寺內向李完用提交的版本只有五條。序言部分只有兩條（韓國皇帝愿意將其統治權讓與日本；日本天皇愿意接受合并韓國），第八條（條約頒布）被遺漏掉了，但余下條款大體相同。

1. [[23]](#_23_55) 1910年10月向76名韓國貴族授予了日本的爵位：6名侯爵，3名伯爵，22名子爵和45名男爵（《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88頁）。同年12月，前韓國皇帝被封為日本陸軍大將；韓國皇太子被封為步兵中尉；放蕩不羈的哥哥李堈和其他貴族被封為中將。也許皇太子是這些軍官中唯一一個真正履行軍事職責的人。至于其他人，均根據級別獲得了良好待遇并配置了武官（第535頁）。

1. [[24]](#_24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2—453頁。

1. [[25]](#_25_53)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3—454頁。

1. [[26]](#_26_53)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93頁。

1. [[27]](#_27_52)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7頁。

1. [[28]](#_28_49)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60頁。

1. [[29]](#_29_49)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64—465頁。

1. [[30]](#_30_47) 8月，李完用告知純宗日本決定與韓國合邦，剛開始，純宗沒有任何反映。他似乎無法對情況做出正確判斷，但是，當李完用說完，純宗張著掉光牙齒的嘴，臉上是苦澀的表情（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89頁）。

1. [[31]](#_31_4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67—468頁。

1. [[32]](#_32_44)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69—470頁。

1. [[33]](#_33_43) 杵淵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89頁。“Enma”是閻羅王。“Don Saigō”是模仿鹿兒島的用法，“don”也是“dono”（殿下）的縮寫，相當于西班牙語的“don”（先生）。

1. [[34]](#_34_43)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03頁。昌德宮是前純宗皇帝在漢城居住的宮殿。

1. [[35]](#_35_40)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00頁。

1. [[36]](#_36_39)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94頁。

# 第六十章 “大逆”陰謀



1911年悄然拉開帷幕。今年天皇六十歲了，有進一步的跡象表明他的健康每況愈下。他原定于1月7日前往青山閱兵場觀摩本年度的第一次閱兵，但在主治醫生的建議下，以健康為由取消了。

1月10日，他和皇后前往鳳凰之間聽了本年度的第一次講座。和往常一樣，講座的內容分別與西方、中國和日本的學說有關。[[1]](#_1__1906Nian_5Yue_30Ri__A_Fang_S)18日，宮中按照慣例舉辦了本年度的第一次詩會。天皇以“寒月照梅花”為主題作了如下詩歌：

月光柔如水

凌空撫梅疏影朦

雖春寒依舊

皎月高懸梅枝舞

點點花開謐清香[[2]](#_2__Ji_Tian_Jing_Yi_Yin_Shu_Zhen)

這首詩很優美，但并不出眾。有太多詩人描繪過初春的梅香。

就在舉辦這次文雅詩會的同一天，大審院對二十四名企圖暗殺天皇的嫌疑犯做出了死刑判決，另有兩名嫌疑犯被判處無期徒刑。下午，總理大臣桂太郎攜帶判決副本來到皇宮，向天皇匯報了案件的情況。天皇帶著顯而易見的悲痛情緒聽取了桂太郎的奏報，并指示桂太郎考慮給予大赦和減免刑期。[[3]](#_3__Di_Yi_Ge_Jiang_Zuo_Yu_Xi_La)

雖然有些難以置信，但天皇這個時候才初次聽說關于幸德秋水和其他被告的審判。從12月10日開始審判后，這件事便成為了日本全國饒有興趣的話題。對此只可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宮中的人了解到天皇不讀報，于是故意沒有向天皇稟報審判的情況。[[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1)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天皇應該不知道策劃刺殺他的事情。要是得知有日本人想要他的命，他一定會非常震驚。明治時不時地聽到有關外國國家元首被暗殺的消息。在最近幾年中，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意大利國王翁貝爾托一世和葡萄牙國王卡洛斯一世都遭襲身亡；[[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1)法國總統薩迪·卡諾（Sadi Carnot）以及美國總統詹姆斯·加菲爾德（James Garfield）和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都遭到了暗殺；朝鮮閔妃慘遭日本浪人殺害；此外，還有刺殺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未遂，甚至刺殺維多利亞女王未遂的事件。[[6]](#_6__Zai_1886Dao_1912Nian_Qi_Jian)就拿更貼近日本的事情來說，1891年，一名日本警察企圖在大津刺殺俄國皇太子尼古拉。

聽到暗殺的消息時，天皇通常會致電吊唁；當他得知暗殺事件的預定目標逃過一劫時，通常會發送慰問電報。但他大概從來都沒有想到過有一天自己也會成為被暗殺的目標。

這次密謀暗殺天皇的事件被稱為“大逆事件”，是由無政府主義者策劃的。他們的精神導師是記者兼翻譯家幸德秋水（1871—1911）。[[7]](#_7__1881Nian_3Yue_13Ri__Ya_Li_Sh)幸德在四國地區的土佐縣中村町長大，很早就展示出不同尋常的學識才華，他在七歲時用漢文作的一首詩被保存至今。[[8]](#_8__Jiu_Zai_Ta_Bei_Zhi_Xing_Si_X)

他在自傳《為何我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中，暗示了少年時代那些可能導致日后自己被社會主義吸引的理由。他帶著怨恨之情回憶了一個不幸事件：明治維新后家道衰落，自己無法繼續學業。[[9]](#_9__Xi_Wei_Yang_Tai_Lang____Xing)他沒有提到另外兩個不幸事件——幸德一歲時父親過世，從此失去父親的保護；他并非武士階層，因此在學校一定會受歧視。

孩提時，幸德就不安分于待在中村町的封閉世界之中。因為沒有錢，幸德在高知中學中村分校撤校后中斷了學業。家人意識到他具有不同尋常的才華，做出犧牲送他去高知縣的私塾就讀，但他討厭私塾的嚴格教育，感覺自己像個“囚犯”一樣。[[10]](#_10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據說，焦躁（和粗劣的食物）讓他患上了肋膜炎，而這是困擾他的眾多疾病中的第一個。在身體恢復后，他回到了高知中學本部，但長期缺課對他的學業造成了不良影響，他決定輟學前往東京。幸德賣書籌集到了遠行所需的路費。1887年9月，他抵達東京，那時剛滿十六歲。

幸德成為寄食學生，并利用空余時間在英語學校學習。三個月后，他和土佐自由黨（一個由具有先進政治主張的高知縣人士成立的協會）的其他成員因違反《保安條例》而被責令離開東京。他們的主要罪行是抗議政府在處理修約事宜時表現得太軟弱。持各種政治信仰的人犯有的這一“罪行”，倘若并非發生在新憲法即將成立之際，或許能夠逃脫懲罰。政府（尤其是伊藤博文）擔心這類抗議可能會威脅到憲法的成功出臺，因此以維護公共秩序的名義頒布了《保安條例》。幸德是被勒令離開東京三年的五百七十名人士之一。[[11]](#_11__Xi_Wei_Yang_Tai_Lang____Xin)

幸德是走著回到土佐中村町的。在路上遭受的寒冷和饑餓，使他對伊藤產生了無法平息的仇恨。一回到家，他就遭到了家人抱怨，說他沒有做任何事情來緩解家里的經濟困境。于是，他再次決定出走，這一次是去中國。但途中路費花盡，于是幸德放棄中國而是前往大阪。結果，大阪成為了一個對幸德至關重要的城市，他在大阪結識了唯物主義哲學家和民權倡導者中江兆民（1847—1901）。根據幸德的證詞，中江是他唯一的老師。十八歲的幸德開始在中江門下當了兩年半的寄食學生。

中江（也來自于高知縣）之所以生活在大阪，是因為他也被責令離開東京。大阪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地方：被驅逐出東京的大多數自由主義或激進主義思想家在此定居，他們討論政治問題、召開集會、出版刊物。

從這時起，幸德開始寫日記記錄自己的想法。1889年2月11日，就在憲法頒布的當天，文部大臣森有禮被一個叫西野文太郎的年輕人刺死。幸德在日記中對憲法只字未提，但他用漢文寫了一段悼詞，對西野表示同情和欽佩，將自己和一名選擇了危險事業（即采用直接行動來完成自己的信念）的暗殺者重合在一起。[[12]](#_12____Bao_An_Tiao_Li____Dui_Lai)幸德對西野的欽佩之情在他日后的政治活動中有所體現，盡管此時他甚至還不是一名社會主義者，更別提無政府主義者了。

雖然大多數日本人都欣喜地歡迎憲法的頒布，但幸德的沉默大概反映出了中江對他的影響，中江對天皇賜予的這份“大禮”的價值提出了質疑，并對那些對憲法可能起到的作用毫無概念，卻對“憲法”這個詞大聲歡呼的日本人的愚蠢嗤之以鼻。[[13]](#_13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

為謀生，幸德曾一度為一名受歡迎的演員寫劇本，其中一部與刺殺森有禮有關。這部戲將內閣大臣的傲慢自大與日本普通民眾的無能為力進行了對比。幸德還開始為政治刊物寫文章。當慶祝憲法頒布的活動在平安無事中結束后，政府解除了將激進分子驅逐出東京的禁令，于是首都又成為了政治活動中心。中江帶著幸德回到了東京。

1890年，幸德年滿十九歲，因沒能通過征兵檢查而無法入伍，這也許是糾纏于身的疾病給他帶來的一個令人慶幸的結果。他在一所政府創辦的英語學校里學習，并于1893年畢業。與此同時，他沉迷上了在吉原尋歡作樂。中江預料幸德將成為一名作家，而非政治人物，但幸德堅稱他打算當一名內閣大臣。[[14]](#_14__Xi_Wei_Yang_Tai_Lang____Xin)

1893年9月，幸德在《自由新聞》謀得一份差事。《自由新聞》是一份沿襲板垣退助的傳統、支持自由主義的報紙，但它被政府買下，成為了政府的機關報。幸德的工作主要是翻譯刊載在英語出版物上的文章。盡管他曾在英語學校閱讀過麥考利、狄更斯和卡萊爾的著作，但翻譯政治急件卻是另一回事。在以后的幾年里，他生動地描述了這份工作有多難。

隨著幸德漸漸地能夠更加熟練地閱讀英文政治著作，他受到了那些作家的影響。在個人回憶錄中他提到自己在職業生涯的早期讀過阿爾伯特·斯卡夫爾（Albert Schäffle）和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作品，但他那時還遠非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1897年，幸德寫的一篇關于皇太后葬禮的文章首次引起了關注。文章抒發了忠于君王的虔誠感情，使得編輯認為幸德是一位模范的日本年輕人，于是提拔幸德寫社論。[[15]](#_15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

第二年，幸德第一次接觸到了社會主義組織。他加入了社會主義研究會，每月聽取并討論與社會主義有關的演講。剛開始，大概是因為他對社會主義的了解有限，幸德是這個研究會的一個不起眼的成員，但在1899年6月25日，他發表了一篇題為《現今的政治社會與社會主義》的演講，引起了關注。不同于與其他演講人以外國社會主義者[如夏爾·傅立葉（Charles Fourier）、路易·布朗（Louis Blanc）、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亨利·喬治]的論文為題，幸德研究的是日本國內的社會主義。[[16]](#_16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

1898年，幸德（作為一名社論作家）跳槽到了東京一家大型的進步報刊《萬朝報》，并為該報寫了五年的社論。他的第一篇社論（發表于1898年2月）采用了一個激進的標題“哀紀元節”。文章開頭寫道：

我國民為憲法發布之音響興奮，忽幻想黃金世界，欣喜雀躍幾近發狂，此實十年以前之近日也。而后歲月雖未久，然專制壓抑之政治依然未變。憲法履遭薩閥之為侮辱，議會履為長閥之為蹂躪，政黨癱瘓，社會日向腐敗墮落。[[17]](#_17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

雖然幸德對政府（尤其是薩摩—長州派系的壟斷）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但他并沒有拋卻加入政黨的希望。11月，他寫了一篇歡迎新的山縣內閣的社論，不是因為他欣賞這個內閣的政策，而是因為隈板內閣的垮臺證實了目前的政黨只不過是徒有虛名罷了。他認為，讓不以“政黨內閣”的虛名欺騙大眾的人來擔任總理大臣是更加可取的做法。幸德繼續呼吁在實現貧富階層收入均等化、普及教育、公平選舉、結束貴族制度、設置遺產稅、貧民救濟法、制定工廠法、壟斷商品和土地國有化等方面進行改革。[[18]](#_18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他似乎仍希望對現有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給廣大的日本民眾帶來裨益。

幸德打算從政、做官。他參加了“普通選舉期成同盟會”，希望建立一個任何人都能夠參與競選的體制。此時，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以憲法為基礎的民主制度，但是，由于參加了社會主義研究會，他的作品開始更加公開地探討社會主義。在1899年9月撰寫的一篇社論中，他承認日本尚未準備好實行社會主義，但力勸讀者在拒絕或排斥社會主義之前先進行認真研究。

社會主義研究會的中心人物片山潛（1859—1933）是日本社會主義歷史中的一個重要人物。片山曾受過良好教育，但他對傳統的東西感到不滿，認為“漢學已是過去之物”、“學漢書亦愚蠢，以詩文不能立生活之道”。[[19]](#_19__Zhe_Shi_Ban_Ben_De_Kan_Fa)1884年，片山在二十五歲的時候前往美國，并在那里待了十一年。他一邊在各種學府學習，一邊盡其所能地維持生計。[[20]](#_20__Da_Yuan_Hui____Pian_Shan_Qi)1886年，在加利福尼亞，他“發現了上帝”，并成為阿拉梅達第一公理會教堂的成員。幾年之后，他自嘲自己只是因為日本的神靈相距遙遠而轉為信仰美國的神靈耶穌，但信仰基督教對他的發展至關重要。片山以神學學士和文學碩士的身份離開美國。不過，比這些學位更有價值的是，他接觸到了先進的新教教會領導人的社會思想，加深了對工人和其他被剝削的社會成員的關注。[[21]](#_21__Ta_Zai_Ao_Ke_Lan_De_Huo_Pu)片山寫道，社會主義是拯救二十世紀社會的“新福音”。

片山于1895年回到日本，開設了日本第一個鄰保館[[22]](#_22__Da_Yuan_Hui____Pian_Shan_Qi)。對窮苦人民的了解無疑加深了他的社會主義信念。清日戰爭結束后的時代特征是工業化飛速發展、工薪階層數量增多、物價上漲、社會發生巨大變革 。但是，無論承受多么沉重的壓迫，工人都沒有途徑來反抗剝削和壓迫。1897年，片山積極創建工會，并成為第一個工會期刊的編輯。1898年鐵路罷工取得勝利，片山聲名鵲起，這也證明了罷工是工人行使權利的有效武器。然而，片山確信，改善工人處境的各項工作應始終遵守法律。他不贊同無政府主義者。

1900年，山縣內閣推動通過了《治安警察法》，其中包含直接影響工會活動的條款。雖然這部法律沒有明令禁止罷工，但它規定將對煽動罷工的人和使用暴力結束罷工的雙方進行懲處。看起來這部法律似乎不偏不倚，但事實上，這些規定和新法類似條款的意圖都是為了控制工會和防止工會舉行罷工。幸德在《萬朝報》上寫了一篇關于新法的社論，認為盡管“暴力、誹謗、強迫、引誘和煽動”都是不可取的，但它們應該被用于工人運動，因為工人“缺乏教育、資金、寫作能力、演講能力、選舉權”。他認為，在與資本家斗爭時，工人們別無選擇，只能求助于將會被視為犯有輕罪的其他手段。

左翼領導人幸德是片山的主要競爭對手，他于1901年發表了一部著作《廿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在序言他謙遜地否定該著的獨創性，聲稱自己所做的只不過是復制了歐美學者已經寫過的內容，但該著作仍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作品。[[23]](#_23__Pin_Min___You_Min_Shou_Rong)他對帝國主義的探討即便不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切實有效的。他對天皇的評論是獨到的：

與德國的年輕皇帝不同，日本天皇不喜歡戰爭，高度重視和平。對于采用野蠻的無益行為戰勝另一個國家，他并不感到高興，所期望的是造福全世界的文化繁榮……他絕對不是所謂的“愛國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24]](#_24__Ban_Ben_Zhi_Chu__Zai_Xing_D)

幸德認為明治天皇只是為了和平、人道和正義才使用軍隊。他確信，較之為了天皇或出于忠誠而開戰，他更贊同士兵為這三個理想而戰。在生涯的這個階段，幸德崇敬天皇。在回應山川均寫的一篇譴責皇太子包辦婚姻的文章時，幸德對有兩三“如此狂暴不敬”之徒感到極其遺憾。他希望民眾和皇室能夠團結起來。[[25]](#_25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

當時，列強鎮壓義和團運動的活動引起了幸德和其他進步作家的關注，他們認為西方列強（和日本）的干預是帝國主義粗鄙行為的實證。幸德深受觸動，寫了四十篇譴責帝國主義和倡導和平主義的社論，這兩大議題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占據著主導地位。

1901年5月，幸德、片山和其他被稱作“社會主義者”人士決定成立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在之前的一年，自由黨垮臺，部分前成員放棄了自由黨的理想，加入了伊藤博文新成立的政友會，從而使得有必要成立一個代表弱勢群體權利的黨派。經中江兆民要求，幸德寫了一篇哀悼自由黨的社論。這篇文章采用民眾廣為接受的精練語言寫成，讓幸德贏得了文學家的美譽。

前社會主義研究會的成員安部磯雄（1865—1949）為新黨起草了宣言。不久后，宣言的大多數主張都得以實現，但在當時，這些主張似乎給政府帶來了危險的革命沖擊。這些主張包括對鐵路實行公有制、開展免費的小學義務教育、禁止婦女兒童在夜間工作、廢除死刑等。[[26]](#_26__Xi_Wei_Yang_Tai_Lang____Xin)宣言一公布，政府便決定取締這一黨派，并查抄了宣言。

據安部稱，警察向他透露說，政府不會禁止成立這個黨派，但前提是要廢除其中的三個主張：呼吁削減或廢除軍備、倡導公民對重大決定進行公投、廢除貴族院。但安部是一名理想主義者，堅決反對更改任何一個字。

內務大臣末松謙澄下達了取締該黨派的命令。[[27]](#_27__Ru_Xu_Le_Jie_An_Bu_Ji_Xiong)與幸德的《萬朝報》關系密切并且熟識末松的堺利彥前去詢問為什么取締該黨派。末松的回答很簡單：“其他國家都被社會黨搞得焦頭爛額，正在盡全力鎮壓。日本也必須全力以赴予以鎮壓。”得知末松的態度，幸德在《萬朝報》上寫了一封諷刺的文章說，如果末松真的想禁止社會主義，他應該將所有社會主義者驅逐出境，燒毀所有相關文件，禁止進口外國書籍。如果他有勇氣、有毅力、有能力這樣做，那或許可以在這一代人中成功鎮壓社會主義。[[28]](#_28__Mo_Song_Ceng_Zai_Ying_Guo_L)

不久后（1901年5月30日），幸德寫了一篇文章叫《日本的民主主義》。在引言中，他引述了明治天皇的兩首短歌：“文于早前著／今朝展卷細品讀／疑從心中來／舉目山川萬民泰／似有惠澤我國哉”和“遍身綾羅緞／為暖我身層覆層／羨煞襤褸衫／試問露臂怯衣單／怎在嚴冬抵風寒”。[[29]](#_29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幸德指出，這兩首詩所要傳達的主旨就是民主主義；沒有力圖按照天皇旨意行事的任何人都是“陛下的罪人”；天皇作為民主主義的化身，十分希望國民幸福，但政府中的一些人只為自己牟私利，斷送了民眾的福祉。他呼吁采用新的原則和新的理念，以適應新的時代。

1901年9月，幸德會見了田中正造——一個反對足尾銅礦污染的勇敢斗士。1900年2月，來自群馬縣和栃木縣的約三千名農民前往東京進行和平示威，但政府命令武裝警察驅散了示威游行，并逮捕了領導者。田中由此認為向政府進行呼吁已是無望，于是決定直接向天皇請愿，希望天皇直接處置。他認為自己無法寫出一篇語言華麗的請愿書，于是向當時的名作家幸德求助。1901年12月10日，田中試圖將請愿書扔進天皇的馬車，但天皇并沒有看到這封請愿書。田中被逮捕，幸德作為共犯也遭到了逮捕。政府不知道該怎樣處置這兩人，最后他們被當成瘋子無罪釋放。[[30]](#_30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

這一事件發生后的第三天，中江兆民死于癌癥。當醫生告訴他只能活一年半的時間時，他決定把余下的時間都用于寫回憶錄。他的書《一年有半》在三天內售出一萬冊，并再版二十二次，可見雖然遭到了政府的鎮壓，但自由主義思想仍然引起了公眾的極大興趣。將中江視為自己唯一恩師的幸德寫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詞，于翌年發表。

1903年，幸德寫了一部名為《社會主義神髓》的著作，闡述了社會主義的原理。在序言部分他承認自己的著作受惠于馬克思、恩格斯等人，其結論認為，一旦社會主義得到貫徹執行，那么自由、友愛、進步和幸福才能堅定地確立。他懇切地希望有良識的志士仁人能夠挺身而出，幫助實現社會主義。[[31]](#_31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到1905年，該著作已經再版七次。

1903年10月，幸德辭去了在《萬朝報》的工作，因為該報的編輯方針從一個允許在版面上發表尖銳觀點的自由論壇，轉變成了支持對俄國采取戰爭政策的政府喉舌。[[32]](#_32__Ru_Xu_Le_Jie_Zhe_Ben_Shu_De)幸德和堺利彥決定出版一個他們可以發表觀點而不必聽從于任何人的刊物。1903年11月，周刊《平民新聞》第一期由平民社出版。[[33]](#_33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平民新聞》頭版刊載了一條公告，說明了周刊的未來方針：《平民新聞》以促進自由、平等、博愛為宗旨，提倡民主、社會主義及和平主義，希望在合法范圍內取得眾多民眾的積極配合，承諾在開展社會主義運動中絕對放棄使用武力。

即使與俄國開戰似乎已不可避免，但《平民新聞》繼續刊登譴責好戰行徑的社論。幸德在一篇文章中質問誰有權宣戰。根據憲法，宣戰是天皇的特權，但在行使這項特權之前，其他人做出了決定——做出決定的并非公眾、議會的當選議員或行政官員，而是“以銀行家為名的高利貸者”。[[34]](#_34__Zong_Gong_Chu_Ban_Le_64Qi)

即使自己的文章無法阻止與俄國發生戰爭，但他繼續通過不懈的努力來撲滅愚蠢的戰爭熱。1904年3月，他發表了《與俄國社會黨書》，將俄國社會黨的成員稱為“同志”，并痛斥了兩個交戰國的帝國主義的貪婪行徑。他對俄國社會黨的“兄弟姐妹”說，兩國民眾有著共同的敵人——所謂的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這篇文章的譯文也被刊登在了英文版的《平民新聞》中，對迅速轉載或翻譯這篇文章的其他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機關報《火星報》稱贊幸德的文章是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文書，并加入到了“打倒軍國主義！”的呼聲之中。[[35]](#_35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

雖然獲得了俄國的鼓勵，但幸德和平民社的其他成員無法對抗席卷整個日本的戰爭熱。3月，幸德發表了一篇題為《嗚呼增稅！》的文章，痛斥為支付戰爭費用而增加賦稅。政府認為這篇文章損害了國家利益、破壞了社會秩序，于是判處《平民新聞》的發行人兼編輯堺利彥兩個月的拘役。這是第一個因開展社會主義活動而被判處拘役的例子。[[36]](#_36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

1904年11月13日，為慶祝創刊一周年，《平民新聞》打算出版周年紀念特刊，并決定在紀念特刊上刊載《共產黨宣言》的譯文。但在特刊面世之前，同屬平民社的幸德秋水、西川光二郎、石川三四郎被訴“紊亂朝憲”。幸德被判處拘役五個月，并處罰金五十日元。刊載了幸德和堺利彥合譯的《共產黨宣言》的《平民新聞》紀念特刊被查抄，幸德和堺利彥為此另外支付了八十日元的罰金。

1905年7月，幸德入獄服刑。他將獄中的五個月用于學習政治學說著作和約瑟夫—歐內斯特·勒南（Joseph-Ernest Renan）的《耶穌傳》（"aid-KJ6"）。能有這么一段不被打斷的學習時間，對幸德來說是因禍得福，但他向來身體虛弱，監獄的生活進一步損害他的健康。出獄后的幸德無法像前同事所希望的那樣重振平民社。在一封于8月10日（日本與俄國在該日簽訂了議和條約）寫給美國無政府主義者阿爾伯特·約翰遜（Albert Johnson）的信中，他透露說，盡管他入獄時是馬克思學派的社會主義者，但出獄時是“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37]](#_37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他還列出了自己應該出國的原因。首先，他想掌握外語，以便了解國際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運動。他還希望拜訪外國的革命領袖，直接從他們的活動中學習。最后，他希望逃到天皇的魔掌觸及不到的、能夠自由地談論天皇的地位以及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地方。[[38]](#_38__Xi_Wei_Yang_Tai_Lang____Xin)

幸德對天皇的態度發生了令人吃驚的轉變，對此他并沒有進行解釋。同樣是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的朋友木下尚江，過去曾批評幸德的做法（即堅持只采用法律手段和對天皇畢恭畢敬）和他的不一致。但現在，由于五個月的獄中生活，幸德的想法已經和他的觀念完全、極其一致。[[39]](#_39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

當幸德還在獄中時，平民社因戰事發展被迫轉變其和平主義的立場。在旅順和奉天戰役獲勝后，日本民眾確信勝利結束戰爭已經近在眼前，因此抨擊戰爭無法引起日本民眾的興趣。日本民眾仍對社會主義充滿熱情，這可以從他們踴躍參加日本的第一個五一慶祝活動看出來，但平民社的財務資助者開始撤資，并且各階層也出現了分歧，尤其是在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和唯物社會主義者之間。甚至堺利彥也決定離開平民社，決定辦一份家庭雜志來謀生。8月27日，幸德向他的同事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說他打算前往美國。9月26日，在慶祝西川光二郎出獄而舉辦了一場宴會后，平民社的所有成員決定解散該社。

1905年11月，幸德動身前往美國。此次旅途的經費和在美期間的生活費用都由朋友和家人提供。在離開日本時，幸德在日記中寫道：

嗚呼，余何故去日本？無他，只無可奈何也。政府之迫害使平民社倒潰后，余之病與貧使余不能為任何事。去八日夜，于同志送別會，木下君送余，有送負傷勇士之感。余非勇士，但確然為敗軍之亡命者，求隱于世間，尋可生活之地。[[40]](#_40__Xi_Wei_Yang_Tai_Lang____Xin)

在抵達美國時，幸德發現自己的名聲已經先行傳開了。他在西雅圖和舊金山受到了曾讀過他的作品，尤其是《與俄國社會黨書》的日本僑民的熱烈歡迎。他頻繁地做演講，據他說，來聽演講的人絡繹不絕。在舊金山，他被介紹給一名俄國婦女。她是一個充滿熱情的無政府主義者。幸德在這名婦女的家中租了一個房間。在給約翰遜寫信時，他說，在獄中他已經成為了一名無政府主義者，但只有在接觸了女房東后，[[41]](#_41__Ru_Xu_Le_Jie_Xiang_Qing__Qi)他才意識到，選舉通常都無用以及有必要暗殺統治者。[[42]](#_42__Ta_Jiao_Fu_Li_Ci__Fritz_Fu)他開始相信，為了推翻殘酷壓迫的政府，為了讓一個沒有政府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一個人都為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和睦工作）誕生，暴力是必不可少的。

在美國的六個月，幸德并沒有遵循他最初向約翰遜寄送的學習方案，但他結識了很多人，并積極參與了美國社會革命黨的創建工作。然而，沒過多久他就發現，甚至在美國，言論自由也是有限制的，他對將日本移民者當做學童或家務工這一種族偏見予以嚴厲譴責。[[43]](#_43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當著名的舊金山大地震發生時，幸德正在那里。他在火災中欣喜地說道：“嗚呼，火！熱情地燒吧！在它所到之處，沒有神，沒有財富，沒有權力。眾多雄偉壯觀的教堂、高聳的市政樓宇、眾多的銀行、眾多的財富，無一例外地被躥起的火苗吞噬。”[[44]](#_44__Xi_Wei_Yang_Tai_Lang____Xin)

在返回日本的船上，平民社舊金山分社的成員岡繁樹告訴幸德，在日本發動革命必須要先推翻天皇的統治。他建議幸德自愿擔任貴族院的警衛，由此伺機接近天皇。

幸德在美國時，日本政壇發生了諸多變化。對社會主義者而言尤為重要的變化是，1905年12月極端保守的桂太郎內閣辭職，在隨后的一個月西園寺組閣。新內閣透露，其承認社會主義是全世界的一股主要潮流，并且不會動用警察力量不分青紅皂白地鎮壓社會主義。這促使一些社會主義者于1906年1月請求政府同意創建日本平民黨，政府認可。另一組人員（以堺利彥為首）請求成立日本社會黨也得到了批準。此時，社會主義政黨在日本合法成立。

然而，幸德對議會社會主義不再有興趣，而是提倡與其相對的“純粹社會主義”，即無政府主義。他沉醉于如舊金山火災一樣的無政府主義革命的火焰之中。在回到日本后，幸德發表的第一次演講讓社會主義追隨者感到震驚和困惑。他力勸采取直接行動，組織工人總罷工，而非采用合法、和平的議會策略。他的強硬態度不免與其他人產生了分歧，尤其是與那些渴望獲得法律認可的社會主義者。

1907年1月，繼承前名的《平民新聞》發刊，印數一萬三千份，定價一錢。該報主張言論自由，并宣稱“不接受對所發表的內容進行干涉、限制或約束”。雖然幸德聲稱他不會試圖迫使任何人接受他的信條，然而不久后，贊成直接行動的“強硬”派明顯占了上風。幸德堅稱，革命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趨勢。如同在證實他的論點一樣，此時日本發生了一系列自發性的罷工，包括足尾銅礦的大罷工。在內務大臣原敬的要求下，礦山的罷工遭到了軍隊的鎮壓。

1907年2月17日，日本社會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東京召開。崇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者與支持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者（包括幸德）之間的嚴重分歧很快就顯露出來。社會革命黨——一個由生活在美國的日本人創建的組織——領導無政府主義者發起抨擊。該黨于1906年12月底出版的一份期刊，對不同國家的統治者進行了猛烈抨擊，其中包括要求迅速推翻代表資產階級的日本天皇的統治。1907年11月，該黨發表了一篇無政府主義政黨成員給日本天皇的公開信《與日本皇帝睦仁君足下》。[[45]](#_45__Donald_Keene_Modern_Japanes)這件事情的發展與幸德不無關系，他在美國時組建了該黨，并且每個月給該黨的期刊撰寫文章。

政府對社會主義者施加了更大的壓力。1907年4月，就在這篇文章出版后的三個月，日報《平民新聞》被迫關閉。直接的原因是山口孤劍發表了一篇名為《踢父母一腳》的文章，激烈地批判父權，呼吁讀者反抗體制。除了政府給社會主義者施加壓力外，幸德與片山之間的對抗也變得越來越激烈。幸德的派別稱為“強硬派”，片山的稱為“緩進派”，凡是無政府主義派別提出的主張，幸德都拒絕向片山的派別做出讓步。幸德為無政府主義進行辯護，認為那不是一個由暗殺者組成的組織，他們的目的是“推翻專制壓迫的根基，在懦夫心中燃起反抗的靈火”。[[46]](#_46__Xi_Wei_Yang_Tai_Lang____Xin)

1908年6月，幸德在土佐中村町養病，“強硬派”的成員在東京舉行了示威游行，舉著印有“無政府”和“無政府共產”等字樣的紅色旗幟。[[47]](#_47__Xi_Wei_Yang_Tai_Lang____Xin)這只是一個相當小的事件，但大多數無政府主義的領導者遭到逮捕，并受到了嚴厲懲罰。這一事件預示著無政府主義者越來越強硬，警察越來越嚴苛。最強烈反對社會主義的山縣認為西園寺在對待激進分子上過于溫和，于是他密謀讓天皇用桂太郎來取代西園寺。山縣的策略成功了：1908年7月，桂太郎受命組建內閣，很快，桂太郎便采取了高壓措施壓制社會主義者。

與此同時，日本到處涌現出無政府主義者的反政府活動。日報《平民新聞》將許多人轉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者，然而，其中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工人或失業者，而非受過教育的理論家。盡管警察對疑似激進分子進行了監控，但他們還是成立了小團體，如“紀州幫”、“箱根幫”、“信州幫”等。例如，在箱根，佛教僧侶內山愚童私下出版了一個叫做《入獄紀念無政府共產》的小冊子，其中包括以下段落：

政府現在的頭目，就是人們稱為“天子”的那一位。他其實并不是你們小學老師灌輸的那樣，是神的子嗣或之類的人……甚至是佃農也必須起來抗爭，以便每天能有充足的食物填飽肚子。你不用對日本是神國或隨便什么叫法心懷感激……因為你一直都被灌輸著要為一個戴著神的面具的強盜后代工作一生，要被他利用，那樣一來，你將永遠都無法擺脫貧苦。[[48]](#_48__Guan_Yu__Chi_Qi_Shi_Jian__D)

在無政府主義者發表的作品中（無論是在日本發表的。還是在加利福尼亞發表的），被確立為“敵人”的不是腐敗的政治家或貪婪的資本家，而是天皇。為進行有效變革而使用的武器也從組織工人總罷工轉變成了使用炸藥。幸德認為，成功的暗殺并不需要太多的參與者。他贊同成立一支由五十人組成的敢死隊。

剛開始，不同幫派之間幾乎沒有什么聯絡，它們都是按照各自的行動綱領分頭行事。內山愚童攜帶有能使用的炸藥，但他認為暗殺皇太子要比暗殺天皇更加容易。信州幫的宮下太吉制定了最具體的計劃：他提議自制炸彈，并用炸彈炸死天皇。但是，當1909年2月宮下拜訪幸德時，幸德雖然欣賞宮下的勇氣，但對這個方案的可行性表示懷疑。幸德身體狀況不佳，他希望在死前能完成其他計劃，除了剛出版的彼得·克魯泡特金的《面包與自由》以外，還想完成諸如《基督何許人也》等 。盡管他一再重申堅持無政府主義的原則，但是，或許長期以來他對天皇存有的崇敬之情使得他難以加入到投彈手的隊伍當中。[[49]](#_49__Xi_Wei_Yang_Tai_Lang____Xin)

最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大概是一個叫做管野須賀的女人。在被家人強迫締結一段沒有愛情的婚姻后，她逃跑并與作家荒畑寒村生活了一段時間，荒畑使她轉變成左翼觀點的支持者。在赤旗事件中，他們都遭到了逮捕，但因證據不足須賀被釋放。當荒畑仍在獄中時，須賀轉而愛上了幸德，并最終成為了幸德的戀人。幸德認為自己終于找到了有著共同革命理想的夢想中的妻子，然而，須賀狂熱地決心執行暗殺計劃，而幸德對此反應冷淡，最后他們分手了。

即使在幸德明確表明自己不會參與暗殺后，宮下仍決定實施他的計劃。他另外招募了三個人——管野須賀、新村忠雄和古河力作。1909年11月3日，[[50]](#_50__Ban_Ben_Wu_Ren____Xing_De_Q)他制作的一枚炸彈成功引爆。1910年5月17日，這四人抽簽決定11月3日（也就是天皇的生日）當天皇乘坐馬車從閱兵返程時各人的任務。須賀抽中了幸運數字：她將扔第一枚炸彈。

5月20日，對宮下起疑已經有一段時間的警察[[51]](#_51__Gong_Xia_Zhi_Suo_Yi_Xuan_Ze)搜查了他的房間，發現了兩個錫罐。之后，他們搜查了宮下工作的木材廠，找到了化學品和其他罐子。25日，警察遞交了起訴書，信州幫的五名成員遭到逮捕。隨后，警察在6月1日逮捕了其他人，包括幸德秋水。逮捕活動從一個幫派擴展到另一個幫派，10月18日，警察逮捕了最后一批人。

12月10日大審院開始進行審判，12月29日審判結束。二十六名被告被控違反了刑法第七十三條：傷害或企圖傷害天皇或皇室者，處死刑。在審判中，管野須賀堅稱只有他們四人參與了密謀；即便沒有她的證詞，幸德也顯然沒有牽扯到這一事件中。然而，他卻因煽動其他人信奉無政府主義學說而遭到指控。[[52]](#_52__You_Chuan_Wen_Shuo__Yi_Ge_X)警察決定不讓他逃脫。

1911年1月18日，法院宣讀了判決結果。二十六名被告中有二十四名被判死刑，另外兩名被判監禁。1月19日，按照天皇的旨意，有關法官和官員召開了會議，商議給予大赦。他們建議將十二名被告的死刑判決減為無期徒刑。這一提議獲得批準，但另外十二名被告（包括幸德）分別于1月24日和25日被處以絞刑。[[53]](#_53__Ru_Xu_Le_Jie_Dui_Xing_De_Ti)

對只是略微涉及了大逆事件的人做出如此嚴厲的判決，讓日本文學界的一些人感到震驚，也在海外引發了抗議活動。但是，也許當時的大多數日本人都認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密謀是一種令人憎惡的謀反行為，處以死刑是完全合乎情理的。[[54]](#_54__Jian_Yu_Dang_Ju_Dui_She_Shi)對二十六名被告進行的審訊和做出的判決，讓迫切希望撲滅社會主義的日本當局感到滿意。社會主義者要想從這個令人不快的冬天復蘇，可能需要再花費十年時間。

從遠離此事的今天來看，人們傾向于同情這些被處決的男男女女。他們是受理想的推動，而非權力欲望的驅使。謀殺天皇的計劃失敗，使得人們能夠很容易地原諒那些謀殺未遂者，并痛斥對他們做出的判決。不幸的是，這并非是在日本策劃或實施的最后一起暗殺陰謀，不過下一個三十年的暗殺者并非無政府主義者，而是極右翼的狂熱分子。

1. [[1]](#_1_60) 1906年5月30日，阿方索十三世在從剛為其舉辦婚禮的教堂返回皇宮的途中遭遇炸彈襲擊，他沒有受傷（《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65頁）。 維多利亞女王至少遇到過七次行刺。第一次發生于1840年6月10日，當她和丈夫阿爾伯特（Albert）親王駕著敞篷車外出時，“突然，她聽到爆炸聲，阿爾伯特伸開雙臂抱住她……她對阿爾伯特的興奮舉動投以微微一笑，但下一刻，她看見‘一個小個子男人站在小路上，雙手交叉在胸前，每只手上舉著一把手槍……’他對準她，又開了一槍，她猛地伏下身”（Elizabeth Longford, "aid-KMB", p. 151）。這名暗殺未遂者被判犯有叛國罪，本可處死，但他最后被送進了一家精神病院。1850年7月27日，維多利亞女王的頭部遭到一名退伍中尉的猛烈襲擊，她被擊昏，失去了知覺。襲擊者被叛流放海外七年。1872年2月28日，維多利亞女王遭到了第六次暗殺，這是最具有現代色彩的一次：刺客的目的并不是要謀殺女王，而是嚇唬她簽署一份下令釋放某些政治犯的文書（pp. 390-391）。最后一次行刺發生于1882年3月2日。這名舉著一把裝滿子彈的左輪手槍、瞄準目標的暗殺未遂者被送進了一家精神病院。所有暗殺未遂者的動機都很模糊、混亂，這也是他們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原因。

1. [[2]](#_2_60) 吉田精一引述正宗白鳥的話說：“如果有人就這一事件的嚴重性問我是否覺得自己的內心深處感到憤慨、是否對政府和法官感到厭惡、是否詛咒生活、是否對所有食物都失去了興趣以及是否在晚上無法睡個安穩覺，我必須回答說，我沒有一點點類似這樣的情緒”（《近代文蕓評論史：大正編》，第48—49頁）。 然而，幾年后永井荷風寫道，“在世間的所有事件中，我從來沒有見過或聽過這樣的事情，也從來沒有燃起過像這件這樣讓我無法言說的厭惡之情。作為一名作家，我不應當對意識形態的問題保持沉默……但是，和當時的其他作家一樣，我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我對自己作為一名作家感到非常羞愧。我備受難以忍受的良心不安的煎熬”（《永井荷風集》，第319頁）。 片山潛聲稱，“對幸德和其他人做出的判決很公正，沒什么可指責的地方。但遺憾的是，沒有向公眾公開審理這一案件。各國社會黨的成員都在他們黨派的機關報對這一案件大肆批評；在極端情況下，他們甚至辯稱日本政府拒絕進行公開審理，而這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趨勢背道而馳，此舉是為了消滅社會黨。這表明他們對我國的法律和該案件的真實情況全然無知”（引自于大原慧《片山潛の思想と大逆事件》第68頁）。還有，“日本政府絕對不是在迫害社會主義；死在絞刑架上的那些人都是活躍的無政府主義者”（第69頁）。

1. [[3]](#_3_60) 第一個講座與希臘和羅馬敬拜祖先的經典文本有關，第二個講述的是《易經》中的文章，第三個關于《出云風土記》中的國引神話[日本古代神話，相傳出云國有一位叫做“八束水臣津野命”的神，有一天，他決定要擴大狹小的出云國。于是，他以平鋤勾住土地，佐以三股扭在一起的繩將志羅紀（新羅）拉過來，接著從北門佐岐（隱岐道前）拉來了狹田國，由北門良波（隱岐道后）拉來了暗見國，自高志（越國）都都三埼拉來了三穗之埼，之后繩形成夜見島，固定繩的地方為伯耆國火神岳（今鳥取縣大山）。——譯注]。

1. [[4]](#_4_60)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44頁。

1. [[5]](#_5_60)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45—546頁。

1. [[6]](#_6_60) 在1886到1912年期間擔任天皇侍從的日野西資博說道，在1895年后的“七八年中，他完全停止了讀報”（《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53頁）。

1. [[7]](#_7_60) 1881年3月13日，亞歷山大遭到謀殺；1900年7月29日，翁貝爾托遇刺身亡；1908年2月1日，卡洛斯遭到槍殺。盡管各個案例中的暗殺者都聲稱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但他們其實都是國王的政敵所雇傭的殺手（《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5頁）。

1. [[8]](#_8_60) 就在他被執行死刑前不久，他翻譯完成了一部重要著作——彼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王子的《面包與自由》（La Conquēte du pain ）。他是根據英語譯文將該著作翻譯成日語的。

1. [[9]](#_9_60) 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9頁。該書的扉頁翻拍了幸德的原文。如果這真的是他在七歲的時候作的詩文和寫的書法，那他的確異常早慧。幸德一生都寫漢詩。如需了解關于幸德早年生活的英文描述，請參閱F. G. Notehelfer,Kotoku Shusui , pp. 8-20。

1. [[10]](#_10_60)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78頁。另請參閱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8頁。

1. [[11]](#_11_60) 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20頁。

1. [[12]](#_12_60) 《保安條例》對來自土佐（高知縣）的人士尤其嚴苛，因為他們領導開展反抗薩摩—長州政府的活動。

1. [[13]](#_13_60)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50—51頁；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27—28頁。

1. [[14]](#_14_60) 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28頁。

1. [[15]](#_15_59)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55頁。畢業后，幸德告別在中江家的學生生活。中江給了他“秋水”這一名號，這個名字富有詩意而非政治色彩。

1. [[16]](#_16_59)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60頁。另請參閱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46頁。此時，由于對為政府的喉舌工作感到不滿，幸德已經離開了《自由新聞》。他在《中央新聞》的主要任務也是翻譯。

1. [[17]](#_17_59)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02—104頁。在第102頁中，作者列舉了幸德向社會發表的所有演講。

1. [[18]](#_18_58)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99頁。

1. [[19]](#_19_58) 這是坂本的看法，但西尾認為幸德作為社會主義者的生涯開始于1897年（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48頁）。

1. [[20]](#_20_57) 大原慧，《片山潛の思想と大逆事件》，第15頁。

1. [[21]](#_21_57) 他在奧克蘭的霍普金斯學院、麥利維爾大學、哥林奈爾大學、安多弗神學院和耶魯大學就讀。

1. [[22]](#_22_56) 大原慧，《片山潛の思想と大逆事件》，第16頁。如需了解對片山很大影響的理查德·伊利（R. Ely）的《基督教的社會功能》（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 ）等書，請參閱第18—19頁。

1. [[23]](#_23_56) 貧民、游民收容所，一種社會福利機構。——譯注

1. [[24]](#_24_54) 坂本指出，在幸德的書出版后一年，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才發表其有關帝國主義的作品；在幸德的書出版后十五年，列寧才發表其著作（《幸德秋水》，第125頁）。

1. [[25]](#_25_54)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27頁。另請參閱F. G. Notehelfer,Kotoku Shusui, pp. 85-87。

1. [[26]](#_26_54) 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69頁。山川的文章使他以冒犯君主罪被判入獄四年。

1. [[27]](#_27_53) 如需了解安部磯雄提出的28條主張，請參閱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74—75頁。

1. [[28]](#_28_50) 末松曾在英國留學，并發表了《源氏物語》的部分譯文。

1. [[29]](#_29_50)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34頁、第135頁。

1. [[30]](#_30_48)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34頁、第135頁。第一首詩的原文“古のふみ見るたびに/思ふかな己の治むる國は如何にと”（《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一卷，第50頁），該詩作于1878年。第二首詩的原文“綾錦とに重ねても/思ふかな寒さ掩はん袖もなき身を”，該詩并沒有收錄到這一著作中。

1. [[31]](#_31_46)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40頁；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82頁。

1. [[32]](#_32_45) 如需了解這本書的內容匯總，請參閱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86頁。

1. [[33]](#_33_44)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52—153頁。在此之前，三名有才華的作家——幸德、內村鑒三和堺利彥——定期發表反戰社論。雖然其他報紙支持戰爭有一段時間了，但在清楚地認識到俄國不會履行從滿洲撤軍的承諾之前，《萬朝報》是反對戰爭的。《萬朝報》的創辦人兼編輯黑巖淚香決定，為了團結國民，他將支持政府的主戰政策。這個決定促使幸德、堺利彥和內村從該報辭職。

1. [[34]](#_34_44) 總共出版了64期，最后一期于1905年1月29日出版。第一期售出8000份，之后各期的平均銷售量大約為4000份（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96—97頁）。

1. [[35]](#_35_41)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60頁。

1. [[36]](#_36_40)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63頁。

1. [[37]](#_37_35)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64頁。

1. [[38]](#_38_30) 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135頁。

1. [[39]](#_39_28)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68—169頁。

1. [[40]](#_40_27) 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136頁。

1. [[41]](#_41_27) 如需了解詳情，請參閱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70頁、第171頁。

1. [[42]](#_42_27) 她叫弗里茨（Fritz）夫人。如需了解關于她的一些情況，請參閱F. G. Notehelfer,Kotoku Shusui, pp. 124-127。

1. [[43]](#_43_24)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73頁。

1. [[44]](#_44_23) 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153頁。

1. [[45]](#_45_23) Donald Keene,Modern Japanese Diaries , p. 444. 資料來源于鹽田莊兵衛編，《幸德秋水の日記と書簡》，第235頁。

1. [[46]](#_46_20) 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177頁。

1. [[47]](#_47_19) 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189—194頁、第202—203頁、第204頁。

1. [[48]](#_48_19) 關于“赤旗事件”的生動描述，請參閱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202—206頁。

1. [[49]](#_49_19) 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220頁。

1. [[50]](#_50_17)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215頁。

1. [[51]](#_51_14) 宮下之所以選擇在天皇的生日這天對自己制造的炸彈進行試驗，是因為他希望在慶賀時燃放煙火的聲音可以掩蓋住爆炸聲（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245頁）。

1. [[52]](#_52_11) 有傳聞說，一個心懷不滿的丈夫（其妻與宮下有染）或參與這次行動的警方密探向警察告了密。

1. [[53]](#_53_11) 如需了解對幸德提出的控告，請參閱西尾陽太郎，《幸德秋水》，第276—277頁。

1. [[54]](#_54_11) 監獄當局對涉事的唯一一名女子頗為體貼，他們在處決這些男子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25日）處決了管野須賀。

# 第六十一章 天皇駕崩



大逆事件的騷動情緒平息下來后，明治四十四年幾乎沒有什么吸引人的事情發生。值得關注的大事包括與美國、法國、西班牙和其他國家簽署了新的通商條約，廢除了大多數之前條約中在經濟上和法律上對日本的歧視規定。但是，日本移民問題破壞了與美國一貫保持的友好關系，此后多年仍然是日本人感到苦惱的源頭之一。

1911年7月，英日兩國第三次締結了同盟，不過因為對最初的規定進行了修改，此時的同盟關系遭到削弱。美國對日本的海軍建設以及在朝鮮半島和滿洲的勢力擴張感到不安，譴責這些不受歡迎的事態是同盟導致的。毫無疑問，美國希望終止這個同盟。[[1]](#_1__Ian_H__Nish_The_Anglo_Japane)英國不能完全忽略美國的反對意見，因為英國希望與美國簽訂條約，規定如果英日兩國發生分歧，美國須進行強制性仲裁。然而，強制性仲裁與英日同盟的條款相抵觸。如果日本和美國開戰，英國受該同盟的束縛，必須加入日本一方對抗美國；但是，假如英國受強制性仲裁條約的束縛，則仲裁人可以反對英國參戰。出于自身考慮，日本拒絕將本國與別國之間的分歧提請仲裁。經驗告訴他們，每當白種人國家與黃種人國家發生沖突并提請仲裁時，贏的總是白種人國家。[[2]](#_2__Hei_Yu_Mao____Ri_Ying_Tong_M)

但是，為了保全英日同盟，日本最終同意：如果日本同曾與英國簽訂了仲裁條約的國家（如美國）開戰，英國沒有義務支持日本。[[3]](#_3__Ru_Xu_Le_Jie_Gai_Tiao_Yue_De)之所以做出這一讓步，是因為日本仍相信該同盟有助于維護遠東和平，但事實上，該同盟已經喪失了最初之于日本的重要性：作為與歐洲列強平起平坐的象征，以及作為防御俄國侵略的屏障。

有跡象表明，在第一次宣布簽訂同盟時席卷英國的強烈的親日情緒已經冷卻下來，尤其是在日俄戰爭后。英國人厭惡日本，其根源大概是潛藏的民族和宗教偏見，而表現形式則是對日本的工商業發展的憂慮。他們擔心日本正在將這個同盟用于滿足自身利益，并且越來越確信日本侵犯了清朝的領土完整，壟斷了滿洲的重大利益（盡管日本聲稱其遵守“門戶開放”政策）。[[4]](#_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2)一些英國人要求結束同盟，但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支持續訂同盟，因為他覺得需要利用日本海軍來對抗日益強大的德國海軍。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1911年7月），山縣有朋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奏折，感嘆日俄戰爭后籠罩日本人的松懈放縱氛圍，力勸重整軍備。他指出俄國已經從戰爭中恢復過來，清朝陸軍比過去更有戰斗力，（盡管難以想象，但是）日美遲早必有一戰，因為美國的太平洋政策經常與日本的利益相沖突。[[5]](#_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2)

盡管前景不容樂觀，但在日本占主導地位的還是和平的氣氛。人們甚至還有余暇來關注迄今為止被忽略了的那部分人群。天皇第一次表露出他已經意識到在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中被落在后面的人群的困境。2月11日，他向再次擔任總理大臣的桂太郎頒布了一道敕語，其中一節如下：

若夫有無告之窮民，醫藥難獲，天壽難終，為朕最軫念之所在也。為以施藥救療廣濟生之道，茲出內幣（天皇的個人財產）之金，以充其資。卿可體朕意，宜隨之行舉措，以期創永久眾庶可賴之所。[[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2)

當天，天皇告知大藏大臣他打算提供一百五十萬日元，用于窮人的醫療保健。這不是天皇第一次向需要醫療護理的窮人慷慨解囊。1878年，沙眼在新潟橫行，苦惱萬分的天皇就曾捐贈資金用于治療。[[7]](#_7__Qing_Can_Yue_Di_San_Shi_Zhan)日本的任何一個地方（以及有時候國外）發生火災、洪水或地震，他都會向災民捐款。但是，這一次的捐贈數額比以前大得多，好像這是一個新涌現出來的需要關注的問題。也許天皇開始感受到了衰老和疾病這些心頭重壓，于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和他承受著相同重壓的人群。

這一年，天皇開始取消可能對健康造成損害的露面活動。例如，4月20日，他和皇后原計劃參加浜離宮的賞櫻會，但那天風很大，揚塵彌漫，于是他決定不去了。[[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1)天皇向來都不喜歡花園宴會，因為在宴會上必須對出席的所有人表現得親切熱忱，他也可能覺得自己與外國外交官的握手次數已經夠多了，然而，無論如何他都必須履行這些令人厭煩的職責。而現在，即使是他的儒家訓誡也無法使他克服身體上的疲勞。

這一年的稍晚時候，天皇出席了福岡縣的陸軍特別大演習，這是對其忍耐力的最后一次考驗。他于11月7日搭乘火車離開東京，在沿途的靜岡和姬路停靠，于9日抵達長州藩的三田尻，毛利元昭接待，長州藩的一些杰出人士（包括山縣有朋、桂太郎和原敬）也加入其中。那晚，為取悅天皇，毛利特意準備了娛樂活動——用薩摩琵琶和筑前琵琶演奏紀念過去英雄事跡的音樂民謠，之后播放活動寫真[[9]](#_9__Dian_Ying_De_Zui_Zao_Xing_Sh)。這大概是天皇第一次觀賞這些早期電影。毛利播放了一部記錄青森縣海岸捕鯨活動的短片，一部講述一只獾變成人的滑稽短劇，還有一部在非洲深處漂流的旅行記錄。天皇一行中的一名成員對這些電影進行了解說。[[10]](#_10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

第二天，天皇動身前往下關，在那里登上了一艘海軍艦艇前往門司，并從門司搭乘火車前往大本營所在地的久留米。11月11日，天皇離開久留米，搭乘火車和馬車前往軍演所在地。為了方便天皇行走，通往山上的路被專門修建了六十級木臺階，多虧這些他才能夠爬到山頂的觀察哨。沿著臺階建有竹欄桿，他可以一邊爬一邊倚靠。所有人都能明顯地看出來，爬山讓他筋疲力盡，但他仍爬到了山頂，并觀摩了大概兩個小時的軍演。

當時，一名隨軍攝影師拍了一張天皇附身看地圖的照片。[[11]](#_1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noYu_1)在天皇駕崩后，這張側面照和簽名副本一同被公開，但為了使天皇看起來像是站直了，攝影師將底片旋轉了九十度。這大概是自1873年天皇擺好姿勢讓內田九一拍攝后的三十九年來，為天皇拍攝的第一張照片。[[12]](#_12__An_Ri_Ben_Li_Fa_Suan_Shi_60)

在回程的途中，天皇在三田尻再次受到了毛利元昭的殷勤款待，并觀看了音樂以及一些既增長見聞又幽默有趣的活動寫真。在回到東京后，天皇得知，11月10日負責天皇專車的操作員失誤，造成火車出軌，出發也延誤了一個小時。第二天事故責任人為贖罪躺在另一輛火車的車輪之下自殺。天皇向他的家屬捐贈了三百日元。[[13]](#_1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1912年2月，參謀本部向天皇提交了年度秋季大演習的方案，供天皇審批。方案中天皇只在川越町度過軍演的第二個晚上，余下的三個晚上將返回東京。很明顯，這個規定是為了天皇日益衰弱的身體狀況著想。

然而，天皇恩準這個方案的過程異常緩慢。當參謀本部再也等不下去時，總務部部長進宮（通過侍從長）打探天皇的意思。天皇回答說：“見今次演習計劃，朕僅一夜駐泊川越行所。軍隊不拘風雨，露營演練實戰，朕豈能忍安眠于宮城內乎？如斯計劃不可也。”因此，參謀本部對方案進行了相應修改，安排天皇在軍演的整個期間都將在川越町度過。在提交新方案時，天皇于提交當日批準。[[14]](#_1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天皇堅持（和他在清日戰爭期間一樣）要與士兵共患難，并且不愿意承認觀摩軍演可能會有損他的健康。



明治天皇觀摩軍演

天皇從福岡回到東京后不久，就獲悉了清朝發生大動亂的消息。日本政府傾向于靜觀事態發展，而非貿然采取行動。然而，清廷近年來明顯軟弱無力，在沒有外國干預的情況下恢復秩序的希望或多或少落了空。奏報中說，力圖推翻清政權的革命勢力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但缺乏統一性；起義的領導人之間存在著內部紛爭；倉促召集的軍隊缺乏訓練，力量非常薄弱；他們能否在所占領的地區維持秩序也令人懷疑；如果騷亂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會影響到通商，并可能再次出現義和團起義時的仇外情緒。考慮到這一緊張態勢，日本政府得出結論認為，那些高度關注清朝局勢的國家不會袖手旁觀。

日本政府令駐倫敦大使探明英國在面臨這輪危機時打算采取哪些措施，并且還指示如果被問起日本的立場，則回答說日本無法接受那些要在清朝建立共和國的人的空論，更期待清朝建立一個名義上是由滿族人組成的清朝朝廷統治，但實際事務則交由漢族人管理的國家體制。[[15]](#_1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

日本國內對清朝局勢的擔憂情緒持續增長。日本人所熟識的軍機大臣袁世凱被清廷任命為總理大臣，這是清廷以一種絕望的姿態來維持其存續。清日戰爭前，袁世凱曾在朝鮮發揮了重要作用；清日戰爭后，他通過重建軍隊樹立起了聲望。現在，他似乎成為了清朝君主的最后一絲希望，但事實上，袁所看到的是成為中國第一任總統的千載良機。英國贊成清帝退位，甚至清政府中一些身居要職的人也傾向于接受建立共和國。

盡管日本人不會改變君主立憲制才是最適合清朝的政體這一看法，但他們也意識到了日本不能成為唯一一個堅持讓清朝保留君主制的國家，也不可能繼續無休無止地為清朝的未來操心。11月27日，天皇召開了第二十屆議會。在詔敕中提到了清朝的動亂：“朕甚憂之，望速復秩序，得見和平。”[[16]](#_1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0)他多次提到希望維持東亞和平（這與德皇威廉堅稱要維護德國榮譽的說法截然相反），無疑反映了他的真實感受。這就是像安重根和幸德秋水這樣的人物雖然憎恨日本政府，但仍然尊敬天皇的原因。

1911年12月28日，清政府發表聲明，呼吁結束敵對行動，并公平選舉組建臨時議會，以便確定民眾是希望建立君主立憲制還是共和制。第二天，無視這個聲明的革命勢力在南京舉行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的選舉活動，孫中山當選。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政府總統。

在此期間，日本駐清公使伊集院彥吉（1864—1923）和儒學學者康有為（其領導了建立效仿明治政府的戊戌變法）拜訪了袁世凱。他們說已經得知政府和革命黨之間的談判毫無進展，還有謠言說皇帝將退位，但實情到底是什么。袁世凱回答說，與革命軍的談判確實陷入了僵局，雙方甚至無法就召開議會的地點達成一致：政府提議在北京召開，但革命黨強烈反對；無論如何，政府軍的財務狀況日益令人絕望，沒有辦法補足經費以用于軍事開支；上海和香港的民間組織和地方官員都要求皇帝盡快退位，并建立共和政體。

面對國內外的反對意見，內閣放棄了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希望。貴族中的意見也不一，局面一片混亂。話末，袁世凱請伊集院提供建議。[[17]](#_1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伊集院回答說，日本沒有簡單易行的解決方案可以提供，但他表示日本希望清朝建立君主立憲制，即使這會使皇帝降尊成為一個有名無實的人物。他補充說，日本政府不太可能承認某個政府，除非它能證實自己能夠鎮壓動亂。在那之前，日本別無選擇，只能將清朝視為一個沒有政府的國家。這個回答讓袁世凱大為煩心。[[18]](#_1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6)

幾個星期后，統治中國三百年的清王朝宣告結束。1912年2月12日，六歲的皇帝溥儀宣布退位。袁世凱成立了臨時共和政府，并全權負責與革命軍談判統一的事情。13日，承認袁世凱具有軍事才能的孫中山向南京議會提出辭去總統一職，并推薦袁世凱擔任新總統。議會同意了這一請求，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舉行就任，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

明治天皇對清帝退位有何反應尚無史料記載，但比起葡萄牙國王被趕下王位，這一事件給他造成的觸動無疑更大。這不僅僅是因為清朝比任何歐洲國家都更靠近日本，還因為他長久以來都尊敬清朝，即便它在清日戰爭中慘敗。清朝可能已經失去了在東亞國家中的領導地位，但清朝皇帝和日本天皇在互通書信時都采用漢文書寫，明治的詔書中也隨處可見儒家經典中的典故。

日本的民族主義者會毫不猶豫地說，日本人（而非該時期的中國人）才是中華文明古老榮耀的真正繼承人。中國帝制的終結，打破了自秦始皇起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傳統，這種終結絕非可以與一部分日本人所認為的琉球王國或者朝鮮王室在近代化中無可避免的弱國命運同日而語。在未來的四十年中，雖然受到日本軍隊的羞辱、遭到戰爭的蹂躪，但對那些認為中國的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的過去的日本知識分子而言，中國仍有著強大的吸引力。

天皇的身體狀況明顯惡化，但他仍積極關注國家事務。1911年10月，患上了耳聾的總參謀長奧保鞏準備退休，山縣有朋向天皇提議讓乃木希典接替。第二天，天皇向山縣傳話說，他擔心可能難以找到接任人來接替乃木的學習院院長一職。這也許確實是天皇的真實想法，他可能希望自己的三個孫子能在學習院接受乃木的悉心教誨。[[19]](#_19__Yuan_Le_Yuan____Nai_Mu_Da_J)但是，天皇也一定意識到，比起學習院的院長，乃木可能更樂于擔任軍人所追求的最高職位的總參謀長。拒絕讓乃木升任這一職位有些不近人情。也許對于在旅順造成的重大人員傷亡，天皇仍然沒有原諒乃木。盡管乃木被日本民眾尊奉為日俄戰爭的英雄，并且外國政府也向他授予了勛章，但是，他卻被排擠到一個教育類的職位，除了卓越的品質外，并沒有其他資質來勝任這一職位。[[20]](#_20__Wei_Nai_Mu_Xie_Chuan_Ji_De)最后，天皇當然拒絕任命乃木擔任總參謀長，山縣撤回了提議，請求允許陸軍大將奧保鞏留任這一職位。[[21]](#_21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9)

新的一年（1912年）正好是明治四十五年。這一年，明治將慶祝六十大壽。[[22]](#_22__Tian_Huang_De_Liang_San_Zha)但考慮到他的病痛，不太可能舉辦慶祝活動。

宮中舉辦了傳統新年儀式，講座由亞里士多德《政治學》（"aid-KV6"）開始。由于天皇不喜歡高崎正風推薦的兩個主題“海邊鶴”和“社頭杉”，使得本年度首次詩會的安排工作變得復雜起來。高崎又提交了兩個主題，但天皇還是不喜歡。他按照自己選定的主題“松上鶴”做了一首短歌。[[23]](#_2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本年的詩會不同尋常的是，權典侍園祥子也參與其中。權典侍是宮中最不起眼的人物，通常不參與宮中儀式，但也許天皇為了向園祥子表達特別的好感，因為園祥子為他生了四個平安成長的女兒。或許還因為他感覺到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詩會，希望能留下難忘的回憶。三天后，御醫岡玄卿建議說，天皇暫時不要吃肉、家禽、貝類、蘑菇類、鰻魚或西餐，并將這一命令傳達給大膳寮。[[24]](#_24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天皇繼續履行接見內閣成員和外國來訪者的日常職責，盡管虛弱的身體狀況讓這一切變得很費力。他還向需要幫助和受苦受難的民眾捐錢，并出席陸軍學校的畢業典禮等公眾活動。4月，他（和被招待的兩千四十四人）參加了浜離宮的賞櫻會。

5月，天皇出席了多個海軍和陸軍院校的畢業典禮；7月10日，他參加了東京帝國大學的畢業典禮。爬樓梯似乎讓他精疲力竭，他需要借助佩劍來支撐。[[25]](#_25__Fang_Cheng_Jun_Liang____Gon)14日的早上，當御醫來給天皇例行問診時，天皇說他清早的時候感到有些疼痛，并且覺得胃部沉重。他還抱怨說時常覺得四肢無力，疲乏犯困。盡管如此，他仍然沒有忘記派遣一名宮中官員向王世子李垠傳話，贊揚李垠學習勤奮，并敦促李垠在暑假時也要保持這樣良好的狀態。

7月15日，日本和俄國在圣彼得堡簽訂了秘密協約，劃定了兩國在滿洲和內蒙古的勢力界線。在樞密院召開討論協約的會議之前，天皇召見了山縣有朋，向他頒布了詔書，對消除日俄沖突的根源并由此確保了東亞和平感到高興。盡管身體不適，天皇仍出席了樞密院的會議。通常情況下，天皇都是神態莊嚴、平靜，并且在就座后很長時間都保持不動。但在那天，令大臣和顧問們驚愕的是，他坐姿懶散，時而打盹。在回宮后，他對身邊的人說，他已經盡力去參加這次會議，因為會議的討論主題具有特殊的緊迫性，但他太困了，以致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睡著了兩三次。[[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從這一天起，天皇的脈搏出現了跳動不規律和漏跳的現象，但盡管感到不舒服，他仍像往常那樣繼續去辦公。然而，他嗜睡的時間變得越來越多。下午向他侍奉點心，或者在留聲機上播放他最喜歡的音樂，也不能讓他像以往那樣樂在其中。他看起來非常疲憊。[[27]](#_27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5)

7月17日，御醫岡玄卿為天皇檢查，發現天皇出現了脈搏漏跳、肝硬化以及膝蓋以下部位疼痛等癥狀。天皇走得極為緩慢，但他仍像往常那樣前去辦公室。

7月18日，天皇食欲不振。他沒有試圖前去辦公室，整天都感到頭暈目眩。晚上，他令人播放留聲機，好像是在欣賞音樂，但實際上仍在打盹。那天夜里他睡得很不踏實。

異常炎熱的夏天加劇了天皇的痛苦。連日來，氣溫都沒有低于三十二攝氏度；19日，溫度甚至躥到了三十四點五度。天皇坐在餐桌前喝了兩杯酒，之后感覺眼睛有些疼。他起身離開凳子，不料身體搖搖晃晃，摔倒在地板上。所有人都驚恐萬分，并在天皇倒地的地方迅速鋪了一張臨時的床。天皇發起了高燒，并陷入了昏迷狀態。凌晨2點，皇后召見德大寺實則等四人。

第二天早上，皇后建議召之前替天皇檢查的兩名醫生（他們都是東京大學的教授）。他們診斷天皇患上了尿毒癥。這兩名醫生和宮中醫務局的局長向聚集的元老、大臣、樞密院議員、陸軍和海軍上將等告知了天皇的病情。當天下午，他們發布了一份聲明，第一次向全國披露了天皇病危的消息。報告中提到，天皇從1904年起患上了糖尿病，1906年又患上了慢性肝炎。這兩個疾病一直折磨著他，時輕時重。7月14日起，他患上了腸胃炎；15日起出現了嗜睡的癥狀，并越來越明顯。天皇食欲減退，19日起因腦膜炎陷入了昏迷狀態。這份報告對天皇的體溫、脈搏和呼吸都做了詳細記錄。

從那天起，他的四個女兒和皇太子妃輪流在床邊照看他。皇太子缺席，因為他在出水痘。皇后派宮中式部長官宮地嚴夫前往伊勢神宮祈禱天皇康復，然而，天皇的病情繼續惡化。來看望天皇的人絡繹不絕，但他無法和他們說話。所有人都責怪醫生在1904年發現天皇的病情后沒有制訂治療方案。醫生們為自己辯解道，他們每天早上都進宮打算給天皇做檢查，但天皇總是拒絕，稱自己不需要檢查。他們不敢違抗天皇的命令。[[28]](#_2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即使在意識到自己肯定患上了某些疾病而同意讓醫生檢查時，天皇也總是擺出一副很不情愿的樣子。侍從日野西資博回憶說，在清日戰爭期間，天皇身居廣島時曾經突然生病。“我們認為那只是感冒，但不久后發現是肺炎。”日野西繼續說道，“他的眼睛和牙齒出問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他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訴過苦。他看遠處的東西時有困難……在吃東西時，他總是對放進嘴里的食物很小心，絕對不碰硬的東西。但是，他從來都不做牙齒護理。他都是忍住疼痛……他盡量避免去看醫生。”[[29]](#_29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

那些服侍天皇的人都懇求他聽從醫生的建議。在久留米觀摩大演習時，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極度勞累。從三田尻返回名古屋，火車的搖搖晃晃讓他感到很不舒服。他責備笨拙的工程師讓火車開得太快，命令“讓火車開慢點”！同行的侍從坊城俊良說，火車是按照正常速度行駛的，天皇對此嚴厲地駁斥，“你是站在鐵路那邊的”。最終，火車的速度慢了下來，到達名古屋時晚了一個小時。[[30]](#_30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

天皇像這樣的情緒爆發的記載極其罕見。無論身體遭受著怎樣的疼痛，他都忍耐著，盡量不讓其他人看出來。就像無視夏日的炎熱或冬日的嚴寒一樣，他堅忍地承受痛苦，認為作為天皇就應該這樣。此外，他覺得自己不僅要承受苦難，還要拒絕享樂。他曾對西園寺公望說：“朕喜京都，故不能訪京都。”[[31]](#_31__Mo_Song_Qian_Cheng____Yu_Zi)但是，他免不了也會有疲憊的時候。從九州回來后，曾有人聽到他在內宮中私下說道，“若是我死了，世界會怎樣？真想死。”[[32]](#_32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

明治對儒家統治者的言行舉止的詮釋，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他在某些時候表現出令人費解的行為。他感到四肢沉重無力行走，更別說爬樓梯時，仍決定在久留米觀摩軍演。這個決定讓人難以理解，然而，他卻心甘情愿地忍受身體的疼痛，因為這是他職責的一部分。他不會憐惜自己，在拒絕接受為川越町軍演擬定的輕松方案時，也并不覺得這是在自討苦吃。相反，他確信和士兵們共患難是他的義務。九州的漫長旅途，從演習期間天皇實際發揮的作用來看，幾乎沒有意義。雖然天皇是最高統帥，但他沒有發布一個命令，也沒有試圖通過任何方式來展現自己的軍事知識。天皇之所以去觀摩軍演，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的身份要求這樣做。天皇知道自己的出席會對演習產生怎樣的影響。士兵們在得知天皇正在觀摩軍演后，將會竭盡全力，下定決心不讓自己在天皇面前丟臉。他知道自己可以鼓舞士氣，那無需費唇舌或者強調自己的重要性。義務，是他最關心的事情。他并不渴望榮耀，也完全不擔心歷史會怎樣評判他。

1912年7月30日凌晨，就在午夜剛過不久，天皇走到了人生的盡頭。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心臟衰竭。宮內大臣和總理大臣共同宣布了這一消息。凌晨1點，內務大臣捧著劍、玉、玉璽和國璽去正殿。之后舉行了授予劍和玉的儀式，新天皇發布詔書，定年號為“大正”。[[33]](#_33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2)

第二天早上，坊城俊良伺候大正天皇穿上登基大典的裝束。一直以來，大正天皇都穿著陸軍中將的制服，但現在改成了最高統帥的制服。在儀式結束后，新天皇走近內室，對先皇的遺體行拜禮。昭憲皇后（現為皇太后）認為大正天皇的頭銜在她之上，要把房間中的主位交給兒子。大正堅持讓她坐在原位，但她用溫柔而堅定的語氣說：“你已經繼承了皇室的君主之位，必須坐在主位上。”雖然大正想向母后充分表達他的尊重之情，但他還是默默地鞠了一個躬，坐上了主位，發表了即位的致辭。[[34]](#_34__Fang_Cheng_Jun_Liang____Gon)

在明治死后不久，那些最熟悉他的人被請來講述以往的事情。[[35]](#_35__1912Nian_9Yue____Tai_Yang)所有人都評論說，明治堅持過著簡樸的生活，擁有過人的記憶力，關心他人，但他們的描述在某種程度上無法勾勒出明治的全貌。這大概可以在政治家兼外交家牧野伸顯在當時說的話中找到原因：

天皇幾乎沒有不為人知的一面，也沒有什么特殊偏好。他的住處與貴族的宅邸毫無區別，反而更加簡樸，里面的東西只不過是些需用之物。他的每一次旅行都不是為了消遣，而是為了這個國家。他開展公共工程，但從來都不是為了自己的喜好，而是出于這個國家的需要，或為接待外賓，或為處理國事。天皇從不允許建造非必要的公共建筑物。他購買任何東西，并不是因為想要得到它們，而是為了鼓勵工業或保護藝術。除了工作外，他幾乎沒有什么私人生活。[[36]](#_36__Mu_Ye_Shen_Xian____Yu_Qin_Z)

1. [[1]](#_1_61) Ian H. Nis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 p.377.

1. [[2]](#_2_61) 黑羽茂，《日英同盟の軌跡》上卷，第207頁。

1. [[3]](#_3_61) 如需了解該條約的條款，請參閱《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628—630頁。日本在第四條做出了讓步。

1. [[4]](#_4_6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84頁。

1. [[5]](#_5_6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637—638頁。

1. [[6]](#_6_6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55頁。5月30日，總理大臣桂太郎宣布成立一個叫做“恩賜財團濟生會”的基金會。除了天皇捐贈的資金外，還有來自全國的志愿者捐獻的金錢。當天皇獲悉這個組織的名稱時，他表示反對，因為除他以外，還有許多其他人提供資金。在他的提議下，這個名稱的前四個字（恩賜財團）總是用小字印刷（第612頁）。

1. [[7]](#_7_61) 請參閱第三十章。

1. [[8]](#_8_6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93頁。

1. [[9]](#_9_61) 電影的最早形式。這一時期播放的主要是記錄的時代劇、演劇，時間較短。——編注

1. [[10]](#_10_6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689頁。

1. [[11]](#_11_61) 《明治天皇の御肖像》第20—21頁轉載了當時拍的照片以及在奈良、栃木和岡山縣拍攝的三張類似照片。

1. [[12]](#_12_61) 按日本立法算是60歲，但按西方立法算是59歲。在日本和中國，滿60歲被視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這意味著該人已經度過了一個完整的甲子。

1. [[13]](#_13_6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02—703頁。

1. [[14]](#_14_6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44—745頁。

1. [[15]](#_15_60)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05—706頁。

1. [[16]](#_16_60)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18頁、第719頁。

1. [[17]](#_17_60)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30頁。

1. [[18]](#_18_59)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31頁。

1. [[19]](#_19_59) 源了圓，《乃木大將の自殺とその精神指摘背景》，《心》1963年12月號，第17頁。這三個孫子是后來的昭和天皇、秩父宮親王和高松宮親王。

1. [[20]](#_20_58) 為乃木寫傳記的早期傳記作家對他在學習院的工作大加贊賞，稱他是“佩帶寶劍的裴斯泰洛齊\*”（源了圓，《乃木大將の自殺とその精神指摘背景》，第17頁）。不過，如需了解更加近代的傳記作家的不同觀點，請參閱松下芳男，《乃木希典》，第193頁、第197頁。松下還提請關注發生在1908年大演習期間的一件事（第195頁）。在演習的最后一天，擔任“南軍”指揮官的乃木突然被另一名將軍替換，因為乃木無視演習監軍（陸軍大將奧保鞏）下達的撤軍命令。乃木認為南軍沒有遭受損失，沒有理由撤軍。他的這種獨立精神并沒有受到褒獎。[\*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瑞士著名的民主主義教育家。——譯注]

1. [[21]](#_21_5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673頁。隨后，乃木獲得了一個更低的職位，即擔任演習（在第四師團和第十六師團之間開展）監軍。（第683頁）

1. [[22]](#_22_57) 天皇的兩三張快照從這時候起被保存了下來，但這些快照是在很遠的距離拍攝的，因而沒能清楚地展現天皇的容貌特征。

1. [[23]](#_23_57)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33頁。不久后，高崎正風于1912年2月28日逝世。

1. [[24]](#_24_5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34—735頁。

1. [[25]](#_25_55) 坊城俊良，《宮中五十年》，第23頁。

1. [[26]](#_26_5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03—804頁。

1. [[27]](#_27_54)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05頁。

1. [[28]](#_28_5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13頁。另請參閱坊城俊良，《宮中五十年》，第23頁。

1. [[29]](#_29_51)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71—72頁。

1. [[30]](#_30_49)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60頁。

1. [[31]](#_31_47) 末松謙澄，《御自制力のお強かりし先帝陛下》，《太陽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325頁。

1. [[32]](#_32_46)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75頁。

1. [[33]](#_33_4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19頁。新天皇的即位和年號的公布都是匆忙地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明治在將年號從“慶應”改為“明治”等待了超過一年半的時間。久米邦武對匆忙更改年號這一不當做法予以批評（《先帝崩御に際して余の感想》，《太陽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317頁）。

1. [[34]](#_34_45) 坊城俊良，《宮中五十年》，第49—50頁。

1. [[35]](#_35_42) 1912年9月，《太陽》雜志出版了一期臨時增刊，所有版面都用來追憶先皇。

1. [[36]](#_36_41) 牧野伸顯，《御親政初期の追憶》，《太陽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48頁。

# 第六十二章 乃木徇死



明治天皇駕崩當日沒有舉辦任何宗教或其他儀式，但是，子爵藤波言忠在獲得皇太后的恩準后，對天皇的身高進行了測量。天皇總是拒絕測量他的身高，即使是在為他縫制新衣服的時候。裁縫只能裁剪出一套尺寸差不多的衣服，天皇會試穿一下，然后告知裁縫哪個地方太緊、哪個地方太松，裁縫在沒有進行實際測量的情況下做些改動。[[1]](#_1__Ri_Ye_Xi_Zi_Bo_Xie_Dao__Jin)藤波測量得出天皇的身高為五尺五寸四分，約合一百六十七厘米。[[2]](#_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目前尚不清楚為什么藤波要求測量天皇的身高。飛鳥井雅道認為藤波可能是天皇唯一的朋友。他寫道，多虧了藤波，在其他文件上查找不到的天皇的準確身高，現在已經眾所周知了。[[3]](#_3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g)在描寫天皇時，通常都會說他個頭高，[[4]](#_4__Ou_Wen__Bei_Er_Ci_Xie_Dao)但他的身高是相對的；伊藤博文、乃木希典、東鄉平八郎等杰出人物按照現在日本的標準來看，大概非常矮小。雖然當時并沒有對天皇的體重進行測量，但我們從各種描述中得知，他體重超標已經很多年，并且他對這一話題很敏感。

7月31日，新天皇、皇后和皇太后走近放置明治天皇遺體的宮室，明治躺在一個鋪著純白色紡綢的平臺上。他身穿一套用這種紡綢制成的葬服。皇室成員（包括大正天皇的三個年幼兒子）向先皇的遺體告別，在他們身后的是一百七十一名侍奉過先皇的高官、貴族成員等其他哀悼者。當晚8點舉行了入殮儀式。大正天皇頒布詔書，下令暫停朝事五天；在此期間，犯人免服役，死刑和笞刑延期執行；禁止歌舞和音樂演奏。

8月1日，對先皇的靈柩進行了封棺。即使禁止歌舞奏樂的五天禁令解除后，東京市的居民仍然避免演奏音樂或參與其他娛樂活動。街道安靜，路上行人稀少。

8月6日，大正天皇宣布葬禮定在9月13日到15日舉行。這次的大喪儀打破了天皇駕崩時舉辦佛教葬禮的悠久傳統，而僅用神道教的方式舉行。這一方式缺乏先例，因此必須創造一些適當的“依照古代傳統”的儀式。[[5]](#_5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g)

大正天皇還宣布，先皇將被安葬在位于京都城南的古城山。選擇這個地點作為先皇的陵墓，據說是遵照先皇的意愿。顯而易見，明治是在1903年4月為觀摩海軍大演習和出席第五屆國內產業博覽會而身居京都時做出了這個決定。某個晚上，他和皇后共進晚餐、討論舊都時，突然說道，他已經決定在“百年之后”將自己安葬在桃山。當時正在服侍天皇的權典侍千種任子被這些話嚇到，并在日記中記錄了下來。當天皇的病情嚴重惡化時，皇后顯然回想起了天皇的心愿，于是將陵寢的選址定在桃山。[[6]](#_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3)

豐臣秀吉的伏見城就位于桃山。這是一個風景異常美麗的地方，但在德川時代，這里被遺棄，城堡成了廢墟，雜草叢生。能夠說明這里曾經建有一個城堡的事物，就只有“古城山”這個名字了。之后，人們在這個舊址上種植桃樹，于是這座山便有了一個新的名字——“桃山”。這個名字雖然悅耳動聽，但對于天皇的山陵來說相當平凡，因此，人們把和歌中經常提到的一個附近村莊名“伏見”，加在這個名字的前面，這座山也就被稱為“伏見桃山”。

得知天皇病情嚴重，東京的很多民眾請求政府將東京附近一些特別清凈的地方作為天皇的山陵，但是，他們的懇請沒有得到回應。天皇希望葬在京都，這個意愿所具有的效力和詔書相同。[[7]](#_7__Fei_Niao_Jing_Ya_Dao_Zhi_Chu)政府在東京建造了明治神宮，大概就是為了安撫東京居民受傷的感情。[[8]](#_8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22)

8月13日，先皇的靈柩被移到殯宮，暫時停放在那里。天皇、皇后和皇太后以及眾多官員每天都來叩拜，一直持續到了9月13日將靈柩移到專車上。8月27日，政府正式向先皇賜謚號“明治”。天皇的謚號取自其年號，是日本及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確實，年號“明治”與他在位期間的非凡事件如此密切相關，因而沒有比這個再適合的謚號了。[[9]](#_9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8)

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報紙紛紛向已故的天皇發表悼詞。日本將這些悼詞翻譯，合成厚厚的兩本，在天皇逝世一年后出版。不用說，無論是哪個國家發表的悼詞，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地進行贊揚。報紙主要描述了在明治統治期間日本發生的驚人變化，但也對天皇為此做出的個人貢獻大加贊賞。英國的社論最獨具慧眼，這可從下文（摘自《泰晤士報》）看出來：

外界普遍存在著一種觀點：日本宮廷仍守著舊時的傳統，天皇并沒有積極參與管理國家事務。這是一種無知的看法。那些了解實情的人可以一致證明天皇熱忱地履行議政職責。他擁有了不起的判斷能力，一旦信任某人則終身不變。他還擁有罕見的特質，絕對樂意讓其他人戴上成功的桂冠，因為對于國民他只有一點要求，那就是皇位是一種榮耀和崇敬、國民應當尊敬和信任君王的臣仆。因此，他的工作從來都不明顯，但仍然真誠懇切。[[10]](#_10__Wang_Yue_Xiao_Tai_Lang_Bian)

《環球報》（Globe）贊同這些觀點。

日本取得了如此令人驚嘆的進步。這在多大的程度上要歸功于先皇的個人能力，在多大的程度上要歸功于早年圍繞在他身邊的那些政治家們的遠見卓識，對此，一知半解的西方人沒法做出準確的判斷。但是可能正確的觀點是，如果天皇不具備這樣的品格，那么政治家們能夠取得的成就要少得多，進展也要慢得多。他具有的品質包括做出判斷的能力——這大概是君王能夠擁有的最寶貴的品質；對國事兢兢業業，這可從他在憲法頒布之前雷打不動地參加會議中看出來；過人的記憶力，能記住所有細節；具備極大的勇氣，無論是身體上的還是道義上的；完全不貪圖個人享受。[[11]](#_11__Wang_Yue_Xiao_Tai_Lang_Bian)

我們不清楚寫這些悼詞的記者是如何獲悉天皇的性格的。也許是由天皇身邊的人向外國媒體“透露”的。

比起關注明治本人，法國的社論關注更多的是明治統治期間發生的事件，但《通訊者報》（Le Correspondant）不僅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還引述了日本政治家的言論。第一段言論引自于伊藤博文：

無論是什么原因幫助日本取得了進步，也無論這些年我們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如果與對天皇陛下應盡的義務相比，這些都將變得微不足道。一直以來，陛下都是引領著這個國家的明燈。像我這樣竭力幫他建立開明政府的人即便做出了再多貢獻，但如果在每一個新的改革措施的背后，沒有他一貫給予的大力、明智和漸進式的支持，也不可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12]](#_12__Wang_Yue_Xiao_Tai_Lang_Bian)

第二段言論引自于末松謙澄：

陛下始終如一地關注國家事務的各個細枝末節。每天他都把自己沉浸在辦公室內，從清晨到深夜一直埋頭于政治事務當中。他了解各個部門的重要事項，尤其是對陸軍和海軍造成影響的事項……有時候，他了解民眾之間發生的種種事件，這讓（我們）感到吃驚。他最感興趣的是世界各主要國家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唯一的愿望就是向這些國家學習。[[13]](#_13__Wang_Yue_Xiao_Tai_Lang_Bian)

法國社論作者的洞察能力更強：

在某些時候，天皇對大臣的政策產生影響，因為他的作用、他的智慧都不容置疑。但是，他以了不起的智慧來完成的主要工作，是擔任這個國家的元首、作為民眾生活和國民感情的象征……那些偉大的君主都不是希望僅憑一己之力來管理國家事務的人（如菲利普二世），而是那些深信他的大臣、能借助有聲望的貴族來支持他們治理國家的人。[[14]](#_14__Wang_Yue_Xiao_Tai_Lang_Bian)

一份比利時的報紙稱贊明治天皇仿佛用一根魔杖將日本民眾從長久的沉睡中喚醒，并將他和古希臘的英雄進行了比較。[[15]](#_15__Wang_Yue_Xiao_Tai_Lang_Bian)一份俄國的報紙在指出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相似之處后，認為這兩人根本不同。彼得像戰士一樣戰斗過，他懂得航海，并且當過木匠；但天皇從來沒有在戰場上戰斗過，從來沒有造過船艦，也從來沒有爬過桅桿。彼得需要具備這些才能，是為了能夠單槍匹馬地建造一個全新的俄國；而天皇沒有這些才能也能夠做到。日本擁有眾多有才干的人，天皇只需挑選出最有能力的人來輔佐他。[[16]](#_16__Wang_Yue_Xiao_Tai_Lang_Bian)

中國的報紙對明治天皇的駕崩表達了悲傷之情。一份中國的報紙用以下話語來哀悼天皇：

嗚呼，富士山頭，云陰黯帝王之氣，琵琶湖畔，波聲泣考妣之喪，而此一世之雄手、攜三島國家于世界第一等舞臺之日本天皇，竟舍蜻蜓般之國土、龍虎般之國運，并五千萬大和民族，脫然撒手而去。[[17]](#_17__Wang_Yue_Xiao_Tai_Lang_Bian)

該文的作者無法抑制充溢內心的痛苦之情，代表中國民眾說了這些哀悼的言辭。在將明治的成就與世界歷史上其他杰出人物的成就進行比較時，他認為，盡管明治無法與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相提并論，但明治勝過阿提拉[[18]](#_18__Gu_Dai_Ou_Ya_Da_Lu_Xiong_Re)、窩闊臺（元朝的創建者）和穆罕默德，因為他們本質上都是游牧民族的首領，都是野蠻人，缺乏皇帝應具備的資質。多虧了天皇，日本才在戰爭中打敗了俄國，才與英國建立了同盟。作者為天皇哀悼，其中一個特別的原因是天皇為“黃種人”帶來了光明。他指的無疑是日本在引領東亞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上所發揮的領導作用。[[19]](#_19__Wang_Yue_Xiao_Tai_Lang_Bian)

這大概是中國人第一次認為自己與日本人屬于同一種族。在過去，中國人習慣認為自己的國家獨一無二，因為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化。雖然國民的長相與日本人很相似，但他們認為這不值得一提。日本在明治天皇的領導下取得了與西方大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尤其是日本在戰爭中打敗了俄國，似乎促使中國人認為他們與日本人之間存在著一個同為黃種人的紐帶。然而，即便在此時，仍有一名中國記者寫道，“（日本）人民勇毅，富模擬性，無本國固有文化”。[[20]](#_20__Wang_Yue_Xiao_Tai_Lang_Bian)一些作家通過間接批評中國人的自滿——這些中國人自信地認為自己的文化優于所有其他文化，因而拒絕采納西方的新學說——來稱贊明治天皇的成就：“亞洲東西稱國者，大小計十數。其能保存固有文化，吸收歐美新文明，卓然稱為立憲國者，僅日本而已。”[[21]](#_21__Wang_Yue_Xiao_Tai_Lang_Bian)

在天皇駕崩后不久，這些外國報紙繼發表評論之后，刊登了葬禮的描述。《評述報》（La Revue）的通訊員德·班澤蒙特（G. de Banzemont）在文章開篇中描述了日本民眾在得知天皇駕崩時的悲痛心情：

睦仁不僅是日本最負盛名的天皇之一，也是當今世界最偉大的君主之一。為證實這一點，人們只需要回想一下在第一次獲悉天皇病情時，日本民眾心中所充滿的痛苦即可。一連好幾天，淚流滿面的人群不顧酷熱高溫，朝著皇宮的窗戶不停地磕頭，異口同聲地向神靈祈禱。病房的微弱燈光，宣布天皇在承受臨終的痛苦，群眾悲痛慟哭的聲音難以想象。[[22]](#_22__Wang_Yue_Xiao_Tai_Lang_Bian)

很多日本人留下了他們在聞悉天皇死訊時的震驚與茫然。甚至是生于明治元年、與明治在位時間同齡的德富蘆花——一位經常批評政府并且抗議對牽涉大逆事件的人士執行死刑的小說家——想到這個統治時期已經結束，也感到十分震驚。他回憶道：

陛下駕崩，則年號將要更改。我并非不知，但總覺得“明治”這一年號會永不更替。明治元年十月，即明治天皇陛下舉行即位儀式的那年，首次從京都行幸東京的那月，我出生于東京西南三百里，靠近薩摩的肥后縣蘆北郡的一個叫做水俁的村子里。我已習慣將明治之齡視為我的年齡。與明治同齡，既驕傲又羞愧。

陛下駕崩，明治史之卷便合上了。當“明治”變成“大正”時，我有一種自己生涯中斷之感，覺得明治天皇帶著我的余生而去了。

這是萬物悲泣的一天。水田對面的糖果店飄來的笛聲，如一聲聲長嘆，令人肝腸寸斷。[[23]](#_23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_1)

夏目漱石在7月20日的日記中記述了他對取消花火大會——每年在位于兩國[[24]](#_24__Di_Ming__Wei_Yu_Dong_Jing_D)的隅田川舉行的傳統節日——感到困惑：

天皇尚未駕崩，沒有必要禁辦花火大會。細民多為此困惑。當局者缺乏常識，真是讓人難以置信。當局似乎在為是否要停止戲劇及其他娛樂活動展開激烈爭論。天皇的病情值得全體民眾同情，然而，要是沒有對天皇的健康造成直接損害，應當允許民眾像往常那樣生活……如果民眾被迫中斷正常事務，無論他們表面上對皇室多么虔誠深情，內心也一定積蓄著憤恨和不平。[[25]](#_25____Shu_Shi_Quan_Ji____Di_Er)

不過，即使是漱石，在得知天皇駕崩時也寫了一篇悼詞。[[26]](#_26____Ming_Zhi_Tian_Huang_houto)和幾乎所有日本人一樣，他對天皇——這位對統治期間所發生的巨大變革給予堅定支持的君王——進行了哀悼。盡管漱石不贊成很多此類變革，但他也意識到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做法，只要能夠在一個日益狂妄、日益不容東亞傳統的世界中維護日本的獨立和威望，那么必須忍受現代化丑陋的一面。

9月13日，在青山閱兵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大喪儀。晚上7點，靈柩離開殯宮，并被抬到了靈車上。車頂為中國古代風格，與英照皇太后的葬禮所采用的風格相同。靈車的全部車身都漆成了黑色，上面裝飾有三千多種金屬飾物，總重量將近三噸。靈車由精挑細選出來的五頭牛來拉動。8點，天已經很黑了，莊嚴的送葬隊伍點著燈籠，開始從宮門緩緩移動。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前侍從長德大寺實則、侍從北條氏康和大喪使事務官藤波言忠。他們身穿正式的喪服，并佩帶寶劍，和其他華族拉著靈車的繩子。曾親自侍奉過先皇的兩名貴族走在靈車的兩邊，高舉火把照亮道路。提前抵達二重橋的天皇、皇后和皇太后正在等待著送葬隊伍。隊伍經過二重橋時，他們向明治天皇做了最后的道別。那一刻，陸軍開始鳴放志哀禮炮，遠處的海軍在位于品川的戰艦上鳴炮回應。城內外寺廟的鐘聲同時敲響。[[27]](#_27__Yi_Hui_Zhao_Kai_Jin_Ji_Hui)

8點20分，靈車經過了皇宮正門，十二名騎兵加入進來，并在隊伍前面開路。近衛騎兵團走在這十二名騎兵的后面，跟在他們后面的是演奏著《哀之極》的近衛軍樂隊。被派來報道葬禮的記者生方敏郎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能比這些細軟、冗長、哽咽的樂聲更加悲涼了；“幾萬群眾瞬間吞聲正容，任這悲哀的音符籠罩。”[[28]](#_28__Sheng_Fang_Min_Lang____Ming)

舉著火把的兩名官員帶領著送葬隊伍，跟在他們后面的人攜帶著火把、鼓、鐘、白幡、黃幡、箭袋、弓、盾、戟、飾有太陽和月亮圖案的帝國三角旗、武器和裝有神道教用的驅邪幡的箱子。這支人群分成兩列或三列，作為靈車的先頭部隊。其他官員跟在后面，排在靈車前面的是站成兩列的五十名八瀨童子。[[29]](#_29__Lai_Zi_Ba_Lai__Wei_Yu_Bi_Ru)曾經親自效勞過先皇的官員（包括侍從）走在靈車的旁邊，直接跟在他們后面的是其他侍從。之后跟著的是二十八名陸軍上將、海軍上將、校級軍官、艦長和司令官，他們保護著隊伍的兩側；在他們后面的是以作為大正天皇代表的載仁親王為首的貴族成員、大喪使祭官長貞愛親王以及其他親王、王以及韓國皇帝的弟弟李堈。緊隨其后的是貴族成員、總理大臣、內閣大臣、朝鮮總督、高層海陸軍官以及其他文武官員，所有人都穿著正裝。

東京都當局對靈車將通過的街道進行了緊急維修，并鋪上了白沙。街道兩側掛滿了楊桐樹枝、織錦三角旗、煤氣燈和弧光燈，其間懸掛著黑布和白布扭成的繩。在隊伍經過的各個建筑物的前面都掛著一個白色的燈籠，象征著哀悼奉送。殯儀區雖然被送葬者擠得水泄不通，但卻浸沒在一片充滿敬畏的沉默當中。

晚上10點56分，靈車抵達了青山殯儀館。代表天皇、皇后和皇太后的官員出來迎接靈車。靈車通過第一個和第二個鳥居[[30]](#_30__Yi_Zhong_Lei_Si_Yu_Zhong_Gu)，進入殯儀館前面掛著的簾子之中。眾人在此處將牛從靈車上解下來，并將靈柩抬進殯儀館。此后簾子被拉開，天皇和皇后進入這個臨時的祭場，后面跟著一位代表皇太后的官員、亞瑟王子（代表英國國王）、大使和特派代表。所有人就座后，儀式開始。

首先，神道教的神官朗讀祭文。之后，新天皇離席走到靈柩面前鞠躬，并宣讀了桂太郎準備的悼詞。天皇的聲音低沉，充滿了哀傷。在場的人一邊聽一邊傷心地嗚咽。禮炮的轟鳴聲在東京都回蕩，表明這個城市進入默哀時刻。六千萬民眾在遠處鞠躬致意。9月14日中午12點45分，大喪儀結束。[[31]](#_31__Zhe_Ge_Miao_Shu_Dui___Ming)

就在御靈車離開皇宮的那個晚上，陸軍大將乃木希典和他的妻子靜子在其府邸殉死。乃木在面朝皇宮的窗戶旁擺放了一張小桌子，桌面鋪著白布，并在上面放著一幅先皇的遺像和楊桐樹枝。他還留下了絕命詩：

明君神化身

功蓋天下萬世久

悲痛泣難休

皇恩沐浴數春秋

愿了此生君側留[[32]](#_32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

乃木先用軍刀剖開腹部，然后用刀刺喉，接著將身體向前壓下去。他的妻子用匕首直扎心臟。

乃木在遺書中解釋說，在西南戰爭期間自己丟失軍旗，希望對這一恥辱以死謝罪，但一直沒有機會。[[33]](#_33__Nai_Mu_Yu_Xi_Nan_Zhan_Zheng)在清日戰爭和日俄戰爭期間，他再次想要自殺，但這個機會又被剝奪了。日俄戰爭期間，數萬將士（包括他的兩個兒子）在他指揮奪取旅順的戰役中喪生。讓陛下失去了這么多的“赤子”使他深感羞愧，但天皇并沒有責備他，而是在戰后任命他擔任學習院的院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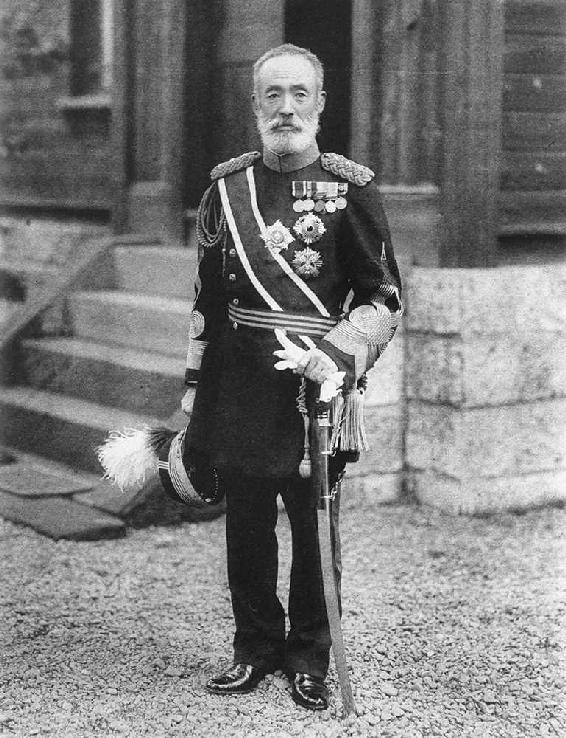
乃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天皇的關懷之情，他遺憾自己年事已高，回報皇恩的時間所剩不多。在天皇病重的最后時刻，他每天都進宮請安，并祈禱天皇康復，但這一切都無濟于事。天皇駕崩讓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他決定了卻余生，以示效忠于天皇的圣靈。

幾年前，日俄戰爭結束，在凱旋東京的當天，乃木向天皇表達了想要切腹自殺的意愿，以便向旅順戰役中喪命的眾多官兵謝罪。剛開始天皇什么也沒有說，但當乃木離開時，天皇叫住他，并說道：“卿欲以切腹謝朕，朕能知之。然今非卿死之秋。卿若強死，宜于朕去世后。”[[34]](#_34__Shan_Lu_Ai_Shan____Nai_Mu_D)

據說，當乃木自殺的消息傳到青山殯儀館時，每一個人都為乃木如此高潔忠烈的行為肅然正襟。[[35]](#_3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17)剛開始，森鷗外懷疑乃木是否真的自殺，但在得知傳聞屬實后，他在隨后四天寫了《興津彌五右衛門的遺書》。這個短篇小說的主題講的是一個武士在主人死后殉死的故事。森鷗外對彌五右衛門決定以自殺來證明其悲痛之深的做法給予無條件的贊美，但在其后的作品《阿部一家》中，森鷗外對殉死的可取性似乎不那么確定。他在故事中說，很多人只是因為與死去的大名有著間接的關系，或者甚至沒有絲毫的關系便自殺，好像他們只是在做人們期望他們去做的事情那樣。

武士決心用無法反駁的方式來展現自己對過世主人的忠誠之深，通常都受到贊賞。但是，如果已故大名的所有最有能力、最可信的家臣都自殺，那么大名的繼承人就會喪失他們的指導。即使是出于高貴的動機，自殺也是不負責任的。殉死的做法在17世紀非常流行，導致日本明確頒布了一項法令，規定未經授權而自殺的人是“犬死”，即死得沒有意義。這條禁令被納入了1782年修訂的《武家諸法度》。[[36]](#_36__Song_Xia_Fang_Nan____Nai_Mu)

乃木的自殺違反了該法度，但這并不是此舉受到批評的原因。明六社——在明治時代早期由倡導“啟蒙”的知識分子組成的一個團體——僅存的一名成員加藤弘之評論說，盡管過去的人可能欽佩這位陸軍大將的做法，但現在這種做法已經過時了。他問道，為什么這位狂熱的忠誠之士沒有考慮過要向新天皇表示效忠之心呢？也許是擔心其他軍官可能會效仿乃木的殉死，軍隊隱瞞了他的動機，將他的自殺行為歸結為精神錯亂。[[37]](#_37__Yuan_Le_Yuan____Nai_Mu_Da_J)對乃木的自殺批評最多的一點是，此舉讓明治的繼承人失去了乃木的指點。盡管沒有人如此直白地說出來，但大正的教育受到阻礙不僅是因為他身體上的疾病，也因為他的老師無力向一個令人頭疼的學生提供充分的指導。天皇希望大正的兒子們能有一位絕對正直的人士來指點，而這正是他為什么選中乃木擔任學習院院長的原因。但現在乃木死了，三位王子無法再從他的教誨中受益。



身著禮服的乃木希典

乃木給出的自殺理由也許很真誠，但它們似乎屬于另一個時代。丟失軍旗的其他軍官不認為他們需要用自殺來為過失贖罪，也不認為必須采用自我犧牲的方式來對先皇的仁慈表達感激之情。盡管如此，乃木的死使大多數日本人聯想到舊式的武士美德。不過，也有人對此持有懷疑甚至是敵視態度。曾在學習院上過學的白樺派[[38]](#_38__Ri_Ben_Xian_Dai_Wen_Xue_Zho)作家尤其如此。武者小路實篤發表了一篇文章，將乃木的自殺斥責為“一種只有在濫用這一行為的扭曲時代形成扭曲思想的智力扭曲的人才會贊賞的行為”。[[39]](#_39____Wu_Zhe_Xiao_Lu_Shi_Du_Qua)他將乃木的自殺與凡·高的自殺進行比較，認為前者是完全缺乏人性，而后者則揭示了人性的本質。

志賀直哉在9月14日的日記中記錄下了他對乃木自殺的第一反應：“真是個蠢蛋！”“就好像下人什么都不想而做了某件事情時的感覺”。第二天，他將自殺的乃木描述成“愚念的臣服者”。[[40]](#_40____Zhi_He_Zhi_Zai_Quan_Ji)

批評乃木行為的人絕非僅僅局限于學習院的學生。漢詩詩人長井郁齋的諷刺詩《忠義》就包含有以下詩句：

乃木將軍忠義規，

明治圣帝圣天資。

將軍知禮誰非禮，

為惜朝廷疏舊儀。

（中略）

武門中世喜為之，

詢葬固非皇舊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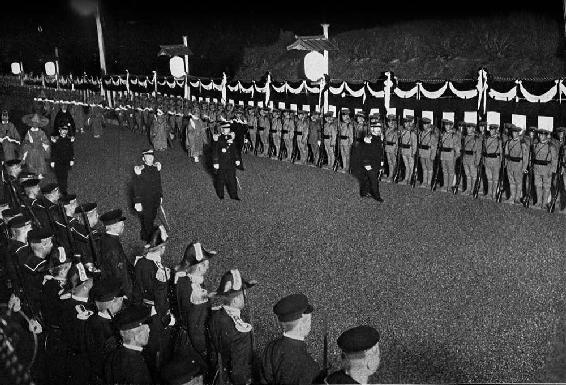
誰料堂堂軍上將，

卻為寺婦宦官為。[[41]](#_41__Yuan_Tian_Xian_Xiong____Ri)

甚至是報紙，在剛開始的時候也并非一致贊揚乃木的自殺行為。一些報紙批評乃木未能履行接待亞瑟王子等國賓的職責，另一些則指責乃木未能服侍新天皇。但兩天后，媒體的基調變了。9月16日，記者黑巖淚香（1862—1920）寫了一篇關于乃木的文章，“民眾是否應當奉乃木為神？是的。如果他不受此殊榮，還有誰能受此殊榮……實際上乃木大將就是神”。9月19日，《東京日日新聞》對乃木的死表示遺憾，問道未來的民眾應當將誰作為理想日本人的楷模，并在將乃木和楠木正成[[42]](#_42__Nan_Mu_Zheng_Cheng_Shi_Lian)進行比較后，自答道這個人就是乃木希典。從這時起，乃木便成為了忠君之士的化身，一個不可能受到批評的傳奇英雄。[[43]](#_43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乃木被尊奉為軍人忠心和效忠于皇室的完美典范。

9月14日凌晨1點40分，就在乃木自殺后的幾個小時，裝有天皇遺體的靈柩被運上了開往京都的專列。專列有七節車廂。中間的車廂放靈柩，以載仁親王和貞愛親王為首的送葬者坐在其他車廂。專列在從東京到京都的各個主要站臺停靠了幾分鐘。在站臺上（甚至是站臺之間的鐵軌上），民眾都在畢恭畢敬地鞠躬。當天下午5點10分，專列抵達桃山。靈柩接近目的地時，第二十二連隊野戰炮兵鳴放禮炮志哀，沿途列隊的海陸軍樂隊演奏起《哀之極》。

站成兩排的一百零五名八瀨童子擔任抬棺人，走在他們旁邊的是曾親自效勞過先皇的高層陸海軍軍官和侍從。當天晚上7點35分，送葬隊伍抵達葬場。此時，下了有一段時間的雨停住了，清輝的月光灑下來。八瀨童子將靈柩從所盛放的肩輿架上抬下來，移到了陵墓旁，并放置在石棺內。在將先皇的私人物品放進石棺后，進行了封棺。雕刻有四方神將的埴輪[[44]](#_44__Ri_Ben_Yong_Yu_Pei_Zang_De)被放置在陵墓的角落，并樹立起了一塊刻有“伏見桃山陵”字樣（出自于貞愛親王之手）的石碑。貞愛親王走向陵墓，鞠了三次躬，并在石棺上放置了一抔潔凈的泥土。最后，用純砂覆蓋在石棺的頂部。



送葬的隊伍到達桃山

9月15日上午7點，葬禮完畢。9點55分，整個儀式結束。[[45]](#_45____Ming_Zhi_Tian_Huang_Ji_9)

1. [[1]](#_1_62) 日野西資博寫道，盡管天皇的衣服從來都不合身，但他絲毫沒有受此困擾（《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89頁）。這種說法遭到了《明治天皇紀》的編纂者的質疑，他們記錄下了1872年春一位歐洲裁縫從橫濱來給天皇進行量身的情景（第二卷，第666頁）。當時對天皇進行了量身，但即使那一數據準確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天皇后來變胖了，裁縫大概需要猜測哪些數據發生了變化。

1. [[2]](#_2_62)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28頁。

1. [[3]](#_3_62)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9頁。在《明治天皇紀》或與天皇生活有關的其他記載中，藤波并不是一個占據重要地位的人物，也許是因為他與天皇之間的關系比較隨意、比較私人。

1. [[4]](#_4_62) 歐文·貝爾茨寫道，“對于日本人來說，睦仁天皇高大威嚴”（Erwin Baelz,Awakening Japan ,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395）。

1. [[5]](#_5_62)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33頁。

1. [[6]](#_6_62)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30—831頁。亦見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48—49頁。飛鳥井雅道指出，千種任子似乎沒有留下日記，因此無法確定這是否真的是天皇的意愿。

1. [[7]](#_7_62) 飛鳥井雅道指出，盡管日本的首都從來都沒有正式地從京都遷到東京，但當天皇訪問京都時，描述的是“行幸”，而非“還幸”（《明治大帝》，第46—47頁）。根據1889年在頒布憲法時發布的《皇室典范》，即位式和大嘗祭都在京都舉行。但事實上，1871年的大嘗祭在東京舉行。盡管天皇喜歡京都，但仍接受了將東京作為首都這一事實。然而，他可能覺得當他在世間的職責完成時，他有權被埋葬在他所選定的地方。

1. [[8]](#_8_62)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31頁。

1. [[9]](#_9_62)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33頁。

1. [[10]](#_10_62) 望月小太郎編，《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1頁；1912年7月30日的《泰晤士報》（倫敦版）。

1. [[11]](#_11_62) 望月小太郎編，《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37頁。

1. [[12]](#_12_62) 望月小太郎編，《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18—119頁；日語原文請參閱上卷，第228—289頁。尚不清楚伊藤是否發表了這番言論。

1. [[13]](#_13_62) 望月小太郎編，《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19頁；日語原文請參閱上卷，第229頁。

1. [[14]](#_14_62) 望月小太郎編，《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19頁。

1. [[15]](#_15_61) 望月小太郎編，《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上卷，第687頁。

1. [[16]](#_16_61) 望月小太郎編，《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上卷，第599—600頁。

1. [[17]](#_17_61) 望月小太郎編，《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205頁；1912年8月2日的《國光新聞》（北京版）。

1. [[18]](#_18_60) 古代歐亞大陸匈人的領袖，后代史學家稱之為“上帝之鞭”。——譯注

1. [[19]](#_19_60) 望月小太郎編，《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206頁。

1. [[20]](#_20_59) 望月小太郎編，《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233頁。譯注（從中文翻譯成日文）添加了一個注釋，大意是說這名記者仍然充滿了作為中國人的優越感。

1. [[21]](#_21_59) 望月小太郎編，《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211頁。

1. [[22]](#_22_58) 望月小太郎編，《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75頁。

1. [[23]](#_23_58)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31—32頁。另請參閱Carol Gluck,Japan’s Modern Myths , p. 220。德富蘆花的《明治天皇の崩御の善後》收錄在《明治文學全集》第四十二卷第338頁的《みみずのたはこと》一文中。格盧克（Gluck）對天皇葬禮所彌漫的氣氛進行了很好的描述。另請參閱報道了葬禮的記者生方敏郎在《明治大正見聞史》第189—211頁中的描繪。

1. [[24]](#_24_56) 地名，位于東京都中央區和墨田區的兩國橋的周邊一帶。——譯注

1. [[25]](#_25_56) 《漱石全集》第二十卷，第398頁。一份第一次披露天皇病重的報紙特刊促使夏目漱石寫了這篇日記。

1. [[26]](#_26_56) 《明治天皇ほうとうの時》，見《漱石全集》第二十六卷，第312頁。漱石尤其稱贊天皇重視教育，在小說《心》中對天皇的駕崩和乃木的殉死進行了著重塑造。

1. [[27]](#_27_55) 議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給葬禮撥款154.5389萬日元（《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32頁）。關于葬禮的詳細描述請參閱第838—843頁。

1. [[28]](#_28_52) 生方敏郎，《明治大正見聞史》，第207頁。

1. [[29]](#_29_52) 來自八瀨（位于比叡山附近的京都的一個地區）的人從古時起被稱作“八瀨童子”。之所以被稱為“童子”，是因為他們不梳發髻。按照傳統習俗，他們負責抬延歷寺（位于比叡山的一個天臺宗寺院）住持和皇室的肩輿。

1. [[30]](#_30_50) 一種類似于中國牌坊的日式建筑。日本人認為，鳥是人類靈魂的化身，其中有好的靈魂，也不乏骯臟的靈魂，不能讓鳥接近神社，故而在各個神社的正門前二百米左右處建“開”字形牌坊，名為鳥居。鳥在此居住，就不會飛入神社。——譯注

1. [[31]](#_31_48) 這個描述對《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38—843頁的大葬儀的描繪進行了匯總。漱石為送葬隊伍作了一首俳句：肅穆送行人／火把高舉悲中行／爍如夜空星（《漱石全集》第二十四卷，第84頁）。

1. [[32]](#_32_47)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44頁。

1. [[33]](#_33_46) 乃木于西南戰爭期間寫的日記中，并沒有提到丟失軍旗一事。也許在那時此事對他而言并不重要（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54頁）。如需了解乃木遺書的部分內容，請參閱第248頁。

1. [[34]](#_34_46) 山路愛山，《乃木大將》，第305—306頁，轉引自源了圓，《乃木大將の自殺とその精神指摘背景》，第15頁。只有少數人（包括侍從長德大寺和侍從武官岡見）目睹了這一時刻。他們都對此保密，但在乃木死后，岡見才披露天皇說了什么。源了圓的文章對乃木自殺的背景進行了精彩的論述（《心》，1963年12月）。

1. [[35]](#_35_43)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45頁。但是，一些人在最初聽到乃木自殺的消息時不太相信。剛開始，生方認為這個消息只不過是一個拙劣的玩笑（《明治大正見聞史》，第214—215頁）。森鷗外對這個消息半信半疑（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47頁）。

1. [[36]](#_36_42) 松下芳男，《乃木希典》，第213頁。

1. [[37]](#_37_36) 源了圓，《乃木大將の自殺とその精神指摘背景》，第16頁、第17頁。

1. [[38]](#_38_31) 日本現代文學中的重要流派之一，由創刊于1910年的文藝刊物《白樺》為中心的作家與美術家組成，包括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志賀直哉等。該派反對自然主義文學，主張新理想主義為文藝思想的主流，也稱為新理想派。——譯注

1. [[39]](#_39_29) 《武者小路實篤全集》第一卷，第495頁。在他同時期的其他作品中，武者小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乃木的自殺這一話題，總是將這一行為視為不合時宜的。

1. [[40]](#_40_28) 《志賀直哉全集》第十卷，第636頁。另請參閱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77頁。三天后，志賀在日記中寫道，詩人吉井勇將乃木的自殺稱為“最近幾天來最不愉快的事件之一”。

1. [[41]](#_41_28) 原田憲雄，《日本漢詩選》，第246—247頁。在師從副島種臣學習漢詩后，長井郁齋曾在清朝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在清朝的名氣要比在日本大。

1. [[42]](#_42_28) 楠木正成是鐮倉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時期著名武將，一生竭力效忠后醍醐天皇，在湊川之戰陣歿。后世稱其為忠臣和軍人之典范，將其視為武神。——譯注。

1. [[43]](#_43_25)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79頁。

1. [[44]](#_44_24) 日本用于陪葬的陶器，形狀多樣，放于古墳頂部和墳丘四周。——譯注。

1. [[45]](#_45_24)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46—847頁。

終章

與過去五百年統治日本的天皇不同，明治天皇即使在死后也沒有被人遺忘。“明治”這一稱呼來自于年號，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現在以始于明治維新的明治歷史研究的標題當中，而如“明治的文化”、“明治的思想”之類的概念，在沒有提及明治天皇的書籍中也頻繁出現。

日本在1860年代打開國門后的半個世紀中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深受吸引的學者從所有能夠想象得到的角度對明治時期的事件進行研究，就算天皇本人也常常成為被研究的對象。天皇一生中受到廣大民眾的崇拜，較之獨特個性，更多的是因為他是將日本從昏暗的東方君主國轉變成位列強國之一的現代國家的推動力量。死后他被尊為神，受到了高度崇拜，這可以從在東京修建的“明治神宮”中看出來。他的生日（11月3日）成為了全國性的假日，被認為是一年當中最重要的慶典。[[1]](#_1___Erwin_Baelz___aid_LKG___tra)

隨著曾在明治時代生活和工作過的日本人漸漸減少，人們逐漸將“明治”當成一個名字，也常常將他的成就與效勞他的文武百官的成就相混淆。人們一般記住，例如，他在領導日本戰勝清朝和俄國時所扮演的英雄角色。事實上他在這兩場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他雖沒有被人遺忘，但是，要是讓說出一個無可置疑地應歸功于他的功績，大多數日本人都會感到比較困難。

不僅僅是與他有關的記憶漸漸淡化，就連作為他在位期間實體標志的許多建筑物也消失了。一些消失在1923年的大地震或1945年的東京轟炸，更多的毀于較之保留歷史更在意商業利潤的后世日本人手中。明治時代的標志性建筑物——鹿鳴館——于1941年被拆毀。位于東京站前面的一排排紅磚建筑，似乎代表著明治時代后期的日本人所懷有的希望，即終有一天日本也能取得像倫敦那樣的商業成就。這些建筑雖然在戰爭中幸存了下來，但在戰后只因被認為是低效能建筑而拆毀。明治時代的其他遺跡被遷移到了明治村[[2]](#_2__1927Nian__Ri_Ben_Zheng_Shi_X)，在那里，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建筑物被別有風味地規劃到樹木成蔭的環境中。

每年新年，明治神宮都是參拜者人數最多的神社。但是，大概只有極少的人才會在鞠躬時回憶起神龕內的天皇，乞求他為來年賜福。大部分拼命擠向祭壇的參拜者或許只是希望今年人數也能破紀錄吧。明治位于京都的陵墓幾乎不見人影。明治和他的時代，就像常常被引用的中村草田男的俳句那樣，越來越遙遠。

雪落，而明治漸遠

傳記作家的任務就是讓他們的對象再次浮現在人們的眼前。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作傳的著名傳記作家里昂·埃德爾（Leon Edel）曾經說，傳記作家必須“愛上”他的寫作對象。不過，“愛上”明治——這個即使在最不正式的時刻也從來沒有忘記身份或皇祖皇宗，并且很少流露自己感情的人物——很困難。很多軼事講述了天皇在宴會上的情形。只要桌上有酒，他就不停地喝，然后步履不穩地離開。這類佚事記錄了天皇私人的一面，但最后，它們也只是證實了一個很無趣的事實：和數百萬其他日本人一樣，天皇喜歡喝清酒。它們并沒有拉近我們與天皇的距離。天皇和無名女子（包括據說是在旅行期間由地方人士獻上的女子）發生緋聞的小道傳言同樣沒能說明任何問題。

明治似乎總是排斥傳記作家為進一步接近他所做出的嘗試。如果那些最了解他的人樂意寫回憶錄的話，那我們對他的認識可能會有所不同。但很顯然，昭憲皇后永遠不會透露她婚姻生活的細節（比如，她對天皇擁有眾多典侍有何感受），我們也不要指望之后的大正天皇會對他和父親關系緊張的原因進行解釋；不過，如果藤波言忠能夠講述和天皇做朋友是怎樣一番情形，或者如果園祥子（天皇最后八個孩子的生母）說這個冷酷、疏遠的男人也有溫情的一面，那我們將會對明治有個更好的了解。

除了在公共場合所表現出來的方方面面外，也許明治并沒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他是一個很少表露個人喜好、不以苦樂為意的人，幾乎從來都不抱怨自己遭受到的炎熱、寒冷、疲勞、饑餓或其他普通民眾遇到的苦難。他總是擺出一副夸張的漠然置之的表情。一名侍從寫道，在軍演期間鳴炮時，他拒絕將棉布塞進耳朵里，即使隨行的所有人都采取這一防范措施。[[3]](#_3__Ri_Ben_Ren_Jiang_Ming_Zhi_Sh)

明治不講究生活舒適，大概可以歸因于他所受到的儒學教誨。但這種教誨與他的父親以及宮中其他成員所接受的教誨在本質上是相同的，然而，他們都不像明治那樣恬淡寡欲。和他的父親不同，明治很少發怒，也很少有任性隨意或不負責任的行為。他似乎擁有一些內在力量，使得他極少背離自己定下的行為準則。直到生命的最后，就在他非常費力地掙扎著出席東京大學的畢業典禮以及參加樞密院的會議時，他都在遵循著這套準則。他不愿意向任何人（甚至向自己）承認他在承受痛苦。

侍從日野西資博回憶，天皇很少流露出自己的情感：“我服侍天皇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從來沒有見到過天皇有過異常開心或極度悲痛的表情。”有兩三天的時間，日野西都無法鼓起勇氣將伊藤博文被暗殺的消息告訴天皇，但是，在得知他最信任的大臣被暗殺時，天皇所說的只有“嗯”。在憲法會議上，當天皇獲悉彰仁親王的死訊時，他只是“嗯嗯”地點頭會意，而后，會議繼續進行。[[4]](#_4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_T)

在統治初期，他從來沒有抱怨過在全國不同地方進行的繁重辛勞的巡幸，即便他在各個目的地的住宿都很簡陋。遵循著自己的那套行為準則，他可以忍受一整天挺直背坐在悶熱的轎子里的折磨。在到達后，他也不能獨處放松一下。一到達目的地，他就被絮叨地表達喜悅和感激的當地官員團團圍住，天皇需要專心地聽他們所有人說話，仿佛很感激他們能說出這番話一樣，從來沒有表現出厭煩。這種責任感也迫使他對當地的特產和遺跡進行了仔細視察，即使他已經感到筋疲力盡。

當坐在轎子里顛簸好幾個小時的時候，他在想些什么呢？大多數的時間，尤其是在道路難行的時候，他可能在提醒自己，“這是朕的國土”。他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萬世一系的天皇的后代，他們曾經統治自己正在巡幸的這個國家。他有義務遵循“國見”的古老傳統，視察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地方。他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放棄皇祖皇宗建立的先例，堅決不做可能讓皇祖皇宗不光彩的事情。

同樣，天皇還將他在旅途中遇到的人視為臣民。在進行第一次江戶之旅前，他大概從來都沒有見過正在勞作的農民或漁民，但是，當看見他們時，他知道那些人就是他的臣民。他沒有像平安時期的貴族那樣，幾乎將他們視為非人的卑賤者，也不討厭和百姓一起觀看馬戲表演、賽馬或煙花表演這些平民的娛樂活動；在旅行中，他有時候也會和百姓們一起吃簡單食物。

天皇對巖倉具視有特別的親近感。巖倉長年負責天皇的教育，是天皇童年就認識的貴族。不過天皇晚年身邊都是出生卑微的人，比如他最信任的伊藤博文，可天皇沒有因為他們的出生而看不起他們。就像伊藤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樣，有才能的人可以進入新貴族的行列，無論他們有著怎樣的出生。

在和外國人打交道時，明治總是彬彬有禮，甚至是誠懇親切。無論出現在他面前的是誰，他總是面帶微笑，并與他們握手。他與美國前總統格蘭特的會見尤其令人難忘。大概他在一生中所獲得的建議都無法比特蘭特的建議更讓人印象深刻。天皇對夏威夷國王很友好，盡管他對國王提出的建立由天皇領導的亞洲國家聯盟計劃的可行性表示懷疑。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在大津受傷后，他關懷備至，不僅是因為擔心俄國攻打日本，而且還因為其對在遙遠的異國遭到襲擊的皇太子懷有同情之心。每一個覲見過天皇的外國皇室成員都受到天皇非常親切的接待，因此私下或許會覺得自己是第一個感受到如此友好態度的人。

明治所接見的外國人不限于國家首腦。他幾乎每天都會接見一些準備回國的外國技術專家或教師。不計其數的外國政要（主要是軍人和政治家，但也有救世軍[[5]](#_5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_T)領導這樣的人）會求見明治，對客居日本期間的生活表達贊美之情，其中的大多數人都得到了天皇的接見。很多外國人獲得了日本皇室授予的高級別勛章。鮮有國家像明治天皇統治時的日本那樣如此慷慨地授予勛章。

很難說清天皇對他統治期間日本所發生的變化有何反應。盡管和很多信奉儒家學說的人一樣，天皇通常會遵循古制，但他似乎越來越不愿意在新年時操持傳統儀式（如四方拜）。他無疑信奉神道教，但卻很少參拜神社。回到京都時，他會去先皇的陵墓祭拜，而不是去神社；他認為信奉神道教要次于敬拜祖先。[[6]](#_6__Ji_Du_Jiao__Xin_Jiao__De_Yi)雖然很多皇祖皇宗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但他并沒有為此感到煩惱。他自己對佛教漠不關心，甚至有敵對情緒。

有時候，善意的傳教士向天皇贈送《圣經》，但是，這并不表明天皇曾讀過。就算他勤奮研讀《圣經》的日譯本，也不太可能動搖他的信念：他是神的后代，是萬世一系的天皇的后裔。當時很多年輕知識分子都成為了基督教徒，但對明治來說，基督教是一個外來宗教，他不會考慮基督教的教義。

盡管明治天皇對基督教沒有興趣，但他似乎對在治世期間涌入日本的西方事物并不排斥。在日常生活中，他經常穿軍裝或雙排扣長禮服，很少見他在公共場合穿日式服裝。此外，他也不反對皇后偏愛歐洲式樣服裝的喜好。他最喜歡的似乎是日本料理，但對于正式的宴會中提供的西餐也會毫無怨言地享用，甚至還吃得津津有味。白天，他就坐在書房桌子前的椅子上；宮中的公務房間都采用西式風格。明治不喜歡電燈，不是因為這是外國的東西，而是因為他擔心錯搭電線可能會引發火災。

在一場大火燒毀了舊的宮殿后，因為不愿意把錢花在這方面，他盡可能推遲建造新宮殿。最終，他意識到，為了給外國賓客留下深刻印象以及維護國家聲望，他需要將宮殿建造得富麗堂皇。但是，宮殿中不允許賓客進入的地方仍然很簡陋。一直以來，明治似乎都不愿把錢花在自己身上，他對制服縫縫補補的故事就能證明這一點。

明治的消遣活動包括聽留聲機，并跟著一起哼唱，尤其是在播放軍樂的時候。[[7]](#_7__Guan_Yu_Ji_Bai_Zu_Xian__Qing)他在晚年時有了一個新的娛樂活動，就是看活動寫真。他喜歡舶來品，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拒絕日本的傳統藝術，而只是表明他接受最新發明。另一方面，他喜歡的體育運動——蹴鞠和射箭——就很傳統，而且他常常對日本藝術品表現出偏愛之情。

天皇也有一些小怪癖。歐文·貝爾茨回憶道：

他無法忍受皇后的座椅和他的一樣高。他想要御座更高些，但井上反對。某天，在進宮謁見時，井上發現天皇的御座下面偷偷地放了一個很厚的絲制墊子，他將墊子扯出來，扔到宮室的一個角落，這自然導致了天皇和他“大吵”。[[8]](#_8__Shi_Cong_Ri_Ye_Xi_Hui_Yi_Dao)

他似乎還有施虐傾向。例如，他故意把蘆筍掉在滿是灰塵的餐廳地板上，讓侍從撿來吃。也許這種施虐行為對于具有絕對權力的人來說（至少在理論上）是無法避免的。他大概想知道舉止滑稽的忠實侍從對他的順從達到了哪種程度。

天皇的施虐行為（如果這個詞語適當的話）與他的幽默感密切相關。每一個了解并撰寫過回憶天皇的文章的人，都提到這位令人敬畏的天皇的幽默感。如果被舉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的話，那么說明他的幽默是陽剛熱情式的，而非機智風趣型。侍從日野西回憶了這個佚事：

某天，當我出現在他的面前時，我發現他在笑。他說昨天晚上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問他是什么，他說：“昨晚，山口和綾小路睡在隔壁。山口鼾聲如雷，綾小路磨牙霍霍。睡在二人的居室之間，朕享受了一場最不同尋常的音樂會。”站在近旁的山口說道：“不，臣認為陛下的鼾聲更大。”陛下對此哈哈大笑起來。[[9]](#_9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_T)

天皇還被譽為具有過人的記憶力，但所列舉的這個例子表明他的記憶力一點也不超群。侍從日野西寫道：

每個人都認為天皇擁有驚人的記憶力，但我卻回想不起有哪些具體例子。不過，我陪他在京都時，他詳細地告訴我某個房間在過去的使用情況。他回憶起當他仍是小男孩時，皇太子宮殿房檐下有一個溝渠，他常常在那里捉鳉魚。[[10]](#_10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

天皇沒有什么需要消耗腦力的愛好。日野西寫道：

我幾乎從來沒有見過他讀任何東西。他只在年初聽講座時看書。也許當他還住在赤坂行宮的時候，有更多的空閑時間看書；然而，當處理國事的壓力日益增大，有越來越多的事情占用他的時間時，這種事情想必就沒有了。在我服侍他的所有時刻，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在讀書。[[11]](#_11__Ri_Ye_Xi_Zi_Bo____Ming_Zhi)

即使明治不讀書、不看報，他也會設法從每日回答咨詢的官員那里獲得有關世界局勢的大量信息。毫無疑問，在會見外國賓客之前，他會大概了解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在這方面的見解給賓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天皇每年年初聽取的講座，激發了他對歷史或哲學的興趣，但從來沒能促使他對這些話題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似乎沒有讀過那時期的文學作品或短歌詩集，更別提學術專著了。

天皇真正學習過的學問主要是元田永孚闡釋的儒家傳統，這些講座持續到他三十歲的時候，無疑幫助他形成一種嚴于律己的責任感。他極少拒絕做別人期望他去做的事情，在熊本的軍演結束時他固執地不參加宴會就是一例。天皇似乎特別討厭大臣們（或其他人）迫使其適應他們的計劃。他拒絕利用身在奈良的機會去祭拜神武天皇的山陵一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他并非不樂意祭拜先祖的山陵，而是不喜歡讓其他人來決定應該做什么。不過，最后天皇通常都會被說服，如果沒有，他之后也會道歉。在他的統治期間，曾有一段時期似乎不愿意履行作為統治者應當履行的日常事務，也許這是因為他厭倦了文書工作，或者厭煩了那些顧問。但是，總的來說，他責任心強，很少不顧及大臣的意見。

天皇信賴他的大臣，這使得我們難以確定那些以天皇名義做出的決定中，哪些是他做出的，哪些是由他的大臣們做出的。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詔書一定是那些文言文素養比他好的人士寫的。不過，我們無法知道，詔書在何種程度上反映出了他的個人意見。也許可以比較穩妥地說，詔書并沒有違背他的意愿。

他的詔書中常常出現一個主題，以至于人們不禁會將這個主體看成是天皇最深刻信念的表示：他反復強調希望和平。這看起來不過是一個慣例的表達，或者可能是一個用來粉碎成為“和平障礙”的敵人的借口，但從天皇對治世期間發生的戰爭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來看，雖然他喜歡穿制服，喜歡觀摩陸軍演習，但真的不喜歡戰爭。

在西南戰爭期間，他如此漠不關心，以致拒絕履行擔任國家元首的義務，甚至拒絕完成學業。在1894年向清朝宣戰時，他表示反對。在日俄戰爭期間，得知旅順大捷時，他的第一反應不是喜極而泣，而是下令妥善對待敵軍將領。天皇堅持強調他對和平的渴望，甚至給暗殺伊藤博文（天皇最信任的顧問）的安重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許天皇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位時間比較長久。就這一點而言，他與幾乎同時期的維多利亞女王相似。媒體曾抨擊維多利亞女王因多年沉湎于悲傷之中而忽略了職守，但最后，靠著統治時間長久，她獲得了偉大君主的美譽。[[12]](#_12__Zai_Shen_Ai_De_Zhang_Fu_A_E)如果明治和他的父親一樣在三十六歲的時候英年早逝，那么會是什么情況？大概人們最多也就能記住，在日本發生種種大變革的時代，剛好有一個年輕人繼位。但是，他在位時間長，以及給人留下的堅定不移的印象，都使他獲得了令人敬畏的、甚至是神圣的權威。就在他駕崩后不久，《太陽》雜志出版了一期臨時增刊，標題是《明治圣天子》。在他駕崩當日，《大阪每日新聞》的頭版發表了一篇文章，稱逝世的天皇為“大帝”，這個和彼得大帝一樣的稱呼之后頻繁使用，直到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對為什么給自己的書命名為“明治大帝”，飛鳥井雅道解釋說：“這是因為在日本近代史——不，在日本的整個歷史中——除了明治以外，再無其他大帝。明治天皇無疑留下了一代圣君的足跡。”[[13]](#_13__Fei_Niao_Jing_Ya_Dao____Min)

1. [[1]](#_1_63)  Erwin Baelz, "aid-LKG",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7. 此處提到的“井上”指的是提倡現代生活方式的井上馨。

1. [[2]](#_2_63) 1927年，日本正式宣布將他的生日作為全國假日，但在1948年（美國占領期間），這個節日被改稱為“文化節”。

1. [[3]](#_3_63) 日本人將明治時代有代表性的建筑物，集中移建在名古屋郊外一處風景優美的地方，取名“明治村”。——譯注

1. [[4]](#_4_63)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09頁。

1. [[5]](#_5_63)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25頁、第151頁。

1. [[6]](#_6_63) 基督教（新教）的一個社會活動組織。1865年由牧師卜維廉（William Booth)和卜凱瑟琳（Catherine Booth）創立于倫敦。該組織以救濟貧困為主旨，廣泛進行宗教宣傳，招收教徒，并舉辦慈善事業。1878年起仿效軍隊形式進行編制，教徒稱“軍兵”，教士稱“軍官”。1880年正式定名為“救世軍”，后發展到歐美各國。——編注

1. [[7]](#_7_63) 關于祭拜祖先，請參閱坊城俊良，《宮中五十年》，第34—35頁。

1. [[8]](#_8_63) 侍從日野西回憶道，在日俄戰爭期間，天皇失去了對娛樂活動的全部興趣，完全埋頭于國家事務。他的唯一消遣就是聽留聲機（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24頁）。根據侍從坊城回憶，天皇的留聲機是一臺老式的機器，有一個喇叭來播放蠟筒唱片（《宮中五十年》，第40頁）。唱片為“健康曲子”，由此推測它們可能不是流行歌曲，而是激動人心的歌謠。

1. [[9]](#_9_63)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46頁。

1. [[10]](#_10_63)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52頁。

1. [[11]](#_11_63) 日野西資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53頁。

1. [[12]](#_12_63) 在深愛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過世后，維多利亞女王沉湎于悲傷之中，有五年時間拒絕召開國會。《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力勸她“聽一聽臣民的呼聲，想一想自己身居高位的職責，不要因為沉湎于徒勞的悲傷之中而再拖延下去了”（Giles St. Aubin, Queen Victoria , p. 344）。

1. [[13]](#_13_63) 飛鳥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頁。
2. [[14]](#filepos1252) 本系列精品版由微信公眾號 啃讀精品匯制作 歡迎關注！

本書由微信公眾號【Kindle圖書共享】（ID:DZSGX8）分享，歡迎關注我們下載更多優質Kindle圖書。

同時歡迎關注：

公眾號【Kindle圖書庫】（ID:pushebook）下載更多免費暢銷圖書。

公眾號【電子書部落】（ID:DZSBL18）免費提供推送、搜索Kindle電子書服務。

公眾號【Kindle圖書匯】（ID:DMS411）下載更多免費暢銷Kindle電子書。

（本書僅供學習交流，請勿用于商業用途，請于下載后24小時內刪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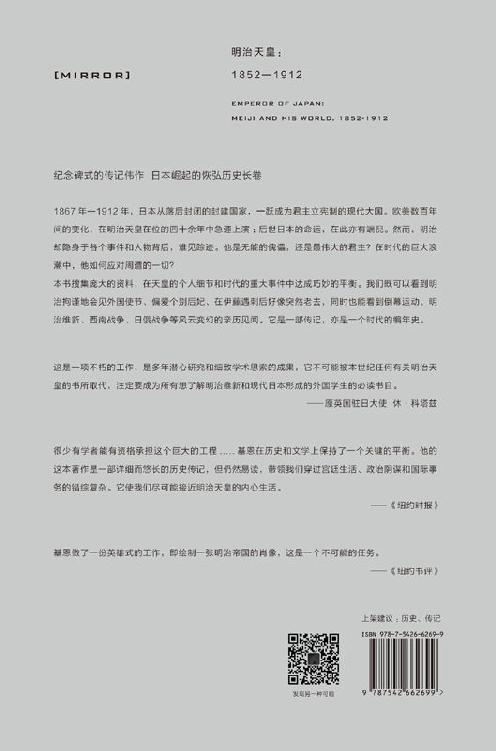


Table of Contents

[理想國譯叢序](#filepos1011)

[序章](#Xu_Zhang)

[第一章孝明天皇](#Di_Yi_Zhang_Xiao_Ming_Tian_Huang)

[第二章祐宮出生](#Di_Er_Zhang_You_Gong_Chu_Sheng)

[第三章開國難避](#Di_San_Zhang_Kai_Guo_Nan_Bi)

[第四章下田條約](#Di_Si_Zhang_Xia_Tian_Tiao_Yue)

[第五章安政大獄](#Di_Wu_Zhang_An_Zheng_Da_Yu)

[第六章賜名睦仁](#Di_Liu_Zhang_Ci_Ming_Mu_Ren)

[第七章和宮下嫁](#Di_Qi_Zhang_He_Gong_Xia_Jia)

[第八章“征夷大將軍”](#Di_Ba_Zhang__Zheng_Yi_Da_Jiang_J)

[第九章蛤御門之變](#Di_Jiu_Zhang_Ha_Yu_Men_Zhi_Bian)

[第十章家茂去世](#Di_Shi_Zhang_Jia_Mao_Qu_Shi)

[第十一章孝明駕崩](#Di_Shi_Yi_Zhang_Xiao_Ming_Jia_Be)

[第十二章美子皇后](#Di_Shi_Er_Zhang_Mei_Zi_Huang_Hou)

[第十三章末代將軍](#Di_Shi_San_Zhang_Mo_Dai_Jiang_Ju)

[第十四章將軍遁走](#Di_Shi_Si_Zhang_Jiang_Jun_Dun_Zo)

[第十五章接見公使](#Di_Shi_Wu_Zhang_Jie_Jian_Gong_Sh)

[第十六章五條誓文](#Di_Shi_Liu_Zhang_Wu_Tiao_Shi_Wen)

[第十七章親王叛亂](#Di_Shi_Qi_Zhang_Qin_Wang_Pan_Lua)

[第十八章東都江戶](#Di_Shi_Ba_Zhang_Dong_Du_Jiang_Hu)

[第十九章剛、毅、木、訥，近仁](#Di_Shi_Jiu_Zhang_Gang___Yi___Mu)

[第二十章英國公爵來訪](#Di_Er_Shi_Zhang_Ying_Guo_Gong_Ju)

[第二十一章帝師元田永孚](#Di_Er_Shi_Yi_Zhang_Di_Shi_Yuan_T)

[第二十二章廢藩置縣](#Di_Er_Shi_Er_Zhang_Fei_Fan_Zhi_X)

[第二十三章初次巡幸](#Di_Er_Shi_San_Zhang_Chu_Ci_Xun_X)

[第二十四章“征韓”論爭](#Di_Er_Shi_Si_Zhang__Zheng_Han__L)

[第二十五章江藤新平之死](#Di_Er_Shi_Wu_Zhang_Jiang_Teng_Xi)

[第二十六章早蕨之局](#Di_Er_Shi_Liu_Zhang_Zao_Jue_Zhi)

[第二十七章西南戰爭](#Di_Er_Shi_Qi_Zhang_Xi_Nan_Zhan_Z)

[第二十八章功臣？叛臣？](#Di_Er_Shi_Ba_Zhang_Gong_Chen__Pa)

[第二十九章大久保遇刺](#Di_Er_Shi_Jiu_Zhang_Da_Jiu_Bao_Y)

[第三十章吞并琉球](#Di_San_Shi_Zhang_Tun_Bing_Liu_Qi)

[第三十一章格蘭特到訪](#Di_San_Shi_Yi_Zhang_Ge_Lan_Te_Da)

[第三十二章教育改革](#Di_San_Shi_Er_Zhang_Jiao_Yu_Gai)

[第三十三章籌備憲法](#Di_San_Shi_San_Zhang_Chou_Bei_Xi)

[第三十四章卡拉卡瓦訪日](#Di_San_Shi_Si_Zhang_Qia_La_Qia_W)

[第三十五章自由民權](#Di_San_Shi_Wu_Zhang_Zi_You_Min_Q)

[第三十六章濟物浦條約](#Di_San_Shi_Liu_Zhang_Ji_Wu_Pu_Ti)

[第三十七章巖倉逝世](#Di_San_Shi_Qi_Zhang_Yan_Cang_Shi)

[第三十八章江戶的舞會](#Di_San_Shi_Ba_Zhang_Jiang_Hu_De)

[第三十九章太子嘉仁](#Di_San_Shi_Jiu_Zhang_Tai_Zi_Jia)

[第四十章帝國憲法](#Di_Si_Shi_Zhang_Di_Guo_Xian_Fa)

[第四十一章修學習業](#Di_Si_Shi_Yi_Zhang_Xiu_Xue_Xi_Ye)

[第四十二章大津事件](#Di_Si_Shi_Er_Zhang_Da_Jin_Shi_Ji)

[第四十三章條約改正](#Di_Si_Shi_San_Zhang_Tiao_Yue_Gai)

[第四十四章對清宣戰](#Di_Si_Shi_Si_Zhang_Dui_Qing_Xuan)

[第四十五章旅順屠殺](#Di_Si_Shi_Wu_Zhang_Lu_Shun_Tu_Sh)

[第四十六章馬關條約](#filepos1962658)

[第四十七章暗殺閔妃](#Di_Si_Shi_Qi_Zhang_An_Sha_Min_Fe)

[第四十八章英照皇太后](#Di_Si_Shi_Ba_Zhang_Ying_Zhao_Hua)

[第四十九章藩閥終焉](#Di_Si_Shi_Jiu_Zhang_Fan_Fa_Zhong)

[第五十章義和團運動](#Di_Wu_Shi_Zhang_Yi_He_Tuan_Yun_D)

[第五十一章英日同盟](#Di_Wu_Shi_Yi_Zhang_Ying_Ri_Tong)

[第五十二章禍機暗藏](#Di_Wu_Shi_Er_Zhang_Huo_Ji_An_Can)

[第五十三章戰前交涉](#Di_Wu_Shi_San_Zhang_Zhan_Qian_Ji)

[第五十四章“發現敵船”](#Di_Wu_Shi_Si_Zhang__Fa_Xian_Di_C)

[第五十五章日俄談判](#Di_Wu_Shi_Wu_Zhang_Ri_E_Tan_Pan)

[第五十六章高宗抵抗](#Di_Wu_Shi_Liu_Zhang_Gao_Zong_Di)

[第五十七章慶子去世](#Di_Wu_Shi_Qi_Zhang_Qing_Zi_Qu_Sh)

[第五十八章伊藤遇刺](#Di_Wu_Shi_Ba_Zhang_Yi_Teng_Yu_Ci)

[第五十九章吞并韓國](#Di_Wu_Shi_Jiu_Zhang_Tun_Bing_Han)

[第六十章“大逆”陰謀](#Di_Liu_Shi_Zhang__Da_Ni__Yin_Mou)

[第六十一章天皇駕崩](#Di_Liu_Shi_Yi_Zhang_Tian_Huang_J)

[第六十二章乃木徇死](#Di_Liu_Shi_Er_Zhang_Nai_Mu_Xun_S)

[終章](#Zhong_Zhang)